

本书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复制或传播，违者必究。

八九民运史

陈小雅 著

本书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复制或传播，违者必究。

关于本书

本书是一部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的修订本的分卷版。本书综合了二十多年来新披露的文献资料、本人的采访、研究，除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和“89/64事件”过程外，重点聚焦了一些公认的大案、疑案、悬案，探讨事件发生前后的朝野互动、高层博弈、民间竞争和精英分野等问题，并对其背后的隐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书共十卷，约129万字。

作者：陈小雅

出版：公民社 公民力量主办

版次：2019年5月 第一版

实体版国际书号：ISBN-978-1-950834-01-3

电子版国际书号：ISBN-978-1-950834-11-2



作者简介

陈小雅，女，1955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过工人、干部、编辑记者，现退休。1996年因出版《八九民运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任上被解聘。出版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文集》，《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摇篮与墓地--恢复的思想和道路》



Table of Contents

[关于本书](#)

[作者简介](#)

[序言](#)

[第一卷 红玫瑰：从盛开到凋谢](#)

[目录](#)

[第一章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第二章 执政理念分歧与权力斗争激化](#)

[第三章 胡耀邦下台——与学运的结缘](#)

[第二卷 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

[目录](#)

[第四章 大气候，小气候](#)

[第五章 临界点](#)

[第二卷注释](#)

[第三卷 悼念引发抗议潮](#)

[目录](#)

[第六章 胡耀邦逝世](#)

[第七章 第一个回合——寻找交手接触点](#)

[第三卷注释](#)

[第四卷 低谷与高峰](#)

[目录](#)

[第八章 警钟鸣响——“四二六社论”前后](#)

[第九章 走向高峰的学生运动](#)

[第四卷注释](#)

[第五卷 赵紫阳“新政”与运动转折](#)

[目录](#)

[第十章 总书记拨转船头](#)

[第十一章 从学运到民运](#)

[第五卷注释](#)

[第六卷 高层变局](#)

[目录](#)

[第十二章 中苏峰会：最后的晚餐](#)

[第十三章 “五一七”政变](#)

[第六卷注释](#)

[第七卷 顶牛](#)

[目录](#)

[第十四章 民间竞争](#)

[第十五章 保卫北京城](#)

[第七卷注释](#)

[第八卷 天安门之变](#)

[目录](#)

[第十六章 主角的替换](#)

[第十七章 形势急转](#)

[第八卷注释](#)

[第九卷 六月腥风](#)

[目录](#)

[第十八章 收网](#)

[第十九章 清场](#)

[第九卷注释](#)

[第十卷 大结局](#)

[目录](#)

[第二十章 死亡迷雾](#)

[第二十一章 民心的测试](#)

[第二十二章 八九人物之去迹](#)

[第十卷注释](#)

[后记](#)

《八九民运史》初版序言

“人不能两次涉足同一河流。”

如果相信赫拉克利特的这个断言，一切历史的研究和著述，除了供人怀古，供当事人或更准确地说供胜利者自娱以外，将毫无意义。在文化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仍处于计划体制状态下的时代，即使是历史的著作，也难免“按需生产”。

这种状态下的生产者，生产（而不是创造）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为自己谋得“饭碗”。如果倒退20年，写作和出版此书，第一个收获必是这后一层意义的消失：我将肯定会因此失去已有的“饭碗”。直到现在我也不能保证，这不会成为事实。因为在生存状态方面，我仍大部分受制于计划体制。好在我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赞同者，六年前还曾在《光明日报》撰文，鼓吹文化生产者也要“砸铁饭碗，捧泥饭碗”。

有所言，最好也有所行。也许此次出版《八九民运史》就是我的一个机会。也好在人生有限，它迫使我时刻考虑，如何把上帝交给我的东西还给上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就有一种超然。面对良心，无意取媚于任何人。

本书写作时所本良心，是一种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感。它与我曾经从事过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相似，那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真相。只有在知道所有真相的基础上，人民作出的自主选择，才是符合民主理想的选择。一切价值的“重估”才有现实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是正义的基础。而我，是兰克的信徒。

一、八九民运与十年改革

“八九民运”没有胜利者，就同“六四”镇压没有失败者一样。至今人们提到它时，那种厌恶与消沉的情绪或许可以作为这一判断的佐证。我的朋友，无论是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至今仍坚持科学立场的研究者，或持“政府派”立场的官员，都觉得我选择这个课题是在与自己为难。显然，他们对赫拉克利特名言的体会比我深刻。

八九民运，就内容和规模来说，是中国人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六四镇压，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有过的事件。这件事情的结局，在共和国记忆中留下的痛楚，与其在每一个公民心里留下的荒诞感几乎同样浓重。所以，对它的回味，对于任何爱国者和民主理想的信奉者来说，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愉悦。人类有逃避痛苦的本能，历史学者也并非天生的自虐狂。但如果这痛苦的根源将无休止地酿造历史的苦酒，这荒诞的魔匣将无节制地导演蠢剧，人们就不得不面对之，解析之。“‘不经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小智小慧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傅雷先生如此说过。

“八九民运”是失败的。它打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改革的进程。但“八九民运”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所得所失，而在于这所得所失中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前进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按照黑格尔“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它之所以能“中断”一个事物的进程，必是这一事物有它自身的局限性。而问题恰恰在于，“八九民运”并非外界强加给“十年改革”的事物，而是这种改革路线、模式、目标本身，在后毛泽东时代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民运史”的研究，是“十年改革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十年改革史”又是共产世界运动变迁的一个重要范例。我可以藐视我的选择，但无法回避历史的召唤。

社会没有参照系，就如同人在大雾中行走。反观来路，是旅人确定脚下位置的第一个判断根据。尽管人们的结论会因各自的视野而不同，但事实，却将为判断奠定最终的底线。

对于“八九民运”的研究也是这样。自1989年以来，国内由官方不同机构出版的“大事记”、纪实文学和述评类作品，海内外当事人的回忆录，尽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带有片面的色彩，但它们的出现，对于“底线”的澄清是有着互补效益的。本书的事实依据，除本人亲见、亲历、亲访者外，都是在综合比较它们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或解析而成。相信这类概括笼罩的面积越大，其抽象就越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本书与所有前人做出的努力不但不相排斥，相反，在追求“事实真相”这一点上，精神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人们对事实的评价，将根据各自的信仰和价值准则作出。

我们首先需要事实，也需要对事实的初级归纳。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感谢那些官方的报告，侦察的证据，和大量的宣传品。它们中的许多，尽管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别有用心的裁剪，断章取义的排列，但多少总能反映一些事实。例如陈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他说：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这场动乱……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插手。”

他的这些归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相当准确，看到了问题的要害的。循着他的这一启发，我们得以看到：

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暴露了执政党和它的领袖与人民的矛盾。“主权在民”，是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原则。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权持有者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和他的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建立在他们对中国5亿农民的解放这一历史功绩和他们对人民的“共产主义”许诺基础上；邓小平和他的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建立在改革开放重新解放劳动和知识生产力这一事实，以及他们对人民“四个现代化”许诺的基础上。曾几何时，学生的游行队伍里自发地亮出了“小平，你好！”的标语，体现了天心、民心、民族之心，人心所向。仅仅五年不到，在同一个队伍，同一个地方，人们却喊出了“打倒……”的口号。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民的前一个口号是正确的，后一个口号是反动的。它的出现，迫使执政党反躬自问，究竟在哪些方面背离了民心，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自己将如何防止从一个合法统治者，蜕变为一个仅仅靠暴力维持的政治寡头。

对此，邓小平是做了反思的。1989年5月31日，他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说：

“第一，我们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觉到面貌一新……人民是看实际的，否则真正就要永无宁日。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第二条，是真正办几个实绩，要惩治腐败，要取信于民……要拿事实给人民，这样人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

这个道理，千真万确！

陈希同的报告告诉我们，八九民运的第二个意义，在于揭示了“十年改革”路线、方针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共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在这个特别需要统一行动，特别需要用新的思维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历史新时期里，正是由于这条路线的存在，使

来自意识形态的诘问每每成为左右改革探索实践的震荡之源：“四个坚持”成了一切党内迫害、龃龉和社会压制，尤其是对改革者实行清算的罪恶之源。在“六四”镇压后的大清洗中，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组部长宋平说：“这次动乱和暴乱的煽动者、组织者、指挥者，不少是共产党员。”中共元老彭真也指出，八九民运是党内、军内矛盾，及其它多种社会矛盾的交叉。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这个党内矛盾的正宗源头。对此，那个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的始作俑者，胡乔木在晚年已有所悔悟。

陈希同的报告还告诉我们，八九民运的第三个意义，在于暴露了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八九民运中，学生和民众根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断冲破政府关于游行、结社和贴大字报的禁令，说明了现行政治原则、法规体系与宪法精神的冲突；暴露了在统治者心目中，法，与几千年古代社会一样，是制裁和限制人民自由的工具，而不是现代社会中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守护神；尤其是由“四二六”社论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事实，暴露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奉行“习惯法”的国度，而并非一个“立宪国家”；宪法的所有条文，由于中共党的地位、党的纲领、党的政策路线的实际高于一切，都不得不以“将来进行时”屈居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

按照陈希同报告的归纳，八九民运的第四个意义，在于它暴露了现行“集中计划—动员”型体制的弊病。谣言四起，谣言惑众，首先是政治缺少透明度，传播媒介的垄断，政治表达与意见传输机制功能的退化，社会缺少缓冲机制，以及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曾试图以增加新闻的自由度对这一矛盾进行调节，但在未改变“动员型”体制的情况下，新闻媒介的单项改革，不仅无力平息已经发生的动荡，相反只能加剧事态的扩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陈希同们痛诋谣言之可恶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政府堂堂皇皇的出版物上，公开的散播和制造谣言。例如，某书刊载的一篇“某学院一名二年级学生”题为《痛定思痛，我悔！我恨！》的“日记”，

就伪造了“新华门事件”的所谓背景材料。这篇“日记”说：“1989年4月20日星期四 在老IU带领下，我们班今天有人去新华门，听说打起来了。我没去，因为小OU说要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有资格、有能力来领导？”而事实是，4月20日凌晨参与新华门冲突的学生，是4月19日晚前往请愿的。按照一般人写日记的习惯，记述者要么在4月19日当晚记入：“今晚……”如何如何；要么在4月20日的日记中追述：“昨晚……”如何如何。而且，“新华门事件”中所谓“打倒……”的口号，现已有各种回忆和调查资料证明，纯粹是在一女生“被强行带离现场”的情况下，偶然呼出的，根本不是并不知道当日会强行清场的学生“有预谋”的活动。政府或暂时不能超越政府立场的材料存在这类问题，学生和社会其他组织的传单、大小字报及回忆材料也同样存在。这就给不可能事必躬亲的史书作者留下了大量的考证事务。而本书的义务，就在于本着历史的良心，对那些众说纷纭的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并试图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无法做出判断的地方，公开存疑不论。

根据陈希同提供的思路所归纳的八九民运的意义，当然不可能是全面的。因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对“十年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进展和成果作出了检验：在这个政权下，人们仍需要用肚皮去推销他们的脑袋——用绝食的方法去阐扬一种观点，一个思想；它提醒人们重新考察所谓“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重新审查打着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旗号分享政权的“多党合作”的实质。它使人民再次认识到，那种没有制度保障的所谓共产党的“自我监督”、“自我革命”及自身调节的局限性，而最终大大提高人民发挥自身历史主动性的觉悟，并使这种潜能变为现实的时间大大提前。

恩格斯说过，无情的历史，应是觉悟了的现代人的史前史。今后的历史，应该是与文学的精神、道义的精神和人性统一的历史。

二、八九民运与中国现代化

此外，八九民运还存在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它对人民、对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因素，以及对适应政治现代化要求的变革理论的检验。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剥开八九民运全民性“抗议腐败，要求公平”的表层，触及这一“冰山”的水下部分，我们不难看出，它的出现，与知识界的崛起，知识阶层独立意识及全体人民参政意识的觉醒，以及它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要求的自觉适应是分不开的。

无可否认，无论是作为运动的思想提供者，还是实际运作者，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次运动的一个主要角色。他们呼唤了这样一场运动，但却没有能力将它善始善终。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顽固拒绝现代政治思维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知识群体缺少社会基础与适用理论及操作方案的结果。从八九民运中他们的行为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进行宣介和据以操作的思想、理论、技术手段，一部分来自西方启蒙时代的民主革命理论和历史经验；一部分来自近现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潮；一部分来自近年来东欧民主运动的实践；一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和毛泽东思想。显然，如果书写一部《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八九民运无愧于它的探索阶段的首篇。但指望这场运动，能够在一面如同西欧中世纪地图一样色彩斑斓的旗帜指引下取得胜利，无疑是痴心妄想！

就象骑手听到战马的嘶鸣，水兵渴望大海的召唤一样，八九民运对于每一个想在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留下痕迹的人，都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面对一个如此巨大，布景、灯光看来都一应俱全的舞台，每一个希望成为历史正剧主角的人，都响应自己心灵声音的催促匆匆登台亮相。但是，决定登台的演员，在大幕拉开的一瞬间很少领悟，自己不仅没有化好妆，没有背熟台词，甚至连剧本都不知道。许多人的主演意识让他们不停地发表一个又一个的宣言，一次又一次地预告着新时代的到来，但脚步却随错乱的群众

晕头转向。在大部分情况下，义气、血性、情感比理智更有感召力。精英的本色，往往淹没于他们所从由来的土壤。

不过，在众多“脑袋跟着鞋子走”的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用脑袋走路”的人。在介入运动的所有知识精英的圈子中，唯一拿出了行动方案，并付诸操作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清洗”中被判处13年徒刑、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陈子明。早在4月底，他便设计出了一个“三线”计划，即：一线，由学生组成，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二线，由对学生有影响力，有社会知名度的知识界人士组成；三线，由他主持，专司和政府谈判。不过，这个看来完善的计划，在与实际对接时，难免有错位的嫌疑和实施的困难。这或许也是他所领导的在野政治家集团始终未能与“体制内精英”形成联盟，就在他已依靠“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空降广场后，“一线”的学生领袖拒绝合作的原因。

综上所述，无非是想说明，“八九民运史”的研究，对于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它至少可以提供一条底线。它告诉精神和思维仍停留在旧时代的人们：历史已经进步；也告诉以激情和幻想为食粮的人们：中国的社会发育、“政治人”的理性生长、自组织与应变能力，尚处在初级阶段。它期待中国的进步，更期待这进步是切实的。

就象于光远先生所说，“股票市场是中国人学习市场经济的课堂”一样，八九民运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人学习现代民主的课堂。它不仅为政治精英提供了将民主理想原则付诸实践的实验场，也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检验这些理论的丰富实例和资料。尤其是对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它将是一个极具开采价值的“富矿”。在这方面，香港学者或许已走在了前面。但是，通过对史的了解，人们便会知道，要接受那些人们为八九民运抽象出来的民主制概念背后的事实，将远不如接受这些概念来得愉快。例如，所谓“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民运缺少负责任的领袖的产物；所谓“少数服从多数”，每每成为大众的激进主张否定理性的决断的关键环节；而“多

元化”又往往是激进分子处于少数地位或权力追求时的堂皇出路，等等。它使人们看到，那种诗人笔下竞争长高，一浪高一浪如火如荼的沸腾景象，正是事物向无序方向发展，并将从它的顶峰跌落谷底的前奏。它警告人们，民主在西方国家获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在东方土地上的无往而不胜。

三、八九民运与文革

所谓“八九民运”，从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起，至1989年6月4日北京出动军队大规模镇压止，总共只有50天时间。在此后的几天内，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太原、西安、昆明、郑州、长春、南京、哈尔滨、长沙、天津、兰州、合肥、济南、杭州、广州、乌鲁木齐、福州等地爆发了相当规模抗议性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与“八九民运”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它的性质和作用已经超出了民运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因而，在本书中，拟不作为具体描述对象。

值得指出的是，官方材料对这一事件的分期，一般采用了“56天”这一说法。这种分期法的算法，是以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为起始，以邓小平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宣布“我们党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止，显然这个分期法是以中共党的政权所面临的一场危机为视角而提出的一种时间概念，它是不适于拿来作为描述以民众为主体的这本《八九民运史》的。同时，这种分期法，也是为“从动乱到暴乱”这个镇压借口服务的。可惜的是，他们罗织的所谓暴乱罪名，多发生在“八九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这种欺骗的手法，当然只能蒙蔽舆论于一时，而不能篡改历史于万世。所以，这也是本书拒绝这一分期法的原因之一。

“八九民运”虽然前后只有50天，但是浓缩了的历史。写《八九民运史》，只不过是把这50天放在显微镜下，你通过显微镜看到的，已不仅是物体的本身，而是活活的一部现代政治进化史。正因为如此，本书不得不涉及

一些文革结束以来，进而至于“十年改革”时期的许多问题，以求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应该指出，最早对八九民运的成因进行综合概括的，是在此问题上持“政府派”立场的何新。他关于此次运动的“四大动因”与“三大背景”的论断，形成于1989年4月底至5月初。在新华社5月6日《国内动态精粹》中，刊登了何新写给中央领导人载有上述内容的信。该信关于“四大动因”是这样说的：“这次学潮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1、学生中不满情绪和促进民主改革要求的自发力量。2、大学生接受近年激进改革思潮。西方思潮和文化虚无主义三大思潮（如《河殤》派、方励之、刘晓波）影响而形成的极端的力量。3、因某些激进政治派别（指党内民主派——引者注）的暗中鼓动。4、海外敌对势力的暗中策动。”至于“三大背景”，信中说：“（1）由于近年中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使少数官员、新生资产者与多数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对立化，引起广泛不满。这一现实，也使人民对现行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怀疑。（2）由于屡次失误，使人民对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值降低。（3）通货膨胀的发展，侵害中下层人民生活，引起大家广泛的不满。”——他的这些天才论断，因后来服务于中共对知识界和社会民主力量的大清洗、大镇压而臭名昭著，但当时光流逝，意义纷争的大潮退去之后，面对历史与科学的研究，这些论断仍能给人们一种水落石出之感。

在探讨八九民运发生原因时，我们不得不谈到与之时间距离最近，规模和形式最相近的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样的联想，也许是对这场运动持“政府派”立场者所愿闻，而“民运派”会引以为痛心的。但问题是这种联想、比较有没有根据？其次，才是对它的解释与评价问题。

勿庸回避，八九民运和文化革命在形式上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除大小字报，游行集会，总部运动，绝食静坐之外，串联全国（当时还没有“通电海外”一说），指名道姓地要见领导人，搞“百丑图”等，在思路、语言上也有许多类同。对此法国《费加罗报》特派记者曾撰写了《中国：文化革命

的幽灵》。他说：“从昨天（5月1日）开始，学生运动已进入第三周。某些观察家（他们不同于当局那样挥舞文化革命的幽灵来吓人）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大字报、传单、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反对贪污腐败和反对派中不同派别的分裂。”5月18日，香港《快报》更是把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与“倒邓狂澜”联系起来，说“现在的情况，有点象文革时期毛泽东藉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斗倒的翻版”，称赵的此举是“活用毛泽东的高招”云云。

凡此种形式上的比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虽然可以说明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文革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但这种政治文化只不过是传统政治结构和“两极社会”的一个现代标本而已。从东西方政治运动比较可以看出，所谓文革特色，其实就是“揭杆为旗，斩木为兵”的“造反型”特色。它是“动员型”而不是“协商型”政治偏离常规的产物，同时也行使其再造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特色并非造反派的创造，它的最终制造者还在国家和政府。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

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后者是自觉革命。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的钟馗而已。80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领导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

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构成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抗。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新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级，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

为了重建1949年奠定的阶级秩序，寻找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基础，与文革上台派华国锋进行政治斗争，需要彻底地否定文革，打掉文革造反派；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新的承诺，也需要重视知识文化和重用知识分子。于是，便形成了重新“正位”的特权阶级与知识阶层在邓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撮合下的短暂蜜月。但在这个貌合神离的“婚姻”中，知识分子并没有获得主人翁地位。一方面，要“用”知识分子“有用”之处，使之为四化建设、为人民造福。另一方面，对知识阶层要求扩大参政权利，并使之不再是一种“优惠知识分子”的政策，而是一种民主制度的要求，予以通透的拒绝。针对知识阶层“政治多元化”的要求，1989年春，中共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与民主党派座谈时重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反对党，搞西方的那一套，我们

不同意。在座的民主党派也不会同意。不合国情……如果主张多党制，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书生之见。

正是这种新的压抑，及片面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又一次把知识阶层与人民大众轧成了一个整体。他们本质上仍有区别的诉求，共同组成了八九民运的抗议声浪。

人们普遍感觉到，阶级斗争理论在十年“淡化”之后，八九民运中突然又变得好使起来。一位在八九民运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青年帮”成员，笔者的朋友，也曾在与本人大谈革命畅想之后，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们就是要“革”你老头子这种人的“命”。一份署名“全国工农群众联合行动指挥部”题为《看准目标，勇往直前——再造一次中国工农群众南征北战的辉煌成果》的传单说：要“牢记阶级恨，莫忘血泪仇”，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现在要反抗无产阶级专政下滋生的红色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

读一读郑义的书信体传记文学《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八九民运对于文革的这一主题的继承性。作为文革前的一位地位受歧视者，文革初期的受迫害者，以后的造反派，他以“人权”的名义声张了那种“造反”的合理性；继而解释了，作为八九民运的重要“黑手”——他的思维与文革造反依据的一脉相承性。

他的“反特权阶级”的灵魂，代表着在八九民运中构成左翼激进主义呼声的全部“理性”。由他担任主要起草人的《五一六声明》，可称之为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

但是，八九民运决不是80年代再版的文革。它的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造反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大多数参加者所持有的对法制与秩序的要求。这一首先由学生运动表现出来，并贯穿运动始终的特点，曾给知识界人士以极大的感动。后来被判处13年徒刑的王军涛，在4月下旬与本人的一次见面中也谈到：

“过去的学运是北大挑头，口号是自由、民主、人权，这次的运动以法大为核心，口号是法制。过去那种口号，政府很容易接过去，他们给你摆历史，划阶段，然后是阐明‘代议制’的合理性，把抽象变成具体；而这一次讲法制就要与宪法对条文，回答不了的问题就要有承诺。”“这次运动使我对前段大众文化又有了新的评价，一是它对于人的个体的自我觉醒的意义，从非理性中看出理性：使人变得无畏，无宿命感，认识命运就在自己手中。他们不能再指望别人。那些自称有历史责任感，被青年们视为精神领袖的人，在这个时候为了忙出国，差一点写了悔过书。二是在一片悲观失望之后，人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自我牺牲、崇高、廉洁的东西，仍然能得到人们的尊重。”

的确，青年学生虽然提不出更多的理论、方案，他们却为这次运动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主体。他们所倡导和努力实践的“和平、民主、法制”原则，得到了除政府中少数人外的全社会普遍的尊重。

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八九民运是一场群众自发的平等要求与学生 and 知识阶层的民主追求相结合，而共同参与发动的运动；没有什么理由把一场有着社会心理广泛基础的运动归结于“极少数极少数人”恶意煽动和阴谋策划的结果；也没有什理由把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知识阶层与学生群众的合法权利区别看待。如果不是深怀阶级偏见和本能地对知识阶层怀有仇恨心理的话，至少应该承认，党的领袖、普通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待业青年，一切拥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权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遗憾的是，在八九民运中，我们屡屡听到政府官员与共产党的领导们，站在全体公民为之筑起的讲坛上，把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离间，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进行离间，甚至毫无自责。毫无愧色地把地位低微、生计无靠，但绝对拥有公民权利的北京市民中的一部分称为“社会渣滓”。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民运领袖为了博得人权舆论的同情，也把那些与自己一样参与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有责任能力的公民称为“孩子”。假如真是那样，他们，就需要别人替他们负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在知识界内部，在八九民运问题上，也有人以难以置信的歧视对待自己曾经混迹其中的同类。请看“六四镇压”后大清洗期间何新给某中央机关刊物的上书云：“至今仍有人把1989事件看作‘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殊不知这纯粹是欺世之论。在我看来，89动乱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在这个事件中，天真无辜的青年学生早已成为被国内外复杂政治力量，无情加以利用的可怜政治工具。”他接着说：“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不是抽象民主而是十分具体的（见诸其标语口号）。其第一步目标是颠覆以李鹏为首的国务院。更深一步的目标，则是颠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整个政治领导体制（即所谓‘结束垂帘听政’和推翻‘老人政治’）。所以，从政治的直接目标看，89事件实际是一次未遂政变运动。”他还说：“事态进程表明，他们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权力。他们需要让形势进一步乱下去，直到他们最终接管权力。”

“这场运动的后期目标，是掀起兵变和全面内战。而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届时外部势力即将大规模而公开地插手，从而彻底推翻现制度”。他急切地提醒李鹏政府说：“对于1989事件，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件的这种非自发性，这有助于揭露和认识其真正的性质。”“1989事件，在极大程度上，它是被其幕后的策划者所导演的，是被种种谣言和蛊惑煽动起来的……这是一部超大型的现代化妆、居心险恶的丑剧，而决不是什么悲壮史诗。它那浓重的阴谋色彩，使学生的纯真、民众的轻信，显得更加轻率荒诞。这个事件乃是对历史和人类的一次大愚弄。”“翻案必将引发动乱。”“遗憾的是，至今（1991年——引者注）尚未全面揭露这场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质，因此，这一事件的虚假道义形象依然存在。这实际是一个隐患。只要这一隐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而导致新动乱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的警觉。”

诚然，八九民运是不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或“史诗”性事件，不应以当事人的判断为标准。甚至当代人所作出的结论，也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

当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志士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的风发意气，宣布“洋务”与改良”作为政治路线的最终破产时，他们不会想到，当革命高潮扬起的泡沫灰飞烟灭之后，在社会河床底部滚滚涌动而推进历史的，正是那些点滴的改良和近代化势力在起作用。当人们在争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民叛乱”或是人类进步的枢纽时，人们不会想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取决于路易家族的情感，也不取决于丹东、罗伯斯庇尔们的行为是否纯正，它取决于历史的走向！取决于人类作为总体的价值追求。而当人类的这种追求目标发生转换，人们将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时，他们也不妨对自己昔日谟拜的偶像弃之如粪土。所以，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是一件人类的事情，是一个关乎人类总体的价值追求的问题，是历史的事情。它与那些蝇营狗苟者的鼠目寸光、可怜私利毫不相干。

在何新的立论中，“权力”，似乎是一个类似试金石式的东西。他的逻辑仿佛是，为民主，反腐败就不应该有权力诉求；以权力为目标的运动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为了引起李鹏们的注意，这个“著名文字学家”一再使用了“颠覆”这个词汇。颠覆者，权力也。这种做法，正好不打自招地道明，“权力”恰恰是最能刺激李鹏们的一个实在的字眼。不管民运是否以夺取权力为目标，反正当权者把权力看作一切中心的中心，这一点恐怕要因为何新的这一强调，而更加昭然若揭了。那么，人们自然会反问：既然权力如此肮脏，以维护权力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又有什么正义可言呢？也许是顾及到读者并不愚钝，他注意在现“政权”前面冠以了“合法”的定语。但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恰好忘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恰恰在于它的人民的拥护。人民的革命，是当今世界一切宪法之母。革命是造法的机器，并不需要“依法”行事，就尤如上帝永远无需加入教会一样。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本人同意“八九民运是一场人民革命”的观点。如果尊重事实，就应该看到，它

的参加者既没有要发动一场革命的意识，也没有夺取权力的迹象。对此，这“学运—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有一个清楚并符合客观实际的表述。他说：

“从根本上讲，我们这些组织者和发起者在内心中是将这次运动当成一种政治表达的，当然不会想到暴力。非暴力原则和‘理性、和平’的口号一直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我们所反复申明。一旦事态恶化，我们面对赤裸裸的暴力，首先在心理上就感到无法也无力接受……6月3日在北京街头有不少枪支弹药流入民间，‘高自联’如果真的‘阴谋暴乱’的话，为什么非但没有号召把武器集中，组成一支专门的武装力量，反而通知各个路口的学生将得到的武器就地上交公安机关呢？”

“民主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到政权，而是为全国确立一个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作为学生，我们始终没有认为自己在从事一场政治运动，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投入的仅仅是学生运动，学运的目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代表人民提出问题与答案，要求政府接受。因此，在整个运动中，即使是激进的学生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采用一般政治斗争的通用策略，比如联系上层权力斗争，发动下层民众，与投入运动的其它政治力量结成同盟。”“当学运发展成为全民民主运动之后，……知识界总认为目前进行的主要还是学生运动，为了保证学运的‘纯洁性’，应该由学生起主要的领导作用，他们只起谘询、参谋作用。”

显然，在十年改革创造的社会精神文化环境下，通过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完全有条件走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八九民运，恰好是人民以非常方式表达这一愿望，表达自己的急切心理与担忧，期望亲手参加这一变革的集体行动。而拒绝人民的这一要求，漠视人民的这一愿望，对人民的合法合理要求以暴力进行回答，恰好是导致矛盾向敌对化——即改良向所谓的“革命”转变的导火索。因此，要回到真正的改革轨道，要给人民以新的信心，不仅如邓小平所说，要有新的领导群体有新的面貌，政治家无可回避的一个课题，就是对八九民运进行重新解释。

四、鲜血与粪污

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从1949年到1989年，四十年中，除1957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作为整体，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1989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的素质，至少不妨做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做戈尔巴乔夫。1988年，本人在《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之一》中曾判断，这批人物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怀着“第二种忠诚”，但被误解的布尔什维克的“屈原”和“岳飞”。其实，一年以后，因胡耀邦“含冤去世”而引发的这种压抑和不满的暴发，虽然从客观上讲有助于推动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从主观上说，却是一种“失散了的自由电子”渴望回归“原子家族”的运动。1989年5月14日，十二名学者座谈时局时，刘再复的一段话曾赢得满场笑声和掌声。刘再复说：

“我们党40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自我批评的时候还可以，但不允许别人的批评。比如大跃进，过热，我们自己说说行，但彭德怀站出来批评就不行，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就不行。这样我们党就只有一个正反馈的机制，而缺乏一种负反馈的机制……由于我们不习惯于负反馈，我们就不断地把批评当作异端，就会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这几年，我们连续对政治界、文化界、理论界一些同志的处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最后连总书记也蒙受冤屈（众笑，鼓掌）。个人受冤屈，不能视为小问题，不仅是对人的尊重问题，另一个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见的渠道。”

很难说参与鼓掌的人中没有比瓦、哈、曼、金更适合当领袖的人物，但很明显，他们并不认同于“持不同政见运动”，哪怕是在1989年的5月。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治社会中的这种“戈尔巴乔夫梦”，比戈氏本人的明星史要来得更长，更久！

也许，事情从1986年的方励之开始有了变化。但他最终托庇于美国大使馆的行为，说明他没有曼德拉们的勇气。1989年李鹏政府的一纸“戒严令”，也许把更多的人推上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但从此开始，瓦、哈、曼、金们的成长过程，如果他们不改变路向的话，不能不说将是漫长的。

任何一场群众运动，哪怕是肯定会以正面形象彪垂于史的革命运动，它本身的情况与它远播的名声，总是不相称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个判断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

“所有的旗帜，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当你瞻仰陈列在博物馆和教堂里的光荣旗帜时——在理想和希望的名义下，人们象崇敬珍宝那样跪拜在它们面前——你不要产生错觉，因为那些褐色的斑点不是锈斑，而是血迹和粪污，粪污还往往多于血迹。失败者的粪污，胜利者的粪污，好人的粪污，坏人的粪污，英雄的粪污，带着鲜血的普通人的粪污。哪里有鲜血，哪里就有粪便。前者需要后者……如果鲜血超过了粪便，

人们就唱起颂歌，竖起墓碑：如果粪便超过了鲜血，人们就高喊耻辱，并举行赎罪祭礼。”

八九民运也不例外。它的旗帜上鲜血与粪便同在、有目的的粪便、手段的粪便，学生的粪便、知识分子的粪便、北京人的粪便、外地人的粪便，甚至鲜血背后也有粪便。对此，我们只能感叹上帝的仁慈——它总是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提供同样的机会；但我们也感叹上帝的吝啬——它总是不使人满足，给人类一个完美。

对于一部史书来说，辨别鲜血与粪便的大致比例义不容辞，但它不可能象文学一样，肩负起在人类精神一切领域中道德法警与审美教师的责任。史书，只给这种审视提供一个大致背景，为它的判断免于狭隘和独断，拓展一片环顾的空间。

在八九民运爆发五周年之际，向读者献上这本《八九民运史》，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在政府尚未替民运平反，尚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对这个主题作正面论述的书籍的情况下，充当所谓八九民运的代言人。我也并不认为，此时是重新议论这件给中国人民留下巨大感情创伤事件的最适宜时机。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将对人民生活带来重大变化的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稳定。在这种时刻，人民的感情将是敏感而脆弱的。作为一个受这个民族养育，深深热爱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决不希望陷同胞于水火。同时，从技术上来说，在大量当事人滞留海外或处于有形无形的监禁，公开调查或征询意见则干脆有半途夭折的危险的情况下，本书所叙述事件的准确性难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本书之所以最终决定于此时推出，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是我感到了生命的有限；其次，是考虑发行人的利益，“五周年”这个时间似乎变成了我的最后期限；第三，正如我相信人人都有著史的权利，一个史事不妨有上百部史书一样，我相信自己的工作将为后来的有识者提供一种框架性基础。历史是螺旋型上升的，总有一天，政府和这场民运的参加者，都将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过去，他们“合作失败”的杰作，

并引以为戒。由于历史所呈现的加速度发展趋势，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而它进入史书与科研领域的时间越早，它成为“过去时”的时刻到来就越快。我最后的自信还在于，真正的强者，面对历史不需要自欺欺人；而对于真正的智者来说，成功和失败，都能化为他们的营养。

在八九民运中，我并非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时至今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里，仍存放着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四大罪名”：其一是在严家其起草的《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上签名。我本于新闻工作者良心要求所作的这一举动，因江泽民后来成了中共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而被认为是“性质严重”的事情。其二是列名发起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委会。其三是戒严令颁布后，参与起草致人民解放军士兵的一封信。其四，则是参加过两次游行。另外，还有一条使我被置于重要监控对象的原因，就是曾作为记者的我，从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关注那些新闻禁止报道的人物与团体，与他们不得不处于“地下”的活动，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在我的眼中，他们纯粹是一些被毛泽东传奇和民主化理想驱动的报国无门的有志青年。令我意外的是，这些人物和团体在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并成为海外同行和国内公安、安全部门追逐的对象。这些选择和经历，自然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对此并无丝毫遗憾。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或许还会重复这条道路。但遗憾的是，我在领受党对我生平的第一个“处分”之时，自己的内心竟有“被推了一把”的感觉。我于是理解，什么叫“第二种忠诚”。

写作此书时，第二个遗憾接踵而来。那就是由于以上原因，我无法真正地保持兰克学派要求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我的“第二种忠诚”与我对自己参与或同情的运动的辩护，每每交替出现，常常自觉有进退失据之感。向读者交代这一点，或许可以起到某种“免疫”的作用。

本书自1993年10月动笔以来，历时半年，终于1994年3月脱稿。这一写作过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写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著之不易：有时，大量的材料会勾起你那沸腾的回忆，尚未沉淀的激情会使你失去史家应有的“冷眼”；有时，理性的、有历史感的思考，会使你看不见事物在人们精神——现实可见的将来的潜在能动因素——方面的意义。例如，当我尝试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八九民运时，我们在感叹它的激进主义色彩所带来的历史的循环和历史的倒退时，我们可能正好忽视了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时代的具体的权利主体，他们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力；我以本能的超现实的“洁癖”讥评政治家或精英的手腕、机谋时，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引导读者陷入理想政治的泥沼；而当我想给人们一种高尚正直而又全面现实的标准之时，我正好在重复“愚民政治”的惯用伎俩……陷阱几乎无处不在！最后，我发现，如果我不能战胜自己的怀疑主义，那么，我便永远不能前进一步！为什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你说出你知道的，你想的，这就够了！而意理，永远是与个性同在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上帝。历史，确如一条混浊的河流，画家能画其势，音乐家能鸣其心音，而只有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才会被分离为各种成份的液体。显然，液体已不是河流，因为它已经离开了河床，离开了跳宕的走势，离开了澎湃的喧响。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囑告真诚的读者：我期待您的理解，但不奢望您的接受

1994年4月 于北京 沙滩

八九 民运史

第一卷 红玫瑰：从盛开到凋落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
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第一节 从学生到职业革命家

第二节 崭露宣传鼓动才华

第三节 抵制“极左”政风

第四节 选择苦难，同光荣站在一边

第五节 中科院“百日维新”

第六节 “拨乱反正”的“人心三策”

第七节 带领理论界、新闻界造反——邓胡协同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八节 理论务虚会

第九节 走向政治高峰

第二章 执政理念分歧与权力斗争激化

第一节 民主墙“小阳春”

第二节 分道扬镳——“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第三节 流产的“政改”

第四节 第一次基层直选

第五节 “三驾马车”的“说三道四”

第六节 胡耀邦的1983危机

第七节 陈云、赵紫阳是否“联手”？

第八节 “自由化”欲速不达

第三章 胡耀邦下台——与学运的结缘

第一节 胡耀邦“退居二线”的几种传闻

第二节 邓小平“弃胡”由来

第三节 提前交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权

[第四节 促使胡耀邦下台的四件大事](#)

[第五节 政改舆论催生的自由化浪潮](#)

[第六节 “八六学潮”天平迅速倾斜](#)

[第七节 “倒胡”生活会](#)

第一章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许良英、李盛平、郑仲兵）

宇宙时间，在我们——地球人——的生活中，是均匀分布的。或许它也有节奏，在心跳，在呼吸，但只要地球不毁灭，当今的宇宙秩序不改变，它就会均匀地存在。人类的个体，出生与死亡，对于天体运行和时间来说，不过是一次呼吸和心跳吧！

但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却不是均匀分布的。每当社会历史的心脏跳动节律发生巨变，单位时间内的历史也会变长或变短：有时，人类在一年中所实现的进步，可能超过过去的一千年；有时，他们在一天里遭逢的变故，可能倒退几万年。在这里，时间的单位价值，是不相等的！

1989年 4月 15日，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了。

历史地看，这一天从地球上消失了肉体的这个人，并不是一位政治或思想的巨人。这一天，本来也可以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平常的日子。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改革及共产党内积累的诸多矛盾、危机，以及这些矛盾、危机的交叉制衡，使千百万人的目光集中到这个日子。

就像太阳光通过凸透镜射向含碳物体一样，这一天终于燃烧了！

一个共产党前总书记的逝世，居然成了这个党治下的国家有史以来罕见的社会运动的起点，这难道不有点奇怪吗？

所以，要透视这场运动，不能不从这位逝者说起……

第一节 从学生到职业革命家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身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区中和乡苍坊村的一个多子女的农民家庭。这一年是农历乙卯年，所出生的孩子属兔。按照星相学的说法，这一天刚好轮到天蝎座在天空当值。不过，他母亲在分娩之日的凌晨，梦见的是一个“穿大红袍的人”走进堂屋。族中有文化的人说，这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

这一年在当时通行的历法中，叫做“民国四年”，也就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倒台、辛亥革命刚刚过去的第四个年头。孩子出生后的二十多天，清廷旧臣袁世凯在北京称帝。这个婴儿家乡所在的中国南方，革命党人孙中山、蔡锷等正开展护国运动，酝酿讨袁。

这个婴儿在胡氏宗族中属于“耀”字辈。父辈为他取名“耀邦”；字“国光”；父母家人则按照兄弟姊妹的排序，呼他为“九伢子”。

与贫穷的农家孩子一样，九伢子从小就参与家务劳动。据说，他3岁起就跟着哥哥上山拾柴伙。他也像别的孩子一样爱打闹，但自幼便显示出一些读书识字的天分。据族中老人说，他5岁时，就跟着读私塾的哥哥偷学了一些生字，回家就坐在门前，根据记忆，用树枝在泥土地面上画出来。胡氏宗族有男子必须识字的传统，于是，九伢子被送进了族中私塾“种桃书屋”发蒙。

1922年，九伢子7岁的时候，进入了胡氏家族所办的“兴仁小学”，在那里完成了初小学业。1926年春，他考入了文家市里仁学堂读高小。据说，从他家住的苍坊村到文家市有20里地，他每天上下学要往返40里。可以想象，这对一个10岁儿童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磨炼！而这个孩子，对这个读书的机会，又该多么珍惜！

里仁学堂的校舍，原是文庙。受清末“维新”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先进的读书人在这办起了“新学”。在耀邦读书时，学堂已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等。其中还有一门类似今日“政治课”的“公民教育课”，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些，都使得出身农村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比较全面的启蒙教育。

胡耀邦和表哥杨勇是同班同学。杨勇打架很厉害，而耀邦功课不错，这一文一武凑一块儿，谁也不敢欺负他们。

据说，里仁的校长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因深得他的器重，胡耀邦在高小就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由于里仁学堂在高涨的浏阳农民运动中非常活跃，1927年“马日事变”后，学校一度被查封。校长和两位老师遭通缉。但以后复课时，胡耀邦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也正是在这里，胡耀邦偶然目睹了一个中共党史的重要场面——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并见到了一个后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物。据文家市文博工作者说，1927年，毛泽东将攻打长沙失败的一个团农民军拉到文家市，就住在里仁学堂里。在这里，他与师长和总指挥率领的另两团汇合，并讨论了队伍的去向问题。毛泽东主张，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应放弃攻打长沙，将队伍拉上井冈山。经过争论，意见取得了一致。队伍在里仁学堂的操场集合时，胡耀邦与杨勇就趴在矮墙上看热闹。当时，毛泽东的一番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胡耀邦后来曾反复回顾这个场景：

“我12岁时，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镇集中。那天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给起义部队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的那口大缸！’”



图1-1：里仁学堂（选自网络）

1929年胡耀邦高小毕业。据称，在毕业考试时，他写了一篇描述农民艰辛生活的作文，名震浏阳。同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浏阳县立初级中学。据胡耀邦自述，那一年冬天，他在家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前夕，一生酷爱学习的胡耀邦，令人意外地匆匆中止了自己的初中学业。有人说，他是受党派遣回乡担任少先队队长兼儿童团长。有人说，红军兵抵浏阳前，城内施行了戒严，学校师生“被强制疏散”。胡耀邦趁学校停课，曾和同学一道前往长沙，希望能看到打仗的场面。但不巧遇到族中长辈，他挨了一通训斥后回到家乡。

“奉派”一说出自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可能是胡耀邦本人的说法；而“长沙行”一说，应该出自胡氏族中长辈。到底哪一种说法是真？以笔者之见，事情很可能是：学校停课时，胡耀邦并没有收到组织的指派。证据是他还有一箱书留在校舍，来不及取出。后来，他每每表示惋惜。如果是有计划离开，应该不会留下这个遗憾。而浏阳离长沙近，胡耀邦很可能是和同学自

行到长沙“观战”，然后遇族人被迫回乡。于是，负气的胡耀邦结束了自己秘密共青团员的身份，公开在乡里参加了农运。

这里的问题是，事件结束后，胡耀邦为什么没有向前一次停课一样，回到学校继续深造？是胡耀邦不愿意？还是“工作”离不开？笔者认为，很可能是，日益左倾的胡耀邦，已经不能再令族中长辈满意，而他们也再不愿意出资供其念书了。

所谓“族权”，曾被毛泽东批判为束缚中国人的“四大绳索”之一。它通常掌握在有钱有势的地方乡绅手中，在经济背景上，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地主。因没有更多资料，我们不知道胡耀邦是否参加过“打土豪”一类的阶级斗争行为。但胡耀邦家乡所在的湘东地区，正是湖南农民运动扫荡的核心地带。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那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乡绅们眼里，是“糟透了”的“痞子运动”。胡耀邦既是少先队长，又是儿童团长，不可能置身事外。浏阳是“赤白拉锯”之地，据说他当年写的标语中有这么一条“七十二行早回家，晚上被杀莫怪他”，表现了红军和白军暗中斗争的情景。对于一个日见“赤化”的少年，族人停止了读书费用的供给，也是理所当然。热爱读书的九伢子已经无可选择，不得不中途辍学，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问题在于，如果事情如此，胡耀邦为什么没有趁机演义一段从小就与地主乡绅斗争的故事呢？在一个少年人那里，当时的他与“族权”的决裂可能是一件义无反顾的行为。但到了老年，当了解了更多的社会发展史，当历史走过一个大“马鞍形”，重新回到它的起点时，胡耀邦回头叙述这个故事，他很可能已经有了新的看法。况且，胡是一个懂得感恩的、诚实的人：他不会忘记早逝的祖父留下的三个未成年孩子，是靠族人抚养长大成人；他自己毕竟也是依靠家族的接济，才读到了初中的。老年的胡耀邦，既不愿意伤及有恩于自己的族人，也不愿把此事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同时给自己

脸上贴金。他事后既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显然，“奉派”一说也是过得去的。

回乡后的胡耀邦，依当地当时的文化水准，已经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所以，他参与了创办列宁学校的活动，据说还兼任了该校的政治和文化教员。到这一年10月，他已经是中共湘东儿童局的局长了。

1933年，经地方团组织推荐，来自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巡视员冯文彬将胡耀邦带到了中央苏区所在的瑞金。但不久，耀邦就在“肃清AB团”的运动中受到株连，险些被枪毙。这是他一生遭遇的“十次大难不死”的第一次。经此劫难，他与冯文彬、张爱萍结下了终生的革命友谊。这次被审查、被冤枉的经历，对后来“四清”中胡耀邦不愿意搞扩大化，文革后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

不久，胡耀邦接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青年部长，以后又转任该同盟的宣传部长和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等职。1933年9月，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第二节 崭露宣传鼓动才华

1934年到1935年，胡耀邦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中共党史上以艰苦和漫长著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也是从江西出发，到达陕西吴起镇的七千个幸存者之一。他曾眼见一个又一个战友在身边倒下，有冻死、饿死，或被沼泽吞没的。他甚至亲眼看见一个连指导员，在绝望中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在著名的娄山关战役中，他曾身负重伤，经历了他人人生“十次大难不死”的第二次。接着他又患疟疾，是杨勇用马把他驮出了草地。伤愈后胡耀邦转作民运工作，又在征粮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长征结束

后，他参加了进军山西的“东征”，担任石楼县工作组组长。其发动群众，征兵、征粮的工作效率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并被指名作报告。

后勤给养工作的性质，使很多人免不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胡耀邦却能洁身自好。据他当时的警卫员回忆，有一次，他在一个已经被抄过家的地主家的天花板上找到两口装满布匹、衣物和皮衣的大木箱，准备给耀邦换两件衣服。不料，耀邦知道后大发脾气。他对警卫员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发财党”，“这些东西是地主剥削人民的血汗，应还给人民。”他让警卫员马上把这些东西送到区政府去。

1935年底，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作重新任命时，胡耀邦仍为中央局成员，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

1937年，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次年，被任命为“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据胡耀邦对严如平回忆，他曾约毛泽东为抗大校刊写文章。毛听了他对学员情况的汇报后，赞扬他叙述很有条理，后来就写下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

1938年，胡耀邦又以开展中国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而闻名延安。

1939年，毛泽东亲自提名，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图1-2：胡耀邦的青年时代（选自网络）

1945年4月，胡耀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5至1949年间，他先后担任过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任华北人民军第一兵团（后又改为直属中央军委的18兵团）政治部主任，在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中，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

《攻取太原紧急动员令》是一份很少见的战争年代遗留文献，从中可以看出胡耀邦的宣传鼓动才能：

“太原是山西省城，是敌人留在我们华北解放区内一个孤立的大据点，它有数十万人民，又是华北的一个大工业与大兵工厂城市，我们打下了太原，不仅最后彻底歼灭了阎军、解放了全山西人民，而且夺得了一个巩固的大工业、大兵工厂根据地，对全国革命战争的支援有极大的帮助……正因为这样，敌人一定还要拼命抵抗。这就是说，攻取太原的意义很伟大，也很艰巨，凡是参加作战的人都是非常光荣的，牺牲的烈士将要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我们号召全体指战员同志们，都做夺取太原的英雄，打下太原立大功！”

由于胡耀邦总是深入前线，身先士卒，他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在不利的战争条件下焕发出极大的战斗力。为此，他也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同延安时代就结下战友情谊的李昌到前线视察，敌机突袭扫射，将正端着碗在指挥所吃饭的胡耀邦的饭碗打碎。另一次是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棉帽。

从那时候起，胡耀邦爱读书的习惯，就给李昌留下深刻印象：

“每打下一座城镇，他都要搜集历史、地理和各种书刊典籍。行军时，他骑在马上看书，读一页，撕去一页；读一章，撕去一章。”

胡耀邦认为，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提高战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为此，他于紧张的战争生活中主持编写了一本《革命军队三字经》。他还创建了“流动铅印车”，坚持出版铅印的《前卫报》。在此期间，胡耀邦与聂荣臻、徐向前、杨得志等军队将领结下了战斗友谊。这几位将领后来在八九民运中的态度，与此不无关系。1989年4月17日，胡耀邦去世的第三天，聂荣臻曾致信李昭，介绍耀邦在华北部队先后担任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时的情况。聂帅说：

“他很善于抓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华北，讲形势任务，宣传鼓动，使部队很活跃，士气高昂。与耀邦共事接触过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没有不称道的。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经历了各个最主要战役，指导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1949年9月，胡耀邦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0名代表之一，进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并参加了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是年底，回到十八兵团的胡耀邦率部与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汇合。随后，被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与邓小平的工作关系，始于这个时期。

第三节 抵制“极左”政风

与胡耀邦同在川北工作过的黄天祥回忆，那时的胡耀邦就以“土地不会增加，但人口会不断增加”的道理，鼓励“土地还家”后的农民增产增收。当这句话被《新华日报》记者批为“马尔萨斯主义”时，耀邦说，这不是什么主义，是常识！

1952年7月，胡耀邦奉调进京，被毛泽东钦点接替冯文彬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耀邦任职初始，毛泽东几次主持会议讨论团的工作，并指示：青年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根据这个指示，胡耀邦创造性地发挥为，青年团要像地球一样，既要围绕党这个太阳转，又要自己转动，既要公转又要自转。他提出《中国青年报》要多办一些副刊。在这一时期《中国青年报》创办了《周末》、《自学》、《科学与卫生》、《长身体》、《长知识》、《青年团支部》、《舞台与影幕》等许多副刊，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胡耀邦说，孔子生日要介绍孔子，中秋节要介绍中秋，还可以介绍穿裙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使自己长高一点，怎样才能不胖……

1953年7月，胡耀邦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他以团长身份在大会上发言，郑重宣布“中朝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话音刚落，雷鸣般的掌声长达30分钟。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赞扬说：“你现在敢到国际舞台上去讲话了”。

1956年，胡耀邦当上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但胡耀邦并不热衷于这种地位的上升。在他去世后，团中央档案室里还存有一封他在参加中共八大期间给中央领导的亲笔信。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他才接受了这一安排。

在1957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1964年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均任第一书记，并一直持续到文革。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7月，胡耀邦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带领中国代表团16个民族1202人的队伍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为期两个月。而此时，正是国内和团中央反右运动最高潮时期。胡的这次幸运抽身，使他没有在这个得罪知识精英的运动中陷得过深，也使他在后来的“右派”平反问题上，没有邓小平那样沉重的思想包袱。

1961年1月，胡耀邦参加了中共反思“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任大会的工青妇组组长。当年夏天，团中央在黑龙江所办农场发生农民阻拦上调粮食车队事件。胡耀邦认为，所谓“抢粮事件”不一定是“阶级敌人破坏”，他批示道：

“群众阻止公家运粮，恐怕是农民群众没有吃的东西，我们的干部又不关心群众的实际困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吧。如果有阶级敌人破坏，也是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

对于当时流行的“空头政治”风气，胡耀邦进行了尽可能的抵制。据当时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杨继绳回忆：

“这一年（196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学生要学好业务知识。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的讲话，却从其它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际。一些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

据一度联系团中央工作的吴江 回忆，在团中央，大家对胡耀邦一个共同的想法是，他思想活跃，不迷信，敢说话，与人坦诚相见。他曾发问：“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人哪能活一万岁！”他曾给中央团校的学生出过一道题：《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他说：“毛主席只有六十几岁，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积累了许多科学知识，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都有办法。”但团中央的书记们对他也有一个意见，认为他“主意多，事前却商量不够，有些问题往往未酝酿成熟就在会议上仓促作出决定”。

1962年至1964年，胡耀邦曾代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湘潭县委第一书记。由于实际情况与党的方针之间的差距，他对“四清”运动产生了看法。一次毛泽东到长沙，召集他和华国锋见面谈工作，他竟以“感冒”为由，推却了觐见。但这段经历使他与同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有了一段共同的工作经历，也决定了他日后不愿取华国锋而代之的政治态度。

1964年11月起，胡耀邦又兼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发现陕西省的粮食总产量一连几年都停留在80多亿斤，单产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比西藏还低。为了抓好农业生产，他提出农业增产的方针是：两手抓，双丰收。他说在关中地区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畜牧业。针对“四清”工作中“左”的倾向，胡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阶级出身，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瞒产私分，不查小偷小摸，不查小额贸易。同时，他还提出“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为了刹住“左”的错误，他还果断提出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他还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

求是地减轻下来。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但是在左倾势力当道的陕西，胡耀邦的上述政策、措施、方针，遭到了严厉批判。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彭高习 在西北的黑线”人物。据称，毛泽东支持了对胡耀邦的批判，还留下“圣旨”：“胡耀邦要是不革命，就叫他走嘛！”

据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回忆，他到任202天，先后被批判101天，实际工作99天！所以，文革后期，胡耀邦曾对同事戏称，这是他的第一次“百日维新”。但这一失败经历，奠定了胡耀邦与习仲勋在后来的改革事业中协同合作的基础。在陕西，胡耀邦被斗到“蛛网膜出血，有生命危险”，住院。这一次，解救他的是到陕考察工作的叶剑英。当时，叶对他说：“小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陕西谈不清楚，回北京谈吧！”趁胡耀邦送叶帅一行上飞机的机会，叶剑英命令关闭机舱，把胡耀邦“劫”出苦海。事后，周恩来表扬胡耀邦“把陕西农业搞上去了”，邓小平为他另行安排了工作。

在1954和1959年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胡耀邦均在山东选区任代表。并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4年三届人大时作为四川代表参加大会，继任人大常委会委员。

这些经历表明，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是属于那种经受过长期考验，有着特殊资历和专门经验的老党员。即使在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之前，也是为领袖们知晓、信赖和依靠的基本骨干。在延安整风直至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得以免遭整肃，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波折。这意味着，他在党的这架庞大而残酷的机器中，始终是一个忠实得力的部件，

并且是毛泽东信任并培养的人。但是，此时，他已经对毛泽东的路线、政策发生了怀疑，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

第四节 选择苦难，同光荣站在一边

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狂想，继续撕裂着他同这个党的关系。是领导全国青年充当“砸烂旧世界”的打手？还是依靠先进分子继续与党的系统站在一边？胡耀邦领导的青年工作首当其冲地接受了考验。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革开始。感觉到被动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要团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毛泽东立即看穿了“刘邓司令部”的用意，于是采用了先打后拉的策略。他首先发表谈话：“团中央应站在学生一边，但却站在了镇压学生一边。”又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当时，胡耀邦还在养病。有人说“三胡是糊糊涂涂犯了错误。”毛反驳说，“三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清清楚楚。”毛泽东发话表示不能原谅。团中央率先成为运动冲击的目标。

但不久，毛泽东又使出“拉”的一手。在中央文革接见团中央领导时，江青给胡耀邦递过来一个“楼梯”，她说：

“耀邦同志啊，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个病号，没你什么事。”

但胡耀邦决定不下这个台阶。他说：“我还是第一书记呀，别的人还都是代理的啊！”

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奉命来到团中央，宣布胡耀邦停职反省。称他犯了“三个不够”的错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走群众路线不够。批判中，他和李昌在共青团“二大”通过的

团章上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情节被揭发出来。胡耀邦鼓励青年人不仅要“红”，同时要“专”也被揭发出来……为此，他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

被关“牛棚”期间，胡耀邦为外调的人写了上百份证明材料。由于不迎合造反派外调人员的口径，坚持实事求是，他吃了许多苦头，甚至被毒打得走不了路，抬不起胳膊。

中共“九大”筹备期间，由于“八大”中央委员多数已被打倒。为了凑够半数，毛泽东亲自点名解放了五个人，其中就包括了胡耀邦。但参加“九大”会议时，他因拒绝同主动上前的康生握手，还在小组会上指出，“洪湖苏区”没有中央委员，并质疑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说法。为此，胡耀邦没有被大会选为“九大”中委。

他并不感到失落，而是毅然接受了下干校劳动的命运。

在他能背诵的古代义士名句中，有这样一句话：“取予者，义之表也”。意思是，一个人有机会在善与恶、美与丑、清明与齷齪之间进行选择时，他的选择是看一个人“义”与“不义”的表征。在高官厚禄自由平安伸手可及的许多个“一刹那”，胡耀邦一再选择了光荣的放弃！他曾说：

“我这个人，这辈子是立不了功了，不是那个年代了嘛，也立不了言，像孔子、孟子那样，所以只好立德。那就是说，要一辈子保持气节和人格。”

头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项帽子的他，依然不改耿直和诚实的性格。他自我检讨时，坦言自己解放后对毛主席有五次动摇。如“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文革”等，他都有所怀疑。

据干校同仁回忆，在河南潢川的黄湖农场，胡耀邦先与几十人合住在大仓库里，以后又与很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原本每月有四百多元的工资，现在每月只能领到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他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

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是挖河、打草、收割，还是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很欢。插秧时，他一天能插六分地；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盖房子他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样样都干。就拿脱坯来说，一块土坯大约有25斤重，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脱50块，而他一天却要脱20多块。大家到七八十里外的大别山拉石头修路，一车重五六百斤，他争着驾辕。他身患痔疮，经常脱肛流血，十分痛苦，每次劳动时都带着个小盆，别人休息时，他才到稻田里舀点水，避到草丛里去清洗。因身体太弱，而劳动强度太高，他几次晕倒在道旁或沟里。

1971年，经中央批准，胡耀邦回京休养。陆续回京的战友、同事看望他的人川流不息。据罗瑞卿的儿子罗宇说：此时的胡耀邦“成为黑帮子弟的头，而他的家富强胡同六号即成为四人帮嘴里的‘黑窝’。”

如果说，两年的干校劳动使他感到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和“四化”建设的迫切的话，从这些交往中，他日益感到政治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迫切、平反冤假错案的迫切。他的热情真诚、正直无私、敢作敢为敢担当，使他很快成为那个灰暗时代沉默人群希望的寄托。

作为“复出”的信号，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一个追悼会的出席领导人名单中。这个名单表明，他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的身份仍然有效。为此，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胡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汪东兴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找他谈话，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但胡耀邦在这时想到的是李白的诗句：“安能够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两次拒绝了上峰的试探。

胡耀邦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多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

第五节 中科院“百日维新”

1975年1月，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全面整顿，对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秩序、制度和思想进行拨乱反正。当时，胡耀邦作为一个已经“解放”的高级干部，正在中央读书班等待分配。7月18日，经邓小平点将，时任国务院主管科学的副总理华国锋出面通知，胡耀邦出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院长。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文革的“重灾区”，每250个科学家中就有1人被迫害致死；少数仍然维持运转的研究机构中，科研工作被要求“三个面向”；在受批判的“反动观点”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名列其中。文革前夕，它原有一百多个下属研究单位，科研人员二万四千多人，到1975年时只剩下13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和二千多名人员，其中有1800名干部或科研人员，200名后勤人员。很多科学家仍在农村劳动改造。而且，当时的科学院还包括了文革中被撤销的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两个单位，问题复杂，政治和生活待遇欠账都很多。

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与“四人帮”在科学院的代理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他们宣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科学院已经结束，工宣队和军宣队离开。被下放农村的人可以回单位重新工作。要让科研人员获得必要的研究文献，包括外文出版物。确立科研是科学院的中心，研究人员是研究所的中心，专业研究是科研人员工作的中心。并提出恢复“所长负责制”等要求。

此后，胡耀邦等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探讨未来十年的科学技术需求，中国科学院的重建和主要领导人的选拔，如何克服科研工作中的具体障碍，如何解决科研人员的个人生活问题……

在这里，胡耀邦再次展现出他在战争年代的宣传鼓动才能。他说：

“今后廿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

“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了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长征……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

他讲话不仅热情洋溢，而且贴心入理，所以他的每次讲话，都会成为科学院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他很快就成了中国科学家群体心目中的英雄。在京城广大知识分子中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信任。

同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胡耀邦主持起草了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给国务院的报告，提出了整顿科学院的方针政策。

为了使对“知识分子”一贯敏感的毛泽东批准这个提纲，他们仿效陈伯达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明权送给毛的做法，在文件中加入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不存在的“毛主席语录”，企图为科学家身份的解放打开道路。但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否定了自己有这种讲法。

据参与报告讨论的于光远回忆，邓小平的这个部署，的确是对文革进行“反攻倒算”的一系列步骤的一个环节。

胡耀邦下台后，也曾对人回忆到有关情节：

“邓小平对我说，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活头。……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志在必得，还对被任命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说：“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

事实证明，邓小平紧接着在教育系统开始了“虎口拔牙”的行动。据称，那份曾经轰动一时的向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生活作风的信，就是刘冰请教胡耀邦，胡耀邦建议他请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

从同一时期一系列“转信事件”看，转信者一般都是同意信件内容，或者根本就是转交者急需的武器。而深谙人情世故的毛泽东也正好抓住了这一点，发现了邓小平一系列行动背后的计划，就是全面否定文革在各个领域的“成果”。接下来的便是，胡耀邦先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胡耀邦的“第二次百日维新”失败。尽管如此，通过从1975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的辛勤耕耘，时代的初春已经在科学院萌动。通过“四人帮”印发的批判材料——《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及邓小平主持的在交通、工业等领域的整顿，这些信息传遍中国大地。给暗夜中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据李昌回忆，1976年2月，四人帮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反击科技战线右倾翻案风”的万人大会，为配合舆论宣传，姚文元布置各新闻单位派来上百名记者。会上，群众要求认识一下被批判者，当李昌站起来的时候，全场爆发出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四五”运动中，中科院下属的109厂成为了运动先锋。他们抬着大幅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穿过王府井闹市区，走进天安门广场。脍炙人口的“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愤斩祭周公”也出自科学院计算所。据统计，仅五百人的一个109厂，在“四五”被镇压后的清查中，就有3人被隔离审查、17人停职，办“学习班”勒令交代的三十余人，被列为重点审查的七十余人。

胡耀邦在此一阶段的工作表明，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对毛泽东路线有独立思考，并决心扭转党的错误的政治家。在公开的言论中，他曾反对毛泽东

倡导的科研与劳动生产的紧密结合，反对时髦的“开门办学”，反对空谈政治和对知识分子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与“文革下台派”达成的政治共识和果敢的言行，为胡耀邦日后的政治命运铺平了道路；为中国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人心基础；也为他日后与“自由化”扯不清的关系埋下了伏笔。

胡耀邦从政治上进入中国历史，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后。

在此之前，他已经对毛泽东思想及其路线有了一次深刻的反思。

“斯大林死后不几年，毛主席把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的锋芒转向了修正主义，国际上对准了铁托、陶里亚蒂和赫鲁晓夫，国内则大反‘资产阶级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走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那个道道上去了。他的这种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认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实现……他在某些问题上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六节 “拨乱反正”的“人心三策”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了胡耀邦。还没有被安排工作的胡耀邦感觉到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历史时刻已经真正到来，于是向叶选宁说出了一条经过深思熟虑的对策：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他托叶选宁将这八个字捎给华国锋，既表达了对华的拥护、寄予的希望，也明确地在给他出主意。想必华国锋会为这个“人心”的问题，和他有一番探讨。而胡耀邦准备的谜底是：

“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抓，人心乐开花。”

没想到，华并没有立即给他回信。而且让他一等就是四个月。等待中的耀邦所见所闻——从“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到两个“凡是”——无不使他感到“乱箭穿心”。

所谓“两个凡是”，作为一种对策，有一个形成过程。它的历史背景是新上台的华国锋权威和实力不足。华国锋担忧他接管权力的“宫廷政变”的“合法性”。为要掩盖这一点，不惜夸大自身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忠诚度：从保留毛泽东遗体、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到编辑“毛选”五卷，他的辅佐者和理论班子为此挖空心思，最终找到了两个“凡是”这样一种表述方式。

两个“凡是”最早见于1976年11月30日，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一次公开讲话。吴德的根据，则是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2月7日，由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又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此形成了“两个凡是”的基本句式。1977年3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想通过狠抓生产，搞出一个“洋跃进”来安抚民心，这与胡耀邦的“人心第三策”虽然一致，但胡耀邦不相信，在不使用邓小平这样的能人，在不依靠大批老干部、为文革和历次运动中蒙受冤屈的人平反的情况下，能创造解放生产力的奇迹。作为没有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冒险，就坐享了这一胜利果实的“文革下台派”，完全没有华国锋的忧虑和思想包袱；作为邓系人物，他也不可能知道，在应付来自左面的“四人帮”余党的攻击的同时，

华国锋还存在来自右面的担忧：一个没有说出的“潜台词”，以后被鼎力扶持华国锋的叶剑英说了出来，他们怕“擅权”的邓小平一旦回到权力中心，将造成最高政治权力格局的重组。

毛泽东逝世后，是再造一个“强人政治”，大刀阔斧改弦易辙？还是辅助一个“弱主”打造一个民主结构，逐渐转出“文革”路线？这是胡耀邦当时并未远谋，而后来日益觉得紧要的问题。所以，胡耀邦后来对人说，那一段时间，是他人生最难过的时期！

据熟人回忆，那段时间里胡耀邦闭门不出，脸色难看，拒绝出山。他说，与其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不如在家抱孙子。

1977年2月26日，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与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找胡耀邦谈了一次话，胡耀邦仍没有挪窝。这次谈话究竟有什么内容？目前尚无档案披露，但胡德平的回忆讲到这么一件事：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父亲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主席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胡耀邦把这件事讲给儿子听时，并没有告诉他，他是怎样理解华的这段话的含意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当日胡耀邦回避见毛，身体不适只是借口，认为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四清”不符合实际，他既不想顶撞毛，又不想说违心话，才是真正原因。而这种状态，也正是胡耀邦当下的状态。华认为他该去，无非是表示，现在，坐在毛位置上的他，愿意听到耀邦的不同观点。华或许认为，如果大家当日都对毛讲出真心话，毛也不至于犯更大的错误。

直到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找胡耀邦谈话。3月14日，胡耀邦去见了邓小平，二人就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了意见。大概是取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当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二副校长。在这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

当时，中央党校的名义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汪东兴兼任。胡耀邦是专职副校长，主管常务。胡耀邦到党校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起并支持了对已经去世的前任校长康生的揭发批判。这直接打击了华体制的骨干、曾以特殊方式为粉碎“四人帮”立下功劳的李鑫。

胡耀邦到党校干出的第二件大事，是组织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并于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自文章刊出以来，《人民日报》每日电话不断，一个月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之内，收到两麻袋信件。

此战的完胜，为胡耀邦取代当朝要人郭玉峰出任中组部长，全面开展平反冤假错案铺平了道路。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中组部上班那天，办公大楼的前院里还响起了久违的鞭炮声。

据中组部统计，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有230多万人，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75%。到文革结束，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历次运动伤害或冤枉过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胡耀邦曾掰着手指头对人算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5%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5%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中央决定平反冤假错案后，每月收到的申诉信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每月也收到申诉信1万多封。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中组部和胡耀邦家门前便排起了长队。就上访人员登门申诉问题，胡耀邦曾对老秘书高勇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有些上访者凌晨就在他家门等候，为了早日解决他们的问题，胡耀邦有时一边吃早饭一边接待上访者，有时夜以继日地工作。重要信访案子他都要亲自过问、审查、批示，直至最后解决。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落实干部政策时说：

“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不管”。

他在中组部一年时间里批复了四千多件来信。全国八千万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后，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的问题得以解决，就是这些批复信件中的一件。

由于胡耀邦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问题上出了名，他调到中宣部当部长后，这条长龙也跟到了中宣部。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能引发全国性风潮，与他在这个时期留在人心的感激和怀念是分不开的。

在所有纠正案例中，有一个案子是与本书有着潜在密切关系的，那就是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错案。

所谓广东“反地方主义”案，是中共建政初期，以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在土改、镇反、合作化、反右等一系列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上，与（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推行的“左倾”路线发生分歧，以前者遭到清洗和镇压为结局的，一场带有明显宗派倾轧特征的路线斗争，历时长达十余年。在这场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因批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批评土改中的乱打乱捕、无限度清算；反对做群众自发行为的“尾巴主义”；主张“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批评广东土改“搞左了”；批评合作化“搞糟了”，“年年增产，年年饿死人”，工农业生产发展“比陈济棠时代都不如”；批评“镇反”“靠杀人发动群众”，“靠杀人推动运动”，质疑“镇反”“到底是消灭了敌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制造敌人？”质疑广东省委执行的是否“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整编琼崖纵队是否“消灭异己”？中央和省委是否“不重视广东历史”或“割断琼崖历史”？等等，而被省委主要负责人采取无限上纲的做法，上升到“反党”的高度，将对方打成“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反毛泽东思想”。先后对叶剑英、冯白驹采取“调虎离山”，对李坚贞、古大存等上万名广东干部采取降职、撤职、查办的处分。

虽然事后陶铸、赵紫阳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和总结广东土改经验时，也承认了由自己主导的“中后期土改运动”犯有错误。承认“由于强调‘反右倾’和加快土改进度，在政策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未有团结住大多数”、“打击面过宽，错打击了一些人”、“死人多了些”、“划阶级中提高成分的现象相当普遍”……但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们仍然对那些对土改整队等历次政治运动表示不满，给省委或当地党委提过意见，而又不够划右派条件的地方干部作为整肃对象。把他们打成大大小小的各种“反党集团”。仅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中就有83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6.4%），省委委员、候补委员中有11人（占委员总数的20%），省委常委中有4人（占

常委总数的27％），在省委书记处中就有3人（占总数的30％）被打成犯有“地方主义”或“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人。

到反右运动结束时，全省的民主党派中共有162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当时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8076人的20％。全省共错划了36610名的右派分子。古大存在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职位上被下放到广东增城县，任县委书记。

在文革初期，中南局为发动和引导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抛出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名单，供群众批斗，古大存也被列名其中。1966年11月4日，年仅70岁的古大存病逝于广州。

文革结束后，韦国清、习仲勋、杨尚昆、任仲夷等相继主政广东期间，依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上述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和复查。经过长达5年中地反复斗争、反复磋商，最终，在省委书记刘田夫的坚持下，以任仲夷为第一书记的广东省委在1982年4月7日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终于在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没有证据显示胡耀邦在这个案件的平反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倒是曾说了一段和稀泥的话，回避了对本案的直接评价。

胡耀邦与陶铸、王鹤寿曾是延安时期“桃园三结义”的战友。据曾任胡耀邦秘书的曹治雄回忆，胡耀邦1954年出差广东时，曾见过赵紫阳。回京后，他曾多次赞扬赵紫阳，说：“在现任省委书记中，论年龄赵紫阳最年轻，论资历赵紫阳最浅，可是他有能力，有才干，干得好前程无限。陶公选才得当呢！”据称，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些早期印象，就来自陶铸的介绍。广东“地方主义”案久拖不决，与此应该不无关系。与赵紫阳的升迁更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作为赵紫阳从政生涯中最大的一个经验教训——广东“反地方主义”——及其所透露出来的政风与个性，仍将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中发酵，成为我们解读其选择的秘钥。

第七节 带领理论界、新闻界造反——邓胡协同的思想解

放运动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这一政治上的转变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清算“文革”路线及其发动者的思想理论错误的开始，这一冲动，在政治界、思想理论界暗潮涌动；另一方面，是感到失去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惶恐，在尚存的“文革上台派”和一部分思想僵化的干部中弥漫。

出于政治软着陆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当政者华国锋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安全气囊。但它直接打击了前一种冲动，并加剧了后一种惶惑。为澄清思想迷雾，指出正确道路，迎接崭新未来，前一种力量分进合击，导致了中国继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潮起。

前一种力量由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文革下台派代表，是主动的、进步的力量。后一种思潮处于观望、待分化状态，谁有力量就会加入谁的阵营。加上“凡是派”，实际上是三种势力占据中国政治舞台。

在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前一种力量中，又可分为“诠释派”和“实践派”。“诠释派”以邓小平为首，主张仍举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可以利用毛泽东言论的庞杂性和“辩证”色彩，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和“构成”和“发展”上做文章，为我所用，权称“诠释派”。“实践派”

主张用实践检验过往的一切，包括毛泽东本人的行为、言论、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真理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故名“实践派”。

在70年代末期的政治营垒中，“诠释派”与“实践派”属于一个共同体；但在思想光谱中，“诠释派”处在“凡是派”和“实践派”之间。换言之，“诠释派”与“凡是派”之间的斗争，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机会主义与另一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其不可调和性，表现为权力斗争的不可共存性。而“实践派”和尚存于“凡是派”中的“顽固派”，不是思想上的机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具有更多的理想色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上层演义的更多的是权力斗争，而“两个凡是”也是为巩固权力而设置的，因而，凭着邓小平的政治敏感性，“诠释派”作出了最早的行动。

1977年7月以前，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安排工作，所以，他是通过人际关系不断“放话”来进行运作的。下面是《邓小平年谱》记录的几个节点：

——1977年2月，也就是“两个凡是”正式出笼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的当月，刚刚做了前列腺手术的邓小平与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同日，他又对代表党中央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约方毅、李昌座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时谈到：“实事求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转述了他向汪东兴、李鑫表述的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并谈了一段后来在党内高层流传甚广的话：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这次谈话，暗示了他即将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取代“两个凡是”的提法。谈话中，邓小平还对胡乔木1976年批邓时的行为表示宽恕。从而也奠定了“诠释派”的理论班底。

这个谈话记录，经王震的儿子王军之手广为传播。据邓力群回忆，胡耀邦看后曾说：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对，这个谈话广为流传，开了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此开始的。

1977年7月15日——正好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在胡耀邦的亲自主持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刊。该刊是一份不定期简报，定位是：探讨新思想，提供新见解，供高级干部内部阅读。

因《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刊登的吴江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受到胡耀邦的赞赏，胡把文章送给邓小平看，邓表示“完全同意这篇的观点”。据认为，这是胡耀邦和邓小平理论上发生的“第一次接触”。

自此，《理论动态》开始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重要讨论，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等，都由这个刊物发起。《人民日报》等全国性大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章，也多由这个刊物供给。据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回忆：

“这个小刊物由胡耀邦亲自编辑，亲自出题并最后定稿。从1977年7月创刊到1982年4月24日胡耀邦卸任（不兼中央党校职务），这个刊物共出345期。”“奉命写稿的多是几位青年同志。1977年底，胡耀邦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但仍兼任党校主要日常工作。胡耀邦将主要精力转到中组部之后，仍没有放下《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他临走时特设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其主要任务。研究室主任由我兼任。这时《理论动态》的题目仍争取由耀邦出，我也提出一些题目，文章由我修改定稿，然后送胡耀邦最后审定。”

根据《理论动态》345期的目录，我们可知，它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诠释派”观点的文章。但最终，对后文革时代“思想解放运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及其引发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溯其大端，有如下脉络可循：

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第9期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批评了“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权威意见”或“报刊提法”为准的倾向。

1977年9月底，吴江在中央党校正式复课后第一期（听课的有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学员共计1000多人）报告中，谈到“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吴江和孙长江的回忆“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语，脱胎于列宁“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这一名言。这是中央

党校第一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这个报告后来以《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为题，在1978年2月《哲学研究》第1—2期合刊上发表。

在此同时，关于鉴别路线是非的标准问题的思考，也在全国理论工作者中间悄然展开。被历史记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山之作”的胡福明的文章，也是在这时开始酝酿的。

1977年10月，胡耀邦让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准备一个党史讲授提纲，并明确提出要根据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针对党校学员中由此发生的一个混淆——即认为检验路线是非有“两条标准”，党史研究小组征求了胡耀邦的意见，特别写出“鉴别路线的正确与否要以实践检验效果为唯一标准”这一原则。1977年11月初，吴江将提纲送胡耀邦。经胡耀邦同意，1978年1月，这份提纲以讲义的形式下发给党校学员。许多学员看后，反响很大，他们又将提纲寄到本地、本单位，以通达信息。“实践是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提法，又一次悄悄地传播到各地。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在党委会上作了《以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为题的讲话。他说：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

以后，胡耀邦亲自指导撰写供中央党校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把实践标准作为总结十年“文革”的一条指导原则。这一条指导原则的文字表述是：

“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这个文件进一步指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刊登了邵华泽《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该文章不但提出了认识路线的概念，而且强调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文章进一步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由于《人民日报》公开发行，且发行量大，读者多为党政干部，张德成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但大部分来信对实践标准是持异议的。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第60期《理论动态》刊出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了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转载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向全国发出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即，许多地方报纸也相继进行了转载。由此引发了中国思想界一场以“真理标准”为题的大讨论，揭开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图1-3：《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选自网络）

仅仅三天时间，该文从一个读者有限的内部简报文章一举铺遍全国，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这幕后经过一番怎样的运筹呢？通过各种文章的回忆，我们可知“真理标准”讨论的形成，其中凝聚了多少思想理论工作者和报刊出版者的心血和意志，同时也可见这场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胡耀邦、罗瑞卿等人的领导智慧与艺术。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道：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和我一起决定的。”



图1-4：胡绩伟与郑仲兵、陈小雅回顾“真理标准”讨论（李晓斌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遭到了来自“凡是派”的严厉批评。文章刊出当晚，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吴冷西就给他打来电话，指责此文有“砍旗”之嫌，“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影响很坏很坏”。

5月13日，胡耀邦在富强胡同6号的家里召开《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由胡绩伟介绍了吴冷西的电话内容。在随后的议论中，胡耀邦和大家一起批

驳了“凡是派”对《实》文的指责，吴江表示要写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吴江在孙长江协助下，又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稿。

6月15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点名批评了这篇文章，并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及《新华社》，要求“接受教训，下不为例。”华国锋也在胡耀邦面前直接点了吴江、杨西光、胡绩伟的名。

但就在汪东兴发令“下不为例”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立即转发，《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1978年6月24日，吴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横跨三个版面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天以显著版面转载，新华社也在当天向全国转发，打破了文章转载一般在次日的惯例。

值得一提的是，此文由《解放军报》首发，与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邓小平的讲话以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强调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婉转批评了两个“凡是”。他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对刚刚遭受挫折的“真理标准”讨论起到了强大拱卫作用。这种形势，不仅进一步提升了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提升了吴文的境界，也大大加强了文章刊发背景的分量，为原来在正面经受批评的胡耀邦大大减轻了压力，而且使处于观望状态的各省“诸侯”开始转变立场。

胡耀邦后来说，为此，罗瑞卿至少和他“通过六次电话”。据吴江回忆，罗瑞卿“通过编辑部口头向我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

《解放军报》时任总编辑华楠将军对此回忆道：

“中央党校吴江同志撰写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股逆流而写的，发表也有一定风险。罗瑞卿同志特意嘱咐我们同作者商量，建议在文中多引用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文章做了修改后，罗瑞卿同志再次审读，并同耀邦同志通了六次电话，给我们打了五次电话，他还给《人民日报》打电话，部署同时转载此文，《光明日报》也同时转载……这篇文章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胡耀邦与罗瑞卿六次电话讨论的另一个内容，应该是发表的“时机”问题。据吴江回忆，此文第一稿送胡耀邦看后，他的意见是推后三个月再发表。这也是吴江后来发表时没有经过胡同意的原因。按照吴的理解，胡耀邦的推后主张恐与他当时遭受的来自党中央的压力有关。因为，汪东兴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并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弯”，并要《红旗》杂志和各省市领导不要发表文章支持。他还指示中宣部今后不准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上发表类似文章。华国锋指示中宣部“不表态、不卷入”。胡耀邦是一个守纪律的老党员。当时的他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主管宣传。也许，他当时并不想在党中央没有授权或最高权力问题解决以前，造成党内过于剧烈的对抗乃至分裂。

果不其然，吴文发表的当日，有一位领导人赶到胡耀邦家说：这篇文章的发表，表示我们在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斗争公开化了，他对此表示遗憾。而“毛选编辑办”负责人又一次对胡绩伟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后，更认为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形势不由人。批判者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有力的冲击来自已经复职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正是他的态度，使吴文的发表成为突破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打压与封锁的事件。

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署名“岳平”（“特约评论员”的谐音）的文章《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也对一些反对“真理标准”的议论作了总回答。

7月15日，第73期《理论动态》发表了韩树英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这样的小标题。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

9月1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严家其的“哲学幻想小说”——《宗教、理性、实践——访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7月21日，邓小平曾撇开华国锋、汪东兴，直接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他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要求张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次日下午，邓小平又给胡耀邦鼓劲儿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据胡绩伟回忆，以后，胡耀邦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旧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他在《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审改时，还留下这样一段话：

“那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这些文章，不但被全国大多数省区市的报纸和中央一级的大报所转载，还引出更多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文章。从1978年7月黑龙江率先表态支持开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或谈话，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到该年的12月8日湖南表态收尾结束，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才对“真理标准讨论”一一表明态度。虽然其中有些属于跟风投机——譬如某省的主要领导，曾组织专人查看全国的省报，一旦发现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超过半数，他们才站出来亮相。但这正好说明，这次讨论的意义，已经早已越过理论范畴，超出思想路线，最终变成了“政治投票”。在这股历史潮流面前，唯一没有表态的是中共中央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但《红旗》内部并非没有斗争。自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以来，《红旗》杂志的编辑们也跃跃欲试，想参加到讨论中去。哲史组就向总编辑熊复请示过两次。但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却叫《红旗》“按兵不动”，多次指令熊复“不准介入”，要求他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自6月份以后，汪东兴每期都要亲自审稿，凡是文中涉及这个话题的文字，一概删除。汪东兴还命令熊复“不要轻举妄动，自作主张”；鼓励“《红旗》要一花独放”。

对于党刊的冷漠态度，外界意见极大。有人说，“实践标准”在全国各地都转发了，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红旗》。海外也有人猜测，这是高层权斗的征兆。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访华时，邓小平不得不为此向他作出解释。由于党刊威信的流失，杂志订数骤降二百万份。所以，杂志社内部怨声载道。

1978年7月到《红旗》工作，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方克回忆，他很快便想出了两条主意：一是自己动手写一篇文章，打着学习毛主席《实践论》的旗号，参加到讨论中去，这样既可以免除“砍旗”和“非毛化”的指责，也可以摆脱政治上的被动，突破僵局。这个想法出台后，他曾登门请教过胡耀邦。出于为党刊解围的考虑，胡对他说，《红旗》杂志作为党刊，如

果不便于直接转载《光明日报》文章，“可以从另一角度写文章”，也就是变个法子参加到讨论中去。

方克想出的第二个主意，是借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机会，请他在新四军时期的老领导、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撰文。

经熊复和编委同意，两件事分别于当年7月底和8月中旬展开。但谭震林的稿子，在熊复那里没有通过。他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为此，三位执笔编辑拉上了方克，一同拜访了谭府。不出所料，“谭老板”果然火了。并说出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

“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

作为副总编的方克，在总编辑反对，作者又坚持不改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定夺，只好矛盾上交，请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定夺。鉴于谭震林的老资格和倔脾气，汪东兴不敢独断，阅后即批转：“请华、叶、邓、李阅示。”

几个人的批示颇有意思：华国锋在自己的姓上画了个圈。叶剑英当时远在广州。李先念开始批示说：“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邓小平则动了真格的，批下了那段著名的文字：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得知邓小平的批示后，李先念又作了重新批示：

“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邓的批示下达《红旗》的时间，是11月23日。这样，经过三个月的来回拉锯终于有了结果：谭震林的文章，在《红旗》1978年12月号刊出了。

由方克执笔的文章于9月11日写出初稿，标题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全文二万三千字。据熊复说，汪东兴最早是不同意写此文的，后来看到已经写了，他又提出两条：（1）不要专讲真理标准，主要讲《实践论》，顺便讲真理标准；（2）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估价太高了。所以，该文在第三稿时改名《重温〈实践论〉》。按照熊复的意见和他亲自提供的资料，文章后半部分又加入两大内容：批判“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因为这不符合执笔人撰写此稿的原意，所以，方克将“第三稿”送社科院哲学所和中央党校“征求意见”。根据这几个单位反馈的意见，到第六稿的时候，熊复加进去的那些内容就都删掉了，41页的文章只剩下22页。

汪东兴看了最后定稿后，拍板“不发”。

这就是《红旗》没有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大致原因。

图1-5：《重温〈实践论〉》（初稿大样）标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作者家藏）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四年后召开的“十二大”修订的党章中，“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第八节 理论务虚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

从胡德平的一则日记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胡耀邦处于亢奋状态。胡德平写道：

“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央召集宣传理论战线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召开了理论务虚会。会议的缘由，根据《党的文献》记载是这样的：

在理论务虚会召开前两个月（即1978年10月）邓小平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开理论务虚会，是叶帅看到《红旗》那篇文章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刊载的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引言”中的一段话也说：叶剑英看到此文后“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问题解决一下。”据朱佳木回忆，叶帅是同时看到了《重温〈实践论〉》（第三稿）和哲学所反馈的批评文章，才提出这个建议的。

理论务虚会的发起单位，是中宣部和中国社科院。当时，胡耀邦任中宣部长，胡乔木任社科院长。胡耀邦亲自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被奉为理论权威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

文元等人摧残文化，箝制思想的恶霸作风。肯定了文革结束以来，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在思想理论和新闻宣传工作中所做出的成绩。认为，目前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希望理论工作者认真面向实际，解放思想，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努力研究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因三个多月前在《光明日报》发表“哲学幻想小说”——《三个“法庭”》，刚成为预备党员的严家其，因文中呼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也被邀请参加了理论务虚会。据他回忆：

“会议的目的是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第一天开幕式，胡耀邦报告话声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所以，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第二天，每一个人的发言，不经任何删改就印成《简报》。无论大会小会的发言，每人都可以看到。今天看起来，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去世后第一次大规模的‘非毛化’会议。除了没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外，会议上一个个发言列数毛泽东的错误，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

严家其写道：

“长达二十多天的会议，白天谈中国问题，晚上看港台和外国电影，有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绢》。看完电影，大家再吃夜宵。”

“……《幸福的黄手绢》对爱情、同情心和人性的描写，与‘文革’时期的生活适成对照，大家看后印象深刻。这些电影，当时在外面没有放映。我们二十余天的会议的前半段就是在这样的宽松、轻松、放松的气氛下召开的。有人说，这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出气’就是在会上放心地‘批毛’。”

“……就像《幸福的黄手绢》的‘主角’岛勇作刚刚出狱一样，期盼着看到‘幸福的黄手绢’。……‘理论务虚会’的大多数与会者，可以说是从毛泽东时代‘思想禁锢的监狱’刚刚出狱的人，大家同样怀着不安和期盼的心情。不安的是，1957年‘反右’的阴影没有消失，期盼的是，希望见到一个思想自由的、幸福的新时代。”

图1-6：严家其“三个法庭”在《光明日报》刊出文本（作者提供）

会上，“实践派”再接再厉，与“凡是派”理论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在政治上，追查和澄清了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以来几大事件过程，以“实践派”的完胜和“凡是派”退出历史舞台圆满落幕。“凡是派”理论重镇——毛选《五卷》编辑委员会的吴冷西、胡绳和《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等人也都作了检讨。据当时西单民主墙传出的消息，在务虚会的一个分组，全体成员要求改组《红旗》杂志编辑部和毛选编委会，连吴冷西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名。

在思想理论上，与会者对中共建政以来，尤其是“文革”中留下的理论路线问题进行了深刻追讨、批判和反思。

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李洪林作了《领袖与人民》的发言，引起了会议的强烈震撼。他说：“公开宣传全国人民要无条件约服从一个人的权威”，是中国的“耻辱”、“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尊严”。“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平等关系”。他说：

“实践证明，‘人民必须忠于领袖’的原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抛弃它，而代之以‘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原则。”

“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

继“启蒙社”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应当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三七开”的大标语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对文化大革命进行

了全面反思。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用错误的方法对错误的对象进行的一场错误的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中国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封建帝王思想、专制统治是产生“个人迷信”的重要根源。“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王若水对文革的定性，后来被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采纳。理论家张显扬、王贵秀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进行了深刻批判。

严家其的发言从“政治体制”上指出了发生在中国的政治灾难的根源，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历史教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以强调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开始，以破坏集体领导、大搞个人专政告终。如果党的主席事实上仍是终身制，总有一天，还会产生新的林彪、四人帮，他们还会煽起新的造神运动，再一次剥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他认为，苏联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的原因在于，苏联和中国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终身任职的人手中。为了建立真正的“共和政体”，“不仅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要规定严格任期，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要规定严格任期，即废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黎澍、于浩成的赞同，成为中共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旋律之一，也是那次改革在政治体制上的唯一成果。

北师大哲学教师齐振海讲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经济方面，经济学家孙冶方、董辅初也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在发言中追溯了二十年来中共党内“左”倾思想的一个源头，即六十年代与苏共中央开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这场论战的主帅，正是邓小平。

宦乡认为，论战“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

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他说：

“‘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

“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到提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

1989年5月15日，中苏最高领导人会晤时，邓小平面对戈尔巴乔夫，实事求是检讨了这场论战的错误。

此外，务虚会还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搞“穷过渡”问题，“唯意志论”搞经济问题，封建主义残余和法西斯专政问题、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问题、公有制问题、军事共产主义问题、民主与法制等等问题，作出了空前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认识深度和广度，在中共党内，至今没有被超越。

“真理标准讨论”和理论务虚会，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聚集和形成奠定了基础。胡耀邦成了这个派别当然的领袖。后人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时说，他不仅解放了人的政治生命，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第九节 走向政治高峰

由于政治形势的快速推进，胡耀邦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迅速飙升。与此相应，他也开始更多从政治家（而不是造反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广东“反地方主义”案因为牵扯到赵紫阳，胡耀邦曾“得体”地表态：

“以前的问题，各人都有一本辛酸帐。”“今后看干部，就是要看你的成绩。”“看你的风是正还是不正。干部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老的还是新的，只要工作有成绩就是好干部。”

在来自广东的复查工作人员要求面见赵紫阳被拒后，古大存遗孀不得不给胡耀邦写信（意在请胡耀邦“说服”赵紫阳）时，胡耀邦似乎也没有留下令单方面满意的文字和说法。

在“实践派”与“诠释派”日益加剧的分歧面前，胡耀邦也尽可能地弥合这种裂痕：

在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对1959年《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做党的同路人》的文章作了批判。文章署名“康生”，批评者大概是认为，这是已经受到中央批评的康生的文章，所以使用了“文革”中大批判的口吻。但邓力群看到刊载了这些发言的务虚会《简报》后，出面承担了责任。澄清文章其实是由他（邓力群）提议，在他同《红旗》杂志副总编许立群多次商量后，由许执笔，最后由他定稿的。根据当时的惯例，为了加重文章的分量，他们希望由当时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康生署名，康生“勉强同意”，但对此文“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字”。所以，邓力群认为，这篇文章的错误，应该自己承担。

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受到了胡耀邦的赞赏。但是，事后，严家其与王若水说，邓力群不让批康生。由此，撕开了“实践派”与“诠释派”之间的一道裂痕。

据严家其回忆：

“我与阮铭、胡绳在同一小组，在小组会上，阮铭言辞锐利，批胡绳时的激烈声调，我觉得就像解放初‘斗地主’一般。”

对此，胡耀邦曾明确地表达了心里很不舒服。据郑仲兵回忆，他曾反复要求会议“不强迫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会。”由于担心来自“诠释派”的反对，胡耀邦警告与会者，有些个人的批评超出了善意批评和党员行为准则的界限。在2月28日中宣部召开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胡耀邦又说，毛泽东虽然犯过错误，“但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据吴江回忆，“会议领导方面也有意尽可能避免紧张情况的发生，特别避免发言涉及高层领导人”，在会议印发的众多揭发材料中，“有些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

邓小平看了务虚会第一阶段小组会的报告后，同意其它高层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党内理论家在批评中共和毛泽东上已经走得太远。鉴于“民主墙”运动已经从议论时政和理论探讨转向要求“人权”、反“暴政”的群众性运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了这场讨论。

以后，在李洪林的建议下，胡耀邦主政的中宣部以“双周座谈会”的形式，把理论务虚会开创的思想开放形式传续下去，直至1980年胡耀邦不再兼任中宣部长。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八大”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被任命为总书记。当年11月10日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这些会议是对华国锋的

全面清算。虽然肯定了华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功劳，但认为他有六大错误：

- (1) 提出“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 (2) 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
- (3) 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反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
- (4) 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
- (5) 对1977、1978两年的经济工作的“冒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 (6) 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所必备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继续担任现职务是不适宜的。会议决议：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而此前的1980年8月，他的总理职务已经由赵紫阳接任。

据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回忆，对于华国锋的下台，胡耀邦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他说：

“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

所谓“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就是把权力放在第一位。而党的原则是：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华国锋毕竟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最大功臣。

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不赞成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但胡德平认为，胡耀邦考虑得更多的是，在毛泽东之后，应该建立一种比较民主的“集体领导”制度。他曾考虑过高岗在1953年提出过的“主席团制”。胡德平回忆：

“他认为最后（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

在说到他本人时，胡耀邦接着说：“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胡德平认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6位常委，那第7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非华国锋莫属。

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证实道：

“在解决华的问题时，胡耀邦稍微客气些，还想给华在领导集体中保留一个位置（十一届六中全会时保留副主席位置），邓、陈不同意。”

据说，耀邦为了实现自己的构想，与很多党内同志进行过讨论，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他都在为此努力。但党中央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图1-7：胡耀邦与赵紫阳（选自网络）

但赵紫阳的观点似乎并不孤立。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在回忆录中就认为，在华国锋的待遇问题上，胡耀邦并没有表现出恻隐之心。他写道：

“华被整下台后，开始是副主席，胡耀邦说，不搞主席制了，改总书记。华对叶说：‘我当个常委吧？’叶说：‘我同意。我去跟胡耀邦说。’

叶跟胡一说，胡答：‘大家都不同意华当常委。’

叶说：‘那就让华当政治局委员吧。’胡说：‘只能当个中央委员。’”

如果这个叙述是真实的，应当不是以耿直和真诚著称的胡耀邦的“违心”的行为。遗憾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点，胡耀邦没有想到，对加之于华国锋的不实指控的缄默，将导致这一错误在他的身上的重演。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正式取代虚位已久的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当时的他尚不清楚，自己出任这个职务，是各位大佬在“倒华”问题上“政治交易”的结果。但人们都清楚，而且在事后越来越清楚，重返“书记处”制度，与“党内”民主并无多大关系，它体现的是元老们的各种权衡考虑。借用何维凌的说法，80年代的中共高层决策机制，实际是“元老一人提议无异议通过制”。

据于光远回忆：

“叶剑英早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讲了领导班子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革命的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辈子，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那时叶剑英81岁，邓小平比他小7岁，是74岁。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毫无疑问是会议的核心。说核心不是他而是别的人，完全歪曲了史实。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会后这个地位更巩固地确立起来了。但是邓小平的年龄也偏高了。将来谁来接班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胡耀邦是最合适的人选。到会的代表谁也没有这么说，但许许多多人心中都是这么想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人对胡耀邦的经历很了解。在讨论增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组会上，就有人对胡耀邦的经历作了介绍。会下更有许多的议论。那时胡耀邦63岁，也不算年轻。他也是老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已有49年的革命历史。他的政治水平、工作精神、组织能力，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近期所做的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两件大事摆在面前。同时中央老同志也很了解他。……加上中央工作会议让他起那种特殊的作用，也可以看出叶剑英、邓小平等把他作为接班人人选的迹象。”

“中央设立书记处这个机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有人提过，1980年2月召开

十一届五中全会时，这被列为全会的一个议程，决定要把这个机构成立起来，并准备让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五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会议上，叶剑英讲话一开头就说：‘我同意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也同意决议中提出的书记处的职权范围。虽然我觉得职权范围稍小了一点，但目前只能如此。’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年人的明天。’……”

胡耀邦的“就职演说”是谦虚得体的：

“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综上所述，胡耀邦在毛泽东去世后，领导了一场“秀才造反”。这场造反的成功，为胡耀邦以后的执政赢得了人心，也为他攒下了一个“秀才”班底。但这次胜利也留下了另一种遗产，那就是不同派别“秀才”之间的恶斗。这是毛泽东时代未曾有过的现象。它虽然给历史创下了一次大转折，但落下了此后十年中国政治恶痢不绝的慢性肠炎，最终葬送了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销蚀了改革开放给思想界带来的大部分成果。

尽管胡耀邦上任初始已经看到这种危险，并竭力阻止分裂的发生，但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带着年轻人的锐气和这次胜利的记忆（以及对胜利背后军队作用的忽略），与“诠释派”权力共生的不可调和性，使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以至于当人们呼唤强人主导下的速变时，匆匆送走了一个其实更有利于自身赖以生存发育的相对宽松的时代。最终结局，是“实践派”的主帅、“改革派”肱股——本章主人公在政治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迅即殒灭，以及本书主述事件对历史的再次逆转。

第二章 执政理念分歧与权力斗争激化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于光远、高皋、岳晓玉、锺兴永、吴洪奚、周多多）

“真理标准”讨论的胜利，军队重新回到“文革下台派”手中，以及中共党内聚集的对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的巨大怨愤，借助社会力量，把华国锋、汪东兴轰出了中南海。由此，中国的权力又重新回到“文革下台派”手中。但是，重掌中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历史的反省深度，对于“新时期”的政治治理模式、公民权利和社会自由度，并没有形成共识。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诠释派”与胡耀邦所代表的“实践派”渐行渐远。

第一节 民主墙“小阳春”

1978年4月，李胜平等人在西单贴出大字报《捂得捂不得》。对北京市党政第一把手吴德在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执行毛泽东和“四人帮”的镇压政策，在粉碎“四人帮”后阻碍“四五”运动平反进行了批评。大字报拿吴德开刀，矛头对准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这张大字报成了西单民主墙的“开山之作”。

1978年9月11日胡耀邦的旧部《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由于复刊号上刊登了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青年工人韩志雄等人的长篇报道——《革命何须怕断头》，选载了“童怀周”编选的“四五”诗选，被汪东兴批评“没有

突出华主席”，要求杂志全部收回。据这期复刊号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作者李洪林回忆：

“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把《中国青年》复刊号一页页撕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来看，接着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西单墙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借助民主墙舆论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的遗孀邓颖超、康克清向华国锋施加了压力。这期《中国青年》在稍作修改后重见天日，发行量突破270余万份。民主墙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报纸，每天只有四版。1978年9月14日《光明日报》以三版篇幅刊登了严家其近二万字的中篇“哲学幻想小说”《宗教·理性·实践——访问“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文章不仅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历史以有趣的形式提到公众面前，并直击“天安门事件”。在它仍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的条件下，作者通过与“实践法庭”法官的对话中，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热情的讴歌。文章说：

“虽然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大权，对人民施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就在他们的宗教法庭上，多少人民英雄照样威武不屈地屹立着。”

当时常去西单墙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回忆，自此以后“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他写道：

“到这里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间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北京的示范效应，使得各省市也有类似的场所。”

据载，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和其他领导人，当时都对民主墙表示了支持。叶剑英曾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而邓小平这方面的言论更为突出，影响也更大。

1978年11月26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两个“凡是”做出检讨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

“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

他还使用反问句式以加强语气：

“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11月27日，在会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邓小平更直白地表示：

“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

事情传到西单民主墙，人们为此举行了一次胜利的游行。据目击者记载：

“11月26日晚，数千人聚集在西单墙前。有的人在灯光下看抄大字报，有的人则围作一团议论纷纷。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Jonk Fraser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Jim Novak夹杂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观看现场活动并与新识旧友交谈。当有人得知Jim Novak第二天要会见邓小平时，便请求他明晚再到民主墙前来，向大家转达与邓小平谈话的内容，并希望他能就民主墙一事，征询邓小平的意见。Jim Novak应允了。”

消息不胫而走。11月27日傍晚，西单墙前集聚了六至七千人。七点钟，Jim Novak因事未能前来，Jonk Fmser准时到达了。Jonk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讲话内容。他说：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就西单墙上大字报的内容，邓小平说，毛泽东三、七开我不同意，毛泽东比三、七开要好。彭德怀不久要昭雪。当记者向邓小平反映，‘群众现在很拥护你，一听到你的名字就欢呼’时，邓小平答道，‘这样不好，我今年七十四岁，我对自己是四、六开。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记者问到有关刘少奇的问题时，邓小平没有表态。”

外国记者讲完话，听众热烈鼓掌。

邓小平对民主墙的赞扬鼓舞了人群，有人提议举行庆祝游行。

大约七千人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并在纪念碑下举行庆祝邓小平支持民主墙集会，发言声、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12月初，邓小平在出席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又对法国记者提到“民主墙”。他说：

“大字报运动会继续，因为那是件好事。”

据称，中共元老派还派出卫戍部队，日夜守护民主墙。

当时的邓小平正好主管外事。通过外国人的“捎话”，他一方面为自己营造了一种开明、民主的形象，为即将到来的访美做准备；另一方面借助“民主墙”的舆论力量，准备与华国锋的“文革上台派”做最后的较量。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还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报告中，他批评了党内“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

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的做法，指出“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据参与起草这个讲话的于光远回忆：

“西单民主墙，开始大家都很高兴。邓小平也很高兴。因为西单民主墙在三中全会里面，是汪东兴的问题。你不能提华国锋，汪就是代表。最早提出汪的问题的是江一真。我们两人商量，江就讲他的长征的问题，我就讲他后面一段。我们两都在一个组，西北组。三个召集人，胡耀邦是其中之一。”

“当时是会内会外配合。胡乔木晚上打着手电筒到民主墙去看。我不敢去，怕人认出来……严家其不是给人抛起来了么？所以我始终没敢到跟前去。严家其在这批人当中已经很有名气了。‘四五’运动啊，等等的。”

于光远继续回忆说：

“这时，叶剑英讲话，表扬了西单民主墙。叶的讲话是叶身边的人给他起草的。邓小平讲话是我组织的。邓对我说：我听说北京市公安局的人要给西单民主墙的人立案，这个事很岂有此理！你把这件事给我搞清楚一下，我讲话的时候，离开讲稿，把这件事情批评一下。可是，讲话时就转变了——这是我亲自感觉到的第一个转折点。叶帅后来发表文章也去掉了那些讲话。因为这时‘民主墙’已经出现一些东西，矛头不光是对汪东兴了。对于整个民主啊，等等问题。……当时他要我写，不过我写得不多，就一张纸的样子。他不要写到稿子里，讲讲维护民主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是他的高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社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鼓励民众在突破僵化时“越轨”，把各种意见讲出来；“要让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不要“鸦雀无声”；“言者无罪”，“反对说错了话就要追究”，要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1979年3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言者无罪”与“以言治罪”》的文章，作者是徐炳与白玉琴。文章旗帜鲜明，义正词严，给了民主墙人士以极大的支持。

胡耀邦曾派出理论务虚会参加者，《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理论部主任范荣康考察“民主墙”的情况。他们撰写了一份长达几万字的调查报告，详尽地介绍了各个“民刊”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巨大的共鸣。

另一位参会者，严家其本人既是“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又是西单墙民刊《北京之春》创刊时的参与者。会议期间，他还把新印制的《北京之春》拿到务虚会上散发。据说，这是民主墙唯一的一份铅印刊物。严家其和王若水后来都成了“党内民主派”的理论骨干。据当事人回忆，1979年1月27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汇报理论务虚会情况时，还有过更激进的民主派言论，他说：

“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它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东西要大大发扬，过去无产阶级没有搞好，斯大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

“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举、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一时间，社会上呼“邓大人”者有之，呼“邓青天”者亦有之。美国《时代周刊》则将他评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称赞邓是“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民主墙”的声音从下层呼应了邓小平，给党内高层权力更替提供了“民意”的依据。在诸如平反“天安门事件”、反对两个“凡是”、批评汪东兴、华国锋、为老干部平反等重大问题上，给“文革下台派”以舆论的支持。以胡耀邦为首的“实践派”也以各种形式给“民主墙”以鼓励。客观上出现了“党内党外、会内会外互相呼应”的局面。

但是，群众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你利用，也可以为别人利用，更要表达群众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境况。遵循这个规律，西单民主墙运动很快便由就事论事发展到批评时政、反思历史、探讨理论；从实践言论自由进而发展到实践出版、结社自由。维权、喊冤、情感宣泄的示威活动，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转变的轨迹大致是这样的：

1978年11月16日，署名“北京王府井大街57号汽修……字0538证件持有者”的一篇小字报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形而上学，批评“革命要在被当作反革命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悲现状。把时事议论上升到现实批判的高度。

11月24日晚，黄翔等贵州青年在北京成立“启蒙社”。作为建社的“奠基礼”，这一天，“启蒙社”成员在天安门前一字排开，撒了一泡尿；然后，在靠近毛泽东纪念堂的栅栏上刷出大标语：“应该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三七开”。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晚，民主墙前的自由讨论发展成“民主讨论会”。

11月26日，徐文立等在民主墙贴出《四五报》的创刊号。是为“西单民主墙”的第一份刊物。

11月27日，受外国记者传达的邓小平言论鼓舞，大约七千人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

11月28日，民主墙人士又重温了一次“胜利大游行”的快感。不过，来自公安和各地新华社记者的报告，与民刊记者的描述有所不同。《民主墙》的报道是这样的：

“11月28日，有人以‘民主讨论会’的名义贴出通告，准备晚七时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集会。天近傍晚，聚集在西单的近万人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与已等候在纪念碑下的人汇合。总人数万人以上。组织者带领大家唱国歌、国际歌。而后，自由发言。发言者用半导体喇叭演说。有人谈知识青年问题；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论；有人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彭真这些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中共高官以及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处理提出质疑；有人点名批评汪东兴、吴德、倪志福、陈锡联等人的僵化保守；有人就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的改革提出自己的设想；……谈民主、谈四化，发言踊跃，场面热烈。当演讲内容获得听众赞同时，人们雀跃、欢呼，甚而把演讲人抛向天空，以示祝贺。当演讲人吞吞吐吐，或演说内容不投合听众趣味时，便是一片嘘声，甚而将演讲人轰下台……讨论会持续三至四个小时。会议结束时，有人分发<十一·廿五民主讨论会>口号和《民主墙歌》等传单。”

1978年12月5日，在西单民主墙一处不显眼的地方，出现了一份小字报，题目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作者是魏京生，署名“金生”。文章概述了中共三十年来实行独裁统治的状况，揭示了专制统治权力的实质，提醒人们正视仍然沿袭的旧政治制度，人民仍然没有民主、自由的现实。告示民众不要相信那些独裁法西斯主义者所说的：你们的现状实际上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这种谎言。要信赖自己，争取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民主。至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文中说：

“由人民按他们自己的意愿选择为他们办事的代理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利益去办事，这才谈得上民主，并且他们必须有权力随时撤换这些代理人，以避免这些代理人以他们的名义欺压人民。”

据称，魏京生研究过马克思、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理论，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弊病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判断是错误的。

文章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赞同、支持以至进而发挥的小纸条不时出现在小字报的周围。但也遭到不少人的斥责，有人以“焦大”为笔名，破口大骂这篇小字报及其作者。有观察家认为，正是经由《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出现，“西单民主墙上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发展”。

由于贴在西单墙上的大小字报不断被覆盖，加上风吹日晒，很快就损坏；一些言词犀利的大字报更是公安便衣人员重点毁坏的目标，因此，很多有意思的大字报只能昙花一现。于是，保留、交流思想与创作价值的需要，催生了民主墙的另一朵奇葩——民刊。

1978年12月16日，徐文立创办的《四五报》和赵南创办的《人民论坛》合并，变身《四五论坛》。徐文立、赵南、吕朴、刘青共任召集人，发表了大量文章，使之成为当时华北最有影响的民间刊物。

此后，一份以《民主墙》为名的油印刊物也出现在西单墙上。该刊是西单墙上大、小字报汇编。它在前言中表明，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赋予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所以才编印这份刊物。

为争取“出版自由”权利，《民主墙》编辑部刊出了一份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函件，争取他们“对杂志的公开、正式承认与支持”。虽然在履行手续方面不得要领，但却表现出当时青年中少有的法治意识。但这些单位的装聋作哑，没有人出来指点迷津，说明执政者并没有将此列入议事日程。

1978年12月底，青年诗人北岛、芒克、陆唤星、刘禹、张宏志等合作创办的诗刊《今天》出版。给政治氛围浓厚的民主墙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接着，主要刊载短讯、短诗的《群众参考消息》出版。由于文章短小精悍，容量大、消息多，十分抢手。

1978年12月下旬，因“四五运动”受迫害，以及为其平反奔走呼号的周为民、王军涛、刘万勇、吕嘉民、李楠、严家其、邵明瑞等十人，商讨创办刊物。受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启发，严家其提议，刊物称《北京之春》。

1979年元旦，《四五论坛》编辑部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前，组织召开了一次“民主讨论会”，就“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使1978年11月底中断了的“民主讨论会”得以继续。

1979年1月，以周为民为主编、王军涛为副主编的《北京之春》面世。它在发刊词中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脱去“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这两只穿在中国人民脚上的小鞋而努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京之春》一直保持理性和温和立场。

1978年12月，任畹町将个人起草的《中国人权宣言》带到民主墙，与一些有兴趣的青年进行了交流。

1979年1月1日，任畹町、赵兴、辛光、李广利、钱卫（陈旅）、宋义、李伟等人，在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聚会，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同盟”；宣读、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权宣言”。1月5日夜，《中国人权宣言十九条》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西单民主墙及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1月7日晚，经过“美国之音”的预先广播，上万人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倾听“同盟”宣讲“人权宣言”。

《宣言》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搬掉天安门广场水晶棺；全国公民直接投票选举各级领导人；组成有全体公民直接选举的“公民委员会”或“公民院”作为人代会的常设机构；公民旁听人代会；用法律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国家预、决算和国民总收入、工农业总产

值、军费开支、国家行政开支……取消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向全社会所有制过渡；监督国家对全体公民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分配；制裁行贿、受贿行为；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修正对铁托同志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公民自由出入外国使馆索取宣传品和招待外国记者，向国外发表作品；开放所有“内部读物”和“内部电影”；新闻自由；公民拥有出版印刷权；穿戴自由，迁徙自由；解决夫妻分居两问题；失业公民享有国家救济的权利；保护农民的基本口粮，消灭乞丐；兑现对国民党起义官兵及其家属的政策；取消贫民窟，取消三代同堂，取消大儿大女同室；高考取消政审，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开放边境，活跃贸易，交流文化，出口劳动力；出国勤工俭学自由；谋生和旅游自由……

末了，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组织及公众给予支持”。

之后，“同盟”又出版了《中国人权》和《中国人权报》油印报刊。

据高皋女士描述，“中国人权同盟”理直气壮地把人权问题昭示天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撼。

到1979年1月底，“中国人权同盟”成员已达一百余名，外省支部也开始成立。近有天津、山西分盟，远的有贵州、新疆、吉林分盟。地方建有泸州分盟。

1979年1月8日，魏京生与杨光、路林主办的《探索》出版。办刊宗旨是：“力求以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现实为探讨的基础，既不承认某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也不认为某些人是绝对正确的。一切理论——包括现在的和即将出现的——都是本刊讨论的对象，也都可以成为分析、探讨的工具”，“本刊是在文革中反对官僚政治的潮流和西单民主墙反对独裁专制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反对任何维护官僚主义和独裁法西斯主义的言论和理论，对不给予别人或不准备给予别人自由的人，本刊拒绝其自由发表的权利”。《探索》的创刊号除选登了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它》外，还刊登了《续〈

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续》文不仅批判了马列主义，并将之与“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是马克思将“社会主义运动纳入理想主义也就是极权主义的轨道”；主张摒弃以压抑个性为特征的极权主义，弘扬以维护并融和个性为特征的民主原则，为创立一个多元化社会而努力。文章还称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这期《探索》还刊发了由杨光执笔的《就邓小平副总理1月5日答美国记者问而问》，对邓小平在外国记者面前宣称“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进行了批评。

继《探索》之后，北京青年陆续创办了《求是报》、《沃土》、《人民论坛》、《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等55种民刊。发行1至43期不等。

北京之外，全国各地，至少有26个城市出版了127种民刊或大学生刊物。在许多大学里，还有由学生会或学生独立创办的刊物。如，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上海复旦大学的《大学生》；上海戏剧学院的《筏》；广州中山大学的《红豆》；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天津南开大学的《南开园》；四川大学的《锦江》；杭州师范学院的《我们》；全国13所大学学生合办的《这一代》，共约45种之多。

图1-8：1979年“星星美展”十一游行。左图：左为王克平、左中为徐文立、中为马德升、右为杨靖（美国新闻周刊）；右图：王克平、曲磊磊（徐文立提供）

图1-9：《人民之路》《人民之声》《责任》《北京之春》《这一代》创刊号封面和《告读者书》（张桦、陈小雅收藏）

1979年1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传出“镇压民主墙运动”的信号；18日，因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并组织“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的示威游行，女工傅月华被捕。

针对这一动向，1月25日《四五论坛》、《探索》、《群众参考消息》、“人权同盟”、“启蒙”北京分社、《人民论坛》、《今天》共同发出《联合声明》：

为实践和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和第五十二条，北京市各群众团体和民办报刊于1979年1月25日发表联合声明如下：

一、各群众社团和民办报刊决心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坚持长期奋斗。对违背宪法第四十五条和第五十二条的言论和行动，各群众社团和报刊应共同运用各种宣传形式首先在民主墙进行抵制。

二、各群众社团、报刊及其公民因从事宪法所规定的范围的活动被专政机关以一些借口或造谣诬蔑拘捕，和以其他形式进行迫害，各群众社团和报刊应共同要求执法机关公布拘捕理由，并要求开庭审讯。

三、各群众社团、报刊及其公民由于从事宪法所规定范围内的活动而遇难，各群众社团和报刊有责任向国内外公布消息，以求舆论支持。

四、各群众社团和报刊对受迫害公民进行长期援救，并要求探监。对受迫害公民的家属有责任进行慰问和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以上四条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公民支援。

该声明由任畹町主笔。

在民刊团体和北京市民的共同抵制下，为了配合邓小平访美、访日营造开明形象，北京市暂缓执行会议精神。

2月8日，民刊团体派出“民办报刊记者”，联合造访了市公安机关。魏京生将采访作了录音，并整理公布在西单墙上。同时还写了一张《扣押傅月华是否合法?》的大字报。指出，公安部门对傅月华的作为，不但是无视宪法精神的行为，同时也是蔑视人民群众，向民主进行挑衅。并要求北京市法院和检察院严肃处理这一事件，立即释放傅月华，对逮捕傅月华的原因作出说明，追究制造这一事件的犯罪分子。

3月8日，从贵阳“启蒙社”拉出来的李家华等人另立门户，成立了思想上更为激进的“解冻社”。同时发出《解冻宣言》，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不适应现实的成分，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要求废弃“毛泽东思想”中过时的成分，迅速把毛泽东个人的党还原为全体党员的党；为实现中国人思想、政治、伦理、感情、生活的大解冻，为实现社会的多元化而奋斗。

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特别指出：

“有少数人，他们一不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无辜者，二不是无职无业的人，却故意制造借口，擅离生产岗位，向国家提出无理要求，以达到个人的目的。游游荡荡，无理取闹，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正告这些人，你们代表不了群众，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对于极个别确实别有用心，蓄意制造事端，造成严重恶果的人，应该给予法律制裁。”

其中批评的“有职有业”还“煽动闹事”者似有所指。魏京生针锋相对为第三期《探索》写了一篇社论《是谁制造事端，是谁造成恶果?》文章说：

“人们群众不满，因为国家领导人们，骗取了人民的信任，却不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国家有困难，是因为这些领导人把持国家权力，却不去从事有

益的建设，他们不愿意倾听人民的意见。如果‘社会秩序’不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只是保障少数压迫人民，无视人民要求的权力，人民就没有理由来维护这种秩序。因为维护了这种秩序，就是维护了人民的敌人。”

社论还说，是那些想继续“反人民政策，是那些用错误政策使人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特权者，是那些为了争权夺利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和使经济崩溃的刽子手。”制造了人民的不满。并警告说，统治者不要以为人民没有权利来破坏他们干坏事的“秩序”。他认为：

“必须首先铲除这些官僚、老爷，实现人民的民主，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四化”。

这期《探索》除为解救傅月华进行宣传外，还刊登了魏京生的《人权、平等与民主——评述〈再续第五个现代化〉的内容》，以及揭露中国牢狱黑幕的文章《功德林的“功德”》、《二十世纪的巴世底狱——秦城一号监狱》……

3月15日，《四五论坛》的杨靖、《探索》的魏京生、“北京启蒙社”的金庆军、《群众参考消息》的夏训健、“中国人权同盟”的陈吕，再次组成记者团，前去北京市公安局功德林收容所采访傅月华现况。

3月25日，《探索》出版了一期号外，在西单和王府井销售了1500份。这期号外刊登了魏京生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章指责“邓小平利用过去人民对他的信任来反对民主运动”，“企图把华、邓政治体系无力挽救中国经济和生产的责任强加给民主运动”。文章说，邓小平3月16日讲话中对毛泽东的刻意吹捧，有可能是邓小平“准备继续毛泽东式的独裁社会主义政治”。邓小平对待民主运动的态度，表明他“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在这篇文章中，魏京生还对华国锋、邓小平“占据总理和副总理的职位是否合法？”“以副总理

和副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代议机构的名义宣布抓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提出质问。

邓小平的3月16日报告是内部讲话，当日由中办下发至地师级单位。魏京生能够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写出并印行批评邓小平这个讲话的檄文，说明他有接触党内文件的机会。正是这一信息，使对方找到了一个对付魏京生的突破口。果然，世人看到的是：这位“勇士”毫无察觉地朝诱饵走去，并最终陷入法网。

但是，多年后，魏京生在忆述自己的这番言论时，给出了完全别样的解释。他声称自己为证明邓小平是独裁者，对邓采取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而邓小平果然“上当”。剩下的问题只是，以什么理由、采取什么手段，将他拿下。而魏京生再次给邓小平送去了理由。

很难判断魏京生的自述是否其原意。但不容置疑的是，魏京生案奠定了邓小平成为“独裁者”的第一块基石。

图1-10：魏京生在法庭上进行辩护（选自香港《明报》）

本书以后还将提到，1989年1月，当方励之以“公开信”的形式直接向邓小平提出“大赦”魏京生时，从心理上说，对邓小平是一次逼迫。它逼迫这个已经具有“独裁者”身份的人，再次直面自己踩在脚下的那块垫脚石。这一格局，将直接决定邓小平对于之后发生的“八九民运”的态度。

魏京生文章发表的当日，新华社报道了上海市政府的3月6日《通告》，全国各报刊予以刊载。

3月29日，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内容与上海《通告》相仿，但增加了邓小平即将发表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禁止一切反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图片等材料。由此可见，这个《通告》直接出自邓小

平的授意。美国著名汉学家傅高义也注意到，当时，华国锋还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邓小平已经负起责任。他认为，1979年3月28日的北京市政府的公告，是根据邓的指示发布的。

当日，魏京生和“人权同盟”的陈吕因“反革命罪”被捕。

4月4日上午，任畹町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再致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公开信》、《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3月29日〈通告〉的6条意见》。大字报的第一句话是：“民主的敌人已经开始进攻”，但大字报的第一张刚刚贴出，他本人就被捕了。

据时任《四五论坛》负责人的徐文立回忆：

“1979年3月底，由于魏的盲动入狱，迫使民主墙的朋友们不得不站出来，为他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奔走呼号，首先为此罹难是任畹町，之后民主墙的朋友们不断地发表声明，并在民主墙前由我主持民意测验和讨论会，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任和魏；并冒着极大的风险，搞到了审魏的现场录音”。

关于获取魏京生录音的过程，由于充满着惊险和勇敢，一直被“民主墙”同仁传为美谈。

《四五论坛》在接获了魏京生的审判录音后，将其抄成大字报贴在西单民主墙上。11月9日，预售《魏京生案件审判过程》的布告张贴在民主墙上。11日下午，油印版的《过程》销售刚刚开始，便有警察七、八十人蜂拥而至，抓捕4人以上。了解到上述情况的刘青，前往公安部门承担了责任。据徐文立回忆：

“刘青按事先约定好的分工，去北京市公安局承担责任，被判三年劳教；我则设法去营救刘和照顾刘的老母，并专门为此成立了‘营救刘青委员会’。我同时冒着被捕的风险，在民主墙上公开发表为魏辩护的文章《不公正的判

决》。当我被判15年徒刑、4年剥权时，北京市中级法院在我的刑事判决书中，明白无误地记载着我的主罪之一：被告人徐文立于1979年4月8日在‘西单墙’散发传单，污蔑《通告》是‘使用暴力镇压’，‘扼杀民主’，煽动群众抗拒政府法令的实施。被告人徐文立还搞所谓‘民意测验’、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张贴散发传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煽动群众，反对司法机关对反革命分子的公正判决和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确处理。”至此，全国性的大逮捕浪潮接踵而来。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1989年的学运，为什么自“四二六”社论后，直到运动被镇压，一个始终不变的诉求，就是要求当局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同时理解，为什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撤不下来。因为在没有讨到说法之前退出，接下来的就是历史的重演。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1989年的结局会比历史重演更坏！

1979年12月，实际上已经被禁止了九个月的西单“民主墙”，正式宣告死亡。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1980年2月23日召开的中共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规定公民拥有的“四大”权利！

第二节 分道扬镳——“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对于“实践派”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耐心也越来越有限。据邓力群回忆，理论务虚会期间，每日看会议《简报》的邓小平曾对胡乔木说，越看越看不

下去。对1956年“整风”和1957年“反右”记忆犹新的他，觉得秀才们再一次走过了头。他对王若水尤其感到气愤。王不但批毛，还在香港媒体发表文章，将会议的争论透露到境外。这违反了中共“内外有别”的纪律。尤其是“出口转内销”，借用境外舆论促使党内高层发生改变的做法，更令邓小平深恶痛绝。1989年，他再次因为这类事情对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失去信任。

文革下台派“分道扬镳”的时刻终于到来。

1979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泽东长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做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的长篇讲话。

邓小平说：

“粉碎‘四人帮’两年半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党、政、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党、政、军工作也基本恢复了正常秩序。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以上的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胡乔木为他起草的。

由于理论务虚会上出现批“康生”文章的插曲，把原本支持“实践派”的邓力群向左推了一把；朝野批毛声势的不断升级，也使毕生贡献于毛泽东文献的胡乔木感到了危机。从此，一场以胡乔木、邓力群及其同道为一方的“诠释派”理论家，以于光远、吴江、苏绍智、李洪林、严家其、于浩成、胡绩伟、杨西光、王若水、阮铭、张显扬、孙长江等同仁为另一方的“实践派”理论家，在理论界争夺“话语权”的斗争轮番展开。

于光远曾对笔者回忆与“诠释派”分道扬镳的原委。他说：

“分道扬镳是在理论务虚会，其中有一段时间，我躲在友谊宾馆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了列宁108条，全部是引证，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反对华国锋说‘强化国家机器’。我的意思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机器消亡的开始。据说胡乔木拿来大做文章。胡耀邦也批了，说我的观点‘不敢苟同’。他们都弄错了，说我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就是国家消亡的开始。因为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嘛，后来我把这些都收到文集里去了。强调民主，那就是要强调国家机器的实际上的消亡。敌人只是少数，要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干啥？发扬民主，敌对阶级不就孤立了吗？‘分道扬镳’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胡乔木投井下石也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胡耀邦那时候还崇拜胡乔木，因为他是权威。”

“理论务虚会之后，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它提出来后，社会科学院林伟（过去《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调到社科杂志）说：‘四项基本原则’搞得不好会变成四根棍子。胡乔木抓住，说：社科院有人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四根棍子。我就非常生气，说没有一个领导人把自己本单位的事情加以夸大。他当时是社科院长。在他家里就吵起来了。人家是有条件的，没这个话，你拿出证据来，我说，还有邢贲思也有一句话，邢也否认。”

“这以后我就正式和他冲突起来了。他要批判，我说好啊！印出来，大家讨论。我的嗓门很大，牛脾气一来什么也不管的，他也有点儿发怵了。”

“三中全会以前，胡乔木还是不错的。张显扬批‘全面专政’他还是赞成的。”

图1-11：于光远接受陈小雅采访（陈小雅收藏）

于光远回忆道：

“‘四人帮’刚粉碎，我提出几个问题讨论，这是很大的事情。按劳分配讨论会呀，有人维护七中全会决议啊，毛主席理论问题的指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我是起草人之一。我对这个报告就采取一个方针，在原则性问题上我都要发表一次意见。你听不听，那是你的。我讲了，我灵魂得救了。现在的王维澄、顾明，还有红旗的，他们就和我争论……然后到1979年，1980年，我就一直下去。胡乔木、邓力群说：‘自从理论务虚会以后，有些人就同党分道扬镳了。’其实是我们跟他们分道扬镳。”

“有人问我，为什么就和邓力群搞成了对头呢？我说没别的，就是我看他不顺眼，他看我不顺眼。关键还是怕民主。这是根本问题。”

吴江也认为，“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存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局势和鼓动反右”的问题。指的就是“诠释派”理论骨干胡乔木、邓力群等人。

但李洪林认为，“诠释派”所代表的是一个更庞大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及其在“后毛泽东时代”将失而复得的权益“落袋为安”的心理。

随着邓小平大权到手和访问美国的成功归来，他终于露出了“实用主义”的真面目。通过他的这篇讲话，后毛泽东时代“威权政治”的图景，以及邓小平个人“修正派”的定位，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艺术”逐渐变得清晰：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用中共“八大”以来的提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对“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有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因为还可以用来镇压“民主派”和“文革”余孽，所以不能取消。但不能让它干扰“新时期”的任务，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新的解释。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绝对不能用！因为它的含义是“革”走资派的“命”。这是邓小平的噩梦。更重要的是，它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

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提法——可以讨论。因为那其中很多华国锋的东西。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应该取消；不涉及政治的自由可以还给人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满足人民生活；要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作用。至于经济改革，他看好市场经济、重视价值规律、主张对外开放，但这时还没有什么蓝图。即便搞市场经济，也不能走西方道路，自己怎么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至于是采取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市场经济计划指导”？他似乎没有成见——不管黑猫黄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至少在可见的二十年内，要以“铁腕”保证“小康”蓝图的实现。

李洪林认为：

“事实上邓小平这个闭幕讲话，应该说是中共度过文革危机后左的本性重新亮相。党内主流是什么呢？就是‘左’。……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一恢复工作后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报一下子就把邓小平说服的原因。”

正如何维凌所说，在中共高层，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如果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多少已有些动摇的话，至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存在信仰。至于共产党的领导，更不会怀有二心。有心人也注意到，胡耀邦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取消“四大”等问题上，都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面对“务虚会”参加者一反往日畅所欲言的情景，胡耀邦以出人意料的节奏，宣布了会议的结束。这就使邓小平这篇原本不是“结束语”的讲话，在很多时候被当成了“结束语”。据吴江回忆，这个过程是这样的：“3月30日，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结束时邓小平说：我只是初步讲些意见，请同志们讨论提出意见，然后再作修改。

在我的记忆中，讨论中大家的意见不多，因为报告主要讲当前存在的两种思潮：一种是林彪、‘四人帮’和‘两个凡是’的思潮，一种是脱离或违背四项原则的思潮，包括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出现的少数人闹事。重点却是放在后面。

准备讲这样的问题，自然不能不事前同胡耀邦打招呼。胡不在会议场所，当时是在他家里。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要我到他家去一谈。……耀邦问我小组会情况，我据实以告。我问大会究竟何时召开，小组会已经开不下去了。趁他暂时沉默之际，我向他汇报我们准备的发言内容。他反过来问我：‘你觉得大会是开好还是不开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说：‘大家究竟会讲些什么呢？你们的发言内容自然可以。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四项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出在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弄成两张皮。反对教条主义当然同样不能动摇。但是，……’然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当我正与安子文说话时，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坚定的语气说：‘大会不开了，我也不讲话了。我明天就去宣布。’”

邓小平的讲话是3月30日，那一天是星期五。那时还没有周末“双休日”制度，所以，实际上会议只在3月31日星期六讨论了这个讲话，而且讨论并不

热烈。吴江可能是4月1日星期天到胡耀邦家里。胡耀邦说“明天就去宣布”闭会，这个“明天”即4月2日星期一。4月3日星期二，理论务虚会召开了闭幕式。胡耀邦在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

笔者不惜累赘地对上述时间节点作出爬梳，是想凸显一个“历史的节点”：当时的邓小平还不是一个独裁者。当邓小平要求大家讨论他的“初步意见”时，“四项基本原则”并不具有“法定”的意义（至少还未被写进《宪法》序言）。但胡耀邦和与会者的表现证明，他们自动放弃了再做修正，因而错失了一个使形势朝着更健康方向转变的历史机会。这究竟是由于眼光短浅，还是性格的懦弱？还是已经估计到、但不愿意看到新的分裂？抑或，他和在座的理论家们一样，都无力为当前复燃的群众运动指明一条“出路”，便只好对“四坚持”沉默？就犹如他们在八九民运中再次表现出“理论的无力”，进而对武力沉默一样？抑或，胡耀邦与1989年的赵紫阳一样，是尊重党的实际领袖邓小平，为了照顾大局？胡耀邦究竟作何思考，目前暂无更多的资料提供分析。但不论胡耀邦作何考虑，显然，他已经感到这件事情的分量，并略微窥见了裂痕的深邃。也许，在新的分裂和更多的牺牲尚未出现时，他决定采取迂回消化战略，等到自己真正接班的一天，一如1989年的赵紫阳？

胡耀邦的观点是清晰可见的：他保护“实践派”理论家，反对捕人，反对把“民主墙运动”出现的问题和社会风潮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对于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

“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其时，胡耀邦大概并不知道魏京生在与邓小平玩一场“赌博”游戏。但年轻人履历尚浅，轻生冒进，不惜以死相搏的特性，他是熟悉的。尽管他也

有不耐烦的时刻，据说，胡耀邦曾讥讽《人权宣言》“哗众取宠，好象我们这个党不行了，要由他们来收拾局面”。但他并不对持不同政见者下狠手。对于任畹町的刑期，迟迟不能最后宣判。直至胡耀邦主政，草草以“四年劳教”作结。

1979年1月3日“理论务虚会”期间，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例会上，胡乔木说：“现在党内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三股风，局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还严重。”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认为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

1980年7月，波兰团结工会举行全国范围的罢工，陈云根据国内形势，说了两句极具压力的话：

“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

他要胡乔木、邓力群根据波兰的教训和这两句话的意思，对中宣部草拟的《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进行修改。9月24日，胡乔木致信胡耀邦，就7月间波兰全国范围罢工表示了看法。胡乔木认为，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可能使其达到激烈的程度和爆发的形式。信上说：

“我国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旦与心怀不满的群众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爆发波兰事件不是不可能的，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

胡耀邦对来信未予理睬。但他对中央党校吴江等人说，波兰事件说明了波兰人民不满苏联霸权主义，积极要求改革，我们在波兰事件中要“引为殷鉴”的，应是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

在官方史学的话语圈内，基本认同毛泽东逝世后的历史，第一阶段是“拨乱反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但胡耀邦曾对“拨乱反正”的提法有所思考。他认为，什么是“正”？并不是已经有了答案，而是仍在探索中。胡绩伟说：

“他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他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他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胡耀邦最终成为某些人推行新的专制主义的政敌。”

显然，从以上胡耀邦的言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尽管他在大局上曾努力消弭裂痕，但与邓小平执政理念的分歧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在“理论务虚会”上，胡耀邦的一段讲话其实已经表达了这种理念：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虽然，胡耀邦尚不能说已经找出解决这类社会历史问题的制度性突破口，但是，他已经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要学会在“动乱”中治理国家，而不必要追求专政时代用剥夺人民自由和权利的手段才能实现的稳定。这也是日后赵紫阳在处理“八九民运”问题时的执政理念。尽管他们和邓小平都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们在这些头等大事上仍能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界限的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却无可避免地正在日益加深。

第三节 流产的“政改”

1980年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前，邓小平明确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把它写进党章修改草案。

1980年8月31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集中批评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等等弊端。指出这些问题同现行的制度有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这里他还引用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一句话，说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时，还特别提出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虽然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和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但对肃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估计不足，没有完成。

邓小平提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为此，正考虑逐步进行以下重大改革：

一、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二、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

三、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工作系统。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内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

四、企业和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

五、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给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民主派和体制外知识青年极大的鼓舞和无穷遐想；对于早已存在于朝野的对现行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鼓励和促进。

早在1974年，广州的李一哲就提出“民主与法制”改善社会主义制度。1979年元旦，《四五论坛》编辑部就组织召开了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题的“民主讨论会”。1979年1月5日“中国人权同盟”在“人权宣言”中

已提出“普选”、“直选”及“公民委员会”和对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1979年1至2月,《北京之春》杂志主笔吕嘉民(笔名:吕民),连续发表了《逐步废除官僚体制和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再论废除等级授职的官僚制度》和《取消厂矿企业基层党组织的行政领导权》等文章,探讨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979年1月,历史学家黎澍在第一期《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提出了封建主义对我国政治制度影响和“国家脱离社会”的问题。在理论务虚会上,“严家其等人提出的废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实际存在的终身制等诸多发言,都触及了政治体制问题”。

1979年5月8日至10日,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多年致力于文官制度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龚祥瑞作了以《英国文官制度》为题的研究报告,认为实行文官制度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为此,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

10月6日,《光明日报》编辑部组织了有关进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问题座谈会。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以及理论界著名人士参加了会议。会后连续两天不惜版面发表严家其、鲍彤、于浩成、张显扬、吴明瑜等人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吴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鲍彤《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于浩成《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江春泽《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当家作主》,阮铭《改革,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张显扬《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吴大英《健全法治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证》,高放《要改革,就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胡华《深批左倾

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萧灼基《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戴逸《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林韦《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方针坚持下去》。宁夏大学教授吴家麟在《怎样发挥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要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必须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习惯，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同时，应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1980年6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座谈会。与会者认为必须结束“干部终身制”，消除“个人迷信”，改变“任人唯亲”和“一言堂”等封建意识在党内生活中的影响。

在政治体制改革探讨中，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廖盖隆提出了著名的《庚申改革》方案。

《庚申改革》方案是廖盖隆根据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所作的说明、引伸和发挥。中心意见是，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也就是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化。

“方案”根据胡耀邦9月在各省市书记会议上“宪法要大改”和邓小平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关宪法修改的讲话精神，对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解释。“方案”认为，应考虑把人民代表人数由3000至4000人缩减至1000人，把人代会分成两个院，分别代表区域及各阶层、各企业的利益。人大常委会也应从现在的300人缩减至60至70人，并整年在人大常委会工作。在法律原则上，重申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还特别强调“司法独立”，党委不能干涉审判。

在阐述“党政分开”原则时，强调要保证各种财政经济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群众团体和舆论机关的独立性，特别要保证新闻记者有独立报导新闻的权利。农民应建立独立的农会维护自己的利益。

方案认为，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要实行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民主。至于共产党，则应取消政治局，成立执行、监察、纪检机构，并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制。

廖盖隆还分析了庚申改革与戊戌维新的不同，认为如今靠掌握实权的共产党推进改革一定会成功。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如许多锐意改革的先进人士的期待落空一样，廖盖隆的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触动执政党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权力，而自1949年以来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相比之下，改革派势力非常薄弱。

其二，1980年7月，波兰爆发战后最大规模、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工潮中诞生的团结工会势力迅速涨大，影响逐渐超过执政的波兰共产党。原本叶公好龙的邓小平在党内高层保守派的压力下，扭转了政治改革的形势。

其三，与邓小平倡导“政改”的初衷有关。多年后，赵紫阳说，“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赵紫阳说：

“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

“另外，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

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另外，当时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多年后，替邓小平起草这份“重要文献”的邓力群也证实了赵紫阳的看法。邓力群说：

“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国锋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我们当时没领会到这点。”

但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华国锋的权力被一分为三：

——中央军委主席由邓小平接任；

——党主席由胡耀邦接任；

——政府总理由赵紫阳接任。

实际权力的重心，由党权移向军权。

图1-12：军人邓小平（选自网络）

第四节 第一次基层直选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将人民代表直选范围扩大至县和自治县一级政权，采用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的办法，并决定从1980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为此197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县级直

接选举的试点。根据试点经验，1980年2月5日至12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

上海县徐汇区，是上海市选举的先行试点成功的县区。当时身为副总理的王震还做出批示，赞赏了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参加竞选、并当选为上海县人民代表的学生徐政宇，表扬他的勇敢，称他为“真正的民主战士”。王震还说，要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时期里，逐步形成竞选的风气。

上海市的选举是从1980年4月开始。上海的几所著名大学，都以竞选方式产生人民代表。通过黑板报、大字报、演讲会等方式，竞选人得以宣传各自的竞选纲领。最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徐邦泰和化学系学生孙德纬当选为金山县人民代表。上海师范大学的何成、上海科技大学的魏永东、同济大学的黄静等学生，也当选为人民代表。一些教师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傅申奇也在上海动力机厂所在的南市区加入竞选。因他曾参加民刊活动，遭到工厂党委和所在地选举领导小组的阻挠。但傅申奇居然在1480名登记选民中，赢得了有效票636张。虽不足半数，但超过另外两名正式候选人。为了避免出现难堪局面，当局竟然取消第二轮投票，并令得票数比傅申奇少的那位“内定”候选人“当选”为代表。

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县级直选在全国铺开。

1980年9月中旬，地处长沙市西区第76选区的湖南师范学院开始进行选举。因选民多为大学生，很快形成了竞选局面。据湖南师院历史系77级一班班长锺兴永的日记：

“9月20日，星期六，阴。晚上在操坪看电影《中华儿女》和《爱情与遗产》。放映前，中文系七六级工农兵学员梁恒、七七级学生陶森手握半导体扩音器，发表竞选演讲。梁恒以独立候选‘人民代表’自居，说：我若当选为人民代表，准备起草一份大学生毕业分配方案意见书，呈交总理和书记处书记，并发往全国各高校。其要点一是论才分配；二是实行聘请制。”

两天后，陶森贴出《我的态度》、《我若当选为人民代表后的打算》、《选举问答》的大字报。

陶森和梁恒都是中文系学生。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梁恒坦承，自己在“文化大单命”中曾经狂热崇拜毛泽东，以后幡然醒悟。在答辩中，他公然宣称“不信仰马列主义”。与他一同出线的陶森，则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风闻与北京的王震还有亲戚关系。中文系七七级和七八级部分学生参与了为陶森助选。但师院的政治气氛并不浓，更无人心所向的人物。到9月25日为止，第一轮候选人选出了585名代表。陶、梁二人只拥有相对较高的支持度。其支持者中，以中文系、历史系、政教系的为多。

经过三轮淘汰，选出的正式候选人中没有院选举领导小组满意的人。于是又采取了推出学生会主席、擅自增加候选人名额的做法。这些措施不仅遭到绝大多数选民的反感。还直接引发了湖南师院学生赴省委请愿和绝食风潮。

在省委的默许下，院方无视选民学生的意见，不作协调，仍然我行我素按原定计划在10月14日举行投票。结果，全校投票人数仅为登记人数的四分之一。在历史系的投票中有一票投给了彭德怀，两票投给了张志新。

10月15日，师院学生成立“罢课总委员会”，宣布罢课以支持绝食学生，各系还组织了游行。湖南其他大专院校纷纷声援，不少工人也前往省委门前，或贴大字报，或站台以示声援。据锺兴永记载：

“10月16日，星期四，雨。中南矿冶学院数千学生经师院往省委声援，要求省委立即解决师院的问题。听说中央决定派调查组来调查，毛致用接待了陶森，加上天气变化，绝食代表决定撤回。11：15，绝食代表在旁人挽扶下，冒大雨，步行回学院。学院数台车随后跟着。可是回到学院后，在大操场主席台上，有绝食代表大骂陶森是‘学贼’，梁恒说他有充分证据来说明陶森背叛了他们。”

10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的调查组到达长沙，次日，接见了绝食代表。10月25日上午，湖南师院李秋枫院长等数十名院系领导在省委门口接见了静坐的学生代表，并进行了会谈。毛致用的秘书也表示，愿在下午2：30接见陶森、程安庸等。但陶、程与另外30名师院学生依然动身前往北京上访。

上访者一路得到各省大专院校学生的热情接待。湖南师院“选举风波”得以在沿线迅速扩散。在北京，他们得到了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办公室主任程子华等人的接待，他们承认学生的行动是合法的，但不赞成学生的做法。11月1日，陶森一行从北京发回电报：

“情况很好，中央领导很重视，团结反官僚，立志大改革，吸取教训，继续奋斗。”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三人调查组”则在本地进行了调查，并下达文件，对湖南师院选举领导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批评，对其错误提出了处理意见。11月15日，师院各系传达了三个文件：

“一个是全国选举委员会程子华部长对师院问题的处理意见：师院选举成绩是主流，但在选举程序上有问题，一是将6名候选人改为7名时未征求意见；二是苏明态度不好；三是在未做好工作时仍然进行选举。故决定：第一，由院选举办宣布第一次选举无效；第二，苏明作检查；第三，总结教训，再行选举。选举后，由新华社发一通讯。并对上访团的一些处理作了决定。第二个文件是中央书记处信访局赵副局长与陶森等人的谈话纪要，批评陶森相当尖锐。第三个文件是党委书记李秋枫代表党委和选举办的前段选举工作的回顾和检查。因苏明已70高龄，在事件发生后，得肠炎住院，后病转危，一度双目失明，故由李秋枫代为检查。”

继湖南之后，在西南师范大学选区，罗立为、陈敏、刘然杰、赵宏铭均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重庆市北碚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杭州师范学院，陈越光当选杭州市湖西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成都大学

当选的有黄晓云。两个月后，又有北京大学胡平、人民大学一分校李盛平、中科院化学所陈子明等16位同学当选。在兰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共57位在校学生当选。北京的县级直选大约在10月底11月初才展开。

在北京大学，首先是国际政治系学生、校学生会宣传委员房志远，在主持经济系与国政系的一个“联合讲座”时，宣读了新修改的《选举法》。然后，他鼓励同学们在北大掀起一场竞选运动，为实践《选举法》赋予选民的权力进行尝试。与会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推举房志远为候选人。经济系的同学成立了助选班子。为了造声势，他们又鼓动技术物理系学生王军涛和经济系学生夏申一同出线。当时，王军涛是北大团委委员，团中央候补委员，“四五”运动的知名人士；夏申是校学生会学习委员。他们出线，有助于吸引选民的注意力。

1980年11月3日，房志远、王军涛、夏申等三人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竞选宣言，北大竞选由此拉开了序幕。湖南学生上京请愿，使湖南师院选举情况在北京几所主要大学里得到迅速传播，并引起热议。房志远等人在总结湖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这次竞选可能经受的困难已经有所准备。

由于房志远举办的首次答辩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又激发起胡平、张炜、张蔓玲、杨百揆、杨利川、刘娟、田志立、姚礼明、易志刚、于大海等学生投入竞选。

在竞选中，夏申以“整体改革”为主题。认为，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宿点和目的也是人。他还公开为魏京生进行了辩护。当他振臂高呼“释放魏京生！平反大冤案！”“全面的现代化，一切为了人”时，激起了选民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王军涛的答辩会是北大竞选的另一个高潮。据载：

“能容纳一千人的礼堂挤进了1500人。他以《中国现状分析》为题，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剖析中国正在走的改革道路的曲折、艰辛，对改革的动力和阻力进行了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批评毛泽东犯了重大错误，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是跨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他不满意人民代表大会只起聋子耳朵的作用，起草了《人大组织法建议草案》。王军涛言辞犀利的演说，引发了选民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欢呼声、叫骂声、掌声、嘘声交织在一起。跳上讲台争抢话筒的现象不时出现。特别是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成了激战的焦点，也因此失去不少选票。”

经济系学生、校学生会主席张炜的答辩会，表现出竞选人的冷静、沉着、通达、精明。他自称务实派，主张从经济入手进行改革，循序渐进，提高生产力是首要任务。

哲学系欧洲哲学史研究生胡平的答辩，赢得了众多的支持者。他的发言题目《论言论自由》一文曾发表在民刊《沃土》上。胡平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专制主义的大厦”，“这个支点是言论自由”。他的思维逻辑缜密，言谈机智诙谐。整个讲话富有哲理又通俗易懂。据载，他答辩时最多的一次有二千余人参加，把北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讲坛背后的舞台上都站满了人。这使得胡平在第一轮选举便以唯一超过半数票的候选人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

与“言论自由”相呼应，房志远、方觉、王军涛、郑棣、李小平、祁亚中等22人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并于12月10日张贴在北大三角地，同时，油印数百份征集海内外人士签名。

图1-13：北京大学校方收集的竞选言论摘要（陈小雅收藏）

北京大学的竞选人把这次竞选看作推进民主的第一步。认为，应当在北京大学生间扩大战果。为此，王军涛、房志远、胡平，北大一分校的李盛平、

科学院的研究生陈子明和人民的大学的刘沃中等人共同发起，并于1981年1月9日，在人民大学召开了北京14校竞选活跃分子联席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选区的选民，则提出严家其作为“非官方候选人”。因他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大声疾呼等事迹，当选为东城区人民代表。

据许良英回忆：面对青年学生高涨的民主政治热情，思想僵化的高等教育部领导人感到了惊恐。当时，胡耀邦同志去外地考察，留在北京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受到这种惊恐情绪的感染，否定学生的竞选活动，并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学生参加竞选，如执意参加，则开除党籍。好在这个使矛盾激化的命令下达后没几天，耀邦同志就返回北京，他立即加以纠正，声明党组织对学生竞选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由此，各校的竞选活动得以继续顺利进行，直至最后选出区人民代表。

在竞选期间，高等教育部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当前学生政治思想情况的报告，把多数学生都恶意地加以丑化，认为必须开除一批，并逮捕几个活跃分子。耀邦同志怀疑这个报告的真实性，要中央办公厅抽调10名干部到北京大学进行深入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完全否定了高教部的报告，认为当前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优秀的，所有活跃分子都不存在所谓政治问题……

鉴于波兰教训，1981年初，胡乔木奉邓小平、陈云之命起草《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但这个文稿在提交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讨论时，“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内容被否定。书记处的意见认为，这类问题应该制订“结社法”、“出版法”加以管理。

胡乔木起草的文件被否定后，于是致信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认为制订两法将给“反党分子钻了空子还不知道”。陈云见信后把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谈话。他说：

“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

根据陈云这一指示，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九号文件——《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文件指出，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并规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直接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

根据这个精神，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要求北京大学开除发起《出版法草案》签名活动的房志远、方觉、王军涛三人。由于北大党委的抵制，这个指示未能实施。但在上级领导机关的压力下，北大不得不扣发房志远寒假回广州探亲的火车票，保卫部门要求他停止签名活动，交出名单方准离校。

事后，北大又组织了对竞选中自由化言论的批判。

据传，湖南师院到京上访的陶森，曾试图面见他那位名人亲戚——王震，但他没料到，王震完全放弃了表扬上海青年徐政宇时的立场，不但拒不见，还下令将陶森“抓起来”！这位亲戚还派人将陶森押送回湘。王震这一“大义灭亲”的态度，给了湖南师院放胆处理陶森的方便。不久，梁恒和陶森在学校受到公开批判。

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后，1980年9月，上海、山东临青、开封、长沙、宁波、安阳、武汉、青岛、贵阳、温州、韶关等地约20个民刊的代表赴广州开会，成立“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以《责任》为协会刊物，推选上海工人傅申奇为主编。协会最初成员为21个民刊，后增至33份民刊助。于当年3月被迫停刊的《四五论坛》，也在11月复刊。

自此，各地民刊人士再度活跃起来。

1981年4月，民刊《责任》的最后一期出版后，主编傅申奇与何求分别从沪粤进京，参加北京主办的“四五”运动五周年纪念会，并寻求与中央负责

人交涉民刊的“法律地位”问题。但二人随即被捕。傅申奇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4月10日，北京的徐文立、杨靖在家中被捕。广州的王希哲、青岛的孙丰也在同日在当地被捕。

1981年6月19日下午4：00，陶森被开除学籍。两小时后，以“倒卖外汇”的罪名被公安机关秘密收押，被判“劳教三年”，押送农场改造。梁恒则因与美国人结婚，并已办妥移民签证，才逃过了一劫。以后，他与安全部门合作，得以创办《知识分子》杂志。

当时的人们并未意识到，“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随着“波旁王朝复辟”——国家权力从“文革上台派”回到“文革下台派”手中——其实已经结束。直到1985年“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反自由化”，党内民主派和体制外激进青年，还想重温1978年的胜利，并根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讲话精神作文章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大展拳脚的梦想，在现实中每每踢到“铁板”。

中国进入80年代的第一次民主运动，就此以失败告终。但是它训练了当时在校的大批学生。据后来参加八九民运的北京大学学生骨干邵江回忆：

“参与的人，有一些作为青年教师留校。他们许多人对80年代的校园自由化和学潮，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第五节 “三驾马车”的“说三道四”

借用李洪林先生的描述，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出台，以后的十年，都在“说三道四”的“左右”斗争中摇摆前进：

“‘说三’就是坚持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决定了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说要全面改革。‘道四’，就是用‘四项原则’来压制三中全会路线。”

有意思的是，“说三”的政策依据同样出自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闭幕前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大篇幅叙述“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由后，邓小平说道：

“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在以后的十年中，正是这段讲话，每每给反左抗“四”的理论家提供了胆气。

1980年4月开始，在胡耀邦手下的中宣部任理论局长的李洪林接连写出了四篇文章在《人民日报》整版刊出——《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什么》——试图把“四项基本原则”纳入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轨道，用以消弭“说三道四”的矛盾。胡耀邦对此十分欣喜，并表示了支持。李洪林回忆道：

“（第二篇）《人民日报》出报当天，胡耀邦叫我去他家里。我一进门，他说：‘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说我们党的这些干部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左倾思想根深蒂固。他很赞成我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让我把四篇都写完。”

1981年3月27日，针对胡耀邦在一篇讲话中只讲反“左”、不讲反右的问题，邓小平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讲话。讲话同意黄克诚“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观点说：“解放思想，也是既

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除了“常委制”和“轮流坐庄”的顶层设计之外，胡耀邦并没有发表过具体的主张和设想，对于改革各子系统的关系，他也是逐步清晰的。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能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人民能够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环境中，这是他追求的理想。”事过境迁后，赵紫阳曾公允地评价胡耀邦说：

“在他下台前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1981年“伤痕文学”大流行。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公开对作家白桦及其作品《太阳和人》进行上纲上线的点名批判。

《人民日报》顶住了胡乔木要求转载军报文章的指示。刚刚结束病休的胡耀邦于5月17日紧急会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广播局、全国文联负责人，批评了军报的做法，提倡进行健康的文艺批评。随即《人民日报》请顾骧将耀邦的讲话整理成文，6月8日以《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7月17日，邓小平就思想战线问题与中央宣传部门领导谈话，却直接批评了《苦恋》，指出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和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

那些“反社会主义言论”、“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邓小平还尖锐地批评了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虽然，他不主张再以“搞运动”的形式进行思想斗争，但他要《文艺报》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

为了贯彻邓小平讲话，在胡乔木的努力下，中央书记处于8月3日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会上，胡耀邦被迫承担了思想战线“涣散软弱”的责任，作了担任最高职务以来的第一次检讨性发言。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冥诞一百周年纪念日。为此，中央党校在3月7日召开了“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时任中共中央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在这个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长篇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

当时，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坚持，这篇纪念马克思的文章要修改，并只能在《哲学研究》发表。但在秦川、胡绩伟、王若水的坚持下，文章于3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长邓力群认为，《人民日报》不服从中央领导，违反了宣传纪律，要秦川和王若水写检讨。在胡乔木的建议下，中宣部将此事上报中央，周扬也写了自我辩护，并附有“马克思谈异化问题的18条语录”送邓小平，请他公断。

胡耀邦自始至终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各说各话。他本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几次高潮几次低潮，承认目前马克思主义处在一个低潮中，希望能够再出现一次高潮。

不料，半年以后，9月30日邓小平对异化问题说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话：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

此前的9月7日，邓小平在准备十二届二中全会报告时也曾谈到提到：“所有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整党不能走过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这篇对周扬的批评，使邓力群们如获至宝，

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要求。赵紫阳回忆说：

“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随后，在以邓力群为首的中宣部的大力推动下，在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

被视为“污染”现象的例子，首先来自经济改革的前沿：社会主义竟然重新产生了雇工剥削现象，这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变质的征兆。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一些不健康的、灰色阴暗的东西开始登场。宣传色情、甚至淫秽书刊也出现了。连“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也出现了。在思想理论界，讨论异化和

人道主义的文章也应运而生。为此，胡乔木发出严重警告：“资产阶级正在卷土重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占了主导地位”。

中宣部部署“清污”后，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都被列为禁书。一些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东西被横加干涉：一些歌被禁唱，一些电影、电视片被禁演，裸体雕塑被砸碎。有些工厂门口站岗，宣布留长头发的、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不得入内。《瞭望》周刊封面登了中国女体操运动员（世界冠军）在高低杠上的动作照片，也被一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收缴了。这股风同样波及到部队，听说有的连队宣布收缴“淫秽照片”，一些战士把自己的姐姐、妹妹、未婚妻的照片也交上去了。这难免引起社会上的一片恐慌。首先是农村和城市工商业界，以为改革搞错了，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反右”又来临了，因此纷纷准备退却。

据赵紫阳回忆：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刹车了……”

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发表了讲话，他认为这次“清污”由于一开始没有划清政策界限，所以“许多地方走了样”：

“拨乱反正，已经过了五年，怎么还搞‘左’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封建主义思想的人对现代化、对现代世界各国的东西都看不惯，还要把社会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秩序方面去。”

胡耀邦还四处说，“清污”提法不科学，就像宗教、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一样，精神污染是无法清除的，只能提“抵制”。

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会见日本外宾时又说到“清污”：“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赵紫阳认为：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善于总结的邓力群把胡耀邦的言论归纳为“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事情的来由是这样的：

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四大”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的大会主题报告进行讨论，胡耀邦专门讲了精神污染的问题。他说：小平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此即“三个失误”。“两个不提”是胡耀邦说，主报告可以不提“清污”，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所谓“一个无效”，是在讨论中宣部准备了长达一年的作协选举的“人事方案”时，胡耀邦说：

“人事管理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有党委直接领导的部门，一是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对于后者，我们的党组织根本不要干涉……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没有选好，让作家自己负责……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

在胡耀邦的指导下，作协四大选出巴金和刘宾雁当主席和副主席。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思想理论界人士为此欢欣鼓舞。而这，显然干犯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款，坐实了胡耀邦“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罪名。当时，李先念通过女婿刘亚洲了解到大会情况后，对邓力群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个反党的会。”而时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和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竟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作协的盛会！

在作协造反的鼓舞下，1985年4月召开的剧协四大也被开成“不成样子”的会。在那次会上，剧作家吴祖光甚至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据赵紫阳回忆：

“1985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 go 新疆……”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

问题是……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

按照赵紫阳的观点，这些事“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但胡耀邦好像压根儿没把这些当回事！

在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下，“清污”搞了28天就难以进行。与“文革”时期挨批判的人灰头土脸相反的是，从此开始，“越批越香”、“越被点名在社会上名气越大”已成为时代的特征。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就多次问：“怎么还没点我的名？”诗人叶文福被点名后，被邀请到处讲演；《时代的报告》批判《苦恋》增刊因附有《苦恋》原文，第一次印刷15万份一抢而空。

但是在文艺界、思想理论界，“清污”仍然以“反自由化”的名义继续着。作为“整党”和这次运动的损失，受到胡耀邦庇护的周扬成为“植物人”；中宣部理论局长李洪林被撤职并挤出中宣部；已经从总编辑转任社长的胡绩伟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王若水被免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职务，二人被调离《人民日报》社。胡耀邦在党校的班底——《理论动态》的阮铭，被作为“整党在中央机关几乎是唯一的‘三种人’”揪出。

第六节 胡耀邦的 1983 危机

在1980年代，中共上层除分化出思想理论上的“诠释派”与“实践派”外，在政治经济改革方略和意见上，也分化出“保守派”和“改革派”。润涛阁描述了这个派别的形成背景：

“如果说李先念认为帮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有功，陈云则认为自己对干掉华国锋功劳巨大。因为第一个当众而且是在华国锋在场的情况下公然提出要华国锋下台的便是陈云。……早在中共六大五中全会上陈云升为政治局委员了，1956年升为中央副主席。此时的‘五组’便有他一组。排在他前边的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那时候邓小平要向他汇报工作的。文革前，五组后面又加了两个人才成了‘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位，邓小平的排位还在林彪后面呢。”“陈云的经历使得他可以在邓小平手下憋屈着，但不可以被儿皇帝忽略。从胡耀邦到赵紫阳的倒台，都与李先念和陈云二人有关。”“如果我们正视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陈云从来都没有在任何场合承认过邓小平是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坚持这样的潜规则：我私下里尊重你陈云，但名义上不能有两个核心。”“陈云之所以忍受这窝囊气，就是因为他在毛泽东死前没有与毛泽东硬顶的经历，而邓小平公开拒绝毛泽东让他写文革定性文章。毛泽东死前邓小平曾经有手握党政军大权的经历，而陈云从未插手过军队。没有枪杆子，陈云靠吃老本是压不住邓小平的。”

“压不住邓小平，可他压得住邓小平的儿皇帝。……邓小平为了拢住这个摊子，就不得不丢车保帅。”

但是，如果没有执政理念上的分歧，陈邓完全可以成为盟友，而不必成为对手。毕竟，二人都不是没有胸襟之人，而且，陈云长期身体不好。因此，分野必定有实质性的矛盾，按照赵紫阳的表述，它基本上是这样的：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邓小平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

当然这种划分和描述并不精确，有时只是为了叙述的简化。譬如在中国80年代最早使用“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概念的不是别人，而是“保守派”大将邓力群。另外，在经济改革方面，对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权力，简政放权，农村包产到户，陈云并不反对，甚至是赞同和支持的。邓力群甚至是“包产到户”合法化的重要推手。直到“六四”镇压以后，曾为农业改革献策的“发展组”（暨日后的“三所一会”群体）的核心人物，一直把邓力群视为“大老板”之一。据何维凌回忆，他甚至可以邀请“民主墙”《北京之春》“幕后人”到家吃饭，听几个年轻人议论“多党制”。他“在一旁听说，不吭气，不评论”。被何视为“容量足够大。给我印象很好”。陈云派的“保守”，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对待特区、引进外资和举借外债，以及强调“打击经济犯罪”等方面。一句话，主要是在改革方略及目标上，在与国际资本主义斗争的“冷战”思维和对红色江山的维护上。因此，与其说他们是经济上的“保守派”，毋宁说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更确切。而邓小平虽然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成见，主张不论“姓资姓社”，只要姓“共”就行。因此，也经常与“保守派”一道，形成反“自由化”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赵紫阳和胡耀邦虽然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方面目标一致，但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政治自由化方面却有分歧，而赵紫阳在这方面更赞同陈云或邓小平的观点。他曾说过：

“陈云正派厚道。50年代，毛搞大跃进，他反对；毛搞一大二公，他说（要）大集体小自由；他说对资本家，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他有功，他是一种见解，并为这种见解而奋斗。当然，他老了，脱离实际，脑袋里还是那一套旧的治国主张。但他是认识问题，我崇敬他。”

正因为“改革派”与“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划分80年代中国的政治派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依何维凌之见，与苏共高层一样，中共高层当时并不存在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只存在对改革持不同方略的“稳健派”（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

“务实派”（赵紫阳、万里）、“激进派”（胡耀邦）。他的描述不仅有事实支撑，而且颇为传神：

“这三派力量形成了中央上层决策的三角平衡，从1981年的改革进入突破阶段，至1986年改革达到顶峰，是这三角平衡的黄金时期。”

“（务实派）一般不触及意识形态，尽量避免敏感问题。就采取改革的措施而言是‘渐进’论者。……因为有胡耀邦这样的激进派为之开路，为之挡箭，形成了三角平衡，才使务实派获得成功。胡倒台后，三角平衡倾斜，务实派孤军奋战，缺乏屏蔽和缓冲，赵紫阳被迫居于政治第一线……终于务实不成，逃不脱垮台的下场。”

根据这种描述，邓小平实际上处在这个三边平衡的“协调和仲裁的位置。即“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因为：

“邓小平在十年改革中的前大部分时间中，着重干的事就是抑制稳健派，主要的办法是‘年轻化’，让多数人从实权位置上下来。”

由此造成稳健派“力量分散”，“在高层实权位置不多”的局面。何维凌认为：

“形成和维持三角平衡是邓小平最大的成功之处，它使中国改革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

作为上述“第一次总摊牌”的前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权力的被侵蚀，就是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的意见分歧开始的。而事情的爆发，在叶剑英请辞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并获准之后。时间在1983年的3月。

由于胡耀邦的口不择言，言不择时，他在经济领域的“积怨”由来已久。

1980年1月，胡耀邦第一次到深圳、珠海视察，与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等探讨“在沿海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

无的民间交换发展经济”，由此揭开了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序幕。3月24日至30日，时任书记处主管经济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粤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特区建设问题。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将“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改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并写入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了这一纪要，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搞“特区”的动议，首先遭到陈云的反对。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甚至组织了人马，论证“特区”会沦为旧社会“租界”的可能性。同年12月23日，陈云在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谈了四点意见，其中三点都是敲打胡耀邦的：要没有“水分”的速度；不能把国家分光吃光；特区不能再增多。

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与胡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回忆道：

“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章蕴，也曾致信胡耀邦、邓小平：

“1982年以来，广东的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特殊、灵活政策措施的余地越来越小”。

对于陈云主张的1979至1981年的三年经济调整，胡耀邦颇有微词。据赵紫阳回忆：

“1982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1981年经济调整搞了个小‘马鞍形’。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当然很不高兴。”

此后，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对于毛泽东和毛时代的评价，胡乔木与胡耀邦发生了分歧。胡乔木的观点，显然是为以陈云为首的老人帮争取“一五”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路线的“合法性”而预备的。

同年7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陈云接过“年轻化”的口号，改称“必须成千成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组织部门要专门设立管理中青年干部和管理科技干部的机构”。经陈云提议，1982年3月，曾经当过陈云秘书的李锐出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据李锐回忆，到任的前一天，陈云曾找他谈话：

“陈云对我说，你去了就是两件事：第一，监视胡耀邦干些什么；第二，把我们的子弟提上来。”

据李锐回忆，当时，他已65岁，按照党内惯例，到这个年龄的人，如果不能继续角逐更高职位，就应该退休。李锐因“调换文物”事件，遭到党内通报处分，也正面临从水利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的前景，他自己也准备“安度晚年”。但陈云对他施展了激将法：

“这时陈云定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将这个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员人选特别严格。据说这件事中组部曾拖了一年没办，原因在部内地方、经济、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统干部，当然也包括选拔青年干部，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国家计委内有过的‘小计委’。我……不愿再卷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陈云的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能上不能下’，只当个局长，而非部一级名义。于是我就只好服从了。”

“中组部青干局具体任务是选拔省部级后备干部（最终考察了一千来人）”，这就是当时所谓“三梯队”计划的具体落实。据李锐回忆，除一些高干、烈士子弟外，他甚至参与过提拔江泽民这一级干部的意见。

次年7月，李锐升任中组部副部长。

陈云的这个措施，杜绝了胡耀邦上位后，中共未来“青帮化”的前景，从而奠定了“青红帮”共同接班的格局。

除了对陈云的“调整”方针，发展速度有不同意见外，在改革目标上，胡耀邦也反对“回到‘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模式。早在1981年，因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的批评文章，胡耀邦与陈云就有过一次“短兵相接”。事情的起因是《理论动态》第269期上曾发表一篇《跳出圈子想问题》的文章。文中言之灼灼有这样一段文字：

“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的圈子。”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是胡耀邦审定的，除了《理论动态》外，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1981年6月，《理论动态》第282期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的文章。批评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文章为党校副校长冯文彬授意、孙长江执笔。他说：

“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据邓力群回忆，引起陈云愤怒的似乎是另一篇“和冯文彬商讨的文章”：

“那篇文章说：有的人平常不说话，小病大养，韬光养晦，一见机会来了，就要说这个那个，指手划脚、提出很重要的意见……陈也感觉到确实有点像在影射自己，这样就引起了注意。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是阮铭。”

于是就发生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面对面地遭到陈云责问的事情。据说，会议当场胡耀邦拂袖而去。而邓小平发下话来：“既然如此，可以由组织部调查党校有关人员。”

事情的结果是胡耀邦在党校的班底遭到清洗。他本人干犯“众怒”，主要在“十二大”登上党的最高领导职位以后。

据赵紫阳回忆，他和耀邦的矛盾，也是从1982年开始的：

“我到北京后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去那种追逐产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这种不同意见在1982年就开始了。当时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涉及到经济问题如何写。起草小组的多数人开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报告的基调来写的，但耀邦不同意这种写法，他提出了一个思路 and 想法。因此政治报告有关经济这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后来问题反映到邓那里，邓就拍板说，经济部分基本上按政府报告的调子来写。”

此外，赵紫阳对于胡耀邦到处鼓动“翻番”，造成地方向中央要东西，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意见也很大。

万里、赵紫阳都在农村改革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不排除胡耀邦想在城市改革“立新功”的念头。但这势必抢了国务院的饭碗。赵紫阳也知道，胡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意见，其实代表了邓小平的想法，但“板子”只可能打在胡耀邦身上。

胡耀邦“八三危机”的引爆点，是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在这篇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胡耀邦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

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篇讲话中强调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在这个报告中，胡耀邦首次提出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原则：

“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事有蹊跷的是，胡耀邦原本不打算发表讲话消息。但抗不住新华社记者李尚志的软磨硬泡，第二天，首都各报和全国各地、各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要闻：《胡耀邦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各级电台也在当天反复转发这条消息。据李尚志回忆，当时通知他发新闻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

“他还叮嘱说：‘耀邦同志下午这个讲话十分重要。’他给我一份胡耀邦的讲话提纲，说：‘你先看一看这个材料，作好报道的准备。’”

“耀邦同志的讲话提纲，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断之后说，从破除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说，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这个意义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很深刻的革命。……现在，我们确定了在本世纪要力争达到的奋斗目标，不抓紧改革，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这就增加了我们改革的紧迫感。”

“关于改革方针，提纲说，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提纲中说，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提纲在讲了机构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之后强调，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只有改革的侧重点不同，没有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会场气氛非常活跃，听讲的同志都很兴奋，在耀邦同志讲话的过程中，台上台下不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李尚志看了这份讲话提纲后，思想为之大振，甚至“热血沸腾。因此，一口气准备了一篇新闻稿。”

这个讲话，后来被“改革派”人士称为“全面改革的宣言书。”

胡耀邦的这篇讲话稿曾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印发给在京的书记处7位书记，也发给在云南养病的胡乔木。胡乔木曾回信“表示赞赏”。在讲话的前一天，耀邦还去邓小平家，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有不同意见。”

但是，仅仅两个月不到，形势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首先感到变化的，是信息灵通的《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据他回忆，2月16日（旧历正月初四），胡乔木把《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辑王若水召到他的家里，对他们说：“中央的某一次会议，领导人个人的某一次讲话，不要急于宣传，不能作为宣传中心。”

“惟恐我们不明白其中奥妙，乔木干脆点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同志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胡乔木谈话不久，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报社一连接到上海等几个省市的同志打来的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一无所知，但对事态的严重性有了某种预感。’”

第七节 陈云、赵紫阳是否“联手”？

1983年2月，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有一段时期不在北京。2月底，一向爱护胡耀邦的叶剑英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委员长请求。胡耀邦登上最高权位的第一次权力挑战，就在这时开始了。据邓力群回忆：

“胡耀邦一直在找各个部委谈话。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提高速度。他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他还指名道姓地讲：我们这些人要多干一点，就可以为启立他们上来创造条件，使他们包袱轻一点，好轻装上阵。他这样一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赵紫阳也回忆说：

“十二大以后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更加强调要增加指标，要加快速度。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里产值定得高，他就表扬。哪里速度慢了些，就严厉批评。从来不讲经济效益，也不对快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笼统地就是鼓励快。于是地方上就根据耀邦的指示，向计委、国务院要资金，上项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个时期各地比速度、争材料、争资金的气氛相当厉害。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是那样讲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讲话、指示，又是另一个调子，当时我感到许多事不好办。”

“1983年我与耀邦在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他一个劲地鼓励加快速度，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1983年1月我访问非洲期间，耀邦作了一个城市改革的报告，主张城市改革全面推广农村承包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包字进城’。……耀邦讲话后北京就在国营商店搞承包，一开始就出现了乱涨价和卖大号的情况。什么叫卖大号？就是商店把畅销的商品大

批卖给零售商，从中获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价买给消费者。这样国营商店一下子卖出那么多东西，承包任务很快就完成了。……我访问非洲回来以后，停止了这种搞法。我提出城市经济改革要经过试点，逐步推行，摸索试验，不能一哄而起。……那年耀邦是在海南过春节的，他对海南的干部说：‘什么一哄而起？是轰也轰不动！’”“这一段他在各地视察时，对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经常讲一些批评或影射的话。这些讲话的记录经传抄、扩散，使许多人知道在经济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声音。”还有，胡耀邦鼓吹“有水快流，到处发动农民开矿山”等等材料，都被搜集起来。

各方面围绕胡耀邦的行动，被刚刚回京的邓小平得知。因为他收到了姚依林、宋平向中常委和邓小平反应情况的联名信。邓小平看后，于3月14日约请陈云到家中谈话。第二天，又与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进行了谈话。据《邓小平年谱》记载，这次谈话的主旨很明确：一是“领导作风”，二是“经济工作归口”。

但不知什么原因，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记载的在邓小平家的谈话没有了胡耀邦，却有姚依林在场：

“……本来是想少数几个人谈，邓陈先念，加上胡耀邦和赵、乔木、姚，对胡在小范围里做批评。邓小平说：做些批评可以，他也愿意听。但又表示担心：批评了耀邦，他如果表示不干了怎么办。结果没让胡参加，只有赵、姚、乔木到邓小平那里谈。……事先几人相约，由赵向邓主谈。但赵很鬼，到了邓那里，把乔木推在前面，自己扮演帮腔的角色。胡乔木发言时说，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小平同志认为这样说过头了，对胡乔木不高兴。几个人向邓汇报后，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判定，在邓小平与胡耀邦谈话之前，还有过一次上述几人联袂到邓小平处“告状”的会谈。这次会谈，《邓小平年谱》没有记载，作为当事人的赵紫阳也没有记载。赵紫阳记载的是3月15日《邓小平

年谱》有记载的那次谈话，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提到胡乔木在场。赵紫阳说道：

“1983年3月15日，邓约耀邦和我在他家里谈了一次话。我把经济工作的情况和我的意见讲了，耀邦听了很平静，有些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释。这次谈话比较好。邓小平最后说，经济工作他赞成我的意见，批评耀邦讲话太多，不够持重，老喜欢搞些惊人的东西，作为总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邓还说，搞改革不能搞群众运动，改革要贯穿整个四化过程，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事。还说现在形势很好，要注意头脑不要发热。同时在这次谈话中还定下了这样一条，为避免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今后经济工作主管是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肯定哪些对、哪些错，都要经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作为权威的发言和决策者，不要多头发言，政出多门。当然书记处是要管经济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针，不要干预具体的经济工作。”

3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书记处开会。专门谈经济工作的问题。参加了会议邓力群回忆说：

“会上发言的主要是赵紫阳和陈云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讲了话。”

“第一个是赵讲，讲历史的经验是：每次都是这样，几年顺利发展，就坐不住了，头脑发热，高指标、浮夸、折腾，搞不下去了，再调整。……没点耀邦的名，但很明显，听得出来，是说耀邦的（我有一个专门的记录）。赵讲了四个问题。接着，陈云同志讲了十条意见。”

据吴稼祥回忆，当时，陈云指责胡耀邦说，一切都要改，连“一五”都要改？他还批评发展速度7%定高了，他主张4%。会后，胡乔木与陈云商量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将会议记录、发言整理下发讨论。但邓力群已于3月17日当日下午，将会议内容向新华社的分社社长会议、《红旗》杂志

联络员会议作了传达。此事被邓小平知道后，立即遭到了制止：会议不要开，整理的东西全部封存。

图1-14：邓小平、陈云、胡耀邦（选自网络）

据邓力群回忆，这次会议的结果，令陈云很满意：

“后来陈云讲，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经济工作决策的程序，主导权由书记处转到了中央财经小组，换言之，就是由胡的手里转到了赵的手里，帮了赵的忙。”

邓力群的这个回忆，与赵紫阳所说——经济决策权的转移是在邓小平家里，仅他和耀邦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稍有出入。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邓小平在与二胡和赵谈话前，3月14日上午与陈云的谈话已经决定了这个权力的转移。

那么，赵紫阳有没有关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述呢？如果按事件的完整性和时间排序，这次会议的内容应出现在3月15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胡乔木和他的谈话之后，记述在《改革历程》第三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这一节中。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搜遍《改革历程》，都没有找到这次会议的记述。倒是在第四部分《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胡耀邦被迫辞职》这一节有这么一段文字，在时间、内容与情节上十分相似：

“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

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許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从这几段文字看，会议主题、发言顺序，特别是陈云讲了“十条”，以及陈云、李先念、胡乔木等主张并酝酿召开省市领导人会议，会后邓力群私自将会议消息在新闻界传达……等要点上，赵紫阳与邓力群讲的是同一次会议。至于赵紫阳为什么不放在《改革历程》第三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里讲？可能当事人有自己的考虑。但是

从阅读的客观效果看，这种组装，既透露了此事与耀邦下台的关系，又成功地撇清了它与自己的关系。

接下来的事情，吴稼祥的《泡面传奇》有这样的描述：

“电梯下行，同梯的还有乔石。胡眼中含泪，政治局书记处联席会议刚刚结束，陈云在会上严厉批评胡耀邦，并与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会商后，发出通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胡耀邦下台，拟议邓力群取代。胡的‘罪行’是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

‘怎么办？’胡泪眼模糊地问乔石。

‘找下小平同志吧？’后者建议道。

小平建议胡找下叶帅。叶帅对胡一直很宠爱，邓与叶在其他事情上有分歧，推举胡登位意见一致。叶帅当时在广东养病，立即北上找陈云，这场危机被化解。”

这就是说，会议策划者要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前述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会议）的目的，是要胡耀邦下台，让邓力群上位。在阮铭的回忆中也有类似说法：

“1983年，十二大刚刚开过，陈云他们要把胡耀邦搞掉，开第一书记会议时，邓力群已经布置下去了，准备了很多拱倒胡耀邦的材料，当时是叶帅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他们这么干，邓小平才下令都封存起来了。”

吴稼祥和阮铭都提到要胡耀邦下台的问题。究竟有无此事？据李锐说，当事人胡耀邦去世前曾对他谈到这么一个情节：

“1983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应过来后，破涕为笑，谈别的了。”

“胡耀邦还说：‘1983年那次会是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

赵紫阳和秦川的回忆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赵紫阳回忆说，事后，胡耀邦去找他：

“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有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野心。”

“过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

秦川也曾记载，邓力群私自向新闻界传达的内容，《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有一份原始记录，经由秦川送交了书记处的习仲勋。后来，他们才知道，当天晚上，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已经把邓力群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讲的材料送上去了。秦川回忆说：

“小平同志和叶帅闻讯制止了拟议中的中央工作会议，小平一锤定音：‘胡赵格局不能变！’”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几点：

第一，胡耀邦当上总书记不久，各方对他的不满，已经到了需要仲裁和做出权力调整的时候。

第二，胡乔木提出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的问题，可见他们意欲调整的是最高职位。

第三，赵紫阳在事前参与了谋划的议论，但在回忆时却完全抹掉了痕迹。事后还对胡耀邦进行了安抚。第四，事情的结果是，胡耀邦作为总书记的经济决策权转移到赵紫阳的手里，但在叶剑英和邓小平的影响下，“保守派”挑战最高职位的策划流产。

以后便发生了前述“清污”运动和反自由化运动。

第八节 “自由化”欲速不达

“清污”运动的无疾而终，明明让邓小平吃了个“哑巴亏”，而且，据赵估计，是邓决定“抛弃”胡的关键，但此后一段时间，直到“反自由化”，胡耀邦的日子虽然清闲，但比顽固坚持极左思想路线的邓力群来说，相对要好过得多。

首先，邓力群想让王忍之、卢之超等四人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等要职的提议，遭到了来自书记处和中组部的抵制。不仅如此，他还接到通知，以后凡中宣部局级干部的提拔，都要经中组部批准。在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问题上，邓力群三番五次提出应保留“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都被胡耀邦置若罔闻。邓小平则再一次站到了胡耀邦一边，并当面警告邓力群，不要企图把党“往左的方面拉”。直至1985年7月，朱厚泽取代邓力群出任中宣部长。

这一段的顺风顺水大概也曾迷惑了胡耀邦，以至于他曾得意忘形地对田纪云说：

“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

1985年，胡乔木的儿子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胡耀邦批准的。据李锐回忆：

“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才落实定案……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耀邦的坏话。胡耀邦的下台，胡乔木在其中起了作用。”

1985年11月下旬，开始走背字的胡乔木给于光远写了一首诗——《赠光远》：

我慕于光远，在处席不暖。

试笔千言来，登坛万人满。

尽瘁惟国家，玄思竭晦显。

人言或啧啧，我道自坦坦。

同心戒伐异，知音谢相勉。

反躬多失驷，补过愿沥胆。

屈指五十载，填胸存没感。

耳目苦昏聩，手足筋疲软。

安得剪春韭，留此岁月晚。

于光远对笔者忆道：

“这个时候他有一点倒霉。和胡耀邦斗了半天，胡耀邦地位越来越巩固。大概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把我拥抱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当着那么多人，在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把我拥抱起来。两个老头拥抱在一起，又不是外国人，别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秦川在旁边看热闹，他回过头去把秦川也拥抱一下子。秦川说，我不会整人的。”

据赵紫阳回忆，早在1986年之前，邓小平已经疏远了胡乔木，很长时间不和他见面，胡几次约见都没有获准。胡为此很感苦恼，曾找杨尚昆为他在邓面前疏通。

不久之后，赵紫阳受命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请胡乔木推荐一位学者，胡乔木竟然推荐了严家其。还评价说：“他懂政治学，表现也不错”。可见其转舵之快！

邓小平的转向，赵紫阳对胡耀邦“同舟共济”的许诺，给“民主派”带来了新的动力。赵紫阳说：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

但是9月28日，在六中全会通过《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大会上，陆定一的一个发言，带来了事态的逆转。这是他第四次提出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

“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历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

万里发言支持了陆定一的意见。胡耀邦在征求大家意见时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并且说：

“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现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确实有。当然也不要自由化的帽子乱戴。一下不要这个词了，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啊？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改革开放。”

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还代表宋任穷）发言主张保留。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赢得了会场的掌声。赵紫阳说：“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1980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事后，赵紫阳说：“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邓小平发言后，几位超重量级人物也表示主张维持原案，保留这个提法。决议按原草案通过了。

据当时参加六中全会文件起草的于光远回忆：

“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大家颇费了一点心思。由于这个口号没有确切的含义，它的使用也带来不少问题……最后主张干脆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给它划一个范围……大家都同意这样的意见。胡耀邦也表示同意，在决议上写了一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死的概念定义为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目的是防止滥用这种帽子来压人，用这个棍子来打人。但是这么下定义也把这顶帽子、这根棍子的政治分量加重了。当时大家担心：如果

限制不了，把这种帽子广泛地使用，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下决心这么写下来了。决议的这个提法也是得到邓小平批准的。”

起草者的担心不幸成为现实。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赋予如此严重的性质，而它的形式——按邓小平的说法——又是如此的活泛，后来，文化思想理论界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以“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名义遭到整肃的。

因为政治上的共生性，以胡耀邦为首的“民主派”一直不承认与邓小平的执政理念已经渐行渐远，以致到了泾渭分明的地步。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的阻力来自陈云，及其代言人胡乔木、邓力群在捣鬼。在“六四事件”中，则来自李鹏、陈希同的顽固和杨尚昆的野心。而拒不承认，邓小平其实在取代华国锋的权力后，已经成为“政治保守派”的头。直到胡耀邦被迫“辞职”的前夕，1986年11月26日，胡耀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还在说邓小平替人“背了黑锅”。

悲惨的是，希望越大、越殷切，失望就越大，失望所带来的打击就越沉重！而双方的势均力敌，无疑更加强了邓小平作为仲裁者的地位。

第三章 胡耀邦下台一与学运的结缘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岳晓玉、吴洪奚、陆铿、张伟国、杨继绳、李盛平、高皋、封从德）

1982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除保留少量超过离退休年龄界线的老革命家，省部级以上职务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为了缓冲，中共十二大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发挥“余热”和逐步适应退休生活的过渡。1985年，邓小平决定更坚决地推行退休制度。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区的负责干部，除特殊情况或组织决定留任外，到了离退休年龄都应逐步退下来；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顾问，省级顾问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常委，省级人大、政协的中共党员正副主任（主席）和常委，凡年龄已满70周岁的，也应逐步退下来。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批准了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等64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请求：不再担任十二届中委和候补中委。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按照内部商定，年逾七旬的胡耀邦将在一年以后退居“二线”。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胡耀邦在届满前的十个月被非正常程序逼迫辞职。而在此之前，关于胡耀邦退居“二线”后，将置于哪一个岗位？已经众说纷纭。特别是他将接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谣诼，甚至让胡耀邦感到很不自在。这一切是偶然发生的吗？

第一节 胡耀邦“退居二线”的几种传闻

笔者最早看到胡耀邦“退居二线”将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之说出自高皋女士的《后文革史》。该书写道：“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为退休之事专门征询胡耀邦意见，其意是邓本人全下，不再当军委主席，胡耀邦半下，接替军委主席，让出总书记位子，由年轻人承担。天真的胡耀邦当即表示举双手赞成，并对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表率行为赞叹不已。”

这种说法还有另一种版本，见于海外传言：

“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该文注释，这段话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

近年在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也看到类似说法：

“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来家谈论十三大人事安排。耀邦说，我已过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确系邓小平习惯用语。但下面将要谈到，此说尚有一些破绽。

第二种说法是，胡耀邦“退居二线”后，将出任“中顾委主任”。此说出自赵紫阳：

“1986年春天，胡耀邦到赵紫阳家说，邓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二大邓小平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邓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

动退下来。’胡耀邦当时是接受的态度。胡耀邦还对赵紫阳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

赵紫阳认为，事实上，邓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中顾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耀邦换下来，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很天真，只理解为年轻化，没有理解邓这次谈话更深的含义。1987年1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由于陆铿谈话和学潮，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渡变为强迫他辞职。

吴稼祥的《泡面传奇》则兼有两个版本的要素——“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但时间更靠前，地点不同，也不是胡耀邦转述，而是邓小平亲口所说：

“1984年夏季北戴河海边，邓小平80岁华诞，在临时度假别墅宴请满朝文武，宣布自己将在‘十三大’彻底退休，胡耀邦将接替自己出任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书记。”

比较这三种说法，除了胡耀邦退居“二线”后任职不同外，其他内容基本相近。其中，吴稼祥的说法，在时间上有一个旁证，那就是，邓小平在“1984年与金庸的一次会面中”，已经透露了自己“退休的想法”。

赵紫阳的说法有两个特点：一是来源清楚，二是时间稍早，但比较模糊——他对杨继绳说是在1986年春，但在《改革历程》中，没有说这次谈话的时间，只说胡耀邦十二届六中全会开过不久对他说。

赵曾表示，在胡耀邦告知他前述信息以前，“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这就是说，至少在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前，赵从未与闻邓胡退休传闻，包括吴稼祥的说法。而赵紫阳所说，到了1986年“春天”或者“下半年”，让胡耀邦当“中顾委主任”或“国家主席”，倒仍是有可能的。因“中顾委”本来是为“干部年轻化”政策设立的一个提供退休高干发挥余热的建制，而“国家主

席”也是个荣誉性的虚职。赵紫阳的这个陈述，间接批驳了海外版本——让他赵紫阳做“国家主席”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似乎是将耀邦有可能做“国家主席”错接到他的头上。

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令邓小平大伤脑筋的“陆铿访谈”事件，它发生在1985年5月10日，《人民日报》5月11日刊登了简讯，邓小平于1985年7月14日已经读到陆铿访谈全文的记录。所以，邓是否有可能在“1986年5月”仍将军权许诺给胡？就成了明显的问题。

于是，这里便凸显出一个问题：既然邓小平无意把军委主席职务交给胡耀邦，为何在1986年，这个“谣”会被造得满城风雨？这种“坊间传闻”是否“倒胡派”故意散布的讯息？

高皋也曾提出这个疑问：

“即便是一党之尊，他那不会掩饰自己的本性也无法改变。在公众场合，他喜欢跳上跳下，甚至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从座位上突然蹦起……”

“特别是那些军头，听说胡耀邦来做统帅，流言蜚语便一下子填满京城。于是，有人放出话来，说是胡耀邦统帅三军，军队不服。看来，倒不是胡耀邦上啊下啊的问题，而是邓小平不能下的问题了。”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对“军委主席”说出处的考察。

此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没有出处”。其中海外版本注明“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但笔者查阅有林等主编的，由红旗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并无此话。

其中，李锐先生最接近“权力层。但他的说法有一些毛病：

1、“来家”二字给人感觉谈话地点是在李锐家进行的。但不论是邓小平还是胡耀邦，肯定都没有去过李锐家。

2、所记内容似乎出自邓小平或胡耀邦本人的口述，或者消息来源是邓家人或胡家人。但李锐从未没有交代过与邓家人有何来往。据李锐自述，他自己退休前与胡耀邦从无个人交往；直到1988年1月14日才第一次被引见到胡家，开始与胡耀邦长谈。因此，这条消息，他也不可能亲自从胡耀邦那里得到。

3、李锐版本内容与海外版本基本一致。

到此为止，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军委主席”说究竟是“谣言”，还是实有其事？关于“军委主席”的动议，是否和耀邦见过面？

网上有一篇文章提到，1987年1月倒胡“生活会”后，耀邦曾“向老部下冯征倾诉苦衷”说：

“我的报告送中央后，有人藉辞职报告落井下石，对我进行诽谤，以‘生活会’为幌子，诬我想当军委主席，逼小平同志让位。我早就对你说过，我并不想当军委主席。我过去在军队中是一个兵团级干部，按授衔不过是个中将，军队中授予上将的多得很，我有自知之明。这个问题我也亲自对小平同志讲过。唉，不由分说……”

笔者认为，如果这个材料是真的，那么，关于“军委主席”的“非正式”提议可能确实存在过，胡耀邦也听说过。那么，此说究竟是谁散布出去的呢？有两个人可能性最大，一个是邓小平本人，另一个，是那个“有意此位”，但害怕胡耀邦接替此职的“第三方”。

包括高皋在内的坊间猜测，似乎都是，邓想借此激发反对胡耀邦接掌军权的呼声，为自己的不退寻找理由。

笔者认为，邓小平“结束终身制”，推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这个战略目标是真诚的，不变的。这不仅可以从他在这方面的诸多言论看出，也可以从他对严家其的态度看出来。据严家其回忆，自理论务虚会以后，他一直是“诠释派”理论家意欲除之的目标之一。正当中国社科院要追查他和

“民主墙”的关系时，他突然受到胡乔木、胡绳、李汇川等院领导的接见，谈话的中心内容是肯定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文章，并征询他在工作上“有什么事需要帮助？”此后，严家其被推荐参加了张友渔主持的“修宪”讨论会，不仅成为全国青联委员，还以助理研究员身份当上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组负责人。1985年，被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任命为政治学所所长。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当耀邦旧部和“自由化”同仁纷纷中箭落马，被开除党籍、撤职、调离或闲置时，他却被胡乔木推荐给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这一切反常的“幸运”，如果不是出自邓小平亲自关照的话，只能说明，胡乔木和社科院领导也认为邓小平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在“作秀”。对于邓的用心处，他们（以后还要说到，包括素来不“保人”的赵紫阳）自然是不能敷衍草率的。

那么，问题又回到，邓小平如果无意把军权交给胡耀邦，又为什么要对胡耀邦这么说呢？

可以理解的是，邓小平是个军人。军人把政治当战争打，总是会放出“疑兵”的。既然邓小平认为胡耀邦不适合当军头，他自己也不恋栈，那么，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如果要“放风”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要试探那些可能的“接班人”。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说明邓小平主动释放了疑兵，或侦察有什么结果？十三大他没有交出权力，似乎另有原因，而1989年11月9日他正式退休，这个权力还是交出去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被考察者也是军人，而且是一个善于“迂回”的军人。为要掩盖自己的目标，他打的是“拥邓”的旗号。

那么，既然胡耀邦貌似知道这个消息，是否还存在胡耀邦自己泄露出去的可能呢？李锐和坊间传闻，都是直指胡耀邦的！

首先可以排除，李锐把“坊间传闻”当作“亲历”记入日记。那么，是否存在李锐从胡耀邦的近处得到这个消息的可能？阅读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我们发现了一条线索：在经常出入胡耀邦家的亲友中，有一对年

轻夫妇，也是李锐夫人的老战友的后代，二人每次到李锐家传递的关于胡耀邦的信息，李锐都以“日记”形式记录。胡耀邦从无“地下工作”经验，自己襟怀坦荡，对人从不设防。他更不知道，陈云曾向李锐布置过监视他的“工作任务”。但有蛛丝马迹证明，在去世前，他已经起了疑心。李锐的文字资料证实，胡耀邦下台后，确曾对这年轻夫妇说：“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下谈话……”；去世前十天，胡耀邦又再次与李锐谈到这个问题。可见，他也似曾怀疑，此风究竟是谁放出去的？只是我们仅从已经发表的李锐的记录，还是无法看到全貌。

联系到李锐日记的含糊性，这个消息是从耀邦本人那里走漏的可能性就呼之欲出了！

由此，李锐“日记”的内容似乎这样读，才可避免文法上的“漏洞”：

“1986年5月，元元夫妇来家，谈到邓小平约胡耀邦谈论十三大人事安排。耀邦说，我已过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如果李锐日记原本是这样的，那么，上述“坊间传闻”的第一个流出口，就在李锐家中。

因此，胡耀邦在退休后去向问题上遭遇的困惑，不仅是一场“疑兵”战，一场“迂回”战，而是一场由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伏击战”！

政治丛林，险恶如此！

但此时的赵紫阳，仍是看客。

第二节 邓小平“弃胡”由来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会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产生“换马”的想法？按照赵紫阳的说法很简单，就是胡耀邦长期信用自由化知识分子的结果：

“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早在理论务虚会议时，胡就对反自由化不热心。由胡主持的这次理论务虚会，本意是研究如何进一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可会上有些人偏离了这个主题，逼得邓不得不出来讲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笔者也注意到，1983年7月17日，邓小平就思想战线问题曾与中央宣传部门领导谈话，直接批评了《苦恋》。但有意思的是，在这篇讲话的结尾部分，有一段当时看似不着边际的话。邓小平说：

“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

笔者认为，邓小平这是在婉转地说，这场批《苦恋》运动并非单纯的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分歧，它的背后是一场尚未展开的权力斗争。此前，胡耀邦的经济决策权的转移，只是这场斗争的副产品而已。邓小平想借此告诉那些人，我们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但最高权力的安排，不便轻易更动。正因为有了这段忠告，在这次“分权”中得到实惠的赵紫阳，很注意在随后发生的“清污”问题上，与共谋者拉开距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说明，在“清污”之前，邓小平确无换马之意。

邓小平决定“弃胡”，赵紫阳认为，决定性的事件是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发生之后：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赵的这个估计是有根据的。《改革历程》又说：

“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

邓小平与胡启立的这次谈话，距离他关于“不换”的谈话，恰好相隔大约一年时间。也是距离他“八十寿宴”最近的时间，这个信息的披露，无疑是增加“泡面”分量的一个砝码。但邓小平这次单独召见胡启立，一直不为外界所闻。直到1987年1月处理胡耀邦问题的“生活会”，赵紫阳也才第一次听说。那么，在这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还发生过什么事情，助推了这次“逆转”，而不是打消了邓小平“换马”的念头呢？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在距离邓小平“八十寿宴”这个时间最近的过去发生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1984年5月4日至11日，胡耀邦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陪同，访问了朝鲜。在回程中，媒体罕见高调地报道了他们在长春对部队的检阅，以及在沈阳接见陆、海、空三军领导干部的消息。据《邓小平年谱》记载，5月21日，邓小平听取了胡耀邦出访朝鲜的情况介绍。赵紫阳、陈云、万里、杨尚昆参加。

关于这次胡耀邦访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外界鲜有资料谈及。但在杨继绳《一访赵紫阳》中，赵紫阳有这么一段话：

“他到朝鲜访问答应金日成派飞行员到中国受训，可以开中国的飞机。小平对他这一点很不放心。”

赵紫阳是在1987年“倒胡生活会”上谈出这件事情的。但赵紫阳没有随行赴朝，怎么会知道胡耀邦几成习惯的随口应承呢？自然是杨尚昆在通风报信。而杨的通报是否真实？以后我们还要谈到另一段由赵紫阳说出，但实际上是转述杨尚昆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

1984年6月28日前发生的第二件事情，是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建议在老同志健在时，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调整。

赵紫阳的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

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0日访欧前夕”

坊间盛传，赵此信的目的是解构“胡赵体制”。但赵不同意这种议论。理由是，信中无一字提到胡耀邦。的确，如果脱离当时的高层权斗内幕，仅从这封信的字面，我们得不出如上结论。要解析其真意，还必须参考陈俊生的文章，但是，陈文迄今为止未予公布，所以，笔者无从评论赵的真意。但既然事涉“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胡耀邦又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说它与胡耀邦“无关”是不能成立的。直到胡耀邦被迫辞职的那一天，胡耀邦还不知道赵曾写过这么一封信。

据帮助赵紫阳写回忆录的杜导正回忆，赵紫阳事后曾申辩说，“我不知道要胡耀邦下台”，“胡下台不是我那几封信引起的”。但他又透露，信中建议在邓、陈健在时，中央建立集体领导体制，即投票制。而且在同胡耀邦议论他下台后谁接班时，也提到了“考虑今后不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主席，譬如说每人半年，主持全党工作”这些内容。这不能不说明，赵紫阳在写信时，是有一定针对性的。据看过赵紫阳这封信原件的李普说：

“从信中看，说的是党政分开、民主集中制，在邓、陈云在世时，处理好中央的领导制度，养成习惯。李普说，我与杜星垣都认为赵在胡耀邦的处理上还是有错误。他没有坚决与胡站在一起。”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1984年6月28日以后，那就是1984年10月《光明日报》举行的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评为“特等奖”，但署名作者只有胡福明一人。已经退休的重要当事人、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被排除在活动之外。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大人物导演的，旨在抹杀中央党校特别是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重要作用”的行为。此事不论背景真相如何，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似也可以作为胡耀邦地位微妙的一个佐证。

总之，总书记和总理有嫌隙，不会是邓小平拼盘时不考虑的问题。据傅高义透露，邓小平在1986年5月就曾问过邓力群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看法，这表明，“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替换胡耀邦的问题”。

但是，胡耀邦在1986年年底之前，对于一切围绕他的权力运作并无戒备。

第三节 提前交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权

1986年4月，书记处办公室秘书吴稼祥写道：

“上午进玉 让我考虑一下政治改革问题。十三大有可能将此作为一个主题。……他说，经济改革国务院那边研究得比较多，我们很难超过他们。研究政治改革可能是我们的优势。过了五月节，就搞一个政治研究小组。”

1986年6月，胡耀邦率团访问英国。在欢迎宴会上，撒切尔夫人致词道，“亚当·斯密分析经济行为的著作也被马克思认为是经典之作——《国富论》中也没有提到资本主义”。耀邦在答谢时，非常得体地回答了英国首相的话题。当然，即便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只要是碰到记者，他也还来得及犯一些“小错误”：

6月11日下午，在海德公园酒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香港《大公报》记者就邓小平发挥的中心作用和决策延续性提问时，胡耀邦坦然答道，1978年以来，国家的重大问题，都是由邓小平提出，其他人赞成或决定，从前年开始，邓小平想逐步少出点主意，以便国家重大问题由胡耀邦和赵紫阳提出，然后大家讨论，所以这两三年来，胡耀邦和赵紫阳提出问题相对多了一些，所作的决策相对多了一点。为表现慎重，胡耀邦特地补充了一句，这些决策当然也是经过邓小平赞成和其他人同意的。在谈到今后决策继承问题时，胡耀邦说，自己的年龄也不小了，七十了，赵紫阳也六十六了，他与赵紫阳看法相同，从明年开始，要少出主意，过几年之后，也要慢慢退下来。

当时，国际上对中共高层可能出现的人事变动正猜测纷纷，胡耀邦此言一出，仿佛是在告诉世人，十三大之后，他和赵紫阳都准备逐渐退下来。为肃清胡耀邦这次访欧“流毒”，赵紫阳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胡耀邦时，向记者否认了胡耀邦所说的有关人事变动的内容。因为他此时不仅没有退下来的想法，相反，他认为：

“邓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有了一个总的设计，如何把它具体化，在实践中贯彻下去，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出个眉目，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我想花点力气去干的。别的人搞，我还有点不放心。”

1986年11月13日，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京闭幕。胡耀邦又做了一件惹恼邓小平的事情。当时，他带着一批中共领导人与参会作家合影留念。当他走到《苦恋》的作者白桦面前，认出他并与之握手时，有意寒暄了两句，意在鼓励白桦继续进行创作。当天的电视新闻播放了这个情节。第二天，海内外多家报纸作了报导，并刊登了胡耀邦与白桦握手的照片。

这两件事都说明，胡耀邦当时心态的从容和淡定。但作为一个旁观者，参与起草十二届六中全会文件和“十三大”政治报告的于光远，却记录了一些细微变化的过程：

“在起草六中全会文件的过程中我已经看出胡耀邦在十三大后，将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赵紫阳将要接替他当总书记，并且知道这件事在一九八六年夏天可以说已经成为定局。……我最初看出这一点，是在六中全会这个文件经过大会通过后，商量如何在文字上处理时，在大会通过决议的当天，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胡耀邦和赵紫阳商量这件事，我也在场。我从胡耀邦对赵紫阳说话的口气，感到两人间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

接着就是十三大报告的起草问题。这件事也使我感到有些特别。胡耀邦把我们这些参加起草文件的人留下，谈起草十三大报告的问题。……说十三大不是一个人作报告，而是两个人作报告，他作‘政治报告’，赵紫阳作‘发展报告’。……从这样一些事情中，我看出胡耀邦有这样一种心情，他即将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准备搞一个好的、他本人满意的报告来交班。没有多久我们从上海回来，听说情况有变化，十三大报告又从原来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作变成赵紫阳一个人作一个既包括政治又包括发展的报告。”

据田纪云回忆，原来由耀邦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1986年10月6日正式转由赵紫阳负责的：

“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十三大报告、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工作外，又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明确由赵紫阳牵头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小组成员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彭冲等四人。根据赵紫阳的提议，决定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胡耀邦说，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是在小平同志那里定的。”

胡耀邦连成员都不是！据陈一谔回忆，这整个事件是根据赵紫阳的建议而设计的。陈一谔说，其经过是这样的：

“赵紫阳在1986年9月13日给邓小平写了一个报告，说：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报告中建议由赵紫阳本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冲等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为十三大设计政治改革的蓝图。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就这样成立了。”

陈一谔在此提到的赵紫阳1986年9月13日给邓小平的报告，很少见有资料提到。但在前述赵紫阳提到给邓小平的信时，使用的不是单数。所以，可以肯定，他还另有信件与邓小平议论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有关的问题。

作为这个“政改研讨小组”的成员，陈小鲁 事后回忆说：

“我是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1986年学潮是在12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

同样参加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吴稼祥，则似乎到很晚还不知道这个权力的转移。但他记录了胡耀邦流露的焦躁，以及两个写作班子捏合后更细微的观察。

他在日记中写道：

“11月11日……耀邦与起草小组谈13大报告起草设想……还讲了一段吐露心曲的话……1982年我在军委会上讲，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急也急不得，慢也慢不得，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步履维艰呵！对‘左’的也不能斗，一斗就乱套了。有些青年人讲，你太软弱了。不是那么回事。有人批评周扬批错了（指胡乔木），你反过来又批评批评周扬的人行吗？不行。”

“然后讲改善党的领导，一是不要包办一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二是要坚决废除终身制，要讲一大批老革命家带头退下来的意义。

‘十三大’人家主要报道这个，报告里没有反映怎么行？年轻人上来的意义要讲充分，不然人家造谣。特别要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带头退下来的意义讲够，……不然，深圳青年报说，功劳是他的，他妈的！第三讲党内民主生活，党组织要有造血功能，要有免疫力，要讲新东西，每个党组织每个细胞都要自我完善。现在大案要案都要上边查，你不查，他不解决，他妈的！（他已经骂了两次娘）……”

“袁木、鲍彤、吴象、光远、家宝都发了言，赞同耀邦的思路。鲍彤的发言有点意思。他说，党的领导要‘一少三好’，威信才高。具体事情少管一些，出的主意要好，模范作用要好，联系群众要好。权力集中，责任集中，挨骂也集中。党内民主，要有程式，要有表决制（郑必坚后来对此嗤之以鼻，我想是嗤错了）。我们各级组织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没有及时由革命体制转向建设体制。革命体制要求保证主要目标不错，不惜付出代价。我们不惜拆了机器用零件，搞许多临时机构，不注意发挥常设机构的正常职能。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是个庞大的单细胞社会，只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西方不同，什么事能办，什么事不能办，都有明确规定，一个办事员就办了。办事员认为不能办的，你找总统也办不了。”

“鲍彤很健谈，颇有点学生味，口才极佳，但给人不够稳重的感觉。稳重和才华是有矛盾的。果然，大家对他的发言评价不高。”

后来，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回忆这一段时说：“（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也许是时间的久远，赵紫阳在回忆时缺少相应资料的查考，他对这个权力转移时

间的描述，与吴稼祥的日记不甚相符。事实上，鲍彤参加十三大报告写作班子，紫阳的人接过耀邦主持的这件事，早在耀邦“辞职”前已经着手了。

图1-15：赵紫阳与政改办和13大文件起草小组（选自《陈一谔回忆录》）

第四节 促使胡耀邦下台的四件大事

种种迹象表明，胡耀邦“十三大”退居二线这个原定的节奏被改变了。这与邓小平个人改变了对胡的看法不无关系，但国家领导人的任免，毕竟不是邓小平个人的事。综合各方资讯，大体有这样几件事情起到了高层抉择的关键作用：

第一件事，是胡耀邦批捕了胡乔木的儿子，并搜查了他在中南海的家。此事高新有专门文章，在此不赘。如前所述，李锐认为胡乔木在邓小平面前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笔者要补充的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似乎支持了胡耀邦。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书记处抓整顿风气抓得好，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

由于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坚决，压住了高层的不满，其他人只好借题发挥。

第二件事，是香港记者陆铿发表了《胡耀邦访问记》，及其恶劣影响的持续发酵。

第三件事，是叶剑英的去世。

第四件事，是1986年底的学潮。

这里专门交代一下“陆铿访谈”事件。此事发生在1985年5月10日。

陆铿是一名资深记者，1940年毕业于重庆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曾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出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创办过《天地新闻》。1949年，他因准确预测出解放军渡江地点，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匪”之嫌关入监狱。后为于右任、阎锡山所救。中共建政后，他担任过云南省政协委员，1957反右运动中又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下狱，1975年获释。1978年，陆铿申请去香港，与胡菊人创办了《百姓》杂志，又因言论批评蒋经国被指“通共”，禁入台湾。从1978年到他去世的三十年中，他采访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许多重要人物，他的报导、文章引起广泛注意。

唐德刚认为，陆铿的所向无敌，源于他的一种“见面熟”的草莽习气。严家其回忆道：

“唐德刚说陆铿见到谁，都像‘二十年朋友’一样，此话不假。陆铿游走在国共两党的上层、海峡两岸的底层，深知中国社会的一个‘真理’，就是人们总感到孤立无援，不少‘大人物’，在那些自己不大了解的人面前，往往会小看自己。……陆铿出狱后见到蒋纬国，比老友还老友，竟热情拥抱。其实，他们拥抱时，蒋纬国只是对突然遇见的陆铿的突然举动，无法抗拒而已。胡耀邦虽然知道陆铿是被他‘放生’到香港的国民党犯人，但陆铿采访胡耀邦时，他那种随意豁达的风格，使胡耀邦弄不清陆铿其人到了海外是何方神圣。”

据冯胜平回忆，陆铿这次采访前，曾与在美国的朋友们讨论，这次他获准到中国大陆，可以选择一名国家领导人访问。他请大家看看，在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三人中，以何者为宜？经分析，陆铿认为，采访邓小平当然可以获得最重要的信息，但邓的脾气火爆，弄不好来个“送客”，岂不白白

浪费一次采访机会；而赵紫阳比较狡猾，他和你说的话，未必是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胡耀邦比较合适。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披露，他是经由中国新闻社王瑾希女士的联系，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协助，得到采访胡耀邦的机会的。陆铿当时的身份是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和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采访过程破例允许被录音。在未征得胡耀邦同意的情况下，采访内容以《胡耀邦访问记》这个不太张扬的标题，发表在1985年6月1日出版的《百姓》半月刊上，全文两万余字。在文章刊出前，胡耀邦并未要求审稿。胡耀邦之所以能事先看到大样，完全是因为时任许家屯助手的耿飚的女儿耿燕想“先睹为快”。而当时已经是5月29日。耿燕看完大样后，立即报告了许家屯。许家屯觉得“关系重大”，当即派专人送给在北京的胡耀邦过目。胡耀邦看完大样后，修改了七个地方送回，但此时已经来不及，杂志已经印刷了。

图1-16：胡耀邦在中南海住所会见陆铿（选自网络）

这篇访问记后来引发争议的内容，据王沐明转述，有如下几点：

“胡耀邦开始就说‘我们让你受委屈了’。作为总书记，说出这种话等于是代表共产党向国民党道歉，在政治上并不合适。

在关于台湾问题上，胡耀邦说，‘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力量。’‘连封锁力量现在也还不够。’‘再过七八年上十年，我们经济上强大了，国防现代化也就有办法了……那对你就是要带一点强制性了’。这段话一方面暴露了大陆当时的实力不足和没有信心的问题。另一方面被海外舆论视为大陆武力攻台的规划，台湾反应尤为强烈。蒋经国该年视察金门时特别强调‘中共党魁’的谈话，鼓吹‘军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质疑：邓小平半年前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北京阅兵时还表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怎么仅仅时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动武呢？北京则解释那只是胡个人意见，且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大陆对台和平统一政策不会改变。……

关于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在陆铿连续提出胡乔木的许多问题时，胡耀邦没有反驳，反而模棱两可地打哈哈。‘哈哈……你们（陆铿）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等于是默认了对胡乔木的指责。……

在提到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保守和中央打算换掉的问题上，胡耀邦‘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这种回答也等于认可了陆铿的说法。后来邓力群内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落选中央委员而销声隐迹。在谈到王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即撤换了前任校长胡耀邦信任的阮铭等三位笔杆子（指当时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编辑阮铭、吴江等三人。……），外间盛传此事造成二人纠结，两人是老乡南北呼应时，胡耀邦说‘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等于是说他与王震有矛盾。……”

与邓小平见到外国记者总能超常发挥不同，记者，尤其是境外记者，似乎是胡耀邦的克星。而每当此时，胡耀邦总是异常亢奋。当循循善诱的老牌媒体人试探军队问题时，胡耀邦又一次“中计”了。王沐明继续道：

“在谈到军队时，胡耀邦认为‘我们的国家今后几十年都不会动乱’。显然在对国内局势的评估上，胡耀邦说了大话。”

“对邓小平仍占着军委主席不让的问题，胡耀邦的回答是‘我们两个人（指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邓小平）兼任了……。’这种回答明显是对邓小平的轻蔑，无视老人家邓小平的作用。”

其实，在外国记者面前，从容兴奋如邓小平者并不多。即便赵紫阳也难免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时候。如1987年他担任总书记后，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一段谈话：

“索：我觉得邓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我希望世界上很多人都能够记住这个事情。世界上很多人也觉得自己可以退，但是总认为别人没有我办得好。

赵：1963年毛主席跟我说过，说他见过几个大人物，这些人的名气可大了。当然这个请你写书的时候不要写进去。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见到孙中山了，他觉得孙中山老是那么干巴巴的几条。人到了晚年，是他声誉最高的时候，也往往是他最脱离实际的时候。”

如果当时有人攻赵，是很难不让“心有邪念”者发生联想的。好在那一段人们只聚焦在胡。

据陆铿回忆，胡耀邦送回的阅后大样，改动有七处。这七处改动中，三处是去掉自己的“哈哈”；另两处是要求删去双方谈到的关于王震和胡乔木的内容。第六处是要求删去关于邓小平的内容：“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指邓小平）兼任（指军委主席）了。”最后一处是关于陈云的，胡的原话是“这位老同志”，胡耀邦要求改为“这位老革命家”。

对于胡耀邦因上述讲话得咎的故事，很多爱戴他的人归结于陆铿“包藏祸心”的“诱导”。但客观地看，确实是胡耀邦本人缺乏与自由记者打交道的防范意识和政治家“慎言”的修炼。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说：

“1986年夏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

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

显然，胡耀邦与陆铿的谈话，不仅有损党国颜面，触动了政治人物的“权力神经”，而且暴露了中央高层的人事矛盾。但是，从1985年6月事发，到1986年6月，邓小平毕竟又忍耐了一年。因为胡耀邦的缺点，一直是很明显

的；他与胡耀邦的政见不同，已经越来越清楚；胡赵无法合作，在老人退休后，不可能出现二人“共治”局面，也是隐约可见的。但胡耀邦毕竟是他选定的接班人。胡的背后，还有叶剑英的支持，1983年那次“倒胡”就是被叶化解的……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兼老练政治家，邓小平需要等待更适合的时机。

那么，是什么事情加快了这场“宣判”的步伐呢？

如前所述，第三件改变胡耀邦退居二线原定节奏的“突发事件”，是叶剑英元帅的去世。

1986年10月29日，叶剑英追悼会在北京召开。几乎所有能动弹的党政军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帅的追悼会。就在这次追悼会上，平时难得见面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相约举行一次会谈。第二天，他们如约在陈云家进行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密谈”。请看杨明伟的回忆：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的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活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并示意自己的警卫员离开时将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接下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先念主席已经起身正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冲我说：‘烟，拿烟。’我赶忙出来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张宝忠匆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已经拆封的硬盒十支‘熊猫’牌香烟，我接过来边走边打开烟盒盖，我拿进去两个烟灰缸和两盒火柴。我知道李主席不抽烟，但又不好意思只给邓小平一个人放。陈云说：‘李主席不用烟灰缸。’我就只放了一个烟灰缸，

把烟交给邓小平就关上门出来了。……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6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就要求过，让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的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三人长时间秘密会议，没有记录和录音，而且气氛紧张。他们究竟谈了什么问题？据猜测，接踵而来的胡耀邦以非正常方式下台，是这次会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它气氛十分紧张的原因。而陈云在此后见诸媒体的“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的思想；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说的“四个不变”，都反映了这次会谈的基本共识。邓小平说：

“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不变；为了成功进行四化建设，两个开放不变；为适应改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将继续进行下去。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但真正提到这次“密谈”内容的公开言论，据杨明伟回忆，只有1987年10月19日陈云在中纪委一次会议中谈到过。这次讲话，是他作为中纪委第一书记的最后一次讲话，陈云透露：

“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笔者认为，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刚刚开过，如果是讨论关于“十三大”政治、思想路线，党的大政方针，完全没有必要局限于邓、陈、李三位老人，至少应该吸收总书记和总理参加；如果仅仅是商讨“十三大”三位的退休问题，没有必要开成一个秘密会议，只需给中央委员会一纸请求书就能解决问题；而如果不涉及胡耀邦非正常下台，则没有必要在叶帅去世以后，如此急

迫地进行磋商。所以，认为这次三人密谈的关键，是胡耀邦“提前退休”，这种估计，应该是靠谱的。

接下来，第四件加速事件进程，直接导致胡耀邦提前下台的，就是人所共知的“八六学潮”。因为它是89学潮的预演，所以，这里对有关情节稍作详细的回顾。

第五节 政改舆论催生的自由化浪潮

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旧的生产方式适应的旧意识形态解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失范，学校管理的普遍松懈，以及开放条件下西方世界（特别是东欧）民主思想的熏染、民主进程的激励，辅之以现代传播手段——电视——演示的南韩、港、台街头政治的示范效应，在历史进入80年代中期时，已经预示着一个学运频仍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个时代的“报风鸟”，是发生在1985年9月的学生骚乱。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出现逆差52.2亿美元。由于中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流传最广的是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吃了日本人的大亏，对政府腐败的不满情绪在群众中得以蔓延。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此点燃了部分中国大学生的反日情绪。随即爆发了“九一八”反日抗议和示威活动。运动卷入上万大学生，风潮波及西安、成都。据时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回忆，当时正值党代会在京举行。会议决定处理学潮的方针是：

“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

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前，曾发生过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潮”。

追溯这个“舆论热潮”的起点，应该是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赵紫阳汇报时，发表了包含以下内容的谈话。邓小平说：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乔石关于端正党风的汇报之后说：

“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我看明年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的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7月12日和16日，中宣部长朱厚泽和中办主任王兆国也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大型研讨会和毕业典礼上，大谈政治、经济、文化配套改革和法治建设。

在7月13日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朱厚泽又专门讲了宽松、宽容、宽厚问题。他说，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

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这就是为后人广为称道的“三宽”政策。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访问。他对记者说：

“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我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法拉奇谈话时说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进行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

此后，邓小平又两次与外国友人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谈到政改：

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谈到：

“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又谈到：

“党政要分开……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

“改革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到：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

“第一个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但只是开始……”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

“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学习讨论了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讨论这篇文章。

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上，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说：“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这个说法，给人以即将“放开报禁”的遐想。

一贯支持和力行改革的万里，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以《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标题发表，当时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8月7日，万里又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他的话传出后，使思想文化界惯以批评和暴露鞭挞时弊的知识分子深受鼓舞。

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密集、高调地大谈政治体制改革，除了万里、朱厚泽这些一贯真心政改人士的推动，在邓小平那里，有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其一，1986年年初，菲律宾“人民力量党”将马科斯总统赶下台，这股浪潮已驱使蒋经国该年的3月宣布，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9月，蒋经国宣布，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的大选激动人心：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为此，邓小平也曾作出指示，要认真研究各种政治体制，搞清楚哪一些体制持久，哪一些体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

其二，1986年2—3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七大”。在这次大会上，苏共提出，在“完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用经济手段领导经济，实现管理民主化，改革经济管理的组织结构”。此外，还提出了“革新政治机关和意识形态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加深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方针。这次大会选举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新领导机构。这件事情的意义，对于一向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不言而喻的。中共高层不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深受震撼。尤其是“保守派”立即感到，“理想目标”的这一变化，对自己坚守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而“改革派”则感到欢欣鼓舞。对于邓小平个人来说，可能还起到另一种“刺激”作用。

据吴稼祥回忆：

“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参加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之前去见启立，启立讲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三点使人反感：一是说我们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抢旗帜；二是说不要提什么两党制、设计院，使我们又面临1957年夏季的形势；三是说不要把一切都说成是封建主义。……他这样说，可能是有来头的。他的话，可能是给还没有真正开始的政治改革吹来的冷风。”

现在回过头看，胡启立的讲话应该是来自邓小平的面授。“抢旗帜”是抢谁的旗帜？自然是戈尔巴乔夫的旗帜。抢的什么旗帜？自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胡启立得邓小平的“真传”，怕思想理论界走得太远，所以作出

限制。这恐怕也是胡耀邦不见有什么言论，后来还责备赵紫阳部下舆论造势给人以假象的缘故。

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大谈政治体制改革，已经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要展开了。党内民主派和民间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仁不让，加倍活跃。政治改革的舆论很快在社会上形成高潮。

据杨继绳记载，从1986年7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8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这个题目和7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的相似。9月8日，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强调，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热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吁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以更高的调门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与此同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到处发表讲话，揭露社会阴暗面，批评共产党的腐败；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讲话，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他们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

当时，杨继绳曾参加过一次刘宾雁在天津大学的报告会。他回忆说：

“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情况的确如此。”

1986年，这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踊跃。

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笔者曾参加10月11日至12日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协调发展理论研讨会》。会议邀请的主报告人有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理夫、经济学家厉以宁、国政系教授李景鹏等人。北大法律系、国政系、经济系、历史系等系的研究生，以及校友樊立勤、胡平、王军涛等人都参加了讨论。会议采取大会发言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激烈的意见则只能在夜晚的饭厅和宿舍沙龙里发表。两天的会议气氛热烈，议题广泛，给中青年学人提供了一个议政的机会，也营造了一个全面改革的舆论氛围，熏陶了一代学生。

在这一时期众多的研讨会和演讲中，以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的风头最健，批评也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批评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他主张“全盘西化”，即：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方励之还提出：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

刘宾雁也认为：

“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这就明显触到了邓小平“四坚持”的底线。

杨继绳认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

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1986年9月28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胡耀邦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

“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胡耀邦是否对政治改革大任的旁落有情绪？换做他会这么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担忧的情况发生了。而当这些被作为纵容“自由化”的罪名加之于他时，他也承担了。实际上，这种形势与胡耀邦关系不大。胡耀邦甚至认为，这是赵紫阳旗下的政改研究班子在民间制造政改空气的后果。对此，赵紫阳有自己的解释。

第六节 “八六学潮” 天平迅速倾斜

1986年的学潮，是从一些微小事件诱发，逐渐聚势而成的。它首先发生在天津。

1986年5月，天津大学中国学生与非洲籍学生发生冲突，双方分别到市政府“讨公道”，部分人赴京请愿；8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因伙食太差实行“罢饭”；11月，上海华东师大学生发生“罢跑、罢测”事件，二十余系学生起而响应，提出“人权”口号，大字报死灰复燃。

1986年底的全国性学潮，是从位于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首先爆发，也首先在这里获得成功的。

此时，正值五年一次的基层人民代表换届选举。鉴于1981年的基层直选引发的自由化浪潮，官方对这次选举格外小心。11月底，中国科技大学选区“选举领导小组”公布了一份未经选民提名的候选人名单。

此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地方性报纸多次报导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等主导的民主办学的经验和理想。恰在这时，万里到安徽合肥，邀请十二所大学的负责人召开了一次“民主办学”讨论会，就如何完善民主管理机制进行讨论，对正在进行的“政改讨论热潮”是一个有力的烘托。

春江水暖鸭先知。科技大学的学子自然最先萌发在基层选举过程中实际推进民主建设的想法。他们认为“选举领导小组”的做法违反提名程序，因而也是违背“选举法”的。

1986年12月1日，科大校园内贴出了一张题为《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呼吁选民“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提议市长、区长也应由直选产生。从而揭开了“八六学潮”的序幕。

翌日，30名学生联名贴出第二张大字报，表示声援。接著，有人贴出大字报，自荐参加区人民代表的竞选。

12月4日，校选举委员会在大礼堂主持选举大会。自荐候选人与校方推荐的候选人各自发表竞选演说。副校长方励之在与会者热情要求下发表演讲。

他肯定了正在进行的自由竞选是一种民主意识的提升。并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3000：0，比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那种51：49的选举结果要民主得多”的言论，反衬出学生的民主素质。他强调：

“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而是靠大家争取得到的。”

他的讲话，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学生的喝彩。

安徽省教委副主任、科大化学工程系主任温元凯也应邀发表演讲。作为一个积极倡导改革却又不时遭暗箭中伤的人，他提醒学生在微妙而严峻的改革局势中，珍惜并保护科大当前的民主局面，不要让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动破坏了它。

选举大会结束后，当有人提议明天上街游行时，大家一致赞成。方励之反对学生上街，并在学生出发前亲临现场，重申了这个意见。

12月5日下午，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改革选举制度！”“唤醒民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12月9日，在另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中，两千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两千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

在这次游行请愿中，学生向市政府提出的三点要求与后来发生的“八九民运”的基本诉求完全一致：

一、学生的这次思想和行动见报、上电台、电视；

二、建立高校民主联合会；

三、保护参加游行学生，不受政治迫害。

但学校政工部门无视这些主流诉求，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单单挑出一张《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大做文章。

这次科大学生运动的结果，是终于争取到四个候选人名额。经过无记名投票，1986年12月29日，方励之、温元凯以最高票当选为合肥市西区人民代表。

与胜利的科大选举相比，“八六学潮”最出彩的部分发生在上海。由于江泽民的一系列表演，奠定了他1989年取代赵紫阳的“资本”，所以有必要做点交代。

上海的“八六学潮”，起于官方为“一二九”纪念日疏散学生精力而安排的一场“摇滚乐”演出活动。演出在上海市万人体育馆举行。演出结束时，上海交大一名研究生想与表演者交流，翻越座椅，被现场执勤的工人民兵殴打。在寻求公正无门的情况下，斯文的交大人终于被迫发出了“新闻自由”和“人权”的呼声。

正当此时，安徽的学潮波及上海。同济大学校园贴出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的大字报，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于是，上海各校开始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学潮。

18日，又是同济大学出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报。各校都骚动不安，校际间串联加剧，大字报、演讲会越来越多。各高校学生准备19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为阻止学生游行，上海市长江泽民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12月18日，他以学长的身份，来到自己的母校——也是这次上海学潮的点火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和学生进行对话。面对礼堂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的学生，江泽民抓住一个学生谈到“民有，民治，民享”的机会，反问学生是否知道这段名言的出处？接着他用英文背诵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全文。据说，满场没有学运经验的理工科学生“惊诧得目瞪口呆”。利用这一情绪，江泽民扭转战机，把“对话”拉到他预设的轨道，狠狠地教育学生说：

“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

江泽民的“作秀”非常成功。但由于他既未回答学生被打的问题，又给本来需要泄愤的学生颐指气使的印象，使之倍感压抑，所以，第二天，12月19日，同济、复旦、交大等校的学生依然举行了游行。同济学生提出的四项要求，成为游行学生的共识。这四项要求与安徽学运、八九民运的基本要求基本相同：

一、要求政府承认这次运动是合法的、爱国的、正义的；

二、要求江泽民与学生对话；

三、保证参加运动的每一位学生不受打击、报复和保障人身安全；

四、要求新闻自由，上海各大报纸、电视台立即如实报导这次运动。

学生把上述四项要求当作“最低纲领”通过后，书面呈递官方。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无果后，江泽民又在深夜接见了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但看到围坐的学生不但没走，还有同济、交大等校八百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增援，大有打“持久战”的态势，江泽民只好另谋篇章。

恰在这时，离开的江泽民突遇横祸。据香港媒体描述：

“江泽民由衡山宾馆乘车至外滩。途中，因突遇紧急情况急刹车，把他的额头撞破，血流满面，腰扭伤，血压也陡然升高。虽经紧急救治，腰还是直不起来。”

面对镜子里一幅狼狈相的江泽民，转念一想，决定利用这个危机：

“20日凌晨刚到，七名学生代表获告江泽民接见。当他们看到江泽民一副狼狈模样，已被吓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于是，更加不是政坛老将的对手了。

学生代表一味要求落实四项要求。因江泽民已与学生对话，实际上只剩下三项要求。江泽民答应了第一、三项要求，谈到第四条时，江泽民说，报纸、电台报导的内容由他们自行决定，政府无权干涉，因此无法答应。

懵懵懂懂的学生代表没有悟出江泽民话中的玄机，满意而归。一到学生中，引起的是学生的愤懑。当即宣布谈判‘流产’，继续静坐。”

这正是1989年5月，天安门广场某一幕的预演！不过，那时已不仅是学生代表说话不算数，政府代表说话也不算数了。

凌晨4：00，同济大学校长江景波及其他高校有关人员纷纷赶至现场，劝学生返校休息，并带来开水、面包给学生充饥御寒。学生深受感动，但决意坚持到底。

4：30，市政府播放叶公琦讲话，明示学生，游行符合宪法；如果同学们没有违法行为，政府不会处理学生；政府理解学生要求民主、推动改革的愿望，但不赞成上街游行；要求学生立即解散，回校休息。其实，叶公琦的讲话里已暗藏玄机，只是未能引起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的警觉。

同时，扩音器里传出学生代表与江泽民谈判的录音，但只有江泽民的讲话，没有学生的声音。学生大为不满，高唱‘新编国际歌’，高呼口号，狂跳迪斯科，压倒了扩音器的声响。

就在叶公琦讲话后半小时，市政府的扩音器里传出上海市公安局《第一号通告》，认为学生的行动阻塞了交通，已构成违法行为，劝谕学生尽速撤离现场。接著广播的《第二号通告》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学生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为由，要求学生和市民立即离开现场，“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令、不听公安人员劝导的，一切责任由本人负责。”

凌晨5：45，公安机关组织两千多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

毫无疑问，自江泽民在医院同意学生三条要求时，上海市委一系列“组合拳”方案已经形成，但在决定是否强行驱散示威学生（即采取“行政措施”）时，还是请示了中央，并获得了同意。但学生不知道这些。他们只能根据政府的措施走一步看一步。原来，他们的游行口号有：“反官僚专制，争民主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加快民主进程”、“开放禁片禁报”等。因发生警察打人、拘留学生代表事件，抗议和请愿口号中又增添了“还我战友”、“还我自由”、“反对暴力”、“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

为了平息学生的愤怒，在同济大学校长江景波的斡旋下，官方有意放松对扣在市府大楼里的学生的警戒，让学生有机会一个个全部溜走。然后宣称，政府没有抓学生。

这时，江泽民打出了他没有承诺学生的那张王牌：运用手中垄断的新闻工具，开足马力渲染学运的负面新闻。从“造成交通瘫痪”升级为“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江泽民甚至发表讲话，说他的交大之行，被“学生们剥夺了他讲话的自由，妨碍了他执行公务的自由”。他还倒打一耙，谎称警察采取“行政措施”时没有打学生，倒是有31名警察被学生打伤；还造谣说，同济学生殴打了自己的校长。当他告诉听众，有学生呼喊了“共产党下台，国民党回来”的口号时，那语气是煞有介事的。

21日晚，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冒充学生，打著复旦大学旗帜，在上海外滩推翻了两辆汽车，有人还窜上车去乱跳乱蹦；拥挤的人群将市政府前栽种的花木踏毁；更有一些人喊出“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等口号，并传出有人侮辱妇女谣言。

之后，又发生交大十名参加游行学生向《新民晚报》记者检讨过失的“对话”，被同学指为“十个叛徒集团”。十名学生悔恨交加，以“集体自杀”要挟校党委撤销这篇报道。当局无奈，只得将已经印好的二十万份（已流出一千份）报纸全部化浆。

面对复杂的斗争，上海大学生终于决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并在五日后结束了游行。但据说，此后，人民广场上探讨政治制度改革的讨论并未终止。

在政府一方，则以掀汽车、踏花草……等罪名逮捕了参与示威的工人；以参与煽动学生运动的罪名逮捕了“中国人民卫民党”首要分子、上海漆器雕刻厂工人史关福。以后又以“张贴反动标语”、“投寄反动宣传品”的罪名，将赶回上海观察学生运动的留美学生、中国民联成员杨巍逮捕入狱。之后，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被秋后算账者也不乏其人。

事后，江泽民在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的录像传到北京。为此，他在中共高层赢得了“处理现代社会危机能手”的印象。正是他“成功平息”上海学运的经历，让他在八九民运中，从挣扎的泥潭中突然超拔，轻松越过一大批跃跃欲试的觊觎者，得以填补赵紫阳被废后的总书记职位空缺。

继上海大规模学潮之后，武汉、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17个大中城市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学潮。

1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恰巧第二天是“一二九”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学生再度走上街头。这些讯息，通过“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广播电台传播到中国的各个大学，也启动了北京的“八六学潮”。

从12月10日开始，清华、北大就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一反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北大到清华“点火”的惯例，这一次，清华走在了北大的前面。他们于12月23日游行到北大门口，带出北大部分学生，然后到人大，发动了三千多人的游行。游行到白石桥终止。在随后的几天里，北大三角地出现了大字报。讨论是否应该游行。团中央教育部等多人到北大劝阻。

12月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十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性规定。学生对“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的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立即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

虽然在学校和官方的压力下，部分人不得不撤回了申请，但从此，在校内辩论、贴大字报和校际串联开始成为常态，一直持续到“六四”。

12月29日，北京大学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等大字报和标语。12月31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

“……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12：00开始，下午5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

- (1) 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
- (2) 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
- (3) 允许私人 and 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
- (4) 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据北大研究生封从德 回忆，这次元旦游行的酝酿过程是这样的：

“……后来又传说万里到了合肥，督阵处理学潮，其间说了一句话：‘党给你们民主已经够多的了’。这句话，把北大同学激怒了……但同时又出现一个难题：万里近年来明显是个开明的改革派人物。于是同学们又争论起是否应该抨击万里，从而引发对改革中的种种问题弊端的反思，特别是

政治改革等问题。我饶有兴味地阅读那些酣畅淋漓的文章，颇觉新奇和兴奋——在没有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大字报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

……大概为了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当时校内连续放了好几部优秀的外国影片。后来三角地的大字报才铺天盖地。年底前几天，三个穿风衣的神秘人物站出来，自称北大经济学院研究生和讲师，说应该给改革派时间，并警告同学们不要蹈波兰、匈牙利覆辙，要求改革反而引发流血和经济危机。后来我才知道，这之前两天，邓小平已在党的高层讲了类似的话。

12月20日左右，三角地有人倡议元旦到天安门游行。26日，限制游行示威的《十条》便出台，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地区游行示威的暂行规定》共十条。《十条》明显针对同学们而来，这可把大家气炸了。有的说，这‘橡皮图章’从未这么高效，一周就能订出个法规！有的则要上诉，说《十条》的制定程序非法，且严重违宪。

当时真有按《十条》要求去申请游行的，是三个物理系的同学。刚把申请递上，公安局立即打电话叫来北大校党办要员，对三人晓以利害：要么撤回申请，一切好说；否则今后的毕业分配则无法保障，上级也不会批准游行。最后三人只得撤回了申请。

《十条》的出台，申请的被拒，激起同学们的义愤。有人愤然贴出大字报，号召同学们于元旦上午10：00去天安门，用实际行动否定《十条》。”

1986年12月27日，一场具体而又平常的学运，经公安系统带有职业性神经过敏且不无歪曲的“汇报”，加上新华社记者专业性搜奇猎异且不无取舍的“情报”，由“七老联袂告状”事件，被提炼出一个“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在邓小平家里，他们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拒不执行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关键时刻阳奉阴违，失去制止学潮的最好时机”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恰在这时，邓小平收到一封密告信。密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于11月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预备在明年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写信人钱伟长 时任民盟中央常委。事后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方励之曾有一段回忆：

“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于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暂短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只有四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1987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拟议中的会议议题有： ”

图1-17：反右学术讨论会通知（陈小雅收藏）

至于他自己的讲题。当时还没想好。

据朱长超回忆，此信发给了全国“比较有名望的”三四十个右派。

但“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科大就爆发选举风潮，并触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 156所大学学生上街。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秩序回归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长要方励之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方励之回忆说，电话里，胡没有作什么重要‘指示’。但他意识到，“没‘指示’，并不是好兆头”。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给他，许良英告诉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12月31日上午，方励之结束课程后立即赶回北京。1月2日，中央下达1987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

1月12日，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

1月14日，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

1月16日，中央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职务的请求；

1月19日，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

1月25日，《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至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央的文件。”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

在12月30日的谈话中，邓小平还就学生运动发表了严厉的讲话。邓小平说：

“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所说的“疏导”方针，正是胡耀邦对学运的方针。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接着，他又责问胡耀邦：

“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污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但是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反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

“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力，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最后，邓小平还表扬了《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和《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的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 不错。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与1979年“三三〇”和1989年“四二五”讲话原则、立场、方针都如出一辙。据赵紫阳事后评论：

“他（邓）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

赵紫阳所述耀邦的无力感，应该是事实。当然，即便如此，胡耀邦也没有像1989年的赵紫阳那样放下学生不管，而是嘱咐时任公安部长的阮崇武，无论如何要将学生“软着陆”。

1987年元旦，在这个千人萦怀的清晨，曾目送同学出发的邵江回忆：

“海淀广播站开始广播‘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广播说未经批准的游行非法，非法参加游行者将严惩不贷。许多校方干部在学生宿舍门口观察学生出入，但仍然有北大和其他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聚会游行。”

为了防止出现上海的复杂局面，1987年1月1日，天安门广场戒严。数九寒天，政府组织了3600名少先队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集会。上午11：00，有学生和闻风前来观望的市民数百人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等待。

后来，在“八九民运”中担任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封从德，当时只是一位抱着看热闹的心情前来的旁观者。当他钻出前门地铁站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番情景：

“广场已进不去，三层人墙，隔一米站一人，团团围住中间偏南的纪念碑。最外一层是武警，中间中学生，最里是少先队。除了这三层人墙，广场空空荡荡。当局为了阻止同学们冲进广场，在地上洒水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博物馆门前的空场和人行道聚有上万人，学生、市民、游客及便衣，乃至穿制服掂着摄像机的武警，全都混在一起，仿佛没有主体，也没有围观的人群，谁都像是看热闹来的。”

“突然一股人流向北，大家也跟着向北，以为北面天安门方向发生了什么事。我赶到人流的源头，已是长安街了。只见一队整齐的中学生队列兵分两路，一路朝东向王府井方向，一队朝西向天安门去。人群跟着走，越走越茫然，最终就散了。”

“又是令人窒息的十分钟过去了。终于，人群开始不那么沉默。面对几台摄像机，大家闭着嘴哼唱《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歌声越来越大，勇敢的学生和市民站在中央，胆小的退避两旁。歌声把示威者凝聚在一起，大家开始张口高歌。”

“嘹亮的歌声振奋了大家，有人呼口号，有人把揣在怀里的标语打了出来，人群开始移动，向北游行。围观的人群鼓起掌来，摄像机慌了，却赶不上队首。这时大约中午十二点。”

“游行的人流向北浩浩荡荡涌去。横幅、标语越来越多，口号越来越响。口号喊些什么已记不太清，想来应有‘废除十条、游行自由’以及‘支持改革’、‘民主万岁’之类。队伍北行到长安街向东转，要去王府井，那儿人多、宣传效果大。向东还未走出百米，便一片回头的喊声：‘到天安门去！到纪念碑去！广场才是我们的目标！’”

“于是大家折回头，我正好走到了这回头向西的队伍前面的人群中。直到此时，我还只是一个热心的旁观者，想看个究竟而已。这时我还心想，这样回头去冲广场武警，是不是有点暴力的味道，心里并不大赞成。”

“一幅场景改变了我的角色，使我从旁观变成投身参与。当一辆警车迎面开来时，队伍前面打横幅的人手软了，横幅的一角歪倒下来，人也不见了……于是我挤到队前，接过歪倒的横幅，同另外三个学生一道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仗着人多，我们绕过警车，车上几个武警全被淹没在人海之中。车子小心地对着人群慢行，他们还想劝阻学生，却全无效果。”

“……我看看手中的横幅，上书‘改革到底、民主万岁’几个大字。……”

“这时，四个戴鸭舌帽的人走进队伍，热情地说：‘我们工人支持学生。’同学们甚为感动，以为有了工人老大哥的支持，就成功一半了。我还握住其中一个中年人的手说：‘欢迎工人老大哥！’就像电影里共产党闹革命时的情景。”

“前面就是武警队列，在广场东北角。武警们一片忙乱，有的手拿对讲机急促呼叫。十几辆警车很快从广场各处开来，载着上百武警来增援。此时，游行队伍已一发不可收，只听到一片‘冲啊……！’的喊声。”

“因为洒水结冰，地上很滑。武警提着警棍插进人群，队伍乱了起来。这时我倒益发平静……一面维持做人的尊严打着标语往前冲；一面怀着强烈

的好奇心。恐惧还没有到来，我感到自己属于一个群体，这群体有一个强烈的共同心愿，这心愿给了我力量。”

“然而不久，我感到背后一股推力把我送到武警手中。回头一看，正是刚才那四个‘工人’。那鸭舌帽这时急急地喊：‘这家伙是带头打标语喊口号的！’”

学生高喊的口号有“修改十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仅十几分钟，游行的队伍就被警察制住，52名学生被警察带离现场。

老实人不能欺骗。老实人一旦被欺骗就会认死理。事后，封从德成为八九民运领袖，其中所表现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乃至对周围人的警惕，与他这次受骗的沉痛教训关系极大。

傍晚北大校园传来学生被抓的消息。据估计，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学生35人。

从广场逃回学校的学生悲愤万分，立即在校园里掀起了抗议活动。他们向校方提出包括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公正报导学潮等4条要求。当晚北大、人大等校数千名学生冒着严寒再次向天安门步行进发，打算到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请愿。沿途高呼“还我同学”，“自由万岁”等口号，还辩论了是否罢课的问题。但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不同意罢课。2日凌晨1：30，队伍行至甘家口，被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沙校长用广播告诉同学们，被扣同学已返回，希望大家返校。大部分学生闻讯返回，但仍有400多名学生于3：30游行到天安门。他们的怒气宣泄殆尽后，于5：30乘学校租来的车返回学校。

随后几天，政府继续声称这次学运受少数人利用。因此，北大学生在1月5日焚烧《北京日报》。这次学潮虽然失败，却让“是否应该建立学运组织”的问题有机会提上议程。这个意见虽遭到“主流意见”的否定。但“第一步需要争取言论和集会自由”却成共识。

图1-18：北大学生烧《北京日报》（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据阮铭回忆，他的连襟——时任公安部长的阮崇武曾奉胡耀邦之命和平解决学潮问题：

“1986年那一次学潮，邓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亏胡耀邦不肯。当时阮崇武叮嘱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天安门，……后来下起大雪，学生还是去了天安门。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车，把学生送回学校去了。”

据认为，元旦北京学生示威，强化了邓小平对胡耀邦采取措施的决心。1987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评“一些同志表现软弱，不敢理直气壮地起来斗争”，并指出，“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据说，这公开表达了邓小平处理胡耀邦的态度。

第七节 “倒胡”生活会

据钱玉堂回忆，在“倒胡”生活会前，赵紫阳已预闻老人帮的“倒胡”动作，曾要胡耀邦“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这个说法，得到了田纪云回忆的证实。田在《我所了解的赵紫阳》一文中说：“1986年，在赵得知小平同志对胡有些看法时，他劝耀邦同志主动找小平同志谈谈，沟通思想，解除误会。”可见，胡耀邦找邓小平，确是出自赵紫阳的建议。

至于胡和邓在这次见面说了什么？目前尚无权威资料来源。此后，就发生了胡耀邦向邓小平递交辞呈的事情。关于此说，又有“1月2日”和“1月6日”两种说法 和“两次递交”说。从“两次递交”说里面又延伸出“正式”与“非正式”的解释。以上关于胡耀邦递交“辞呈”的时间的纷纭说法，最终因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得到了澄清。它证实，胡耀邦在“生活会”

前后曾写过三份文件，第一份，是“1月2日给邓小平的信”，大概在信中提到辞职的意思；第二份，是“1月月10日”在“生活会“第一天的发言稿——《我的检讨》；第三份是“1月15日”在“生活会”最后一天宣读的《我的表态》，大概是为自己的辞职意愿按下了确认键。此外，根据卫建林的记述，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还有一个发言，大概只有录音（及中办秘书局整理的录音稿）。最后这两份文件，就是中共19号文件的蓝本。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证实了这两份文件的存在。由于上述事件的存在，胡耀邦辞职在先，“生活会”倒胡在后，似已无可争议。

胡耀邦提出辞呈后，邓小平决定以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问题。会议在邓家召开。据说，那一天——1987年1月4日一早，邓小平一起来就催子女去上班。子女说，今天是星期天，不用上班。

当时的常委有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李先念5人。但会议没有通知总书记的胡耀邦参加；李先念则是接到了通知自己不来。据说，这个会前，邓小平曾派杨尚昆坐军机冒着大雾飞往上海接李先念回京，但李先念拒绝了。他对杨尚昆说：“急急忙忙干什么？耀邦可是个阳人啊。”与1985年9月叶剑英去世时的“密谋”相比，这次他略显消极。原因可能是对“十三大”被杨尚昆接替国家主席的预案有意见，在闹情绪。所以，真正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常委，只有邓小平、赵紫阳两人。此外还有陈云、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彭真。据赵紫阳回忆：

到会的人传阅了胡耀邦的辞职信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

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邓小平提出“生活会”要注意四点：

“第一，不要说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第二，不要涉及到个人的品质，不要因为胡犯了这个错误，就说他的品质如何，对品质不要加以评价；第三，不要提‘团派’，因为胡长期在团中央工作，社会上也有这种议论，认为批评胡耀邦，实际上是要打击‘团派’；第四条大概是：不要说这个人是什么圈子，那个人是什么圈子，即属于宗派性质的问题不要提。”

邓小平1月4日的讲话中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游行原则的内容，作为中共中央【1987】1号文件于1月6日颁发到全党。文件开宗明义：

“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斗争前列；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重处理。”

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中央1号文件作了全面的诠释。在社论气势的震慑下，由于春节气氛渐浓和后继动力不足，“八六学潮”终止于寒假的门槛上。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4月，当胡耀邦逝世学运再起时，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根据这个经验出台了“四二六”社论，但这次却没有奏效。

邓家“常委会”后，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赵紫阳、胡启立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如何开。会议决定，由薄一

波、杨尚昆布置邓力群、胡乔木、姚依林、余秋里、王鹤寿等准备“生活会”上的发言。1月8日，中央办公厅就此发出了《通知》，还规定了到会名单。

赵紫阳受命通知胡耀邦本人。但直到“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赵紫阳才去胡耀邦家，通报了即将召开“生活会”的消息，提示胡应该从哪些方面检讨。

批胡“生活会”于1987年1月10日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参加的人员中，政治局委员18人，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书记处书记4人，中顾委委员17人，中纪委负责人2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生活会”开了六个半天（其中有一个整天），于1月15日结束。

1月10日至15日，中顾委召开生活会，薄一波主持。据说，会议的第一天，胡耀邦作了检查，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他说：“自1986年11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十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作过三次指示。”他承认自己在如下问题上有错误，但也试图作出辩解：

——关于“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承认：“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承认：“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关于“精神污染”，胡耀邦承认：“小平同志讲过之后，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

——关于“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胡耀邦辩解道：“党中央，特别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养好接班人，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有经验的同志。对此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关于外事活动，胡耀邦解释道：“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话时，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

——关于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胡耀邦检讨说：“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后，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主要用于防左，没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长期任职之后，我变得过于兴奋急躁，不能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

——关于“答应下面的事太多”。胡耀邦辩解说：“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

此外，他还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事后，胡耀邦对前去看望他的朋友说，作这样的检查，是违心的。其本意“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如果知道有人蓄意整他，要把他批倒批臭，他是不会作这样的检查的。

1月11日是星期天。12日继续开会。第一个发言的是余秋里。事后，赵紫阳评论说：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

紧接着发言的是邓力群。据他回忆：

“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12日上午没讲完，13日上午接着又讲了近一个小时。两次发言合起来有3个半小时。”

“在批评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评，然后是对胡耀邦同志进行批评，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一、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二、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三、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的问题；四、关于‘左’和右的问题；五、关于对干部的任用问题；六、关于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邓力群的发言尽管准备充分，时间最长，但并没有令人意外的新内容，都是胡耀邦承认，大概也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

在1月14日上午的“生活会”上发言的是乔石。他披露了1985年7月14日邓小平曾找他和胡启立谈话的事情。先讲了团中央的干部问题，接着专门讲了胡耀邦同陆铿谈话的问题。当时邓小平说：正是耀邦同志应该多讲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他恰恰没有很明确地讲。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至少是很不得体的，有些话很不严肃，完全是迎合。

1月15日上午，胡启立发言。他在发言中也介绍了邓小平1985年7月14日同他和乔石的谈话，他说，小平同志再次指出：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个问题。经济建设始终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四化。……胡启立说，“小平同志谈话后，我和乔石同志按照小平同志的吩咐，立即向紫阳、耀邦同志作了汇报。紫阳同志的意见，

对小平同志谈话，书记处要尽快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小平同志的思想，还可以先搞个粗的文件。根据紫阳同志意见，中办编印了反自由化问题的材料，摘编了常委们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论述，供书记处学习、讨论。我去请示耀邦，问什么时候开会，耀邦说他要去新疆。……他从新疆回来后，书记处在北戴河讨论了两次，但既没有作决定，也没有发文件和通报。回到北京后就不了了之。”

胡启立还透露，早在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就单独找他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小平同志这次谈话，我当即向耀邦同志郑重地原原本本地作了报告，但耀邦同志听了之后没有向书记处其他同志谈一谈，征求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事实上，小平同志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赵紫阳是在这次“生活会”上第一次听说邓小平在1984年6月与胡启立的谈话，想必是非常震惊的。因为在那之前，他刚好给邓小平写信谈了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问题。事后，他点评道：

“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这是1984年的事情。”赵紫阳的发言也是在1月15日上午。《改革历程》未载入其内容。但杨继绳追问了这个问题。据赵的回忆，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1987年1月，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有人批评耀邦不受约束，好即兴发言，对重大问题轻易表态。我也讲了这方面的问题。我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

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我说，早在1984年我给邓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阮铭掌握的材料，提供了比赵紫阳记忆更多的内容：

“……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83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即使你现在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

“当时就已感觉到，胡耀邦不遵守纪律，等到格局一变，小平、陈云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就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对小平、陈云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阮铭认为，赵的话是在暗示：胡耀邦是别有用心，对人宽容，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形象，是在积累实力，图谋将来老人不在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自由行动。那不就是做独裁者吗？那时赵紫阳就只有辞职了。这种说法最能打动老人猜忌之心。

由于阮铭是“胡派”大将，又是最早受“反自由化”整肃的人，所以要证实他的记忆，还需旁证。邓力群是阮铭的“宿敌”，也是一个爱做笔记、方便获得会议记录稿的人。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赵紫阳的发言很用了一点心机，他是15日上午讲的。赵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讲到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赵说：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他同耀邦个别谈话时还讲，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什么这么猖狂，为什么有恃无恐？他们寄希望于你。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83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即使现在有时候还捎他们一下，受一些批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他们就是这样有恃无恐，即使现在你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不管耀邦同志怎样想，那些人是这么看的。”

“赵又说到1984年他给小平同志写的一封信，希望在他和陈云同志健在时，能够认真帮助解决我们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特别是书记处。赵说，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等到格局一改变，小平、陈云同志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上次讨论怎么定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对小平、陈云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赵的话说得很巧妙，意思是说胡耀邦是有意识地把这些人保护起来的，一旦胡成了第一把手，这些人就会成为他的人才和力量。表面上看，赵紫阳说的就是上面的那几句话，但仔细想来，赵是话里有话的，有些话是在给人一种暗示：即胡耀邦要独裁，眼前所以还没有这样做，是他自己有意识地克制自己。赵紫阳是说胡耀邦这个人用心很深、不可低估和轻看啊！”

阮铭和邓力群的陈述基本一致，对赵紫阳发言的感觉也大致相同。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采信了郑仲兵主编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与阮、邓的说法差不多：

“在1月15日的生活会上，赵紫阳批评胡耀邦说，他虽然大公无私，但是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为什么他对刘宾雁、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么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

赵紫阳害怕胡耀邦“变”成毛泽东，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剥夺胡耀邦经济决策权时已经讲到，胡耀邦称经济计划送他过目是“强迫签字”。赵紫阳说：

“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说过所谓‘倾盆大雨’、‘被迫签字’之类的话。现在耀邦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来自改革派“盟友”，曾许诺要与之“同舟共济”的赵紫阳的这番批评，究竟让胡耀邦有多伤心？是常识可以判断的。据目击者称，那天（1月15日）开完会，胡耀邦走出会场，“坐倒在台阶上痛哭失声”。胡耀邦去世前对于光远谈到的两个“想不到”，其中之一是：“想不到有人会那样地去理解他”。指的大概就是没想到赵紫阳会这样看他。因为，赵紫阳在批评胡耀邦时，还提到他不守外事纪律，“随意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的问题。胡耀邦去世前对李锐说，这是“造谣”。

笔者同意赵紫阳的自辩，他与耀邦之争，“并非权力之争”；他对胡耀邦的总书记位置并无兴趣，他即使有扳倒耀邦的想法，也并不见得就是想在老人去世后自己做“独裁者”。但他的刚愎自用，排除挡路人的手段之狠，过去——在反对广东“地方主义”问题上——曾表现过，以后还会再次表现。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事实。

这些，虽然都无损于赵紫阳作为80年代“改革派”领袖的地位，无损于胡赵二人同为中国改革开放“功臣”的荣誉，不能抹杀赵紫阳曾经给予过胡耀邦的支持，但对1989年赵紫阳处理因胡耀邦逝世而爆发的学运，表现出来的反应消极、处理迟滞，不能不说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在赵紫阳之后，是姚依林做了经济问题的长篇发言。他批评胡耀邦不懂经济，又不好好学习陈云经济思想。还历数了胡耀邦搞高指标、高速度、高消费，给下面制造的压力，造成经济混乱。其中在经济和人事问题上对胡耀邦的诸多指责，实际上是胡耀邦为邓小平承担责任。

薄一波则批评胡耀邦：“全国两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他还指责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这几年，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有人认为，他指的是胡耀邦批捕胡石英，并抄胡乔木的家这件事。

前文已经交代，杨尚昆是这次生活会的具体策划者之一。在吴稼祥眼里，他有接替邓小平当“太上皇”的愿望，所以，他是非程序“倒胡”的利益所系者。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能看到的他在“生活会”上的言论很少。只能从下列分散的零星描述中得窥全豹。

在《谁毁掉了胡耀邦？》一文中，钱玉堂写道：

“杨尚昆说：‘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

杨继绳则写道，“在那次‘生活会’上，有人说胡耀邦“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我们虽无法断言这是谁的言论，但阮铭的一段文字却可以说明问题：

“在拱倒胡耀邦问题上，杨尚昆是非常活跃的。胡耀邦被迫辞职，党内反应很强烈，纷纷质问，薄一波就让胡乔木、邓力群赶快炮制材料，把‘生

活会’上的批斗发言拼凑成胡耀邦的‘十个问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来又陆续发下去五个‘补充材料’。杨尚昆在军队的传达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说成向邓小平‘抢班夺权’，比喻成同林彪一样。杨的讲话稿曾印发军队高级干部，影响极坏，邓小平让他收回——邓虽然对胡耀邦不满意，但是他知道胡耀邦不是这种人，那些说法讲的完全不是事实。我们有亲戚在军队里，得知这些情况。”

由此可见，杨的活动大多在幕后。他是通过别人发声来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这里，我们就要谈到前面提起的一个话头，杨不止一次传达关于耀邦的不实消息。

1986年12月胡耀邦在上海，与李先念有一次见面。据刘崇文回忆，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阮铭的回忆则说明了李先念对“倒胡生活会”反感的态度：

“事先邓小平曾派杨尚昆坐军机冒着大雾飞到上海接李先念回来开会，李先念拒绝，对杨尚昆说：‘急急忙忙干什么？耀邦可是个阳人啊。’（指胡耀邦不搞阴谋，那么谁在搞阴谋呢？）”

用这些材料解释李先念为什么不参加“生活会”，可谓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在《改革历程》中看到，赵紫阳不仅描述了另外一个“胡李见面”的场景，而且描述了另外一个“杨李见面”的场景：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赵紫阳所述情况，与刘崇文、阮铭说的都不一样。当然他不会编造的，他肯定是从杨尚昆那里听来的。仅从这一件事，我们无法判别究竟是李先念扮演了“两面派”角色，还是杨尚昆撒了谎？但联系到陪同胡耀邦访朝归来的“小报告”，及其对耀邦“抢班夺权”的指控，以及下面我们还要讲到的，他在赵紫阳接掌军委副主席后的“紧盯”，在1989年力拒江泽民接班……等等问题上，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杨作伪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十分关注军委主席一职，虽然不是为了自己。

当然，从这几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直到最后写回忆录时，赵紫阳听信杨尚昆的，比信任胡耀邦要多一点。这是我们理解，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绝少提到杨尚昆在1989年的活动的原因。

在“倒胡生活会”上，王震是批胡的另一杆大炮。据说，他曾以对当年“红小鬼”训话的口气，训斥了耀邦：

“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了。”

因为涉及到1989年的一樁公案，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王震其人的做派。很多人都知道下面这句名言，但很少人知道这就出自王震之口：

“老子打天下，就得坐天下。”

什么“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过渡时期”的理论宣传的“遮羞布”，一句话就被此公穿透！据许良英回忆：

“1977年在科学会堂就亲耳听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这样警告。他对参加几个学术会议的知识分子说：‘我愿做你们的后勤班长，但如果你们不好好干，我有办法对付，那就是我在新疆搞的劳改农场！’”

胡耀邦与“老乡”王震变为“仇敌”起于上一次瓜分华政权“蛋糕”时节。据吴江回忆：

王震受邓小平青睐，主要是因为在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受到监视的日子里，他经常亲自（或派儿子）为消息闭塞的邓小平充当与老干部之间的信使。邓小平坐天下自然不会忘记王的功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局决定增补三名委员时，内定名单有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但在征求胡耀邦的意见时，胡说军内比王震资历高、条件好的还大有人在，建议对王震的提名暂时搁置。但胡得到的答复是：王虽爱打横炮，但此人也有其可爱处。结果，胡耀邦的建议未被采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王一同进入政治局。1981年胡耀邦出任党的最高职务后，拒绝接受华国锋腾出来的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并辞去第二副校长职务。经邓力群提议，中央书记处任命王震出任中央党校校长。1982年4月，王震到任后，立马直言不讳要拿胡耀邦在党校的班底开刀。他在党校的会上说：“听说胡耀邦在这里有个智囊团，我就是来砸烂这个智囊团的！”一边说，一边用他手上的拐杖“当，当，当”地狠凿地板。之后，为粉碎“四人帮”后在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立下汗马功劳的《理论动态》的吴江、孙长江、阮铭被以各种名义遭到批判、调查、整肃，最后离开党校。

1982年7月，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42名学员毕业，要求胡耀邦讲话。胡耀邦居然拒绝前往党校，而是把学员邀到了中南海。在讲话中，他极不寻常地说道：

“要同一切错误和邪恶的东西作斗争，也就是要解决相信真理与坚持真理的关系。在我们的事业面前，任何时候都会有极端错误的东西、极端邪恶的势力的干扰破坏。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他们低头和投降。歪风邪气、丑恶现象、邪恶势力总会长期存在的……”

此次讲话在报纸刊出，胡王矛盾在高层就不再是秘密。

据传，王震的“可爱之处”，是毛泽东首先发现的：在延安整风时，毛曾钦点他担任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毛还得意地说：

“我就是要你这个文化不高的人和文化人打交道。”

在整个邓时代，由第一代领袖开发出来的这颗“螺丝钉”，在这架红色机器上继续发挥作用。“丘八管秀才”的艺术，在他的手里被演义到登峰造极。其高论和做派也时常为思想文化界所闻：

他曾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打电话：

“《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不要脑袋？！”

1986年天津“学潮”期间，已经当上中顾委副主任的王震，在天津与老干部见面。杨继绳曾亲自瞻仰他的“风采”：

“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

‘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 ‘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

5天以后，即12月31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又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说：

“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

还说：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

他还声色俱厉地咒骂胡耀邦和知识分子，甚至骂到巴金头上。他说，上海还有个什么巴，都是民族败类。

他自命周仓，把邓小平视为他的主人关公。邓小平自然会给他撑腰。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精神文明决议时，因为陆定一反对提“自由化”，邓小平曾说过一段极严厉的话。但在布置书记处会后传达时，胡耀邦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因而书记处没有将邓小平的即席讲话向下传达。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了邓小平讲话全文，人手一份。他还在全校大会上说：

“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20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50年，一共70年，反到下世纪中叶。”

鉴于以上种种，1989年5月中旬，有传闻元老扬言要“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有人怀疑就是出自此君之口。

在“生活会”上发言的还有宋任穷、彭真、万里。唯一对这场闹剧提出批评的，是胡耀邦的忠诚战友习仲勋。据说，他曾指着薄一波、王震等人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吗？”“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

胡耀邦没让习仲勋说完，就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在这次“生活会”上，延安时期曾经同胡耀邦、陶铸有过“桃园三结义”佳话的王鹤寿也作了发言。他把胡耀邦平时说的一些心里话也端了出来。

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7位退休的中顾委委员参加了会议。会上，薄一波汇报了“生活会”的情况，对胡耀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通过了一个“公报”，决定：

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政治局常委除了李先念以外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没有参加“生活会”的陈云，这一次在会议的最后，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结束前，他特别强调了总书记任免的程序问题。他提醒与会者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

在这一天，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还宣布，要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同时也明示，要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

1月17日，胡耀邦的秘书告诉胡的家人，胡耀邦现在身心憔悴，要在中南海勤政殿休息一段时间，他要求家人不要去看他。两周以后，胡耀邦才回到家中。他对夫人李昭说：“我没有错，顾全大局，我只能辞职。”

16日扩大会议的“公告”，在会议结束的当天，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

1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了3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3号文件还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检讨摘要。他在检讨中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不过他没有说自己对思想的宽容态度导致了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学生示威。3号文件中还说，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这些老干部只要身体健康，今后仍会继续为其它干部——这是指总书记和总理——提供指导。

胡耀邦下台的“公报”一经播出，立即引发党内外、海内外的强烈震惊和质疑。1月19日，留学美国的一千名学生和学者共同签署《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信》，在海外各大媒体发表。为了应付党内外、海内外舆论，薄一波让胡乔木、邓力群把“生活会”上的发言，又拼凑成胡耀邦的“十个问题”作为中央第19号文件下发。以后又陆续发下五个“补充材料”，作为3号文件的补充文件，对胡耀邦担任领导期间的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供各单位传达。因杨尚昆在军队的传达影响极坏，被迫立刻收回销毁。

在1987年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胡耀邦就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1987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胡耀邦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得票1800多张）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得票166票）。但是，他从此成了政治局中惟一的只参加例会，不担任具体工作的委员。

在女儿满妹的眼中：

“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默默翻阅了自己从1977年再度复出以来的全部讲话、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年间在领导岗位上的功过是非，然后开始再次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

“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胡耀邦此时的孤立无援，凸显了战友队伍中一些人的人格。他们的观点也许与胡相近，但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衡，隐瞒了自己的观点；不是服从真理，而是追随权力；以致忍看着胡耀邦从悬崖坠落，还在一边说风凉话！比之那些本来就是极左派的死硬分子，这些人的冷血、投机和见风使舵的本色，已经暴露无遗。然而，他们不了解，事情就像个韭菜一样，旧的被割去，新的固然会长出来，但新一轮也会面临被割去的命运。在胡耀邦感受压抑的时候，广大知识分子感到的则是失望。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中国的爱因斯坦专家许良英回忆：

“胡耀邦还在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在1981年邓小平第一次搞‘反自由化’的时候，胡耀邦就说过，我们不再搞整人的政治运动。有人问，你能不能担保不再搞政治运动？胡耀邦很坦率地说：‘我不能担保，因为我不能保证我自己的地位’。这话我听了很感动。当时，我就讲只要胡耀邦的地位不变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否则，中共没希望。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台，我就绝望了。”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一卷149600字 全文完

八九 民运史

第二卷 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
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四章 大气候，小气候

第一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微与自救

第二节 紫色季风

第三节 重整河山

第四节 横扫“保守派”组合拳

第五节 新权威——风动、幡动与心动

第六节 价改闯关——赵紫阳的滑铁卢

第七节 “治理整顿”的来踪与“倒赵风潮”的去迹

第八节 “反腐”主题的凸显与八九话语的聚集

第五章 临界点

第一节 民间社会的扩展

第二节 异议运动的萌动

第三节 从“草地沙龙”到“民主沙龙”

第四节 方励之走上前台

第五节 布什的晚宴

第六节 包柏漪们的“中国梦”

第七节 知识界的签名风潮

第八节 山雨欲来

注释

第四章 大气候，小气候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王橙宇、吴洪奚、岳晓玉、杨继绳、仲维光、赵鼎新、严家其）

党内民主派领袖胡耀邦的下台，虽然给改革事业带来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改变中国改革的大趋势。改革的两大背景依然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与自救；后“极权”时代的控制松懈和社会复苏。

在中国，由于各种政治派系的逐渐清晰和朝野矛盾的纠结，人们对改革的目标、战略和路线及期望的分歧也日益加大，这就使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国陷入一个空前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保守派”集团日益从一个进攻性较强的“信仰集团”退守利益的底线，但其战斗力并未消减，这就给权力斗争留下了凶险的前景。另一方面，在改革阵营内部，总舵主位置上的邓小平更坚定了拒绝“波兰模式”的决心；而处在操盘手地位的赵紫阳，在指望用“新威权”排除经济转轨出现的困难时，又希望通过“公开性”政策动员社会对改革的支持。这既不见好于退守利益底线的保守派，也不见容于日益多元化、自由化的社会，还可能引火烧身。

正是这“四方六对”矛盾的复杂交错和回旋余地的缩减，最终挤出了一个八九民运。

第一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微与自救

1988年4月，来自全世界的93位共产党和亲共政党组织的代表在捷克的布拉格聚会，庆祝由苏联主办的唯一的一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刊物——《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创立30周年。数年前，这类会议还受到世界新闻媒介的极大关注，但现在西方的新闻媒介已经全然没有了反应。为数不多的“应付性的简短报导”，仅仅来自参与国或与会组织的媒体。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这次会议毫不引人注目，这一事实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就在这次会议的前后，布拉格电视台引用曾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长达25年的老牌共产主义外交家多勃雷宁的话说：

“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已经开始，它要求我们掌握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想要不想要，我们也得重新塑造工人阶级。”

文章没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何去何从提供意见，但他清楚地表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全世界的和平，比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更高的价值。

布热津斯基注意到，为了刺激停滞不前的经济，为了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苏东和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主张，“简直与美国制造商协会年会上提出的主张没有什么两样”。苏共理论家开始在《真理报》撰文，说“灌输所有权的意识是件好事……如果与他没有利害关系，他就会漠不关心。”几乎在同时，波兰政治局委员也提出：“那些为国民经济多做贡献的人当然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拿更高的工资。”“这就是经济的无情规律。”

早在80年代上半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胡耀邦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胡启立的表述则更加理论化：

“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所要求或者所允许的东西。”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觉悟和行动早于苏联、东欧共产党。

为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包括中国在内，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也在发生巨变。对国家的赞美，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强调，到处都在让位于对个人、人权、个人创造性的鼓励；对国营企业的偏袒和扶持，也更多地让位于对个体户和私人企业的颂扬。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共产主义曾经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产生过吸引力，因为他们在共产主义描述的图景和初步的实践中看到了夺取政权的捷径和解脱压迫，消除贫困、落后和种族歧视的希望。但是，掌权后的共产党国家，不久便陷入停滞、浪费、官僚化，出现权力寻租及腐化现象；特权的发展使新的阶级差别和隔阂与日俱增。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体制中，看不到修正这些弊病的“制度制约”机制，而只能诉诸于不可靠的“人治”。

也许是旁观者清，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决定不再步共产主义的后尘。

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康乃馨花革命”，无意中揭开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序幕——这一浪潮，被政治学家们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西欧的希腊，推进到拉美，将巴西、秘鲁、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全部囊括；再到东亚台湾、韩国、蒙古、印尼，经前苏联东欧阵营之后，又涌现于非洲的南非、加纳、冈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

在这一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有70余个国家民主化。1973年，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前一年，世界上只有40个民主政体，但是，到2002年这个数字是121，占193个独立国家的3/5强。

虽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只是启动了民主化过程，有的运行尚不稳定，有些甚至形貌可疑，但这股浪潮的规模和汹涌程度，确实可以与“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浪潮媲美。也许，从长程历史的尺度看，这些国家并不一定具备了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但他们确实共同选择了抛弃共产制度的前程。

这股浪潮与“后毛泽东时代”极权体制的衰微相遇，形成了中国70年代末期的“自由化”浪潮。由此触发了共产主义世界的改革扳机。到80年代末期，共产主义国家的自救运动，已经成为这个浪潮的一部分，并跃居前沿。

比中国幸运的苏联，对现行制度进行的改革在高层没有分歧。分歧只在如何进行改革、如何确定改革的规模和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新闻宣传动员苏联公众直接参与改革过程等问题。一些苏联最高领导人像邓小平一样，主张采取更加谨慎而稳妥的步骤，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将重振社会经济的工作牢牢地控制在执政党手中。但是他们比邓小平更激进的认为，苏联要避免灾难性的衰落，需要进行“自由主义”的重大变革。

1988年6月，在苏共第19次非常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开幕词中把“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提高到经济改革之上。他还通过“公开性”运动调动下层社会的参与热情，用社会压力促进上层改革。1987年10月，他甚至直接向列宁格勒大街上的人们喊话：

“两年来，我们同你们一起协商、谈论、争辩和思索，试图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来解决生活本身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现在，我们必须走完这条改革之路。整个社会都必须以这些原则改弦更张。在经济管理和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实行民主。一切都必须改变！”

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思路，显然为赵紫阳所欣赏和模仿。

在“公开性”运动引发的全社会辩论过程中，许多过去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遭到公开的亵渎，多年来鲜为人知的事情被揭露；国家表面上的一致性被

打破。在苏联，这场辩论在1988年6月召开的党的第19次非常代表会所进行的电视辩论中达到了高潮。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一“完全违背了苏联固有的公众生活准则”的行为，直接“打开了公开表达不同政见的大门”。他甚至预言，“最终还会打开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

许多非正式的自发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组织起来。据《真理报》1988年2月1日报道，苏联全国已出现了大约3万个“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的未经政府批准。这些团体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对各种问题的反应，从生态平衡、城市改建、社交活动，青年音乐团体、保护历史和宗教文物，到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的问题，诸如对历史问题的辩论，与法制、哲学、民族语言、宗教活动、历史上的政治逮捕有关的问题，以及“政治一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政见等。

与“民主墙”所显示的功能一致，这些团体的出现，向那种认为社会主动性只能来源于执政党，并受党控制的传统信念提出了挑战；也向共产党在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垄断地位形成了挑战。许多团体把矛头直接对准政治领域中的问题；某些团体还创办了半地下刊物，在人权、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提出具体的要求。

步中国作协“四大”的后尘，1987年，苏联也爆发了对编辑委员会、作协、影协和主要剧院控制权的公开争夺。……一些长期遭到压制的作品受到了赞扬，并被允许重新出版；以前所定的学术罪名和受到的批判被撤消；流亡国外的著名文化人士被欢迎重返祖国。

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改革过程已经表明，旧有的官方意识形态既不能应付复杂的现代生活，又不能为对现行社会状况和新的社会需求异常敏感的创造力找到用武之地。而“公开性”辩论只不过使官方“真理的捍卫者们”处境更为难堪。人们对道德沦落问题所产生的日益清晰的新认识，为宗教复兴敞开了大门。

在东欧，新一轮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行动和政治自救也在加紧进行。

1978年10月16日，波兰出生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被选为教皇（若望·保罗二世），一年后他造访波兰，吸引上百万波兰民众朝圣。教皇呼吁尊重波兰的传统，并强调自由和人权的重要，反对暴力的行为。

1980年7月，波兰出现经济危机，超过600座工厂实行了罢工。政府决定让步，与代表劳工的工会签订了《格但斯克协议》，正式接受了包括“罢工的权利”、组织独立工会，以及允许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民主变革的要求。

1980年9月，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被解除职务。

这次大罢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催生了莱赫·瓦文萨所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团结工会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是“华沙条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独立工会组织。

1980年9月成立的独立学生联盟，1981年5月成立的农夫工会、农业团结工会都汇入了团结工会运动。从此，团结工会运动由单纯的工会运动转变为社会运动。1981年1月15日，瓦文萨率团结工会代表团前往罗马，会见了教皇保罗二世。

1981年9月，代表总人数达950万的波兰工人（约占工人总数三分之一）的团结工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瓦文萨当选主席。

1981年3月19日，发生了27名团结工会成员被殴打的事件，团结工会在3月27日发动了一次4小时的全国性罢工。这是历史上东欧国家最大的一次罢工。它使整个波兰陷于瘫痪。这迫使政府不得不展开调查。但政府态度的暧昧使事态迟迟得不到平复。

另一方面，波兰当局的软弱退让，引发了苏共的不满和波共中央内部的斗争。10月18日，统一工人党再度换马。主张暴力政策的总理（兼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登台后，颁布戒严令，建立救国军事会议取代政府职能，取缔团结工会。在随后的数年中，以各种手段对异议运动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雅鲁泽尔斯基的镇压受到国际舆论和美国的经济制裁。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为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组织提供资金。波兰民众和天主教会依然支持着团结工会。戒严法在1983年7月正式解除。政府对许多遭监禁的工会成员颁布了一次特赦令。

戒严的破产，使得团结工会的影响逐渐取代了执政的共产党。1984年10月5日，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从1986年开始，由于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苏联的内外政策开始向右转。对东欧国家的松绑，直接将苏联和东欧导入制度转轨时期。

1988年8月起，波当局与团结工会就召开“圆桌会议”问题进行会谈。1989年2—4月团结工会参加圆桌会议，获得正式承认。团结工会参政的渠道正式开启。同年4月5日，共产党政府与瓦文萨签订了一项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协议。

团结工会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它实践过程，一直为中国80年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关注，并为有志于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在野群体所模仿。它的经验也不断地，以各种形式被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团体所重复，最后导致东欧集团的解散，以及1991年苏联的彻底解体。

在匈牙利，为1958年被处死的领导人伊姆雷·纳吉的平反，成为开启新时代的引爆点。

匈牙利与波兰十分相似的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在群众中名誉扫地。它虽然在恢复政治生活方面不及波兰的自我解放运动，但迈出的步子却是最大的。

1987年，匈牙利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已成为既成事实，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在布达佩斯举行半公开的集会乃至一些示威游行活动。反对派已经能够举行非正式的讨论，并表达他们要与政府公开对话的要求。地下出版物也开始急剧增多。

1988年6月起，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成立了由专家、学者参加的“重新评价历史委员会”，重新甄别评价匈建国以来的历史，拟定了一份供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讨论的文件草案。该委员会由波日高伊负总责，下设的历史小组肯定纳吉在1953—1955年的政策是正确的。对1956年事件本身确认为是“人民起义”，是“一次反对蔑视整个民族的寡头统治的起义”。并趁总书记格罗斯·卡罗伊出访瑞士之机，将上述调查报告内容公诸于众。1989年2月匈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为1956年事件平反，并重新安葬了纳吉等人。

波日高伊认为，匈牙利以前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主张尽快“实行多党制”和“确立三权分立的西欧型议会民主”。他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记者采访时，主张建立“一个以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思想为基础的新型政党”。1989年5月，主张彻底改革党的党内激进派力量成立了“改革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组织遍布全国，成员多是知识分子，多达几十万人。这一派系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彻底更新党”。

匈牙利模式与波兰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共产党政权具有顺应时势的主动性。它用“先发制人”的方法，成功对付了来自开放社会不断增长的改革压力。他们成功地更换了自己的第一书记，让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卡罗利格罗斯替换了亚诺什·卡达尔。他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观点，让党的官员们感到可靠，这可以使改革免于失控；而他的相对年轻，则可以指望带来创新。中国的赵紫阳近似这个角色。

显然，“匈牙利模式”相对于“波兰模式”，是共产党更愿意接受的模式。为此，共产党两大巨头——苏联和中国——都把匈牙利改革作为“取经”的对象。只不过，在中国，人们更愿意向匈牙利学习经济改革的手段。他们

不仅在“承包制”的运用上可以找到彼此的亲缘关系，当改革转向更广大领域时，人们也曾将眼光投向匈牙利。

据傅高义记载：

“1980年代初，中国负责调整经济体制的官员最初想从东欧国家寻求改革模式。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南斯拉夫，1983年又将兴趣转向匈牙利把不同部门的所有计划都合为一体的‘全面改革’。中国派出两个代表团访问匈牙利，研究它的改革规划，匈牙利也派了一批人到中国介绍他们的改革经验。熟悉匈牙利问题的人认为，中国应当使用更多的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进一步向地方放权，并允许更加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

图2-1：体改所代表团拜访匈牙利财长（选自《陈一谔回忆录》）

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所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谈中也暗示道：在他看来，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说，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第二天，这位匈牙利领导人就把谈话内容转告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无疑成为了美国决定对苏政策和制订世界战略的一个重要依据。

1988年初，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民主反对派率先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在他们的国家实行民主化。第一次有300人在联合声明上签名，第二次有438人签名，其中还包括了南斯拉夫甚至苏联人。布热津斯基认为，作为斯大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以来，反对苏联统治的东欧反对派组织的联合、公开的首次亮相，这一事件构成了东欧改革进程中“心理上和历史上的重要突破口”。

1989年1月，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允许成立反对党，共产党四十年的垄断地位被打破。2月，匈牙利共产党改名社会党，放弃执政党地位。3月28日，共产党以外的候选人第一次被允许参选议员，匈牙利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击败

共产党候选人取得胜利。他们的政纲是“民主、融入欧洲、反对共产主义、保持匈牙利价值”。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奥地利的长达218英里的安全围墙。

在捷克斯洛伐克，失败的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为新的转型提供了现成的样本。那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行动纲领》中，阐述了当时捷共新领导人，特别是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提倡的思想：呼吁实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经济分散化，主张开放意识形态和全面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当时莫斯科指责这些主张是“右倾修正主义”，是为“退回到资本主义和脱离华沙条约组织铺平道路”。为此勃列日涅夫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并撤换杜布切克及其同僚。但是，1987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布拉格时，在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当人们问到戈尔巴乔夫与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杜布切克之间的主要区别时，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只回答了两个字：

“19年。”

这意味着，现在的苏联领导人认为，杜布切克只不过是超越了历史现实。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著作与1968年杜布切克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纲领》在某些方面如出一辙。

1987年，曾被以“危害共和国利益”和“颠覆共和国”名义先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8个月的“七七宪章”组织者和发言人瓦茨拉夫·哈维尔，在《东欧报道者》杂志撰文，批评了苏式“极权主义”。同年12月，捷共举行中央全会，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后上台的总书记辞职，留任共和国总统。

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20周年之际，波兰和捷克反对派组织的26名代表署名发表了一份《波捷联合声明》，要求修改《华沙条约》，以保证每个国家的主权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声明要求“公布下列文件：1968年干涉捷克

斯洛伐克的文件，1980年和1981年威胁干涉波兰的文件，1939年、1941年、1944年和1948年大肆逮捕波兰公民的文件，1940年卡廷大屠杀的文件，杀害伊姆雷·纳吉及几百名支持者的文件，有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的文件，以及有关1948年和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法庭大屠杀的文件”。

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杜布切克则在采访过程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在谈到欧洲时，“我不用‘西’和‘东’这两个字眼，……捷克斯洛伐克按其地理位置、传统和经历，属于中欧。”几十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在竭力灌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的观念，但此时，东欧人已经拒不承认莫斯科作为“文化辐射中心”的地位。

为尊重现实，1988年，戈尔巴乔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该年的6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订双方拆除和销毁中程核导弹的《中导条约》，并就尊重人权、全面控制军备等议题展开谈判，为结束东西方冷战揭开序幕。

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宣布“释放全部政治犯”，并许诺将为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纪念碑。1989年1月6日，数十万30到50年代遭遇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得到平反。2月14日，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3月26日，苏联举行1918年以来第一次包括非共党政党的全国性选举，许多共产党人被击败。被俄共中央政治局开除的激进派领导人叶利钦在莫斯科选区赢得压倒性的89%选票……

这就是1989年胡耀邦逝世前的国际“大气候”。

第二节 紫色季风

在中国，具有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卡罗利格罗斯位势的赵紫阳，应运走上了权力的巅峰。

赵紫阳，原名赵少生。1919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豫鲁冀边区第二地委书记、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国共内战中，历任豫鲁冀边区第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期间，多次在邓小平手下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因足智多谋，应变能力强，素有“南阳小诸葛”之称。与胡耀邦比较，赵紫阳缺少与中央高层打交道的经历，但具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在以后的政治事务中，他所表现出的乾纲独断的魄力，和缺乏下大盘棋、进行周密部署的能力，多少与他的这一政治履历有关。

中共建国后，“土地改革”（简称“土改”）成为一时之中心工作。由于广东土改进展的迟缓，被中央认为右倾，1951年4月，赵紫阳被调到广东加强对土改工作的领导。1951年5月中共华南分局第33次常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原主任“下放锻炼”后，赵紫阳成为广东土改的实际负责人。

同时，赵紫阳还兼任中南局下属的华南分局俱乐部 秘书长，在分局书记叶剑英、方方的领导下工作。在叶、方的“右倾”问题受到批评后，1953年5月叶剑英正式调离广东，陶铸接管华南分局。赵紫阳在陶铸领导下历任办公厅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华南分局副书记，最终成为陶铸在广东的副手，时年34岁。是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之一。

1956年5月，由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任组长、赵紫阳等任副组长的“广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借“反右”之风，摧毁了原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所谓的“反党集团”，“彻底搞掉”广东的“地方主义”。

1960年后，赵紫阳走上“封疆大吏”的职位，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曾兼任广东省军

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在赵紫阳与陶铸共事的15年中，二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赵紫阳后来说，他对陶铸“永生难忘”。

据赵紫阳与索尔兹伯的谈话，他曾于1963年见过毛泽东主席，并进行过谈话。

与胡耀邦在湖南和陕西的经历相比，赵紫阳精明强干、作风强势，熟悉经济工作，从一个地区级干部一路登上“封疆大吏”位置，显得势如破竹；而胡的经历则显示了他对那个时代的不适应、不成功，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黯然失色。

文革中赵紫阳也受到冲击，曾下放工厂劳动。1971年4月被“解放”后，历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以后，随着历史车轮的加快，国家又当用人之际，进入盛年的赵紫阳也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仕途也随之步入了快速升迁轨道。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8月，赵紫阳在中共“十大”上始任中央委员。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事件爆发，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赵紫阳，“发动全省开展批判，大小批判会开了有一百多场”。但他允许被批判者反驳和贴大字报辩论。给人留下开明印象。

1975年10月，赵紫阳从广东被派往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我们虽然不知道赵的被重用是否与邓小平的举荐有关，但二者的履历确有“正相关”踪迹可循。据闻，赵紫阳也正是在此时与邓结下了后半生的不解之缘：

赵紫阳去四川赴任前，曾与邓小平在北京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对他说：“去四川后，要放开手大胆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当时，邓小平还同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启允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但不巧的是，在一个月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这句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揭发了出来，邓小平由此被戴上了一顶恶名昭彰的“还乡团”的帽子。

而赵紫阳没有向“四人帮”派出的调查组供出真情。这件事后来被邓知晓，使得“邓小平觉得赵紫阳这个人值得信赖。”“六四”期间，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向他表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反对邓小平，想必是希望与邓小平再续前缘。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8月，赵紫阳在中共召开的“十一大”上被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2月，邓小平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赵紫阳被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由此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在1978年的“平反冤假错案”浪潮中，广东“反地方主义”案发。但这一案件的平反呼声并没有阻挡赵紫阳在1979年9月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常委汪东兴的辞职请求被批准，赵紫阳进入常委。8月，赵紫阳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接替了华国锋的总理职位。1981年6月，赵紫阳成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由此进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行列。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大批老人退出一线工作但还要管事的局面，促使中央采取“书记制”。赵紫阳虽没有进入书记处，但已是中国80年代改革决策中枢的六名常委之一。这六人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六人中只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比较年轻。

赵紫阳的稳步上升，与中国80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及改革所选择的模式是分不开的。同时，他在漫长的基层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出的坚定性、灵活性——这些个人素质表明，他曾经是邓小平所寄望的，最有可能帮助他实现其改革目标的合适人选。他的“反右”经历，尤其是在改革思路上的“中体西用”原则，“政左经右”的手段，和“权威政治”的风格，甚至某些时刻表现出的“实用主义”色彩，是政治局常委中

最接近邓小平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甚至不妨猜测，邓小平对这位“接班人”的欣赏，完全是因为他在赵紫阳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

就连八九民运后赵紫阳被软禁的那段时间，被派往他身边的王秘书也说：

“我以为中国党内领会小平精神最好、贯彻最得力的，除赵紫阳外，别无第二人！”

鲍彤证实：

“1980年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学潮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可以说，对赵紫阳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两个人合作得很好。”

麦克法夸尔也有同感。他说：

“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

在六人中枢里，赵还具有“最年轻”优势。加之他的善于平衡左右关系，审时度势韬光养晦，抓住机会迅猛出击，这使之成为毫无悬念的、最具竞争力的主政接班人。

第三节 重整河山

赵紫阳很早就明智地知晓，作为一个从地方上来的干部，他在中央缺少深厚的人事资源。在主持经济工作时，他不可能消化陈云、周恩来的班底，

因而倚重高岗“经济内阁”大将 另起炉灶，绕过国家计委的老人班子。依靠鲍彤，他网罗了“文革”后新生代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任总书记后，如何消化耀邦的班底？特别是摆平思想文化理论界“雷区”？至少在胡耀邦辞职被正式批准前，他就已经开始考虑。如果能顺利收编耀邦旧部，他才有最后与保守派叫板的资本，至少平稳渡过眼前的“权力真空期”。

如前所述，早在胡耀邦的辞职被正式批准以前，邓小平已经为胡耀邦下台至“十三大”正式召开期间安排了一个过渡班子，代行政治局常委职能，这就是由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组成的“五人小组”。1987年1月7日，这个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研究批评耀邦的生活会议如何开。赵紫阳事后说，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问题）很有兴趣，但他“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但根据邓力群的文字，不提“团派”，是邓小平在1月4日的会议中已经提出的要求。 赵重申这个提议，可见他对“团派”势力的整合，还是重视的。

大概也是出于整合团派的考虑，这个被认为“从不保人”的人， 在关键时刻还“拉”了胡启立一把：

“（1月4日）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

赵紫阳当时似乎还不知道，胡启立实际上是邓看好的隔代接班人和受邓直接指挥的人；胡启立调京，也不是耀邦提议，而是邓的提议。赵始终认为，是他，再次给了胡启立政治生命：

“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

赵紫阳的这个断言，从十三大两个报告合并由他一人作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在赵的重整河山计划中，最重要的还是胡耀邦的态度，和那些“战斗情绪”高昂的思想理论界人士。所以，借“五人小组”委托他通知耀邦的机会，他特别对耀邦谈到这个问题。

赵紫阳回忆说：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

他还引导胡耀邦如何考虑检讨自己：

“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

胡耀邦对赵的承诺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在“生活会”上，他也践行了自己许下的诺言，这无疑给了赵进行“重新统一”一颗最大的定心丸。

另一方面，经过邓小平做工作，赵紫阳也得到来自万里和杨尚昆的支持。不过，邓小平虽然信任赵，但还要进一步看他的行动。据赵紫阳回忆：

“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任命滕藤为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彭佩云兼任校党委书记，刘吉为党委副书记，组成新党委。在免去撤销方励之的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时，也免去中国著名的超导专家管维炎校长、党委副书记、研究生院院长等职务。理由是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使科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受到很大削弱，对这次学生闹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严重的失职。次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坚决同一切违背党章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不管是谁，如果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对于少数不顾党的组织一再警告，恣意妄为的，严重危害党的人，要坚决清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当地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作出决定，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党籍。后又借方励之被调往北京天文台为由，取消了他合肥市的“区人大代表”的资格。

在北京，邓力群带着新任部长王忍之亲自到中宣部，当着朱厚泽的面宣布朱厚泽被免去中宣部长的职务。

同时，全国各地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文章批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把自由化泛滥和学潮的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文化、新闻、出版界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尖上都受到巨大冲击。并再次掀起清理报刊杂志及重新登记的风潮。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报刊或被点名批评、或遭停刊改组。

但是，赵紫阳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目前所打击的，正是他今后的改革必须依靠的力量。他不会不明白，“保守派”势力不可能成为其改革蓝图的

“执行力”。所以，在推行邓小平“反自由化”指令时，他一直在考虑如何收官。赵紫阳回忆道：

“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为此，在起草《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时，赵紫阳和邓力群发生了冲突。邓力群组织人马起草的初稿，力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乡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据说，胡启立对这个稿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赵紫阳也没有提什么意见，而是让鲍彤组织人另起炉灶，然后直接交邓小平过目。邓同意后，赵紫阳才召开书记处会议，说“这个文件小平同志已经看过，同意了，请大家讨论。”有邓小平的明确态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明知这是利用邓的权威来压服他们，但已不便再行纠缠，只好作罢。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中共中央四号文件颁发了这个《通知》，明确提出这场“反自由化”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对于如何将这一信息传达下去，赵紫阳颇花了一点心思。他说：“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下去。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相串门，传播消息。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

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的社论，在重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原则下，突出划定了种种界限。

这些措施，对胡耀邦之后的权力平稳过渡，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严家其回忆：

“80年代初，于光远在社科院组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苏绍智任副所长、张显扬任马列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不赞成于光远组建这个研究所，认为于光远找的人是打着‘研究马列’的名义，批毛泽东思想。由于苏绍智、张显扬与王若水关系密切，在‘批毛’方面互相配合。王若水因发表《为人道主义辩护》和关于‘异化’问题的文章，在‘清理精神污染’中，被撤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职务，但保留党籍。到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在点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名后，要求开一个‘坚持自由化’的人名单，让接替胡耀邦当‘代总书记’的赵紫阳来处理。”

“这12人 为首的就是于光远，其它一些人在于光远多年的朋友、同事，如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孙长江、李洪林、于浩成、吴明瑜。于光远知道此事是邓力群使坏，写了一封信给赵紫阳。赵紫阳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圈，批了一句话：请小平、陈云、先念、彭真、一波、启立、纪云、乔木、力群、鹤寿阅。邓小平先看到报告，划了圈，陈云亦随之圈了自己的名字，其它人包括邓力群在内只好依样画葫芦，于光远就这样从‘自由化’名单上删了去。”

对此，赵紫阳回忆道：

“邓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当时我按四号文件的精神，建议对于光远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作组织处理。1987年3月2日，邓问我对张光年如何处理，我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的方式解决为好。当时名单除了于光远还有几个人，也没有通过。

但中纪委的人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待下次讨论。因而那时并没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这次反自由化中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刘宾雁和张显扬。吴祖光原定开除党籍，后定为劝退。王若水由劝退改为除名。苏绍智原来名单上要开除党籍，我提议改为撤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孙长江原定开除党籍，后因聂帅讲了话，没有处理。”

在开除党籍的行列中，还有在1984至1985年“整党”中因“三种人”被撤职的阮铭。

邓小平让赵紫阳处理“12人名单”，实际上是给赵紫阳一个下“投名状”的机会。赵只有“杀掉”自己人，才有可能死心塌地成为他的人，从而也只能以他人为“自己人”。邓的心思，聪明的赵紫阳岂能不知？所以，他也被迫“杀”了一些耀邦的人：

“……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公安部的阮崇武。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

他一方面与邓力群一派周旋，一方面还要让邓小平放心。对此，他事后曾对杨继绳有一段交代：

“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

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一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

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还邀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分表达意见。

为了给“保守派”一颗定心丸，赵紫阳甚至鼓励邓力群领导的书记处研究室“还要存在，还要发展”。邓力群回忆说：

“赵紫阳提出来，最好把书记处研究室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对此还讲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我当然同意了。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一些批示和说法，什么书记处研究室功劳大、人才济济啊。后来就在研究室内部讨论了。讨论之后，5月18日给胡启立、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

赵紫阳的橄榄枝令研究室人员喜出望外。

在大政方针上，赵紫阳则突出强调“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

第四节 横扫“保守派”组合拳

胡耀邦的下台，给保守派带来了重掌话语权的幻想。但赵紫阳对保守派的敷衍，很快便令双方在“倒胡”问题上的暂时联盟瓦解。据赵紫阳回忆，事情起因于保守派的进攻：

第一件事，邓力群的干将，时任中宣部长的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对

于邓小平提出的今后任务“主要是反左”，该部的一些局长暗中互勉“要坚持顶住”。他们认为，“现在胜负未分”左右终有一决。

第二件事，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赵紫阳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并为自己的这种“和稀泥”本领暗自得意。不料，中宣部理论局长卢之超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部署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关系问题。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

第三件事，1987年4月5日至12日，邓力群、胡乔木控制下的《红旗》、《文艺理论与批评》和《光明日报》三个单位在河北涿县召开“组稿会议”，参加者120多人。整个会议充满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氛，算总账的情绪高涨：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白羽阐述了从1979年3月到1987年春天，共五个回合的斗争；说这八年是噩梦一场，是马克思主义者受压的八年。《红旗》副总编辑马仲扬强调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会议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正在形成。现在需要大家拿起笔来，在大量掌握材料，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批旗帜鲜明、说理透彻、战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评论文章。因此拟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1987年3月，邓力群直接领导的书记处政研室成立“反自由化”写作班子，办公地就设在中央办公厅厂桥招待所一楼，亦即鲍彤领导的“政改办”的楼下，两个势不两立的单位人员在一张屋顶下办公，都在同一个餐厅就餐！这个班子夜以继日地收集拟定的12名自由化分子已发表的文章，摘录、拼凑其中的一些语句，整理了一份《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摘编》，炮制大块批判文章。在送交赵紫阳前，又加上了鲍彤的材料，形成一份13人名单。

这最后的一举，无异于与虎谋皮！

赵紫阳回忆道：

“他们还散布一种论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还说，‘思想理论领域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

不管细节是否准确，邓力群们一心“反自由化”，积极推进对“自由化”分子的组织处理，给改革开放制造障碍，给一心重整河山的赵紫阳带来了压力，是可以肯定的。

赵紫阳曾坦言，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务，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他不仅“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他承认：

“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

赵紫阳调看了“涿州会议”和邓力群天津讲话的材料，于1987年4月28日上午向邓小平做了一次汇报。并对邓小平说，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对这个问题十分警觉，要赵紫阳开一个会，刹一刹左派的威风。他自己则在次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时发表谈话，说左倾危及经济改革，1957年以来，左倾使中国犯了许多错误，几年来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左”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因此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针对香港有媒体散布，赵紫阳已经“不管事”的谣言，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保加利亚领导人托日夫科夫时特别提到，“现在管事的是赵紫阳和李先念”，公开表示对赵紫阳的支持。

5月13日赵紫阳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四五个月了。在全党的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赵紫阳的“五一三”讲话，将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来了个急刹车。

事后，有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形容：

“赵紫阳一巴掌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量打翻在地，应声而起的是一片反‘左’的声音。思想文化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下子改成反‘左’。从这以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就来了个大逆转。”

此时的赵紫阳审时度势，认为打掉保守派意识形态堡垒的“时机”已经成熟。而胡乔木此时已经不成问题。如果要斩其蛇首，必要拿邓力群开刀。

他回忆说：

“在3月间，我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当时我觉得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陈云当时没有表示，经过一天考虑，他通过秘书告诉我：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我的意见。”

但是，真正让赵紫阳产生紧迫感，用心思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另一件事。赵紫阳说：

“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 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此后，赵紫阳布置胡启立收集邓力群的材料，并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1987年5月18日，书记处研究室根据赵紫阳此前的建议，递上了一份关于政研室“发展计划”的报告。 5月24日，赵紫阳批示“缓办”。

6月2日，胡启立报告赵紫阳，由邓力群主持起草的通报“倒胡生活会”的中央3号文件的补充材料之四、之五被人做了手脚。赵紫阳未作调查即于当日批复：“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该追查。” 不久，此事先在国内传开，后又 在香港媒体上被大肆炒作。邓力群威信骤降。“左王”雅号不胫而走。

随后，赵紫阳在讨论“十三大”人事安排时，正式提出了处理邓力群问题的方案：

“我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李锐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反映了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像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很快作出了邓力群不再主持宣传战线工作的批示，并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来了。”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职权的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我当时建议由胡启立

接管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

对比四个月前，赵紫阳关于研究室“还要发展”的指示，这个180度的大转弯，不可能不给相关人员带来极大的震动。

吴稼祥在《泡面传奇》中的描述，生动而贴切地表达了相关人员的感受：

“……撤销书记处研究室，邓力群失业了。同时失业的，还有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她当时任该室营养组组长、科技组顾问，宋平的夫人陈舜瑶，任室务委员，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邓小平大秘王瑞林的女儿……除了失业的，还有失去娘家的，比如薄熙来，他就是从这个研究室到大连金县挂职副书记的，等他回到北京，想去看看原来的单位，找不到了。这一下，无异于捅了马蜂窝，所有与它血肉相连的人和群体，想必都有要蜇紫阳的冲动。这一次，陈云没有让紫阳收回成命，但紫阳用来取代这个研究室的政治改革小组（13大后升格为政治改革研究室）应该是成了他老人家的眼中钉肉中刺。第一，这个研究室从诞生到结束，都没有进入中南海，一直窝在中办厂桥招待所，第二，室主任鲍彤最后锒铛入狱。紫阳本人呢，自然被列入围猎名单。”

邓力群对此似乎还看得开：一来因为研究室内部的矛盾和与总书记的关系紧张，他早想摆脱这个摊子；二来他认为，“研究室是中央的一个工作机构，是领导同志的一个助手单位。每个领导同志，特别是第一把手，都需要组织适合他自己思想和工作习惯的助手机构。”他认为，赵紫阳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权力。但对比此前赵紫阳对研究室的表扬，他认为赵有“两面派”的嫌疑。事后，邓力群甚至欣慰地回忆说，通过解散政研室，他手下的人马分散到中央一级的二十几个单位，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就有十几个。在这些人中，和他观点一致的，在后来发生的“八九事件”中，“没有一个表现不

好的”。言外之意，化整为零的书记处研究室，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记处政研室被端掉以后，紧接着，赵紫阳又命令《红旗》杂志停刊。由书记处主管降为中央党校代管，总编辑职务由正部级降为副部级。

对于赵紫阳的这一系列行动，陈云都没有干预。但他对赵做了两次提醒：

“一次是通过薄老转告，一次是亲自找赵谈……陈云建议的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你责任重大啊，死了多少人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耀邦没有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现在由你来承担，你一定要想到牺牲了几千万人，要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去啊！他还按着赵的肩膀说：你身负重任啊！第二点，陈要赵好好学哲学……哲学、世界观的问题不解决，你的责任就承担不好。”

赵紫阳也意识到陈云的话的针对性。

尽管如此，赵紫阳扫荡左派势力的组合拳，已经是离弦之箭，无法收回。接下来就是在中共“十三大”上宣读“最后判决”了。

赵紫阳回忆说：

“邓（小平）在那次会上也说了，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在筹备十三大人事时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见办的。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空气浓厚，而邓力群‘左’的名声在外；多年来与改革开放唱反调，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员的预选中，邓力群就落选了。这一情况邓小平知道后，表示要尊重选举结果，这样邓力群也就进不了政治局。”

邓小平希望邓力群能到中顾委继续发挥作用，指示让他进中顾委常委，但在中顾委常委的差额选举中，他又落选了。

在“十三大”代表选举中，中宣部长王忍之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党代表选举中落选；左营干将徐惟诚亦在选区落选。在中央委员选举中，积极主张

“反自由化”的邓力群在1936票中仅得1600多票，因“反自由化”不利而下台的胡耀邦却得了1800多票。在随后的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选举中，胡耀邦在173张选票中得166票。据传，在没有投他票的7人当中，有胡自己的一票。而在中顾委常委选举时，在187张选票中，邓力群仅得到85票。胡乔木勉强当选中顾委常委，也只有135票。虽然这个选举结果有派别活动的痕迹，但基本可以说明党内的政治气候。

从处理“自由化人士”的壮士断腕，到横扫“保守派”的组合拳，赵紫阳在这一连串动作中显示了他的魄力和铁腕。但也由此给自己的执政前途留下了两大隐患。一是在后来发生的八九事件中，来自自由营垒的“不合作”；二是来自“保守派”的倒阁行动。赵紫阳事后说：“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第五节 新权威——风动、幡动与心动

1987年9月，在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赵紫阳当选为总书记。原政治局常委中，只剩下赵紫阳一人；老人全部退出“一线”：邓小平改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改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而另外两个国家要职，国家主席由杨尚昆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万里担任。新班子中，除了1917年出生的姚依林已年届七旬外，赵紫阳68岁，乔石63岁，李鹏59岁，胡启立58岁。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成果，中国共产党总算可以宣布已经实现了领导班子的“年轻化”。

但是，这一切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老人们依然可以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决策，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提倡“年轻化”最力、主张老人“退休”最坚决的邓小平的决策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被确认。并且，这种挽留不是出自别人，

而是赵紫阳本人力主的。据赵紫阳事后回忆，这不仅是出于对于老一代革命家的代表人物的尊重，而且有相当的功利考虑：

“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

但是，邓的决策地位的确认，在党外政治生活中并不为人所知。1987年1月1日，在“十三大”最后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朱穆之在答记者时说得比较隐晦：“邓小平在党和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并不是他在党内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决定的。”

隔日，在新当选的常委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赵紫阳的回答也相当暧昧：

“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

至于它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人们并不清楚。明哲保身者深谙这一“低调”对于安抚“老人帮”的重要性。但改革者也很少人意识到，这一暧昧，在即将到来的事件中，会造成何种冲突和灾难。

赵紫阳认为，在许多关键时刻，邓一贯是支持他的。此刻，他也毫不怀疑，他还将一如既往地对他支持到底。

1987年9月25日，赵紫阳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采访时，聚光灯下的他显得踌躇满志。“十三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更是异常耀眼的一幕。请看吴稼祥的描述：

“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都能记得一个瞬间：13大闭幕，5个常委接见记者，紫阳走在最前面，后面依次是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5人都西装革履，传递西方化的强烈信息，都手端葡萄酒杯，要表达大功告成，都满面春风，要显示从容自信……5个人不是呆板地站着，而是绕场漫步，与记者

们用眼神、微笑或举杯打着招呼，紫阳更是主动靠近记者，不是宣布真理或宣言，而是亲切交谈……”

“还没有拜高堂，就入了洞房，电视上的笑语，听上去，更像是叫床。……十三届一中全会上，紫阳确实讲了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请教，由他拍板，但仪式呢？没有拜高堂的仪式，在场的贺客们，谁知道谁是最尊？到底是真把自己当婆婆，还是假的？”

关于邓小平当时的心理，做这样的猜测我们没有多少凭据，但对于退休的“老人帮”来说，许多人不舒服是可以肯定的。赵紫阳注意到，在他作“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云中途退席。后来他询问过，陈云身体没有问题。而在“十三大”召开前，薄一波曾明确向他提出，希望能保留为筹备“十三大”而成立的以他为首的“五人小组”，以便老同志继续发挥余热。据《人民日报》报道，薄一波在视察天津时，也曾着重谈论“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发挥老同志作用”的问题。他认为，在提拔干部的指导思想，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有的老同志身体尚好，应当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选拔干部首先要讲革命化，讲知识化不能只看文凭。对于薄一波的这个要求，赵紫阳仅以“事毕人散”一口作了回绝。

老人中最为不满的，恐怕要数这次内定“全退”的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因为以“年轻化”为名的改革为他安排的继任人杨尚昆，比他还大两岁！这种安排，与杨向邓小平承诺支持赵紫阳是分不开的；与他的军职晋升因邓小平的留任而受到阻碍也是分不开的。因此也可以看做，出任国家主席，是邓小平对他的一种补偿。但李先念的这个纠结，注定将在以后的事件中爆发出来。

与此相反，在社会上，“十三大”的开明气象，给知识界带来新的参政议政激情。其中最重要的建议，便是“新权威主义”的出笼。

“新权威主义”概念是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引伸而来。其基本观点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不够的社会，现代化过程需要政治上的安定，需要有引导变革的权威，这种权威是权力集中于某些特定个人或团体的“新权威”。年轻学者王沪宁、张炳九等受亨廷顿理论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启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走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化道路，亦即用半集权或集权的政治体制保证变革社会的安定，促进经济商品化快速发展。赵紫阳在上位以前，也接触到亨廷顿的思想，并表示过对它的关注。

在“倒胡”问题上一直强调“靠制度”而不是“靠个人”，希望在领导制度上解决问题的赵紫阳这一回有些心动了。面对经济改革中一大堆纠缠不清的难题，他明确流露了对这一主张的兴趣，并试探了邓小平：

“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以后，赵紫阳在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和香港张五常教授时也表示：

“若一个领导人不能被充分授权的话，就无法推动经济改革”。

这可以看做赵紫阳心迹的一次表露。

但经历过毛泽东专制独裁统治、身心饱受摧残的知识界人士，一听到“新权威主义”，立即便将它与“独裁”与“专制”进行联想。他们的第一

个反应，就是坚决反对。其中不乏据理力辩，但也掺杂不少情绪性的上纲批判，据说，在一次主题讨论会上，“新权威主义”的主要阐释者“吴稼祥如背芒刺，饱尝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滋味。”

事后，赵紫阳在口述回忆录时谈到这件事时并不想和它扯上关系：

“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

造成赵紫阳“心动”的另一次激励，是轰动全国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播出风潮。

继1983年播出《话说长江》收到良好社会反响后，中央电视台开始策划介绍运河、黄河等祖国风貌的巨片。但由于黄河在中华文明中的“图腾”地位，以及上世纪80年代强烈的“反传统”、“反专制”思潮，此片的写作多有曲折。当时物色的作者均极富忧患意识，他们不可能不在这样一个绝好的题材中表，达自己的政治历史和艺术主张。在前有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历史“超稳定系统”研究的传播背景，后有陆一发起的关于“球籍”讨论的危险警策，1988年问世的《河殇》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性格。这些时髦的思潮，在总撰稿苏晓康的极富情感穿透力的文字和编导陈汉元、夏骏的现代蒙太奇表现手法烘托下，让历来只能看到“新八股”式的大陆电视宣传片的观众耳目一新。据说，《河殇》的脚本一出，五百多万本即被抢购一空。“晓康体”由此成为一种崭新的煽情文体，在报告文学界当红一时；夏骏的“河殇体”则为后来的《世纪行》、《大国的复兴》等大型政论片所继承。

《河殇》将黄河与中国汉族文化中的图腾——龙——联系在一起，借批评黄河的暴虐抨击东方专制主义；借批评黄河的浑浊、凝滞批评中国的“酱缸文化”和人种的“圆滑事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借黄河与长城的形象批评统治者的闭关自守；借对传统文化及“国民性”的批评影射中共执政

的历史；借展现“大河文明”的衰败，讴歌“海洋文明”的昌盛……，它用艺术的手法，把思想文化领域中研讨的一时之成果展现于大众。

这样一部作品，根据后来的资料看，其实在构思到组织实施阶段都与赵紫阳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播出后，赵紫阳的确罕见地干涉了对它的批评。据一篇署名“靳人”的文章说：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在文艺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我有个基本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他还特别声明：‘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对《河殤》这个作品，他不仅介入了，而且三番几次地介入……去年夏，《河殤》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赵紫阳同志对《河殤》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五百套录像带，广为发送。……不久，一位友好国家的总理来华访问，赵紫阳同志特别送给他一套《河殤》的片子，并推荐说：值得一看。”

以后，他不仅抵制了王震的批评，还亲自阻止了署名“易家言”的批评文章发表。

据说，赵紫阳送《河殤》的那位外国总理，实际上就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按说，新加坡社会华人居多，在那里保留了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赵紫阳不会不了解，在80年代的政治改革讨论中，人们曾把新加坡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和“政治专制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的范例。因此，把一部以批评中华传统文化和专制政治为主调的电视片送给新加坡总理，着实有些耐人寻味的地方。

后来的批判者认为，赵紫阳属意的，其实是《河殤》的第四集《新纪元》。这个由体改所张钢执笔的专集，对“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图像的阐释，令人印象最深刻之处，莫过于在出现赵紫阳

特写镜头时，屏幕推出了“新纪元”三个大字。无需猜测，这一手法，对于已经不需要再“低调”行事的赵紫阳，当然是愉快的。

正是因为有赵的干预，《河殇》经历了停播、复播的曲折，此后风行全国。

由于作者随心所欲的历史引证方式、对有争议的西方理论的盲目引用，以及粗枝大叶的结论，这部电视系列片受到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批评。但美国也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高度赞扬了这部片子，说它“出色地运用影像技术，从历史和哲学上对中国文化的处境做了非常有震撼力的论述，它在修辞的力量和概念的精确性上所达到的水准，即使在西方电视纪录片中亦罕有其匹。”《河殇》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这场风潮的后果，不久就显现了。

1988年9月19日下午，赵紫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会见。

弗里德曼因创立消费函数理论、货币历史和市场稳定政策而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货币理论影响了尼克松以来的三届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他提出的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经济运行的自由市场理论，已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接受。据当时陪同弗氏访华的香港经济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助手、著名时评人士林保华回忆：

“1988年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正在闯价格改革的难关，由邓小平发动，但是引发抢购与通胀时，却把责任推给赵紫阳，因此赵在党内受到‘八老’与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的围攻，地位不稳。十三届三中全会宣布要治理整顿，更显示改革可能倒退。弗老是货币学派的大师，这正是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张教授就有意安排他与赵紫阳见面，提供意见。”

这次会见在中南海紫光阁进行，从15：00—17：00，持续了两个小时。据赵紫阳回忆：“我在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谈话时说，我们最大的

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无处不在，但产权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谁也可以不关心。那时企业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提出股份制也是这个意思。” 弗里德曼则就通货膨胀、价格改革、和企业效应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主张大刀阔斧的继续推行改革，解除对市场的管制。

据称，“双方不但谈得投机，而且相互欣赏。” 弗里德曼认为，赵紫阳不仅懂经济，而且对经济的了解很深入。

赵紫阳去世后，已经94岁的弗里德曼对这次会晤仍然记忆犹新，他写道，1988年9月19日我与赵紫阳的难忘会谈，他给我留下了高智慧与高品格的印象。我历来相信，一个人对经济的感受是天生的，不是从教育学得。很多智慧了不起而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经济学者，只懂得经济学的词汇，但却听不到其中的音乐；有些人没有受过经济学教育，但却对经济有着很好的直觉。赵紫阳给我的印象是后一种人，他展示着对经济情况的老练理解和对市场运作机制的熟悉，又知道中国还要有大的改进，对改革的各种建议和考虑敞开大门。……

弗里德曼最后写道，赵紫阳作为总书记，不是为了毁灭共产党。他深信扩大市场机制的运作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巩固党的权力与稳定。他不认为党因此而要控制经济发展的细节，而是为了党，他们要改进人民的生活与福利。我同意他相信的多种市场机制会改进民主，但不同意会同时巩固党的地位。然而，我对他的诚意却并不怀疑。

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据林保华称，这次会谈结束后，张五常似乎产生了某种可称为“赵紫阳情结”的感情。他回香港后便提笔写了一些热情赞扬赵紫阳的文章。

会逢“新权威主义”讨论的走向高潮，这年的9月21日，恰好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90周年。在《求是》杂志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人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以“光绪”与“慈禧”暗喻赵紫阳与邓小平关系，主张中国现

代化需要“乾纲独断”的政治强人。还有人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称：“中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把党政军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个领袖——赵紫阳的手中”。

1988年10月31日，香港《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上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一文。文章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

11月号《解放》杂志刊登了陪同弗里德曼同赵紫阳会见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返港后发表的一些言论和文章。张在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时表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随后，他又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假若赵紫阳是个独裁者》。文中称：要改变中国二百年来的悲剧历史，只有进行“独裁改革”，“邓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将中国今后经济改革的问题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是很自然的”，赵即便拥有过去八年的权力还不够，要有蒋经国那样的权力，中国才有希望。港刊评论，“这也暗示赵的权力要超越邓。”一时间，“光绪”要结束“慈禧干政”的流言广为传播。

这些动作，后来均被“保守派”作为赵紫阳集团“倒邓保赵”的罪证。“六四”事件后，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所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赵紫阳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大概指的就是这类文字。但是，事实与陈希同所说恰恰相反，在与弗里德曼会见时，赵紫阳不仅没有贬邓，还以澄清的口吻说到：

“最近，香港报刊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

赵紫阳深知，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他玩不转这个党。但如果邓小平支持，可以预料，他也不会拒绝“新权威”的角色。

第六节 价改闯关——赵紫阳的滑铁卢

林保华注意到，当赵紫阳恭送弗里德曼走出紫光阁时，他的表情并不轻松。

此刻的赵紫阳，的确正陷落于政治与经济事务的双重危机中。价格改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配套政策措施明显准备不足；经济松绑和市场空间的拓展，要求党在所管领域的权力消减，但刚刚失去权力的“保守派”正等待契机蓄势反扑。而最为诡谲的是，经济决策权仍在赵紫阳之手，但国务院总理李鹏与赵紫阳并不一条心。这不能不使他面临“有心无力，动则得咎”的尴尬境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价格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改革走到这一步，赵紫阳也认识到，两种体制的并存，两种价格体系的存在，的确是造成政治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在这种“双轨制”下，国有企业仍可以很低的“补贴价格”获得生产资料，而其它企业则必须用市场价购买。这使得那些能低价获得原材料的人，可以低价买入高价售出，从价差中牟取利益。据记载，在1988年某宾馆，一张50吨的钢铁订单，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还没有出宾馆就倒手五次，价格从700元/吨翻到1500元/吨，每位中间人都可以从一次倒手中获得5千到1万元。还有记载说，当时，“双轨价格”价差最大的时候，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600元。由于政府缺少必要的配套措施，这便使许多有权分配原材料或者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都开办了公司。1986年注册的公司数量为17万，到1988年就猛增到40万。其中包括国务院办的700多个公司。1988年彩电供应极为紧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计划价格的彩电到市场上卖，可以赚上千元。商品越短缺，价差就越大。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

率、外汇汇率都是双轨的。为了得到计划价格商品、贷款和外汇，不法分子向掌握商品销售权、贷款权的人大量行贿，普通人则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干部子弟则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得到计划价格商品后，按市场价格出售获取暴利。许多新开的公司既没有资本投资，也没有办公场所。这些公司唯一的业务就是权钱交换，经济学专用术语叫“寻租”。

但是，在现有的权力关系下，赵紫阳并不急于改变现状。在1987年9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1988年计划时，他提出“1988年要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突出的是稳定物价”。

但是，形势不让人。

十三大刚刚结束不久，11月下旬，上海、天津等20余个大城市再次实行鸡蛋猪肉配给制度。北京亦于12月份跟进，每月每人2斤猪肉，每户5斤鸡蛋（议价品不在此列）。这些措施令人们对物价问题的神经再度绷紧，一时间成为社会最关注的话题。尽管政府千方百计向市民解释，与大家对话，但面对几乎无价不涨的市场，配给外食品（特别是菜蔬）的价格飙升，这一切导致城镇居民有限工资入不敷出，难免不生出不满和恐慌。

高皋女士记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家老字号咸菜店，过去毛把钱一斤的咸菜已涨到1.80元至5元，一位老太太拿出3毛钱要买咸菜，售货员不卖给她，还调侃道，“大妈，3角钱您还买咸菜？！连个咸菜毛也买不了！”老太太最后说，只要尝尝咸味就行，售货员回道，“那您不如买盐去！”

图2-2:1988年抢购风潮（选自《海南纪实》）

从3月份开始，武汉、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居民在一片涨价的蛊惑声中大肆抢购食盐、手纸、火柴等生活必需品。有人通过各种关系囤积了200公斤食盐；有户人家囤积了400盒火柴，因而导致了一场损失惨重的火灾。

物价改革，冲击百姓生活，扰乱社会秩序。是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明显失误，也是那场改革的“终结篇”。但事后，中央并没有对这次失误进行责任追究，相反，倒是在民间谣诼纷纷。

有一种说法是，鉴于价格改革的火烧眉毛，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于1987年下半年在香港向经济专家和金融界人士请教物价问题和货币贬值问题，并构思出一个物价改革方案报送中央。

面对现实，急于用成功的改革为自己的执政生涯画下句号的邓小平认同了李铁映的构想，决定以大无畏的气魄迅速闯过经济改革中的物价关卡。他频频发表意见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的风险。

另一种说法是，田纪云应对这次价格闯关的方案负重要责任。据何维凌回忆：

“‘体改所’从成立之日起，到1986、1987年经济改革的黄金岁月接近尾声止，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入手处——先搞价格改革（第一入手处）还是先搞企业自主权改革（第二入手处）——论证如何过渡。此间，中央决策多在这两个改革入手处之间来回晃荡，‘体改所’的论证也随之起伏……”

“可惜，对于以上两套入手处……中央却实际上已悄然作了决策：‘哪壶不开提哪壶’，取了下策——先动价格，终于出现了预料的危机，把改革引入死胡同。”

“对于价格体系的改革，中央让价格改革小组拟定第一步调整方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先动农副产品，还是先动原材料价格。小强等‘发展组’的人，都坚持先动原材料价格，使官价上浮，向市场价格靠拢。这样有助于强化对生产领域的市场调节，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同时不会猝然影响人

民生活，不至于引起全社会过大的反响。然而，田纪云，这位赵紫阳从四川带来的‘理财’专家，当时负责抓价格改革，却坚决主张先动农产品价格。他的主要理由是政府长年对农产品价格补贴，负担越来越重，现在亟需卸下（至少减轻）这个负担。显然，调整农产品价格的结果是嫁祸于民——对原来已经补贴的，直接发到城镇居民手中，以后政府不再承受新增加的负担。”

“……于是，他们与田纪云的一场小型但对全局影响颇大的拉锯战，就在赵紫阳身边展开。”

“小强对我说，他们几个年轻人几次向赵紫阳汇报，分析利弊，力陈不能先动农产品价格的理由，坚持要动就先动原材料。赵紫阳听时，不断点头，听后又明确表示同意。可是每次等他们回去之后，田纪云来了，又竭力坚持他的看法，向赵紫阳摆了一通理由，赵马上动摇。特别是因为田纪云掌握第一手价格资料情报，数字玩得精熟，而小强他们只能粗略了解，粗略估计。这就更使田纪云振振有辞。于是，三下五除二，一场倾盆大雨，把小强既已说服赵紫阳的那点‘干货’，又冲得一干二净。等下次小强他们再进言，赵紫阳又觉得他们说的有理，再一次倾向他们的看法。可是一回去，又抵不住田纪云的一通数字攻势，那一点点的推动又‘找补’回去。这么几番拉锯，最后还是田纪云获胜。于是，这个价格改革小组就短命的夭折。也实在是国家决策走向科学化的一次挫折。”

图2-3：《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封面

赵紫阳的回忆，则把这次价改失败的责任归于邓小平的压力和催促，及由姚依林负责的国家计委。大概是出于复杂的政治考量，他并未介绍上述两套改革方案取舍的决策缘由。而且，通篇没有提到放开“生产资料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争议。连“生产资料价格”这个名词都没出现。他表示，自己虽然不愿意贸然进行这场带有赌博性质的“价格闯关”，但他仍然必须听命于邓小平：

“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

他提出的这个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赵紫阳便责成姚依林负责，由国家计委具体研究实施方案。自己却在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

价格改革是否会引发社会动乱？

据说，在1988年夏季北戴河会议之前，为对付经济改革有可能导致的“国内动乱”，赵紫阳曾向邓小平建议，建立一支有“30万人的特种部队，归总书记指挥”。他说：

“除了中国目前已经拥有解放军、武警部队之外，应再组建一支特种部队”。“解放军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用于防范外敌侵略，武装警察维护社会治安，新组建的‘特种部队’主要用于防范在中国境内出现大的政治动乱。”

据称，邓小平建议政治局常委讨论此事。杨尚昆首先反对“三分军权”；李鹏则不同意在“大裁军”之后再增加军费。此后，赵紫阳似乎没有再坚持这个计划。但武警部队奉命开始组建“防暴队”。

1988年夏季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了价改方案并予以通过后，准备于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开始实施。

问题是，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方案出台前，领班的赵紫阳没有制订一套保障闯关顺利实施的纪律和步骤。于是便发生了这一幕：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早有警惕的人认为，现在公报发表了，价格闯关势必马上就要开始。有些单位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在各种信息的刺激下，一时间，“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的流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

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鞋帽到彩电、冰箱，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面对混乱的秩序，有些商店干脆连大门也不开了，只开一条小小的门缝，和顾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便没有挑选的余地，门缝之外仍然排起了长队。有一位女士，扛回了十箱洗衣粉；长期积压的杂牌缝纫机、锁边机、电风扇、自行车也被一扫而空。北京有个4口之家，居然通过关系抢购到6台洗衣机，使本来就面积狭小的家活脱脱像一个卖洗衣机的店铺……人们把这次抢购称之为“黑潮”。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群众推倒……事后，据有关方面统计，这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造成7、8、9三个月银行存款少增300亿。

据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也对物价飞涨牢骚满腹。他曾对其它同僚表示，“物价猛涨，不少百姓都骂政府。你知道，我也想骂，但我不能跟普通人一样发泄。我也有一个大家庭，家里财政很紧张，现在我家只能买菜，不能买肉类或家禽。”这应该不是事实。但天天提着菜篮子到市场买菜

的江泽民夫人应该是知道民间疾苦的。而江泽民最知道说什么话能够“联系群众”。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挤兑抢购等严重情况，为了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国家不得不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执行，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以治理整顿为中心。

关于这次价改失败的原因和责任，赵鼎新博士认为，它不在邓小平，而在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他说：

“对于这次闯价格关，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文献都把归咎于邓小平。确实，邓小平非常支持价格改革，然而，‘改革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来解决’这一观念，却肯定不是出自邓小平，而是出自知识分子的普遍信念，包括闯价格关在内的改革措施都是这一信念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改革：挑战与选择》这一书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中得以看出。……因为这本书基本上汇集了当时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智囊机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所推荐给政府的一些主要政策。”

“这本书的核心观念是：过去的改革政策取得了全面成功，大部分人不是从中受益，就是即使不惜牺牲生活水平也会支持改革（第二部分）；尽管改革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人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有限，而是由于原有的经济体制结构仍然没有得到调整（第三部分）；因此，目前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快改革（第四部分）。简而言之，这本书认为改革具有极高的公众支持率，并认为公众愿意承担包括通货膨胀、失业以及破产等种种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然而……公众反应与这本书所指方向恰恰相反。”

“正是以这些正面的评估为基础，政府作出了‘闯价格关’的决策。其结果是价格飞涨，民怨沸腾，从而为八九学运的发起莫下了群众基础。”

这，也不失为一种看法。

第七节 “治理整顿”的来踪与“倒赵风潮”的去迹

然而，“保守派”对追究这些细节并无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期而遇，暗中等待的时机。赵紫阳回忆说：

“治理整顿提出以后……首先是国务院那边，李鹏、姚依林他们借着治理整顿的机会大肆复旧，使改革全面回潮。他们接二连三颁布了许多条例、法令、规定，除控制基本建设外，实际上把前几年搞活企业的措施，绝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又收了回来。……一个时期甚至把农村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后，留给地区和群众让他们在品种、有无、多少之间互相调剂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管起来。刚刚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统统作废了。可以说，这是体制大的复旧，改革的大回潮。他们把许多权力集中到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如为控制信贷，甚至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们搞这种治理整顿，不久就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停滞。”

接下来的是，仿照当年消减胡耀邦经济决策权的手法，让国务院脱离总书记控制，理由与当年“倒胡”一样，便于总书记管好党。多年以后，赵紫阳对此仍耿耿于怀：

“另外还发生了一个情况变化，就是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虽然这个时期，我通过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但他们不予讨论，更不执行。本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小平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邓小平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但是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我领导经济工作的地位削弱了。借这个机会他们把持治理整顿的控制权，使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我本人，无法过问经济，使他们能够借治理整顿大搞复旧。”

“同时党内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

“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价改失败的）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道说，邓在上海期间，李先念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从1988年秋季以后

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

在应声而起的“倒赵”风潮中，赵紫阳认为，最卖力的是退休的国家主席李先念。他回忆说：

“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殤》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殤》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殤》，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河殤》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殤》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殤》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河殤》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殤》，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殤》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殤》，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殤》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据称，邓力群有一次谈话，称赵紫阳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说：“有一次李先念问陈云，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图2-4：从1988年秋开始，长安街不再树立马恩列斯像（陈小雅摄）

事后，赵紫阳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道：

“1988年是1989年的酝酿期、潜伏期，1989年整我明朗化、表面化，实际上，伏笔在1988年。……这些天，想了些，觉得1988年，远比我原想的复杂，微妙，值得深思。”

据陈一谔回忆，这时，体改所的日子也很不好过：

“体改所组建不久，秦柳方 就上书要求解散体改所，宋涛 就攻击体改所是‘赵紫阳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窝子’。那些顽固的左派和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是不想失去自己的特权，他们一天都没有放弃‘把陈一谔那伙人干掉’的想法。”

公安部还就体改所与美籍犹太投资家索罗斯联合建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一事，告诫赵紫阳“索罗斯是个反共老手，一贯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动乱，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有人并报告了邓小平。一时间，弄得有关人士人心惶惶，担心“搞不好就会弄成另一个陆铿事件。”

据陈小鲁回忆，当时的政改研究室内部，也出现服务对象的争议：

“政改研究室1988年年终总结时，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赵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

“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

“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了。……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

“报告以后呢，估计老鲍可能有点火，他没有直接跟我谈。……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觉。”

图2-5：价改困扰中的赵紫阳（江致顺 摄 选自《海南纪实》）

鲍彤也因疲劳过度住进了医院，并生发出“化作春泥更护花”之想。

1988年夏天，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总书记赵紫阳老母的坟被挖，尸骨被盗。

这股“倒赵”风潮，在“六四”后被倒打一耙地描绘成“倒邓保赵”风。赵紫阳心中却十分清楚，他的命运是和邓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他说：

“倒邓不能保赵，保赵就不能倒邓。”

但是，这次“倒赵”风证明，邓小平其实不太容易被离间。赵紫阳回忆说，正是在到处议论“赵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不能直接过问经济”，“已经被架空”等等这些流言时：

“邓多次反复向我交底，说不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变动，甚至说要我再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后，邓和李鹏谈过一次，他要李鹏分头转告各位常委。因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会上，李鹏、姚依林就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有些批评，有些责难。后来李鹏在找邓解释这件事时，邓就向他说了，意思是保我，要他们支持我。1989年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当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他还说，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难，不好搞；通过他这样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当时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无论

如何不要这样做，你现在挂在这里，对我有好处。现在我们经济工作还有些问题，物价不稳定，有些波动，无论如何现在不要提这些问题。目前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的工作。这是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过春节前谈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访朝前到他家谈访朝问题时，他还向我说，等我访朝回来后，专门开会谈一下要我搞两届的问题，不仅现在格局不能动，而且下届总书记还要我搞，此事他同陈云、李先念谈过，他们同意了。”

以上事实证明，来自保守派的离间，并没有削弱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和倚重。同时也证明，赵紫阳本人，至少在当时，也不欲改变邓小平一人说了算的“专制“地位”。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并无真正的兴趣。

第八节 “反腐”主题的凸显与八九话语的聚集

赵紫阳的地位暂时无虞，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腐败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止。物价闯关的失败令民间怨声载道，而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民营经济发展的放缓和整个经济速度的放慢，则挤出了四千万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导致的大学扩招，和不包分配的“人才市场化”政策，加剧了在校大学生的危机感。“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与知识分子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倒置（体脑倒挂），使知识人变为牢骚满腹的一群。新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则令受西化思潮浸润最深的人文社科界愿意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变得激愤。

据八九学运骨干，时任北大数学系三年级学生的邵江回忆：

“知识界不断呼吁中共启动政改，北大一部分师生在两会期间组织了一系列的大字报，要求政治改革……增加教育经费和提高教师待遇。有时也组织静坐抗议活动。”

一位北京大学副教授发现，他的收入远不如校门口的修鞋匠。因而扬言他也要在校门口摆个修鞋摊！一时间，这件事被传得满城风雨。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 副局长的陶斯亮 介绍说：

“当时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调侃。对这一现象，我曾有过这样一段概述：‘我国有知识分子2500多万，其中科技专业人员只有868万（均为当时数字），占全国总人数的0.78%，而全国却有文盲2亿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本应很宝贵。然而事实不然，一组数据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知识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49元。从增长率看，工人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5.5%，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平均增长率仅为11.5%。这种倒挂现象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工人工资的5—6倍，这符合规律。连赵紫阳同志也认识到体脑倒挂问题，并说此问题不解决长期吃亏的是我们。’后来邓小平对老布什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看来改革的一大失误是没有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待遇低下。’”

当时，北大校长丁石孙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也痛切直言“不重视教育的人将成为千古罪人”。此言赢得了北大学生的高度认同，他们甚至高呼：“丁校长好样的！我们支持你！”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和《国殇》也因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令人担忧的状况，而轰动一时。

在统战部六局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知识界呼声最强烈的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有位院士说：只希望在书店看到一本“我要求不高，好书，能够立即掏钱买下来。”北大的老同学向新生介绍学校情况时说：“在校园里，你看谁穿的最破谁就是顶级教授。”

1988年 1214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发了一篇题为《但为教师求一屋》的文章。其中描述了北京37中教师刘××住房的悲惨景象：夫妇二人均

是师院毕业的中学教师，在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霉臭的小屋里居住了17年，儿子身高1.7米，但床只有1.4米，睡觉只得长期弓成虾米状。

知名人士的情况也不例外。著名音乐教授沈湘，三代人挤在两间小屋里，连钢琴都放不下。作家梁晓声一家三口住在北影筒子楼一间小屋里，除床外只能放一张矮饭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趴在矮饭桌上写出来的。更凄惨的是1982年从香港回京定居的知名老编辑经明士，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又被亲戚抛弃，住在一座破败的高层建筑里，大门对着垃圾桶，又脏又臭，非人所居。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家里破破烂烂……

据后来参加八九民运，并一度担任北京高校自治联会主席的周勇军回忆，他当时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虽然管制很严，但“右派”教师“在正式的课讲完以后，常常留下几分钟和学生聊天谈心，发发牢骚。这个时候，老师叫我们不要做笔记，他们的真实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我们之所以在八九民运时出来参加运动，受这些老师的影响很大。”随着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极权政治向以绩效为基础的威权政治的过渡，使得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监督学生行为的学校政工系统，从精神到管理都出现废弛。这又令原先凝聚在各级党系统周围的学生积极分子感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既无道德的支撑也无政治的必要，更无经济的实惠。相反，那些在经商活动中小有斩获的师生开始令人刮目相看；校园自组织活动和历次“学潮”中脱颖而出的学生，即便不是更受人尊敬，也不会比围绕着党的积极分子更令人生厌。而在他们之外的、数量庞大的一群，则普遍感到前途无望，意志消沉。

后来在八九民运中最早脱颖而出的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虽然在民院的预科补习中两门成绩不及格，并面临被退回招考地的危险，但却因经商而小有名气。事后，他的老师和同学回忆道：

“吾尔开希是1987年北师大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招收的预科部学生。国家考虑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不如大城市，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在高考招生录取时给予少数民族考生以优惠

条件，适当加以照顾。吾尔开希高考成绩只有340分，比北师大录取最低分数线还低120分，因此先让他进入中央民族学院预科部学习一年。”

但是他“经常旷课”。吾尔开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同班同学说，他“经常晚上喝酒到深夜，早上睡懒觉到10点才起床。他偶尔也到课堂听课，但也往往听半节课，下半节课就溜了。到了考试的时候，就抄人家的考卷。”

1988年，吾尔开希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他曾告诉自己的一位维吾尔族朋友说，进入北师大后的第一学期，他只上过四节课。所以，直到学运开始以后，许多老师还不认识他。他的任课教师高长城对他倒是有印象，说“冬季，我经常看到他在上午上课时间，披着棉袄在宿舍门口晒太阳”。他的一为舍友说，吾尔开希看不起认真学习的人。他曾公开在宿舍里说：

“你们读书有什么用？我不读书，毕业以后，凭关系也能找到比你们更好的工作。”

但是，吾尔开希有自己忙乎的事情：

“他晚上要同非法经商的‘小倒’们应酬，喝酒到深夜，所以早晨常常睡懒觉。他要了解新疆的行情，又要在北京找合伙人，他是两地‘倒爷’的中间人物，倒买倒卖毛皮、刀子，从中渔利。”

但是，作为一个初学者，他似乎赚钱的机会并不多，。据说，到胡耀邦逝世时，他还欠下了7000元的债务。后来得以在学运捐款中挪用偿还。

曾参加八九民运的西安学生辛苦说：

“说在运动初期有组织地进行学生运动是不存在的。更多的是一次一次的来自外来的不满和对前途的无望，如物价的飞涨，这是更直接的原因。”

1987年，超过3000名大学毕业生被计划用人单位拒绝。198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1.9%的大学生对这一事件深感恐慌张。这类事件对于社科和人

文类的学生或许影响更大，因为他们的“所学”与市场经济的“所需”不符，但招生的规模仍在扩大。据称，在北京，遭到用人单位拒绝的600名学生中，10.5%是政法类学生。“读书无用”的思想在文革后再次弥漫校园，在政法类学生里难免产生叛逆的反应。

1988年“两会”开始不久，北大校园里涌出大字报，指责政府忽视教育，点了赵紫阳的名并着力攻击兼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用“知识份子光着屁股抬花轿”来嘲讽知识分子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还以“做学问已无力效国，擦皮鞋也能为民服务”为幌子，结伙到天安门广场摆摊擦鞋，遭到警察责难驱赶后，又扬言要组织“北大研究生生产自救俱乐部”，到天安门广场为“两会”代表擦皮鞋。此事惊动市委，书记李锡铭亲赴北大劝慰。学生的戏谑心理一发不可收拾，决定将“擦鞋”升级为静坐。只因几次到天安门广场均不被人搭理，干坐冷石板自觉无趣，才不得不快快收兵。

“两会”结束的第二天，北大校园贴出一张署名“红帆”的大字报，声言马克思主义是灰色理论和空洞教条，因此，按照这一理论实践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达成美好的社会，反而滋养了一大批腐化堕落、贪得无厌的官员。呼吁找回老校长蔡元培时代培植出来的北大精神，积极促进社会变革。

作为两会代表的北大校长丁石孙也支持学生敞开胸怀，大胆探索。

1988年6月3日，因北大研究生柴庆丰被流氓用铁锹和气枪打死，引发了1985年以来的第三次学潮。学潮由北大三角地反复播放哀乐、集会讲演，发展到北京高校2000余名学生到公安部门前示威请愿，共持续4天。据这次活动的参加者回忆，事发当天的夜里，在北大学生中便成立了一个叫“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并“讨论了一些行动方案”。参加者大多是后来在八九民运中率先起事的学生，如熊焱、王有才、邵江和沈彤、武运学、马学礼、杨通学。

“草地沙龙”的主持人刘刚则起着比较大的作用。行动委员会的活动持续了大约10天，以张贴公告、各系串联、在其它高校张贴大字报、讲演、开会等

方式组织学运，后来因为成员受到官方的警告和压力，这次学潮以6月17日的广场散步为结束。

事后，体改所社会研究室与社会舆论调查室组织的依据调查信息写出的《学潮分析：原因、后果及对策》指出：

“调查中，76%的人认为，造成这次6月学潮的社会原因是‘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在11项原因中高居榜首；其次，是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与前两次学潮相比，此类原因在这次学潮中明显地突出起来。60.4%的人认为，学潮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经济地位低’，居第二位；37.4%的人认为是‘知识分子政治地位低’，位居第四。这说明，在改革带来的利益格局变化下，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

而对于这个纯粹的社会治安案件，认为原因在“法制和社会治安状况太差”的人占只占47.8，居第三位。

报告甚至预言：

“大学生与某些利益群体结合起来，将自己较为空洞和不现实的口号及设想变为与某些阶层的具体利益紧密结合的产物。这种可能如果转化为现实，将会导致严重得多的社会危机。”

据载，1988年，仅仅北京就发生了210多次的学生抗议活动，并出现了1100多张大字报。

大学生的愤世嫉俗与他们对时局的清醒估计错杂相交。一项在北京16所大学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大学生被问及“资本主义将使中国发展更快”和“我对当前的改革不抱希望”两个问题时，与1986年相比，对前一个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在大幅上升；对后一个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在大幅下降。据后来成为八九学运领袖的北大研究生封从德回忆：

“当时在北大（学生）有好几类，我知道的有两派，一个叫麻派，一个叫托派，打麻将和考托福，根本就不学习，学习的都是想出国的，我就是属于这一派。”

原本，出国对于疏导毕业生的不满情绪，减轻社会容纳就业的压力是有利的。而无情的现实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出国越来越困难。因为超过95%的中国公费留学生都没有表现出归国的迹象，国家逐渐停止了公费赞助，并为“留学潮”立下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性规定。而比来自国内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北美大学接受中国学生的难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不断地遭受到大学或者目的国签证处的拒绝，他们为此倍感挫折。这就难免使留学预备队中的不满和愤怒成倍增长。

这些打算出国的学生，因为学习英语的需要，大多养成了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VOA）节目的习惯。从东欧的改革进展，到国际上人权运动的动态；从波兰“团结工会”的圆桌会议，到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把马科斯总统赶下台……这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国际“大气候”的最便捷的窗口。

除了“托派”和“麻派”外，校园几大派系中还有谈“老庄”道家的“玄派”，整日沉浸在男女恋爱中的“鸳鸯蝴蝶派”。据赵鼎新统计，1988年的在校大学生的学习时数比1978年时的学生大幅下降：

图2-6：大学生学习兴趣递减图（选自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

这种情势，被认为是“大规模社会动乱的时机已孕育成熟”的条件之一。

普通民众担忧的则是通货膨胀。那些拿固定工资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对与私人经商者收入差距拉大和被他们日益推高的市场价格感受到威胁；权力通过寻租和“倒爷”一起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而遵纪守法的干部却囊中羞涩。农民工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官方数字显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

资、过去30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而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这便使愤怒变成了恐慌。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在八九民运中，那些公然打出机关单位旗号加入到学生和市民游行队伍的人，大体属于这个阶层。

而国企职工忧虑的则是，改革的深入，势将砸烂很多人好不容易才捧上的“铁饭碗”，从此不仅失去生活的保障和福利，还必须加入与通货膨胀角逐的行列。正如傅高义先生所见，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前景十分可怕。”

此外，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大量涌入北京打工的农民大量进入建筑业。但1988年底的经济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再次失业，成为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当时，有一首用陕北民歌《东方红》改编的民谣流传甚广：

西方白，太阳落，
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为儿女谋幸福，
他叫俺们各顾各。

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社会政治工作系统老一套工作模式和教育范式面临失效。1988年1月爆发的“蛇口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988年秋，首都知识界几家单位联合举办“全国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与会者三百多人。在会上，利用当右派下放农村的机会，熟读爱因斯坦也精研马列经典的中科院研究员许良英说：

“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并不是有人说的，在有关市场经济，货币问题上，这些是次要的。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张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自己说，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恩格斯认为国家就是暴力，有国家就没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需要国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就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我说，十八世纪以来，民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可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却提出要专政，反对民主，这是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我们批判毛泽东，说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这种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都是讲阶级斗争。俄国、中国搞不好根子都在马克思，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论断是错误的。”

1988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未来中国与世界》大型讨论会。在会上，《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两大遗产之一。被誉为新中国“四大红色女记者”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在其后的发言中对此表示赞同。她以一个“年龄最大”老党员的身份作证道，“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而是客气了一点。”

1988年适逢“改革开放”十周年，12月18至22日，在官方主办的“十年改革理论讨论会”在远离市中心的大兴宾馆举行。为防止“闲杂人员”混入，会议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在“反自由化”运动中保留了党籍和职务的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作为“自由化人士”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说，十年来的政治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叫学术大批判的学术大批判还是有的。最大的两次是“清除精神

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实质上还是学术大批判的翻版，是十年来理论界最大的问题，并为因此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理论工作者抱不平。

会后，苏绍智将发言稿交予未被邀请参会的《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站主任张伟国。文章于12月26日在《导报》刊出后，受到中宣部长王忍之的严厉责问。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驳回了中宣部的指责。此事的流传，使人们对重新掌权的“左派”意识形态学阀以势压人的态度极为不满，理论界人士于是筹划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革命胜利一百周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1989年召开一次更有代表性并容纳各种意见的“改革十年理论讨论会”。

1988年，“九三学社”对在京成员进行的一次内部调查中，对“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进行回答时，人们可以从七个答案中选择三个。调查结果显示，有81.2%的人选择了“党内腐败”，72%选择了“知识分子收入太低”，55.6%选择了“通货膨胀太高”。在1989年的3月和5月这段时间，《半月谈》杂志在28个省进行了一次调查，要求被采访者列举八项社会问题。结果也是，78.15%的人将腐败看作是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这个百分比要高过另一个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货膨胀。

1988年在上海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当人们被要求就下面的说法——“富人中，有大多数是靠腐败或者犯罪手段发财的”——作一判断的时候，有53.8%的人表示赞同，只有27.3%的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其余的人则没作评论。当时，超过83%中国城镇人口相信，大部分官员都是腐败的，超过63%的接受调查的干部承认，他们曾涉嫌一些腐败行为。

据杨继绳先生记载，当时流行的民谣，也反映了社会的不满和人心的散乱：

“提了一批吹牛拍马的，富了一批投机倒把的，穷了一批奉公守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

“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

“文化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

“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气冲冲。”

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群众不满的原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正之风；二、分配不公；三、物价上涨；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对腐败现象，群众深恶痛绝。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评最集中的就是腐败现象。

偏偏这一年又交通事故特别多。于是又有“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的新谣问世。

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在三月一个会上说：“1988年是难忘的一年。1989年是难过的一年。”

留学北美回国探亲的博士生赵鼎新，也记载了他当时的综合感受：

“1989年4月5日，我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启程回上海探家。……和很多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一样，我也打算完成学业后归国。但是，当我的飞机降落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海——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震源来自中国政治图景所发生的剧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原先存在于大多数人内心的满意之情已不复存在。在公交车上、街头巷尾……不管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在议论通货膨胀、腐败、收入不均或犯罪猖獗的话题。‘别回来’、‘留在加拿大吧’、‘中国没希望了’……我在上海的导师是一位党员知识分子，他在50年代初响应‘建设新中国’的号召从美国归来。1986年，我赴

加留学时，他对中国的未来还充满信心。他建议我，完成学业，马上回国。然而，我这次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却建议我留在加拿大。他心情抑郁地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和1948年一模一样。当年，我亲眼见到国民党是怎么垮台的。当年的一切正重新发生在共产党身上。’”

第五章 临界点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李进进、冷落的江湖、高伐林、茅青、吕朴、仲维光）

“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一、有足够的可裂变元素；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1989年的中国，这三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

如果说，本书一至四章所铺陈的种种历史事象，可以称得上本书“大爆炸”形成的第一个条件的话，那么，正如“爆炸”过程所显示的加速度反应一样，本章所述内容则起到了“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的作用。善用比喻的方励之本人，在《自传》中，也正是在这时使用这段文字的。

第一节 民间社会的扩展

进入80年代末期，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这不仅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就业和国家税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也使得80年代初期“民主墙”异议分子中没有被体制吸收，在稍后的“从政热”中没有实现愿望的人士，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和看上去不错的发展机会。

据陆丁研究，在经济改革以前，政府长期实行尽量缩小个体行业生存空间的政策。多年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运动几乎使中国的私人企业绝迹。据统计，在工商业改造以前的1953年，中国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数是840万人，1956年工商业改造完成时，降低到16万人。60年代初期虽有所恢复，但到文

革结束时减少到14万人。进入“新时期”以后，迫于文革结束后170万返城知青和约三千万农村失业农民的就业，及城市零售服务业的严重短缺的压力，加之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政府不得不放弃对个体私营工商业限制的政策。1987年初，中共中央五号文件提出对私营企业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政府第一次认可私营企业的地位。这一政策突破，使私营企业的数量在1987年猛增了近一倍。一年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正式给予私营企业合法的经济地位，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1988年政府颁布并实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明确私营企业可以有独资、合伙、有限责任公司几种形式，并规定私营企业可以和外国公司发展合资经营。除金融和军工业尚不能让私营企业经营染指外，其他行业都开始对私人资本开放。同时，允许国营企业的辞职、退职人员从事私营企业经营。

自1981年以后，八年来，个体私营工商业从业人数以每年将近40%的速度递增。同时，乡镇企业也获得了大力的发展，为城乡居民创造了2200万个工作机会，占同期全国新增就业人数的将近六成，农村劳动力的20%（约一亿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工作。据统计，80年代下半叶，乡镇企业缴税1900亿元，平均每年380亿，相当这期间政府新增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政府每年从私营个体经济中收取几十亿元的税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期间，政府每年却要支付400到600亿元的补贴给亏损的国营企业。在8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国营企业的税利减少了15%以上，亏损面从一成增加到三成，总亏损额增加了三倍多。

“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所占比重也逐年下降——由1980年的75%下降到1988年的57%。

从1986到1990年，名义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百分率，国营企业是7.3，集体企业是17.6，乡镇企业是25.9，个体私营企业是39.2，外资企业是74.0。

在八九民运中曾对学生运动给予过经济支持的四通公司，就是这股经济大潮的产物。

四通公司创办于1984年5月，是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实践“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先驱之一。创业的2万元经费来自北京四季青公社的借款。最初只有几名辞去公职的科技人员。创业初期，总经理万润南曾自己蹬三轮车到机场提货。1986年以后，公司利润以每年以300%的速度高速增长。在与现行体制的磕磕碰碰中，到1988年的四年间，它已经拥有10亿资产的规模。

图2-7：“知识产权”官司缠绕“四通”（选自《海南纪实》）

在类似公司的大量涌现后，1987年，北京地区的民营科技实业家以自愿原则组织起“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该协会以“桥梁、纽带、服务、自律”为宗旨，为参会企业提供八大服务平台：为民营企业解读发展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将长年沉淀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失败教训与众分享；为企业技术总监、总工程师及相关人员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通过专业人员解析，与会人员互动，盘活企业人力资源；搭建企业对话桥梁，探索以企业联盟的方式，加强并放大民营企业资本运作实力的有效途径；关注软件业动态，探索企业专业化联盟之路；并未企业培训专业委员会；同时整合国际化合作信息与资源，推动企业和协会国际化进程。

在此期间，原农村发展组副组长何维凌，依托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即“索罗斯基金”），创办了中美中小企业国际交流联络处。

图2-8：何维凌与陈一谔（选自《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

在国家政策鼓励、同业扶持、社会经济环境提供人力资源的背景下，到1987年，全国私营企业数目已达到22.5万家。

如果说，社会文化领域的开放进一步弱化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控制，那么，经济领域对社会和个人的开放，以及后者所获得的迅猛发展，不仅意

意味着经济制度结构的转换和社会经济活力的增加，同时意味着，在这部分逐渐扩大的、生存发展不再依赖政府和国企的人口，在思想观念上独立的可能性和利益诉求上分化的必然性。从客观上看，它必将减轻公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在延安时代，在统制经济的限制下，桀骜不驯的萧军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但80年代末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和科技知识分子），砸碎了“铁饭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谋生，有的甚至端上了“金饭碗”。这一切，如果说还不足以支撑“多元政治”的格局的话，至少已经涣散了社会对集权政府的向心力，并给谋求政治新格局的民间活动家以乐观的遐想。

而这，对于催生八九民运这样大规模社会风潮，并使之持续很长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

第二节 异议运动的萌动

中国80年代的异议运动，通过“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人才培养方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只是由于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保守派主导的节奏性的打压，和胡耀邦时代的政治开明，这股“异议”潮流被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不被体制接受，遁入民间；另一部分则得以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体制内各机构、部门和单位发挥作用。如“民主墙”时期的活跃人物严家其，他不仅能够成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全国青联委员，还一度进入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班子。在于光远为副院长的中国社科院其他所，更聚集了一批包含上述人士，及“四五”天安门运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参加者。正如原社科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先生所说，到八九民运发生前夕，中国的政治版图与70年代末期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新的公共空间和新的政治行动者的出现”：

“它们包括八十年代中比较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政治学所、文学所、国务院体改所，以及一批民间研究机构、独立经济实体，还有一批带有民间色彩的社团和报纸。依托这些团体，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包括老、中、青各年龄层’的，‘独立思考而不依附于中共作政治传声筒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正日益扩大。”

后来在八九民运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陈子明、王军涛为首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就是这个民间群体中的一元。

“社经所”是一个挂靠在国家科委“人才交流中心”的民办科研机构。该所的前身，是1984年8月“经商热”中成立的“自强公司”。同年10月，该公司旗下成立北方书刊发行公司，依靠编撰和发行《现代青年社交手册》、《青年法律手册》等畅销书，赚取了“第一桶金”。

此后，在朋友们的参与和协助下，陈子明与李盛平等人合作，又开办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使之成为两只“下金蛋的母鸡”。

在这个事业中，陈子明“慧眼”瞄准的是“文凭热”大潮中没有考上正规大学的更广大的青年群体，以及那些在十年“文革”中失去受教育机会，又早已过了正规大学入学年龄的更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保证了这次举事没有空手而归。但由于经济操作上的“不规范”，让这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群体出现了第一次大分裂。

据陈子华记载，两所函校第一期招收学员达23万， 报名费68元至70元，仅此一项就为他们带来上千万的收入。但在金钱迅速涌入时，两校并没有建立健全的财务制度，而且管理层带有严重的“家族色彩”。很快，陈子明被指“对函授学院的学费处理”有问题；学籍管理存在隐患。知情人批评其“一是私分乱拿，全然不顾财务制度。报名高峰时期，学生交来的现金，每

天都有满满的两大旅行袋提回陈子明家中。而且两院财务完全被陈家所把持，陈子华是出纳，子华丈夫是会计。账务和财务均密不透风。”

历任函大教务委员会主任，都对此持严厉批评态度，有的选择了缄默而自动离开。其中一任被邀请来接替的吕朴，曾是陈子明《北京之春》时期的老友，因批评这种现象而遭到“断其手脚”的恐吓，一度被人诬告“参加非法组织活动”，惹上了警察。以后他另谋职业，所到之处都有这类匿名诬告信尾随。直至吕朴进入体改委，单位负责人本着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彻查此事，陈子明函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图2-9：1987年10月14日发布的函大整顿文件（陈小雅收藏）

1987年10月28日，笔者走访该校时，该校正面临内部整顿。当时，上任仅一个星期零三天的负责人张克坚对笔者说：

“创办人跟走马灯似的。校长？现在没有。负责的是教务委员会。当初准备不足，手段原始。手算。因为是新事物，学员配合也有些问题。两方面都有原因，造成了最初的学籍管理混乱。严重到究竟多少学员弄不清楚，统计时经常在以万为单位的数量级上变换……有些管理，主导思想上有问题：只管收钱，不管学员。”

曾被拉来函大充当校长的何家栋，则留下了这样的记忆：

“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筹建我并不知情，对他们的意图也不了然，仅仅因为他们未经办妥全部相关手续，就开始招生，主管部门威胁要出面禁止开学，李盛平、陈子明这才‘急时抱佛脚’，找我救驾，大概是觉得我‘有求必应’吧？……我只得陪他们到成人教育主管部门补办手续，申明‘承担一切责任’。次日开学，讲稿也是他们备好的。就这样当起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校长。”

“……在这期间，对子明的不满也时有所闻，最突出的是实行‘家族统治’，妻子王之虹、妹妹陈子华二人‘把持学校大权’，一个管人事，一个管教务。我曾就此询问子明，要他做出解释，他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办学之初，他曾请各方合作者派出可信任的人分任关键职务，条件是放弃铁饭碗，专职坐班，但当时没有人决心下海，他只得动员自己的亲属来冒这个风险。紧接着，北京市审计部门派工作组查帐来了，据说是学校账目不清。这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

曾经被陈子明拉来当行政函授大学顾问的严家其，也证实了当时函大出现的危机：

“他（陈子明）到哲学所后，办‘行政学函授学校’要我当‘函授学校’顾问，我答应了，好像张友渔也是顾问，并把我们的名字印在他们的刊物上。我收到许多对‘函授学校’不满的信，如没有收到书。我不客气地退出他的顾问。”

据知情人回忆，两所函校的教材，成本也非常低廉。大多是把以前的经贸院校或行政学院（或党校）的讲义教材经过粗糙的编辑，拿来“翻印”；要么是把自己写的书作为教材卖给学生……大量的工作集中在邮寄上。

通过这些简单粗糙的“教育与受教育”程序，陈子明家族赚了个盆满钵满，也实现一定社会阶层的“文凭”梦想。

精英层的强烈拒斥，并没有令陈子明气馁。毕竟，在这个时代，金钱已经开始扮演主宰的角色。不论黑道白道，没有钱摆不平的事情。而且他懂得如何用“目标的崇高”说服同道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面对外界的压力，他不断地变化身形，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又通过注资、合办、竞标等各种可能的方式，把经营的触角伸向科技、金融、商贸、咨询、出版、音像、旅游、文艺、法律，甚至慈善等领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80年代末期，陈子明们最终站稳了多元化民间社会的“一元”地位。虽然许多事业

还在草创和畅想阶段，但不难想见，如果假以时日，它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民营经济体。

但问题出在，陈子明并不以追求一个“经济帝国”为鹄的。他要搞政治，并对此直言不讳。至少到1986年11月——笔者采访几位他的主要合伙人为止，该所已经确立了“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形态，以政治为灵魂”的工作目标。所谓“以文化为形态”，通俗地说，就是披着文化和研究的外衣搞政治——从制度设计到政策建言，哪里有路就往哪里走，只要有机会接近权力层，陈子明绝不放过。陈子明也直言不讳地对同伴描述过对自己政治前景的期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能“决定中国政策的人”。

有资料显示，陈子明的这一抱负，至少在“文革”的下乡插队期间已有展示。只不过，其道路并不平坦。

陈子明1952年出身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随父迁居北京。1968年在北京八中毕业。文革中在内蒙古插队。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化工学院，学习化学工程专业。1975年，因与当时就读于内蒙锡林郭勒盟师范学校的“插友”徐某的通信内容，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75年11月12日，化工学院团委作出的《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

“陈在插队期间与徐X……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陈的思想反动，系统全面，性质严重……”

1976年4月2日，陈子明被北京化工学院开除学籍。

据陈子明向本人介绍，在80年代前后，他曾三次要求入党，但因各种原因都没有被批准。但到笔者采访该所时，社经所已成功吸纳两位身份“转轨”

的中共党员进入所内。按照王军涛的设计，“只要吸纳够三名党员，就可以成立党小组。《党章》规定，党小组就可以发展党员。这样，我和子明就可以入党。”但是，王军涛和陈子明远远没有估计到这个过程的曲折性。这不仅与“函大风波”的后续效应有关，与陈子明的一段历史也有关。

1976年4月5日，陈子明被释放。在前往劳改农场之前参加了“天安门事件”。他曾对笔者说：

“4月5日早上，我7:00就到了广场。我认为，我那一天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一是引导唱《国际歌》；利用群众的义愤，把喊‘打倒周恩来’的人从解放军的包围下拉出来，赶到人民大会堂前。……那次出了头以后就得老得出头了。我决定把人群引向电台，后来，我又引导截了广播车。当时，车里面有个男的，姓乔，我把他从车里面揪出来，他们要打他。我说，你喊‘周恩来万岁！’就不打你。他开始不喊，我说不喊就打。结果他喊了……当时我想，事态闹得越大，卷进去的人越多，这件事平反得就越快，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就越大。”

此后，他自告奋勇，进入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首都民兵指挥部，成为“小楼谈判”的代表。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成为“四五英雄”。

据陈子明说，他因4月6日前往永乐店农场劳动改造，逃过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搜捕。但重新掌权的“文革下台派”及其掌控的审干部门怀疑，他是否服务于“四人帮”给邓小平栽赃的计划，被北京市公安局（恰好在那个时间段）有意放出来的人？因达到预期效果，未被再次逮捕？作为最早的“反‘四人帮’英雄”、为邓小平登台制造舆论的“四五英雄”，陈子明做梦都没有想到，在他的档案里，因为这些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被记上了“文革三种人”的记号，并在他后来的仕途追求中屡屡作梗。

正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档案内情，陈子明一直高调宣传上述经历。据笔者研究，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二：

其一，根据陈子明的历史观，青年运动是时代的先锋。他的这一思想（陈子明对笔者的陈述承认，自己曾经是一个“毛泽东主义”者）来自文革中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即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这一天，他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们碰杯时，祝贺未来“全国全面内战”展开时的讲话。毛泽东说：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虽然未见正式刊行，但当时就泄露于社会，被各种小报和传单印成“最高指示”，传播甚广。而此时，正是陈子明一代世界观的形成时期。

其二，根据陈子明的忘年交何家栋的一段叙述：

“当时一些复出的老干部都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认为要防止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就应依靠四五运动涌现的新生力量，所以我主持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丙辰清明纪事》。书中就记载有李胜平（李盛平）、陈子明（小平头）在天安门事件中活动的情况。”

陈子明认为，中共之所以有先进性，在于它的骨干力量由各个时代青年运动的成员组成，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根据何家栋转述的当朝老人的希望，他有理由认为“四五”一代也应成为中共新生代的凝聚点，“四五英雄”应该成为中共新一代领袖。

为此，他并不隐晦自己在“民主墙”参与编辑《北京之春》时期，是有意意识地在“配合”党内改革派的“作战设计”。按陈子华的说法，他们是“自觉的被利用”。

1980年，陈子明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念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生。在随后的高校竞选运动中，他先后为北大一分校历史系学生李胜平和北大物理系学生王军涛辅选。最终，他自己也投入了这股潮流，在政治氛围相对稀薄的研究生院胜出，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

1981年1月9日，陈子明参与发起了在人民大学召开的北京14校竞选活跃分子联席会议。

由于上述特殊的经历，陈子明结交了一批当时代青年政治精英。而陈子明善于筹谋的才能，使他不仅对改革时代的各种机会明察秋毫，并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和政策空间；同时，把这种人脉关系利用到极致。在短短的几年内，从依附于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进行“就业—国情”的调研，到独立开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从组建“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到主办“青年政治研究会”。还一度通过周荣鑫女儿周少华的关系，与国家体改委试点组联合主办《改革试点动态》（内刊）。后来体改委与之脱钩，但地方体改委并不知道，资料仍然源源不断地寄往社经所。

虽然屡战屡败，却能够屡仆屡起。陈子明不仅赚下了号称近亿元的利润，而且撒开了一张笼罩全国28个省市的关系网。据称，他的函授甚至有海外华人报名。其学员中还有“南昌市市长、宁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一级的人物。他们开展的活动，不仅能邀请到中组部部长陈野苹、副部长李锐一级人物的捧场，甚至能得到胡耀邦的回函鼓励。显示了极强的公关能力。

如果以为举办政治与行政函授学校，只有一个经济目标，那是低估了陈子明做事的深谋远虑，及其宏远的理想。据王军涛对笔者回忆，其实，这个函授的设计，曾得益于一部西方电影的提示。该片描述的是在有严格文官制度的英国，一个不可一世的政务官，最后不得不“萧规曹随”，被事务官们治得服服帖帖的故事。通过此片，陈子明们受到了“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这个俗语的启发：不论民主政治还是威权政治，政务官（流水的兵）是依据

上司、朝代和选举结果的变化，可以经常更换的。但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大体是不变的，当政务官更迭时，维持机关稳定运作的，是那些积累了长期行政经验的事务官。他们是可以为任何朝代、领导和代表所用的。一个政治家一旦失去职位，如何保证他的理念和意图继续在政府机构得到执行？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行政人员。用陈子明妹妹的话来说，就是“促进……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阶层”的“成长之路”。

出于这种信念，在“行政函校”结束以后，社经所还举办过人才考评中心、秘书培训班，并热衷于与中组部拉关系、在劳动人事部打下自己的楔子。他们畅想，将来能为自己养不起秘书的人大代表配备秘书，从而达到影响代表的目的。

在一个人们都向往政治民主化的时代，这种着重于培养“工具”的思路，也不失为“独特”。假以时日，这桩看上去暂时“赔本的买卖”必将收获巨丰！

据笔者所知，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该所以推荐秘书的名分，已经安排一些人在一些著名人物身边就位。如向包遵信主办的《太平洋论坛》推荐的秘书长刘卫华，被介绍给王岐山的彭明，都是王军涛在武汉时期的哥儿们。

在另一方面，由于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闵琦和北大物理系毕业的王军涛的入伙，给该所带来了大量知识界人脉关系。尤其是以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为人生楷模，从伊朗霍梅尼的成功吸取了经验和力量的、极富人格魅力的王军涛，起到了某种风云际会的作用。同时也掩盖了陈子明家族的“世俗”色彩及函大污点。据闵琦回忆，当时的王，已经确立了走“持不同政见者”道路，进击政坛的理想。

闵琦的这个说法，能够得到何维凌的佐证：

“王军涛与姜洪不同，他基本上对当局不抱太大希望，也没有很大合作欲望。……他是我这批非主流派朋友中年龄最小的，而又是最坚定，甚至可

以说是最顽固的一个。他的观点一旦形成，要说服他改变就实在太‘蜀道之难’了。他到过22楼来找我讨论多次，我对他这个特点，很有领教。

听朋友介绍，他曾与胡耀邦直接对过话，结果居然唇枪舌剑，不欢而散。胡说他完全不懂中国的政治，我想，他大概会说胡不懂现代政治的吧。

王军涛每次见我，都劝我自己出来在社会上‘振臂一呼’，不能只盯着一条‘通天’进言渠道不放，只能凭着‘通天’之路来号召精英。他认为这样做，面太窄了。他认为我出来在更广阔的面上号召各种英雄，可以起到陈一谔所起不到的作用。”

“没想到，在这次‘学潮’中我做斡旋工作时，与学生领袖接触，当面谈得效果不错，但过后一回去就变卦了。听“体改所”副所长李峻说，天安门广场静坐的真正的幕后指挥是王军涛。真令我叫绝，也叫苦不迭。我于是暗想，这斡旋将异常艰难，甚至可能夭折。因为我太了解王军涛了，他绝对是死硬分子，绝对不妥协的主儿。”

因为王军涛的渊源关系及坚持，早在八九民运爆发前，社经所已经网罗了从“四五”天安门运动、民主墙参加者，到北大1986年以来历次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有的兼职，有的用经费资助保持关系。其中任畹町、陈小平、刘刚、王丹、等人，都在八九民运中发挥过层次不同的作用。

可以预期，这些都是社经所在“乱世”角逐政坛的资本。但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本？使之不与培育“治世”干城的计划发生冲突，还有赖于陈、王二人在目标和路线上的协调。

无论如何，到1987年为止，陈子明并没有决定放弃通过进入执政党，通过当“幕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的道路。

一方面，他们公开与方励之、许良英倡导的“思想启蒙运动”划清界限。陈子明、王军涛在各种场合，都批评许良英们“光说不做”，是“租界民主

派”，是“‘一二九’一代的局限”。作为给当政者下的“投名状”，他们甚至把对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评，列为社经所1988年上半年以来的“工作重点”。

另一方面，陈子明一直在积极寻求进入体制内的门径。对于其人格和特长，何维凌曾留下“深刻印象”：

“姜洪、陈子明初来我家，正值‘发展组’首次打开‘通天’渠道，被中央书记处‘收编’为‘正规军’的当口……他们专程拜访，是为了‘取经’的。”

据何维凌回忆，“取经”的内容之一，是如何充当青年知识精英之间的“协调人”：

“我不假思索地说，要协调这伙才子，依我的经验，关键有两条：

第一条就是（协调人）不背后说人坏话……

第二条就是有好事自己（协调人）往后‘稍’。所谓好处，无外乎功、名、利、禄……在发表的文章、出的书，递送的报告上署谁的名，谁牵头，中央接见时，出不出场等。”

“从第一次‘倾盖如故’开始，接二连三地继续了多次。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特别是强调这一代知识精英应该以多种方式沟通、组合，并尽可能把我们的研究化成对中央决策的实际影响。‘发展组’的道路是今后我们共同的道路。”

在何维凌的眼里，姜洪是“非主流”精英的“核心人物”：

“陈子明与姜洪有不少共同特点：性格坚强，有个性，刚且韧，不屈不挠，思想开阔，敏锐深刻，志气高远，才华出众，自负，甚至自傲。常常以

抱负自诩，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共同的特点。但往往只愿意自己如此，不喜欢他人若此。也因此，好端端地两个志士仁人竟然互相容不下。”

在他看来，姜洪偏重独来独往，而陈子明更富有组织能力。论口才，姜洪则略胜一筹。至于二人是否提出进入“体改所”的要求？何维凌自始至终没有透露。

为了开拓改革事业，使中国实现和平转型，何维凌确曾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期望。当时希望通过热心而有抱负的何维凌进入这个机构的不乏其人，他在木樨地“部长楼”的家也因此门庭若市。而他本人也确有穿梭于同时不期而至的几个谈话圈子，应付自如，滴水不漏的特长。他理解，知识精英的这种愿望，不仅因为十年“文革”压抑了人才，中国制度的不民主，更因为“体改所”的实践开创了中国人事制度的一个特例；通过“走后门”，体改所的意见不仅可以“上达天听”，而且挣来了许多特权和便利。据陈一谘回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不仅在国家机关中享有独一无二的研究自主权、财政自主权，还有独立的人事任免权力。

为了应付突然汹涌而至的知识精英“参政热潮”，何维凌曾和陈一谘进行过精密的筹划。他们认为：“要有一支精干的核心队伍，一支组织严密、配合一致的核心队伍，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突击队式的快速反应的核心队伍。这支队伍有七、八十人足够，每个人都要有两手：既能作为‘硬专家’搞研究、写报告，又能作为‘软专家’搞研究组织的协调工作。这样，核心队伍的影响面、联系面和活动面就可以极大的增加，并以专门化的分支队伍和区域化的分支队伍分布在全国各领域、各地区。”

“对于松散的外围，我基本上认为采取的办法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只要确定了总目标，确定了研究方向，就尽量扩大包容，来者不拒。与核心的关系是交流式的联系的关系，不作硬性的上下级的指示关系。

为此，我们确定“发展组”有三种成员：正式成员，联系成员，通讯成员。由正式成员构成核心队伍，一般情况下都将正式调入。”

但天有不测风云，1983年陈一谔病倒，他本人因“冲撞老太太”事件 被罚“出局”，体改所群龙无首，“关门”和“事务”两大主义从此盛行。由此“埋下了中青年理论界的分化：获得直接与中央对话、参谋决策条件的被称为‘主流派’，被排斥在外的被称为‘非主流派’”。两大营垒形成。何维凌事后检讨，体改所由此丧失了“它本应起到的团结第三代精英的核心作用。”

至于陈子明在“体改所”投石问路的情节，倒是鲍彤和姚监复的一段“赤裸裸”的对话透露的：

“姚：听说陈子明想进体改所，你们也觉得他本事很大，但是考虑到他是‘三种人’，所以没有要他，但决定吸收他参加一些讨论会……？”

鲍：这是陈一谔经手的，我不太了解情况。陈一谔介绍说他很有想法，但可能有一些‘麻烦’……我说，有‘麻烦’就不要，因为改革的阻力很大。”

2013年1月，我向陈子明求证此事时，陈子明证实，在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中，鲍彤承认，是他决定不让陈子明进体改所的。

为了亡羊补牢，陈一谔与鲍彤又商议建立了“青年经济研究会”，意图能网罗广泛的人才。

据陈一谔回忆，“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除了“召开各种关于形势、发展与改革的专题、综合讨论会”外，还用“合同制”委托、承包课题的方法，外放了“50多个课题”给有关学者和部门。可见，不论是鲍彤还是陈一谔，都希望像陈子明一类有志愿、有思想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能够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为改革建言献策，发挥自己的作用。

除了在“体改所”扣关求通外，陈子明还一度运作进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据知情人张明澍回忆，陈子明希望同时调入的还有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在他看来，这个阵容无异于要“接管政治学所”。事后，笔者向严家其求证，严家其也曾对笔者回忆说：

“我很早就认识陈子明。……陈子明进哲学所，哲学所专门找我，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他自然科学基础好。后来到我家，要从哲学所进政治学所，我要他给我几篇政治学文章……”

可惜的是，陈子明并没有潜下心来作政治学的文章，而是在他组建的社经所，把几乎所有政治学所的中青年理论骨干（除刘军宁外）都聘为“所务委员”或研究人员，除按月发薪外，还组织他们撰写、翻译和出版著作。在那个工资低、出书难、评职称更难的时代，这些待遇对这批中青年学者起到了非常有效的凝聚作用。在后来的八九民运中，这批人有的成为了由陈子明发起成立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基本班底。以后我们还要谈到，陈子明们在八九民运中的公开活动，也经常选择在政治学所进行。

毫无疑问，陈子明在进身途中遇到的坎坷，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阴影。种种圈层的区隔和身份的限制，在这个自负的青年那里，难免引发深度的厌恶。不幸，笔者对他的采访，正是在这个当口进行的。当时，他曾流露出的不满、甚至失态，难免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雅：现在分野和集团已经形成，而且似乎也各有自己的领域。他们是否也各不相犯呢？比如你们搞政治，金观涛搞意识形态，发展组搞经济……

子明：搞经济的也不是他们一拨人啊，摊子很多。比如说，朱嘉明和陈一谥就已经达到互相指责的地步。朱嘉明、杨小凯最近在深圳开了一个会，说：‘小人跑着，大师等着’。意思是小人跑着给人号脉，给人献计献策；

大师等着，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等待时机到来。这个报纸登出来后，陈一谔就火啊！前天何维凌还说，这都已经形成一个事端了。无风不起浪嘛！

另外还有一些同志……你不要就看到走向未来、体改所那些人。

搞控制论的人，分三派。……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立场和道路。像我们这样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我个人看得很透。自然科学方法在建构社会科学框架方面能起什么作用？我个人评价不太高。这种方法是有价值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愿意从工、从理，这样来转一圈。但是想拿这个东西来征服一代人，恐怕先要把自己征服了。这是自欺欺人的。”

陈子明认为，当时中青年理论界两大山头——陈一谔的体改所和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丛书，起了一个不好的头，那就是在原来没有圈子的中青年界搞起了圈子。体改所的坏处更在于“垄断了进言渠道”。而他个人在后来的辩驳中也曾透露过这种不满。陈子明说：

“流氓和精英的区别是什么？流氓可能有权术、有能力，但他们完全不讲手段、不讲规则，不重社会公理。他们利用社会的无法无规，利用人性的弱点巧取豪夺。”

如果说，这些话的指向还不够明确，那么，他还在几次谈到与体改所关系的场合表示过，自己的“思想智慧被别人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搞宗派或搞‘咨询’的人必然垄断渠道，‘利用别人的材料去谋自己的利益’”。如果存在这类事实，当事人的怨怼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情结，与后来社经所及陈子明本人在八九民运中的行为，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试图进入体改所失败后，陈子明团队自行创办了“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和“青年政治学研究会”。他们的活动，直接揭开了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热潮的序幕。在下来“主办的14个大中型学术研讨会”，“协办和参与”的16个研讨会中，他们有力地“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但它们的实际运作者闵琦认为，由于负责人过于追求外在的造势，开一个会就成立一

个研究室，实际上根本没有静下心来做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致使该所和该会基本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

2-10：不断变化身形的社经所（陈小雅收藏）

据该所内部人士透露，1986年12月，全国学潮闹得如火如荼之时，陈子明因结识了科大学生领袖，曾提出“平息学潮，换得官方谅解”的动议。并因此获得了一次面见胡启立的机会。但当他们接到胡秘书的电话，赶到中南海时，又被通知“会见因故取消”。有目击者称，坐在返程面包车中的陈子明脸色阴沉，最后终于憋出了一句话：

“不见也罢！见了，最多不过是给个局长当当。”

此后，陈子明又风闻邓小平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研究交由赵紫阳负责，并组建了“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与李盛平一道拜访了陈一谔。据陈一谔回忆：

“这时，陈子明和李盛平来找我，说要谈谈政治改革问题。……他们表达了希望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意向，我说可以向上边反映。我和鲍彤说了以后，鲍彤表示目前还不行，只能搁置了。”

其时，陈一谔已有自己的人选：中央党校理论部研究生、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迟福林和吴伟。据社经所骨干闵琦回忆，他们与陈子明们路数完全不同：

“当时在北京已经形成了一股讨论热。主体表现在中央党校和体改所也参与了进来。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路数：从中央决策需要出发，提供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性论证，以及改革的具体方案和措施。主要人物是党校的迟福林、王荣江，体改所的陈一谔、王非欣。他们最大的一次活动是7月10号到7月12号在中央党校搞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主要观点是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因果关系。体改所认为，没有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

有政治体制改革。会上超出了理论的角度，形成宗派交锋。当时很有代表性的话：要‘夺旗’。我们内部确有人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专利。如李盛平在与陈一谘谈话时说：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你们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搞。井水不犯河水。而体改所则认为，在体制改革问题上他们是正宗，而我们是野路子。政治体制改革这面旗帜他们是当仁不让的。体改所当时考虑改名叫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而且在几家报社上确实已经出现过。……对我们这一派人来说，我个人的领袖欲可以说是没有的。我不过是想研究一些现实问题，把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学术问题结合在一起。但陈子明、李盛平两人，多年以来，尤其是陈子明，一直是希望要成为一股社会政治力量中、一派青年的代表。所以才提出了‘抓旗’这个口号。如果我们只想当一个学者的话，那么不管在哪面旗子下面，我都可以研究这个问题，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希望靠这面旗子来拉一批人，搞一块自己的地盘。”

在加入“主流”的希望破灭后，陈子明开始安心经营自己的社经所。一方面，他们通过房志远（丁楚），在美国向“中国民联”申请“课题”费。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中国民联”的王炳章经费来源于台湾国民党的特别经费。另一方面，陈子明已在厉兵秣马，准备与赵紫阳以后的政府合作。对外，则以“政治发展”这个意涵模糊的提法替代“政治改革”的提法，借以释放善意的政治信号。

请看该所所务委员谢小庆的描述：

“他们对1984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市场作用得到承认之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就不再是政策问题而变成技术问题，应由技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来回答。他们反对以‘让利放权’为主旋律的经济改革思路，认为‘让’和‘放’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能搞群众运动式的‘放’。他们认为，对于城镇居民和全民职工的‘利’和‘（特）权’要以赎买方式来‘收’，而不是‘放’。他们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批评高消费的政策是‘以打土豪、分浮财的方式搞经济改革，分光吃光’。对

这位经济学家‘文革是十年动乱，改革是十年乱动’的说法有共鸣。他们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低积累、短期行为、产业结构轻型化，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导致经济失误的直接原因是缺乏精致的、严密的、可操作的设计，深层原因则是政治体制未能为人才到位和决策科学化提供保证。他们组织了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自甘寂寞地躲起来搞操作层面的经济改革方案，已搞出几百万字成果‘待价而沽’。”

“去年（1989年）春天，陈曾在一次谈话中讲：知识界虽然在消化人类现代思想方面有优势，在青年中有影响，但他们缺乏实际管理经济的能力和运作经验。相反，以留苏同学为主体的技术官僚，却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知识界应争取与技术官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1988年底，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正由于这种考虑，在去年风波期间在对待李鹏的问题上，他们经常有投鼠忌器的苦恼。”

图2-11：《李先念促换总书记》（选自香港《争鸣》）

笔者的采访证明，这时的陈子明，对民间异议运动确已失去兴趣：

“小雅：如果十三大后还要选人民代表，中国的民主运动会有什么动向？

子明：我不太赞成给民主运动下一种狭义的定义：民众的、激烈的……中国政治发展……民主运动现在就是在搞。譬如省长会议，现在一年开一次，而且每次的时间越开越长，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征候。原来政治局常委决定的事情，现在省长会议才能决定。他们在会上吵得一塌糊涂……像陆定一、周扬这些人，过去都是镇压过民主的人。但他们晚年的功绩，也不会比王军涛小吧！

小雅：邓小平晚年之后，中国的形势会怎么样？

子明：周恩来死后，我觉得这些老的人会一批一批换了，形势并没有恶化到哪里去。我对邓死后的中国形势并不忧虑。

小雅：那么，仅从接班人的一批人来看，是不是理想呢？

子明：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可不见得不像样……耀邦肯定是过渡性的。启立究竟能怎么样还不知道……另外，还有方励之啊，什么的。”

第三节 从“草地沙龙”到“民主沙龙”

在社经所延揽的新生代学运领袖中，后来成为八九民运推手之一的刘刚，是一个重要人物。

刘刚，1961年生于吉林省辽源市。父亲是一名公安干警。他本人1977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1978年3月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学习；1982—1984年就职于航空工业部沈阳六〇一研究所；1984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1987年在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任职，同年辞职。1988年春节回到北京，在耐磨材料开发公司等单位任职。

在北大读研期间，刘刚参与发起了1985年的纪念“九一八”活动，并将活动情况通电全国。1987年元旦，刘刚因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曾被当局拘留。在同学们的积极营救下获释后，他又带领大批同学去关押过他的派出所同当局谈判，要求释放全部学生。回校后，这批人中的许多，都成为北大学运的骨干力量。

1987年1月17日凌晨，刘刚听到胡耀邦被迫辞职的消息后，立即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抗议邓小平违背党章党纪，非法撤销中共最高领导人。贴出的大字报被撕毁后，他又再次贴出数张大字报。从此遭到公安方面的不断袭扰和屡次擒纵。

刘刚另一出人意表的行动，也发生在1987年春。当时，正值北大举行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刘刚动员北大同学推举身为北大物理系教授的方励之夫人李淑娴为候选人，在两天内征集到数百人签名。此后，学校动员各种力量，试图将李淑娴的候选资格取消，包括散布谣言，玷污诽谤候选人李淑娴和所有参与联名的推举人；频繁地找李淑娴，劝她自动放弃；校办主任甚至以毕业后推荐刘刚到团中央工作做诱饵劝其收山；派出所则频繁地派出员警骚扰刘刚的生活；派其导师做政治思想工作……面对种种刁难，许多支持者退出。但，由于刘刚和李淑娴的坚持，李淑娴最后以89.2%的高票当选，所获选票远远高出第二名将近一倍！刘刚的好友程朝翔和荀昆也参加了竞选，预备万一发生李淑娴被取消候选资格的情况，二人将自己的资格转让李淑娴。而程朝翔最后也顺利当选。

刘刚曾对许良英表示，自己的理想是以物理学家的身份参与政治，有志于做“中国的萨哈罗夫”。受老一辈自由派人士举办的“新启蒙”沙龙影响，效仿捷克布拉格之春、“七七宪章”和波兰团结工会的道路，他决定把沙龙办到北大去。

1988年，刘刚加盟陈子明的社经所。

4月19日，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堂召开之际，他召集王丹、徐培、张毅生等数十名高校师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要求新闻自由和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5月4日，刘刚与徐培、张毅生一道，在北大勺园塞万提斯塑像前的草地上举办了第一次“草地沙龙”。沙龙邀请的嘉宾是方励之夫妇。据称，参加者达上千人。沙龙没有主持人，参加者自由发言。会后，要求方励之签名的队伍排成了长龙，签名持续两个多小时。用刘刚的话来说：

“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给中国的自由化平反。我们永远都不需要中国政府来给我们平反。”

从这时开始，沙龙骨干每周三下午四点都会来到同一地点，通过举办大型集会、发表演讲，散布民主思想。1988年11月，因北大发生“柴庆丰事件”，刘刚参加“行动委员会”，被公安部点名实行活动限制。自此，“草地沙龙”更名“民主沙龙”由王丹主持。到1989年5月，仅仅一年时间里，“草地—民主沙龙”共搞了17场讲座。在受邀讲演的人中，除美国大使洛德夫妇外，还有倡导“科学、民主启蒙”的许良英，主张“全盘西化”的包遵信，以及邵燕祥、吴祖光等文化名流。甚至刑满释放的“民主墙”时代“人权同盟”的创建者任畹町，也可以在这里就“新权威与民主政治”大发议论。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的这些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在有关方面采集的言论中，据称有李淑娴的建议：“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为此，李淑娴被认为是“民主沙龙”的“军师”。

类似“草地沙龙”的社团活动，以后在北大和其他院校也发展开来。如教育研究学社 各种“论坛”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也纷纷出现。

当时参与过“民主沙龙”的沈彤回忆：

“另外还有各地的串联问题。……其实各地的不论是从民主墙时期，1986、1987年时期出来的这些学生跑到各地去，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放弃。因为这10年对民运分子，除了像魏京生、刘青这些人，处罚并不是太厉害的，这些人实际上还有活动空间，尤其是离开北京之后。有代表性的像安徽的民主沙龙。

他们来到北大，发现北大的一些学生，至少像民主沙龙和我们，对1989年的分析跟他们很接近，有许多共识，大家有一种‘臭味相投’之感。觉得1989年不闹是不行的，不闹白不闹。而且当时到了设计新政府的程度，就是我们要通过八九民运推出胡耀邦呢？还是推出赵紫阳？大家争论的结果，还是

觉得胡耀邦为好。……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胡耀邦一死，在我们这个层次上出现的这种反应。”

图2-12：1988年5月4日，方励之参加“民主沙龙”（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据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的统计，与此同时，武汉、南京、兰州都出现类似行动。它们增强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联系，推进了民主思想的启蒙，对即将发生的八九民运，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组织核心和组织形式。正如许良英先生总结1989年签名运动时所说，它们，为1989年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背景。

刘刚被禁止进入北大后，又在废弃的圆明园举办了参加人员更广泛的“渊鸣园”沙龙，每周五聚会。参加者除了北京各高校师生外，还有许多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如下面我们将要提到的美国在华专家林培瑞就曾多次出席。八九民运中首个高校联合组织——北高联，也是在这里进行首次聚会的。

据邵江综述：

“大概从1986年起到1989年运动，北京高校一直为学潮的重要力量。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北大等北京高校和社科院、中科院的师生，共同参加和组织了一系列的游行、静坐、集会沙龙和讲座等活动。在北大学潮期间，北京其他高校的师生也去北大张贴大字报和参加讲演。这为89年的民主运动高校联合打下了基础。”

第四节 方励之走上前台

方励之1936年出生于北京。在北京平民中学和四中完成中学学业。在国共内战期间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52年，16岁时考入

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被抽调进入高度机密的原子核物理专业。1956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方励之自己的话说，他此时已经建立了对于“物理—爱情—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信仰。

“在我们心目中，共产党不仅是真理的代表者，而且是道德权威的化身。……加入共产党，被看作是一种极大的光荣，它标志着一个人开始超越了凡俗的污秽，成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成为上帝的选民。”

如果说，他的社会经验已经使他知道，这个社会中的的人，是被划分为“可依靠者，可使用者，可争取者，面目不清者，不可信任者，予以打击者”这“六种人”的话，那么，他毫不怀疑自己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的“可依靠者”。他和李淑娴终生相守的爱情，也是在“这神坛之前”开始的。

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大鸣大放”在北京大学如火如荼地展开，方励之与李淑娴属于党团骨干，所以一直处在被群众批评地位。他们甚至已经准备向党交心，检讨自己的极左行为。但随即而起的“反右”，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因此，反右运动也并未波及他们。眼看到了9月，反右运动即将过去。但是，“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也在9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反右运动’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临北大。看了北大的大字报，出乎他们的意料，惊叹：‘北大右派的品质很高’。于是，他们立即破格优惠北大，必须再追加‘右派分子’，数目再提高几个百分点，即在北大的全体人口中必须找出超过百分之五的右派。”

两个“小人物”的美好的人生梦想，就这样在这位“大人物”的任性的弹指间破碎了！

方励之和李淑娴等人拟议中的给党组织的信，被揭发出来。他们成了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集团”。结果李淑娴被打成“右派”，方励

之因已经分配到中科院，不在北大的比例中，被内定为“漏网右派”。随后，他被逐出反应堆研究组，到河北赞皇县下放劳动。这是他从50—70年代四次被逐离物理学的“场”，而面对真实“田野”的第一次。

在赞皇，他从人类最初的燧石打火、最简单的用吊桶在井中取水开始，到打井、耕地、养猪、赶马车……即便如此，方励之并未改变信仰。他希望通过这“荒漠原始的磨练”，“使自己的灵魂走向圣洁”。他相信，“只有通过繁重而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使自己得以赎罪和新生。”当他到了为了凉快和节约不穿上衣，成日裸露着“黧黑发亮的前胸和后背，结实的肌肉”，和农村青年打成一片时；当他收到农民女孩的求爱信时，他确信，党交给他的“改造”任务已经完成。一度，他甚至劝未婚妻更彻底的向党交心。在和她分别的前三天，他们甚至“冷冻”了他们深挚的爱，以等待“春暖花开”！他虽然不再提“共产主义”，但自认不改变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念念不忘的仍是“科学，自由，民主，世界大同……”

1959年，方励之被从劳动地调进科大，但等待他的不是政治上的平反，而是开除党籍。此举对他的“走向反面”也许是致命的：

“在农村那八个月里，我还是极相信，只要经过努力的劳动，自己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成为一个受信任的人。然而，党籍的开除表明，一切真心实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他引用斯宾诺莎的话描述自己的转变：

“有如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

在科大，他从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到高年级的近代物理，从基础实验物理，到各门理论物理都教过。同时还参加了修筑铁路的体力劳动。但在老一代科学家严济慈的支持下，他开始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经中科院物

理所李荫远教授帮助，他得以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激光，并躲过发表学术文章的政治审查关口，逃脱彭真、罗瑞卿们把北京建设成“水晶城”的清洗计划。

在等待冰消雪融的日子里，方励之与李淑娴组成了自己小家庭。但他们等来的却是“文革”的大风大浪和妻离子散。

1969年，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搬到安徽。1970年，方励之从北京直接被送到淮南煤矿接受“再教育”。在地层深处一百多米的井下挖煤。

“地狱的黑暗，可能也不过如此了……”事后，方励之感慨道。

清查“5·16”运动开始后，科大迎来了另一次自杀高潮。原来用车拉土石的方励之，又改拉死人。

“在小停尸间外面，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在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夜深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

肉体和精神的苦难，使他开始思索“永生”的命题。与先前的“三位一体”信仰一样，这是另一部交响诗：

他发现，他所接受过“再教育”的赞皇的农民和淮南煤矿的工人，以及挖铁路隧道的士兵，对他们的“身份”和“专政”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都被这个制度“专政”着。所不同的是，他们只不过是以“主人翁”的名义被“专政”而已。由此，他发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虚伪。

在地层深处无边的黑暗中，他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最爱——天体物理！

“人的躯体和人的灵魂，好像都有自动地寻求平衡的本能。当要像左摔倒的时候，人会本能地向右……当在黑暗中时，人会本能地想到光明；当在丑恶中时，人会本能地更向往和谐与美。

八公山下的生活使我本能的驱策走向了天体物理。……

有什么力量能比得上永恒运转的天球，可以抵消那井下黑暗枯坐时所感到的压抑？又有什么圣洁能比得上繁星密布的苍穹，可以洗净那野狗和停尸间所散发的恶臭？”

而在烧砖的经历中，他更窥破了他所受的“再教育”是一种“伪理论”：

“五年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使我愈来愈觉得，我不可能接受当局的任何意识形态改造。事情已经那样一清二楚，就如在有了高温温度计的时代，不可能再接受‘看火候’技术一样。别了，我少年时代的一切政治偶像！……

……实质是科学的不可后退性。科学只能在科学自身作用下向前发展，而不可能由于任何非科学力量的强制和改造而倒退。科学史家萨顿曾经说：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方面从来没有倒退而总是进步，哪怕只是缓慢的进步，那就唯有科学了。在砖厂，这条哲理变得十分简单，想用两千年前的传统技艺来改造精确的数表达式，绝无可能。”

尽管依然衣衫褴褛、满身煤黑；尽管依然是一副掌握娴熟劳动技巧，而面无表情；但是，从此，他的内心深处的转换完成了！他有了对“科学”的新信仰。这信仰不仅支撑他度过暗夜，而且是他坚强的，可以用来抵御一切意识形态看似庞大、成体系、且貌似真理——而其实是谬论——的武器！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方励之是何时知道，自己和整个家庭的前半生命运，是由邓小平的那个任性的决定造成的。但是，从他的自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并没有沉浸在个人恩怨里，也没有把这种命运归咎于某个人的责任和世事的无常。相反，通过反思，他甚至得出结论，邓小平那祸害了中国多少知识分子，破坏了执政党和青年知识界关系的论断，在理论上未必是不对的。他渐渐地意识到，自己走向“反革命”是迟早的事。而原因，就隐藏他们那个“物理学—爱情—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信仰中：

“我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句话里讲清楚物理学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影响。我只想说，物理学绝不只是几个无情的公式，它所包含的精神和哲理是那样地强烈地关联着人生和社会，以致有人惧怕它，有人爱它，有人为它而受难。也许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的智慧只果，凡是吃过它的人，会更聪明，但也更痛苦。

物理学所必须的精神之一，是怀疑。”

“只要懂得了物理，就不可能再愚昧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权成为君临一切之上的指导者。

知识分子之所以偏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由科学必将抛弃愚昧决定的。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一个‘反右’政治运动相矛盾，而且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至高无上性，是绝对不相容的。所以，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必定要发生的。

‘反右运动’只是加快了这一离异进程。”

方励之也检讨过，他并未察觉大跃进的荒谬。他相信报纸上所放的“卫星”，即便有疑问，但囿于不是自己的专业，他也没有发表过不同意见。只是当他读到钱学森为大跃进寻找物理学“科学”根据时，他警觉了：

“物理学是不可欺的！……在1958年，已经清楚，生物生长原则上不属于平衡态热力学。生物‘吃’的并不是能量，而是负熵。决定产量上限的，是太阳所带的负熵流，而不是能量……”

原本，如果政治不来找麻烦，方励之等科学研究工作者未必有挑战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兴趣。就像保罗二世对中世纪基督教会所做的改革那样：既然“宗教要求笃信宗教的自由，科学则强烈地主张研究的自由”，那么，双方合作的方式只能是，“在任何意义下都不破坏各自的自主”。

但遗憾的是，即便退缩到纯粹科学研究的一隅，无产阶级在文化科学领域的“专政”，也不打算给科学家这种自由。

从1973年春开始，上海的《文汇报》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辩证法》杂志，突然发起了一场声势空前的对于“资产阶级宇宙学”的大批判。矛头所指，就是方励之文革以来所发布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中国“天体物理”研究的开山之作。在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那里，关于宇宙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有了结论！

这样的大批判，当然只能是适得其反。由此，方励之不仅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科学的局限，更发现了列宁、毛泽东的局限。由此，他看穿了所谓“精华之精华”、“科学的科学”，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已！

接下来的问题是，执政党为什么喜欢这件不存在的“皇帝的新衣”？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某些人（而绝不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专政”的需要。

方励之说：

“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专制：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上的中央计划专制；意识形态上的中世纪教会式的专制。三者缺一不可。”

“我想，正是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偶像，在我的心中，彻底倒塌了。”

好在文革的运数也不长久。此后，方励之和国人一道，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新时期，是以邓小平的重新上位为标志的。与方励之的一些同事不同的是，他对邓小平并无成见：

“有海外及港澳亲属的人，这时都急着设法移民。政府又开始准予移民……他们都是1949年从香港来大陆的。……”

“我们谈起对时局的估计。他持悲观立场，……他的主要理由是，邓小平重新上了台。这同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看法很不同，我们认为邓小平本人也遭到过毛的整肃，总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会重复吗？”

“几个朋友，在这股现代化潮流一开始，即纷纷离去。

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不能离开这块大陆，只有盼望它好起来。也许毛朝的结束是个转机？”

“四个现代化”包含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53年时那个浑身充满着干劲，一心献身美好理想的方励之似乎又回来了。所不同的是，盲目变成了清醒。“整个生活几乎全被天体物理占满了。”

然而，四个现代化并不是在真空中推进的。无论政治、经济、科技和国防，如果要突破旧的格局和意识形态，必然遭到旧势力的顽强抗拒。1977年7月，北京举行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全国自然辩证法讲习会，方励之应邀作了“现代宇宙学”的演讲。演讲原本完全没有挑战意识形态的动机，但他却收到“一大把听众递上台的纸条”：

“请问演讲者，你是不是要否定恩格斯的论断！”

“请回答，你是否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宇宙无限论。”

“会议主席，今天为什么请来这种满是反革命言论的报告，希望会议主持者考虑。”

可以想见，这些质询对方励之所起到的砥砺作用会引起怎样的反弹。他悲哀：

“毛朝的三十年锁国……长期的文化饥饿，使精神的胃液完全枯竭，失去正常的精神消化力。幻觉性自大狂，又使人拒绝吸收一切外来物，只能吸收自己的排泄物。

无知而又不自觉，这就是七十年代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困难。

不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过时，幻想科学现代化，断无可能。”

自此，他决定公开回应那些躲不开的质问：

“我认为，恩格斯的宇宙观念已经过时了。”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向马克思这样经典著作挑战”。演讲结束后，他被团团围住，久久不得脱身！

此后，他在上海、杭州、重庆、南宁、贵阳、昆明、安庆、乌鲁木齐等地多次做过类似演讲，结果如出一辙。

这是一个需要反叛的时代！

这是一个期待有人能代表自己说出心声的时代！

方励之，不管他对于宇宙和科学事业多么地钟情与忠诚，该当你被推上这个时代的舞台！

如果说，在此之前，方励之的许多言论都是出自被动的应答，那么此后的几件事，则是促使他走向主动，并承担起责任的契机。前两件，是他在科研和科研交流活动中产生的感想，后一件是他被任命为科大副校长。

那么，他的科研活动又是怎样启发了他呢？

第一件事情，是他应朋友之邀，到北京西北郊区的地磁观测站作为期两个月的的哨音观测。这次观测，使了解中国科技史的方励之想到，中国轩辕氏早在公元前2690年就已经懂得使用指南针 技术，利用地磁的指引，指挥大

军在大雾中行军，并打败了蚩尤的骚乱。但后代的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地磁的“进攻性”，而是只学会了用它来看风水。第二件事，是参加意大利国家电视二台制作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的科普节目。在物理学界一般认为，伽利略的“船舱发现”，对于“相对论”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幸的是，对自己民族的掌故更熟悉的方励之，立即想到，“中国汉代的古籍《尚书纬·考灵曜》中就有一段话”应该是更早的“相对论渊源”，而且表述得更简洁：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窗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

但方励之并没有被他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怀所蒙蔽，科学家的理性紧接着向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伽利略的发现“引发了不可遏制的科学潮流。而中国的思想先驱却只像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自生而又自灭了”？

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专制和孤立的社会，绝不会有发达的科学。没有自由的交流就没有科学。爱因斯坦说过：‘真正伟大和富有灵性的东西只能由工作在自由之中的个人所创造’。”

从1978年12月开始，走向世界的旅程使他更感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与制度的关系。尤其是在英国剑桥的半年经历，使他思索：一百年来，他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们，曾一批又一批地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每开放一次，就有人来一次剑桥，如今轮到了他。那么，是不是还会有下一代的“重复”呢？为此，1979年5月他为《大公报》撰文《在剑桥想到的中国的科学现代化》。

读者一定不难发现，此时，他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深爱的天文学，甚至也不是物理学，而是整个中国的科学事业前景的问题了！他为之担忧。而当这担忧在不断加深和有机会解除时，他必然不能不有所行动。

说来幸运，方励之对祖国科学事业的激情恰好与此时国家的“四化”建设目标合上了拍！在上世纪80年代，乘着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

革命化”的东风，方励之这位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1984年9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到1987年1月被撤销这个职务，约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方励之在这个位置上干的可谓有声有色，但也从此被形势推上了一条不归路。其中有几个事件，甚至于震动朝野：

第一件，是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认为前十七年进行的是“愚民”教育，背离现代教育观，由此开罪于国家教委的某些人。

第二，发表著名的“谁养活谁？”的演讲。向学生灌输“纳税人”观念，用实际数字表明，不是执政党给了学生受教育机会，而是纳税人享有受教育权利。

第三，在北大无线电系学生会作报告，揭露北京市副市长冒充物理学家，顶替名额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致使安徽省委、中纪委、中科院出面干预，提出“劝方退党”和无限期取消出国研究讲学机会。只因在胡启立、胡耀邦的力挽下，方励之躲过一劫。但此事在清算胡耀邦包庇“自由化分子”时，成为了他的罪状之一。

第四，发表一系列讲话，对“自由化”推波助澜。

在上一章里，我们曾谈到邓小平为与戈尔巴乔夫竞争“改革旗手”需要舆论造势；在本章的上一节里，我们谈到陈子明们从“经改”转向“政改”，抢占战略制高点的变身，以及二者与1986年夏季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舆论的关系。后来的许多历史论述者把这一轮“舆论热”归结于“自由化分子”一手推动和胡耀邦的纵容，这至少是片面的。看看方励之这一系列讲话出台的过程，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舆论背景：

“在1986年的夏天，至少我，完全没有预感到几个月后即有危机爆发。在我从美国回北京之前，我还到人迹稀少的北极圈里逍遥。……对北极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的一切都乱了套。一天可以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年也分不

出春夏秋冬，奇努那 同时有春天的花，夏天的不落的太阳，秋天的层云，以及冬天的寒风。”

“这时，我想起朋友来信说，北京兴起了文化热，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改革到底应以‘中文化’为体，还是必须‘西文化’化。……我对这种争论的兴趣不大，……第一，我不是文化问题专家，不敢冒说。第二，争论中涉及的许多……物理学家所关心的常常只是正确与错误，先进和落后，很少管东方还是西方。在北极上，甚至连东西南北这些概念都一律不能用了，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坚守‘中（东）体’。当我在奇努那静观环行不落的太阳的时候，蓦地想到，可以答复朋友了：在我看，中国改革所需要的恰是抛弃‘东’‘西’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应当‘全方位开放’，即凡好者皆可用之，根本不必管它是东是西。”

这就是后来被批为“自由化”的“滥觞”。

此后，他应邀到青岛参加了一个中西文化研讨会。讲出了这个想法。在以后召开的宇宙学会议期间，他又对记者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按照‘全方位开放’的逻辑，很自然，我主张中国首先应当实现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励之说。火上浇油的是，《人民日报》同时刊出一条消息，公开报道了方励之的办学思想是：科学、民主、创造、独立。

“全方位开放”以及它附带的“三大自由”和“四项宗旨”很快被官方认为是挑衅性的。为此，邓小平还大为光火，声称：“我们的宪法被人利用了。”

在上海交大为研究生作《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这场演讲时，方励之更“闻到一股极强烈的对现状不满”的味道：

“你对党的领导无孔不入有何看法？”

“你认为中国的贪官污吏占当官的人数多少？”

“四个坚持是否有碍于中国的进步？”

1986年11月18日，当方励之应邀为同济大学作题为《民主、改革、现代化》的演讲时，他放言高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他不仅批评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还向听众介绍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么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

这一天，上千的学生打着“方励之，共和国需要你！”的横幅涌进会场。

此时，“八六学潮”已经箭在弦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中央分工主抓方励之问题的是中共最开明的领导人万里。方走到哪里，万里便坐镇哪里，方每发表一次高论，万在会后立马要调用方演讲的录音。11月30日，万里甚至在合肥安排了一场批评教育方励之的“座谈会”，说政府已经给了方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据方励之回忆：

“如果万里是在他的中南海办公室里批判我，我绝不会有兴趣正面顶撞他，多半是含糊其辞应付几句就算了。但是，在稻香楼 的一百多位观众面前，一种教师常有的阐述真理欲控制了我。对不起，副总理大人，别无他路……

一场恶辩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两个人说话愈来愈快，声音愈来愈高。……至于万大人最后激动到如何程度，我只想说最后一个回合的辩论就够了。这个回合是：

万里问：‘你的党龄多长了？’

‘三十年。’我答。

‘我五十年了。’万里终于得到一次五十对三十的绝对胜利。”

在与万里辩论后的第五天，科大学生上街游行。所践行的理念，就是这次辩论中方励之的一个观点：

“民主不是赐予的”。

万里对方励之的惨胜，无疑鼓舞了正在争取民主的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但却使高层的天平发生倾斜——在下来的“倒胡政变”中，本来势单力薄的胡耀邦失去了一位盟友。而这最终也决定了方励之们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此前，方励之曾应胡启立之邀为《人民日报》1986年元旦的版面撰写一篇教育学生的文章《危机感下的责任》。在该文中，他曾谈到“占星术”：

“我们不相信占星术，但事情不无巧合，哈雷彗星的回归常常与社会转折的年代十分相近……哈雷彗星的这次回归，是否又巧合着中国在走向繁荣未来的改革中所引起的转折呢？”

这篇文章显然不可能被采用。外界也无人知晓。但在年底的学潮中再次失去党籍和被撤销副校长职务的他，事后也自嘲道，没想到“自己的‘占星术’应验到了自己头上”。

第五件事，便是本书上一章提到的1986年11月，方励之与许良英、刘宾雁筹备召开“反右运动（1957）历史学术讨论会”。正是这次很可能被邓小平理解为“清算”的未遂的讨论，最终促使“反右”运动的主持者邓小平对方励之等“自由化”代表人物痛下杀手！

这时，身在合肥的方励之不断接到夫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据她从“极可靠方面”得到的消息，中央在讨论处理方励之的各种方案，其中一种是制造车祸，一了百了！

1986年12月30日，就在方励之登上回京列车的同一天，邓小平作出了“对方励之，不是劝退，而是开除党籍”的决定。并以中共1987年一号文件下达。这也成为了当年全国第一条新闻。紧接着，他的被免职和调离消息，又登上1987年1月12日、19日晚全国电视黄金时段的头条新闻。随后，中央又编发了10万字的《方励之言论集》印发50万册。遗憾的是，这种种措施，不仅没有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使方励之在大大扬名的同时，其思想得到迅速传播。当中央发现这个问题，命令收回材料时，却为时已晚。因为它立马又在黑市书摊出现。

据方励之回忆：

“从年初，电视上开除我的党籍之后，我就开始接到大量各地来信。批判文集由中央发行后，再一次出现来信高潮，纷纷表示赞同我的观点。有一天，我一次就收到157封。信来自全国各地。写信的人，有大学生，中学生，有知识分子，中级的，高级的，有工人，也有军人和干部，甚至有在中央工作的干部。信的内容，有的支持，有的慰问，有的大骂当局之蠢笨，也有的抄诗献诗……”

从方励之开始，中共不再使用“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等名称命名异议人士。而是与国际看齐，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此后，方励之所到之处，都使他感到“认同持不同政见者，就像流行的‘瘟疫’一样，蔓延而不可遏止了”。

意识到这种时代的变化，方励之的言论也更加尖锐直率。据布热津斯基记载，1987年3—4月的《中国之春文摘》发表了方励之在上海一所大学所作的讲演。他宣称“全盘西化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并强调指出了这种改革的政治内涵。他说，“第一步是要清除我们头脑中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他接着指出，任何真正的民主概念都必须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

“我们在不久以前追求的民主只不过是要求放松限制.但必须指出，民主与放松限制并不是一回事。民主的关键内容是人权。……”他还把矛头指向北京的政治改革“我们的政府给我们稍微松了松绑，但并没有给我们民主。它只给了我们转身的自由。”

1987年9月，方励之参加四中母校建校八十周年校庆。方励之回忆道：

“正当我不无遗憾地回忆着自己守规矩的中学生活时，一个大型恶作剧在酝酿了。

……当会议主席宣布由学生家长代表讲话后，上来的竟是王震。大家心里不免咯噔一下。这位王先生当时很有名，不是因为他即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而是他主张杀人。那年的政治大事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位土匪出身的‘共产主义者’公开主张‘杀他几十万’，以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如果他讲讲他当年当土匪如何打家劫舍，也许还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可是，这位先生很不知趣。真要在这些老少学生面前摆出一副‘大家长’的架子。可惜，他的无逻辑的、不合文法的语言，只让听众证实：他还不够资格进四中当一名学生。这种人及这种讲话，正是四中学生绝好的捉弄对象。此时不捉弄，更待何时。捉弄他！

正当这位先生在台上自我感觉很得意时，我发现，我的四周围满了青年学生，正向我指指戳戳。心想，不好！这批年轻的校友们这次要推我扮演恶作剧的主角了……开除我的事件，好几天里都是全国电视台新闻的头条。……果然，我周围的人开始自由化起来，他们不再理睬台上的‘大家长’，而来请我签名。最初还是零星的，随后，就是一小股一小股地过。会场开始骚动。接着，又过来一些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学生，他们非但不制止骚动，却自己也来请我签名，从而引发更多的人围过来。我所在的会场一角，全乱了。这时，正在台上主持会议的四中的党总支书记（他是我的中学同班）和副校长（他在中学比我低两班）见状不妙，马上下台来到这混乱的一角。他们两位是老同学，就不客气地像警察一样，一左一右把我架起就走。他们

的原意是要我暂时离开会场，以平息混乱。可是，他们的行动引起更大的瞩目。一大批学生拥挤在我们周围，并随着我们一起离开了会场，好像是一场预谋的游行。由于包围我的学生愈来愈多，我的视线完全被封闭……

……我被学生围困在四中的校长办公室，为他们签名，直到下午2：00才获得自由。”

图2-13：科大(北京)学生争相请被免职出党的方励之签名（87.9.23。选自《方励之自传》）

事后，这位家长代表的态度不见消息。但有迹象表明，邓小平已经决意为“家长”出气。很多人已经看出，这位1957年的“大人物”，确实已经和当日的“小人物”“对”上了“眼”！

1988年夏，方励之夫妇还在外国，就听到北京传来邓小平准备起诉方励之的惊人消息。他要告方励之“诽谤”他的“家人在国外有账户”！方励之承认，这事缘起于他在周游世界时，传播了国内大学的一些未经证实的“谣言”。但这既不是方励之的编造，他也没有添加内容。一般说来，和这样的传闻较真的领导人很少。但邓小平这回是要较真了。为了亲自拿到方励之的“诽谤”罪证，他们还派出两个驻港新华社记者，“采访”只问了一个问题，即你是否说过“领导人在国外有存款”。警惕性不高的方励之，提供了自己的“罪证”。

“9月，法律界的朋友告诉我，邓小平确已找过律师来咨询这诽谤案。在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全国发行的《参考消息》，也登出文章，点名说我的言论已属诽谤云云……”

“很多朋友为我捏一把汗……不少人帮我做了事态可能恶化的具体准备，有人帮我延聘律师，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认真蒐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已备反击。”

“最紧张的几天，是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到庭对簿。在那些日子，心情当然有些不安定，但反过来想，如果真的有机会同邓小平先生在公堂一搏，即使败诉，也不失为人生一大可书之事。其代价或许是要为‘诽谤言论’而赔偿给邓小平一笔钱。真到那时，愿意损出这笔赔偿费以资留名者，必定大有人在。”

但是，不知道老头子是因为突然想通了，这样做得不偿失？还是认为，已经达到了吓唬方励之的目的？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结。因为，各种企图借力腾升的政治力量，已经把这看在眼里，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种算计和运作，最终把这个一言九鼎的老人由病态推向疯狂。记住这一点，对于解开八九民运的许多谜团，是不无裨益的。

此事的草草收场，不知道是否令方励之略有遗憾？据他揣测，老头子大概是意识到，对他的打压只能起到使他更风光的作用，不愿意再抛头露面来为他“做广告”了。这个意识之危险，决定了方励之还要再一次撩惹这个已经缺失理性的老人。1989年1月6日，方励之亲自给老头子写了一封信：

中央军委

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40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70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40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颂

近祺！

方励之

1989年1月6日

这就是被后来的历史当作1989年第一件大事，也是八九民运的直接导火索的那份著名的“方励之上邓小平书”。

据方励之说，这封信的灵感，也是来自宇宙学的提示。那时，他正在写作“超新星爆发”。由于他自离开中国科大后，被分配单位——北京天文馆（古代司天监）——的传统，就是向号称“天子”的当政者报告天象变化的重大信息，“建议颁行‘大赦天下’，用以感动上苍消灾减祸造福社稷”。方励之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自觉地总是把天象的变幻与的社会前景作某种联想和预言。

或许，他还想到了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那次“特赦”？他的夫人李淑娴，就是在那次特赦中摘掉“右派”帽子，并从农村回到北大的。

可能是出于顾及朋友安全的原因，方励之把“上书事件”完全归于个人的行为。但据许良英介绍，此事的背景并不那么单一：

“1989年，适逢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有志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的知识分子于1988年的11月就开始酝酿筹划纪念活动，

希望通过一系列纪念活动，来提高并普及人民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许先生也做了同样的陈述。

1988年12月25日许良英先生给笔者的信中也有这样的建议：

“明年是‘五四’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是开展民主启蒙运动的大好时机，希望你和文化报 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目前这篇文章 为主线，你是不是可以写一系列文章？1985年纽约出版的A. J. Nathan的Chinese Democracy，你看过没有？其中有一章是讲西单民主墙和1980年的选举，对你可能会有参考价值。”

图2-14：许良英1988年12月25日给陈小雅的信（本人收藏）

这封信及其邮戳可以证明，关于利用两个“纪念日”进行启蒙的话题，发生在方励之的“上书”之前，而许良英又是方励之的好友。这说明，“上书”中的这个内容，在当时至少不是方励之个人的突发奇想。所以，方的上书，尽管在行动上可以看作个人行为，但在思想上是有代表性的。

第五节 布什的晚宴

据称，中共中央在向各单位传达时，都宣称，方励之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及其以后的几封联名信，都是美国支持的。“美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美国是否支持这几起签名信？除“美国之音”的公开报道外，我们从方励之的自传中，仅能读到有关林培瑞“插手”的一段详情。他是这样写的：

“（上书）第二天，元月7日，有两位客人来我家。……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中国，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东方纪事》

的编辑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为他们的刊物写稿。顺便，我也给了他一份致邓小平信的副本。当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给了一些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

至于林培瑞的身份，新华社内部确曾有说法，但时隔二十余年，并没有出现新的材料予以证实。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插手其事的只是一位“美国公民”。至于“美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事后，方励之在避难美国大使馆期间书写《自传》时认为，美国并非没有愿望，但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少在当时，不是激怒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看来还没有多少现成的章法。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的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一时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极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李淑娴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

布什总统的告别宴会邀请有五百位客人。即便方励之夫妇到场，也只占五百分之二。美国政府的“智囊”或许指望中国领导人也是这样算账的，并且可以糊里糊涂地糊弄过去。

然而，方励之在这里显然不是一个“数”，他代表着一种“质”。是否容忍与方励之同宴，不仅代表着一个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政策立场，而且意味着，是否容许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内政”进行某种安排。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在多年后出版的《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也认为，说美国支持这几起签名信“无法核实”。但是，美国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确有其事。最显著的事例，就是他们对布什总统晚宴的安排。该书对“赴宴事件”描述简练完整，姑引于此：

“2月25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26日晚，他在长城饭店举行得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几名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出席。他们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经济学家苏绍智、文艺界著名人士吴祖光。老布什到别人家里做客，邀请主人不喜欢的人，主人当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请的人当中，除方励之外，其它四个人都出席了。方励之接到请帖后乘车去长城饭店。途中车子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扣下。方改乘出租车，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他又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这位外交官用外交车把方励之送到香格里拉饭店的新闻中心。在这里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第二天在家里又开了记者招待会。28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3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在中国方面看来，这等同于把邓小平此前会见布什的谈话视作耳旁风。因为就在布什告别晚宴的当天——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对美国总统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这显然就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它是参考苏东局势，并对其前景作出估计的产物。但是，“晚宴事件”使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据日后成为八九民运骨干的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回忆：

“……北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子之死。……他留了一个遗书，这个遗书非常苦闷，就是说没有出路。这个是北大学潮的一个起源，人们就要思考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方励之的一封信，方励之给邓小平签名的一封信，签名运动，就是释放魏京生，这是第二个对北大震撼的。

第三个对北大震撼的就是方励之的赴宴。二月份布什请方励之吃饭，方励之去了，但是被警察拦住，说是司机违章。用这个非常卑鄙的手法，没让方励之去准时赴宴。方励之第二天在北大贴出了一个没有赴宴的经过。这个经过在北大人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反感：共产党现在什么手段都使了。”

第六节 包柏漪们的“中国梦”

自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已并入苏东改革的步伐，而后者在最近的两年显然已步入快车道。尽管在当时，攻克共产主义的主要堡垒尚遥不可期，但乐见自由主义的旗帜在世界飘扬，却是里根政府的理想。2007年秋，当笔者为筹备一部描述上世纪80年代文化思潮的电视片，就中美文化交流采访张郎

郎先生时，他谈到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在当时的一些活动，使我们可以略窥这种国家理想和个人奋斗目标是如何相结合的。

据网络资料，包柏漪祖籍浙江宁波。父亲包新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代表。母亲方婉华出生于安徽桐城，是清代文学家方苞之后。包柏漪1938年11月3日出生于上海。1946年包新弟移居美国，随后包氏一家赴美定居。1960年包柏漪在马萨诸塞州的塔夫特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与同班同学温斯顿·洛德交往相爱。1963年两人结为伉俪。

据张郎郎介绍，温斯顿家族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古老世家，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有着共同的血缘。洛德的爷爷一直认为，这个世代贵族联姻的“蓝血”家族需要注入新鲜血液，才能焕发活力。所以，当包柏漪与许多金发碧眼的同学一道去洛德家里做客时，家中的老爷爷独独注意到了这位黄肤黑发的亚裔女子。性格活泼，举止大方的包柏漪很快赢得了老人的欢心。于是，爷爷决定了孙子的这桩婚事。

据网载，洛德毕业后分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也许是碍于美国政府的回避制度，他同包柏漪结婚后，曾一度被禁止接触有关中国的事务。洛德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多年，经历了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等几任总统；曾担任过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远东事务特别助理。1971年，他曾随同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促成了尼克松总统的首次访华。1985年，洛德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包柏漪遂成为大使夫人。

其实，早在1973年，包柏漪就与丈夫一道随基辛格访问过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这是她27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1981年，她根据其访华经历出版了其代表作《春月》，该书曾成为《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并获美国图书奖提名，还被《出版家周刊》誉为“中国的《乱世佳人》”，后来被译为18种语言文字。1982年，包柏漪获得塔夫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84年，她又出版

了儿童小说《猪年的棒球王》，该书于1985年获美国图书协会杰斐逊杯奖。所以，当包柏漪以大使夫人再度出现在更加开放，西化潮流处于一个时代的顶峰的中国政治舞台时，立即成为了文学青年瞩目的明星。

能参加包柏漪的“洋沙龙”，成为当时新锐的文艺中青年的一种荣耀。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当时的中国，每个有抱负的学者和从事创作工作的艺术家的最大愿望，就是去西方呆上一段时间。他们把本国视为穷乡僻壤。美国赞助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尤其是那些由福特基金会几年来资助的各种交流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新的生活方式、技术上的进步和文化上的探索使他们大开眼界，心驰神往。

据估计，到 1987年，大约有2 .7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相比之下，来自苏联的学生只有几十名。哈佛大学 1988年报告说，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全世界为哈佛大学提供研究生最多的10所大学之一。

而包柏漪的沙龙，难免成为这股潮流中那些不得其门而入者争相跻身的场所。从“民主墙”时代起就追求文艺自由，但在自己的国度里只能扭曲着求生长的先锋青年，自然便成了她的常客。这中间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后来都成了八九民运中的弄潮儿。

据张郎郎描述，包柏漪经常举办各种不同内容的沙龙：有时是电影晚会，有时是宴会，有时是联欢会，有时是座谈会……“每周都有两三次”。今天搞戏剧的，明天搞电影的。从轻音乐到民间剪纸……在“摇滚乐”被意识形态权威指为“资产阶级的没落文化”加以禁止时，她亲自参加了崔健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专场演出，并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场下舞动……在当时，能得到美国大使夫人的如此鼎力支持，不能不给自由文艺界极大的鼓舞！

张郎郎认为，青年们从包柏漪这里需要满足的无非是两条愿望：一个是出国，一个是打开自己的眼界或打开自己的场面。在画家里，当时有不少人送画给包柏漪。因为他们在包柏漪的家里看见她从纽约市场上买来的极简单

的画，却卖出很高的价钱，这使他们对自己的估价产生变化。在给包柏漪送画的人中，出手最重的莫过于作家冯骥才，他甚至送出了亲自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他分文不取，据认为是想通过包柏漪的展示，让人们知道他还会画画。但这种奉献的结果，是青年艺术家之间的竞争。张郎郎说：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是我们把她给惯坏了！”

当然，在这位大使夫人的“粉丝”里，也不乏有特殊使命的人，如著名戏剧艺术家英若诚，著名翻译家吴世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包柏漪的志向绝不在于利用身份之便充实个人的收藏；也不仅仅在于文学艺术的欣赏或创作；或单纯地为配合丈夫的职务广交朋友。据认为，在女性政治家日益频繁地角逐美国政坛要职，少数族裔政治家日益受到美国政府重视的当日，包柏漪确有一颗角逐未来女总统的雄心。

如果这个信息是确实的。那么，包柏漪要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共产主义堡垒打开自己的从政道路，在张扬“人权”、普及“美国价值”上建功立业，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这是我们理解，她在卸任前后，将触角伸向更广的思想理论界，与那里的“风云人物”密切来往的原因。

张郎郎回忆说：

“这个‘洋沙龙’最大的变化是，包柏漪通过这些文艺界的人突然认识了一些社会科学界的人，就是所谓‘政治人物’。所以，她请了北大的那一批人来，她的整个人生也开始了变化。当时，我问过一次包柏漪。包柏漪那时的兴趣，从文艺界转向政治。所以，他最大的败笔是，里根（布什）总统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她力促要请方励之。所以，让赵紫阳政府和里根（布什）政府陷入一个尴尬境地。这是我后来总结的这个‘洋沙龙’的败笔。就是，因为它超越了自己这个‘洋沙龙’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关于美国政府在“赴宴事件”上陷入尴尬，并且不快，应该是确实的。这从方励之的自传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本书最后一节，我们还要介绍，1989年6月5日，当方励之第一次进入美国大使馆请求“借住三五天”时，没有接到来自白宫的新命令的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伯瑞光，对他的态度是冷淡的。方励之认为，这不是伯瑞光个人的态度，它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脸。

图2-15：包柏漪（选自网络）

如果张郎郎提供的是来自包柏漪本人的准确消息，那么方励之所说在“赴宴”事件上，那些给总统出主意的“聪明的智囊”就水落石出了。据“六四”事件后，方励之滞留美国大使馆期间的一份手书《避难时的陈述》，包柏漪确是访问过方励之在北大的家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虽然方先生没有谈及这次到访的时间，因而，我们也无法判断，这是否与她卸职大使夫人后转向媒体的运作有关？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赴宴事件”是以方励之奔向香格里拉酒店的外国记者新闻中心结束的。而那里，正是卸任后的大使夫人的供职地点。但无论如何，这一切，也都不可能逃过中国情治部门安插在方励之和包柏漪周围的耳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到一个不自由国度实现自己的梦想，会出现怎样错综复杂的局面！而这个人越是有创造力和独特优势，她的成果便越是奇诡！

第七节 知识界的签名风潮

方励之给邓小平个人写信，经后来每每在方励之人生的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教授林培瑞之手，变成了一个“事件”。通过自己的渠道，方励之确信邓小平已经看到了他的信。但是他本人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于是，

他把邓的沉默当做了“佯装不知”。此事在中科院内部引起了热议。春节期间，方励之的好友许良英酝酿发出有更多科学家签名的“公开信”。

但有意思的是，捷足先登的并不是这些与方励之关系最近，但思虑过于周密的科学家们的文字，而是最先看到方励之信的英文版，准备在国内民运中有一番作为的、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联”成员陈军策划的“33人签名信”。碍于身份的敏感，公开信由著名朦胧诗人北岛领衔。他是方信重点提到的魏京生在“民主墙”时代的“同仁”。为此，北岛和老木走访了方励之，并向他询问了“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方励之给了他们一份自己信件的副本。

2月13日，有33人签名的《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发出。三天后公开发表。其内容为：“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1989年1月6日致邓小平主席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

我们认为，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的。

1989年2月13日 ”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33人：北岛、邵燕祥、牛汉、老 木、吴祖光、李陀、冰心、张洁、宗璞、吴组缃、汤一介、乐黛云、黄子平、张岱年、陈平原、严文井、刘东、冯亦代、萧乾、苏晓康、金观涛、李泽厚、庞朴、朱伟、王焱、包遵信、田壮壮、刘青峰、芒克、高皋、苏绍智、王若水。陈军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了最后。

许良英组织的“公开信”迟至13天以后才发出。但就内容的全面、人员的整齐，以及致送之广大，却是三封公开信中首屈一指的。这封信写道：

“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开放、改革为基本国策的我国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中间曾出现过一些曲折和失误，但总的发展方向还是顺应民心和世界历史潮流的，这个十年确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进中遭到严重障碍：腐败成风，‘官倒’猖獗，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为此忧心忡忡。为了使现代事业不致夭折，我们这些长期战斗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线上的老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本著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以赤诚的爱国心，恳切地向你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坚持开放、改革的前提下，尽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因为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告诉我们，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经济改革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必要保证。只有实现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困难，全国人民会乐意共同承担，通过群策群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且，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民主，在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有效的舆论监督下‘为政清廉’才有可能实现。反之，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就无法杜绝腐败现象。这一历史必然规律，早已为人所共知。

（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只要人民能够畅所欲言，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公开发表，对任何领导人批评不会受到打击报复，全国就会出现一个活跃、舒畅、和谐的局面，公民的民主意识就得以充分发扬，这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改革由此可以顺利前进。

（三）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将为我国政治开创一个新纪元。

（四）对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应予以必要支持，尽可能增加教育经费和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识分子（包括老、中、青和已离退休的）的生活待遇，使他们不致长期陷於困境。目前已有若干50年代的一级教授申请困难补助，最近又有78岁二级高级工程师因生活困难而跳楼自杀身亡。这显然不利于现代化事业，也有损国家形象。

以上建议如蒙采纳，将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七十年前五四运动先驱者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发扬光大，也将为建国四十周年创造喜庆的气氛。

此致

敬礼

1989年2月26日”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钱临照、王淦昌、施雅岚、许良英、过兴先、薛禹谷、叶笃正、黄宗甄、胡世华、朱兆祥、周明镇、许国志、蒋丽金、孙克定、汪容、刘源张、茅于軾、胡济民、严仁赓、张宣三、杜汝楫、于浩成、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刘盛际、邵燕祥、吴祖光、王来棣、顾知微、戈革、刘辽、张昭庆、梁晓光、张崇华、厚美瑛、吴国祯、蔡诗东、曹俊喜、萧淑熙、周礼全、梁志学。

关于这封信的起草背景，许良英先生曾作过一个回顾：

“1989年1月，方励之发表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我和老同学施雅风商量，要效法‘公车上书’，推动中国民主改革，我起草了一封致党中央的信，提

出四方面要求……当时签名的人有42人，绝大多数都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由我的老师王淦昌和钱临照先生领衔。”

这三封信的差别一目了然。

第一封、方励之个人的信，因其致信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个人，而显得锋芒毕露。它虽然没有使用任何不恭敬的言辞，但仅此第一句，就等于向世人直戳邓小平依靠军力成为“独裁者”的鼻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特赦”的权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特赦的权力在国家主席。现行宪法中没有关于“大赦”的条文。1954年宪法中“大赦”的权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这一权力在1982制定的新宪法中被取消。在中国，除了古代封建帝王，还没有过实行“大赦天下”的先例。而方励之向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大有试看你老邓敢不敢当“真帝王”的意味！

另一具有挑战性的特征在于，方励之在信中赤裸裸地点出魏京生的问题。他虽然没有否认其“罪”，而是要求“赦免”，但知情者都知道，魏京生实际上是因触犯了邓小平的政治权威才被系狱，并判刑15年。它难免让人们再次回味，所谓“改革开放”和由邓小平创造的“复兴时代”，不过也是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一个王朝。

其三，不论“大赦”或“特赦”，历来都是由最高统治者主动做出的。其效用在于显示其开明政策，营造和谐宽松气氛，祈求上天免灾。现在，即便邓小平采纳了方励之的意见，统治者不仅不能营造气氛，反而会因此大失颜面。这难免让邓小平认为，方励之并不是想让他做什么，而是逼迫他再一次重犯“死不改悔”的过错！

毫无疑问，当方励之第二天便把此信的副本交给林培瑞时，就是不打算等待邓小平的答复的。它以《公开信》的形式公诸于世，实际上就是不给收

信人回旋余地。在邓小平看来，这无异于一份公开战书，一纸“最后通牒”，它的发出无非是要给邓小平一种公开的“压力”。

北岛领衔的“33人签名信”，并不比方励之的信更尖锐。甚至口气相当缓和。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是一种友情的表达。在第一卷第二章里，我们已经谈到，从魏京生被捕的那一天起，他的“民主墙”战友就一直通过各种办法声援并试图营救魏京生。而北岛是“民主墙”时期唯一公开宣布过“与政治兴趣浓厚的诸团体划清界线”的人。他和同仁主办的文学刊物《今天》，是以“追求文学解放”为目的的。据魏京生本人后来说，当时，在一个以法国“德雷福斯”案件为援例的“民办刊物联席会议”上，北岛曾公开过自己的这一观点。但正因为北岛的这种非“政治化”的色彩，给当局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为它预示，民主运动中“人权”主题的凸显。

而从表达形式来看，“33人签名信，突破了“个体”的阀门，开启了“群体”活动的先河。再加上运作者陈军与“中国民联”的关系，所以，该信在官方所引起的不快，以及签名者受到的特殊“关照”，程度都是空前的。

1989年2月22日，中共有关部门连续组织了《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3月6日，《北京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对魏京生定罪判刑理由很充分》的文章，3月18日与22日，有大陆背景在香港《大公报》又刊登了《知情者谈魏京生》、《陈军发起签名信前后》等文章，一方面切割大陆民运与海外民运的关系，另一方面试图消弥“公开信”造成的影响。

相形之下，第三封信没有提到魏京生的名字，因联署者的身份特殊，它的待遇也比前者略好。据许良英介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科学家联名发表政治见解。”

“那时候，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态度还比较好。这封信被《美国之音》广播之后，科学院开了会议，党委书记传达中央讲话，说我们的信内容没有问题，不要给签名的人压力，不要找签名的人谈话。以后，统战部部长阎明

复特别找到我和我爱人，还有施雅风谈话，谈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他说，你们有意见尽管讲，我们就放开来讲了很多，我们觉得当时中央还是比较开明的。”

据说，多年后被送往美国的魏京生并不认为方励之的上书和“33人签名信”对他的出狱帮了什么忙。相反，他认为“方励之他们是因为事先知道了邓小平要放我们，才发表了呼吁书，反倒让我们出不来。”

但是，无论如何，随着三封“公开信”的陆续发表，1989年思想文化界寻求表达的序幕已逐渐拉开：

1月28日，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和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北京“都乐书屋”举办“新启蒙丛书”首发仪式兼组稿座谈会。李锐、童大林、秦川、胡绩伟、苏绍智、李洪林、于浩成、吴明瑜、张显扬、包遵信、李南友、严家其、金观涛、刘青峰、方励之夫妇等一大批老中青自由派知识分子参加了沙龙。各国驻京记者也倾巢出动。参加者共约百余人。会议开始不久，先由苏绍智介绍最近考察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随后大家主要围绕苏绍智的发言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讨论。苏绍智的发言将中国当前的形势与波兰、苏联的危机进行了类比。王若水则呼吁警惕中国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封建专制主义。他说，与那些“左派”相比，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举办者并未正式邀请方励之参加，但方随朋友到会并介绍了“上书”的要点，“中心是要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在讲人权，就是中国不讲，谈不上人权，民主、自由都是空话。中国在人权宣言上是签了字的，但是国民党签的。因此，争取人权是个重要问题。”他还说，“当前是个非常好的时机，广发议论不行，最重要的是行动。今天的会、出版《新启蒙》也是行动，但还不够。”

当时，有感于会议的参加者身份的清一色和发言的气氛的热烈，一位美联社女记者曾风趣地说，如果此时在都乐书屋丢一颗炸弹，中国的自由化分子势将全军覆没。

当然，炸死的人中也难免会有一些“无名英雄”。当天，他们就把座谈会的情况，以《电话摘要》上报了中南海。第二天，方励之评论头天会议的言论也汇报了上去。方励之说，昨天的会“火药味很浓，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现在当局根本就没招了。我觉得这种会连着开三次就要上街了”。事后，都乐书屋女主人于燕莎被稽查。一些赴会者被盘诘；丛书的责任编辑被审查，公安部门多次传讯了到会者。王元化不得已找到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芮杏文，此事才不了了之。

2月4日，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许良英、陈军等也参加了座谈并发言。方励之在会上发表了“民主”和“人权”问题演讲。他“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

2月16日，陈军在“JJ艺术酒吧”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33人签名信”。

改革派喉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试图把“签名信”的讨论合法化，为此专门组织了文章，对于“大赦”与“特赦”在法律上的区别加以澄清。

图2-16：1989年初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陆一提供）

1989年第一、二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苏绍智、严家其谈“五四精神”的文章。指出：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至今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人，在发展民主与科学的艰难道路上，帝制阴魂不散，封建专制主义始终是头号大敌。为此，除了科学民主之外，还要厉行法治。

另一些传媒人士，则以一种看起来“不经意的方式”让吴祖光、苏绍智在电视荧幕上曝光。

在科学家签名信之后不到二十天，作家戴晴、苏炜又组织“文化界人士”推出了第四封“公开信”。该信道：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值此国庆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建国以来的惯例，大赦一批在押人员。前不久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了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

1989年3月14日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戴晴、苏炜、徐友渔、赵世坚、史铁生、李聃、张胜友、赵越胜、聂峙砥、吴方、孙乃修、周发祥、陈燕谷、许明、靳大成、乐勋、王行之、王信、安延明、张晓明、柳鸣九、苏国勋、查建英、毛崇杰、袁红、林岗、汪晖、陈嘉映、朱正琳、严家其、吴予敏、张暖忻、吴彬、陈宣良、张卫、郑也夫、陈奎德、何怀宏、远志明、邝杨、黎鸣、李银河、周辅成

正如许良英所说：

“这些公开信为随后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准备。运动的中心口号——‘民主’、‘自由’、‘打倒官倒’、‘打倒腐败’，显然都是与公开信的内容相呼应的。”

第八节 山雨欲来

1988年至1989年初的中国，由三个原因造成了理论界空前活跃的局面：

其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理论界“放”和“收”的轮转，几乎形成了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的规律。在两年一轮的周期中，1988年正逢“夏季”。一年前因“反自由化”运动导致胡耀邦下台，将一批“自由化”头面人物开除党籍的警示，一方面已经被大部分人遗忘，而在相关人士方面则有愈挫愈勇的势头。中共“十三大”重新肯定“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公开宣布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的报告中甚至专门有一节阐述“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并宣示“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加之“左派”精神领袖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马……这些，都使人有理由相信，一个理论的“春天”已经来临。

其二，1988年12月18日是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暨“改革十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国人的不论是政治习惯还是生活习惯中，都有逢十“大庆”的传统。而对于思想理论界，这是一个总结、反思，向新的里程碑迈进的极好时机。作为关心政治的青年学生或学者，问一问“十年了，我们有什么进步？”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上述签名信所激发的风潮，只是在这一背景中的一个顺势发挥。

其三，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许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已认识到，十年改革，在经济方面基本上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解放”过程，但真正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符合规范的新经济体系尚未建立、微观层次可改的已经改完，宏观层次的改革基本未动，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国营大中

型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徘徊，政府所采取“治理整顿”措施带来的停滞，更是使人感到形势严峻，前景莫测。在政治上，改革进展不如人意，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的迹象。特别是以李鹏为代表的“太子党”接班以来，在政策路线上的保守，执政能力的低下，以及不负责任的表现，使中共统治基础呈现日渐狭窄的趋势，令人心浮动。加之分配不公，“官倒”猖獗，使得广大民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寻找表达和宣泄不满的时机和场所。正是这些因素，汇成了1988—1989年思想理论界、教育界空前活跃的局面。

在雨后春笋般的大小会议上，在各种层次的“沙龙”里，人们争相表达着各自不同观点，并不急于谋求共识；讲演者的“出语惊人”，常常是他们获得掌声的一个重要方法。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与组织整肃，使得早就该超越“启蒙水平”，超越“主义”而进入“问题”的中国理论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再加上中共党的体制决定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争夺战争，自然要引起一些申辩和反弹。由于开放的不彻底，人们对西方民主的朦胧认识造成的向往，更因为政治上的人为压抑而扭曲为一种富有刺激力的探寻“真理火种”的献身活动，这种状况，在青年学生中尤为普遍。

然而，遗憾的是，中共党内的一些老人，本于一贯的“家长”式思维，无视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关心“自己的国家”的命运的珍贵性，漠视他们关心社会的前途和个人命运的合理性、合法性；把人民的解放、自由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的行为，本能地当成自己的危机，他们四处设置“密探”监视人们的言论，挖空心思地东拼西凑一些人所谓的“反动言论”；其中，不排除蓄意的栽赃“做局”和制造“危机”，以实现部门利益。由于他们控制着政治的主动权，他们也就自然而然把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后也把人民，逼到对立的位置，同时也引导着自己来到真正危机的边缘。

据陈一谔回忆，当时，体改所比较体制研究室已经就“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作出研究报告。指出：

“这些国家社会不稳定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社会骚乱或动乱；第二种是政变；第三种是内战。而决定出现何种形态的条件有5个因素：一是民众的不满意程度；二是领导者的不满意程度；三是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四是控制传播媒介的能力；五是控制军队的能力。”

在2月21日—23日体改所召开的形势研讨会上，各部门参加会议的研究人员，都对形势不表乐观。社会研究部主任杨冠三指出：由于机会不公，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在蔓延；因为“合法性危机”，精英又处于“无动力”状态。他们在社会调查中发现，社会不满迅速增加，在48个测度指标中有43个是不满意。为此，他发出了惊人预言，中国“可能出现动乱时期。”

1989年3月1日，北大、清华两校同时出现题为《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批评“党现已成弄权谋私的必备之物”，“共产党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权大于法”；主张“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

翌日，北京大学出现《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呼吁“打倒专制和独裁”。

次日，清华大学等校收到有人以“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胡子骏”的名义发出《致广大青年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是一个没民主的国家”，鼓动学生“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

3月29日，北大等高校学生贴出方励之在香港刊发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等文章，认为应该利用“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形式，形成“压力集团”，“促使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

4月1日北京改革理论界人士主办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召开。参会的五百多位中青年学者，汇集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各路精英。不仅有诸如严家其、包遵信、戴晴、温元凯等有争议人物，也有诸如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李源潮、刘延东等日后成为党国要

人的政治精英。赵紫阳甚至派他的秘书李湘鲁，儿子赵二军也“潜伏”于会中。会议对经济改革停滞不前、政治改革不能推展、中央决策久拖不决、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等现实问题热烈讨论。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还提出有关“多党制”等敏感问题。研讨会在规模和气势上都超过了去年中宣部操控的“十年改革理论讨论会”。也是通过这次会议，陶斯亮物色到了一批中青年理论界人士，成为八九民运中统战部介入学运，进行“斡旋”的依靠骨干。

会后，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陶斯亮总结这次会议时，恳切道出了它的缺陷：

“整个会议的热点是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讨论议题有好几个，但与会者都拥到政体改革这一组，致使经济改革、文化建设，甚至连通货膨胀等热门话题都受到冷落。这是会议组织者未料到的情况，这反映了在经改步履维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希冀从政体改革中找到出路的心态。而会议的最大缺陷也恰恰在于此，两三百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上显得单薄，更拿不出方案来，种种看法均难达到共识。”

4月6日，北大校园里出现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质疑社会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及马列主义存在的必要性。主张“建立个体制和私有制”。

1989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50.2%；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占21.8%；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占12.3%。

调查显示，有22.7%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门科学，与其它科学是平权的，不能指导其他科学。在有的学校持这种看法的人达53.1%。某院对研究生一次调查，认为科技人员“不必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占11.7%，认为“略知一二即可”的占24.9%。相反，在校园内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河殇》热”。什么《自我论》、《首脑

论》、《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丑陋的中国人》成为大学生的流行书目。4月13日，王丹等4人创办的《新五四青年》问世，在《新五四宣言——代发刊词》中提出，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是返回到旧体制中去继续忍受黑暗和愚昧，还是迈向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世界，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抉择。

同日，全国各地众多高校收到署名“西大学生会”的《告全国大学生书》。文章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五四’即将来临，届时，让我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制’的大旗，隆重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像70年前的青年学生一样，走向街头，走向广场。”

蹊跷的是，胡耀邦真的在两天后去世了！这份“西大”文献中所描述的场景，就像电影的脚本一样，在随后的历史中一页一页地展现开来……

注释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第224页。

同上，第225页。

同上，第15页。

详见本书第一卷 第二章 第六节：胡耀邦的1983危机。

1974年4月，一群中下级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马赛罗·卡塔诺独裁政权，实现了葡萄牙政治的民主转型。民众将康乃馨插在士兵的枪口上，故名“康乃馨革命”。

该数据来自总部在纽约的国际著名智库“自由之家”2002年的《世界自由报告》。本书转引自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电子版，第二章：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之一）。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第64页。

同上，第71页。

阮铭网文《中国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教训》。

伊姆雷·纳吉，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1956年，匈牙利爆发反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骚动，史称“匈牙利事件”，纳吉曾宣布取消一党执政，并组成“四党联合政府”。在国际上，他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呼吁联合国进行干涉。纳吉因此被莫斯科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

并被指控“企图建立一个中立的、其实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匈牙利”。1958年以“组织推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承认：“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见本册第四章 第三节：重整河山。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 - 1982。注15—65：匈牙利在1960年代中期也采用过类似的体制。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16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第55页。

同上，第157页。

阮铭网文《中国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教训》。

金锺《澄清赵紫阳父亲之死》：“赵父是滑县赵庄（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的地主。”载《开放》杂志2005年四月号。

中共中央分局办公厅的代号。

参见《百度百科·人物》；杨立编著《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版。

《赵紫阳同志会见索尔兹伯里的谈话》，1987年11月5日。载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附录1。电子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

1974年广州青年李正天、陈一扬、王希哲在街头贴出题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批判文革极左路线，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与法制。事发后，当事人及其文章遭到全省范围内的大批判，三人被流放管制。文革结束后，王希哲有被以“帮派分子”被拘捕。参见亚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访原广州“李一哲”大字报作者王希哲》。载亚衣《流亡者访谈录》，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25页。

同上，第128页。

“还乡团”出自上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指被造反的农民分田地之后，回乡反攻倒算的地主及其武装。

参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136、168页。

5月2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的信。详见本书下册 第五章 第四节：收网。

详见杨立编著《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版。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1993年7月15日。电子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

鲍彤《赵紫阳：改革历程〈导言：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鲍朴译）。

如安志文、马洪。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胡耀邦被迫辞职。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邓力群《1986年学潮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生活会》。《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15章，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七节：倒胡“生活会”。

参见《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119、129、130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胡耀邦被迫辞职。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同上，第174页。

同上，第172—173页。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见198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1月13日《安徽日报》。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 425 页。

见1987年1月15、20、25日《人民日报》。

参见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10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1996年10月29日杨继绳《赵紫阳口述杨继绳笔录》。《前哨》月刊，2005年1月号。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15. 显扬心中有大爱。电子版，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10月版，第89页。

“12人名单”包括于光远、王若水、苏绍智、吴祖光、张显扬、孙长江、李洪林、于浩成、吴明瑜、严家其、张贤亮、管惟炎。据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4. “二表人才”于光远。电子版，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10月版，第28—29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同上，第188页。

1996年10月29日杨继绳《赵紫阳口述杨继绳笔录》。《前哨》月刊，2005年1月号。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页。

同上，第713—714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同上，第183页。

王大明给王瑞林的信。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十三大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据陈小鲁回忆：“起草十三大报告的前后，我们提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基本路线’。我说，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管它对不对，但是这种形式让人记忆深刻。十三大报告，也应该写基本路线。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见徐绥之、黄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同上，第184页。但邓力群说他与卢之超均与此事无关。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第705—707页。

参见1987年4月21日《光明日报》。参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64—366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见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7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但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说情况有出入。见《邓力群自述：十二年春秋1975—1987》一书第703—704页。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

邓力群在《邓力群自述：十二年春秋1975—1987》中逐一为这些事情做了辩解。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229 页。

见1987年5月8日《人民日报》。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65—366页。

弋人才《涿县会议的前前后后》，载1990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引自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叶选宁，1938年生。是叶剑英的次子。1960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电子工程系。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见本章第三节。

1987年6月2日，赵紫阳在胡启立来信上的批语。手稿复印件。见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第688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同上，192页。

吴稼祥《泡面传奇》【第二十二回】捅马蜂窝被蜇只是早晚的事，挡别人路遭害绝非偶然的果。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第714页。

同上，第715页。

同上，第75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251页。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72页。

据吴稼祥回忆，他和张炜都分别在代表中做过工作。邓力群的回忆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四、筹备党的十三大。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人民日报》，1987. 11. 2

《人民日报》，1987. 11. 3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六、计划与市场。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见1987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李先念1909年出生，杨尚昆1907年出生。

严家其《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2年，第315页。

1996年10月29日杨继绳《赵紫阳口述杨继绳笔录》。《前哨》月刊，2005年1月号。

《赵紫阳中南海十年纪事》（下），第1056-1057页。见高皋《邓小平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见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1987年9月，赵紫阳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提到，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10月，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表示，“我们原来的基础很差，过去耽误的时间又太多了，现在还相当落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如果对这种形势缺乏认识，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

曹放《试论当代青年的危机意识》。载《青年研究》1989年第六期，第9—12页。

靳人《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殤〉的“新纪元”》。载1989年8月14日《光明日报》。

同上。

金锺《澄清赵紫阳父亲之死》写道：“赵是支持《河殤》的，88年9月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赵还特地送一套《河殤》给李光耀。”。载《开放》杂志2005年四月号。

见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上篇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缘起。第二章知识精英与“八九”学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41页。

见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上篇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缘起。第二章知识精英与“八九”学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42页。

1991年7月17日—24日“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巴黎”。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65—367页。

林保华《佛利民与赵紫阳会晤的回忆》。载《动向》2006年12月号。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林保华《佛利民与赵紫阳会晤的回忆》。载《动向》2006年12月号。

张五常《悼紫阳》。载吴国光等编《赵紫阳纪念文集》第237页，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5年。

弗里德曼《赵紫阳之会》。载吴国光等编《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第34页，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注释【230】。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阮铭网文《中国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教训》。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2—3页。

林保华《佛利民与赵紫阳会晤的回忆》。载《动向》2006年12月号。

吴琰、张学虎《官倒现象探析》。载《工人日报》1988年8月24日。

杜卫《给李代总理打几分》，《九十年代》，1988年2月。

童颜怡《北京：无尽的忧虑》，《九十年代》，1988年6月。

汪萍《抢购旋风 ——1988 年》，《海南纪实》，1988. 11。

龚千山《赵紫阳在价改危机前后》，《开放》，1992. 6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478—479页。

王小强1952年生。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487页。

同上，第488—489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罗冰《军委文件批赵图拥兵自重》。香港《争鸣》，1989年九月号。

同上，第127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74页。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同上，第374页。

据冯良《江泽民传中文版删节的内容》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第120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陈一谔《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北京六四屠杀的背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5页。

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上篇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缘起。第二章 知识精英与“八九”学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34页。

同上，第35—3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同上，第226页。

同上，第226页。

同上，第226—227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246页。

阮铭网文《中国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教训》。

秦柳方，原名运章，1906年1月7日生，无锡胡埭乡张舍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任组长。1933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领导小组成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

宋涛（1914—2011），安徽利辛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34页。

同上，第459页。

同上，第545页。

“小舰队”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组织的一个军人小集团，1971年曾密谋杀害毛泽东，举行军事政变。

徐绥之、黄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45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同上，第68—69页。

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1977年，中国只有404所大学，这个数字在1988年涨到了1975。入学人数1977年62.5万余人，1988年涨到206.5万人。涨幅最大的是财经类院校。1977到1988年，人文社科专业的招生人数增长了7.8倍。政法类专业的招生人数更是增长了75.8倍。赵鼎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其社会中往往是作为一个激进力量而存在，而人文社科类专业无疑处于激进主义的风口浪尖。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专业所讲授的观念，许多都来自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思想，对于本土政治传统来说，这些观念都是革命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社科和人文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参

与激进运动的原因。见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51—52页。

邵江《我所经历的学运和八九年民主运动》。载自《观察》2004. 6. 11；
<http://guancha.org>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中央统战部六局为党外知识分子局。

陶斯亮，1941年生。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参加工作。

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作者苏晓康、张敏。

作者霍达，回族。

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亚衣《“六四”牌不能再打——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载《中国之春》1993年，第4期。

范民友《吾尔开希其人》。原载《瞭望》周刊第48期。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12月3日。

同上。

同上。

同上。

1991年7月17日—24日“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巴黎”。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59页。

刘向阳《第三次浪潮．文凭热》。载萧勤编《五次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

杨力伟《有些用人单位退回大学生现象对大学生的影响》。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89年，第二期，第37—41页

张炳升、邓海云《面对21世纪的挑战——北京地区高等院校教师队伍调查》。载《光明日报》1989年4月15日。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刘刚，男，1961年生。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据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69—71页。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16页。

同上，第519—520页。

任彦申《首都五所高校学生政治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载仓理新《对80年代首都大学生的纵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27页。

王殿卿等《对当前首都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走向及教育对策的研究》。载仓理新编《对80年代首都大学生的纵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28页。 1991年7月17日—24日“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巴黎”。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57页。

见萧勤福《第五次浪潮：经商热》。载萧勤福编《五次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1—261页。

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上篇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缘起。第三章 经济改革、大学扩张和学生不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62页。

参见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上篇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缘起。第三章 经济改革、大学扩张和学生不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62页。

见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281页。

详见百度词条。

自由亚洲电台张敏《许良英访谈录》64档案。

陈小雅1988年12月7日《工作笔记》。

苏绍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讨论会始末》，《探索》，1993.7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283页。

调查人数为280，回馈率为67.5%，见《北京九三社员问卷调查结果选摘》《北京九三论坛》，1989第一号。

武仁《五月风波的起源于发展》，《青年研究》1990年第10期。

这个结论以670份问卷中的642份有效问卷为基础。在这些调查者中，有266人是工人，165人是国家干部，128人是知识分子，另外14人是私营企业主。见《当前本市民情民意调查分析》《宣传通讯》1988年第14号，第24—27页。

Cherrington, Ruth. 1991, *China's Student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22).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377—379页。

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前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400页。

陆丁《八十年代中国民间企业家的体制创新活动》。中评网2004年08月08日 <http://finance.sina.com.cn>

同上

同上

万润南《我的 1989（2）钦老板》。

万润南《我的 1989（10）处理家务》。

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49页。但此说遭到质疑，有人认为是29万。

参见徐文立《陈子明一生不容易，请不要再强扶他上神坛了——就陈子明的评价和隐秘劣迹致友人信》。2015年5月4日。此事经吕朴证实。

指吕朴参与民主墙时期“星星画展”和游行活动。

见陈小雅《张克坚访谈录》1987年10月28日。载陈小雅《公关笔记（1987）》（手写原件），第34页。

何家栋网文《我和子明、军涛的合作》。

同上。

见2014年9月2日严家其与陈小雅的通信。

据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陈子明等撰写的《现代政治学导论》，就是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基础课教材。”

陈小雅《闵琦访谈录》1987年10月20日。载陈小雅《公关笔记》原件第26页。

笔者1987年底从闵琦、张伦处听到此说。2013年1月7日陈子明与陈小雅对质，闵琦再次证实。陈子明未再坚持反驳。（有录音）参见张伦《而今我们一唱再唱》，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见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549页。

转引自<http://t.cn/R7MUkw>。

第一次是陈子明在插队期间，第二次是他就读化工学院期间，第三次是他就读中科院研究生院期间。见《陈子明访谈录》1986年11月。载陈小雅《采访笔记》（手写原件）第42页。算上陈子明后来在秦城监狱递交的入党申请书，陈至少有四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小雅《王军涛访谈录》。载陈小雅《采访笔记》（手写原件）。

陈小雅《陈子明访谈录》1986年11月。载陈小雅《采访笔记》（手写原件）37—38页。

在陈子明及其家属的文章中，都说陈子明是被推举为谈判代表。但严家其说：“1976年4月5日那天我看着四个人从人群中‘自告奋勇’进‘小灰楼’谈判……”。见2014年9月2日严家其与陈小雅的通信。

据严家其回忆，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就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高的小灰楼里。见严家其《两次“天

安门事件”的对比——为悼念“六四”20周年而作》载香港《前哨》2009年第5期。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陈小雅《陈子明访谈录》1986年11月。载陈小雅《采访笔记》原件第48页。

见《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101页。

何家栋网文《我和子明、军涛的合作》。

陈小雅《陈子明访谈录》1986年11月。载陈小雅《采访笔记》原件第45页。

剑军《1980年北大竞选风潮》，《中国之春》1990年5月。

时任国家体改委试点局局长。

陈小雅《闵琦访谈录》1987年10月20日。载陈小雅《公关笔记》原件第26页。

此谣传似来自陈子华的文字：两校第一届招生有近23万人报名，“学费收入近2000万元（相当于90年代的上亿元）”。参见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28页。何家栋在《我和子明、军涛的合作》一文中称：“它通过办学积累起上千万元的基金”。

见陈小雅《张克坚访谈录》1987年10月28日。载陈小雅《公关笔记（1987）》（手写原件），第36页。

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50页。

同上，第435、436页。

同上，第439页。

即后来在美成立“流亡政府”并自任总统的彭明。

2013年1月7日陈子明与陈小雅对质录音中闵琦的证词。

何维凌认为“姜洪更多的是走陈元的路线”。陈元时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陈子明曾与姜洪竞争成为陈元的幕僚。

同上，第421页。

指八九民运。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421—422页。

王丹，男，1969年生。吉林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见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油印本）。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415页。

同上，第416页。

同上，第416页。

同上，第417页。

同上，第416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326页。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200页。

同上，第201页。

当时，同住木樨地22号楼的政协秘书长郭则成的夫人张成莲常到秦德君（何维凌的岳母）家议论集资办学事宜，而且每每带来一大帮人，久久不散，估计是两项“伟大事业”在场地上形成了冲突，何维凌怀疑老太太是盯着岳母的钱而来，曾以老太太示意其“逐客”为由，赶走客人。张老太太不服抗争，造成肢体冲突。事后，张老太太利用与邓小平的广安老乡的关系在高层施加影响，而被邓小平尊重的老资格的秦德君也站在外人一边，何维凌被邓小平“钦定”为“坏人”。习仲勋批示“何品质有问题，不宜在书记处工作”。详见《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267—275页。《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285页。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202—203页。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2013年1月7日陈子明与陈小雅对质录音。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330页。

时任政治学所制度研究室副主任，社科院党委委员。

见2014年9月2日严家其与陈小雅的通信。

陈小雅《陈子明访谈录》1986年11月。载陈小雅《采访笔记》（手写原件）第54—55页。

同上，第55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59页。

陈子明《是编纂案例，还是书写信史？》电子版。

1986年12月7日陈子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的谈话。见晓华（陈子明妹妹陈子华）《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六四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2003年3月版。

陈小雅《闵琦访谈录》1987年10月20日。载陈小雅《公关笔记》原件第23页。

2015年4月9日，罗立为与陈小雅、XX的谈话。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383页。

陈小雅《闵琦访谈录》1987年10月20日。载陈小雅《公关笔记》原件第20—21页。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记载：“我第二次见王炳章是在《中国之春》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谈了陈子明、王军涛他们办的研究所和他们的打算。王炳章一听到这些，耳朵就树起来了。”“他非常仔细地了解了陈子明他们的情况，然后问：‘你能不能帮我们与陈子明他们建立联系？我们可以合作做一点事情。他们需要钱的话，我可以想办法。’我笑着摇摇头：‘恐怕不行。我临行前他们还特别叮嘱我不要沾你们这类组织，免得给他们惹麻烦。组织上或政治上的联系绝对不行，唯一可行的是学术上的联系。可以为他们找一些研究项目，他们有事情干，也赚点美元，他们的研究结果你也可以用。’王炳章沉思片刻，道：‘没有问题，陈子明那边你负责联系，这边的学术机构我来联系。你能不能起草一个书面的详细计划？我想办法去搞点钱。’”

陈子明《十年改革反思》，第48、174—175页。陈小雅《闵琦访谈录》1987年10月20日。载陈小雅《公关笔记》原件第26页。

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载1990年6月16日《百姓》杂志（第218期）。

陈小雅《陈子明访谈录》1986年11月。载陈小雅《采访笔记》（手写原件），第57—58页。

《刘刚简历》。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561页。

“人权同盟“被宣布为”反动组织”。

参见北京市长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第14页。

参见常劲《从胡耀邦逝世到北大筹委会》。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页。

沈彤《北大校园活动》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2—13页。

许良英为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所写的序（未刊出）。

邵江《我所经历的学运和八九年民主运动》。载自《观察》2004. 6. 11；
<http://guancha.org>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137、145页。同上，第139页。

同上，第148页。

同上，第139—140页。

同上，第169页。

同上，第176—177页。

李淑娴《封存二十多年的遗稿》，《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25、179页。

同上，第29—30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192页。

同上，第193页。

据《方励之生平大事记》。载《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

彭真时任北京市长，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水晶城”意在打造一个全体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的纯洁城市。见《方励之自传》，第204页。

同上，第232页。

同上，第239页。

同上，第239—240页。

同上，第244—252页。

同上，第144页。

同上，第160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187—188页。

同上，第270页。

同上，第270—272页。

同上，第268页。

同上，第273页。

同上，第279—280页。

同上，第286页。

同上，第287页。

同上，第286—287页。

指南车。

把你和一些朋友关在一条大船甲板下的主仓里，让你们带着几只苍蝇、蝴蝶和其他小飞虫，舱内放一只大碗，其中有几条鱼，然后，挂上一个水瓶，让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下面的一个宽口罐里。船停着不动时，你留神观察，你留神观察，小虫都以等速向舱内各方向飞行，鱼向各方向随便游动，水滴滴进下面的罐中。你把任何东西扔给你的朋友时，只要距离相等，向这一方向必不比向另一方向更多用力。你的双脚齐跳，无论向哪个方向跳过的距离都相等。当你仔细观察这些事情之后，再使船以任何速度前进，只要运动是匀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你将发现，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也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即使船运动得相当快，在跳跃时，你也将和以前一样，当你在船底跳过相同距离时，你跳向船尾也不会比跳向船头更省力。引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04页。

引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05页。

同上，第306页。

同上，第340页。

同上，第342页。

同上，第355—358页。

瑞典极北部的小城。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64页。

同上，第365页。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19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同上，2012年版。

稻香楼是安徽省最排场的会场。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65页。

同上，第359页。

高希均《追念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方励之》。载《方励之自传. 出版者的话》。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许良英《自由知识分子的先行者》。载《方励之自传. 序》。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75页。

同上，第379页。

同上，第385页。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第216—217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118—120页。

同上，第385—386页。

坊间流传的方励之上书有各种版本，其文字稍有不同。本文出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89—390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88页。

同上，第197页。

许良英应包遵信邀请为《未完成的涅槃》所作的序（未刊出）。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机关报《中国文化报》。笔者曾任该报理论部负责人，当时任记者部负责人。

指陈小雅、李勤《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之一）》载《海南纪实》1988年创刊号。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51页。

《方励之自传》，第391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92—393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5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57—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7页。

张伯笠《学运之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6—47页。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fobp_N8yh15KH0SJXQWI0mCcAIZYfPGyPp72mtc50aoe_0XnujQfeW4f5JwUIcJXyTjK-V0A5fHpdmtpjs2tK

据《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温斯顿·洛德>

据《百度百科·包柏漪》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fobp_N8yh15KH0SJXQWI0mCcAIZYfPGyPp72mtc50aoe_0XnujQfeW4f5JwUIcJXyTjK-V0A5fHpdmtpjs2tK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第200页。

2007年9月17日张郎郎与陈小雅、冉铁的谈话。

据2008年1月张郎郎与高伐林、萧燕谈话录音。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407页。

同上，第391页。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联”，此前被中共宣布为“反动组织”。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91页。

据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页。

同上，第2—3页。

许良英为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所写的序（未刊出）。

载《人民日报》1989年2月23日，第一版。

载《北京日报》1989年3月6日，第一至二版。

载1989年3月18日与3月22日香港《大公报》。

自由亚洲电台张敏《许良英访谈录》64memo.com'89。

徐文立《致王希哲书》，1998年3月6日。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5页。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序言：知识精英呼吁大赦。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5—6页。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同上，第284页。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据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3页。

许良英为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所写的序（未刊出）。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49页。

同上，第550页。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1页。

同上，第12页。

见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同上。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3页。

同上，第 14 页。

程元《大学生的误区与社会的误导——风波过后的回顾、反思与启示》。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5版。

高皋《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 13 页。

即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6年6月版。

199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王忍之通报政治学研究所：有老同志来电话，说对待陈小雅“你们不要姑息养奸”，故决定解除对陈小雅的聘任，保留工资一年，自谋生路。查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几处处提到，邓在美苏关系上多次指责美国对苏“姑息养奸”。1、“他指责美国关于苏联问题的第10号总统备忘录是在姑息养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让苏联控制了德国的三分之一，其实是让它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这又对南欧形成了巨大的影响。”2、“布殊在1975年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邓小平对布殊重申了他向万斯说过的话，强调美国的对苏政策是姑息养奸的政策。”3、“邓小平和他的外交团队也在继续批评美国对苏联的姑息政策，批评他们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裹足不前。”4、“在谈到苏联的危险时他说，为了避免战争，必须备战：只有这样苏联才会更加谨慎。邓小平提醒说，对苏联切不可姑息迁就。”可见，“姑息养奸”是邓小平的常用语。对于陈小雅的处分，有可能来自邓小平。2016年5月26日作者新注。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创立的学派。该学派主张治史不带成见，持纯客观态度。

据盛禹九《李锐谈胡乔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议上，胡乔木和邓小平合作，草拟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听说1989年胡乔木去美国访问前，专门打电话邀总书记的秘书到他家做客。在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他是用肯定语气讲的，表情则是笑嘻嘻的。在另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他也讲过同样的话。”

见《京都血火》，第346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9月版。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一节：“新华门事件”及其后果。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七节：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本书第一版写作时，由于资料的稀缺，没有具体描述上层矛盾和“六四”事件的全貌。本修订版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一节：巨星会晤。

参见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2.

即十年改革中共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起草小组的第三次谈话说：“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造福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参见李向前、韩钢《于光远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记录》。正式讲话稿和发表文章将这段话改为：“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151页。 见《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80页。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三节：大游行。

详见《陶斯亮揭秘统战方励之、金观涛往事》。载凤凰博报2015年6月30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36412481.html>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二卷） 116400字 全文完

八九 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发抗议潮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
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六章 胡耀邦逝世

第一节 “历史将在我眼前爆炸”

第二节 评价问题，弦外有音

第三节 胡耀邦犯病与去世真相

第四节 地火在寻找喷口

第五节 “中国魂”、“七条”与大会堂请愿

第六节 《新观察》、“导报”座谈会

第七章 第一个回合——寻找交手接触点

第一节 “新华门事件”及其后果

第二节 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第三节 高层意见的分化

第四节 北大筹委会发起的第一次联合行动

第五节 “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第六节 赵紫阳的闪避

第七节 学生的绝望

注释

第六章 胡耀邦逝世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仲维光、封从德、张伟国、苏晓康、李进进、杨继绳、吴洪奚、石晓敏、许良英）

第一卷谈到，胡耀邦的政治生命结束于1987年1月16日。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并没有出现党的分裂，更没有爆发抗议性的群众斗争。但胡耀邦的逝世，却使他的政治命运突然从他低调的隐退中凸现出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场空前大事变、大灾难的引爆点。

这场“大爆炸”将有多大？从第二卷的叙述中我们大致可窥见其规模。但其“链式反应”的发展过程，仍是步步可见的。

第一节 “历史将在我眼前爆炸”

“4月15日 星期六 晴转阴 下午上班，路上遇陈维伟，政法部一位采访党政机关新闻的年青记者。他告诉我：‘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太突然了！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看两会期间登的照片，他的精神还是顶好的。虽然12日李鹏在机场答香港记者问时，证实耀邦同志有病在医院治疗，但没有想到病情这么严重。”

这是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的日记。但比他更早得到这个消息的却是一家外地报纸——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并破天荒地在党报还没有发布讣告前，登出了一则消息。据当事人陆一 回忆：

“1989年的4月8日，我到北京，筹备并在12日召开了我主编的《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的发行会。……会议开完，我留在北京处理后续事务，准备乘15日晚上的火车回上海。15日（周六）中午，美国大使馆的经济参赞带女朋友来本报的北办吃午饭，我们的北办是一座坐落在北海边的四合院。原来午饭是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吃的，可是刚开始端菜上桌，好久没有下雨的天下起了雨。我和常驻北办的伟国只能匆忙把酒菜搬到南边会议室。吃了不久，伟国就去北屋接了个电话。回来后他神情异样地告诉我，胡德平来电话，告知胡耀邦今天早上7：40左右去世了。在座的都默默无语。”

“……我作为要闻部负责统筹工作的副主任，凭着职业的敏感马上和已经回上海的老钦打个电话通报情况。由于那天是周六、我们出报付印的日子。我在和老钦通电话时，向老钦提出应该在这一期的头版抢发一个讣告，老钦让我直接和在《解放日报》的飞飞说。于是我就打电话到《解放日报》排字房，找到飞飞，由于当时官方讣告尚未发表，我只能在电话里向他口述了这样一个讣告。”

图3-1：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第一个刊出胡耀邦去世消息（陆一提供）

重大消息未按新华社统发稿发布，这是大陆新闻史上罕见的事例。但这正是当时蕴藏在新闻界的一种冲动的反映。也正因为如此，在胡耀邦去世的时间上，“导报”讣告与官方公告并不一致。

大约在此同时，胡耀邦的“小朋友”张凯，同与胡耀邦有“难兄难弟”之谊的“改革派”理论家于光远通了电话，并从电话中证实了这一消息。于光远回忆说：

“当天下午我的研究生张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听到一个传闻，说胡耀邦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相信这是真事，他怀疑会不会那些陷害胡耀邦的人造胡耀邦的谣言对他作恶毒的诅咒。我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在电话中有一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

在大学，人们知道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来自午休时爱收听电台的学生。
据北大作家班白梦回忆：

“4月15日的中午，我们当时正在午休。当时同屋的一个同学正在听收音机，突然他听到了哀乐，就把耳机拔掉了，我们就听到了这个消息。”

据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的杨正泉回忆，中央电台于中午2：04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并配发了哀乐。白梦及其室友听到的正是这则消息：

“当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本人非常热爱胡耀邦这个形象……后来就写出来那么一句话：沉痛悼念胡耀邦先生的逝世，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民主和自由事业的巨大损失。我当时就要贴到三角地去，我的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不让去，说你在北大少惹事。后来我还是去了，大概是15号中午2：15的时候。……当时在三角地有两幅大字报，一幅是‘耀邦不朽’，一幅是‘耀邦同志，我们怀念你’。……大概往后就是我们班上一个同学贴了第四幅大字报。”

张伯笠 的回忆证实了白梦的说法：

“第一张大字报，第一首诗，第一个对联，都是作家班出的，这没错。当时，三角地是空白的。‘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这是作家班的同学写的。”

图3-2：该死的不死……（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张伯笠则贴出了一首诗：

《长相思——雨夜送耀邦》

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县泪无声。

呼一更，唤一更，聒碎民心志未成，夜深望明灯……

据第一时间赶到北大的万润南回忆，第一批贴出的大字报里还有一首改编的《奉献歌》：

“把长寿奉献给小平，把短命奉献给耀邦；把捐赠奉献给邓儿，把彩电奉献给赵子。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呢？我的苦难的百姓。”

更多的人，是从当天晚些时候的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一噩耗的。平时处在信息灵通地位的体改所所长陈一谔这次也不例外。此时他正在301住院：

“4月15日，我在病床上吃完晚餐。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里传来了胡耀邦病逝的消息。我惊呆了，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从1957年在第三次团代会上，他给我题字‘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到1962年他到北大物理系搞‘甄别’时说的‘千锤百炼才能成钢’；再到1971年春节我向他汇报农村情况，他鼓励我说‘青年人的雄心壮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有大出息！’他的教诲一直激励着我克服万难努力奋进。……1978年若不是他的批示，我也调不回北京。”

眼泪里流出的还有他的后悔：他后悔胡耀邦“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没有抽空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他最后一次当面聆听胡耀邦的教诲，是1984年9月。

而两天前，他还去看望过住在同一家医院的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听说朴方也在301住院。4月13日晚饭后，我让护士用轮椅推着到了他的病房……朴方躺在病床上，气色不太好。他和我说：‘我已经肝腹水了，可能活不久了。’我说：‘人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你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有问题！’我担心他为康华的事情心理上受到打击，我说：‘无论外边现在说些什么，你都要看开一些。’

……他问我：‘外边到底怎么样？’我说：‘情况不乐观。’就把知道的情况说了。我最后说：‘从去年价格闯关没成功，搞治理整顿很多东西又

复旧了，民众的不满在增加。赵紫阳和李鹏的施政理念又不同，事情很难办。’朴方没有说话。与开完十三大后，他主动让我给紫阳捎话，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无巧不成书，这一天，也是后来成为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柴玲女士的生日。当时，她和丈夫还租住在北大南门外的一间11平米的平房里，过着再世俗不过的“小日子”。那一天，她的丈夫封从德给她带回了“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柴玲回忆道：

“当我们准备好桌子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我挚爱的猫咪小不点抓了抓我的脚踝，问我讨食吃……

封在用一个小电饭锅煮面条的时候心情特别好。他在面条里加了一些昨天剩下的肉馅和蔬菜，我们两个在树下坐在马扎上看着电饭锅里冒出了热气。

在吃晚饭的时候，封从德提到了他收到了著名教授方励之的妻子李淑贤的回信。封给她写信询问她是否出国留学就会被看作放弃了我们的祖国。李跟他说不用担心，一旦他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技能，回国后就能更好地报效自己的祖国。”

在80年代电视比较普及后，中国的城市居民，大概许多都有边看电视新闻边吃晚饭的习惯，这个小家庭也不例外。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天打开电视，传来的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多年后，封从德回忆起事前的那份憩静，总觉得有“无限意味”。但他绝没有想到，一刻钟后，那将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体验。饭后的他依然坐在那个小马扎上，在小院中构思他的计算机程序。6月12日是他的硕士答辩日。论文题目是《遥感卫星图像识别专家系统》。他喜欢软件设计，从大学二年级就一直兼听计算机课程。

“我认为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的手，计算机则将解放人脑，而专家系统程序则可能将人解决某类问题的经验收集处理后，代替人脑作种种重复而单调的动作。我研究了种种人工智能的算法，对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伟大惊叹不已。”

直到“白练似的月光”洒满小院，他耳中只有“树叶在微风中轻轻作响”。对于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一点预感也没有”。

作家郑义还记得，在当年的春节晚会上，相声演员姜昆曾神秘地念过一句台词：

“我们国家要出事儿啦！”

此言既出，“立即引来一阵热烈掌声”。

4月15日当晚，美国前任驻华大使洛德夫妇举行告别宴会照常举行。“照常开逗、照常跳舞、照常吃冰激凌。”但上午已通过陶斯亮得到消息的戴晴在“笑着的脸”的下面，怀着的是一颗“紧抽着的心”。张郎郎也感到，大家失去了往日的欢快，有人对他判断“中国会有大动乱”。

这一天，听到耀邦逝世消息后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也想到一位西方记者的话“历史将在我眼前爆炸”。从这一天起，平日不写日记的他，开始了逐日的见闻记载。

虽然4月12日李鹏总理曾向党内通报过胡耀邦的病情，但此刻正在国外访问的他，依然感到意外：“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

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证实。当他在宴会上公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一时间，在宴会厅内中日双方人士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当即和钱其琛、郑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对日访问，立即回国？大家都认为，明天是我访日的最后一天，还是有始有终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断访问。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赵紫阳在这一天没有留下特别的记录。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其中列出的三十个问题之一：

（1）4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赵紫阳对此没有提出反驳。

第二节 评价问题，弦外有音

与人们只能通过媒体和小道了解事情真相不同的是，杨正泉则经历了那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上午11：00，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对胡耀邦逝世的宣传问题。他说，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积坏死而于今天上午逝世……我们最先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新华社今天赶发消息，讣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后，什么时候广播要请示。”

艾知生传达说，胡耀邦的治丧规格相当于叶剑英、刘伯承元帅去世时的规格，即其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治丧，而不是按照他生前担任的最高职务或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治丧。这个消息给人们带来了第一个意外。此后，由于“讣告”内容的难产，又发生了这一幕：

“12：20，新华社即向境外发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香港传媒于13：20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对内发。因为已经对外发稿，中央电台考虑这样的消息对内不应该晚于对外，想对内赶发。经请示部总编室同意，中央电台于14：04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后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乐……15：00又播出一遍，无哀乐，后在16：00、17：00又安排了播出。……但直到这时，新华社仍未对内发稿，说是等到晚上才发，至于为什么要抢先对外发而对内晚发，时间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

为了应对“讣告”难产的突发事变，中央电台为联播节目设计了三种预案：一是先播简讯、哀乐填充时间空白；二是讣告稿随来随播，用“刚刚收到的消息”作为衔接；三是除直播联播节目的两名播音员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员待命，准备随时播出讣告。杨正泉回忆说：

“为了等讣告，大家都很着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对内对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生的事情把首播权让给境外？’……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作为国家电台，总有一种责任感。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出现了奇特的安排：18：30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哀乐，在播出了其他两条新闻之后，18：38又以‘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收到稿子是18：32，方

明直播），但在讣告后也就不好再放哀乐了，也就是说在同一节目中播出了两次内容不同、规格不同的消息和讣告。这种发布的不统一和中央电台播出安排的混乱，使听众感到莫名其妙。”

其实，杨先生的担忧实属多余。中国人，尤其是靠收音机收听时事政治的老百姓，懂得这类“丧葬政治”的人并不多。人们关注的是中央的评价，所以，“讣告”内容才是事件的焦点，这也是“讣告”迟迟不能发出的原因。

那么，事情究竟出在哪里？正如后来众所周知的，出在了对胡耀邦的评价上。

在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中，胡耀邦没有被授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属于党的领袖的一般称号。在历史上，这个称号曾经授予过毛泽东、康生、朱德等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据传，在关于胡耀邦治丧工作的一个汇报会上，谈到评价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称得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据此认为，邓小平要把这个“最高级”称号留给自己。

当然，这些情况在当时还属于最高机密。“讣告”的迟迟不能出台，显然卡在了当事人家属那里。事后，陈一谔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

“4月20日晚，经医生同意，杨冠三和杨晓 陪着我到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耀邦家致祭。耀邦家门口排着泣不成声来致祭的长龙……德平搂着我悲伤地说：‘人都不在了，难道呼他一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行吗，家属就这一点要求。’我后来才知道，是邓小平不同意在胡耀邦的悼词里用这个提法。”

从胡耀邦的经历我们得知，他只是在延安抗大时期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常识的。而且是从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开始启蒙的。尽管他文革后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在被迫退休期间，他有闲暇博览群书，但他思维的特点和兴趣，显然不在逻辑严密的理论问题，

而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现实问题。他具有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贯作风，是一切科学所必然要遵循的原则，也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不可须臾偏离的准则；他在哲学上的合二而一的色彩，掌权期间淡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及斗争哲学，创造了中共历史上少有的令人身心舒畅的局面；他具有的天生的人道主义倾向和古代贤相亲民、下士的作风，在位期间使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虽然是有限的）程度，等等这些，马克思或马克思式的圣贤或许也具有，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是没有什么相干的。正如胡耀邦逝世时一则外电所评论的：

“胡在中国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胡耀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于自己的党的忠实，丝毫没有妨碍他思想的活跃和对事实、对人民选择的尊重。如果胡耀邦在世，预知有人会在其身后为他打一场“马属”问题上的圣战，不知会作何感想？

因此，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并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问题。马克思是19世纪的德国学者，一位有建树的社会学家。然而，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马克思已不是学者马克思，甚至也不是导师马克思、领袖马克思，而是圣人马克思、教主马克思、上帝马克思。被否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信仰并期待这一称号者来说，必然深怀被“上帝”遗弃之痛苦。而争取这一名誉，不亚于争得生命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阵营中争夺“正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斗争，其激烈程度往往不亚于宗教的“圣战”之原因。

当历史进入到80年代，逐渐从过去阶级斗争造成的意识形态迷信中苏醒的中国人，也不会因为自己的领袖是否马克思主义者而妨碍对他的尊敬。但是胡耀邦的追随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中，有许多人对于这种“正统”位势的确比胡耀邦看得更重。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个“是”与“不是”，不是一个“真”“假”问题，而是一个“善”“恶”问题，“美”“丑”问题，“是”

“非”问题。他们更理解这种位势的含义及其政治上的作用。在听说邓小平关于“评价问题”发话之后，胡派重要的改革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便公开撰文，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4月20日中国科协举办的“纪念“五四”座谈会上，中国科协常委、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也发言称胡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人民日报》4月21日头版的报道中，用副标题加以冠明。

作为胡耀邦主政时期，新闻战线上的一名干将，与胡耀邦并称为“五胡”之一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也同时撰写了以《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为副题的文章。对此，为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供了第一级“火箭”的经济学家，胡耀邦的私人朋友于光远直言不讳地说：

“这（指是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没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观存在。黎澍去世的时候，很反对表现八宝山灵堂里面的等级主义，但它是存在着的。”

这种“存在着的”等级主义意味着一种秩序。在正常情况下，它是集团中人用自己的经验、才华、贡献、自我牺牲换来的一种有价证券。持有者据此来展示社会对他的承认程度，并由此而获得对相应社会资源或相应的活动空间的支配权与使用权。但人死之后，这种等级对他个人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承认的意义，也就更多地表现在对他的事业的表彰与承认上。而这一切，对于他的同志与亲属，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而对于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在1989年，正好关系到由他代表的改革路线的存废，关系到改革派政治力量的沉浮的问题。因为，在众人心目中，是胡耀邦，而不是亲自发起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在新时期继续推行毛泽东“整人路线”的邓小平，更配得上称为中国改革派的领袖和代表。“改革”这个名词，在80年代，也同“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一样，早已超出它原有的内容，成为了一种融道德理想于一体的准宗教。

也正因为如此，在胡耀邦评价问题上的“等级”问题，才会使人们联想到改革的去向与一派政治势力的沉浮。并使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大规模社会不满爆发的火山口。

事后，于光远撰文谈到这段历史，说出了他当时的担忧：

“胡耀邦逝世后在他是否可以称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上，曾经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不快。这件事不但同我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由我在胡耀邦逝世后提出应该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

他说，他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是1975年康生病死时，“悼念的规格很高，在讣告和悼词中写进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周恩来逝世，却由于‘四人帮’的反对，不让人们称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件事引起的。于光远说：

“对这两个人的这个评价，毛泽东都默认了，尤其是对周恩来没有写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家非常不满。我受到关于这两件事的影响，不愿见到对周恩来不公的事在胡耀邦身上重新出现，因而主张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这个主张的不止我一个，还有别的同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和别的同志的这个看法就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讲的，在场的新华社的同志，发了一个《动态清样》。后来传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这个意见不接受的消息。”人死盖棺，这个评价，自然勾起了胡耀邦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往事，令压抑已久的人们感到愤慨！正如陆超祺所说：一个人死了，在他的讣告、悼词或墓碑里，只说好话不说坏话，而且说好话往往多溢美之调，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讲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也不能避免，为什么唯独对胡耀邦是个例外？对他的优点、他为党为人民做出的贡献、不是言过其实，而是讲得很不够，七折八扣的，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事，只说他做了大量工作，而不说他是首倡者，是领导者，组织者。当时他只是中央党校一个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上头有主席和几位副主席，他们中至少有一位副主席和主席是最坚决的“凡是派”，是最坚决反对拨乱反正和平

反冤假错案的。不讲“首倡”，不讲“领导”和“组织”，就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不能表现出胡耀邦人格的伟大。与这相联系的就是不讲耀邦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读了讣告，总难免有一种感觉：耀邦同志的突然病逝，可能与1987年初对他的不公正的批评和处理有关。

不平则鸣，于光远所担心的，发生在周恩来死后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第三节 胡耀邦犯病与去世真相

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谣传”开始的。

4月15日下午，中央电台“简讯”播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之后，社会舆论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意外：几年前还经常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的胡耀邦，他那讲演时不住挥动的手，给人民留下的印像是那样的新鲜活泼，怎么会顷刻之间就撒手人寰呢？有消息传来，胡耀邦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发作后，入院抢救无效去世的。但人们并不相信！如前所述，胡耀邦的“小朋友”张凯，就是怀有这种担心的人之一。据于光远回忆：

“在1989年4月2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张凯写的《年轻人的‘大朋友’——忆耀邦叔叔》一文中，张凯就提到……我告诉他‘耀邦说过，他一生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他会担任那么重要的领导职务，二是想不到人们那么理解他’。张凯也许没有记准我对他讲的话。耀邦对我说的第二个想不到是，……想不到自己会担任的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这样的岗位上被理解为一个如此不称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人而不体面地下台。在最后十年，在政坛上作出如此光辉的业绩，却如此下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是其中的一个，的确是完全想不到的，在思想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说，耀邦直到去世前，仍对人们在他下台时加之于他的不实之词耿耿于怀。在胡耀邦离职问题上，一直为他抱屈的人们，宁愿把这位“苦星”

的犯病归结为受到一场围攻，他的去世或许出于一场有预谋的“医疗事故”？因为当今医药科学的进步已经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它怎么会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年轻生命束手无策呢？特别是在此前听到过“胡耀邦有可能在新一轮的中央全会上复出，担任中纪委职务”的谣传者，更相信是有某种势力在阻挠他的出山。

这种谣传还描绘了胡在“下野”的两年中，如何走遍全国，大量搜集“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以权谋私、“官倒”等不正之风的材料，在湖南逗留期间，他还与他的“宿敌”——邓小平安排在左面对他施行制约，并在胡耀邦离职后一同被“烹”的——邓力群会谈“反腐”问题，历时数小时……

到底是谁在谋害胡耀邦？谁有这个能力和权力？谁有利害相关？4月21日下午，北大、清华甚至传出了耀邦是“被最高统帅警卫打死的”谣言。有的学生竟商议要“截灵车”。

实际上，胡耀邦去世前的情况是，他尽管很苦闷，但却没有被委以重任“重出江湖”的可能。他的身体情况的恶化，的确与情绪有关，但长期的忘我工作，生活节俭，则是其“阳寿”的基础。

根据胡耀邦女儿的回忆，1988年秋，胡耀邦结束了将近两年“独对晨曦和落日”读书思考的时光，心头涌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11月，他和夫人李昭前往湖南。12月9日，在游君山的那天，他遇到一对夫妇游客，对他批评“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说“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胡耀邦心情沉重，加之旅途劳累，又受了风寒，第二天便觉得头晕不适。满妹说：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40度，而且持续不退；血压从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

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

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3月下旬，胡耀邦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满妹回忆道：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4月8日上午差15分钟9点，胡耀邦夫人目送他走出家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没想到，当天会议还没结束，就送回了丈夫的衣服。那是一件“旧毛料的外套，一件有细条纹的旧衬衫，领口和袖口已磨起了毛……”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所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几位教委的领导。他们围绕着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而坐。

胡耀邦是差5分钟9：00进入会场的。当时，所有与会者已经到齐。胡耀邦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

据鲍彤回忆，胡耀邦坐在椭圆桌的这一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椭圆桌的另一头。胡耀邦坐定后，会议随即开始。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

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但没过多久，胡耀邦就感到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紧接着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李鹏回忆道：

“大约10：00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

江泽民回忆道：这时，胡耀邦并没能离开位置，“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鲍彤的回忆略有不同。他记得因为赵紫阳的嘱咐，胡耀邦并没有离开座位，是倒在自己的座椅里的：

“我估计不到10：00，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如果你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上。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李鹏继续回忆道：

“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

的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京医院的钱貽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情稍为平静一点后，于下午2：00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在大会堂主持了对胡耀邦的抢救。胡耀邦入院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都到过病房。邓小平和王震则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胡耀邦的病情。胡耀邦还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9日上午，李鹏到医院看望了胡耀邦：

“主治医生钱貽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期……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耀邦同志，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25，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当时，还没有从美国赶回的胡耀邦的女儿满妹，事后通过与家人的沟通，了解到父亲最后的状况：

“……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像。’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查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第四节 地火在寻找喷口

正如长期饥饿的人群容易产生幻觉一样，长期被废除思考的人们则容易轻信谣言。来自民间的谣言，是政治悬念的产物。而政治缺乏透明度，缺少公开性，则是悬念得以积累和谣言得以流传的基础。但是，人们没有证据，没有能力去澄清事实，而严峻的现实又迫使他们不能再沉默。他们，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只能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不满和疑惑，给假想的敌人以某种心理压力。

当一个人去世时，有谁能阻挡人们对死者的悼念呢？

挽联、悼文，在这时，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宣传品。

在胡耀邦去世的前两天中，悼念基本上限于中央明令划定的机关和单位内部。在知识分子和敏感的青年学生聚集的校园里，已有自发的群众性悼念活动。新华社记者杨继绳4月16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他的观察：

“在人民大学，果然贴出了不少大字报。一张大纸上画了一根点燃的红蜡烛，旁边写道：

心线正直表里通红浑身是火

一生光明风吹不熄泪落始终

还有一张大字报写道：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该死的是指那些整胡耀邦的老人。有的大字报主张‘五四’搞大的政治活动：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岁在五四，天下大吉。

署名‘悲夫’题为《悼胡公》的藏头诗大字报写道：

悼君唯怨是非多，胡公又奈邓公何

耀邦曾经华夏客，邦国何事凭蹉跎

如果说上面一张大字报对邓废黜胡耀邦表示不满的话，后面的大字报就指名道姓地批邓了：

猫养七二鼠食尽民脂民膏最终猫成硕鼠

魂系民心呼喊捉鼠打鼠毕竟魂仍是忠魂

黑猫白猫不抓老鼠才是好猫

赌棍恶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

由于邓小平爱打麻将，有不少对联是用麻将的术语写成的：

横批：去他妈的

借西风作胡胡公胡

抛‘四条’伐民民十万”

据《中国青年报》4月16日报道，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广大群众举行了一系列追悼胡耀邦的仪式和活动，一些学校和单位里，群众自发地为胡耀邦设立了灵堂。胡耀邦曾经工作过的中央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很多对联、诗歌和杂文。

在北长安街会计司胡同25号——胡耀邦座落在中南海一侧的寓所里，他的家人为他设立了一个开放的“家庭灵堂”。这间有40多平米的会客厅，正中悬挂着胡耀邦的一张生活照。照片上胡耀邦饱经忧患的面庞，身后是一片绿油油的冬青。黑纱环绕着遗像，置于苍松翠柏和君子兰之间，更被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花篮簇拥着。台历，仍然翻在1989年4月8日……

这里，迅速地成为了他的同事、友人、政治崇拜者与追随者，各大专院校师生、甚至更多仅仅是因为热爱和同情的普通人凭吊与寄托哀思的地方。

据满妹回忆：

“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前来家中吊唁致哀的，一天竟达4000多人。灵堂内外，白花如雪，泪水如雨。无数的花篮、花圈和挽幛，将灵堂堆得只剩下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走道。

八旬高龄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伤心地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

楚辞专家文怀沙对着父亲的遗像说：‘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爱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动？因袭放翁句，书此联以奉灵右。’他悲声颤抖地朗诵道：‘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年近九旬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孙女的搀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灵前，半晌才发出一声呼喊：‘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中华英烈》编辑部的同志将两本最新出版的、父亲生前常看的杂志献到灵前，九位编辑签名的挽联上写着：献给我们的挚友胡耀邦！

父亲生前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在灵前老泪纵横，悲恸得直不起身子。

在我们家珍藏的悼念留言簿上，有公交司机的笔迹，也有郊区农民的留言，还有解放军官兵的签名，每一页都留下了共和国公民的无尽哀思：‘人民又一次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你心里有人民，人民心里有你。’‘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老战友张爱萍缅怀他们一道走过的长征路。念及文革中，他受林彪一伙迫害时，耀邦给予了他的子女有益的影响。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耀邦亲临老山前线，发表了“国威军威看西南”的名言。他还想到了“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的那一天，耀邦跨越“座桥”与他热烈拥抱的动人场景！在这一天，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痛悼耀邦同志 1989年4月16日》

突闻噩耗哽咽喉，往事涌心头。少年战场携手，长征喜同俦。

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

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

《人民日报》刊载的孟晓云、王楚《11亿中国人为你送行》也记录了这个小灵堂的场景：

干部、工人、学生，一个接一个无言地走过这里，只有挽联上的字留下了他们的心声：

一生正气深得人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

至大至刚

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

飘（漂）浆甘兮饮水长思源。

“老部下张黎群与耀邦同志的小儿子德华抱头痛哭，噩耗传来，他夜不能寐，伏案疾书：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卓绝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一个多么仁义正直的人民的儿子离去了！一位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停止了战斗！

“老红军赖大超拄着拐杖匆匆从广州赶来……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有的在灵堂里嚎淘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

……

“十几条雪白的哈达是中国藏族语系高级佛教学院的学生献上的，几个大学生将自己扎的小小的花圈奉献在灵前；街坊邻居老少几代人联袂前来吊唁。

从山西赶来的种棉能手，80岁的吴吉昌，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

“留言簿上还有许许多多动人的题词：

“‘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代表人民的领袖，真正的汉子’；

‘民主先锋’。”

在中共领导者中间，历史上可称为“人民的领袖”者，在70年代以前，只有毛泽东一人。但毛泽东最终在自己错误的积累下，逐渐失去过去由人民衷心赠与的这个称号。而在此同时，“人民的领袖”一词，也逐步赋予了“与人民同受苦难者”的含义。就如同失去精神家园的民族往往是伟大宗教的摇篮一样，“人民的领袖”一词，重音也从后面的“领袖”二字向前移到“人民的”下面。“领袖”这时也由政治的首领转变为精神的教主。在这方面，1976年在民族危机中去世的周恩来和1989年中国改革危机时去世的胡耀邦，就成了70年代与80年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耶稣。

不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人民，几乎是在他们的“领袖”离开时才发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英灵，借助对亡者的追思与悼念的庄严气氛飘离尘世，在高天张扬开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个人通过感觉都知道，它聚合着一股能量。而且，这能量因政府为它限定的空间所造成的压力，密度在不断地加强。

学生的反应是最迅速的。4月15日，中央电视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刚播出10分钟，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便贴出了大字报，一个小时后，悼念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已经贴满了三角地的报栏。

图3-3：北大三角地（选自香港《明报》月刊）

还有一幅对联写着：“耀邦七三先死，小平八四健在，问政坛沉浮，何无保命；民主70未全，中华40不兴，看天下兴亡，北大亦哀。”一份大字报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

当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彭克宏，率领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花圈。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辑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纪念碑前出现的第一个花圈，署名是“顾保忠”敬献的。它的挽联上写着“真正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胡耀邦同志千古”。当晚，有目击者称，纪念碑前的索链上出现了第一朵小白花。小白花的挽带上写着“耀邦不死，耀邦永存”八个字。当时就有人拿出步话机报告了这一消息，并问怎么办。大概是对方向了送小白花人的特征，报告者说：“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

据官方统计，截至16日止，北大、人大、民院、清华、北师大等20所高校共出现标语、挽联、大小字报300多份。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有花圈6个，白花15朵，条幅5个，黑纱一个。不少学校都出现了对党和政府不满及指名攻击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人大贴出题为《哭耀邦》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攻击多名中央领导同志。北大题为《你死我活》的挽联，影射中央领导同志是“欺世盗名的窃国奸雄”。清华、北京理工大学的大字报提出“朽翁听政”、“独裁集权”、“蛮横腐朽”，攻击中央有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民院的大字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心狠手毒，残害忠良”。北大题为《猛回头》的大字报影射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是“独夫”、“橡皮图章”、“草包衙内”，提出“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全国大选产生总统、省市市长”。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照片。纪念碑上放置着5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这令读者感到，党报对人民的感情是尊重的，对新闻是忠诚的。犹如给自发悼念的群众运动填了一把柴火。据陆超祺回忆，图片刊出的过程是这样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海外传媒反应很快。香港《文汇报》除了刊登中央的讣告、耀邦同志的简历外，还登了该报驻京记者采写的耀邦同志发病治疗经过，他家里设小灵堂，什么人去吊唁，紫阳同志与胡德平的谈话，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的谈话等，整整登了两块版。新闻透明度和记者工作效率之高，恐怕是内地同行望尘莫及的。……”

对比香港《文汇报》，深感在内地我们的报纸对耀邦同志的逝世太冷清。昨晚上班，没有什么东西可登。正在发愁的时候，摄影组的同志送来一幅群众自发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照片，说是通讯员送来的。我看画面尚好，问有关方面对群众自发送花圈取什么态度？拒绝呢还是照收？回答是不拒绝，凡是送去的都收。我也不请示老钱（社长钱李仁）和老谭（总编辑谭文瑞），决定在一版用这张照片。大余也决定在海外版用。

我们是不谋而合。我所以不请示钱和谭，主要是考虑到这张照片，广大群众固然高兴，反映了他们的感情，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向中央告我们的状。为了不给他们两位添麻烦，有事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来承担责任。不要把主要领导人一下子就推到矛盾的第一线，给他们留下周旋余地，这也是《人民日报》的一个优良传统。”

同日，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的《几点建议》在各校贴出，号召花圈、挽联向天安门广场集中；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责成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图3-4：悼念活动集中到纪念碑下（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当天中午1：00，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86级学生抬着制作的花圈游行来到广场，并跨过围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禁止通行的索链，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的基座。在场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华尔街日报》、英国《独立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十余位记者进行了拍照、录像和录音采访。事后，有40余人到胡耀邦家进行了慰问。

图3-5：法大法律系队伍率先走出校门（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紧接着，北京航空学院动力系87级研究生制作的花圈也送到了广场。法大花圈的白布挽带上，苍劲的墨迹写着：

问历史真正无私有几人，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人民之友人民怀念。

胡耀邦同志千古

长空当笑，笑天下丑陋之人

大地当悲，悲地上英雄之杰

献给耀邦同志

北航的花圈挽联上写着：

倡民主兴科学精神不灭

哭导师忆先驱心随魂走

还有一位署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留下的贴在纪念碑上的字迹是：

新时代的开拓者

中国改革的旗帜

图3-6：北京师范大学湘籍教工将挽幛固定在纪念碑上（陈小雅摄）

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气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都陆续来到广场。其中北大送来的一条挽幛，上书“中国魂”三个大字；北京师范大学湘籍同学的挽联，上书“三湘恸哭，四水悲歌；一生正气，两袖清风；耀邦千古”、“青年挚友，民主斗士”；中央美术学院绘制的一幅胡耀邦巨幅画像，被安放在花圈的最高处，旁边配

有黑底白字的醒目挽联“何处招魂”；中央戏剧学院送上的，则是一幅“打鬼”钟馗的脸谱画……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最早到纪念碑送花圈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单位。

图3-7：中央美院制作的胡耀邦像与钟馗并放（陈小雅摄）

由此，原来封闭在校园和机关单位内的悼念活动终于冲出院墙校门。他们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为由，向北京市政府1986年反自由化运动期间定立的禁止游行集会的《十条》规定提出了挑战，为那一年遭到镇压的学潮向北京市委示威报仇。并借助游行，把对胡耀邦的缅怀和继续推进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决心，展示于社会，最终还是要展示于党。

中国政法大学的这次行动，率先使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走出校园，不仅为该校在此后的学运中跃居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也以其自身的专业优势，给本次学运打下了不同于过往学运的烙印。

据该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同时兼任陈子明社经所所务委员的陈小平回忆：

“胡耀邦去世的那天上午，我正好去《世界经济导报》……当时，因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导报’正在进行当代中国宪政改革计划，我常去‘导报’办事。我既是‘导报’的特约记者，又代表研究所出面主持这一计划，而‘导报’方面主事的则是张伟国。伟国在京城是消息灵通人士，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我记得当时我听到消息后，心中猛一惊。但是，在我的意识深处是没有想到要立即打算作什么事情的。”

离开“导报”后，陈小平回到了他在政法大的宿舍：

“南平房住的大多数是光棍汉，平房的地理优势适合交流、串联，一呼百应。大家的信息和感情交流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当天7：00新闻联播过后，我的房间里专为聚会购买的转角沙发上就座满了几乎与我心情一样的人。而

仅一门之隔的邻居，号称对政治问题‘从来不感兴趣’、后来带领青年教师‘占领’新华门的北大校友吴仁华（他与我是北大分配过来的仅有的两人）从我回来后就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房间。在打破沉默后，一个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方案很快出台：隔日下午1：00，不管人数多少、‘风雨无阻’地在教学主楼前集合，向天安门进发。为此，一个相对细致的分工方案也很快通过……”

4月16日一整天，他们都在忙于制作花圈。陆陆续续有师生加入。傍晚时分，一个直径近两米的巨型花圈已经做成。花圈上的挽联是：耀邦千古。落款是“中国政法大学部分青年教师敬挽”。

为了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师生，他们特意将花圈摆放在教学楼大门前，还贴出公告：“兹定于17日去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请参加者于下午1：00整在校门口集合。”

翌日，游行队伍沿学院路、西直门、复兴门、西长安街奔向天安门广场。师生们沿途不断地唱《国际歌》和呼喊口号。口号限制于悼念胡耀邦和要求民主自由法制两项内容。途中，曾有人呼喊“打倒新权威”的口号，当即遭到众人劝阻。在途径西直门立交桥时，因花圈巨大无法通过，只好将花圈放倒，才顺利通过。

据吴仁华回忆：

“当初我提议制作巨大花圈，就是为了引人注目，扩大影响。记忆中，1976年爆发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源于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其中北京重型电机厂制作的巨型花圈让人印象深刻。”

当法大师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将巨型花圈抬上纪念碑基座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原来：

“中国政法大学师生上街游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共青团中央，那里正在召开北京十所高校的团委书记会议。与会的团干部们不仅不忧虑，反而显得很兴奋。他们纷纷对政法大学团委书记白希说：‘这次你可露脸了。’同时又奚落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张来武：‘你们北大这次怎么被人抢先了？！’游行沿途的消息不断传进会议室，与会者无心继续开会，终于决定终止会议，赶赴天安门广场观察。”

回忆没有说团委书记们是何时结束“观察”者身份，参加到悼念队伍中来的。但是，天安门的活动结束后，政法大部分师生前往胡耀邦家悼念，却是在团委书记白希的带领下前往的。

图3-8：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到胡耀邦家悼念的队伍（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时任政法大学研究生会生活部长、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86级硕士研究生浦志强认为，当时，在法大师生中确有一种与北大争“风头”的心理。

就在首都北京学生开始悼念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大专院校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4月15日，率先走上农村改革道路的安徽省，安徽大学学生贴出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怀念青年的朋友耀邦同志”等横幅。次日，贴出了“悼念您，激进的改革派，耀邦同志；怀念您，学生运动的理解者，耀邦同志”的横幅。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大也有类似的悼念活动。

同日上午，中国近代第二都城南京政治学院挂出了悼念的挽联。写有：“国威军威再看西南，党心民心心向书记”；“敬爱的胡总书记，泰山是您的忠骨，长江是您的脉搏”等内容。4月17日，南京大学哲学系88级研究生开始在校园募捐，筹办悼念活动资金。有一名“同乡校友的对联曰：“革命六十载，心瘁胆摧，一心卒为民主死；英名九万里，内贞外达，旷世难逢天下

才。”有大小字报也对社会政治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论中国特色》《耀邦改革祭》《民主科学的殉道者》等等。有文章说中国的“民主患了软骨症”，“自由聋哑了”，“教育严重营养不良”，“科学成了弃儿”，“真理在墙角哭泣”，“法律成了破鞋”，问“中国还有什么？”

上海复旦大学还贴出标语，称“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本”。

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上街游行的同一天，4月17日上午，天津南开大学一千学生也高唱《国际歌》、《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高呼打倒独裁！打倒专制的口号走上了街头。

18、19两日，湖南师范大学也贴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走入死谷，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没动”，“反独裁，要民主”的大字报。桂北山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也出现了“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无处不悲歌”，“肥了贪官，闲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等内容的标语。西安交大，南京大学，上海复旦的学生均上街游行。复旦大学还成立了“悼念胡耀邦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包含“取消中顾委”，“整顿中纪委”内容的行动纲领。南开大学则贴出了《新五四纲领》。

据陈一谔回忆，4月18日，体改所社会研究部主任白南风做了两个特大气球，用解放牌大卡车运到天安门广场。结果，写着“耀邦不死”的气球飞上了天，写着“改革万岁”的气球掉在了地上破裂。

后来屡屡被官方提起，并作为向邓小平汇报，使形势发生不可挽回的逆转的一张“关系图”也出现在这时。陈一谔回忆道：

“（4月18日）晚上，杨晓给我拿来了一张贴在人大的‘关系图’。我一看，感到要糟糕，这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既有不满，也有恶作剧，真是天真地把政治当儿戏，还是有意在故意搅混水？

不可小视。像在‘关系图’中，‘李铁映’名下写的就是：‘邓小平的私生子，靠裙带关系窃据政治局委员要职’。

……据我所知，邓小平这个人刚毅果决。早在二野时，他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毛泽东说他是‘钢铁公司’……邓小平在受辱的情况下不得已韬光养晦，但在掌权的时候决不会让步。

4月19日，我和体改所的几个骨干说：‘从这张关系图反映的情绪看，搞不好这次学生又要闹悲剧了。要抓紧作领导人的工作，尽快促成与学生对话，以免情势的恶化。同时要想办法劝学生理性、冷静。’说心里话，从看到‘关系图’开始，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

陈一谔不知道，其实，根据官方掌握的消息，早在4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标语提出：“悼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了邓公；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掉四条。” 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

——“倒邓”和“保赵”——这两个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口号，再次被列在一起，上报中央。

据报道，上街的群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数千人、围观者上万。在众多的观众中，大都怀着一种对事态的关注心情，议论着几个话题：（1）事态会如何发展；（2）事情会有什么结局；（3）议论胡耀邦的为人；（4）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作风的不满。

一般以干部与知识分子对前两项较为关注。这说明，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所有街头行动都是在追求一种政治目标的。而且也较为理性地考虑了结局。而后两项则多为一般群众议论的焦点。他们到这儿来，大多不过是要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而已。

4月17日下午，分管国家教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分别向赵紫阳、李鹏汇报了两年来全国高校的情况，说何东昌已经向他反映，北大、人大、复旦与武汉大学等一批院校在悼念活动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情况和苗头，国家教委将马上发一个通知。赵紫阳对他说，要充分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指出他们的一些不当做法，要深明大义，晓之以理。这天下午，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报告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动向的《简报》，已送达李鹏案头。李鹏对李铁映表示，工作要做在前头，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天，姚依林在与李鹏的个别交流中谈到，这次学生悼念耀邦的动向值得高度注意。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早在等待时机，现在耀邦去世了，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这些人会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防止事态的扩大。

当晚上，李鹏看完北京市送达的材料后，致电陈希同，了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希同通过电话简单汇报后，于18日早晨，签发了一份北京市政府给国务院的报告。报告称：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从4月17日开始出现升温趋势。”

据市委教育工作部今天早晨的统计，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北京已有26所高校的学生自发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校内张贴的悼词、挽联、大小字报共计七百多份。

报告简述了4月17日午后，北大学生集结到天安门游行的经过；人民大学17日晚出现的“人大民主墙”；北京理工大学“一天就贴出93幅条幅”等情况。还报告了各高校，出现的悼词、挽联、大小字报、讲演和开设灵堂状况，以及有的学生提出的“送灵”要求。

从七百多份大小字报、挽联、悼词内容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正常悼念，这是大多数；第二类，为耀邦同志的生前鸣不平；第三类，对现实不满，带有煽动性、攻击性的言论。

同日，何东昌签发了国家教委向全国部份省市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的《通知》，《通知》指出：于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活动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和苗头。少数人由于对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不满意，想藉机发挥。需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以引导。也有校内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藉此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五节 “中国魂”、“七条”与大会堂请愿

在这个阶段，学生的街头运动与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以及民间政治团体四个方面的活动关系，基本上是互通声气，互相关切，并行不悖，各行其是，互不来往的。就像是一场由高声部和低声部组成的合唱。但北大“中国魂”白练的出现、制作，与它后来在运动中发挥的作用，预示着这种互不来往的关系被打破。

据北大学生常劲回忆，“中国魂”的白练出现在4月17日，它直接导致了北大学生第一次游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5日、16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活动，主要是大家贴出一些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4月16日早上，出现了一些抨击邓小平的话……但是没有特别激烈的文章。”

“到了4月17日晚上11：00，在28楼、31楼的花园里有十来个学生在弹吉它、唱歌，对面的女生楼也在那儿合唱，又唱又笑。但是这天晚上是一个不眠之夜，很多人都睡不着。大家睡不着，听着就很烦，推举一个人出去骂他们一顿。因为我的嗓子比较大，就选了我出去骂。所以我就伸出脑袋骂了一

句‘操你大爷。’没想到，在我骂的时候，旁边28楼又有人伸出脑袋来骂‘操你大爷’，一会儿就伸了几个脑袋出来一起骂。当我缩回脑袋，下面就有人叫：‘有种的下来！’他刚说完，28楼全响了，宿舍灯全亮了，大家都伸出脑袋开始跟他们骂，有一批学生就要下去跟那帮人打……”

据女生们回忆，窗外弹吉他的人，弹唱的是崔健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歌曲。她们本以为，按照往常的习惯，熄灯之后，这伙人就会散去。可“怪异”的是：

“快到12：00了，他们还是不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在黑暗里我们听到不知是29还是28楼的人，大声嚷嚷让他们走开。他们非但不走，反而变本加厉。我当时想，这下可有戏看了。”

“果然，真正的‘戏’从此开演。我们听到摔瓶子的声音，敲脸盆的声音，甚至还有几声鞭炮声。开始我们以为是双方发生了冲突，后来三角地那头传来人群的嗡嗡声、叫喊声……”

据常劲回忆，当时，在下面呆着的人也感到没什么事。但无聊之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游行啦！”

于是：

“整个28楼就沸腾了，都叫‘游行啦！’对面的女生宿舍也叫‘游行了！’大家就开始往28楼下面那个广场上汇集，三角地前面的地区也站了很多。这时三角地前面的28楼突然有一个窗口吊下来一个条幅，上面写着‘中国魂’，就有学生抬着这个条幅开始汇集，向天安门广场游行。”

在原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博士研究生李进进的记忆里，当晚的集合信息，是通过集体“敲碗”传达的：

“我与其他几位博士研究生在我房间里闲谈，突然听到一阵一阵嘈杂声。是什么声音？原来是来自学生宿舍的敲碗声。这声音把我们不由自主地吸引

到北大28号楼前。强烈的敲碗声夹杂着‘游行去’的喊叫声……是这原始般的声音将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在学生还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做的时候，突然从28楼楼上降下一个巨幅挽幛：‘中国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师生敬挽’。几位学生将这幅挽幛沿四边托起并引导学生们绕校园而行……在各学生楼前转，目的在号召更多的学生参加游行。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这挽幛周围，跟随它，走出校园，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门。”

这次行动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后来被视作八九民运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的“七条”。关于“七条”的酝酿过程，王丹对笔者描述是这样的：

“我是参与起草者之一。因为我搞‘民主沙龙’，在学生中比较有名气，所以大家推我出来。那天（4月17日）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散步，事先并不知道要游行。大家觉得，根据当时的情况，应该向政府提出几条要求，于是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凑起来，凑了七条。我们走到学校的三角地，看见大家都聚在那儿，一个由张炳九在前一天缝制的写有‘中国魂’的条幅，从29楼的窗口挂了下来。后来大家说要游行，我们就跟着去了。”

据笔者一个在国务院工作的朋友告诉，制作“中国魂”挽幛的经费，是体改所陈一谘交由他的秘书杨晓转交北大教师的。陈一谘本人虽已是赵紫阳幕府中人，但他的另一身份确实是“北大校友”，杨晓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八三级硕士毕业生。“中国魂”的制作者张炳九，是北京中青年理论界活跃人物，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倡者，博士生毕业后，留任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他也是“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之一。这便是这条挽幛上“师生”署名的来由。

但这次目标为天安门的游行，事先并没有预案。据当时在北大作家班的张伯笠回忆，游行是这样决定的：

“第一次游行我觉得是种情绪性的东西。……4月17日晚上我又到了三角地。这之前，有几个教师，他们写了一个‘中国魂’……他们都已经准备好

了，就是要今天搞游行。这个思想准备我们是有的，当时就看广场的情绪。到了‘三角地’一看，人也不很多，三三两两地大概能有十几个人。这个时候，常劲那个楼和南边的女生楼打起来了，打起来就骂。我就去看，那个女生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说要游行了。这个时候王丹出来了，王丹说怎么办？因为那时已经聚集了大约三百多人，大家就说：游行。王丹说：游就游。我们在校园游。我就说：在校园游有什么意思，要游我们就到天安门。王丹说：这个大家怎么看。大家说：同意。我一看人很少，我就说：这样，先在校园游一圈，人就出来了。然后就准备在校园游。刚说完这句话，在48楼4楼就扔下了这个‘中国魂’，‘刷’地下来，上面扯着。在底下我们就把它拽过来，就抬出去游。”

图3-9：“中国魂”

当时的北大女生宿舍31楼由一位老太太把守。为防止谈恋爱，她规定晚11：00以后就不许出门。校园内游行队伍经过女生楼时，张伯笠等提出“救救女同胞”的口号。于是：

“我们去了很多男生，就把女生楼的大门给踹开，这是第一次革命。踹开以后，女生就出来了，队伍就越来越大，然后就顺着北边48楼、46楼转了一圈，然后就出来了。”

据白梦回忆，这次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法大学的刺激而起的。当时，打着挽幛走在前面的有张伯笠、郭海峰、王丹、丁小平。“王丹走在最前面中心像个领导人似的”。

但队伍走到人大的时候，张炳九赶来拦住了去路。他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你们不要游行，你们如果游行出去以后，赵紫阳就完了”。张伯笠说：

“我知道他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当时我说：‘他是新权威的人，我们不要理他。’张炳九当时就要下跪，眼泪都出来了。我就把他扶起来，说：‘张老师，你最好先到边上冷静一下。’其实我是想，他冷静以

后，我们队伍就过了。但他不冷静，郭海峰就踢了他两脚，把他踢出了游行队伍。然后游行队伍接着往前走，走到人大的时候，这个队伍边跑边喊：

‘人大下来，人大下来。’人大的在里面喊：‘北大的同学，我们跟着你们。你们等一会儿，我们要穿衣服。’因为那时很晚了。我们说：‘不能等。我们前面走，你们后面跟吧。’”

18日凌晨，数千名北大师生涌出校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经过人大校门时，又加入了人大的学生。当他们步行到达广场时，将这幅绣有“中国魂——永远怀念胡耀邦同志”，长15米，宽5米的挽幛，搭人梯挂上了纪念碑基座的顶端。随后，学生们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讨论，大家敲定了七条建议，并决定早上将意见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七条”的内容是：

一、要求党中央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

二、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

三、要求公布中央领导及其家属的财产和收入；

四、要求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五、要求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六、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七、要求政府肯定学生此次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

到达广场的学生，向围绕纪念碑的市民进行了演讲，并就社会热点问题和学运走向进行了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4月18日）早晨。据李进进回忆，大约6：30左右，同学们推出学生代表王丹和郭海峰，要求与全国人大对话，并递交书面的七条意见。王丹来回传递着与人大办公厅交涉的情况。但交涉

看来并不顺利。学生见联系无果，有的去看升旗仪式，有的买早点，大部分逐渐离去。剩下的约二百人，坚守在大会堂正东边的空地上。这时，张伯笠提出向北大求援。王丹说只知道李淑娴的电话。

据称，王丹向静坐学生传达了李淑娴“一要坚持，二要把请愿书递交人大常委”的“指示”。而李淑娴则将王丹通报的广场情况写了一张小纸条，贴在了北大三角地。《方励之自传》没有回避这个情节。自此，王丹的行动备受官方重视，并在1989年浩如烟海的资讯中被强调，大体因为他们认为已经抓住了“黑手”上班以后，人大常委会一位信访局副局长出来接待学生。但张伯笠对他说：“这个级别不够。最低不低于人大代表、常委来接待我们。”于是事情被耽搁下来。

此时，李进进决定走上前台。而他的出现，又使这次学生的活动与民间政治团体发生了交集。

图3-10：李进进（选自亚衣《流亡者访谈录》）

李进进，1955年生于湖北武汉。1971—1977年参军服役；复员后任武汉市刑警大队刑警；1978年考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1982年就读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回到武汉中南政法学院从教，并在此结识了王军涛。1986年，经王介绍，又结识了该团队的陈子明和闵琦。之后，参加了他们主办的政治与行政所的“公民论”课题组。从1987年到北京读博士直到“六四”，他一直与陈、王保持联系。事后，他承认，这也是他“后来组织‘工自联’时‘维宪会’得以通过我和‘工自联’取得联系的一个基础”。

1988年“两会”期间，北大学生走上人民大会堂台阶给人大代表擦皮鞋。时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的李进进则与十来位研究生一道，提出了一份“教育改革”建议，并以致两会“公开信”的形式，在北大三角地发表。在1988年

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热潮中，他邀请了于浩成、包遵信、温元凯等一批学者在校园里举办了“现代化理论讨论会”。由于他富于“自由化”色彩的一系列活动，在1989年2月他离京期间，校方组织了研究生会的换届选举。自此，直到4月18日早晨，他一直抱着“安心坐下来做研究，完成我的博士学位”的念头，坚持不介入运动。但事态的发展和贡献所学的诱惑，使他毅然走到了学生面前：

“我拍了几下手，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然后我作了自我介绍，接着我发表了我的看法。我说：‘人大代表应当同学生见面，我们也有权利向人民代表递交请愿书。这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我是宪法学博士研究生，我愿意代表大家去递交请愿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应当离开。我们应当学会斗争的方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学生同意了他的主张后，他向大会堂警卫出示了研究生证，警卫让他进入了大会堂。李进进回忆道：

“我进入了人民大会堂里面的一个会议室，那里已是坐满了人。我是学宪法的，我向他们列举了宪法条款，指出人民代表有义务倾听人民群众包括学生的意见。我说，人大办公厅应当接受学生的请愿。他们说，人大现在休会，代表不在北京。我们可以回到海淀区向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提意见。我回答道，北京市有许多人大代表。最后的焦点是：如果全国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学生会不会纠缠不清。我反复强调，学生已经承诺，递交请愿书后即回学校。他们不相信学生。双方相持不下。有人说要去研究一下……”

随后，他走出会议室，在走廊里等候两个小时，仍没有任何人给他答案。于是，他走出大会堂，走到学生中间，向他们说明情况，并告诉大家，“我们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得到任何答案”。紧接着，他部署了自己在步出大会堂时已经构思好的“行动方案”：1、静坐等候结果；2、通报全国；3、向北大

求援；4、将纪念碑上的“中国魂”移到举行静坐的学生中间，“大家围绕着挽联坐下”。

午时过后，饥饿的静坐者开始接受捐款。

“由于往来的人较多，为了让人们了解我们，支持我们，我每隔15分钟就站起来，将我们所做的前因后果做一番说明。路过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被我们的执着精神所感动，纷纷解囊相助。”

图3-11：募捐、“七条”（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但是，直到下午5：00，北大方面并没有动静。静坐的一群人，与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山人海比较起来，显得稀少而且寥落。原来，没有经验而且并未组织起来的北大学生，听说广场需要军大衣，理解了其中“连夜战斗”的意思，所以决定白天按兵不动，晚上前往增援。

“我正在焦急之中，突然一队打着‘北京经济学院’大旗的学生在纪念碑献完花圈后，涌向我们静坐的地方。……他们大约有五百人左右。”

自北京经济学院的队伍加入以后，静坐的队伍不断壮大。到晚7：00左右，大约聚集了数千人。

晚7：00许，请愿学生等待13个小时之后，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在李进进演讲的空隙，有人过来对他说，“人大”要求见面。李进进再次与在场学生通报情况，取得共识和授权后，第二次进入了大会堂。这一次，几名人大代表已在等候，对方显得比他要着急得多。他们开门见山，让他提交“请愿书”了事。但李进进当即拒绝。他说，递交“请愿书”不能私相授受，人民代表必须当着外面的学生和其他群众接受请愿“七条”。否则，静坐的人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愚弄他们。”

美联社18日发自北京的报导，转述这次请愿到此为止的情况称：今天，学生们的游行逐渐变得越来越带政治性，学生们要求政府对他们今天早些时

候提出的七点要求作出答覆。学生代表刘京京（译音）说，官僚们会尝到人民的力量。……学生们想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谈谈他们的要求，而且不会要求立即作出答覆，可他们不敢出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人大代表答应在大会堂外的台阶上接受请愿书。于是发生了这一幕——八九民运中第一个以“喜剧”形式结束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另外一个学生，后来才知道是郭海峰，一起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我手拿着用大毛笔自封书写的‘七条’，郭拿着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名义）提出的‘十条’。当我们走到中间台阶时，我停住不走了。我看到几个人民代表站在高层台阶上。工作人员赶紧用手招呼，让我往上走。而我却招呼他们下来，并说：‘人民代表是仆人，我们是主人。仆人应当下来接待主人。’这时一位著名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带头走下来了。其他两名代表也跟着走下来。他们是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刘延东说，他们会向全国人大转交我们的请愿书。”

事后，人大常委会并未公布，这份请愿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怎样的“旅行”？以及常委们作出了怎样的回应？直到5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赵紫阳提出“新政六条”；5月10日政治局会议后，当日下午，万里召开委员长会议，才决定6月20日左右（也就是事发两个月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把“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作为其中议题。

参加这次请愿的学生中，李进进、王丹、郭海峰、周勇军、张智勇后来都成为了八九学运和民运的骨干。

静坐人群随即散去。但李进进回校时，正路遇北大出发的学生。据说，他们原定在校园内举行追悼大会，但因受到官方阻止，只好扛花圈走出校门。

李进进认为，他们应该是增援的学生，所以向他们讲述了请愿成功的过程。但他感觉学生们似乎不认识他是谁，对他的述说不敢偏信，所以仍然继续向天安门进发。

据一份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口的传单与北京市委办公厅材料称，这批学生于晚9：00到达广场，和留在广场的北航、人大的学生会合。此时，算上围观者，广场人数达到2万人左右。

官方掌握的信息称，此时，有学生在演讲中说：“中国只有一党专制，就是官僚。打倒共产党一党专制！”众人大笑，有喊“不现实的”，有鼓掌的，还有起哄的。

图3-12：4月18日，夜晚的纪念碑下（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到晚10：00，在北大郭海峰及一些人大学生的带领下，他们开始打着“中国魂”挽联围绕广场游行、呼口号，然后奔向新华门，要求政府领导人出面对话……

晚11：35，近2000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吾尔开希 等人进行了演讲。

下面，是笔者和《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目击的18日午夜到19日凌晨2：00新华门前请愿的情况：

……许多人堵在新华门前的长安街当中。街心站着两行交通警，不时地招呼过往行人不要逗留，但似乎并不认真。当新华门前传来一阵振奋人心的呼喊时，他们也伸长脖颈朝声源探望……靠近新华门前的地上坐着黑压压的一片学生，人圈中两根竹杆挑起一幅横幅：继承耀邦遗志，促进民主进程。学生们有节奏地呼喊着：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之后是一片“出来喽！出来喽！”的胜利欢呼声。但随着一个“进去喽！”的声音，欢呼声又低哑下去。

新华门前九个警察手挽手站成三、四排。最靠近学生的是一排便衣。他们的前面赫然站着两个花圈……随着一声声“加油！加油！”的鼓动，花圈被举起，倾斜。接着便有“冲啊——！”的呼喊声。在一阵争持之后，第一个花圈被门里的人接进去了。又是一阵“噉——，进去了！进去了！”的呼声。大约12：25，第二个花圈也“冲”了进去。但等到进去时，基本也被揉碎了。学生捡起掉在地上的小白花，一朵一朵往人墙里扔，有的被挡回来，再捡，再扔。如同游戏一般。

图3-13：4月19日凌晨的新华门（陈小雅摄）

又有“李鹏，出来！”的呼声一阵阵传来。人群闪开，一个人民大学的学生拖着疲惫的步子，抱着卷起的横幅从闪开处出来。我上前问：“为什么撤？”

回答：“我们是来悼念胡耀邦的。现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要李鹏出来干什么？”

他走了。人圈里的学生坚持要把写有“中国魂”的条幅送进去。相持一阵以后，警察的手放下，门里面有闪光灯迅速地闪了几下。伟国说可能是“取证”。

1：00以后，警卫换人。新换上来的没有戴白手套。之后，门里闪出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朝外扫了一眼。但抱拳拱拱手，又进去了。伟国说有点像胡启立。

一个戴白手套的学生指挥唱起了《国歌》。接着领呼“民主万岁！反对独裁！”

不久，天安门方向又来了一队送花圈的队伍，走进圈中。一个中心是一面鲜艳国旗的小花圈很快被接进门内。人们又带来新的口号：“反对反自由化！”“反对反精神污染！”……一辆洒水车停在南长街路口，没有对新华门前的大街进行清扫。

“中国魂”飘来飘去，终无所归。

——这是19日凌晨2：00以前的新华门。

接下来的事情，国家教委的资料这样记载：

“凌晨，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和围观者不断呼喊‘我们要见李鹏’等口号，并手挽着手6次冲击新华门。有些人不顾阻拦，扔汽水瓶子和鞋子。有一武警战士被打伤。凌晨4：20，北京市人民政府在现场广播了《通告》，指出：‘近几天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广大群众进行悼念活动之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张贴攻击、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4月18日晚，公然煽动少数人冲击中南海，打伤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提出种种与悼念活动无关的无理要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而是蓄意制造和挑起事端，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

《通告》说，‘悼念活动主要应当在本单位内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北京是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所在地，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维护党政机关的正常秩序，维护首都交通、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借悼念活动之机，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那些搞打、砸、抢、冲、烧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这时，人群开始疏散。5时许，剩下的二百余人在限时撤离的通告发出和武警到场执勤后，自动散去。” 呼喊“李鹏出来”，是这次事件一个新的动向，也是“李鹏下台”口号的最初形式。事后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写道：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3000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

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单单从言语的表述看，此时的李鹏仿佛还比较“超脱”，还没有感到学生是冲他来的。因而，他的担忧，仅仅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一天他单独见过谁？就能够感到一种紧张：

“上午9：00，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在当日的“大参考”上，刊登了路透社17日题为《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导也认为，“这是自13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的示威活动。”李鹏的评论，显然受到这条评论的影响。但他们都忘记了，这不是“文革”的继续，而是“民主墙”运动的继续。

一些外交官和中国分析家预料，中国当局会设法防止这场学生运动进一步扩大，必要时会使用武力。因为，党的最高层的状况没有稳定到足以容忍这种情况的程度。

当然，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便不会有冲突局面出现。可是，双方似乎都意犹未尽。在这一天的新华门前，有一个人尽管没有发言，但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在活动，他就是为陈子明社经所工作、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刘刚。据他回忆：

“自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发生游行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到天安门广场，密切观察运动的走向。更主要的是要发现在运动期间成长起来的学运骨干和领袖。至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一天，已有许多学生骨干引起我的注意。这其中包括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周勇军，北大的张志勇、郭海峰。

我是在4月19日夜里中南海门前的示威人群中初识吾尔开希的。那时的游行队伍中还鲜有人敢站出来演讲或带头呼喊口号示威，大多数人都是站在后面看热闹。可那天在中南海门前，吾尔开希就勇敢地站了出来。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护卫中南海的武警和便衣要远远多于支持他的学生。不是见到有身份不明的人频繁地找吾尔开希谈话，或是威胁或是恳请他立即回学校。我相信，那天的吾尔开希是绝对有胆有识的。我在那天午夜就找到了吾尔开希，并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

所以，4月19日凌晨，新华门的和平清场并不是结束，只是开始。

第六节 《新观察》、“导报”座谈会

学生提出的“七条”的内容，确已超出一般的悼念和学生利益范围，在多数条款上表达了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的政治要求。其中要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为在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受打击的人士平反，是知识界与党内民主派的切身利益所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则是他们在漫长历史中的不懈追求。它与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一条，都是当年2月中国科学院42名知识分子《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中的内容。因此，它如果不是在知识界人士的帮助下形成的话，至少也是因受知识界及党内民主派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从整体上说，仍在沉默。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由《新观察》杂志社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反映了这种“沉默”的感情和思想。到会者是与胡耀邦有过共事、共谋经历，在现实政治中带有“胡派”色彩的党内中、高层干部。这个阵容令戴晴想到了延安“青委”的班底：

“……还是他们这帮子人，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当时他们对延安开始滋生的腐败的厌恶与对开明的向往绝不在王实味之下，他们那份很有朝气的《轻骑队》的呼喊也在王实味之先。但因他们年轻，又很听招呼地立即回到党的身边，立刻就没事了。这对他们说来一定留下深刻印象，成了他们随后进入政坛的必修课。但既使这样也没有改了他们的本性，他们依旧是中共高干队伍中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跃、最开明的一批。”

此外，到会的还有受到过胡耀邦关注、保护的知识分子，以及他的开明政策的受惠者及改革路线的赞同者、追随者，共计50人。会议由老资格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主持。

会议开始时，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代表家属向到会者表示，“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坠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吉祥！”因丧事在身，胡德平提前离会。

胡耀邦的老战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昌首先发言。他谈到与耀邦有过三次共事经历：第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军区，李昌任第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任政治委员；第二次是建国初期在团中央，李昌属于胡耀邦前任团中央书记冯文彬的班底，胡则是新任总书记；第三次是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工作时，任命胡耀邦、李昌到中国科学院领导科学院系统的“拨乱反正”。从这些共事经历中，李昌感到，胡耀邦“确实是我们党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许是由于党性的缘故，他没有去碰“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敏感问题。但接着发言的法学家于浩成，前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秦川，社科

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研究员张显扬，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吴象，青年理论工作者韦典华都没有讳言自己在这问题上的态度。于浩成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敬佩爱戴的领袖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一个沉重的损失”。秦川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十年，正是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生气勃勃的、最辉煌的时期……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再高明，得不到人心，不是那么仁爱，不是那样纯洁，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与会者回顾了胡耀邦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重要贡献。指出，他早在延安审干时期，就以实事求是“不信邪”的精神，为投奔革命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主持了公道，影响毛泽东做出了“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的决定。文革后期，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注重培养鼓励青年，对消除文革造成的人际隔膜，重振科研气氛起到有力的推进。中共十一大后，在邓小平尚未站稳脚跟，大多数复职者政治上仍在观望，不少人还“脚踩两只船”的情况下，他英勇无畏地担当起大举为“文革”中受迫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内外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任，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之后，在思想战线、组织路线上进行了坚定的拨乱反正，反对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亲自点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准备。他提出的“创作自由”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开创了创作繁荣的新时代。他积极支持理论上冲破思想禁区，大胆探索，明确反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农村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符合经济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型因素和新型生产关系，使改革者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与社会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他正直诚恳、胸襟开阔、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光明磊落、谦虚好学、深入群众，勇于自我批评，对党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会者回忆，他下台后曾说：

“有四种人要慎重而又慎重地来对待：一种人是青年学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成长；一种人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理解、宽容；一种人是少数民族；另外一种民主党派。”

与会者暗示，这段可视作胡耀邦政治遗言的话，在当前是有现实意义的。显然，在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党和政府依法执政的社会里，这种对某类人的特殊“关照政策”不免显得有点煞有介事，但在一个没有建立起民主与法治秩序的国家，在一个从思想到观念都十分陈旧的党，在政府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民之父母”的社会里，无疑是明智和可贵的。

年青的参会者对老一辈在哀悼中把胡耀邦的悲剧归结为奸佞所害，歌颂其虽大屈而无怨的个人品格表示了不满。跟随戴晴前往参会的张郎郎说，党史不再应该是好人和坏人的历史。如果那样，事情倒简单了。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民主的、正常的秩序，这个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立凡回顾了胡耀邦在平反父亲张乃器“右派”问题上的作用，表达了感恩的思想。并说，在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下降的时刻，胡耀邦的逝世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历史机会。他警告说：

“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

《光明日报》记者戴晴不满于苏绍智赞扬胡耀邦在辞职问题上的“坦然”，更不赞同章立凡对中共纠正“反右”错误还要感恩。她在历数了历任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批评自己的党内缺乏民主后，指出：

“我们今天悼念耀邦，不仅仅是怀念他的伟大人格，而且应该按照他的心愿，把他已经开始的事业推向前进，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回避了……对党内不正当的事情，不能坦然处之。要使得党内好的作风不仅仅是由个人好的品格来保证，而要靠建立一套机制来保证。”

事后，戴晴回忆：

“我并不认识这位总书记。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为了一名被‘搞’掉的前福建省副省长路东明的问题。促使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冲的著名改革家去职的最后与最关键的一击来自胡总书记的一段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感情色彩浓烈的批示。我作为一名实地调查记者则打报告请求他在事实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这在处于极盛期的中共高层干部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抵消了我对他其它一些细节上的不满，赢得了我对他一定的尊敬。” 但是，考虑到“在这一个案例中，前总书记的形象不够光辉”，她不想在会上讲述这个冗长而令人沮丧的故事：

“我与他全遭败北。他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的偏听偏信；待到 he 不想偏听偏信时，又遭到了欺蒙与利用他的人的坚决抵制。我则如一头勇气十足的一岁半的小狼掉进陷阱，让那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路东明的死敌给玩了个底儿掉——手持一纸总书记的敕令也白搭。”

座谈在论及当前局势时，大部分人使用了谨慎的措辞和态度。在老人中，只有秦川明确地提出，希望学生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重新再发生天安门事件”，但又强调“绝不能错误地对待年轻人。绝不能整学生”。与众人的这种谨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其的发言。作为一个与“四五”运动和“民主墙”有渊源的人物，他开门见山地把话题引向了天安门广场。他说：

“有人说中国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以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对胡耀邦同志这种悲痛的心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感，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凝聚力。说中国没有凝聚力，我看他们是离开了人民……人民对这种不公正的意见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第二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悼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希望有这样的人，在未来的年代里，对错误的做法能够公开的进行重新评价。”

“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时，发现都在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悼念耀邦，第二句是中国缺少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在1976年的时候，几乎也是叫这两句话……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对1986年学生运动作出公正评价。如果只是少数人议论议论，不能够公正评价，我想今后还会有严重后果。”

他奉劝公安部的一些人，不要重蹈1976年的覆辙。因为他们每做的一件坏事，都会被记在历史上。他预言：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图3-14：4月19日，严家其（左）、于浩成在《新观察》“导报”座谈会上（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显然，在1989年的4月，人们会因为一个得民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去世，再一次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并不是因为那儿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也不是因为那儿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而是因为有了一个1976年“四五运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那儿原本是党的领袖俯瞰人民的广场，是执行国家功能的庄严领地，是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标记，但是当1976年的“四五”改写了它的历史，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民众以自发的运动成功地干预了历史进程的摇篮之后，它便获得了新的功能。尽管1986年反自由化运动以后，北京市政府以实现交通现代化为由，用铁栅栏将其与道路分割，使人们只有从地下通道才能抵达广场，但它写在觉醒了的人民心目中的意义，是锁不住的！

问题在于：历史，是否可以重演？

第七章 第一个回合——寻找交手接触点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仲维光、封从德、张伟国、李进进、杨继绳、吴洪奚、石晓敏）

当历史把人们带到似曾相识的渡口，习惯往往会指引人们运用以往的经验泅渡。1989年的中南海里，掌权者虽已不是积十年动乱之民怨的“文革上台派”，而是积十年改革之荣誉，有40年统治经验的中共“正统派”，但他们对暴力统治的路径依赖并未改变。中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说，我们要学会适应现代社会中的学生运动，学习用现代政治的方法解决问题。但这正好成为其政敌把他打入“自由化”另册的把柄。对于这个信奉、也擅长于用“枪杆子”打天下的政权来说，政治艺术家本来就是稀罕之物，谈判与妥协远不如斗争来得顺手。

而1989年4月的街头，走动的也不是13年前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虽然仍仰望“四五英雄”的壮举，却对60年代英雄主义培养出来的，使英雄成其为英雄的“炼狱”不感兴趣。他们是理想主义退潮、世俗价值复苏后新生的一代。他们习惯于轻松的、带游戏谐趣的生活。与前代的以集体主义和无名英雄为追求理想的价值准则不同，他们把参与政治与塑造个人看作水乳交融的事情。

第一节 “新华门事件”及其后果

如前所述，4月19日凌晨的清场顺利结束，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朝野双方通过“备战”，正准备一决高下。

在学生一方，没能等来他们希望一睹的领导人的尊容，却等来了“宿敌”——北京市政府一纸冷冰冰的《通告》。这个《通告》，把几天来发生在校园和广场等地的学生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对耀邦的“深切怀念”，为“寄托哀思”而举行的悼念活动；一类是“别有用心”的造谣、蛊惑、攻击、谩骂。并根据这个分野，亮出“底牌”。但是，这个充满教条主义精神的《通告》没有分析，人们为什么会对耀邦的逝世感到“悲痛”，为什么要对他“深切怀念”，正是因为耀邦是作为“民主”先锋，在改革过程中被用“非程序”的手段拉下马，人们才有这么多的悲痛和这么多的怀念。既然如此，人们借耀邦逝世之机，发泄不满和不平，表一表平日不敢有的怀疑、义愤，以及推进耀邦未完成的民主事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通告》把这些通通不加区别地归之于造谣蛊惑，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只能按照一种方式、内容悼念，其它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但耀邦既然是人民“自己的”耀邦，人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哀悼方式。而《通告》中所说的将绳之以法的“打、砸、抢、冲、烧”等行为，当时根本没有发生。

北京市的这个《通告》，是在4月19日白天见报的。也许正因为它所透出的那种冷冷杀气，这一天举行的《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自由派”座谈会上，才有那么多的忧虑和警告。但对于沉浸在“末世氛围”的青年人来说，这个《通告》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因新的信息刺激导致抗议活动的升级。

“新华门事件”是八九民运形成期间的一个著名事件。是它，使悼念活动第一个染上了“血”的色彩。

4月19日夜，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再次聚集在新华门前。据公安部长贾春旺向李鹏汇报，前往聚集的学生游行队伍很不严肃，“一面游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去世有什么悲痛之情。”

但是，一个新的情况是：与前一天相比，人数大幅增加；悼念胡耀邦、敬献花圈的主题，已经转换成“反对独裁”、“反对专制”。除继续向中央提出昨天已提交全国人大的“七条”请愿要求外，北大作家班还第一次打出了“绝食”的旗号。旗幡所用，是张伯笠的床单；“绝食”二字是作家郑义所写。打出这个旗号的，是诗人白梦和另一位数学系的同学。据说，绝食是郑义提出的。他之所以在这时发起“绝食”运动，是“文革”中绝食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种唤起同情，聚集人气的最好方法。

根据各种回忆和记述材料，19日夜到20日晨的情况是这样的：

晚11：00许，有三千多名学生坐在中南海新华门前的地上，反复呼叫“李鹏出来”。围观的群众有七八千人，公安、武警动员民众离开。这时，从天安门广场方向过来一支队伍，一位上访的中年妇女挟在队伍中，见到新华门警卫就跪在地上诉说冤情，可能是警卫战士想把她与静坐群众分开，将她带到里面去，站在后面围观的群众看不见，往前挤，把队伍挤向新华门。警卫部队出来阻拦，发生了第一次摩擦。

图3-15：4月19日晚新华门请愿妇女（选自64memo.com）

后来，又有静坐队伍要求派人送花圈进中南海，据说有3位代表进去了，但很久不见出来。外面的学生以为他们被扣押了，便想冲进去要人。后面有工人往前拱，有很多鞋扔向警卫。学生领袖当场制止了扔鞋的行为。据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回忆：

“4月17日我们学校组织了第一次悼念胡耀邦的游行，自那天以后，我几乎天天上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在天安门广场，我被学生们推上去演讲，我讲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自由都是现有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我又指出现在的宪法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原则产生的而不是根据人民的意愿产生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后来我们又到新华门前去静坐请愿，前后延续了好几天。当我看到有些人把花圈和鞋往里面扔时，我跟清华大学的张铭说这样做不大得

体。他同意我的看法，建议我跟在场的人讲一讲。我就讲了我们在请愿时应该保持哪些行为规则，大家说我讲得很及时。”

大约是在此时，在政府一方，有人心急如焚，有人神凝气定。 据李鹏《“六四”日记》载：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给我来电话，要求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有一个明确态度。新华门前混乱情况愈演愈烈，而听不到中央的声音。他极力主张中央对闹事分子应该强硬起来，否则北京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不知中央对学生的行为是支持还是反对，市委不好做工作。

我实在忍不住了，到晚上11：30，我给赵紫阳同志直接通了话。我对他说，学生上街游行已不是简单为了悼念耀邦同志，性质已经起了变化。就在此时此刻不法分子冲击中南海的新华门，向执勤战士攻击、冲撞、扔玻璃瓶等，有的战士头部被砸伤。……我要求紫阳同志明确下达指示，向冲击新华门的人采取严厉的措施。但赵紫阳竟回答我说，他对现在闹事群众冲击新华门的情况不了解。他还是那句话：‘只要学生不搞打砸烧，中央就不采取行动。赵紫阳就住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搞打砸抢，叫喊声不绝于耳。他竟然说不了解，令人费解。他还说，按照原来中央确定的分工，社会发生突发事件本应由国务院处理。但考虑到乔石同志已经主持胡耀邦治丧事宜，而学生游行又是与治丧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现在再由党中央交回国务院处理，也不太方便。他还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向乔石同志提好了。他在电话中断然回绝了我的意见，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闹事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

赵紫阳事后的回忆，证实了这次李鹏来电：

“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

大约也是在这时，受命负责胡耀邦追悼会期间治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正在召集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中宣部、中办警卫局、北京市委、市府和市公安局有关人士的会议。经研究决定，以北京市人民政府名义发布通告，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的秩序，由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执行。 据称，中南海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学生冲进大门。 在乔石的应急预案中，有一条，就是用大卡车封死新华门“为人民服务”大字影壁与大门之间的通道，令静坐的群众冲不进去。

图3-16：周勇军在新华门演讲（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4月20日凌晨1：00，新华门前围观者大部分散去。剩下的学生，计划早上5：00等候头班公交车撤离。因为昨晚从学校步行几十里地走到这里，早已经又累又饿，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就此自行退去，面子上没光，肚子也不允许。反正大黑天的也没地方去，只好在新华门前候着。

但是，新华门不是火车站候车广场！凌晨2：00，中国人民大学开来校车，接回了本校同学。留下的北大、法大学生，大约有三百多人。

大约是4：00，新华门前的广播车开始催促，让学生“回去睡觉”，政府现在要清场了。据张伯笠回忆：

“这个时候警察就开始打人了，数学系的那个同学就让人用腿给顶了一下，……把床单一放就跑了。当时我也跑，我领着另外一个学生，跑得都很狼狈。

……警察在半夜的时候就采取了措施，切断了新华门跟外面的联系。当时里面切断了有二百多人，其中北大的最多。……出去后，我就绕到东面，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吾尔开希在那儿发表了煽动性非常强的演讲。”

据在场的陈子明社经所兼职人员张伦回忆，当时已经被“切”在包围圈外面的吾尔开希，没有忘记圈内的同学自己逃跑：

“他说：‘……里面的同学被堵在里面，我们在外面，不能让他们感到孤单。我们要组织起来支援里边。我来喊口号，大家跟我喊。’于是，就这么开始组织起来，坚持了很长时间，他又不断地演讲。然后他要求有人出来，跟他一块组织。在他没有要求之前，刘刚就站了出来。然后就应吾尔开希的要求，又有一个工人站了出来。到了凌晨时，我找了个人把刘刚找了出来，因为周围全部是便衣，明目张胆，带着步话机，看得很清楚。刘刚的情况很特殊……他没有固定的住宿，他要是失踪了的话，朋友们都不会知道下落。但是刚刚撤出来，警察就从东边过来，就要开始打点。这时我们就完全被打散了。打，用的是铜头皮带和皮鞋。……吾尔开希最早是被几个小伙子架在脖子上，往外跑，然后再上三轮车，警察一下子就把长安街封了起来。”

在警察将静坐学生“强制带离现场”期间，发生了“反动口号”事件。陈一谔得到的信息称：

“凌晨4：20，公安、武警与这些学生发生了冲突。原来，在公安、武警强行将学生拉上公交车时，一些不愿意上车的学生和公安、武警发生了争执。在相互推搡的过程中，公安、武警殴打了一些大学生，大约有四五十人被打伤。……目击者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生气愤地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当时，立即有学生制止了这个女孩，公安、武警挤过人群要抓她，很多学生保护着她走了。”

5月20日清晨5：00许，警察把围观群众向东西两侧推出：东到南长街，西到六部口，然后把准备好的汽车开到新华门，不到几分钟，静坐的学生全被推进汽车送走。

北大的学生被公交车拉回。当其中一辆经过正徒步返校的张伯笠身边时，张回忆道：

“因为在北大门口，他的车路过我，我就听车里面喊：警察施暴。下车以后，我问彭嶸怎么回事，彭嶸就拿着一块玻璃，这么大一块玻璃，那上面有这么大一块血。他说：这是血的罪证。怎么办？我说：那咱们就游行吧。把全校同学都喊起来。当时我定了十六个字：警察施暴，殴打学生，然后是全国罢课，如何如何。大约是20日凌晨5点钟。”

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坐的也许不是同一辆车，他的回忆提供了与张伯笠不同的细节：

“4月20日清晨，当局出动了数千名警察强行驱散了外围的请愿者，发生了流血事件，我们学校也有一名学生被打伤。但在新华门前，在里面部分，警察没有打人。一位穿便衣的警察头头要我们立即撤退，在场的学生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我当时的意思是不要和警察对抗……可惜到最后，在场的二十多个人中只有三个人同意我的观点，包括清华大学的张铭。后来警察就两个架一个地把学生送上汽车，车子开到北大，把我们都轰了下来。”

这大概就是整个“新华门事件”全过程的梗概。

那么，“血”是从哪里来的呢？

4月20日凌晨，新华门前警察打人的情况，不仅是学生的“一面之词”，在场目睹了实况的还有机关干部、北京市民和各新闻单位记者。例如，中宣部一干部，奉命到广场做学生的工作，被警察一脚把脸踢肿；《经济日报》的一位女记者，在新华门拍照时也被殴打；西单一位下班的饭店工人，路遇学生经过，被警察从后面拥打；《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实习记者，于20日凌晨2：30左右，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地痛打，并两次被打倒在地。他们的身份证明，他们应是在场的围观者，如周勇军所说，是在“驱赶”和“切割”过程中遭遇了暴力。但当场有学生手腕被扭脱臼，这应是针对静坐学生的行为。

据学生组织的统计，4月20日凌晨在新华门前被打的学生约四五十人——与陈一谘的说法一致。

事后，《人民日报》聚集记者发回的消息，综合形成了一个对“新华门事件”看法。陆超祺在4月20日日记里写道：

“总的意见是：学生没有什么过错。所谓冲击中南海，有两种说法……不管哪一种说法，所谓‘冲击中南海’都不是事实。”

但是，官方对这次事件所作的报道，与上述记忆有很大区别。新华社的报道说：

“19日晚至20日晨，有近300 名学生围聚在新华门前并冲击中南海，他们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的呼喊反动口号，有的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据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介绍，有4 名警察被人群中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冲击新华门，击伤维护秩序的民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希望围观的人提高警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离开现场。《通告》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

由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写的《惊心动魄的56天》对这一天新华门前的活动仅作了如下反映：

“3：45，新华门前开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希望围观的人提高警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离开现场。并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

4：00许，公安干警、武警战士在新华门前清场，将广播公告后仍留在新华门前的100多名学生强行带上公共汽车。其间，一些学生将汽车玻璃打碎，还有一名女生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轩彦编的《京都血火》是这样表述这一过程的：

“据现场维持秩序的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说：19日晚至20日晨，有数百名学生围聚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些人向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当场有四位警察被打伤。有些人还多次冲击中南海……警察耐心地对这些学生劝说了约两小时。到20日早晨3：40左右，广播要求在场学生20分钟之内离开新华门。但他们不离去。到4：40左右，一部分学生被学校来的领导劝走，但快到天亮仍有200多人不肯走。有人喊‘谁走就是叛徒’。为了维护秩序，使即将大量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能正常行驶，警察依照治安管理条例只好挟着这些学生，将他们送上大型交通汽车送回学校。有的学生极力争跳着不肯上车，又吵又骂，又喊。已经送进车里的学生在车上又砸破了不少车窗玻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警察之间发生了互相推拉和厮打的现像。’‘市公安局的同志说，外界传说公安局抓人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传唤过一个人。在这次强制学生离开新华门时，学生和警察互相推推搡搡是确实有的双方也都有人受了一些小伤。”

那么，当时的学生为什么要对“强行带离”作如此的抗争呢？显然，他们以为是要将他们送进监狱。这里有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记述了自己在前一天新华门清场时的心态：

“……到18日午夜之后，实在支持不住，就走出新华门前的学生队伍，到门侧一个树丛中坐下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觉得有人推我，推得不重，但很有力。我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三个警察……戴上眼镜，才发现新华门前已空空荡荡……在两个警察扶持下，走进路边停放的一辆公共汽车。

……我刚进车，就有人说，‘可能会把我们送到公安局去’。我一惊，马上溜下汽车。”

北京市委编印的小册子有一段记录也可以反映“四二〇事件”中学生的这种心态：

“5：00市公交总公司在武警、公安人员的协助下，将130 多名滞留在新华门前的学生疏散上车。学生边上车边砸，将5块玻璃砸碎。当车行至南礼士路口一带，有些学生从破碎的玻璃窗向外探身，有人被划伤。司机减速，学生硬扒开车门全部下车……”

以上来自官方消息，不能说没有真实之处。但它们在披露真相时，都或多或少地有意隐去重要环节，或故意含糊其词。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学生似乎是在作“煽动性演讲”时，无故呼喊了“反动口号”，而且，不仅不存在什么“血案”，相反，是警察被人打伤。教委本和轩彦本的记载，客观地反映了所谓呼喊“反动口号”的情节，但却把学生所说“警察施暴”，描绘成警察和学生互打。而警察身上的伤痕（相信这是真的），究竟是被身份不明，别有用心的有用的人用砖块或汽水瓶击伤的，还是在与学生推打中受伤的？则不清楚。市委本虽然承认所谓“反动口号”是在强行带离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不仅只字未提学生被“协助”时受伤的情况，反而暗示学生是在无故逃离汽车时，自己被自己打碎的玻璃“划伤”的。

总之，按照官方口径，根本不承认有学生被打一事，而所谓“血案”更是子虚乌有。对中国政法大学王志勇被警察痛殴一事，有的还以讥嘲的口气说，学生喊得震天价响的“新华门前，警察施暴”，原来只有一个“在前门附近被人打伤”的学生，他的那件“血衣”是这个事件中的唯一血迹。仿佛学生要把一个毫不相关的事件，与新华门清场硬套在一起。

大概是19日夜间接到李鹏电话以后，赵紫阳也感觉到，自己住在中南海内，说不了解“冲击”情况，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他还是向公安部调来了录像，并据以判断形势。事后，他回忆说：

“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 事情就这么简单！他只字未提人

群中有人砸砖头、汽水瓶和鞋子的事，也没提警察打人的事。之所轻描淡写，以后我们还将分析原因。

当然，他也并不是没有忧虑。李鹏要“安定”是为了搞“治理整顿”，赵紫阳同样需要“安定”来搞改革。于是，便有了由鲍彤执笔，署名“新华社评论员”的《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出炉。文章说：

“有那么一些人，借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他们发表煽动性讲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污损人民英雄纪念碑，甚至冲击新华门，打伤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他们明明白白地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而是在干扰正常的悼念活动。他们的行动已经越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对这样的违法活动，采取坚决的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

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日记：这篇评论是经李鹏审定的。他认为“态度如此强硬，是想把学潮压下去。但是，事与愿违。”关于这篇评论的出炉，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也有记载：

“因为有学生到新华门静坐，与警卫发生了冲突，新华社的新闻还说有人呼喊反动口号，治丧办公室宣传组要求新闻单位写评论。下午，新华社的评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发出来了，杀气腾腾的，各方反应都很强烈，报社内部亦然。”

据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这篇评论苦心在于希望学生顾全大局，体谅改革派领导人此时存在的为难。但其语气的强硬，与后来发表的“四二六社论”并不相上下。但就像一脚踢走“中国魂”的制作者张炳九一样，接近亢奋状态的学生对它的反应，与北京市的《通告》没什么区别。

学生和群众被打，官方把持的新闻媒介的公开报道却隐瞒真相，不仅为八九民运提供了“新闻体制改革”要求的依据，也激怒了怀有委屈和不平的学生。

4月20日当日，从新华门回到学校的学生迅速传播着“新华门被打”的事迹。一份关于中国政法大学王志勇被打一事的传单，不久就出现在北京的街头。这张来自政法大学的传单内容如下：

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

——“四二〇”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被打真相

4月19日晚，我校王志勇等三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20日凌晨4时许，他们穿过长安街南侧街巷走上人民大会堂南侧街道准备直达地铁。走到一半，迎面来了两排武警。带队警官一声令下：“什么人？打！”几十名武警迅速分散包抄上来，几名警察不问青红皂白，蜂涌而上，专用带铁扣皮带抽打王的头部，并辅以拳打脚踢，致王志勇头颅破裂，缝三针，多处淤血，两眼充血，眼眶发乌，左眼无法睁开，当时无法做任何医学鉴定。惨不忍睹。王被打后，拼力跑至地铁口，昏坐在那儿，后被两个好心青年护送回校。

据悉，20日凌晨其他离校的一些学生也遭到无辜的殴打。连女同学也未被放过。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武警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人性，难道是共和国法律允许他们这么干的，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难道这是党纪、军纪允许的吗？

我校全体师生对此事的发生无不愤慨万分。各系学生会联合决定于21日、22日实行罢课，坚决要求惩办元凶，有关方面公开道歉，新闻媒介披露该事件的全部真相！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凶手！

（王志勇同学是国际经济法系学生）

中国政法大学全体同学

为了调查此事，当时就有新华社内参记者采访了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三名学生于4月19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当晚11：30许，乘22路汽车回校，由于长安街交通拥挤，后决定乘早班地铁回校，走到大会堂南侧街道时，被迎面走来的两排武警冲散，学生王志勇被包围并被武警用皮带抽打头部晕倒，后被鲁艺学院的两位学生送回法大。王回校后在校医室包扎、缝针，后转北医三院就诊。北医三院出具的证明为：“头皮裂伤，轻度脑震荡，眼外伤。”

4月20日当天中午，中国政法大学便挂出王志勇的血衣，夜间贴出了罢课通告。通告内容有：（1）4月21日至22日罢课两天，抗议警方这种非法行为；（2）要求政府严惩凶手；（3）警方必须在报上公开对这种行为道歉，如实报道伤案经过；（4）第二、三条要求必须在4月23日晚5：00前给予答复，否则进一步采取行动。

4月21日开始，该校1300多名学生进行了罢课。中午12：00，法大校园内有学生点火烧毁了登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报纸。

4月19日，北京市政府警告不要在新华门前闹事的《通告》发表当天，北大学生曾拒绝清华同学邀请再去新华门。新华门事件爆发时，前一天在新华门前扮演过组织者角色的王丹，正与同学亟亟于总结前一天行动不利的教训，筹备北京大学的学生自治组织。但“四二〇事件”及法大同学罢课的消息传开，他们与原来“各自为政”的学校一起，立即作出了声援的反应。不久，北大三角地就贴出了清晨刚刚诞生的“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的通告：

“为了抗议军警对学生的残酷殴打，为了抗议舆论的歪曲报道，我们筹委会代表北大广大同学决定，自4月21日上午8时起，开始全校罢课。并要求：（1）新闻公正报道；（2）严惩惨案制造元凶。请每一个真正的有热血有良心的北大师生进行罢课抗议，不达到目的决不复课。”

同时，北大、人大、清华都分别贴出了《新华门血案》、《血》、《“四二〇”惨案》等大字报。中午，吾尔开希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三一八纪念碑”前发表演讲。此后，四校同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一起，走出校门，上街游行。虽中途遇雨，仍有1000多名北大、航大学生高举“和平请愿”、“反对官倒”、“反对暴行”的标语，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当晚，学生冒雨在天安门静坐，抗议凌晨新华门前的打人事件。还有人爬到纪念碑浮雕顶上演讲。

图3-17：北大展出王志勇血衣（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4月21日，各校学生罢课付诸实施。已在酝酿筹备的学生组织也迅速成长起来。

此前，学潮基本上是没有统一组织，没有形成统一纲领，与社会各界基本隔离，也没有体现出大的发展势头的自发的、分散的活动。而通过“新华门事件”，学生的组织化程度迅速增强，自我约束的理性水平大大提高，运用宣传手段扩大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并寻求社会、特别是知识界支持的意识也随即觉醒。

后来成为八九民运著名学生领袖的柴玲，就是通过目睹“新华门事件”转变的。柴玲事后回忆道：

“在4年北大生涯里，除了我被班主任任命为团支部书记外，我尽可能避免参加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例如我们区的当地选举或者偶尔举办的主要谈论西方影响或者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沙龙。”

然而，这一切，在1989年的4月20日凌晨，发生了改变。当时，她和封从德都随天安门广场过来的一群人，在声援围观的人群里。当她看见被警察追逐的“人群像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平原上的一群受惊的黑斑羚一样向四面八方”奔逃，自己也成为羚羊群中的一只时，她心中的“耻辱和愤怒”被点燃了：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耻辱过，被像丧家之犬一样赶走。”“”从此以后，我绝不要再跑了。封也不会。”

柴玲的回忆，帮助我们拼齐了“新华门事件魔方”的最后一个色块——造成“冲击”的人群（包括上访妇女或花圈）来自天安门广场。而那些用来投掷的物件，显然也是这帮有备而来的人们携带而来的。在春寒未散的四月凌晨，谁也不可能脱下自己的鞋用来投掷，如果有这样光脚的人，一定很容易被发现。剩下的问题是，这支人马是由谁组织的？很明显，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要陷害学生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平息学运），这一点，学生已经想到过；另一种是要利用学生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这一点尽管到此学生还没有在意，但随后而来紧贴学运的种种势力运作，将把这些人凸显出来。

显然，从柴玲这段回忆，我们可以看出，在学生这一边，“悼胡”主题，从此已经悄悄地地转变为“抗议”的主题了。

而在政府一边，则是直接改变了胡耀邦治丧活动的规格：

原定方案：

- 1、4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的向遗体告别仪式；
- 2、4月22日开四千人的追悼大会；
- 3、群众性的就地的悼念活动可以适当报导；
- 4、驻外使领馆除追悼会那天下半旗外，还要设灵堂，耀邦同志照片挂黑纱，设签名册，谁来了就签个名；
- 5、已经有了的专案就不要收缩，如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不得拒绝。

但4月20日晚9：00，这一方案改变了。陆超祺的日记写道：

“21日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的仪式取消了。”

这是悼胡方案的第一次变化。其原因，如果不是与天安门广场上的自发悼念有关，便是与胡家对方案的意见有关。胡家方案希望两天开放灵堂，供群众举行“遗体告别”，取消追悼会。但这个变化是针锋相对：追悼会依然召开，“遗体告别”就免了。

与此同时，媒体报道的纪律也进一步收紧：一切悼念活动都不得报道，连耀邦的生平照片也不能登，除了外国发来的唁电，统统留到22日，即举行追悼会那天刊登。陆超祺认为，这可能与18晚、19日凌晨新华门前的事态和《科技日报》刊登一张写有“中国魂”三个大字的大幅挽幛的照片有关。

自新华门事件开始，《人民日报》报社内部也开始出现大字报。这预示着，如果事态继续发展，而当局的策略不加改变，新闻界卷入学生运动是早晚的事情。

第二节 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不过，此时，与学生联系更密切的大学老师和知识界人士，还是先走了一步。

就在学生的悼念活动因“新华门事件”转出“抗议”主题时，原来在近处观望、或只是以在幕后出点子、给学运“敲边鼓”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按捺不住，走到了前台。4月21日，他们联名发出了“八九民运”中知识界第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耀邦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道。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构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借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平等对话，吸取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引起学生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 致

敬 礼 ！

1989. 4. 21. 北京

就在政府中的某些人竭力想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政府的行为，以便干净利落地扫除时，知识界的这封联名信明确把它定格在法律和公民权利的范

围内，意在保护学生，尽量不使之在较低的层次上与政府交手。在“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的精神观照下，它一方面警告政府不要以“杀死对手”的方式逃避这场比武，另一方面，也以婉转的形式劝吁学生不要犯规。使学潮爆发以来学生提出的口号、纲领，进一步系统化、条理化。而最终也是将知识界、党内民主派想说而无法说出，这次借学生之口提出来的政治愿望与政治要求公之于众。

据领衔签名的包遵信回忆，他参与此事的过程是这样的：

“4月20日上午9：00左右，《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魏群给我打电话，说她昨晚通宵都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学生们请愿示威以及凌晨警察与学生冲突的情况，还说学生现在对知识界感到很失望……我说，我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是钦佩的，对他们的民主要求是支持的，但我们支持只能是道义上的。如果站出来说话，反倒会给他们惹麻烦，使事情复杂化……下午2：00多，远志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给我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说的话，和魏群上午在电话中讲的一样，只是没有说他曾经目睹昨晚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当他提出要我站出来公开表态时，我还是照上午对魏群讲的重复了一遍。远志明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却提出，我们可以建议中央领导与学生对话，这样总是行的吧。我一听觉得有道理，这倒是个好主意。他说如果你同意就起草一封信，下午我来拿。我说还是你起草吧。远说，那也行，不过你要第一个签名。我说：行。

……我们到了远志明家，远的妻子说：他们在谢选骏家。进了谢家的门，一看除了远志明、谢选骏，还有王润生、陈宣良、荣剑也来了……远志明首先拿出了一份稿子，念了几句，大家就觉得不怎么满意……接着我讲了几条意见：（一）首先肯定胡耀邦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象征，他的逝世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受挫。（二）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中一些敏感问题不表态。（三）我们这封信的落脚点是放在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王润生还提出应该明确要求新闻界对学运客观公正报道。

王润生和荣剑还把学生的要求概括成为四条内容。大家觉得这样很好，接着就由王润生口述，远志明执笔起草……”

第二天（4月21日），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它一些没有参与起草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

郑义也参加了这封联名信征集签名。他回忆道：

“通过陈子明的关系借了辆小车，马上出发征集签名。除了我和远志明，还有咱们的老朋友——青年神话学家谢选骏，还有位女记者。急匆匆地走家串户，向足不出户的老先生们介绍情况……虽然他们信仰、见解和党派不尽相同，但在声援学生，反对暴力上完全一致。跑了几十家，没有一位老先生拒绝签名。女作家宗璞的先生很使我感动，他一直面含微笑倾听着我们陈述，当宗璞签完名后，这位音乐家谦恭地小声发问：我也能签吗？他认真地签上了名字。他完全明白这签名将承担政治干系，他更将这风险视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和光荣。”

图3-18：4月21日知识分子公开信（陈小雅收藏）

“我们配合得很好。写作界由我主讲，理论界由远、谢主讲。下午四五点赶回人大，凑起名单，将公开信抄成大字报，火速在北大、人大等主要高校贴出。……学潮初期，学生们都在晚饭后行动。必须赶在他们出发之前让他们知道知识界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并不孤立。”

此后，依然是乘坐陈子明提供的那辆车，由郑义、远志明、谢选骏和魏群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据郑义回忆，为防不测，他们出门前都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只留下证件。

但是从中南海西门到人民大会堂小西门，他们均遭到拒绝。在中南海西门，他们还遭到审问盘查，一度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碰撞。这封信曾被“门卫摔在地上”，后来，因“投送无门”，它又被郑义从某处围墙上抛进了中南海。最后，一行人只得将复制件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在海外刊登。

这封信的意义，不论是当事人还是社会各界都曾给予充分的评价：

“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

这封《公开信》的出现，使原来仅有两方参加的比赛场上，出现了第三方。

但这个第三方的出现，并没有构成战线上的三角格局。因为第三者虽然以“仲裁人”的姿态出现，但并没有立即站到前台，而仅仅以学生的同盟或智慧提供者的面目出现。这一方面适应于知识界本身无组织、无前台经验、无担当责任的心理准备等状况，另一方面，也适应了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轻视的传统。试想，手握“粮票”的中共什么时候害怕过知识分子？哪一次运动不是从知识分子开刀的呢？这一次，知识分子若跳到前台，堂堂皇皇地将它收拾，顶多不过是在无数旧例中，再增加一个新例罢了。而知识分子如果站在学生后面，以学生的名义说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青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人数众多，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是国际人权社会首先关怀的对象。连目空一切的毛泽东都说过：“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文革中的刘少奇，不就是这样翻船的吗？

知识界的加入，无疑加重了学生一方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他们的智慧与政治经验的帮助，也使政府中“草斩”学运的企图增加了实施的困难。但这一举动，并没有使处在危境中的学潮化险为夷。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

其一，“33人签名信”与邓结怨。

其二，“大闹1989”得到了应证。

1989年4月21日知识界的《公开信》，与“33人签名信”并无任何联系。它是由原人大的研究生、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后因他们多以青年政治学院谢选骏家为活动地点，而被称为“青年帮”）为核心酝酿和发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主编、原《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和名义，但并非组织者。

但这封信采取了与“33人签名信”一脉相承的形式。即公开的、以宣言面貌出现的、跨单位的形式，也就是干政的姿态。而后者不仅是中共统治绝对禁止，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实行多久的活动形式。况且，在签名者中，有包遵信、吴组缃、高皋、李泽厚、宗璞、北岛、朱炜、刘东、王焱等十人是重复签名者，其中北岛是“33人签名信”的组织者。另外，“青年帮”中的远志明、谢选骏因参与苏晓康《河殇》的撰稿，而《河殇》的主要作者苏晓康也参加了“33人签名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公开信》带上了某种“33人色彩”。

据称，参加“33人签名信”的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曾经说过，中国将形成三个集团，即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政治家三个集团。而前两集团应对后者构成压力，以起平衡作用，促进中国向前发展。与汤教授的这番言论如出一辙，方励之在年初也曾大谈过“压力集团”概念。据此，当局有理由认为，

这些事件与当前发生的知识分子的联合行动，是构成所谓“压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中共对89年学潮一开始就采取严格防范和极其反常的敌视态度成为必然。

李鹏当日和日后的“日记”，都没有记载这封“公开信”。这说明，中南海的巡逻哨没有能及时到达郑义投信的地点。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声称，中南海是4月22日从北京大学“布告栏”得到消息的，来源是安全部根据北大提交的报告。这说明，所谓公民与政府的“对话渠道”，秘密的渠道比公开的畅通！

第三节 高层意见的分化

李鹏4月20日的日记，记述了这一天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情况：

“常委会还讨论了昨天晚上学生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学潮的性质正发生变化。冲击中南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已超过正常悼念活动的范围。为防止学生再次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政要害部门，常委会决定，今晚开始对西长安街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闹事学生和群众拦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乔石同志提出，要把学生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常委会正式确定由乔石、温家宝、李铁映负责追悼会前后的学潮，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赵紫阳说：处理学生闹事方针定了，第一线同志全权负责，难免有不周之处，出了问题，集体负责。赵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是：‘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采取行动。’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大多数学生尚处于中间状态，但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真相，把学生、工农和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很遗憾，我的意见没有为赵紫阳所重视和采纳。这是我

和赵紫阳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会议上。”

继4月18日陈希同签发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第一份报告后，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又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呈送了第二份报告。报告称：“从4月18日凌晨开始，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悼念活动，由于别有用心的人的破坏出现转向。”

“转向”的主要表现是：

一、借题发挥，提出不少政治主张……

二、反动言论公开化。……“自18日开始，个别学生公开书写和呼喊反动口号，矛头指向小平、紫阳、李鹏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诸如“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共产党”“打倒独裁专制！”等等。

三、不断有人煽动闹事。对耀邦同志的死因，有人造出“是被迫害致死的”“是被气死的”等流言。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堆里，常见有人煽动：你们在这里闹腾有啥用，要到中南海去，到人民大会堂去。有的大字报还公开号召大学生组织起来，要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采取联合行动；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商店去，动员各界群众起来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的大字报公然煽动学生：要冲击中南海，火烧中南海！

四、冲击中南海……

五、提出纲领性口号，活动趋于组织化。一些学校先后贴出大字报，提出诸如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制定学生自治法；成立修正宪法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言论自由等纲领性口号。

报告指出：“悼念活动的开始几天，学生的一些过激活动，经有关人士的劝说，常自行结束或散去。从18日开始，静坐的、集会的、演讲的和冲击

中南海的学生，则已劝说无效，而且心较齐，行动较统一，显示出有组织的状态。针对这一情况，市委、市政府已采取如下措施控制局势：

一是开展政治攻势，晓之以理。用广播的形式和劝说的方法，向学生讲述道理，揭露少数人的不良企图，引导学生回校学习，有组织地进行悼念耀邦同志的活动，化悲痛为行动，好好学习。

二是发布通告，制止违法行为。19日市政府发布三条通告，确保悼念活动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严防少数人的破坏、捣乱。

三是采取戒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18日和19日凌晨，为排除学生对中南海的冲击和长安街的交通堵塞，市政府果断决定采取临时戒严措施，驱散新华门前闹事的学生，同时派出车辆，将学生转移回校。

四是紧急召开区、县、局、大学、总公司和大企业负责人会议，介绍情况，分析形势，提出要求。市长陈希同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锡铭、副书记李其炎分别讲话……。

同日，根据李鹏的指示，李铁映责成国家教委向部份省市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了第二份《通知》。《通知》指出，“对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学校党委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对学生中的一些意见和怨气，要及时疏导；对错误言论，要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对个别煽动闹事的人，学校领导要找他们谈话，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

第四节 北大筹委会发起的第一次联合行动

据柴玲回忆，4月19日那天，封从德做项目的计算机又坏了。所以，当晚，他们得空来到了北大三角地。本想看看学生们对市政府的广播通告有何反响。却不料“他的精力一下转到正在兴起的运动上”来了：

“他（封从德）花了一整天都在北大图书馆里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美国政府和政治》、甘地传记和其它著作。他想为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他能够感受到命运在呼唤他的名字。”

还是在“新华门事件”爆发以前，4月20日的凌晨，北大已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据常劲回忆，这个组织的成立过程是这样的：

“4月19日晚上10：30，我听说民主沙龙在三角地有一个悼胡集会，我站在外面听。当时的主持是武运学，他请大家上去讲胡耀邦的功过。讲的都是比较理性的，没有太多地谈到学运方面的东西，主要谈一些关于胡耀邦、关于社会状况。后来就上去了丁小平、封从德、熊焱，还有我。丁小平、封从德、熊焱他们都是八七年学运的参加者，我也是1988年柴庆丰事件的参加者。丁小平说他搞了十年民主了，所以我们就上去分析以往学运失败的经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应该成立一个学生组织来领导学运，当然这个学生组织应该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应该是公开的。然后丁小平就上去讲，说‘既然要成立这个组织，既然大家已经有了这个共识，为什么没有勇敢的人站出来，加入筹委会，成为筹委会的第一批成员？’他讲了以后两、三分钟之内都没有什么人举手，丁小平就说，‘那就让我们那些勇敢的讲演者成为这个第一届的团结学生会的筹委会委员吧。’底下就鼓掌，我们都在上面站着。我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丁小平就叫封从德记录这些人的名字。这个时候，王丹和杨涛他们从天安门广场上回来了，王丹哑着嗓子在那里介绍广场上的情况，号召更多的人去广场。谈到筹委会这个事情，王丹和杨涛也加入了，并且在丁小平问下面的人报名参加的时候，又有三个人加入。这三个人是杨丹涛、孟召强和赵体国。”

据常劲介绍，经丁小平提议，该组织定名“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们要学习团结工会，当时大家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封从德也谈到过这个名称。而且当时在讨论时，大家已经对学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个大的设想。”

在考虑与现存的学生会组织的关系时，团结学生会的发起人首先提出建议，希望“学生会站出来领导。”但是没有动静：

“……我们喊三声，就说‘学生会站出来！学生会站出来！学生会站出来！’没有声音。‘好，那么我们要不要罢免学生会？’‘好。’‘同意不同意？’‘同意！’‘罢免学生会以后怎么办？要不要选一个自己的组织？’‘同意！’”

在这次讨论中，有人冒充金观涛的名义“传话”：“现在是行动的最好时机，要采取统一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北大、清华的学生要联合行动。”会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约定第二天中午互派代表在清华商讨联合行动问题。

此后，不断有学运积极分子参与进来，他们起草了成立宣言和新闻发布稿，不仅进行了内部分工，还派出成员联络清华大学学生成立清华的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在最后定名时，起草人感觉“团结学生会”这个名字太像波兰团结工会，有模仿之嫌，于是改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简称“北大筹委会”）。

如前所述，“北大筹委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了4月20晚抗议“新华门事件”的冒雨游行和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常劲回忆道：

“当时沈彤负责捐款，赵体国负责纠察队，张智勇拿着喇叭在那里做讲演、鼓动。就赶紧派人去通知熊焱和封从德，说是把清华的同学也拉上，因为清华的同学也要去游行。这个人去了以后，他们俩不信，没有动静。又派了我去，通知他们两个人。等我回来的时候，赵体国他们这边的纠察队已经拉起来了，沈彤和张智勇他们已经拿着横幅，开始准备出发了。他们这支队伍有一千多人，非常整齐，冒着大雨浩浩荡荡地在街上走，一路上喊口号，那么大的雨……”

也许是校方预先收到了消息，清华的大门紧闭。当北大学生到来时，一辆装有四个大喇叭的吉普车，对他们喊道：北大的同学，你们回自己学校去闹，不要影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上课。但是仍有少量清华同学走出校园。于是，队伍继续往政法大学走。在政法大学，冒雨前来的同学受到很热情的接待。他们被接到学生食堂吃饭，并受到劝阻：“不要再去了”。在赵体国的坚持下，常劲和沈彤鼓动大家要继续坚持下去。

“政法大学劝了以后，我们没有听，就拉好队伍继续往路上走。我们派了人去找北师大的学生，这个找的也回来了，说北师大的学生也要去。我们再走就看见北师大的学生举着‘教师万岁’的旗子，又有一批大约几百人的队伍，就一起往天安门广场走了。”

在北师大，据王德邦回忆，4月20日一早，就听见吾尔开希在“三一八”纪念碑前大声讲述新华门事件过程，呼吁同学们下午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谴责打伤学生暴行。下午将近3：30的时候，将近五六百学生在“三一八”纪念碑前集合，打着“继承耀邦遗志，发扬民主精神”的横幅走出校门。不巧，大雨骤至，天空电闪雷鸣。当队伍走到新街口时，已经只剩下四五十人了。这时，吾尔开希在地铁口再次就新华门事件发表演讲。讲完看看剩下的人已经不多，就征求王德邦的意见：是否返校？王认为，大横幅既然扛出来了，回之不武。就是剩下他们两人，也要把它送到广场去。于是，一行七八人，坚持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他们受到坚守在那里的记者和学生的欢迎。当时拍下的照片，还登在了当期《大学生》杂志的封面上。

“我们似乎是被簇拥着走到了纪念碑下……吾尔开希向围观的人们发表了演讲。刚讲了几句，从纪念碑台基上走来一个人，跟吾尔开希说先别单独发言，待大家协调统一后再讲，但吾尔开希没有理会，继续讲了昨晚的所见及纪念耀邦的意义等。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从纪念碑台基上下来的人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演讲完后，我们将横幅送上了纪念碑。这时，周勇军又过来跟我们说，学校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对此大家都表示认同。”

走在北师大队伍后面的北大队伍，到达广场的时间大约是晚上九点多钟。据常劲回忆：

“天已经黑了，而且下着雨，天气非常的冷，所有的学生都在那儿打抖。我们走到广场上，广场上已是挤满了人。我们找纠察队，把北大的队伍拉到这儿，广场上整个就沸腾了，说：‘北大的学生来啦！’但是我们拉了队以后，发现我们的人已经少了一大半了……然后沈彤、我和赵体国三个人在那个地方拉出一个圈子来，开始做讲演。陈明远、吾尔开希和周勇军，还有一些工人代表都上去讲演。”

北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走在了学生队伍里。张伯笠则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呼吁成立全国高校的联合组织。张伯笠回忆道：

“我第一次看见陈明远，陈明远一边走一边喊：打倒官倒，打倒腐败。我觉得这个知识分子挺有意思，就跟他聊一会儿天，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陈明远，他还给我留下地址。然后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围了一条圆圈就开始演讲。……这是我第一次站出来，第一次亮相。我说：‘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针对昨天的警察施暴。我们下一步应该成立一个全国高校的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领导机构。’”

这一天柴玲并没有参加北大的行动。一早起来，她给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少儿心理学的研究生项目寄出了申请书。她还在继续执行他们夫妇一起出国留学的计划。心想过几天悼念会完了，丈夫把过去的创伤平息下来，他就会回家安心过日子了。可是事与愿违，运动的纵深没有送回她的丈夫，反而将她也卷了进去，而且陷得比她的丈夫更深。当晚，留守在北大没有参加冒雨游行的筹委会成员开会，拟定了行动纲领“十一条”。在原有七条外，又增加了：1）要求惩办元凶；2）要求新闻界公开报道学生运动；3）释放魏京生；4）要求就政策上的失误向人民检讨；5）科学理顺物价；6）强烈要求邓小平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误的原因。去掉了要求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公正

评价学潮两条。倡议各高校能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目前已形成声势的学运。

此后，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北大学生会筹委会委员熊焱，在三角地宣读了《全国高校联合会宣誓书》。

4月21日，北京15所院校在北大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下设纠察部、联络部、信息部，办公地点在北大28楼4楼。

在北师大，据王德邦回忆，20晚冒雨游行结束后，他和吾尔开希一同坐地铁回校途中，二人交换了联合各校、建立统一组织的意见。当时，他尚不知道吾尔开希早在新华门事件中就已经出头，还动员吾尔开希说“这时候谁先出来学生就认谁”。但当他一觉睡醒时，发现吾尔开希已经“以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号召北京各高校今晚到师大来集合”，统一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明天的胡耀邦追悼会了。

图3-19：北大三角地“贴出的学生421游行前遗言”（选自香港《明报》）

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全市高校统一行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决议，是如何形成的？“临时高联”的成立，经过一番怎样的幕后策划？第二天，为何各高校果然集中到北师大，举行了联合誓师大会？但官方认定，这是被“黑手”操控所为。据他们掌握的消息，早在4月16日社经所《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就找到王丹，对他说：“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星期六（22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披露这一信息的文章错误地把高瑜指为是“体改所”的人。另外，官方信息还披露，方励之的夫人李淑娴18日也曾对王丹说：“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闹大了。”也许正因为这符合众人的心理，也许是“新华门事件”压力产生的凝聚力，4月21日上午，各校果然都贴出了“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通告，通知当晚10：00集合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誓师大会”。要求学生穿球鞋，

带足水和干粮，集队前往天安门广场，给第二天出殡的胡耀邦遗体送行。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组织纠察队，以防止坏人破坏，给政府镇压提供口实。

这个行动的提出，与北京市公安局预先发布的一个《通告》有关。《通告》说：

“为了保障4月22日上午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的顺利进行，现将天安门地区的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一、4月22日上午8：00至12：00，天安门广场及大会堂西侧路，除持有大会车证的车辆外，停止其它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二、4月22日上午8：30至12：00，南河沿南口（不含）以西、府右街南口（不含）以东、天安门广场东侧路，除允许公共汽车甩站通过和持有大会车证的车辆通行外，停止其它各种车辆通行。”

同时，电台还广播了《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通告》：

“为了维护东西长安街交通的安全畅通，所有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挽联的同志，请不要走东西长安街（东单至西单），可绕行前三门大街和其它街道。”

未雨绸缪，从广播到戒严仅剩24小时的紧迫时间，促使酝酿还极不充分的新生的学生统一组织迅速运转起来，并体现出空前的凝聚能力。

晚7：00，北大、清华、人大、北京科技大、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外语学院，都有人数不等的学生开始行动，纠察队一律佩戴红袖标。他们由北京郊区的西北一线，步行来到正北面的北师大，撞开校门，与师大院内已聚集的万名高校学生汇合。

晚9：30左右，“全市高校学生誓师大会”提前举行，参加者约二万人，会议由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主持。他提出要以演讲的形式控诉“四二〇暴力事件”，讲了22日晨游行的目的和路线。当场，有人用自行车驮着一大袋白灰到人群中分发，但被一些高年级学生制止。

9：45，队伍离开北师大，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沿途高呼“反对暴力”、“爱国无罪”、“铲除官倒”、“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贪官污吏”等口号。队伍打出的标语、横幅有“联合起来”、“耀邦千古”、“耀邦精神不死”、“民主斗士，青年挚友”、“科学兴国，教育为本”、“争取民主，尊重人权”、“民主万岁”、“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反对腐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暴力”、“爱国无罪”、“新闻要讲真话”。

中国政法大学还抬出了一块木牌，是青年教师刘苏里 准备结婚做家具用的木料，现在，它行进在望不到头的学生队伍中，上面赫然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37、41条。队伍中，学生们5 人一排，手拉手前进。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人领呼口号。纠察队员手拉手走在队伍的两边，形成队伍与围观群众及尾随者的屏障。他们沿途对背有照相机的人询问是否是记者，向他们讲述“新华门事件”和王志勇被打经过，请记者到学校去看血衣和医院证明，要求新闻界为他们说公道话。沿街群众不时对他们的口号和严整的组织报以掌声，学生则以“人民万岁！”“理解万岁！”相回报。许多群众将茶杯、开水放在路边，供学生饮用。过街天桥上那幅“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交通宣传标语，被卷起了前半句，剩下“平平安安回家来”。

图3-20：4月21日晚首个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清华人”队伍（选自香港《明报》月刊）

这时，围绕着第二天人民大会堂追悼会实况转播忙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从大会堂内部往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这幅景象：

“广场上有数万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摆满花圈，镁光灯闪闪烁烁，晚上10：30在回电台的路上，仍然有许多人正赶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得知，游行示威的学生要准备占领广场，阻挠追悼会的举行，甚至有传闻说，有的人准备拦截灵车。”

4月22日0：20，学生队伍经过新华门。北京科技大学的队伍第一个进入广场。随后到达的是前一天赴京的天津南开大学的“请愿团”。1：50左右，清华、北航、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北师大、北大、人大、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京理工大等20所高校，3万人的队伍全部进入广场。

据封从德回忆：

“因为听说了在晚上12：00以前要把天安门广场戒严，担心会有暴力的冲突，北大是在队伍的中后部分，我就想跑到前面去看。结果到了前面，在长安街大概是六部口的附近，我发现清华的方阵非常有威风，是北大筹委会的孟召强走在队首，打着红黄绿三色小旗，在前面指挥。清华的纠察队绝对是第一流的，他们检查非常严格，那个方阵真是气势磅礴。

因为他们是首队，我就跟着他们进去。结果清华把广场的中心轴线给占住，占了中线以后，还是考虑到北大向来在民主运动当中的地位，所以他们主动提出让北大也到中间来，但是已经发现有了技术困难。这个时候来了人大的一个代表，还有其他同学在纪念碑的北面台阶上，我们商量怎么办？这大概是‘协调小组’的一个雏型。为了把广场上的队形搞得好看一点，不让中共看笑话。人大的同学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由清华非常强大的纠察队来做一个封闭的曲线，这个封闭的曲线往外扩张，遇到学生就放进去，遇到其他人员就请走，就这样把它推到外面去。这个努力做了三个小时，最后失败。

失败以后，我就回到北大筹委会。北大的位置是在纪念碑的西面，纪念碑和人大大会堂之间。北大的队形就远远不如清华，非常的松散，市民随便就能插进来，而且外围曲线是就像中国的海岸线一样复杂。这时我们筹委会的成员非常担心：因为离人大大会堂比较近，那么军警要从那边过来，我们就担心，他们会首先在学生当中插入一些便衣，然后各个击破，把北大同学先赶走。所以我们就整队。然后我累了，就躲到纪念碑去偷偷睡了五个小时。”

3：00左右，学生按临时协调小组排定的位置在广场打出校旗，就地坐下，纠察队员负责维持秩序，检查进出人员的校徽或学生证。

据官方掌握的消息，此后，在临时召开的19所高校代表会议上，郭海峰提出，首先要搞和平请愿。在追悼会前，要求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接见，进行谈判。如果不行，就冲入大会堂。各校学生代表一听，马上都表示不同意。在人家办丧事时去闯灵堂闹事，太不得人心；再说，学生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搞什么“谈判”，大家是来开追悼会的。经过这样一番争议，大约到5：00左右，代表们才决定向治丧办提出3条要求：绝对保证学生安全，瞻仰胡耀邦遗容，灵车绕广场一周。

学生在广场的突然出现和秩序井然的就坐，给负责管理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秩序的治丧办公室提出了新的难题。但他们迅速判定，学生们风尘仆仆而来，为的是与胡耀邦的最后告别。认定他们的合理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所占据的位置应予调整。

图3-21：学生坐着，警察也没辙（选自香港《明报》月刊）

5：00时左右，“治丧办”开始与学生的“临时协调小组”交涉、要求他们把队伍从纪念碑西松墙以西，调到西松墙以东至西华灯一线。为参加追悼会的车辆腾出停车场地。但因面对纪念堂的北大学生队伍体积过大，后来的其他院校学生不愿腾闪位置，学生间的协调失败。

清晨，当华灯熄灭时分，天安门广场西面华灯以西学生的队伍仍没能按要求完成调动。同时，他们又提出三点要求：1）无条件保证学生人身安全；2）瞻仰胡耀邦遗容；3）客观报道“四二〇事件”。这些要求如不答应，将每隔十分钟调一所高校队伍向西移动。

据时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的浦志强回忆：

“在天已破晓之际，由于我们所提出的条件未能获得全部接受，根据当时所说的每隔十分钟带领一个大学的学生队伍西进的精神，我带领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率先冲过了由武警士兵组成的松散的警戒线，未发生冲突。士兵随即撤到人民大会堂前西侧路的内侧。我们则一直走到广场边缘的铁栏杆前。随后的大约二十分钟光景之内，各校学生纷纷前进到铁栏杆前并重新以校为单位，面向人民大会堂方向整队站好。广场秩序一度比较混乱，但秩序随即恢复。

由于各校需要在队伍的前沿与广场铁栏杆中间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所以各校又将各自的队伍后撤约两米左右的距离。空出来的这两米左右的空间即成为一些同学领呼口号和发表演说的场所，以及各校组织者加强联系的通道。” 7：15左右，“治丧办”工作人员向熊炜、郑旭光、熊焱等5名学生代表作出答复：1、通过音响向广场转播追悼会实况；2、大轿车停车位置不挡住学生视线；3、只要学生队伍不乱，保证学生人身安全。

图3-22：大会堂前：学生与军警的“楚河汉界”（选自香港《明报》月刊）

第五节 “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早晨最早的时候，仪仗队从天安门里踏步而来，停在了天安门广场北面、紫禁城对面的国旗杆前。几万名学生在国旗迎着清晨耀眼的骄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肃然立正、行注目礼。我们面对国旗行礼，并用如雷的声音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们用感天动地的歌声震撼了天安门广场。当我们唱国歌的时候，国旗缓缓地升到了旗杆的中央，以纪念胡耀邦的去世。我们开始唱《国际歌》，这是一个对死去的敬爱领袖唱的庄重的挽歌。很多人洒下了泪水。……”

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意识到，此刻，他们已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

不久，有一队士兵从广场西北角跑步来到大会堂东路，紧贴学生队伍，由北向南站成一线。学生将其视为“侮辱性行为”，7：50左右，学生队伍开始向西移动，“协调小组”做工作无效，几万人的队伍涌到广场与大会堂东路的隔离墩附近。部分学生越过隔离墩。那个由军警组成的象征性的绿色警戒线，即如沸汤中的几颗绿豆——翻滚了几下，随即化为乌有。

据香港《百姓》月刊记者现场采写的报道描述：“社科院新闻系标语‘新闻要说真话’往前涌进。传闻风起，背景是嗷嗷的叫声，人们的精神快要疯了。”

“当仪仗队回到天安门里面以后，广场上的广播里传来了一个政府发言人的声音。

‘广场上的学生们，’这个声音大声喊到：‘大家知道这些天来北京发生了一些不法行为。你们大家应该注意一小撮心怀叵测的人利用胡耀邦的死来攻击政府。如果这些人继续这样的行为，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全部的责任。’集结在广场上的学生迅速感到了不安。封从德和其它学生领袖会面谈论对策。几分钟以后，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举起了一个大板，上面写着斗大的几个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章，公民有自由言论权和自由结社权。’

整个人群爆发了如雷的掌声。”

这一天，首都的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均下半旗向胡耀邦致哀。人民大会堂大厅东门入口处横挂着一条20多米长的黑色挽幛，上面写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会场正中的遗像前，摆放着胡耀邦夫人李昭率众子孙献的大花篮。花篮的白色缎带上面写着：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安息吧！”

胡耀邦的身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他面容安祥地仰卧在杜鹃花、马蹄莲和松柏簇拥的水晶棺内。这原是为毛泽东逝世而制作的一个备份棺槨。

各种应邀参加官方追悼大会的人士，乘着大小车辆纷至沓来。他们中有党魁和政府首脑，有各单位的头头，与中共同舟共济但在大多数时候充当花瓶的民主党派人士，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左派和右派……在这个政权建立以后，参加这样的认识不认识，喜欢不喜欢，有感情无感情，有仇恨无仇恨的人的遗体告别，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今天，当他们走出与各自身份相称的车辆时，有些人或许感觉到不虚此行。因为，这时，他们有机会目睹学生静静的方阵，而这种景观在共和国历史上的罕见，与内参、外刊按身份级别权力大小拥有知情权的多少而分配不同，并非每一个有权力者都有幸能看到的。

为了安抚各方，追悼会邀请参加与耀邦遗体告别的4000多人中，尽量照顾了党和国家机关及大专院校的中青年干部与知识分子。这些对几天来学运一直抱密切关注态度，后来终于成为“八九民运”中风云人物的人，此时从饥寒交迫、疲惫不堪，被认为是“没有资格”进入悼念大厅的学生身边走过时，怀有的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态度：有人侥幸，有人痛苦，有人因此而生长出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所在的位势的优越，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做比学生更多的事情……

图3-23：从东门进入大会堂的代表（明报）

因为大会堂东门学生静坐，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

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

10：00，党和国家领导人各自就位。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准时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了追悼会。不知道是因为紧张亦或是过于激动，他糊里糊涂地将“奏《国歌》”念成“奏《国际歌》”，但立即又进行了更正。当广播将大会开始的消息转至广场时，学生们全体肃立，跟着唱起了《国歌》。

大会堂内，邓小平没有接受胡耀邦夫人李昭的建议不参加追悼会，站在第一排的他，与同耀邦共同开基立业时相比，在人丛中显得更加苍老、矮小，脸色极为难看。

默哀三分钟时，有三个老人晕倒（谣传有人当场死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耀邦权力的继承人，不甘心被从总理位置“挤”上这个“宝座”的赵紫阳致悼词。在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加上了《讣告》中没有的“胡耀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的词句。这可以看作是自耀邦逝世以来，民心的反映，当然也是邓小平面对有可能扩大与升级的学运的一种让步。

在赵紫阳代表党中央为胡耀邦所作的悼词中，对胡耀邦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贡献，是这样评价的：

“……十一年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他重视调动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他在关于当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到基层去……”

图3-24：“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学生吊唁队伍（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悼词称，胡耀邦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的大损失。”

但是，悼词对胡耀邦为何在任满之前离开总书记的位置只字未提。这虽然是中共文告的一种惯例，甚至也可以看作一种让步，但同样使许多人不满意：因为，一个如此“完美”的人，为什么会那样下台呢？

据满妹称：

“在悼词的征求意见稿中，对父亲曾有这样的评价：‘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母亲当时代表我们全家人提出：不要这样写，那时耀邦的处境没有机会，也不可能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有抵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中央采纳了母亲的意见，将这一句改为：‘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知情者称，胡耀邦夫人之所以要在这个其实并不显眼的问题上较真，是因为胡耀邦在所谓“两案”问题上不同意邓小平的主张。而从政治着眼的邓，欲整合军队，非把林彪系彻底打残不能成其事功。

10：50，追悼会提前结束。据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慰问家属的例行程序进行时，邓小平曾伸出手去，想与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被李昭拒绝了。她还语带怨怼地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散会后，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以及治丧办公室的其他负责同志，陪同胡耀邦家人护送胡耀邦的灵柩前往八宝山。因为学生占据了大会堂东路的灵车过道，原定灵车将“绕天安门广场一周”的方案无法施行。为了避免与学生的纠缠节外生枝，灵车由人民大会堂西南门开出，取道大会堂西路，径直从西长安街向八宝山开去。这是在天安门广场苦等了一夜，约十几个小时的十几万学生和群众没想到的。

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的江棋生曾目睹了这一幕。他事后回忆道：

“时近中午，我和吕益民不谋而合，想到要去人民大会堂西门等候灵车驶出。我俩离开大部队往北，准备从长安街绕过去。不意到了大会堂北门外马路上，就被执勤的公安拦入南长街口，说是‘交通管制’。半个多小时后，我俩眼见灵车缓缓折向西长安街，并慢慢从视野中消失，而彻夜未眠的数万师生却被晾在东门外广场上，连看一眼灵车这一退再退的愿望都被人耍弄了！”

事后，时任中央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回忆说，胡耀邦灵车得以“金蝉脱壳”，是政府运用了对天安广场广播“播出不同步”的手段，才得以瞒天过海的一一就像美国电影《生死时速》中那个聪明的故事一样：

“中央电台从9：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00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第六节 赵紫阳的闪避

胡耀邦的葬礼，是按照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等级，与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等的待遇进行的。作为一个曾经的党魁，胡耀邦在政府中没有职务，这种待遇是恰当的。但是，当这一天的份量在历史上加重，人们的希望都赋予了这个时刻，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不够了！

站在追悼大会后排的人，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有的不时地走到面对广场的落地窗前，看看学生的动静，体味着两个营垒的气氛。北大教师张炳九就是其中一人。在“反自由化”运动中侥幸逃脱处罚的《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事后说：

“今天北京有两个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地方，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外，这两个地方我都参加，我感到前者太小太小，而后者是太大太大。”

当日参加完胡耀邦遗体告别，从东门步出大会堂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在目睹学生请愿场景后，也写下了一首诗——《这边和那边》：

“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

这边是冷漠的冰山，那边是真情的海洋。

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

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

在“倒邓保赵”舆论战中活跃的香港《九十年代》的总编辑李怡，则对会内会外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别：

“大会堂内高度赞扬胡耀邦一生，独独是回避了1987年1月他下台的事；大会堂外则紧盯着1987年1月的事，要求为当时的决定改正……大会堂内强调胡对党的忠心耿耿，强调他顾全大局，这两年来仍不辞劳苦地到处鼓励干部‘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大会堂外则强调他的自由、开放、宽松的政策，他在两年多前所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以及他两年多来的沉默……”

图3-25：“四二二”大会堂内外（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无疑，前者表达了本届党中央，尤其是赵紫阳本人的愿望，后者显然是与本届党中央和赵紫阳本人的意愿相抵牾的。

那么，赵紫阳将如何度过这个难关呢？事后，他对此事的一些关节点作了交代：

“4月22日开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经过同意”显然是在学生造成既成事实以后，政府退后了一步。正像后来的普京所认识到的那样，惩治闹事学生，就像给小猪剃毛——它的尖叫声会把动静弄得很大，而你所收获的猪鬃并不多，所以得不偿失。赵紫阳的第一着眼点，自然也是投鼠忌器，顾及形象。这一点可以从李鹏4月20日的日记中得到反映。李鹏写道：

“昨天晚上学生冲新华门。许多同志认为性质正在变化。冲中南海，攻击领导人已超过悼念胡的范围。决定在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戒严。乔石说，要把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赵说，中国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评。”

赵紫阳继续道：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赵紫阳对学运的以上描述和指示，显示这位“小诸葛”已经准确地把握了这次学潮初期的锋芒所向。而他也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其中两条有可能朝不利于他的方向转化：

一是胡耀邦下台的方式。虽说他在“倒胡”生活会上表现并不是最突出的；而且，作为胡耀邦的继任者，他是经过党的“十三大”确认的。但是，他毕竟在批评耀邦的“民主生活会”上说了很重、令胡耀邦终身耿耿的话。赵紫阳不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不可能没有留下心中负担。据陶斯亮回忆，在紫阳去世前，她去看望这位既是世交又是上司的老人时，挂着氧气瓶的赵紫阳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

“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

在处理胡耀邦逝世后学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行动迟缓，不能说与这种负担的阴影有关。

第二个可能被引向不利于赵紫阳的问题，是“腐败问题”。他心里应当清楚，这些信息极大可能是通过一直伺机反扑的保守派散发到民间的。此时，如果他站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很可能会引火烧身。

第三，学生对治理整顿造成的经济改革停顿，政治改革滞后不满，则很显然是针对李鹏阵营的，这也正是赵紫阳曾经流露、极不甘心的地方。因此，这是学运有可能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力量因素。

从表面上看，赵紫阳对学运表现出的，似乎是一种轻视的态度。他认为学生的行为可以理解，也出不了什么大事。这与他的大多数同僚不同。据《中国“六四”真相》称，早在4月20日，中共元老彭真就打电话给北京市长陈希同说，要他“尽快”将事情背后的原因查清。王震则给邓小平打电话，说“学生要造反”，要“马上采取措施”。当天，邓颖超也对前去看望她的李鹏说，“一定要揭露少数别有用心利用学生闹事的人。”王任重则给李先念打电话，通报了武汉学潮的情况，担心“再不采取措施，全国看起来就不太平了。”这一天，宋平在见到姚依林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学生的闹事苗头已经很明显，方励之等人非常活耀，学生背后肯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操纵，中央要尽快采取措施，控制事态的发展。”姚依林则说，“这次学生是打着悼念耀邦的名义要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好多学生都蒙在鼓里，不明真相。实际上，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早就在等待时机，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正在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所以，要尽快揭露真相。这几天的趋势表明，学生闹事有演变成动乱的可能。”

出于对局势的真心忧虑，这一天上午，田纪云也专程求见赵紫阳，建议他改变原定23日对朝鲜的访问。但赵紫阳似乎胸有成竹，他对田纪云说：

“这个意见我也考虑过。不过，随意更改预定的国事访问。会让外界揣测我们政局不稳。所以，还是按预定计划执行。”

但是，根据事后披露的材料看，赵紫阳此时的心态，实际上却是“外松内紧”的。就在他回避与李鹏过多地交谈学潮问题时，4月21日下午，赵紫阳在看了国家教委、北京市、公安部、安全部、新华社等部门的报告后，绕过李鹏亲自给主管国家教委的李铁映打电话，“建议国家教委应及时与各地教育部门和有关高校沟通，各地各高校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疏导为主，避免激化矛盾。”同日，他又对中央主管新闻宣传的胡启立、芮杏文说：“新闻舆论要多宣传一些正面的东西，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指出社会安定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防止激化社会矛盾。”

“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

据事后披露的材料看，早在4月21日，赵紫阳就曾找到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谈学潮问题。4月25日晚，杜润生在科学会堂召开有胡绩伟、秦川、李昌、李锐等10多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赵“赴朝前”和他谈及的想法。赵的意见是，“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这和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对学运的态度，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4月22日，大约11：40左右，胡耀邦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除负责送灵的人员外，政治局委员皆恭立目送邓小平离开大会堂。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描述，此时：

“赵紫阳、杨尚昆走过去，扶着小平的手，（赵紫阳）说，‘小平同志，我明天就要到朝鲜去访问了，一个星期时间。您有什么指示？’邓小平说，‘代我向金日成同志问好。’赵紫阳说，‘对这次学潮的处理，我已向政治局提三条建议，一是追悼会已经结束，要坚决劝阻学生游行，马上复课；二是对打砸抢行为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三是对学生疏导为主，可以开展多层次的对话。’邓小平说，‘好。’赵紫阳最后补充说，‘我出访时，李鹏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工作，有事，他会向您汇报的。’赵紫阳、杨尚昆送走邓

小平回来时，所有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委员都没有离开会场，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都在场。李鹏伺机对赵紫阳说，‘紫阳同志，你明天就要出访了。是不是下午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李锡铭接着说，‘希望中央有个明确的方针，以便迅速制止北京学潮的发展。’赵紫阳说，‘时间比较紧，不专门开政治局会议了。这几天，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工作还得靠大家做啊。’他对李鹏、姚依林和李锡铭说，‘对于这次学潮的处理，刚才我向小平同志提了三条建议，小平同志表示肯定。现在，我再把我的意见向同志们说明一下：一是追悼会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工常的轨道，要坚决劝阻学生上街游行，并尽快使他们复课；二是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如果发生流血事件，就会给一些人以口实，但对打砸抢行为一定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三是对学生要积极采取疏导方针，并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杨尚昆说，‘我赞同紫阳的意见。’赵紫阳看着李鹏说，‘在我出访期间，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你负责主持。’李鹏说，‘我同意紫阳同志刚才讲的三条意见。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将随时向你通报。’说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姚依林等各自离开。材料表明，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前虽然没有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但他的三条原则意见是表达得很清楚的。” 事后，赵紫阳的回忆并没有否认上述事实。不过，相关过程的场景和情节却与《真相》完全不同，他记得，他与李鹏们讲的那番话是在大家一同下电梯的过程中讲的。而李鹏《“六四”日记》4月22日则记载：

“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原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

说这不能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三种记录虽然存在很大差别，但都说明，大佬们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天安门广场上十万学生和市民的存在。而且证实：赵紫阳所说的“追悼会后的三条意见”，是在一种非正式场合提出的。《真相》的叙述还透露了一个细节：赵紫阳在征求邓小平的意见时，说的是“我已向政治局提三条建议”，当取得邓小平同意后，他在向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传达这三条建议时，又说“刚才我向小平同志提了三条建议，小平同志表示肯定”。这是否说明，赵紫阳正在利用邓小平这个“太上皇”的存在，回避与政治局的正式见面？

赵紫阳的三条意见无疑是对的。但根据赵紫阳对待学运的态度和主张，这时，最有可能和学生达成沟通与谅解的，在高层，只有赵紫阳他本人。

但是，送走邓小平后，就在大会堂台阶上的学生代表长跪等待之时，赵紫阳也并未因刚刚追念过战友的英灵而沉靡在伤感之中，更没有因宣读那冗长的悼词而显示出疲倦，而是很有兴味地登上了人民大会堂楼顶，用望远镜观察眼前的局势。事后，中央电视台甚至播放了仰拍赵紫阳微笑着向下俯瞰探头的镜头！

从大会堂屋顶下来，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坐电梯下行中，赵紫阳很不正式地讲了三条意见。当天下午，他也没有休息，而是同他的智囊们一起打高尔夫球去了。

不幸的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学生中。次日的北大校园里，就贴有一首《念奴娇·权贵问答——4.22 大会堂纪实》对这个情节进行了嘲讽。词云：

“李鹏紫阳/牵万里/翻上会堂屋角/倒背双手斜眼看/都是请愿队伍/喊声震天/人群遍地/吓倒檐上雀/哎呀/怎么得了/要翻天罗/小平问有何方/尚昆答

到/有百万军队/不见“四五”春月朗/广场遍地鲜血/还有预备的/警察不够了/再加军队/不用担心/天地不会翻覆。”（4.23.）

23日中午11：00，李铁映给赵紫阳去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希望紫阳主持听一次汇报。李锡铭也给赵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但赵紫阳告诉李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就向他汇报吧。事后，许多人认为，李鹏与北京市委串通，利用赵紫阳访朝发动政变，大概是不了解这些情况。

下午4：20，赵紫阳固执地按照原计划，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他显然早已打定主意，在去朝鲜之前，不再与李鹏们讨论什么学运问题。但许多人当时就预感到，这是一步错棋。

试想，如果赵紫阳没有走错这一步，而是早就定下“民主—法治”的大计，以后，就不会发生李鹏主导的常委“碰头”和“请示邓小平”这些事故了；而导致事后的那场灾难的那个“死结”——“四二六”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也就无由形成了。然而，当时的总书记采取了避缩的态度，并把担子压给了他明知承担不起的李鹏。

根据事后赵紫阳的行动，笔者揣测，他之所以没有在4月23日“出手”，大概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这个时机的障碍，就是他即将进行的出访。

在历史上，赵紫阳出访前，总是要在政治上预作双倍的“保险”。如1987年6月，他作为“代总书记”出访西欧前夕，一方面公开宣称“总理的职位比总书记更适合于我”，表示无中国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匆忙同意把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任会长的民间团体——残疾人联合会下属的康华实业公司（经过改头换面）定为中国唯一的一家部级公司。

很明显，如果在4月23日就挑明与“保守派”的分歧，或者从朝鲜发回与邓小平“四二五”讲话不同观点的电报，那势必把自己的两翼都暴露给学运和“保守派”。相反，选择这个出访之机，从两造之间“缩身”，既可让保守派与学运彼此消耗，又不给存心“倒赵”的保守派留下“非程序更迭”的口实。这不仅可以保存实力，还可以为将来解决问题铺平道路。

第七节 学生的绝望

富有悲剧意味的是，4月22日大会堂前的学生，要求面见的不是有可能与之对话的赵紫阳，而是绝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的李鹏！

根据广播里播出的“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大会堂外的学生——不知由谁领头——开始喊话：

“对话！对话！”

“李鹏，出来！李鹏，出来！”

北大国政系研究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政治系学生周勇军三位代表，来到大会堂东门外要求向李鹏递交以“七条”为内容的“请愿书”，并要求瞻仰胡耀邦遗容。11：40左右，治丧办公室回答学生不能瞻仰遗容，李鹏是否能够接见，要等追悼会开完以后才知道。

据浦志强回忆：

“在当天中午追悼会结束，人民大会堂内的出席者陆续退场之后，于极度悲愤之下，学生队伍失控，就下一步的具体去向发生分歧。在我的印象中，我校刘苏里老师似乎主张撤走，我心下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对于冲击人民大会堂的后果无法预料。此时，郭海峰、周勇军等人在正对着人民大会堂的铁栅栏豁口处拿着写好的请愿书商议着什么，中国政法大学的XXX单手举着一

面旗子，红着眼睛冲过马路，学生队伍蜂拥至人民大会堂前广场，在警卫局士兵组成的警戒线面前停下。”

图3-26：“四二二”大会堂前请愿。中：郭海峰高举请愿书双膝下跪；左：周勇军；右：张智勇（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12：00，广场戒严解除，上万群众向请愿学生涌去。

经过一昼夜等待的学生得知运送胡耀邦遗体的灵车，不再按惯例绕行广场一周，已由西门开走时，也群情激愤地向大会堂涌去，冲破了由警卫部队组成的第一道警戒线。替学生抱不平的围观群众也压向军警，不时发生局部磨擦。

在纷乱之中，有谣言说李鹏将于12：15与学生见面。时间到了，李鹏仍无踪影。又有人说可能是12：45接见。郭海峰等三人再次出列，走上大会堂台阶后，泪流满面地双膝跪下，双手高举“请愿书”，长跪达30分钟之久。

据张伯笠回忆，当时：

“就有人提出要冲击大会堂，这个人是一个留着胡子的北大的研究生。吾尔开希赞成这个观点，说：我看可以。然后我说：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还不能冲国会呢。这是国会，况且今天这个时候是悼念胡耀邦，如果冲了很危险。吾尔开希说：我赞成。当时封从德手里拿着一卷纸，这个纸就是请愿书。后来我说：不行就冲进去，跪那儿请求。吾尔开希说：我不能跪，不愿意给共产党跪。这当时有争论。这时候郭海峰说：你不跪，我跪。从他手里就把那卷纸抢过来了，冲进去，然后就跪下了。”

对此，封从德也回忆道：

“4月22日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三人下跪。从广场往西，往人民大会堂看过去，左边是周勇军，他单腿下跪，中间是郭海峰，拿着请愿书。这个请愿书是北大筹委会新定的请愿‘七条’，我找同学抄出来，然后像命一

样金贵的带到了广场。右边是张智勇。吾尔开希也在请愿的同学当中，但是他没有下跪。”

此时，参加了胡耀邦遗体告别仪式的北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正好步出大会堂，当他看见三名学生代表跪递请愿书的场景时，禁不住“从大会堂门里踉跄奔出，下台阶紧搂着三个学生，大哭，然后向他们跪下，求他们不要再跪，这是没有希望的！”从此，陈明远与学运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因此系狱。封从德继续回忆道：

“当时我有一种印像，好像军警认识北大，他们在北大前面增加了一倍的兵力往北大的队形当中冲。原来是三排军警，后来他们退到大会堂台阶上增加了三排，变成了六排，以势能变动能冲到北大的队伍里边来。北大就组织了一个缓冲地带来进行防御，这个防御是成功的。他们没有冲到我们的女同学，只冲到了前面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我们当中有一个空旷缓冲地带。但是马上我就发现再组织第二次就很困难。这个时候，带纠察的彭嵘问我：是不是还要挡军警？我就说：我们撤吧。他就带着同学撤了。

回去以后就是同学无限期的罢课。”

在与军警摩擦期间，柴玲的一段回忆可以说明很多学生的心态：

“在情感上最深的一层是，当时同学们说，如果再等半个小时没有消息的话，就冲大会堂，而一冲大会堂，跟武警很快就要造成流血冲突。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出来跟大家前后联络，让同学们再等半个小时，再等几分钟，我进去看看。当时我拿着一个喇叭，其实根本就没有声音。我冲到前面，前面的同学跟士兵肉贴肉地站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条绳子。当时，我就拿着喇叭干喊：‘能不能让我进去和里面的代表交流一下，把消息带出来？’说不可以。后来他们就找那个官。那个官笑着说：‘不行，不行。’我后来猜想，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在那个时候，同学们一浪一浪涌上来，我就不得不拿着那个喇叭再向里面喊。我说：‘大会堂里面的政府官员们，请你们

听听同学们的呼声。同学们已经饥饿了，从昨天晚上至今已18个小时。现在因为饥饿，疲劳，情绪已非常激动。我们不希望发生流血冲突，因为‘解放军也是人民子弟兵，我们不要骨肉相残。’这时我们嗓子都哑了。后来一个解放军主动递给我一个后面传来的水壶，当时我特别感动。我喝完了水，马上又把水壶赶快还给他们。……我们一直一直都在喊，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任何回话。这时里面也可能是在下跪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哭了。那个时候，我看有的解放军也哭了。再回到同学中，大家都激动得很，那个情绪就是很不一样，这时北大充满了骚动。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如果一旦军警冲过来，或出现什么骚动，这么几万人，光是人跑，也像‘四一九’那样……，光踩就踩死一大片。这将是我们的学生运动的一个巨大耻辱，是自残。所以那个时候就让北大学生拉起手来，最后老封一声令下，说撤。大家一冲出警戒线以后，就和平地带出了这个场地。” 中午1：00，当学生终于明白根本不会有什么李鹏接见，而且僵持可能令冲突升级时，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队伍率先退出后，各校学生也有秩序地撤离了广场。

怀悲壮而来，负耻辱而去的他们，临行留下了“为民请命，万死不辞”，“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

图3-27：4月22日人民大会堂请愿后，人大经济系的队伍井然有序退出广场（陈小雅摄）

正是经过“四二二”的大失望，一些原来对学运抱旁观态度的学生，开始转变态度。一位北大女生当时给朋友的信中披露了这个心路历程：

“我仍坚持认为学生运动不会有什么结果，中国的事情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解决的，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那一刻我恨透了自己冷静的头脑，心里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下次游行一定参加，即使死了也要为知识分子争回跪下的双膝，也要为学生争回名誉，为人民争取民主。”

“‘罢课’不知被谁赫然写在‘三教’外墙上，只要能看到第三教室楼，就能看见这两个字。也许是永远也抹不掉了。”

沈彤的回忆也证实了这次事件的转折意义：

“4月22日大游行可能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早期核心人员失去的最好的一個机会。……这是从情绪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4月22日大游行，在广场有15万人，所以我们后来做四二二大游行纪念章等等，都跟这有关系。这是情绪上的第一次大转折，就是由一些核心人物，转向校园内绝大多数人参与的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当天，各校都出现了一片“无限期罢课”的呼吁，北师大一张署名“一爱国者”题为《众目睽睽的欺骗》的大字报说：“鉴于对学生运动的不理睬、镇压立场，北师大、北大、清华、南开、北航、理工大、北邮、钢院、中科院、政法（大）、音乐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决定统一罢课，直至政府接受十条”。

中国人民大学，吕益民、李刚剑、赵哲等在读博士生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宣言》所列六条意见为：重新评价胡耀邦、铲除官倒、实现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剪断党库与国库之间的脐带、变党军为国军等。”

清华大学出现以“物理系学生会”名义贴出的标语：“今日人民大会堂前最可耻的一幕，强烈要求罢课抗议。”

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行动筹委会的《告同学书》，则提出了下一步学运的行动纲领：

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行动筹委会，面对李总理哄骗十万学生，答应见学生代表却不露面的行径，决定采取新的策略：

第一，号召北京所有高校，实行总罢课，七条建议不被接受，决不复课，希望各校学生写信给外地的亲人、同学、朋友，冲破新闻封锁，揭露事实真相。

第二，联络全国大专院校，实行全国总罢课，壮大学生运动，使七条早日得以接受。

第三，采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举行游行等形式向工人、农民、市民及各阶层人士进行宣传，说明我们的目的和要求，争取他们的支持，实行罢工罢市。

来自天津、上海、武汉、湖南的学生，也于此时集中到北京大学，酝酿成立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并拟在“五四”将组织建立起来。把宪法赋予，但一直停留在一纸空文的权利变为现实。

至此，4月中旬以来，以悼念胡耀邦为中心内容的学潮基本结束。八九民运经过一周的锤炼，也基本走出了它的酝酿和起步阶段。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格局已经形成。从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有关政治要求，不必在别人的名义下求得自身的伸展，而是有了自己堂堂皇皇的姓氏了。

注释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页。

陆一时任《世界经济导报》要闻部副主任。

即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地处北海公园东南角的大石作胡同。

张伟国时任《世界经济导报》编委。

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

陆一《4月15日，悼念同日去世的两位前辈》，载“陆一的blog的博客”。

于光远《告别胡耀邦》。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2页。

见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白梦《学运之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8页。

张伯笠，男，1963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报告文学作家。

张伯笠《学运之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7页。据万润南《我的 1989（1）悲剧序幕》说，“该死的不死，

不该死的死了！”是冰心悼念胡耀邦文章中一句自况自哀的话，但被贴到北大校园里，就具有了特别的含义。据封从德查证，冰心那篇刊载于《群言》的短文《痛悼胡耀邦同志》写于5月2日。应与作家班的标语无任何瓜葛。

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73页。

万润南《我的 1989（1）悲剧序幕》。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61页。

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当时，中央正在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下属康华公司的经济问题。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59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46—47页。

据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6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75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75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17页。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张郎郎《我家小院是“黑据点”》。载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七月号。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5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同上。

杨晓，时任陈一谘秘书，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83级硕士研究生。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64页。

杨中美著《胡耀邦传略》。新华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51页。

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439期（查封版），第6版。

80年代初期的“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党内有“五胡乱华”之说。“五胡”指胡耀邦的“胡说”，胡乔木的“胡写”，胡绩伟的“胡编”。另有胡耀邦的“团派”人物胡启立、胡克实，也忝列其中。

中国历史学家，于光远的好友。1988年去世。他生前说过：“进八宝山，死了还要排座次，何必呢？再说那里的人并不都喜欢我，我也并不都喜欢他们，又何必挤到一起去呢？”（见于光远《古稀手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八宝山灵堂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存放骨灰之处。其存放序列与死者生前官职的排名序列一致，是为一种阴间等级。

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439期（查封版），第3版。

于光远《告别胡耀邦》。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5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15页。

于光远《告别胡耀邦》。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2页。

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同上。

鲍彤《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载《炎黄春秋》2012年8月号。但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描述：赵紫阳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桌首，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见第132页。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2页。

鲍彤《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载《炎黄春秋》2012年8月号。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同上。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宣传纲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355—356页。

六月血《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大事记》。载64memo。

据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张凯、章立凡《送耀邦叔叔》，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孟晓云、王楚《11亿中国人为你送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4月22日。

见孟晓云、王楚《11亿中国人为你送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4月22日。

李进进《我在1989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05页。

高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电子版，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8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16页。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同上。

吴仁华《序曲与尾声》。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73—174页。

同上，第174—175页。

浦志强，1965年1月出身于河北滦县。198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6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硕士生。1991年硕士毕业。

浦志强对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征求意见稿）》的校订意见（1994）。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27-28页。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版。

据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0页。《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63页。

“邓公”指邓小平；“四条”指“四项基本原则”。

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17日，第4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同上。

同上，第127页。

同上。

《北大女生的六封信》4月18日，第一封。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71页。

常劲《从胡耀邦逝世到北大筹委会》。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2页。

李进进《我在1989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05—206页。

应是28楼。

同上。

张伯笠《4.17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8—49页。

白梦《4.17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9—50页。

张伯笠《4.17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0页。

关于“七条”当时就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地方称为“六条”，教委本《惊心动魄的56天》所载为“九条”，于“七条”之外，还有“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释放政治犯，反对以言定罪”，“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但没有“七条”中的“取消北京市公安十条”的内容。（见《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本人采用的是当时在广场的速记稿。

据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清晨学生只受到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接待，答应转交请愿书；8：00，“党中央、国务院信访局负责同志”接受了请愿书。大部分学生听到这个结果后自动离去。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

李进进《我在1989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06页。

张伯笠《4.17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1页。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张伯笠《4.17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1页。

即“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详见ㄚ。

李进进《我在1989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03—207页。

同上，第207页。

同上，第208页。

同上，第209页。

同上，第210页。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李进进《我在1989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13页。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九节：赵紫阳“双周维新”。

据中国社科院门前传单。

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

吾尔开希（原名：吴尔凯西），男，1968年生，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

这是本人1989年4月18 日午夜与前《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所目击的新华门请愿实况记录，部分为笔者随时手记，部分由张站在自行车后架上口述，本人记录而成。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见本书第一卷 第二章 第一节杨继绳目击记。

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刘刚《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51—152页。

见本书第二卷第五章、第七节。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详见本书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三、五节。

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439期（查封版），第3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的发言。

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439期（查封版），第5版，《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的发言。

张郎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文革中曾被判死刑。文革后任美院教师。后移民香港，成为专栏作家。时任华润集团驻北京代表。

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439期（查封版），第3版。

见本书附录。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广大干部、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借悼念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之机，反对“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统治，呼吁邓小平出山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又称“四五运动”。运动遭到当局的武力镇压。

见《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439期（查封版），第4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19日，第52页。

郑义，1947年生，四川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作家。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23页。

参见张伯笠《4.20惨案》。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1页；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49页。

张铭，男，1965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

亚衣《“六四”牌不能再打——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载《中国之春》1993年，第4期。

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1、2。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

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3—24页。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23—24页。

张伯笠《4.20惨案》。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2页。

张伦《4.20惨案》。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2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25页。

张伯笠《4.20惨案》。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2页。

亚衣《“六四”牌不能再打——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载《中国之春》1993年，第4期。

见陈小雅录音整理《1989年5月9日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座谈记录》。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20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25页。

见1989年6月《半月谈》刊载的《北京新闻录》，第6页。

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

轩彦编《京都血火》，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9月版。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6页。

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7—28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364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25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
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页。

详见本章第四节：高校学生的第一次联合行动。¥¥¥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
第24—25页。

同上，第49—50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7页。

同上，第18页。

同上，第20-22页。

同上，第24页。

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我与八九民运》。（未刊稿）

茅山道网文《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
首发。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宗璞的先生蔡仲德（1937—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13
页。

参见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
第13页；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指学生的请愿“七条”。

茅山道网文《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
首发。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详见本书第¥卷 第四章 第四节：“北知联”与“各界联席会”。

茅山道网文《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远志明、谢选骏是《河殇》第五集《蔚蓝色》的撰稿。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同上，第137页。

指《新观察》主编戈扬4月15日与《世界经济导报》张伟国通电话时所说。见忻华实《〈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8日。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40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51页。

熊焱，1964年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

常劲《从胡耀邦逝世到北大筹委会》。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页。

同上。

柴玲《从胡耀邦逝世到北大筹委会》。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页。2002年，我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期间，金观涛特意和我谈到：他当时已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根本不可能发此指示。我问他，当时是否和国内通过电话，说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根本没有。他这话我是相信的。

从《陈一谔回忆录》记述的情况看，传话人不像体改所的人。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张伯笠《“四二〇”北大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页。

常劲《4.20北大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6页。

同上，第6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79—180页。

常劲《4.20北大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6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52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2页。

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

同上。

同上。

刘苏里，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79级，1983年考取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任教。

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封从德《四二二天安门广场》。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4页。

此处官方提供的时间是“2：00多钟”，出席单位是“20多所高校”。笔者根据学生提供的资料进行了修改。

此处官方提供的时间是“6：00左右”，笔者根据学生提供的资料进行了修改。

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3—34页。

浦志强对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征求意见稿）》的校订意见（1994）。

熊炜，男，1966年生。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

郑旭光，男，1969年生。河南省密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科系学生。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54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4页。

转引自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

封从德批注：“不记得那时有如此严厉的声音，当时氛围也不允许。中共顶层只是回避，没人愿意承担责任，下面谁敢这样激怒学生？强硬态度是两三天之后邓小平发话后的事情。”但笔者认为，这个声音自新华门事件以来，已经在北京市府的《通告》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反映出来。详见本卷 第七章 第一节。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54页。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同上。

即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

《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第151页。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江棋生《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段》。载江棋生《看守所杂记》，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年。

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转引自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67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0日，第55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见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四集。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版，第278、291、296、298、299页。本卷第一章 第一节 于光远的回忆；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七节赵紫阳在倒胡生活会上的发言。

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同上

同上，，157页。

中纪委《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杜润生（1913-2015）：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中顾委委员。

参见《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第13条。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5日，第71页。赵紫阳对此未加反驳。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赵紫阳的回忆中没有这个情节，相反，他说：“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一：学潮初起。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164页。

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2日，第59页。

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3日，第60页。

参见万润南《我的 1989（3）存亡之秋》；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第58页。

1984年成立的康华实业公司是为残疾人联合会筹积资金而成立的，隶属于残联，1987年改装后的康华发展总公司，请来原石油部、冶金部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原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这种改装使康华公司升级变成名正言顺之事。

事后，官方舆论指责学生将18日递交过的请愿书再递交一次，有刻意闹事之嫌。见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但18日递交的是人大常委会，22日递交的是国务院总理李鹏。

浦志强1994年就《八九民运史（征求意见稿）》给陈小雅的信。

据当时传说，是一个在场的记者误传了这条消息。但后来市委版《平暴纪事》中说成是一“学生队伍的组织者”（见35页）；教委版《惊心动魄的56天》没有确定此人身份，但认定其事的性质为蓄意造谣（见35页）。据王超华回忆，是学生误解了她的传话。她传达的是吾尔开希的话。当时是12：30，原话的意思是，再等一刻钟没有结果就撤。王超华《北高联：从自发到自治》，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5—46页。

张伯笠《422悼胡集会》。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4—55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25页。

封从德《“四二二”天安门广场》。同上，第25页。

柴玲《“四二二”悼胡集会》。同上，第54页。

关于学生行动的各个环节的时间，有许多不同说法。此处采用市委版《平暴纪事》中的说法。估计该书在时间问题上有监视器为忠实依据。

《北大女生的六封信》4月26日，第一封。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73页。

沈彤《北大新闻中心的出现》。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8页。

江棋生《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段》。载江棋生《看守所杂记》，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年。

《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6页。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3卷 110页 全文完

八九 民运史

第四卷 低谷与高峰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八章 警钟鸣响——“四二六社论”前后

第一节 共识的形成与策略调整

第二节 北高联

第三节 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第四节 请战一碰头会一密诏

第五节 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第六节 西安、长沙打砸抢事件及其影响

第七节 赵紫阳政治天平的倾斜

第九章 走向高峰的学生运动

第一节 高潮再起

第二节 艰难的二次出发

第三节 大游行

第四节 “导报”事件的反响

第五节 火上浇油的“对话”

第六节 对话团

第七节 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注释

第八章 警钟鸣响——“四二六社论”前后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李进进、仲维光、封从德、张伟国、杨继绳、吴洪奚）

生命在于运动。

当社会发展停滞时，社会冲突和阶级间的斗争，是社会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社会学家的这个理论，尤如一个中性的瓶子，它即可装入意理的毒液，也可以容纳意理的甘露。马克思主义者迷信它，所以坚持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承认它，所以创造了现代的议会。然而，社会学家亦指出：

“当人们的分歧是建立在一致的基础上的时候，共有冲突会随之发生；当人们的一致是建立在分歧的基础上的时候，非共有冲突就随之发生。”“非共有冲突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和分裂性的。相反，共有冲突，即以共同承认的基本目的为基础的冲突是整合性的。”

当“四二二”追悼会结束以后，大会堂内与大会堂外的两拨人马，原先共有的目标开始消退，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凭借以与前者对抗的、牵就世俗的、公允的依据开始消失。通过一周的磨擦，政府在悼念胡耀邦问题上的确有了让步：（1）在胡耀邦的悼词中，加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字样；

（2）在追悼会召开时，没有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例行的清场，并容忍了学生对警戒线的冲击。在另一方面，学生也开始总结“新华门事件”的教训，规范了自己的口号和抗议方式，力图把自身的行为约束在法律范围之内。当这种情况到来时，事物存在着两种前途：

第一种前途，冲突结束，双方关系恢复原状。这取决于两个因素：（1）学生放弃隐含目标，以在胡耀邦悼念问题上获得的阶段性成果为满足。并在

行动上对遗留问题采取从长计议的态势，使这次因耀邦逝世提出的问题，在不破坏既成秩序的条件下，按常规方式解决。（2）政府承认现状，不搞“秋后算账”。如果这两个条件均同时满足，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八九民运”这个名词存在了。但是，中国社会无疑的已在“悼念风潮”的名义下，取得了切实的进步。社会学家们也可把这段历史，归入“共有冲突”之列。

第二种前途，冲突继续。这也可分为两种情况：（1）冲突持续。既不加剧，也不消失。它取决于双方在枝节问题上的争持不休。学生不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政府为保全面子既不对前者发出新的刺激，也不承认其合法性。（2）冲突扩大。在学生方面，可能因为有了新的动力。这种动力，可能是一种新的，在有限时期内可以看到结果的斗争目标或口号，即获得“新战略”的鼓舞；可能是在组织形式或同盟军方面有了新的增强，即在力量方面带来新的信心；也可能是受到新的刺激，在新的愤怒下滋生出的勇气。而这种原因造成的反应，其激烈程度会超过前两者，但它发起的冲击却没有前两者来得那样有后劲，一般在情绪发泄完毕之后，也就偃旗息鼓。另外，冲突的扩大也有可能来自政府方面，如果它缩小与冲突方的“一致”与“共有”性，不再容忍面对“压力”逐渐失势的事实，把先前的“让步”作为杀“回马枪”留出的转身余地，对学生实行秋后算账，那么，它也就必然会得到学生们的响应，冲突由此得以扩大。

在这方面，读者将会看到，1989年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翻来翻去，也不能逃脱历史为人们划定的领地。

第一节 共识的形成与策略调整

三双支撑男子汉尊严的膝盖\在你面前悲壮地跪下\撞开了共和国自尊的伤痕。

一份血写的谏书\在国徽前高高举过头顶\牵动着阵阵悲楚的哭泣。

哀乐低徊 悲风凝滞 春日暗淡 长空悲泣\你 睡意尤浓 梦眼迷离\吞吐着
几缕齷齪之气息\默默不语。

邪恶的皮带 抽红了长安街的黎明\抽碎了中国人善良的梦境。

阴险的铁蹄 踢残了四月的鲜花\践踏了人权的绿意。

却唤不醒你沦落风尘的舆论工具\玷污了学生的清白 蒙骗了市民的感觉\
傲慢的官吏 强奸了纯朴的民意。

人民将理想砌进你公正的石壁\希望公正在你这儿诞生；

人民用爱心为你栽花种树\希望博爱永远温馨碧绿；

人民用信任为你铺成世界最大的广场\希望自由像风一样开明\你却酣睡
不醒。

.....

浩荡的春潮\震醒了夜寒凛冽的大街\干枯的老眼\涨满了灼热的义愤\失
望的桅杆\重扬起斩浪的风帆\你却酣睡不醒。

纯情少女\写下了无泪的遗书\孱弱书生\擎起了罢课的新旗\V 形手势\
在英雄乐章中找到了新的和谐\平平安安回家\是慈母凝炼的祝愿\你却酣睡不
醒。

莫非你威严的大理石已被贪婪蛀空\你正直的台阶已被特权踏破\你豁达
的胸襟已被淫欲填满\你耀眼的国徽已被卑鄙腐烂\人民将忠诚注进你平等的
地基\希望平等 从你这儿发源。

.....

醒来吧！人民大会堂\假如你还属于人民。

醒来吧！

假如你愿意\一代精英用坚强的膝盖支撑\中华的信心 民族的荣誉\在世界上永远自豪地屹立！

醒来吧！

假如你还属于人民！

——这是1989年4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大字报栏里新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醒来吧！人民大会堂》，署名“野夫”。它用诗的语言，表达了学生的心愿、纯情、意志、不平与疑惑。

“四二二”以后，伤心、失望、悲愤与寻求发泄的情绪在校园里空前地聚集着。

4月23日暨胡耀邦追悼会第二天，北京科技大、理工大、北师大、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农大、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二外等10所学校的学生均举行了校内游行。天津南开、天大、外贸学院、纺织工学院等学校也有一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要求“严惩‘四二〇’惨案凶手”，“打倒官倒”、“消除腐败”，“公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示威游行自由”。在人大校园里，贴有记述“四二二事件”经过的大字报，宣布“对当局彻底失望”。北大贴出了《北洋军阀尚且接见北大请愿学生代表》的大字报。

当天，在北大三角地，语言学院教师、著名诗人陈明远爬到东侧一个有三米高的广告栏上，从一位正在演讲的北大学生手里接过了一个小喇叭，开始了他那后来传遍全国各高校的著名演讲。刘刚和封从德都对他的演讲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二人的记忆各有侧重。封从德认为，陈明远的讲演是理性、温和而激动人心的：

“陈明远首先磊落地报出姓名，讲给便衣们听，博得同学们热烈的掌声。……陈先生说，昨日下跪请愿 那耻辱的一幕令他难以忘怀。他以贵宾身份参加大会堂里面的追悼会，见没一个领导人出来接受请愿，他悲愤不已，走去与下跪学生拥抱。他说，‘这是中国人民的良心在向他们拥抱！’接着，他抨击中共宣传机器对学运的扭曲报导，建议大家联名公诉。他又提到新闻自由，赞扬《科技日报》近来真实报导的勇气。然后他讲到官倒，讲到当前的经济形势。他以肉价从八毛涨到四、五元，来证明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的不可信。一个知名教授月工资才120元，现在连衣服都买不起！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教授的感叹：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两筐苹果！陈先生如此平凡的例证，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令同学们激愤地跟着他振臂呼喊：‘打倒官倒！铲除腐败！’最后同学们齐声高喊‘向陈老师学习！向陈老师致敬！’结束了近一小时的即兴演说。

从此，陈明远在同学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常来我们学生组织中，提醒我们凡事要谨慎、周密，不给政府中的顽固势力抓住借口和把柄。24日，他的威望还帮助筹委会渡过难关。他是一只公开的‘黑手’。”

据刘刚回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陈明远在演讲中曾经讲：‘同学们，现在官方的喉舌《人民日报》在指责你们是煽动。我要说同学们确实是在煽动。’听到这里，三角地的人群中没有耐心的同学发出了些许嘘声，以表达对陈明远这番话的不满。‘可是什么叫煽动呢？所谓煽动，就是用一把扇子把奄奄一息的火又煽动起来了。同学们，我要再一次地感谢你们，因为是你门把我心中的希望之火又煽动起来啦！’听众中随即又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陈明远还讲过：‘闻一多在北大演讲后就被一小撮卑鄙的特务给谋杀了。那时闻一多年仅48岁。我今年49啦。我演讲后，今天我前脚跨出北大校门，后脚也不准备再跨出去了。’人群中又爆发出热烈掌声。

在演讲最后，陈明远带领大家反复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由，毋宁死！’”

在罢课继续的情况下，各校还提出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校废除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及抢占校广播站的要求。同时，北师大、清华、北京经济学院、中央美院学生也开始了募捐活动。下面是一位新华社记者目睹的一个募捐场面：

在积水潭地铁出处，墙壁上贴着一张大字报和一张4月23日的《科技日报》（《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大字报写着：“我们团结必胜，援助我们！！我们早已欲哭无泪，现在只有一腔热情和无限勇气。我们现在血也流了，跪也下了，但我们丝毫没有使统治者麻木的神经得到一点刺激。我们决不罢休，我们已经罢课，用你们的钱和我们的勇气和行动结合在一起……”

有一位女青年从摩托车上下来，拿着面值100元一张的人民币，塞进募捐箱。从18：20—18：50，半个小时内37位围观群众捐款。除那位女青年，最多的给了50元，最少的一元，大部分是5元或10元，旁边卖饮料的小贩不时送汽水、雪糕给学生。

当天下午2：30，人大校园还出现一则“最新消息”，称“当局已调王牌军38军入京”。

在进行上述活动的同时，校园里对一周以来学运也进行了反思，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目标和手段的重新认识。4月24日，北大“五四”操场上甚至发生了学生领袖互相攻击的事件。师大也贴出了《当心被收买的学生贵族》的大字报。

“四二二”以后，作家郑义在与北大学子的交往中，也提供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暴力往往导致新的独裁……我提请他们注意：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以事实上的组织与出版物来争取宪法上一纸空文的结社出版自由；稳定领导核心，不要搞书生气十足的大民主，走马灯似地撤换领导核心……我们谈得十分融洽，除绝食外，其他各项他们都已开始考虑、落实。王丹、熊焱走后，我留郭海峰（北大国际政治系研究生）多坐了一会儿……”在诸多嘱咐中，他还明确向郭海峰、王丹、熊焱提出，尽可能不要与方励之先生夫妇接触，一是为了“保护”方先生夫妇，二是为了学生的自我保护。

在此前后，四通公司的周舵也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研究生，“力劝他们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

“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矛头要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的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从同期的一些大字报，我们可以了解到新的共识是如何形成的：

北大一张署名“地球之子”，题为《伯乐相驴——与政府联合起来》的大字报说：

政府其实是头叫驴，我们本是用它来拉车的。可它现在变得好吃、贪睡、懒做，脾气还倔，动不动还刨蹄子。把它卖了，重新买一头吧，还不行。市场上还产不出别的驴。把他杀了吃肉，更不行，而且太酸。只好用胡萝卜加大棒，把它驯好。胡萝卜是人民的拥戴，而大棒，则是人民的抵制和抗议……

我们所作的就是让人民觉悟，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去推翻政府，而是督促它，乃至帮助它前进。我们的统一战线也可以包括它嘛！……中国有句话，叫恼羞成怒，很有几分道理。我们要它着恼，要

它识羞。但要把握分寸、火候，要有阶段性，不能让他成怒。否则，这驴子来个驴惊了，岂不糟糕！……

当然，这驴很不好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至少得比这驴更有耐心吧！而且，驴毕竟是驴，不能指望它太通人性，所以要讲策略。别指望一夜之间它就能到马戏团去表演，赚大钱了。动作，要一个一个地学嘛！特别是不能让踢着，它肥得很，有的是力气咧！

下面，也是一份来自北京大学，诞生在同一时刻的理性思考的清单：

《思考：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行动？》

连日来，爱国的民主运动使我们倍感振奋。但我们不应光有热情，还应有冷静的头脑。我们的爱国运动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显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也不是否定现有政府。我们的目的是推动民主，推动改革，清除腐化现象，使我国早日富强。由此，我们在近期内所能达到的目标又能是什么呢？我们认为：

一、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学生利益的，并为法律认可承认的学生自治组织。

二、该组织应具备：

（1） 有为法律可承认的号召组织罢课、游行的权力；

（2） 能有自己为法律所承认的公开出版物。

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权力的取得，是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基本条件，为达到这些目标，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

一、必须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权威领导；

二、整个这次活动的目的，不宜太分散，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

三、要有严格的纠察组织，提防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捣乱；

四、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非暴力原则；

五、在严密的组织下，以严格的方式多作宣传，争取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六、与全国高校取得广泛密切的联系；

七、学生自治组织的活动经费，难道只能靠募捐吗？考虑西安、长沙发生的暴力事件，应引为借鉴。希望我们考虑事情应该慎重，不要为坏人所利用。

更不要让社会与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对立起来。我们有义务维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这张大字报的署名是“部分研究生”。另有一张写在同日的大字报，则告诫学生不要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学生运动与拐杖——再谈策略》

……历史上，学生运动极易成为政治投机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运本身的弱点决定的。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具有最大的狂热和失控性。但只有毛一个人能驾驭它……86年底、87年初学潮的大方向本来是“民主”，但最终导致胡耀邦下台和反自由化，成了不利于民主的结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潮帮了倒忙……学生运动无数次成为政客们手中的拐杖，被得心应手地用来打击一些人，扶植另一些人，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不能等到再出现一个胡耀邦时才来反省。

我很想知道那些率先把矛头对准李鹏的人的真实身份和动机，我从那种仇恨性的煽动和挑唆性的叫嚣中，觉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阴谋，一种旨在改变民主运动大方向，并把它引向换汤不换药结局的阴谋……我们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而不是撤了张三，再换上李四，一切又都依然故我，随

意打倒的危险性还不只此，它还会成为恶毒攻击的罪证，并为大规模镇压做铺垫，从而半路断送我们的事业。

同学们，随时警惕阴谋家和骗子！

我们决不做任何人的拐杖，我们要按照自己的路子走！

在这张大字报的下面有一个批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字报。请同学们读后三思。署名“北京市教育局一干部”。

事后，中国在巴黎的“民主之家”、法兰西学院和德国莱茵笔会联合组织的八九学生领袖座谈，追究了“四二二”大会堂静坐关于“李鹏接见”谣言的来龙去脉：

“王超华：关于那个一刻钟李鹏要出来。因为他在那儿老说‘再等等，再等等’，底下问‘到底等多长时间？’我也在那儿使劲喊，‘到底要等多长时间？’他就说，‘等一刻钟。’当时是12：30，我说，‘那到12：45啊？’旁边也有其他人这么说。我就出来告诉我们学校说，‘前边学生代表说了，说再等一刻钟’。当时还有在传，说是有两个代表进去了，在和里边谈。所以我就说，‘他们进去了，可能还要等一刻钟。不什么的话，咱们就会有其他行动。’我们学校的同学就说：‘你跟别的学校的同学也说说，因为后边的同学已经开始走了。’我这个人也挺愣的，就捂着嘴喊：‘哎，再等一刻钟！’忽然一个人就抓住我，‘你造什么谣？再等一刻钟是怎么回事？刚才正在这抓，谁说12：45分的时候李鹏会出来？’我说，‘没说呀。我是说，学生代表……’那人就问，‘你的学生证呢？’这时候，我们学校的同学非常护着我，幸亏我没走太远，我们学校就把我给护了。然后跟这个人要学生证，这个人拿出一个清华的学生证来。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后来学生并没有拿李鹏要出来见学生这个事做文章，也印象并不深，可是政府反复地说。这是跟我有关系的一件事。”

“封从德：说李鹏要出来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

“王超华：没有任何消息说是李鹏要出来。当时我听到，包括人家质问我，包括我传的都只是‘一刻钟以后，他们不给答复，我们要采取行动’。下跪是这之后。”

“常劲：我想对这个做一点补充。因为开希跟我谈过这个事情。当时开希召集了会议，然后作为代表上去，他在下面说这个事情，当时他们跟治丧委员会谈判，治丧委员会说是10：30吧，他们不是说李鹏来见面，而是说他们给学生答复。但是后来不知怎么消息误传了以后，就说成李鹏去见学生。”

“王超华：没有任何人说是李鹏答应了。”

“常劲：但是我们在后面得到的消息，当时我和柴玲都在后边，我们在那得到的消息是，听说李鹏、赵紫阳都出场了，要去参加那个会议。然后李鹏还愿意给我们学生谈谈话，当时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消息。然后底下的人热烈地问开希，开希当时觉得没办法，因为10：30了，他还没得到消息。”

“王超华：那应该是12：30，他说再等一刻钟。”

“常劲：对，当时他没办法了，所以一动脑筋说，再等一刻钟。开希他说他当时很怀疑这个消息是怎样传下去的。他说有可能是共产党……”

第二节 北高联

从一周以来北京各高校的自发自觉行动中，学生运动已开始酝酿出多个中心。其中最显著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前者有很深的“北大渊源”，但这一次，它已经自己充当起学生运动的脊梁。因此有人说，以往的学运旗帜是“自由”、“民主”，而这次的旗帜却是“法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学生将他们的专业精神灌注到现实政治

生活中去不无关系。至于北师大出头的原因，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北师大的教师、学生要为被评上国家教委的“先进单位”一事“雪耻”。因为，国家教委被昏庸保守者把持，是当时中国最黑暗的、散发着僵尸气息的衙门。据后来担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以下简称“北高联”）常委的梁二 回忆：

“师大自治会的形成主要建立在三个人的作用上，第一是吾尔开希，他在4月19日那天新华门示威的时候确立了自己领袖的形象；第二是张军，他是在4月20日下午和我组织了一个全师大游行到人大，再联合游行到广场。当然那次游行因为下雨失败了，但是建立了我们两个人与人大的接触和我们两个人同各系积极分子之间联系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之上，我和张军就希望能联合吾尔开希组成一个自治会的雏形。

从4月20日下午到4月21日期间就开始有师大学生自发的联系活动，我和吾尔开希、张军也觉得有必要组成一个自治会的筹委会。那天我们就搞了一个办公室，是在开希的宿舍里。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香港同学来找我们。那个时候有许多社会人员来访都是由我们那个雏形办公室来接待。开始设了一个广播站，准备了一些音响器材，这就是最早的形成。到了开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开希在广场上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多同学的支持，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分工协作的计划。”

“在师大校内，我们学生自治会没有脱离系组织，校自治会的全委会是由系的小头目组成的。他们在本系都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不仅能领导各系，而且有许多系主席都是以前的官方的系学生会主席，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有一个决策程序，重大的提案需要所有十八个系的同学到齐才能进行表决。”

师大地位的突出，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学运组织者的开放意识也不无关系：

“不论是他们派出的联络队员，还是比较小的专业学校，他们不仅传递了信息，也起到了参谋、建议的作用。他们到小一点和郊区一点的学校实际上是帮助进行了组织活动。当时联络部派出的人参与性都特别强，比如在北京印刷学院，他们就帮助有心的人建立了自治会，这是比较重要的。后来印刷学院在4月26日率领五百同学到师大来，跟着师大的同学一起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准确地说，他们就整个投靠我们了。”

北京电影学院马少方的回忆，证明了师大的开放性工作及其辐射作用。他本人参与学运组织宣传工作，就是从认识吾尔开希开始的。“4月20日，我因‘新华门血案’，去北师大见了吾尔开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开希。就是在那一天，开希提出了要组织起来”，并通知他“21日晚各校组织起来到广场参加胡耀邦追悼会”。马少方回忆说：“21日晚，我领着电影学院的一部份同学赶到北师大，当时师大里已经聚集了很多高校的学生，好像是北大的人还没有到……大家都在等，人越聚越多，人多嘴杂，一片混乱，而越是混乱就越是焦急。还是开希有办法，他坐在一辆自行车上，手持小扩音器，开始调度已是非常混乱的师大操场。这时候，旗帜的召唤作用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开希指挥着领队的旗帜，在广场转圈，秩序一下子就恢复了。而很快，北大的队伍也到了师大门口，大旗便直奔东大门而去。

大旗在当晚的作用，直到今天还给我震撼不已的感受！”

4月22日，参加了大会堂请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王超华，也对吾尔开希留下深刻印象：

“吾尔开希在那喊来喊去的时候，北大这边有一个同学说：‘你算干什么的呀？’他就喊，‘我叫吾尔开希，我是师大3000同学选出来的代表。你有意见的话，你可以去跟师大的同学讲，或者你们北大的派代表。’我印象是，师大那个时候已经认他为代表了，不是完全他个人。”

如前所述，就在那一天，19所高校学生在与官方协调时成立了“临时协调小组”。吾尔开希和几位自告奋勇的人参与了与治丧委员会的交涉。虽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但这一行动为后来的全市高校统一学生自治组织奠定了骨干的基础。而政府的冷漠，为这个组织的进一步凝聚提供了机会。

“在追悼会之后，我们就是一定要全市统一罢课，而且是联合罢课。”梁二继续回忆道：

“吾尔开希就认为有必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机构，这样各个系的自治会就开始筹建起来，各个部也开始筹建起来。到4月23日晚上，各项职务基本划分清楚了：吾尔开希任主席，我任副秘书长，张军任秘书长。下设几个部，自治会以秘书处为执行机构，以正、副秘书长和开希作为一个决策机构，然后再受各个系自治会的学生代表的领导。

师大最早对高联的贡献，我想第一是一个比较健全的秘书处，曾经担任过高联的执行机构。超华曾经提到过，高联曾经运用师大的秘书处作联络、通讯、印刷、会议准备等，这是对高联执秘机构的贡献……

对各阶层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早期师大就与一些官员、官员的参谋或各个研究机构的老师有联系。我们秘书处最初的一些情报就是通过这些人得到的，而且他们与我们也保持着一定的密切联系。师大对师大附近的居民宣传点的宣传工作是相当好的。最早是跟人大学的，把喇叭拉到外边，最后把自由论坛也设在在校门口。这样就有一些市民来听，了解学运，然后是对学运表示支持。后来向市民要钱要得也比较多。”

至于最早提出“校际联合与统一组织”的北大，为什么暂失“笼头”作用？这不仅与北大学运内部的整合程度和速度有关。与自身诉求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渗透也不无关系。

家住北大，曾积极寻求与之联系的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回忆道：

“4月22日游行回来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组织应该加强。4月23日我就到北大去，正好陈明远在那发表演说。我一看，接待处在28楼428房间，我就上去，一上去就见到柴玲，我就给她提建议，像什么中南海外边静坐呀，她马上把我的名字写下。下午她就拉着我，说他们正开会……我当时以为是各校联席会，没有想到这是北大自己的筹委会。”

“我还不断地送来条子。……说希望他们建立北京高校联席会议，下面设各部，这是主要两个建议。他们说，‘各部我们已经设了。联席会议呢，我们现在不准备搞，北大现在自己还忙不过来。’然后才告诉我说，‘都已经熬了两夜，70几个小时没睡觉。’”

“北大在25日上午又收到北航和清华发来的一个召开联席会议的一个通知，是早上8：00还是9：00开，收到的时候却已经是11：00了。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不止一个学校要出面组织，柴玲提到的是政法、师大一块准备要召开的，这个通知是北航准备要联着清华一块要召开的。所以当时各校都在主动地组织。这是当时我的一个印象。（常劲插话：只有北大是被动的。）”

“北大是被动。我4月24日就去说，‘你们北大要组织各校联席会议。’我印象特别深，北大接待处一个挺年轻的学生就说，‘嗨，北大着什么急啊，他们哪儿组织联席会议敢不给我们留席位！’这是非常典型的。”

就在北大学生领袖忙于内部事务，对联合之事意马心猿之时，23日晚，前北大研究生、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兼职人员刘刚，与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政法大学学生王志新等在圆明园召开了有关高校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总结了22日请愿的情况，认为学运发展到这一步，应该产生一个自己统一的组织。当场决定成立“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简称“临时学联”或“临时高联”），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宗旨；近期目标是把学运继续下去，长远目标是争取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化。会议选出政法大学为临时主席院校，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北大、师大、

清华、人大、民院、北京电影学院等6个常委院校。此前成立的北大学生自治组织“北大筹委会”表示服从“临时学联”的统一指挥。

关于“高自联”的成立过程，发起人刘刚在《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梗概：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内召开……有三名学生代表在大会堂台阶上下跪请愿，我随后了解到他们是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北大的张志勇和郭海峰。……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这样的民运骨干人才。但所发现之人大多集中在北大，例如王丹、邵江、熊焱等。而今在几天之内一下冒出这许多杰出人才，我当时就想到一定要尽快将这些人都组织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将这场运动引向深入和成功。于是，我在4月23日，就逐个去联系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及其它学校的学生骨干。当天中午我到了吾尔开希在北师大的宿舍，向他简单介绍我的尽快成立学生组织的想法。吾尔开希立即表示赞同。我们约定当晚7：00先到圆明园南门外集合，然后再到我在附近的宿舍开会议。我建议他先作些准备，并由他主持当晚的会议。随后，我们俩分头去联系我们各自熟悉的各校骨干。”

在北大，刘刚向王丹简单介绍了成立“联合学生组织”的设想，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参加。但王丹提出他参加的条件是北大能够拥有绝对多数的常委名额，比如说，如果总共有7个常委名额，北大至少占4名。刘刚表示，这只能通过民主程序决定，北大不能搞“大校沙文主义”。

当天傍晚，陆续到达的各校学生代表先在圆明园南门外集合。然后由刘刚领到自己的驻地。刘刚回忆道：

“我当时除了在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供职，还同时在中科大研究生院的软科学研究所及国家教委属下的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兼职。特别由于我发现那一段时间不断有公安便衣跟踪我，为了不给予明的研究所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也为了能更方便地主办北大‘民主沙龙’及‘渊鸣园’

沙龙，我索性从子明位于双泉堡的研究所宿舍搬出来，住到了在圆明园附近的北京高联材料公司。……那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一排小平房，我住其中一个房间，此外还有会议室和几间办公室。我就将各校代表领到了会议室。我安排了两名学生代表看守住小院的大铁门，每个出入的人一律检查学生证。当时有几个人自称是记者，被我拒之门外。”

据当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回忆：

“当天，我接到通知，说傍晚将在圆明园召开有各高校代表出席的有关成立各校统一组织的会议，便率87级行政法专业研究生XXX及86级本科生XXX、XXX前往。当我们骑自行车赶到圆明园前广场时，见到前来迎接代表的外校同学，他们检查我们的证件之后将我们带到位于圆明园对面路南西侧的一座小小的平房院落门前，这个院子的北侧隔壁是一家低档餐厅。开门的就是刘刚和他当时的XX、中国政法大学八六级本科生XXX。当时已经有不少外校的学生代表已经到场，如日后家喻户晓的吾尔开希等。我们学校的周勇军和王志新亦已在场。”

刘刚继续回忆道：

“7：00刚过，我宣布开会，要求大家静下来。这时坐在沙发上的清华研究生大声质问：‘喂喂，谁能说一下今天的会是怎么回事？’我后来才知道那人叫宋立峰。‘我来简单说一下’，我接过宋立峰的话，‘我叫刘刚。我想大家大多都知道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就不更多地自我介绍了’……我继续讲，‘我们北京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已持续了一个星期。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联系各个学校的骨干，尽快成立我们的跨校联合组织，使得我们在运动期间能够协调运作，统一纲领，统一行动。这就是召集大家来的目的，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下面我推荐由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来主持会议。’大家随即都把目光移向了吾尔开希。吾尔开希正与他的北师大校友们嘀嘀咕咕地讨论著什么，听说由他来主持会议，立即展开手里的纸片讲道：‘我们要开短会。今天的会要进行这样几个程式，1、讨论通过组织名

称，2、讨论通过组织章程，3、选举组织领导机构。大家对这几项会议程式有意见吗？’他环顾周围，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那么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讨论通过组织名称。’

开始，刘刚提议的组织名称是“团结学生会”。马少方发言时表示反对。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临时组织，因为临时组织虽不合法，但合情合理”。继而，吾尔开希提议取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他还提出“学生组织要纯学生化，防止社会其他阶层介入和利用学生运动。”但已经不是学生的发起人刘刚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一听吾尔开希建议的这名，就感到不够响亮。对于他的纯净学生组织的观点，我更感到是过于单纯和幼稚。‘我提议叫‘团结青年联合会’。我认为学生运动的作用就是要像滚雪球一样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到民主运动中来。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民主自由，而不是自治。’‘好，我们现在有两个候选名字’，吾尔开希讲，‘还有其他建议吗？如果有，我们现在只提名字，不允许作任何解释。’……”

第一项议程的表决结果，是吾尔开希提出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获得超过半数通过。此后，吾尔开希又念了他预先准备的章程草案。刘刚认为：

“大部分内容都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例如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等等。……口号是：民主、自由、人权。后来政法大学的同学提议增加一条法制。”

吾尔开希宣布的组织结构是由五名常委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选举产生。对此，刘刚提出了几点修正意见：“第一是常委应实行‘单位常委制’，即选出几所大学作为常任理事学校。第二是主席由常委学校轮流担任，任期一周，不设个人主席；每个学校派到高自联的代表最好频繁轮换；代表的责任是将各个学校高自联分会的决定和动议转达给高自联，并代

表其学校参与高自联的会议和表决，以及将高自联的决定传达到本校。我的这些提议都是为了分散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风险，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当局采取擒贼先擒王各个击破的战术。”

刘刚提议的“常委制”和“不设个人主席”的建议获得了通过。

在确认代表资格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代表首先表示：青政坚决支持这次正义的学生运动，但考虑到青政的特殊身份，青政不参加这个学生组织，但保证积极参加这次学生运动。大家鼓掌通过了他的建议。期间，北大有学生来到会场，宣布北大筹委会的一项决议，指当时参加会议的张智勇，已被北大筹委会开除，已不能代表北大筹委会出席会议。张智勇在否认自己是校方派遣后，当即退场。

会议随即选出了5个“常委院校”。其中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但参加会议的八大艺术院校 要求有自己的代表，因学校小、学生人数少，可以共享一个常委名额。这项提议获得与会代表的鼓掌通过。接着，中央民族学院学生石翁提请大会为中国的56个民族设一个代表，也被全体鼓掌通过。 因此，会议共推出7名常委。 在推举“主席院校”候选人时，北师大推举吾尔开希，刘刚则推荐政法大学的周??军。他认为，目前所选出的领导者，要尽可能通晓法律，以便领导我们进行有理有力的合法斗争。两位候选人都作了简短而又非常精彩的竞选演说。最后举手表决。据时任八大艺术院校常委的马少方回忆：

“总共参会的可能是二十九所高校 的若干代表，但按一校一票计算。我们八大艺术院校和法大自身共九票，占第一位，师大好像是七票，北大、清华、人大分获余下票数。故法大‘以微弱多数’当选主席院校”。

法大当天参加会议的是周勇军，他因此当选为首任“北高联”主席。

事后，刘刚解释了他当时推荐周勇军的想法：

“其实，按照我当时的建议，由谁担任主席并不重要。……我更希望由吾尔开希以外的其他人当选，这样可以利用高自联主席职位培养造就更多的学生领袖。而对吾尔开希来说，他早已是过了河的卒子，是只能进不能退的了，不论他是不是当选主席，他都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了。而且我有一点担心，他一旦当选主席，一周后可能不会实行自动轮换。”

主席选出后，刘刚提议从次日起，北高联在政法大学全日办公，各高校派代表常驻；4月24日在政法大学举办成立新闻发布会。同时提议周勇军、王志新 着手准备为履行申请注册登记手续。

刘刚的回忆，比较忠实的反映了当时学生运动的几点诉求：1、纯粹的学生运动，不希望被社会上其他势力左右，这是前述“大会堂请愿”后学运达成的共识的反映；2、自治，这本身是建设民主社会的一部分，它说明学生当时并无将“学生运动”扩大成“社会运动”的计划，也未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抱不切实际的幻想。3、希望有自己的领袖领导运动，至少，赴会的代表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明智地判断：按照“轮流坐庄”和“不设个人主席”的架构，未来的组织运作将花费极大的沟通成本，无以保障行动的效率和政策的延续性。

而刘刚的方案，则显然是与他将“学运”扩大为社会运动的目标相联系的。“学运”决策机制的缺口，恰好是它与“社会运动”进行整合的接口。而这个链接人，则由至今保持低调的“发起人”自身担任。事后，刘刚继续回忆道：

“最后，我提出由我联系法律界精英进一步完善章程草案，并联系其他各界人士组成顾问委员会和后援会，藉此发动学生以外的其他团体的支持。吾尔开希还是坚决反对与非学生组织或个人合作，但同意由我去进一步修改章程。会议结束时大约是夜里11：00左右。”

“4月23日夜至24日上午，我带着那份章程草案，分别咨询了方励之、陈子明、许良英、于浩成。记得方励之将‘民主集中制’改成了‘民主制’，许良英将‘反对暴力’改成了‘非暴力’，于浩成改了三个错别字，陈子明就只说了一句话：如果需要资金就尽管说话。我……一分钱都没跟子明要。但我在那一天掏出了自己的两千元存款，为高自联买了第一台油印机和扩音机等设备。”

方励之、许良英和于浩成的回忆，均证实了刘刚的叙述。其中，刘刚找到于浩成得助于许良英的介绍。事后，于浩成为此入狱，许良英还深怀歉疚。许和方对待此次学运的观点和态度，与学生的诉求高度契合，那就是一一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支持学运，但不介入学运。知识分子的任务仅仅是启蒙。

事后，笔者与陈子明的对质也证实了刘刚的说法。作为团体，社经所此时对学运的态度还是“保持灵活”的、可进可退的身段。

法大当选主席院校之后，会议改由周勇军主持。

图4-1：“北高联”第一任主席周勇军（选自亚衣《流亡者访谈录》）

临时学联选出当日，就决定派出300名学生，到上海、南京、广州、兰州、长沙、太原、济南等地，与这些地方的高校取得联系。其中师大就向上海、西安和成都派出了三个小分队。

4月25日晚，“北高联—临时学联”在“主席院校”——中国政法大学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了4月26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4月27日全市高校联合大游行。

4月26日上午，“北高联—临时学联”在政法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告“北高联”正式成立。

4月28日，“北高联”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主席院校”改由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主席由该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吾尔开希担任。八大艺术院校的代表被东部十大院校代表取代，民院代表因石翁辞职名额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取代。

4月30日，“北高联”召开第四次会议，“主席院校”改由北京大学担任，主席由该校学生自治筹委会常委封从德担任。

5月6日，封从德辞职。此后，“北高联”由“主席制”改为“秘书长制”。秘书长由中国政法大学王志新担任。但此后“北高联”主席院校轮动停止，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主席杨涛，自然成为“北高联”负责人（主席）。日常工作基本由秘书长王有才掌控。杨涛是北大历史系88级本科生，是为该组织最后一任主席。

第三节 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就在赵紫阳慎之又慎，以图身免，待机而动之时，他的未来的接班人却陷入了新的微妙之中。他所辖地区的一份报纸，迫使他从沉默中登台亮相了。

事情发端，就是“八九民运”中新闻界的第一件大事，史称“《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创办于1980年6月。它的创办，与总编辑钦本立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钦本立，笔名林沧白、里甫，浙江长兴泗安人，1918年出生。北平朝阳学院毕业。曾任《成都晚报》、重庆《商务日报》记者，上海《文汇报》、《经济周报》、《工商天地》记者、编辑。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解放日报》财经组组长、《新闻日报》采访部主任、《人民日报》记者、

上海《文汇报》副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会科学》杂志主编、《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著有《美帝经济侵华史》。

据时任“导报”编委的张伟国回忆：

“钦本立是一个老报人，1949年以前曾经是香港《文汇报》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文革中钦本立受冲击，以后平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在这期间，他凭着跟《文汇报》的老关系，借了二万块钱，把当时在文革当中打散的，在新疆、青海……那批右派老报人找回来，大家一起，办起了《世界经济导报》。办起来以后涉及到一个挂靠问题，因为在中国你如果没有一个挂靠单位的话，它就不允许你搞。由于钦本立自己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那么就挂靠在世界经济学会……。

办起来以后，它基本上是属于民办性质的。民办有一个困难：看不到中央文件。看不到文件就没有消息。办报纸没信息是很致命的事情。所以在1984年，当时汪道涵当市长的时候就出了个主意，让世界经济导报成为一个局级单位。……以后，文件就可以发到报社来了。当时所谓四报两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世界经济导报，然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算是上海市的六个局级单位，导报算挤进去了。但那时候讲好了，就是一个看文件。导报的人事任免和经济都是自负盈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导报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民办报纸。”

在办报初期，钦本立本人还亲自到上海街头卖过报。

图4-2：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选自万润南《我的1989》）

“导报”的创办，得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钱俊瑞的支持。在北京有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宦乡、陈瀚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人作高级顾问。通过李昌夫人冯兰瑞的介绍，他们的女婿万润南的四通公司，成了“导报”幕后的金主之一。合作的方法是四通与

“导报”联合成立一个广告公司，但广告收入四通分文不取，而且四通公司凡有广告，都给“导报”刊登。

当然，还有一些内幕是当时“导报人”所不知道的。那就是，在中国，所有“涉外”单位，都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才能活动。所有报纸的国际消息都来自新华社的批发，一般报纸也不可能派出自己的“驻外记者”。更遑论一家民办报纸。

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导报”以在思想解放和理论探索方面的大胆，与积极配合中央改革派领袖人物的言论，不断主动开拓新闻主题，在我国的新闻界独树一帜。由于设计当初就有“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出现，为政府经济改革“放风”并回收反应，给人以“消息灵通”，甚至比“人民日报”还快半步的印象，在国际、国内都颇受欢迎。加之没有官报的许多条条框框，不论“经济私有化”还是“政治多元化”，许多犯忌的话题都“口无遮拦”，政府改革派及思想理论界人士多把它当做发声的阵地。在知识界、文化界普遍痛恶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它坚持独立的立场，巧妙顶住上方的压力，被誉为“善打擦边球”的能手。为此，它也早就成为上海和北京意识形态保守派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83年，“导报”因发表南京一经济研究者的探索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学者告到中央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那里。所列经济理论界24条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论文摘要，其中有18条出自“导报”。“导报”因而被指控为“犯有方向路线性错误”。1987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运动落马，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人事更动对“导报”极为不利。但该报驻京记者通过内线获知中南海信息，抓住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竞争心理，用外电综述形式刊登了《克理姆林宫频频吹出改革之风》的消息。又被意识形态权威批了“别有用心！”四个大字。官司由外交部一直打到当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办公室。由于报纸为改革开放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大概

也因为清楚“有关部门”在“导报”的利益，故上海市委虽于1985、1987年两度派员对其进行整顿，也未能对其最终下手。

1988年12月，“导报”又以刊登苏绍智在中宣部、中央党校和社科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而获罪。据张伟国回忆，这篇文章的刊出过程是这样的：

“1988年底，在纪念11届3中全会10周年的活动时……王忍之是当时的宣传部长。他看到记者名单里有《世界经济导报》，他马上就圈掉了，不让我们参加。……也不让当年帮助胡耀邦一起进行思想解放，参加理论务虚会的许多改革理论家参加，像王若水、严家祺、于浩成、李洪林等等，都没参加。……于是，苏绍智一人在会场上孤军奋战。他虽然也发言了，但这个声音很微弱，也没有让外界知道。等到会议最后一天的时候，苏绍智先生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起看他的稿子。他跟我们导报商量，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登在导报上。我马上把这个稿子传回上海，请总编钦本立定夺。……钦本立当然很愿意发。当时他说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一、既然没让我们参加这个会，那所谓这个会议的纪律，我们就没有遵守的义务；二、这个稿子是苏先生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不是一个秘密文件，我们也应该可以用；三、如果讲有人对这个稿子有意见，我们完全欢迎，开放报纸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批评。”

苏绍智在这篇发言中讲到，在十年前“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理论探讨方面立下过功劳的人为什么受到不平等待遇；“清污”和“反自由化”是十年改革中的两次重大失误；目前理论界仍存在禁区和宗派把持；以及学术自由是改革成败的生命线等问题。该文发表后，有关报纸便接到中宣部的电话通知：不准转载“导报”12月26日第三版上刊登的苏绍智的文章。此后，总编辑钦本立的命运一直是个未定之数，外界纷纷谣传，他可能会被免职。但到底是采取免职形式，还是采取“离休”方式，上海当局还举棋不定。因

为该报上下团结一致，已形成一种高度认同的协同整体。外人派进来无用，新选拔上来的继任可能比“老板”更不好对付。

正在这关键时刻，赵紫阳秘书李勇亲赴“导报”驻京办事处，讲了一些“总理的办公桌上有每期导报”一类的“客气话”。一时间，消息传到海外，“导报”似乎又时来运转。事后，经陆一调查，请来总理秘书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报”的幕后老板。有关消息，也是“有关部门”运作发往海外的。

“江泽民也是很善于伪装的一个人。就在这一年上海的春节团拜会，江泽民看到钦本立的时候，还拍拍钦本立的肩膀，说这个事情你不要紧张，检讨市委帮助来写。上海市委呢是做减压器不会做加压器，不会升温，只会降温，你放心好了。”

由于江泽民给了钦本立一颗“定心丸”，1989年4月10日，“导报”又发表了一篇与李鹏《政府工作报告》“治理整顿”方针唱反调的文章——《走回头路不是没有可能的——读李鹏〈政府工作报告〉》。文章作者是千家驹。上海市委尚未及处理这件事情，学潮已经爆发。因此，直到胡耀邦逝世，对于上海市委来说，“导报”问题悬而未决。

4月17日，张伟国将“导报”将开辟专栏纪念胡耀邦的消息通报给港台报刊。港台报刊登出消息后，政治嗅觉敏锐的上海市委立即引起警觉。

图4-3：《世界经济导报》编委、驻京办负责人张伟国（选自亚衣《流亡者访谈录》）

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与《新观察》杂志联合举办题为“胡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缅怀追思座谈会。会议结束后，张伟国向钦本立作了汇报。钦本立希望“把整个会议能够报导出来”。于是，张伟国花了将近一天一夜的时间将会议发言整理成文字。事后，他回忆道：

“我们大概分了5个版面，把这个座谈会发言的大部分内容，用这期报纸登出来。这也是导报有史以来没有过的。”

据张伟国回忆：在这个会上有比较尖锐的言论，其中两个人的言论比较突出。一个是严家其的，他认为共产党的权力更替都是非程序化的，讲白了就是宫廷政变，没有按照一个正常的程序进行。另外一个讲得比较激烈的是戴晴，认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从陈独秀到胡耀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她就从另外一面印证了严家其提出的中国没有确实的权力更替程序，所以这样的悲剧不断地重演。胡耀邦的去世不单单是胡耀邦本人的悲剧，实际上是中共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这就是后来被指责为“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并“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领”的言论。

“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里面有一个跟江泽民关系很近的人叫刘吉，在海外被称作是江泽民的智囊。他参加这个座谈会以后就往上海给江泽民打报告。”

这一天是4月21日，时间在晚7：00。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电约钦本立谈话，请“导报”把准备刊出的内容送市委“看一看”。据称，当时，陈至立感到说服困难，又搬来了主管文宣的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经二人做工作，钦本立答应第二天早上将清样送审。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清样还未送达。下午，市委宣传部打电话到“导报”催问，没找到钦本立。到下午4：00左右，人们才在《解放日报》印刷厂找到钦本人。钦本立回话说，清样刚刚送去。据上海市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清样送达的时间是下午4：30。

在审阅清样的过程中，市委领导觉得该期报纸用整整5个版面（长达二万字）报道的“四一九座谈会”发言记录，规模过于庞大；有些内容公开发表，会造成“思想混乱”。确切的说，主要是严家其和戴晴的发言。他们在小范围座谈会上发表个人意见可以，但有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一旦见报，就会成为一种宣传，对当前已经非常复杂的形势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所以不宜见报。

为此，4月22日（星期六）下午，曾庆红、陈至立约见了钦本立。

“在报纸已经开印的情况下，钦本立接到了陈至立的电话，要求他到上海康平路市委去谈话。导报从来也没有送审的惯例……作为一个老报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页报纸他都要全部看完，签了字才走。那天钦本立在印刷厂看完报纸校样，开机印刷才走。马路上那时已经出现游行，交通还不太方便。”

晚8：30，曾庆红等人终于见到了钦本立。他要求将“导报”第439期这篇报道中，严家其、戴晴等人发言中直接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为胡耀邦“平反”和为“自由化”翻案的部分内容删节500字后才能发行。

这些应删去的文字包括：严家其所说，邓小平“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要党中央“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所谈中共70年历史中几位总书记的命运，以及“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的有关内容。还有被认为是鼓励学生和群众上街游行的“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就在天安门广场”等内容。

据说，钦本立当时表示，邓小平必须为拉胡耀邦下台而承认错误：

“我就是要邓小平检讨。邓小平早检讨，早主动，早得人心。他要检讨，我们就拥护他。”

如果市领导感到为难，钦本立建议他们最好装聋作哑：“既然泽民同志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他仍想在不改版的情况下，自己承担责任。

但曾庆红回答说：“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这是保护社会！”

曾庆红向江泽民汇报了钦本立拒绝删除有关文字的情况。江泽民立即打电话给时任“导报”的名誉董事长汪道涵。

“‘江请求我的帮助’，多年后，汪回忆道，‘我也认为维护稳定是重中之重。领导人必须阐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必要的安全措施。’”

“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火……他想阻止‘导报’使党难堪，自毁前程。江批评钦无视党纪，尔后就走了，让汪道涵……来说服钦作必要的删节。”

有生以来，钦本立从未受到过这样凶狠的训斥——事后钦本立曾对陆一说，他感到自尊心很受挫伤，当年他当“右派”时，柯庆施都未曾这样骂他过。

但这正是江“唱红脸”需要的效果。接下来是汪道涵登场。

汪道涵看了清样以后说，在目前情况下，把那些敏感的内容发表出去不合适，我们对党负责。有的问题可以通过内部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这篇座谈会发言报导中还谈到耀邦近一两年的一些谈话，现未经组织和耀邦同志家属核实就发表也是不慎重的。

事后，戴晴也对自己的这次发言作出检讨：

“这是我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就重大问题发表未经缜密思考的见解的典型表现。近一二年来，我有这样的表现已不是第一次……我都有临时作‘惊人之论’并当场反驳别人引起争论的举动。……当时只觉得自己反正是局外人，随便说几句使会议活跃起来没有什么不好。殊不知这是一种对学问极不严肃的态度。以4.19发言为例，中共党内民主生活的历史与现状，党的历届总书记的去留的复杂背景与历程，足够以专业学者作一辈子学问的大题目，我仅出于对耀邦……感慨，就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轻率发表意见，实为学人之大忌。……我当时也完全没有估计到这发言印出会发生什么影响，起到什么作用。”

汪道涵还对钦本立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党性原则，删掉若干段落并不影响整个版面，而且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消息和赵紫阳所致的悼词都不登，也是不符合事实上的政治和新闻要求的。

“经过讨论，钦同意删除刺眼的段落，进行版面调整。修改过的版面将在次日下午完成，以便能按计划在4月24日早上印刷。”

此后，汪道涵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一直待到4月23日（星期天）凌晨1：00。钦本立也曾打电话给印刷厂，要求停印、停发这期报纸，待修改后再印发。事后，陆一等负责人也确实在印刷厂看到了“老板”的这个电话记录。但电话打出时，实际上报纸“16万份已全部印完了”。并有几百份已从“内部交换”渠道被领走，有的已送往北京。老板的电话记录，则成为一纸封条，封存了所有剩余的报纸。按常规，上海的读者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才能读到“导报”，但汪道涵在那个星期天（23日）的早上就发现，未经删节的439期“导报”已经送到他家。受托与江泽民处理此事的老市长感到自己被欺骗，于是，汪道涵气愤地给钦本立打去电话，声言要与“老板”绝交。

图4-4：第439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陆一提供）

而此时，经张伟国散布，香港《南华早报》等海外的一些报纸却刊出了“导报”被“没收”、被“查封”的消息。《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也相继报道了这个消息。

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中，有几个明显可以进行对照的现象，这就是广东人买香港人的账，内地人买北京人的账，江、浙、赣人买上海人的账，而上海人买外国人的账。这种状况的形成，是与地域经济和文化的辐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买外国人的账，所以，上海市委对“导报”借海外舆论的压力来迫使其改变决定尤其恼火。星期日当天，上海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

仍然责成“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虽然主观上保留意见，但面对组织的压力，也只好决定改排后再发行。

据陆一回忆，综合其他信息，后来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4月23日上午，钦本立和导报的两位年轻骨干——朱杏清和陆一来到“康办”，当时在场的有曾庆红、陈至立、龚心瀚。他们先看钦本立带去的有删节的A版版样。但钦本立在这时说，刚才接到汪道涵来电，我们去查报纸已经流出去了一部分。他检讨了工作中的这个疏忽后，征求意见说，鉴于这种既成事实，是否可以照原样出，以免引起外界的猜测。朱杏清也持这种看法。但曾庆红则认为，如果情况是这样，外界，特别是那些港台记者，有可能已经看到了A版原来的内容，再出修改的A版，就会“让人从中看到上海市委的立场”，所以，A版不能改版再出。具体怎么办？以后，市委留下陈至立、龚心瀚与“导报”来人继续商议。曾庆红离开时留下三条原则：第一，报纸不能拖期；第二，不能让外界看出市委的倾向；第三，不能让那些敏感的话出去。他让在座的人考虑。

此时，已是4月23日下午2：00。陆一回忆道：

“那么，这就很难办了。‘导报’是4月24日星期一出报，既不能拖期，也不能照改版出，重新排版会来不及。这是一件两难的事。陈至立不是学新闻的，她提出几个方案都不可行。龚心瀚是学新闻的，他提出的意见还比较可行。他说，是不是赞成‘导报’的意见拿掉一点，不赞成的意见也登一点？平衡了，大家都看不出市委是什么意思。”

话说到此，陆一憋不住插话：

“当时是铅字排版，而且我们又是借用《解放日报》的印刷厂，这样拿掉一点，加上一点，看似改动不大，但在时间上来不及。不如这样，我手里已经有两个排好的备用版面，这时，胡耀邦追悼会已经开过，他的‘生平’已经发了，我们再加上《解放日报》这两个现成的版，四个版就够了。头版

重新拼一下。这样的话，我保证星期一可以出来，又看不出市委的倾向，又不拖期。”

经请示曾庆红，龚心瀚回来说，就按这个办——这就是后来的439期B版。

这个妥协的结果可以有两全其美的解读：对市委来说，他把可能引起争议的四个版拦住了；对“导报”来说，我宁可撤稿，也一字不改。

但是，上海市委的领导们并没有等来439期的新版本（B版），却等来了《世界经济导报》编委会的一份“紧急报告”。据知情者透露，这份“紧急报告”，是朱杏清、陈乐波和北京的张伟国电话商议决定的。它谈到439期A版已流散于世的情况。其解释是：当市委4月22日发出439期停印前，该报已因各种因素流失数百份之多。据“导报”编委张伟国说，当人们听说这期报纸有可能被查封时，纷纷从印刷该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将报纸偷走，并大量复印。据称，有300份报纸被一报贩就便车批发带走。只追回200份。当邮局的报纸被查封时，交换和赠送渠道的传输带并没有停止工作。鉴于“既成事实”，报告指出，如果另行发排，第439期“导报”将会有A、B两种版本流传于世，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它说：

“据了解，美国各大报纸已相应做出反应，以‘导报’脱期事件做为头版消息，引起了人们对我报A版内容的普遍关注。4月24日一天之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英国《卫报》、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日本时事通讯社等9家海外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以此事到我报北京办事处证实。其它国内外新闻机构在上海、北京，利用多种方式接触有关知情人员，以证实他们得到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图文传真机的普遍使用，海外报刊随时可能刊出我报A版文章，而海外的原文必然很快流传到学生手中，使得关心此事的学生很快可以拿到两种版本的导报，从而可能触发新的矛盾。”

“据闻，北京一些高校已在流传有关‘导报’被‘查封’、‘停刊’的消息，在学生可能已实际知道A版内容的情况下，改出B版很容易引起学生包括上海学生新的更大反应，从而使事态难以控制。”

另外，“紧急报告”还说：

“据北京消息，中央有可能对胡耀邦同志重新作结论，在这种情况下，B版中改掉发言人要求重评价胡耀邦的内容，会给人造成对上海领导人的看法。”

该报告在力陈发行B版害处同时，还警告这样做可能“违反中央、国务院4月24日特急电【中发电（1989）4号】通知的精神”。根据23日市委副书记曾庆红“三种方案都作参考，由“导报”自己决定”的精神，“紧急报告”的意见是，仍然坚持发行原版本。

也许是编委会认为，作为“民办报纸”，“导报”这样做并不需要通过市委领导批准。因此，在报告的结尾处写下了“专此奉告”的字样。

这份“紧急报告”与其说是一份报告，不如说是一份“宣言”。它的意图有三：

一是把“导报”与上海市委在439期问题上的矛盾，定位在大方向一致，仅在技术层次不够协调的位置上。既不承认有“反党”的企图，也不给对方戴上一顶“干涉言论自由”或“违宪”的大帽子。二是挽回他们的“老板”钦本立的道德名誉，由于问题出在技术环节的疏漏，老板当然不存在对党“阳奉阴违”，或声言要与之绝交的“老朋友”汪道涵所说的“不守信用”。三是将上海市委对严家其、戴晴讲话的意见扩大为“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利用海外传播媒介和已经兴起的学潮的压力，以及上海市委不了解京都政治内幕的矛盾心理，试图在新闻自由方面冲开一个缺口，迫使接受即成事实。

此时，已是1989年4月25日。

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其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4月8日，胡耀邦犯病当场，是他紧急掏出了“急救盒”帮助对耀邦进行抢救。不论二人在处理“86学潮”上表现出政治观点有多大的差别，至少他与胡耀邦个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他也许更关心另一个问题：赵紫阳会在这次学运中有什么动作？这次学运中，之所以赵紫阳态度十分消极，党内民主派不停地散布舆论，要防止高层权力发生“非程序更叠”，对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抱抵制态度，呼吁要防止“走回头路”，防止“改革形势逆转”，等等等等，这些在外界看来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江泽民看来却洞若观火一般。去年年底以来，香港等地突然兴起的所谓“倒邓保赵”并非空穴来风，此“风”倒邓是假，因为从来没有什么海外几个文人的唱合能使中国改变最高权力的。中国政治奉行的原则，历来是毛泽东的那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几十年来，港台自由传媒对中国政治权力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发现和清除党内的“异己分子”，谁被它们作为明星吹捧，就意味着谁的“大限”已到。

有消息说，赵的命运，其实在1989年2月——也就是老人们在上海过年时——已经决定。而他们意中的下一个接班人不是别人，正是江泽民。显然，上海市委领导人对于“防止权力非程序更迭”的敏感，超过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其他省份的领导人，是有由头的。他们当然看得出来，这种诉求，并不是针对已经死去的胡耀邦，而是指向未来的政治生活。而这，也正是发言人严家其的初衷。

图4-5：1989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

据严家其回忆，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的悼胡座谈会上提到的“防止权力非程序更迭”问题，信息来源于因经营不善已被陈子明社经所集团出资购买的《经济学周报》记者高瑜。

高瑜1944年出生于重庆，196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曾到人大新闻系听课。文革中参加人大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

大同县教书。后与林立果“小舰队”成员结婚，但她个人前途未受影响。1974年调北京市文化局工作；1979年进入中国新闻社，任专稿部记者；1988年调入陈子明接管的《经济学周报》，任副主编。因与高干子弟的结交关系，她拥有某些高层信息渠道；又因中国新闻社对港台工作性质，在港台等地具有相当知名度。这些条件，使她成为80年代北京知识界“消息灵通”人士，并对港台传递信息的重要管道。

1988年11月13日，趁《新观察》杂志在北京饭店举办文化讨论会，思想文化界名流聚会之际，高瑜将与会的严家其和温元凯邀到与会议室相邻的客房，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传递了赵紫阳地位危险的消息。高瑜回忆道：

“经济问题谈得差不多后，我又提出现在出现了1986年底的政治温差，党内继承毛氏衣钵的保守势力仇恨赵紫阳，用对付胡耀邦一样的非理性政治方式对待赵紫阳，不是没有可能。我清楚地记得，听了我这段话严家其心情十分沉重地连连说：‘那就很糟了！那就很糟了。’……在采访最后，严家其又提出：‘我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胡耀邦那样非程序的权力更迭的覆辙。’虽然在审稿中严家其删去了胡耀邦的名字，但寓意是十分明确的。”

对此，严家其回忆道，早在1986年出版的《首脑论》一书中，他就用了三分之一的章节谈论“首脑更迭规则和程序”问题。高瑜透露的信息，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在胡耀邦下台事件中的“非程序更迭”先例，并流露对当时局势的担忧。

这篇访谈录以《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为题，于1988年12月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镜报》发表。据高瑜回忆：

“海外几乎所有华文报刊都予以报道和转载，国内最先由《新华文摘》转载，以后是海南和广东，后来发展到内地，直到‘六四’镇压之后，国内报刊还在转载。”

而高瑜传递的信息，据李鹏《“六四”日记》披露，发生在1988年9月第六次“全国妇女大会”期间：“他（赵紫阳）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

另据李鹏回忆，邓小平的牌友丁关根也证实了这个传闻，但时间不是在全国妇女大会期间，而是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5月28日晚上，丁关根谈了邓对赵下决心的经过。”李鹏回忆道：

“晚上，我和丁关根同志谈话。他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今年1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而一则来自李先念下属的信息则是“1988年10月X日，在北京人大会堂的福建厅”。那一次，李先念陪同邓小平会见外宾之后，李先念要小平留下来，二人“作了一次长谈”。李先念认为，当时愈演愈烈的自由化浪潮是赵紫阳的纵容的结果，而赵在经济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上的错误已经明显暴露。在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自我批评，李鹏对国务院工作也承担了责任，但赵却没有一句话的自我批评。李先念还将香港报纸“倒邓保赵”的口号告诉邓，说过去有人高呼“小平您好！”现在是说你邓小平为什么还不死。他请邓认

真考虑，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行不行？谈话还提到政治局、邓小平和极少数人的谈话，为什么香港的报纸很快就能登出来了，这说明“在中南海有鬼，有内奸”。

据赵紫阳回忆，1988年，酝酿倒赵。李先念在上海对下级公开骂他。李先念、王震、薄一波联名上书邓小平，弹劾他。有人警告过他。

此外，1989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期间，邓李二人在上海迎宾馆会面。李先念再次谈到赵的问题。邓小平答复说：

“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人事问题暂时不动。这就是说，政治局和国务院的班子暂时都不能动。我曾多次对外宾宣布要全退，工作完全交给赵紫阳同志，现在看来，我暂时不动，你和陈云同志的工作 也不动。”

这表明，邓虽然没有立即换赵的意图，但李先念提出的问题已经使他心有所动，而且已经影响到老人原来的退休的全盘计划。

因此，高瑜所传，严家其所急，并非空穴来风。

但赵紫阳和鲍彤都认为，直至赵紫阳赴朝，赵紫阳的地位并未发生动摇。事后，鲍彤回答笔者提问时，我们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陈：紫阳，或者您，知道香港发表‘倒邓保赵’文章的事吗？你们看到过，或者是否订阅那些刊物？

鲍：我们中心，紫阳办公室，都有这些报刊，秘书给他堆在那里，他有时看，有时不看，有时看得很仔细……香港人要怎么写，张五常怎么说，不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严家其说，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他说‘非程序更迭’……

陈：就是高瑜采访严家其、温元凯的那篇吗？发在《经济学周报》上的？

鲍：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很影响邓和赵的关系。我觉得，严的这个讲法有点……有点敏感过度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但这可能引起邓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严家其是你的人。

陈：是不是当时他们也听到一些风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赵不行了？我当时也是从老严他们这个渠道，还有‘导报’这个系统里获得这个消息的。

鲍：当时，确实有这个谣言，李先念在上海、江苏跟人讲。但是，实际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非常信任赵。”

综上，民主派之所以急不可耐地放出风声，这次又利用胡耀邦逝世问题向中央提出警告，这种局势，对于江泽民来说，无疑是极其微妙的。有消息称，江泽民事后接班，并不是坐享其成的结果，而是他早已参与了配合李先念“倒赵”的幕后活动。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对“导报”刊登严家其的“非程序更迭”论异常的敏感。但是，他面临的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环境：第一，他在中央没有什么根基，不像胡耀邦那样，做过许多的好事，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虽然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就决定，江泽民决不能在悼念胡的问题上走错一步棋。第二，对待学生如果过激，就立刻会引火烧身。南开大学的学生在此番悼念胡耀邦，敦促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就捎带有请校长母国光辞职的要求。现在，学生紧紧盯着李鹏，把他看作改革派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这使江泽民有一种局外观察的优势，而一旦搅了进去，势必骑虎难下，弄不好两败俱伤。

但是，自4月15日以来，上海的学潮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胡耀邦逝世当日，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标语“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16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出现挽联、标语、大小字报；300余名学生在校园周围街道游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17日，两校汇合华东师大学生，共7000人走进市区，喊着“斩奸除霸”、“争取民主”、“打倒官僚”的口号，有近千人到达市府。18日，复旦出现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价1986年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重新评价胡耀邦任总书记

期间的功绩，追任他为终身总书记；要求言论、新闻自由，公开两会内幕。19日，又有上千学生上街游行；华东化工学院有大字报说“改革正处在危难中”，号召人们“像莫斯科市民支持叶利钦那样支持我们的改革家。22日，有数百名学生在市府前静坐，介绍“四二〇惨案”，声援北京学生；复旦有大字报称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反击的檄文”。25日，上海各高校内传播北京“四二〇”，“四二二”情况的大小字报抄件、传单、照片明显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导报”第439期上的有些内容若公之于众，势必把原来目标泛泛（有的“反官倒”、“反特权”舆论明显本来是针对赵紫阳的改革思路去的）的学生运动，引向党内民主派希望的轨道。而这，势必给他的接班人前途带来险情。但是，不论人们相信不相信这是真的，“导报”在多年中确实表现出自己是赵紫阳的“嫡系”部队的姿态。至少在公众眼里，它是赵的“铁杆”保皇派。考虑到这层关系，动“导报”就有可能牵动赵的神经，作为一个他的权力的未来的继承人这样做是否太过张狂？是否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他不断地与北京的政治时间对表。终于，他等来了《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据闻，他当时就请曾庆红给邓小平办公室打电话，询问社论的来历。当他得知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后，坚定了解决“导报”问题的决心。而且，他的行动之迅速，赶在了北京市的前面。

4月26日，上海市召开了有14000多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学习“四二六社论”的《通知》。除重复了社论给学潮定性的那几句恶狠狠的话以外，还介绍了上海所处的“严峻情况”及《世界经济导报》439期报纸处理经过。

江在报告中说：市委认为，“导报”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在改革、开放中发了不少好文章，许多同志为办好“导报”作出了努力，市委许多同志对“导报”的工作是支持的。为了让“导报”健康地办下去，为经济建设

和改革开放发挥积极作用，市委作出了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决定说：

“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市委决定：停止钦本立同志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向世界经济导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由刘吉同志任组长，孙恒志、张家俊同志为成员，马达同志任顾问。‘导报’整顿期间，由整顿领导小组主持‘导报’工作。”

同时，报告还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在“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题目下，规定“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串联”，“对内容出格的大小字报、标语，要用适当方法，坚决揭去。对内容反动的，要做好取证工作”，“对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等等。

江泽民派往“导报”的工作组，其实是一批与钦本立关系不错，与“导报”有一些缘分的人。据称，他们进驻“导报”后，基本上还是希望报纸按原来程序运行。时隔二十多年后，当时任“导报”副主编的朱杏清透露，万人大会过后的当晚，市委副书记曾庆红还把他找去谈话，让他在“老板”停职后承担起责任。他表示，我们不看你发稿，也不审你的大样，你们“按照原来的编辑方针，带着大家继续做”。

图4-6：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选自亚衣《流亡者访谈录》）

据当时派往“导报”工作组的成员孙恒志回忆，当时市委给工作组的指示，就是“你们去，不审大样，不参与日常工作，就是保证市委的决定能够落实。”

但在青年人占多数的“导报”，消极怠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4月24日凌晨已经准备就绪的第439期B版，直到4月27日才付印发行。在B版中，撤去了A

版中刊载的“四一九座谈会”发言记录的二至六版。换上了赵紫阳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这篇悼词被冠以《赵紫阳号召学习胡耀邦》这样不伦不类的题目，让人感觉到两个政治命运类似的人之间那种惺惺相惜的凄凉。此外，还刊登了《11亿中国人为你送行——耀邦家庭灵堂吊唁活动纪实》、陈退之的《要引导舆论，首先要开放和活跃舆论》、钱辛波的《舆论监督是新闻的职责，不是恩赐》，及《上海高校教授评估教育形势》、《公民讨论修宪，维护宪法权威》，和海南问题的一些文章。

但“导报事件”在北京引发的后果，使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多久。

第四节 请战—碰头会—密诏

就在上海的江泽民静观形势，等待中央的反应之时，他的在北京的竞争者却加紧了动作。“四二二”追悼会以后，面对校园不满的升级和学运进一步组织化的行动，北京市委频频召开会议汇集与分析高校形势。在4月23日67所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向与会者提出要求：对学生中流传的谣言要坚决予以澄清；做好教师、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工作，以稳定局势；各校党委、校长、学生会、共青团对学生的一些错误做法，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对学生与校领导对话的要求可以答应；属于国务院部委的学校要主动争取各部领导。可惜的是，他们错误地把这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认作是学生听信了一些“谣言”所致，而不认为谣言惑众本身就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征候，而学生此番胃口很大，并没有什么人要求和校领导对话而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在李、何再次想祭起所谓“党、团员、积极分子”这种中共在几十年统治中搞阶级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法宝”之时，他们也不了解：党，在一次又一次地把它自己的优秀分子、持不同意见者、非同一宗派的活跃人物排出体外后，广大党、团员对它的核心的失望，以及对这种体制的憎恶。他们更不了解所谓“积极分子”

的成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实际上成了一群思想保守、目光短浅、不学无术、唯利是图的围绕着权力打转，或依仗权势为生的群体代名词。

这样的决定，当然有了等于没有。事实上，它也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4月24日，北京市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十分严峻。虽然胡耀邦追悼会得以顺利进行，但动用上万名军警保卫党的领导人举行追悼会，是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其结论是，目前的事态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地下组织、非法组织猖狂活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就实质来说，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称，这一天的下午，李锡铭和陈希同按照电话的约定，拜访了在人民大会堂办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是北京市的“老领导”万里。书称：

“陈希同一坐下，就对万里说，‘老领导，北京市的学潮已越闹越大，反动组织都已经公开化了。他们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今天北京已经有39所学校，约5万名学生参加罢课。并且，高校的混乱已经开始波及到社会上。甚至连西单墙事件中的一些反动分子现在也活耀起来了。形势很严峻。’接着，李锡铭专门提交给万里一份关于北京学潮的分析报告。李锡铭说，‘这些学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他们背后有黑手，据查，这次闹事最凶的一些北大学生，就由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方励之虽不直接插手学潮，却是把学生与国外媒体直接挂起钩来的牵线人。还有一些人也不怀好意。’万里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北京的局势的确有点复杂化。天安门的情况我是天天见。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是爱党爱国的，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要把极少数人与大多数区分开来。’李锡铭说，‘万里同志，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万里说：应该尽快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北京和全国的局势，明确

工作方针。陈希同说，‘老领导，那就由您提议开会吧？’万里建议李锡铭、陈希同直接找李鹏。”

李鹏听取了李锡铭、陈希同的报告后，决定当晚召开政治局碰头会。

4月24日晚，李锡铭、陈希同怀揣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参加了李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四点建议是：

一、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

二、中央报刊等“宣传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声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三、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

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常委们在听取了北京市的汇报后，“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关于这个过程，李鹏《“六四”日记》写道：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同志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对处理学潮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昨天中央采取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是老北京，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主动表示愿意找北京市领导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向学生做工作。

“下午5：00，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8：00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

“晚8：00召开的常委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参加的同志有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会的有杨尚昆、万里，还有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局势严峻。首先在北京继而波及到全国的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李锡铭在会上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众发动起来，挽回局势。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散会时已是晚上11：30。”

当晚，李鹏接到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

“明天上午10：00小平同志约我和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4月25日上午10：00，李鹏和杨尚昆到邓小平家向他做了一个“简单汇报”。关于汇报内容，目前仍未见披露。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李鹏说了这样一段话：

“目前北京已发生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事件，长沙、西安出现了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武汉也已多次发生学生在长江大桥游行堵塞京广大动脉事件，

这些都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扰乱了社会秩序。我们常委的几位同志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动乱，必须依法尽快予以制止。”

李鹏《“六四”日记》说，随后邓小平对二人表明了态度：

“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

当天中午，李鹏根据自己的笔记，向秘书口授了邓的谈话要点：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不能让他们目的得逞。这些人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受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苏联自由化分子的影响，起来搞动乱，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采取这些措施，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精神污染，20几天就丢掉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现在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把动乱引到中学中去，稳定中学十分重要。他们会鼓动娃娃起来闹的。工人是稳定的，但其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农民没有问题。还要注意稳定社会其他各个方面。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人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话是可以对的，但不能纵容错误的行动。纵容不能解决问题。

题，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北京市的意见是对的。中央的态度要明确，明确了他们才好办事。

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争取抓紧立法。他们现在就利用宪法中的集会、游行权利来和我们斗。北京不是有个‘十条’吗？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约束他们。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争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然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我对布什说，如果中国允许搞游行，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360天，天天都会有游行，这怎么能稳定呢？没有稳定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如果出现‘团结学生会’，就宣布解散。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惟恐天下不乱，把中国的希望搞成泡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甚至毁于一旦。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对有些人，要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不要卷进去，不要继续搞了。不要等事情发展起来了，怪我们没有打招呼。科技日报内部有争论，要支持内部的健康力量。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报刊编辑要调离，负责人要解除职务，要坚决调离。必要时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骂。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罢课的6万学生中，不少是被胁迫的，被阻碍不让上课的。他们搞的纠察队是非法的。我们要支持那些没有卷入的学生。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出现了‘团结学生会’，要坚决采取措施，先警告，让他们自己解散，不服从就取缔。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一些人诚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吴祖光是第一批挨整的。这次治丧活动处理是好的。现

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昨天的决定是对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据《邓小平年谱》此后还有一段话：

“我们不是讲治理经济环境吗？现在也要治理政治环境。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有。如果没有‘四个坚持’他们就会横行无阻，肆无忌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要分两套班子，一套处理动乱，一套抓日常工作。还是要把主要力量放到建设上来，不能把人都陷到这里面去。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行。行动不能慢，越慢被卷进去的人越多。”

李鹏的秘书根据李鹏口授将邓小平上述讲话要点整理出来后，下午3：00，李鹏再次召集常委碰头会，传达了邓的指示。杨尚昆在会上证明，李鹏传达的邓的讲话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常委碰头会决定，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三大系统副部级以上干部中传达4月24日常委会精神和邓的指示精神。由温家宝责成中央办公厅印发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并及时整理邓的谈话记录，作为传达的依据。

据李鹏回忆，当天傍晚，温家宝给他打电话，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

“为了缩小打击面，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我当即表示同意。我同时授权给温家宝同志，中央办公厅整理邓的那篇谈话稿时，你们认为哪些问题敏感，就先不往下传达。”

这就是后来流传的邓小平讲话有两个版本的来由。据曾听过国家机关工委传达的中国社科院党委委员记忆，邓小平讲话中原来还有：“专政要用起来，流点血不要紧。”这个内容显然没有见诸经过温家宝筛选的中央正式传达文件。

“由于避免了争论，就争取了时间，两个传达稿很快发出了。按照常委会的分工，中央系统是由乔石，国务院系统是由田纪云，北京市系统是由李锡铭同志分别传达的。三大系统的传达都在25日晚间进行完毕。北京市因为身处第一线，在传达时还主动扩大到区县局级干部。为了落实小平同志要给吴祖光、于光远、苏绍智、胡绩伟这些人打个招呼的指示，则由阎明复同志去办。这次常委碰头会还写了纪要，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议。由我签发，把24日常委会纪要和小平同志讲话记录稿密传到平壤，送给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

“24日常委碰头会的纪要和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用密电发到平壤，送给了紫阳同志。他回个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话虽很短，但当时他是明确表了态的。”

据说，当时，李先念正患肺炎发高烧住院。但他在病榻上听完传达的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时，立即要秘书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他完全拥护讲话和社论。几乎在同时，陈云也打电话给小平，表示他对讲话和社论的完全支持。

据赵紫阳回忆，他的确回电同意了邓小平的讲话。但他保留了对常委碰头会纪要的观点，更没有同意《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

事后，赵紫阳把学潮升级的责任推给“四二六”社论，在“六四”后的反“清算”时推给李鹏，其实是为邓小平保留了“后路”的。

第五节 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那么，《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难道不是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起草的吗？日后出版的《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的《“六四”内部日记》显

示，“四二六”社论虽然发表在邓小平4月25日讲话之后，但起草却在邓小平讲话之前：

“（4月25日）中午，秘书室通知：下午2：00在三楼会议室开编委会。原来并不打算开的会突然通知要开，一定有什么急事。

果然，2：00的时候，连正在党员轮训班学习的老谭 和大余 也来了。老钱 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

老钱说，昨晚（24日晚）12：00启立通知今早让他带一位主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到中南海开会。会议只有新华社、广播电视部和我们三家，后来又来了王忍之。启立同志传达昨天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叫我们发表一篇社论，明天见报，用大字排印。社论是针对耀邦同志追悼会以后，首都大专学生的无限期罢课、募捐、准备派人南下串连而发的。

老钱说，常委会议精神，基本上在明天见报的社论都反映了。这个精神，包括紫阳同志出访朝鲜前留下的三点意见：恢复正常秩序；警惕少数人闹事，但要努力避免流血；民主化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加上中央支持各省市发动群众、党员起来打退少数人的进攻。最后这一条，是根据北京市委的要求作出的。

3：30，召开各部副主任，行政管理系统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会上宣布由俞成秀、江世杰、赵连宏和王庚南组成临时小组，负责接待来报社示威冲击的人群。散会时老范 回来了。他是帶著送审社论稿回来的。他还传达了邓小平听李鹏汇报时的讲话。”

陆超祺的这个记载，说明了“四二六”社论的主持者、执笔人，以及动手时间。它没有说原稿是什么时候送审的，可见采用稿不是在报社完成的。但迟至25日下午，社论已经定稿。事后，范荣康对《人民日报》同事说，原来的社论稿是他起草的，但送上去以后就被否定了。他带回的是另一篇稿子。

范荣康看过这篇稿件后，曾打电话给中央，说有些地方“文理不通”。但中央回话说，“不通也不能改”。

根据陆超祺4月25日日记，《人民日报》领导层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范荣康传达的。这说明，此时，中央拟对“三大系统”传达的邓小平讲话稿，尚未准备就绪。

这个时间节点，得到了李云、岳风编辑的《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的证实：

邓小平讲话的当天下午，中央各新闻单位负责人被召集到中南海，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传达邓小平讲话。同时宣布，中央已成立两套班子，李鹏、姚依林主持日常工作，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分管制止学潮和动乱。当晚，邓的讲话被传达到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要求第二天（26日）传达到本单位，27日传达到北京市民。

而李鹏、胡启立急于将邓的讲话传达下去，显然有让邓为“社论”和常委会纪要“背书”的意图。对于一个法理依据有缺陷，政治权威不足的领导人来说，这不足为怪。但匆匆忙忙一定要在赵紫阳回国前传达到群众，的确有造成定局，让赵无法翻盘的嫌疑。

陆超祺的日记，还记载了李鹏《“六四”日记》未记载的邓小平讲话内容：

“邓小平……还讲到耀邦同志的错误。他说，耀邦对反自由化是动摇的。反自由化的时候他下的台，现在还是那些人支持他。又说，对‘两个凡是’，耀邦是反对的，但他同时又保护华国锋。正因为这一点，不能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耀邦同志不够格，我也不够格，我连《资本论》也没读完。我死以后，你们也不要封我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讲了耀邦同志坚持高速度发展经济，如果照他的意见办，现在困难还要大。”

“邓在讲话中，还两次说到，要给胡绩伟、于浩成、苏绍智等人打招呼。”

这段讲话证明，即使胡耀邦追悼会已经开过，在邓小平心里，胡耀邦问题依然没有成为“过去式”。他愠怒未消地提到胡耀邦“保华”，显然是仍在记恨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关键时刻没有站在他一边。这和他利用邓力群但始终未予“重用”一样，是由于在50年代，邓力群曾认为，“林元帅比邓副主席更适合做毛的接班人，因为林会打仗，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把手应该是个会打仗的人”，是同一类型的问题。而且，直到此时，邓小平依然把主张经济高速发展的责任推给胡。由此可见，1986年邓小平的“倒胡”，不仅是出于为了抑制“自由化”浪潮的“公心”，还有巩固个人权力，一路推卸责任的“私念”。不过，邓的这篇讲话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虽然给一部历史文献带来重大缺陷，但它说明邓本人或者其后人，对其中阴暗是明晰的。

4月25日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召开前，对

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

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污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篇社论有四个要点：第一，是把学生和群众在悼念胡耀邦期间和之后，凡与悼念活动无关的行为与纯粹的悼念活动区别开来；第二，是把政治性的抗议行为与刑事犯罪活动混同起来；第三，是把对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攻击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第四，是把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的具体要求与“民主与法制”的抽象概念对立起来。然后，以一个“有计划”的”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的帽子，强加在这场学运身上。虽然，在事后看来，它关于“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反对腐败，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不幸被言中，但它对其中道理的讳莫如深，对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合理合法的参与权利的避而不谈，都表现出一种难以令人接受的“独断”与“专横”。因而，它也是这一不幸结果的原因之一。

社论播出之日，人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似曾相识”。读者和听众从这篇社论中嗅出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镇压前的空气，那段刚刚过去13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仍然记忆犹新。从过程、思路到语言，都如此的相像。只不过上一次是用的“一小撮”，这一次用的是“极少数”；上一次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这一次是以“社会主义法制”的名义；上一次是要保卫毛

主席，这一次是要保卫邓主席；上一次是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这一次是要依靠广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细微的差别，多少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同时也表现了这个党在两个时期的社会基础的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都是蔑视人民的权利，压制不同意见，丝毫没有现代政治的气息（后者只是在利用现代政治的某些概念，而褻渎其精神和实质）；都是迷信武力，采取恶劣的高压，恫吓和“铁腕政策”；都是在企图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倒自己的政敌……不过，上一次还赚得了各地党政军上街游行形式的“支持”，这一次的效用就远远不及了。谁要邓小平一上台就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呢？人们不再相信那个经常叫唤“狼来了！”的孩子。

多年以后，当时家住北京大学的北师大研究生柴玲，还清晰地记得“四二六”社论播出时她的感受：

“当封 和我从食堂走向我们在 28 号寝室的指挥中心的时候，校园里的转播系统突然响了。……我们站在那里，听着播音员歪曲和中伤学生抗议，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人民群众中传播不满，要把全国都带入混乱，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是他后面说的才真的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我看着站在我身边的年轻的学生，他们的脸色既严肃又沉重。政府把我们的运动称作一场动乱，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文革使用的判决词。没有任何其它的运动被冠以动乱的名称，这个名字就代表了灾难的降临。政府也将学生组织称作非法组织，而且指控我们企图推翻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任何中国人而言，没有任何罪名比‘推翻党和政府’更值得千刀万剐的了。

广播还在继续着，整个校园陷入了死寂。好像所有的活物都停止了呼吸，地球也停止了转动。我震惊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全身感觉到第一次恐慌和不安的感受。良久，砸碎玻璃的声音在我耳边像爆炸了一样，一个玻璃瓶被从宿舍窗里扔了出去，砸在了地上。……在 1978 年，当邓小平第三次掌权的时候，人们把小瓶子挂在树上表示对邓的支持和美好的祝愿。然而今天晚上，学生们将瓶子砸碎了表示自己的反抗的心愿。当学生们把所有的瓶

子都砸碎了之后，他们把锅碗瓢盆都砸在桌子上，喊叫着，抗议着。当整个校园响遍了吼叫声、和几百万个瓶子的破碎声时，夜空上方的气氛直冲云霄。

然后从校园传音器上面好几层里我们的学生广播中心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在当今的中国，权力、法律、政府、军队、经济体系、国家、媒体和人民都被一个政党所操控。党政合一，党就是法律。宪法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党章的翻新。为什么在过去的十三年，自从文革结束以后，人民都不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而必须要通过共产党的组织或政府才能够发声？答案很简单：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都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这就是腐败政治、腐败政客和腐败的法律体系带来的结果。这样的谎言难道能永远进行下去吗？为了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一党专政必须结束！’

演讲者是一个长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叫任畹町，他刚刚被从监狱里释放。我觉得他的演讲特别一针见血，但是他马上就被学生领袖们打断了。

‘结束一党专政’对当时的许多学生而言太激进了。学生领袖们不愿意给政府更多的借口去破坏学生运动。他们希望能够推动改革，清理腐败，和提出一些基本的民主运作方式，先从在校园里开始。去推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学生们脑子里面考虑的事。”

柴玲继续回忆道：

“把我们叫做‘一场有组织的反革命阴谋，其用意就在于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太难让我们接受了。我们觉得被误会了。当你被父母误会的时候，你可以离家出走；当你被当地的党的干部误会，你可以向上级申诉，可以去找市里、省里、甚至中央政府。但是当你被国家的最高当局，被国土上的独裁者误会的时候，你何去何从呢？我们于是就又上街示威游行了。”

第六节 西安、长沙打砸抢事件及其影响

西安和长沙，是陕西省与湖南省的省会，是胡耀邦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后者还是胡耀邦的家乡。几乎同时发生在这两个城市的“打、砸、抢、烧”事件，是八九民运“悼念胡耀邦”期间发生在外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史称“‘四二二’西安、长沙打砸抢事件”。由于它们的发生，使决定整个八九民运官方口径的“四二六社论”拥有了重要论据，也是邓小平用兵的最初依据。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两个事件的经过：

首先，在西安，自4月17日起，已成为悼念活动中心的新城广场，每天都有上万人聚集。17日当晚10：00，西安交通大学约1000多学生上街游行。有500多学生“冲进”位于新城广场旁边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大院，要求省政府领导答应“公祭胡耀邦”。经各方疏导，学生于18日凌晨散去。

4月18日下午1：00：西安交大、西北政法大学等校1000多人再次“冲进”省政府大院，其中200多人“冲进”办公大楼。经疏导离开省政府大院。

4月21日凌晨1：00开始，先后有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五、六百名学生再度涌入省政府办公大楼。他们打着横幅，吹着哨子，一起喊着口号，要求与省长对话。上千名群众也尾随其后，进入省政府大楼。个别社会青年煽动学生砸门、砸窗，但没有学生响应。4：30分以后，学生陆续乘各校派来的汽车返回学校。

4月21日下午3：00左右，一部份在广场的学生和围观群众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栅栏，进入省政府大院。随之，大批学生和群众从省政府东西大门相继涌入。人群汇集在十四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停车场。到4：00左右，人数约1万多人。当学生、群众冲进大楼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武警曾先后将六

名走在前面的人强行带离现场，涌在大院的人见状就一齐高呼“放人！放人！”同时有2300多人冲上大楼台阶，试图冲进办公楼，被守候在那里的200多名武警阻拦。据观察，闹事者中有组织的大学生很少，绝大多数是城市待业青年、工人、社会闲杂人员，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既没有口号，也没有讲演，就是起哄……

“下午6：00许，少数不法分子推倒省政府大院临街铁栅栏，冲到办公大楼门前。晚10：30左右，多数学生和群众离开广场之后，个体三轮车夫刘刚、西安高压开关厂工人唐勇、西安华夏美术广告公司业务员孙广虎、包卫等一伙人，用三轮车拉走挂在广场中心旗杆上的一个花圈，边走边喊，狂呼乱叫，行至闹市区东大街时，尾随围观群众超过千人。此时，混杂在围观群众中的一些社会渣滓，开始对过往公共汽车、电车、出租小轿车投掷石块，砖头砸碎车窗玻璃，推翻路面隔离墩和人行道上的垃圾箱，砸坏三个交通岗亭，从而全面拉开了这次打砸抢烧事件的序幕。”

“晚11：15，不法分子在解放路企图抢劫西安金店，因店门结构牢固而无法下手，便转而冲向对面的解放百货大楼，砸碎三个橱窗和里面陈列的化妆品；晚11：30，一些不法分子冲入火车站广场，砸碎12个夜间商店的营业柜台，哄抢了价值1000多元的商品和2000多元营业款。还破坏了旅客接待站、出租汽车调度亭。晚12：00许，一些人冲入候车大厅，砸烂6个营业柜台，抢走高档香烟等商品。由于公安干警采取果断措施，当场有18名罪犯被抓获。”

4月22日，上午10：00，胡耀邦追悼会实况转播在新城广场播出。从这时开始，人群中就有人向武警和公安干警投掷砖块、石头和皮鞋。随后，有人反复冲击省政府大院西门。下午1：00，广场聚集约10万人。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工人、社会闲散青年、机关干部。武警部队已作好充分准备，在省政府大院内，“准备了大量高压救火车”。“人群向省政府民警投掷砖块，武警动用了警棍”。这时，有“执勤人员开来两辆卡车，堵住西大门”，阻挡人群冲击。下午1：30，不法分子……点燃了一辆卡车上的篷布，纵火焚烧

省政府信访室、传达室。 2：15，民警已开始用高压水龙头冲击省府西门人群。西门传达室已被砸烂。

下午2：30西安市发出《通告》和《紧急通告》，在新城广场反复广播，要求围观群众迅速离场。严正警告不法分子立即停止破坏活动，否则后果自负。但3：00许，仍有人群冲进省府办公楼。歹徒们再次点燃了封堵在西大门的一辆卡车，火柱达几米高，与正在燃烧的两侧传达室及相接的新城饭店连成一片。省府大院墙已被推倒一段。前往灭火的消防车被砸坏，消防战士被打伤。4：32，执勤人员开始驱散围观人群。 目击的记者称：

“放火的不是学生，是社会闲散青年。民警把树上围观的人拉下来用警棍皮带打伤四、五人。还有十多人被拉进政府大院武警中队驻地，拳打脚踢，打得躺在地上。有的民警从院内出来，也被人群追赶猛揍。”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西安市委本次事件的一线总指挥孙殿奇事后在向中央汇报时，也证实了以上情况：

“现场指挥部门和省市领导层虽一再强调不要打人，但被抓的人当时几乎都遭到了棍棒、皮带、拳脚毒打。孙殿奇说，在当时情况下，素质较差的武警战士和部分公安干警被激怒了，打红了眼，这种违反纪律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

下午6：10， 一辆乘坐台湾同胞的旅游车路经广场时，车窗玻璃被闹事者砸破，个别台胞受了轻伤。

晚7：00以后，少数不法分子又推倒临街围墙和铁木大门， 冲进省检察院和省高级法院办公院内，烧毁了停放在院内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并把车库内的三辆汽车推进烈焰中，还纵火烧了存放汽油、煤气罐等物资的库房，砸坏办公楼一至三层部分门窗、玻璃，并冲进办公楼，疯狂毁坏办公用具、砸电器、烧文件、抢财物。 随后，轻工厅供应处仓库被砸开，继而被点着。

晚9：00以后，被强行驱散的少数不法分子继续进行破坏，西安飞机场炊事员李自发、西安电机厂工人李永安、市塑料一厂工人曹磊等一些不法分子，窜到新民街口推倒了在建的省市民主党派办公大楼的临时围墙，砸碎雅园商店门窗，烧毁一辆公共汽车，冲击电讯大楼。

当新城广场的打砸抢事态基本得到控制后，被驱散的少数不法分子从新民街口向西华门什字逃窜，一路推围墙，砸商店，烧汽车。到9：40左右……天天时装店遭到雨点般石块的袭击……几十个不法分子……从窗口跳进店内，打伤值班人员，将成捆的时装扔到窗外，抢走……一家仅有80平米的高档服装店被砸抢一空，损失约20多万元……

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通过陕西省委给中央的电报，对这一天的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22日晚，陕西省委给中南海的电报触目惊心，紧急电报称：今天下午，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新成广场有六百名左右大学生集会，引起两万多人的围观。17：00左右，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焚烧了两辆汽车和五间房子，并与警察发生冲突。17：30左右，在学校领导和教师组织下，集会学生陆续返校。20：00，武警部队对广场实行交通管制。不法分子逃跑时，又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烧汽车，抢劫商店。十八名不法分子被当场擒获。24：00西安局势基本恢复平静。”

不知什么原因，陕西省委给中央的这个报道，把事件发生的时间，推后到了政府镇压以后？而对西安打、砸、抢、烧事件损失的统计，却远远低于其他文献记载？请看《癫狂的蛇年之夏》：

“在这次打砸抢烧事件中，不法分子共烧毁、砸坏汽车13辆，摩托车2辆，烧毁房屋20间，破坏商店14家，还毁坏了不少办公用具和其它物品，直接造成经济损失120多万元……打伤武警和公安干警213人，其中重伤38人……事后公安机关共逮捕57人，其中主犯王军……判处死刑。”

为了廓清西安学生运动与“‘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的关系，《癫狂的蛇年之夏》特作出三点评述：

第一，“4.22”事件事实上是从4月21日晚就开始。当晚，不法分子拉着学生放在广场的花圈，沿街打、砸、抢直到火车站。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学生并没有在场。

第二，22日上午10：00许，不法分子就开始寻衅闹事……大专院校的队伍是下午1：30左右才陆续进入广场，他们有组织地集中在广场正面和东侧……而滋扰闹事，主要发生在广场西侧……

第三，学生看到打砸抢烧的不法行径后，许多人表示震惊和不满……于下午3：30和5：00左右……先后有秩序地退出了广场。

然而，《中国“六四”真相》记载，被打的人中也有学生：

“据了解，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院校一些学生被抓，部份学生已返回学校。他们头上缠着带有血迹的纱布，有的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一些学生下落不明。许多学生看到这种情况议论纷纷。有的学生说：太惨了！太惨了！没想到警察这么凶，不但毒打无辜的学生，而且还打伤了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的说，被抓的人已失去了反抗能力，共产党历来是讲政策的，但为什么还要当众用皮带、木棍毒打他们！”

这些学生是在何处被打？在什么情况下被打？被当做什么人被打？记者见闻也没有遗漏。它告诉我们，曾“有31名学生因围观与不法分子混在一起，也被执勤人员强行带离现场。”

4月22日发生在长沙的情况，与西安有不少相似之处：打、砸、抢发生地点同样是在市中心广场和火车站广场，不过没有针对政府的攻击，历时稍短，只有6个小时（22日晚7：00至23日凌晨1：00）。“凌晨1：00，一队队荷枪

实弹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紧急出动，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共擒获百名不法之徒。” 其中有27人（工人6人，个体户4人，停薪留职人员1人，还有农民、无业者）受到法律惩处。湖南省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红因煽动烧毁摩托车，殴打了民警，并伙同不法分子砸了长沙市旅游产品服务部和长沙凹凸彩色印刷厂门市部的卷闸门，砸了省五交化公司的一辆小轿车，造成损失达2.3万余元，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余26人分别判处1至15年有期徒刑。

据官方声称，长沙事件的损失是：

“21名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被打伤，5辆汽车被砸坏，32家商店被抢劫……经济损失达56万余元”。这一报告明显严重于事后对有关人员的判刑依据。

据称，白天上街游行请愿的学生在事件发生前的下午5：30返校。但在被“带离现场”的百名不法分子中，“有3名大学生”。

但是，也有谣传，长沙市民中有许多人曾目击武警和公安干警在出动前两个小时就整装待发了，但奇怪的是迟迟没有行动命令下达。直到长沙最繁华的街道——黄兴路被洗劫，事件终于蔓延到数里以外的火车站广场。当然，我们也可以读到某些例外：一是当一名女大学生要遭暴徒凌辱时，“三位壮实的汉子排开人群冲了进去，挟起那位女子……冲进蝴蝶大厦……掏出证件：‘我们是公安局的’”。另一件是凌晨，一伙歹徒试图把一辆载有妇女儿童的汽车推翻、点火时，“10名公安干警及时赶到”。

——这些事件又使人感到：到底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公安是有力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

于是，问题就在于：谁命令他们拖延？蓄意扩大损失的意图为何？

总之，由于新闻的管制，更由于官方在“四二六”社论中利用西安、长沙两地不法分子的刑事犯罪事件，对学运笼而统之地定性为“动乱”，在社论发布当时，就有人贴出大字报，呼吁人们《警惕新的‘国会纵火案’》。人们感到奇怪的是，在“四二〇”新华门事件的《通告》出来之后，也就是官方明确提出对“打、砸、抢、烧”行为实行制裁之后，在北京——本次学运的中心，并没有发生任何一件比呼喊“打倒共产党”更严重的事件。而恰好是在赵紫阳“三条”给出的“宽容”、“忍让”政策的时间下限到来以前，在西安，偏偏就发生了“打、砸、抢、烧”俱全的事件？而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救火车的准备——易燃物（两辆带蓬卡车）的送达——点火”的顺序被安排得天衣无缝？一个奉行“专政”的省政府和公检法部门，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几次三番地让上百号人进进出出？警察殴打学生是个人行为，还是蓄意激怒学生令事件升级的行为？孙殿奇承认的“事后逃逸”的闹事者是一些什么人？是“逃逸”还是有组织完成任务后的“安全撤离”？西安市的建筑外墙怎么就那么容易被“推倒”？……联想到“新华门事件”中那些被身份不明者扔向战士的鞋子，以及来历不明、不知去向的“上访妇女”……总之，“国会纵火案”的联想，无疑加深了政府与学生及社会之间的不信任。

而不信任，是走向对立的开始。

在西安，因“‘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的出现，学运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从4月23日起到4月30日，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的《惊心动魄的56天》中，基本没有关于西安学运的报道。新华社直到4月30日，才又有关于“西安大字报开始增多”的内参报道。该报道还透露，“四二二”动乱之后，各个高校都将大小字报“全部撕掉”。所以，不论政府发言人如何说，他没有说是学生在搞“动乱”，他谨慎地把学生与不法分子区别开来，而客观后果是，学生运动因此而遭到粗暴镇压！他们的合法权益被无理践踏！

第七节 赵紫阳政治天平的倾斜

“四二六”社论把学生推到了对立面，为自己树起了一个假想敌——方励之，同时，也分化了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然而，赵紫阳只对于北京市委和李鹏们的积极行动作了充分的估计，但似乎直到生命末年，仍认为，邓小平不仅与他意见一致，而且对他是信任并支持的。他和他的团队都认定，邓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一个“受蒙蔽”的人。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这样谈到：

“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

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4月25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开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议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

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前文说到，赵是从基层提拔到中央的干部，富有实际经验，但在中央缺少盟友，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时，经邓小平做工作，曾取得杨尚昆和万里的支持。鲍彤回忆说：

“赵当总书记的时候，邓找过万里。万里原来是赵的上级，他当地委书记的时候，赵还是他下面的区委书记。邓对万讲，要他全力支持赵，他答应了。杨也是赵的上级，邓也找过他，要他全力支持赵，他也答应了。赵当时觉得，有这两个人的支持就行了，其他人怎么样都不重要。”

当然，万里和杨尚昆支持赵紫阳，应该是有前提的。因为在答应支持赵紫阳之前，他们还有各自的历史。

万里，1916年12月生。山东东平人。据说原本姓张，幼名秀峰，学名万明礼，万里是参加革命后的化名。1933年秋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即曲阜第二师范学校）。这种初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道德取向和侠义风格。1936年，万里在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一所现代的综合小学教书，秘密发展中共地下组织。之后，他受党组织派遣，回故乡宣传抗日救亡，几年后成为家乡县的工委书记。按资历，他比在邻近的河北省担任县委书记的赵紫阳稍老一些。

1940年后，万里担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1947年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像赵紫阳一样，万里第一次引起邓

小平的注意，也是在1946年他领导晋冀鲁豫军政期间。万里在地方工作中为刘邓大军提供后勤服务，在诸如筹粮、运输支前方面，展示了突出的才能。

1950年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时，万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进京，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1956年万里同时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负责北京市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天安门广场周围最著名的建筑项目，包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为此，毛曾开玩笑说，这个人“真是日行万里啊！”被传为一时佳话。1959年9月至1977年11月任北京第二至四届政协副主席。

图4-7：1958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审查天安门广场设计方案。左六为万里。（选自《爱思想》网站）

由于万里长期主管建设工作，及其实际能力，在文革期间，他较早地被“结合”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1973年5月，万里出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在北京市长达18年的任职经历，决定了他与北京市剪不断的人脉关系。这是我们理解，在1989年4月25日，他会代北京市委向李鹏建言的原因之一。

1974年12月，在长沙开会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了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的任命。这项任命的建议者，是已经受命准备“重整河山”的邓小平。就此开始，在胡耀邦、李昌轰轰烈烈整顿科学院系统期间，万里对经济战线问题最严重、最棘手，也最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铁路进行了整顿。

万里上任一个多月，就抓住了制约铁路整顿工作的“瓶颈”——“派性”问题，请求中央发文件，授权镇压控制着徐州铁路枢纽的革命造反派。为此，中央获得毛泽东批准，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1975]9号文件）。9号文件把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了万里和铁道部手中，从而打破了徐州铁路枢纽管辖权重迭的死结。在整顿中，雷厉风行的万

里运用“土改”斗地主的经验，打掉“派性”顽固头子的气焰，敲山震虎，立威立法，震动全国！

为了打消人们对新方针的顾虑，使“派性”不至于卷土重来，万里派出的工作组宣布为徐州地区在“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大约6千人平反，释放在押人员。同时对派系斗争中受害者及其亲属赔偿道歉，为过去受到冤枉的人重新安排工作。为了让铁路工人完成指标，万里鼓励当地领导班子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仅仅用了12天时间，徐州的问题就基本搞定。到3月底时，据当地新接手工作的领导班子汇报：徐州平均每天办理的车皮数从3800个增加到7700个，日均装载量翻了一番，从700个车皮增加到1400个。

“徐州经验”在全国铁路系统推广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与此同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也把“徐州经验”推广到煤矿和钢铁业，对经济战线实行全面治理整顿。

之后，万里又受命从铁路转向对江苏全省进行整顿。不到三个月，万里就报告说，在整顿江苏的新领导班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经邓小平和万里等人的努力，1975年全国前八个月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平均增长17%。

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被称为邓小平推行“治理整顿”的“四大金刚”的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张爱萍都受到了批判。1976年毛泽东丧事期间，万里与邓小平、胡乔木、张爱萍、胡耀邦一道，被排除在参加悼念活动的名单之外。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粉碎“四人帮”后，万里重获党和国家的重用。1977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又任命万里担任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安徽省委书记。

1977年8月，万里刚到安徽，就用了十几天时间视察该省的主要农村地区，与当地干部谈话。他目睹了普遍的贫困现象，村镇到处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简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连木头桌子也没有，只有泥砌的桌子。

他曾对随同他视察的孩子发问，共产党掌权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情况还是如此糟糕？

在中央的政策和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仍然明令禁止和反对“包产到户”的背景下，经过亲历亲闻，万里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调研成果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解决安徽农村问题的“省委六条”。这一方案建议：（1）生产队根据自身条件，只要能完成生产任务，可以把一些地里的农活安排给生产小组甚至个人；（2）上级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3）减少给生产队和个人下达的定额；（4）实行按劳分配，放弃按需分配；（5）粮食分配的决策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6）允许生产队的社员种自留地，在当地集市出售自己的产品。1977年11月，万里召开安徽县委书记会议，明确宣布“任何妨碍生产进步的做法或政策都是错误的”。干部要依靠实践找出最好的办法，要充分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他以解决徐州铁路困局表现出的魄力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气概，打消了那些担心此举会被批为“搞资本主义”的顾虑。使政策得到贯彻。1978年初，万里又允许各地继续缩小生产单位的规模。在饥荒仍很普遍的风阳县，实行了“包产到户”。

图4-8：1978年秋，万里在安徽农村参加劳动。前左二为万里。（选自《爱思想》网站）

1978年2月1日，从缅甸前往尼泊尔访问途经四川的邓小平，对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介绍万里的“安徽六条”。其时，赵紫阳已经允许生产队“包产到组”，只是他不像万里走得那样远，没有允许包产到户。

当时，主管农业的陈永贵副总理指责万里暗中搞包产到户。报纸依然延续文革极左路线的惯性，批评万里反对“学大寨”，搞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试行分散经营权的地区取得的丰收，使万里很快赢得了党内支持。1978年11月在先发制人的陈永贵面前，万里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你说自己是从大寨经验出发，我看大寨不过是个极左典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别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我也不把我的观点强加于你。谁对谁错，咱们不妨走

着瞧。”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在邓小平、陈云，以及后来的胡耀邦等高级领导人支持下，特别是在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持续快速增长的事实，终于扭转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成见。农户经营的样板在全国得到推广。1958年成立的农村人民公社，于1983年10月根据中央35号文件被正式解散。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后，确保农户享有无限期的“承包权”进入新修改的宪法。

经万里有力推动的“包产到户”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制度压抑下的生产力，不仅结束粮食短缺、提高农民收入还导致了经济作物（如棉花、亚麻、烟草）和肉蛋蔬菜的增加，提升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由此，万里的名字也深深镌刻在该时代的丰碑上，成为每一个为新时代的进步而欣喜的人们心中的英雄。有人直言不讳地把中国“80年代改革”称为“邓胡赵万的改革”。

从1980年至1988年，万里历任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很明显，在邓小平的政治棋局中，三个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都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胡耀邦后来被提拔为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成为总理，后又转任总书记；而万里却没有获得与他的功绩和能力相称的职务。因此，在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有意让万里进入政治局常委，担任他完全能够胜任的总理。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甚至有意将自己储备的智囊推荐给万里。

但是，邓小平的这一意愿没有实现。有谣传说，关键在于赵紫阳的不同意见——他并没有直接反对万里进入常委，只是在邓小平提名万里“入常”时，他没有附议。他提出了自己的人选——他从四川带来的田纪云。

据赵紫阳在广东时期的老部下，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萧洪达回忆：在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万里任常务副总理期间，万里曾提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中央经济小组秘书长的杜星垣任国务委员，但“赵没有点头”。

据此，有人认为赵万之间有“瑜亮情结”，另有人认为赵有专制倾向。

为澄清这个事实，老记者张广友和杨继绳曾访问过赵紫阳。据杨继绳记载，赵紫阳作了这样的辩解：

“外面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六人小组’，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组’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有人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

“传说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万不能进常委后，邓曾和我交换过意见，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六人小组’也不赞成。这时邓

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做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

“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六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老张问：李鹏是怎样当上总理的？

“赵答：总理人选只有李鹏一个人。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田纪云嘛，没有人提他，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说我提田纪云，没那么回事。对李鹏当总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邓说：‘他年轻，知识面广。’不知道小平怎么认为他知识面广。（杨问：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在考虑李鹏当总理时，有人担心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就提姚依林。小平否决了，说姚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

“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的事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

在这个讲话中，赵紫阳忽略了邓小平让万里“入常”的背后动机：“入常”只是出任总理的必要条件。常委中没有虚职。也不可能设想一个不“入常”的人可能担任总理。这一点，可以由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的如下回忆得到证明：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邓小平的这个提议目的再明确不过：薄一波——中顾委；赵——总书记；杨尚昆——军队；万里——总理。

此外，在邓小平那里，即便真的提过田纪云，也不可能一连被否定两个人。即便姚依林对万里有过议论，他又何尝不是“被决定的一层”，而不是决定的一层？赵紫阳承认，邓小平让万里找人谈话，改善关系，他是其中之一，这至少说明，在“十三大”后万里的职务安排上，他不是促“进”派。

在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三人中，胡耀邦出生于1915年，万里比胡耀邦小一岁，比赵紫阳只大三岁，而且身体不错。既然1907年出生的杨尚昆可以取代1909年出生的李先念，1917年出生的姚依林可以入常，1916年出生的万里并非完全没有出任总理的可能。如果万里当日顺利出任总理，在中央高层改革派力量的对比将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格局。不但不会有“新华门请愿”导致的事态恶化，不会有“四二六”社论的出台，连整个1989年的历史都会改写。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正如傅高义所说：

“尽管他们三人 是为邓小平效力，但他们并不是朋友”。

但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赵紫阳似乎忘记了这段历史，而只记得自己出任总书记时万里答应过邓小平支持他。而这种支持，不必是“互相”的。因此，在4月25日整个事件中看不出任何被动迹象的万里，在他们眼里，也是“上当”的人。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

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赵紫阳对局势的看法比邓小平、李鹏和北京市委戴着“阶级斗争”有色眼镜作出的判断更客观。依据这种判断所作出的对策，无疑更符合现代社会治理方式，是可能产生良性互动，并有助于打开“政治体制改革”新局面的。

但他的问题大概在于，对于邓用“个人权威”支持他的改革所寄予的希望过大，而轻视政治局常委团队支持的意义。非此不能理解，他明知北京市、教委和李鹏等人有可能做手脚，而排除异议决意访朝。他的悲剧在于，在邓小平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希冀这个现实是虚幻的；在高层（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指望这只是李鹏等个别人在起作用。

第九章 走向高峰的学生运动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郑仲兵、张明澍、苏晓康、浦志强、仲维光、封从德、李进进、张伟国）

在悼念胡耀邦活动中产生，借“新华门事件”的压力而凝聚的北京市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自诞生以来，就使零散无节奏的学潮开始转变为有规模，有气势的学生运动。第一次亮相，它成功地领导了“四二二”和平请愿之后的北京市高校6万人的统一罢课；随后，“四二六”社论又对它提出了新的考验。

第一节 高潮再起

“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当即引起了两个方面的紧急反应：

在一方面，是作为“核心力量”的各级党政领导与作为依靠力量的“积极分子”。他们比广大学生更早地得知了党中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讲话，当日下午就进入了紧张而兴奋的状态。李鹏4月26日的日记记载：

“《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4月25日下午4：30，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市委书记李锡铭主持。何东昌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要点”。当晚，市委召开区县局、高校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指示。邓小平“讲话精神”及市委向中央汇报的

提纲。同时，国家教委也召开了部分高校党委书记座谈会，教委所属高校和其它一些重点高校的党委书记及京、沪市委教育部门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强调，要通过艰苦的工作，“用中央的精神来提高和统一广大党员和师生的认识，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动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能让步。”晚7：00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四二六”社论后，仅过了两个小时，“21：00，国家教委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和领会好这篇社论的精神。同时要发动党支部组织干部、党员、教师和中学生的积极分子学习社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该《通知》还以高度的阶级斗争警觉性警告人们说：

“有迹象表明，有些罢课学生已开始向中学串联，值得严重注意。要记取文革中的教训，决不能让他们把娃娃鼓动起来。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制止。”

26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万名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反对动乱”。李锡铭在大会上讲话指出：“部分学生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以后进行的贴大字报。搞串联、组织‘战斗队’、成立非法的学生组织等活动，是在制造混乱……我们对这场动乱不能再容忍了。不坚决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他要求全市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发动全市群众同少数打、砸、抢、烧的人进行坚决斗争；严禁在街头等公共场所张贴标语，演讲和进行其它非法活动；要坚决取缔非法组织，各单位不得为这些组织提供进行非法活动的场所；要严格禁止串联，特别要注意保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并要“全市党员带头做好家属及子女的工作，以防上当受骗”。

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前，北京本来没有发生打砸抢事件。但蹊跷的是，第二天——“四二七”游行当天，就发生了北京邮电学院的工商银行储蓄所被抢劫事件。

在另一方面，是被作为整肃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强烈愤慨和尚处在旁观状态的社会各界的不满。

陆超祺1989年4月26日的日记记载了《人民日报》当天收集的信息：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把广大群众，主要是青年学生悼念耀邦同志并藉以提出的政治民主，反对官倒，反对腐败的正义行动，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引起强烈的反响。据科教部和驻省市记者反映，说社论好话的还没有，说社论错误的、不同意评论观点的很多。总编室和办公厅接到的电话不断，没有一个是肯定社论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同意把动乱的原因归之于学生游行示威，不同意把学生悼念胡耀邦说成是动乱，反对扣帽子，打棍子。二是认为学生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是广大群众所关心和议论的问题，如民主问题，官倒问题，腐败现象问题等等。社论对这些问题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却一味责备学生，而这些问题正是动乱的根本原因，一天不解决，动乱总会潜伏着。……按照宪法，公民是有这个权利的。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明白‘动乱’的含义。尽管社论把广大学生和少数搞动乱的人分开来，但广大读者都清楚这只是一种策略。既然认为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为什么要那样大张旗鼓地动员全党全民起来反对‘动乱’呢？这岂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吗？

昨晚电台、电视台播完社论不久，首都大专院校就有反响。

……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27日（明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会合，抗议‘四二六’社论。

晚上，新华社和本报驻京沪记者，分别发来京沪市委召开党员大会，动员干部党员群众学习‘四二六’社论，打退动乱的报导。严格说来，属于老套话，有些话经不起推敲……27日凌晨，《科技日报》总编辑来电话谈起这个问题，他说他是违心地签字发稿的。

违心地签字发稿的岂独他一个人。

《新华社》还发来京沪各一则综合各界对‘四二六’社论反应的新闻，……凡是尖锐地批评学生的话，都没有说话人的姓名，有的连单位名也没有；凡是有名有姓的都是比较中性的话。这显然是有失真实的，是按照领导意图编造的新闻。给新华社一位负责人打电话了解，知道这两条新闻不是上面指定的，决定不用。”

25日当晚，中央电视台播出“四二六”社论的“新闻联播”刚结束一个小时，北京农业大学就贴出了《有感于中央对学生运动的结论》的大字报，呼吁“哥儿们，姐儿们，爷儿们，赶快把书扔到火炉里吧！去当倒爷吧！去醉生梦死吧！去放纵淫荡吧！”

北师大中文、历史、教育、心理、经济、数学、哲学、生物8个系（各系百人左右）的学生，刚刚听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的社论后，便聚集在校园里高呼口号，之后数千人举行了校内游行。政法大则有500名学生到街头演讲。

20：30，于当日下午刚刚改选完毕的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由孔庆东、王池英、封从德、王丹、沈同等5人组成的工作班子也开始工作，他们第一次用设在28楼的自己的广播站向全校广播了三点声明：（1）我们学生运动一不反党，二不反宪法，我们的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学生运动决不是所谓动乱。（2）我们将继续罢课，让新闻界作出公正报道，严惩打人凶手，要求新闻立法，实现新闻自由。（3）我们反对打、砸、抢，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捣乱破坏。一位演讲者指出：

“我们只要翻翻历史就很清楚，《人民日报》曾发过无数社论，但是有几篇社论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特别是在每个历史的重大关头，《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几乎无例外地成为反面教材！”

21：00许，民院、人大有2000多学生在院内游行、演讲，北航有3000学生集会，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演讲。就在国家教委的《通告》发出两个小时以后，各校学生也收到了新成立的“北京高校自治联会（北高联）”的《通知》：

为抗议“四二六”社论，27日决定举行全市大游行！

据官方统计，25日晚，自社论广播后，北京市高校有7000人顶着高压的政治空气上街游行。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主要是：抗议污蔑；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坚持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学生爱国，爱国无罪；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北京日报》胡说八道；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为求自由，为求民主，决不动摇。58所高校贴出1270多份大字报。它们不仅宣泄了愤怒的感情，而且据理力争。一篇题为《评〈人民日报〉社论》的大字报写道：

“我们并没有违宪。第一，《人民日报》没有权力决定我们这次学生运动是否违宪，根据宪法67条，由人大常委及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关于违宪的决定和判决，才有法律效力，《人民日报》社论只是一家之言，有诽谤之嫌。第二，《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学生违宪必须以具体事实为依据，以具体法律条文为准绳，他们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即为造谣诽谤。第三，并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学生是违宪的。

1、根据宪法41条，公民对政府和任何国家机关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十几万公民的和平请愿，违宪在哪里？同样根据41条，对公民的申诉，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抑和打击报复，这又是谁违宪呢？社论以极个别人呼喊反动口号否定大多数人的正义行动，这无异于以少数共产党员的腐化来证明共产党的不可救药！

2、根据宪法第35条，公民有结社自由。在没有结社法的情况下，试问根据何法认为广大学生自动选举出的学生筹委会是非法社团？根据北大学生会章

程第34条规定，不承认不能代表广大学生正当权益的‘学生会’是全体学生的权力。根据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如果把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为目的的有组织的学生和平请愿活动认为是动乱，那么宪法的权威何在？

.....

第四，在争取宪法权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履行宪法义务，我们建议开展护宪运动。

1、维护宪法尊严，切实赢得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2、在宪法允许范围内开展运动，根据宪法第38条，公民人格尊严不允许任何人加以侵犯。”

一首题为《我曾经爱过的女人》的诗歌写道：

“我刚懂事时，就爱上了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可昨夜的风/吹掉了你温情的面纱/露出了一张40岁女人/奇形怪状的脸/地上所有冤屈的泪水/冲掉了你浓浓的脂粉/你女妖般的淫威/让我颤栗地感到/天空中滚动着黑色的太阳/月亮早已成为乌鸦的翅膀/吸血蝠一样吮吸所有的光/只有苔藓植物/才能疯狂地生长/于是我终于相信/40年时间足够了/连大理石也会腐烂”

西安、长沙也出现反驳“四二六”社论的大字报。称社论“谎言连篇”，并酝酿新的抗议运动。

这些校园舆论充分表明，“四二六”社论不仅没有对学运和知识分子起到弹压的作用，反而把胡耀邦追悼会后由于失掉初始依据而势头渐弱的学运重新煽动起来。这一判断的另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四二六”社论见报的第二天，学生运动为自己书写的最伟大、最精彩，同时也最令人广为传颂的一笔。它彻底扭转了社会舆论中开始还对之抱怀疑、轻视态度的部分，它使自己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中，而胜利者的形象又为之赢得

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就是“八九民运”中唯一的一次，被所有传媒不约而同地称为“大游行”的一次学生游行。

第二节 艰难的二次出发

但是，“四二七”游行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4月25日晚，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前，“临时学联”已决定27日举行游行。游行针对的，仍是“四二二”大会堂请愿遗留的问题。这个消息，当晚便以“新学联一号令”传达到各个学校。从有关记录看，通知发出的时间是在当晚11：00以后。

根据25日晚“临时学联”全体委员会决议，4月26日，他们在政法大学主楼前广场召开了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于上午9：00召开。会场的大标语写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二千多名学生，上百名中外记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临时学联”主席周勇军宣布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的成立。该会的宗旨是“民主、科学、自由、法制、人权”。临时学联采取的斗争方式是“和平请愿”。

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向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

- 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
- 二、要求公安部长王芳就“四二二”新华门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
- 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新华社“违反新闻报导真实原则”，对“四二二”事件的歪曲报导道歉。

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说，“我们不会放弃所提出的争取民主、人权、自由和法治的要求。如果政府不同意对话，我们就上街游行。”

一位女学生说，“我们从未号召推翻共产党或政府。我们学生进行的是和平的、爱国的抗议活动，‘四二六’社论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一位藏族学生说，“政府必须承认我们的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不反党。他们曲解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要斗争到底。”

当外国记者问到对《人民日报》社论的看法时，周勇军回答说：“《人民日报》社论是造谣污蔑，只能是激化矛盾，是政府压制学生。”

当香港记者问《人民日报》社论是不是发出警告，要进行镇压时，他们回答：“我们认为是警告，是恐吓，我们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政府采取强硬行动，我们提醒政府，玩火者必自焚。”“《人民日报》社论把我们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动乱，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新学联还公布了北京高校决定于4月27日举行大游行的消息。游行的统一口号十条：“（1）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2）民主万岁；（3）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4）维护宪法；（5）爱国无罪；（6）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7）人民万岁；（8）物价稳定；（9）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0）人民警察保护人民。”到广场后的口号是“要求对话”，游行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临时学联为这次游行制定的路线，有意避开了穿过繁华的西单商业闹市区。

图4-9：北大三角地贴出427游行通知（选自香港《明报》月刊）

据封从德回忆，决议“四二七”游行的过程“非常复杂”。在这个过程中，“北高联有反复，北大同学有反复，我个人也有反复”。他说：

“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决定‘四二七’游行是在‘四二六’社论出来之前。北大当时非常不满北高联组织这样的游行，认为北大同学已经游行

游得太累了，因为北大离广场最远。而高联是设在师大的，所以可能有这种本位主义的原因。……但是，4月25日晚上的新闻联播，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把‘四二六’社论给漏了出来。这个时候北大同学的情绪马上反了过来。开始我在筹委会里边是反对游行的，但我相信学生要想出去的话，我们就应该支持出去。我的一个信念是，运动应该是大家推着组织者走，而不是由组织者拉着大家走，最多快半步。北大筹委会26日开会，讨论是否参加‘四二七’游行，到这个时候北大还在强调自治权。到了下午分筹委会和部长联合会议，就是北大筹委会的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北大筹委会的五人常委先做了一个表决，当时的表决结果，我记得是三比二反对北大同学出校门。当时我就有点着急。因为我读了些大字报，感觉到大家的情绪已经反了过来，同学是想出校门。如果北大筹委会去阻止的话，那么可能要被同学抛弃掉，因为这个组织在头一天已经表现不佳。这个时候我就提醒扩大会议的分筹委会和部长会议加上秘书处，我跟他们讲，根据我们章程的民主程序，可以由八处联名提出否决案，三分之二还是二分之一通过了就可以推翻常委的决议。最后是推翻了，北大的同学才这样出了校门。虽然我相信即使是做了决定不让出校门，同学们也会出校门的；但是，‘四二七’，这个中国历来最大的一次民主示威，如果北大因筹委会决定而出不了校门的话，那将成为一次历史的笑话。

这个反复的过程，使我对民主的原则、民主机制，有了更多的信念。由此，我就更相信当时自认为的民主原则——现在看来有点泛民主——我一直就坚信这个信条，重大决定应该由更多的人来做。这种作风后来一直带到广场，包括广场的营地联席会议，有三百多个学校的代表参加。”

关于北大决定是否游行的过程，沈彤的回忆更道出了另一层曲折：

“大家都知道张来武，这是各校团书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明显是同情学生。但是他们建议，就是北大校方和团系统，建议北大筹委会不要游行。这是一个条件，如果北大不游行，北大校方和团系统将以正式的方式帮

助学生和政府之间搭桥。所以这也就是后来北大筹委会下面的各部，甚至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叛徒。在这之后，基本是两方面，一个是大会，系大会决定游行，另外一个是我与孔庆东等于是代表学生和校方做了一个协议，所以才出现了4月27号早晨，我们又开紧急会议。”

沈彤当时提议，游行只到双榆树，然后回北大。这样既表示了抗议，“把邓小平的高压政策打破了”，又“给校方留下今后对话的余地”，而且“不影响市区内的一切活动”：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说要盯住王丹，说王丹，你到时候一定不要反悔。王丹说，我不会的。所以‘四二七’，北大的领导层包括王丹在内，都没有主张再往前走的。‘四二七’最后形成全市大游行是其它学校的功劳，不是北大的。”

王超华的回忆则说明了北高联“四二七”游行决定的出台过程：

“（4月25日）当时做的一个决定，就是4月27日要游行。同时我们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有重要广播。……（出席会议的北高联常委）一会儿又出去，再回来就说：“上边来电话，这次的原则是‘三不’，不打，不抓人，不什么。所以咱们就游行，不要紧的。”一会儿说，休会，一会儿又说，‘上边来电话了，呆会儿有重要广播。’

所以，那些中、小院校意见纷纷。我当时一个重要印象就是：这常委行啊，有内线。

……（四二六社论）广播之后同学们非常紧张，说‘那我们还要不要游行？’‘还要游行，但是还是那三条，如果堵截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就冲出去继续游行，堵截非常厉害，就在校内游行，要是校内控制也特别厉害，就在校内绝食，原地绝食。’后来，我们就说，‘你们大学有大操场，你们可以原地绝食。我们那小学校一共五百人，一共就俩人在那绝食的话，那……？’后来就说，中、小院校往大院校合并。这是对付‘四二六’社论，

因为本来光说是有重要广播，大家都觉得这是中央对学运的态度，而且刚说那‘三不’，所以都觉得‘四二七’游行没什么问题，一听这杀气腾腾的社论，都非常紧张。25日的代表会基本上就这样。”

王超华提到的“三不”，很可能与邓小平讲话以后高层对局势普遍出现的担忧有关。据赵紫阳《改革历程》回忆，：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

王超华继续回忆道：

“根据4月25日代表会的决定，4月26日早晨召开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还是在政法大学。……这之后，就说都赶紧上楼接着开代表会，讨论‘四二六’社论出来以后，我们这个游行怎么办？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昨天晚上不是都讨论过了吗，第一步，第二步……。可是，这几个常委还是非常紧张。还讲了一下财务。然后香港的同学来了。这事我后来跟他们核实过，确实在4月26日第二次全体代表会之前，香港同学已经见过开希他们了。香港同学是秘书长陶君行、李兰菊，还有另外两个人，一共是四个人，他们说来调查这个运动。李兰菊当时也说：‘如果确实是个民主运动的话，我们就准备支持。’然后说，‘我们香港学联是本届亚洲学联的主席，我们支持学运是很有经验的，台湾的学运我们也支持过，南朝鲜的学运我们也支持过，基本上这些支持都是成功的。我们本来订的明天的飞机票，但是我们要晚走，如果政府镇压你们明天的行动，我们就在北京静坐、绝食，马上跟香港联系，叫香港支持。’

然后就把他们的地址给了我们，说：‘你们找到任何一个亚裔的留学生，都有可能帮你们联系到我们香港学联，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你们救出去。’然后就要这几个常委的地址。除了吾尔开希，其他几个人都有点犹豫。我说，‘你们如果不愿意当众给地址的话，可以私下里交给他们嘛。’我估计他们后来跟吾尔开希他们还继续有接触。总而言之，那会儿就觉得挺振奋的了，外国记者也来了，香港同学也来支持来了……。”

根据邓小平讲话暨“四二六”社论要“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的精神，及中共中央的委托，4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连续发布两个公告，禁止在公共场合演讲、募捐、集会、游行。当晚在电视台和电台进行了反复播出。为防紧急情况，驻扎外地的38军数万名野战军奉调进京。人们纷纷传言，医院已经腾出大量病床，并且临时进行了医治催泪瓦斯所致创伤的训练。

各校遵命对学生做工作，企图把事件平抑在萌芽状态。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广播站反复十次播送了校长办公室的一个通告“……为了同学们自身的安全和家庭幸福，请大家谨防上当，明天不要上街游行。”同时，法大校方也加紧对周勇军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收回行动。据马少方回忆，他曾目睹“老师们”做工作的过程，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们是谁：

“4月26日下午，电影学院一个自称上面有背景的同学找到我，说可靠消息：若学生明天上街游行，必遭开枪镇压，要求我立即将此消息通报‘北高联’。我立即赶往法大找周勇军，大约下午3：00左右找到周勇军，其时周勇军正在和几个青年教师模样的人在紧张的交流，我当时未加任何考虑，见到周勇军就脱口而出地说：我建议取消明天的游行。周勇军当时使劲给我使眼色，但等我领会到不该在这个场合说这个话时，话已经说出口了。周勇军当时只好说：那也要由常委会决定。我说：我建议立即召开常委会。当时一个和周勇军谈话的青年教师模样的人，立即说：我们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周勇军说：必须找到五个常委院校的代表，才能召开常委会。结果是那位青年教师模样的人，居然找来一辆车，拉上我和被授权代表了法大的甄颂育同学，

先去师大，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吾尔开希，我看时间太紧，就决定先去人大，在人大找到了胡春林，又赶忙去民院，在民院知道‘石翁’已辞去民院主席职务，幸好有个同学，我记不清名字了，在获知我们的情况后，说他能代表民院参加常委会，就上了我们的车，直奔清华大学。此时已经时过6：00了。在车上，我和其它三位同学商量：我认为在时间上，找齐五个常委院校，开成常委会，形成取消游行的决定，恐怕也不能保证在余下来的时间通知到20多所高校的同学了。特别是，如果几所大校知道取消游行，小校不知道却走上街头，人数少，更危险。于是我提议：不取消游行，然后强调三条，一是加强学生纠察力量，二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是25日法大会议上定下来的口号）的口号不变，三是一旦和警察发生冲突，立即撤回校园，静坐示威。车在行驶，我的提议在三位同学的默认下，算是达成共识。等我们7：00左右赶到清华时，清华筹委会已解散，在清华耽搁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我们根本没法找到能代表清华的人，就立即去北大。时间大约是晚上9：00。在北大，我们好不容易得知‘北大筹委会’9：30将在一个教室召开会议，我们四人赶过去，其时教室里还有很多同学在晚自习，我们当时以为，北大筹委会不在这里开会了。正当很有些失望的时候，王丹来了。这样，差不多快9：30的时候，总算凑齐了五个常委院校代表。我没有再和其它同学商量，就立即把我在车上说的意见当着王丹的面重复了一遍，王丹同意，并表示一定将我们现在的决定，转告北大筹委会。我也让法大、人大、民院的三位同学，把这个决议带回各自的学校，强调一定要转达。这样，原本是为了取消游行的一次紧张行程，最后是决定继续游行。”

在法大等待五常委院校代表前来开会的周勇军，并不知道上述面包车上“临时常委会”作出的决定。据王超华回忆，此时他正承受着来自“北京市领导”的压力：

“因为他是高联的第一任主席，（他们）找到他就施加压力，说明天要出多少军队，要镇压，你要对这个负责任。他坚持说‘这是高联全体做出的决定，我一个人不能改。’开始他说，不能改。后来他说是‘全体’做出的

决定，我‘一个人’不能改。对方好像抓住这一点，说‘那不要紧，你就以你个人的名义说嘛。’说来说去，后来他们说，‘你个人想不想对同学的生命安全负责任？’他绕不过这个圈子，也确实觉得压力特别大，和项小吉烟抽得一屋子都是，他就以个人的名义写了。……”

据北京市委次日召开的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中国政法大学领导汇报，当时他们与周勇军“谈到凌晨3：00”，周勇军终于同意。学校为他提供一辆车，让他去通知北大、人大等校学生。

4月27日凌晨，有关学校的学生自治会收到了周勇军发出的通知：“我看到一份通知，那是盖着‘祖国万岁’的章的。‘祖国万岁’这个章是4月26号上午说的，高联没有自己的章，现在用师大‘祖国万岁’的章代替高联的章。因为各校校方下午开过会，都大门紧闭，北京市给各校打了电话，说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车，这个车到的时候，你们给他开门。各校学生接到这个通知，都觉得这就是高联的通知。”

王超华继续回忆道：

“因为我们学校是要和东郊的几个院校凑在一起，从大北窑出发，既然我是联络员，我就先跑了一趟。我去了以后，联络员觉得奇怪，说：‘都不游行了，你来干什么？’就拿出这个通知给我看。我在那的时候，那个大胖子联络员就跑回来了：‘哎呀，商学院的学生简直就要打我出来呀。’他是去通知西郊的商学院和外语学院的。他说，学生就排队坐在马路沿子上：

‘我们就不信不游行，要是北边有学院来的话，我们就走。’然后，还不让他走，说：‘要是北边学校来了，先揍你。’当时各校都想游行。就这样我还是通知我们学校，说是不游行了。等到4月28日我们同学见到我还说，人家都说王超华是特务呢，昨天怎么假传高联指示，说取消游行。”

“其实26日我还跑去清华煽动过一回，27日早晨，我也是先去清华看，看到清华队伍出来了，我才接着走的。我看到清华队伍从西校门出来，西校

门没有任何挡的。因为我原来就住在大学区，我知道1978年那会儿，根本头一天晚上就是校门紧闭，校门外一排摩托车挡着，你根本就别想来回进出。可是在4月27日早晨，从北大东校门进出，我就说送孩子去，就把我放进去了。我就把这件事跟封从德说，‘今天这个堵，好像是又要堵，又没有真堵。’”

沈彤回忆，吾尔开希也为取消游行专程到北大进行过游说：

“（4月26日）扩大会通过（游行）之后，当晚我与孔庆东作了许多准备。同时，那天晚上我与孔庆东第三次与校方及团委接触，商量时，提出搞校园静坐。之后回28楼：印刷、筹委会、广播站（当时暂由杨涛负责），都在烧文件。三四点钟或四五点钟，我从校长那里回来，吾尔开希到了北大：校方跟我说了，如果你们不出校门，什么都好办。我是第一来北大的，希望我说服北大不上街，若你同意的话，下面联系清华。五大院校不出去，游行就不成了。开希就走了。可是第二天，北师大第一个，开希又写了遗书什么的，冲了出去。”

据家住地质大学院内的笔者的一位同事回忆：

在远郊的北京农业大学，4月27日早晨6：00起，就有学生三三两两地来到校门集中，有人还带着系、校的旗帜和标语牌。但是，见面后，大家对今天到底游不游行尚存疑惑。昨晚，他们通过学校广播听到的最后的消息，是公安局的通告，以及校党委的劝说。大家估计，其他学校估计也是如此。但此时大家担忧的是，如果一个学校走出去，其他学校没跟上，那才是不能忍受的。但偏偏北农大地处北郊，位置最偏远，他们无法根据其他学校的动作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在犹豫之时，又传来消息：北大、清华、人大这几个打头阵的学校宣布不参加今天的游行。人群更加骚动起来。此时已是八九点钟，附近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甚至召开了“紧急会议”，以投票的方式决定取消游行。后来，这些学校的学生仍有上千人出校游行，甚至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决定游行的根据，可惜没有代表学校的校

旗，他们只能集合在其他学校的队伍里。事后，他们将这一天称为“校耻日”。

浦志强的回忆，则描述了在南面最邻近城区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走出校门的艰难抉择：

“当时学生在悲愤之余，受到了社论和整个态势的强大压力并感到手足无措确是事实。基于经验以及各自的渠道，爱护学生的老师和学校的各级领导，以及后来被认为是八九民运的黑手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陈小平等人，无一例外地对第二天的游行所可能面临的血肉横飞的悲剧性结局深信不疑，只不过是激进的师生对于这样的定性实在无法接受而已，但是如何以具体行动以及以何种具体行动表达这种主张则实实在在地是举棋不定——没有人有资格和勇气敢于对如此重要的决策承担责任，并且，没有人对于在这种态势下自己的振臂一呼是否真的会应者云集充满信心——万一狼上狗不上真的就完蛋了！4月26日全天有上百名激愤的本科生涌到我的宿舍要求我第二天一定要带领大家冲出去，‘我们愿意去死，只要能死在一块儿！’我只能对大家说：‘只要有一位同学冲出去了，我保证我是和他在一起的！但是，一定要与各校统一行动。’因为作出这个决定的责任——包括对历史的责任——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十几位老师也不断地跟我讲一定要对自己和同学的生命负责，千万不能出去，因为政府已经红了眼……与此同时，我也不断地请求得到陈小平、吴仁华、刘苏里等老师的指点。记得当天我曾问陈小平到底第二天出不出去，他说：‘看样子，明天出去肯定会流血，我操。’……”

周勇军等临时学联的学生领袖所受到的压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只有在作出选择的权力看起来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候才能真正意识到选择的艰难——他们决定取消原定的游行决定！在4月27日早上我于8：00左右起床后，听到了政法大学学运负责人——85级本科生XXX——在校广播站播出周勇军的取消游行的决定。这份决定说将原定的到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改为在各校校园内游行。但是，心有不甘的同学们还是陆续聚集到政法大学

的校门口，‘四二二’时用过的宪法标语牌和其他的横幅、校旗、系旗一应俱全。阳光明媚的早春天气，祖先留下的土地已经作好了孕育生命的准备，但此时此刻他的子孙却正在打算着为未来而奉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但此刻，深为广大同学敬重的校长——江平先生，正拖着自己的一条假腿，坐在校门口，坐在同学们脚下，声泪俱下地说着，挡住了同学们往外冲的路。

江平先生的大意是，‘你们是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你们的父母把你们交给我，我就有责任保证你们的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去就意味着流血，我们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后果。我请求你们，不要出去。只要是在校内，就没有人会来伤害你们。学校将为你们在校内的游行和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一切方便，只是千万不要出去。’空气象死一样沉寂，欲哭无泪，在每一张表情严峻的面孔上——周勇军的决定依然在广播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送着。

我当时讲了话，但是我仍然下不了决心。我说今天的形势，严峻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走出了这一步，就意味着准备接受流血牺牲的后果，这样的后果将不是他的领袖打破自己的头就能避免的（‘四二二’中午悲愤至极的我用手中的喇叭打破了自己的头，血流满面）。这次讲话辞不达意，我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想说明什么意思。周勇军的决定还在播。此时，扛着宪法标语牌的本科生XX抓过来一个喇叭，抬眼望天，语调嘶哑，带着哭腔吼道：‘我们已经忍了这么久，难道我们就只能永远这么忍下去吗？！’我感觉我遭受了雷击，血液顿时涌遍全身，一哈腰就搀起了我们的校长：豁出去了！拼了！不足一百人的队伍冲出了校门！此时大约有9：00光景。

陈小平要我们先不要急，建议大家先把横幅标语沿校门往南的路边一字排开，等着看一看北边其他学校的动静。我照办了。顶多过了十来分钟，北边就过来了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高校的队伍，一望无际的人流！北京医科大学的十几个女生，身着白大褂、手提红十

字药箱的身影一出现，我感到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周围这时已经有了大约180多位同学，我们的外围，自然是由同学组成的纠察队。”

“XX此后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代表，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参加了高自联的组织活动，是他的勇气，使得我今天还可以回味这件事，而不是北京市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策划与领导。事实上，在学生最孤立无援的时刻，没有任何组织、任何人给予了实实在在地鼓励，因为在那种空前的高压下，所有的人都是最最需要鼓励的孤立的弱者！所以，我认为‘四二七’大游行，是同学们基于心理上的强烈共鸣而采取的一致的决死行动！走出这一步之后，就发现今天的阳光原来是如此的灿烂！‘皇帝明明是什么也没穿嘛！’”

“‘四二七’大游行之后，高自联的凝聚力较此前大为降低。”

忙乎了一晚上的马少方，第二天上午也赶到了人大：

“我27号上午赶到在人大时，人大仍有两种声音，一说是继续游行，一说是取消游行。我当时说：不可能取消游行。人大有学生骑车到北大和清华，来回奔波，通报北大、清华学生情况，很快说：北大学生出来了。人大这边得到这个消息，就决定游行。但人大部分教师坚决地堵住大门，为此与学生发生争执，最后学生还是冲出了学校大门。”

一场由饱满的愤怒孕育的行动，由于高校领导实际上“外紧内松”的姿态，这时已如离弦之箭，无法收回了。

据柴玲回忆，当她加入这一天的游行队伍之前，一个声称邓小平女儿邓琳的朋友的人找到了她：

“他告诉我说：‘邓小平和老一代的领导很喜欢年轻人，但是他们现在有困难，他们希望学生们能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不要把运动深化，免得给大家都带来危害。’

我对这个信息感到很惊讶，因为这和《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所影射的完全不同。如果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认识是因为受了误导，那告诉了他学生们的和平意图后会否对事情有所帮助呢？我让这个人带给邓小平回复的消息，说我们对邓本人没有敌意，实际上，我们特别爱戴他，也感激他发动的改革，并希望他继续站在后面支持改革，推进改革进程。

在跟这个人说了再见之后，我马上去和我的同学们集结了。我们一走出北京大学的校园，就遇到了一些清华大学的学生……”

第三节 大游行

1989年第十期《新观察》有一篇由记者集体采写的目击记，是目前可以查阅到，当时留下的一篇较为真实和全面反映“四二七”大游行的报道：

一、4月27日8：00-8：30

每天，当太阳和国旗几乎同时升起来以后，天安门广场就已布满了游人。

而今天，空空荡荡，隐隐透露出一种异常的气氛。铁链紧张地圈住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台阶。上面只有一个值勤的武警战士和两个清洁女工。花圈不翼而飞，胡耀邦的画像失去了踪影……

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广场四周的警察逐渐增多。历史博物馆停着几辆面包车和大轿车，里面坐满了警察，似乎在等待什么。广场东侧有一队刚刚开来的警察，一位领导正在队前布置任务：“第一，如果有零星的学生入场我们就让他们进来；第二，如果有人搞打、砸、抢，我们就采取行动……”8点半钟以后，军警一队接着一队，沿着广场两侧的道路迅跑……东西两侧的军警排成了一个方阵，每个方阵中都有几个女军警。历史博物馆前的小树林中，掩藏着许多正在休息的军警……小树林北端，某报记者C 趁机采访一位年轻

壮实的军警：“今天学生会来吗？”记者问。“说是要来。”“你是武警吗？”“我们是公安大学的。”“你们其实也是学生啊！全校都来了吗？”“二年级以上的。”“要是今天学生不来了呢？”“我们反正是听命令。”这位穿警服的大学生说。

人民大学。喇叭里传出临时学生自治会的通知：原定于27日上午8时进行的游行因故取消。但仍然有一些学生打着校旗、横幅标语，慢腾腾地正在集中。

北京大学南门外。门卫严格检查每一个入校者的证件。外国记者的摄像机、照相机镜头，紧紧盯住了校门，在等待着学生出来的那一瞬间！校园内，校方广播喇叭正在大声疾呼：现在有少数人仍然在鼓动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们感到震惊，希望学生不要出去游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28楼学生的那个小广播站则针锋相对地广播“对话的条件”。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到三角地集中……。

终于集合了两千多人的队伍，向校门口走去。

二、8：45-9：30

北大的队伍走出了校门……8：45。

早已等候多时的社会各界人士欢声雷动。坐在墙头上的年轻人用尽气力呼喊支持学生的口号。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和欢呼的群众差不多。队伍最前面是一面光辉的旗帜，红底黑字：北京大学。这四个字的威望是在1919年的5月4日那一天确立的。从此就像是有某种遗传基因似的，70年来的学生运动北大始终走在前列。

紧跟着校旗的是两条横幅标语：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

.....

队伍向东，到了中关村丁字路口。清华大学的队伍从北面过来了。两校会合后停下来商量，决定让北大先走。队伍向南，走到科学院的那个丁字路口时，迎面一堵人墙拦住了去路。人墙是由人民的警察组成的，一二百人的样子，手挽手排成了五、六道防线……一名警官走出来与学生交涉。机敏的外国记者立刻把警官和学生代表团团围住了。外国记者很多，有的扛着摄像机，3人一组，起码有三、四组。更多的拿着照相机、录音机和记录本。

（事后，一位香港出版界的女士在北京对某报D记者说：27日这一天，她在香港听广播，电台每半小时报一次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她特别紧张，当时香港舆论都认为要镇压学生……）

……中国记者有自己严格的纪律，没有经过批准是不准随便采访的！在这个地方有一名中国记者，某报的A，他只能在圈子外面听。只听清了大概的意思，那位警官让学生停止游行，学生让警官让开道路。双方交涉了十几分钟，都比较客气，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纪律性决不亚于训练有素的警察，队伍稳稳地立在原地，与警察的人墙相峙着。一两千名（？）群众插入警察与学生之间，他们有节奏地喊着：“让开，让开！”

学生们也在喊“人民警察爱人民……”

没有猛烈的冲击，只是一步步地往前压，群众在前面，学生跟在后面。街道虽宽，但一边是民房，（一边是）街心隔离带、栏杆，人都往中间压，因而街心拥挤，如同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上一样。有人被挤掉了鞋。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地往前拱。警察顽强地抗拒着人流。虽然不是猛烈的撞击，但从人流中发出的缓缓的潜力如同大海的涌浪，一波接着一波，即便是坚固的大坝，也会倒塌的。大坝决口了！第一排的警察胳膊松开了，人墙倒塌了；突然失去了阻力，人流呼啦啦冲了过去……此刻，大约是9：30。 人流中爆发

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北大校园内又有许多学生赶出来加入了队伍。人数从一两千 猛增到六、七千。

……警察显得有些沮丧。人墙被拦腰截断，他们呆在路旁，无可奈何地看着学生的队伍走远了消失了。

三、10：00-11：45

人民大学的学生刚一走出校门就楞住了：街道上空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他们担心北大学生受阻，便决定向北迎接北大学生。人大的队伍有100米长，大约两千人左右。人大有几栋宿舍是临街的，许多学生趴在窗口上观看。因为几乎所有学校都传达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关于取消当日游行的通知，所以许多学生持观望的态度。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挥手高喊：“下来，快下来！”

楼上下来了不少人。在附中门口，人大的队伍和北大、清华的队伍相遇。在双榆树北三环路口，与北京外语学院的队伍相遇。据说原计划是向东，朝北太平庄走，去北京师范大学。也许因为看到了100 多米外友谊宾馆的军警防线，四所学校的负责人协商了大约有20分钟之后，决定队伍继续向前，迎头撞向军警的防线！

警察排成了6排，像一把大锁似地牢牢把住了路口。警察劝学生停止游行，学生也不想多说什么，反正就是要走：“请警察让开！”正如锁不能自己打开一样，没有接到让路的命令，这些忠实的警察手挽着手，他们决不让路。据一位警察说：“上级命令我们谁也不准后退，除非被抬下来！”

围观的群众声势浩大，和学生一起高喊：“让开！让开！”喊声未落，队伍拥过去，像一把大钳似的一下就把警察的大锁拧断了。

这时，北方交大、中央民族学院从南面折了过来，与北大、人大、清华、北外的队伍连接起来。接着，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理

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的队伍也先后加入了大队。记者D在魏公村第一皮鞋厂门前看了一下时间：从11：10到11：45，队伍仍然没有过完。

大约11：30前后，许多在城中上班的人纷纷接到电话，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送着这个消息：“学生已经冲过三环路，朝二环路来了。”

四、11：30-13：30

白石桥。在学生队伍到来之前，警察已经筑起了坚固的防线。从紫竹院到首都体育馆，几十米长的路面上，手臂与手臂像铁索般地紧紧扣在一起。游行队伍缓缓蠕动着过来了，学生之前是群众。人流越逼越近，在几十米外就能感到沉重的压力。警察们挺起胸膛，准备承受几千人的撞击。压力是缓缓地压到警察的人墙上的，逐渐加大，人墙向后弯曲凹陷，猛力反弹，人流哗啦退下，紧接着又扑上去，潮水般地忽退忽进……经过几个反复，铁链断开，人墙倒塌。军警主动撤离到路旁，大约有四、五百人，列队整齐，注视着学生队伍通过。

中央民族学院的队伍高喊：“人民警察保护少数民族！”也有人唱起《便衣警察》主题歌。此时，白石桥路两旁，仅围观群众就有近万名。许多人也跟着学生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图4-10：警察用方阵阻挡“四二七”大游行（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据《方励之自传》记载，当天，他依然骑自行车到位于动物园旁边的天文馆上班。而事后传出，方励之不仅参加了今天的游行，还在队伍中“跑前跑后地指挥”。而更诡异的是，据目击者称，当天的游行队伍从动物园一带经过时，速度及其缓慢，仅此一地，就“过了两小时”。方励之即便上班时没有遇到游行队伍，休息时出来看看（被取证）的时间也足够了！

图4-11： 四二七中科院队伍（顾昕摄）

队伍继续向南往四道口行进。然后转向东，经过大都饭店，在国谊宾馆前稍停了一会儿……继续向东……上了二环路。无论怎么绕圈子，目标是明确的。如同盘绕曲折的河流，终究要流向大海。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门前，学生们开始背诵《邓小平文选》第134页上的语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中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本来，从北面进城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师大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游行队伍，想取道北二环西边的豁口，向南直奔西单。但是，在豁口，前往新街口北大街的去路被军警封锁。有的学生要冲，但许多同学不同意：

他们高喊：“理智，理智！克制，克制！”

队伍不得不转向西直门。如果没有后续的力量，他们很可能从那里继续往西，然后往北，回到各自的校园。

但是，当时针指向12：30的时候，从西面过来的人大、北大、清华的队伍出现了。他们随即与从北面过来的北航、师大、法大的队伍在西直门南大街汇合。

在车公庄又被拦住了。学生们向警察呼喊：“提高警察社会地位，提高警察工资待遇！”“人民警察不打学生，专打官倒！”

政法大学前列是一条横幅：“誓死捍卫宪法尊严”！那个黑色的“死”字，被红墨水泼成血淋淋的样子。学生们早已做好了流血的准备，有的写了遗嘱，有的写了血书。临出校门时，3位学校领导拦住了队伍。校长抱住旗杆，指着那个“死”字，含着眼泪说：“你们不能出去，不能让你们这样流血，如果流血了，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政法大学，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经过反复交涉、冲击，警察终于让路了。这时候，许多女同学哭了……警察队伍中，也有人落泪了。

洪流缓缓滚动，队伍继续向前。

13：00许，队伍开始聚集于复兴门立交桥。记者、观察者、党和国家机关的调研人员和看热闹的人们，早早在这里占据了有利地形。还有骑自行车先期到达的学生，在这里等候自己的同伴。“桥栏杆边，人行道扶手边，后来是人行道上，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远远望去，就像黑压压的一片蚂蚁。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意识到，这里将是今天的壮剧开始的地点。”张明澍回忆道：

2：00，桥上的空气似乎骤然变得热烈紧张，人们兴奋起来，躁动起来，渐而变成欢呼、鼓掌。

第一面旗帜由远及近，过来了。旗帜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紧跟着还有一面旗帜，上面用纸贴着中英文的名称：人大研究生院。然后是各系的旗帜。期间夹杂着白布、白纸的横幅，还有不少人手里拿着小小的三角形旗帜。举着第一面旗帜的人是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面色冷峻，眉宇中透出悲壮的气概，想必是写了遗书的一个。他双手紧握旗杆，高高举起，迈着坚定、有力，但又使人觉得有几分沉重的步子朝前走。旁边有人评论说，“我佩服这哥们，真有骨头。”听着这些连父母亲都瞧不起的北京痞子说这话，能把人感动得掉下眼泪来。

紧接着过来的是北方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人们很快就觉察到，这绝不是冲过警察堵截的几个学校、几千人，而是上万人的巨大队伍。站在近十米高的立交桥上望去，只见红旗飘飘，白的横幅、黑压压的人流，看不到哪里是尽头。图4-12：“四二七”游行队伍经过复兴门立交桥。桥上桥下呼应（顾昕摄）

队伍穿过长安街，口号声响亮起来。听得出，口号是经过精心研究并且是统一的。“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这是针对社论说的……“学生爱国，不是动乱”，这是驳斥社论所说的动乱。“打倒官倒”、“铲除腐败”、“稳定物价”、“推进改革”。这是为群众立言，为社会立言，也是为赢得更广泛群众的支持。“人民日报，欺骗人民”，“中央电台，颠倒黑白”，“北京日报，胡说八道”，愤怒之情一泄无遗，但又不失有理有利的立场。各个学校还有自己的特色……

据《新观察》记者集体采写的报道，14：10学生的队伍来到复兴门立交桥的时候，在前面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旗帜晃动了几下，在警察的防线前停住了：

几乎没有什么冲突，只听见警察中一声喊：“撤！撤！”防线就垮了。学生和观众向警察鼓掌、欢呼。游行的队伍摩肩接踵，旌旗招展，一眼望不到头。宽阔的马路变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人的河流。

有几百名群众，在游行队伍前为学生开路。……

学生组织的纠察队边走边喊：“请市民往两边走，请让一让，请协助！”队伍中树立着一些标语牌。还有一组写有“目击者”的照片专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巨大的版幅，这是一张模拟“起诉书”：

原 告：首都高校全体学生

被 告：人民日报

起诉理由：诽谤诬蔑罪

案 情：（略）

人大后面是建工学院、外语学院、理工大学、北方交大、北方交大的一个操东北口音的学生拿着喇叭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人民养大的，我们愿意

为人民流血牺牲，我们代表的是11亿中国人民，11亿中国人民都是腐败官僚分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清除腐败的官僚分子，我们要求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你们和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没错儿！”一女青年喊到。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围观的人中有拿录音机的，同学们认为这些人是新闻记者，有人便向喊话的东北人耳语了几句，于是他又高声喊到：“需要广大的、正直的、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支持！向中国及世界各国一切有良知的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致敬！”掌声又响成一片。

学生们表示了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强烈不满。“抗议人民日报、中央电台任意歪曲学生运动”、“请愿不是动乱”等标语口号布满了整个游行队伍。有的措辞更加激烈：“新闻界遮羞布多层次一种的确良”、“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光明日报，没有光明；北京日报，胡说八道；科技日报，为民开道。”

图4-13：四二七讽刺对联（顾昕摄）

在大学生中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江青看了“四二六”社论后，一口咬定姚文元被释放了，要求把她也放了。借以讽刺那篇社论。

大学生普遍对《科技日报》和《农民日报》表示欢迎。一条极长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向正义的农民日报致以崇高的敬礼——首都高校全体正义的爱国学生。”

北医大口腔学院只有一、二百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都穿着白大褂，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后是中央民族学院，举着汉藏两种文字的“尊重人权、反对暴力”，“爱国不分先后”等标语。领呼口号的男同学嗓子已经嘶哑：“民院民院，为民请愿！”还有一队呼口号全部用四川口音，路人听了，忍俊不禁。然后是气象学院、北京商学院、商学院的学生向建筑大楼脚手架上

的工人呼喊：“向工人阶级致敬！”工人们高举双手，不停地挥动。这时有人影张开双臂，好像要工人们下来，但没有人理他。

14：17左右，北大的队伍开过来了。他们有节奏地呼喊：“北大北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国际政治系举着的横幅是“忍痛罢课，平等对话。”有同学喊：“官倒官倒，越倒越胖。”

在北大的队伍中间，夹着北京林业大学的校旗。北农大的横幅言简意赅：“官倒富，农民苦”。“减轻农民负担”。还有一句带有自我批评的成分：“北农大不再沉默”。据说，22日追悼胡耀邦大会前的深夜急行军北农大没有参加。

14：35左右，清华大学过来了。同学们高唱着用“打倒列强”的曲子填写的新歌：“打倒官倒，打倒官倒，争自由，争自由。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向前进，向前进……”

开始游行队伍最后的是邮电学院，后来又续上了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在二环路上，队伍基本上是学生，站在高处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旗帜、标语。到了长安街后，群众就汇入了，形成了三股洪流，铺满了整个长安街，街中间是学生，两边是群众。三股人流齐头并进，滚滚向前。

当然，学生两侧有手拉手的纠察队，与群众保持着明显的分界。

“所有游行者的校徽。队伍两旁，是学生手拉手组成的两道‘人链’，出示学生证才能进入队伍。”据张明澍记载：

任何地方只要“人链”一断，立刻就有学生迅速跑过去接上。这是一道十几里路长的“人链”啊。看看那些稚气未退的女学生十分紧张地自动冲上去补人链，令人在赞叹之余，生出深深的叹喟：她们何至于此呢，不就是怕

个别不肖之徒混入，授政府以柄吗？爱国竟然要这样的担惊受怕，这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府！

据《新观察》记者集体采写的报道：

西单路口的岗台上站着五六个警察，……一个50岁上下，手持对讲机，显然是在汇报情况。路口亮着红灯，队伍停下了。3个学生手提小型扩音器向警察交涉：“学生要过去，你们能不能放个绿灯？”“不行！”警察说。学生又要求：“希望和平地放我们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警察始终就是两个字：不行。队伍受阻。学生们有节奏地喊到：“学生代表，大会堂前，跪下请愿，无人理睬。人民大学，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打倒官倒。”十多个学生齐唱：“……再大的风雨我们同经过，再苦的日子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从来没变过……”

……警察两侧的群众开始挤了。群众对警察说：“你们不要再堵了，你们堵不住的！”一拥而上，防线就被冲开了。一阵欢呼，队伍继续向前，把一支动人的歌儿留给了人民警察：“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15：40-16：30

开始学生是三路并进。东边最前列的横幅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群众把警察冲开后，自动留出了大约三米宽的通道让学生过去。警察从马路北侧向西撤走，单行列队，步伐整齐，凯旋般的。群众夹道欢送，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队伍在六部口受阻。上千名军警手臂挽着手臂组成了厚厚的人墙。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如同两个浪峰之间的短暂的平缓期。纠察队员迅速跑向前面。

一会儿，队伍向前挪动了几步，又停住了。学生们好像早有这种思想准备，谁也不着急，你不让我过，我就休息。反正迟早得过去。就这样走走停停，差不多有40多分钟。

这时，人流已经从四个方向把路口完全塞满了。长安街上全是人。有不少自行车卡在人缝中动弹不得。有一种要把空间撑破了的感觉人流被挤得向上漫溢，街道两旁的楼上和树上、交通标志灯上、南北两侧的广告牌上，也全站满了人。有人爬上广告牌顶端，双手敲着牌子的板面，“咚咚咚”的像是播响了的战鼓。……

据张明澍记载，这时：

一支队伍举着横幅，沿府右街由北往南而来，人们看清这就是前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说“大多数同学在坚持上课”的中医学院时，又爆发出一阵欢呼。

前面就是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的所在地。“此处有‘六层’警察，手挽着手横排在长安街上。”张明澍认为：

如果说4月27日这天有什么外在形式上的较量，那就是在这里。

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武警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势，似乎仍然没有打算退让。这时，一件真正可以称为“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一大群市民挤到了学生前边，用自己的身体，把武警向路边挤。一边挤，一边嚷，“你们有本领，去打官倒，去抓腐败呀，挡住学生干什么”。只要武警往回挤，人群中就爆发出雷鸣一般的吼声：“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大约十分钟之后，越来越大的市民队伍把武警挤到路两侧。但他们不再往前走，而是模仿学生拉起两道“人链”，给学生让出一条宽阔的路来……

据《新观察》记者的观察，“六层”武警的撤退固然与市民的拥挤有关，但他们可能是奉命撤下的。在《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中写道，在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不许打人”的吼声后：

中南海的红墙墙头上，隔着浓密的绿叶儿，有三四个穿便衣的人在向外了望。

其中有一个人的手弯在嘴前，像是对着对讲机说话。

这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形象：五六排警察在马路南侧贴着墙壁站立着。虽然表情不那么自然，但显得比较轻松。有的警察还向学生招手。学生一路喊着：

“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万岁！”深情的《便衣警察》主题歌，把警察也唱得高高兴兴。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察，把手举起来向学生敬礼。动作很小，有点儿犹豫的样子，举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人又放下了。见没人注意，他第二次举起手来……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军人和武警被围得水泄不通。只许出，不许进……广场中心已空无一人。

天安门东侧的南河沿路口已被封锁。三四排警察紧紧地挨在一起。受阻的人很多，自行车混成一团……此时，景山公园前开过16辆军车。每辆车上坐着4排士兵，每排9人，加上军官，大概近40人，一个排的兵力。16辆车，估计将近两个营的兵力，往西开，开到北长街向南拐弯。前面三辆军车刚拐过去，红灯亮了，夹在三四辆车中间的一辆摩托车紧急刹车，车上是一对中年男女。第四辆军车急刹车，而第五辆军车刹车不及，重重地撞在了前车尾部，声很大，车上的士兵吓了一跳，行人也发出一声惊呼。

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有一些学生从公园的另一个门跑进来，往南门外跑。门口有两便衣大喊：“别跑！”吓得他们缩回去了。两点钟以后，广

场前的路也不准公共汽车通过了。天安门前，长安街上，人们都在快慢车道中间的栏杆后面。有两次纪念堂前有一点骚动，人们登上栏杆看。有人正跨越栏杆，被警察一吆喝，就吓回去了。从西边，远远地传来了学生队伍中的鼓乐声，在安静的广场上听起来像是战鼓。……从中山公园里出来了十几队士兵，步伐整齐，似乎要去接受检阅，指挥员不时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广场上也出现了军车，满载着士兵向西疾驰！看样子，学生的队伍接近了广场。

16：40，当笔者从北长街到南长街，最终在长安街口停下自行车时，发现自己正身处这一天政府在长安街为游行队伍设置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内。西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校旗已遥遥在望，并越来越近。但当笔者钻过武警的“绿墙”，打算在学生队伍和军警的对峙间找到一个好的摄影点时，我突然发现，嵌在这面“绿墙”中的士兵，竟有我认识的人！这说明，由于警力不足，他们把中央各大机关的警卫部队都拉出来了。还没等我与这排军人拉开合适的距离拍摄时，西面的游行队伍已经走到近前。队伍前面的市民无情地将我压在了“绿墙”上。当我正喊着“不要挤了！”“不要……”第二句大概还未喊完，我发现靠南边的“绿墙”已经打开缺口，一队杂色的人流，就像干涸的渠道放进的第一股水流，带着急切而杂乱的步伐，涌进了大会堂北面西长安街口上最开阔的路面，渐渐地，缺口越来越大，水流越来越急直至漫过整个街面……而“绿墙”则很像是有计划地收缩到路边，正好把通往中南海东门的南长街口——我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堵死。在《新观察》记者集体采写的报道中，以上过程是这样被记录的：

双方在南长街封锁线前僵持了不到十分钟，队伍就冲过去了……转眼军人就被包围在中间，如同一座孤岛。忽然，许多人像大梦初醒，呼地就往广场中心跑，如同要去火车上抢占座位。有人大声说：赶快些，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了。”广场当时还不让进，人们就站在交通隔离线的墩子上。有几位警察拉、推他们下来，群众就围过去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革命博物馆处有25辆军车调过来增援。开走了两辆，后面的军车一下子就陷入了人群的包围之中。虽然是对立的双方，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反而向军人欢呼。有些大胆的人爬上军车与军人聊天。一个戴白帽子的外国记者，爬上车头给士兵拍照，士兵木然以对。群众高喊：“解放军走开！走开！走开！”“丢人！丢人！”“回去！回去！”

驾驶室里，一个中尉面有难色，拍拍司机的肩膀，不知是让进还是让退。汽车稍稍往后移动了一点儿，顿时群众中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喊：“解放军万岁！”

中尉把帽子扔在一边，和下面的群众握手。士兵们也向群众招手。旁边一辆部队救护车想开过去，群众一用力，把它推了回去。车右边的一块玻璃碎了，里面有报话机，急救器材。坐在最后面的一位士兵激动地向群众挥手。学生们向爬上军车的群众高喊：“下来，下来，让解放军过去！”车上的士兵全都站了起来，看样子想和群众交流些什么。军官大声喊：“坐下！”士兵尴尬地坐下了。有两个军人下了车，拿着步话机，又生气又焦急地跑着，边跑边喊：“让开！让开！”他们往故宫里跑，像是去汇报。

人民大会堂边，密密麻麻的军警坐在地上护卫着人民大会堂。当学生队伍接近广场时，警察突然拐过来，向北突击，学生队伍受阻。马路南侧被堵住了，但北侧可以通过。这时，学生纠察队像是帮助警察维持秩序那样，说：“同学们，绕过去，往这边走。”他们和警察紧紧贴着身子，指挥同学们通过。

……队伍继续向东，根本没有进入广场。

图4-14：“四二七”大游行标语（明报）

如果从早上7：00算起，先出发的学生此时已经在路上整整走了近10个小时。此时，已经有人想到了他们的口渴和饥饿。张明澍写道：

游行队伍刚刚上长安街，就有工人、居民提桶送水来。而后，不断地有人一整盒一整盒地送来冰棍雪糕，一整箱一整箱地送来汽水，不时有人把买来的面包等食品扔进游行队伍。下午6：00许，天安门前出现了令人感动的一幕。有人用三轮板车拉了一车面包，呼喊“同学们，吃面包！”顿时，塑料袋装的面包天女散花般地洒落在游行队伍中。其他人则有节奏地鼓掌喝彩。一个小伙子大叫，“同学们，你们抽烟吗？”不待回答，掏出一盒“万宝路”香烟，撒进游行队伍，赢得一阵掌声。在这一阵“小高潮”中，一个人突然爬上三轮板车，大声问，“市民们，学生是不是动乱？”成千上万围观的人齐声回答，“不是！”“谁是动乱？”“他们！”一问一答，整齐响亮，就像精心排练过的一样。

与市民比起来，北京警察的表现可以说是有趣。他们站在自己该站的地方，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执行上级的指示。但他们却没有做“该做”（按上级指示）的事。你可以说是无可奈何。一个警察用几分“京油子”的腔调对游行学生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您呢，尽管冲。我呢，就站在这里，挡一挡。您要是没冲过去，那就谢谢了。算您协助我完成一次任务。您要是冲过去了，那您就过。我的责任是尽到了。”

游行队伍走起来没个完。原来严阵以待肃立在广场边缘的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好不尴尬！于是，堵在通道上的士兵从五六“层”减少到三四“层”，又减少到一两“层”，后来干脆坐下来。看游行，听四川话的“邓小平语录”：

天安门事件有那么多群众参加，说是反革命事件，恐怕不好吧？

据张明澍统计：如果以天安门上毛泽东像为参照点，第一面旗帜经过这个点的时间是下午4：40，等到最后一面旗帜从这里经过时，已经是6：40。他写道：

“这支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足迹的队伍，像火山爆发涌出的岩浆，把燃烧的热情掩盖在冷峻的表层之下，缓慢、深沉，带着万钧之力，流向前方。”

“下午6：30，游行队伍的最后一面旗帜还没有走过天安门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已经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和学生对话，半小时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宣布了这一消息。”

据《新观察》记者集体采写的报道：

在东单，学生队伍已经是一段段的，不连贯了。每当队伍稍停时，都有人坐下来。许多人显得疲惫不堪的样子，但依然喊着“加油”，坚持走着。经过《北京日报》附近，不知为什么情绪一下子又调动起来，振臂高呼：“北京日报，胡说八道！……”

建国门立交桥北面路西一座楼房上，有人放鞭炮，引来一阵欢呼。

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五辆军车被围住了。群众情绪激动，喊：“你们当兵的回去好好想一想吧，你们要敢动学生一根毫毛，我们决不饶你们。”……有个学生掏出北大学生证，不断地向群众作揖，嘶哑着嗓音说：“谢谢大家，让他们过去吧。士兵是无辜的，让他们过去吧。”他反复地重复着这样的话。许多群众眼睛里含着泪花，闪开了道路。大学生送走了两辆军车，再返回来送第三辆。这时过来一个交通警察站到学生中间想指挥，“噉——”群众把他哄下去了。

一群个子不高，满面稚气的男女学生，看样子都是不到20岁的大孩子，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着。有的脸上带着泪痕，一拐一瘸的。但他们依然倔犟地昂着头，一条横幅在他们的头上挺着：

“妈妈，我们没有错！”

当队伍行走到北二环的安定门立交桥时，桥上桥下，围观者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从高楼群到大街上，彼此呼应，形成共振。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举着自己不到三岁的孩子在头顶挥舞，婴儿极乐，持续整整半个小时。许多学生都上前去摸孩子的头。一个领队的学生用干得泛白的嘴唇声音嘶哑地喊着：“水！水！”。于是，有人也提了水桶，站到了游行队伍前。

路过的车上，有人朝学生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冰棒、汽水、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后来的人买不到，就成箱地买可口可乐，排在后面的人够不着，直嚷嚷“我全包了！”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模样挺标志的姑娘蹬着，两旁有自行车开道护送，神气活现地叫着“闪开！闪开！”俨然当年的“支前模范”一般。

豁口一带，一伙个体户在一起议论：这些学生年龄小，又没钱，累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一个开饭馆的说，让我去给他们炒几个菜！菜炒好以后，他硬是从外面拖进来一个头上缠红布条的学生，要请这个客。那学生推脱半天，说“绝对不能吃”，才被放了。

走在这支游行队伍中，听着旁边人山人海的呼声，有些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当队伍行进到一处时，一女生问：“到哪儿了？”有人答：“北太平庄了”。那女生说：“啊！已经到了这儿了，快到家了！”另一女生问：“往人大怎么走？”人群里登时发出嗡嗡的怜惜声：“看！人家小姑娘，连家都找不着了！”

从早上8：00出发，到晚上11：00最后一支队伍（北京农业大学）返校，这次游行历时15个小时，行程30公里，以和平、胜利而告结束。

据时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的封从德回忆，当留守在校的他，为了让劳累了一整天的同学能够得到休整，以北大筹委会的名义，致信校长办公室，请求校方照顾游行返校的同学，延长今晚食堂和澡堂的开放时间，并

希望派校车去接女同学。“没想到校方很快就答应了，指示食堂和澡堂，只要还有一个同学刚回来，就不关门。”

从此，北京的舆论为之一变。自胡耀邦逝世以来，笼罩在学运头上的疑惑、哀伤、愤怒、高压的空气，一变而为自信、开朗、轻快的空气。政府，不论其在4月27日的早晨，是否仍想再版一个西安、长沙事件，但到此为止，不论其立场是否有所动摇，它不得不暂时收起了“四二六”社论的腔调。4月28日，邓小平在家人的劝说下去了北戴河。据说，“邓办”人员还发出通知，要求收回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动作较慢的省市，只传达到厅局级。

一位学运出身的《中国日报》负责人目睹这一天学生的游行，断定它的后面一定有“高手”指挥。“一下子就把南朝鲜给‘毙’了！”

大游行——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这样称呼发生在这一天的事件。没有任何权威或新闻媒介的提示和倡议，也无须经过什么人承认。即使是在后来又出现过“五一六”、“五一七”和“五二三”等从人数、规模到卷入的方面，以及声势都大大超过“四二七”游行的情况下，人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变这个提法。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第一次给人留下的印象肯定是分外鲜明的。在“四二七”以前，不仅学生没有过如此规模的大游行，就是全社会，也没有过如此浩大的自发组织的游行。所以，它至少是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首例。其次，它的组织性，合法色彩，与前一天发表的“四二六”社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群众看到政法大学的队伍时，他们议论说：“你看，搞法律的也游行了，这回打官司，学生准赢！”当人们看到穿白大褂的北医学生和她们的红十字旗时，人们说：“就这，国际战争也打不起来！”虽然像纠察队一类的组织，在“四二二”已经出现，但它一半由于处在夜间活动，一半由于游行路线较短，所以未被广泛知晓。而这次时间长达15个小时，路途长达30公里的游行，如同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是以对手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告终的，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历来的群众运动往往为

“非理性”情绪所左右，但“四二七”之成功，是“理性”战胜“非理性”大胜利。

作为一个亲历者，笔者认为，“四二七大游行”虽然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但是，它对于广大公众的真正魅力，恰巧不在它的理性程度，而在于它“哀兵”的形象和“天然去雕饰”的真诚和纯情。慷慨赴义，是它的真正灵魂，不论是“誓死捍卫……”，“民不畏死……”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都体现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四二七大游行”没有“八九民运”的许多缺点。在那些过分工整的格律词章之外，它是一首自由的抒情诗。它的文明的性格不是刻意塑造，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在学生自觉接受了“新华门事件”和西安、长沙事件教训，对此次学运取得高度认同的前提下，所有最精彩的片段，都是他们自由地发挥和创造出来的。这也许也是时至今日，不少民运人士为生计而历数自己在“八九民运”中的光辉业绩之时，却没有谁来“认领”这次伟大的游行的缘故。因为它的确是集体的创作，是学生与人民群众共同迎来的胜利。对于这次游行，外电给予了相当热烈的反映。香港《明报》4月28日有一篇社评《可喜的“四二七运动”》说：“将来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运）称为‘四二七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这篇社评还说：“这四次运动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它们发生的地点都在北京。其次，它们的主要参加者都是大专院校学生。再其次，它们的本质都是爱国运动。而最要紧的是，它们都是由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甚至可说紧迫的危机感所促成。”它说，“四二七大游行”使中国的政局豁然开朗，透出希望的光芒。”

4月29日，在统战部知识分子局与北京市海淀区委联合举行的知识分子联谊会上，主持人陶斯亮开门见山第一句话“27日平平安安过去了！”赢得了满堂喝彩。戴晴事后回忆道：

“‘27日平平安安过去了，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考验。’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没有踮起脚来看看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干部们，但李泽厚鼓了，同桌的科技日报孙长江鼓了，作家们还有站着与坐着的记者们也鼓了。这些人都十分了得，他们接受别人的掌声不少，但要他们真心为一位官员鼓掌，这确是我几年来经历的第一次。亮亮，干得漂亮，你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期待，你知道什么才能真正打动他们，赢得他们。”

会议期间，到走廊上遛弯的戴晴和包遵信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甚至开始酝酿一封给党中央的“致敬信”：

“‘小老包，咱们得给党中央来一份致敬电，27号没动手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小可。’ 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纸笔，我们俩坐下来开始想开头……” “我当时的想法是，乘着今天这个劲头和这个阵容，那致敬电一定足够壮观。我不打算避嫌，比如我是共产党的孩子或者文稿是在统战部高茶会上起草的等等，只要对局面有好处。我坚信怀有偏见的谣传抵御不住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不幸的是此时陈鼓应先生又踱了过来。他是台湾的教授，我的邻居，还是病号，我们不得不放下电文，向他嘘寒问暖。”

于是，这份电文没有出笼。八九民运史上少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但是，在后来知识界公开站到前台的日子里，包遵信也在各种场合主张对“四二七”大书特书，指出它是一个“划时代”事件。戴晴女士在5月10日的中国人民大学讲演中也说：1989年4月27日一定会像1949年的10月1日、1966年的6月6日、1976年的4月5日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提议，把这一天定为“大学生节”。5月下旬，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建议把这一天作为中国的“民主节”。

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认为，“八九风波”因为“四二七”大游行的出现，一场可怕的危机一变而为一个可喜的转机。但是，也有不容乐观的声音存在。

4月27日，路透社发表一位60年代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外交官的评论说：这次学生抗议的结果很可能只是稍有收敛而不是骤变：

“中共在拖延时间，就像他们对待经济问题——通货膨胀——以及腐败现象的做法一样。他们对这些问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中国是反对骤然行动的。”

香港虎报4月28日的一篇评论说，“当局昨天的容忍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而“无畏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奇迹”。

这些议论提醒了人们，昨日的胜利，在极大程度上是以政府的“宽容”为前提的。政府的态度是与警力不足，无责任政府，及体制内的离心离德分不开的。而这些现象，也可能为下一次专制极权行动铺平道路。

《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并无恼怒地记载了游行队伍中“起诉《人民日报》”的消息。他公正地写道：

“这次游行，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社论逼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是党和政府工作，特别是政治改革、教育改革滞后造成的，是中央决策造成的，是北京市委，国家教委向中央和邓小平提供不真实情况，导致中央和邓小平决策不当造成的。

这次游行既是对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决定的蔑视，也是对邓小平权威的挑战。这次学生运动，很值得党中央、邓小平等一批老人反思。他们固守的老一套，已经不适用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了。

新闻界许多人对中央的决策也有意见。新华社穆青同志坚持客观报导。他们既发了学生游行的新闻，也发了北京市发言人说游行非法的新闻。”

这一天，在尾随游行队伍的市民群众中，有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他“跟着学生走了几条街”。学生队伍的“秩序井然”令他觉得“学生的行动无可指责，学生打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官倒、要

求民主，有一条标语我印象最深刻，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不是邓小平语录吗？”

赵紫阳事后总结，对于这个结果，执政党和政府是“没想到”的：

“‘四二七’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四二六’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学生都知道‘四二六’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四二七’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四二七’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四二六’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据李鹏这一天的日记，他经历了一场虚惊。白天上班后，他一直守候在中南海的电视屏幕前看学生游行。他心里想的却是：“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往游行的人潮。”晚上下班前，他接到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的一个电话，告知有一群学生企图在他回家的路上拦截他的汽车。后来，他和朱琳的乘车行至复兴门时，果然遭遇一群学生的堵塞。在其前导车上的警卫参谋下车观察情况时，“司机刘继宗灵机一动，调转车头绕道南行”。李鹏于当晚9：00才回到万寿路家中。

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次日，李鹏一家由万寿路搬进了中南海202号。

4月27日傍晚，金文成、张晶（女）、李龙男三名歹徒趁乱抢劫了北京邮电学院的工商银行储蓄所，抢走近6万元人民币。但这条消息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四节 “导报”事件的反响

“四二六社论”在《人民日报》刊出的当天，李鹏收到了邓办退回的《小平同志4月25日谈话要点》中办整理稿。在这份经邓小平本人修改的“讲话”中，有一段关于《世界经济导报》的“圣旨”：

“小平同志对讲话稿重要的修改是：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编辑部要改组；二、耀邦同志是有错误的，他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提倡改革开放等等；三、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吴祖光这些人谈谈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据信，江泽民曾就“导报”问题征求过邓办的意见。4月26日当天，他就在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上海也采取了响应的行动：召开万人大会，撤销《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党内及行政职务，对导报派驻工作组。这一行为，客观上对在“四二六”社论中仍含糊其词地所称的“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把整肃重点避开了广大的、难以应付的学生，而对准了新闻界。新闻界的背后，自然是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界。

江泽民知道，这些人有一个弱点，他们不像学生，是吃父母亲的饭过活。他们全是捧共产党控制下的国家的饭碗的人。对待他们的有效办法，一直以来就是以“生存权”钳制“自由权”，而采用“杀鸡儆猴”的办法曾屡试不爽。他曾放言：我就不相信“我一个政治局委员还不能撤一个局级干部”？

然而，这一次江泽民似乎有点儿失算了。

上海的淮海中路622弄——《世界经济导报》所在地，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条名巷。71岁本来快退休的钦本立，也突然之间举世闻名：

在钦本立的办公室里，他专用的那把圈形座椅，被报社的青年编辑记者们当作文物，高高地放在了电视机柜架上。说，“老板”的“宝座”谁也不能坐。“导报”驻京办事处租住的、破烂不堪的平房里，两部电话机昼夜不停地嘶鸣，传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问候。慰问信、致敬电使邮电局突然大发其财。平日里只有来去匆匆的记者的报社，宛如一座集市。

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就导报事件于4月25日和4月28日两次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发来呼吁书。呼吁书说：作为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他们深切关心上海市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书称：

“本委员会意识到你们政府目前遇到难以应付的局面，但我们作为维护世界同行的一个无党派的新闻工作者组织，尊敬而急切地请你们政府停止妨碍我们同行得到各种国际协定包括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保证的，报道新闻和意见的权利。”

28日，该委员会再次发出呼吁书，对钦本立被停职表示“深感不安”。指责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准则”，并请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该书还再次重申了其组织的“非党派”性质和“支持同行”的权利。

美国国务院在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在北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文艺报、华声报都有编辑记者前往导报驻京办事处慰问。在送达的致敬信中，有

的是同行借以表达敬意的。钦本立成了胡耀邦之后，在这个月份里收到信电最多的中国人。……

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总编辑金尧如、总经理王家祯给《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的来信说：

“陡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宣布撤销先生之总编辑职务，并下令停顿世界经济导报，我们香港新闻界的老朋友不胜骇异。近十年来，世界经济导报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三中全会的路线，循着以经济改革为党的中心工作的轨道，为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思想上，理论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个贡献和你的勇于破旧探新，勇于冒险犯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处于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的严峻关头，你的去职和导报的改组顿然令人忧虑这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信号……” 与他们的感觉相同，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因“反自由化”运动而去职的潘维明说：

“‘导报’在中国政治走向全面反动之际第一个倒下，这是‘导报’的光荣。”

更多的人也对于上海市委这种干预表示出深远的忧虑，有些信电甚至寄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所在地上海市高安路5号。……

中国的公民，按宪法的精神要求他们的领导党，应该是这个党在近十年中强调“法制”的一个必然结果。就在政府有意把“法治”这个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偷换成一个可为历代封建或专制君主接受的“法制”内容时，他们的人民却依然执著于心向往之的“法治”。这种法治，与人治和党治，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的。

但是，历史表明，法治，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政治形态，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中国虽自1954年起，有了第一部宪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它都表现出不是一个依照“成文法”处理政治事务的国家，而是一个依照“习惯法”处事的国家。曾有一则笑话说，某中国宪法专家到国外讲学，第一章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这其实没有一点可笑之处。这表明这位宪法专家不仅熟谙法律史，而且了解中国社会的实质。不仅中共党章，党的会议的决议和某一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真正的。最后的和最高的“宪法”。后者是前者运用时的真正根本约束，也随时赋予前者弹性和张力。所以，中国社会的两极——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和那些政治生活中腐朽的堕性力量，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有时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般均不拿在中国社会中并无真正可靠基础——民众觉悟和军队支撑——的“成文”宪法要求他们的领导党，而更多的是谈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精神。

下面，是发生在“导报”事件中的两个典型事例：

当时供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吴稼祥 在给钦本立的信中说：

“钦总：我不知该向您慰问，还是该向您祝贺。对您来说，在您各种离职的方式中，这是最好的方式了。您失去的，是总要失去的；您得到的，却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您应当欣慰，受损失的是作者与读者，是党的声誉，是改革事业。活到您这种岁数，还能让生命放出异彩，还能开创一项让世界瞩目的事业，还能有如此的勇敢精神加旺盛活力，应该算奇迹了。

人不一定创造奇迹，人本身就是奇迹。我这样写并不暗含否定加于您的解职行为，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价值理性……您忠于您的职业，政治家也可能认为解您的职是忠于他自己的职责。我们不能把您和政治家对立起来……这里当然有手段和价值判断问题，这有历史去做结论。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忠于自己职守的有理性的人。不同的职业要互相尊重，不必用自己的职业要求否定别人的职业要求。有时政治上合理，未必价值上合理；有时价值上合理，未必政治上合理。解您的职，不应被视为报人从来可以昧着自己的职业

良心，如果那样，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有不怕解职的，就应当有不怕被解职的。如此，则祖国幸甚。最怕的是一听说解职，一些人就吓得一身虚汗，大气不敢出，双手捂住头上的乌纱帽，没有多余的手去做事情。中国人的“官情”，坏了我们不少事情。祝您无官一身轻，益寿又延年！”

“六四”后，吴稼祥终于在自身追求的“价值”与他所服务的“政治”之间无法平衡的时候翩然挂冠，并身系图国，实践了自己对钦本立的祝愿。但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党内较开明、有民主思想的干部，对“导报”事件的真实思想。他们深知，哪怕是在号称“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有时，理想也不得不服从于政治。但在职业目标与政治利益之间，最终的仲裁者是法律，而这个机制，在中国尚属缺如。

与这位对“职业”角色有深刻体会的青年不同，严家其则抓住了上海市委的行为中既不合价值理想，又违反政治原则的把柄。在包遵信征求知识界“四二一”公开信签名时，严家其曾要求在信中加上避免1976年“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内容，说明他意欲从“四一九”导报座谈会的发言取“收敛”之势的立场。但此刻，在许良英的“激将法”作用下，他又站到了第一线。

4月28日，严家其起草了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今天，《人民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我们认为：

一、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报纸（非上海市委机关报）总编辑职务，这种做法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政分开”的原则的，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漠视。

二、中共上海市委某负责人说“导报”439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内容”，“将会加剧某些动乱因素”，这是对座谈会参加者的严重“诽谤”。

三、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经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和其它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宪法第三十五条，侵犯了新闻自由，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

对此，中共上海市委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应对诽谤4月19日座谈会参加者进行公开的赔礼道歉，保障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新闻自由。

“这是许良英要我起草的”，据严家其对笔者回忆，当时的情形是：

“1989年4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被上海市委免职，许良英一定要我起草一个声明。我说你许良英写，我签名。许良英说，你研究政治学，希望中国民主，临到这样的事，就不说话了，你的民主是假的还是真的？许良英说，你写声明，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我放第二。我对许良英这样说话的口气虽然听了不高兴，但在‘民主’面前，我听命于他……”

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58人中，部分是“导报”和《新观察》“四一九”座谈会的参加者，其他为知识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及青年学者、记者。签名者或出于对上海市委处理导报行为的抗议，或出于对自身权益的要求，或有感于自身职业领域的保守状况，但他们无一不是受到了“四二七”大游行的胜利的鼓舞，抱有趁势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的幻想。签名者中，还有收到邓小平4月25日讲话和4月26日“修改件”特别点名关照的党内民主派人物。邓小平希望他们，危机当前，从改革大局考虑，不要卷入动乱。其中不乏念及他们为“邓时代”立过功劳的相惜之意。但有的人显然没有听招呼。

有深谙中国政坛黑暗权术者，认为迫于“四二七”大游行后的舆论形势，邓小平一定会寻找机会“转弯子”，按其一贯作风定会采取“舍卒保车”的措施，而此时，在他一边的棋盘上，可舍者一为北京，一为上海。舍北京难以自圆其说。上海的事情与邓并无多少联系。所以，捏住上海，可能坐收一

箭双雕的效果——既为“新闻自由”打开一个口子，也给邓小平一个转弯机会，乘学运的东风扫荡保守派势力。

配合这一公开信，“导报”的上级主管单位之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也致信江泽民，指出钦本立“是受本学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主持世界经济导报工作的，停止他的职务，应由本学会及上海社科院负责人协商后解决。”该信指责上海市委的决定“违背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关精神”，即“党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政分开”等，谓之“不符合干部任免的法定程序”，宣布上海市委的决定“无效”。

在1989年4月下旬的特定形势下，“导报”事件激起了中国新闻界寻求自我解放的空前浪潮，它与学生“四二七”大游行闯开的新境界一起，创造出了一个建国四十年罕见的局面。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景象。但中华全国新闻学会会长钱辛波以其职业的敏感性预言，中国从此起“要么进十年，要么退十年。”

进入5月，北京传来有人要起诉江泽民的消息。被指派到“导报”任整顿小组领导人的马达，也开始向老朋友问计了。老朋友提示：“你既然身体不好……”

“四二七”之后，官方的舆论转而开始允许正面报道学运，政府和学生的“对话”也在酝酿中。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从北京传到上海的消息是，赵紫阳主张“导报”的事情应该“淡化处理”。甚至有责怪江泽民被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的意思。5月10日，江泽民进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汇报了“导报”事件过程和准备“缓解矛盾的想法”。赵紫阳批评了上海市委接管报社的决定，并指责他们造成了人民和党的对立，小题大做，自陷绝境。赵紫阳表示，中央不管上海的事。他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赵的理由是，如果现在中央出面，恐怕会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测，说是上海市

委在中央的压力下才采取措施“缓解矛盾”的。据说，在会的其余政治局委员对此都保持缄默。

对比邓小平4月26日对“导报”事件的意见，赵紫阳此时的态度，与邓小平的口径可谓大相径庭！一时间，江泽民感到，与北京“对表”，有点儿“对”不准了。自己如果不赶紧找台阶下，瞻念前途，很可能比钦本立还要提前结束职业生涯。据张伟国回忆：

“那个时候江泽民有点慌了手脚……听这些秘书讲，会议厅出来脸色大变。他也商量了一些对策，一个呢就是让陈至立来背这个黑锅。如果这件事情中央怪罪下来，由陈至立来担这个责任，因为她是宣传部长。江泽民他自己呢也在党政军的会上，内部变相地做了一些检讨，他甚至都讲到自己是缩头乌龟啦！……他找到李锐、苏绍智、季崇威等当时跟‘导报’比较密切的一些干部、老学者，希望他们来做导报的工作，导报退一步，检讨也不要做了，就做一个说明吧，那么上海市委也就不再追究钦本立的责任啦，大家退一步，这个事情也就了了。”

第五节 火上浇油的“对话”

“四二七”大游行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前任大使夫人鲍柏漪曾对马少方说：

“你们学生已经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场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尽管对话不尽人意，但是总算有了对话，这了不起。”

和鲍柏漪一样，后来的人们很容易从时间的顺序上把“对话”想象成当局对“四二七”大游行的退让，但实际上，“对话”的诉求产生于“大游行”之前。

学生第一次有记载的“对话”要求，发生在4月24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和平请愿”）通过校方提出与国务院负责人对话。经国务院方面同意，清华大学校方安排了15名学生代表参加，其中校学生会5人，研究生会代表5人，“和平请愿”代表5人。领导方面拟定由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镠、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袁立本出面对话。在双方就对话的具体问题协商中，“和平请愿”向校方提出：1、对话不仅要有清华大学学生代表，还要有“临时学联”的代表和记者参加；2、对话方式要协商；3、意见陈述后就复课。但校方以“和平请愿”中途变卦作为借口，否决了以上要求。

在约定的4月25日下午2：00，“和平请愿”的代表没有到达官方指定的“对话”地点——北京市委大楼二楼会议室。致使“对话”流产。

据王超华回忆，当时，清华学生没有去的原因，一是他们提出的“北大筹委会”应有代表参加未获同意；二是自己这边的对话代表还没产生：

“讨论来，讨论去，大概是从下午两点还是到几点。北京市那边就说，不对话了，学生没有对话的诚意。”“就这样在清华那来回好几次，最后决定在那个礼堂旁西边的大阶梯教室里边开选举会。”

4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对此事的报导。清华学生普遍对此意见很大，认为“这一报导的意图是想在学生中制造分裂。反映的情况不客观，不全面”。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运组织决定调整策略，“对话”议题逐渐提上日程。据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的江棋生回忆：

“针对4.26社论，北京高自联很快确定了两项主要诉求：不是动乱，坚决平反；平等对话，现场直播。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学潮的参与者虽然已被无端扣上了一顶搞‘动乱’的帽子，却还主动作出了复课的决定，并着手通

过选举产生对话代表，准备一旦官方稍有诚意，或可良性互动，以新的模式化解冲突和危机。”

而早在这之前，赵紫阳赴朝鲜之前留下的“三策”中，就有一条：“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赵紫阳的这个意见，与1988年体改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得出的结论和建议有关。这份题为《学潮分析：原因、后果及对策》的文件认为：政府对1985年以来的“第三次学潮”采取的强制措施后果并不理想：

“有11.1%的人对“政府在这次事件中采取的控制措施”表示满意，而表示不满意的人高达52.9%……根据此次学潮后调查，38.8%的人表示，自己对政府的信任感减弱了，表示加强了的仅有2.3%；34%的人表示对政府感到疏远了，感到亲近了的人仅有2.6%。学潮中和学潮后两次调查结果，对政府领导的改革没信心的人数比例分别为22.5%和24.2%，认为政府不理解或不太理解当今大学生的人数比例分别为90.6%和92.8%。”

因此，该报告建议，“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以疏导为主，强制性措施为辅。要致力于引导、消化、分散和削弱导致学潮的各项原因……”

该文件在讨论“安全阀机制”时，日本处理劳资矛盾的“春斗”模式被提出参考。报告还提出了“政府与大学生直接对话”的命题：

“从调查中看，大学生最重视这种方式。在回答‘此次学潮之后，你认为再遇到类似情况时，采取哪种参与方式为好’的问题时，高达63.8%的人选择‘大学生与政府直接对话’，居八种方式之首。在回答‘你认为政府在类似事件中采取何种对策为好’时，40.2%的人选‘政府高级官员与学生自由对话’居四种之首。应该防患于未然，学潮起来后再开始对话，已使对话变得困难。建议在有关部门专设一个或一些专门和大学生保持日常对话的机

构……日本通产省在调节企业或有关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时，做法是坐在那里听来访者将一切意见或对政策的不满说尽。”

“其次是校园民主。调查中，大学生们优先选择的第二种参与方式是‘在校内设立公开论坛进行口头讨论’，人数比例为36.2%。”

该报告指出，调查数据显示，诉诸街头政治，并非大学生的首选：

“根据学潮后调查，在对类似此次情况下的参与方式进行选择时，大字报、游行、集会只分别居大学生选择序列的第三、四、五位，比例为26.5%、25.7%和19.5%，远低于‘对话’和‘公开论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在此类事件中‘政府完全放任学生，不闻不问’是最佳政策的人，在调查中只有一个，仅占全体调查对象271人的0.4%。”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在《社会动员与社会稳定》一题中谈到，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过的一个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意思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动员越广泛，社会挫折越大，除非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高。因此，“社会动员不宜过早、过大。”

据陈一谔回忆，赵紫阳收到这个报告后，立即批示给了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委，请他们认真研究，但李鹏和李锡铭却将其束之高阁。

“四二六社论”把此次学潮置于非法地位的企图，因学生自觉的调整和统一行为而终于落空。但学生内部新生组织和原有组织的对立却成为不可避免。

受东欧改革风潮沐浴，特别是在波兰团结工会的胜利感召下，先进的大学生对于中国渐进民主道路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凭借宪法“结社自由”的条文，成立自己的组织；拥有了组织，就拥有了与政府谈判的地位。谈判一经开始，中国通向民主的大道也就从此洞开了！所以，自“新华门事件”以来，他们除成立了统一的北京高校临时委员会（又称高校临时行动委

员会)外,各校还先后不一地成立了一些学生自治组织。如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又称团结学生会筹委会(4.20);清华和平请愿委员会(4.23),社会主义民主进步领导小组;人大学生自治会;北师大学生自治会,青年教师自治会(4.22),中华知识分子联合会;北京高校联合会北京化工学院分会(4.23);中央民族学院民主爱国会(4.23);北外声援委员会;中华学生民主同盟;陕西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浙江大学民主科学促进会;天津南开新“五四”纲领起草组(4.18),新觉悟社——临时学生会(4.20),天津学生自治会(4.28);上海高校团结学生会,上海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4.28)……

受中共“一元”政治文化及农民运动史影响,他们有的也提出“废除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切权力”的口号。有的则考虑是否通过重新选举改造原学生会,或将学运中产生的“临时学联”与原学生会合并。这种意见虽遭到具有“多元民主”思想同学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但立即引起了官方学生组织和国家教委的注意。

4月21日,国家教委向部分省市教育部门和委直属高校发出《通知》,通报了北京、天津高校成立学生自治组织的消息,说“这些学校内或跨校的组织,既没有经过学校或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批准,又没有经本校或有关学校广大学生按民主程序选举产生领导成员,因此是不合法的。这些组织的存在,分裂了学生群众,会严重干扰和破坏学校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必须依法予以制止。”并声称,“有迹象表明,这些组织少数头头背后还有人参与并成立争取和串联工人农民参加的组织”。

原各校学生会的“头”——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也感到了某种威胁。4月25日,北京市学联发出《公告》宣布自身的“合法”和竞争者的“非法”。某校学生会的一位干部说:“他们可以一脚踢开我们,到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脚踢开他们。何况,他们没有政府撑腰,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迟早都得解散。”

也许是意识到“消灭”原学生会是一种缺少现代民主宽容精神的行为，为了不与原学联发生正面冲撞；也许是为避“四二六”社论中“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指控，为政府的镇压提供借口，“四二七”大游行胜利结束后，4月28日，北京市“临时学联”正式改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又称“市高联”、“北高联”、“高自联”），这一方面表现出它仍然勇于改正缺陷，有自我约束和政策调整能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坚持争取“结社自由”的决心。在这次会议上，北高联撤销了临时学联原主席周勇军的职务，选举北京师范大学吾尔开希担任新的主席，并决定常委5—7天进行一次换届。

在政府方面，促成本次“对话”出台的，是4月28日上午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以及当天下午李鹏主持下召开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在两个会议中，主张理解和体谅学生，严肃党纪、政风，呼吁取信于民的呼声强烈。不少人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决定：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安排，于29日下午，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对话。30日下午，由李锡铭、陈希同等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同时，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多渠道的对话。袁木、何东昌列席了这次会议。

为回应当局已透露出来的“对话”信息，北高联决定：各高校不能单独与政府对话，必须以整个北高联的名义，原则上平等，由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对话的时间、地点，要得到学生的同意。政府方面出面的，应该是学生要求的人员。

关于对话的具体内容，北高联次日（29日）继续开会商讨决定。本次会议还对罢课和下一步斗争形式及目标作出决定：专业性、艺术性、外语院校

明日可以复课。其它学校继续罢课到“五四”。今后是否游行，以政府的态度而定。斗争的目标，是要争取“北高联”的合法地位。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学生为争取宪法权利所做出的努力，并不取决于他们单方面的愿望。就在“四二七”大游行取得完胜的次日，不承认“四二六”社论失败的李鹏，赶在赵紫阳回京之前，祭出了自己的一套“组合拳”：其一，责成鲍彤起草另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用赵紫阳的人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其二，于4月29日开展与学生的“对话”。

据陆超祺回忆，鲍彤起草的这篇社论的发稿过程是这样的：

“（4月28日）晚上用社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这是为了缓和广大群众对‘四二六’社论的强烈不满情绪，李鹏叫鲍彤起草的，调子比《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低。因此，北京市委对它不大感冒，送小样请他们提修改意见，他们以此文不是针对北京市情况为由拒绝发表意见。

说这篇社论调子较低，主要是它没有把近来学生活动与动乱联系，而只把动乱与发生在西安，长沙的打、砸、抢联系。可以说，是总结了这两天的教训，羞答答地从‘四二六’社论的立场后退了。但学生们未必满意，因为社论还是落脚在要求学生赶快复课，赶快恢复学校正常秩序上来。

从逻辑上社论也有不够严密的地方。社论的一些论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中国经济现在之所以处在这样一种水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现在之所以受到这样多的客观因素制约，除了历史条件这个根本原因外，建设时间太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乍一听，颇有道理，但往细一想，矛盾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时间并不太长，至少不比我们的长，最突飞猛进的时间也不过十几二十年。政策对头，抓住了机遇就上去了，如日本和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亚洲四小龙’。现在有一种观点不利于我们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这就是动不动就说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百年才达到

的水准，我们只用五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达到，用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用以证明我们领导的多么英明。殊不知现在的科技水准与几十年前，与一百多年前很不一样。……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说得多，做得少，更是没有道理的。这除了说明我们一些同志继承了孙中山的‘训政’学说，抓住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个遗产不放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陆超祺的这番评论，可以说是“党内民主派”中批赵最严厉的文字了！它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周旋在激进的学生运动和“保守”的党内老人之间的赵紫阳团队的“戴枷舞蹈”、左右为难的困境！不过，更重要的是，当日的读者，还来不及查询社论的党派背景和细细品味其中甘苦，很快就被李鹏“组合拳”中的另一招夺走了“眼球”。

就在各大学校园热烈讨论即将与政府所作的“对话”应如何进行时，李鹏政府与学联共同策划的“对话”却抢先登台了。据李鹏4月28日日记，这个“对话”是这样出台的：

“下午3：00，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施压。他们准备利用‘五一’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争取中间群众。”

关于李鹏启用袁木的过程，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曾有过这样的说法：

袁木原是新华社记者，以能说会道著称。文化大革命中，受宠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1983年“整党”，因其检讨的态度和参与《李先念文

选》编辑工作，免于被打成文革“三种人”。1984年至1987年，借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8年，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袁木成为国务院新闻发言人；1988年下半年，又从李鹏那里争得了一块“国务院研究室”的牌子，但职务和机构级别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说法。

“新华门事件”发生后，4月20日上午，经与姚依林商量，李鹏决定成立一个固定的班子，来密切关注学潮的发展。当日下午2：00，李鹏找来了袁木，“要求袁木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密切关注这次学潮的发展势态，并在必要的时候代表国务院讲话”。李鹏对袁木说，“这件事我已与依林同志商量过。从今天起，你与何东昌同志、曾建徽同志集中精力主要做这项工作。”4：00，在李鹏办公室，召开了由李铁映、罗干、袁木、何东昌、曾建徽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等人参加的会议。李鹏说：

“开一个短会，找你们来的意思就是如何处理好这次学潮。各位从今天起要集中精力做这一工作。一定要密切注意学潮发展的动向，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一定要及时揭露真相。这方面，北京市将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随后，李鹏命令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从4月21日起，各地各部门报送给中办和国办的凡是关于这次学潮的材料，两办都要报送一份给袁木。据说，当时袁木就答应李鹏，以后“将每天下午当面向您汇报一次。”

4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决定由袁木出面主持对话。29日上午，李鹏召集袁木、何东昌开会，听取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准备的报告。会上，李鹏说：对话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望，一定要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小平、先念等老同志非常关注这次对话。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

在这次会上，李鹏对袁木、何东昌准备报告的一些具体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一条是：“‘四二六’社论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问题，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充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李鹏请袁木在对话中将这个意思捎给对话的学生并转告北京高校的广大同学。

不知什么原因，以上张良绘声绘色的描述，并不见于李鹏4月20日和4月29日日记。公众见到的只是如下事实：

4月29日下午，在未取得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话”在团中央会议室举行。政府方面参加的有牛皮哄哄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学生方面有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建工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其中，“41名是政府指定的各校的学生会干部，都没有参加过游行，只有4名是本次学运的参加者。即：北大郭海峰、北师大吾尔开希、政法大周勇军和郭恒忠。据后来担任北京高校对话团主席的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回忆：

“政法大学去了4个代表，周勇军、郭恒忠、殷杰、项小吉。殷是法大学生会主席，周和郭算学生自治会代表。不知道为什么法大当时要我去，我正在睡午觉，从床上拖起来的。也许因为我是法大辩论赛冠军，需要一个研究生代表。”

“在团中央会议楼门口，吾尔开希、周勇军、郭恒忠和我被拦住，等所有其他学生代表上楼之后才放我们三人进去，吾尔开希等得不耐烦先离开了。”

“我们三人进去后发现只有最后一排位子留给我们，这些显然都是故意安排的。殷杰为了表示不和我们一类，他和别校的代表坐在一起。”

“会议开始学生发言时，我第一个举手，但袁木叫别的学生发言（他们事先排练好的），我一直举手不放下来，后来袁木没办法叫我发言。我主要讲对话程序问题，认为4月29日不能算是对话。周勇军，殷杰都有发言。”

作为法大法律系国际法律专业的研究生，项小吉研究的正好是国际法当中的谈判。他当时正在写的硕士论文，也是关于联合国和平解决各国争端的问题。在好不容易取得的发言时间里，他尽可能地“运用了学到的法律知识”，提出了“建立对话代表团”的建议。关于这个思想的产生，项小吉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回忆道：

“对话、谈判、协商这三种形式的沟通，各有它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从谈判学上来讲，‘谈判’往往是在对立面之间进行，‘协商’通常是盟友之间，在对外之前内部先进行，而‘对话’是介乎于谈判和协商之间的一种形式。在1989年‘六四’以前，整个形势既不表明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也不表明学生和政府是什么盟友……”

“我当时主张成立一个组织，一个学生组织的对话团体，这个团体是有纲领的，有组织的，也可以说是有领袖的，是有主持人，有人出面负责的。有这么一个团体经常与政府沟通交涉，不是搞一次动作，作一锤子买卖，而是长期谈下去，那么，对各行各业就会有推动作用。如果坚持三个月，效果就不一样，工人、干部都会起来效仿。”

图4-15：（左起）郭恒忠、项小吉、周勇军在4月29日对话会上（项小吉提供）

在发言中，项小吉还谈到对话代表的产生和讨论的程式问题，在确定谈判的具体内容、地点和双方的人数达成一致后，再进入实质的谈判等内容。据《中国“六四”真相》记述，项小吉在谈到代表问题时说：

“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16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

“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

之后，是坐在他旁边的周勇军发言：

“我说了三点，第一，正因为有了政治风波，才产生了今天的‘高自联’。你是来解决问题的，就必须跟‘高自联’对话。如果你要跟原来的学生会对话，早就可以做了，也不要等到今天。第二，你说我们违法，而我们组织‘高自联’，恰恰正是根据宪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来做的。甚至在我们的口号里还有拥护共产党的内容（袁木说我们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第三，你说新华门前许多人喊打倒共产党，我现在可以证明你的说法不正确；另外我也可以证明，新华门前没有流血，但在其它地方流了血，包括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被打。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把我驳斥袁木的场面录了相，但是没有公开播放。”

据说，当他说到“我是北高联主席……”后，何东昌“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们不承认北高联，北高联是非法组织’”。

袁木、何东昌明确表示，他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针对北高联提出的政府代表应经学生同意的要求，袁木说：“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对话，不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而是为了互相交谈，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只要大家有诚意，愿意坐在一起谈，就不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

当场，就有北航学生表示抗议，拂袖而去。

在答复“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时，袁木说：“我还是认为我们党就总体或者它的大多数来说，党的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于是，同学们这次游行的时候，也就打着拥护共产党的口号，这个是基本前提，如果它已经彻底腐败了，从内部完全腐化了，已经变了质了，不要说同学们不拥护，我也不拥护。”

面对“中央如何过紧日子”的提问时，袁木说，“往年中央、国务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办公。”“要增加一笔财政开支。”“今年考虑到这个不大行，因为这和要求制订政策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大协调，已经正式宣布不去了。”他还大着胆子打包票说：“从此，我想也不会再去了，并已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进口豪华汽车。在回答“新闻要讲真话”时，袁木不顾三天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因坚持总编辑负责制被停职这个举世皆知的事实，公然撒谎说：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如果感觉到某项报导、某篇文章、某个社论没有把握，他可能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去，要求帮助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有的。”

在回答关于“四二六”社论中将北京的学生游行与西安、长沙的打砸抢混为一谈的问题时，袁木态度强硬地说，“我倒觉得北京高校里头一些在背后策划的人，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一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袁木借用“一个老红卫兵的名义”说，“现在的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

关于闹学潮的问题，袁木摆谱说，“我们也从年轻人过来，……我们在大学里面也闹过学潮，那不过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

袁立本在回答学生提出的“我们是爱国行动而决不是动乱时”说：“但是同学们也要想一想，特别是有的长胡子的人，我说是老一点的人，是不是真转过来了呢？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对于“学生游行为什么要用人民解放军进行阻挡”的问题时，袁立本回答：“我们北京市的公安力量并不多，所以只起个阻挡作用。但同学们也可以深思一下，最后我们没有阻挡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学生。”

关于“因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问题，袁木这样回答：“耀邦同志1987年辞职的事情，当时耀邦同志自己对他在那段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并且感到在当时他已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主动提出了辞职申请，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来又经过十二届七中全会批准。我觉得这件事是党内的正常生活，不能反映说党内的生活不正常。”

这次所谓“对话”回避了很多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如学生要求放映新华门的录像带，以证明武警有没有打人；“四二二”有很多官员从大会堂出来观看，却无一人与学生代表对话；为什么要将“动乱”的帽子扣在作为这次活动主体的全体大学生身上？为什么不能公布胡耀邦下台的真相？……等等。

据称，“对话”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李鹏与袁木通电话时，赞赏袁木“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非常好”。第二天，李鹏还专门对罗干和李世忠说，“老袁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图。”

李先念则对姚依林说：“袁木不简单啊。”姚依林的秘书马祖彭则讥讽袁木“包票打得太早了。”

田纪云在见到袁木的时候说：“老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按照一定方针被剪辑过的“四二九对话”通过电视在全国转播后，袁木、何东昌的表演虽然招来了大众舆论的憎恶，但“对话”的电视效果，却表现出学生不仅在气势上略逊一筹，就是在道理上，也显得底气不足。它让人疑

惑：“所谓学运，是否就是在这样一大堆互相矛盾和牵制的问题中盲目冲撞的自生自灭的运动？”

但失分更多的是当局。因为他们一手导演的“对话”真相很快就被揭露出来，借助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渠道不脛而走。他们在“对话”中的“小动作”一旦公之于众，立刻就威信扫地了。正如陆超祺在日记中评论的：

“从电视上看（非现场直播）好像很正常，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但现场采访的记者告诉我，电视广播是剪接过的，例如，对话快结束时，非官定的学生代表发言时，与对话者争论，双方拂袖而去的镜头被剪掉了。

尤其令人不解的，也可能会再一次激怒学生的是搞了一些小动作。……真正有意见的学生不找来谈，而偏偏找那些没有参加游行、唯领导意见是听的学生来谈，这种对话是真心诚意想解决问题，缓解矛盾的呢，还是做一个‘对话’的姿态给群众看，然后把‘动乱’的罪名加给学生群众？因为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有些人在会上申明：他们不能代表任何人。

二是谁提问题，问什么，都得事先提出（实际上是上面布置的），袁木等人的答复也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故他们才显得那么从容不迫。

三是最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次学生游行，对赵紫阳的意见虽然有，但并不多，也不太尖锐，而对李鹏的意见却不少，甚至有要他下台的。可是这次对话，学生提问中根本没有提李鹏，对赵紫阳却两次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一次是指斥他每星期打一次高尔夫球，脱离中国经济发展水准（袁木答理语）；一次是关于对胡耀邦的评价，指责赵在悼词中为什么把胡捧得那么高。明眼人不难看出，这里面大有文章。”

“对昨天的对话，报社没有听到有人说是明智的。老钱说：‘我不想用‘愚蠢’二字，但做得实在太笨拙。’老钱是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说话向来很谨慎，考虑问题很周到。他对昨天的对话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事后，赵紫阳也对这场“对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

在学生方面，这场所谓“对话”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29日当晚，北高联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在香格里拉饭店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承认4月29日政府与学校学生代表的对话。

4月30日，自“大游行”后渐归平静的北京各高校校园，又掀起了一波评价“四二九对话”的高潮。人们纷纷公布“对话真相”。也有人咒骂“袁立本是北航的叛徒，何东昌是清华的败类，袁木则给新闻界丢尽了脸。还曾说到某高层干部是北大的叛徒，”参加者是政府的“走狗”、“学贼”……等等。当时一幅流传广远的对联是：

避实就虚政府言啥立本

装疯卖傻国家何日东昌

袁（缘）木求愚（鱼）

人们揭露，大家在电视中看到的政府与学生的“对话会”实质上是政府与政府表演的一个“双簧”。不仅参加的学生不能代表广大同学的意见，在对话的时间上，政府29日中午12：00给各校发出通知，而会议下午2：00就召开了，根本没有给学生以准备时间。谣言还说，时任北高联主席的吾尔开希

实际上已经到达会场门外，但他被要求放弃“北高联”代表的身份和对话条件才准许入场，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因而未能参加“对话”。在所谓“对话”过程中，学生只能提问而不能反驳，因为提问之后甚至提问之中他们的话筒就被抢走。

人们感到，“除了何东昌小丑般地自作聪明外，除了袁木哼哼哈哈鬼一般精巧地推脱责任和袁立本关于‘大头鞋’与‘皮鞋’的狡辩外，从对话中，我们什么也没得到。这场对话纯粹是养猴人与猴子的对话，他们在默契的配合下，仅仅把对话的内容压缩在细枝末节，远远没有深入到这场运动的本质。”

他们愤怒地呼喊：“学生不容欺骗！人民不容欺骗！”

也有的大字报和传单对于“对话”中政府发言人的讲话内容进行了批驳。有文章说，“关于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政府发言人屡次支唔，回答总是所谓所作结论是针对‘一小撮坏人’，但我们学生的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根本不存在‘一小撮坏人’的操纵和利用。而且，根据所谓极个别的行为对全局定性的做法也是极其荒唐可笑，完全不合逻辑的。广大同学对所谓‘对话’的内容深表不满，我们坚决要求政府对这次学生运动作出正确的、合乎民意的评价。”“袁木说：‘本次运动与文革有惊人相似之处’。众所周知，文革是自上而下为权力之争而引发的动乱，本次学运是自下而上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民主运动，与‘五四’倒有惊人相似之处。把文革与学运联系在一起，那是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人们对动乱年代的恐惧心理混淆视听。”

对于这次“对话”中的袁木的形象，著名杂文家舒展当时就有一个很形象的描绘：

你忽而党员，忽而导师，忽而政府发言人，忽而老新闻工作者，忽而国务院工作人员的种种身份变幻莫测，于是产生了怪诞奇诡的喜剧效果，使人

感到你是在作戏。同时由于同你对话的45名大学生，其中41名的代表性和4名的合法性都使人怀疑，更增强了一场滑稽戏的剧场气氛……你明知你的对话对象中有非法组织的代表，作为国务院发言人竟然与他们侃侃而谈，要么你承认他们是合法的，要么就是你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参加这场既无代表性又无合法性的对话。

整个实况转播，你的镜头最长最多最大，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既然名之曰对话，那就多少要给大学生哪怕很短的正面镜头，作戏也得有陪衬的配角呀！

可惜有几个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影子片断，一时使对话变成了袁木讲演会。

……您的大智大勇、能言善辩，比起以前谈物价什么的是表现出长足的进步，说服力之强令俺拍案，感染力之深令我心酸……

图4-16：袁木何东昌在“四二九对话会”主席台

此外，舒展还批驳了袁木发言中的观点：“党风不正是对外开放后才有的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依着你袁木，该怎么才坚决呢？更多地开除一些党员？在各条战线一切领域来一个横扫？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人人自危的新的政治运动？难道党中央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部署，你还觉得不过瘾吗？”“在你批评党中央、赵紫阳和胡耀邦不坚决的三者之中，矛头显然是对准胡耀邦同志的。”

一篇《就教于袁木、何东昌先生》的大字报，则就所谓“长胡子”的“一小撮”问题驳斥了袁木、何东昌，它说：

在29日的对话会上，何东昌先生一再暗示有胡子的一小撮人在背后煽动、操纵学生运动。袁木先生在后面补充说，这些长胡子的人，比西安打砸抢分子更阴险。对此，我想向袁何二先生提出疑问：有胡子的一小撮到底指谁？

有何证据，务必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要有点法律概念，无中生有或不实之词是违法的。

……不错，是有不少长胡子的人同情和支持学生，他们和学生有共同或近似的政治观点。根据宪法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条款，他们有持有并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力，这和背后煽动、操纵完全是两码事……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向中央、国务院、人大写了“公开信”、签了名的。他们是在学生运动势不可挡，七条请愿早已提出，报纸把学生污蔑成一小撮坏人，并扬言要镇压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的。许多院校的教师，也是写了声明和呼吁书的。他们确实是长了胡子的人，但不是一小撮，他们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搞幕后活动，而是公开了自己的观点和姓名。把他们看作比打砸抢分子更坏的政治阴谋家，更是别有用心。目的是制造口实，打击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再一次向知识分子开刀……我呼吁，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为保卫自身的人生安全和群体利益联合起来，再也不能让每逢运动必受凌辱的局面继续下去了。

——男性成年有胡须

4月3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李锡铭、陈希等人再次与北京市属17所院校的29名学生“对话”，同样是由市学联出面组织，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撇在一边。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北京经济学院一位学生要求市领导公开自己和家属的收入。李锡铭当场进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两女都是一般干部，收入有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要求对学潮有一个正确评价，不能把罢课和游行说成动乱。李锡铭说，《社论》中说的“动乱”，是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同学们不愿听“被人利用”的说法，但确有人想利用你们把国家搞乱。

由于这次对话“悄悄地进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两次“对话”，虽然几乎涉及到此次学运关心的所有问题，如：“官倒”及党风

问题、教育危机问题、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关系图”问题、新闻自由问题、学生运动的定性问题、“四二〇”新华门事件与“四二二”请愿问题、以及与学运产生的组织——“北高联”对话的问题。但由于学生参加者缺少统一的布署与研究，所提问题不是空洞的概念，便是缺少充足证据的谣传，再加上无政治上提出问题和公开辩论的经验，轻而易举地就被政府发言人用诡辩糊弄、搪塞了过去。

这就使此次学运创造的与政府对话的机会，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双方理解、推动政府改革的目的，相反，利用这两次“对话”，中央和北京政府借机宣传了自己在反贪污腐化、惩治官倒、清理公司，等等“治理整顿”事业中所做出的业绩。而此次“对话”中学生集中提出的“官倒”、党风、教育及改革决策失误等问题，却或明或暗地指向了赵紫阳和胡耀邦！

人们因此认为，这场所谓的“对话”，是以学生的“表面的失败”和当局的“真正失败”而告终的。

但它不是一场孤立的失败，而是在一个已经越来越大的、滚动的雪球后面又推了一把。此后的未能真正复课、绝食，都是从这里开始，而不是从胡耀邦逝世开始的。在此之前，学生或许只是为了宣泄。“四二七”以后的“‘五四’再见”可能只是一种浪漫，但当再次被“愚弄”成为现实时，仅仅“宣泄”已经无法涵盖学运的意志了。他们至少要一次真正平等的对话！要求“公正”！而“公正”是介于“宣泄”和“政治企图”之间的诉求，也是最能维系人心的、获得最大多数人同情的价值。何况，这一次由于电视的转播，“人心”已经撒向全国！

第六节 对话团

在“四二九”对话中，只有四名参加了本次学运的学生进入“对话”现场。其中一人为北大“筹委会”成员。他曾出色地组织过“四二一”游行，并在“四二二”大会堂请愿时有过突出的表现。他就是北京大学国政系研究生郭海峰。但是，他在本次“对话”的选择，引发了学生运动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不管以什么身份参加，重在参与，对话是为了沟通政府和学生之间的信息，增进互相理解、化解矛盾；另一种观点认为，以“放弃原则”换取参加对话，是背叛行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把这场学运定位在“意见表达”层次，还是“推进制度的民主化”这个层次上。前者为普通意义上的“学生运动”，后者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运动。

事后的历史证明，北高联选择了更高的目标。

鉴于已有的传言，邓小平说：成立高联这样的非法组织就是想在中国打开一个“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口子，因而决不能让它得逞，不能让高联存在下去，而政府已经把北高联看作“非法组织”，学生又确有“对话”愿望，北高联想到，可以采取校园民主选举的方式，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与政府对话。

据王超华回忆，“关于对话团的建立也是在这几次会上就提出来了。对话北高联不一定出面”：

“4月29日郑旭光他们拿了北航弄的对话的条件，对话内容来了。实际上当时各校都在做这事，但是北航是做得比较好的，列得非常具体，是我所看到的几个对话条件当中最好的一个。只不过它是四条，而且没有列上胡耀邦。我们讨论认为这是不行的，这个运动要有前后承继性的话，一定要把为胡耀邦恢复名誉这个事放在第一条。这样到4月30日，高联开例会就觉得要是能设法把北航这个常委补上就好了……”

……4月30日，同时确定了封从德是新任主席……封从德以主席身份上去主持。就开始提出增补北航的常委，非常痛快地就通过了。因为郑旭光在会上好几次发言都很理性的，就被接受了，增加了一个。……最后确定的是九个常委。”

在这天的北高联会议上，酝酿成立对话团也经历过一番讨论。王超华继续回忆道：

“所以在30日的高联全体代表会上就讨论这个，说……只要政府是真诚的、平等的、公开的和学生中直接选出来的学生代表对话，我们就复课。这条件已经压得非常低了。所以说完全不必高联出面去对话，我们各校就可以去。所以北大开始选对话代表的同时，各校都开始选对话代表，高联发通知，让各校都选。”

沈彤回忆说，当时，北大最先选出的对话代表是王丹和杨涛，但王丹、杨涛看了“四二九”对话这个阵势之后，觉得他们不适合对话。而在本科生望而却步的地方，研究生却开始跃跃欲试，譬如社科院研究生院：

“我们学校那些人都不愿意出去搞组织工作，都是些博士生、硕士生，你简直支不动他们，一说选对话代表，都公开站出来了，‘我要去对话’，都觉得自己口才挺好的。”

后来成为“对话团”骨干的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卷入运动的。

5月1日上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北大球场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会上宣读了北高联关于“四二九对话”《声明》、对话要求“草案”、告香港同胞书、告全国高校同学书，以及由一些知识分子签名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并作出了成立“对话团”的决定。

据常劲回忆，上述对话要求“草案”，实际上就是后来引起官方重视的“十二条”。它原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理论信息部根据“四二九”后几次对话失败的教训拟定的。5月1日的北高联会议将“草案”略作改动，添加了有关成立“对话团”的内容后，以《请愿书》形式，派王超华和王丹于5月2日递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请愿书》说：

在“四二七”游行之后，政府通过新闻媒介表达了愿意与学生对话的愿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促成尽快达成实质性的对话，我们作为大家推选的代表，代表北京市高校广大同学，向政府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对话的要求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引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同学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团。在代表团内部经充分讨论磋商后，从中推举出若干名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务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允许双方邀请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拦。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允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均有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护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点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具体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5月3日中午12点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游行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点半，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送出这份《请愿书》的当天，北大筹委会还派出了柴玲和赵体国，试图联系“四二七”大游行前夕到北大来过的那位邓小平女儿的代表，传达学生“支持改革”的善意。但遗憾的是，他们没能见到关键的人物。而《请愿书》传达的两个信息，却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运动的能量在积累！（2）东欧、南韩事态的辐射。

这份《请愿书》于当日送达李鹏案头。他敏锐地发现：

“这封请愿书比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提出的七条要求调子降低了，不再提为耀邦同志平反，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组织的合法性。我们分析，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陆超祺5月2日日记，部分佐证了中南海当天讨论这份《请愿书》中提出的问题：

“晚上上班，看到老钱传来的一份情况，是根据今天上午中南海会议精神写的，主要讲学生游行的情况。总的估计是‘五四’的游行是难免的。学生代表今天中午提出请愿书，提出十几个条件，在北大原提的七条基础上加以具体化，其中不少是有关对话的，有些条件从政府方面看是太苛了点。有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即他们处处学习波兰团结工会。有人称他们为‘团结学生会’不是没有根据的。”

29日袁木等人的对话，看来是想撇开自发的学生组织——自治联合会，而只与党和政府支持的学生会打交道，面向广大学生，把广大学生与自治联

合会分开。效果如何，尚待实践证明。不过，现在看得出来的，是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坚决不买账，而被指定参加对话的学生也不满意，觉得更加脱离了广大同学，无脸见同学。如果现在硬要他们去做同学的工作，劝他们‘五四’不上街游行（前些时劝他们不上街悼念胡耀邦未果）不成，又不让他们主动领导同学上街，那他们就更脱离群众，将自己置于与广大同学相对立的地位。29日的对话会，已又一次置他们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这种做法，很难说是明智的。”

“中南海会议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29日对话后果的分析，与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与《请愿书》的希望却是南辕北辙：

5月3日上午，在学生请愿书指定的时间之内，袁木等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请愿书》发表了答中外记者问。在答问中，再次重复了只与原学联组织的代表对话的立场，嘲笑了《请愿书》企图让学生代表与党和政府平起平坐，甚至高于党和政府的设想。并对用再次游行相威胁的做法嗤之以鼻。此外，却对所谓“极少数”幕后操纵者，进一步给予了细致和具体的描绘。

5月3日下午，北高联特别大会按计划在北师大举行。在47所高校自治组织的基础上选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新任北高联主席封从德主持了大会。会议确定五四游行方案。据封从德回忆：

“当时有四套方案：‘北大荒地方案’与二环路‘手拉手方案’没通过，结果大家还是通过了传统的游行方式。当时，我安排周勇军作游行组织联络人，安排会场等；超华负责起草‘新五四宣言’。

对话团成立大会就在北高联特别会之后开，来了23个对话代表，熊焱、沈彤、项小吉都在。会前，我代表北高联只讲了几句话：这是你们自己的会，

北高联只是协助选了代表，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独立的组织。作了一点建议之后，我就离开了会场。”

据参加了这次大会的沈彤回忆：

“5月3日下午在师大的对话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上，各校代表都是学运情绪很重的自治会积极分子，这使我很失望。因为这样不可能做到很理性地去讨论，而且当时来的学校很少，实际上只有十几个学校。在这个时候大家也说不出所以然，都想着‘五四’大游行。……

正在大家争执不休的时候，项小吉进来了。我在4月29日听到他说话，印象很深。他一进来，很多人就说：他就是那个代表。”

原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项小吉在“四二九”对话中崭露头角后，他收到了来自全国的热烈反响。为了应付各地的来信，中国政法大学特为他设立了一个专用信箱。从此，在他的研究生论文外，又增添了一项内容：看群众来信。而当对话代表团筹备之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众望所归的人物。

“项小吉也很有准备，他拿出一张纸来，当时就提出来对话代表团的三个大方向，这就是对话代表团后来一直准备的三大方向。……这三大方向一提出来，本身内容没有经过讨论，但项小吉的准备和这种理性的方式很快被大家接受。所以当时就有人提议选项小吉为对话代表团的团长，推选我为对话代表团的秘书长。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拒绝了，我们两个人都认为在对话代表团有各校正式代表参加之前，我们两个人只担任召集人。

实际上直到对话失败之后，我们两个人都是作为召集人。”

在北高联的联络与推动下，5月3日，在各校学生广泛参加的选举中，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筹备会成立。在“对话团”与“北高联”之间存在的默契是，“对话团”原则上是独立于北高联的。

据王德邦回忆，北师大参加“对话团”的代表，是通过类似“竞选”的活动选拔出来的：

“……在‘三一八’纪念碑前，通过公开演讲、学生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了5名对话代表。后来实际参加对话代表团的共3名。我有幸成为北师大对话代表之一去参加对话活动。”

“代表团定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会议室召开会议。6日我去参加会议时，代表人数共三十余名，主要以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师大等高校的研究生为主，许多是博士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自然成了会议的主持者。社科院的何光沪以博学老成稳重而成为代表团倚重的对象。会议进行到11日，中国人民大学增选了江棋生参加对话代表团……他的儒雅举止、包容品格与严谨的逻辑思辨，几乎在当天下午就赢得了代表团人员的一致首肯。”

图4-17：对话团在法大教学楼开会（项小吉提供）

参加了当天会议的童屹也认为，“江棋生由中国人民大学推荐为对话团的一个代表……他说话很有份量……他说出的话，使当时在座的人员都有些震惊，觉得他的思辨能力、梳理能力都在一般学生之上。”

在北京20多所高校学生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为首的首都高校对话团，就下一步与政府的对话健全了组织，广泛搜集对对话的要求和意见。这个对话团主要由来自24个院校硕士班及博士班的40名学生组成（5月8日扩展到29校50人），其中只有三名成员来自北高联。5月5日，对话团成立三个议题组，根据其成员的个人特长，召集人指定了三个议题组的核心成员：第一组，讨论本次学运问题，以清华大学耿良鹏为核心；第二组，讨论深化改革问题，以政法大学张志新为核心；第三组，讨论宪法第35条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问题，以项小吉为核心。

王德邦分在第一组，他的任务是调查“四二〇”新华门事件。他找到了被施暴学生一条染有血迹、被撕破的牛仔服，当事人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指证警察的暴行。

据沈彤回忆：

“5月5日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开始具体定三大方向的内容……在三大方向原则确定之后，拟定了29个分主题。……当天项小吉、我和另外两个代表四个人去三个信访局交请愿书。”

这份《请愿书》的内容如下：

“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请愿书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最近，北京及全国各地高校学生通过游行、请愿等方式，反复表达了同党和政府要求对话的要求。党和政府领导人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表达愿意同学生对话，共同商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们作为北京高校学生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本着广大同学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态度，恳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约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的顺利进行。

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全面、公开、准确地作出报导。

我们准备于5月8日下午3：00左右前来听取答复。”

对话团的构成与性质，决定了它在学运中温和态度和学术的风格。对此，王德邦曾有一个精到的评论：

“对话代表团的理论素养在当时无疑是非常高的。有几个还是当时国内不多的法学博士。然而，大家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是不够的。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建构、现实如何改良等都缺乏系统的认识。因而对话提出的问题和改革方案都较零碎。没有一整套系统的东西。……因当时的条件所限，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中国文化思想界自身研究刚刚起步，对外国的东西接触吸收也很有限。尤为关键的是，由于胡耀邦的开明执政，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新气象、新活力，学界在根本性问题上对现政体是认同的。……因此，代表团的根本立场，是帮助改进政府不足、促进社会健康良性发展。我记得当时最大胆的质疑也无非是宪法前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当然，财产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在考虑之列。……总体而言，对话代表团相对政府来说，还是站在一个进言上书，甚至献策的地位。”

由于“四二七”之后政府做出的新姿态，使人们幻想一个“对话的时代”已经开始，也就为对话团造成了一个今后学运重心的前景。为此，北高联对话团的工作也采取了积极促成的态度。而北高联自身却因失去“对话”的筹组权，也日益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据万润南回忆，4月29日，吾尔开希曾向他提出“组建一个北京高校联合的文工团，希望能够得到四通赞助和支持。”那一次，这位维族小伙给万润南留下了“阳光、帅气，而且有灵气”的良好印象。

第七节 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由于“四二九”对话发生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它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这是否当局从镇压信号——“四二六”社论立场的退后？而它的形式，

似乎是对“四二一”知识分子《公开信》的一种响应。这使得向往“东欧道路”的人们产生了朦胧的希望，认为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中国这个具有古老专制传统帝国通向“圆桌会议”的政治大门就此打开。为此，在八九民运前期一直处在幕后的社经所，开始改变姿态，从“以个人名义介入”，转变为有组织地介入运动。

如前所述，自胡耀邦逝世以来，社经所以对运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李进进、刘刚、陈小平、王丹、高瑜、任晓町、吴仁华等与社经所有（或保持着）各种联系的运动骨干或积极分子发挥作用。其支持的方式，一是给钱，二是提供物资方便，三是提供咨询或交通方便。现有资料显示，主要有如下几项：

（1）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起，陈子明就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2）4月16日，社经所《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并希望学生4月22日“都到人民大会堂外”。

（3）4月17日，社经所兼职人员陈小平是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带到广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上街的学生队伍）。

（4）4月21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一起商议了当晚学生示威活动的口号和有关事宜，并提供3000元经费。用以采购了喇叭、旗帜、横幅布等游行物品。用在了此后发生的“四二二”人民大会堂请愿和“四二七”大游行中。（5）当天，为郑义派车，提供知识界“公开信”联署和递交活动。

（6）4月23日，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开车前往北大，与王丹等就学运的现状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提供3000元经费。

（7）同一天，任晓町在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广播站进行讲演。当时的任晓町，妻子被陈子明接纳为社经所工作人员。他本人向笔者提供的履历则有“1

987-1989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记载。 尽管他并不认同陈子明对于民运“鼠首两端”的态度，在本次演讲中就曾嘲笑了那种“胡子一大把，还要往里钻，很愚昧”的人。

（8）（23日）当晚，刘刚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高校联合组织。此前，刘刚曾在“四二〇新华门事件”中充当重要角色）。

（9）4月30日，社经所专职人员费远、兼职人员郑棣，在《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事处与其他人一起发起首都新闻界联合行动。

据陈子华记载：

“由于长期以来陈子明、王军涛被一些人视为‘职业革命家’，在运动的这一阶段，几乎每天有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向他们咨询学运的战略与策略。”

尽管在物资、精神和智慧方面给予了这些“街头运动”以支持，但奇怪的是，各方资讯却显示，陈子明本人对之却没有多大的热情。

“陈王当时向许多人谈到，历来的学生运动（游行、罢课等）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必须做到有张有弛，能放能收。”

4月23日，该所在双泉堡汽修厂租用的驻地举行了一次“与运动有关的‘沙龙活动’”。参加者除陈子明、王军涛外，还有闵琦、刘卫华、陈小平、谢小庆、石小敏、刘力群、杨百揆、姜洪、王润生、梁治平、远志明、谢选骏、高瑜、王小平、王锦娜，以及体改所的杨冠三、杨晓和中央办公厅的吴稼祥等体制内人士。陈子明在会上再次表明了自己作为“思想理论界人士”的身份和面对群众运动应采取的“超脱”立场。他说：

“尽管在座的人可能都到过天安门广场，但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要身份是思想理论界人士，在大家都热的时候特别需要强调清醒。‘你能不能加强、加速完成上层文化的重建，能不能加速完成知识阶层的组织化过程，能不能

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磨合，能不能加速完成你从一般百姓的牢骚中，一般百姓打成一片的不满情绪中尽快地超逸、超脱出来，构成一种对老百姓的新的指导力量，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我觉得这就是当前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先进分子所面临的一个时代性的任务。”

但就在当晚，陈子明又要陈小平到北大“找到王丹等人，用车把他们拉出北大”。陈子明在车上不但和王丹们“讨论了学运的形势与前途”，还“交给了王丹3000元活动经费”。

据刘刚回忆，第二天，他曾将成立“北高联筹委会”的事向陈子明通报，并请陈子明对他草拟的“北高联”章程提意见。但“陈子明就一句话：如果需要资金就尽管说”。

这种既“超然”又“不超然”的姿态显示出莫测高深。但更奇怪的是在4月23日沙龙中陈子明大谈“文化危机”时，专门对所谓“流氓崇拜”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根据这次“沙龙活动”获取的信息，4月24日，就在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学运情况，李鹏当局决定组织撰写“四二六”社论的同时，陈子明秘密拜访了陈一谔，对体改所对本次学运的态度进行了试探。据陈一谔回忆：

“4月24日夜，杨晓带着陈子明来看我。子明也对学生的过分情绪化很担心，询问我的看法。我和他说：‘青年学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好处，却没有尝到过共产党的苦头，难免把事情看得简单化，这次搞不好又会演出一场悲剧！一定要引导他们从实际出发，不可能一步达到目标，提的口号要让大多数老百姓能接受。’”

据陈子华说，4月27日大游行后，陈子明、王军涛分别在学生和中央政改办的陈小鲁谈话中，都主张“有张有弛”，运动的重心应由游行、集会转向政治对话和校内民主建设。表达的依然是对于“街头政治”的厌倦。

但是，4月29日“对话”的消息播出以后，社经所立即召集各方人士，对形势和对策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据《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回忆：

“他们现在把所有的请愿要求归结起来，两点：一个是自治会，一个是‘导报’。通过导报呼吁新闻自由。分析下来，导报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实体，是一个社团实体，地位本身是合法的。所以，解决‘导报’的问题，比解决学生自治会的问题要容易得多。如果在学生自治会这个问题上坚持，陷入僵局，划不来。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适当退让，然后导报这一块硬要咬住，中国的新闻事业如果在这个事情突破，反过来，对于学生自治会东山再起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没有这一块为它创造大环境，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陈小雅：我听说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学生运动嘛，应该校园民主为先，是不是有牺牲‘导报’的可能？”

“张伟国：这两个组织所产生的，为社会提供的政治产品也不一样。学生的流动性很强，毕业以后马上就完蛋了。（外院马上就有两个被分配回老家了。原分到中央单位）。所以，昨天大家这个看法与你说的正好相反。他们都在。原来学生考虑的好像是相反的，因为他们感到导报和他们的关系不是太密切。当然要呼吁，通过这样解释后他们也同意。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都能成功。但是作为一个对话条件、对话要求提出来，就提出两个要求，最后大家做了一个折衷，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结局，从这个角度考虑不太可能牺牲导报，因为这个问题操作很简单，上面只要对上海市委做个决定……”

“陈小雅：问题是他不会这样做，这样做没人替他干活了。”

“张伟国：那么就上海市委烂掉。这个让你自己去权衡。你到底是希望这种无序状态继续下去，弄得整个海内外新闻舆论都沸沸腾腾，还是想快刀斩乱麻，一次痛完算数？效果很明显。我想，江泽民这么着急，和他自己的困难很有关系。不单是和整个政局有关，这个矛盾变得千夫所指，又何必呢？作为一个政治家，绝对不想陷入这样一个困局的。”

张伟国作为“导报”的人、“导报事件”的始作俑者，希望“导报”话题在学生和政府的对话中受到重视，并率先得到解决，情有可原。但不久前刚刚发表过学生应该回到学校，开展“校园民主”的陈子明，却一改十天前的态度，主张学运应进一步与社会各界的运动加以联动。5月10日，陈子明、张伟国一行与香港文汇报副总编程翔、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等在与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项小吉、童屹就对话的主题进行讨论时，就提出假设“政府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两个学生提出的要求中只能满足其中一项”的情景，问学生该如何取舍？当时，陈子明认为：现在政府不大可能正式承认‘北高联’，只要政府承认现有学生会领导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就可以满足了。”

陈子明的“假设”，基于新闻界与政府已开展对话的事实。很有可能，他通过胡启立那条渠道，已经得知5月6日赵紫阳与胡启立、芮杏文关于新闻改革的谈话。或者，他还从李锡铭的渠道了解到，北京市、国家教委和老人们对学生“非法组织”绝不纵容的态度。如果这就是他改变十天前态度的原因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动机，在支撑着社经所这样不惜工本地往学运的“街头政治”里投资？又是什么，给他们原先似乎“厌倦”的情绪中注入了“强心剂”呢？张伟国对4月底社经所会议的描述，有助于人们揭开这个呼之欲出的“主题”：

“……从政治运动到政治组织，然后到政治权力，这个过程很清楚。中国由于政治组织老是发育不出来，所以，它的整个震荡在运动和权力之间来回摆动，不能建立正常的通道，稳定的秩序，这个都建立不起来。现在，关节点已经到了……现在的形势，是形成了三线：一线是学生，二线是知识分子，像苏绍智、方励之、金观涛啊这些人。三线是他们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分工：像陈小平、刘刚这些人联系学生；像军涛啊、闵琦啊，这些和知识分子关系比较好的，联系二线；三线由子明自己主持。这三条战线的关系是什么呢？一线，学生是运动主体，给政府造成压力；二线的知识分子给学生支招；三线制定方案，和政府谈判啦……”

这段追述，揭开了陈子明尽管厌倦、不屑，但仍不惜工本地要保持学运势头的原因。那就是，让学运对政府保持“压力”，最终逼迫政府和自己“谈判”。既然这个谈判只有自己有资格主持，自然也就没有项小吉、童屹什么事情了！

其实，早在八九民运爆发前夕，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刘卫华就与香港《镜报月刊》主编徐四民进行过一次座谈。在这次座谈中，陈子明就提出“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的路线。

“陈子明说：‘西方民主程序给予的权威比政绩给予的权威更具有可靠性。’‘对正在由自发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知识分子，仅仅小恩小惠来收买，给个局长、部长当当是不行的，而且参政方式只开后门（靠亲友、秘书等关系打个小报告）也是不行的。要开前门，要容纳具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是进行公开讨论，有必要对知识分子采取倾斜政策。’”

在这次座谈中，王军涛说：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就是要重新对自己的文明模式进行选择。”“应就十年中酝酿的新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论争，也就是中国应对自己现代化的模式进行通盘性的思考。”“解决这种危机必须用创制的方法。”

在这次座谈中，陈小平说：

“修改宪法也是当务之急”，“把中国转向民主制，既需要思想、观念等这样大的准备，也需要对具体的运作规则具体方案，以至很小的技术性措施进行改造”。“知识分子民主的自发的参与，本身就是对执政党的制约”。

那么，是基于什么认识，陈子明及其社经所认为，政府会认真打这张“对话牌”呢？难道这不是一厢情愿吗？

张伟国继续回忆道：

“目前是一场政治危机。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它现在是一种倒置，先应该有经济危机，然后社会危机，然后政治危机。……胡耀邦的死，把这个程序打乱了。接下来的是，当政治危机没有建立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上的时候，这对于政府很难得的，政府的对立面现在是中产阶级，是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民主与法治，它希望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发展。如果社会危机到来，触发的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这个时候再产生要求，那就不是一般民主与法治的要求，那就是共产党领导革命，不和你干了。这个时候你政府想对话也对不成。所以，现在给你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这既是政府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社经所像陈子明这样卧薪尝胆十余年，有强烈参政渴望，又不得其门而入的知识青年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些“热议”通过各种研讨会的形式，在社会上也有所流布。如北大学生沈彤的回忆，就是一个佐证：

“这种大的环境使一些学运的活跃分子认识到1989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机会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全民的不满，各种政治、社会危机的因素造成的一种机会。另外是消极地去看，如果1989年没有什么大的举动的话，那么至少民主运动就要推迟三至五年，就是说最早，当时估计可能下一个机会是在1992年，在经济上国际社会压力比较大，就是还债高峰开始的时候才有可能有下面一个机会。同时紧缩政策好像是开始发生作用……像王军涛、陈子明这样的人在各地也有了，就是1987年以来积累下来的这些社会活跃分子跟校园的联系，跟学生也有联系。”

据张伟国回忆，4月底社经所的会议，也是在这种乐观的期待中召开的：

“如果能够政府、知识分子联手，至少不要对抗，能够合作，那么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希望的。不是说后面两个危机可以避免，但解决这两个危机时的信心可以多一点，能力可以强一点。”

在这种激动人心的形势鼓舞下，5月1日，社经所在香山召开了所务委员会，又称“香山会议”。在会上，陈子明作了题为《形势、任务与反思》的工作报告，并获得“一致通过”。该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对形势的判断，并就“运动的目标以及有组织的分工等问题”进行了部署。请看陈子华的回忆：

“一、形势判断。《形势、任务与反思》指出：‘截止1988年上半年，十年改革这一比较顺利、平稳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充满困境与危机的新阶段。’”

“在经济上，通过实行‘让利、放权、给好处’的政策，通过对积累和资源的掠夺性消耗，增加各种投入，取得了生产和消费总量的增长。但是各种经济效益指标并没有明显好转，经济结构指标更形恶化，中国经济经过十年改革并没有转入‘高积累、高效益’这条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在今后一、两年中，国民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将出现下降趋势。”

“在政治上，发展方向虽然已从建设‘理想国’转为建设现代化国家，但政治人事尚未完成代际更新，原有的‘强制动员型’体制已经失效，但尚未被新的体制取代。因此，出现了合法性体制架空，体制外政治盛行的现象，合法性权威迅速流失，政治主体不择手段，不讲规则，攫取利益，腐败之风在全社会蔓延。”

“在社会上，人口状况继续恶化，企业内待业现象没有丝毫的解决，农村剩余带动力以每年八百万人的速度增加，‘盲流’人口犹如脱缰之马，使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承载力濒临极限。财富和权力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满的积蓄，多数人感受到心理挫折和社会不平。黑社会悄悄地滋生。资源状况和环境问题引起社会有识之士日益增加的关注。”

“在文化上，‘流氓崇拜’压倒‘精英崇拜’，社会上层文化‘礼崩乐坏’，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完全依

据功利标准，缺乏精神支柱和道义的感召力。一般民众乃至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都笼罩着一种世纪末的颓废风气。”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创业敬业精神削弱，对政权的信任度下降；市民阶层（包括工人和一般职员）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和外化；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的蜜月已经结束，政治疏离加快，革命情绪抬头；统治阶层日益消沉和腐化，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均严重跌落，一种政治无作为的心态和状态正在出现。”

“现在的社会领导阶层和统治格局，已经不能保证使中国现代化的航船驶出险滩。只有以弘扬理性原则，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精英为先驱的中国中等阶层的迅速崛起，只有现有领导阶层与新的社会力量迅速达成妥协和共识，才能避免宿命论的预言，使中国步入稳定发展的坦途。”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个社会中立性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幼苗，无论是在统治阶层、中等阶层还是一般民众中都是如此。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死死抓住既得利益，不肯作出任何妥协，坚持用镇压的方法来对待知识精英政治表达和参与的要求；如果知识精英和一般民众中的革命情绪由于社会经济原因的刺激迅速高涨，以感情因素对待感情因素，以破坏方式对待镇压方式；如果具有理性的知识精英不能团结起来，迅速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势头，而是陷于无休止的争吵、内战，我们所期望的社会前途就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无论是革命浪潮将社会仅存的合法性权威席卷而去，还是统治阶层中的顽固派将社会理性的幼苗扼杀在摇篮中，都将酿成社会的悲剧。唯一的出路是社会理性力量的超水平发挥，迅速渡过危险的襁褓期，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运动目标。《形势、任务与反思》指出：‘推动知识精英迅速成长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使命，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政治方向和纲领。这个政治方向应当是理性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可操作的、以民族大义为重而不是以本阶层本集团的利益为重的。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形成一种彼此沟通、理解、协商、合作的机制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从而能够将分散、微弱的声音聚集、放大，引导政治家前进并教育广大民众。方向和力量，是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缺一不可。”

“为可能出现的镇压和革命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是我们当前第二位的任务。在思想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创造尽可能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以迎接各种可能的前途。在力量配置上，我们应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

“在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中，迅速形成与中青年学术界的‘官厅学派’相对峙的学术组织和联合体，迅速形成与学术界老一辈的广泛统一战线。并将这种组织活动与思想建设和各学科的理论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学术界率先造成组织多元化同时又能达到妥协、合作的格局。”同时，“广泛联络政界（共产党、民主党派、政府、人大）、军方、高级文官、地方当局、司法界、新闻传播界、企业界、文化界、海外人士及民运人士等，建立不同层次的社会联系与合作关系。”

“立法创制是今后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以学术界为基础，推动社会各界以立法方式进行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目前，应着重进行修宪和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示威游行（集会）法等基本权利法的制定。”

“三、组织分工。《形势、任务与反思》指出：‘如果我们真有心在大风大浪中一搏，进行开创性的社会政治活动，我们必须在团队性质和目标上达成高度共识，并对团队的每一个成员的素质提出严格的要求。’政治坚定性、献身精神、善意态度和自制能力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几点要求。’”

“应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很敏感、善于应对、富于首创的人。我们缺乏的，恰恰是对于突发的灵感、欲念、冲动进行必要克制的意志力，是对于轻重缓急的适当安排和周密协调能力，是防止自己成为应急事件和他人盛情的俘虏的坚强决心，是经常进行回顾、反思、检查和总结自身工作的良好习惯。”

“除了提高个人素质，还应提高整个团队的组织素质。这种组织素质应当体现在‘形成明确分工，每个人各负其责，实行责任制’；‘既有坚强的核心，又有组织弹性和适应能力，提高开放度和吸纳能力。’”

据陈子华回忆：

“社经所团体从孕育诞生起，一直带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色彩’。但是，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

那么，社经所的主要工作方式，和本次运动的分工究竟如何呢？

关于主要工作方式，陈子华在《凤凰涅槃——八九民运中的社经所及其代表人物》（征求意见稿）中的表述，与她后来发表在《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中的内容稍有不同，现罗列如下，以供分析：

（1）在《凤凰涅槃》中是这样表述的：

“1989年5月社经所‘香山会议’决议将其概括为‘一主两翼’（也称‘一体两翼’）：推动知识精英迅速成长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在力量配置上，我们应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

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

（2）在《浴火重生》中是这样表述的：

“1989年5月社经所‘香山会议’决议将其概括为‘一主两翼’（也称‘一体两翼’）：主要任务是推动知识阶层迅速成长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在力量配置上，应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影响接近权力中心的咨询机构和积极参与各种民间政治活动为工作的强有力的两翼。”

这两个版本，除了语法的表述方式略有调整外，微小的差别只在于，前者在描述“咨询机构”时，使用的是“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而后者使用的是“影响接近权力中心”；而在描述“各种民间政治活动”时，前者使用的是“尽可能地接近”，后者使用的是“积极参与”。

但两种版本的表述，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指的其实就是以陈子明为主体的、主持“制定方案”和与政府对话的“三线”；“咨询机构”指的是类似体改所、政改办的“智囊机构”；“各种民间政治活动”当然指的是学生运动。故此，陈子明事后在与笔者“对质”时亦承认：“你说它是‘三线’也可以”！

据此，通俗地说，社经所承认，它在八九民运中的策略，就是以体改所或政改办一类的机构为一翼，以学生运动为另一翼，托起社经所主体起飞！

据陈子华回忆，1989年5月1日，陈子明在“香山会议”上又重提“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象，以经济为后盾”的团队发展战略。会议明确了“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三项原则，并对每一名所务委员在“一体两翼”布局中的具体任务作了明确分工。那么，社经所所务委员的具体分工又是怎样的呢？根据现有资料，有三种版本：

一、陈子华版本，有三种说法：

（1）“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

（2）“5月1日，社经所在香山召开的所务会议，确定由王军涛、陈小平和刘刚负责与北高联建立联系，由郑棣负责与新闻界建立联系，由此开始了对八九民运有组织的部署和介入。”

（3）5月1日，社经所在香山召开的所务会议，确定由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高自联”建立联系，由郑棣负责与新闻界建立联系，由此开始了对八九民运有组织的部署和介入。

这三种“版本”虽略有不同，但社经所人员（不限于所务委员）在“一体两翼”结构中的分工大体是清楚的。其最大的一致性，是完美避开了饱受诟病的“三线”分工内容。其中，（2）和（3）一个既微小却也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抹掉了刘刚在“联系学运”一翼的角色。这种处理，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刘刚作为一位在公安部门有案底的、以萨哈罗夫为人生楷模的“职业革命家”，对初期运动难以磨灭的作用，与该所的“不介入”姿态和“文化”外衣相冲突，故而当《凤凰涅槃》变身为《浴火重生》公开出版时，刘的名字被抹掉！二是，刘刚不接受陈子明的钱，遇事独断独行的风格，与该所的“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三项原则相抵牾，故而约定“两厢情愿”，井水不犯河水。在“做”史时，自然就抹掉了他的名字。

但是，关于社经所在八九民运中的“内部分工”还有另一个更早的版本，那就是该所另一位“元老”王军涛的版本：

二、王军涛版本

“一线是直接介入其中的人，包括后来由我推动谈判和协商，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由王丹、包遵信担任召集人。……二线是子明他们，不中断研究，不介入运动，但是要准备在紧急关头对第一线的援

救……第三线的是研究所的主体，不仅不介入运动，也不介入政治，是纯粹的研究，作为本钱保留下来。这就是所谓‘三线’，本来也只是我们所的一个工作部署，与运动无关。三线的计划是有的，人质的想法是没有的。”

另外，王军涛还解释道：

“三线计划的背景是，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不想介入太深，因为研究所正在对中国经济作一个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政治、社会危机和出路的研究。但是在运动中，我们团队中的一些人进入得比较深，比如政法大学的陈小平、还有刘刚等。所以我们就想一方面有人介入运动，另外一方面还得保持研究，于是‘三线’计划就出来了……”

王军涛说“三线”计划“与运动无关”，但又将本次运动中涌现的学生领袖王丹、知识界领袖包遵信列入该所的“二线”，这本身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不过他的版本至少可以对前述张伟国的版本给予佐证，他对“不介入”的动机进行的解释，也是完全符合该所在八九民运发生前的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正如该所的另一位资深所务委员谢小庆所说：

“去年春天，陈 曾在一次谈话中讲：知识界虽然在消化人类现代思想方面有优势，在青年中有影响，但他们缺乏实际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政治运作的经验。相反，以留苏同学为主体的技术官僚，却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知识界应争取与技术官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1988年底，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 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正由于这种考虑，在去年风波期间在对待李鹏的问题上，他们经常有投鼠忌器的苦恼。”

与新政府的“技术官僚”合作需要拿出成果，所以，自1987年以来，该所以“兼职”方式组织了一批与“胡赵改革”思路不同的各科学者，利用业余时间搞“纯粹的研究”。由于该所的各类研究室并无真正的实体，所以这

批在该所并无编制的“专家”成了该所的“本钱”和与官方“合作”问路的“敲门砖”：

“我们搞的经济部分叫‘赶超工程’。怎么起源的呢？先是1986年‘体改所’开会，召集各方，陈一谔很乐观，说增长300亿，说明改革的路子对了。XX听过我的估计，说是亏损120个亿，改革只是放权让利，搂草打兔子，结果打了一只家兔……陈一谔很慌，说这不是否定改革吗？宏观组（‘体改所’最早建立的一个组）的人怨我闹得大家不欢。事情汇报上去，赵紫阳、鲍彤也怀疑。既不相信那么高的增长，也不相信亏损，问财政部。财政部说不会吧？账上增长了300多个亿。但不知道那个数是从哪儿来的。是积累的钱。工人一看增长就加工资，所以，积累全摊百姓头上去了，吃空了国家。但过了不到两个月，传来了消息，说财政出了赤字120个亿，这下慌了。李鹏也来找……这就有了1986年下半年的大借债和廉政建设。”

“1987年十三大以后的‘治理整顿’，陈一谔他们很灰。但是陈子明、王军涛很热心，让我弄出个东西来。那时候不是要搞十周年反思吗？……但他们名曰‘社经所’，但没有搞经济的人，有的几个是票友（一般都被吸引到体制内去了，因为经济是热门话题）。费远和郑棣很支持，找来XX。他说干一月胜读三年研究生。还找到一个女孩，写字缺胳膊掉腿的，叫我给训哭了……”

“（1989）大约是‘现代化讨论会’（王军涛、陈子明是政治组的）筹备前……定规矩，只许我们找他们，不许他们找我们。两摊没关系。我们一天到晚铺满床，插进来就乱。我提要求，定大纲，说。磁带都录了50—60盘。可人家那边怎么干活儿呢？找来几十号人，讨论了许多天，我只见军涛、子明一天守着个电话机打个不停！”

“我问过军涛一次，世界上有多少种政权形式，从极右排，一直到极左？有没有继承关系？机制是什么？军涛说不出来。讨论了那么多天！后来我又问过子明一次，国内、党内有多少种派别，从极右到极左，各派态度，阶段

表现。子明憋了半天，说出一句话：你这不是一个‘政治光谱’吗？倒是挺通俗的。你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有次在我房里折腾，我出去了，回来一看，一个人没有，除了乌烟瘴气就是一屋子香蕉皮。”

“陈子明就像个守财奴。家族统治。没有干部子弟那种政治素质。他们欠我帐……可能还是把我们当用完了就甩的那种人。”

这段叙述，帮助我们揭开了在八九民运初期，社经所迟迟不愿全力投入之谜。因为他们还抱有运动过后，继续寻求与赵紫阳以后的“技术官僚”合作的念想。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必要对这场与“胡赵”关系很深的“运动”太在意，也不愿将“三线”投入运动，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不过，以后的事实证明，“一线”和“二线”在陈子明的棋盘上并非可有可无的“阵线”。运动初起，“抠门儿”的陈子明就大方地“撒钱”就足以证明。但将这个“三线”计划和盘托出的文字，大概直到5月21日才见诸报端。这一天出版的《经济学周报》，刊登的题为《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的“本报评论员”文章说：

“……必须理解，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

对照4月底张伟国描述的“三线”计划，这段文字不仅在内涵上，甚至在表述方式上也基本相同。对此，XXX也是洞若观火的。他曾一语道破：

“……陈一直怀抱被招安的愿望。被招的本钱：能收服学生。收的两个环节：1、影响和控制学运领袖；2、影响学生精神导师。为了这个，布了两条战线：前者通过王丹、刘刚、陈小平，还有钱、用车；后者通过包遵信……”

“为实现这个愿望，一是始终与体改所保持关系，通过白桦……；二是始终保持观察位置，作期待状。他们并没有多少越轨行动。但要在各界提高声誉，表现见解的优越、能力的优越（在工会、知识界）以保持价值。但政府不知好歹。”

据知情人透露，就在拜访陈一谔的第二天，4月25日，陈子明曾经与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秘书通过电话，请对方转告领导人：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的，打个招呼就行。

“这应验了一句话：在两个非理性巨轮面前玩弄理性游戏——哪怕是真正的政治，只有被碾碎的份！”

注释

GEORGE SIMPS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NEW YORK: T. S. SIMPSON, 1937), P. 4.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七节：学生的绝望。

关于陈明远与北大筹委会的关系，可参见常劲“中国人的脊梁——记陈明远先生在八九民运中”，《新闻自由导报》1992年5月29日。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35—136页。

刘刚《我的同乡陈明远》。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24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七节：学生的绝望。

王超华，女，192年生。山西平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指吾尔开希。

王超华《高联：从自发到自治》。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4—36页。

梁二（梁擎瞰、梁兆二），男，1969年生，四川蓬溪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7级学生。

梁二《师大与高联》。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1—32页。

同上，第32页。

马少方，男，1964年生。江苏省江都县人。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王超华《北高联：从自发到自治》。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5页。

梁二《师大与高联》。同上，第33页。

同上，第36页。

此处依据刘刚提供的文本。马少方记忆：“目标是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见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51—157页。

刘刚《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51—157页。据刘刚提供的名单，当日参加会议的法大代表除周勇军、王治新、浦志强外，还有于渚刚、周游斌、张东风、张文方、锺磊。

浦志强对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征求意见稿）》的校订意见（1994）。

刘刚《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51—157页。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刘刚《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51—157页。

同上，第151—157页。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39页。

八大艺术院校指：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

据刘刚提供的名单，当天到会的民院学生，除石翁外，还有尤尔都斯、西生、阿力克木。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据刘刚提供的名单，签到院校是20所。另有十余人没有签到。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王志新，男，1967年生。山西省介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

同上，第151—157页。

刘刚网文《我的同号陈明远》。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0—42页。

梁二《师大与高联》。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1页。

王超华《北高联：从自发到自治》，同上，第41—42页。

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91页；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参见王超华《北高联》，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70页；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97页；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杨涛，男，1969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参见王超华《师大与高联》《北高联》，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3、70页；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36、420页注[277]：据北高联副主席王超华回忆，五二三高联整顿后北大主席就是高联主席，她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确称杨涛为「北高联主席」（《新闻自由导报》1995年6月9日）。北大筹委会副主席常劲则说，5月15日以后高联负责人就是杨涛。见《回顾与反思》第217页。

《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载<http://www.epochtimes.com/gb/3/5/30/n321216p.htm>

万润南《我的 1989（2）钦老板》。

参见本书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五节：政改催生的自由化浪潮。

《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

2016年3月11日，陆一与陈小雅的谈话。

《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六章 第六节：《新观察》、“导报”座谈会。

张伟国回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

见中纪委《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问题之三。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关于上海市委从何处获得导报报道计划的消息，此处采用《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的说法。忻华实《〈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对这个情节进行了回避，称上海市委宣传部是从座谈召开的前两天——4月17日海外报刊的报道上获得这个信息的。见《人民日报》1989年8月18日。

“导报”人士说，这是绝不可能的。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3页。

《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

忻华实《〈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8日。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3页。

同上，第133页。

同上，第134页。

2016年3月11日，陆一与陈小雅的谈话。

见《戴晴狱中交代手稿》（063）。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4页。

2016年3月11日，陆一与陈小雅的谈话。

忻华实《〈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载《光明日报》1989年8月19日，第二版。

2016年3月11日，陆一与陈小雅的谈话。

龚心瀚，1941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2016年3月11日，陆一与陈小雅的谈话。

高瑜《新闻自由是吾辈的目标和旗帜——我和〈经济学周报〉》。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35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瑜《新闻自由是吾辈的目标和旗帜——我和〈经济学周报〉》。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3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30日，第84页。

同上，5月28日，第212—213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2000年11月1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参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七节：“治理整顿”的来踪与“倒赵风潮”的去迹。

即李先念任政协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的职务暂时不动。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

据2016年3月11日，陆一与陈小雅的谈话。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八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0—42页。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0—42页。

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有关部门负责人”有何东昌、袁木、曾建徽。该书称李铁映也参加了会议。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4日，第6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4日，第66页。根据李鹏日记，4月23晚上是杨尚昆先建议李鹏找邓小平汇报。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认为，4月23日当晚李鹏、杨尚昆已经谒见了邓小平。吴国光也怀疑本次“常委碰头会”是在邓的授意或许可下召开的。但《六四真相》对此没有任何记录。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5日，第67页。

同上。

据《邓小平年谱》此处还有一句话：“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丧失前途。”见第127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5日，第67—7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4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5日，第70页。

据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一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5日，第70—71页。

李鹏5月27日向中顾委介绍情况。载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谭文瑞(1922—2014)，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余焕春（1935—），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钱李仁（1924年—），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引者注。

指范荣康（1930—2001），时任《人民日报》主管评论的副总编范荣康。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30—32页。

陈小雅《XXX谈话录》。1993年。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32—33页。

同上，第33—34页。

二者的比较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147-148页。

据“中南海”人说，“四二六”社论就是徐惟诚执笔。见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0年6月2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封从德，柴玲的丈夫。

《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65页。

《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64—65页。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0页。

同上，第2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无“西安事件”4月21日的报道，此处时间应是4月20日午夜以后，21日凌晨。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同上，,150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1月版，第29页。

同上，第30页。

传单《新华社记者报道的“西安事件”》。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大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30页。

传单《新华社记者报道的“西安事件”》。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大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31页。

传单《新华社记者报道的“西安事件”》。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大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30页。

同上。

传单《新华社记者报道的“西安事件”》。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大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30页。

同上，第31页。

同上，第31页。

同上，第3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传单《新华社记者报道的“西安事件”》。

《参与长沙“四·二二”事件 二十七名罪犯受到惩处》。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2日，第2版。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大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37页。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8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0页。

《辞海》“国会纵火案”条说：“国会纵火案 德国法西斯阴谋陷害共产党人的案件。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国会大厦，嫁祸共产党人，大肆逮捕和迫害进步人士……”

新华社记者王煌彦报道。

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第二节。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万润南《我的 1989（1）悲剧序幕》。

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香港）开益出版社，2001年版。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p. 333 - 334; Salisbury 1987年10月7日对万里的采访。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3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第54 - 56页。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第81 - 84页。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3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第445页。

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版，第281页。

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版，第283页。

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第284 - 286页。

《人民日报》，1979年1月31日。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农业合作化以后，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社员开山造田，兴修水利，取得了粮食丰收。树立了一个农业集体化的样板。1963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反对困难时期兴起的农业单干风。

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傅高义2009年4月对姚监复的采访。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15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版，第278 - 288页。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18页。

何维凌《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29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2000年6月30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1996年10月29日杨继绳《赵紫阳口述杨继绳笔录》。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574—575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第四部分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据赵紫阳回忆，李鹏任总理后，田纪云就曾对他表示过，万里任总理比李鹏要好。见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4年11月13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指胡耀邦、赵紫阳、万里。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12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3页。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8页。

同上，第49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0页。

见本册第四章 第三节：大游行。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34页。

同上，第35页。

同上，第36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1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5页。

详见本卷第八章 第二节：北高联。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0页。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7页。

王超华《四·二七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2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7页。

王丹、封从德赞同游行，沈彤、孔庆东、王迟英反对游行。见沈彤《四二七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63页。

封从德《四·二七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7页。

同上，第63—64页。

王超华《“四二七”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1页。

同上，第41—42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

王超华《“四二七”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2—43页。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2页。

此人据称是某人大副委员长的外孙。见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据刘燕称，4月23日圆明园会议时，石翁在民院并不是选出的代表，更无职务。因民院学生自治会是4月26日才成立。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0—41页。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王超华《“四二七”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2—4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王超华《“四二七”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4—45页。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3页。

浦志强对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征求意见稿）》的校订意见（1994）。

同上。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另据柴玲回忆，当时这位来说：“邓琳非常担心老头子的身体健康问题，希望问你们学生到底要求什么，不要造成更大的误会。”见柴玲《跟官方接触：北大与邓琳》。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12页。

《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66页。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加入清华的队伍后应不止这个数。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同上。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4页。

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主题歌，为当时流行歌曲。见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八节：“黑手”行迹。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4页。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同上。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4页。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5—7页。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同上。

此政治笑话应是在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因为大学生文革时年龄尚小，对姚文元的文风体会不深。当时许多文章为躲避“散布谣言”之嫌，均假托学生之口。因世有“童言无忌”之文化。可以免于追究。

邓小平为四川人。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此是与当时流行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对应的口号。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7—8页。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8—9页。

同上，第9页。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中国百姓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由于多年的闭关自守，即使在政治斗争中也难免恪守“内外有别”的原则。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张明澍《4月27日》（手稿）第9页。

同上，第11、7页。

同上，第12—1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

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载《新观察》1989年第10期。陈小雅《薛涌见闻录》1989年4月28日。

陈小雅《郭黎见闻录》1989年4月28日。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出版2009年，第172—173页。

穆望（高瑜）《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载《镜报》月刊，1989年6月号。

陈小雅《张晓刚见闻录》1989年4月30日。

关于“四·二七大游行”的人数，北京市与国家教委均统一用“3万”这个最低数。这个数字是根据各校报送的数字统计的。当时因慑于“四·二六社论”的口径，为保护学生和自身利益起见，各校都尽可能把这个数字缩小。所以不足为凭。给这一天游行报出最高数目的是香港《明报》月刊，在1989年6月号的一份大事记中称“4.27 五十万人上街游行”。根据人民大学教师尚晓援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用秒表大致掐算为十万人左右。但这种算法没有考虑到各校之间后来越来越拉大的距离，及行进速度的递减等因素。所以仍为乐观的人数。而5.16游行官方报道的是数十万，5.17游行为“40万”，虽然这个数字与他们企图给赵紫阳“分裂党中央，促使动乱升级”罗置罪名有关，但与事实基本差距不大。

毛泽东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四五运动”例外，其主要参加者为青年工人。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邝岩《动乱“记者”戴晴》。原载《光明日报》。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14日，第2版。

江棋生《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段》。载江棋生《看守所杂记》，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年。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37—38页。

张敏《鲍彤谈“秦城交代”》。载《民主中國》<http://www.chinamz.org/ftpgb/mz0109b.gb>，2001年9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三罪犯趁乱抢劫银行在京伏法》。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6日，第75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

该呼吁书的署名者为劳里·贝克隆特；劳伦·杰格莱昂；柯曼·麦克卡赛。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7日，第78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205-207页。

见《世界经济导报》信稿摘编，增刊三。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207页。

吴稼祥，1955年生，安徽铜陵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副研究员。

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中《赞成与犹豫》。

2015年2月16日，严家其给陈小雅的电子邮件。

严家祺《在人生列车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第282页。

见《世界经济导报》信稿摘编，增刊三。

《世界经济导报》记者李俊杰采访钱辛波。

原上海《文汇报》总编辑。

5月2日，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期间，谈到《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时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5页。

萧辰邦《“六四”当中的赵紫阳与江泽民》。载《新世纪》网站。

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56页。

《张伟国谈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内幕》。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参见周锋锁《六四口述实录》。

王超华《清华与北高联代表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8—39页。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封从德认为，这好像是5月13日绝食开始后才提出的两项诉求。

江棋生《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段》。载江棋生《看守所杂记》，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年。

该调查和报告由社会研究室与社会舆论调查室组织的“改革中的社会阶层和利益调节”课题组完成。

转引自《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15—518页。

据百度百科：“春斗”，又称“春季生活斗争”、“春季工资斗争”，是日本工会每年春季组织的为提高工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1954年，合化工人联合会委员长太田薰提出此案，1955年开始第一次春季斗争。此后，每年都由各大工会联合组成“春斗共斗委员会”，领导春斗。现在已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固定形式之一。春斗一般采取谈判的方式进行。

转引自《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20页。

同上，第521页。

同上，第522页。

同上，第523页。

北大团结学生会王丹和北师大吾尔开希均发出过“废除原学生会”的号召。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8、32页。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9页。

见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4页。

封从德在4月28日阻止过同学占领官方学生会的行动，见《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40—41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238页。

同上，第157页。

同上，第238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记载4月20日上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下午会见了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4月20日上午常委会，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三节：高层意见的分化。

另一说，吾尔开希受阻的原因是他通报姓名时，说自己是“北高联主席”。

项小吉2015年5月19日给陈小雅、江棋生的信。

同上。

亚衣《为了中国的社会公正——访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召集人项小吉》。载《流亡者访谈录》。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第24页。

同上。

同上，第2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亚衣《“六四”牌不能再打——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载《中国之春》1993年，第4期。

同上。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对此有几种不同说法：一说是项小吉和周勇军离开了会场。据项小吉对笔者回忆，

是北航的一个学生拉他离开会场，项不同意，同时劝他也不要离开。那位同学离开一段又回到了现场。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同上。

同上，第240页。

同上。

同上，第241页。

同上。

同上。

李鹏的大秘书，兼国务院副秘书长。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同上。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41—43页。

同上，第43—44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王超华《我所知道的对话团》。载《中国之春》1992年第7期。

王超华《与政府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72页。

舒展《致两个袁木》。载《新观察》1989年第十期，

见《人民日报》1989年4月30日，1—2版；5月1日2版。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第231-232页。

王超华《我所知道的对话团》。载《中国之春》1992年第7期。

参见《明报》记者采写的《北高联的四十日》、陈启明《学运领导问题浅析》。

王超华《与政府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72页。

北航代表郑旭光、崔春杰。

王超华《与政府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73页。

同上，第73页。

沈彤《与政府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0页。

王超华《与政府对话》。同上，第72页。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一节：五四：收官？还是新的开始？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日，第89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46—47页。

在北大西门外荒地举行集会。

封从德《组织与对话：北大与高联》。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69页。

沈彤《与政府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1页。

项小吉在对话中的电视镜头有幸没有被剪掉，他的发言也登上了报刊。

亚衣《为了中国的社会公正——访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召集人项小吉》。载《流亡者访谈录》。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第23页。

沈彤《与政府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1页。

封从德《与政府对话》。同上，第72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4页。

江棋生《我的心路历程(上)——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采访录》。载《北京之春》，2006年2月号。

项小吉曾荣获“第二届亚洲辩论赛”最佳辩论员称号。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4页。

沈彤《对话团》。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1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5页。

万润南《我的 1989（6）刘晓波》。

晓华《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3年3月版。第204—205页。

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

据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13页。详见本册第二章 第三节：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晓华《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3年3月版。第204—205页。

社经所并无此类职称系列，也无考评资质。

见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整理《回顾与反思》张伦的回忆。

详见本书第五卷，第十章 第八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据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同上，第472页。

同上，第444页。

同上，第471页。

刘刚《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同上，第458页。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68页。

据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472页。

《张伟国与陈小雅谈4.30社经所会议》（根据录音整理）。

同上。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页。

详见本书第五卷，第十章 第八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详见本节结尾。

《张伟国与陈小雅谈4.30社经所会议》（根据录音整理）。

1989年3月22日。

参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二节：异议运动的萌动。

当时，不乏有参政未逞的知识界人士批评，陈一谘、何维凌“发展组一体改所”的成功模式，是靠“走后门”成功的模式。见《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421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页。

同上。

同上。

1991年7月17日—24日“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巴黎”。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62页。

指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张伟国与陈小雅谈4.30社经所会议》（根据录音整理）。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458页。

同上，第459页。

同上，第459—460页。

同上，第460页。

同上，第460—461页。

同上，第462—463页。

陈子华《凤凰涅槃——八九民运中的社经所及其代表人物》（征求意见稿）。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据2013年1月7日，陈子明与陈小雅的“对质”（录音）。

陈子华《凤凰涅槃——八九民运中的社经所及其代表人物》（征求意见稿）。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

陈子华《凤凰涅槃——八九民运中的社经所及其代表人物》（征求意见稿）。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亚裔《政治是责任、智慧与善意——访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王军涛》。载《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转引自亚衣《流亡者访谈录》，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第308—309页。

同上，第308页。

指陈子明。

指陈子明、王军涛。

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载香港《百姓》杂志，1990年6月16日，第218期。

1991年2月12日XXX与陈小雅的谈话。

同上。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89—490页。

1991年2月12日XXX与陈小雅的谈话（节录）。

2015年4月9日，罗立为与陈小雅、XX的谈话。

1991年2月12日XXX与陈小雅的谈话

（陈小雅《89民运史》第4卷 13万字 全文完

八九 民运史

第五卷 赵紫阳“新政”与运动转折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
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十章 总书记拨转船头

第一节 五四：收官？还是新的开始？

第二节 高层：两军探底

第三节 “出手”时机的选择

第四节 亚行讲话

第五节 为赵紫阳“把脉”

第六节 与邓小平拉开距离？

第七节 东风、西风、旋转风

第八节 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第九节 赵紫阳的“双周维新”

第十一章 从学运到民运

第一节 对话、罢课无果——绝食的酝酿

第二节 柴玲脱颖而出

第三节 阎明复临危受命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意见——《光明日报》座谈会

第五节 艰难的对话

第六节 找不到党

第七节 失败的斡旋

第八节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注释

第十章 总书记拨转船头

1989年5月4日，掀起这场运动的学生在“告一段落”的期望中，度过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一天。70年后的“五四”，人们以它光辉的精神为动力，胜利地欢聚天安门广场，这无论如何也是少男少女们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借以寄托的一个完美结局。

设想，如果八九民运就此结束，历史在书写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抑或是这四十年重大事件时，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可以肯定，它也会同人们在“五四”这一天的感受一样——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它或许会成为接下来中国健康民主运动的首篇，而不是历史中断后的一个遥远的回想；它或许会成为一次历史的传奇，虽未留下现实的成果，但却可以一代一代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流传下去。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一改其神秘的沉默面孔，带着“收拾残局”的架势公开亮相，并积极干预这场运动时，它的命运就变化了。

因为，在“朝野矛盾”之外，另一对决定运动命运的矛盾——党内矛盾——由此登台。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乘专列回到北京。紧接着发表了对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拨乱反正”的“五四讲话”与“亚行讲话”，并创造了一次共和国有史以来的“新闻维新”奇迹……

赵紫阳，到底要干什么？

第一节 五四：收官？还是新的开始？

五四前夕，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对局势曾有过一个估计：北京的学运高潮，已随“四二七”大游行而过去，并将以“五四”为界告一段落。而全国的学运高潮则是在“五四”。果然不出所料。

据事后有关部门统计，4月27日清华大学有2000余名学生参加游行，但到5月4日的游行参加者已减到不足千人。5月5日，清华开始复课，第一天的上课率即达85%以上。在复课的一周内，本科生有80%—90%的同学坚持上课，研究生基本上都上课了，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也全面恢复。当时，不论学校的干部、教师还是参加过前期运动的学生，都觉得“五四”确是一个“收官”的最佳时机。

在5月4日这一天，全国有30个省、市都爆发了学生、教师游行请愿事件。他们提出的口号，共同内容有：发扬“五四”精神；促进民主化进程；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要民主，要自由，要科学；打倒官倒；公布领导人财产状况；廉洁政府，惩处贪官污吏；反对官僚主义；抑制通货膨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坦诚对话，反对训话；解除报禁；保障人权，健全法制；新闻、言论、结社自由；声援北京学生；反对镇压学生运动等。

也许与“北高联”的南下游说团的工作有关，5月4日这一天，北京以外地区全国上街游行的有130所高校，人数达到12万。其中，山西太原有8000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门前静坐，口号除与北京学运相似的内容外，还有“争取煤电的地方利益”，“重新评价胡耀邦”等内容；西北重镇兰州，6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内有要求澄清4.20科技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在宪法允许范围内成立学生组织；制订从政道德法、或廉政道德法等8条内容；杭州市十所高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除提出上述共同口号外，还提出公开紧俏商品，诸如彩电、冰箱、自行车等的优惠票证的分发情况和流向；在西北工业大学“五四青年会”的组织下，西安市有三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参加的学生均佩戴校徽，穿军训服，提出“要求纠正舆论对西安学运的歪曲”，并有“吃喝官员魏明生滚下台”的口号；中南重镇武汉市12所高校三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向省政府递交了有6条内容的《请愿书》；重庆市6000 学生上街游行的口号中则有：“半文盲，大富翁，中国特色；傻博士，穷教授，中国独有”，“官倒不灭，改革必败”，“民主不明，中国无望”等口号；上海市6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散发了《告上海人民书》，书称：“市民们，物价飞涨，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率达20%以上，中国已处在危机中。39%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下降，42% 的上海市民生活水平下降，制币的印刷机在紧张地、昼夜不停地运转，仍然供不应求。市民们，你们想过没有？钱到哪里去了？该是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榨了。我们要作真正的主人”；天津市8所高校5000学生在南开大学举行纪念“五四”集会，打着“谁镇压学生运动，谁就没有好下场”，“外保球籍，内争人权”，“政治公开，新闻自由”等标语上街游行；长春市三所高校5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的口号中有“反对政客”，“反对滑头”；大连市两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市政府门前静坐，标语口号中有“反对专政”，“反对封建专制”的内容；福州市约两千名学生冒雨举行了游行，并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中独特的内容有“提高师范生助学金”，“取消定向分配制度”等；长沙市3000多学生在鞭炮声中走出校门，横幅标语中有“收回《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还我4. 24《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恢复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开辟人民批评政府渠道等内容，游行还向群众散发了有“取消封建特权”、“抑制物价上涨，挽救农业危机”内容的《告同胞书》并进行了讲演；厦门大学2000学生游行后，向市政府提交了要求查处浯屿驻军殴打厦大学生事件；南京2000多名学生在游行中散发了《南京五四宣言——再造一个青春中国》，号召“所有的中国工人、农民、子弟兵、学生联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自由平等，享有人权的中国”，向省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中有：一、集体造成的决策失误应

集体辞职；二、强烈要求75岁以上党政领导辞职；三、中共经费不应在国库内开支；应由各界人士组成廉政委员会，公开查处官倒内幕等内容；昆明市2000多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贵阳市1200名学生“飞行集会”；成都市高校6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广州市有数百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在石家庄市，5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远在青海的西宁市，青海师大、教育学院、青海民族学院也有近千名学生先后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静坐请愿，民院打出的标语中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内容。安徽合肥，江西上饶、赣州，河南洛阳，陕西宝鸡、咸阳，湖南湘潭、衡阳、娄底，河北保定均有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

面对这些游行，各地学校均先由教师、干部进行了一番无效的劝阻活动。公安部门有的设置了象征性的路障，但没有硬性的阻拦。有的事先做了清道工作，甚至全程随行。凡口号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游行，都与市民发生了较强烈的共鸣。

图5-1：五四游行（选自卡玛、高富贵《天安门》）

然而，5月4日，对于李鹏来说，原是一个令他提心吊胆的日子。自“四二七”游行胜利结束，邓小平避居北戴河，把北京的烂摊子扔给李鹏，政府不得不仓皇打出“对话牌”时，这种忧虑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4月30日赵紫阳回京，这虽然可以卸下他责任的包袱，但那势将自己前段的辛苦付诸东流。对此，他唯一的希望是继续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因此，4月30日，就在去火车站迎接赵紫阳之前，他给邓办打了一个电话，李鹏《“六四”日记》写道：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李鹏此举，自然是想在和赵紫阳正式讨论学运之前，求得邓小平强硬的指示，以便在赵紫阳面前或为自己主政期间的不得力辩护，或在讨论未来方

针时有“尚方宝剑”支撑。但是很遗憾，李鹏没有从王瑞林那里得到任何答复。

5月2日是“五一节”的星期天倒休日。这一天，“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但随着“五四”的迫近，李鹏却陷入了另一个深深的焦虑：

“10：00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步，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

据李鹏4月28日日记，那一天，他就收到“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这份记录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为此李鹏连日来都在寻找“五四”对策。4月29日，北京市委提出，由政府出面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但李鹏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感觉欠妥而没有采纳。

他也曾寻求万里的帮助，万里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此时，李鹏的另一个担心是，害怕赵紫阳回来后不支持“四二六”社论。他曾向阎明复流露，如果赵不支持他，“他只有下台”。5月1日的常委会，赵紫阳的态度已经很明显。因此，他只能在日记里流露内心的孤独和惆怅。

图5-2：要改革家，不要糊涂虫（陈小雅摄）

李鹏自省道：

“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也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嘛！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李鹏的心声，流露着“找不到党”的迷茫。难道他此前发表的不是中央的声音？邓小平的讲话不是中央的声音？“四二六”社论难道不是中央的声音？更加使他感到压力的是，学生指名道姓和他对话的要求，明显在挑战他的极限。人的木讷不一定是缺点，汉语不流利也不能作为职业歧视的根据，但这一切与他对学运格格不入的感情，与不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性格加在一起，不是明明白白要他的命吗？

就在李鹏陷入苦闷的时节，学生其实也在找党。直到5月1日这一天，柴玲才从郭海峰处索回那个自称与邓家有关系的人的地址，并将“四二七”游行出发前与那人的遭遇及谈话内容 报告了组织：

“我向筹委会报告了在 27 日游行前来找我的那个号称认识邓小平人的事，他们同意再派一个学生代表去看看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人直接联系邓小平。直觉告诉我如果能够像这个人说的代表学生领导层与邓小平当面对话，那么他们就可以解释学生方面究竟在做什么，这样邓就可以看到我们对民主

改革的真实动机和愿望。邓小平也许不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他至少会知道学生对他和其它的领袖并没有恶意。我完全相信爱与和平会在互不相信的人之间架起桥梁，软化领导们的心，并结束这场运动向暴力的升级。”

“在又热又潮的城市里走了将近一天之后，我们才凭运气找到了那个来找过我的人。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他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自信了，而且说他和邓小平一家没有什么真正有用的关系。

然后他说：‘他们已经离开北京了。’那时一般人还不知道邓家离开了北京。

正当我们很失望地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人似乎又重新考虑了他说的话。他不仅没有赶我们走，反而把我们请进了屋，提醒我们未来的危险。他说政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镇压，而他不愿意看到更多人失去自由。‘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共产主义体制是多么黑暗和残忍。你们要特别小心。’他的妻子也一直敦促我们停止抗议，她的脸上尽是真诚的担忧。”

“后来我们了解到邓小平对 4 月 27 日大众的反应感到高度警觉。民众认为邓小平被李鹏夸大事情的严重性所误导了。邓小平的全家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他的放逐而备受牵连，但是在很多时候，好心的老百姓帮助、保护、爱戴邓的一家。他们的心里对帮助他们重新上台的中国的百姓和北京民众有感激之情。听说邓小平的两个孩子来到北大，试图建立和学生们沟通的桥梁，但是他们来到北大南门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些学生和旁观者报复性的谈论。邓的儿女缩短了他们的行程，然后邓小平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去了离京城几小时车程的夏季的避暑胜地北戴河。”

“当我们结束了和这个人以及他的妻子的会面后，他叫了一辆车，并找了一个司机把我们带回北大。两个举止麻利、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他们做事的速度出奇的有效率。他们告诉我们说看过了抗议的录像，并且他们能够很轻易地认出和我一起坐在车上的一个学生就是抗议者之一。我的心凉了一截。

我的脑子里迅速闪过了过去听说过的在陌生的地方消失的人的故事。这些人不是警察局的，而是隶属于国家安全部门。谣言说这些人的上司是有权做全国各大重要决定的七人常委会成员之一的乔石，私下里赞同改革，但是他非常反对无政府主义。当我们快速驶往北大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如果你们真要行动的话，那就干脆彻底一点。’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这两个人互相对望了一眼，然后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又开口了。‘4月19日的晚上在长安街上，我们看到一个学生在一块白布上坐着，那块布上写着《绝食抗议》。但是当警察来的时候，那个学生跳了起来，像兔子一样逃跑了。如果你们的抗议就是那样开玩笑的话，没有人会把你当真的。’我看了看和我一块儿来的学生，我们两个都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从敌人那儿来的建议？到底谁是和我们一帮的，谁又是我们的反对派呢？”

很难判断，这两个工作人员的话，到底是一种对学运乳臭未干幼稚的嘲笑？还是一种带政治企图的建议？是代表组织？还仅仅是年轻人的戏谑？但是，它与“四二六”社论——以为把学生吓唬一下就能吓回去——的估价是一致的。

接着，柴玲在一种情绪低落的语调中结束了这段回忆：

“在我们从北大南门下车之前，这两个人给了我他们的名片。‘如果遇到麻烦就给我们打电话。’他们说：‘但是不要出卖我们。’我们刚刚下了车，这辆车又急行而去。我意识到，一个通向和平与和解的机会来了，又走了。”

而此时的李鹏，日子更不好过：

“昨晚（5月3日）11：00，我约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商量。据各方面的信息，明天的游行已成定局……游行的目标是到天安门广场，发表一个

‘五四宣言’，要求中央或国务院领导人出来接见代表，也不排除故伎重演，指名道姓要我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权衡利弊，还是由罗干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出面接待游行者的代表。我打电话征求了乔石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明天我不宜出去接见代表，这样比较妥当。”

直到学生“五四”游行平安结束，李鹏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但他立即认为，学运自身势头的衰竭，学生不愿意卷入党内斗争的态度，是自己推行的强硬政策发生了作用：

“这说明中央坚定的方针，北京市各级党委作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几次公开对话，说明了学潮与动乱的事实真相，都起了作用。闹事的学生头头已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定暂且收兵了。”

他完全忘记了，这次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对“四二九”对话的一个报复。不过，李鹏的判断其来有自。

第二节 高层：两军探底

赵紫阳作为中国改革的“功臣”，与他的搭当胡耀邦相比，性格中正好缺少了一点优柔，而多了一点自负。用一句刚愎自用来形容他，或许有失武断，但那却也恰好是他的魅力所在：当胡耀邦以他的真情打动人们时，他可能却在用他的雷厉风行征服着世界。他识时务而无宿命论，决不放过机遇却也能等待机遇。这些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他肯定要有所动作。但时机，也必须是他自己选定的，对他有利的。

4月25日，北京将明显与赵紫阳意见不同的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用电传征求在朝鲜的赵紫阳的意见，得到的回复是“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据鲍彤说，“赵当时同意邓的讲话”，是

真心的，他还指示鲍彤，“写五四讲话的时候，要把这个精神加进去”。按照这个回电，政治局可以认为，赵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转变了自己的看法。

此后，赵紫阳一行，风光于平壤的光复大街、青春大街，观看杂技和大型歌舞《幸福之花》，并沿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足迹，访问了朝中友谊合作农场……而他在北京的同事们，却正为学运的事态进退维谷，焦头烂额。

邓小平不得不避居北戴河，“一线”的主持者很不情愿地打出“对话”牌。

4月30日上午10：00，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按照惯例李鹏到北京站迎接了他。李鹏当时就请总书记安排时间听取他的汇报，赵答应下午4：00听取李鹏汇报。

可是，当下午4：00李鹏到达赵紫阳的驻地——中南海4号院的东厢房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

“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

赵紫阳在会见李鹏之前，会见了谁？谈了些什么？据鲍彤记忆，他肯定是在李鹏之前与赵紫阳谈话的人之一，但还有一个人赶在了他前面：

“紫阳回来以后我第一次去见他，要向他反映‘四二六’社论的效果不好。但是已经有人在里面了。他们说，乔石同志在里面，你等一等。我等着，一会儿，门开了，乔石出来了。我进去就跟紫阳说了我的看法。紫阳说，他知道这个情况。这时候，他已经有主张了。以后，他提出理智、秩序的路线，紧接着是公布那几条……”

据《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最早向紫阳同志反映26日社论激化中间学生群众的对立情绪的是我。”

“4月30日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北京。他刚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学生上街，挡不住，市民围观的很多，机关干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态有升级和扩大之势，相当一部分中间学生群众对26日社论有反感，认为是针对他们的。我讲了我对社论的看法：社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一定要稳定，一定不能搞动乱的思想；但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分析，没有考虑到中间群众的接受程度；既然这么多的人都以为社论是针对他们的，可见社论没有讲清楚。紫阳同志当时没有表态，过了若干天，他对我说，看来社论是有缺点。紫阳同志的观点当然有他的形成过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

鲍彤在这个材料中两次提到“最早”向赵紫阳反映“四二六”社论激化矛盾的是他，并说赵在若干天后才形成对“四二六”社论的意见，与他后来对笔者所说，在他前面“已经”有人见赵，赵在与他见面时“已经有主张了”明显不符。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为了在1989年“大清查”中保护这个捷足先登之人而撒的谎。

这就是说，赵在见李鹏之前，至少已经见过两个人。

李鹏的回忆，则从侧面佐证了鲍彤的说法，并有更多补充：

“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

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赵紫阳对李鹏的这番讲话，有可能是已经得知，4月24日常委“碰头会”、起草“四二六”社论把鲍彤排除在外的情况。从这个角度看，赵的谈话无疑是十分恳切的。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李鹏，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危机；自己家人的活动给他带来的被动。他明显在示弱。但在这恳切、示弱之后却暗藏机锋。既然你们可以捏造“倒邓保赵”莫须有罪名，我也可以说“攻赵”就是“倒邓”。为了不让李鹏感到难堪而加深敌意，他有意把学生对李的攻击和对自己的不满绑在一起，以图模糊“倒李”反映的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矛盾的界线。据赵紫阳回忆，此时他对学运形势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就是前述“三个不灵”。

5月1日下午 3：00，按照约定，赵紫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参加了会议。杨尚昆、薄一波按惯例列席了会议。李铁映、李锡铭和陈希同以“制止动乱小组”成员的身份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时，赵紫阳慰问并肯定了前段常委的工作，特意重申了对4月24日常委会议的决定和邓小平“四二五”讲话的拥护。然后宣示今天会议的主旨：分析形势，讨论“五四”预案。

陈希同首先汇报了学潮的情况。他认为，较之“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闹得最凶的”那两天，目前的学潮已进入低潮：

“一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这几天胆战心惊，生怕被抓。清华大学的几个非法组织头头，已经辞职并宣布不参加游行。北京大学一个非法组织头头已被其父母带回家，禁止他参加游行。北师大那个叫吾尔开希的坏学生也吓得对美联社记者说，他打算不远离自己的宿舍，不再多组织活动，生怕自己会被逮捕。”

图5-3：陈希同幸灾乐祸

陈希同认为，这是“对话”和他称之为“分解政策”达成的效果。他还幸灾乐祸地说：“现在学生们不仅不愿进行领导，而且还不愿被领导。一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开始相互指责对方有野心，甚至指责是团委或学生会的人。一些年龄较大的和同学中受尊重的人，已经怕站到这次学潮的前列，这对化解学潮很有利。”

对于学生扬言的“五四”游行，陈希同估计：“规模不太可能超过27日的游行”。

随后，李锡铭介绍了北京市委制定的下一步反对动乱的七条对策：明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将分两摊召开会议。一摊是高校负责人会议，由李锡铭、李其炎主持；一摊是各区县局和总公司负责人会议，由陈希同和袁立本主持。两个会议的主旨是：进一步强调和提高对目前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争取中间群众，孤立少数闹事者；坚决抵制非法串联和募捐活动。把工作深入做到个体户和居民委员会；警告市民千万不要掺合“五四游行”。

李铁映则介绍了全国高校的情况。他认为“学潮的面在扩大而不是缩小。但是，各地禁止外地高校学生进行串联的措施正在起作用。”他认为，学潮闹了半个多月了，对很多学生来说，新鲜感也马上要过去了。五四游行虽不可避免。但“五四过后，学潮将慢慢地消退。”

对于李铁映的乐观，乔石根据自己主管的“公安一情治”系统掌握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看法：

“这几天学生们正处于守势，他们在积蓄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看了一些材料，总觉得学生的情绪平静不下来。相当多的学生参与了游行、罢课和张贴大小字报，他们没能把自己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区分开来，觉得自己反正已经参与了‘动乱’，一不做二不休，看政府能把我怎样？还有一些教师从过去的学潮风波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不再轻易表态，一直保持沉默。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一些政工干部和学生干部有一种留后路的想法，免

得日后对这次事件的评价一变而陷于被动。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阐明政策界线，将绝大多数学生从‘参与动乱’的思想包袱下解脱出来。”

接着发言的胡启立，介绍了学生对新闻界的不满和新闻界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蠢蠢欲动的势态。担心“学潮拖得时间越久，参与的人会越多。”

胡启立讲到这里，赵紫阳接过话头说：

“对《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应该进行认真分析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上海市委的处理太草率、匆忙了，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反而使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当然，我们仍然要支持上海市委已经作出的决定。”

下一步怎么办？姚依林主张：处理学潮“宜早不宜迟，工作早做早主动”。再这样拖下去，对党对国家都对人民都不利。他说：

“对学生，该强硬的地方就得强硬，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也是能够理解的。总之，不能因为学潮而影响正常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薄一波则借用一份英国报纸的说法，警告不要因党内斗争延误了危机处理的时机。这份英报说，处理学运对策的迟缓，反映了党内思想混乱。并猜测“也许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预言“学生运动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深入的权力斗争”。对此，薄一波说：

“因此，越是处理这类敏感问题，我们的决策就越是要坚决，态度越是要鲜明。与学生开展对话是争取时间瓦解和平息学潮的一种好的策略。如果我们能以软性的方法平息学潮，我们就会得很多的分。”

此后，杨尚昆将讨论引向一个国家主席最关注的问题：五月份北京的两个国际性活动：亚洲银行理事年会，戈尔巴乔夫的来访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

化。“因此——”他满怀感慨地说：“能否把这次学潮处理好，是对我们能力的一次考验。”他赞成“避免激化矛盾的策略”，认为那样“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借着杨尚昆的“温和论”，赵紫阳阐发了正在酝酿中的“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想萌芽：

“我们要继续以疏导为主，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并坚决劝导学生尽快复课。我想在后天北京纪念‘五四’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在我国，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当然，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那种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

杨尚昆插话道：

“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党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赵紫阳继续道：

“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的新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份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并改造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定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

会主义才能增长对人民的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

在赵紫阳纵情抒发了设想中的蓝图后，李鹏冷冷地说：

“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所以，我们当前首先要稳定大局，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接下来，胡启立的讲话体现了他的“辩证法”修养。他说道：

“民主政治的建立要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当前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当然稳定不是不让人说话。只有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反过来，假如政局不稳，甚至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失去。”

在李鹏和胡启立的启发下，薄一波似乎找到了切入点：

“的确如此，两者相辅相成。如果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地去搞民主建设。当然，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尽快平息学潮，平息动乱。”

对于一派不同于“四二六”以来常委思路的议论，李鹏似乎很不甘心地

说：

“这场学潮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的，其影响面和波及程度相当严重。一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正在策划更大的活动，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励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并强迫要求党和政府承认。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倒退。”

面对咄咄逼人的李鹏，刚刚回京的赵紫阳决定，在摸清情况以前，特别是在与邓小平沟通之前，先退一步。他说：

“的确，这次学潮很严重，影响面很广。不可否认，在这次学潮中有极少数人混水摸鱼，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学生们提出的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是与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相一致的。我的想法和同志们一样，尽快使这一已经扩大了的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前提就是社会稳定。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再也经受不起折腾，所以，我将特别强调稳定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让全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们明白，稳定对于我们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把稳定都破坏了，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只能得到动乱。”

在会议结束时，赵紫阳将其五四讲话送审稿发给大家，“请同志们提出修改意见。”

以由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记述的会议，不知什么原因，在李鹏的日记中，却完全是另一些东西：

“如何评论4月26日的社论，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对此也不否认。”

“北京市的同志在发言中对《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还揭发得不够。”

“在讨论中，同志们发言很热烈。锡铭同志认为对闹事学生组织的‘团结学生会’觉得不能承认。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赵紫阳说，他要求中央立案，审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为，但他无力劝说儿子退出公司。这时，阎明复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激动地说，赵紫阳同志应下决心主动查清，带头让儿子退出商业公司，否则授人以柄，使中央陷于被动。阎的讲话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对阎明复的建议赵紫阳沉默未语。依林同志说，往更深一层去想，这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用对话办法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发言，要求紫阳在‘五四’青年节代表中央讲话时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是一场动乱，并且明确重申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不承认学生的非法组织。我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处于中间状态，争取中间力量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己队伍要坚定，二是对敌对势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对动乱定性态度不坚定，必然动摇军心，拥护党的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内部一场大辩论和大争论，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李鹏和张良记录的一致之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就赵紫阳提出的“民主与法制”思路达成一致。赵、李二人回忆的契合点在于赵紫阳总结的四条：

“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

从这些记录看，赵紫阳似乎并不是一个比李鹏更喜欢争论的人。以后的事情证明，他希望通过私下沟通的方式“统一思想”。在没有把握取得政治局常委及列席人员的多数同意之前，暂不召开常委会议。当然，这些拜访是秘密进行的。对外，赵紫阳只说，这段时间里，他在进行“社会调查”。

第三节 “出手”时机的选择

5月1日下午的常委会结束后，赵紫阳接见了拄着铝合金双拐刚刚出院的“体改所”所长陈一谔。据陈一谔回忆：

“5月1日下午，赵二军找我谈洋浦开发的事。我微笑着说：‘大家都传你是个官倒啊？’他说：‘老陈，你要相信，我绝对清白！’当天下午，我在中南海见到了赵紫阳，我向他简介了社会动态，并说‘如果按四二六社论的方针，中国改革的进程最少会拖长20年。’赵紫阳说：‘不拖长20年，也会有10年，说不定还会走上歪路。’”

这一天晚些时候，赵紫阳做的另一件事情，便是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彩电、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一些人，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确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

利用这一天的间隙，赵紫阳还给在香港的许家屯打了一个电话，招他立即进京。许家屯去世前，曾对采访他的高伐林先生表示，赵这样做，是违规的。

5月2日，赵紫阳在运动以来第二次约见了国务院农研中心主任杜润生。

杜润生，山西太谷人。1913年7月生。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肄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任总部宣传部部长。

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3支队队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兼教育处处长，太行区6、2专署专员，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国共内战爆发后，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淮海战役，领导所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历任淮西区工委书记，豫皖苏四地委书记，中原局、华中局秘书长。

中共建政后，1951年任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主张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2年，杜润生调入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他支持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即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职务。……

“文革”中，杜润生受到冲击，被停职检查，下放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

此后，杜润生重新回到农村工作岗位，成为在世的党内最资深农村问题专家。1979年2月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在此期间，他支持了由青年知识精英创建的第一个中央书记处针对农村改革成立的调研机构——农村发展组，并指导其业务。1982年，中共中央颁发了杜润生领导起草的“一号文件”，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长达30年的有关争论。自此到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因此获得“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尊称。

杜润生是公认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但是，赵紫阳之所以在1989年4月23日离京赴朝之前和5月回京之后频繁地约见杜润生，显然不是为了向他咨询农

村问题。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在80年代国务院共事之前30年，杜润生就与赵紫阳有过一次短暂的交集——他们同在中南局，同有过主持农村“土地改革”的经历。但这段经历究竟给二人带来什么影响？直到《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问世，我们才得以窥其堂奥：

“杜润生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他的‘慧眼识人’。早在1950年代，解放军南下，杜润生在广东省农委任职。当时赵紫阳不过是广东省某县的县委书记。杜一眼看中，极力向省委推荐（当时叶剑英、陶铸主持），赵紫阳由此平步青云，渐直至广东省委书记（‘文革’前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

杜与赵因有这段渊源，以后关系一直很密切。杜润生有一次很感慨地对王小强说，‘一个人的造化真是未可逆料，当初赵紫阳是我一手举荐，没想到成了今天中国政府的首脑！’”

正因为杜润生有这种经历，特别是与时任总书记有这层关系，他无论在中青年知识精英还是在胡耀邦旧部和改革老人中，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他本人，大概是吸取了60年代初期被整的教训，在言论分寸的掌握、政治火候的拿捏，以及在派系平衡方面的艺术，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从对赵紫阳发迹的兴奋，到固执重用翁永曦，再刻意培养王岐山，在在都体现了其老来继为“国师”的兴趣。

杜润生有意，赵紫阳有急，两厢情愿，正是此番十万火急的形势下二人避开组织系统会晤的背景。

1989年5月2日，杜润生应召向赵紫阳汇报了4月25日自己在科学会堂召集的会议。据赵紫阳回忆，内容主要是讨论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报毕，赵紫阳表示，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

再说许家屯。接到赵紫阳的电话后，他立即动身赴京：

“我立即动身，并把香港传媒界反映这次北京学潮的许多材料、录像带，带去北京给赵紫阳。

5月3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一开始就问我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诉赵紫阳，我5月2日到北京后，接触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况，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社会上积极支持学生的人有两种，一是个体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后的主管人员，这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变，走回头路。

我讲，‘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有水平，口号相当策略……’

我表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也有人讲，邓小平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据说李锡铭、陈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报告说，学生要暴动。陈希同甚至讲，给他5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

我提出，‘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

赵紫阳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给了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

他又说：‘学生要求廉政，反对贪污，惩治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

他们还谈到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出现学生自治组织应该怎么对待的问题。赵紫阳表示：

“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

赵紫阳对许家屯讲，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说服邓小平。他委托许家屯做做杨尚昆的工作。

以后我们将陆续谈到，此后，他一一拜访了杨尚昆、薄一波和万里。但他在最想见、并急于见到的邓小平那里，却吃了个“闭门羹”。

但赵并没有放弃寻求与邓的沟通。5月3日上午，就在赵紫阳约见许家屯的同时，赵紫阳的秘书李勇找到陈一谔。并与体改所李峻、刁新申、白南风、杨冠三、赵渝江进行了座谈。座谈后，这天中午，陈一谔给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打电话，二人相约下午在邓家见面。据陈一谔回忆，邓朴方认真听了他们反映的情况，并征求意见：“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陈一谔回忆道：

“我说：‘现在缓解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你们老爷子出来讲个话。’

朴方说：‘已经到这一步了，还怎么讲？’我说：‘……比如在接见外宾或记者时说：娃娃们都是爱国的，总是想把事情办得快一点，好一点，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办成的，欲速则不达嘛！年轻人嘛，说点过激的话，做点过激的事，没有什么，不要去追究。……’朴方很高兴地说：‘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跟老爷子说说看。’

二人的谈话进行了“5个小时”。

赵紫阳从朝鲜回国途经沈阳时，其实已经听了当地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 5月1日常委会后，继续作了一些社会调查：

5月2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座谈，就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紫阳同意这个观点，表示“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

5月5日上午，赵紫阳又约请北大校长丁石孙、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进行谈话，请他们介绍两校学潮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当天下午，他又“自行决定参加了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地区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学潮的意见。”

通过找人谈话，调看“四二七”现场录像，赵紫阳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四二六’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10万。由于‘四二六’社论的言辞比较严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

‘四二六’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普遍抵触。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

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人群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见好就上！赵紫阳终于等到了适合他出面解决问题的时机。

第四节 亚行讲话

5月3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举行。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简称“五四讲话”）。这篇讲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近代史权威胡绳起草，参考了社科院哲学所李泽厚、王鹏令的有关论文而成。稿件经过政治局成员和杨尚昆事先传阅。在这份长达五六千字的报告中，讲了“五四”运动的性质，中国“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今天发扬“五四”精神的新内容、新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信任依靠青年，改革对青年素质的要求等五大问题。虽然对于当前学运有明显的警策意义，但论述并无牵强附会、大出大入的痕迹，大多与历史事件有点粘带关系。

尽管如此，这篇讲话还是公开了一个事实：它的苦口婆心的说理态度，它提出的“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等要求，以及它对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始进行较为切合原意的评价，甚至在强调党的领导时没有忘记党68年来“犯过大大小小各种错误”，说明党是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并再次声明，人民群众和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治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也正是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它还暗示“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等等这些，都透露出一种开明的气象，都与“四二六”或“四二六”式的社论文章横蛮霸道，指鹿为马，以势压人的口吻大相径庭。这当然是一种新的信息。

据赵紫阳回忆，讲话后，李鹏、杨尚昆均对他表示了赞赏。李鹏非常满意赵紫阳的报告接受了他“在征求意见稿上加的‘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提法。

但是，参与了传阅过程的政治局委员们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征求意见稿”传阅过程中，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均提出，应在文章中加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李鹏在稿子上做出修改补充后，给杨尚昆过目。杨尚昆拿着修改过的稿件亲自找赵谈过：“好几个同志都提了意见，这句话你是不是加上”。但是，鲍彤在汇总有关意见时，没有加进上述内容。参加了五四纪念大会的李鹏、杨尚昆等人，眼睁睁地看着赵紫阳照原稿念过，并无只字提及“反自由化”。

5月4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赵紫阳的讲话（简称“亚行讲话”）比“五四讲话”更进一步表明了他对当前学运的态度。他对客人们说：

“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

“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

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正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在谈到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时，赵紫阳说：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地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限扩大，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工资低，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时，赵紫阳说：

“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

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当时，在报纸上读到赵紫阳的这番讲话的人，还没有觉得赵紫阳的“乐观”和预言欺骗了在座的客人，而是觉得这一番“介绍情况”实在是一篇文不对题的表演。如果把在座的大腹便便，有着足够的“理智”和“冷静”的亚洲银行的阔佬们，换成杂色衣衫的黄脸青年学生，它的喜剧效果将不会那么浓烈。因为，当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话不能直面自己的人民和党的高级干部说出，而要采取这种转弯抹角的方式“传话”时，他和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

正是通过这出喜剧，有政治经验者看出，中国的致命的不稳定因素并非来自下层社会的动乱，而是来自执政党的中央。十年以来，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第五节 为赵紫阳“把脉”

“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

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

5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四二六’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

的工作。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我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也是这个调子，既与‘四二六’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

如前所述，许家屯回忆录记载，5月3日赵紫阳与他谈话后还请他给杨尚昆传话。杨尚昆与许家屯于次日见面时，许向杨传达了赵紫阳的意见和看法。如果5月3日赵紫阳已经与杨尚昆面谈，就不需要许家屯“传话”了。所以，二人记忆，必有一错。那么是谁错了呢？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赵紫阳到杨尚昆家的时间是5月6日。该书写道：

“5月6日下午，赵紫阳拜访杨尚昆。”

“赵紫阳说，‘从朝鲜回来后，我除了看材料了解一些情况，还分别找乔石、启立、纪云和许家屯同志谈过话，前天还与李鹏同志交换过意见。主要是想全面了解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总觉得，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很多青年学生期望改革的步子能更快一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言行过激，有的地方表现得不冷静，缺少理智。所以，我在亚行理事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学潮。’”

“杨尚昆：‘你在亚行理事会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得不错，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分复课了。这就是效果。你说得对呵，这次学潮的确跟以往不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学生所提的口号也相当策略，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的确有人在帮学生出主意，这里不排除那些自由化分子，也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港台、及反共势力的介入，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 ”

“赵紫阳：‘我觉得，这次学潮如果处理得好，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 ”

“杨尚昆：‘所以，对这次学潮，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他又说：‘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份。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

“赵紫阳：‘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再如特供（指给予副总理级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问题，从常委做起，先考虑取消给常委的特供。小平、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可以继续保留。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和警卫制度要改革，几位老同志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最根本的是，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准备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

“杨尚昆：‘许家屯已经把你的话捎给我了。’ ”

“赵紫阳：‘我今天就是想向您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四二六’社论称这次学潮为‘动乱’把矛盾激化。提法上欠斟酌。社论发表后，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也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象，不能把他的形象给损坏了。’ ” “杨尚昆：‘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特别强调，‘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 。”

“赵紫阳：‘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您认为怎样？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

“杨尚昆：‘我揣摸，常委这边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

“赵紫阳：‘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

“杨尚昆：‘我去同小平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我试试吧。’”

从上文看，赵、杨的这次会谈，时间则应在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以后和许家屯见过杨尚昆以后。如果张良的记述及时间是正确的，那么赵紫阳记忆在5月3日的时间可能有误。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一个可能是老年人的记忆问题，另一个可能，则是他希望后来被追究的“亚行讲话”，是有王瑞林、邓家人和杨尚昆背书的。如此，则证明自己并没有先斩后奏。

另据《中国“六四”真相》，赵紫阳在“亚行讲话”结束后，曾与李鹏有过一次私下交谈。大概是为了掩饰曾经有过的“动摇”，这件事情未见于李鹏《“六四”日记》。但在赵紫阳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

“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下。但后来当我说到‘四二六’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赵在单兵突进之时或之后，还是曾为“取得多数同意和授权”进行过许多努力的。只是在这一切都明了之后，他才召开常委会。

至此，对赵紫阳接连两天的言行抱坚决抵制态度的，在常委内似乎只剩下一个半人。李鹏5月4日日记写道：

“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我想现在是困难时刻，只要党内领导层团结一致，也许还有可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但在中顾委方面，反对的仍然占据大多数。

面对总书记发出的与邓小平和“社论”不同的声音，高校政治思想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这便使国家教委和受命处理学运的领导们不得不设法弥合二者的差别。在实在无法弥合时，只好宣称“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

很明显，赵紫阳已经与邓小平“拉开距离”。不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已经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那么，赵到底要干什么？他真的已经下决心，从此不再掩藏在邓小平威信和权势的大纛背后，不再在政治上充当邓小平意志的“传声筒”，不再在左右两派中扮演“抹稀泥”角色，推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政策路线，从而真正承担起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责任，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吗？

姑且不论赵紫阳对街头民主运动是否富有真实的同情，把一个从数十年互相倾轧的中共官僚机器中脱颖而出的“铁腕人物”，一个对思想文化事务的价值取虚无态度的“务实派”领袖，当成是一个“群众运动的尾巴人物”，或一位感情丰富的“多汁”的诗人，是不符合赵紫阳的性格的。但是，他显然也不是一个有着李鹏们“贵族意识”，一切从维护既得利益出发，并天生以阶级斗争理论为行动指南的“古董脑筋”。他的身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往

往能够帮助他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党内保守派对学运作出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始终如一的，并且是正确的。

另外，赵紫阳虽然与邓小平具有同样的“爱面子”的缺点，这往往令他们在明知错误的事情面前“死不认错”，而且，如前所述，这很可能是邓小平看中赵紫阳，并执意将之培养成接班人的原因之一。因为具有这种品格的人，能够与恩师同进同退，并为他的错误承担责任。但是，邓小平没有想到，赵紫阳毕竟比他年轻，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向往未来而不是抱守过去。在接受西方先进社会制度和文化成果方面，赵紫阳不仅比邓小平更具内在的热情和期待，而且，善于学习的他，自然是极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这也包括他执政广东时期，在处理“地方主义”问题时所犯下的，直至近十年还在困扰他的案件。虽然嘴上不说，暗地里仍想留个“尾巴”以挽回颜面，但要他重犯类似的错误，恐怕是办不到的。

剩下的问题是，赵紫阳冒风险与党内保守派和邓小平对决，你有多大胜算？

此时，在中南海内议论这个问题的人大概很多。陈毅元帅的儿子、时任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的陈小鲁事后的一段回忆就非常典型：

“1989年5月8日，我在中南海里遇到他。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绝食，矛盾趋于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定，这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27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人家耀邦还有‘团派’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

图5-4：反通胀反官倒（陈小雅摄）

为此，他为赵紫阳提出的策略是：

“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够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也许才能保住自己。我说，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呀，或者怎么唱个白脸红脸的。”

赵紫阳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则由于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们对于“成就”的评价标准是很不一样的。二则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势必要打破原有的平衡。对于偌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打破平衡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混乱。三则中国当时的改革动力，首先来自原来计划经济体制边缘的成分，依靠他们推动改革，势必要让他们尝到甜头。这就难免会造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导致经济“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不满的出现。四则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赵紫阳，都没有受过经济学的正规训练，国家也没有为改革准备好蓝图、各种技术手段和人才储备，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此难免出现摸错石头走弯路的“不规范”问题。为此，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这样的评价：

自1986年起，赵紫阳领导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没有整体改革设想的支撑，依靠满足人的私欲释放生产力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从“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减税让利”（1982）到“利改税”（1984），再到“企业承包制”（1986），能改的都已经改完（能“放”能“让”的已经放完、让完）。当人们正准备欢呼十年改革创造出了几百个亿的财富时，这个数字与财政部的赤字报告刚好相等。国家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支撑下一步更加深入的、全面的、伤筋动骨的改革。而这种“放权让利”政策豢养出来的企业并没有经历竞争的淘洗，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没有配套

的市场机制，在眼看着农民“老弟”已经“先富起来”的情况下，把增加的利润多数用来满足工人“老大哥”们的收入欲望。不能盈利的企业，则借口设备陈旧，竞争无力仍然靠在国家的“大锅饭”体制上，向高收入单位的分配水平攀比，不少企业甚至用国家贷款发奖金，否则就要滋生不满情绪，危及社会安定。于是，放权让利，“放”出了一个投资膨胀；“让”出了一个消费膨胀。社会其它阶层在经济收入没有相应增长的情况下，因通货膨胀而生活下降，人心不稳。

由于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干扰，为“深化改革”服务的宏观的配套改革思路，在赵紫阳任政府首脑期间，他的“智囊”班子一直没有能力提出来。在有些时候，当有人提出时，却被适应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导人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连提交研究的机会也没有。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被新闻、理论工具当作“倒退的”和“计划经济的”思路加以批判。由于这些原因，在赵紫阳任内，他被认为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深化改革”这一历史任务。

1984年，乘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刮起的“改革春风”，赵派理论家提出了价格改革“调放结合”的战略，带来了价格领域的“双轨制”局面，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企业，为了获得优惠的资源，不得不卷入这种机会的竞争中，一时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大量滋生，严重腐蚀和毒化着整个社会空气。1988年，邓小平企图在仍不触动产权问题的条件下，实行“价格闯关”，出现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闯关失败。

正是因为自我评估的困难，赵紫阳事后也曾嘱咐帮助他撰写回忆录的杜导正等人：

“十年改革开放中的具体措施、政策，可不多着笔墨，这些并不规范，但是都朝着以下两个目标前进。这两个目标是：（1）如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生产力；（2）进入市场经济。”

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1988年10月，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出台，赵紫阳的经济决策权被进一步侵蚀。就在改革派理论家大声疾呼要防止“走回头路”，提出“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时，朝野持不同政见者已经提出：“由谁来领导改革？”“以什么思路统领改革？”“谁有能力领导深化改革？”等问题了。

在政治上，赵紫阳曾有过一帆风顺的时候：1986年9月13日，赵紫阳给邓小平打报告，建议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并由他本人（包括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在内）领导成立一个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邓同意，开始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这些以“一党专政”、“党政分开”为前提的设想，经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后，又经党的“十三大”确认。但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无声抵抗下，无疾而终。不仅如此，由于赵紫阳容忍了保守派对改革“难兄”胡耀邦下手，他在高层领导中日益面临形单影只，唇亡齿寒的局面。随着“保守派”大将宋平出任中组部长，一时间几乎要“党政双肩挑”的赵紫阳，不仅失去了主管经济的权力，甚至连人事权也旁落。显然，在中央，他已失去在上层的优势。但在具有新思想的中下层党政干部中仍具有威望。这就形成赵紫阳“眼前失利，但还有将来”的政治前途。

在地方，被视为改革的社会基础的各方诸侯，实际上是胡赵“放权让利”政策的受惠者，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权益， just却不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每次省长会议都变成了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的讨价还价的场所。因而，他们可能会支持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微观层次”的改革，却把国家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而进行的宏观的配套改革视为畏途。他们可能成为赵的有条件的同盟，但这个条件是赵不能放弃其从前改革的路数。

在社会上，被视为改革的另一社会基础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改革派的理性知音。他们一方面由于理性支配，想象着经济改革必将推进政治改革并最终推出一个自由民主人性的社会，从而着眼于未来，愿意把眼前的不如意

看作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政府改革派共渡难关；另一方面又为越来越严重的“体脑倒挂”和分配不公现象及每况愈下的社会地位而困惑。特别是对于赵表现出来的与邓的一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小农式政治思维，及对思想文化自由的漠视，中青年学者尤其不满。为此，民间独立社会力量的重要一翼——以陈子明为首的社经所，已经在为同“下一届政府”合作做准备。

自年初传出赵有可能下台的风声以后，他又借压制“33人签名信”一事向保守派妥协：指斥这一行为是对中央的挑战与对抗，是一种与国际大赦组织遥相呼应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主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还通知各报刊电台，半年之内不得随便发表33人署名的文章，更不得在电视、广播中出现其镜头和名字。时间之所以定在半年，有人估计是在预期的中苏高峰会谈之前不会出现大的人事更动，半年之后，鹿死谁手必有结果。同时，为对付经济危机可能出现的社会骚乱，赵还主持制定了包括建立防暴指挥中心、戒严、军管等手段在内的“紧运”政策。其中的“杰作”之一，就是在各大专院校加注警力。其建立一支有三百万人的“特种部队”，由总书记直接指挥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在武警编制下，“防暴队”已经开始运行，一旦有机会赵紫阳是会把它变为现实的。

这些，都使知识分子增添了新的不满。

而在当前运动中充当主干的青年学生，则较普遍地反映着处于竞争中不利地位的下层社会的呼声。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财产，反官倒，反贪污腐化这些反映平等愿望的口号，正是针对新出现的不平等而发出的。

而赵的改革思路的真正社会基础，是在这十年的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下培育出来的特殊利益阶层，既不希望出现彻底的经济改革，也不希望倒退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去，因为后者会使之失去他们的在不平等竞争中的优越地位，两者都会损及其依赖“双轨制”化公为私的便利。

面对上层权力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和被看作改革派社会基础的四种势力的要求，赵紫阳能作些什么呢？他既不能无限度地满足地方诸侯的愿望，也无力给予知识分子要求的自由，更无法满足下层社会的平等愿望。唯一可能的，就是代表那个要求不进不退的新生特殊利益阶层，与“保守派”达成某种契合。而他们，又正是当前学运不满的焦点——“官倒”及大公司阶层。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赵紫阳，成了80年代末期社会政治中最尴尬的人。在所有的期望与不满、前进与倒退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国家与集团利益的对抗，政治权谋与党风的抵牾，以及这种种利益与价值之间冲撞、矛盾、挤压下，无能政府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赵紫阳挤出政治舞台。

陈一谔对赵的这种尴尬境遇也有所描述。他把这些结构复杂的矛盾用毛泽东的“两分法”熟练地归结为“两方面的失望”。在他首先把“老人们”定义为“既得利益阶层”以后，他认为，“民众的失望与这批老人的失望从总体上来说根本对立的。这样的对立表现为：一方认为改革不够，改革措施不力，另一方认为改革过头了，改革导致政局不稳；一方希望加快改革，深化改革，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要求改革刹车甚至后退。”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两分法”虽然可以大致描绘出历史的主动脉，但却无助于人们了解以后的事态——在八九民运中起关键作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选择与赵紫阳站在一边。

事后，赵紫阳痛定思痛，总结道：

“中国民主改革、政治改革跟不上去，腐败延续下去，日盛一日，人民便把腐败的账算到改革开放头上去。反对改革的人与反对腐败的人联手起来，可就麻烦了！”

1989年的赵紫阳，陷入的正是这样一个两面受敌的局面。

第六节 与邓小平拉开距离？

1989年的“倒赵”潜流，实际上是保守派上述政治、经济主张在高层发酵的继续。

就在赵紫阳前脚登上东去的列车时，早有准备的北京市委便拉上万里，联络李鹏、杨尚昆，赚得了无冕皇帝邓小平对学运“动乱”的定性。这一方面为按照他们的意愿平息学运，重建思想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的统治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铺平了道路。

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个重要迹象，便是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没有通知例应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参加。甚至早在学运之初，就有人“动用国家机器对鲍彤进行监控”，对鲍彤的坐车进行“跟踪照相”，并掌握鲍驱车前往天安门的情况。在另一方面，李锡铭再度启用了被赵紫阳命令不得主管意识形态，因而“恨透了”赵紫阳的徐惟诚，作为“四二六”社论的写手。

据赵紫阳回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李鹏曾向阎明复说过，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为此，赵紫阳回国后，李鹏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他表态支持。并一再要他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加上明确反对“动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

不仅如此，据陈一谔回忆，在4月28日北京市召开的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就已经断言，作为赵的“嫡系”的“两所一办”是“操纵运动的三只黑手”。

总之，此时，许多征候表明，党内分歧已经不限于意见和执政理念的层次，权力斗争的主题已经浮出水面，并逐步上升，直至取代学运与政府矛盾，成为八九民运的死结。

而正在这时，赵紫阳却被一个现象迷惑了。直到去世，他根本没有怀疑过，邓小平推说身体不好，对他避而不见的解释，是不是一种托词？邓小平那段时间到底干什么去了？

他与当年的胡耀邦们念兹在兹的都是邓力群、胡乔木一样，他视为对手的只有李先念、李鹏或姚依林。直到90年代后期，赵紫阳读到本书的初版时，对书中描绘的他已处在险象环生的境地还不以为然。他念念不忘邓小平让他再干“两届总书记”的许诺，念念不忘邓小平要把军委主席的职位也交给他。

的确，邓小平的这一动作——无论动机如何——在战略上释放了一个致命的信号：它告诉赵紫阳，现在，你可以掌舵了！而这个信息，正好迎合了赵刚愎自用，有时甚至是一厢情愿的弱点。一贯机敏的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他终于结束了充满担忧的旅行，双脚踏上祖国坚实的大地时，历史给他留下的腾挪的余地，实在已经不多了。

也许是出于对“四二七”以后形势的乐观估计，也许是邓小平避见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总之，赵紫阳在5月上旬的“双周维新”明确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他正在与邓小平拉开距离。

在“六四”后的大清查中，对赵紫阳的“30个问题”的指控，至少有6项，涉及到赵紫阳这几天的行为：

（1）5月3日，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拒绝。

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四二六”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四二六”社论确有缺点。

（2）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四二七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3）5月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杨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4）5月3日上午，赵紫阳与杨尚昆同志谈四二六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5）5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

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6）5月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减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据李鹏5月2日的日记，赵紫阳在与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以后，还对阎明复说：

“‘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这些“问题”的指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赵紫阳在邓小平没有作检讨的情况下，在明知党内高层有巨大分歧，而没有召开常委会统一思想、形成决议的情况下，没有按照邓家子女和秘书的意思“淡化”，而是擅自公开了党内高层关于学运看法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公开了他与邓小平的分歧。

但是，笔者有理由认为，赵紫阳当时并没有这类“拂逆”圣上的“主观动机”。有三条证据：

其一，赵紫阳的专注点，在利用这场学潮推动改革。他还不至于认为不需要邓的支持。对此，他事后曾有一段解释，是符合逻辑的：

“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学潮缓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其二，赵在向杨尚昆和阎明复表达了不同意邓小平和“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过后，反过来给邓“支招”。他希望邓承认“误信了”北京市委或李鹏报告。赵紫阳事后对杜导正等人说：

“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比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由此可见，赵紫阳在“擅自”表态之前，是曾想和邓进行沟通，并希望达成一致的。他甚至替邓把说辞、语气都想好了。潜台词是希望推出李鹏或北京市委作为“替罪羊”，解脱邓小平。至于邓会不会接受他的这一“招”，凭借赵紫阳对这位“恩师”的了解，答案应是肯定的。这大概是他当时能想到的，解决学潮问题，同时也连带扫除改革障碍的“一举两得”之计。

可惜的是，邓小平拒绝见他，因而他也没有机会亲自向邓面授机宜。此正所谓：智者千虑，功亏一篑！

其三，据鲍彤回忆：

“邓讲过‘动乱’以后，5月初，我们中心一次开会的时候，陈小鲁说过，现在邓在学生中的形象很坏，赵紫阳最好和邓拉开距离。不然，学生会对紫

阳不满。我当时根本连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认为，提出‘理智、秩序’就已经和‘动乱’的调子拉开距离了。所以，连表扬一下他我认为都没有必要。”

作为赵紫阳幕僚中最激进的一翼，鲍彤这时对陈小鲁的建议不以为然的态度表明，他们当时想到的不是摆脱邓小平，而是怎样裹挟邓小平转弯，帮助中央过关。

事后，陈小鲁也对此事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赵紫阳与邓小平对学运的看法不同，但是他并不支持“动乱”，他只是想和平地平息动乱；赵紫阳也不反邓。

第七节 东风、西风、旋转风

据陆超祺5月4日日记，这天上班后，《人民日报》副总编谭文瑞告诉他，胡启立向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秦川透露，“赵紫阳已与邓小平摊牌，表示宁可辞去总书记职务，也不同意镇压学生运动！据说邓小平已妥协，看来情况正在起变化。”

类似乐观的信息还有，“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主张‘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还有消息称，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表示了不满。邓的孩子责怪把邓推到第一线。这一谣传事后得到赵紫阳和鲍彤回忆的证实。赵说，他的“五四讲话”征求意见稿送邓小平后，邓的女儿“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赵紫阳的“亚行讲话”在高层也曾收到良好的反应：

“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

在这些“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中，赵紫阳一直没有提到中顾委主事的薄一波。但他事后回忆说：“1989年5月初，我从朝鲜返京，一次到西山拜访薄一波，临别，薄一波儿子急急上来说：‘我与我父亲不一致，广州建中外合资飞机工厂，我同意，我父亲不同意！’”在这党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当然不会是为一个什么“飞机工厂”的问题去找薄一波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披露薄一波的态度。但这不要紧，在常委五人中，他已拥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三票，在列席常委会的三人中，他已获得两票。

“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北京一所高校，有位学生听了广播后说：“紫阳，你大胆地往前走吧！人民支持真正的改革者。”

赵紫阳讲话的确带来了普遍缓和的气氛。大部分与这场学运关系不大的人都认为，既然党的总书记已做出姿态，那么，学生也应该见好就收了。因为一场以改良为目的的群众运动，最终还是要通过执政党内的变化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学运与赵紫阳达成配合，不仅可以使前段纷乱局势进入可以把握的轨道，使之有利于处于不利大势下的“改革派”，就是更进一步的民主要求，也会因今次已开的中共按民意改变决策的先例，渐次实现。

按照鲍彤的要求，赵紫阳发表“亚行讲话”以后，中央的宣传机器一改往日对学运的灰色基调，在开足马力宣传赵紫阳讲话的同时，也紧锣密鼓地组织了来自校园方面的积极的报道。

就在刊登“亚行讲话”同一天同一版上，5月5日的《人民日报》同时报道了政法大、北大、人大、清华师生对“亚行讲话”的反映！标题是《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副题是“希望党和政府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增加透明度”。在这篇报道的旁边，还刊登了一篇题为《游行学生宣布今日全部复课》的消息，给人造成了一种学运已因赵紫阳挥动的手臂而走向平息的印象。同日，新华社也播发了《北京高校今日起陆续复课》的消息，称“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已有80%的罢课学生复课。”《中国青年报》头版也刊登了标题为《赵紫阳的讲话获得广泛好评》的报道。《光明日报》记者也匆匆采写了一篇《5月5日：首都高校校园印象》，给人们展示的亦是一片曙色。

5月6日，《中国青年报》又以《党心·民心·青年之心》为题，发表了记者采访胡绩伟、严家其、曹思源等“社会知名人士和学者”对赵紫阳讲话的“感想”。他们既“赞成”，又“高兴”，认为这个讲话在处理学生游行问题上“有了很大进步”，“反映了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这是我们党及其领导人理智、成熟、有信心的表现”。

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论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说，“这位党的首脑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

反应最快的当然还是香港的股票市场。5月5日，新华社香港消息报道：5月4日这一天，香港股票市场的恒生指数猛升65.9点，达到3221.12点，创下1987年股票市场大暴跌以来的新高峰。5日上午开市后，承接昨日升势继续攀升，中午收市时恒生指数达到3257点。

但是，中共党内一些“识途的老马”却看出，这样的密集的宣传攻势，并非政治上的明智之举，至少它不能起到“淡化”复杂矛盾的作用，这对实力弱小的一方，是不利的。

有消息说，对赵紫阳的“五四”讲话，高等学校的部分干部、党员和教工却有着相反的评价。5月4日晚，当电视台播出这篇讲话的消息后，清华大学有干部立即敏锐地感觉到：“中央的调子变了！”在第一线做学生工作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有“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之感。认为“他这一讲，把北京市委、学校党委和我们全给卖了！”有人甚至说：“总书记在上面做好人，让我们在下面当恶人”——令人想起倒胡“生活会”上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批评。

5月6日，就在《人民日报》刊登《首都高校昨起陆续复课，赵紫阳讲话引起积极反响》报道的当天，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辑们商定：

“赵紫阳同志讲话的反应暂停一停，不要刊登得太密太集中。在目前的情况下，太密太集中可能会帮倒忙，我们也议论了中国青年报的做法。他们集中刊登思想比较解放的同志，如胡绩伟等同志的谈话，好是好，读者定会欢迎，但也可能给反对赵讲话的人以口实，用以挑拨和激化赵邓的矛盾。情况很微妙。”

记者和报刊的上述报道，反映了人们期望安定，期望学运有个“善终”的良好愿望，也大部分符合事实。但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他们在匆忙响应主张新闻独立的鲍彤组织的宣传攻势时，恰好忽略了另一种存在也是事实。而对事实负责就是对历史负责。而正是这个被掩盖的事实，最后断送了赵紫阳的“双周维新”。

这个事实便是：相当多人对赵的讲话持保留和抵制态度。

对赵紫阳讲话采取保留和抵制的态度来自两个方面：中央对这次学运坚持“四二六”立场的强硬派；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对学运怀有独立期望，感到意犹未尽的人。

在两种人当中，第一种人的反应是本能的，因此十分迅速：5月5日，李鹏在首都8所主要院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上说：“‘426社论’是根据小平

同志的意见起草的，代表中央的精神。赵紫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对于学运的政策，他强调了“三不变”，即：定性“动乱”、学生受“坏人”操纵、学生自治组织属于“非法”这三个判断不变。同日，何东昌召开教委司局长紧急会议，说赵在朝鲜时就知道邓的讲话和社论，他是同意的。他在“亚行”的讲话，是特定环境对特定对象讲的话，“不能代表党中央”。

同日，在中央应急小组 举行的会议上，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等一再对中央的降温方针表示不满，一再强调要把指导思想统一到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的立场上去。

到底赵紫阳的讲话代表党？还是邓小平的讲话代表党？党在哪里？在当时确实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李鹏或柴玲一类少数人中的问题。在“六四”后的大清查中，对鲍彤的指控有十几条，他唯一承认在处理“亚行讲话”时，“犯了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严重错误”。这也说明，尽管他和他的同党在很多场合都辩解，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说党的总书记“分裂党”是笑话，其实在当时，他本人也有“找不到党”的感觉。

在5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预备会上，北京市提供的七个文件中，专有一个是关于坚持“四二六”社论精神的。这个文件逐条批驳了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显然，强硬派并没有把赵紫阳的讲话当成特殊场合的、特定的、有益无害的产物，而是把对赵的讲话进行消毒作为一种义务，一场战役来对待。这就使原先包裹在事情表面那层，“对一场学运持不同观点”的窗户纸被捅破，而使其“党内斗争”的本质大白于天下。

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赵紫阳的疑惑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赵的政治品德的怀疑，使人们有理由认为，赵在把学运纳入其可控轨道，平定局势后，将反手处理这次学运的参加者与同情者；二是认为赵紫阳摆在学运面前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仍然是一党独尊下的“民主”，是在法制根本不健全下的“法制”；“官倒”属于合法性腐败；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公然与宪法对抗；上海市委居然可以撤销一家报纸总编辑的职务……这一切说

明，在政治的行为与成文宪法抵触的时候，在习惯法的王国里确是“合法的”。所以，这个“好听不好使”的建议，不可能真正解决这次学运提出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它在本质上与“四二六”社论没有差别。5月6日，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贴出大字报说：

“赵紫阳有一个讲话，貌似很理智，很有道理，很能感动那些已经有点疲倦的同学们。其实不然，仔细一分析，我觉得与《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多大差别。

一、他的推理过于简单肤浅。他说学生的基本口号是‘拥护……’，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学生的基本口号决不只这些。赵的前提就是对事实的歪曲，这与《人民日报》说学生喊‘打倒共产党’有何差别？……最初的游行并无‘拥护……’的口号，只是《人民日报》玩弄的少数强加于多数的惯用伎俩迫使学生别出心裁地高喊‘拥护……’等口号，其用心良苦可知矣！没想到，也被人利用……现在出现的许多腐败现象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之下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某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失误，而是整个领导体制本身不合理……身上长了脓包，不是把它割掉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消炎，要除根。

二、赵作为党的总书记，并未道出学生的心声……造成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是人民未能行使主人的权力。党和政府几年来一直在解决腐败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甚至更糟？因为没有改到点子上。说得确切一点，因为自身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任何事物的自身调节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我们不要指望政府会赐给我们民主，只有我们争取过来的监督权，才是有用的。

图5-5：反腐败，反官僚（选自香港《争鸣》杂志）

三、赵说的措施好听不好使。对话亦不是一个新词。早在几年前，中央就提倡和群众对话，那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它是主人提出来的，是主人给的。因此，对话超过一定范围，主人就不高兴了。他有生杀大权，为什么不保护自己呢？……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是人民的本能也是政府的本能。

同学们，你们没有被《人民日报》社论所吓倒，也不要被赵紫阳的讲话所欺骗。揭开它的面纱，可看出是同一个东西。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民主权力全是人民群众经过各种方式的斗争换来的。事实上，人民确实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自己（应当是‘管理个体管不了的事’——作者批注），人民也需要自己作主人，这一对矛盾达到平衡，社会才能真正稳定。

四、赵过于自信。不错，学生运动在没有一个别有用心的政党领导时，是会自生自灭的。但学生运动只是一种征候，就像地震前某些动物的异常活动一样。他们比较敏感，走在前面，其后必然有一场动乱，是新的层次上的动乱。不要理解为以前的暴力革命。直到旧的体制被新的更合理的体制所取代，这是必然的，没有人能阻止，也不可能用政府的调节措施来避免……”

这张大字报上有不少人加了赞同的批注，对赵紫阳一再为共产党的特权辩护表示不满。另有题为《要等就等一万年》的一首诗歌，则发泄了不甘心被赵紫阳“收编”，不甘纳入政府控制的渐进改良轨道的忿懑：

要把猴子等成人，要把凡人等成神；

要把雨露等成海，要把白骨等成魂；

要把红旗等成裹尸布，要把鲜血等成生命树；

要把爱情等成干地瓜，要把野心等成五色土；

要把事实等成一本书，要把鬼话等成万里图；

要把地主等成个体户，要把生命等成真坟墓；

要把洪水等成相思林，要把阿Q 等成太阳神；

要把未来等成一张纸，要把真理等成两片云。

5月下旬，为了批驳“撤免赵紫阳会出现历史大倒退”的观点，社科院近代史所一研究人员曾写大字报说：

“如果说5月19 日以前的学生游行请愿活动是有积极意义的，那是因为学生提出了‘打倒官倒’等正确口号。然而……官倒作为一种大量的经济现象出现，并不是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而在于亦官亦商的经济体制。而这种体制的产生又在于赵紫阳以商品化推到工业化、现代化的错误路线。”

“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这次群众运动面前，按正常道理说，是应当作一点自我批评的，如果他有‘十年失误，我有责任’这一句话，就不失为光明正大……如果他能像胡耀邦同志那样主动承担责任，事态本是可以很快平息的。但他却不肯这样做。”

这张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与赵持不合作态度人们的心理：不满的人群期待的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但他们的呼唤却召来了一个姗姗来迟却指手划脚的“救世主”。

就是在赵紫阳的阵营内，其他成员也未必有赵的那种自信和果敢。5月11日，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部门负责人以上编辑、记者、干部对话时，有记者问他对学潮的事情怎么看，胡启立说：“我想，《人民日报》26日、29日社论，赵紫阳‘五四’的讲话，亚行讲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讲话，说明了中央的态度。这些讲话，有同志说有变化，我认为，一切的任何讲话，一篇文章，都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时间地点条件而作出。还有，跟什么人谈，对象……一切讲话都有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但是贯穿的中心，就是要稳定，要团结，这是始终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经不起动乱的，要求大家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所以，这是中央再三强调，一直不变的这么一条红线。”他的答复，在那种时

间、地点、对象和条件下，真正不失为一种机智巧妙的答复。但是大部分人仍然没搞清楚：到底是邓小平面对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不得不讲那一番话，还是赵紫阳面对纪念“五四”的青年及亚行代表不得不讲这一番话？抑或是党的中央政策方针从来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据柴玲回忆，当时的感受：

“我们学生们那时对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一无所知。我们努力的靠观察各种风向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但是每天的形式都在不断变化。在4月27日的游行之后，很多学生沉浸在了表面的胜利之中。另有一些人坚持说一切都没有真正地改变。”

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几十年斗争的翻云覆雨，已经造就出一代政治上冷漠的中国人。面对看不清的局势，听不明白的道理，人们生发出的第一反应必然是：没有必要把自己和党内某种派别搅在一起，充当党内斗争的筹码和工具。正是本于这种心理，一场眼看着将要被赵紫阳收进钵底的学运野火，在这个党内唯一有可能扭转乾坤的法师面前，稍加犹豫，又飘然而去。

赵紫阳失去的机会，在事后看来，也是中国在80年代的最后一个机会。

然而，他的出面并非完全没有作用，至少，他把被“四二六”社论轧成铁板一块，怀着背水一战、慷慨赴死决心的学生阵营，瓦解成了一些碎片；使他们的继续抗争会在国人面前显得理亏；使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情绪的这场学运出现了力量的衰竭。同时，也把知识界人士由幕后引到了前台。

第八节 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北京的“五四”游行人数少于“四二七”大游行。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其一，是队伍中出现了外地学校的旗帜；其二，是重点院校的人数减

少，但以前没有参加进来的北京市专业学校，这次参加了进来；其三，是加入了新闻界编辑、记者的队伍，他们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旗帜走上街头。

这后一个新因素的出现，使仍在“开创校园民主”还是“向社会政治纵深”两个目标面前徘徊的学运潮头，有了一个喘息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也正是由于学运出现了这种从思想、理论，到生员和激情都后劲不足的状况，新闻界得以在一时间越居潮头，在“五四”以后，接过学运的接力棒，独领风骚三五天。

新闻界本来是一个社会中最敏感的部位，但在中国，它又是受管制最严的一个部位。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与经济上“赶超型”国家的动员机制相关，更与政治上“专政型”国家的统治机制有密切联系。不论新闻还是出版，都不是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文化、知识、信息的传播角色而存在，所谓纯粹的新闻工作者，当然更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他们统统受着共产党宣传部门的“归口”领导，而在大大小小宣传部的顶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管宣传的常委。这个常委表面上主管着党政军、工青妇、各省市自治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国务院各部委）的上千家报纸，但党委会对这些报纸的绝对领导（民主党派的情况类似，也是由各党宣传部领导，以便与执政党“归口”，并事先在政治上进行了自我阉割），就形成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只有一家报纸，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的局面。这种局面有许多特定的维持机制：其一，办报经费由国库拨款；其二，总编辑由上级党委任免或认可；其三，中宣部定期召集中央各大报刊的“吹风会”，确定一个时期的宣传方针与“口径”，规定哪些人的文章不予刊登，有越轨者要受到从“通报”到“撤职”的级别不等的纪律处分；其四，遇有重大事件，一律采用新华社所发“通稿”；其五，党内文宣部门从上到下遍布“耳目”，对各报动向实行日常监督，一遇风吹草动立即举报。几十年来，中国报人的命运跌宕起伏，没有一个是因经费无着，言语失信，或迫于同行竞争而失败的，他们的命运，大多和政治原因联系在一起。 “文

革”结束后，为了拨乱反正、探讨全面现代化路径，也有一二人物在新闻界作出“造反”壮举，如新华社社长曾涛 在平反“四五”事件问题上，突破中央口径，走在中央前面，促成中央转变的实践；《光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杨西光抵制主管汪东兴的两个“凡是”规定，率先公开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践；《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提出“党报既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与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的辩论；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因打“擦边球”屡涉险境的实践……

新闻界的痛苦由来已久，这痛苦不仅在于上级的压制和种种约束，还在于新闻工作本身的特性及对新闻人素质的要求与这种约束之间的矛盾。犹如囚禁生活对于一个生性沉静、爱好冥思者，决不同于一个活泼好动、血气方刚的人。新闻工作要求的敏锐、快捷、社会责任感与道义感，恰好与中共的新闻管理体制形成尖锐的对立。在中共四十年的统治中，有着良好记者素质者，大致有三条出路：

一是政治上被整肃，或疯或傻或自杀，能郁郁而终者，皆算善终；二是移情，要么转而充当“刽子手”或鹰犬，把过剩的能量和感情交给包裹着神圣外衣的权力；要么转战其他领域，走出“曲线救国”的道路；三是消弭自身的天性，掐灭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留在新闻战线，做一名“老兵”。即便是这后一种，他们也总是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的天性。所以，他们是这所有痛苦者中的最痛苦者！

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际的社会动荡，不论其价值判断如何，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毫无疑义，是一种战马对于骑手的召唤。虽有无数改革开放以来中箭落马者尸陈在前，又有新闻主管套上“统一口径”的笼头，勇敢者还是忍不住要冲锋陷阵。只是在奉献到读者面前时，那些巨大的勇气和超凡的热情，经过与各种陷阱的周旋和羁绊的厮磨，只余下丝丝热气。

最先行动的，应该说还是《人民日报》。4月17日，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记者张军荣摄自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民群众自发悼念胡耀邦的照片，照片说明文字是“4月16日，北京，人们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4月19日，《科技日报》不仅在头版以大幅照片刊登了18日北京部分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的情形，而且发表了《哀思洒满校园——首都大学生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倾注哀思——天安门广场目击记》两篇通讯，对学潮的初始作了首次报道。

4月21日，就在新华社发出《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的失实报道，并以《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为题配发评论的第二天，《工人日报》刊登了题为《最重要的是赢得民心》的评论员文章。当中央责问全国总工会，要查处该报时，全总主席、工人出身的倪志福进行了抵制。

4月21日晚至4月22日，大会堂前学生追悼与请愿的一幕，加之学生发表的对新闻界的不信任甚至愤慨言词，极大地刺激了在场的记者。而享有“新闻自由”的香港同行的出色表现，更使得大陆新闻工作者意识到在竞争中的劣势。

“据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扬建新说‘香港的大批记者3月份去采访人大、政协会议后就没走。……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些民运人士透露，要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给政府一点压力。香港媒体都知道有大事要发生，陆陆续续都来观看整个事件的发展。’香港《经济日报》记者罗一苹，1989年4月20日目睹了在中南海新华门外，军警们与示威学生发生冲突，并很快报道了这事实真相。她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有照片，把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都写出来，报道了公安打学生的情况。后来采访王丹时，把这篇文章给他，想不到他马上给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大量的，一万张，一万张的翻印，然后满街在贴，就看真相是公安在打学生，因为国内媒体没有嘛？说公安没有打学生。我作为境外记者，把事实真相写出来，影响很大。后来我知道，对北京的记者引起很大反响，为什么我们知道的新

闻不能写，反而境外的人写出来。’ 学生印发的小报，使香港报纸在大陆传播，确实成了北京新闻界大游行的动因之一。”

时任《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的陆超祺，在当时的日记中也多次据此反驳来自中央的压制：在开放社会中，你不报，人家从外电和港台媒体照样会得到真相。与其人家报，不如自己报。这的确对当时中国大陆的新闻人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海外同行、政府的新闻管制和学生鄙视的三重压力下，不少记者选择了新闻工作的职业尊严和道德良知，录下了当时的实况。但是，在报纸的总编辑负责与部门主任层层把“关”之下，有幸突出重围的仅《科技日报》一家。4月23日，描绘了广场学生追悼场面的大特写《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飞遍全城。紧接着，第二天《农民日报》也刊出了本报记者撰写的报道《再送耀邦一程，再看耀邦一眼》。但在中央的严密监督下，《人民日报》和其它报纸除刊登新华社的“通稿”外，自己采写的报道文章却只字未提广场事态。4月25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刘再复题为《两次历史性的突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的“现代文化意识”》的文章，批评了过去几十年党对知识份子的政策，反对“圣人立言”遵命文学，欢呼现在知识份子恢复了“五四”时代已经燃烧起来的个性精神、独立意识和对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关怀精神。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对工人农民进行现代意识启蒙和现代意识的普及。

此时，各报编辑、记者的“造反”行动已开始酝酿。

在《中国青年报》社内，4月24日，身兼学校部、科教部两个主要部门主任的李大同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要求按中共党的“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全社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同时，大家撰写了有关学潮情况的报道。当晚，该报20余名编辑、记者和半数以上的部主任，与总编辑和党组成员交换了意见。总编辑与各报“对表”以后，决定如其他报纸不发，

该报仍按兵不动。此后，该报一部门负责人又酝酿“部门负责人集体辞职”，但考虑到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报社，这样做只能增加报社内部磨擦，未获多数部门负责人同意。

25日晚，《人民日报》的员工从电台、电视台收听到“本报”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四二六”社论。该报国内记者又获知邓小平讲话中有“要制止学生运动，看来流血不可避免，我们还有三百万军队，不要怕影响国际声誉”的内容，忧心如焚。社论在该报发表后，该报编辑、记者针对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起草了一份《我们的意见》致该报编委会。指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原则”，批评了新华社和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的社论“强奸民意”。该报社评报栏内贴出文章，对“四二六”社论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驳。

“四二七”大游行后，《中国妇女报》冲破禁令，顶住高压，以《北京数万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为标题，首次正面、真实报道了学生游行的情况。所引学生标语内容为：“妈妈，我们没有错”和宪法条文。

巾幗起义，为新闻界造反提高了士气。

4月27日，上海市处理《世界经济导报》，撤销钦本立总编辑职务的消息传到北京，给跃跃欲试的北京新闻界以新的刺激，人们纷纷到导报驻京办事处表示慰问和鼓励，支持导报同仁与上海市委的非法决定抗争，迎接新闻界争取独立解放之日的到来。

针对新闻界的现状和“北高联”提出的要求，4月27日上午，主管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动找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主要报社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一开始，与会新闻单位负责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反映记者在社会上“挨骂”，领导人在报社挨记者骂的情况。与会者说：我们不知道如何掌握对这次学潮报导的分寸，希望中央拿出明确意见。胡启立则表示：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报社主编有权决定可以报导什么，或不报导什么。不一定事事都要请示。”

在谈到如何报导这次学潮的问题时，芮杏文说：

“我们的新闻战线的确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不能几十年一贯制。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但是新闻改革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的原则，新闻报导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失实。”

图5-6：别逼我们造谣（选自香港《明报》月刊）

在回答有关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处理一事时，胡启立说，“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是报告过中央的，中央支持上海市委的处理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胡启立、芮杏文表示愿意就新闻改革问题与记者进行对话。无疑，这次谈话，给原本十分沉闷的新闻界带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报社总编辑的胆略比原先要大一点了。

从4月27日开始，中央电视台就开始大量报导学运，人们可以从电视新闻中看到：

“学生手挽手秩序井然地前进、警察嬉笑观望并不阻拦学生、学生攀登军车和向军人解释民主的意义、建筑工地工人在高架上鼓掌、街道两旁楼房居民探身窗外欢呼、过路人踊跃捐款、学生向军警递交饮水食品等等镜头。”

虽然对《世界经济导报》利用报纸出版周期短的优势，不作修理地抢先发表与《新观察》杂志共同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的全部内容有保留意见，4月底，《新观察》也发出了自己报道“四二七”大游行、评论“四二九”对话的有份量的第十期稿件。

5月1日,《世界经济导报》第440期头版以通栏大标题刊出《我们需要自由地讲真话的环境》的本期内容提要,及以《政府不廉洁只能自食其果》为题的国际事务评论。在同期第13版副刊则在头条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莫要靠谎言过日子》;第7、第14版专论则刊登了两篇意味深长的《中国现代化与民粹主义思潮》、《“权威”能否成为自由的盟友?》。

与此同时,新闻界的一个联合行动也在酝酿中。

这个活动始于4月29日,在5月上旬达到高峰。它是由三条主要线索演变而成的:

其一,在4月29日中央统战部六局和北京市海淀区委举行的北京知识分子联谊会上,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研究人员陈崇山女士向阎明复提出,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够跟新闻界对话。阎明复当场回答:

“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据戴晴回忆:“大家七嘴八舌点出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四巨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阎部长说:‘好,我立刻联系。你们这边也提个名单。’他说着用手一指,把我与陈女士划了进去。

在他走向别的桌子以后,陈立刻找我商量。应该说,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为我不但对新闻界人头不熟,对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也很陌生。……但此时我不忍扫她的兴。同时,我也觉得,如果那时真的存在新闻界与中央协调的这种必要性的话——我认为无此必要,新闻是党的工具,这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斧头能向手要求什么吗——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闻从业人员了解点什么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我于是向她建议请《导报》的张伟国一道商量。”

于是，她们又找到会上仅有的两位记者——《法制日报》副总编王XX、《世界经济导报》张伟国，并一同草拟了一个对话名单。事后，陈崇山接到芮杏文办公室电话：希望继续组织这次对话，她便致信阎明复，希望记协出面组织这次对话。

第二条线索，是以广州的《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事处在鲁迅博物馆主办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为发端，以知识界部分人士对形势的分析及展望为背景，由《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和社经所《经济学周报》筹备的请愿活动：

4月30日，《时报》驻京办邀请了一些学者就当前学运的背景、影响、评价，学运的发展趋势及可能结果，学运对当前中国改革与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等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者有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良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包遵信，四通公司周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远志明、谢选骏，民政部干部管理学院教师黎鸣，《经济学周报》社长费远、副主编郑棣、王军涛（未请自到），北京大学教师孙立平等。

在发言中，大家认为，导致这场学潮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总危机。它首先是经济危机的征候。经济改革走入死谷，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情绪不满。如果没有胡耀邦的逝世，矛盾也会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出来。有人介绍了市民对学运的态度，说有60%的人持赞成和同情态度。关于学运走向，有人提出学运与社会民主力量结合。

据周舵回忆，他当时是主张“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的。他将之称为“掺沙子”。他说：这样可以“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

据《时报》驻京记者罗立为介绍，与会者认为，学生不希望外界介入，以免改变学生运动的性质。许良英先生说，学生应该干学生的事，记者应该

干记者的事。学运目前面临的是学生“自治会”合法化问题和舆论公正问题。周舵的发言强调了“找出有限目标”和“议定议论程序规则”及新闻监督对学运前途的重要性，既反对胡闹也反对清谈。有人还特别警告不要让陈军这种人介入，也不要动员工人农民。以“四二七”大游行为揭槩，中国政治“非理性时代”应该走向结束。

对于学运可能带来的成果，与会者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一是由对话入手，通过合法的程序，可能实现“结社自由”；二是由上海市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非法”手段为突破口，可能争取“新闻自由”。

会议结束后，东道主请新闻单位的人留下，共同商议就“导报”问题起草一份给中央的《公开信》，并相约5月3日下午再次集中，议定该《公开信》，以便5月4日正式递交。

事后，《亚太经济时报》与《经济学周报》各出一人起草了《公开信》。该信内容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4月27日上海市委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以及在此之前停止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的发行，我们认为，这些决定是违反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是违背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及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违背党的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开的原则的。对此，我们提出以下要求：

一、中共中央考虑撤销上海市委的该项决定；

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

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

四、政府与新闻界就这一事情进行对话，新闻界对话代表从本公开信签名代表中产生；

五、对以上要求尽快作出明确答复。

在此同时，《中国青年报》也在酝酿着一场与中央领导人的对话活动。与《时报》活动是建立在“务虚”基础上的背景不同，该报的活动是在外界条件的压力下，由自身“长”出的本能需求。据这次对话的组织者李大同回忆：

“我当时的思考是，本报内部的争论和分歧，实质上是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弊端，与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及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求改革这些弊端的愿望的磨擦。产生这种磨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说来，就是新闻界尚未建立和形成对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的符合新闻规律的快速、准确、灵活的多层次反馈机制。以上问题自1986年学潮后即成为我国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界讨论并加以改进的重点，成为我国新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改革的具体成果，体现在对大兴安岭火灾、一些严重交通事故、拉萨骚乱等重大新闻的报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威信。对以上取得的成果，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曾在1989年1月28日《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中作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要从引导国内外舆论、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和我国的国际形象出发，本着中央关于‘提高开放程度，增大信息量’、‘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继续努力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任务。

然而，这项重大改革毕竟尚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就突然面对这场规模空前浩大、背景空前复杂的学潮了。新闻界缺乏成熟的对策，只好再临时采用按统一指令，‘不利的事件不报’的传统做法。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显然对平息局势弊大于利。

结果，对新闻媒介的抨击，成为学潮的重要口号；这种抨击得到相当多公众的共鸣；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内部均就学潮报道方针发生激烈争论；一些新闻单位在内部压力下开始突破中央禁令；由于在我国新闻媒介上得不到关于这次学潮背景、状态和评论的足够信息，于是，‘大道不通走小道’、‘出口转内销’等方式传播的谣言不胫而走；收听《美国之音》、BBC 等外台广播的各阶层人数激增。”

李大同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采用“不利的事情不报”的传统做法，使新闻媒介这个原来作为平息事态最有效的工具，反而成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因素。所以，他提出，应当迅速修订学潮报道方针，这样才有利于稳定。

但是，他意识到，这一涉及到新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家新闻单位内独自解决，再在本报内部争论没有多大意义。4月29日，袁木在与首都部分大学生对话时说的一句话给了他启发。他传达了党和政府准备在各个层次上与社会各界广泛对话的愿望。看完当时的对话录像以后，李大同觉得，那场对话的水平很低。他认为，大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但他们受生活空间和阅历的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深切的体会，更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真正对改革和现代化事业起制度化推进作用的对话，只能在党和政府与专业工作者之间开展。

“这时，我便萌生了就当前新闻界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与中央有关领导进行一次对话的念头。4月30日，当我否决了其他同志提出的‘总辞职’动议以后，就提出了对话的动议。当即得到十几位部门负责人的赞同。于是，我开始考虑对话活动的安排。首先要争取不被误解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我确定了几条原则，一是要站在帮助党中央改进工作的立场；二是意见和建议要以十三大精神为依据；三是不能像学生那样，提出众多的先决条件；四是要与学潮严格划清界限，只涉及新闻问题。”

经参考报社总编辑徐祝庆的意见，李大同对对话活动以本报为主的原方案作了较大修正，决定广泛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意见，如对话动议得不到

多数新闻单位赞同，对话活动立即中止；如对话动议得到赞同，但对话内容为非理性的激进方案所取代，则我们立即撤回动议，并不再参与此事。

此后，经与同事商议，李大同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5月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将这封信带到了《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所在地鲁迅博物馆。据叶研说：

“我们的东西魅力显然比他们的大，他们的《公开信》显得像‘最后通牒’，而我们的则意味着一次行动。各单位要了我们的信，准备回去征求签名。结果把他们组织的会给冲乱了……”

据5月3日鲁博会议的东道主——《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事处记者罗立为介绍：

“5月3日，原定是讨论《公开信》的事，在二楼会议室里。但不知道谁把消息透了出去，结果来了很多外国记者，40多个外国记者，加上200多个国内记者，房间里坐不下，我们只好把会挪到院子里草坪上开，请各报派一名代表参加，其他人与外国记者先在葡萄架下休息。我们议定了《公开信》的第二稿。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中国青年报》的叶研也拿出一个打印稿征集签名，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后来经人提醒，叶向会议东道主道歉，并提议是否可以考虑将两个东西揉在一起？与会代表同意。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

以后又讨论了送交《请愿书》的问题。大家议定，5月4日中午12：00到新华社南门集合，然后到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递交《请愿书》。

图5-7：5月4日新闻界走上街头（选自香港《明报》月刊）

5月4日中午，各路记者顶着烈日齐集新华社南门。但这时，几个原定的这次行动的主持人只字不提请愿的事，也不提到记协去的事。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却拿出了一份游行口号，说，我们提出15条口号，我逐条念，如果大家没有异议，就算通过。这15条口号是：

首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集会口号

一．新闻自由，新闻公开；

二．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

三．人民有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批评权；

四．新闻民主，开放报禁；

五．要一部保护新闻自由的“新闻法”；

六．新闻自由有利于政治昌明；

七．新闻自由有利于经济发展；

八．新闻自由有利于社会稳定；

九．捍卫新闻真实，保护言论自由；

十．放宽对新闻报道的种种限制；

十一．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真话；

十二．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十三．反对粗暴干涉《世界经济导报》；

十四．恢复钦本立同志总编辑职务；

十五．新闻界要求与政府真诚对话。

这份口号反映了新闻界人士的各种憧憬，由于事出匆忙，人们并未注意到它自相矛盾的内容。口号刚刚读完，立即获得了通过。于是，首都新闻界成为响应八九学运的外界的第一支队伍，走上街头。

新闻界的游行被看成是一个壮举，但它却是新闻界对这次学运中自身不同诉求公开暴露的起点。这种不同，简而言之，一是以争取新闻自由、冲破报禁为目标；一则是以争取“放宽”对新闻管制的尺度为最近目标。前后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当前，新闻要不要对社会的稳定及执政党负责任。大致来说，前一种观点一般由生存艰难的民办报纸或由于新闻管制生存受到威胁的报刊和新闻工作者持有；后一种观点，则为在日益变化了的条件下，敏感地体会到生存危机的报刊及新闻工作者持有。前者是这次运动中的“激进派”，具有“革命”的意向；后者是“温和派”具有“改良”的色彩。由于知识界部分勇于“闯红灯”者与前一种诉求有着相关的命运，所以，在行动时，他们是前一种力量的后盾。但在人数上，前者是少数。

不过，这种分歧，在当时并不明显。这表现在，虽然人们对有“最后通牒”色彩的《公开信》弃置不顾，但人们却以违反北京市“十条”规定，上街游行这种更激烈的方式进行了补充；在游行的口号中，代表两种观点的内容兼收并蓄。

但是，到了5月5日，即赵紫阳“亚行讲话”发表以后，在新闻界代表继续讨论对话问题时，这种分歧更加明朗化。在新闻所召集的这次会议上，到会的各家新闻单位代表所汇集的情况表明，通过程序对话来表达意见的方案，得到了首都新闻单位的广泛赞同；对《中国青年报》李大同起草的请求对话的信件内容，各单位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信件签名者踊跃。而原先由《经济学周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代表起草的，以责成中央重新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为主要内容的《公开信》不再被人提起。并且有人动议，因为这是以“首都新闻界”名义进行对话，所以，是否请非首都新闻单位就不要参加？另外，还提出这是党报与自己中央的对话，是否非党报就不要参加？

按照这个动议，原《公开信》的发起者，《亚太经济时报》（外地）、《经济学周报》（民办）和“当事人”《世界经济导报》（外地）就可以被排除在外。但这样一来，除在这次学潮报道中表现突出的《科技日报》（专业报）也将不能参加外，甚至连发起单位和组织者《中国青年报》的身份也会受到质疑。由于这个动议的不合情理，因此没有被通过。于是，在选派对话代表问题上，又采取按签名人数多少分配名额的办法。这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这些有一二百人签名的报纸当然就位居这次对话的主要地位。再加上上述几个相关单位，和召开当日会议的东道主——社科院新闻所，共组成对话“十人代表团”。最多不超过20人。

对话原准备指名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进行。经咨询老资格的新闻学会会长胡绩伟后，改为“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

5月9日下午2：00，新闻界要求与中央领导对话的联名信递交活动准时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进行。在记协常务书记杨翊致欢迎词以后，《中国青年报》记者部负责人郭家宽介绍了此次活动的大致设想，李大同宣读了信件全文：

全国记协书记处：

根据赵紫阳同志5月4日“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谈话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正常途径，就中国近日来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

我们认为，需要进行对话的主要问题为：

一、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该报总编辑钦本立被停职的问题；

二、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潮，在这种重大事件过程中，首都新闻单位因种种限制，无法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并且在各方报道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因而严重损害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声誉，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扩大。我们认为，首都新闻界在这次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受到的种种束缚，违背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基本原则，现在极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就如何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三、国务院发言人在4月29日与首都大学生的对话中说：“我国新闻工作实行的是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我们的新闻是自由的”。我们认为，这与中国新闻界的现状严重不符。事实上，中国新闻报道的运转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迅速建立起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恰恰是中国当前新闻改革的首要问题。

以上对话请求，请中国记协转呈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32个新闻单位的1013名编辑、记者。他们均代表个人，而不代表所在单位。

与此同时，在会场外，数百名骑自行车前来的热情的大学生聚集在记协门口，打着“声援新闻界的良心”，“支持《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标语、横幅，高呼“为民说话，关系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声援新闻界的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新闻界对话的组织者，为将这次活动与学运区别开来，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早在5月4日，部分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李大同就通知该报记者，此次行事，绝对要按合法程序运行，这是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在5月5日的集体讨论会上，议定的几条不成文原则中，有“不为对话成立任何名目

的组织，”解释是因为新闻界已有自己的合法组织。但是因参加对话的新闻单位和人数过多，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之前的大量具体协商工作难以由全国记协承担，有必要以一家新闻单位为主，就对话中将涉及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初步的归纳和整理。同时还议定，要“严防活动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新闻单位的参加者不得与学潮发生任何联系”，故送达信件时，不造任何声势，以“静悄悄”的方式进行。5月9日，当有记者报告：大学已贴出告示，号召大学生下午到记协“声援新闻界”请愿时，组织者当即决定请几位身高体壮者同行，任务是把大学生挡在门外。

在递交信件结束后，李大同还特别对“对话”这个词进行解释说：“对话不是对抗，也不是辩论，而是双方充分交流自己的观点”，以防外国记者对汉语造诣不深产生歧意。

此后，在进一步商议各报参加者名单时，因在《世界导报》“四一九”座谈会上的发言，有“激进派”嫌疑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也被提出了异议。有人则质疑她曾为“中央调查部”工作人员的身份。

5月9日部分首都新闻界青年编辑记者递交对话信件一事，事后被有关报道称为“递交请愿书”活动，也有人讥之为“新闻界跪着造反”。但李大同坚持从未使用过“请愿”这个词。在这次递交信件活动中，原定程序没有安排其他人讲话。但信件递交完毕后，面对众多海外新闻记者，陈崇山突然提出要对这次活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介绍。她除了左一个“娘家”，右一个“娘家”地称呼官方控制的中国记协，大谈了一阵“中国新闻界的耻辱”外，还强调这次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对话，目的是为了促进新闻改革，而不是要把事情搞乱。”因为她的刻意强调，请愿活动被不满的人们称为政府继“四二九”对话之后再次导演“新闻界对话”的“标本”。

而事实是，这请愿的被接纳，只是赵紫阳“开明牌”在新闻界的一个回响而已。

此时，赵紫阳确已面示胡启立、芮杏文，新闻要更加开放。他说：

“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

在讨论中，胡启立说：“学生强烈要求新闻界对他们的活动进行如实报道。一开始是对‘四一九’、‘四二〇’晚学生在新华门静坐示威的报道不满，认为太片面；接着对‘四二六’社论不满，认为对学生的定性完全是错的；上海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又被传得纷纷扬扬。学生提出‘新闻要讲真话’的呼吁，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赵紫阳表示：

“我看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

芮杏文认为，“新闻要讲真话，老百姓才会相信。现在，我们的记者就不相信自己，还打出标语‘不要逼我们造谣’。看来，我们的新闻体制的确需要尽快改革。”赵紫阳说，自己也“听了不少反映，看了不少报告”：

“新闻改革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新闻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要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

接着，胡启立谈到新闻界正征集签名，要求对话的情况。赵紫阳说：

“我们应该欢迎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与新闻记者对话，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我们的想法，有助我们的新闻改革。今后，在处理一些敏感的新闻事件时，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千万不能简单草率地下结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搞得我们很被动，原因就在这里，要引以为鉴。”

当天下午，也就是新闻界递交对话请愿书的前三天，胡启立、芮杏文向北京新闻界主要负责人作了传达。在事后的“大清查”中，有关资料证实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赵紫阳的这段谈话，明确了“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是本次“新闻维新”的政策底线。这与前述新闻界要求中的“体制内”观点“不谋而合”，因此奠定了这场党与新闻界对话的基础。

5月8日，亦即新闻界递交对话请愿书的前一天，胡启立致电《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新闻界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他还希望《人民日报》根据这次学潮的报导，“总结几条经验，提出几条措施，包括报社的自主权有多大，就可以做到客观、真实、全面报导，可以进行舆论监督，可以引导舆论。最后产生一个中央政策文件，在新闻法之前公布。”

5月9日，亦即新闻界递交对话请愿书的当天，胡启立把赵紫阳5月6日对他和芮杏文的讲话整理成要点，经赵紫阳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

遵照5月8日常委会与赵紫阳讲话精神，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于5月1日至13日主动前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几个大单位，听取编辑、记者的意见陈述。在《中国青年报》的对话会上，郭家宽的发言对学潮发生以来事实真相与报刊的失实报道进行了心平气和的展示；指出了目前新闻管理体制是战争动员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并指出，胡耀邦逝世以来新闻界的作为，已从前段新闻改革的成就上倒退。但他也表示，不赞成在现阶段提“新闻自由”。李大同的发言着重分析了现代社会对新闻业的要求与党对新闻工作的传统观念的不相称；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在此次学运中遭受的刺激；以及新闻改革应从系统全面清理中共新闻管理思想入手。在论及《世界经济导报》问题时，他提出了妥协的处理方案：即暂时保留上海市委撤销钦本立党组书记的决定（因为这在程序上没有問題），但撤销上海市委对钦行政职务的处理，撤出整顿小组，改由宣传部门、新闻界和公众代表组成的评议会，对439期“导报”的社会效果进行民主评议。再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根据评议结果对钦的行政职务做出处理。胡启立对此建议大感兴趣。表示立即转达有关人士。

在这次对话中，胡启立谈到：

我理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加强民主法制，推进新闻改革。这也正是我们几年来在反复思考、研究和实践着的问题……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个人赞成你们刚才所说的一些重要意见，就是对我们的新闻工作，缺乏一个系统的总结回顾。

在制订新闻法的同时，或者在这个之前，应该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清理一下我们的思想。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认为，通过这次事件，（对我们的新闻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把我们历来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我们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我们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和模式，是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环境条件等许许多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一概否决，说都错了。

这次事件的报道……开始控制得紧一些，后来放开了一些。游行不是也报了吗？也没有什么呀！看来，增加透明度，公开化，有好处；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开性不够，毛病甚多。

我感到，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思想观念，领导方法，宣传方式方法，都需要根据发展了的新情况来改进和更新，这才能够实现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才能够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支持群众反映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完全靠中纪委、中监委去查，查不清楚。只有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立一套检查监督的机制，包括差额选举，人民有罢免权。你烂的不像话，下回不选你就是了……这涉及到一系列立法等等问题。

胡启立在谈到“新闻自由”问题时说：

这个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的渠道。我们的新闻立法，第一要保证宪法赋予的权利，保证新闻自由；第二要根据宪法，防止滥用权力，滥用新闻自由。

这个同志们都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没有法制就没有自由。但法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在两种经济体制转换时期，“稳定”的特别重要性。

本来，这并不是一次理想的对话，事前既没有通知新闻界方面，以给出准备的时间，也没有告知来者的身份。在新闻界方面，不得不仓促上阵，全凭发言人功力和素质的临场发挥。它只是赵系人物准备打好新闻界对话这一战役的前哨战，但由于后来学生突如其来的绝食成为社会焦点，准备中的正式对话因而停止，它竟成了八九民运中（可能也是1987年十三大以来）唯一成功的一次对话。

与此同时，在《人民日报》举行的对话则因没有形成任何共识，而变得有名无实。会上发言者言词激烈，邓小平、李鹏、何东昌、袁木都被点名。前来寻求“沟通”的中央“对话”代表，如同代人接受审判一般，如座针毡。成为赵紫阳“开明形象”的“牺牲者”。

5月13日，也就是学生“绝食”登台的当天，党的领导人与新闻界人士举行了最后一场对话。对话仍然在统战部会议室举行。据戴晴回忆：

“我正点踏进统战部会议室的门，没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着的最后一名。胡启立、阎明复、陶斯亮都已在座；除我们六名被邀的新闻界——更确切地说应是新闻理论界——人士而外，记协的两名头头也到场了。……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五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因为对新闻理论不大通，一直没有插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年轻的所长孙旭培谈到的新闻立法问题。他从这部法的动议、搭班子、换马、数易其稿一直谈到迫在眉睫的送交人大审议。他认为这里边埋藏了很多问题，恳请提交前将草案公诸于世，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真是新闻界的头等大事。”

在新闻法的制订过程中，哪些问题上有过分歧？事后多年，孙旭培在接受腾讯记者采访时曾介绍：

“胡绩伟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按照他的总结有五条：其一，对制定新闻法的指导思想，一种意见认为是保护新闻自由，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其二，一种意见认为新闻法是为全国人民制定的，是为全国人民实现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新闻工作者要遵守，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要遵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强调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加强道德自律，应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管理；其三，一种意见主张‘报刊的创办也可以由自然人进行’（见新闻法研究室起草的新闻法草案），另一种意见则坚决反对；其四，一种意见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战争和国家总动员时期除外），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报纸的重要稿件，理所当然地要送党委审查；其五，一种意见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但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要强化监督舆论。”

当时，高层的阻力主要来自陈云和胡乔木。陈云的一段话流传很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而胡乔木则主张，先制定出版法，再制定新闻法。

戴晴记得，当时，胡启立频频点头，当场答应一定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但她感觉，领导人对其中问题其实是了然于胸的。

戴晴发言时，首先替张伟国转达了《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的意见，并陈述了个人看法：钦本立不必检查但也不必复职；工作组撤走，保留第三审的顾问权甚至暂时的三审权；编辑部恢复正常工作。接着，她谈了民办报纸问题：

“我从来没提过新闻自由，不是不爱它，只是此生对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觐见教皇一样。不过有着发育正常的大脑的人只作工具与喉舌，总不那么对劲；况且我们也觉得，以一个人的思索与判断来代替亿万人的，这人如果不是上帝，难免出点岔子；而出了岔子，最后倒霉的，又总是那被剥夺了思索权利的人。

但这番道理没人要听，如今能打动中共高层的，只有孔方兄。他们是那么坚定忠贞的马列主义者，面对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只有孔方兄才能使他们的眼珠略转一转；如果这话说得太不具学术气息，也可以改为：枪子儿什么都对付得了，唯独在通货膨胀面前无能为力。

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将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包下来，财金负担过重了。我提出能否按报纸的重要性从财政上分为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级，党报，如《人民日报》，各省党的机关报。对这级报纸，政府财政全包，包括人员工资、住房、差旅、发行、生活娱乐设施等等，他们则完全起传达党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级干部也完全由党的组织部门直接任命；第二级为比较重要的专业性报纸，如工、青、妇的机关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他们，国家只负担员工的基本工资，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挣了。为此，在版面上，也必须给他们一点自由度，允许他们发表一些使读者愿意掏腰包订阅的文章；对这样的报纸，主要干部上边任命，但应充分考虑本单位职工的意见，因为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饭碗问题。第三级为零杂小报，对他们，我建议政府原则上不要管，由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会决定，但要严格接受新闻出版法及各种法律法令的约束。”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作用。我绝不谈舆论监督，恰如我不谈新闻自由一样。我知道中共宁肯要一万只麻烦死了的举报箱也不肯容纳一块经调查核实后刊出的要害举报版面。原因是明摆着的，能看到举报信的有几个人？想要抛出什么人与瞒住什么是很便当的。

我只谈舒泄。泄掉总是一件好事，将具有破坏力的闸崩变为涓流，对谁都不构成威胁。我扳着指头为他算如果自4月15日起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局面可能会出现的变化……话还没有说完，会议室屏风的另一侧已响起盘盏的叮咚响。”

这便是1989年5月“与新闻界对话”的最后一幕。

5月12日，在中央举行的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赵紫阳5月6日就新闻开放对胡启立、芮杏文的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传媒出现了一派空前自由、活跃的局面，从自己的报刊上，读者得以真正了解到发生的事实真相。尽管它仍是非常有限、很不彻底、极为短暂的。

5月5日，《人民日报》于头版《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的下方，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燕辉拍摄的高校学生“五四”游行的照片，图中隐约可见游行队伍中高举的载有《宪法》关于公民自由权利条文的标语牌，还有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横幅。《中国青年报》于同日刊出图片，报道了数百名新闻工作者自发组成的一支队伍上街游行的事情。图片中“新闻封锁不利于稳定”的字样清晰可见；《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5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头版头条刊出《赵紫阳国外归来充满信心接连讲话论时局 公开化 透明度将在更高层次步步推开》；在该版的中心位置则以大标题《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刊登了2、3、4版的内容提要。下面最醒目位置，是一幅北京记者游行的图片和相关报道。在该篇的左侧，还“别有用心”地框出6版一篇题为《叶利钦现象》的小文提要。在该期第2版（要闻版）还在头条位置刊登了以《新闻改革如何跟上形势？》的研讨会报道。

图5-8：5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北京记者的游行图片（陆一提供） 据陆一介绍，那篇北京记者游行的图片报道，是大样已签发后，朱杏清连夜到印刷厂改版添加进去的。不料，此举竟使该期导报成了“绝响”。

5月10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大报，均刊登了首都新闻界向记协递交对话要求的消息。

5月15日，《光明日报》刊出了“首都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请求对话”的图片。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播出了戴晴等12名知识分子、学者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以引人注目的手法对当日广场学生的绝食及声援场面进行了报道。并传达了首都某地党政机关也参加了声援的信息。

5月16日，北京出版的报章大都刊用了新华社或本报记者撰写的有关学生绝食请愿的报道，有的配以图片，显示了绝食学生晕倒的情况。其中《人民日报》公然采用了《首都一部分高校学生继续绝食，知识界人士到广场声援》的标题，海外版刊登的照片中，有绝食团成员柴玲手拿扩音器，身后牌子上学生的绝食时间和晕倒人数等场景。《科技日报》则刊登了一篇集体采写的报道，题为《国家民族利益呼唤着理性和人性》，翔实报道了学生绝食事件。

同日，《人民日报》社800员工（包括一些资深编辑记者）再次上街游行。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电视新闻。据封从德回忆：

“（5月16日晚）7：00。新闻联播。我惊奇地听到官方对绝食的正面报道：多少学生继续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如何请愿等等。我感到十分振奋。这可是全国都能听到的新闻联播！”

虽然美国之音、BBC等广播也能听到，但因是短波，又被当局定为‘敌台’，在大陆收听的人并不多，且主要限于学生、知识分子阶层。当局新闻联播正面报道学运，意义非同寻常。除了覆盖面很广以外，因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它播出绝食的消息，多少带有承认的成份。

我感到十分鼓舞，更相信我们在广场上坚持下去，可以唤醒民众……”

5月17日，《人民日报》二版的图片上，赫然有“北大教师誓与学生共存亡”的大字横幅出现，并报道了绝食人数剧增，医疗单位全力抢救的消息。《中国文化报》还刊登了报道严家其等人发起《“五一六”声明》的消息。

5月18日，首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5月17日首都百万群众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学生的消息，《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予以刊载，并以显要位置刊登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紧急呼吁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本报编辑记者游行、绝食学生和群众、工人声援游行的照片。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有史以来的“新闻维新”，外电自始至终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及时的评价。国内人民亦不无耳目一新之感。几年以后，当笔者到大西南山沟里去采访，一位农村教师得知笔者曾供职首都新闻界时说，只有1989年5月的几天内，中国有真正的新闻。

对此，李鹏们的看法则完全相反。早在4月17日，在看到《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照片时，他就“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他想起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他疑问“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5月8日，李鹏又写道：“这两天新闻报道本来就向动乱分子一边倒，赵紫阳还嫌不足，还要新闻界把动乱之后再次煽动起来。艾知生参加了这次会

议。他送来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果然不出意料，由于赵紫阳在亚行讲话的发表，北京各高校闹事学生又纷纷活动起来。《人民日报》不但在头版头条登了赵紫阳讲话稿，而且在头版下方配有一系列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讲话的消息。”

19日上午，李鹏日记记录了李先念对新闻界的批评：

“这次事件闹得这么大，跟我们的新闻宣传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天来，报纸、电视、电台不仅不做正确的引导，反而连篇累牍地宣传鼓动，推波助澜，好像上街游行的都是爱国者，不上街游行就是不爱国的。还有，赵紫阳的一篇讲话比‘四二六’社论的社会效果要大，反映要好，真是不可思议……”

第九节 赵紫阳的“双周维新”

据杜导正回忆，1987年7月18日，赵紫阳与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他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有过一段谈话。赵紫阳说：

“改革，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谁改谁好。东欧、苏联日子比我们好过。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外，尤其苏联、保加利亚，四十年了，国内无动乱，生产发展，人民生活过得去。成立互经会后，他们经济更发展了，但与西方比，他们又落后了，这差距在加大，越来越大。西方靠科技，靠科技的强大促进经济的力量，资本主义的统治又得到改善，他们从利润中拨出一批给劳动者，对高额收入者征收累进税，使阶级矛盾缓和，人民不想革命。瑞典的福利社会经验，尤其值得人们研究。日夫科夫（保加利亚领导人）说：‘人民不凭信仰拥护社会主义。人民凭得到的经济利益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在战争时期，人民出于战争，出于改革制度，如我们的土地改革，拥护、支持我们党。现在呢？我们再不改革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大力改善人民生

活，人民还会拥护我们吗？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是对的！非改不可，戈尔巴乔夫也真在改！改，必须，但改到哪儿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改，有个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在我党。苏联改革阻力在人民，因为人民过得去。我国改革，人民盼改革，怕我们改革的政策变，我们改革阻力在掌权的领导干部，他们老怕改革‘越规’。

耀邦同志以为领导上同意我们政治上也要大变革，他又同情弱者，所以在反自由化上不积极。其实，中国自由化思想会长期存在。这要靠我们的进步，靠我们教育。自由化大潮泛滥是可以避免的，耀邦当时领导上软弱了一点。

我的看法是对自由化思想，要特别考虑知识分子中的中间人士人心的向背。我们党在这类问题上多少年的失误，造成他们一种不正常的心理：你支持我反对，你反对我支持。所以我们的政治形势应宽和、和谐。弦不要绷紧了！越紧，知识分子中间群众越脱离我们！

这牵涉到报刊、舆论的管理。我们党与国家，只整两类：一、煽动群众不满党不满社会主义的；二、毒害群众，煽动打砸抢和淫秽的。其它的，不以为然，管多了不好。我的意思，国家对出版对舆论的管理思维是：该管死的管死，其它的放开，睁一眼闭一眼！把管死与放开的关系处理好。现在要点是放开！”

据杜导正回忆，赵紫阳的这段讲话，是他“听到反映我与姚锡华当时反精神污染比较积极后，作为老上下级关系，有意给我和姚打招呼”说的。因此可以认为，这种看法，是赵紫阳不戴“面具”时的真实思想。

有迹象证明，赵紫阳提出“新闻改革”，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其中之一，便是对有参政诉求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开放空间的问题。据鲍彤回忆：

“5月上旬，《零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

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紫阳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判断，第一，赵紫阳在八九民运期间的政策转向，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对他的一贯思想的实践。以前没有做，或者不理解胡耀邦，可以认为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以理解为，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而现在，他认为时机成熟了。第二，赵紫阳考虑的问题，远远大于他实际提出的方案和已经公开推行的政策。开放新闻不仅有壮大“第四权”对政府施行监督的功用，直接受益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虽然它满足的只是知识界意见表达权利的诉求，而非对政治权力的诉求，但那是绝大多数知识人的愿望。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

据李鹏回忆，会议听取了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小组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下一段工作布置的汇报。乔石重点叙述了27日学生大游行前的情况，如闹事学生两次冲击新华门，22日追悼会后的请愿，23日后的串联，在高校夺取合法学生会的权力，罢课活动。乔石肯定了动乱的事实，也澄清了学生递交请愿书，李鹏不接，纯属谣言。乔石讲完后，赵紫阳说，如果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李鹏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

在介绍完学潮情况后，北京市委书记、制止动乱领导小组成员李锡铭说：

“这次学潮的确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北大为什么闹得这么凶？就是因为有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在幕后策划，北大学生所谓的民主沙龙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办起来的。现在，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已经公开承认插手了这次学潮。美国国会还举行关于中国学潮的听证会。所以说，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是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在这场严峻的政治斗争面前，北京市委、市政府

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希望中央对我们北京的工作提出明确的方针，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

陈希同接着谈到，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与“四二六”社论的调子不一样，高校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觉得“不好理解”，“无所适从”，询问“我们到底以哪个为准？”赵紫阳并不辩解，而是说：“关于我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我讲错了 I 负责”。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首先发言：

“这次学潮的发生，实际上是近年来国内外多种因素积累和演化的结果，它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由于近年社会中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使少数人暴富，这中间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干部子弟。这一现实，使不少人对现行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怀疑。二，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使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三，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引起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所以，这次学潮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及时有效地平息这次学潮，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实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

赵紫阳的发言，得到了薄一波的赞同：

“这次学潮不是一件孤立的学生事件，它已经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北京市民普遍同情学生，说明学生所提的一些口号正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所以，紫阳提出的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做几件实事，我看是得人心的。古人云：‘施之以德，威之以法。以德者昌，以力者亡。’回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建立在一种大得民心的清廉光辉的基础上，共产党的的确确为老百姓谋幸福。而最近二十年，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却逐渐被党内腐败分子所玷污，他们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利欲熏心，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我认为，恢复党的形象，必须从廉政入手，必须从中央做起。也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弭政治动乱的根源，平息老百姓的不满，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乔石也赞成赵紫阳的意见。他说：

“我们对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危险不可低估，对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不可低估。以这次学潮为出发点，如果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不能得到妥善适当地解决和引导，就将严重危及社会安定。现在，我们在加强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作出一些实质性的措施非常及时。如果我们的措施有力，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因势利导，可以把这次学潮中要求改革、拥护共产党（哪怕是表面上的拥护）、爱国主义的潮流，引导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清明政治，革除腐败现象的方向上，从而激发青年中的爱国主义和奋进精神。”

反腐败，李鹏也不反对：

“国务院决定尽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我们确实应该下决心整顿一些与高干子弟有关，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大公司，并把整顿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有问题就查处，没有问题要澄清。这是廉政建设的必要措施，也是恢复党在人民中形象的重要一步。”

李鹏的回忆还记载了赵紫阳的另一些话：

“如果北京高校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在这广大学生中没有威信，在台上久不了。”

李鹏认为，“这是赵紫阳变相承认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这与学生把今后对政府斗争焦点放到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意图不谋而合。赵紫阳临去朝鲜时，我问他如果出现团结工会式的自发学生组织会怎么办？他当时明确表示那不能承认。现在，很明显他已经改口，说‘承认’也没有什么的大的关系。他不是回电同意邓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动乱的讲话吗？小平就说过波兰团结工会式的组织不能承认，要坚决取缔。事实说明，赵紫阳已经离开中央的方针，走的相当远了。”但是，李鹏似乎没有在会上讲出这些看法，仅仅限于“腹诽”。

据李鹏回忆，与会者还议论了学生会不到改选期，该不该改选这样具体的问题。赵紫阳又提出，中央与学生对话也不一定都由学联或青联类官方式的学生团体参加，学校里学生自己产生的组织也可以参加，学生自愿结合也可以。但是，与会同志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

在这次会上，胡启立仍旧谈了他对新闻改革的看法，并建议“建立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向社会申报和公布财产的制度”。

杨尚昆则提到“建立公开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的问题。他说：

“这次学潮，流传着一张在社会上传播很广的所谓的‘亲官图’或叫作‘革命关系图’。图中罗列了高干子弟担任省军级以上高级官职的亲属谱系。这张图在社会上传播极广，已达到臭名昭著、大失民心的地步。小平同志也听说了，非常生气。我看了此图，里面所列有真有假。这是对党和政府威信的极大损害。我认为，有必要在适当场合对此加以澄清。”

“我认为，高干子女中有德有才的完全可以与平民子弟同等资格担任高级干部。问题是必须保证‘同等资格’这一点，很多老百姓对此不相信。在政治改革中，应当建立制度化选拔和提升干部的方式，使无论高干子弟还是平民子女，其中的优秀分子都能有平等的机会，根据德才标准，担任高级职务。目前由于缺乏这一制度，事实上使许多担任高级职务的高干子弟在人民群众中受到广泛嘲骂。他们即使自己工作很有成就，人民群众也会认为他只是沾老子的光当官而已。所以，我们同样要尽快建立这样一种公开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

对此，赵紫阳认为，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他主张把康华、中信等五大公司交人大常委会组织审查。李鹏则“顶牛”道：“提高透明度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姚依林并不反对以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但他认为，那并不能立即解决当前的问题。对于当前学运，他依然主张“强硬”：

“这次学潮还没有完。这几天虽然太平一点，但学生们又在酝酿下一步的动作，又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在为学生出主意。我们是执政党，好的意见我们接受。不好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反驳。这次学潮已经牵扯了我们太多的精力。学生现在在采取‘拖’的策略，我们不能‘拖’，我们‘拖’不起。该强硬的就一定要强硬起来，决不能因为学潮而打乱我们正常的工作部署。”

赵紫阳见此，将话转了一个弯，然后依然直奔自己的主题：

“我想我们大家和依林同志的意见一样，决不能因为学潮而打乱我们正常的工作部署。当然，对这次学潮的处理，我们还是要坚持把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极少数人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

当前，在廉政建设方面，我的初步想法是，国务院尽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公布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特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建议把今天会议的讨论内容放到政治局的会议上再进行讨论，以便提出更加全面有力的方案。”

这，就是后来被称作赵紫阳“新政”核心的“五条建议”。当天的会议赵紫阳只是将它提了出来，并没有付诸讨论，更没有被“通过”。

在这次会上，乔石曾提出，胡耀邦治丧已结束，中央制止动乱小组应该加以改组调整。但李鹏认为，乔石领导的治乱小组工作得力，为了保持工作

的连续性，治乱小组不宜改组，至少要保持到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后，再来议论。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亲自下到基层去，多做群众工作，主动与学生、工人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话”

赵紫阳的“五条建议”，反映了由学运表达出来的部分民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参照上述关于“反自由化”的思想，这个设想可以说反映了赵紫阳到北京执政以来的一贯风格：绕过难点，在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不争论，做出成绩后自然会转变大家的认识，获得大家的认可。这后一个特点，常常造成“赵紫阳刚愎自用、独断独行”的印象。

但赵紫阳的这个建议，有着锋锐的杀伤力。因为它所列“清理公司”名单，首当其冲的是邓朴方主持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康华公司。对比两年前亲手把它变成一个“正部级”公司，赵紫阳这次可谓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

赵紫阳的这个建议，还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不论是“反腐”还是“倡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将在未来的历史中扮演主角。人大不再是“橡皮图章”。换言之，此役的对决，将在邓小平和万里这一对“老朋友”之间的桥牌桌上进行。

但不知什么原因，万里并没有列席这一天的常委会。

赵紫阳的“五条建议”，加上“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个总纲，形成了赵紫阳的“新政六条”：

一、尽快公布审查国务院直属的四大部级公司的结果；

二、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但75 岁以上的老同志仍然保留，公布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的经历和财产；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专门受理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子弟违法乱纪的案件；

四、尽快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

五、司法独立审判，不能再搞联合办案；

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

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全会。会议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方针。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与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杨尚昆、薄一波、宋平、李铁映、秦基伟、田纪云、吴学谦、李锡铭、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

赵紫阳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一应事宜，然后自然转到了学潮、廉政、新闻、集会、结社、立法等问题。与会者就各自关心的问题 and 了解的情况交换了情报，表达了看法。

在谈到学潮问题时，李铁映、李锡铭重点介绍了京、津、沪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认为原先充当龙头的一线城市、院校的学运出现疲态，形势已渐趋于平稳，但外地有兴起和扩大迹象。

对此，李鹏、宋平、杨汝岱补充道，许多地方不满的原因，一是“对话”失败，如山西、甘肃；二是对腐败有意见，如四川、山西。

李锡铭在介绍北京情况后，提到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一是北京的学潮已与一些知识分子相结合，并掺杂了一些外国人在里面”。二是“北京工人已有闹事的苗头。”他说，从4月25日到5月9日，北京矿务局已经发生十次请愿事件，最多一次达到280人。全局六千多名家属工中，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请愿。主要是农民轮换工、矿区农民和一些家属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解决“农转非”和参加养老保险等问题。近日，北京矿务局有三条电话

线被掐断，房山矿南大门被当地农民用石头砌成一米多高的墙壁堵住，一些农民工不止一次冲进食堂抢粮食。据李鹏说：

“锡铭他们北京市的领导已经有二十多天没睡过太平觉了。”

李瑞环在介绍到天津情况时，也谈了对这次学潮的起因分析、处理方法和自己的观点。他说：

“天津的学生总是跟着北京的学生跑，闹学潮也总是慢半拍。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你要对话可以，但你首先得遵守宪法；你要游行不阻止，但你不能破坏整个社会的秩序。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所以，天津总的社会秩序正常，工人照常上班，市民照常生活。我今天想说的是，不能把这次学潮单纯地归之于胡耀邦同志逝世，单纯地归之于极少数阴谋家的教唆挑衅。建国四十年来，我们党有过‘反右’、‘文革’等多次沉痛的教训。而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我们再有重大的政治失误，很可能会大失民心。”

李瑞环认为，这次学潮的发生有几种因素：一是学生中的不满情绪和崇尚民主、自由、人权意识的增强；二是近年西方激进改革思潮、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三是国内极少数自由化分子的暗中支持；四是海外敌对势力的背地里鼓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对话很有必要。我们不宜再对学潮发表一些刺激性、对抗性的宣传，也不宜再强调“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上，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帽子望而生畏，显得特别神经过敏。结果是谁戴上这种帽子，大家就同情谁。我们应对这几年来社会上老百姓强烈的逆反心理有足够的估计，你说物价不涨，事实是它就涨了，老百姓还不逆反？上次学潮我们开除了刘宾雁等人的党籍，结果他们的名望反倒更响了，成了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以，李瑞环说：“我们没有必要再用类似的办法处理这类人与事。对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不宜一味地抓、关、管，可以放他们出国，并在适当时间内，暂不允许回国。”

薄一波对李瑞环的意见表示赞同。接着，江泽民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在提到《世界经济导报》整顿问题时，胡启立、赵紫阳先后的插话均有责备之意。赵紫阳说：

“在处理‘导报’问题上，你们市委的处理显得仓促、草率，以至把并不复杂的问题搞被动了，搞糟了。”

江泽民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钦本立以阳奉阴违的手段欺骗市委。作为一个党员，违反了起码的党的准则，理应受到处理。关键是这件事情被新闻界扩大化了。对于这次学潮，市委的态度是鲜明的，就是决不能让学潮影响上海日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决不允许成立非法组织；禁止非法示威游行；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串联，努力做好学生、教师的思想和疏导工作，特别是争取做好中间群众的工作，化解矛盾，力争尽快平息事态。”

杨汝岱在介绍了四川学潮的情况后，会议话题自然转到“惩治腐败”问题上来。乔石、田纪云、宋平都表示，中央确应在惩治腐败上拿出过硬的措施来。

宋平还提到，“山西学生的口号中就有：省委大楼全国第一人均收入倒数第二”。“甘肃省委省政府与学生的对话中就有学生提出‘书记专业户’的问题。”据中组部了解，在省级干部中，这种情况还不少。乔石的讲话，介绍了中纪委“受理的腐败案件一年多于一年，案情也一年大于一年”的情况，并将“腐败问题”提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看待。

胡启立的发言重申了“新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以及“以立法手段来保障新闻制度”，使之有效监督政府工作的问题。

在“五四讲话”和“亚行讲话”获得好评的背景下，赵紫阳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两段发言，都表现出对形势乐观和自信能操控局面的轻松基调。关于学潮，赵紫阳说：

“这次学潮，由于党和政府采取非常克制和容忍的态度，也由于大多数学生日益表现出理智，注意了秩序和纪律，避免了事态的激化。现在大部份学生都已经复课了。情况比预料的好一些。当然，学潮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们在处理这次学潮中措施得当，说不定能使坏事变好事，真正把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秩序的轨道上来。”

针对北京市出现的新情况，他说，“我们不仅要与学生、新闻记者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还应该与工人座谈，倾听工人的呼声。”

对于赵紫阳的“民主—法制”主张，杨尚昆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但李鹏的回答则酷似邓小平的口气：

“现在全国一些高校实际上已出现无政府状态。各种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小字报满天飞，各种夺权和抢占行为蔓延，到处游行、罢课、串联，不要说起码的地方性法规如各省市制定的游行法规不能遵守，就是连最起码的校规都不能执行。这怎么能算是民主？这又是什么样的自由？这与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听任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一次十年的内乱。为此，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

当万里插话告诉他：“这次人大常委会议将把《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列入议题”后，李鹏继续道：

“所以，对话是重要，但决不能被学生认为我们是在纵容学生，必须立场鲜明，决不能在原则问题上有丝毫退让。在要求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的国情在法制的轨道上循序渐进，不能感情用事，失去准绳。”

紧接着，姚依林重申了在常委会上的观点，对李鹏的攻势形成奥援。接下来吴学谦的发言，则对姚依林的观点形成了拱卫。姚依林继续道：

“我们要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地对待这些学生，所以，该严厉时就得严厉。对于学生提的意见，好的我们接受，错的要理直气壮地反驳。我还是常委会上的那句话，这次学潮已经牵扯我们太多的精力……”

赵紫阳再次机智地把姚依林“平息学潮不能拖”的观点转入自己的航道：

“惩治腐败的确刻不容缓。我的初步想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尽快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

此时，万里应声跟进，插话说：

“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廉政委员会。”

赵紫阳继续道：

“这是一个好建议。我认为，惩治腐败问题，首先从我做起。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我建议先从调查我的子女开始，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也一样。还有，我们政治局应该作出表率，公布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岁或75岁以下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特供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讨论，并尽快作出决定。”

据李鹏当日日记，赵紫阳的这个“方案”，是拖到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提出的。不仅如此，赵紫阳还建议，如果大家同意，由新华社发通稿，明日见报。但李鹏对此非常不满：首先，这次政治局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第一次开政治局全会，当前中国的头等大事是处理“动乱”，但直到今天为止，政治局没有专门开会讨论过一次这个议题。这本身就很不正常。第二，他认为，赵紫阳惯用把自己的意见放到会尾提出的方法，造成没有时间讨论，大家“没有意见”的假象。

以上李鹏所说的情况，在《真相》中反映并不明显。但有一点《真相》肯定：会议没有按5月8日赵紫阳的希望讨论赵紫阳的提议。而是通过了如下决定：

“一、政治局成员按现有分工与各部门负责人一道与各条战线群众进行对话和座谈，倾听群众呼声。先安排：赵紫阳、李鹏同志与北京工人进行座谈或深入工厂考察；胡启立和芮杏文、阎明复同志深入北京各新闻单位并与新闻工作人员进行对话；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同志与北京高校学生进行对话，必要时李鹏同志参加。

二、将这次政治局会议中讨论涉及需要全国人大立法或要由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列入下次常委会议予以审议。

三、关于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政治局要再开会进行专题讨论并定出具体措施。

四、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中苏首脑会晤成功。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要确保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并提前作好清场工作。

五、万里同志对美国、加拿大的访问如期进行。”

当天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问题。委员长会议决定：七届人大八次会议将于6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会期一周。

5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则新闻：

“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审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

而这，也标志着万里和赵紫阳的再次联手。

事后，赵紫阳披露了此前他亲自拜访万里的过程：

“5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没有人追问，万里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没有取消赴加拿大和美国的访问。但从他会后急于召开委员长会议，通报6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内容，以及万里在国外发表的对于民运的评价来看，万里是真诚的。

但是此举在中共政治局范围内却遭到了强大的阻抗。赵紫阳回忆说：

“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四二六’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

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李鹏《“六四”日记》证实了这一点。李鹏写道：

“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则。我已经在今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明确表态说，赵紫阳的四条意见不能代表常委的意见，当然也不能视为常委已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及其议程。”

显然，赵紫阳已经明白无误地透露他在整合高层意见方面的“无力感”。他缺乏的不是对社会事物的判断力，对美好前景的想象力，而是对总书记职务的执行力。到目前为止，当他决定全力驱动中国政治改革这驾“四轮机车”时，他实际上只能控制这辆车的一两个轮子。此时，与之并肩的另一个驾座上的李鹏们，却紧紧地捏着其它轮子的手刹！而后座掌握方向盘的“舵手”，却在考虑着相反的方向。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初如果他同意邓小平的提议，让万里当总理，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改革派领袖如果没有心胸容纳自己的同志，又没有力量整合不同意见，就只能期望“一言堂”、“新权威”。如今，“新权威”树立不成，就只有单兵突进了。5月8日，胡启立向《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传达了赵紫阳的意见。当然，按照惯例，依然是有所放大的：

“司法要独立，新闻要自由。司法独立，由乔石负责提出实施方案。新闻自由，由启立负责提出实施方案。”

5月10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座谈会的参加者，并作了讲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

国家教委插不进去，赵紫阳只有依靠胡启立、鲍彤抓住媒体打前锋。从当时《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的日记，我们或可略窥其紧张气氛：

“5月12日 ……午夜（13日星期六凌晨）一点多老钱来电话，问一版拼了没有？接电话的小谷告诉他还没有拼。老钱说，先不要拼，等会儿有个重要新闻。

什么重要新闻？小谷没有问，按正常做法，重要新闻一般都由新华社先发预告，而这一次新华社并无消息。我给海外版大余打电话，问老钱给他打电话没有？他说没有。我告诉他老钱要等重要新闻的事。他说，太晚了，海外版恐怕等不及了，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他给老钱挂电话请示。

大余打完电话告诉我：老钱说10分钟以后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并说鲍彤正在来他家的路上。

新闻内容虽然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个新闻是紫阳同志关照要发的，而不是什么人背着 he 发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这么一分析就放心了。

现在斗争真是太复杂了！

2：00左右，老钱把新闻传来了，并嘱放一版头条位置。内容是对下个月人大常委会议程，即讨论这次学生运动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反应的，其中有工人，有大学生和教师等，最后希望大学生采取克制、冷静态度。老钱还告诉我们，这些反应都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当然，我明白这是赵紫阳要鲍彤办的。”

事后，杜导正在《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里转载了这篇报道，使我们在拼接此案全豹时能够获得更完整视野：

【 标 题 】及时讨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实属创举、人大常委八次会议议程深得人心把解决问题纳入民主和法制的正确轨道、希望学生冷静克制为会议创造良好环境

【 正 文 】本报北京5月12日讯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召开第八次常委会议的消息发布后，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和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在首都的一些学校、工厂和机关进行了采访。许多被采访者认为，下次人大常委会的议题，包括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和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这都是当前广大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建议把这些热点问题通过法律程序，直接列为国家权力机构的议程，太好了，反映了人心、民意。许多被采访者向记者表示，6月20日左右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现在提前40天就提出议程，也太好了，这使人大常委委员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广大群众和法学专家的意见。

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说，这些议程集中反映了近日来青年学生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合理要求，并将这些问题的解决真正纳入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如此迅速和及时地作出了反应，说明党心、民心是和广大青年学生之心紧紧联在一起的，这将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创举，一件大事。

在北大校园，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委员长会议把学生的要求正式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常设机构的议程，符合我们的愿望，我非常拥护。它反映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解决我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诚意。过去我和周围的同学对人大常委会的活动不太注意，这次听到广播后十分惊喜。同学们说，这下

人大常委会真像个权力机关了。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威信一下子提高了。一位工人对记者说，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是同情的。我也希望能够真正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现在既然人大常委会要审议和讨论这些问题，我非常希望青年学生能够保持冷静和克制，为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和谐的气氛。我认为，我们都要冷静地、理智地对待那些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这是当前最重要的。

在“六四”后的“大清查”中，面对制造“假新闻”的指责，鲍彤“交代”了这件事情的原委：

“《5月12日，我给人民日报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00后，政体改革局副局长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师大党委的同志告诉他，明天学生将开始绝食。我说，今天早上报纸已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即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白慧敏同志说，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著，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我就叫高山编一条消息，我还亲自深夜送给钱李仁同志。我对钱李仁说，今天各报都没有把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登在显著地位，包括《人民日报》。我的话对钱李仁同志显然有压力，第二天，我送去的这条消息就登在头版头条。这条消息的结尾是呼吁学生冷静理智，采取合作态度，同党、政府、人大共同为开好人大常委会而努力，这也确实是我叫高山写这篇稿子的目的。问题是：一、在当时形势下突出报导人大常委即将开会，实际上会冲淡中央常委制止动乱的决策；二、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原则。”

鲍彤说，当他深夜造访钱李仁宅邸时，钱并不知道这一篇稿子的来历，还以为是政改办收集的反应。但当陆超祺通过电传收到这条新闻稿时，的确再次让他感到了不寻常：

“我们想起了今天 一版刊登的下月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新闻来。这个议程是委员长办公会议提出的。这么早就公布议程，而且都是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个会议，这则新闻也是按照赵紫阳和政治局的意见办的。

看来，赵紫阳对按民主与法制轨道解决问题是有一套设想的。但愿没有人，特别是那些政治老人给他出难题。”

而实际上，“委员长会议”报道的出笼，也是经过曲折的。据陈一谔回忆：

“5月9日，万里把赵紫阳的这些意见，向人大常委会的党内副委员长作了介绍。这些副委员长一致表示赞成，并决定：如果中央、国务院不发表这些意见，我们用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李鹏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万里打电话说：‘政治局没有讨论这些意见，中央不同意发’。”

“5月10日，万里又开会转达了李鹏的意见。这些副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们说：‘究竟是我们监督你政府，还是你政府领导我们人大？’大家讨论以后，以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写好了一个稿子请《人民日报》发表。但李鹏让袁木要来了这个稿子，他看了以后，觉得全文发表不行，完全不发也说不过去，于是让袁木把这篇稿子删节、压缩、修饰以后交给了《人民日报》。”

这，大概就是“委员长会议决定”这样重大的消息，事后被各大报章刊登在不显眼位置的原因。也是鲍彤深夜造访的动力所在。

面对赵紫阳攻势凌厉的进逼，老人倒是很难再出题了。但还有一方，他是否能镇得住？

是否迟了？

是否缓不济急？

第十一章 从学运到民运

按照社会学者的观点，学生运动本身不可能产生社会结果。它要么是反映社会矛盾的晴雨表，要么是社会危机的催化剂。毛泽东曾把它比喻为社会革命的“桥梁”或“先锋”。当4月学潮进入5月以后，原先由悼念胡耀邦和报复“四二六”社论、“四二九”对话而激发起来的热情，先后为悼念活动的结束、“四二七”和“五四”游行的胜利而失去势头。这座靠激情和对现实政治的幻想架设起来的“桥梁”，眼看着从自己身上渡过的“新闻界”扬长而去之后，已经不可能靠原来的动力继续维持它的存在了。

它，正等待着新的激情的注入。

第一节 对话、罢课无果——绝食的酝酿

那场把全社会卷入学潮，从而把一场学生运动改变为“八九民运”的绝食，在公众的视野里是突然出现的。但它并非一个偶然的行动。

“五四”以后的校园，面临着两种现实的选择：是建设校园民主？还是将成果推向社会？

所谓“校园民主”，就是在复课的同时，继续与政府对话，以解决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的问题。同时，可做的事情很多，譬如：学生自治组织办自己的刊物、广播，按程序改选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建立校园“民主墙”，举办民主论坛，邀请受欢迎的知名学者演讲……等等。而前段所采用的游行、请愿、罢课等形式，一般不再轻易采用。

当党中央已经做出让步，大部分学生都重新坐进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的时候，这一选择显然是现实的。

进入5月以后，许多学校已经开始实践校园民主的以上内容：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学校相继建立起自治组织的广播站。根据研究生会章程，北大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对原研究生主席团进行信任投票，到会244人中241人赞成罢免原研究生会主席团。304张代表证中，有299张投票同意选举“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的研究生成员当选新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5月3日，经张炳九牵线，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在未名湖畔的红一楼与时任北高联主席的封从德会面。封从德回忆道：

“我向丁校长正式陈明筹委会的校园民主计划。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长明确的赞同。丁校长说：‘我支持在校园内搞民主改革。学生会也可以改嘛！我愿北大作为全国高校的校园民主改革试点单位。’丁校长说，校园民主不仅可以包含筹委会成立时提出的两条目标，学生自治组织和校园独立报刊，还可加上第三条：‘教授治校’。

丁校长说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参加一个校友会。他对那些50年代的毕业生说，‘今年的校庆，最可观的是现在的在校学生。你们不是在谈中国的希望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你们到校园里去看看今天的北大同学吧！’

丁校长虽然同情学运，却还是劝我们不可将运动扩大到社会上，不要老去天安门。最后，他讲述自身的经历，来说明我们罢课时间也嫌太长了：‘四十年代我是地下共产党，那时我们在学校组织罢课，最多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国民党特务同学用手枪逼着我去参加考试。’从四二二至今，我们已坚持罢课12天了，历史在作有趣的轮回。”

北大校长的一席话，并不是为了平息学运而开的“空头支票”。据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负责人彭嶸回忆，早在4月24日“五四操场”改选学生会的那次大会，广播器材就是校方提供的。丁石孙的开明，显然也不是个人行为，

而是经过校党委讨论的计划。据周锋锁 回忆，在同一时间，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也与校方“达成校园民主的共识”：“我们完全跟校方都达成了一致，这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就是校学生会的完全直接选举，另外一个就是校园里的学生办报的完全自治开放。这两点……当时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基本上是已经做到了。”

他们甚至已经起草了《校园民主大纲》，内容包括“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5月5日上午，赵紫阳亲自会见北大校长丁石孙、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听取了两校学潮情况的介绍以及他们的看法。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说，如果北京高校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广大学生中没有威信，在台上久不了。显然与前述会见有关。因此，如能排除高层异议，将北大、清华、师大等校作为“校园民主改革试点单位”是可期的。

5月8日，北大筹委会就是否信任原学生会及是否退出原北京市学联和中华全国学联进行投票，投“不信任”的占95.8%，同意退出原市学联和全国学联的占81%。北京大学筹委会办起了自己的《新闻导报》，人民大学办起了《人民之声》，南开大学创刊了名叫《宽容》的杂志。

与此同时，在“对话团”事务方面，政府再一次食言。对话团《请愿书》要求的5月8日答复没有实现，再推到5月11日，仍无下文。这时，却“发生了很有意思的变化”，沈彤回忆说：

“接待我们的不再是三个信访局，而是变成两个信访局，就是国办和中办，没有人大常委会了，到5月11日再见面的时候，只剩下中办了。实际上我们从对话筹备一开始就是一直和中办在交手，国办不知道是自动退出还是被中办挤出这个过程。”

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退出，与正在酝酿中的“七届人大八次会议”准备讨论学运问题的筹划明显背道而驰。

这时，前北高联主席周勇军的兴趣已经转到对话方面。他希望能与党内改革派合作，为此，他利用“五四”游行的机会，擅自公布了“复课”的决定。但他立即被北高联罢免了常委职务。

“我们复课的条件和对话条件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谈论复课条件，是因为当时很多工科院校已经提出：这个罢课究竟要罢到什么时候？而且当时已经有人提出：要不要研究生给本科生补课？如果不停地罢课下去的话，必须向群众交代，为什么我们仍然要继续罢课？所以复课这个事，实际是在4月底就已经开始反复地讨论。……因为人大的常委说，有人提出当时宣布复课，5月6日就复课，人大说：我们5月6日不复课，我们要复课要在5月8日复课，（五四）游行回来（将会）很累。”

“然后到了五四游行……周勇军开始要宣布复课决议时，在场的常委没有一个表示异议或者奇怪。只是在他一句话把这事说完之后，大家才炸了窝，当时在孙中山像前头就跟他炸窝了。所以一回来，我和开希就说罢免他。罢免是我们两个说的。”

据周勇军回忆，王超华是经他介绍进入北高联常委的，并在与政府改革派合作的观点上一致。此番“同室操戈”，进一步预示左右差距的拉大，及右派空间的坍缩。

封从德因此对北高联的工作失去兴趣，并于5月6日提出辞职。这件事，对他日后参加“绝食团”领导工作，在组织、程序和纪律问题上近乎偏执的坚持，对学生中的“党内改革派”观点进一步疏离，不能说没有影响。

胡春霖之所以提出5月8日复课，显然是因为这是原定政府给予“对话团”答复的日期。把复课与对话进行“捆绑”，意在促成对话。但在政府方面还

没有动静时，单方面宣布复课，是顺应了赵紫阳改革派的意愿而违背了北高联的学运计划。

与此同时，北大也贴出了坚持罢课的大字报。这种意见认为，4月以来的学生运动，在什么结果都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就此结束，既对不起自己也有负于全社会的期望。特别是在新闻界已经起来，全国的大学已经起来，都看着北京的大学生的時候，北京决不能停下来。至于赵紫阳所指出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有张大字报说，同学们只是“闻到了馅饼的香味儿，还没有看到馅饼是什么模样”，怎么可以就此罢休呢？

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来说，坚持罢课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北大在这次学运中，没有像历次学潮那样，起到应有的领先和领导作用。而是让政法大学和北师大跑到前头去了。半个多月以来，这一直是富有民主传统，同时也富有学运领袖意识传统的、荣誉感极强的北大学生的一块心病。所以，他们说，现在，正是体现其“革命”的坚决性、彻底性的极好时机。

主张继续罢课的人，撕去了北大筹委会宣布复课的《宣言》和《近期工作计划》，手提扩音器在校园里巡回呼吁，“请同学们不要去上课……”。

为了实践“校园民主”，封从德决定把北大筹委会广播站从二楼搬到楼下的三角地，让人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从而诞生了日后继续在天安门广场发挥作用的“自由论坛”。

利用这个“自由论坛”，北大的两派意见经过激烈辩论，终于达成“用民意投票决定”复课与否的妥协。投票以寝室为单位，“2/3以上同意继续罢课的，一个宿舍算一张罢课票；1/2以上同意复课的算一张复课票；同意继续罢课的人数不足2/3，同意复课的人数不足1/2的宿舍，算一张弃权票。”结果，在1268张有效票中，64.2%赞成继续罢课，主张复课的只占24%，弃权占11.8%。于是，北大，没有复课。

北师大、北农大也宣布继续罢课。

5月9日，就在新闻界与政府“改革派”的浓情蜜月开始之时，北高联宣布“复课决定”作废，北高联第一任主席中国政法大学周勇军被开除出北高联。

5月11日，北高联总部又一次由政法大移到北大，领导体制也随之由“主席负责制”改为“常委负责制”。北大，重又开始成为学运的控制中心。

在另一方面，以政治为目标的民间政治团体也希望得到学运的奥援，争取学生走出“狭隘学生运动”的视界，具有全社会一盘棋的“觉悟”。

5月10日下午2：00，继前一天300名学生骑自行车声援新闻界递交请愿书活动后，“北高联”统一部署的“声援新闻界”的“环城自行车大游行”出台。游行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北大筹委会成员杨涛提议。北大作家班头一天晚上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我们商定通知尽可能多的青年作家，并一律佩头带、披带。头带写简短口号，披带上写姓名，代表作。”“次日午，以作家班为先锋的北大队伍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出校门。数千群众、记者聚在北大南门，外国记者抢占了附近的制高点，早已架好摄像机恭候。作家班特地制了面新旗。头上标语与胸前的名字使人们敏感到游行成分的变化。街边的人出声地念着我们的名字，爆发出阵阵掌声。”

据郑义回忆：队伍到达预定集合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时，这里已是“人山人海”，自行车的长龙一眼望不到边。进城后，苏晓康、徐刚、徐星、王兆军等作家陆续加入队列。手摇轮椅的瘫痪作家史铁生，也出现在队伍的前边。

据北京市委统计，共11所高校11000余名学生先后加入到队伍中来。

封从德和柴玲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经中央电视台发射大楼，到宣武门附近的中宣部、和平门附近的新华社。最后，赶在《人民日报》下班前来到金台路：

“最前一队人马30来人，打着‘北京农业大学’的旗帜，‘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上百人紧随其后。……人民日报社大门前有块空地，同学们便滞留在这里喊口号。前面的同学喊够了，才缓慢地向前挪动，后面的接着喊。……柴玲和我登上三轮车，拿着话筒带领大家喊口号，下面是一片黑压压拥挤的人群。”

“人民日报，造谣日报，不说真话，好好改造！”

“袁木袁木，造谣有术！东昌东昌，骗人有方！”

“立本立本，说话没准儿！”

“柴玲一直带着喊到嗓子发哑。众人很高兴跟着喊这两句口号。……一路上都有市民立在路边为同学们鼓掌，这时约在7：00，市民已下班吃饭，天还没有黑。我们刚走几分钟，有个市民捧了一箩筐油条从路边迎上来，招呼我们：‘嗨！学生，饿了吃点再走！’再走一段路，又有一个个体户模样的人端了一笼屉包子立在大街上，让同学们拿了吃。一派簞食壶浆的景像。”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 等人，发出《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求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体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它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参与”。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罢课，并没有给对话带来新的进展。除了学生自身利益受损失外，它并不能完成引导全社会“过桥”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它只不过是串连下一个更激烈行动的过渡性行为罢了。

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刺激起广大学生教师的热情，才能召唤全社会迅速“过桥”呢？就在北高联酝酿着权力与中心转移的时刻，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已经有了眉目：

当时，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作了一个民意调查，办法是，以宿舍为单位，同意罢课的在门上贴一张字条。梁二回忆道：

“在门上贴一张纸，‘本宿舍同意罢课’。这样收集起来，只有九个宿舍弃权。这样就是罢课，无限期的罢课，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那时有一帮激进的同学当晚找到我们说，‘你们这样不行。这样搞下去，自治会本身就会散，在同学中失去合法性的基础。’他们提出，唯一的办法就是绝食。”

据说，在五四之前，该校历史系就有同学提出“绝食”。

5月5日，“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室”在北大未名湖湖心亭讨论下一步学运的方案时，就提出两套方案：复课和绝食。

据封从德回忆：

“5月9日北大46楼的研究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们现在应该绝食了。大概在11日的时候，博士生又贴了一张大字报。在5月10日的时候，我就在筹备在北大校园内部搞一个绝食活动。当时我暗中告诉北大筹委会里面管钱的同学，让他们偷偷准备下一笔钱来买墨、笔和白布，准备在校园之内发起哀兵之势，到时候把白布条幅突然挂起来，同学在宿舍里边绝食。”

5月11日，“北高联”会议在北大召开。会上，代表们就学运是否要支持党内改革派，作出了辩论。据王超华回忆：

“5月11日下午有过北高联一个常委会，在这个会上，马少方和梁二发生激烈的争执，拍桌子红脸。马少方说，‘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我非常不满意，但是我没有象梁二那样马上拍桌子起来跟

他喊。我说，‘……你不要专靠着小道消息，而且你如果这样光靠着这个，完全迷信这个，不对报导加以佐证的话，会有问题的。’”从字面上，读者看不出，马少方所说的“改革派”到底是指“体制内改革派”，还是“体制外改革派”？但据封从德披露，王超华转述马少方当时的话是：“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考虑到党内改革派的安全，他们在出书时删去了几十个字。

“大闹”绝非真正的赵紫阳系统人马的意愿。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官方（包括李鹏）屡次提到陈子明社经所旗下的《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是“体改所”的人，那么学生会不会也产生这种错误印象，把她当做体改所的人，把她的希望当成改革派的希望呢？如果有这种错觉存在，不论是梁二还是王超华，“拍桌子”是无济于事的。王超华回忆道：

“我们当时就已经提出，并在各个学校传达过，反对‘四二六’社论，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这是高联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在这之后，5月11日晚上北高联做出一个决议：从这个阶段中央办公厅对对话团的反映来看，高联反对近阶段举行任何大规模的活动，只举行中、小规模的活动。”

但是，已经屡屡失分的“北高联”的这个决议，并没有得到传达贯彻，它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一件事情变成一纸空文。

11日中午，会议结束后，北师大的吾尔开希、程真、北京电影学院的马少方、北京农业工程学院的王文、北大王丹、北京农机学院学生暨北师大职工子弟杨朝晖等人，在北大附近“利民餐厅”用餐。王丹回忆说：

“当时‘高自联’组织了对话代表团，希望与政府对话，但截至11日，据我们所知，政府仍未给出明确答案，我们一致认为这明显是政府的‘拖延’战术，企图把学生拖垮。所以我们开始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用餐过程中王文首先提出了“绝食抗议”的建议。接着马少方分析了是否绝食应具备的理由及形势：

“我的理由如下：学生运动主要是五个手段，游行、罢课、静坐示威、绝食、大串联。现在，大串联大家都不同意用，而前面游行、罢课、静坐示威的牌都打过了，现在学生手上就剩下绝食了，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就是胜负手，没有退路。”

接着，吾尔开希介绍了北师大的情形。他说“几个男生宿舍已经贴出声明，宣布要采取绝食行动”，王丹继续回忆道：

“于是我们讨论了这种可能，当时大家有一个一致判断，即如果我们拉几百个学生上去，政府不可能让我们在广场上过夜，因为我们最早也要在13日才能开始绝食，而15日戈尔巴乔夫访华，政府当然不会让戈尔巴乔夫看到广场上的绝食。老实说，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学生一旦在广场开始绝食，就很难再撤下来了。之所以采取绝食这种方式，第一是因为其他方式（请愿、静坐、游行、罢课、对话）都已试过，但政府非但置之不理，且指为‘动乱’，第二是因为绝食是非暴力抗议方式，符合我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第三，绝食是最后手段，是以摧残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向政府呼吁，我们希望以此能打动政府，唤起各阶层人民的关注。”

饭后，王丹等回到北大，其他人去了北师大，但吾尔开希很快离开了他们。

大约下午5：00左右，王丹来到北师大。北京农业大学的王文也正在征集签名。王文、马少方、王丹、吾尔开希、杨朝晖、程真、彭涛八人是最初的签名者。马少方回忆道：

“我这时想起来，这个绝食倡议连个时间都没有，于是想起上午在北大时听王超华说起政府对对话代表团的答复是：本星期内有答复，一想13日是周五，就大家简单商量了一下，在那张纸上写下：5月13日下午2：30，绝食

同学在北师大操场集合。然后王文拿着那着纸，就匆匆走了。不久吾尔开希来了，他要我当晚在师大‘三一八纪念碑’讲讲绝食行动的事。我当晚在师大做了鼓动绝食的演讲。”

5月12日上午，王丹将此情况通报了北大筹委会，当即得到柴玲的支持。据柴玲回忆，她之所以采取支持的态度，是基于如下考虑：

“学运低潮时的格局：第一个就是自治组织渐渐与学生主体脱节，包括北高联和北大筹委会，这是基本的感觉。自治组织尤其是北大筹委会开始运作得比较秩序化的时候，有很多专业化的发展，这时跟同学基本的情绪感受联系不是很紧密，尤其是宣传部和秘书处的工作，只是不断通过大字报、广播站把会议记录和会议决定往外播。同学的各种建议提上来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反应或采纳。

第二个是北京学生罢课与不罢课之争，这包括高校的复课。从5月4日宣布复课以后，主要的高校都复课了，只有北大还在坚持罢课。清华、师大，还有人大全部都复课了，但是第二天他们又声援北大，又开始罢课。虽然在5月4日做民意调查的时候，有60%多还是80%多的同学同意罢课，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同学去上课的。而且罢课呢，基本上都是罢自己不爱上的课，比如中共党史。

第三是‘对话团’进展非常迟缓。……事实上给大家一个感觉，对话代表团像一个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始终没有明确的进展。

第四个是小学校‘秋后算帐’的动向。像5月10日左右，大家知道的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开始开除学运中比较活跃的学生领袖。”

据柴玲回忆，4月26日，在北大作家班，张伯笠就同她谈到“绝食”的作用：

“他（张伯笠）说：‘你知道吗？我们历史上自古至今，都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绝食，连古代皇帝也受不了这一套，别说外国了。你们要绝食，我们在校园里也绝食，拉起一个棚子来，网些白布，都围起来。当然我们回来，可以到宿舍里，厕所里偷偷吃一点，然后再出去。大学校长一看见你们绝食，你们这些祖国的宠儿宝贝，一看见你们绝食，还不得赶紧抱着你们，把你们送回来。’当时我们觉得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5月12日上午大概9：00的时候，我在北大筹委会，然后王丹、王文、杨朝晖来到北大筹委会，就说‘上，我们准备明天绝食，赶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两天，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反应。’王丹说是他们在师大已经商量好了……我说：‘那好，我们同意。’……后来我就问：‘绝食的条件是什么？’绝食条件他们写了很多，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什么新闻自由。后来我一看，我说，‘如果你这个条件，我们就不参加。’然后，我就提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求对话’，一个是‘平反动乱’。”

据常劲回忆，北大筹委会并不同意绝食。因为北大筹委会大概在四、五天以前已经做过决定，“绝食是我们最后一招”。所以，北大筹委会“是两个主要干部支持绝食，我们不支持绝食。当时柴玲他们说，以学生名义发起这个绝食，不借助筹委会。”鉴于这种情况，北大筹委会做了一个决定：北大筹委会支持这些学生以个人的名义去发这个通知。然后借给了他们广播站。”据常劲说“绝食”发起当时，响应的只有四十几个人，就是因为北大在内部已经有一个小的共识了。至于后来的转变，与柴玲个人的作用关系很大。

为了说服“北高联”支持绝食，柴玲决定前往做说服工作。当时北高联正在开会。王超华回忆道：

“那天香港的同学在那儿，他们带去几样东西，第一是‘一二九’的资料，建议我们跟‘一二九’的历史经验学习；第二个是章程，建议我们尽快地完善章程。……第三个是一个计划，香港已经跟台湾联系了，台大和香港

中文大学每家出十个人，北大出十个人，办一个夏令营，准备在6月1号开始正式申请，6月中进行。……所以柴玲他们来时，我们还在这儿高兴，做这个长远计划。当时对话的很重要的一点内容就是保存高自联这个组织。因为高自联组织是撕开一个口子，不管哪方面失败了，只要有个组织存在，就是自治组织在中国撕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我们哪怕被压，压到最后，如果在香港、台湾同学的支持下这个计划做成的话，那怕不做其它的活动，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一下子来否定这个事的。

但是这个时候，柴玲他们来了。她开始问为什么不支持绝食……”

在北高联，柴玲并没有获得支持。但这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当时好象是郑旭光在说：‘通知各个学校，不允许绝食。’每个学校的同学接到命令以后，马上就走了。……我就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允许绝食？’我记得王超华就说：‘是这样，我们已经从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学生平息下去，上面准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来解决。现在有的同学感到在学运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着急，我们也能理解。’当时我就问了一句，‘你们北高联已经同意了一个原则，就是你们只是作为一个协调性的机构，为什么到现在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绝食是同学自发的。你们实际是占着领导的位置，没有领导的能力。’当时没有什么声音。我就说：‘不管你们怎么说，北大已经同意绝食，而且我们也会进行。’”

柴玲证实，当时“北高联”下令不许绝食，理由之一是“高联没有办法负责同学的安全”。但柴玲说：“我们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命”。

这场唇枪舌剑的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即将发生的“绝食”的“个人”色彩。它让人们记住，柴玲的脱颖而出，不是拜民主程序和民运组织所赐，而是凭借其个人魅力。正如同历史上所有克里斯马型领袖一样，排除阻力的最好方式，就是直接面对群众。而她本人，也意识到她对于众人的亲和力——

一种超越任何程序也不依赖组织的“非理性”力量，并自视为群众与组织之间的纽带。此后在协调问题上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均与这个总根子有关。

5月12日下午2：00，“北大46楼部分研究生”在三角地贴出《紧急建议》，建议采取“激烈行动”。其方案有二：一是“集体绝食”；二是戈尔巴乔夫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建议》称，这是“成败在此一举”的“最后拼搏”。

马少方在北航也进行了绝食的讲演：

“我去北航看大字报，被郑旭光看到，就直接被拉到北航正在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让我讲讲关于绝食的问题。我又在北航鼓动绝食。旭光当时告诉我：高联不赞成绝食，他希望我去北大高联联络处那边讲清楚。当天晚上我又被旭光带到北大，和王超华做了交流。王超华代表高联明确告诉我：高联不同意绝食。而我则说：首先绝食行动能不能搞起来，我不知道。但如果搞起来了，高联必须站出来领导这场绝食运动。”

5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出现征集参加绝食的签名大字报，宣布5月13日举行“破釜沉舟”的绝食。中午12：00集合去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希望同学们报名参加。绝食的目的是：1，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2，促使政府与学生对话；3，促进民主化进程。王丹、吾尔开希、熊焱等近百人在大字报上签名。当天，各校发起的绝食倡议已得到三百多人的签名响应。

绝食，早在4月19日“新华门”请愿时，就有北大学生打出白布横幅。而张伯笠的回忆证明，新华门“绝食”的建议来自著名山西作家郑义：

“4月19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架上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么绝食的。”

正是由于前述“四二〇”新华门“绝食”未遂，4月26日，张伯笠又把它作为计策提供给柴玲，希望学生进行尝试。不过，他当时希望绝食在几所大学校园内进行：

“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每个大学都组织一个百人的绝食团，绝食团的人数应按本校医院所能承担的能力严格控制，在校园绝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可以使罢课继续下去，同学们在绝食，还有哪个忍心去上课？二、可以有良好的后勤服务和医疗服务，刮风、下雨、寒冷、暴晒都可以解决。三、不影响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及天安门广场的其他国事活动，给政府一个缓冲余地。”

张伯笠的这一描述，与前述封从德所说发起“校园哀兵之势”一致，可见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方式。但他们似乎不知道，绝食的发动，还有另一条线也在同时推进。而这条线——除马少方前述“中南海”或“改革派”外——其线端，仍是郑义。

据郑义回忆，早在4月22日大会堂请愿结束的当天，他就与在学潮中表现突出的王丹、熊焱、郭海峰谈话，提出进一步采取绝食行动的建议。他用文革时期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场绝食作为范例，说这是给对手施加压力，逼使就范的最有力武器。因为，一旦绝食开始，全社会都会因人类良心而动员起来，“救护车满城飞驰，市民包围着绝食学生，”拯救这些绝食学生的性命“顿时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话题”，等等。

学生当时没有采纳他的这条意见。但当5月13日绝食真正开始，郑义听说发起者是王丹时，他意识到是自己十几天前的那条建议起了作用：

“听说是北大王丹发起，我心里一震。如果绝食有了善果，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一切都好说。如果出了意外，我是难辞其咎的。”

据沈彤回忆：

“在5月12日晚上，对于绝食问题有个辩论，这就是柴玲的著名讲演《我为什么参加绝食》。……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运动中间哭了。听了柴玲的讲演，我个人对绝食的态度根本发生了一个转变。”

事后，李录也透露，柴玲的演讲不仅是他“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哭，恐怕也是我在唐山地震以后第一次哭”。

第二节 柴玲脱颖而出

许多绝食参加者的回忆证明，5月12日晚，柴玲在北大三角地的演说，对这次“绝食”的出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么，柴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她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从学运后台走到聚光灯下的呢？

据柴玲自述，她是山东省日照市人。1966年4月15日出生。她的父亲是一名军医。她是家中长女。由于父母工作的繁忙，她基本由祖母带大，直到17岁，一直过着随军家属的生活。在初三的时候，她的物理老师成为一个“永远改变我对物理和政治的看法的人”。这一年，她成了学校的“三好学生”，进了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孩子”设置的“特优班”，并立志成为像居里夫人一样的伟大科学家。

1983年，柴玲17岁的时候，考入了北京大学，进入地理系学习，同时“旁听心理学讲座”。

“在四年北大生涯里，除了我被班主任任命为团支部书记外，我尽可能避免参加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例如我们区的当地选举或者偶尔举办的主要谈论西方影响或者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沙龙。即使这样，北大的生活仍然是充满生机和少年情怀。”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让这个来自偏僻城市的女孩第一次感受到宏大历史场面的壮观，以及群众运动的力量。她写道：

“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场上的军队，并对下面集结的大量的群众挥手。我当时也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之中。

当另一组大学生接近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们冲散了队伍的形状。喊着、跑着、挥舞着胳膊，这一队幸福的孩子希望能够接近一点，亲眼目睹亲爱的领袖邓小平。在舞蹈的人群中，学生们突然间举起了一则横幅，上面写着四个显著的标语：‘小平你好！’在中国，长者一般从不以名来称谓，想到对伟大领袖直呼其名是无法想象的事。然而这则学生们的简单问候把一切展示的很明了了：我们热爱我们的领袖，并且感谢他为我们的国家所做的一切。这则自发的标语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他微笑着向学子们挥手。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大众聚集之下情感可以引发的巨大威力。”

图5-9: 国庆35周年游行，北京大学学生队伍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她绝没有想到，仅仅5年之后，也许就在她仰头站立过的地方，人们以她为模特儿，塑起了一尊仿“自由女神像”。

她仍然孜孜于学业，并及时行乐于大学生的浪漫生活。在两次堕胎后，这个年仅21岁的女青年已经“品尝了失败和绝望的苦酒”，体验女性的弱势地位，以及人世间的伪善、不负责任和不公平。

但家中长女的责任意识和居里夫人自立自强的榜样力量，使她终究没有沦为一个悲剧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像德伯家的苔丝一样，从此守着阴暗经历消极避世。

1986年，柴玲在北大本科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读研究生。

1987 年1 月1日——又是那个给胡耀邦带来厄运的日子——她路经道中的一颗小石子，令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她与北大遥感所研究生封从德恋爱了。1988 年5月20日他们结婚，并准备好毕业后双双前往美国深造。

4月15日——柴玲23岁生日——胡耀邦的去世改变了中国历史。但直到那时，他们并没有任何投入运动的兴趣。然而，天安门广场是一个能感染人的地方。来到这里的柴玲，经由中学女物理老师种下的、潜伏在她意识中的对于政治的忧虑开始苏醒：

“一个年轻人在我们到来的时候正在演讲。每一次他问一个问题，都会引发围观者激烈的反应。

‘我们这群人中哪有一个没有被党的干部欺负过？’

‘我们为什么不能自由选择职业？’

‘我们为什么非得让党给我们指定工作单位？’

‘为什么党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档案，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权利看里面的内容？’

最后那一个问题说中了我的心事。我在想北大那个公安人员如何使用我的个人档案毁了我的生活。这个演讲者把这种档案称作‘黑材料’。

他谈论着民主的意义，并号召我们：‘难道我们没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吗？’

群众轰动了。他说的话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事后，柴玲承认：

“我在几个小时里完成了蜕变。被警察追赶和看到无辜的人被毒打的经历 揭开了我对在北大被公安警官羞辱和被售货员欺负的尚未好全的伤疤。在

我心里，我下定决心再也不会继续做那个两年前在火车上哭着回家的少女了。我受到伤害的自尊和新的愤怒让我忘记了什么是悲伤。从此以后，我绝不要再跑了。封也不会。”

4月19日晚在去广场的途中，柴玲曾担心着他们的生活将支离破碎。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她知道二人在一起“将开创一个比生命还重要的事业，这个事业比我们两个人对未来的个人计划都重要得多。我们必须像人一样的活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柴玲，从一个丈夫的支持者转而陷得比她的丈夫更深，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充当男人们的看门人、秘书、联络员，到成为他们不休争论的归纳者和协调人，其中有动人的、自然的，也有令人遗憾的故事。封从德承认，是她清晰的思维和归纳能力，使她很快被男同学接受了。而她作风的勤谨和态度的亲和力，使她经常能得到周围人的指点。据封从德回忆，4月23日，柴玲曾很兴奋地向他介绍一个来自民盟的中年人的来访：

“从这中年人那里，柴玲学到秘书处功能与建制方面的基本知识。我们这才明了，一个组织要正常运作，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秘书处。秘书处最重要的功能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建制则分‘内保’与‘外保’。‘内保’即文秘工作，包括安排会议、记录、归档保存各种文件，并设专门小组保卫领导人物的安全；外保则是接待来访、听取建议、发布公告等等。”

当天，柴玲当选筹委会秘书长。加上她对周围人的关切，及颇具感染力的个性，使北大筹委会的秘书处搞得非常出色，秘书们也很拥护她。男士们再也不需为安排开会、发布公告等杂事而发愁。

“我成为了北大学生和筹备委员会之间的纽带，我在走廊上把我的桌子搬了出来成立了一个新闻中心。光是在第一天，我就和几百个人见面，并收集了很多影响运动进程的好建议。一位路过的长者告诉我，他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早期拥有的革命激情。这让我很骄傲。”

4月23日，柴玲第一次作为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的发言人，对外宣布无限期罢课；她还与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代表讨论全国罢课问题。当时，她的名字被新华社内参和海外媒体记作“蔡玲”或“蔡凌”。前述传达自称“邓小平家人密友”4月27日游行前的意见，以及寻找与高层沟通的活动，就是她履职的一部分。

从此，柴玲在运动中逐渐拥有了独立的形象。她不仅勤谨敬业，而且乐此不疲。所以，当4月24日，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改选，有人提议柴玲当召集人，封从德以她不是北大学生不同意时，柴玲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这次夫妻感情的危机，无疑在柴玲理想主义激情之外，加注了女性个人尊严的砝码。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进取心很强的妻子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因为“男权”的压制而得不到彰显时，有两件事是必须提防的：1、使妻子疏离；2、激发妻子自我证实的欲望。

后来，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成为柴玲副手的李录，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柴玲面前的。

此时的柴玲，并不具有邹谠先生所批评的“摩尼教式的善恶对立的世界观”，也没有“埋头不看现实的倾向”和欠缺“与他人对话的能力”。当她4月24日前往北大五四体育场参加学生自治组织的投票时，听到一个学生说“李鹏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学生运动的问题”，她还“认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好消息”！

五四游行之后，一则由于北高联常委周勇军擅自宣布复课，二则由于赵紫阳的“亚行讲话”预示形势转好，三则由于丁石孙校长提出的“建设校园民主”的设想，她大概认为是时候可以继续做他们的“留学梦”了，当封从德的计算机修好，可以继续做研究时，封从德向北高联和北大学生筹委会提出辞呈时，柴玲也提出了辞呈。

令封从德感触颇深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资源少得可怜。当时一台PC要卖四万，相当于一名研究生月津贴的五百多倍。因此，学生不可能有自己的计算机。当他在研究所里使用的计算机坏了，对他的论文完成是致命的。但是，在封从德的计算机再次“罢工”前，柴玲已先回到了筹委会秘书长的的工作，并同丈夫一道，参加了5月10日“声援新闻自由”的“自行车大游行”。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前，他们站在北大作家班征用的一辆板车上领呼口号。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留下的一帧照片，成为了她第一次在大型群众活动中崭露头角的见证。据马少方回忆，这张照片后来“还在电影学院展了好多天。”

图5-10：柴玲在《人民日报》社门前（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5月12日黄昏时分，北大三角地贴出了题为《血祭》的大字报。同时，王丹向北大筹委会通报了自己参加绝食的讯息。之后，王丹与柴玲一道，来到三角地的“自由论坛”。王丹用简单的语言向听众自报：

“我的名字叫王丹。我打算加入绝食抗议。”

接着，他传达了在人民大学的一个会议上几位老师的演讲，给人以“知识分子开始起来支持学生运动”的感觉。听众中也发出了对历来学运“先驱”北大教师不敢站出来的抱怨。

接下来轮到柴玲。柴玲说：

“我叫柴玲，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加入绝食抗议的原因。我知道大家都对这次运动的现状感到失望；并且，对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罢课？是否应该在开展进一步的行动前，继续等待和政府的对话？——感到困惑。我理解两方面的观点。你搞校园民主也好，搞新闻解放也好，只要‘动乱’的帽子不摘，老话说的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曾仔细观察过以往历次运动的产生和失败。每一次我们都做出了牺牲，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达到什么成效。所以每次运动都是从无到有而生，但是最终命运都是

一样的。这一次在 1989 年的运动也会有一个同样的结局吗？这次运动会揭露真相并标榜史册吗？

如果我们不喜欢去上课，那么我们就不会来北大；但是如果我们不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不会去示威游行、对话和绝食抗议。所以，我们既是很好的学生，也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对我们的国家而言，我们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而言，真相又是什么？为什么当我们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时候会被称作‘动乱’？为什么我们喊‘人民万岁’，可是警察来了，人民都撒鸭子跑？而我们喊‘警察万岁’的时候，警察总是来打我们？有些人说如果我们能够等到对话，我们就可以继续校园民主运动；但是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政府正利用他们的系统在传达‘动乱’的说法。我们都知道那是镇压和逮捕的预言。这就是我觉得，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的选择就是‘绝食抗议’的原因。

因为时间很有限，我们可以把目标缩小并定位为可以实现的两条要求：‘平反动乱’和‘与我们对话’。如果政府不平反‘动乱’，至少我们可以把事实告诉人民，这样历史就会还给我们一个清白。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牺牲掉我们的健康，是希望看到我们政府的真面目。小时候，我们被教会说：‘我们爱党，爱人民’，现在我们希望看看我们的政府是否爱我们，以及我们的人民是否会拥护我们。我们希望看看，这个国家是否还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值得我们的牺牲和奉献。

我希望用生命去面对死亡，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这，就是那篇题为《绝食书》的柴玲著名演讲。她毫无疑问打动了许多在场的听众。最初40余人的雪球，经此一役，滚到了60。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成立了北大“绝食团”。

5月13日上午8：30，当头版头条载有鲍彤星夜送达稿的《人民日报》还在邮局分拣时，北大的绝食队伍，也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中准备上路。

三角地贴出了署名“首都高校自愿绝食者”的《绝食宣言》：

“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原因：

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

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报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5月13日下午2点出发。

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

口号：

不是动乱，立即平反！

马上对话，不许拖延！

为民绝食，实属无奈！

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

9：30，北大筹委会广播了“绝食行动方案”：

1、11：30，纠察队在南校门集合。

2、绝食团中午12：00出发，13：00到达师大宣誓、誓师，通电中外记者、中外红十字会和各国政府。

3、纪律：除水和饮料外，不进食任何食物，不准带巧克力等食品，否则你不要参加。

10：30，北大绝食团100多人头扎白布条，由赵体国带领，在29楼前进行了“绝食宣誓”。誓词是：

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我自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纪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图5-11：5月13日，绝食队伍从北大出发前，赵体国带领宣誓（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这时，由北大作家班学员白梦修饰的柴玲5月12日晚《绝食书》已告完成，并进行了广播。

据封从德回忆，《绝食书》的播出，带来了巨大冲击，临近中午，在绝食名单上签名的已达160多人。

在宣传鼓动之外，“北高联”参与绝食的几位领袖则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系统，做了大量的组织和联络工作。

当中午来临时，作家班班主任曹文轩与21楼的部分青年教师用募集的资金，在燕春园为绝食学生饯行。青年教师钱理群当场作了演讲，在场的学生许多为之泪下。饭后，大家在作家班书写的“壮士已去，盼回还”的横幅前照相留念，随后便向预定集结地——北师大——出发了。

北大绝食团这时由400人组成，其中签名参加绝食的约160人左右。柴玲自荐，成为了北大绝食团的召集人。其余的人组成了纠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后勤队，他们用自行车驮着绝食学生上路。后与清华大学等校在北京师范大学汇合，举行了绝食“誓师大会”。

另一些小一些的学校，并没有前往北师大集中，而是自行出发，向天安门广场集中。据刘燕回忆：

“到下午3：00就离开学校往广场走，至少有60人。到了广场人民大会堂的西面，我记得当时差不多的学校都到了，北大和师大是两个大学校，可是小学校特别多。我记得我们学校旁边是体院，那次我第一次见到张健。左边，右边，全部是小学校，虽然是小学校，但人数并不少。”

下午16：20，北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北京科技大、理工大、北航、北医、北农大、民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13所高校三百多名学生，及3名上海请愿学生，在两千多名学生的护送下，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

17：40，王丹宣读《绝食宣言》。在同学们再次进行绝食宣誓后，宣布绝食正式开始。

13日当晚，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先后派出多支“声援队”前往广场。一位随第六“声援队”为绝食同学送寒衣的北大女生，在当时写给朋友的信中，解释了她对学运一直取旁观态度，此时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学运的原因：

“你也许会奇怪，依我这样性格的人，是不大会有如此热情搞政治运动的。……白天我可以躲到图书馆去读书的，但我的良心是怎样也过不去的。平日里，对于中国的民主自由只有发牢骚、叹气的份儿，如今终于可以做点什么了，虽然相当微不足道，虽然此次运动也只能是‘启蒙运动’，不能达到什么明显的效果，但是什么事情总要有个开头。”

据5月14日下午一位青年社会学者在广场的采访，学生大多觉得“绝食”的要求不高，政府会作出一定的让步，“绝食”能够胜利。即使被镇压失败，也可以起到民主启蒙的作用。

为了保持对绝食团的影响力，身兼北高联常委的对话团负责人王超华也参加了绝食。感觉到绝食将成为学运的主轴，自15日起，北高联王超华在广场设立办公桌，17日高联正式进入广场。

5月14日凌晨2：30，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市委书记李锡铭，副书记、市长陈希同，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市委副书记李其炎、汪家镠，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健民，市委常委王光、李志坚，副市长陆宇澄、何鲁丽到天安门广场劝导和看望绝食的学生。但他们到广场后，“立即被数千学生包围。李铁映、陈希同讲了话，但学生秩序很乱。”

5月15至16日，参加绝食的学生人数猛增了近3至4倍。到5月20日改绝食为静坐时，七天中，有三千余名学生参加了绝食。

事后邹谠先生评论说：

“这个富有意味的行动立刻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唤起了北京市民前所未有的同情，不论贫富老幼，不论文化程度高低。绝食将学生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策略上，这是一个成功的举动。但在战略上，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绝食意味着学生将运动升级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而不是继赵冒着巨大政治风险采取重要的妥协性政策之后，学生与政府的冲突的降级。由

此，学生错过了他们回应赵的温和讲话，并接受所谓由赵暗中提供的联盟的第一个好时机。”

在学生方面，前期持与政府合作态度的第一任北高联主席周勇军也曾反思道：

“当时我认为绝食可能导致民众对学生的支持达到最顶峰，同时也会造成政府与学生的对立尖锐化，其后果是很难设想的。学生绝食，等于把党内改革派的生存空间给堵住了，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在我们学生和保守派之间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他要么倒向保守派一边，要么倒向学生一边。”

显然，政府在每一次事变来临时所表现的行动迟缓和决策错误，都缩小了学运“温和派”的话语权。同理，学生每一次向激进方向的推动，同时也缩小了政府改革派的回旋余地。虽然大多数人是怀着献身民主自由的决心参加到绝食队伍中来的。但作为一种政治行动，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种方式继续与政府的斗争，无疑是怀有将事态扩及社会，借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各国新闻媒介关注北京的机会，在全世界造舆论的设想。同时，这种不留余地的做法，也表现了行动的设计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求胜心切的轻躁。

第三节 阎明复临危受命

绝食！这一拳砸下来，首先震痛的是中共首脑盼望和等待已久的“中苏最高级会谈”这根神经。

此前，赵紫阳曾向邓小平和杨尚昆保证，相信广大青年学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会在欢迎戈尔巴乔夫仪式上节外生枝”的。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历史被改变了！据称，“赵紫阳、杨尚昆、李鹏等都对学生的突然行动感到气愤。”“由于学生突然宣布要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使赵紫阳

感到十分难堪。”赵紫阳再次以曲折方式向学生喊话：“我得此（学生绝食）信息后，便于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 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

但是，这个讲话若说有什么作用，无非是吸引人们注意到，从“十三大”以来一贯主张积极对话的赵紫阳，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真正面对学生。当时，学生中就流传这一幅自嘲的对联：“学生要求对话，政府圆（袁）木头一根；新闻界要求对话，党中央全体起（启）立”。“新政”对学生的冷漠，原本是这次绝食发起的原因之一，而赵紫阳此时只听到一点谣言，便踩着李鹏的后脚跟 与端着国家饭碗的工人对话，更反衬了总书记对学运的漠视。人们很难想到，与借“亚行会议”传话一样，赵紫阳出此下策，完全是因为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委坚持对待学运的强硬立场，中办和国办在与学生对话条件方面讨价还价的僵持，以及赵紫阳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可以支配和调度力量的有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学潮爆发以来一直持温和态度、有“储君”之望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 将原本是用来和民主党派打交道的统战部推向前台。

自学运爆发以来，统战部知识分子局陶斯亮一直与北大学生保持着密切联系。与体改所的“北大校友”并行，与另一“储君”——胡启立的团派建制并行，赵紫阳恩师 女儿提供的报告，构成阎明复获取学运资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如前所述，4月28日，他还将陶斯亮与北大学生的一份“谈话记录”送到李鹏案头。

据沈彤回忆：

“……我在筹委会的时候跟校方有一些接触，就是接触到北大团委以及一些青年教师，其中包括几方面的人，赵紫阳的这批人，还有像吴稼祥、张炳九这些人，就是新权威的这批人。在一些人的促成下，包括团委系统的一些人，北大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智囊团，以9个在北大校园比较有名的青年教师组成的智囊团，一直在29楼，每天一到二次给我提一些建议。这个所谓智囊团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跟所谓体制内的改革派接触，希望在正式的公开对话之前有私下的预先接触。当时的目标主要是阎明复，阎明复因为身体的关系，几次答应了见面，但一直在推迟。……同时这过程中间各界对对话代表团很关注，这中间曾经有过项小吉和北京各界的名流见过面，在这整个过程中，跟中办也有过多次接触。”

据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小平回忆，就在绝食开始前的两天，政法大学党委派人通知他到党委办公室。党委副书记解战元立即告诉他：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先生想约见我，就当前的学运事态聊一聊。……在第一次出面斡旋的晚上，我有机会见到另外几个一直在统战部和学生之间奔走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郑也夫、李肃、周舵、刘晓波。他们告诉我：悼胡事态演化为严重事态之后，阎明复找他们谈话，探讨化解之道。他们建议阎明复找几个在大学中对学生有点影响的青年教师谈谈，我的名字，就是他们开给阎明复的。”

但是，陈小平还没来得及见到阎明复，绝食已经出台了。

阎明复，祖籍辽宁海城。1931年11月11日生于北京。父亲阎宝航，早年从事贫民教育、积极于东北的抗日救亡活动；后任国民政府高官，曾负责蒋介石夫妇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被宋美龄器重，获赠一辆美式吉普车。但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居重庆期间，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利用身份为中共 and 第三国际做情报工作，掩护和救助过不少中共党员。抗战爆发，阎明复家中兄姊大多投奔延安。阎明复则在重庆巴蜀小学、南开中学完成了初级教育。国共内战爆发，阎宝航举家回到东北，1947年，阎明复进入哈尔滨外国语专

门学校学习俄文。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全国总工会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翻译组组长，直至1966年，一直在杨尚昆领导下工作。曾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的出访或外事活动担任翻译。文革中，受杨尚昆的所谓“里通苏修”案、阎宝航的“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的牵连，被赶出中南海、集中审查，兹后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7年11月被投入秦城监狱，就关在与父亲几室之隔的监房里，系狱达7年半之久。父亲阎宝航则在被囚禁不到半年后便冤死狱中。

阎宝航的最显著历史功绩，是在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的半个多月前，就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的情报，使苏联提前进入一级战备。他还为苏联红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全部情报，使苏联红军易如反掌地打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卫国战争纪念章”。

1975年，阎明复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在中共“十三大”进入中央委员会，任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从这个履历看，到目前为止，如果发展顺利他有可能走党的系统，进入“诸君”的一梯队；如果业绩平平，则按部就班，将仕途终了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阎明复在中南海的工作经历，使他与杨尚昆、彭真结下了难解的政治关系。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朋友。据他回忆，文革被逮捕时，阎明复还有向他“托孤”的示意：

“在我被押下台穿过会场向礼堂的门口走去这短短的时间里，一直用眼睛的余光在人群中寻找我的好友王瑞林。他是邓小平的秘书，我多次随邓小平出国，王瑞林都同行，所以很熟。……当时我想向王瑞林暗示，请他关照我的家人。当我走到会场门口，快要跨出大门的刹那间，突然发现了王瑞林，

只好转身用目光对着他，举起被铐着的双手向他致意……王瑞林说他理解了我的眼神！”

不用说，阎明复日后的平反和受到重用，应该与邓小平的“重登大位”有关。而在关键历史时刻，他很容易获得来自邓小平方面的最敏感消息。在邓小平“闭关”时，连赵紫阳也要通过他，给邓小平传话。

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家世和前述个人经历，阎明复具有对他所供职的体制难得的反思视野，并储备了左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广泛的人脉资源。在八九民运中，他得以将上述资源发挥到其人生的最高度。

绝食的出台，大大提高了朝野各方对于“对话团”的期望。知识界人士在政府与学生之间往返穿梭，空前活跃。不少人开始打破沉默，希望促成对话解决问题。

13日当天，北京大学季羨林、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发表了致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提醒“中央及北京市政府的态度和措施至关重要，其适当与否，对今后的事态发展影响甚大”。并建议：

第一，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应尽快与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对话，以求尽早妥善解决问题。

第二，应当尽早对这次学潮的性质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安定民心、党心，不应采取拖延政策。

第三，应当高度重视这次绝食请愿活动，以认真、谨慎和人道主义的态度，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

同日，在北大、人大、北师大、清华等院校都出现了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打破沉默，拿出良心、勇气和社会责任感，积极“书写历史”并号召15日下午2：00在复兴门立交桥集合步行到天安门，举行首都知识界大游行，声援在广场绝食的学生。

5月14日，为声援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部分教师”贴出《倡议全体教师罢课》的大字报，提出：“若在今晚11：00以前政府不答复学生的要求，15日将罢教”。

为防止绝食学生感到孤单，整个14日从早到晚都有学生和教师先后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从上午8：00开始，上海高校首批进京请愿团来到广场，接着又有北大、北师大、清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校的学生前来声援。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等都打着横幅、旗帜赶来。紧随其后的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七百多名“和平民主请愿团”。每当新的声援队伍出现，都绕场一周，吸引数千学生和群众跟随。

此时，统战部的阎明复也从病中走上前台。

5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时在开着两个会：一个是前述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人士的对话会；另一个则是上述由知识分子局筹划的征求党外人士对时局意见的座谈会，其实，也就是探讨如何使学生停止绝食良方的“诸葛亮会”。阎明复在两个会议之间来回奔跑，大有系国运于一身的景像。

据周舵回忆：

“大家出主意说请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说要请示阎明复。一会儿阎明复从胡启立的那个会上走过来了，他对大家说要商量个具体办法。阎明复对在座的人说：‘中央领导对目前的局势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外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愿望是很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当现象。我对前

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制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摔死？《虎报》说邓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和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许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再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说穿：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

“阎明复这一番话打动了在座的人。阎明复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午饭后继续谈，我们建议阎明复直接和学生代表对话。阎明复当即同意，说事态紧急，最好是今天下午就谈。我们都表示来不及，晚上说不定可以。阎问，谁能帮我去联系学生代表？我看没人应声，就说，我去试试吧，您给我配三辆车。然后建议李肃、郑也夫和我兵分三路去找学生代表。”

周舵建议郑也夫去《经济学周报》社找王军涛，因为他知道王军涛和政法大学的“对话团”有联系。又建议李肃和自己一起跑西郊的八大院校。李肃有事，不久就先走了，他也只来得及跑了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在这过程中，他才知道，当时学生组织共有三大山头：高自联，对话团和绝食团。

据学生“对话团”的沈彤回忆，他们收到统战部会议的消息颇为突然。此前，他们仍在与中办信访局打交道，不知道这个活儿什么时候被统战部抢了过去：

“5月12日晚上中办在拖了6天之后突然通知，对话安排好了。……这是对绝食的决定一个直接反应。当时因为找不到项小吉和我，就找到了社科院的徐国栋，徐国栋连夜通知了主要的对话代表。13日我们就到了政法大学，筹备预期在5月15日中午的对话会议。

为了避免4月29日这种袁木一个人对着全屋五六十个人的这种形式，对话代表团主动提出了派20名代表，希望政府方面至少十几个部长出席，对我们提出的改革第二大方向的各方面有具体的回答。各校突然带来消息，除了代表团的20位代表之外，各校校学生会还要有30名代表……当时，大家就炸窝了。在我们听了各个学校汇总的消息正在争论的时候，5月13日下午三四点钟时，突然有通知说统战部要见面，而且说汽车在下面等。”

关于这辆车的来历，陈小平的回忆提供了详细而生动的细节：

“绝食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当时，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全体所务委员正在《经济学周报》开会……会议完成半数议程后，会议室的大门被猛然推开，我们看到的是气喘吁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郑也夫先生。他的急切，使他忘记了向房中的主人打招呼，对其他人他也视而不见。看见我之后，他说：‘阎明复要找你！’接着又对军涛说：‘还有你！’待他点完名之后，这才平静下来，开始对陈子明解释事件的原因。他说：学生已经决定绝食，事态非常严重，阎想找个办法将事态平息下来。但是，陈子明仍然坚持要将研究所的所务会议开完，郑也夫坚持说：‘必须马上走！汽车就在外面等着！’我们打开门一看，一辆统战部的至少可以容纳20人的豪华考斯特就停在报社大门外的胡同里，马达仍然在发出低沉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陈子明决定我与王军涛先行离开报社，其他人继续召开所务会议。

汽车载着我、郑也夫和王军涛三人马上离开了报社。时间是傍晚时分，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看得十分清楚。透过车窗远远望去，在广场之间，有黑压压的人群，那大概就是绝食的学生和业已形成的观众包围圈。汽车没有在广场上作片刻停留，而是经二环路很快地来到位于蓟门桥西南角的政法大学。在政法大学的正门，我跳下汽车，按照预先从郑也夫那儿得到的吩咐，到政法大学去找所有我能够找到的学生领袖。很幸运，离停车地点只有一百码左右距离的对话团正在办公楼的顶层举行会议，我从里面将对话团团长项小吉请出……好像还有对话团秘书童屹以及其他学校的对话团代表。我们几乎是没有停留地上了汽车，然后，汽车又向人大和北大方向开去……”

周舵通知了北大、清华学生以后，又找到北师大的刘晓波，通过他找吾尔开希。当刘晓波把吾尔开希找到自己家时，已经将近晚7：00。周舵回忆道：

“临上车，我对晓波假客气了一下，问他是不是也参加。我原以为他会拒绝的，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我心想，坏了！因为我知道，閻明复是不可能接受他这个头号‘黑手’的，而且很可能连累閻。”

“7：30左右，我回到统战部，各路被找来的学生代表已经到了，有大约十余人。由团中央的刘延东带来的共青团和官方学生会代表大约二十人，作为中间人的我、李肃、郑也夫、王军涛、刘晓波、闵琦等，加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共六十多人，把统战部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閻明复坐在长条会议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上，右手边坐着陶斯亮，左边位子空着。閻见我进来，指指空位，示意我过去。我摆摆手，却和刘晓波坐在一起。閻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前往的学生中有北高联的吾尔开希、梁二，对话团的项小吉、王超华、沈彤，绝食团的王丹、柴玲、程真等。作为中间人的还有北京大学的教师孙立平，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陈小平。

会议由阎明复主持，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工作，文革中在秦城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副秘书长，1985年到统战部。他说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他说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周一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赵紫阳有一点意见，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播，使同学们知道。

然后，他进入正题说，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能不能顺利进行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事情……如果天安门广场聚集两三万人，连欢迎仪式都不能举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同学们可以有多种意见，可是要做出损害中苏会谈的事情，必定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是不会得到人们支持的。

他答应，同学们的意见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他可能了解的情况，一定坦诚地传达给学生，他个人的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同学们尽管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

接下来是学生代表发言，他们坚持要收回“四二六”社论，要政府改变“动乱”的提法，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则不会停止绝食。阎明复则反复说服学生结束绝食，以国家大局为重。

王丹发言说：赵紫阳似乎非常担心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学生有所动作。记者提问也问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这是国内事务，戈尔巴乔夫是国事访问，不必担心。“四二六”社论为学运所定的“动乱”应该平反，必须以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纠正。否则学运没有一点成果，同学们的安全也没有保证，学运不会平息。

沈彤说，今天绝食的出现，不是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来访这个日子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动乱”的提法。连改变的姿态也没有。

阎明复表示，同学们的意见，他会一字不改地向中央汇报。关于对话，从4月27日起中央就在认真考虑。同学们游行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同学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是得到全国人民共鸣的。但采取什么措施，不是一两天能够答复的。如果采取敷衍态度，我们可以同意对话。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是一个同意甚至推动腐败的党中央国务院。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纸上揭露腐败现象，决定审计五大公司等等。也不排除让同学们参加的可能性……对话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内容。以前没有贯彻十三大的决议，你们推了一把，我们已经反思了。在座的中青年学者可以作证，就在这个桌台，我们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新闻法、结社法、游行示威法……都在认真准备。政府对话的诚意，同学们发生怀疑。我感觉我们首先应该检讨，没有及时把4月27日以后的思考传达给大家。当然也有困扰：用什么方法传达给大家呢？

“用什么方法传达给大家”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并非阎明复危言耸听。不然，我们无法理解，掌握一切社会资源的执政党总书记要通过向亚行代表和首钢工人喊话，来传达党中央对于学运的策略和期待。

阎明复继续说，我认为，4月27日和5月4日冷处理的方式是成功的。中央的确担心（我希望我们是错误地理解了同学们的心愿）绝食会影响中苏会谈。希望同学们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和爱国热情。中苏关系的改善会使我们没有一个敌国。我曾对香港的徐四民先生讲：我今年58岁，还能干几年？过几年就是他们（指学生们）来推进改革，希望他们能继承一个好的遗产……我不想讨好同学们，但将来的事情确是要有你们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一代之后就是你们的一代，你们注定不是享乐的一代，是忧国忧民的一代。我希望大家不要怀疑政府的诚意。

作为中共的统战部长，他对比他年轻十几、甚至几十岁的“中间人”自始至终以“老师”相称，的确有一些礼贤下士的风度。但与此相比，对他真

正的谈判对手——学生，又忍不住要拿出关于“代”的家庭教育方式。虽然比袁木何东昌谨慎一点，还没有把他们称为“孩子”……

显然，到了80年代后期，除了命中注定要成为“接班人”的高干子弟外，人们与中共之间“代”的关系的意识，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

阎明复讲话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接着是王超华发言。她把成立有更广泛学生基础的对话团称作是“向中央作了让步”。并认为今天请他们来而没有请学联（其实请了），是“表明政府承认”了这些组织，也是在作“让步”。她的话还未讲完，阎明复就打断她说：他会把她要求单独对话、公开公正客观报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但他说他不认识同学们，只是请几位老师把“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同学”请来。言下之意是提醒人们，到现在为止，政府仍不可能改变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立场，仍不是进行单独的对话，更没有把他们当作这些组织的代表来看待。

绝大部分“中间人”的立场比较一致，发言都是建议政府正确评价学运，并在此基础上调解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但周舵事后评价，他们的劝说是“软弱无力”的。

他们讲完之后，阎明复谈了四点，似乎是要结束这场对话了。他说：

1、首先感谢这么多同学到统战部来；

2、我今晚就向中央汇报；

3、推翻“四二六”社论有难度，希望给一定时间， 但希望同学们在戈尔巴乔夫来之前结束绝食；

4、没有根据把中央分成保守和改革的两派，但希望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作为跑龙套的，不能超出音乐的节拍，但我会尽力反映情况。本来，这场会商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因为双方底牌都已亮出：政府方面在学运的定性问题不可能公开让步；承认学生自治组织问题也属谈判底线以外的内容。充当政府代言人者怀着侥倖的心理，希望在不挪动一丝强硬立场的条件下，只用他个人的诚恳和空洞肯定，换取学生在行动上的让步。到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消除他的个人色彩，这场对话，与4月29日的对话，并无本质的不同。它的唯一收获是，学生们终于知道，共产党的高干中，还有这样的“好人”（王丹语）！

但是，阎明复的结语并不算数，因为社经所的代表还没有发言。这时，一直在沉默中的王军涛讲话了：

“阎部长，坦率地说，你感动了上帝。几位老师是被你们感动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仅仅讨论些技术性的东西，能度过5月15日吗？……今天度过这一关不一定是好事……”

阎明复反对说：这是不对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王军涛依然强调说：“阎部长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学生，但学生们再让步，就不可能代表学生了。”听了这些话，阎明复似乎很动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再次重复他的意见：

第一点，同学们回去只讲今天是阎明复的意见。当然不一定同意我的意见。

第二点，事态的发展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 我保证如实向中央汇报。我豁出去了，官也不当了！也就能起那么点作用。

第三点，我将尽力促成有关人员与学生们选出的代表团的对话。

第四点，我完全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分析，深层的问题不是几次对话所能解决的。

我一定以最强硬的口气把同学们的神态如实传达。

他最后又强调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推翻社论结论，对此不要有任何误解。不能把问题赤裸裸地摊开来。

会议至午夜方散。因阎明复要赶去开政治局会议，先告辞了。统战部为与会者安排了简单的夜宵，留下的人边吃边聊。

据项小吉回忆，当晚的会谈中，学生与政府官员达成了口头协议：政府尽快与对话代表团对话，绝食团14日停止绝食撤出天安门广场。但沈彤注意到，在场的柴玲没有发言。而且她和王超华在会议开始之后半小时就离开了会场。沈彤当时就感到：

“虽然大家的共识是应该撤离的，但在场的王丹和吾尔开希怎么有可能决定是否撤离呢？也就是说，在场的所谓学生领袖跟学生主体实际上是脱节的，学生运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天安门广场。”

在5月13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阎明复将与学运代表初步磋商的情况报告了胡启立。胡启立报告了赵紫阳后，赵紫阳决定于5月14日上午10：00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杨尚昆、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李锡铭、吴学谦、阎明复、陈希同等。

在会上，阎明复根据5月11日胡启立在《中国青年报》对话的口径，在关于学潮性质的说法问题上，提出了一个“转弯子”的折衷模式：“即‘四二六’社论是根据4月26日以前的情况写的，那时有西安、长沙的打砸抢。4月26日以后情况不同，没有西安、长沙那种情况。故中央对学潮的态度是明确的，紫阳同志‘五四’讲话就表明了。这既照顾了学生，又照顾了邓小平和李鹏同志。当然，学生不一定满意。”

据《人民日报》传达的信息：胡启立基本同意阎明复的方案，赵紫阳也同意了胡启立的意见。“会议决定下午由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三人与学生对话团对话。”但李铁映是“勉强接受任务”的。

其次，会议要求北京市要千方百计保证绝食学生的身体。学生一有晕倒现象，立即送医院急救，绝对不能死一个学生。

为了能在戈尔巴乔夫降临北京前清空天安门广场，原计划5月15日举行的与学生对话团的对话，正式改在14日下午举行。为此，阎明复和中办信访局局长郑幼枚于当日上午分别会见了北高联和对话团代表。据时任对话团召集人的项小吉回忆：

“（5月13日）晚上我回到法大，信访局来人通知我明天与对话团对话，代表限20人，我同意了。”

“5月14日早上我得到情报，说今天的对话不是与对话团的对话，而是与各校学生会的对话，对话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听了很气愤，觉得被愚弄欺骗。我立即打电话问信访局局长郑幼枚，他支支吾吾默认了。我说对话团不参加这个对话。”

“14日上午我和沈彤再度与郑幼枚谈判，郑不同意用对话代表团这个名称，也不承认北高联。这时他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中央同意与对话代表团对话。第一个障碍解决了。第二个障碍是现场直播对话实况，并允许中外记者旁听。郑一再强调直播有技术上的困难，但他后来答应实况转播。考虑到广场绝食的同学，我们并没有在直播问题上过于坚持，我考虑实况转播也可以接受，但一定要在当晚7：00的新闻联播中播出，电台同时广播。只有这样，广场绝食的同学才可能撤出。绝食团由吾尔开希负责，我只负责对话，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绝食，也不知道北高联和绝食团是否能有效控制绝食活动。”

稍后，参加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阎明复，又在统战部小会议室约见了北高联参加绝食的成员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等人。据国家教委和统战部的有关材料和现场录音，这次会的过程如下：

阎明复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今天下午4：00，在统战部礼堂，李铁映、我本人和尉健行等愿意与学生指定的对话代表进行对话。我希望这次对话能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学生代表似乎认为官方的级别还不够，但没有说出来。对此，阎明复郑重指出：“李铁映是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我本人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尉健行是国家监察部部长。你们觉得哪个级别还不够？”学生代表表示同意。学生代表一致要求：“这次对话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阎明复明确表示：“这不可能。统战部礼堂没有直播设备，而电视台的转播车又都去准备采访戈尔巴乔夫了，调不出来。”

为了打破僵局，阎明复主动提议：“关于这次对话，我们可以进行现场录像，由学生代表监督封存，送往中央电视台，保证当晚播出。”阎明复严肃地说，“现在广场的形势非常复杂，你们有没有信心能劝说广场的同学停止绝食？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学生代表表现一种为难情绪，一个学生代表说，“要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出来进行劝说效果就好了。”王超华说，“今天下午很多著名学者要在《光明日报》开会，我争取想方设法把他们请来！我可以试试。”阎明复当即表示欢迎。

图5-12：绝食（选自《瞭望》周刊）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意见——《光明日报》座谈会

5月14日是星期天。但因为第二天要实现本世纪末的两颗政治巨星的会晤，人们比往常要更加忙碌。

这一天，在“新闻改革”春风鼓舞下，决定作一些改弦更张的《光明日报》，由近年来活跃在知识界的作家兼记者戴晴出面，按原计划把知识界、理论界、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请到了报社，对学潮问题进行座谈。由于“绝食”造成的局势和王超华的意外光临，使之必然成为了议论的中心话题。

据戴晴回忆，这次座谈会缘起于前述5月13日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常委胡启立与新闻界人士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

“吃饭时，我被按照西方的 boy-girl-boy 的习惯，安排坐在胡启立右侧……我对他说，我本人自4月15日以来，接受过不下十次外电外报采访；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能发表自己的学者与文化人的意见呢？这意见与官方口径可能不尽一致，但完全可以通过版面处置使读者了然，比如说放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号字，加具有倾向性的编者按语，甚至还可以剪辑——这样做当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辑而气得房颤加室颤；但站在政府的立场看，总是可用的一招。他说他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就说过，中央的精神摆在那儿，版面完全由各报主编自行处理。我问：真的？真是这样？他说这还有假，前几天开会我刚刚说过。

……当时，我觉得只领受这一原则性答复是不够的，于是紧追不舍：

‘我们报纸常用请学者们来开座谈会，会后发纪要的办法向读者介绍他们的见解，这次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说。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追着问。

我已经说过版面的事由报社自己定。’ ”

散会后，戴晴决意要把这次谈话的收获付诸实践，于是同《光明日报》部门主任沟通，经报社领导及可能更高层次批准后，座谈会得以召开。

按照戴晴报批的计划，原拟邀请的人士有：

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研究员 苏绍智

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 刘再复

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李泽厚

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研究员 严家其

社科院历史学所副研究员 包遵信

福建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李洪林

法学家 于浩成

但因为各种机缘和不明原因，这天到会的还有：温元凯、苏炜、李陀、苏晓康、麦天枢等知名人士，外加学生王超华。苏绍智则因在外地而没有到会。

座谈开始前，北高联常委王超华介绍了绝食学生的情况。她沙哑的声音和疲惫的面孔，以及对广场情况的了解，令在场者误以为她是绝食团的领导成员之一。她说，在绝食者中，坚定者大约只有20%，主要是北大学生；动摇的有40%；想走的有20%，但北大同学不想走的那一部分，也是“接着坐”，到晚上12：00为止，留不留人没有说。她听说公安部有报告表明，现在大量“盲流坏人非常多，她感到局面已经难以控制。她听说知识界准备游行，想听听各位老师对局势的看法。她说，“你们这些学者都是学生中相当有影响的，如果能到广场上去劝说学生离开，……至少不会有反作用。现在政府方面任何人去说，都只能起反作用。

王超华还说，她在北高联常委中是很孤立的，一直起一些协调作用，但她是唯一任期最长的。当有人问有无可能将学生劝走时，她说，对于大多数

学生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绝食团的领袖，他们的态度与文字里面写的也是有差别的。但他们的眼睛就盯着北大。

人们对她介绍的情况表示十分的焦虑。

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光明日报》副总编方温恭作了开场白：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提出用冷静、克制的方法处理游行请愿的问题，他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这是两方面都应该努力的目标。这次学生的罢课、游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都会有好处，但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态度来影响事物的进程。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王超华希望能够直接议论绝食学生问题，李泽厚也不主张坐而论道，《光明日报》因已经留出明天的版面，希望先议抽象问题再议具体问题。考虑到明天戈尔巴乔夫就要到达，明天见报可能已于事无补，温元凯临时动议：《光明日报》发一个《紧急号外》。他表示，他个人愿意到广场去劝说，如《光明日报》紧急动员一下的话，可以带着号外一起去。事后，戴晴认为，这次会议的主题偏离，与温元凯、王超华的意外出现有关，而温元凯及他带来的牟其中一行，是有备而来的。

温元凯说，当然他不是简单地劝学生离开，而是有一系列的想法要表明。如果杀人的话，他也要去绝食。说到这里，会场内赞同之声大起。

根据会场气氛，主持者同意先用两个小时谈对时局的看法，会后留出时间议论《紧急号外》的问题。

下面是此次议论的大致经过：

戴晴：我们对大家不作任何要求，你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学者。中间为了节省时间，不要重复。我提一个建议，前天晓康他们起草了一个知识界对局势的宣言，他可以说得比较“整”，然后我们每个人再作补充。

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教师）：我是这样看的，4月27 日学生的游行事件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一个新时期：中国的强人政治已经结束。学运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们在以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参与政治。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政府或者说执政党表现出极其无能，这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希望动乱，我们希望事情能够朝着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发展，我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我们不想操纵学生，学生也不是任何人操纵得了的。所以，我们就干脆站出来说：

第一，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历史教训：1919年北京政府镇压五四运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四人帮”镇压学生运动，这三次大教训。应该懂得这个基本常识：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

第二，既然是按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处理危机，就应该承认大家选举的学生组织是有其天然合法性的，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动乱的根源，恰好是学生提出（要反对）的腐败、官倒、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中华民族没有办法。

第四，防止动乱的办法，必须有新闻自由，必须开放报禁，必须让权力受到监督。

第五，执政党也应该吸取“胡风事件”，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迫害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一种敌对的势力和一种什么压力集团，能够跟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来解决目前这种政治问题。

我也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的确比较危险，那么，政府希望学生理智，政府自己就应该理智。你们不希望天安门广场产生这样的状态，希望苏联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学生不在此静坐，那么，你们向学生保证了什么呢？为什么

在“动乱”这个问题上，到现在为止，不肯拿出一个意见来呢？……所以，我们在呼唤同学们要有理性的时候，更强烈的呼唤：政府和执政党要有理性。

图5-13：5月14日《光明日报》知识分子座谈会。左起：麦天枢、戴晴、苏晓康、李洪林（陈小雅摄）

苏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在，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危机也是生机，如果执政党能够在全新的、现代的观念指导下，他们应该是有能力走过这个危机的。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事件发生以来，特别是前半期，执政党从面目到语言，都表现出相当的陈旧。必须一定要指出，“四二六”社论，是真正引起这场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学生抗议运动真正的媒介……到目前为止，学生是相当理性的，而政府却摇摆不定，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它执政40年应有的成熟和足够的理智。再重复一下，关于“动乱”这个提法必须改正，还有上海钦本立免职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非常具体、非常明白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还谈什么“克制”和“秩序”呢？第二，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护宪运动”。就是保护宪法赋予每个个人和公民的权利的护宪运动。共和国是一种现代的民主政治，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它的合法性，是依靠它的法的权威来证实、来认可的。如果一个执政党，它对自己参与制定的法，采取一种为所欲为的态度，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法。那篇《人民日报》社论就充满了违法的语言，这种违法现象（的纠正）如果不首先从政府本身做起，是没有办法取信于民的。

第三，遵守宪法的内容很广泛，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尖锐，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开放的问题……如果说，这次有可能引发一场动乱，动乱的一个广泛的诱因，就是我们多年来传播媒介的不沟通，不开放。在现代开放的信息社会，用新闻封锁的方法

来治理这个国家，是非常愚蠢的……今天我们还不面对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就没有希望。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非常现成的。

包遵信：我非常赞成今天的这场学生运动，他们非常理性，非常成熟的态度。所以，这场运动，应该说是一场“非常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改变了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只能听话、只能服从，这个时代的结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次觉醒，超越了五四精神。

现在劝学生回校，我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另一方面，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至少要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从4月15日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介报道，你到底打了人没打？包括西安事件的报道。是否要一概澄清？“四二六”社论说这场运动是“动乱”，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提法，必须要推翻。（如若不然），始终有一把剑悬在头上。

这个运动提的口号很多，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口号是“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还有，承认公民的结社自由……我觉得紫阳这个讲话还是比较好的，但光提口号不行。你必须承诺几样东西，这样你的诚意才表现出来了。

于浩成（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原社长）：我同意这次运动是一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是一次护宪运动。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我们的领导人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法制就是要求老百姓来遵守。首先政府要合法，官员要合法。民主的基础要合法，这是保障……有一句话说，现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只有造谣的自由。……。

温元凯：因为今天下午形势比较紧急，所以，我希望就谈今天下午的问题，也就是明天早上的问题。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中国政府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第二个就是要清场。

（这个）问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危险，可是又是机会。机会就意味着，我们希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大智大勇地利用学潮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变成一种契机……我完全赞同刚才诸位同志的讲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一个政治多元化，一个民主潮流的时代的到来……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向社会发出几点呼吁。首先，我希望对政府发出三点呼吁：

第一，要理解学生，真正的、有诚意的理解学生。……

第二，要保护学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学生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会要重蹈天安门事件的覆辙。将来我们要在历史上背一个恶名，要遗臭万年。

今天你可以做，但明天就要遗臭万年！

第三，应该引导学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希望帮助政府改革。我们希望顾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的面子。……我们希望顾全大局，这是今天下午的大局。

我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用一个办法来维持一个局面。作为长者，我希望对学生方面也有三点呼吁：

第一，我希望学生要认清国情。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但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一季度三个“居高不下”，盲流，如果学潮和盲流结合，可能会导致动乱……这种危险不是不存在。

第二，要推进实际的民主。……要推动新闻自由……学生（自治）会只要通过大部分学生的民主程序，如果说，他们否决了原来的学生会，而建立了新的学生会，我觉得也是合法的。如果说还不够程序化，我们可以重新程序化嘛！

第三，要推进实际的改革。当前改革面临一个停止和倒退的可能性。……对这个十年我们应该加以总结。而且，十年来的失误，我们应该加以否定……十年改革的重大失误，还是在于决策，决策机制基本上没有变……而当前，我国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渡过难关……增加社会凝聚力，要增加四个意识，即公民意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我希望同学们认清国情，使当前学潮，当前社会危机，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走上更快发展的一个契机。

因参加北大的活动，这一天下午，严家其来得较晚，也比较沉默。也许是不同意温元凯关于解决问题需要政府的“大智大勇”一说，他发言说，眼前的问题，对于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应该很容易解决的。他谈到绝食对人的摧残，政府如果任其下去，就是一种对学生和人民的无形的摧残和镇压。但如果把学生架走，可能会引起死亡，政府对此要负政治责任，而且警察两个架一个也做不到。他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面对学生的要求，发表电视讲话，或者广播讲话，一下子就解决问题。

讲话应当包含四点内容：（1）公开宣布这次学生运动是一次爱国民主运动，就“四二六”社论做出检讨；（2）承认受到大家拥护的北高联是合法组织；（3）与对话团进行公开、平等、有诚意的对话；（4）公开宣布不秋后算账。他说，赵紫阳讲话谈到中国人的“声誉和形象”，如果政府把学生架走，那就做了最大的有损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事情，有损于中国人声誉和形象的行为。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因此，他提出现在要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并强调全体人民的利益高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利益，全国人大的利益高于它产生出来的机构的利益。而眼前的事件，正标志着“人治时代的结束”，一个“以建设民主和法制为目标的新时代”的开始。

此后，刘再复、李陀、麦天枢、李洪林均就学潮评价问题发表了意见，并从各自的身份、背景和感受出发，对政府处理此次学潮作出了批评，还探讨了其源于政治体制，政策与思维方式的原因。对于当前学生绝食问题，大多认为政府应该有所表示。

李泽厚的最后发言认为，要政府出来就一些问题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劝学生暂时撤离广场。于是，人们转而开始议论呼吁书的内容。在七嘴八舌之中，人们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三派：

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是为一种“现实政治”的态度；

其二，以严家其为代表，道义与立场上均为学运派。认为政府不满足学生提出的条件则无由劝学生撤退。坚守“理想政治”与“原则政治”。

其余的人则在温、严两种意见之中来回摇摆，实质上是在原则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找不到落脚点。

比较独立的第三种意见由苏炜个人持有。他认为民主社会的特征应该是依法行事，合理的社会结构应是知识界独立于政府与学生之外，充当社会的缓冲机制。他警告人们“两极社会”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

他同意到广场上去劝说，但声明不是为了谁。他们的行为不应对谁上台，谁下台负责。因为，谁是改革派？说不清楚。

最后，由温元凯和苏晓康根据大家的意见同时重新起草一个文告，既似声明，又似呼吁书。结果，终因严家其说了一番要对历史负责，他个人没有权力劝学生撤退，和他个人不能签名的话，人们同意在呼吁书对政府的三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条的话，我们全体将站到学

生运动一边”。苏晓康建议加上“坚定不移地”，最后，大家认为，既然如此，应改为“坚定不移地一同奋斗下去。”

这个呼吁书形成的全过程，表现了知识界在这场突发事件面前全部的矛盾态度和矛盾心理。如果没有严家其在场，知识界、理论界（特别是感情敏感，理论上慢半拍的文化界）也会从此卷入学生运动。但严对自己角色的自觉和坚定的态度，无疑给这个“文告”注入了过多的“声援”而不是“劝架”的色彩。究其原因，大概是前一天他已与苏绍智等人联名贴出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了》的大字报，预知知识界明日将举行第一次游行，以及他领衔签名的《五一六声明》正在征集签名的过程中。显然，他考虑到这一系列活动之间的联系和逻辑关系，不能贸然同意就此劝学生撤退。

“过河”的人已经走到了桥边，此时，怎么能将“桥”拆走呢？

据戴晴回忆，在讨论过程中，就有人提出：

“若想要劝说奏效，必须先说动绝食最坚决的那批领袖，再由他们去劝说大家。而和他们谈，绝不是站在广场上、插进人群中能说得清楚的，必须首先找一个能从容地说话、能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的地方。大家议来议去，认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一间屋子比较合适，那里最具政府权威的背景，离绝食地点又最近。”

因此，在讨论进入轨道后，她曾抽身出门，用“红机子”给统战部值班室打了个电话。值班室把电话转到正在主持与学生对话的陶斯亮手中。戴晴于是向电话那头的“姐们儿”介绍了这个会议：

“我向她讲了这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她学者们打算出面对最激烈的学生代表作点工作试试，请她向上报告，并联系谈话地点。放下电话我即回到会议室。”

不久陶斯亮打回电话，说人民大会堂有困难，谈话地点定在国务院信访局。这时，从不问政治的李陀立刻敏感到这一安排有名堂，他说这是一种降格，表明政府根本不看重我们的这次效命。戴晴记得，当时就有在场者劝他，不管政府如何，我们已尽我们之所能，我们自己的良心就平安了。

“正在这时，陶斯亮又打电话来：‘阎部长要跟你们讲话。’接着，他的声音传来。我捂着受话器喊了一声‘阎明复’，屋子里安静了下来。我大致讲了一下经过，并将学者的名字一一报出。由于我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以组织人的身份出现，觉得此刻阎明复应与真正的学者代表亲自谈才对头。

我说了声‘请等一下’，就将话筒……我瞥了一眼学者们，我很想将话筒交给李泽厚或刘再复，因为他俩在国内国外影响最大；我也想递给李洪林，因为他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一名老资格党内理论家。但他们都离电话机很远，唯有迟到的严家其正站在电话近旁。我将话筒递给了他……

我的印象，在电话上，严家其讲的比阎明复多。这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学学者，历来就是一个长于阐发而不大会倾听的人，在这一时刻，这个特点依旧十分突出。”

阎明复的电话委托戴晴向各位转达了慰问与拜托之意。但却引起在座的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一插曲，使人怀疑有特殊背景的戴晴是否事先秉承了官方意旨，在利用知识分子。因而，反而削弱了温派意见在“呼吁书”中的份量，由“苏派”立场向“严派”倾斜。

下午5：09分，在哭泣和感情失控的大笑交替出现过后，呼吁书终于被通过。

散会后，《光明日报》派了一辆小巴士，接各位到国务院信访局与谈判无果的学生代表见面。

第五节 艰难的对话

就在《光明日报》12位知识分子陷入感情激动的漩涡时，统战部与学生的正式对话也陷入僵局。据项小吉回忆：

“（5月14日）下午政府派大客车来法大接对话团去统战部对话，按计划本来只打算去20人，结果对话团全体成员都想去，就都上车去了。”

“到了统战部，我先去会议厅看会场布置。我首先反对会场的布置，要求改成谈判形式，双方面对面坐，而不是台上台下坐。政府同意，重新布置会场。工作人员觉得我很厉害，敢向政府提这种要求，平起平坐。”

“会前我再次确定对话要电视直播，郑幼枚说实在困难，因为电视直播车已调往首都机场准备迎接戈尔巴乔夫。我说那好办，我们去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对话。郑不同意。中央电视台一位副台长悄悄对我说直播没问题，只要中央同意。”

“后来我和郑达成妥协，现场直播改实况转播，在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播出。”

这次正式对话，在统战部二楼的会议厅举行。官方出席这次对话的，除主持人阎明复外，还有李铁映、尉健行、刘延东、郑幼枚和国务院的12位副部长。学生“对话团”的43名成员，则由正副团长项小吉和沈彤带领，12人坐在前排。“绝食团”则有北高联代表吾尔开希、王丹、柴玲等5人出席，北高联的梁二等也在座。

据柴玲回忆，此前，她和绝食的学生作了一些沟通：

“学生这边知道的消息是，现场直播因为广场没有电视，没办法看到。但是广场的喇叭是可以用的，由于技术性的问题，把对话的记录直接送到广

播电台需要一个小时。在晚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同学还是答应，只要能够听到现场直播。”

图5-14：“妈妈我饿……”

此时，她虽然身在统战部，忧心的仍然是广场：

“绝食抗议已经进行了超过 24 小时了，我们在广场上的第二个晚上即将到来。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对话过程中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共识，我要如何去帮助抗议的学生去渡过另一个饥寒交迫的夜晚呢？我收起了一些横幅，特别是那个写着‘妈妈，我饿了’的横幅，还有含有我录下的绝食书的磁带。我们打算让政府在中央电视台直播我们和政府间的对话，这样全国的人民就可以做见证，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把我的录音带在全国电视台上播放，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行动。”

对话于下午4：20开始，晚上7：15中断，历时近三小时。

对话开始后，阎明复和项小吉先后发表开场白。之后双方代表轮番发言。柴玲回忆道：

“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谈话的话题，而且大家似乎都准备好了台词。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把他们在校园间的辩论时学会的技巧派上用场。

阎明复已经提醒我们，不管绝食抗议学生们是否离开天安门广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可能不会在天安门举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只能和部级干部谈话，而不是和赵紫阳或者李鹏。……

绝食抗议学生代表坐在学生代表团的后面，直接面对着政府的部长们。我们肮脏的衣服，憔悴的脸庞，写着‘不自由，毋宁死’的白色头巾，和干净整洁、衣衫楚楚的官员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很严肃，甚至很沉重，平静地站着，尽管我们已经24小时没有吃饭，也基本上没有合过眼。……对

话一开始是仔细的、衷心的、真诚的和互相尊重的，但是最终还是避免不了面对实质性的问题。”

双方在学运的定性问题和“动乱”的摘帽问题上短兵相接。据当时被派往参会的《人民日报》记者事后向报社汇报：

“总的印象是：受命于李鹏的李铁映等人坚持不得在学潮性质上让步的原则，在对话中老处于被动地位，老在‘让实践来检验’上面兜圈子，给人的印象是缺乏诚意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阎明复发言，表述了得到胡启立、赵紫阳首肯的观点。但当他离开会场上厕所的时候，李铁映等马上声明阎的发言不代表中央意见，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才代表中央的意见。”

在谈到“清场”问题时，阎说：

“党是人民的政党，不可能用武力来对待学生，你们不撤也没关系，戈尔巴乔夫明天来访，就让我们丢丑吧。在外国，接见国家元首还有人扔臭鸡蛋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适应特殊情况。但是，我也只能为你们说这一句话，而你们，也在人民面前丢了一张牌。”

据柴玲回忆：

“后来说，既然这个对话的机会是绝食团同学争取来的，要不要听听绝食团同学怎么讲。开希说了几句话后，说‘我这边有一个绝食同学写的一封信。’程真马上就站起来念《给妈妈的一封信》。我当时一听那个惨呀！我觉得写得是挺好的，非常感人，但是没有把更深的、思想上的东西写出来。而且开希根本就没有跟我们商量，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很好沟通的机会。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也哭了。唉，我就痛苦得要命。”

据沈彤回忆，当时，在场的13位正式主谈代表和后面的列席代表的绝大部分，包括政府方面的阎明复和李铁映本人都哭了。

此后，对话团代表熊焱直截了当地问阎明复：“你到底是如何看待学生运动的？”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阎明复看他有何反应时，阎明复以异乎寻常的口吻说：

“我自己很希望说你们是爱国的，但是我不能这样说。”

当熊焱失望地追问道：“为什么不能呢？”时，阎明复再次痛苦地看了大家一眼，考虑适当的措辞。当他对着希望和沉默中的人们正欲开口时，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撞开了，从走廊里传来：“打住，停止对话！”的喊声。喊话人是从《光明日报》出来的王超华。

柴玲回忆道：

“我们大家都震住了，纷纷向门口看去。在门外，几个学生大吼到：‘我们不能像你们保证的那样听到直播。对话必须结束。’”

“阎明复似乎和我们一样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没有直播呢？’他问他的副手，‘我还以为刚才是在直播呢。’”

“当副手到边门去看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整个屋子陷入了沉默，那个很宝贵的和阎明复的深层次的交流机会已经失去了。” 据项小吉回忆，此时统战部大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不断冲进来，他不断离开会场出去劝阻学生，并请沈彤主持对话团的发言。

王超华事后回忆说：

“5月14日，（在《光明日报》）因为我头一天没劝动柴玲，我就强调说，你们一定要设法先找到绝食最坚决的这些学生，和他们取得共识之后，再到广场上去对广大学生讲话。这是我希望他们先安排见这几个学生的原因之一……在那个会场马上就打电话跟人民大会堂联系，都是戴晴打电话。”

“然后他们开车送我回统战部，这时六部口往北已经都是人了。车开进去就看见北大一个代表，好像是我告诉他，马上找柴玲他们这些绝食团的骨干去见知识分子。

当时沈彤和项小吉他们已经下来一回又上去，又下来一回，这些绝食学生就是坚决不干。‘停止对话，立即现场直播’，有人在那喊。我就在那儿说，‘大家不要冲，统战部那儿没有军警，就是一个大客车挡在门那儿。’后面项小吉他们在那儿说着，又上去了。我说：‘这样吧，如果都进去的话，是说不清楚的。我进去替你们转达这个好不好？’……我进去就大喊：‘不要对话了。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阎明复当时一惊，马上接着我这个话说了一句‘那怎么样？咱们还要不要进行？’。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从12日一直到这会儿，假如我们不能控制绝食学生的话，这个对话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而且我从12日和戴晴接触，到13日早上所有这些接触，我当时已经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这个对话之所以成，就是因为有绝食。所以我才进去冲的。”

王超华带来的惊扰尚未结束，一贯态度温和的沈彤突然也变得情绪激动起来：

“王超华进来大闹会场。项小吉当时在外面调解，我当时拍着桌子站起来，指着阎明复说，‘为什么答应了直播不直播？’阎明复、李铁映、当时的其他12个部的副部长和郑幼枚是政府方面的对话代表，他们都觉得应该是在直播的。”

据此，沈彤认为，政府内部有人在阻止直播。他似乎忘记了，官方承诺的只是实况转播。但连这也没做到。

第六节 找不到党

时隔多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依然在讨论，致使这次“正式对话”失败的原因，究竟是阎明复不守信用还是学生不守信用？陈小平的回忆，为拼齐这最后一块模板，提供了一个存疑的色块：

那一天，陈小平不知为何没有参加这场正式对话。当他被寻找了他一整天的社经所毕谊民找到，并用车送到统战部时，他看到的只是人去楼空的场景。但要不是他的晚来，他不会经历一个意外的惊喜：他看见，在对话的小会议室隔壁的大礼堂里，电视屏幕上正放着与学生对话的场景：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穿过礼堂的时候，我看到的礼堂已经完全不是我第一次来这儿目睹的井然有序的样子。这儿到处是散乱的凳子和桌子，上面有未吃尽的食品，还有躺在凳子上打鼾睡觉的人，他们像是在这儿‘斡旋’了一整天时间。……进入房间后，我看到电视上正在播出阎明复等中共领导与学生的对话……广场上的学生几乎都不知道直播的事情。”

有人在从中作梗？这正是广场上的学生被拉到统战部来的原因。难道说，此时与胡耀邦追悼会后一样，政府内有人再次利用技术手段——利用全国电视播出与广场播出的不同步，在学生面前做了手脚？

事后，项小吉的回忆，为我们最终拼齐了这个魔板：

“7：30新闻联播结束，广场学生没看到实况转播更加气愤，王超华带一批学生冲进会场要求立即停止对话，我不同意，但也无法阻挡了。”

“阎明复很气愤，问郑幼枚为什么不转播。郑幼枚回答录像带送不出去。我出去看了，送录像带的吉普车是无法开出统战部大院，但真想送录像带去中央电视台肯定是做得到的。从5：00到7：00先送一部分录像可以做到。”

“陈小平看到的可能是现场中央电视台记者刚拍完的录像带，他们拍一卷看一卷，有好多卷。”

由此可见，政府并没有兑现哪怕是学生已经退后一步的要求：转播对话现场。但是，学生对统战部的包围，为这一违约提供了口实。

那么，这次“包围统战部”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事后，在巴黎举行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上，常劲的回忆为我们拼齐了另一个事件的最后一个“色块”，常劲说：

“我补充一点跟对话有关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5月13日、14日广场上断水的事实。13日、14日我没有去广场，14日早上有同学到北大找到我们，说广场上同学没水。我到学校去求他们送水。然后我送水去广场，一看大家情绪非常激烈，因为没水喝，很多同学很渴。我送了一罐水去，大家欢呼雷动。

第二个，5月14日我到了广场以后，北大广播站建立起来了。当时广播站播送了两个消息，一是让各校学生到广播站附近集合，然后一起到六部口统战部参加对话。在召集学生代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百多个学生上去做与政府对话谈判的代表。第二个是过了一阵子以后，有人在上面说：‘请同学们到六部口去增援对话的学生，有人要出卖学生。’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大批的学生集中在六部口，开始时六部口没有多少人。那一阵，人一直哄哄闹闹的，很多人就拉到六部口去了。”

这个广播站是辞职后的封从德，为健全广场指挥系统和传达“对话直播”信息而匆忙筹措建立的。此前，他因电脑再次瘫痪而重新卷入学运，孜孜于校园民主园地的建设。妻子的出山，令他也曾考虑是否要参加绝食。但他害怕绝食后体力不支，没有了“跑前跑后”的能力，便加入了“陪绝”的行列。据封从德事后解释，此番对话代表与绝食同学缺少沟通，晚7：00，阎明复承诺的“语音直播”、郑幼枚承诺的语音实况转播和《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也

没有实现，大概还有妻子去后杳无音讯的原因，是广场前后派出三批代表，声援、探问和最终“中止对话”的原因。

柴玲离开统战部对话现场后，了解到同学们的来由：

“他们是听说一个小时以后一直没有消息，怕再受骗，所以全部都来了。等我去了以后，同学还在那儿。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外面等，看还有没有希望两边协调。”

据说，当时在统战部内部的人以为，对话“中断两个小时之后，解决了直播技术问题之后，可以继续进行。结果没有进行。”

在所有学生中，最痛苦的应该是项小吉。事后，他回忆道：

“对话破裂，双方离开二楼会场，来到一楼休息室。学生冷静下来，又想恢复对话。我去找阎明复谈，阎正在吸氧，他对我说你去会场看看，中央领导和新闻记者还在吗，如果在我们恢复对话。”

“我到二楼会场，一片狼藉，人都走空了。我下楼告诉阎明复。阎和我默默地坐着，很久没说话。我们都很痛心。对话很重要，对话来之不易。这一夜，八九民运开始转变。”

“这时统战部副部长宋琨找我去谈，我从不单独与政府谈话，我带北师大的罗健去了。”

“宋琨问我，你们学生到底要什么，中央好不容易同意对话，你们又要求停止对话。我说责任也不都在学生这一方。如果按时直播或转播，情况不会是这样。我的心在流血。”

据事后学生自办的报纸《新闻导报》报道，这次对话以学生代表递交了一份包含5条内容的声明而告结束。其中包括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和不对运动参加、同情、支持者打击报复等“最低要求”。

下一个节目，轮到在《光明日报》厉兵秣马准备了一个下午，后来又到中办信访局补充了粮草的12位知识分子出场了。

第七节 失败的斡旋

据戴晴回忆，从信访局出来的12位知识分子，并没有直接前往广场，而是先到了国务院信访局，然后是统战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那天是平日最为繁忙的国务院信访局唯一的一批来访者，局里的值班人员已得到通知，很郑重地接待，千方百计满足我们的要求，无论是打电话、复印、还是派车。一开始，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大约有20多个座位的中会议室，打算在那里等候学生，茶水等等也已经送来了。学者们坐下后，忽然觉得很不安，因为我们12人，加上随队的《光明日报》记者，已剩不下几张空椅，学生来了怎么办，谁站着？难道是绝食的同学吗？我于是又出面联系，信访局方立刻打开他们那座建筑物端头一间权充库房的大屋子，学者记者一齐动手，摆桌子、铺台布，布置起一处使谈话的双方都觉得平等亲切的环境。

陆续有人赶到这里，包括外国记者。我于是一趟趟被叫到门口，辨认他们，决定谁可以放进来谁不可以。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晚霞已经布满天际的时候，统战部的面包车送来了十几名头上扎着白带子的青年。他们不仅神情异常激动，还非常焦躁。我因为来来去去地忙着处理杂事，没有听到学者们如何劝说，待我回到大会议室的时候，发现这些青年其实一点都不固执，基本上已经‘完全同意’老师们的见解。‘老师们说得都对，我们都同意，请老师们直接和同学们谈好不好？直接和大家见面。’”

以后，12名作家学者和学生代表一起，全部挤进原已被学生塞得满满的小面包车，“一路摇着白头带，举着象征胜利的两根手指‘V’”，开向被包围的统战部。

“统战部院内满是人，大部份是学生，也有记者和别的人。应该说，与我们同车回来的学生领袖，还是有一定的张罗能力的，他们很快将散落在四周的人召集在一起，然后把‘老师们’一个个从车上叫下来，到圈内去讲话。……我只记得，我被接下车，塞进圈内。我不知在我前边下车的学者们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我后边的人会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在信访局的大会议室里，双方是怎么谈的。我只记得我站在圈中反复强调的是：为结束今天的局面，双方都要让步，政府先让，同学们也要让；至于条件，如果同学们相信我们，我们愿向政府方面作一试探。

可能李泽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场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他们决定撤离统战部，请老师们到广场去与广大绝食同学直接见面，我则被推举走进办公楼，将《紧急呼吁》交给工作人员之后，作为学生方的代表与阎明复部长会面。

那是5月14日下午7：00的样子，他正坐在统战部大餐厅里一张杯盘狼籍的餐桌旁。餐厅里四、五张餐桌都是这样，看来在这里用餐的人很多，服务人员已经来不及收拾。席上没什么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快餐。

阎明复神情焦虑。他甚至来不及跟我寒暄几句，劈头便问：‘广场上的同学撤出，起码暂时撤出，什么条件？’

我将我们的《紧急呼吁》递给他。‘领导人亲自出面宣布，承认爱国民主运动，学生组织合法等等。’我说。‘这是不可能的！’阎明复说。

‘可他们总得露个面，这么僵着算什么？’

‘如果不附加种种允诺，我尽力劝他们出来。’

‘谁出来？’

‘赵、李，还要谁？’

‘出来以后呢？’

‘不能再附加条件，这已经是今天能做到的极限了。’

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么？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谈判过。

‘我们去试试，我们愿意去试试。’我说。

‘好。’阎明复说，言语之间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

当时，阎明复给戴晴的“底线”就是领导人可以到广场去站一站，问候“同学们好”，此外什么也不可能说。临走时，他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如果学生不撤，这一回赵紫阳就完了！”

身负沉重使命的戴晴回到学者中时，大家已准备好前往广场。

5月14日晚8：40，当广场传出清华学生拟于当晚撤出，北三环路上出现坦克的消息时，绝食团的广播宣布：温元凯、苏晓康、刘再复等12位学者将步行到达广场看望大家。

还没有弄清学者来意的学生顿时发出一片欢呼之声。

晚9：00，一篇由12 人签名的题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广播站宣读：

鉴于天安门广场的情势，我们十几位学者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发出如下紧急呼吁：

一、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学潮的学生“秋后算账”。

二、我们认为，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是合法组织，政府应当承认。

三、强烈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亲爱的广大同学们：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从4月中旬以来，你们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以令人钦佩的理性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1989年春天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宝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我们相信，同学们能够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断。

但我们郑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面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紧急呼吁》宣读完后，温元凯、苏晓康、戴晴先后发表了演讲。为了使学生接受撤退的意见，讲演者根据各自家庭教育的经验，大大褒扬了学生在前段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像苏晓康这样名噪一时的“大才子”，居然称：“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如何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聪明得多……正因为如此，大家要讲理性，要教会他们……”

从他们热烈崇拜的人物嘴里，听到这番溢美之词，使有自知之明的学生们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戴晴则说：“自4月15日到今天，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觉得非常大，如果没有你们（从4月）15日到今天的活动，我们决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局面。”

事后，这段录像在戒严部队录制的宣传片《血与火的考验》中播出，并被说成是鼓励动乱，给绝食学生撑腰打气，火上浇油。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赢得学生好感的策略。她的真正意图是她在座谈会上所说：“打得出去”还要“收得回来”；“要给改革派机会”。事后她接受《读卖新闻》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解释了她的思想：

“学生们有很好的个人素质，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责任心、爱国热情、牺牲精神、组织能力等方面，可是他们却缺乏现代社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足够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每个人是有自己的角色的。比方说我是个主角，站在舞台上，当我把剧情推向一个高潮后，我就要退下去，由一些配角上来表演，如果需要的话，我再上来。”

戴晴希望，由知识分子绝食替换下学生。但当场有人质疑，知识分子是否想“摘桃子”。

5月14日广场上的学生，显然没有完全领会戴晴不便明言的苦心。但他们的“素质”决定了，其警觉性并没有因饥饿而麻痹。当戴晴进一步引诱学生进入“圈套”时，原以为来声援他们，所以一个劲地对讲演者叫好的学生，开始转变态度。等到戴晴说出，学运的性质和学生自治组织又何必要政府承认？“考虑到领导们的水平有限，只要赵紫阳或者李鹏到这个地方来站一下，不说什么，大家就撤好不好？”他们终于发出了不是配合的声音。

那天晚上，笔者也在广场人山人海的学生中间，对北大这位女生的记述深有同感：

“14日夜，怕警察清场（因戈尔巴乔夫来访），各校差不多都倾校出动。绝食团外总有近10万人。说起来挺严肃的‘革命行动’，实际上，大家坐在一起，聊聊中国的民主、政治、当前局势、民主前途，满有政治沙龙的味道。”

严家其没有发表讲演，而是在学生领袖的簇拥下走进绝食圈，频频向同学们问好。

此后，绝食团广播站再次播放了柴玲5月13日念的《绝食书》录音（部分）。

10：55，一位北大博士生说道：

“我代表北大广大的博士生。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将在历史上留下新的一页。我认为，我们面临一个前进还是后退的最紧急关头。我认为现在只能继续前进！（‘众欢呼：对！’）这次民主运动的过程证明我们不能犹豫。四二七和五四游行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软弱了一点儿！我们必须坚强起来。我认为，明天早上，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斗争，就是坚持我们的阵地！（众欢呼：好！有人喊：一、二！加油！众喊：坚持！）所以请广大市民留在这里坚持支持我们。（众鼓掌：好！有人喊：一、二！众喊：坚持，如是十几遍）如果我们退却，将意味着民主运动的失败。我认为我们的两条要求并不过份，我们是理性的。（有人喊：对！）刚才，12位中年知识分子，他们……我很珍惜他们对绝食的思考……，提出了两点要求，我们感谢他们。但是我也想提出一点：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坚持我们的两点基本要求。（众鼓掌：对！）因为，他们的两条，第一条，在《光明日报》上登他们的发言，我认为是体现了新闻自由的初步的进步，但是，问题是，这是他们，不是我们！（众鼓掌，欢呼：对！）第二条，关于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和李鹏接见我们，我认为，我们希望他们接见，但是我们并不坚持这一点，因为我们不需要做表面文章！（众齐声高呼：对！鼓掌）我们不要形式的东西。我们在镜头上看赵紫阳和李鹏看得太多了！（众呼：对！鼓掌）如果他们要见我们，可以，只希望他们说一句话，就是‘你们是爱国的民主运动’。（众齐声高呼：对！鼓掌）李鹏不是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众齐声高呼：对！鼓掌）坚持就是胜利！今天下半夜到明天早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但是我认为，政府不会采取暴力行动。我认为是这样！（众呼，它不敢！）

我们必须坚守阵地。明天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欢迎仪式，他们一定要进行的话，也不一定非得在这个地方。过去有过先例。在人民大会堂里面。我们必须给他们一定的压力。对于反民主的一小撮顽固势力必须用力量来教训！（众齐声高呼：对！好！鼓掌）我们不希望流血，我们反对流血。但是这个流血，不是我们造成的！（众呼：对！鼓掌）如果流血的话，那么这个血在中国的历史上将写下一个大写的‘人’！（众呼：好！鼓掌。有人喊：‘教训他们！教训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希望领导者和组织者，应当进一步，发动广大的学生来声援我们，发动市民来支持我们，坚持我们的运动，实现我们最后的（不清）。感谢市民，工人阶级万岁！

市民齐声反复喊：一、二！学生万岁！（如是几遍）”

晚11：10，当12位学者撤离广场时，广场上“自由论坛”评论了他们的行动，不友好地称：“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已经走了，有的找政府去了！”

“绝食团发言人”提醒同学们注意：

“他们的条件与我们的条件是有距离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我们的答复是：就是绝食的这两条。这是我们的誓言。我们坚持我们的两条，最基本要求。第三个问题：现在对话是否还在进行？答复是：自从对话休会以后，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另外一个情况：今天，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急救中心的院长率领着他们救护队在广场上努力认真地为我们大家服务。（众鼓掌）众人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斗争到底。”

据绝食团广播站报道，截止5月14日晚11：50，绝食35小时，共有7名学生晕倒。

不久，香港“专上学联”代表在绝食团广播站发表讲话，表示对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并声称带来了捐款。

之后，“对话团”代表熊炎带回了统战部对话的“最新消息”。他说：

“同学们，政府对于对话毫无诚意。现在，北高联、对话代表团、绝食同学代表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一切的要求以在场广大同学的要求为准。另外，对话代表团仍在休会。政府对‘现场直播’这个条件，他们不予接受；同时，我们所提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对这次学生运动的定性予以纠正，他们也说他们无权。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下不清）。对话代表团仍在休会，请大家继续耐心等待。”

紧接着，封从德主持的“自由论坛”继续。两位北大研究生代表对坚持广场发表了反对意见：

“北大研究生代表：各位同学，我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硕士生。我们几个硕士生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我们感觉到，12学者的意见是非常非常的理智、非常合理的。我希望筹委会的同学能够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否则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有人反问：人家不跟你谈，你怎么办？）我认为，如果《光明日报》明天能够全文登出他们12名学者的意见，这是取得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进步。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可以的话，筹委会的同学应该把12学者重新请回来，通过统战部陶斯亮同志进行对话。”

另一名北大研究生的发言支持了他的看法，并认为12位知识分子“他们的两条和我们的目的不矛盾。他们的两条，我们明天就可以达到实质性的结果”，但是，在听众席不断发出的“下去！下去！”的哄闹声中，他的发言没有讲完。

接着，一名自称当过坦克兵的男生请大家保持安静。他说：

“任何人的讲话都只作参考，只代表个人意见，同学们都在提倡理智。我认为好多观点都可以考虑一下。某些人某根神经有毛病的话，作出错误决定的话，希望大家保持冷静，我以前作过坦克兵，坦克车最要害的部位是瞄

准镜。（众笑，欢呼）” 此后，王超华以“北高联”常委身份发表讲话。她说：

“同学们，由于政府现在这种态度……作为北高联的常委……我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准备。现在北高联，对话代表团和绝食请愿团以及广大声援的同学，以及市民们，和各校的教师声援的行动，我们现在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们的基本态度也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众喝彩：好！！！！）”

15日凌晨00：50以后，一队“市民声援队”来到广场，广场上爆发出“特别热烈”的欢迎声。市民代表发言称，他们“绝不能让绝食的同学受到伤害”：

“我希望没有充份心理准备的人（不清）尽快离开现场。（不清）但是我认为，如果政府还有理性的话，他是不敢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前夕，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众呼：对！）但是，我请大家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大家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前排的同志，（不清）是最重要的。你们往外一撤，我们都往外涌，我们绝食的同学就（不清）……”

发言者担心，没有心理准备的人在突发事件中产生慌乱，慌乱中的奔逃可能发生踩踏事故，而其中受伤最重的很可能是已经体力不支的绝食学生。这个谈话，对催生广场统一纠察队的建立起到重要的提醒作用。

之后，与工人、市民的信息交流和观点讨论，陪伴着绝食学生度过了第二个不眠之夜。

据梁二回忆，他和王超华动员12位知识分子前来劝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能够在戈巴乔夫来之前把学生挪一下或是转移一下；第二个目的是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军队和政府会在当天晚上实行一种强行的镇

压，把部分同学绑架出广场的那种清场的行动。所以我当时曾经很明显地提到，以后跟超华也提到，就是那天晚上请知识分子来实际上带有一种对不起知识分子的险恶用心，就是让知识分子留下跟咱们同甘共苦，一块送命的态度。”

但知识分子懂得，只有活着，才能奋斗。他们离开广场后回到统战部的经历，正好被迟到的陈小平目睹：

“这儿到处是稀松散乱的人群，没有人组织，人群分散在大礼堂、小会议室和过道里，只见到对斡旋起很重要作用的陶斯亮……”

“我进入小会议室之后不久，这儿的工作人员开始清场。很显然，他们内部有一个名单，陶斯亮和这儿的工作人员开始按照这个名单决定哪些人应该留在统战部的小会议室，哪些人则不应该留下。待清场完毕，房间里面剩下的人只包括周舵、李洪林、包遵信、于浩成、董XX等后来倒霉的清一色的我认为是‘黑道’上的知识分子代表，大约有15人左右。一会儿，李铁映推门而入，他在与每一个人握手之后，只是说谢谢大家。我记得李洪林、包遵信等当着李铁映的面，措辞强硬地谴责政府不应该固守‘4、26’社论的结论，从而导致学生在戈尔巴乔夫访问的时候，学生们仍然占据天安门。而李铁映则是针锋相对地站在维护‘4、26’社论的立场与他们进行了一轮简单的辩论。随后，李铁映离开这间会议室。到位于过道尽头的电话间打电话。”

“我第二次去统战部，似乎只看到知识分子‘斡旋’的一个尾声。而李铁映的握手道谢似乎是在向当时‘斡旋’的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说‘再见吧！斡旋！’在当天晚上，只是在李铁映握手道别之后，我见到从外面匆匆赶回统战部的阎明复。在目睹陶斯亮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我看见陶斯亮的脸色立即沉下来，我很快发现在他的脸上笼罩着一种不祥之兆。此外，阎明复几乎没有时间与小会议室内外尚在的‘斡旋’代表打招呼，而是直接到走廊尽头的一个电话间，在那儿跟一个似乎比他职位还要高的人打电话。我

经过这个电话间的时候，只听到他在电话中似乎在以请求的口吻说：‘请多准备一些担架！’

从李铁映下逐客令——握手道别，到我看见的陶斯亮的脸色，最后到阎明复在电话中的哀求，我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局已经决定在这天的凌晨3—4点钟学生处于最疲劳的阶段进行强制清场。”

“对话”已经失败，知识分子从“斡旋”中收获的只是徒劳。剩下的事情只有学生自己解决了。但是，当时的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营地，尚没有出现统一的组织机构。据柴玲回忆：

“当时我们基本的认知是：可能在5月15日之前政府会有一个基本的表态，没有想到绝食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所以当时基本上还是绝食团各学校召集人协调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15日上午绝食团指挥部成立之前，一直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

在12位知识分子离场后，绝食团广播站发出通知，各校召集人在纪念碑北侧“绝食”黑旗下集合，开展了第一场“撤与不撤”的大辩论。此后，64位代表就此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是：46人投票主张不撤，7—8人主撤，其余弃权。表决结束，已是5月15日凌晨2：00—3：00。

虽然学生们当日并无长期作战的打算，但这次会议奠定了此后广场学运最高权力机构——“营地联席会议”的组织人事和议事规则基础。

图5-15：封从德制作的“绝食”黑旗

也许是在统战部听到了“凌晨3—4点钟”政府将“强制清场”的消息，吾尔开希赶在这个时间，从温暖的统战部会议室来到了广场。他从封从德手中接过话筒，声音打破了寂静的夜空：

“我要讲几句话。同学们，我求求你们了。我们是要民主的，但我们要爱国啊！我们在这占据广场，阻碍高峰会谈，是国家的耻辱。所以我请求大家移到纪念碑东侧。”

按王超华、梁二、王有才等人的回忆，自5月13日吾尔开希、王丹以个人名义参加绝食，他们已不能代表“北高联”发声。但吾尔开希的个人请求，在疲惫、饥寒的学生身上发生了“神奇”的效果！已经绝食近40个小时的学生，与陪伴他们的后援队伍一道，拖着沉重的身躯，提着各自的衣物、棉被，将营地移到天安门广场东侧，为当日即将进行的欢迎戈尔巴乔夫来访仪式腾出了空地。

此时，已经感到无用武之地的对话团成员王德邦看到这种情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据柴玲回忆，发生效果的似乎并不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而是困意：

“……那个时候广场上还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多数学生并不喜欢在没有和学生代表商议之前就突然用喇叭向学生们喊话，发号施令。但是没有人愿意在饥肠辘辘的早上4：00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学生们站了起来，拿好他们的物品，步履艰难地走到广场的东边去。我看到这个情景心都沉了。绝食抗议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女孩儿，她们看上去是那么弱小。就像黑暗里随风飘零的落叶，有的闭着眼懵懵懂懂地跟着走。一旦她们到达了绝食抗议的新地点后，她们马上就瘫倒在地，被睡意再次吞噬。”

在这次变动中，一直保持完善自治组织系统和协调行动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营地仍在原地岿然不动。吾尔开希的本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没有响应呼吁。他们的营地均在纪念碑的正北。

政府没有清场。

事后，吾尔开希因这次给广场带来的混乱，他的职务被北高联常委会议罢免。而陶斯亮则问陈小平：“你是否知道你带来的学生领袖在他回到天安门广场后是否还是学生领袖呢？”陈小平承认：我几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图5-16：5月15日才成立的“绝食团指挥部”成员

“对话”和斡旋失败，对话成员与绝食学生缺少沟通、广场并未形成统一指挥似乎是一个关键。学生亦检讨说，当时的绝食团，只是各校召集人协调行动的一个松散的组织，并没有权威。言外之意，当时学运领袖的“代表性”是一个问题。

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斡旋失败的“中间人”和统战部用以搪塞领导和社会舆论的“伪问题”。因为在代表性问题背后，“公正”诉求是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四二二”和“四二七”均是在各高校并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组织和行动计划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这不仅因为对“公正”的诉求本身具有号召性和凝聚力，还因为政府方面对于这种“公意”的尊重。同样，“公正”也是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的每一个人的根本诉求。我们不可能设想，北高联、对话团代表的不是绝食学生的心声，相反，他们最怕的就是不能反映绝食学生的心声。换言之，在不为学生运动正名、不满足学生合理有限的对话条件的情况下，即便政府直面绝食团全体成员，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这场斡旋与对话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是主持对话的政府代表无法打通“两个中央的声音”，即执政党首先没有形成共识。换言之，即陈小平所说，党内温和派在力量对比上不占优势。否则，历史将无法解释，当阎明复已经开启统战部与广场学生对话的机制后，学生在明显输理的情况下，为什么社会支持度不减反增？以至于一场纯粹的学运，就此变为一场全民民主运动呢？

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公正”。

5月15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节目报道了12位学者的《紧急呼吁》。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按惯例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欢迎。他的车队，离开了仓促之间没有铺上红地毯的首都机场，径奔钓鱼台国宾馆去了。

首都知识界从此告别了它的超然态度，卷入了汹涌的长安街人流。

翌日清晨，封从德从饥寒交迫中醒来。从广播站穿过横七竖八躺着的身体，去人大会堂东侧上厕所。那正是中央广播电台早7：00“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广播时间。

“我惊奇地听到官方对绝食的正面报道：多少学生继续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如何请愿等等。我感到十分振奋。这可是全国都能听到的新闻联播！”

虽然美国之音、BBC等广播也能听到，但因是短波，又被当局定为‘敌台’，在大陆收听的人并不多，且主要限于学生、知识分子阶层。当局新闻联播正面报道学运，意义非同寻常。除了覆盖面很广以外，因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它播出绝食的消息，多少带有承认的成份。

我感到十分鼓舞，更相信我们在广场上坚持下去，可以唤醒民众，而要解决问题，必先暴露问题。”

无疑，官方的开明和社会各界的声援，给饥寒交迫的学生带来了希望。

第八节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知识界与学生运动向来有着血肉的联系。

自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以来，它就密切关注着学潮的发展，部分人士已经开始积极干预。下面，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行动的轨迹：

4月17日，当天安门广场出现第一个由大学生送来的花圈时，中国人民大学贴出了以“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名义写的《几点建议》。其主要内容：

一是建议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花圈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并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二是号召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

三是要求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

4月19日，同样是人大校园里，又出现了以“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名义写的《告同胞书》，警告学生“无组织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你们必须在法律的保护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行动”，同时，还号召将同学们组织起来，走向工厂、街头，唤起工人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有抛头颅、洒热血的“五四”精神，为民主、自由，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献身。并提醒学生“要明确目标，不可四面出击”。

较之前一个《建议》，这张大字报充满了更加互相矛盾的精神和目标不明的暗示。当晚，便发生了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

与此同时，北大成立学生自治筹委会。4月20日凌晨1：00，有人在会议上假传“北大未来学会顾问”金观涛对学运的“三点意见”：

（1）认为现在形势很好；（2）北大、清华的学生要联合行动；（3）要采取非暴力行动。

会后，两校就商讨了联合行动的问题。

4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远志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王润生策划，由包遵信、北岛、苏晓康领衔，有47名作家、学者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归纳了学潮要求，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建议。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可能出现的学潮低落提供了对策。

同日，作家郑义向学生领袖提出“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绝食，并少与方励之夫妇接近等建议。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师大青年教师自治会”贴出《运动向何处去——致广大爱国学生》的传单，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组织、宣传、纲领，然后是强有力的行动”，并提出以“持久战”为策略，以“罢课”为手段。

4月23日，北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发表了讲演。

4月24日，北大贴出147名教师签名的《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中国政法大也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给党中央的信》，指出需要“协商对话”，避免压服。

如前所述，因“民主墙”时期成立“中国人权同盟”、主办《中国人权》而入狱四年的任畹町，自运动开始就高度亢奋。4月21日至29日，任畹町多次到北大、人大、北京理工大和北师大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批评执政党是“专制”、“独裁”的“私利集团”，“长期侵犯和剥夺数亿公民权利”；批评社会主义“将通货膨胀的危机转嫁到全体劳动者头上，继续剥夺人民”；批评“我国法制和国家机器的职能在本质上是压制全体人民的”，“宪法不代表民意，人代会不代表民意，政府不代表民意”，“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能从宪法上消失，必将高悬于人民利益之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就是十足的骗局。并呼吁学生不要“坐而论道”，要“起而行之”，并再次介绍了“人权宣言”中“组成全新的公民委员会，代行人代会的职权”的思想。他还作了题为《四月民主运动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的演讲。在给“四二二”请愿和“四二七”大游行极高赞誉之后，将本次学运与文革后七次民间社会运动作了“道统一致”的评述，呼吁学运“改变党政一体、党法一体的一元化政治局面”，“以各地大专院校为基础，吸收代表民意的专家、学者、教授

及各阶层人士，参加组成全新的公民委员会，与人代会共同行使职权，改组政府，讨论修宪问题，酝酿新的党团，将几十年来书生论政，推向民主政治的实际操纵过程”。

4月30日，北大出现以“中央党校几位同学”的名义写的大字报，鼓动人们抓住有利时机 扩大战果，并说，“现在的形势是政府已无法实行军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对我们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数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舆论工具。”

5月3日，人大贴出未署名的《关于当前学生运动的目标策略的建议——立足校园，面向社会》，提出，要争民主，争自由，首先应该在校园内取得突破。

同日下午，“北高联”在北师大讨论“五四”行动方案，任晓町闻讯赶去，并要求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与历次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的演讲。

5月10日，包遵信、戴晴应人大工会青年部邀请，进行讲演。包遵信预言“四二七”大游行将会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进入重要阶段”。并希望大家尽快复课，然后考虑言论、结社自由等问题。戴晴则宣布，从1989年4月27日开始，“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就要结束了。”

5月12日，包遵信又应王丹的约请，在北大“民主沙龙”讲演。他让人们记住四个日子：1949年10月1日，国家独立；1966年6月1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在全国引起动乱，但也暴露出党和政府的教条主义，加速了人们对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的怀疑时代的到来；1976年4月5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事件，给老人政治划了一个问号；1989年4月27日，宣布长期封建家长制应当结束，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水平。

在论及民主化的具体目标时，包遵信说，当前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谈到“五四”，谈到对传统是否应当进行分析时，他说“当传统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板掀掉，而不是老考虑这个石板哪一块是好的，哪一块是坏的。”

——以上，是截止学生绝食前，知识界和民间运动人士的动向。当然，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活动并未见诸文字或公开发表。但从这个粗略的统计，对照学潮进程，人们大致可以看出知识界和民间运动人士与这次学潮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他们只是分散的、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作一些评论和政策建议；或就学生的谘询表示自己的观点；或希望通过学运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或许不曾估计到，有一天自己也将走上街头。

但现在，由于学生绝食，道义感的压力和新的民主社会的召唤，终于使他们决定公开站到这场由学生启动的、势必要成为全民运动的行列中来。

5月15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的当天，北京大学以张炳九、袁红冰为首的中青年教师成立了“北大教师后援团”。下午，便打着“北大教工誓与同学共存亡”的横幅来到广场。他们协助学生与社会各界和政府进行沟通，为年高体弱、行动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方便；同时负责交换各高校教师的意见和要求，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提供谘询，并担当起广场的纠察和与校方的联络工作。他们的游行队伍不停地喊着：

“数千学生、绝食广场，无能政府、没人相信（响应？），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北大教授、罢教支持，抗议政府、见死不救，师生同在、流血不怕，救我学生、责无旁贷。”

图5-17：北大党员教工在东观礼台扎营，誓与学生共存亡（陈小雅摄）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边走边握着学生的手说：“你们是中国未来，你们辛苦了！”当场有几位党员教师在东观礼台上宣布绝食。

继北大教师之后，中央民族学院三十余名青年教师组成的“绝食团”也开进天安门广场。

下午2：00，北京理工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声援队伍开进广场。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制作的一幅50多米长的横幅非常引人注目，上面写着：

“门前连日动地声，千呼万唤是民情，莫说学生不足论，满怀忧患九州同，健全法制唯民主，清除腐败立新风，治国贵民诚以信，何患天下不太平。”

北京科技大学的教师给学生营地抱来数十件棉衣，让同学晚上穿用。中央民族学院的二百余名中青年教师也打着红旗，在学生绝食圈内行走，以示慰问。

图5-18：5月15日中午，作者在广场（李曙光摄）

4：00左右，有人打着“全国万民声援学生”、“北京万民请愿团”的横幅走上长安街，有数百名工人、市民跟随其后。游行队伍中，一些人手挥工作证、工会会员证。邮电部、核工业部、中国银行等单位的游行者也打出了单位旗号。他们大都打着“声援学生”、“支援学生”一类标语，呼喊相同内容的口号。

当日，有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企业界及民盟等单位10万人次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下午的天安门广场达到“沸腾状态”。北京大学140名教授就南京大学教师倡议发表《声明》，敦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辞职。

这一天，到商店购买广播器材的封从德也第一次感受到被当做“上帝”的待遇：

“售货员一见我是广场上的学生，立即亲热起来，一边很殷勤地同我说话，一边迅速找我需要的货物。另一位售货员则递上一杯茶，要我喝了再走。她们工作时间不能去广场，显然是想从我这里听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也借此表示对学生的支持。

我藉此机会，宣扬了一番绝食学生的诉求，和这场运动的目标。一杯茶喝完，我急着要赶回广场，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放我走，又冲了一杯‘雀巢’咖啡，非让我喝了不可。这种咖啡在大陆很贵，但她们毫不吝惜，只希望我能多留一会，多与她们聊聊。临走之前，她们发现我的手脏得不成样子，又拉着我进里间的水管去洗。我买东西，她们用了一种极精细的方式包装起来。

我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售货员。运动之前，她们总是对顾客凶巴巴的。”

这一天，“中国知识界”终于打出自己的旗帜，走上了街头。

如前所述，此事的酝酿在绝食以前，新闻界请愿以后，5月10日自行车大游行当晚。郑义在《历史的一部分》中曾对其经过有所交代：

“过了人民日报，队伍解散。作家们碰到一起不易。我叫住苏晓康、赵瑜、王兆军、徐刚、徐星、陈建祖等人，到王兆军家去议议今后怎么办。……讨论结果定下两条：1、由苏晓康和我共同起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就目前时局的政治声明，搞一次知识界大签名运动；2、定下时间、地点，召开一个范围更大的各界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商讨怎样行动。”

后来苏晓康有事，起草了一半的文告由赵瑜转给了郑义。郑义“彻夜未眠，重新写了一稿”。知识界的会议，则于5月12日在鲁迅文学院附近的一家招待所召开。到会的有文艺、理论、新闻各界知识分子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三、四十人。会上，有人提议成立知识界的组织，但立即遭到否定。当郑义宣读他和苏晓康起草的文稿，并提出征集全国“大签名”后，会议一

致同意。“迟到的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痛快地把自已的名字签到第一个。” 包遵信在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5月15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五一六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5月12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

据说，开始是5月9日， 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筹组了5月12日的会议。……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五一六声明》初稿）。 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5月15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 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会后，苏晓康、郑义、赵瑜、老鬼带文告到严家其家征求意见，严将其定名为《五一六声明》。据严家其回忆，他们带来的文稿原题为《五月声明》，由郑义起草。严家其建议改称《五一六声明》，为的是“使邓小平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五一六通知》，同时引起人们对这篇声明的注意和重视。”

当夜，一行人在作家老鬼家对文告进行了最后修订，并打印了出来。

与此同时，其他人分头联络教育、科研、文化、新闻单位人士。新闻界对话组织者为保证自身的运作轨道，拒绝了邀请。

在5月15日游行开始以前，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们确曾怀疑过它是否能成为事实。许多人闻讯后，抱着“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兴门。包遵信等曾估计，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参加，最少能有几十人。加之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苏炜、李陀都参加了14日的斡旋，他们甚至临时发出了取消游行的决定。

但是，他们没想到，在游行的准备过程中，学生突然宣布的绝食和戈尔巴乔夫的来华日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对知识界进行了强有力的发动。郑义回忆：

“由北大出发的队伍有陈建祖指挥，以他的干练和威信，我们可以完全放心。……一路上人们向我们鼓掌欢呼。从北大到白石桥，路上满是带着旗帜标语的骑车者。我悬起的心放下一半。原以为在政府高压下去不了多少人，已和赵、陈等商量好，有几十人也游！特别嘱咐作家班一定准备几块白布，上书‘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现在看来多虑了。”

当天下午，他们来到复兴门，面对人山人海铺满望不到头的复兴门外大街时，连“总指挥”们都迷惑了。而这，仅仅是后来那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个“核”罢了！

下午2：30，在北大作家班制作的“中国知识界”巨大方幅引导下，知识界游行队伍从复兴门立交桥出发，经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队伍前列的知识界人士，严家其、包遵信、钱理群、王鲁湘、柯云路、郑义、赵瑜 均头扎布条，肩披授带，上书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写在白布上的《五一六声明》要点。队伍起初是20人一排，两旁有“北高联”派出的纠察队形成与围观者的隔离，前端是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队伍和各方组织、发起者组成的混合编队，然后才是各单位的队伍。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60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博士生、硕士生和其他职工，以及首都各大新闻单位的上千名编辑记者。有的还打出了单位的旗帜。据包遵信介绍，北大冯友兰、季羨林、汤一介等著名学者教授也参加了这次游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十几位老教授参加了游行。其中有两位教授打着一个横幅，写着：

“请问邓小平：我的孩子在绝食、挨饿，你的孩子在干什么？”

其他还有：“学运代表民意”、“不是动乱、爱国无罪”、“满足学生合理要求、正确评价学生运动”等口号。

中国科学院打着“十年了，老九还是老九”的横幅，喊着“老九老九，一无所有”等口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们打着“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横幅。另外一些横幅写有“穷教授”、“穷博士”、“SOS救救我们的灵魂”、“实验做不下去了”等。

《开拓文学》杂志的一个横幅写着：“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什么主义，人民幸福就是好主义”，“老年政治，早该结束”，“权力属于人民”，“要面包，更要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新闻记者要求新闻自由”。《文艺报》的横幅是：“新闻是人民的心声，不是一个人的喉舌”。“实行大选，修改宪法，声援学生，推进民主”，“报禁不除，官倒难除”，“愚民政策，该收场了”等等。

郑义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的场景：

“队伍在观瞻上超过了以往的每次游行，占据半条长安街，缓缓向前推进，极壮观。我和赵瑜一左一右走在《五一六声明》旁。赵瑜手持电喇叭……因为队伍太宽，围观市民甚众，我们的行进速度颇慢。有时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纠察奋力开道；有时中外记者冲进来，对《五一六声明》和队伍前列拍照；有时候在路边的某单位连人带旗呼啦啦挤开纠察队，扑入大队……此时，绝食已进入第三天。天安门广场几无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队伍在绝食圈外摆正，开个简短的会，……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五一六声明》”：

60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国人民心中无疑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征。23年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民主与光明的召唤。历史终于到了一个转折点。当前，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崛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北京和祖国各地，大规模游行示威彼伏此起，波澜壮

阔。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呼唤民主与法制，表达了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阶层的共同意志。这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这是一个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契机。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力，初见成效的经济改革也严重受挫，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业面临着重大危机。

中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关头。在这个决定人民、国家和执政党命运的时刻，我们——参加本声明签名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特此于今天——1989年5月16日——郑重签署如下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一、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特别是在不久前，还存在着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1919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帮”等独裁政权都曾以暴力镇压学生运动，其结果无一例外，都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最近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表现出值得欢迎的理智，局势因而有所缓和。如果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遵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反之，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避免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反之，就与国家根本大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相抵触。一度把学生组织定性为“非法”的做法，结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剧危机。

三、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

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四、学运期间，以《人民日报》社论、新华通讯社为代表的新闻机构隐瞒事实真相，剥夺公民的知情权；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职务。这完全是错误的做法，是对宪法的极大漠视。新闻自由是清除腐败，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

五、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承认和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基本涵义。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实质就是压制和打击不同的政治见解。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党和政府有必要重温“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训，广开言路，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共商国是，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六、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制从来不是被赐与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关头。

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以退却。

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人民万岁！

自由的、民主的中国万岁！

1989年5月16日于北京

据郑义回忆，当时，宣读人“手持扩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边鼓噪呐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们仍叫喊听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

“手执扩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往远方……”

从这份声明中，我们读到了苏晓康、包遵信在《光明日报》座谈会上发言的内容。据郑义回忆，其中谈到的值得借鉴的“历史教训”，灵感来自北大的大字报：

“北大陆续贴出几张大字报，从校志上抄录了旧军阀、段祺瑞政府、‘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对待游行、请愿的故事。……例如某北平军阀制止学生游行，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逮捕了一批学生。学生代表旋即求见，讲明游行目的。该军阀听后，承认学生游行爱国、立即谢罪，释放全体被捕同学。又例如清华某教授为要求政府抗日，宣布绝食，并南下赴南京请愿。蒋介石立即接见，亲自念了该教授的请愿书，表示坚决抗日。教授长跪，热泪横流，要求蒋不要食言。蒋亦跪地垂泪，发誓抗日。阅毕，谁人都会感到今不如昔。”

《五一六声明》几乎汇集了学潮以来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所有重要意见。与其把它看作知识界的独立宣言，不如把它看作知识界人士抛弃幕后导师和

斡旋者角色，公开亮相的一个标志。对此，包遵信后来有一个感受：“《宣言》内容当然很重要，但更让人注目的是一长串名单……那天的讲话，与其说是有什么宣传鼓动效果，还不如说造成一定声势的轰动效果……”

图5-19：5月15日知识界大游行

在这次集会中，因知名度较高，严家其和包遵信被推出来讲话。包遵信用口音浓重的安徽普通话介绍了游行的宗旨和经过，他对在场的听众说：

“我们的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出来讲话，这是一个无能的政府。你们肩上承担着中国现代化的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希望。”

他还代表参加游行的60多个单位“4万知识分子”向学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称在学生们的感召和鼓舞下，4万知识分子“站起来了”；郑义则感慨地说道：

“在决定改革成败，祖国命运的时刻，如果我们不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大学生站在一起，我就不配当作家，甚至不配当人！”

他把绝食学生称为“我们的老师”，表示“我们跟着你们走”；严家其表示，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渡过困难时期，并高呼“同学们万岁！”

包遵信事后回忆，并没有感到有“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奇观，其时的情景也颇为狼狈。他认为，即使坐在讲话者附近的人加以转述，人们也很难听清楚说了些什么。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并不是绝食学生。

在座的一圈人也挨个作了即兴发言。《河殇》的作者之一王鲁湘谈到：“人民要追求自由、民主，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是猪！”

作家柯云路谈到：“一个社会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是没有希望的”，在一连串强劲的排比句后，他结尾道：

“一个社会，听不到青年的声音，尤其是没有希望的！”

在场的徐刚、老鬼、刘晓波等也发表了感想。

当然，截止这时为止，许多参与游行的知识分子，仍把自己的支持限定在道义和号召层面。次日下午，首都知识界在北大三角地召开《五一六声明》新闻发布会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很快就忘记了自己天安门广场的信誓旦旦：

“新闻发布会正进行时，北大绝食团指挥部一同学进了圈子……他刚从天安门广场赶回来，同学们已开始大批昏倒，可现在连饮水都没有了！那肮脏的面孔，沙哑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嗓子，仿佛刚从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下来，……他喘息着说：‘同学们，同学们，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已经大批昏倒了！他们急需要水，水，水！马上给他们送水！……’”

“他拉着我的手，要我今晚上一定去天安门广场。绝食已进入第四天，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他恳求知识界的各位老师一定去，一定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市高联方形大印的小白纸，签上他的名，说有这通行证就可以进入绝食现场。”

“本不想与学生发生过多直接接触，免得当局日后‘抓黑手’。但我不忍心拒绝这位已绝食三天有气无力的学生领袖，只好收下了那张通行证。”

5月15日超过一百名绝食者已曾晕倒。社会上各方面，包括工人和知识份子，开始表达对学生的同情。超过80万人挤在天安门广场。

图5-20：5月16日社会各界声援（选自64memo.com）

据陆超祺日记，这一天“北京学生的绝食斗争，继续在陕、黑、皖、冀、豫、川、鄂、津、沪、甘、宁、晋等省市院校引起强烈反响和声援。”当天的夜班工作结束以后，他与同事刘允洲、谷嘉旺一道来到天安门广场：

“看一看，西天快亮了，仍有三万人左右，四周存放的自行车不下一万辆。停在历史博物馆前面的救护车有十几辆。”

5月16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对广场学生发表广播讲话。这个讲话指出：

“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与同学们的对话已经开始，还将多层次，多渠道继续进行。广大学生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党和政府正在研究，采取切实措施和步骤加以解决。六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把群众关心的若干热点问题列入主要议事日程，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解决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局面。”

“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

“现在，由于同学们静坐绝食时间较长，夜间气候较凉，有的同学已出现病情。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也希望学校老师、领导和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

讲话在广场的广播里一连播送了20遍。一心等待中央和政府领导表态，已经坚持了两天的学生，静静地听完了第一遍。等第二遍播出时，他们便开始齐声高呼“关掉！关掉！”然后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并摇晃旗帜，高呼“对话！对话！”

等广播第三遍时，全场情绪更加激昂，一遍又一遍地唱《国际歌》。中央音乐学院的小鼓“咚咚，咚咚”地敲个不停。此前，曾经提醒对话代表注意收听中央“广播电视讲话”的阎明复，连同好心的通知起草者——那个曾

经致信钦本立，试图在良心和职业道德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青年，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倾注感情的文字，竟会形成一次与绝食学生耗力费神的“声浪比赛”。

为响应“两办”的号召，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朱德熙、冯友兰、季羨林、吴祖缙、闻家驊、洪谦等十位著名教授联署了一份《紧急呼吁书》：

（一）恳请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即不是动乱。绝不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账”，同时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并承诺不得以任何藉口、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对静坐学生采取暴力。

（二）希望学生从大局出发，停止绝食，撤离天安门广场，通过和政府对话来解决其他问题。

在“十教授”之外，当天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还有“十校长”的《公开信》。这份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方福康教授、清华大学校长张孝文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陈佳洱教授、北方交通大学校长万明坤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王福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黄达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沈士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校长王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教授联署的《公开信》说：

目前，一些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的静坐绝食已进入第四天，有些同学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前天政府和绝食同学代表的对话没有取得结果，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在进一步激化。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感到十分焦急和忧虑。作为大学的校长和老师，我们对同学们的健康和生命非常担心，我们也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被打乱和中断。

在当前的形势下，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对话。进行建设性的对话，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在群情激昂、感情对立的情况下，本来可

以解决的问题也会变得难以解决。我们真诚希望有关方面和有关的当事人保持克制，不要进一步激化事态，避免出现令人痛心的难以挽回的事情。

目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样对峙下去总不是办法。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广大同学和政府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相信广大同学忧国忧民、希望推进改革进程、消除腐败现象的爱国热忱和合理要求会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只要大家有信任、谅解、诚意和耐心，一定能够找到一条积极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

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同学、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本着对参加绝食同学的生命健康负责，对国家前途负责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不要使同学们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目前，我们十位校长已同党中央、国务院取得了联系，紧急向中央领导同志陈明情况。我们愿意同各校参加绝食的同学代表进行接触，反映大家的愿望和要求，做沟通和联系工作。

《公开信》于下午3：45分联署发出。

当日下午，5：30，北京邮电学院院长胡健栋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高文俊副教授、北京医科大学校长施景义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秦少富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院长高贺平副教授、北京师范学院院长杨传伟副教授、北京经济学院院长余迪副教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钱忠涛副教授等8位校长响应“十校长”的《公开信》，又发表一封《致绝食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

近日来同学们怀着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报请敦请政府早日消除腐败、加强法制、促进民主的良好愿望，作出了集会、游行、罢课、绝食等举动，对此我们完全赞同清华、北大、师大等10位校长公开信中的几点看法。我们首先表示完全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我们再次呼吁能在不影响中苏高级会晤首脑会谈的前提下，尽快安排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与同学进行直接见面和对话，对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行为作出更明确的正面答复。

其次，我们对天安门广场事态的发展的确深感不安和忧心忡忡，为此事态不致继续扩大，避免发生其他更严重的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们同样怀着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同学身体健康负责，对同学家长负责的急切心情，热切希望并呼吁有关方面和有关当事人以及广大同学保持冷静克制，共同努力，引导事态向理智和秩序的方向发展，停止绝食行动，尽快回到学校。

第三，我们的心情与广大同学是相同的，要求消除腐败，加强法制，促进民主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愿与十位校长一起，做好沟通工作和联系工作，与广大同学携手并肩，以信任、谅解、诚意和耐心，用更冷静、更实际、更有效的办法，与同学一道促成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尽早与同学直接见面和对话。

但是，这十位校长不知道，现在，不论任何内容的广播、签名、游行、探望，除加强“民运—学运”的热闹气氛外，均已失去了它实现本来意义的可能性。

当日，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人数也逾十万，波及20余个城市，近百所高校。绝食学生增加到1200名。

5月17日，北京医科大学的各院领导、教办主任、学办主任、老师，包括食堂的大师傅一起来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营地，他们带来大量布匹给孩子们搭棚子，带来一车热饭，给急救同学吃。教师队伍打出了“教师与学生同在”的横幅。

当日，乘着学运的东风，著名中青年作家、文学评论家北村、李劫、朱大可、孙甘露、吴亮、吴洪森、宋琳、张献、格非、黄石等10人发表《中国作家人权呼吁书》。呼吁书说：

（一）我们对中国近半个世纪来，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作家的种种迫害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对此我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揭露权；

（二）必须立即停止任何的政治权力干涉文艺作品创作和发表的非法行为；必须立即停止任何妨碍、压制、侵犯作家人权（如盯梢、窃听、信检及其他）的非法行为；

（三）作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政治事件有自由思考、阐释和发表其见解的权利，任何党政官员的行政地位和行政手段对作家个人、言论及其作品的限制、剥夺和侵犯，不仅越权，而且非法；

（四）作家享有的结社、集会、办报、办刊的权利必须受到切实保障，任何以行政权力对此加以干涉的行为应被视为非法；

（五）基于世界趋于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民主化已成为共识的事实，中国作家有权自由选择任何国家和地区发表其作品；

（六）揭露谎言和说出真理，是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所在，对作家这种良知和责任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对创作自由的扼杀和对人权的践踏。

此时有消息传出，上海市委已决定在“导报”问题上做出让步。

同日，据称与绝食学生一起度过了四天四夜的北师大青年教师刘晓波，以个人名义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他说，如果政府还迟迟不公开回答学生所提要求，绝食运动将无限期延迟下去，这对于国家和学生都将造成重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他呼吁“在最大范围内”为绝食学生开展募捐活动，因为“人的基本权利、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属于全人类的”。

刘再复受书法家范曾委托，将2万元人民币捐给广场学生。他还通过绝食团广播站对学生说道：

“同学们，你们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付出得太多太多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我们知识界和你们站在一起！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多保重……”

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林牧，则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声明不仅被学生印成传单，还得到外电转播。

在5月15日的声援的队伍里，第一次出现了军人的声音。一份题为《驻京部队某部官兵致绝食请愿同学》的传单说：

亲爱的战友们：

惊闻绝食勇士绝食60多小时，我们不禁泪如泉涌。你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民主自由的先锋！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为民主自由献身的绝食勇士们！

请记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武装力量不会盲从任何有害于学生的命令！头可断，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丢！

战友们，请你们保重身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尽管，我们不能到场为你们助威，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时刻关注着你们！

绝食战友们万岁！

此致

军人崇高的敬礼！

1989、5、15

5月16日夜，“绝食团广播站”广播的一份《某部青年军官的声援书》说：

首都高校的同学们：

你们近日举行的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官倒的运动，是人民意愿的真实表露。我们军人表示坚决支持！（鼓掌）

由于职业的要求，我们不能参加你们的活动。但我们时刻关注着你们，心中支持你们！我们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鼓掌）

我们是军人，但首先是公民，应遵守和维护宪法。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新成立的高校联合会是合法组织；学生报纸是合法的刊物；你们的游行示威是合法的行为！停刊《世界经济导报》是违法的！

我们是军人，尽着义务，做着巨大的牺牲。可地位却越来越低，如今连军装都发不起。全国每年公费吃喝浪费数百亿，给每一个能有多少钱？

我们不能忘记，一年多之前，一位转业军人，因钱财被人所据，却未能安排工作而自杀。为他的死，我们表示悲哀和愤怒！

如果不清除贪官污吏，我们的命运将更加黑暗，生命将进一步枯萎，建设如何能顺利进行？

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是由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在愚昧和专制的土地上，贪官污吏疯狂地生长，人民终于活不下去，使社会陷入混乱。与其说动乱阻碍社会的进步，不如说愚昧和专制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如果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全国只有一张报纸、一个声音，那才是最危险的！才会亡党亡国！

民主是世界潮流。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马科斯等一批独裁者被赶下了台；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正稳步向前。那种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的说法，是对人民的鄙视。以国情为由，拒绝实行民主的承诺，是荒谬绝伦！

中国的希望在民主，民主的希望是你们！

希望你们坚持下去，直到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

我们相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你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正义行动，坚决反对违犯宪法的行为；我们要求新闻自由，反对愚民政策；我们支持平等有效的对话，反对29日袁木等人的敷衍和无诚意……

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学生万岁！（长时间的鼓掌，欢呼）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全体青年军官

一位现役军人，则为绝食学生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我情愿》

1989. 5

——一位绝食者的情怀

我情愿是一杯清水，

洒在干涸焦热的大地；

我情愿是一束腊梅，

任车轮将她碾作尘泥；

我情愿是一只杜鹃，

永不疲倦的带血长啼；

我情愿是一只飞蛾，

任烈焰将她燃为灰烬；

我情愿是一块岩石，

轰轰的倒下在山谷里；

我情愿是一株大树，

任雷电将她击穿拔起；

祖国啊母亲！

只要你一声呼唤，

我情愿一百次的死去！

民主墙老战士任晓町在一篇题为《四月人民民主运动何处去——三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的长文中警告：

“在关系我国民主利益的重大关头，狭隘的学生运动意识和策略主义这种自我孤立，将会断送4月运动的民主成果。”

他认为，“推进我国民主进程是整个4月民主运动和绝食团行动的首要任务”。而如何推动民主化进程？首要的任务是将本次运动的力量与“民主墙”运动、81—82全国竞选运动、85示威、86学潮、89年初呼吁大赦的联名上书运动等5大运动的人士结合；在为本次学运正名之前，应为“上述历次人民运动，司法当局在全国拘捕、判刑、劳教、驱逐达数百人”，“被开除学籍、党籍、军籍、团籍，遭搜查、立案审查、教育谈话、停止工作、内控监视、分配歧视，出国刁难、舆论批判……的不计其数”的人争取公正待遇。他说：

“回避或者不干预我国黑暗的司法和政治，就不配参与民主运动，也不配作为一个民主改造党人。只有迫使当局认真解决好前5大事件才能更好地解

决4月民主事件。6大民主事件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民主过程。我们要努力摆脱狭隘的、只求解决4月事件的思想意识。”

“狭隘的学生运动意识，不仅是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背叛和倒退，而且是对历史的无知，是自我孤立的死亡之道。”

他还满怀激情地呼吁道：

“同学们，不能选择那种策略第一、眼界狭隘、缺乏知识、无力领导运动的凡夫俗子，应当选择那些有志于中国民主改造和胸怀世界历史的大智大勇的领袖。”

“在成熟之机，合法建立起坚强有力的全国性社团吧！与现行政党共同参与中国政治。”

“同学们！酝酿组成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公民委员会吧！与人代会共同行使职权。在此基础上改组政府，修改宪法，建立民主新秩序。”

自“四二六”社论发表以来，“一小撮”、“长胡子的人”一直像一个巨大的磨盘压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心头，而学生的绝食使他们终于有勇气站起来，掀掉这块磨盘。他们天真地以为，从此，人人都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再也不存在幕前幕后之分。而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注释

清华大学 殷竹《无法否认的事实——从清华大学的事态发展看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的效果》。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30日。

参见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或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一节：共识的形成与策略的调整。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日，第89—90页。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二节：艰难的二次出发。

《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69页。

同上。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4日，第98—99页。

同上，第99页。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89年6月30日。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第2版。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同上。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一，1989年9月25日。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三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

听取北京市委汇报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四节：请战-碰头会-密诏。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三节：大游行。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二、“四·二六”社论激化矛盾。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日，第86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陈希同否认代表市委“首先汇报”的是自己。而是含糊其辞地说“一般”由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大学工作部长汪家鏐汇报。见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9—4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同上，第261-262页。

同上，第262页。

同上，第263页。

同上，第263-264页。

同上，第264页。

同上，第264-265页。

同上，第265页。

同上。

同上。

同上，第265—26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日，第87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80页。

5月4日正式递交政治局。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日，第90页。

参见《百度 百科人物》；《山西籍政要》<http://www.tydao.com/sxren/2012/1010/121010zhengyao.htm>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97—98页。

同上，第424—435页。

参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六节：赵紫阳的闪避。赵紫阳《改革历程》，《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13。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香港联合报有限公司，1993年10月版，第370—371页。

同上，第372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80页。

同上，第580—581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日，第691页。《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据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

5月22日杨尚昆《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3页。

见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二。1989年9月25日。

同上，第31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同上。

同上，第313页。

同上，313-314页。

同上，第314页。

同上。

同上。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 中册, 第281-283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2页。

见李鹏《“六四”日记》, 5月4日。电子版, 新世纪出版社, 2010年版, 第100页

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4页。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二节 紫色季风。

5月8日学生绝食还没有开始。此处记录可能有误。

陈小鲁的一个朋友。

此处文字似以“4.27十万人游行”为宜。参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三节: 大游行。

徐绥之、黄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 2011年3月出版。

即针对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思路提出的“部分调整, 部分放开”, 俟条件具备时, 朝全部放开过渡的战略。

陈小雅《学习笔记: 刘力群、石晓敏的“十年改革反思”》(原件)。

见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3年4月22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十三大后，中组部由保守派大将宋平任部长。赵作为总书记无力插手其事。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六节：价改闯关——赵紫阳的滑铁卢。

陈一谔《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144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3年9月12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张良《“六四”相关泄密陆续有来，鲍彤处境更加危险》。载《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

赵紫阳曾对杜导正等人说：“（徐惟诚）这个同志在‘文革’中很活跃，是姚文元重用的一个笔杆子，这次反自由化，他说了许多话，与‘文革’时说的一样。小平同志也说，这几个人左，但老左，阻碍改革。这些人还是要用，但分工要变变。李锡铭要徐惟诚这个市委副书记管意识形态，很不恰当，我已明令让徐惟诚分工管别的，以后管财贸了。”见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0年6月2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0年6月2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后，阎明复将此事告诉了赵紫阳。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两所一办”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发展所；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办公室，简称“政改办”。

见陈一谔《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163页。

参见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6年6月版，第五章，第一节。

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7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日，第90—91页。

赵紫阳的旧部姚锡华在帮助赵撰写回忆录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你从朝回京，知道李鹏等将赴朝前你们预定的方针改了。为此你找邓谈，但找不到。杨尚昆找邓家人谈。邓家说，你们办，邓会支持，彭真支持，此时，你为什么不可召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一下？”见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2000年7月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由于缺乏相关资讯，至今不清楚那是邓小平本人的意思，还是邓家子女和秘书王瑞林的意见。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同上，第30—31页。

徐绥之、黄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53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赵紫阳《改革的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2000年11月1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这“三票”由赵紫阳、乔石、胡启立构成。

这“两票”由杨尚昆、万里构成。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54页。

据陆超祺5月4日日记：“老钱告：鲍彤来两次电话，通报今天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很重要，希望我们在版面处理上要突出这条新闻。”见《“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53页。同日，鲍彤也打电话给广电

部长艾知生，请他安排将赵的亚行讲话“连播三天”。见鲍彤本人提供1989年9月25日《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295-296页。

清华大学 殷竹《无法否认的事实——从清华大学的事态发展看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的效果》。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30日。

清华大学 殷竹《无法否认的事实——从清华大学的事态发展看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的效果》。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30日。

详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七节：“倒胡”生活会。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59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82页。

“应急小组”是中央授权处理胡耀邦逝世后学潮事宜的临时机构，成员有乔石、胡启立、李铁映。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56页。

纪元特稿《鲍彤六四密件》。2001年4月22日。<http://www.epochtimes.com>

见穆望（高瑜）《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载《镜报》1989年6月号。

政治运动的发生过程表明，在事物发展没有超过临界点时，它是可控的，一旦超过临界点，它就将依自己轨道发展。这个问题可参见本人撰写的《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个问题》，见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

《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71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303页。

曾涛（1914年5月1日—1997年2月8日），著名外交活动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

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附记《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73—74页。

按中宣部当时的指示，对首都大学生的校外悼念活动和游行，一般不予公开报道；如遇特殊情况需作公开报道，各新闻单位均用新华社通稿。

《南华早报》，1999年5月。转引自任诠《现代化媒体对八九民运的影响——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载博讯2004年6月1日。

香港《经济日报》，1999年4月。转引自任诠《现代化媒体对八九民运的影响——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载博讯2004年6月1日。

任诠《现代化媒体对八九民运的影响——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载博讯2004年6月1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47—48页。

见《明报》记者陈天权采写的《国内新闻界在学运中做过什么？》，载《明报》1989年7月号。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同上，第221页。

同上。

同上。

同上，第249页。

参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三节：大游行。

见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318页。

见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310-311页。

陈小雅《采访笔记》《李大同访谈录》，录音整理件。

同上。

同上

罗立为，1952年生于重庆。1977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0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重庆市北碚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委员会委员，毕业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师。1988—1990年为《亚太经济时报》驻北京记者。在罗立为的介绍中，他一会儿使用“公开信”这个提法，一会儿使用“请愿书”这个提法。

陈小雅《采访笔记》《罗立为访谈录》录音整理件，1989年5月。

陈小雅《采访笔记》《李大同访谈录》，录音整理件。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316页。

陈小雅《采访笔记》《李大同访谈录》，录音整理件。

即《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举行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在该会上，戴晴和严家其的发言，是“导报”439期被查封的直接原因之一。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参见《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86—587页。及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60页。

同上，第62页。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

详见下一节。

这次对话全文见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

见2013年7月腾讯网记者沈洪《孙旭培：中国错过了新闻法出台的最佳时机（上）》。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三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

据2016年3月11日，陆一与陈小雅的谈话。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版，第319页。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17日，第49页。

《赵紫阳同志谈国家对媒体管理应开放》，1987年7月18日。载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附录2。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但据戴晴回忆，姚锡华是1988年底中宣部部署反自由化的“涿州会议”发起人之一。见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零讯》是统战部编印的内部刊物。反映民主党派及该部“统战”人士的意见。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四，1989年9月25日。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说汇报学潮情况的是“北京市委”。此处依据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8日，第10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同上，第319—320页。

同上，第320页。

同上，第320—321页。

同上，第321页。

同上。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8日，第11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同上，第322-323页。

同上。

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赵紫阳回忆说：“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载赵紫阳《改革历程》附录4赵紫阳1989年6月23日《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8日，第110页。

即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康华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为当时社会所称“四大官倒公司”。

由“农业人口”转为享有商品粮配给优惠的“非农业人口”。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

同上。

同上，第332-333页。

同上，第333页。

同上，第334页。

同上，第334-335页。

同上，第337页。

同上，第337-338页。

同上，第330页。

参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四节：请战一碰头会一密诏。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同上。

同上，第336页。

同上。

同上。

同上，第338页。

同上。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0日，第11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339页。

同上，第339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

同上，第34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62页。

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的问题，并建议将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66—67页。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五，1989年9月25日。

同上。

5月12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67页。

指赵紫阳在5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建议。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88页。

同上。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8-69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17—218页。

彭嵘《六四口述实录》。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56页，注70。

周锋锁，男，1967年生。陕西省长安县人，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

周锋锁《六四口述实录》。载64memo。

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48页，注141。

沈彤《对话团》。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2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346—347页。参见亚衣《“六四”牌不能再打——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载《中国之春》1993年，第4期；王超华《北高联的活动 宣布复课》。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75页；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61—262页。

中国人民大学的北高联常委胡春霖。

括弧内文字是笔者根据上下文内容连贯所加。

王超华《北高联的活动 宣布复课》。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75页。

亚衣《“六四”牌不能再打——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载《中国之春》1993年，第4期。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31页。

详见本卷 第十章 第八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38—39页。

同上，第40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68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61—262页。

刘晓波4月26日离美，27日赴京。

任诠《现代化媒体对八九民运的影响——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载博讯2004年6月1日。

梁二《师大与绝食发起》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27页。

封从德《谁最先发起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24页。

根据会议记录，王超华原话在此处还有一百字：“在北大四十一楼后来放复印机的那个房间。开常委会之前，在树底下我碰见开希，他带着马少方来。我有点犹豫，因为艺术院校已经换了其他人当常委。但是开希说，少方从一开始就是常委，他很了解其中的情况，要让他参加。”根据王超华的意愿，在出书时被编辑删去。但马少方的回忆是5月12日晚与王超华发生争执，5月11日午饭后，他们一行离开北大回北师大了。见马少方《纪念：历史在鞭打现实》。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18—120页。

根据会议记录，王超华原话在此处还有78字：“‘上面已经说了，’4月25日、26日第一次高联代表会的时候，经常说上面来消息的，我的印象也是马少方，5月11日这次也是他，他说‘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这段话在出书时根据王超华的意愿被编辑删去。

王超华《北高联反对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94页。

见王超华《北高联反对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94页。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90页，注161。

见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受控于鲍形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李鹏《“六四”日记》5月27日载：“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

王超华《北高联反对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94页。

另有刘燕记忆是晚上。见《谁最先发起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23页。

另有马少方回忆是在“人大附近的一个小餐馆”。见马少方《纪念：历史在鞭打现实》。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17页。

王丹《绝食是怎样发起的》。载《苹果日报》1999年5月9日。参见刘燕《谁最先发起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24页。

据刘燕回忆，绝食是马少方和王文提出的。见刘燕《谁最先发起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23页。参见马少方《纪念：历史在鞭打现实》。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

004年6月版，第117-118页。此处根据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同上。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王丹《绝食是怎样发起的》。载《苹果日报》1999年5月9日。 柴玲《绝食的发起》。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8页。

同上，第89页。

常劲《北大筹委会的反应》。同上，第93页。

王超华《北高联反对绝食》。同上，第95—96页。

柴玲《绝食的发起》。同上，第89—90页。

同上。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08页。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81页。

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一节：“新华门事件”及其后果。

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11页。

见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23、24、44、62、43页。

沈彤《绝食与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4页。

李录《复食》。同上，第164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24页。

同上，第32页。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一节：“新华门事件”及其后果。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51页。

同上。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361—362页。

封从德原注：柴玲在巴黎会议上也提到这两位中年人和他们传授的经验，尤其是秘书处，当时就建立了“接待处，档案处，还有一个会议记录处及新闻发布中心等等”。见《回顾与反思》第29—30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30—131页。

见《香港时报》与《大公报》4月24日头版引述“法新社北京23日电”，及《中国六四真相》第172页引述的美联社新闻。转引自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31页注释56。

关于封柴夫妻在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次矛盾，二人有不同的说法。柴玲在《一心一意向自由》中说封是因为自己升任“高位”，请她“避嫌”。此处

依据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44页的说法。

据封从德回忆：5月1日北大记者会后，“三天前才从南京来的”“李禄到筹委会遇到王有才。这个物理系的高材生用极浓的南方口音对他说：‘呵，你是南京大学来的，那就谈谈南京方面的情况吧！’说着便埋头准备记录。这自然伤了李禄的自尊心，似乎王有才将他当情报员了。如果这时没遇到柴玲，李禄可能就走了。李禄分析问题的机敏给柴玲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建议也引起她极大的注意。她当即让李禄直接找我，而我那时却已疲倦于众多动口不动手的建议，显得迟钝冷漠，还是将他气走了。”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122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59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62页。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见本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73页。

参见柴玲《绝食的发起》（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91页）和《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72—75页）的相关内容。因前者内容很少，后者为不准确的英译中，本书上述引文，对二者的内容进行了综合与部分内容的重新排序，及少量文字修饰。

即《及时讨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实属创举、人大常委八次会议议程深得人心把解决问题纳入民主和法制的正确轨道、希望学生冷静克制为会议创造良好环境》。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13日。详见本卷第十章 第九节：赵紫阳的“双周维新”。

见《天安门一九八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8月。该文落款是“北京大学绝食团全体同学1989年5月13日”。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281页。

据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五一四斡旋”前后的录音》；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11页。

柴玲《绝食队伍到广场》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04页。

刘燕《谁最先发起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26页。

参见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12页。王超华《绝食促成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00页。柴玲《绝食队伍到广场》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04页。

《北大女生的六封信》5月20日，第一封。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75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370页。引自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5.14斡旋”前后的录音》。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四章 第三节：广播站与“生命线”。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75页。

一说是16日增至1800人次，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3页。另一说是15日已增至3147人，见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12页。《京都血火》说16日绝食学生为“千余名”。见99页。《人民日报》5月16日的消息也称“上千名”。在该报5月18日的一篇特写中，始提到“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19日刊登的一篇18日讯中说，北京市急救中心“截至今晚6点，已救治3504人次”。

邹谠《天安门悲剧》。载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纪念文集》。开放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5—26页。

亚衣《“六四”牌不能再打——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载《中国之春》1993年，第4期。

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三节，待解之谜。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赵紫阳接见首都工人钢铁厂工人。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当时确有“首钢准备总罢工”的零星谣言。说首钢工人表示，“如果政府不与学生对话的话，首钢准备总罢工，而且号召全国总罢工。”但显然是学生为促使政府对话编造出来的。

李鹏5月13日上午刚刚与首钢工人对话完毕。

参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二节：民间社会的扩展，谢小庆语：“……阎明复则是总书记人选”。

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陶铸在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期间，赵紫阳得到迅速提拔，陶赵合作默契15年。赵紫阳称对陶铸“永生难忘”。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版。载华声论坛：<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据李鹏《“六四”日记》，4月28日。参见本卷第十章 第一节。

学生对话团的智囊团。

沈彤《对话团》。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2—83页。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见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0页。

同上，第972页。

沈戈在《阎明复是什么人》一文中说，阎具有两面派性格，一方面对姜椿芳左右服侍唯恐不周，另一方面又配合邓力群、胡乔木谋将姜椿芳《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的位置转手胡乔木的儿女亲家梅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同上，第386页。

见本卷第十章 第八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沈彤《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5页。

沈彤的这个时间记忆与下面陈小平所说“傍晚时分”不一致。

同上。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同上。

项小吉《回忆对话代表团》载《新闻自由导报》1991年5月31日。

沈彤《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5—86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称，这个会议是在5月13日晚召开。李鹏《“六四”日记》和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均记载是5月14日上午召开。

见本卷第十章 第九节：赵紫阳的双周维新。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0页。

同上，第70—71页。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项小吉2015年5月19日给陈小雅、江棋生的信。

根据时间判断，郑幼枚此时接到的是来自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消息。

项小吉《回忆对话代表团》载《新闻自由导报》1991年5月31日。

见王超华《在统战部的谈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01页。

即4月27日上午，胡启立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主要报社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见本卷第十章 第八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同上。

陈小雅录音整理《5月14日12名知识界人士〈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酝酿经过》。见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

同上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陈小雅录音整理《5月14日12名知识界人士〈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酝酿经过》。见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

指《五一六声明》。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388-390页。同上。

同上。

同上。

通过对资料的研究表明，当时在座的人中还有包遵信、戴晴、苏晓康、刘再复也预知知识界的有关活动，但他们当天没有象严家其那样，表现出对这一系列事情的明确的责任感和坚决性。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同上。

同上。

陈小雅录音整理《5月14日12名知识界人士〈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酝酿经过》。见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

项小吉2015年5月19日给陈小雅、江棋生的信。

柴玲《与阎明复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06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0—81页。

此处依据项小吉《回忆对话代表团》载《新闻自由导报》1991年5月31日。但在项小吉2015年5月19日给陈小雅、江棋生的信中，他的记忆为“大概5点对话开始”，“7：30新闻联播结束，广场学生没看到实况转播更加气愤，王超华带一批学生冲进会场要求立即停止对话”。

项小吉2015年5月19日给陈小雅、江棋生的信。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0—81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3页。

该文在其他引述中的另一个题目是《妈妈我饿》。

根据他所说的时间，应是指程真朗读的绝食学生遗书《给妈妈的一封信》。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1页。

项小吉2015年5月19日给陈小雅、江棋生的信。

王超华《在统战部的谈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02—103页。

沈彤《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6页。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项小吉2015年5月19日给陈小雅、江棋生的信。

同上。

常劲《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06—107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03—305页。

柴玲《与阎明复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06页。

沈彤《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6页。

项小吉2015年5月19日给陈小雅、江棋生的信。

见《新闻导报》第4期，暮云的报道。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戴晴的这个时间记忆与上述学生记忆“对话于7:15中断”稍有出入。

同上。

2016年9月2日，戴晴与陈小雅的谈话。

陈小雅现场录音。

邝岩《动乱“记者”戴晴》。原载《光明日报》。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14日，第2版。

同上。

见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以上过程为本人亲历。王超华的回忆可以佐证。见王超华《为什么学者劝阻无效？》。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32页。

《北大女生的六封信》5月20日，第一封。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75页。

见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五一四斡旋”前后的录音》。

同上。

同上。

详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六章 第四节：广场的支撑。

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五一四斡旋”前后的录音》。

指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

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五一四斡旋”前后的录音》。

同上。

同上。

梁二《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03页。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柴玲《为什么学者劝阻无效？》。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31页。

据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五一四斡旋”前后的录音》。

柴玲《为什么学者劝阻无效？》。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31、133页。

见王超华《在统战部的谈话》、梁二《北高联与绝食团、广播站的关系》、《师大》、《吾尔开希的职务》。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01、160、182、297页。王有才《“六四”口述实录》。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10—311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6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3页。

见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五一四斡旋”前后的录音》；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55页。

梁二《北高联与绝食团、广播站的关系》、《吾尔开希的职务》。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60、297页。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为什么学者劝阻无效？》。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31—132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19页。

时间据封从德注。

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9页。据金观涛、刘青锋对笔者说，这是纯粹的造谣，因为当时他们根本不在国内，也未与国内学生任何人有过这类电话交谈。但是，笔者后来在收藏的资料中，找到了当天新华社记者有名有姓的记载。而当事人王丹、封从德等均证明，当日确有人传达过类似“指示”。但不知动机是什么。

见本书 第三卷 第七章，第二节 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6页。

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1年3月12日对任峻的《判决书》。材料由任峻本人提供。

据任畹町提供《八九. 四月民主运动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二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和历次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

指“4. 27大游行”后的有利形势。

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8页。

据任畹町提供《任畹町给熊焱的信》。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页。

17日开始在广场设立联络点。常劲《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78、180页。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上世纪80年代，为提高商业服务的水准，政府有关部门曾提出“顾客是上帝”的口号。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5月15日：热情的售货员。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40—41页。

同上，第41页。

此处郑义不确定是12日，还是13日。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41页。

包文在提及《五一六声明》时，一概称为《宣言》。

正确时间应是5月10日。见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38页；本章第一节：并非突如其来的绝食。

根据郑义回忆，这次会议选出的游行组织者是赵瑜和他本人。后来事实上也是他们两人。参见《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45页。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45页。

据《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92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2页。

此处郑义没说明是谁宣读的《五·一六声明》，看行文似为他自己宣读。但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和《陈一谔回忆录》均记为王鲁湘宣读。以上见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48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45页。

同上，第43页。

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2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49页。

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18—119页。《陈一谔回忆录》说，参加这次游行的有“200多个单位的3万多人。”（见第592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记为230多个单位，3万多人。包括新闻单位编辑、记者“上千人”。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49页。

同上，第52—53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4—75页。

参见本卷 第十一章 第三节：阎明复临危受命。

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3页。

同上，第23—24页。

同上，第24页。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7日。同上，第68页。

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5页。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柯捷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林牧《我在“六四”前后》。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1页。

1989年5月15日《驻京部队某部官兵致绝食请愿同学》。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来自军人的八封信》。载陈小雅《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3年3月版，第73页。

5月16日夜陈小雅录音学生广播站的广播内容。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来自军人的八封信》。载陈小雅《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3年3月版，第74页。

这首诗署名“国防大学宣”，刊载于北大筹委会传单。

据任畹町提供《四月民主运动向何处去——三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和历次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民主墙运动十周年而作——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

八九 民运史

第六卷 高层变局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十二章 中苏峰会：最后的晚餐

第一节 巨星会晤

第二节 护邓？挟邓？抛邓？

第三节 待解之谜

第四节 赵紫阳醉酒

第五节 最后的挽救

第六节 倒邓狂澜

第七节 《人民日报》记者“逼宫”

第十三章 “五一七”政变

第一节 “非常”常委会

第二节 “戒严”决定的出台

第三节 中南海：焦虑之夜

第四节 邓小平失踪之谜

第五节 从换将到用兵

第六节 赵紫阳泪洒广场

第七节 恐吓or警告——风马牛对话

第八节 军事介入：再上新台阶

注释

一个“对话的时代”一晃而过，被全社会的抗议浪潮卷得无影无踪。人们再一次看到“手段”如何取代了“目的”——绝食——这个为促进对话而发起的行动，就像看护民主摇篮的“拿破仑的刺刀”，面对着老也长不大的婴儿，终于不耐其烦，自己坐到摇篮中去了！

但刺刀是不会长大的。

而最诡异的事情还在于，“学生的行为实际上给政府的反应设定了时间的限制，因为中国人认为，不论对错与否，绝食学生的生命会在七天之后遭到危险……赵和他的老同志们必须在5月20日前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个办法将是什么？邓小平已经有了腹案，但他还是给赵紫阳留出了时间。

第十二章 中苏峰会：最后的晚餐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吴洪奚、张伟国、严家其、包遵信）

5月13日开始的学生绝食，令北京市委焦头烂额，也使赵紫阳打出的“理智、秩序”牌全面丧失了效用。已经把政敌逼到悬崖边的他突然身陷险境。

这一非常的行动，使社会以“非常”形式加速了动员，一切理智的声音均被感情的呼唤所淹没，研究“老庄”的学者也走上街头。当新闻界准备对话的代表正情意殷殷地等待着与政府共创“维新”奇迹时，胡启立以一句“等待局势平静后再进行”的回答，使之成为了一个世纪性的梦想。

第一节 巨星会晤

自年初以来，改革派就一直关注的“时间窗”——中苏峰会——终于到来。这扇窗户之外，将会是彩霞满天？亦或是血雨腥风？命运操纵在谁的手中？

5月16日维系的是邓小平的梦想。

正如为邓小平作传的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傅高义所说：对邓小平来说，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至18日对北京的访问，既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早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就向苏联传出信息；1985年，他又委托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给戈氏传话，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他估计，苏联因战线拉得太长，需要调整自

己的外交政策，于是顺手给戈氏递了一把梯子。结果证明，邓小平的估计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所有三个条件，并答应在邓小平感到方便时访问北京。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盛会，他决定扮演一个热情的东道主。为此，他广邀世界各地的记者齐聚北京。就连很少出国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拉泽尔（Dan Rather），也像其它西方知名播音员一样，亲自来到凑这个热闹。

为了这一天，邓小平1986年匆忙“换马”，1987年营造“政改气氛”，1988年贸然催促价格改革。所有的这一切，除了自己感到岁月不饶人，自己承诺的结束“终身制”已压力越来越大外，希望在这个昔日的老大哥莅临时，能端出一个像样的盘子，也是动力之一。4月20日，在戈尔巴乔夫访华还差25天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讨论了与戈氏会谈的提法问题。据这一天的李鹏日记记载：

“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为了这次正式“会谈”，有传闻说，他不惜放下乱糟糟的北京，避居北戴河；不但不见自己的总书记，甚至取消了原定与哈梅内伊的会晤。只是在这位性情固执的伊朗总统坚持下，邓小平不得不提前结束闭关，于5月11日回到北京。

图6-1：邓小平会见哈梅内伊

虽然，邓小平请来的世界各国记者都在服务于学运，并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学运的热情，但邓小平似乎已经有了腹案，并对此装作视而不见！

5月16日，是“巨星”会晤的日子。但是，这一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属于邓小平和李鹏的。

上午，中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会晤。会晤在人民大会堂北门旁的福建厅举行。会见时，邓小平以“老一辈”资格和东道主口吻，为这次会晤框定了头条新闻的措辞：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我们也宣布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在回顾了中国饱受日、俄（苏）欺凌的不愉快历史后，邓小平建议：

“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所谓“空话”，邓小平坦承，包括自己亲自领导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而且明智地把那些矛盾归结为“尊严”与“平等”诉求的问题。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对苏联仍有意义，邓小平还坦言，现在实际上已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作为前进的指导。他说：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据称，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晚，你还要同赵紫阳总书记见面，这意味着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在宴请戈尔巴乔夫时，客人对邓小平发出了访问的邀请。邓小平的一席话，不仅显示了他退意已决，而且几乎是在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

“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在会谈的过程中，曾发生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绝食、静坐学生四次冲击人民大会堂东门和北门事件。因为取消原定的戈尔巴乔夫欢迎仪式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仪式，绝食的学生觉得这张“王牌”已经失效，随后展开了“绝水”行动。他们似乎预先知道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在大会堂北门附近，以“对话团”为主体的静坐队伍再度出现在新华门：

“5月14日晚学生与当局的对话虽然失败了，但高校对话团没有放弃努力。大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将要求继续对话的资讯传进中南海。有几个晚上代表们因可能的对话而彻夜守候在中南海红墙根下，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对话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鉴。当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门绝食的学生每延续一天，生命就多一份危险……”

据沈彤回忆：

“5月16日对话代表团的大部分主谈代表宣布在新华门前静坐，直到政府同意对话。……因为那时候开始已经有绝水的同学，12位绝水的同学，躺在人民大会堂北面，我当时给他们跪下让他们停止绝水。就是因为这种情绪，

对话团已变成非理性的了。至少我跟对话团里的其他几个主谈代表，已经变得很情绪化了。”

正在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进程中，大会堂北门的一块玻璃，被入内找水喝遭拒绝的学生打破。据说，玻璃掉在地上的“咣当”声，甚至惊动了耳聋的邓小平。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心系广场”的一种生理表现。但尽管如此，意志坚强的他，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依然得以融洽顺利的进行。

据钱其琛回忆，在座谈的两个半小时中，邓小平兴致勃勃，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因为他按自己的条件弥合了中苏关系。在会谈中，邓小平不靠笔记，仅凭记忆就能细致讲述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而戈氏则以他对历史的熟悉和良好的理解力，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但是，邓小平毕竟年事已高。人们从电视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维常常不顾他的表达能力，远远地跑在前面，令观众已然领会邓小平的意思但他一句话仍没说出来。据傅高义记载，在宴请时，邓小平甚至因为手抖，将饺子从筷子上滑落下来。

图6-2：中苏智力竞赛（陈小雅摄）

戈尔巴乔夫与李鹏总理的会谈，被安排在夏日昏昏欲睡的下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田纪云、吴学谦、钱其琛、郑拓彬，苏方有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可夫。会谈的内容，李鹏《“六四”日记》写道：

“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我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各国普遍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我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目前中国发生动乱而言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在谈到经济合作时，戈对中国派工人去西伯利亚伐木、承包建筑、种大豆、办合资企业等方面的合作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坚持要通过签订具体合同加以实施。戈主动建议向中国提供核电站和火力发电机组，并给予相应买方信贷。在谈到边界问

题时，我阐述了中方的观点，要求苏在东段作出让步，中方在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只表示愿意考虑一下中方建议，具体问题委托双方外长去谈。关于减少双方边境的军事对峙，戈说步子应迈得更大一些。双方都指出，中苏边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边界。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我说，现在中苏关系已正常化了，今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还说苏方表示要从蒙古全部撤军，中国对此表示赞赏。我说，中苏现在的关系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独立自主地处理双方的关系。” 这一天的黄昏终于来临，在钓鱼台国宾馆，赵紫阳会见并宴请了戈尔巴乔夫。此前，在5月10日上午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时，谈到戈氏离京后的访问方案，是去西安还是上海？戈氏选择了上海。赵紫阳特意让杨尚昆打电话给军队，通知原定5月18日访问上海的美国军舰推迟到达。为戈氏访华创造一个舒心的氛围。

在场的记者看到，当赵紫阳步入会场时，他首先问的第一句话，是学潮以来学生最关注、因而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

“是直播吗？”

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人们从这一天直播的电视上看到的赵总书记，有一种少见的轻松和愉快。

但他的讲话却令举世震惊！

根据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和赵紫阳的回忆：戈尔巴乔夫先对赵紫阳说：我们两个总书记的会见，说明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

“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见面，实现了两党最高级的会晤。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

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党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这次高级会晤，也就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图6-3：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

此外，据赵紫阳回忆，他还同戈尔巴乔夫谈到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赵紫阳说：

“常常有人特别是青年人提出这样的疑问，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优越性？我认为，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有我们自己主观指导上的毛病”，“我们也确有墨守成规的错误。”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切实做好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必须对原有的体制和政策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广大群众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改革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讲话在下午5点多播出。大部分人没有怀疑它是否“直播”，但事后鲍彤说，他看到了赵作出的是打鼾的样子，但他的语音却在正常放送。

第二节 护邓？挟邓？抛邓？

赵紫阳的这番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公众的第一反应大多是：赵紫阳终于和邓小平摊牌了！

据仍呆在中央统战部，为未来的斡旋做准备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小平回忆：

“在与阎明复的接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问阎明复：为什么赵紫阳就不能到学生中去直接争取支持？为什么赵紫阳就不能公开站出来否定‘四二六’社论？为什么赵紫阳不能直接出来向大家作解释？阎明复每次都以婉转的语气告诉大家：这些事情他都想作，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当赵紫阳在电视中告诉戈尔巴乔夫中共党内邓小平垂帘听政的秘密时，我预感到赵紫阳与邓小平摊牌的时候到了。我对一起与我们观看电视新闻的阎明复说：这是否说明赵紫阳已经作好出击准备？在阎明复听到赵紫阳的讲话之后，他并没有特别的表情，他只是告诉我及在场的其他人：中共党内确实是曾经决定让邓小平在退休之后继续掌舵。”

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回忆：“赵紫阳这段话公布时，很多人感到，赵紫阳的这段话的潜在意思是，现在局面这么糟糕，责任全在邓小平身上。赵紫阳和邓小平决裂了。”

远在香港的许家屯，也有类似的理解，他担忧地回忆道：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好意，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不出预料，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赵紫阳辞职了。”

据说，因为赵紫阳对戈氏的这段讲话，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曾打电话给赵，厉声质问：为什么把邓在中央具有最后拍板权讲出来，这是明摆着将社会矛头指向邓，将火引向邓！

包遵信的回忆，也提供了那天晚上一些人的活动情况，说明有人也把赵紫阳下午对戈氏的讲话，当做了“倒邓”信号。

据杜导正日记，新华社名记冯东书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赵紫阳“见戈尔巴乔夫将邓抛出”是赵紫阳的历史闪光点。

包括李鹏，也有这样的看法，不过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壮举。他写道：

“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

傅高义在为邓小平作传时则说：“事实上，像李鹏一样，邓小平确实认为赵紫阳的话是在指责他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

但是，事后，赵紫阳和鲍彤都坚决否认有上述动机。在《改革历程》中，赵紫阳说：

“……关于5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四二五’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

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5月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当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

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但信写出后，

没有下文。”“我至今 仍然希望在他离世前（这是我七年前写的记事），能够了解我同戈那段话的真实原因。这不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后对我的问题能有什么松动，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会有任何松动。我只是想让邓知道，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我，尽管拒绝接受他关于学潮的决策，但并不是一个在紧急关头牺牲别人而保护自己的人。我想这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他带着这个误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鲍彤对此事的解释，与赵紫阳是一致的。事后，他在答记者问中说：

“赵紫阳所以向戈尔巴乔夫介绍一中全会这个决定，那是为了说明：作为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标志的双方最高领导人会晤，不是指下午此时此刻赵自己和戈的会晤，而是指上午的邓戈会晤。这条消息，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原文具在，可以覆按。在此以前紫阳在会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也曾多次向他们通报一中全会的这个决定，中央联络部有记录可查，全体中共领导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的，应该的。想不到这一次却成了赵的罪状！——后来我才知道，李鹏指责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这样说，是‘把小平同志抛出来了’。”

“紫阳的会谈稿是我准备的。我现在对下令向学生和老百姓开火的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好感，但是请注意，当时是5月16日，不但没有下令开火，而且没有下令调军队。当时我对邓小平还充满着幻想，因为邓小平5月13日亲口表示‘同意’常委（8日）和政治局（10日）的意见，而那两次会议所通过的，恰恰是紫阳提出的方案！所以，老实说，鲍彤在替紫阳准备会谈资料时，一心一意在为紫阳方案终于得到小平亲口说‘都同意’而深感庆幸……”

鲍彤还说：

“紫阳回来以后告诉我们邓小平的‘都同意’三个字，我听了以后高兴极了，我觉得邓小平在改革问题上经常是支持紫阳的，这次包括人大委员长

会议决定在6月20日召开人大常委特别会议讨论学生的要求，成立廉政反腐败委员会等，邓小平都同意了，学生的要求能够满足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借这个机会全面展开，我觉得非常高兴，在这种心情下，我鲍彤会‘把邓小平抛出来’？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鲍彤继续为自己辩护道：

“全世界都知道，早在4月下旬，李鹏自己就已经把‘动乱’的结论向四海五湖‘抛’了出去，特别大吹大擂地声明这是小平同志亲口定的性。此刻已是5月16日，还用得着别人到字里行间去再‘抛’一次吗？”

2007年2月3日，笔者和姚监复访问鲍彤时，他还做了另外的补充：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讲话前，他问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直播’，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听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人事后还议论，说‘以前根本不理咱们，这次怎么这么待见我们了？’这件事，是不是事前有考虑的？”

鲍彤（以下简称‘鲍’）：事前紫阳对我说过，就按照这个讲话直播。但是，我看电视，播紫阳讲话时，他是这个姿势（做闭眼举头张嘴打鼾的样子）……

陈：这很奇怪。我不记得当时播出的情况了，最好以后再看看这个情节。

鲍：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事先写好的，但那段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一整段话是我加上去的。

姚监复：广东顺德的一个同志看了那段录像，后来说如果是形势大好的时候，你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谁谁谁指导的，这是把功劳归于他；但在已经搞砸了的情况下，你说这个话，这不是说这个责任是属于邓的吗？

鲍：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似乎是五四以后），毛毛找到阎明复，哭了，说邓在学生中的形象搞坏了。我们当时的意图，是改善邓的形象，缓和他和学生的关系。因为学生说他‘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嘛！”

赵紫阳和鲍彤的确可能没有在危急关头抛出邓小平的“主观故意”。特别是赵紫阳晚年的那段表白，他不希望对他有恩的邓，带着对他的“误解”离开这个世界，是十分感人的。但是，赵、鲍的上述解释，并非没有破绽：

其一，赵紫阳和鲍彤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抛邓”误解，可能是出于李鹏的挑拨。但他们无法解释，许家屯、包遵信、冯东书、陈小平，以及广东顺德的那位同志，也会同时产生以上“误解”。他们显然不会受李鹏影响。

其二，赵紫阳和鲍彤都说，万万没想到，邓和他的家人会如此生气；万万没想到，会遭到这么严重的误解。我认为二位是有点健忘的。因为在不久前，他们还反复说：“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从赵紫阳和鲍彤反复提到，是李鹏“推邓”在前，他们“推邓”在后。可见，二位认为，自己的作为，与李鹏是同类性质的问题。那么，同样都是“推邓”，为什么李鹏是不道德的、是推卸责任的，而二位就不是呢？而且，既然邓家对李鹏的“推”已经表示了不满意，对于二位在更大范围内的“推”，会产生更甚的反应，怎么会那么意外呢？

其三，赵紫阳和鲍彤在各种场合解释这次事件时，都强调，他对于戈尔巴乔夫讲的那段话，是承接戈氏的话，所做的“自然”回答。但是，鲍彤披露，这个讲话稿是事先写好的。而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一整段话是鲍彤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前就“加上去了的”。请看鲍彤在秦城监狱的交代：

“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

“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朱良同志送来的中联部的原稿上也没有这个内容，他们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话：两党领导人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我认为，紫阳同志应讲得具体一些，使戈理解这里所说的两党领导人是专指小平同志和戈，而不是赵和戈，所以加了这一段话。（当时还有一个巧合：紫阳同志为了澄清当时社会上部分人中关于小平同志的流言，准备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专门讲一讲，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十三届一中全会一致认为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根本不是什么‘违反组织原则’，相反，如果不这样做才是真正违反了一中全会的决定。这两个对新闻界的讲稿，当时都在我手头上并行操作，我就很自然地把这些内容移植到与戈会谈稿中去了）。当时的情况和动机确实如此，后来引起的影响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根据鲍彤的回忆，赵紫阳在根本还没见到戈尔巴乔夫之前，就已经嘱咐他按讲话稿内容“直播”；赵紫阳到现场时，还亲自盯了一下“直播”的问题。这是不是有些“不自然”呢？并且，如果赵紫阳和鲍彤此番“推邓”是“执行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的话，那么，李鹏4月25日请示邓小平，难道不也是“执行”全会决定吗？

所以，笔者认为，在类似的事件中，赵紫阳和鲍彤缺少的是衡量事物标准的一致性和逻辑的一致性。

其四，鲍彤说，当时自己对邓小平还充满着幻想，因为邓小平5月13日亲口表示“同意”常委（8日）和政治局（10日）的意见，而那两次会议所通过的，恰恰是紫阳提出的方案！所以，他在替赵准备会谈资料时，一心一意在为紫阳方案终于得到小平亲口说“都同意”而深感庆幸。这种乐观的感情，显然与赵紫阳的陈述不符。根据赵紫阳《改革历程》，5月8日的常委会和5月10日的政治局会，并没有通过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不仅没有“都同意”赵

的方案，相反，如赵紫阳前述，邓小平对他“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显然，鲍彤的“喜悦感”不会凭空产生。联系到李鹏《“六四”日记》所说，赵紫阳并没有向政治局传达邓小平5月13日接见他的讲话，我们可以推测，邓小平5月13日的讲话，传达的不尽是令人乐观的信息。他之所以要让鲍彤乐观，完全有可能是忍心让这位对他最忠心、也最期待他成功的战友失望！而这种错误信息的传达，显然造成了鲍彤盲目的乐观。鲍彤的盲目乐观则有可能使他笔底失去谨慎，以至于带来决策的失误。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还不是细节逻辑的缺陷，而是政治逻辑的缺陷：既然已经感到路线方针与邓相左，邓的讲话是扭转当前形势的最大、最后障碍，为什么要在这时强调邓权威的合法性呢？外交部的方案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也符合赵紫阳原来与邓家人和杨尚昆等人达成的默契，那就是“淡化”、“转弯子”的方针，为什么在最需要坚持的时候没有坚持？

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必然要涉及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都遇到了什么事情。

第三节 待解之谜

从现有的资料，我们知道，大概有三件事，与赵紫阳同戈氏会见的措辞不无关系：

第一件，5月13日，借伊朗总统要求面见邓小平的东风，从朝鲜回来后等待了13天的赵紫阳终于见到了邓小平。这一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家主席杨尚昆在邓小平家进行了一次谈话。由于《邓小平文选》没有整理并收入邓小平这次讲话的内容，《邓小平年谱》只

节录其谈话的不到110个字，我们只能参考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记载。《真相》说：

5月13日上午，赵紫阳、杨尚昆到邓小平家，在向邓小平问安和闲聊了几句朝鲜的情况之后，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了自己对运动的想法，和近期工作部署。赵紫阳说：

“小平同志，我先向您汇报一下学潮和动乱以来我的一些思想。4月中旬以来，学潮愈闹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一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

邓小平的话语不多，但却针锋相对：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显，是极少数人挑动了大多数人。把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激发起来了。”

也许是感到了明显的抵触，赵紫阳稍作陈述调整，接着又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

“所以，我主张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邓小平又答道：

“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

接着，邓小平开始表达他积郁已久的不满：

“这次学潮已经拖得太久了，将近一个月了。老同志们心都焦急着呢。陈云、彭真、先念、王震还有邓大姐，包括我，心里都急着呢。要有决断力。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要力争有个稳定的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乱糟糟的局面，怎么发展？”

接过邓小平的话头，作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将讨论引向了对国事活动礼仪的关心，并显示出他信息灵通的特点：

“戈尔巴乔夫后天就来了。听说学生今天要宣布绝食，这是有意想把事情闹大，造成重大国际影响。”

他非常担心“这次欢迎仪式能否顺利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

对于这个问题，赵紫阳似乎认为并不成问题。他连续使用了两个“相信”，但却奇怪地把“信任”的基点放在了并不十分可靠的“北京市和教委”身上。他说：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欢迎戈尔巴乔夫是最基本的礼仪，事关国家荣誉，我相信广大青年学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会在欢迎戈尔巴乔夫仪式上节外生枝，相信这个大道理这些青年学生应该是懂得的。北京市和教委已经向各大院校学生讲了这个道理。”

邓小平似乎比赵紫阳对学生更了解。他说：“学生情绪一旦偏激可顾不了这么多。”

看看一老一少的顶牛僵持，没有更多话说的杨尚昆只好说：“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

赵紫阳则表示：“对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一事，下午我透过新闻界再强调一下。”

面对到这个时候依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一般号召和提倡的光滑表面上的赵紫阳，邓小平几乎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再次把谈话引向令人不愉快的“性质”问题：

“我说过，这次事情的发生不简单。对方不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更有极少数竭力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这些人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

“少数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群众中间。是有很大工作难度。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是单纯的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与往日政治局意见不同的时候，赵紫阳抬出邓小平一样，这次面对冥顽不化的邓小平，赵紫阳抬出了“政治局”。他说：

“政治局的一致意见是，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为了把工作做在前头，政治局成员已分头与社会各界群众展开对话。今天上午，李鹏去首钢，下午我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胡启立他们这几天正与新闻界进行对话，还有……”

“现在社会各界心态怎样？”邓小平终于打断赵紫阳的话，意马心猿地问。

赵紫阳说：

“这次学潮波及面虽广，但只在全国一些有高校的城市。农村不受影响，农民是稳定的。城市工人是稳定的，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发发牢骚，同情这次学潮，但照常上班，没有罢工、游行和串联的事情发生。”

杨尚昆接着赵紫阳的话茬，乐观地介绍了他对军队的估计：

“部队官兵的思想是统一的，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这次学潮对部队官兵的思想不会有大的影响。”

已经不耐烦这种表面情况汇报的邓小平，再次把问题拉回到“实质”的认识上来：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过去。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很少，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失误。这几天我总在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

不能说邓小平没有反思。但他反思的结果是“四坚持”没有错。而这个对错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不是理论上、逻辑上的不通，不是实际上的不能进行，而是他自己的理念。此刻他似乎已经忘记，“坚持不够”的根子不在别处，正是他自己权力到手就“不争论”的政策造成的。因为要搞“改革开放”，就不得不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所赋予“四大概念”的内容，不争论的结果，就是自由探索，各行其是。

“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同时，党也必须解决民主的问题，解决党和国家机关滋生的腐败现象的问题。”

问题就在于，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不可能监督自己。看看邓小平也承认“民主”和“反腐”问题的重要性，赵紫阳又有了发挥的可能性。他接过话茬说：

“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您一直强调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

的监督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实行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有点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接着，杨尚昆发挥了他善于划分“政策界限”的特长：

“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利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划开来。我们决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

为了将邓小平的思路引入现实轨道，赵紫阳再次与记忆力减退的老人回顾了以前的讲话，然后迅速纳入自己的“新政”方案。赵紫阳说：

“高举民主和法制的旗帜深得民心，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记得小平同志在1984年就曾经说过，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体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我觉得，我们要利用当前这一时机，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当赵紫阳再次显示其高超的“泥瓦匠”水平后，杨尚昆似乎也深受鼓舞：

“要下大力气坚决克服、消除腐败现象。现在老百姓一提起腐败，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天天有腐败分子被揭露。”

他描述的这种情况，虽然迟至二十多年以后才发生，但确实是从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

见邓小平没有吭气，赵紫阳趁势掩杀：

“消除腐败现象的确已成为当今的头等大事，老百姓的眼睛都盯着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动真格的。政治局正在研究，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首先从政治局做起，我已建议政治局先从调查我的子女开始，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万里还提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的廉政委员会。”

邓小平好像是被说动了。但他很快又回到对“实质”问题的关注上：

“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最近我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搞不通，大概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不能迟。这次事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是他们的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激动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看看没别的话可说，邓小平最后叮嘱道：

“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坚持原则。当然，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

这次三人谈话，读者一看便知，邓小平和赵紫阳根本谈不拢。也许是这个原因，这一次，赵紫阳并未将这次难得捕捉的会见和重要的谈话向政治局常委传达。事后，李鹏是从杨尚昆那里得知某些信息的。赵紫阳的人对外皆称，谈话主要讨论的是会见戈尔巴乔夫的问题。

唯一反常之处是，赵紫阳向自己的心腹爱将传达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信息：他对鲍彤说，邓小平对于赵紫阳的“维新”设想表示“都同意”。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信息。

对赵紫阳与戈氏会见措辞可能有影响的第二件事，据杜导正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发生在谒见邓小平的第二天——5月14日。这一天，赵紫阳在中南海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纪委副书记的萧洪达，时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杜导正。二人都是他在广东工作时的部下。《日记》在1989年10月5日写道：

“……去赵处谈话……我谈维护邓这一旗帜，另抓反腐败，我的具体建议：处理好高干子女经商、特供、车辆、下乡随从人员等等。晤谈共20分钟左右，先等几分钟，以后外边电话不断，赵几次进出，坐不下来。我的意见没说完，谈话中断。”

《日记》1990年7月5日再次写道：

“赵通过林若要我与洪达去他家，时间5月14日晨，不到20分钟，当时天安门广场形势异常紧张，赵屁股坐不定，一会儿秘书叫他出另间房接电话，电话不断。我的谈话便断断续续，我谈的要点是：一、绝对维护邓小平这面旗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二、狠抓反腐败，高干带头。其余来不及谈，便告辞了。因赵到天安门广场去了。”

《日记》在2000年6月30日第三次提到：

“（萧洪达说）1989年5月14日，天安门正闹得厉害时，赵要我（洪达）与你（杜导正）去他家谈话。杜谈了要高举邓小平旗帜，保邓，还有廉政几条。我本想跟赵说对邓要小心，邓说一不二，以劝告赵，但我未说出来。”

据杜导正说，这些内容，是“六四”后大清查时，他们对中央清查组交代的内容。

仅从这三段文字，我们无法了解，赵紫阳，在早晨，在准备去天安门广场之前——如此紧张的时间里，找二位“心腹”来谈话的真正含义。但从杜

导正三篇日记透露的信息看，这次召见显然具有征求意见的性质。征求对什么问题的意见呢？三段文字显示，他们至少议论了两个话题：一个与“新政”有关；一个与后来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关。但“新政”话题是赵的定见，已经提交政治局，也已经报知邓小平，并已经见诸报端，已无需再征求意见。因此，只有未出将出的事件，才需要征求意见；而且，必须是事关重大的事件，才需要在这样一个繁忙的早晨，兴师动众。综合二人的谈话，符合这个标准的，一个当时历史尚未展开的全新的重大内容，那就是，赵紫阳在考虑：如何对待邓小平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二位嘉宾决不会空穴来风，突然提到邓小平。而不论是杜导正说“要维护邓这面旗帜”，还是萧洪达想说“对邓要小心”，但欲言又止，都说明，赵紫阳此刻——在5月13日见过邓小平以后——想对邓“做”些什么。那么，赵紫阳此时到底是在为两天以后的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措辞打腹稿，还是有别的更紧急的动议呢？我们不能指望两位忠诚的朋友给我们透露什么。但根据杜导正提供的信息——赵紫阳紧接着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赵准备在面对学生时，说到邓小平的问题。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面对学生，赵紫阳打算怎样对待邓小平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自赵紫阳回国后，就一直在心头盘桓的问题，很可能也是他一直主张对话，却一直没有与学生见面的原因。因为，他一旦面对学生，就必然面对“四二六”社论的问题，面对学运的“定性”问题。

显然，对待邓小平，赵紫阳此时只有三种选择：一是“保邓”、二是“抛邓”，三是“挟邓”。

笔者无法想象，赵紫阳会在学生面前“保邓”。邓也没有危机到需要他去保护的地步。他本人的境况，综合来看，并不比邓小平更好。聪明绝顶的他，不会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在学生面前为邓辩护，那还不如不去。

笔者也无法相信，赵紫阳会到学生里去“抛邓”。如果赵有这个“主观故意”，那就意味着他有自己当头的心理准备，并必须有相应的组织动作。但赵紫阳都没有。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与军队的关系。笔者曾就此询问过鲍彤：

“陈小雅：赵为什么不要军权？”

鲍彤思考。

姚监复：赵刚上任，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见，结果杨尚昆办公室来了个电话：‘尚昆同志可不可以去啊？’他就知道，已经插进来了。

鲍彤：应该说，赵没有这个野心。他忙不过来。他一心想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从这个对话看，赵紫阳对军权是没有兴趣的。虽然，传闻在1988年，为防止“价改”出现的政局不稳，他曾提议建立一支由自己亲自掌握的，有“30万人的特种部队”。但在遇阻后，并未作出进一步扩展军权的努力。这大概是他能与杨尚昆合作愉快的前提之一。他也许并不想玩忽职守，而是觉得没必要在这个自己既无本钱、也无实力、更无想象力的领域强出头。他的人，对杨尚昆在这方面的动作的麻木，恰好与他对胡耀邦和邓力群的警觉性形成鲜明对照。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个对军权无意的人，不可能有当独裁者的主观愿望。

另一个是与新闻界的关系。据《人民日报》内部消息：

“《人民日报》与赵紫阳的关系：《人民日报》在党内非正统派。实体主流不是从延安过来的，是邓拓带来的‘华北帮’。社领导一层中，老干部是延安时期的；比较年轻的像保育均这样的人，也是经过文革磨难，在思想上比较超越的。与胡耀邦的感情比较深。秦川是习仲勋的人。1989年的主导思想是希望保赵，保改革成果，反治理整顿。陆超祺有一句话：‘我们讨论

来，讨论去，无非是怕出第二个胡耀邦。’组织上与赵没有什么关系。胡耀邦下台后，相当一段时间赵没过问《人民日报》的事。后来请人与鲍彤通了话。鲍只说：‘听招呼就行了’。1989年鲍的唯一指示就是‘正面宣传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报社的主流思想也是希望理智、秩序轨道行事。少数人主张体制外的搞法。‘号外’纯属体制外行为，但影响很大。5月18日，听说‘邓小平下台’传闻，保育均曾给鲍彤电话求证此事。鲍只说了一句话：‘绝无此事！’”

“戒严后，钱李仁一直没离开报社，等赵通知最后干一下，但赵没有出现。此前，他一直坚持‘四二六社论’不松口，作为党报，他要听中央的。”

相信读者已经看懂。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更要靠这两杆子。”赵紫阳对这两杆子的态度，说明他无意用非常手段夺取最高领导权。他亲手把邓小平捧为“独裁者”，并非他在审美意义上更喜欢“独裁制度”，而仅仅是为了“便宜行事”而已。

如前所述，就在他召见萧、杜二人的前一天，5月13日，他刚刚见过邓小平。虽然邓对“新政”的态度不尽如人意，但恐怕还不到二人矛盾激化、由敬畏到憎恨的地步。而且，最重要的是，深知自己实力的赵紫阳，不会不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得失，到学生那里去取暖。你见过学生后，还是要回到中南海里来的。中南海的警卫大权即便听赵紫阳调遣，但北京城和国家的军权还在邓小平手里。

因此，赵紫阳此去，最有可能的是，重新诠释邓的讲话——就像邓小平对毛泽东所做的那样；就像胡启立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所说的那样；就像阎明复打算给学生“对话团”进行的答复（但终究没有说出口）那样。

当然，“诠释”，就意味着那不一定是邓小平本人的意思，就包含“重塑”、玩弄、利用的意思。笔者认为，这大概就是萧洪达想说：“对邓要小

心，他说一不二”的用意所在。林彪编撰《毛主席语录》时，就知道这是一个“骑虎”的动作，并曾为自己是否“骑上去”犹豫再三。最后终因骑虎难下而葬身异域。萧洪达久在中央军委工作，曾任叶剑英办公厅主任。他不会不了解这段历史，也不会看不透，如果赵紫阳“骑上去”，他是否能驾驭此虎的结局。

笔者注意到，在帮助赵紫阳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萧洪达对赵、邓关系，曾提过一些意味深长的问题，请看《杜导正日记》：

“（萧洪达：）十三届一中全会 关于邓小平问题的决定（邓在党内拍板的地位）是个根本性问题。将邓摆在太上皇。我们应反思我体制的这种封建东西。一人执政，一句话上台下台。以我（指赵）个人名义请教你（指邓），可以，组织上这么做，错了！此会你说这番话时，我在座。这么大的事，你事先不与常委谈，在中央开会这么决定。这件事你要负主要责任。你这是一种陈旧观念。十五大后，我知李鹏成立审查小组，说你‘挟洋制华’。”

笔者认为，此时的萧洪达实际上是想说，赵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的作为，是一种“公权私授”的行为；权威不够的赵紫阳，把邓抬为“太上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嫌疑。但碍于上下级关系，萧洪达只能婉转表达。

对此，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早在耀邦辞职前，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小组，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邓仍留在常委里为好。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

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但邓坚持认为：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的国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在十三大不改变，那就是一种倒退，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1987年3月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但要求他们退下去，邓自己就只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陈、李半退’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一开始的时候，陈云、李先念、彭真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邓就请薄一波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几经周折，看来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这样，这个方案才被勉强地接受下来。”

“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但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但从以后的情况看，有重大问题邓还是得同陈云、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陈云）。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陈云、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对于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上述决定的过程，鲍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给予了详细的说明：

“问：有人针对海外新闻媒体报道，您早先关于十三大一中全会（重大问题请邓小平掌舵）决议形成经过的介绍，认为是赵紫阳参与了这一最后使他自己倒台的‘垂帘听政’政治机制的设计……，对这种观点您持什么样的评论？”

“答：十三届一中全会确有‘重大问题请小平同志掌舵’的决议。那是中委和中顾委联席会议，小平在座。一中全会开幕，紫阳在致辞时讲了这段话，全场鼓掌。紫阳说，好，大家赞成，这就是全会的决议。大家又鼓掌。赵的这番话和大家两次鼓掌，都出于对邓的尊敬。

“上一天，紫阳找我，说，小平同志退下来了，一中全会上应该有所表示。为了表达对小平的尊重和感谢，不宜即兴措辞，需要有个底稿，届时基本上采取宣读形式，以示郑重。所以我既是中央全会的参加者，也是赵致辞的底稿的起草人，前因后果我清楚。”

对于自己参与制造的这个错误，尽管不负主要责任，鲍彤依然作了深刻的反思：

“决议是全会鼓掌通过的，是正式的，合法的，有效的。但是，就算后来没有发生六四事件，决议的内容仍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把一个党，乃至一个国家，交给一个人‘掌舵’，显然违反宪法第二条，违反科学的历史观，也违反十二大党章所表述的组织原则。”

“这个原则性的错误，主要责任无疑在紫阳，我也有份。……许多人在造神的过程中都出过力，紫阳出过力，我虽人微言轻，也曾略尽绵力。”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针砭自己，也有提醒别人的用意：把人神化或者鬼化，是咱们中国人（是的，中国人！——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很容

易很容易犯的毛病。”对此，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也曾有一段严厉的评价：“通过这个决定，犹如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其精简的决定》。那时，不但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且在组织上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时，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他说：

“这实际上违背了党章，成为日后毛泽东凌驾于党之上，享受绝对权威，无法无天的章本。”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不吸取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教训，反而违背党章，首倡赋予邓小平最后决策权，而与会诸公却只知逢迎，鼓掌通过。这实际上促成邓小平的“太上皇”地位，是他日后能翻手把总书记打翻在地，并违反天下民心，独裁决定‘六四’屠杀的章本。而且赵紫阳倡导的赋予邓小平最后决定权之不合法程度还甚于1943年之赋予毛泽东之最后决定权。因为1943年毛泽东毕竟是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而1987年的邓小平，照他自己说，不过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1943年中共中央还正式作了决定，而1987年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不过鼓掌通过而已。”

但赵紫阳显然没有鲍彤的反思精神。在私下的场合，他反复强调的却是：

“对邓小平有无‘愚忠’？我很感激邓对我的器重，1988年，那些老人攻我那么厉害，邓力排众议，保我，找我三次谈话，甚至要我将军委工作抓过来，如此信任我，在他困难时，我会挺身而出护卫他，我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仁’？‘义’？还是‘报恩思想’？还是中国人的‘人品’？你（指杜导正）记得，‘文革’中，我从未推卸过个人责任。我以为，一个人做人该这样！所以，有人以为我紧要关头（指‘六四’）为保全我出卖邓，我感情上绝不接受。为此我很难过，感到委屈。”

显然，赵一意为自己辩护的是，他没有“抛邓”动机。但他回避了“挟邓”的话题。

挟邓自重，在赵紫阳的最后几年执政过程中，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类事例——在遇到不同意见时，不开常委会，径直请示邓小平，然后以“小平同志同意”为由，号令政治局的事例——可以随意举出，尽管他这样做时，大多是为了排除保守派干扰，推行正确路线。但他的这一作风，有时也会带来不幸后果。1980年代，乃至赵紫阳下台后，在广东平反所谓“地方主义”案，为蒙冤受屈的古大存、冯白驹落实政策、恢复名誉的过程中，广东省委就有人以“文件是经邓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审定的”为由，拒绝落实政策。以至于有人气愤地说，现在不是领导人决定历史怎么写的问题，而是历史怎么评价领导人的问题。据笔者查证，该事所涉1979年10月中央批复的文件“经邓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审定”查无实据。

对于利用邓小平的问题，赵紫阳在“六四”后的清查中，曾有过一段不经意的表白。当时，专案组问他，“是否因地位不稳，想通过民运博取政治资本”，他回答说：

“1989年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当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他还说，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难，不好搞；通过他这样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当时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做，你现在挂在这里，对我有好处。现在我们经济工作还有些问题，物价不稳定，有些波动，无论如何现在不要提这些问题。目前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的工作。”

在赵紫阳与邓小平关系问题上，鲍彤的估价似乎更客观公允。“六四”后，他在一篇答记者问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1989年4月以前，人们一般有这样的印象：赵遇到重大经济问题游刃有余，但遇到重大政治问题，与其说他是独立的政治家，毋宁说他是邓小平的

代言人。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实很难显现出赵的独立的政治主张。所以，当时的学生大概普遍认为，邓和赵是可以画等号的。”

“1989年5月是一条分界线。过去，在政治改革的措施步骤之类的非原则问题上，赵做到了充分尊重邓小平的意见；现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赵和邓发生了分歧……”

综上所述，赵紫阳早在5月14日，就已经至少产生提出邓小平问题的“念头”。那么这个念头的遭遇如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令他又回到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口径了呢？这里就要说到第三件事：

据《陈一谔回忆录》：在赵紫阳下午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邓办曾通知赵办：希望赵紫阳说明，上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就标志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因为苏联与中国两国不同，苏联老一代领导人退位后就只能代表自己，现任领导人才代表组织，而中国则还由老一代在左右局面。

因为陈一谔的回忆录没有注明消息和资料来源的习惯，我们无从知晓，他的这个消息，究竟是来自邓办还是赵办？亦或是道听途说？如果是两办的沟通，最终要汇集到赵紫阳讲话稿的撰稿人鲍彤那里，并最终传达给赵紫阳本人。那么，我们从鲍彤那里，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读到这个消息。

在赵紫阳那里，是这样说的：

“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

陈一谔的讯息，很可能来自邓小平和赵紫阳这次谈话的内容。如果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促使赵紫阳改变外交部方案的关键原因，就来自邓小平本人当面表述的意愿。

赵紫阳回忆上述过程时，邓小平依然在世。据杜导正这一天的日记记载：

“赵说，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是作为总书记的会谈。以后邓谈，邓说，我与戈尔巴乔夫的谈判，即中苏两党、两国恢复了正式关系。”

“外界对此有反映，说邓非中央委员，更非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应叫正式恢复了（两党）关系。于是我出面解释，说邓是中国的最高领导，目的在维护邓的威信。赵说，戈尔巴乔夫回国途中发来一份电报，说你们中共出现一个赵紫阳，这是你们中共的幸运！这个电报，估计给我帮了大倒忙，惹恼了邓小平，邓小平极不满。”

因此，在赵看来，邓，至少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具有当仁不让的气势，并对他怀有嫉妒心。而他的“推邓”，也不是什么“保护邓小平”，只不过是“知其雄，守其雌”，在强人面前“礼让三先”罢了。

第四件事，香港《争鸣》杂志披露，1995年莫斯科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三十九章第三节记载，（简称“戈说”）“作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上午与戈会见时，已经公开宣称：‘现在我们可以宣告：中苏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

赵紫阳在邓戈会晤后，也听到了类似消息。事后，他对杜导正等人说（简称“赵说”）：

“我与戈谈前，外交部替我起草的发言稿中有一句：‘今日我俩会谈，就是苏共、中共两党关系最正式地恢复了！’按说，这是对的，戈、我是两方的总书记嘛。但我不知邓的底，我将这句话删去了。果然邓与戈谈时，邓说：我俩今日是最高当局谈话。以后，我又出于维护邓的威信，免除误会，才说了邓是我党最高权威的话。实际情况呢？在邓小平引退后，政治局开了会有过正式决定：一、政治局重大问题要向邓汇报；二、政治局重大问题由邓小平拍板。我公开讲话并未将这个底如实端出，我只说，邓是我党历史形成的领袖；重大问题，我们向他请教。”

当然，在笔者搜罗的史料里，与上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说法不同的也有四条，在邓小平会谈的录音资料最终公开之前，我们仍可以作为备考，存而不论。这四条反证的资料是：

一、许家屯回忆录的说法（简称“许说”）：

“5月15日，苏共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赵紫阳却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

二、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的说法（简称“张说”）：

“（5月16日）上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对戈尔巴乔夫说：今晚，你还要同赵紫阳总书记见面，这意味着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了呼应邓小平上午的这句话，也为了进一步强调邓戈会晤是中苏两国高级会晤和邓小平在中国的重要作用，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

但是，以上两种有利于邓小平历史形象的说法，并没有被《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载。《邓小平年谱》和《文选》的记载，既不同于“赵说”和“戈说”，也不同于“许说”和“张说”。

三、邓小平的说法（简称“邓说”）：

“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我们也宣布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刊出这一文章时，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注释中写道：“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邓小平当时说的，比此处刊出的要多一些。而省略未刊的，很可能存在某些瑕疵。

可以佐证邓小平说的，是鲍彤的说法。

四、鲍彤在答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时说（简称“鲍说”）：

“5月16日，上午是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是赵紫阳见，中午，中联部的人就来跟我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谈了些什么……他们提到，邓小平说‘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就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常化’，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就把它写进了下午的讲稿中，我是这样写的：‘你（戈尔巴乔夫）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面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因为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了，但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在最重要的的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掌舵。’大概是这个意思。”

“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就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常化”没有出现在“邓说”里，依笔者判断，很可能就是被《年谱》和《文选》省略的部分。由于“鲍说”的存在，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在关于“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传闻中，可能存在理解的差异。邓小平说的“利用这个机会”，究竟是指“邓戈会晤”的机会？还是泛指“戈氏次访华”的机会？邓小平所说的“两党最高领导人”，指的是他本人？还是赵紫阳？可能存在歧义。不同的人读到相同的话语后，通过自己的大脑进行加工后，再次传播出去，就可能走样了。

此中真相究竟如何，在相关录音资料解密之前，仍是待解之谜。

但无论如何，在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关系上，邓小平本人不可能是没有感觉的。5月19日在决定“换马”的邓家会议上，邓小平终于说出了心中的这一感想：

“赵紫阳……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

纵观二人恩怨情仇，也正应了余英时教授的一句话：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第四节 赵紫阳醉酒

由于历史给赵紫阳的机会在这里戛然而止，我们未能从国内出版物看到关于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全面介绍。但此中缺憾，后来由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得到了弥补。

这本回忆录是这样描述他与赵紫阳的谈话经过的：

“……会谈一开始，他（赵紫阳——引者注）便强调了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变革当中的作用。‘革新’，在其本来的意义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因为就在我们会见的地方——人民大会堂的墙外，狂飙突起，大学生们要求与国家领导人进行直接的对话。而中国领导层正在讨论‘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而且，我想，赵紫阳告诉我的，正好是这些不同的观点之一。这使得我们的会谈特别有意义。”

包括赵紫阳开篇就向他透露的高级机密，戈尔巴乔夫感叹，“两党之间的交往立刻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实在令他意外的惊喜！“改革本身在不经意间便成了会谈的主题”，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他是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事业中的积极追随者之一。我以为，中苏两党共同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如何在国家和社会民主化的条件下活动。”

图6-：民主——我们共同的理想（选自香港《争鸣》）

而赵紫阳则批评了“学生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显然是幼稚的，简单的”。现在的问题是“在青年和学生与党和政府机关之间，相互缺乏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戈氏与他有共同语言。

赵紫阳说：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经过改革才可能显示出来，也只有改革才能够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现在，我们必须回答资本主义提出的挑战。而除了进行改革，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也没有别的武器。”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衰朽。我自然不赞成这种观点。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解答世界上——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理论的解释，那么，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衰朽。因此，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不断发展着的形势相适应；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和概念的探索。有人告诉我，今天上午，您与邓小平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根据他的说法，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改革正在全方位的展开。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作用问题。没有市场，价值规律不可能发挥作用。由于对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进行限制，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便无从谈起。然而，如果我们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取消这些限制，那又很难控制物价上涨的范围。这正好是旧的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的后果。”

“这是困难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以前，我们把这些问题想得简单了，而现在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戈尔巴乔夫同志，您说过，希望我们两国的学者交换意见。我同样赞成两国学者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理论问题上的合作。中国接待了许多西方的专家。不过照我看，更重要的是组织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那些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之间的交流。”

戈氏回忆道：“当赵紫阳谈到改革的方向、范围和深度，以及变革的速度时，在我眼前浮现的一直是自己的国家。参照中国的经验及其已进行了十年的改革，我获得了对我国各种变革的速度和后果有利的补充证据。我和赵就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关系的交谈，特别有趣。”

接着，他很得意地谈到了“公开性”的益处。但他们谁都没想到，赵紫阳即将或正在收获这一政策的“恶果”。不过，赵紫阳重申：

“我们不打算建立一种新的、与西方相类似的政党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各政党可以轮替执政。我们的历史条件与实践与西方不同，现在中国的无论哪一个党，都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

赵紫阳问戈尔巴乔夫：“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戈氏回答：“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疑问。”

戈尔巴乔夫回忆道：

“坦率地说，中共总书记在会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开放性，令我感到震惊，甚至在会谈过程中我都在想，这可能意味着点什么。但只是在后来我才明白当时这个人的感受，即现行方针与价值之间的紧张，造成了他的什么样的内在冲突。这是一个改革家，一个与邓小平关系亲密，并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家，一个具有‘新的思想体系’的活动家。很明显，赵紫阳的追随者有不少是独立思考着的人，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如此。在那些日子里，他正面临着学生群众发出的民主的挑战。赵紫阳不可能不知道，尽管学生的表现带有公民不服从的性质，但当时许多人都要求恢复秩序。这些人毕竟都是一些追随他、或者至少是为理想所激发起来的基本群众，可是他却把自己与这些人区分开来。这正是赵紫阳的悲剧所在。”

赵紫阳还向戈氏请教了“司法独立”的问题。他问：

“如果详尽地制定相关的法律，那法院是否将拥有最后决定权呢？”

戈尔巴乔夫承认，这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图6-4：政法三校学生的标语（陈小雅摄）

事后，戈尔巴乔夫追忆这段历史时说：

“与赵紫阳的整个会谈，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坐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具有卓越的智能和政治质量，能够对这样和那样的原则和方针提出质疑，有能力为最困难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这些都是我第一次获得的印象，以前我对他了解很少。”

“当天晚上，赵紫阳设晚宴招待我们，地点就在钓鱼台国宾馆内一个虽不大、却很宜人的中国饭店，饭店的名字似乎叫‘同乐园’。而且不知为什么，我还记住了许多中国菜肴中一个特别令人喜爱的名字——‘二龙燕窝’。”

“会谈中产生的坦诚感和相互欣赏，迅速地转移到晚上的会见中。我们谈到当时天安门广场和另外一些大学中心发生的事件。简而言之，重要的是在理性妥协的基础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在与赵紫阳告别之际，我为我们之间富有内容和坦诚的会谈向他表示感谢，并邀请他访问苏联。我对他说，我感到，有必要继续进行我们的交谈。然而，那天晚上与他的交谈不仅是第一次，而且如所周知，也是最后一次。”

戈氏察觉到，赵紫阳所面临的“现行方针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对这位总书记造成了“内在冲突”，真可谓“明察秋毫”。

酒逢知己千杯少。赵紫阳在那次宴会中喝高了。

随后，在5月16日当晚，他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杨尚昆、薄一波。会议的气氛一

开始就显得很紧张。首先是杨尚昆对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两次会谈不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订的节目——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无法进行，非常不满。他认为影响极坏，形势“非常严重”。胡启立也一改前两天乐观的态度，认为学潮正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形势的发展“实际上是把学生逼到一条绝路上去”。对于攻击和谩骂性口号的重新抬头，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呼唤“中国的瓦文萨，你在哪里？”他认为这已经“不是一场一般的学潮，而是有人藉机挑起的一场动乱。”乔石指出，全国不少地方游行示威人增多，“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多有发生；“几千名学生在武汉长江大桥上静坐，交通运输被迫中断。种种情况表明，若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面临严重威胁。”“现在，我们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找出好的办法。当然，要尽量避免使矛盾激化。”

但是，也许是酒精的作用，赵紫阳对于这一变化似乎有些迟钝。他一反过去机敏、圆滑的常态，把过去压抑在心头的话，一股脑吐了出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向常委提出了改变“四二六”社论定性的要求。他说：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揭露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实质。我认为，就绝大多数参加学潮的学生来说，尽管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我们不同意的，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心是可贵的，在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腐败等方面提出的许多要求是合理的，即使有些过激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就听到各方面对‘四二六’社论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我主张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逐步转弯子。但是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所以，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我们必须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出改变，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状态，尽快使事态平息下来。”

直到此时，赵紫阳才将学运问题提交常委讨论。然而，与“五四”游行以后的情况不同，形势已经变得对他很不利了。而他似乎尚未察觉。

据李鹏回忆，他在会前曾谋求过与赵紫阳私下沟通，但遭到了拒绝：

“赵紫阳通知晚上10：00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我坚持要在开会前与赵紫阳进行个别谈话。我将作出最后的努力，争取赵紫阳回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赵结束了与戈会谈，又举行晚宴，而后回到中南海，他们两人似乎谈得很投机。赵紫阳春风得意，几杯茅台酒下喉，面色泛红。我对赵说，我们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制止动乱，挽救国家。只有党中央统一认识，一致团结行动，才能平息动乱，国家才有希望。赵说，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不站在党的一边。……两人明显谈不到一起去，我作的最后维护党中央团结的努力也就失败了，那只好在常委会上见分晓了。” “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一致要求赵出面代表中央向学生发表讲话，阐明中央的态度。但对这篇讲话内容，则有不同的意见……”

分歧仅仅在于，是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还是肯定他们的“爱国行动”？

“杨（尚昆）不同意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认为这与小平讲的‘动乱’相违背，最后导致打倒邓小平。”李鹏回忆道：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只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帐’。赵紫阳则坚持要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尚昆同志说，若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那就与小平同志讲的，这是一场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动乱相违背了。由于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抵制，赵不得不同意了用‘爱国热情’一词。”

“赵在临散会时，又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赵说，出路在于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保护邓小平。我当即发言，社论准确地

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决策，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他的预料，想歪曲是办不到的。”

“我说，我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玩弄这种拙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政治手腕，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讲完后，赵也就不再提‘保邓否认’的事了。”

这一天，鲍彤从电视上看到直播了赵紫阳与戈的会谈，但发现，他为赵所写的讲稿的第三部分没有播出。于是，他打电话问赵紫阳的秘书李勇。此时，赵紫阳的宴请正在进行中。李勇告诉鲍彤，晚上要开常委会，让他到勤政殿去。但鲍彤到勤政殿后，又被告知“今晚名单上没有你，你不列席”。鲍彤回忆道：

“我当时十分尴尬。……到凌晨2：00，会散了，张岳琦同志从会议室出来，我问他讨论什么议题，他说讨论常委致绝食学生书。我问怎么开了这么久，有分歧吗？张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在用爱国动机？还是用爱国行动这几个字上统一不起来；紫阳同志今天不冷静，大概是陪戈喝酒喝多了；今天要不是尚昆同志和乔石同志做工作，恐怕现在也结束不了。”

李鹏“天才地”把赵紫阳的策略概括为“保邓否认”（“论”指“四二六”社论），这大概就是5月14日赵紫阳召见萧洪达、杜导正时提出的思路。从萧洪达和李鹏——处于政治营垒两端——提出的问题的相似性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这艘灵便的航船，在这个暗礁密布、急流飞湍的航道里，首先触到的是政治伦理的暗礁。

第五节 最后的挽救

据陈小平描述，阎明复在统战部和大家一同观看了赵紫阳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对赵紫阳披露“党的最高机密”一节并没有表示惊讶，但却掩不住“内心深处的翻江倒海”。

“五一四”对话失败后，听说欢迎戈氏的仪式不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经历了40多个小时绝食的学生突然陷入了一场自我评价的危机：他们自以为，以自身生命的危险可以构成对政府的强大“压力”，但政府虽然在乎他们的死活，但并不打算屈服于这种要挟；他们自以为，绝食抛出了一张获得谈判优势的“王牌”，但这张王牌突然变得一钱不值；他们以为，只要牺牲就可以换来胜利，但他们发现所有的牺牲都是白费！

广场绝食学生“绝水”和准备“自焚”的消息不断由对话代表们传到统战部。据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5月16日上午，这天正发着高烧的阎明复向赵紫阳汇报了这两天与学生代表的对话情况。他说：“通过与学生的对话，我深深地感到现在学生的情绪特别容易波动，很多学生的心理素质脆弱，高自联、对话团、绝食团这些学生自治组织的意见统一不起来，这些学生组织没有一个能够把已经参加绝食的学生劝说回来，一些学者、教授去广场劝说也没有效果。在广场绝食的学生被推到前台去了，想退也下不来，这些绝食学生现在真的是被放在火上烤呵。”所以，他建议，为了使这次学潮尽快得以平息、学生停止绝食，中央必须尽快拿出措施，最好是由赵紫阳和李鹏出面见一下学生，这样有利于事态的解决。赵紫阳允诺，会见完戈尔巴乔夫后，晚上常委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获得赵紫阳同意后，阎明复亲自前往天安门广场。

但周舵回忆，他经过的事情是这样的：5月16日一早，他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陶斯亮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统战部。陶斯亮让他再辛苦一趟，去把学

生头们找来，閻部长还要再做一次努力。但当周舵到广场，把几个主要学生领袖找到统战部时，閻明复对他们的态度大变：“冷冷的，很严肃，还让他们在传达室坐了好一会冷板凳。当然，还是毫无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不肯让步。”

“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开始劝说閻明复干脆直接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喊话，不要再指望那些学生领袖了。閻开始有些犹豫，问‘有用吗？’我说，现在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是您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最终，閻同意试一试。但是，怎么去，到哪去找广播器材，閻的安全如何保证？大家又无计可施了。我心生一计，让统战部当时主事的张秘书长给急救站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坐救护车混进广场。张说对，立刻叫人打电话。问了几处，回话都是，救护车都在抢救绝食学生，派不出来！显然是不买帐。又卡住了。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问张秘书长统战部现在有没有面包车一类车？她让人到院子里看了看，回来说有三辆车。我很高兴，说那就成了！您赶紧叫人准备一只开水桶，装上凉白开；再做两面旗子，一面写上‘急救’，一面写‘送水’，我们假装送水混进广场，就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张大喜，立刻让人准备，当即让我负责全部行动的指挥。

两辆车准备好，閻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两边是夹道欢送的人群，不少人还在抹眼泪，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閻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了这番情景也很受感动，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的纳吉！’”

但是，王超华的回忆似乎证明，閻明复的行动，具有很大的被动成分。那天，她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正好来到统战部门口，没有被准入，但她正好看见閻明复一行往外走：

“王丹领着閻明复出来以后说，‘好了，好了，閻部长要到广场去。’我说，‘没有用，你叫他去有什么用？’閻明复马上站住了，‘你看，你看，

她说没有用啊。那你说，我还要去不要去？’王丹和程真都马上冲我喊起来，‘多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机会，你……’最后上车了。”

历史在这里留下一个疑点：阎明复究竟是主动去的广场？还是被劝说去广场的？张良的《真相》似乎是以见证人的姿态持前一种说法；而“中间人”周舵和上述王超华的回忆，支持的是第二种说法。抑或，阎明复在同意“中间人”和学生劝说之后，在5月16日上午——赵紫阳与李昌谈话 前后和即将会见戈尔巴乔夫这个繁忙的时刻——还抽空去过一趟距离并不算远的中南海？又抑或，阎明复早有挺身而出的本心，也经过正当的组织程序，但他有意做出被学生情感“绑架”的姿态，为将来某种时刻留下一一种说法？只有当真正的档案解密之后，我们才会获得真相。

据封从德回忆，在阎明复到达的半小时前，王丹曾到广播站，神秘地通报了一个即将发生的“重大行动”，暗示有什么重要人物要到广场上来。

统战部虽然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平时不过两分钟的车程，此时却已经无路可达。陈小平不记得，他们日常乘坐的那辆“豪华考斯特面包车是如何从禁闭的紫禁城窜出，经过天安门金水桥，然后闪电般地进入了天安门广场”的。但下面的事情，却可能令他、令天安门广场的市民、学生和记者们终生难忘。

这是，壮烈的一幕：

当天傍晚5：40，钓鱼台的国宴可能尚未开席，20多个“随从”为阎明复在广场的人山人海打开了一条通往学生广播站的通道。学生纠察队涌上来护卫着一行人。“身穿驼色西装，内衬蓝竖条纹衬衫，没系领带，没系扣子，西服的两个兜盖折在兜里”的阎明复，被王丹和吾尔开希一左一右地架着，他的身边只有一位手持步话机的警卫人员。这时，绝食团圈内爆发出一阵骚动。封从德见状喊道：

“一二！坐下！”

“一二！安静！”

似乎是从病房里跑出来的吾尔开希腋下夹着氧气袋，手抓着两个麦克风。他一手拔出鼻孔里的输氧管，一手抓着麦克风，用嘶哑的嗓音激动地说：“我首先担保阎明复同志，他是我们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请求学生们安静下来，让阎明复给大家讲几句话。说完便倒下，旁边医生手忙脚乱地将他抬上救护车。

张伯笠也在竭力维持秩序。他要求纠察队负起责任。纠察队员立即手拉手地在阎明复的周围拉起一道人墙。

神情激动的阎明复，通过绝食团的广播喊出的第一句话似乎是：

“那些没有见到同学们状况的人应该亲自到天安门来看看！”

事后，陈小平一直不明白，阎明复的这句话是对哪些人喊的？

张伯笠记得，阎明复来到广场广播站后，从他的手里接过了麦克风：

“他很激动，衣领敞开着，头上是刚从人群中挤过来时沁出的汗水。他感性地说：‘同学们，我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你们的同情，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

图6-6：阎明复在广场演讲（选自64memo.com）

“场内渐渐安静下来。面对学生，背后是纪念碑和大会堂，阎明复激动地摇动着麦克风：‘我只是想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未来是你们的，党的事业要你们继续下去。你们没有权利用生命换取你们的要求的达到！’”

“我们只能这样！”一个悲怆的声音传来。

阎明复继续说：

“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以这几天的英勇行为，证明了你们的决心，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很快对整个局势做出全面的公正的判断。希望同志们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做为代价，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而且完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第二点我想代表中央向同学们保证，同学们所担心的秋后算账，绝对不会有的，同学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

阎明复最后说：

“同学们，特别是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能够到医院去，能够回到学校；如果同学们对我讲的，不相信的话，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跟你们回到学校去。我相信真理早晚会证实，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陈小平继续回忆道：

“接着，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向学生们请求说：‘请同学们给我们点时间，我想大家的要求最终会被满足的。’。‘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与你们一起回学校当‘人质’！。’”

“我请求你们珍惜年轻的生命。”

“请你们撤出天安门！”“阎明复流泪了，他的真诚和奋不顾身感动了许多人。在场的许多人也跟着他流泪……但是，阎明复旋风只在广场喇叭能及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然后很快被新的一浪激进的要求取代……”

阎明复讲完话后，立即被一群“突然冒出”来的“穿白衬衫的壮汉”拥进了一辆车。车开走后，广场指挥部“对100多个同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

无论结局如何，阎明复这位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是八九民运期间唯一的一位，在大白天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的党的领导人，

没有之一。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都有比他职位更高的人到过那里，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在夜间或凌晨行动。

事后，阎明复曾说：“我已知道情况很难处理，但我不知的是，当时有国际电视台在转播。”

据说，直到最后，阎明复这条线仍然在尝试着发挥作用。只不过，他们已经不知道要与谁对话了。

5月16日晚，北京市政府又命北京市红十字会接手绝食晕倒学生的抢救工作。按有关资料统计，为应付这场他们亲自呼唤来的“天外来祸”，先后调动了100多辆救护车，数百名医护人员日夜守护绝食现场，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两千张病床，调运6000顶草帽，1000条军用棉被，78辆大客车，400多块厚木板，并在天安门广场搭起临时冲洗厕所。

此外，还调用了许多防中暑、感冒、腹泻药济，及大量面包、饮料等；仅北京市急救中心，就用去近400箱各种输液药品。事后，绝食学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与北京市与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当然是分不开的。但主要还是广大医务工作者伟大的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及全社会的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政府方面，从后来的所作所为全面判断，“救人”基本上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因为，不能设想，一个怀着人道之心抢救绝食者的人，5月14日学生与政府进入正式对话时，5月16日当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会有意断绝天安门广场供水，此后又用枪弹夺去对付那些在绝食后留存下来的生命。

图6-7：自动组织起来的医护人员但当广场救援（选自香港《90年代》）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终于通过广播，将昨晚常委紧急会议争吵的结果汇成的那篇，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能解决问题的，保证对学生决不进行“秋后算账”的书面讲话，对广场成功播放。讲话内容是这样的：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据陆超祺5月16日日记披露，这篇讲话稿原是《人民日报》记者的一个采访促成的：

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进入第四天，队伍已达到三千人，先后晕倒的已达六百多人。……

大家心急如焚，见面除了议论此事没有别的。

下午2：30，按计划召开总结这次学潮报导开展新闻改革的第二次座谈会。……老钱首先介绍今天上午中南海开会的情况：承认形势严峻，又讲党

和政府如何重视。中心意思是希望大家想办法降温，不要再给天安门广场升温了。

会上许多人发言都很激动，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为了维护一个人的错误——小平同志“四二五”关于动乱的讲话，竟不惜激怒全国人民？

大家对如何有利于降温提了一些建议。有人建议由《人民日报》写评论纠正“四二六”社论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这行不通。这并不是我们怕承担责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人尚且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这是因为现在谁知道了，“四二六”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写的，并且知道社论也不是报社写的。我们现在还是党中央机关报，未经中央授权，报社是不能办的。

有一位同志建议，用记者访问赵紫阳的方式，给赵一个表态的机会。大家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座谈会后，编委留下继续商量，作出两条决定：一是设法与赵紫阳取得联系，二是派记者访问一些在学生中有影响的名人，请他们发表谈话，既肯定学生运动，又不超出阎明复讲的界限，同时又对学生、对党、对政府提出要求。

说巧也巧，下班以后，6：00多钟，杨尚昆同志的儿子杨绍明送他拍的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照片来报社。老钱与他谈我们的想法，请他说服杨尚昆同志出来推动促成赵紫阳发表谈话——既尽量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又不伤害小平同志。他回去一说，尚昆同志果然同意，要求我们赶快拟一个讲话稿交晚上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8：00多钟，我们把拟好的稿子送给启立同志。这个稿对学生运动基本上是重申赵紫阳“五四”讲话精神，但有两点新意。一是强调是中央常委一致意见（针对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向基层散布“五四”讲话不代表中央）；二是秋后不算账。讲话共500多字，题目是《赵紫阳总书记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晚上值班，一直等回馈资讯。到12：00，除了中国青年报电话询问传说赵紫阳今晚去天安门广场发表讲话，中宣部传出同样传闻外，毫无动静。我和大保等得不耐烦，打了二个试探性电话，一个给阎明复，一个给鲍彤。阎的家里和办公室都无人接电话，鲍彤的电话是位姓吴的接的，说开会未回来。这说明会上斗争很激烈，但会议没结束，还有一线希望。

快2：00时分，新华社预告要发重要稿件。不用问，准是我们久等的了。

新华社稿很快就来了。我们代拟稿的内容还保留着，但形式变成了赵代表中央常委发表书面谈话，并增加了劝学生停止绝食，保护身体，以及党、政府将继续与各界对话，认真研究民主化方面改革的问题。

夜班一些同志看了新华社稿以后，觉得不过瘾，怀疑这个谈话能解决问题。主要是没有明确表示“学生运动不是动乱”，同时没有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学生，时机也晚了一二天。这些看法是颇有道理的。

然而，毕竟是前进了一步，继续这样走下去，这次民主爱国的群众运动是可以慢慢缓和下来的。

然而，赵紫阳和政治局常委们可能从未预料到，在矛盾的不断升级、时间的一再耽搁之后，这篇充满善意和苦心的讲话，得到的反应却是：现在不是你们对不对我们“秋后算账”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不对你们“秋后算账”的问题了。

据阎明复说，这一天的早晨，赵紫阳等中央领导曾试图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

“听说我走之后你们同学组织讨论，有些同学同意我的意见，但大部分同学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本想到广场上去看望同学们，因为没有与你们联络上，就没有办法进去。”

阎明复这个说法，虽然所据事实可疑，但它无异于在宣告，你们，错过的是一颗擦地而过的彗星！

领导权行使无效，学生的地盘又进不去，其时，这位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或许也没想到，在诺大个中国，在沸腾的首都，他已经成了最无事可做的人。等待他的，只能是一个“多汁的诗人”的命运。联想到两年前，他抛弃改革派同盟胡耀邦，以开拓自己的前程；1989年初打算牺牲知识分子渡过政治危机，人们只有替他感叹政海沉浮的无定波澜。赵紫阳可能从未反思，他在上述执政进程中表现出的急躁和思路单一，恰好是今日学生急躁和思路单一的不同表现而已。

第六节 倒邓狂澜

据《中国“六四”真相》，5月17日，安全部统计，北京爆发运动以来最大规模游行，上街人数近120万，甚至东西长安街两侧的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大楼，也垂下声援学生的标语。

声援的队伍中，有高校的教师，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有新闻、出版、科技、法律、公交财贸、商业邮电、市政、饮食、工厂、企业、医疗、国家机关等许多部门、行业的职工。还有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

图6-8：佛教界的呼吁（选自64memo.com）

中央和国家机关参加游行的单位有：中直机关、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国务院机关、国家体改委、国家教委、外交部、文化部、卫生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审计署，直属单位有兵器部318厂、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和光大公司。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

此外，还有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

这一天，最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是中国天主教神学院的队伍。紧随其后，是刚下火车还未安顿下来的河北大学的学生。

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民主党派”的大红横幅引导下，进入广场。

工人队伍里有首都钢铁厂、北京齿轮厂、北京第二、第四机床厂、北京起重机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第四制药厂等单位，及煤炭、石油、铁路、建筑、造纸工人。此外，还有上访人员声援团、失足青年声援团、个体户声援团、农民声援团、失业的人声援团，也参加了游行。据称，“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约十几平方公里的范围，24条主要交通干线处于瘫痪状态。”

这一天，游行队伍的标语口号五花八门，大多数仍是声援学生，抗议政府对绝食100个小时置之不理。除此之外，则是表达各自的政见。

——如笔者在本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看到的一份“五一七全市游行口号”，共列18条：

（1）声援学生绝食斗争；（2）坚持改革，反对倒退；（3）学潮不是动乱；（4）推倒“四二六”社论；（5）政府必须公开承认“四二六”社论错误；（6）我们要民主，不要独裁；（7）我们要法制，不要人治；（8）绝对权力，绝对腐败；（9）维护宪法，维护人权；（10）捍卫新闻自由；（11）老人政治，必须结束；（12）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3）欢迎子弟兵和人民站在一起；（14）大学生万岁；（15）人民万岁；（16）打倒官倒，反对腐败；（17）提高警惕，保持秩序，防止坏人趁机捣乱；（18）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图6-9：五一七游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美国所队伍（陈小雅摄）

——一九三学社的横幅是“要真理，不要面子”；

——一个体户请愿团的横幅是“还我自由”；

——中国检定研究所的横幅是“腐败=爱滋病”；

——北京服装学院的标语是“请政府穿比基尼，增加透明度”；

——宣武医院的横幅写的是“难产，难产，政府难产”；

——《中国青年》杂志社和团中央的一幅对联说：大贪抓小贪——安定，大倒整小倒——团结，横批：国际笑话；

——中央财经学院的一幅横幅是，“88年，官员吃喝 410个亿；教育经费350个亿”；

——航天部的一幅标语写着“导弹，导弹， 瞄准腐败”；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横幅写着，“秘密决议——4100万党员的耻辱”；

——公安大学 400名穿警服的学生，也打着“警察醒了，维护正义”的标语上街游行。

——海关总署的横幅写着“官倒走私，铁证如山”。

——佛教声援队的标语写着“慈悲为怀，爱人如己”。

——北师大教工的标语写着“学生是我们的骄傲”、“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

——中国专利局的标语写着“中国专利营养秘方：50岁少年，60岁青年，70岁中年，80岁正当年。”

此外，还有：

“寻人启事：李鹏、赵紫阳，你在哪里？”

“领导多喝一口茶，学生多流一滴血”。

“赤子热血融冰雪，政府冷漠寒人心”。

“白猫抓权，黑猫抓钱”。

“小平小平，没有人性；紫阳紫阳，心地冰凉；主席主席，主持宴席；总理总理，总是不理。”

“一天不理，是为呆也；二天不理，是为蠢也；三天不理，是为昏也；四天不理，是为恶也；五天不理，是为残也；六天不理，是为虐也；七天不理，必完蛋也！”

“民可载舟，也可覆舟”；

“卖掉奔驰，不买国库券”；

“给官倒放个节育环”……

还有一则《起诉书》上面写着：

事由：离婚

原告女方：人民

被告男方：政府

结婚四十年来感情不和，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男方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在这一天的游行队伍里，还出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画像。

来自军人游行队伍的标语口号则有：

“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

“决不当独裁者的禁卫军；打倒中国的秦始皇；把军队还给人民——一部分军官。”

据一位家住城南的朋友说，这一天的游行队伍经过崇文门路口时，住在崇文门饭店的一群老外也挤到阳台上，配合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用生涩的普通话有节奏地喊道：

“老外，老外，并不见怪！

学生游行，我们明白！”

据国家教委高教司搜集的资料，这一天游行队伍中，攻击邓小平的横幅、标语急剧增多。下午，天安门广场还传出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的模拟像，并在天安门广场放鞭炮。同时，据说，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还出现了“拥护赵紫阳”、“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在这前后，咒骂邓小平，攻击李鹏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

后者的内容之丰富，的确前所未见的。如：

“邓大？党大？”“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听小平的？听人民的？小平下台，人民作主；”“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请退役；”“想小平，盼小平，小平来了不太平；”“打倒中国的马科斯，赶走全斗焕，不要勃列日涅夫，要戈尔巴乔夫；”“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小平，我们的孩子在挨饿，你们的孩子在干什么？”“如此‘帘政’，国将不容；”“人老了，弦子也调不准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天下为‘公’”；“人过80要糊涂”；“我们盼小平归故里，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小平您好（1984）糊涂（1989）”；“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帘子后面找政府”；“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天塌下来，

小个子也逃不掉”；“共和国不要西太后”；“老杨诚可贵，老邓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图6-10：小平您好糊涂

一队小学生挑着的横幅上写着：“邓爷爷，快出来！”

有的领呼口号的人，还操着一口邓小平家乡的四川口音，与整个气氛的欢快、戏谑一起，既表现了人们对这个85老翁的轻蔑，也不乏几分亲切。

还有一些宣传品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追究其1987年用“非程序化”手段免除胡耀邦职务，造成两年党内生活不正常；近又以非常委身份听汇报，把学运定性为“动乱”，造成局势混乱的责任。

同时，在各个校园里，也有不少“倒邓”的言词散发：

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致邓小平同志的公开信》，并征集签名。《公开信》要求邓小平“公开承认‘四二五’讲话以及‘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的重大失误，以缓解当前的局势”。北大近百名教师签名。北大中文系党员副教授曹文轩等4人署名的题为《党员起来抵制独裁》的大字报称，“决不承认邓小平非组织的未经过政治局正式讨论决议的任何个人指令！”

一首用流行歌曲《一无所有》的曲子填的新词说：

我总是问个不休，小平你何时才退休，你频频微笑地告诉我，老鼠还没逮够。

我一直问个不休，紫阳你到底几把手，你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大小总是个头。

我曾经问个不休，李鹏你属狗还属猴，你仿佛谦虚地告诉我，反正不属牛。

我必须问个不休，耀邦干嘛这样早地走，你忧郁的眼神告诉我，死了乐悠悠。

我还是问个不休，中国还有没有救，谁能明白地告诉我，茫茫我神州。

在“倒邓狂澜”席卷首都的日子里，还有两件最无辜的东西——瓶子和猫——也遭受空前劫难。前者因为与“小平”谐音，每每遭到粉碎的命运。平白无故地，你就能见到大街上或楼道里一片“水晶”；后者因邓小平六十年代初期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与邓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因此批他“老右”；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又为此平反；改革出现失误后，人们便开始不客气地称邓小平思想是“猫论”。在翻滚着“倒邓狂澜”的长安街上，游行队伍常常有人用竹杆吊着这种驯良的动物，招摇过市。

图6-11：五一七游行队伍中被示众的猫（陈小雅摄）

有人认为，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与这一天出现的事态有联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巧合”。因为事情明摆着卡壳在邓小平为“四二六”社论的定调那里，而5月17日，是学潮一周月，也是学生绝食达100小时的日子，如果没有赵紫阳讲话，学生和北京市民也会有所动作。这里，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五一七”大游行是谁组织的？

游行的前一天，5月16日晚，以“全市示威大游行总指挥部”名义发布消息的究竟是谁？它所代表的究竟是一个组织，还仅仅是几个人？事后，北师大学生梁二的回忆透露出一些信息：

“我想这只是北大、师大学生散发的传单上故意写的，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指挥部。”

“5月17日大游行的发起人应该是北大的一些青年老师，还有法大的，总之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提出建议，就是既然绝食已到这个地步，我们应该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声援活动，使绝食同学们在心里感到一种支撑力，不至于有孤独无援的感觉，也使政府在心里感到害怕。”

“在北大教师提出这一决议时，我自己也赞同，而且当时就派了师大的联络员回校去通知，我自己也当晚回校去跟老师谈了。第二天就有师大老师到广场打出声援的口号。到那个时候广场人数陡然增加到近百万人。”

梁二的这个信息透露，北师大教师不是主谋，这就排除了刘晓波等人策划的悬念；政法大学的教师也只是参与，这也排除了陈小平及其身后社经所的主动性嫌疑。从梁二两次提到“回校”的情节，此事似乎是在北大议定的，主谋是青年教师，学生的组织起了联络和散播的作用。

既然圈子已经缩小到北大青年教师，那么，会不会与一直抱团的北大作家班有关呢？他们有可能在刚刚扮演完“五一六”知识界大游行的主力后，再次冲到前面去吗？

郑义的回忆，为他们撇清了干系。因为，据他说，在事发前一天晚上，知识界人士《五一六声明》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他们一行人回到北大作家班的宿舍不久，“有人递过一张传单：明日全市大游行，最后到天安门广场集中，游行路线途经王府井、西单等商业街……落款为‘五一七大游行指挥部’。”

郑义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我把传单递给大家传阅，说明天可能出事。……大家都感到问题的严重：这样无人、无单位牵头、无组织的全市大游行，极可能发生意外。一是规定的路线竟要通过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即使当局不搞‘国会纵火案’，也很难保证没有极少数歹徒砸橱窗；只要有少数人砸抢，必有人趁火打劫。倘若发生暴力事件，已维持一个月的非暴力和平运动则前功尽弃，并立即会

招致当局冠冕堂皇的镇压。一是到广场集中：广场本已超负荷，如果百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能否维持住秩序？绝食圈能否保持？绝食已5天的同学能否保证安全？”

郑义想起了那个从广场来求水的学生领袖留下的路条，在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决定提醒学生防患于未然，并当即行动……

从梁二的叙述看，他所说的“北大青年教师”似乎都是一些熟悉的、可以信赖，也比较知根知底的人，那应该就是学运爆发以来一直给学生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其中有“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与赵紫阳的智囊机构联系密切，与社会各界联系广泛的人。说赵紫阳对戈氏的讲话对他们没有影响，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当日众多中央党政机关干部职工上街，应该不是受这些青年教师的影响，和学生自治组织信息的结果，而是被赵紫阳的讲话直接“召唤”到大街上去的。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五一七”游行中另一重大事件——知识界人士发表的《五一七宣言》。下面是这篇宣言的内容全文：

五一七宣言

从5月13日下午2：00起，三千余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八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

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倒“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

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图6-12：政治学所横幅：老人政治应该结束（陈小雅摄）

《五一七宣言》的起草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前所长家严家其。

严家其，1942年出生于江苏的一个商人家庭。1959年正逢国庆十周年，他考入北京中国科技大学。1964年，大学毕业后，对未知科学世界的好奇心驱使他转行，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成为于光远的研究生。毕业后在哲学所当助理研究员18年。

文革期间，他也分属于某个派别。但即便如此，他仍保持科学院训练授予他的观察事物和搜集资料习惯，从大字报中汲取新知，勤勉搜集小字报、传单和群众组织的自办出版物。为交流方便，还与一些“联络站”建立了良好关系。日后他和夫人高皋共同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文化大革命史”，就是以这时的观察、记忆和资料搜集为基础的。

1966年12月，他所在的团体因有人在“日记”中非议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学部”整个团体被打成“反动组织”宣告瓦解，他在遭到多次批斗后反而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从马恩著作中接触到“专制政体”、“立宪政体”、“社会共和国”等概念。对于当时贴在学部的一张大字报，他至今留有深刻印象：

“大字报上揭发有人提倡‘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有一次，我与温锡增谈‘政治斗争三原则’时，温锡增说，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有类似的说法。在当时正在‘清查五一六’的‘大环境’中，我听温锡增讲话，感到万分惊讶。……与温锡增谈话，是我后来决心研究政治学的开端。”

在这段时间里，他从“老革命出身而研究美学”的郭拓先生那里借到了《第三帝国兴亡记》、《考茨基言论集》等“内部发行书籍”。当听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毛泽东是“秦始皇”时，他已确信，中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帝国。这进一步增强了他放弃“自然辩证法”，从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决心。

这位在文革“大动乱”期间实现自我启蒙的学者后来回忆道：

“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〇〇三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两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连在一起的起点，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巩固了这一看法。”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的两年中，严家其集中研究了“政体”问题。写成了《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政体问题》、《专制·立宪·共和——考察“三个时代”的“三种政体”》。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系统研究“政体”问题的《国家政体》一书。

此时，他已确立建立“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的主张，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和国”。“文化大革命”使他确信，中国的制度是“社会君主政体”，毛泽东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

1979年，他以社科院助理研究员身份参加了群贤毕至的“理论务虚会”，同时参加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的创刊会议。他关于“废止终身制”的政见不仅广为人知，而且被邓小平定为政治改革目标之一。

1980年，严家其参与了政法界前辈张友渔领导的政治学会和政治学所筹备工作。1983年，被推荐当选全国青联常委。

同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终身制和限任制》一书。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描述专制政治特征的《首脑论》。

这些知识的储备和思考的结果，奠定了严家其在新一代政治学界的地位，及其政治主张的坚实基础。《五一七宣言》只是这些长期积累的一次喷发而已。

事后，严家其说，这篇宣言完全是我一人在一时愤慨的情况下起草的。他回忆道：

“……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时间越长，愈引起北京市民的担心。学生停止绝食只有两项要求：一是要求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二是要求政府和学生代表团对话并通过电视直接播放。从5月16日开始，成百上千名的学生相继晕倒，除阎明复到广场讲一些安慰性的话外，没有一位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能站出来讲一句话，理睬一下学生‘停止绝食的两项要求’。……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都了解到，问题的症结是邓小平，因为‘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意见写的，只要邓小平不改口，任何人都不能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72小时的绝食，无数辆急救车的呼叫，百万民众的游行示威，都不能打动铁石心肠的邓小平。”

“十多年来，我写过一篇又一篇有关‘皇权’与‘皇位’、‘王朝循环’的文章，我觉得有必要明确把我多年来的想法表达出来。”严家其想，既然他已经在许良英的“激将”下起草过抗议中共上海市委的信，既然已经一次次地签名，现在，面对数以千计学生生命垂危的威胁，他岂能保持沉默？

“我之所以在《五一七宣言》中称邓小平为‘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这同我‘文革’以来形成的看法有关。”严家其说，也与他参与1982年宪法修改讨论时，所预见到的结果终于不幸出现有关：

“1980年9月，北京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1981年至1982年，我应张友渔的安排参加了几次修宪座谈会。由于邓小平正式肯定了‘废止终身制’的提法，新宪法草案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实行‘限任制’，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全国武装力量的统率权不属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而属于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由中央军委主席提名，由‘全国人大’决定。1981年下半年，我查阅了三十余个国家的宪法，发现一个事实：除二次大战期间的日本外，在各国，武装力量的统率权不是由国家元首，就是由政府首脑掌握。我把对新宪法草案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指出，武装力量统率权如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外的第三人掌握，军事首脑就会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政治上的危机。……”

“1982年5月1日，《光明日报》就新宪法草案问题举行座谈会。我表示拥护邓小平‘废止终身制’的讲话和宪法草案中‘限任制’的规定，作了《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的发言： ”

“……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家最高行政权的实际掌握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现代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四种模式：一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合一，拥有国家最高行政权，像美国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是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分离，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国家元首手中，如法国、朝鲜、罗马

尼亚。第三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离，但政府首脑掌握实权，如英国、日本等。第四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无实权，权力集中在另外一些人手中，而这些人掌握权力在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为保障宪法的权威性，第四种模式是完全不可取的。”

严家其说，“第四种模式，就是新宪法草案中规定的模式。80年代的中国大陆的实际政治是，邓小平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但掌握最高权力。”

“1982年底，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任期不受限制，最有实权的人物仍可能终身任职。我当时感到，邓小平所说的‘废止终身制’是一个骗局。”

“邓小平处心积虑地攫取并巩固最高权力，他既要面子，又要实权。党的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胡耀邦任总书记后，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党内控制最高权力。邓小平通过自己担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牢牢地控制国家最高权力。1982年宪法尽管废除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终身制，但为邓小平个人集权和后来的‘垂帘听政’铺平了道路。1989年5月16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需要他掌舵’，正是指出了邓小平个人集权的事实。”

“1989年5月16日晚，我起草《五一七宣言》，对我来说，只是把以往十多年中多次说过的话说得更明白一点而已。”

在5月16日的游行队伍里，已经出现“老人政治，必须结束”、“中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总理总理，总是不理，如若不理，别当总理”等大幅标语。人们到处在痛骂邓小平、李鹏，有人喊着要邓小平下台、“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严家其认为，在这样的气氛下，在《五一六声明》后再写一份更激烈的《宣言》，也不会有多少危险。

“这样，我在5月16日晚上，听了《新闻联播》赵紫阳讲话后，起草了一份《五一七宣言》。5月17日上午，见到包遵信时交给了他。”

据《五一七宣言》的第二位联署者包遵信回忆，从赵紫阳讲话播出后，他一直被一种诡秘的气氛所包围：

“5月16日晚七点多，北大一位姓邢的研究生来找我，说：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明确提出‘倒邓’，大家商量请您出头，发表一份声明。如果需要和他人联系，我们可以帮助跑。我听了一愣，倒不是由于他提出‘倒邓’，因为下午我从北大回来时，从广播中听了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就感到事态的发展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的。我感到纳闷的是，这位姓邢的同学究竟是代表谁来的。他所说的‘我们’是哪些人？我知道他在陈子明那个研究所兼职，但我与陈子明很少来往……”

起初，包遵信以为此人是学生派来的代表，但当他到广场走了一圈，用谈赵紫阳讲话，暗示推翻“四二六”社论问题系于邓小平一人之身等问题试探之后，发现学生虽然无限忧虑，但还没有人提“倒邓”问题。此后，包遵信继续回忆道：“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却看见陈子明留给我的——一张条子，说他来访未见，让我回来给他打个电话，并告诉了他家的电话号码。陈子明从来没找过我，现在这么着急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是不是与小邢找我的事有关？”

“我拨通了电话，陈却说没什么事，只是看看我。奇怪，看看我为什么还要我给你打电话，还是有什么事电话里不便说？这是一个疑问，带着它，我进入了梦乡……”

这一错过，使包遵有幸免于在“倒邓”问题上被北大的策划者或陈子明利用，但该当邓小平逃不过这一“劫”，第二天，他还是被绑上了与之有约的严家其的战车：

“5月17日晨，我起床不久，就接到严家其的电话，问我上午是不是有事？说9：00在政治学所有个会，希望我能参加……严家其见我进来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在研究今天游行的口号，你看看有什么意见？说着就从正在抄写的年轻人手中，将拟好的口号拿来递给我。我看了看，有二十几条，……我说很好……这时严又将我叫到他身边，从几份复印件中拿出一张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份东西。我一看，正是《五一七宣言》。”

“我看了以后，好半天没吭气，严就问我：怎么样？我指一指李洪林等人问严：他们看了没有？严说：他们看了，说还要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反对老人政治，维护民主集中制有什么错？严说，那你是否就签上名？我说这可以。他让我先签，我坚持由他先签。”

此后，包遵信把这份《宣言》带到广场，交给台湾《联合报》记者王震邦。《宣言》于是便成了1989年5月的“倒邓狂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如果没有《宣言》，赵紫阳的讲话也会提醒人们，5月17日的长安街上，也少不了“倒邓”的口号，但它们只不过是老百姓的牢骚发泄罢了。但宣言赋予了这一天的行为一种永恒的理性。而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泄露“天机”的讲话之所以能够“开启”这扇“地火之门”，其原因还是自胡耀邦逝世一个月来，因“四二六”社论迟迟得不到纠正而积蓄起来的民众的不满。赵的讲话内容与“倒邓狂澜”在时间上如此紧密的衔接；加之严家其曾为赵紫阳“幕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赵紫阳、鲍彤都曾对他进行过“包庇”；而且严家其确实在《“五一七”宣言》中援引了赵紫阳的讲话作为“倒邓”论据：

“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

这使人很容易把二人的行为加以联系，并把它当作了一个行动的信号。但事后，当组织也提出同样问题的时候，鲍彤的回答应该反映的是实情：

“我不认识任何非法组织的头头或成员，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任何形式的联系。我和严家其在十三大前共事过一年，但十三大后他就回原单位。今年我没有同他见过面，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或托人捎过什么话。”

从当时的情况看，真正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所以，在《宣言》征求签名过程中，许多人提出了“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

其实，在民运进入4月底以来，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在考虑如何收场的问题的。大量表面上助长了学潮声势的活动，其初衷未始不是为政府，尤其是为邓小平找下台的台阶。如4月下旬知识界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试图迫使江泽民承担“动乱”责任；5月17—18日“倒邓狂澜”中，人民日报社、理工大学研究生、化工部化学研究所、国旅北京分社、《旅游》杂志，航天部的游行队伍专程到北京市委、市政府抗议、请愿，特别是第二天由北京市所属新闻单位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报、北京科技报、首都经济信息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100多名新闻工作者到市委机关请愿，要求北京市委、市府“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教委系统要求罢免何东昌；同日，以曹思源为首的“学者代表”12人和以王丹为首的学生代表9人提出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授权一名常委处理学生绝食问题，均是一些希望问题绕开邓小平的带有引导意义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甚至有部分人广为张贴《就丧失领土主权一事告全国人民书》，披露了中印边界领土争端的所谓“惊人消息”，企图把一场对内的以“政治民主”为诉求的运动，引向对外的“民族主义”运动。

此次学运中，邓小平的确表现出了缺少治理现代国家政治的能力和根深蒂固的家长作风。“倒邓”问题的提出，正是这种状态和人民要求——对现代国家和政治家的要求——已产生尖锐冲突的表现。但客观地说，这还不是

全体人民的要求，只是人民中具有现代觉悟和与知识界接近的这一部分人的要求。“倒邓”，是人们政治现代化要求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这种要求的总体。通过十年改革，大多数觉醒者已经形成了渐进的、改革的、按法制轨道进行的、程序化的运作以”促使国家逐步“长入”现代化的共识，除民间少数急于进击最高权力圈者外，他们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都没有进行一场“革命”的思想和准备。

邓小平是“无冕皇帝”。他的权威不仅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而且是依习惯而成立的。按成文“法”要求，“倒邓”的法律要件——具有实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存在；按习惯法，打倒一个皇帝需要经过革命。如果在人民还没有准备接受一场革命的时候，提出这种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的口号，无异于在子宫不适于怀胎条件下强行植胎，这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产妇”，会带来生命危险。

第七节 《人民日报》记者“逼宫”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有史以来的“新闻维新”，外电自始至终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及时的评价。国内公众亦感觉耳目一新。几年以后，当笔者访问地处大西南山沟里的万县的一个生产队时，一位农村教师得知笔者曾供职首都新闻界时说，只有1989年5月的几天内，中国有真正的新闻。

这个历史性“奇迹”，得自于新闻界同仁的努力。在党管报纸，新闻服从政治，记者端国家的饭碗的制度框架内，1989年5月，学运走向高峰的时刻，不少记者、编辑为争取新闻报道权，在自己供职的媒体，与报社社长、总编辑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5月16日，学生在广场的绝食进入第四天。绝食人数达3000多人，先后晕倒600多人次的消息传到《人民日报》社内，“大家心急如焚，见面除了议论

此事没有别的。”这一天，下午2：30，报社按计划召开了“第二次总编辑、社长与编辑记者对话会”。社长钱李仁介绍了上午中南海会议的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希望大家想办法降温，不要再给天安门广场升温了。”

但编辑记者们似乎没听进去。

“一位离休女编辑发言说：听说孩子们已经情况危急，今天晚上还不知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建议报社编委会：如果我们能单独起作用，就赶紧行动。等到官僚机构行动，孩子们就死完了。……我们《人民日报》的社论错了。今天这个局面，完全是当局造成的。先编造，后又给十几万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哪有这样的事？真是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钱李仁表示，自己和大家的心情都一样，也是忧心忡忡。但今天不可能谈太远的问题，只想谈广场上的问题。“不要死人，用最快的办法让同学们回来”，钱李仁说：

“这个意见我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提了，当然不是向邓大人提的，我见不到邓大人。”

一中年女记者接着说，现在是她从事新闻工作16年以来最痛苦的时候：

“自己的良心受到极大的折磨，想写的东西不能发表。我们现在面临一种抉择：是听党的话呢，还是反映人民的呼声？我们不能光是向上反映一下意见，而应考虑一下我们《人民日报》能做哪些事为人民说话。新闻自由不是恩赐的，不能哪个中央领导给我们一点我们就用一点，我们应该通过斗争，或者叫努力。‘四二六’社论固然是出于无奈，但我想我要是版面责任编辑，我就不发表它，因为发表它在历史上是负罪的。我们要在取信于民这一点上做出哪怕小小的努力，而不能消极等待新华社的稿子。作为一个记者，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一种状态。”

钱李仁说：

“我们也在想办法不要只等上面来了什么东西之后再来改善报道状况。……我们主要是在想怎样使《人民日报》更符合它的宗旨，并使《人民日报》能站得住。要根本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个也可以想，但在报上不能登。在党和人民有差距的时候，报纸是比较难办的，特别是党中央的报纸，更难办。”

一位青年记者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绝食？就是我们《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次学运是动乱，学生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不是法治国家，只要党报一扣帽子，不说你犯任何罪，就可以抓你。所以学生强烈要求公开承认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

图6-13：某报17日在广场的民意测验（选自64memo.com）

一中年记者尖锐地说：

“这场事情不是没有是非，也不是学生不讲道理，就是没有人负责地给学生以答复。现在看起来有一个人能负责的，但他在最初的时候就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现在他又不能负责地出来收回他不负责任的话。问题的纠葛就在这里。我们到底是向人民负责，还是向一个人负责？”

一位记者接着说：

“我认为事情的引起，是因为中央决策的错误。中央的决策是不准确、不科学、不实事求是的。说学生是‘爱国民主运动’怎么就不行呢？这一小步为什么就迈不出去？难道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我们民族就得毁灭吗？有的人把自己的权威、威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党长期政治上生活不正常，才出现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人民日报》要么与党同归于尽，做殉葬品；要么就做一点事，如实报道，包括报道本报同事上街游行。”

有人在会上介绍说，今天的游行队伍中，打的标语、呼的口号，有相当一部份是冲着小平同志来的，如：“小平，你该退了！”“小平，你好糊涂！”

“小平，小平，80高龄，身体还行，脑子不灵，处理国事，胡乱逞能，及时引退，利国利民。”

大家对如何有利于降温提了一些建议。有人建议由《人民日报》写评论纠正“四二六”社论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一老年记者沉重地说：

“我最近去了4个省，见到一些省委的同志，他们也都说，‘你们《人民日报》的社论怎么搞的？谁写的？这么多年了，你们《人民日报》还没有做够蠢事啊！你们写了这样的社论，怎么向人民交代？’现在，我们应报道事实真相。我们在理论上多年讲，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我在新闻界工作了一辈子，经过这么多年的采访生活，我觉得，党和人民一致的时候不多。今天，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了。我们《人民日报》应该与人民尽量保持一致，否则，即使还有一点威信，也会全部丧失。”尽管对话双方意见对立，但最终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个公约数——即上节所述，以《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赵紫阳的方式，纠正“四二六”社论影响，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

这一天，《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公开贴出了《评〈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大字报。文中说：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是一篇反对这次以反腐败、反官倒为主题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极坏的文章。它混淆颠倒是非黑白，是左的时期阶级斗争论的翻版。为什么不肯否定？说学生运动是动乱，就是想吓唬学生、镇压学生，就是迷信手中有400万军队，是对历史的极端愚昧无知。蒋介石搞‘戡乱救国’，结果如何？为何明知错了，就是躲躲闪闪，不肯承认？这次运动全国震动，全民激忿，全球瞩目，造成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的责任不是在学生，而是在当局。特别是这篇社论，我们批判把一个人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批判了那么久，为什么‘句句是真理’的阴魂至今不散呢？这是值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同志深思的。”

评报栏里还有一篇《致编辑部同仁》的公开信，提醒大家关注：绝食学生晕倒上千人，“而中央至今尚未作出实质性的（妥协）回应。《人民日报》几代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艰辛工作而形成的良好社会声誉正在丧失。十年改革的成果正在被恢复计划经济的企图所摧毁。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如果再丧失机遇，将坠入万劫不复之境。”公开信最后呼吁：

“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会问我们，在这个历史的关头，我们做了什么？

学生快死了，人民政府被抛弃了！

改革被埋葬了，中国被世界抛弃了！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让我们走上街头，游行去。”

1989年5月17日，在戈尔巴乔夫于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科技日报》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公开性、民主化的过程中，新闻舆论起了什么作用时，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公开性”的进程恰恰是从新闻开始进行的。新闻是促进公开性和民主化过程最强有力的工具。

乘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东风，在“新思维”激励下，首都各报的编辑记者也汇入了当日市民狂欢的洪流。中国新闻社还打出了“中新社要当中国之音”的横幅。

5月17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群众继续游行声援绝食学生，估计有几十万。在游行队伍中，有高校教授、讲师，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有新闻、出版、科技、法律、工交财贸、邮电、医疗、国家机关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在广场上，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学院等外地学生万余人。

赵紫阳代表常委发表的书面谈话，看来时机晚了一点。正在群情激愤，无法控制的时候，这个谈话显得落在群众后面了。晚上派记者到绝食学生中了解，认为满意、可以接受的为数很少。”

“报社内部也群情激昂。年青人不用说了，一些老同志，三八式、解放式的，六七十岁的人也不够冷静。有个青年写张小字报贴在一楼评报栏里，说编委会处境困难，建议编委出去旅游或休养，由报社组织志愿者临时小组协助办报，安排版面，直到外部环境改善为止。我并不认为写小字报的人要夺权，但却使人想起‘文革’中造反派夺权的丑剧来。可能是许多人都有此联想，觉得这个建议不可取，所以无一人签名回应。不过，大家要干预、影响编报的意图还是很明显，很强烈的。”

“刚吃过晚饭，本想休息一会儿再去上班，无奈李仁臣来电话，说五号楼前面已聚集一百多人，要求和我对话。9：00到报社，刚坐下，就有三位青年进来。他们自我介绍后，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六点要求，包括游行消息要登一版头条，游行的通讯，一个图片专页，还有本报青年和其他十三家新闻单位部份编辑记者的联合声明等，都要在明天见报，并要求立即答复。我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建议，请继续提，我们一定认真考虑，能采纳的一定采纳。至于今晚的版面如何安排，等我们全面研究情况后才能答复，如果没有别的意见，请大家退出去。”

“老钱也接到电话从家里赶来。10：30，他召集在家编委开会，分析今天情况，安排版面。今天没有比群众游行更重要的新闻，大家同意我的建议，群众游行的新闻放一版头条位置，照片可以适当增加，但出一个版太多了。会后，受编委之托，向聚集在一楼大厅的同志们通报版面安排的初步考虑，多数人表示满意。”

“凌晨3：00，新华社通知，中央领导同志可能要到天安门广场与群众见面，要各报等候新闻。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个举措，听了都很兴奋。我们

立刻派记者到天安门等候。等到五点，天已大亮，才知道中央领导人是到协和等医院看望病倒住院治疗的绝食学生，而不是到天安门广场与群众见面。”

虽然有些失望，但从新闻职业的角度出发，总编们觉得这也算一条重要新闻。只是“从新闻价值看，比到广场与群众见面和百万群众大游行的新闻来就差一点了。时间也太晚了”，于是决定，在游行新闻前发一则《最后消息》。

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二版的《人民论坛》上，刊登了冰心老人写的200多字的短文《“此谓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孙”》，全文如下：

“这是两句我小时在烟台农村里很小的一座土地庙里柱上看到的对联。

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几十万受苦受难的我的子孙，这苦难何时才能了结？

我极其赞成北京十位大学校长发表的公开信内说的：‘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

我认为现在只要有一两位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露面，向几十万群众哪怕说一两句同情理解的知心话，就会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的子孙们就不必付出不必要的惨重的代价。

在这里我请求今天的民之父母们，尽快地来保‘我的子孙’们吧！”

请领导“休假”不成，5月18日，《人民日报》评报栏又贴出了一份征集签名信，提出了自买报纸版面发“公告”为报社“正名”的动议。该文写道：

“致编委会：在两天的游行队伍中，《人民日报》的同志呼喊着重‘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等口号，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赞扬。这不能不说是初步地为《人民日报》澄清了责任。我们认为，在中央领导人坚持不与绝食学生对话的紧迫情况下，《人民日报》编辑部应该立即对这篇挑起动乱的社论向全国人民作个交待。我们考虑到报社

领导的困难处境，建议编委会批准由报社同仁捐款在一版刊登广告，由编辑部同志签名发表。内容要向人民交代‘四二六’社论的来龙去脉，本报同仁对社论的鲜明态度，提出几条解决当前紧迫形势的意见。我们相信，此举可以适当挽回《人民日报》的荣誉和形象，也可以对当前的形势起一定的缓解作用。请同志们签名。”

一篇署名“本报记者、编辑、工作人员”的大字报，系统批评了学潮以来《人民日报》的错误，申明了不同的观点，并向报社编委会提出了“对话”要求。该文说：

“胡耀邦同志逝世以来，本报同仁对近期报道提出了很多意见。在此，我们就此再表达意见如下：

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遗憾的是本报对首都学生悼念活动的报道，自一开始就存在不真实，或不够真实，直至没有抵制明显歪曲新闻事实的新华社稿件等有悖新闻道德的问题。诸如在4月20日，在少数人冲击新华门的新闻中，只字未提警察殴打学生、记者等事实。本报记者也有挨打者。4月22日，十多万学生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本报刊登新华社稿中竟然声称天安门广场只有万余人。据说，这一数字还是某中央领导圈定的。请问新闻报道是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以领导意志为准绳？与《人民日报》相反，《科技日报》、《农民日报》如实详细地反映了群众的悼念活动，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界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原则，也是符合党历来主张的实事求是原则的。

二、本报记者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请愿的情况在评报栏上披露，乃是为维护新闻真实性之举动，亦是对本报不真实和装聋作哑的报道的业务评议。我们认为在本报无法（无奈）披露实情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我们报道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

三、从新闻规律上讲，本报‘四二六’社论在尚未刊登时，电台、电视台竟然提前几小时向全国播出，乃是滑天下之大稽之举。本报同仁有权了解内幕。

四、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他们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当前，官倒腐败现象泛滥，这是改革中的最大问题和障碍，也是社会上的主要不安定因素。而法制不健全、舆论监督不力，使其得以猖獗。学生通过和平示威请愿的方式向中央表达自己的意见，实属爱国主义行动。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人民群众有权利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看法，也有权利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国家领导人也有义务向群众作出解释和说明。每一个新闻工作者亦有权利和义务将真实的情况通过新闻媒介准确、客观、全面地传播给大众。这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正像中央所说的那样：‘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五、鉴于本报的情况，我们恳请编委会与我们正式对话，但愿反右、大跃进、文革、四五事件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还有一篇题为《天安门70年历史变奏曲》的小字报上，被人加注说：“本报一位老报人的心声，未能在本报表露，令人遗憾，让本报同仁看一看，大概没关系吧！”文章说：

“今天，11亿人民全在注视天安门广场。今天，11亿热爱祖国、关怀民族命运的中国人的心都飞往天安门广场，同那里的学生一起呼喊。今天，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心系天安门广场，谛听历史巨人的足音。华夏大地，茫茫神州，历史巨人的脚步却是如此沉重，如此艰难，它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汗水、搏斗和鲜血。

整整70年前，当年的青年精英第一次举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呼喊民主和科学，呼喊沉沉黑夜中的同胞，呼喊东方睡狮的觉醒。那一天，终于以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辉煌一页而永垂青史。70年来，它鼓舞一代又一代人为祖国的振兴强盛，同专制强权，同一切形形色色的旧势力搏击，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略）尽管历史不断被嘲弄、被凌辱、被奸污，然而，那些凌驾于人民之上、自认为一言九鼎、可以随意左右历史的人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天安门广场作为见证人，一个个为他们留下被历史谴责、唾弃的可耻记录，不管他们多么权倾朝野、不可一世，也不管他们曾经功勋卓著、受到人民爱戴。只要他们漠视人民呼声，把自己至于人民的对立面，人民立刻就会毫不留情地踏倒他。因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廉洁，要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11亿人民、4000多万党员的共同呼声，是党心、民心之所系。天安门广场激荡着的是民族正气。（略）我们悠长的负担沉重的民族历史又到了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社会主义祖国，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得作出自己的抉择。天安门广场在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晨，由该报记者温子建协调，评报栏出现了“第三次对话会通知”：

“致本报同仁：各位学生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国家的危亡到了最后关头，《人民日报》的声誉也到了最后关头。每一个有些许理性和点滴良心的人都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学生们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点可怜的承认。中央和政府的决策层已经彻底暴露了他们官僚主义的真面目。这时，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设想尽快与编委会进行实质性对话，敦促编委会抛弃最后一丝顾虑，旗帜鲜明地站在千百万人民一边，让《人民日报》发出人民的声音。我们要求5月18日下午3点在5号楼2楼会议室举行职工同编委会的对话，届时请同志们自由参加。大家可在上午在会议室讨论一下下午的会议和大家的想法。我们设想是否可以有如下内容，比如向编委会提出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最高要求是起草并发表本报同仁的公开信，披露‘四二六’社论的真相，呼吁人民参与国事，要求改组政府。最低要求：拓宽加深报道

面，明确肯定、赞颂学生运动，比如报道绝食圈里的情况，以及各地声援的情况。二，发表代表本报立场的言论，敦促赵紫阳、李鹏尽快与学生对话。三、发表党员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的公开信。各位，我们游行过了，我们声援过了，我们哭泣过了，我们呻吟过了。现在需要问自己，我们能做什么呢？”

同时，一篇署名“人民日报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也出现在评报栏里：

“鉴于当前形势极端紧迫，党和国家前途系于一发，而个别领导人又有苦衷、难以决断，因此，建议立即召开党中央全会，讨论局势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明确回答学生和各界提出的问题，并采取表决方式作出决定。同时提高透明度，将表决结果公之于众。”

另一篇据说是代表“《人民日报》主流声音”，打算向“人民论坛”投稿，但未获刊发，题为《妥协：民主的本意》的大字报说：

“……现在的政治局势提出了一个利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危机的机会，那就是妥协。民主的精髓是参与，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和全体公民参与和影响事关全局的决策。参与的过程中，冲突是没法避免的，用大家都完全满意的办法来解决那是很少有可能的。权衡各方利益、冲突，制定出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问题解决方案，这就是妥协的过程。妥协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而是民主的ABC，是民主程序的核心。只有专制者才不能妥协。民主和专制的区别，有一点就是解决争端的方式不同。民主用的是妥协，而专制用的是决断。但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一般是不能够准确地朝着一个方向走，专制的效率，亦决断是用高昂的代价取得的。它只能掩饰着日益加剧的愤怒和不满。……学生当初提出9条，现在只剩下两条，即对话，摘掉动乱的帽子。如果我们再要求学生妥协，那么，他们还剩下什么呢？政府实际上无非是人民委托管理的‘管家婆’，并没有什么尊严。妥协也不是什么耻辱。管家婆向主人妥协一下，有什么不可。妥协是暴力以外唯一供选择的办法。拒绝妥协，作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手段，就是暴力的前奏。”

陆超祺在这一天的日记写道：

“社内外群情继续高涨。首都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不下百万，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和国家机关干部。打的横幅比较集中在要求小平同志离休和李鹏辞职上。”

“报社内部，从下午2：00起，大家就聚集在编辑部二楼和三楼办公室和过道里，议论纷纷，仿佛天下就要大乱，民主政治马上可以实现似的。我们编委在老钱办公室听取罗荣兴关于上午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情况的介绍，还未结束，高集、于明、傅真、刘衡、林晰、陈泊微等老同志进来要求谈话。编委会不得不停下来，老钱、大保和我三人代表编委和他们谈话。他们刚说完看法和要求，老钱正准备谈自己的看法，林钢等同志闯进来，说对话不要分层次，二楼会议室还有许多人等着对话哩！经几位老同志同意，大家一起转到二楼会议室，和那里的同志一起对话。

二楼会议室和走廊挤满了人。

会议由群众推举的代表主持，我们三个编委算是他们请来对话的。”

参加这次对话的人数比上次多，把报社的二楼会议室围得水泄不通。钱李仁在开场白谈到：

“刚才有几位年长的同志主动找到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我们一起谈了。不知道这里已经有这么多同志在等着。”

青年记者温子健说：

“我们想谈几个内容。第一，发表一篇社论或“告读者”澄清‘四二六’社论，我理解这意味着报社与中央决裂。第二，当天用四个版面的篇幅报道学生运动，包括社会各界的态度、言论和北京之外各地的运动。第三，根据情况增发号外。第四，刊登本报党员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同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社会正常途径来解决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危机。我们要

求这一建议明天见报。第五，如果不能发表社论来澄清‘四二六’社论，则要求发表本报记者的评论，敦促中央尽快拯救学生。第六，召开本报编委扩大会，讨论本报工作。我们希望报社领导与报社广大新闻工作者一起，按照新闻规律办报，全面地报道学生运动，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责任。”

紧接着，是一位离休编辑发言：

“我们昨天参加了报社的游行队伍，都深受感动。特别是当我们向群众澄清‘四二六’社论不是本报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篇社论时，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这说明了民心所向。因此，我们几位老同志向编委会建议，希望用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向社会澄清这篇社论的来龙去脉，并表明我们的立场。在考虑到报社编委会处境困难后，我们又提出第二种方案，如果不能用本报编辑部的名义，那么我们就在报社内集募捐钱来刊登广告，大家签名，来阐明大家对这篇社论的立场。历史上，《人民日报》在每个关键的时刻，都是犯错误的，都是对人民犯罪的。我们的建议是积极地避免这种情况再现。但是，钱李仁同志认为，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钱李仁同志仍是用旧的思维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众鼓掌）”

钱李仁耐心地解释道：“就我所知道的，党和政府是想了一些办法，做了不少努力的，要与组织绝食的学生对话的，但是都没有成功。”但是，一位青年记者紧接着逼上来：

“我想问钱社长本人对‘四二六’社论是什么态度？”

“‘四二六’社论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对象。我到适当时候将发表我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钱李仁依然清醒地掌握着分寸。一青年编辑对此表示了不满，认为老爷子用外交辞令敷衍社内同志，把自己的记者当外国记者。

接下来的对话更短频快，也更尖锐了：

“ A 编辑：在历史上，《人民日报》执行中央命令，犯了很多错误。反右，文化大革命，当时是鲁瑛，‘四五’，难道我们现在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钱李仁：我对于把我和鲁瑛相提并论表示遗憾。

A 编辑：我们是在讲事实，并不是说你是鲁瑛。如果你自己要比，那是你的事。（鼓掌）

钱李仁：现在的党中央与四人帮时的党中央是不同的。当然，中央有错误，我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什么场合提，我根据情况决定。

一青年编辑：但是，现在的党中央是不是一个人操纵的中央？

一记者：对‘四二六’社论的态度是不能回避的。

钱李仁：我主张务实，讨论改进报道的问题。

一女声：那发表公开信行不行？当天四块板可不可以？

钱李仁：版面上的事情不是在这个场合可以决定的。

一记者：昨天首都新闻界联合签名致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昨天报社领导答复发表，或者变换形式处理刊登。可是今天报上没有，请解释什么原因？（鼓掌）

陆超祺：昨天我们的答复是，如果新华社发，我们一定登；如果新华社不发，几名签名的报纸如果多数登了，我们也登。一句话，我们既不超前，也不落后。（众喧嚣声）我们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公开刊登与党中央不同的观点。

一青年编辑：我认为目前编委会面临一个抉择：是顺应民意、顺应潮流，还是服从党中央，也就是服从邓小平。（热烈鼓掌）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

面，从报社内部来说，是服从广大编辑记者的意识，还是你们个人的意识。

（热烈鼓掌）当然你们的处境很困难、很痛苦。但是，《人民日报》就是这么难当，你站在这个位置就要承担这种痛苦。（有人喊：我们能不能也理解一下学生的痛苦啊！

一女声喊：我认为用自己的乌纱帽换取千百万学生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众欢呼、鼓掌）

钱李仁：从现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党还需要邓小平同志。（众喊：不需要！不需要！）今天在对话中，李鹏总理提出了他解决广场上问题的办法。中心一条是首先挽救绝食者的生命。（众喊：怎么挽救？怎么挽救？）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保持中央党报的性质。如果我在这里已不能贯彻中央指示，我会立即辞职。在此之前，我是不可能把报纸办得和中央不一致的。如果你们想把《人民日报》办成另外一张报纸，在这里是办不到的。”

对于这一次对话会，陆超祺在当天的日记里评论道：

“发言的人很踊跃，共同的意见是不满意目前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导，说态度不鲜明，篇幅少。许多人在发言中都强烈要求发表一篇批判‘四二六’社论的社论，向社会表明《人民日报》广大群众的观点。也有人要求发表一些对运动性质的看法跟中央（‘四二六’社论）不一致的言论——一个人署名文章。等等。这些意见、要求都不算过分，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就应这样做；在民主国家，早就这么办了，但在我们这里不行。”

谈到会风，陆老爷子还不无牢骚地写道：

“说是对话，实际上抢到话筒的人，都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热烈的掌声。老钱、大保和我，完全处于被质询的地位。既不是对话，要理智地回答问题，大家也很难听进去。”

因为钱李仁收到去中南海开会的通知，所以临走时简明扼要地讲了自己的观点：

一、中国现在还需要邓小平的领导；

二、来《人民日报》工作并非自己的意愿，是中央让来的，并且早向中央表示，希望在《人民日报》的时间不要太长，故对当前的宣传报导，只是考虑不要越出中央党报这个格局，并没有考虑个人的利害；

三、在他认为不能履行中央交给他的任务的时候，他就自动辞职。

陆超祺也从总的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说，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可能跟大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的心跟大家是相通的，一致的。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保什么乌纱帽，现在的职务，我个人的德和才都是不配的。我和编委诸同志，对版面的处理，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又能避免出现第二个胡耀邦。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历史大折腾，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改革开放更有利……” “对我和老钱的话，有些人听进去了，但许多人听不进去，包括一些老同志，他们声言出现不了第二个胡耀邦。会议没法继续下去，主持人也控制不了会场秩序。”

接下来的一个震撼人心的戏剧性插曲，似乎打断了这次“逼宫”的进程，陆超祺继续写道：

“我回到办公室，许多同志跟了进来，表示希望编委会不要撒手不管，并说有些同志的想法不现实。这时，不知那里传来(可能是有人从天安门广场听来的)邓小平辞职的传闻，顿时整个大楼像要倒塌似的，人们从办公室走出来，奔走相告，好像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中国结束了老人政治。还有人说，天安门广场已放了鞭炮。”

“我和大保不敢相信。听到几声不同意见就辞职，这不符合邓的性格，这是一。小平同志再开明，也不会在目前的情况下撒手不管，这是二。我们用红机子给胡启立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又给中办秘书局打电话，接电话的同志回答没有听说。大保又给鲍彤打电话，鲍彤说不可能。这时大家才慢慢冷静下来。”

此时，参加首都新闻工作者游行的记者带回了北京新闻单位“逼宫”的消息。一份北京市的新闻工作者散发了《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请战’真相》的传单，系统揭露了北京市领导人在这次学生运动中的不光彩的表演。

陆超祺当时不知道，《人民日报》5月18日的大篇幅报道学运的版面，造成了新华社记者第二天的“逼宫”行动。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5月18日日记记载：

“（下午）回到社里，只见喻权域伏在办公桌上，满脸通红。我见他神色不对，问他：怎么啦？他没回答。我向别人打听，原来是大家今天对本报的版面不满意。部主任们根据群众的呼声，到老喻这里提了一些很尖锐的意见。还对老喻说：‘你休息几天，我们干几天，干对了算你的，干错了，我们承担责任。’老喻认为，这是夺权。……我安慰了老喻几句，急忙找来报纸看。今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用最显著的版面和语言报道了昨天的群众示威。初号黑体字的主标题是：首都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大学生，副题是二号宋体：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而本报呢？只在一版右下角报道昨天的群众示威，还把示威人数大大缩小了。本报对昨天的群众示威采取了很冷淡的态度。现在的北京，很多人已经把对待学生的态度当成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本报今天的版面，使本报同人在社会上脸面无光。当然会引起报社内部的公愤。”

作为在80年代中国率先实践“新闻自由”的知识分子，曹长青曾对新闻界在八九民运事态扩大方面的责任提出批评。这似乎与中国政府的批评惊人

的一致，但笔者认为，它涉及的其实不是一个真假问题，而是一个是非问题。辩论起来，难免陷入“公婆之战”。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与苏联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新闻界在1989年5月，只是朝“公开性”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这只是“民事”的公开，而非“政事”的公开。尤其是党的领导核心的观点分歧，决策过程，党派斗争这些在集权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对于老百姓和有参政热情的社会阶层来说，仍然是一个“黑箱”。这种“单项公开”在党中央和政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公众，使他们对政治革新的期望大大超过了党和政府实际上的承诺。

正因为如此，那些对中国政治更有经验的人们，即使是对学运抱同情态度者，对新闻界的这种冒险精进也不无忧虑。尤其是为赵的政治命运担忧的党内民主派，在新闻界和公众正在为“新闻的解放”而陶醉时，他们却希望新闻界能够作出“自我牺牲”，以学生的有限目标为这次运动的最高诉求。他们希望在“导报”问题上，钦本立不要过份僵持，以免赵紫阳没有台阶可下。中国政法大学应邀“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起诉江泽民”一事进行论证的学生表示，如若开庭，钦本立可能败诉。因为如果对照法律条文，可以在《民法》中找到“越权”一条，但此事不属《民法》范围，而属《行政法》范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年初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后，此时尚未生效。

《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阻止游行队伍上街时说：

“我不是怕丢乌纱帽，只是想避免出现第二个胡耀邦。”

在陆超祺5月17日的日记里，严家其等人发表《五一七宣言》一事并没有被放在重要位置。事后证明，作为老新闻人的职业嗅觉和关照角度，陆超祺对时事的判断力，的确不同一般。

“（5月18日）晚上，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出现第二个胡耀邦的消息还是来了。虽然只是传闻，但无风不起浪，传闻总是某些人心态的反映。

大家感到迷惑、失望，整个大楼出奇的安静，夜班办公室没了往日活跃的气氛！”

第十三章 “五一七”政变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苏晓康、张伟国、吴洪奚、鲍简）

5月17日是学潮爆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民间自发的意见表达运动，完成了从学运到民运的转换；中共高层在处理学运问题上的分歧演化为公开的党争。前者由弱到强，滚动向前，主题从意见表达到寻求公正；后者由隐至显，曲折伸张，分歧由执政理念到权力角逐。上下两造，通过不断试探对方的底线和力量博弈，鲜明推出了双方分歧的“三八线”。左右两党，因“老家长”闭关各显神通，尽皆黔驴技穷，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这个朝野分界的“三八线”面前，民运一方赌的是“命”，政府一方剩的是“枪”。在高层两派的“楚河汉界”面前，右派赌的是“道义”，左派赌的是“实力”。

结局，将由邓小平的复出提供答案。

第一节 “非常”常委会

据《陈一谔回忆录》，1989年5月17日晚，中国有两个家庭“举行了非比寻常的会议”：

“一个是邓小平家的‘五一七会议’。据邓小平家人透露：晚饭时，邓家人坐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太上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脸色凝重地一语

不发，看着严家其、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全家一致认为‘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邓小平使出了铁腕，下定了‘不怕流血，强行镇压’的决心。”

“一个是赵紫阳家的‘五一七会议’。赵紫阳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吃晚饭时向家人说：‘我执行邓小平戒严的决定，可能还担任总书记。如果我不执行，还坚持反对意见，可能命运会很严酷，也会影响你们的前途。但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决定，我不能当千古罪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家人一致表示无怨无悔地支持他的决定。”

这两件事情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但作者的描述却给读者带来一些困扰：如果“不怕流血，强行镇压”的戒严决定，是在这一天晚上邓家的“太上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的，赵紫阳不可能在同时说到“邓小平的戒严决定”，并有“当千古罪人”一类的预言。

此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在第三节还将进行梳理，这两节只探讨，5月17日这一天，在中共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据赵紫阳回忆：

“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邓小平的家，位于北京市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内大街西侧的米粮库胡同5号院。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相当一段时间，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住处。院落的南边，正对着景山公园后门的，是盖有中式琉璃瓦屋顶的总参大楼。院落的北边，则是横切北海和什刹海的地安门大街。据史料记载，在清代，这里属于皇城之内，周围一带曾设有许多为皇家服务的衙门，诸如司礼监、酒醋局、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火药局，还有钟鼓司、供用库、蜡库、帘子库、皮房、纸房、油漆作、花炮作等。米粮库是其中的一个大库，明代叫

做米盐库。胡同总长不到300米。民国时代，因地近北大，曾有许多文化名人——如胡适、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此居住。

35年前，站在米粮库胡同东口北望，是一座真实存在的宫门——地安门，为北京皇城的四门之一，为砖木结构之宫门式建筑。地安门内左右两侧还各有雁翅楼一座，为二层楼，原为内务府满、蒙、汉上三旗公署。从鼓楼或景山望去，两楼与地安门浑然一体，好似大雁张开的一对翅膀。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就是从地安门出的皇城；1924年，遭驱逐的末代皇帝溥仪，也是从这里出宫，回到他的出生地摄政王府。

为便利交通，历届政府分别于1913和1923年将地安门东西两侧城墙拆除。1954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地安门拆除。因此，在邓小平家搬进时，地安门仅仅成了一个地名。站在胡同口北望，视力的终点所及，是巍峨的钟楼和鼓楼。

1989年5月17日下午4：00，在中国首都决定戒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邓小平家召开。出席会议的除邓小平外，还有政治局常委五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以及按惯例列席常委会的杨尚昆、薄一波。万里因出国未能列席。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

会议一开始，赵紫阳先简单地介绍了学潮情况，他说，“现在绝食的学生被推到台前去了，想下来也下不来，事情很棘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说服学生把绝食和他们的要求分开来，让绝食的学生先从广场上撤下来，回到学校去。否则，广场上瞬息万变，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局势很紧张。”

赵紫阳还谈到：

“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四二六’社论定性上。‘四二六’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根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紧接着赵紫阳讲话的，是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他说：

“学潮发展到今天，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个月来，首都是不是发生了动乱？是。现在已经闹得连国事都不能正常进行，连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和接待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闹得连走路、上下班都成了问题，首都还有什么秩序？还能说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还不是动乱？我们谁要承认这种行动不是动乱，那还怎么进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必须把煽动、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和动机纯洁的学生及其他善良的人们严格区分开。”在赵紫阳的记忆中，紧接着他发言的不是杨尚昆，而是李鹏和姚依林。赵紫阳敏感到，在他的讲话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出“很不耐烦，不以为然”的情绪。因此，他一讲完，李鹏和姚依林立即站起来，对他进行了反驳。李鹏的《“六四”日记》部分支持了赵紫阳的说法。他说：

“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惟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真相》记载，李鹏的批评还提到，赵紫阳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亚行讲话”中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

决定、邓小平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这篇讲话未征求过常委们的任何意见。”李鹏说：

“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

在挥舞了一轮“主观大棒”后，李鹏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鲍彤：

“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播出。”接着，他指责赵的讲话报导后，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让“北京市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人们感觉“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搞不清“谁对谁错，以谁为主”？“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高校做学生思想工作的干部感到被出卖了，伤心得流下了眼泪。所以，出现了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几乎完全瘫痪的局面，致使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严重。”

从《真相》提供的这套版本看，此时的李鹏一反往日给人留下的语言木讷、口齿不利的状况，不仅行文流畅、逻辑清楚，而且气势不凡！

在李鹏的记忆中，接下来是乔石发言，但赵紫阳的记忆支持了张良。《真相》记载，接下来姚依林说道：

“紫阳同志接见亚行理事会的讲话，不讲金融问题，只讲国内学潮，要是不看标题，谁都不相信这是一篇对外国人的讲话。我认为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有明确意图的。这篇讲话讲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这可以理解。然后就提出我们确实有很多腐败现象，是和学生想到一块了，我们将通过民主、

法制解决这些问题。这篇讲话根本没有说‘四二六’社论是否正确，绕开这个问题。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这篇讲话等于把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在学生和别有用心者面前，致使学潮越闹越大，几乎达到失控的局面。还有一条，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紫阳同志昨天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要把小平同志推出来，在现在这样的局势下，讲这番话，无异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同志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这等于是给已经混乱的局势火上加油。”

姚依林的这段讲话，对赵紫阳两次讲话动机的怀疑和效果的描述，与一般公众的感觉相去不远。接下来，赵紫阳对姚依林的两项指控进行了辩解。他说道：

“关于我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片好的反映。……尚昆、乔石、启立等同志都认为反映不错，李鹏同志当时还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李鹏同志说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年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关于昨天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十三大以来，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为什么昨天讲了这个事呢？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传达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良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

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负责人做过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所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由小平同志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伤害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说这番话时，赵紫阳没有考虑到，此前他已经公开表示与邓小平不同的主张，他的讲话之所以让人“误解”，其直接的背景和原因都在这里。大概因为这个原因，邓小平对他的解释并不领情。据《真相》记载：

“赵紫阳说这话后，邓小平说了一句份量极重的话：紫阳同志，你5月4日在亚行的那篇讲话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学生就闹得更凶了。”

接下来，邓小平再次对自己的“四二五”讲话按了“确认”键：

“是没有错。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绝对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要用枪炮，用拳头、木棍也可以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前提必须是国家保持稳定。这次事情不一样。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一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那些学生，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

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断言学运的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而不需要证据？为什么搞民主就一定会出现一个“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不需要逻辑的推导？一段时期以来，笔者一直认为，此刻的老人，是否在以对事务“性质”或“实质”的所谓“洞烛”为名，掩盖其老年性脑缺血的症状造成的思维疲乏？直到读到戴晴所写《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了解到中共建政前夕，美国确有以建立“联合政府”，容纳“民主个人主义者”参政为交换的承认条件，因此导致了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选择。笔者方知，这个当年留下的病灶，历经反右、文革两次大爆发，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已成“疤痕”，但一遇刮风下雨，依然会有所反应。

更重要的是东欧的教训。李鹏日记为我们补齐了《真相》留下的（此中必不可少的）过渡缺环。李鹏写道，邓小平说：

“首先中央要一致，错了大家负责。没有这一点精神，还争论干什么，自己宣布垮台算了。其实，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闹就让，让了一步再闹，再让第二步，还是不满意，再让第三步，永远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中国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共产党。如果中央旗帜鲜明，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发展到了很难收拾的地步。你越让，他就要闹，事情还在发展。不采取紧急措施，肯定是顶不住的。上海江泽民同志那里，现在还可以顶住，再发展下去，他们也顶不住了。现在没有时间来争论，谁的缺点和谁的责任，这些问题可以慢一点解决。第一步是坚决制止动乱的发展，第二步逐渐加以消化。如果中央认识不一致，态度不坚决，采取什么措施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邓小平接着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但现在不是来判断争论的问题，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只讨论究竟应该退不退？”

接下来，薄一波说：“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两步，他进一两步。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国拱手让他们了。当然，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这之后，是乔石发言。他说：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政治企图已经越来越明显。他们利用学潮，蓄意制造动乱，已经严重干扰了北京乃至全国许多地方正常的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和教学、科研秩序，他们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不能再退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找出好的办法。我认为，对于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必须加以保护，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对于煽动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必须予以揭露。并尽量避免矛盾激化。”

据李鹏日记，乔石还讲了“‘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之类的话。

杨尚昆也主张“不能退”：

“这是水坝最后的一个大堤，不能退，一退就垮了。这次学潮不仅破坏了首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而且也影响和破坏了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次学潮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动乱，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形势，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一个混乱不堪的，没有希望的中国。在这样重要的关头，我们一定要采取果断而又审慎的步骤，尽快把这场学潮平息下去，同时，也要认真惩治腐败现象，以取信于民。”杨尚昆在讲话中还提到，“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

胡启立的发言首先表示了“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的差得太远了”。赵紫阳则记得，“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但《真相》的记载显示，胡启立当时处于标准的矛盾心态。胡启立说：

“的确，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学生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把绝食的学生从广场上解救出来，退是不能再退了。”

话说到此，不甘心的读者一定会追问，既然邓小平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为不同的观点辩护，而是考虑如何解救现实，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接受赵紫阳提出的由常委承担责任的转弯子建议？邓小平为什么一意要为李鹏和“四二六”社论背书？为什么李鹏起初并不觉得“亚行讲话”是多大的冒犯，但邓小平会觉得是个巨大的冒犯呢？李鹏的态度为什么有恃无恐？这就牵涉到“六四研究”中的另一谜案：

是先有邓小平对学运的“定性”还是先有“四二六”社论？

按照李鹏《“六四”日记》，4月24日晚的常委“碰头会”已经决定并开始组织人马写一篇社论，这个情况与《人民日报》陆超祺的回忆也一致，而李鹏和杨尚昆是4月25日才向邓小平汇报，并取得邓小平的“尚方宝剑”的——为此，大家都把邓小平讲话称为“四二五讲话”。如果这样，那当然是先有社论，后有讲话。至多不过是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对原有的社论草稿进行了修改。但是，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有一段文字却动摇了这个结论。这段文字说：

“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咨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6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邓小平在4月23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

傅高义在书中注释写道，他的这段文字，来自李鹏4月23日的日记。但笔者可以查证的李鹏日记只是这样一段文字：

（23日）“晚8：30，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李鹏这一天的日记并没有写，他和杨尚昆究竟是去了还是没去？但在这本《“六四”日记》中，李鹏多处提到，邓小平讲话是“4月24日”作出的，请看：

李鹏《“六四”日记》5月4日写道：

“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给我来电话，说中顾委委员们讨论了小平同志4月24日的讲话，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25日常委碰头会的意见。”

李鹏《“六四”日记》5月5日又写道：

“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期间，中央把小平同志4月24日谈话记录电传给他。他曾回电表示，坚决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如今为何出尔反尔。”

傅高义为什么能那么肯定地说，邓小平在开常委会前就见过李鹏、杨尚昆？究竟是他有更多的依据，还是望文猜测？还是李鹏、杨尚昆为了“保护小平同志”有意隐去这一节？这只能留待将来更多的资料问世来解答了。

第二节 “戒严”决定的出台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戒严”一事似乎是由杨尚昆率先提出的。赵紫阳道：

“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但不知什么原因，李鹏的日记和《真相》只字未提此事。据《真相》记载，在大家都发表了看法之后，邓小平说：

“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形势都相当严峻。特别是北京，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许多高校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已经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如果再不结束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变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倒退。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4月26日的社论方针。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当然包括我，看着北京的局势都忧心如焚。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首先解决北京的安定问题，不然全国其它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被管制了。考虑来考虑去，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戒严，具体一点就是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戒严的目的就是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这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今天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来，希望你们考虑。”

李鹏《“六四”日记》还记载了邓小平讲话的其他内容：

“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使动乱平定下来。在戒严期间要打击坏蛋，不打击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数不要多，少数几个人。戒严就是要动用军队，军队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如果冲突起来，碰伤一些人也是难免的。北京警力不够，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学习秩序，只有宣布戒严。动作要快，准备好了就立即实行戒严。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不要让更多的人卷进去，陷进去。”

邓小平继续说：

“戒严也是保护大多数，但有些人硬要闹，而且让它扩大，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要安定全国，必须首先安定北京。戒严首先要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要保护公用事业的安全，要保护通讯部门和电台的安全。现在社会一片混乱，什么坏人都出来了，搞打砸抢的也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行动要越快越好。态度要比前更加鲜明，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

邓小平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肃。各位常委都意识到，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候到了。李鹏首先表示，对实行戒严“完全同意”，又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之后，姚依林也表态同意戒严。据李鹏回忆，乔石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

最后，轮到赵紫阳表态时，赵紫阳答道：

“有决断总比没有决断好。不过，小平同志，这个方针我很难执行，我有困难。”

邓小平冷冷地回答道：“少数服从多数嘛。”

赵紫阳表示：“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

各位常委表态后，邓小平提出戒严的事由李鹏、乔石、杨尚昆主持，除卫戍区、公安、武警参加外，还要调一些部队进北京。

邓小平还表示，他将为戒严一事承担责任：

“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

末了，邓小平还提到保密的问题。他告诫与会者：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他还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

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凡走漏消息者，要以党纪国法严加处置。”

赵紫阳回忆：当时，“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据《真相》记载，会议决定：

一、晚上继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部署如何实施戒严；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8日早晨去医院看望绝食学生；

三、李鹏于18日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要求绝食学生全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

四、18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向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报告部署戒严情况。

会后，邓小平亲自打电话给陈云、李先念、彭真，并由秘书通知邓颖超、王震和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于第二天上午开会，通报实际由邓小平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名义作出的戒严部署。

下午6：00左右常委会结束。赵紫阳先行离开。事后，他说他不知道邓小平是否还将其他人留下作了其他部署。显然，一旦失去邓小平的支持，他已经感到自己仿佛成了外人。

李鹏则毫不隐晦，他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但是，这种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当他从米粮库胡同出来时，立即感到落入了另一个天地：由于学生纠察队的阻拦，来往于天安门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车辆，都行走极慢。往日从邓小平家回中南海，坐车只需要10分钟，今天为了避开学生的检查，他的座驾不得不“绕大道穿小胡同”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中南海。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堂堂12亿人的中国合法政府，此时此刻似乎已成为‘地下政府’。”

据高层当日获得的消息，这一天，全国已有27个城市的170多所高校发生游行示威，武汉学生占据了长江大桥，京广铁路被堵塞。

赵紫阳回到中南海家中，于是发生了我们本章开头看到的那一幕。他在家中的饭桌上发出了警告，但应该不是陈一谔的原话，否则难当“泄密”的指控。据杜导正记录，赵紫阳是这样对家人说的：

“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而此时，邓小平的戒严决定已经做出。所以，这个决策与他在晚饭桌上看到的那份《五一七宣言》并无关系。

当晚8：00，也就是在邓家召开常委会两个小时以后，回到中南海的常委们，再次在勤政殿小会议室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据李鹏日记，在这次会上，“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19日晚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

会后，李鹏分别找罗干、温家宝、阎明复到办公室谈话，就当天常委会关于戒严的决定向他们作了通报。

就在同一天，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中国政府避免使用武力，否则，将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关系。

第三节 中南海：焦虑之夜

关于邓家常委会议，赵紫阳事后的回忆简明扼要：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正因为出于这种考虑，所以，他在晚上再次召开常委会之前，利用晚饭前后的间隙，请鲍彤和张岳琦 到自己家里，并向鲍彤口授了一封信。对此，鲍彤是这样回忆的：

“5月17日晚饭前后，紫阳同志要我到他家去，张岳琦同志也在。紫阳同志说，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里，常委开会，作了决策；什么决策，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常委批评我，说我5月4日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我再三考虑，以我现在的认识水平来执行常委决策，肯定是不得力的，肯定会影响到工作；我想我应该辞职。你帮我马上起草一封辞职信。紫阳同志交代后，我立即回办公室起草，并立即送紫阳同志。他看了，没有作修改，说，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树桥同志，请他发出。……紫阳同志叫我写辞职信时，叮嘱我要注意保密，我说，我很注意。”

不知什么原因，这封“辞职信”不仅鲍彤没有留下底稿，赵紫阳也没有留下复制件。事后，李鹏大概是从鲍彤的交代材料中，取得了这封信的回忆。它是这样写的：

“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决策，我服从。但我仍担心事态难以平息，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和恶化，由我来负责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将会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请求解除我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

李鹏称，他所记述的《辞职信》是“大致内容”。

但是，《真相》为我们提供的赵紫阳“辞职信”却完全不同：

“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小平同志：

我考虑很久，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赵紫阳

五．十八”

那么，《真相》版和“李鹏版”《辞职信》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有“戒严”二字，前者没有出现“戒严”的字样，只有“常委作出的决策”这样一个含意不明的概念。第二，后者有主送，包括了邓小平，前者没有；第三，前者日期是5月17日，后者日期是5月18日；第四，《真相》版与鲍彤答记者问的契合之处在于：鲍彤提到，赵在嘱其起草时确有自己的“认识水平、精神状态”的说法，而《真相》版的文字则是“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第五，李鹏版提到赵辞去职务是“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没有《真相》版中的“中共中央”和“第一”等字样，但这与杨尚昆在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讲话》却是一致的。

从文字上看，《真相》版比“李鹏版”更像是一份正式的文书。但在是否提到“戒严”一事的问题上，李鹏的材料与赵紫阳、鲍彤的回忆出现了惊人的一致！

事后鲍彤回忆，那天他到赵紫阳家时，张岳琦已经先到一步：

“紫阳同志交代后，我立即回办公室起草，并立即送紫阳同志。他看了，没有作修改，说，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树桥同志，请他发出。第二天，我去看紫阳同志，他说，信又收回了，因为尚昆同志批评他，如果学生以他辞职为借口大闹起来，将是什么后果。”

事后，赵紫阳在向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时，承认此举是“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做出的。他回忆道：

“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能够继续共事的。”

“在当天夜里召开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劝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而李鹏5月17日日记也证实赵紫阳的《辞职信》是5月17日写的。“六四”后的清查中，专案组《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的第20个问题，也为赵紫阳、鲍彤和李鹏的说法进行了背书：它写道：

“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这就是说，经过党中央长达三个月的审查，赵紫阳没有写出过第二份《辞职信》。唯一的那份《辞职信》是5月17日写的。

这一证实非常重要！它证明，“赵紫阳没有向鲍彤泄露戒严机密”，因此，“鲍彤向部下泄露戒严机密”的指控，也是不存在的。

但是，由此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真相》版的《辞职信》是从哪里来的？是《真相》杜撰了这份材料？还是杨尚昆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其实，当我们读到赵紫阳回忆“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时，已经发出了感叹：杨尚昆——这位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简直就像一个“守夜人”一样，在“时刻守候”着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党的总书记！几乎赵紫阳的每一个动作都逃不过他的视线，但只有在事关重大的时刻，他才会浮出水面。当然，这一次他是对的。但他为什么要“伪造”一份内容和日期都不真实的赵紫阳《辞职信》，留给后人呢？此事我们以后还要讨论。这里先言归正传。

在口授辞职信时，赵紫阳还向鲍彤坦承，常委会上对他的批评。对此，事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第21条是这样说的：

“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四二六’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5月4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

显然，赵紫阳在向鲍彤传达这个信息时，有意略去了邓小平的话，单独转述了李鹏的话。这对事后发生的鲍彤对李鹏的不满，不能不说是有关系的。

赵紫阳的《辞职信》虽然收回，但“五一七”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使他感到：邓小平已一改过去“一贯支持”他工作的态度，并公开表示了与他的分离。

首先，如前所述，赵紫阳本来想单独见邓小平，就是想在邓做决策之前，先与他作一个沟通。不料，邓根本拒绝再与他进行这类沟通，而是直接召开了常委会。对此，赵紫阳似乎感到了意外。也许是因为醉酒，他已经完全忘记，这次常委会，是因为在5月16日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见与李鹏争执不下，双方提到“要提交给邓决策”所引起的。

其二，赵紫阳敏感到，李鹏、姚依林对他进行的批评，“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意料。从两人对他“毫无顾忌的攻击”，他看出来，“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

其三，邓小平在事先没有给赵紫阳任何信号的情况下，突然一改对其“新政”措施“都同意”的态度，突然把形势恶化归结于他的“亚行讲话”；同时在他与李鹏的分歧中，公开表态“站在李的一边”。

其四，“戒严”的决策，邓小平事前完全没有与他这位党的总书记进行沟通，就直接提交常委。而有迹象表明，他与杨尚昆事先交换过意见。

其五，当赵紫阳表示执行困难时，邓小平连一点挽留的表示都没有，就直接作出了交由李、杨、乔执行的决策。这显然已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

事后，赵紫阳还猜测，是否戈尔巴乔夫在归途中写给他的赞扬备至的信，刺激了邓小平？但从时间上看，戈氏5月18日才离开中国，而戒严的决定在前一天就已经作出了。

总之，在赵紫阳看来，当时的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和邓小平的蜜月结束了！

为此，赵紫阳的《辞职信》，没有像胡耀邦那样，交给邓小平，而是直接交给中办秘书局。

这一天的晚上，就在中南海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时，心情沉重的鲍彤也来到位于厂桥的“政改办”，召开了一个有13人参加的告别会议。会上，鲍彤发表“告别演说”：

“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有人说我是黑手、坏人，插手学生闹事；有人说我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于谦有两句诗：‘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扪心自问，没有做过坏事，没有违反过纪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据说：‘最后的晚餐’也是13个人。我当然不是耶稣，同志们也不是犹大。我只希望同志们冷静、守纪律，不要冲动，千万不能惹事。给我惹事事小，给紫阳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阳同志的关系，同志们都知道。我做事历来最怕给紫阳同志添麻烦。王昌龄也有两句诗：‘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你们如果给紫阳同志惹出事来，我担当不起。”

鲍彤借战国时代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的门人侯嬴“以死报恩”的故事，表达了对于赵紫阳知遇之恩的感激，抒发了誓死不负主人的节志。

然而，是否如杨尚昆所言，中央此时考虑的只是平息事态，并没有考虑人事格局的调整？

赵紫阳事后也曾回忆说：“17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邓小平那里，原本打算把赵紫阳“储存”起来，等平息事态、稳定局势之后，仍然会让他继续主持未竟的改革事业呢？因为，

邓小平在“四二五”讲话中也曾讲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要分两套班子，一套处理动乱，一套抓日常工作。还是要把主要力量放到建设上来，不能把人都陷到这里面去。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行。行动不能慢，越慢被卷进去的人越多。”

从5月17日黄昏，结束邓家常委会议时李鹏所流露出来的扬眉吐气的心态，我们可以猜测，他事先并不知道邓小平将在这次会议上作出戒严决定，并让他主持。这说明邓小平对他并非无所保留。当晚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李鹏请仍是总书记的赵紫阳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19日，他们还给赵紫阳送来了在戒严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这些迹象都表明，李鹏此时也没有在权力上取代赵紫阳的准备。

这些迹象似乎都可以佐证杨尚昆所说，此时的最高层仍无人事变动的设想。

在权力危机的问题上，赵紫阳也算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还清楚地记得，在1988年底、1989年初经济改革出现困难时，邓小平曾给予他毫无保留的支持：“正是在到处议论‘赵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不能直接过问经济’，‘已经被架空’等等这些流言时，邓多次反复向我交底，说不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变动，甚至说要我再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后，邓和李鹏谈过一次，他要李鹏分头转告各位常委。因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会上，李鹏、姚依林就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有些批评，有些责难。后来李鹏在找邓解释这件事时，邓就向他说了，意思是保我，要他们支持我。1989年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当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访朝前到他家谈访朝问题时，他还向我说，等我访朝回来后，专门开会谈一下要我搞两届的问题，不仅现在格局不能动，而且下届总书记还要我搞，此事他同陈云、李先念谈过，他们同意了。”

对于邓小平的诚意，赵紫阳似乎直到晚年还深信不疑。果若如此，就存在一个问题，是否因为赵紫阳的“过激反应”，致使“接班人问题”提前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杨尚昆在接下来的“换马”会上的措手不及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邓小平的戒严决定，果真是直到5月17日下午才做出的吗？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家、军事家，这是他的行事风格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他此前对赵紫阳和杨尚昆的信任表现，又当有另一番结论。

第四节 邓小平失踪之谜

根据笔者有限的资讯，对这个问题第一个产生怀疑的人，是鲍彤。请看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谷际柔采访的回答：

“记者：曾经有报道说邓小平当年他其实同意赵紫阳的方案，就是比较温和的方案，当时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

“鲍彤：是。赵紫阳亲口跟我说，5月13号他为了交代戈尔巴乔夫的接待方案，他跟杨尚昆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去，向邓小平汇报……后跟我说：‘邓小平同意，邓小平说都同意’。我记得还有个‘都’字。……这个表示是表示邓小平的独裁还是邓小平的姿态？是邓小平的缓兵之计还是邓小平的真心？这个我就知道了。我只能够知道的是5月13号以后过了四天，5月17号下午邓小平就在自己家里召开常委会，接受了杨尚昆的建议，调动军队戒严。”

“记者：所以关键就在于从13日到17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邓小平似乎是在态度上有所转变？”

“鲍彤：到底是态度上的改变还是说话上的改变，当着赵紫阳的面说了一席话；当着常委的面又说了另外一席话，这样一种改变是什么？这个我就不清楚。这就是研究历史的人会关注的问题。”

鲍彤对“美国之音”记者张楠、何宗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谷际柔和张伟国的几次谈话，都一再提到邓小平对赵紫阳方案“都同意”的问题，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纠结。

第一个对鲍彤这个质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并进行论证的，似乎是鲍彤的前下属——政改办研究人员吴国光。他在一篇题为《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的文章中说道：

1989年5月9日，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因邓小平取消原定与他的见面，对双方政府原定的正式会谈进行“罢谈”，以表示抗议。据称，当时中方给予哈梅内伊的解释是：“小平同志遵照医生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你”。而李鹏和杨尚昆知道的是：“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但是，经具有强大伊斯兰背景的哈梅内伊这么一闹，两天之后的5月11日上午，邓小平不得结束“闭关”，在“四二七”大游行后失踪了14天之后，出现在会见哈梅内伊的新闻里。

而事情的诡异在于，恰恰是在这一天的早晨，“美国之音”广播了“邓小平要退休；在中国，一个时代已结束，赵紫阳在斗争中占了上风”的谣言。

邓小平真是因身体不适，因而耽搁了事先约定的外交活动吗？赵紫阳认为是真的。但吴国光因李鹏掌握的情况不同，而对此发生彻底怀疑：

“整整两个星期，尽管赵紫阳多次要求见邓，但都被拒绝了。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

“一直要到5月13日，也就是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两天之后，赵才得以见邓——距离4月22日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整整20天过去了——这可是中国陷入‘动乱’（按照邓的说法）之中的20天。”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要这样关门谢客，玩起了‘失踪’？查《邓小平年谱》，从4月25日上午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5月11日会见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综合李鹏《‘六四’日记》里的说法和赵紫阳《改革历程》中的回忆，我们可以听到三种解释：第一，身体不好；第二，准备中苏会谈，要见戈尔巴乔夫；第三，‘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

“对哈梅内伊，用了第一个理由，但是人家认为没有说服力；对赵紫阳，开始用的是第一个理由，后来结合上了第二个理由。李鹏日记其实指明了，第一个理由，即所谓邓小平身体不好、不能见客，明显是个托词。这就是说，邓小平以此理由拒绝见赵紫阳，是对赵紫阳说了谎话。既然邓‘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赵要见邓就是来讨论如何应对当时的形势（即邓所谓的“动乱”），那么邓为什么偏偏不见呢？”

“至于说邓要准备中苏会谈，我们知道，邓小平是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就是9日见一下哈梅内伊，中间还相隔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准备下一场会见了。至于赵紫阳，则是4月30日就回到北京了，这中间邓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见赵，不会耽误邓见戈尔巴乔夫。……”

那么，邓小平究竟为什么不见赵紫阳呢？吴国光的推测是：“邓小平这段时间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无法见赵紫阳，也无法见哈梅内伊。很可能他原本计划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内伊那么一闹，只好尽快回京。”

在冠以《军事政变：邓小平“失踪”的谜底》的小标题下，吴国光认为：

“那么，邓小平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要瞒着赵紫阳呢？我的进一步推测是：他出京安排军队去了。”

他认为，邓小平此行与“文革”中毛对付林彪的“南巡”，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尚未获得邓小平此行的任何确凿信息，但根据几件事情，他作出判断：戒严的决定，时间应该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其理由是：

“如果见个戈尔巴乔夫就真的要准备14天的话，那么，北京戒严这样一件大事，难道邓小平仅仅用了半天就决定了？决定之后，几十万军队从八方调来，倒是不用48小时就完成了？如果我们想像这些军队本来已经待命，是不是更为合理一些呢？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待命的呢？推测是在4月底5月初，邓小平失踪的这段时间里，应该也不是全无来由吧？”

其实，关于邓小平自4月28日至5月11日这一段时间的去向，自4月底开始就传闻纷纷。笔者接触最早的传闻，是4月29日一位赴德国公干的商人，在飞机上读到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说邓小平已经到达武汉，准备调兵。同时也听到说“四二七”大游行当晚，邓家晚饭正好吃饺子，邓家公主在饭桌上说，如果学生知道她是谁，恐怕被学生“包了饺子”云云。

此时，流传最多的是邓小平带着一家人去了北戴河。把北京抛给了李鹏。笔者书中采信的还是这种传言。但邓小平是否在北戴河一直待到接见伊朗总统才回京？则因陈一谔的这则亲身经历，又生疑窦。他说：

5月3日上午，在与赵紫阳的秘书李勇座谈形势与对策后，当天下午，就通过电话约定，与邓朴方在邓家见面。据陈一谔回忆，邓朴方当时就有“已经到这一步了，还怎么讲？”的无退路感，但经陈一谔献策，邓朴方似感觉还有转圜余地。二人的谈话进行了“5个小时”。

这段回忆，可以提供给邓小平行踪研究参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参考；二是心态参考。

其一，如果邓小平4月27日以后，是带着邓朴方等家人一道出行的，那么，此时（5月3日），他已经回到北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让邓朴方单独一个人行动。即在这失踪的14天时间里，老爷子并非一直都在外地。只是一直未在公众视野里出现而已。这是一个时间的参考。

其二，邓朴方当时答应陈一谔，跟老爷子说说看。从这个情节看，至少，在邓小平最看重的长子那里，即便在“四二七”以后，尽管对改善邓小平与学生关系已经很灰心，但并非已经没有转圜余地。这说明，老爷子此时可能还没有调兵的动作。至少邓朴方还不知道有此事。而从杨尚昆、王瑞林默许赵紫阳“新政”，邓毛毛嘱咐鲍彤在五四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等等事情的态度看，从李鹏还曾赞扬过赵的“亚行讲话”这些情节看，他们——这些与邓小平最接近的人——也不知道有调兵一事。故此，上述所谓“德国《明镜》”的新闻，应属谣言。

当然，邓小平此时心里盘算着什么，目前恐怕还不便猜测。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赵紫阳“新政”奏效，他不会走出下一步棋。因此，李鹏说他处在密切关注学运状态，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仅仅6天以后，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了。陈一谔回忆道：

“5月9日上午，周杰和史维国一起来找我，表示希望我一起找邓朴方，再做做邓小平的工作。我给邓朴方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平日照顾朴方起居的阿姨。……她说：‘老陈呵，朴方不在，和老爷子出门几天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可能还得两、三天吧。’我突然觉得，莫非老爷子去调兵了？情况很不妙。”

这就是说，邓小平很可能5月3日还在北京，但5月9日已经出京“几天了”。联系到邓小平在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上批评赵紫阳“亚行讲话”使形势发生逆转，很可能邓小平是在5月5日以后，首次或再次离京，原计划是5月11日或12日回京。

至于邓小平这次出京去了哪里？还有待更多的历史资料问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真有4月底的北戴河之行的话，这一次，应该不会去同一个地方。

笔者接触到最早谈论邓小平行踪的资料中，高瑜在《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中的书写似乎比较肯定，它说，邓小平曾飞往武汉，在那儿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据称是组织“第二指挥中心”。时间是在5月19日。

陈一谔也以肯定的口吻谈到，早在5月8日，即党的总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清理整顿公司等六条意见时，呆在北戴河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就开始召见各大军区军兵种的负责人。将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到此为止，我们大概会发出一种感叹，赵紫阳智者千虑，为什么单单疏漏了一个问题：他身后所依靠的邓小平到哪里去了？其实，赵紫阳大概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猜测是徒劳的。邓是一个狡诈的人。他的健康状况、乃至行踪，是国家的绝对机密。事后，他回忆道，1988年，邓小平去上海，路上休克，谁都不知。不仅《邓小平年谱》毫无痕迹，它告诉我们的还完全是另外的故事：邓小平此次赴沪是先到杭州（1月28日—29日），29日会见。2月5日游览西湖。2月10日由杭州抵沪。2月16日由江泽民陪同，出席春节联欢会。可见，连当时上海的东道主，江泽民恐亦不知。

第五节 从换将到用兵

邓小平的行踪暂时无法探得，但他的思路还是可以捕捉的。因为，早在邓小平与赵紫阳见面之前，5月11日，邓小平结束闭关时，就与杨尚昆作了一次长谈。

杨尚昆，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与邓小平是四川同乡。据称，早年将少年邓小平引上“革命道路”的不是别人，正是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杨尚昆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入上海大学学习。1926年11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之后，年仅24岁的杨尚昆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中共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诸多职务。在参与组织上海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任“红中社”主编期间，他与邓小平形成密切的工作关系。1933年到中华苏维埃首都瑞金，先后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34年1月，接任红三军团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和长征。

1935年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杨尚昆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后任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总政治部主任，陕北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直罗镇、东征和山城堡等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并协助朱德、彭德怀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返回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中共建政后，杨尚昆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当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由于工作上的密切合作，加之杨尚昆利用工作之便对人口众多的邓小平家庭的格外关照，邓家与杨家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杨尚昆秉承刘少奇的旨意，在毛泽东卧室、专列安装窃听器。因此，“文革”爆发之前，他便以“特务”罪名首当其冲被打倒，成为著名的“彭罗陆杨”之一。被撤销一切职务后，被监禁达12年之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尚昆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

1978年12月至1980年底，杨尚昆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广东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邓小平重掌大权后，1980年9月，杨尚昆从广东调回北京，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秘书长。1981年6月，邓小平升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7月，杨尚昆接替耿飚任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1982年9月又升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从此一直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时，杨尚昆还兼任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杨尚昆的这些职务，使他对军国人事，及对港台事务享有重大发言权，因此也累积了深厚的人脉关系。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杨尚昆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83年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88年4月，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以81岁高龄取代79岁的李先念，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从此取得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权力。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杨尚昆取代赵紫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在80年代末期，尤其是在叶剑英退出政坛以后，掌控中共政局的“政治八老”中，杨尚昆的影响力仅次于邓小平和陈云。

可以说，邓小平与杨尚昆的关系，比同辈人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彭真更亲密，即使是死心塌地追随邓小平的王震，也无法超越。在不爱交际的邓小平家中，杨尚昆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随意出入邓家的人。杨的儿子，则是被邓家认可的，唯一可以进入中国第一家庭的专业摄影师。举凡见诸世面的邓小平生活照，基本上都是这位杨公子的杰作。特别是在中共“十三大”

后，邓小平形式上退出权力核心圈后，杨尚昆更成为传递、沟通邓小平与政治局信息的“专业信使”。其“权倾朝野”的位势，令吴稼祥给了他一个“杨太尉”的头衔。

图6-14：邓小平与杨尚昆

作为赵紫阳升位后邓小平向他推荐的两位“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赵紫阳一直以来也把杨尚昆作为邓小平的代言人，并依赖这个渠道与邓小平沟通。相较于杨尚昆在军中的毋庸置疑的资历，自愧不如的赵紫阳虽然身居军委第一副主席，也无意与这位常务副主席争雄。

1989年5月11日邓小平与杨尚昆的这次长谈，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鉴于《邓小平年谱》的讳莫如深，我们把这次谈话称为“秘密谈话”。

在这次秘密谈话中，邓小平已经表达了对于赵紫阳“亚行讲话”的不满；并比较了京、津、沪三地处理学潮的模式；流露出对李瑞环、江泽民的欣赏之意；还转达了诸位老人的意见。其思路所致，从换将到用兵的主题，已经呼之欲出。因其内容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妨仔细看一看《真相》记载的这段谈话：

11日下午，杨尚昆去邓小平家，向邓小平汇报。主要谈论了以下这些问题：一，这次学潮为什么结束不了，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学生；三，政治局的态度，四，部队的情况；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六，下一步怎么办？

杨尚昆说，“这次学潮与两年前的那次很不相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学校教师、新闻记者包括一些机关干部都有。学生所提的口号也有很多方面是老百姓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所以，这次学潮有市场。”他告诉邓小平，现在，全国一些大学已开始出现“学生自治组织”，北京还成立了“高自联”。另一方面，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分子也正在积极利用这次学潮，还有西方反华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革命组织的介入。”

邓小平回应说：“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提出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来激动人心，使我们在采取策略上犹豫不决。我看，现在是学生在逼我们。”他还说，“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只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杨尚昆接着向他汇报了赵紫阳在常委会上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的意见，及政治局建议6月“召开人大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这次学生提出的、人民群众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此时，邓小平单刀直入地提问：

“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为了摸清邓小平的态度，杨尚昆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说：“紫阳的亚行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但与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调不一致。紫阳讲话后，各地情况反映较好，北京罢课的一些学生也开始复课了，但也有些省市对紫阳讲话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北京和上海认为紫阳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动乱……‘四二六’社论明确肯定有黑手在幕后策划，而紫阳讲话中只说‘当然难免’，也让人不好理解。”

他还说，王震曾对他说，“赵紫阳本事真大，他的一篇讲话就可以把学潮解决了？”他个人认为，“紫阳讲话对缓解学潮有一定好处，但学潮并没有到此为止，只是间歇。”

邓小平也介绍了几位老人的意见：读紫阳亚行讲话后，李先念打电话对他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托人给他捎话，要他看看赵紫阳的这篇讲话。接着，他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此时，杨尚昆第一次向邓汇报了赵紫阳从朝鲜回京后，试图通过他向邓转达的意见：

“赵紫阳认为，‘四二六’社论在对学潮的提法上欠斟酌，定性高了。他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象，不能把他的形象给损坏了。赵紫阳主张，对这次学潮，要疏导、分化，争取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一些改变。”

这个“有人”自然是指李鹏。

邓小平于是问：“常委中别人的意见呢？。”

杨尚昆老实回答，直到他们这次见面，赵紫阳尚未将这个观点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过。“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

这是赵的一贯作风，在拿到邓小平的“尚方宝剑”之前，他不想和常委里的什么人争论什么。

邓小平说：“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

邓小平对于姚依林的这句评语，显示了他即使在“闭关”状态下，也对李鹏内心的一些微小活动 明察秋毫！

在谈到一定要保证戈氏访华期间的北京秩序之后，邓小平问杨尚昆：

“你怎么看京、津、沪三地对这次学潮的处理？”

杨尚昆回答说：

“处理这次学潮，态度最坚决的是北京，李锡铭、陈希同几乎整天把两眼都盯在学潮上，生怕北京出现大的乱子，担当不起。陈希同就感叹说，‘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首都市长的难当’。我看最近他们是高度的神经紧张，也难怪他们对有的问题的看法过于严重。”

邓小平的回话表明，他并不欣赏“北京模式”，但口气也是体谅的：

“要做到处乱不惊并不是容易的。”

杨尚昆接着说：

“天津的局面控制得最好。李瑞环的态度很明确，你要对话可以，但你得遵守法律；你要游行不阻止，但你不能破坏社会秩序。李瑞环强调一点，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实事求是。所以，天津总的社会秩序较好。我认为李瑞环蛮有思想。” 邓小平赞同道：“李瑞环他懂哲学，能辩证地看问题。”

杨尚昆又评价了上海。他认为，“上海的旗帜最鲜明。江泽民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很干脆……但这个事件的确在国内外，特别是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的压力不轻。我个人认为，上海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可以更策略一些。”

正如上面提到赵紫阳“亚行讲话”时，邓小平只引用了李先念和陈云的意见一样，邓小平也没有直接表扬江泽民，而是再次引用了陈云和李先念的看法。他说：

“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后，陈云同志对我说，‘处理学潮就应该像江泽民一样有决断’。先念说，‘江泽民既坚持四项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政治敏锐、党性强，有大局观。’他完全支持江泽民的做法。”

邓小平以上讲话，与以后发生的事情联系看，我们可以认为，早在赵紫阳的“亚行讲话”后，邓和一帮老人，已经在考虑接班人问题了。由于是二

人促膝谈心，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思路显得异常清晰。而杨尚昆此刻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接着说：

“江泽民在处理学潮上有一套。记得上次学潮，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学生对话并演讲，还用英文背诵马克思著作。当时，先念就指示中直机关党委，组织中央各单位收看江泽民与学生对话的录像。我印象很深。”

摸清了杨尚昆的思想倾向后，邓小平转向另一个主题：

“部队思想状况怎么样？”

杨尚昆介绍说：

“学潮发生以来，总政治部已经连续发出四个通知，要求各大军区认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介入地方政府处理学潮的事务。对于涉及严重影响地方社会安定的打砸抢事件，地方政府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的，必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现在，军队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一些军区还开展了官兵对话活动，针对性很强，有效果。七大军区和三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不团结现象。”

此时的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正是杨尚昆的同父异母兄弟、比杨尚昆小13岁的杨白冰。杨尚昆特意提到三总部的“团结”问题，在今后的历史中还将逐渐展开。

邓小平和杨尚昆的这次密谈，基本回答了我们在本章第三节提出的问题：“是否因为赵紫阳的“过激反应”，致使“接班人问题”提前提上了议事日程？”回答是：NO！

第六节 赵紫阳泪洒广场

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5月18日，邓小平再次在家召集会议，就17日召开的常委会决定向老人们通气。会议参加者除邓小平外，还有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人。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也列席了会议。会上，李鹏介绍17日晚政治局常委在戒严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薄一波作了补充。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各位元老都谈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对戒严的部署。

赵紫阳的回忆没有关于上述会议的记载。说明他没有参加上述会议。

5月18日这一天的清晨5：00，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和李鹏、乔石、胡启立、芮杏文、罗干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住院的学生。如前所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事先获得的消息是中央领导将赴广场，但临时又改成了去医院。在夏日的清晨，这个人不知鬼不晓的时候，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一行动，与其说富有政治的意义，不如说更像是一次祈求赎罪的集体仪式。鬼使神差，《人民日报》在醒目位置报道这一消息时，使用的标题不是“最新消息”，而是《最后消息》！

图6-15：5月18日晨，赵紫阳、乔石看望住院学生，并给学生签名留念（香港《明报》、陈小雅收藏）

在看望中，赵紫阳等多次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在协和医院，赵紫阳说：“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热情非常可贵。中央对同学们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中央一定会积极认真地研究大家的意见和要求，改进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希望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在同仁医院，赵紫阳特别强调：“党和政府与同学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沟通思想，解决问题，不要采取绝

食的方式。你们很年轻，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要珍惜自己的身体。”

此时，心情已经变化的赵紫阳，对李鹏的态度也极为敏感：

“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

从医院出来后，赵紫阳直接回到办公室，既没有参加当天上午在邓小平家召开的通报戒严的会议、中午与学生的对话会，也没有参加下午常委召开的部署戒严的会议。而且，连17日邓家戒严会上决定的，“李鹏于18日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的安排也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事后的回忆，竟把这个活动列为反常事例之一。

这天上午，他依照杨尚昆的劝告，收回了昨晚发出的《辞职信》。下午，他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希望邓小平再次考虑他的意见，“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信中说：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对此，赵紫阳事后回忆道：在那几天，一些知名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党中央和他，希望正确对待学生运动，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改正对学生的错误态度，其中有一向受邓器重的李一氓。“所以我5月18日又从中挑选了一批信转给邓，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我的意见，希望他重新考虑。我虽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愿意作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如同所料，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据说，赵紫阳为慎重起见，在发信前还曾打电话给杨尚昆，寻求他的支持。但杨尚昆的回复是：

“这句话我不能讲了。你知道，这个问题大得很呢！如果把性质变了，学校广大的校长、教师和积极的学生统统都要挨耳光，毫无立足之地，我们也跟着全部垮了。我劝你，还是不要发这封信好。”

但是，赵紫阳似乎没有接受杨尚昆的劝告，依然发出了这封信。

当晚，赵紫阳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据《真相》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露面，但他已经不再是会议的主角了。原因很可能是在前一天晚上，李鹏要求他主持时，他拒绝了。这次会议主要是具体落实5月19日晚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通报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情况。会议要求赵紫阳主持大会，赵紫阳同样予以否决。

在这次会上，薄一波首先通报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王震等中共元老对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的坚决支持态度；杨尚昆通报了决定从21日零时起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有关部署；李鹏通报了与学生代表的对

话情况，并根据袁木提供的讲话稿阐述了戒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李锡铭、陈希同再次通报了北京市的当前形势。陈希同说：

“我们早就盼望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了。不戒严，我们就理不直，气不壮，腰杆子不硬。现在好了，有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断措施，有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支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尽快恢复首都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是扬眉吐气的决定，我们从心底里拥护！”

会议决定：

一、于19日晚10：00在国防大学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会议。赵紫阳、李鹏分别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李锡铭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介绍北京市学潮的发生和发展情况。

二、5月19日上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顾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纪委等负责同志通报关于即将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决定。

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

在赵紫阳的记忆中，这次会议及其内容没有丝毫痕迹。他说：

“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日 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

“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实际上我已经被排斥在决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时决定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17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

5月19日凌晨5时许，赵紫阳终于在屡次受阻以后，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绝食学生避雨的公共汽车里，他老泪纵横地用手提扩音器作了其政治生涯的“告别演说”：

图6-16：5月19日，赵紫阳广场告别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

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同学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现在已经到了第7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结束这次绝食。

我也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满意答复你们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6天、7天的情况下，现在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呀。我今天不是来与你们对话的，而是劝同学们理智地想想，现在是什么样的严重情况。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这个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严重的情况一天天在增加。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能够控制，造成对交通、运输、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

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有组织绝食的同学，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现在已经6天、7天了。难道真正还要到8天、9天、10天吗？有很多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等到回答你们满意的那一天，你们也应早些结束绝食。

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周围的学生们鞠了一躬，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学生哭了，一些学生则纷纷请赵紫阳签名留念。

赵紫阳是去为自己的良心赎罪的，也是去给学生打招呼的。但他既不能让对他已经虎视眈眈的人抓住把柄，也不能让学生一听就明白。所以，他的讲话富含玄机。在场的学生虽然有所感触，但留下的只是思索：什么叫“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6天、7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他是不是因为激动，把“不能在学生绝食7天政府仍不给答复”表达错了？当然，戒严也是答复。但没有政治经验、又缺少知情渠道的人听不懂。

赵紫阳来了又走了。走向沉默的他，除了良心得到一丝安慰，对比“十三大”新闻，他或许还带走了一个疑问：学生为什么会突然变得不可理喻？

同样的一个人，在数百米之内，在1987年11月2日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他作的报告，是那样的自信非凡，鼓舞人心，而社会反应又是那样的热烈！以至于三天后，他在接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时，都禁不住流露出自我赞叹的心情。他说：

“近日《美洲华侨日报》说，我作的报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历程中的新觉醒。我很赞成这个话。我告诉先生，国内人民，大学生，对我这个报告最满意的是，我这个报告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听了比较踏实。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大学生对十三大报告有这么大的兴趣。有人说，反自由化后中国大学生对政治淡漠，现在看来不对。十三大期间，学生看电视，听我那个报告的情况，是很动人的。”

他似乎一直不知道，有些报道，特别是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报道，是可以为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什么时候有新闻管制，什么时候就有假话。以自信著称的他，绝不愿意相信，即使是把自己送向权力顶峰的时候，也会被这个体制欺骗！聪明绝顶的他，更不会想到，仅仅不到两年的时光，这个体制就不打算再欺骗他，而当体制“撒手”时，他会在这样一个乱糟糟的环境下，用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语言，以这样令人沮丧的方式告别政坛！

赵紫阳事后回忆

“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

“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当时年轻学生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一篇讲话，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在交了自己的良心以后，赵紫阳给政治局和常委写了张假条：“我头痛加剧，急需治疗和卧床休息”，“在此期间，常委和政治局工作，建议李鹏同志主持”。他请假三天，并拒绝出席常委会决定的当晚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

与赵紫阳去广场的同时，李鹏也去了广场。与赵紫阳不同的是，李鹏对待学生的态度非常生硬。他态度冷漠地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到这里来干

吗？赶快回去吧。他一边问话，一边不等学生答话，转身就下车了。但赵紫阳和李鹏共同的是，他们到广场，都没有去找绝食团指挥部。显然，他们都不是为了劝学生离场而去的。但赵、李二人态度的区别，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讯息。并成为当晚学生停止绝食的重要参考因素。

赵紫阳的广场“告别演说”，令邓小平怒火万丈。当天早上，看完新闻的他立即给杨尚昆打电话。张良《真相》没有这一天会议的记录。却留有一段邓小平与杨尚昆的私下交心：

“赵紫阳到天安门去讲话了，你看了吧？你听他讲了些什么？哭丧着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实在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

“杨尚昆：我看他讲话的情绪就不对，有点不想干的样子。他讲他‘老了，无所谓了’。这不是明摆着把党内的分歧公开出来吗？他刚刚向常委请了三天假，说是病了。看起来他的思想情绪越来越大了。”

“邓小平：你知道，这次事件爆发以来，我承受了多大的党内压力。赵紫阳的亚行讲话后，先念就对我讲，这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声音，要我表态。以后，陈云、先念等都给我打电话交换过好多次意见，按照他们的意思，学生去天安门就是中央纵容的结果，要采取措施。他却一点不配合，连一点配合的意思都没有。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真的越走越远了。”

“杨尚昆：我还是想动员他参加今天晚上的大会。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僵了。”

“邓小平：随他去吧。”

第七节 恐吓or警告——风马牛对话

按照17日邓家常委会的计划，18日上午，李鹏代表常委向老人们介绍完决定戒严过程以后，中午11：00，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正式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参加这次座谈的有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北京市长陈希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学生代表有：吾尔开希、王丹、熊焱、王超华、郑旭光、王志新、甄颂育、邵江等。

政府安排这场座谈，本意是想通过这个迟到的应对，在戒严开始前，令学生自动撤离广场。故此，李鹏开门见山地说：

“很高兴同大家见面。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有什么事都好商量。我们不是出于其它什么目的，主要是关心。你们年龄都不大，最大的22、3岁，我最小的孩子也比你们都大。我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官倒’的，但都比你们年纪大。你们都如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是亲骨肉。”

由于对高层已经做出“戒严”决定这个背景不了解，学生代表不理解为什么在没有商定的情况下，李鹏就专断地确定了座谈的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北高联前主席吾尔开希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总理，……您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您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您出来谈，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说。好在，我们观点是一致的。广场上现在已有许多人，有多少人晕倒了，您大概也清楚。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昨天，赵紫阳同志书面谈话，我们都听了，也看了。为什么现在同学们都没有回去呢？我们认为，这还有点不够，很不够，我们提出的条件以及现在广场上的趋势您是知道的。”

接着，按照事先与阎明复私下达成的协议——学生方面由吾尔开希和王丹主要发言——北京大学学生、北高联成员、绝食团成员王丹介绍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截止当天，已有2千多人次晕倒；并重申学生与政府关系的症结：

“如果能使他们离开现场，停止绝食，必须全面解决我们提出的条件。上次同阎明复部长也谈过这个问题。……”

吾尔开希接着谈到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作为广场学生“非理性”证据的著名观点：

“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

王丹接着说：

“我们昨天对100多个同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我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现在能圆满地回答的话，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否则，我们很难做这样的工作。”

图6-17：5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座谈的郑旭光（左）、王志新

吾尔开希接着说：

“关于这两点，我还想说明一下，我们提出要尽快平反，否定社论，即第一，要求正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而且要全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是动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说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还有，应为这次运动定性。然后，可以想出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

这样，我们才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我们还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但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行的话，那后面的情况就很难说了。关于对话，……公开，就应有电视直播……而且应有中外记者在场。关于平等这一点，应该是由有决策力的领导同志，与真正的、能影响学生运动的、直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对话，这才是直接、平等的意思。对话之中，不应再出现诸如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这样的说法’、‘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些问题政治局会议未讨论过，而我们提出来了，应该马上再召集会议研究，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态度。”

为了表明，作为代表，既要为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也要对绝食学生的要求负责，王丹再强调道：

“我们这些代表到这里来，实际是代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为他们的生命负责的态度而来的。所以希望各位领导能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表态。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们都为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我想各位领导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基于这些想法，希望能对两个问题尽快明确。” 北京大学学生、对话代表团成员、绝食团成员熊焱进一步阐明了学生的立场和愿望。他说：

“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及其他各方面的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其实问题就在这里。第二，我们都是为主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什么面子及其它东西都应放下来。只要是人民的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第三，我们对李鹏总理有意见，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意见，对你有意见，因为你是共和国的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北高联常委王超华也同意刚才同学的发言：如果座谈会作出某种“决议”，但不代表广大同学的话，“决议”是没有用处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作为学校代表，也希望政府答应学生的上述要求。他说：

“有不少北大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对同学们的行动，我们作为师长的，心里都很难过。我认为，我们广大同学是爱国的，是希望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大同学不是代表动乱，这一点，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领导人，也希望总书记能到天安门广场，给同学们讲一讲，一方面表示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对于‘官倒’、腐败现象，我们政府也已多次表示有决心解决。同时可把这些问题向同学们讲一讲，即没有人说广大同学的运动是一场动乱。我希望政府同广大同学配合，劝绝食同学回去。这样下去，对学生身体是不好的。中国的建设，民主政治的推进，都要靠青年人担负。”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对话代表团成员、北高联秘书长王志新接着说：

“民主、科学的口号已提出七十年了，但一直未达目的。现在又喊出来了。我再赠给政府一句话，从4月22日开始了请愿，结果你没有出来，5月13日开始绝食直到现在。世界上有个惯例，绝食7天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答覆，连南非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中国政府也应该做到。再一个问题，不知道政府有何想法，现在，加入游行队伍的有幼儿园阿姨等，各种人都有。”

王超华接着批评了政治局常委仅仅承认学生“爱国热情”的措辞。她说：

“我认为，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一点，我希望明确。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否则，无法解释这次运动中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王超华的发言表明，她似乎知道高层关于“爱国热情”与“爱国行动”的争议。但这位学生中的“消息灵通人士”显然还不知道高层已经决定戒严。

接着，王丹问：“还有发言的没有？没有了。那么，请领导表态。”

李鹏说：“我提一点希望，当我们讲话时，不要打断。我们讲完后，如果谁还有意见，可以再讲，充分地讲。”

北京大学学生邵江打断李鹏的话说：

“学生运动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学生现在是比较理智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全民运动是理智的。我想请你们讲讲，这种事态怎么办？”

李鹏听完邵江的话，不悦地说：“你们讲完了吧？请李铁映同志讲一讲。”李铁映说：

“关于与国家教委建立一些对话渠道，听取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这个问题，从国家教委来讲，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形式，能使大家有说话的机会，我们做得不够。”

“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场事件，而且问题是一些政治问题，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生游行示威的看法，我在两次对话中已经表示了。广大学生在运动当中，应该说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应该说提出了很多意见，表达了爱国的愿望。但是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凭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而要看事态的发展和历史的检验。大家都是反对动乱的，我们也反对，学生也反对，全国人民也反对，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什么事请都吹了，不管是经济建设也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我们振兴中华的这个愿望，没有一个稳定的局势，或者继续通过改革建立长治久安的稳定的机制，没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我看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

是一句空话。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问题的讨论和争论，都应在民主法制的范围内进行。我们有人民代表，我们有人大，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对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大学生的最大爱护，就是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在逐渐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现振兴中华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十三大提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达到的目的。现在事情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同志们的主观愿望和良好的爱国热情。例如从昨天来看，全国已有19个城市发生了不同情况的游行示威，有一些学生已从其他各地来到北京。现在广场上的那些学生已经不完全都是北京的学生。像这么一种秩序，已经不完全和我们的主观愿望相适应。为解决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举行几次对话。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来研究如何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使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学能够工作，使在广场绝食的同学尽快回到学校里去。”

接着，阎明复意味深长又充满忧虑地说：

“这些天来，我和同学们有过多次接触，我现在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要救救在广场上绝食、体质非常虚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孩子们。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特别是没有参加绝食的同学，要爱护绝食的同学。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但是，今天就必须把一些身体非常虚弱的同学送到医院里去。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协议，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因为现在事态的发展正像我5月13日晚和吾尔开希、王丹讲的，已经超出了发起人的善良愿望，已经不是你们能够影响得了的。5月16日，我到广场上去和同学们交换意见，我提出了三点：第一，请你们马上离开，把绝食的同学马上送到医院去拯救；第二，我代表中央宣布，绝对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第三，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话，在人大常委会开会之前，我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学校里去。听说我走之后你们同学组织讨论，有些同学同意我的意见，但大部分同学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本想到广场上去看望同学们，因为没有与你们联络上，就没有办法进去，这一点你们可能都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同学们自发产生的三个方面的组织，对局势的

影响是越来越差了，现在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事态会怎么发展，我们很担心。现在你们惟一可以影响的是，决定绝食的同学离开现场。党中央、国务院有诚意、有决心解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孩子们的生命，对孩子们的生命要高度重视，对孩子们的生命要负责。”

在阎明复之后，是陈希同发言：

“我来这里时，车子已经很难通行，所以晚到了。我作为北京的市长讲几句话，这几天事态的发展同学们都已经看见了，广场上的游行大家也看见了。现在，许多人很关心这件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都关心目前发生的事情。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到市委、市政府，希望我们能够按照赵紫阳同志讲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家知道，现在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有的工厂的一些人也出来了，表示支持同学们。但多数群众希望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希望安定下来。如果全城交通瘫痪了，供应中断了，会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大家是很明白的。他们要我向同学们转达这个意见，现在，我转达了。”

“现在，大家对绝食的同学都非常关心，医务工作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心绝食同学的健康，要求给他们以最大的方便条件，能够把绝食的同学顺利地送到医院。他们向我提出来，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要拿我们孩子的生命开玩笑，或者作为一个什么交换条件。我想，这一点希望同学们能了解。你们因为绝食，身体受到影响了，甚至于牺牲了生命，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作为市长，就转达这两点意见，希望同学们多多协助，让红十字会能够履行他们的人道主义的义务，保证每个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我们市政府决心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提供防雨、防寒设备，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与历次会议陈希同的讲话很少出现在李鹏《“六四”日记》中一样，这一次，陈希同的上述讲话在李鹏《“六四”日记》中是这样被反映的：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等：这几天事态的发展，使北京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地影响，多数市民希望安定下来，我向同学们转达广大市民的意见。不要让绝食的同学的生命受到威胁，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而根据另两份资料，李锡铭的讲话确实也非常简单：

“我没有什么说的，现在首要的任务是不要有一个绝食的孩子生命受到威胁。要团结一致，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由此可见，李鹏《“六四”日记》在出版时，有意将陈希同的名字抹去，将他的话和李锡铭的话进行了综合。

大家发言完毕后，李鹏发表了他准备已久，一直害怕被打断的讲话：

“我现在谈几点意见。大家愿意谈实质性问题，我首先谈实质性问题，我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这就是我的具体建议。同时，我要求北京市和中央所属单位的各级医务人员，大力地挽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什么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有责任。每一个在广场上的同学也应该从关心绝食同学的立场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并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我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医院想一切办法，腾出床位和必要的医疗条件，接待这些绝食的同学。这些天来，我们广大医务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他们夜以继日地、精心地护理绝食的同学。今天上午，我和紫阳、乔石、启立等同志看望了在医院的部分同学。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

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我坦率地讲，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些问题我们一直想解决，因为有许多阻力，未能及时解决。同学们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像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想法，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现在这个事情，已是客观存在。我可以告诉同学们，昨天京广铁路在武汉一段被堵塞了三个多小时，停止了铁路动脉的运输。现在有不少城市的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生的旗号到北京来了。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再说一遍，绝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意思。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也好，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动乱，中国出现过很多次，原来很多人并不想搞动乱，但是最后发生了动乱。”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甚至有我们国务院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上街游行，好像是对你们表示声援。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不要受到损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做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地离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来商量，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我不能说他们的动机怎么样，但是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不能不表明我的态度。”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 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如果今天在座的同学们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来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在座的这些同学，不能够左右你们伙伴们的行动，那我就通过你们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很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李鹏讲完后，吾尔开希对“纠缠”一词提出异议。并再次提出学生撤离的条件问题：

“……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问题是在于怎么让他们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广场上如果有一个人不离开，再继续绝食的话，我们就很难保证其他的几千人离开。关于由红十字会解决这个问题，我请李总理和在座的领导同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可行性。我现在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咱们不要纠缠，这也是我们的意见，迅速答复我们的条件，因为广场上的同学正在挨饿，如果再不行，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政府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这些代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坐下去了。”

紧接着，吾尔开希感觉心脏不适，预先有准备的学生把他抬上了担架，并用氧气瓶给他输氧。随后将他抬出了会场。王丹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次座谈的失败，最后申明说：

“如果李鹏总理觉得会闹成动乱，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话，我可以代表广大同学说，应由政府来负全责。”

熊焱补充道：

“亲爱的李鹏同志，刚才您说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像社会上有动乱的迹象，我要讲学生运动与动乱的关系。学生游行与动乱没有关系，望能及时解决。”

最后，阎明复总结道：

“在今天这个对话中，大家的意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了出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使绝食的同学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到医院里边去进行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有时间来解决。对话就到此结束。”

仿佛是预感到日后会有人拿这个词做文章，王志新在“对话”问题上提出了异议。他说：“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

对此，阎明复答道：“对，是见面。”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以上座谈内容。

事后，李鹏《“六四”日记》记载：“这场座谈会的实况录像，没想到启立同志不让电视台全文转播。但是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还是指示中央电视台在当时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出了这次会见的录像。”李鹏认为：

“这使全国上下都知道党和政府对动乱的态度和立场，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电视播出李鹏讲话的后果，并非都是积极的。人们难忘李鹏总理在听取学生发言时，那坐立不安的表情。上海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文雅地批评道：

“5月18日李鹏和学生的会见给人们心头笼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我第一次看见这些学生领袖，对他们的才智和勇气感到钦佩。但我也是第一次认识我们的总理李鹏，印象却十分恶劣。”

“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使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前失了分。但是李鹏5月18日的表现，却失分更多，他使人民对他从不了解到反感了。”

“在5月18日之前他给我们的印象既不比赵紫阳好，也不比赵紫阳坏。至多，我们觉得他在提升之前，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提升之后，在一些场合显得魄力不够、口才不佳而已。但他外表给人的印象还是温文尔雅的。”

“可是，5月18日的李鹏太叫人失望和反感了。他显得那么没有耐心、没有礼貌、没有器量。他忘记了自己是共和国的总理，面对的是为了国家的命运已经绝食五天的学生和站在学生背后的广大人民；也忘记了他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持续了两个月、蔓延到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他心里只记住赵紫阳。他坚信学生和广大参加民运的群众都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此，他开始从先知先觉者的姿态去教育学生，然后就干脆对赵紫阳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了。最后他更变得恶狠狠，言语中暗藏杀机，气咻咻地拂袖而去。说真话，这不像共和国总理在处理国事，而像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水平实在太低！”

当天的《人民日报》社也“收到不少读者电话，都是批评李鹏等人缺乏解决问题诚意的。汽车制造厂一位工人说，他和他所接触的工人，无不对李鹏在对话中的态度表示愤慨。一位北大研究生在看电视转播时，甚至忍不住问旁边的人：“总理一会儿夹紧双腿，一会儿焦急地抚摸裤子，他是不是尿裤子了？”更多的人在看到总理说“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时，都感到，他表情的严厉和语言的生硬像是在说：“现在就把他们抓起来！”

凡此种种细节的滑稽，技术上的小动作，淹没了李鹏总理所传达的严肃、紧迫的讯息。加之政府避开对话团主体，将对话安排在中午11：00这个开饭的时间，以及政府代表在谈到学运“性质”问题时的一致回避，致使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活动，再一次被误解为政府“耍心眼儿”的“闹剧”！

对于这次最后的“对话”，如柴玲一般敏感的女性也没有引起高度警惕。她在回忆录中冷冷地写道：

“李鹏终于同意和学生领袖们见面了，但是绝食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参加会面。当我们听说有可能安排学生领袖和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会面时，我们正忙着在暴风雨前把学生们赶到车上去。我们更关心学生们的安危，对和政府高官的谈话不存什么指望。”

此时，她依然没有做好政治角色的准备，而满足于扮演自己熟悉的“老母鸡”。对事情的紧迫性也一无所知。

第八节 军事介入：再上新台阶

1989年6月的军事行动，从军队进入北京的过程看，是分三个梯级实现的：

第一个梯级，是4月22日—5月5日，即军队进京值勤时期。这个梯级又是分两步实现的：

第一步：以4月20日“新华门事件”为肇端。

根据《38军军史》的记载：4月20日凌晨“发生了‘新华门事件’。中共中央军委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遂于4月22日，将38集团军第112师（欠336团）、坦克第6师（欠炮兵团）、工兵团、通信团，共8986人、409台汽车首次调赴北京。在此期间38军协助首都公安、武警完成了维护首都秩序，保护胡耀邦总书记的灵车安全进入八宝山公墓的任务。”

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简称《真相》）记载，这一调兵行动的“报告由杨尚昆签发，赵紫阳圈阅。”也请示过邓小平：

4月20日“下午，中央军委的急件从杨尚昆办公室转送到赵紫阳处，报告的大意是：为了确保胡耀邦追悼大会期间北京尤其是天安门地区的安全，经请示小平同志，决定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集团军调集两个师和两个团，约九千人赴京，协助公安、武警维护首都秩序，执行保护胡耀邦同志的灵车安全进入八宝山公墓的任务。报告由杨尚昆签发，赵紫阳圈阅。”

李鹏日记还记载了这部兵力在中南海的配置情况：

“为防止万一，军委调38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共调来两个师，都是老兵，不带武器，以免发生流血。”

这次军事行动，保证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安全（事实上并没有人要中央、国家机关造成危害），保证了胡耀邦追悼会的顺利进行（事实上并没有人对追悼会进行冲击），但是，并没有解决社会安定的问题。

第二步：以“四二七”大游行为肇端。

《38军军史》说，“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运进一步扩大。38集团军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6师、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5100人、234台汽车进京。担任了警卫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这个“制止动乱预备队”是根据什么命令成立的？《真相》作了如下记载：

“为了对付这次游行并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请示邓小平，杨尚昆命令从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一个坦克师、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通信团等部队中抽调约五百余人，于4月27日至5月5日，在北京执行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杨尚昆命令，军队必须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学生或市民发生冲突，决不能动用武器。违者按军法论处。由于‘四二七’学生游行秩序井然，38军执行任务的部队基本没有介入。” 该书还记载了“四二七”大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发生的一个“谣传”，38军的“一个师”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并未作出更正。

据李鹏4月28日日记，这部分军队在执勤完成后并没有退出北京。他写道：

“9：30，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11：00，去尚昆处，他也不主张撤回军队。”

李鹏也正是在这一天，将家搬进了中南海。

对比《真相》所报38军抽调的部队与《38军军史》的记载一致，但数目要大大小于《38军军史》。不过，它告诉了我们那个“制止动乱预备队”的来历。而这个“预备队”显然就是后来担任“镇压主力”的38军被绑上“战车”的开始。

第二个梯级，是5月18日——5月22日，即军队正式执行“戒严令”时期。

这个阶段，起始于前述5月17日决定“戒严”的邓家常委会议。

5月18日上午，杨尚昆召集主持了中央军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戒严的决定。中央军委组成人员除邓小平、赵紫阳外，杨尚昆、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迟浩田、赵南起全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戒严部队指挥部”，并部署北京军区5万人进京执行戒严任务，预计其中3万人于19日晚进入北京。另计划调沈阳军区2万人进京。

当日下午3：00，杨尚昆向邓小平和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报告了军委扩大会议情况。会上，杨尚昆通报了兵力调配及对北京市区的戒严部署情况。为协调戒严行动，会议决定成立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正、副指挥。以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戒严的主要任务，其它军区配合。对于这次会议的有关细节，《真相》作了如下记载：

杨尚昆：“小平同志，根据您的指示，我刚刚主持开了会，学智、华清、秦部长、浩田、白冰、南起同志都参加了，对戒严的决定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经过研究，决定这次戒严的主要任务由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其它军区配合，成立戒严部队指挥部。戒严部队

指挥部由华清、浩田和周衣冰（北京军区司令员）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

邓小平：“戒严以后北京市区有多少解放军呀？”

杨尚昆：“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接着，杨尚昆将中央军委调集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兵力部署报告递交给邓小平。

这份由总参谋部代拟，以邓小平名义发布的命令写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1日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为配合完成这次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任务，兹命令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24军、27军、28军、38军、63军、65军，沈阳军区的39军、40军，济南军区的54军、67军的有关部队分别于5月19日、5月20日自驻地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的地。”

在邓小平签署进军令后，杨尚昆也在上面签了字。接着，杨指示总参谋长迟浩田立即与北京、沈阳、济南军区的司令员们磋商，“确定每一集团军的有关师团进京名单，进军具体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戒严主要事项等实施细则”；同时，命令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立即以总政治部名义向各大军区发布政治动员令，要求“在党和国家面临严峻形势的情况下，各大军区必须纪律严明，随时作好准备，绝对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行动和指挥”；命令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调集好戒严必须的一切军用战备物资、粮食，并与北京市委、市政府磋商，尽可能地解决好部队的食宿给养问题”。

据驻石家庄的27军某副政委回忆，他们于18日晚便接到了进京命令。

5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住地再次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换马”重大决策。事情很快在北京市委得到传达。当日下午，北京市召开处级以上

干部会议，再次用“四二六”社论统一思想，并提出以后讲话要以李鹏讲话为准。

注释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0日，第5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5—1276页。

见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但此话未被《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载。《陈一谔回忆录》和《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则有不同说法。见本章第二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6页。

其中由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发起的新华门请愿，演变为长期静坐，一直持续到开枪前的6月2日。参见果卒《学法的为什么做了违法事——中国政法大学师生的反思》。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3日；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北大八名教授副教授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载《人民日报》5月31日，第1版；郑岩《新华门的见证》，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7日，第4版；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原文为“皇城根下”。因“皇城根”是北京旧城墙的地名（有东西皇城根两处），为避免混淆，笔者在引用时，改为“中南海红墙根下”。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7页。

沈彤《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6页。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26页。罗点点《流血的改革》。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28—129页。

同上，5月10日，第113页。

据《中国新闻》社记者耿军1989年与陈兆刚、陈小雅的谈话。2000年冬苏晓康给陈小雅的信中也谈到，当时在场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是他的同学，她事后对苏晓康说：这次怎么这么待见我们了？并对此感到诧异。

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讯。陈一谔《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同上。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93页。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香港联合报有限公司，1993年10月版，第375页。

吴庸《“四二六”社论的始作俑者——邓小平》。转引自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版，第389页。

详见本章第六节：倒邓狂澜。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89年9月30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李鹏《“六四”日记》，5月16日。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金日成（1912-199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同上，第52—53页。

同上，第53页。

同上，第53页。

同上，第53—54页。

参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五节：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同上，第54页。

指1993年前后。邓小平去世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鲍彤答张伟国百问》。《鲍彤文集》廿一世纪基金会，2012年7月版。

同上。

张敏《鲍彤谈“秦城交代”》。载《民主中國》<http://www.chinamz.org/ftpgb/mz0109b.gb>，2001年9月。

《鲍彤答张伟国百问》。《鲍彤文集》廿一世纪基金会，2012年7月版。

中国新闻社记者耿军当时在采访现场。事后对陈小雅、陈兆刚进行了描述。

据苏晓康2001年给陈小雅的电子邮件。

赵紫阳事后对杜导正等人说：“这可坏了！后来才知道，因为北京当时的政治局面，邓小平不愿意自己与中央保持那么近的关系，想保持一定距离。我不了解这个，只一厢情愿的维护邓的威信，就那么说了，结果是反认为我不愿承担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责任，好似将责任推给邓了。邓呢，觉得我那么信任你，紧要关头，你将责任推给我了！”见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2年10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

日讲话……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29页。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1989年9月25日。

也可能是4月24日。

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九节，赵紫阳的双周维新。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

同上。

同上，第365-366页。

同上，第367页。

同上。

同上。

同上，第367-368页。

同上，第368页。

同上。

同上。

同上，第369页。

同上。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3日，第120页。

谷季柔《六四专访鲍彤》。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6月4日。 萧洪达（1918-2005）：广东潮阳人。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89年10月5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同上，1990年7月5日。

同上，2000年6月30日。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六节：价改闯关——赵紫阳的滑铁卢。

参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五节：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指担心胡耀邦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毛泽东。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七节，“倒胡”生活会。

指担心“保守派”拱邓力群当总书记。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四节，横扫“保守派”组合拳。

指吴学灿等在戒严以后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见本章 第七节：《人民日报》记者“逼宫”。

《陈一谔回忆录》说：5月22日有两个中央警卫团的高级军官曾找到他，表示愿意奉召。但赵回话，不愿看到流血。见该书第611、612页。

见本书第一卷 第二章 第二节：分道扬镳。

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七节：东风、西风、旋转风。

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三节：阎明复临危受命。

参见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下册，第四章 骑虎难下——毛林关系探秘。

此处原文为“十三届五中全会”，但与所述内容不符，根据赵紫阳关于十三大后邓小平地位的讲话，此处应为“十三届一中全会”。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2000年7月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胡耀邦被迫辞职。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四、筹备党的十三大。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同上。

同上，第200—201页。

《鲍彤答张伟国百问》。载鲍彤《中国的忧思》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5月版。

同上。

同上。

同上。

苏绍智《为正义和真理直抒己见——读鲍彤访谈录》。载《争鸣》98年7月号。

杜导正注：那时赵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是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兼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2000年8月6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此案为陶铸、赵紫阳主持广东工作时制造的冤案、错案。见本书上册，第一章 第六节，拨乱反正的“人心三策”。

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版。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中册，第455-45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鲍彤答张伟国百问》。载鲍彤《中国的忧思》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5月版。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9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据杜导正《赵紫阳还说了什么？——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谈这件事情的时间是1992年10月18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版。

原注：戈氏回忆录俄文版下卷，第435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2年10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联合报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7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页。

张敏《鲍彤谈“秦城交代”》。载《民主中國》<http://www.chinamz.org/ftp/ftp/mz0109b.gb>，2001年9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4页。参见本书下册 第四章 第二节：江泽民微服进京。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中册，第461-466页。

节选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39章第四节。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出版。引自《争鸣》4月号《戈尔巴乔夫谈赵紫阳》。

同上。

同上。

译者按：这里是根据语义翻译，此饭店的中文名称不详。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28-429页。

同上，第429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29—130页。

详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30—131页。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九，1989年9月25日。

这个时间记忆与《中国“六四”真相》有出入。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见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1页。但王超华的这个判断与戴晴事前通过张郎郎向广场传信的情景无法衔接。详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七章 第一节 争取不流血的努力。

见李鹏《“六四”日记》，5月16日。

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版，第322页。

据《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报道《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

参见《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报道《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版，第322—324页。

参见《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报道《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16页。

据《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报道《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王丹的发言。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0页。封从德批注：“算数不及格。100多人怎么会出现99.9%？就算198/199也仅为99.5%。”

参见本册第二节：柴玲脱颖而出。下册第一章，第七节：赵紫阳泪洒广场。

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58页。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详见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36—138页。

《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 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 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绝不“秋后算帐” 希望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5—79页。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3页。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他曾因受到李鹏阻拦未能实现到广场的计划。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页。

见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4页。

以上游行队伍标语口号出自笔者手记、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醒动魄的56天》、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

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8页。

梁二《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1页。

同上，第182页。

详见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53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Ⅴ章 第二节：广播站、纠察队与“生命线”。

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10. 学部“五七干校”，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第56页。

同上，第57页。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11. 文革十年史，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

该文为“政治幻想小说，后收入严家其《漫游历史和未来》一书，1980年由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杨大力编《走向民主政治，严家其中国政治论文集》，第127—140页。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出版。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同上。

当时的人们还不了解“四二六”社论实际上写在邓小平讲话之前。但社论根据邓的讲话做了修改后发表。见本书中册第三章 第四节，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见本书中册 第三章 第三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同上。

严家其《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同上。

同上。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35. 读南友《三驼图》，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222页。

《严家其谈包遵信》。见2015年2月16日严家其给陈小雅的信。

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即本节前述“五一七全市游行口号”，定稿时减少为18条。

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李建生《动乱“精英”严家其》。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日。

引文见鲍彤本人提供1989年9月25日《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三大结束后，面对保守派的攻击给赵紫阳造成的压力，严家其被迫离开政改办，回到社科院政治学所作研究。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五节：深化与波及。

详见本章 第五节：最后的挽救。原载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6页。

《人民日报》5月16日对话会录音。引自曹长青《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

《人民日报》5月16日对话会录音。引自曹长青《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

同上。

同上。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6页。

《人民日报》5月16日对话会录音。见曹长青《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从行文气势看，作者应是位资深报人。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4—85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9页。

指1938年前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国家干部，及同等资历者。

指1945年后国共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国家干部，及同等资历者。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9—80页。

同上，第80页。

同上，第80—81页。

同上，第81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五节：成长的烦恼。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原题《政府向人民妥协认错》。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82页。

同上，第82—83页。

《人民日报》5月18日对话会录音。见曹长青《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

同上。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83—84页。

同上，第84页。

同上。

同上，第84—85页。

同上，第85页。

同上。

详见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86页；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中册，第504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395—396页。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 中册, 第506-507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 第82页。

同上, 第86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第599页。

同上。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8页。

此处会议开始时间, 依照李鹏《“六四”日记》。但该日记没有提到薄一波在场。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 2009年版, 电子版, 第39页。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 2001年版, 第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 2009年版, 电子版, 第39页。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 2001年版, 第441-442页。

同上, 第442页。

同上, 第442-444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17日记载，邓小平此处说的是“这篇社论是正确的”。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9—14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

同上，第44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7页。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页。

参见本书中册 第三章 第四节：请战—碰头会—密诏。

同上。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82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4日。电子版，第100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5日。电子版，第102页。

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曾为贺龙元帅的外甥女婿，继为杨尚昆的妹夫。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44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9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页。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为：“对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只能组织服从，但是我保留意见。”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1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0页。

同上，第141页。据赵紫阳《改革历程》，李鹏在会上说：“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见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9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2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2页。

杜导正《赵紫阳：改革历程〈序：历史是人民写的〉》。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5页。

根据赵紫阳回忆，这里应该说的是“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杨尚昆在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讲话》记为“我的任务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见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4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2页。

同上，第142页。

同上，第143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9页。

同上。

张岳琦（1938-）：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赵紫阳秘书。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十一，1989年9月25日。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77页。

见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4页。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1989年9月25日。

1989年6月23日赵紫阳《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附录四。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14页。

指赵的秘书李树桥。李树桥（1944-）：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0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78页。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78页。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页。

指邓小平5月13日上午接见赵紫阳杨尚昆时，对赵紫阳汇报的方针的表态。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二节，抛邓？护邓？挟邓？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446页。

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四节 赵紫阳醉酒。据杜导正《赵紫阳还说了什么？——杜导正日记》。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唐代诗人王昌龄五言绝句《答五陵太守》云：“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一，1989年9月25日。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2页。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4页。

4月19日。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69页。

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六章 第二节：江泽民微服进京。

谷季柔《六四专访鲍彤》。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6月4日。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9日，第112页。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2—74页。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同上。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5页。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同上。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其实，即便有此事，这种猜测也是距事实较远的。参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二节，艰难的二次出发。事发当天柴玲与一位自称邓家子女朋友的交谈。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三节：出手时机的选择。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89页。

见本章第一节。

穆望（高瑜）《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镜报》月刊，1989年6月号，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4年4月14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23—1224页。

杨闇公，原名 杨尚述（1898. 3. 10—1927. 4. 6），生于潼南县双江镇，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中共党史上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毛泽东当政时代是一种嘲讽的称谓。指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从苏联归国、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路线”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包括：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

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其中徐以新以观点动摇不定被戏称为“半个”。

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伊铭《邓小平与杨尚昆的恩恩怨怨》1998年9月29日。

见吴稼祥《泡面传奇》。

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三节：重整河山。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同上，第344-345页。

同上，第345页。

同上，第345-346页。

同上，第346页。

同上。

同上，第346-347页。

指赵紫阳“亚行讲话”后，李鹏到赵紫阳家表现的“动摇”。见本书中册 第五章 第五节：为总书记“把脉”。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同上。

同上，第348页。

同上。

指导致胡耀邦下台的1986年底至1987年初学潮——原注。

应是背诵林肯《葛底斯堡演讲》。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同上。

杨白冰（1920—1913年）中国重庆潼南人，汉族。1938年1月入伍，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1985年-1987年任北京军区政委。1987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曾任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89年11月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参见本卷 第十三章 第三节：中南海：焦虑之夜。

李鹏《“六四”日记》的5月19日记载了在邓小平家召开的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会议。

参见本书中册 第七章 第七节：《人民日报》记者“逼宫”。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2页。

见本章第二节：“戒严”决定的出台。

事后，赵紫阳说，“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并认为李鹏有意瞒着他这么干。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2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1页。

同上，第4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

李鹏《“六四”日记》没有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同上。

应是18日。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2页。

同上。

5月15日上午，赵紫阳曾准备到广场看望学生，但绕广场一圈后离去。见本书中册 第七章 第二节：抛邓？护邓？挟邓？邹谠《天安门悲剧》：“他（赵）准备于5月15日去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并和他们谈话，甚至已备好他的公车准备起行。但李鹏制止了他，警告他说，如果赵去天安门就是‘分裂党中央’。”载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纪念文集》。开放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6页。阎明复给出的说法是（16日）没能与学生联系上。见本卷第十三章 第七节：恐吓or警告——风马牛对话。

赵紫阳《改革历程》附录三：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07页。另据杜导正、萧洪达回忆，赵紫阳5月14日晨曾去广场。见本卷第十二章 第三节：待解之谜。

《赵紫阳同志会见索尔兹伯里的谈话》，1987年11月5日。载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附录1。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1页。

同上。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9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15页。

见柴玲《赵紫阳到广场与决定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9页；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39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二节：复食。

同上。

本节内容参照的文本有：1、李鹏《“六四”日记》；2、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3、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笔者的取舍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 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98-109页正文及其注释。

甄颂育，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86级学生。

据说，会前，阎明复和吾尔开希、王丹在旁边的另一个小房间进行过谈话，长达一小时。见封从德对《八九民运史》征求意见稿的批注。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称：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发生领导接见造反派时，往往不时打断或不让领导把话讲完的情况，会见一开始，他就同学生代表“约法三章”：“我还对今天谈话提出一点要求，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讲。我们不打断你们，也不插话。但是，我们讲话时，你们也不要打断我们。”学生代表对此表示同意。

参见本卷第十二章 第三节：待解之谜；第十三章 第六节：赵紫阳泪洒广场。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3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49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8日，第148页。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4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为“社会的正常秩序”。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为：“我都要利用”。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多了一句“，告诉全国人民”。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为“在今天这个场合”。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5页。括弧内文字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没有。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5页。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5页。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5页。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没有这段话。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没有括弧内一段话。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8日，第150页。

戴厚英《回忆和思考——一个学运支持者的自白》。载《广场》杂志，第一期，第49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90—91页。

对话团正副召集人和三个组长都没有参加。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1日，第5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8日，第79页。

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这次会议在下午举行。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497页。

据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2015年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页。

据罗宇《告别总参谋部》。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498页。

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六章 第二节：江泽民微服进京。

【注释】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0日，第5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5—1276页。

见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但此话未被《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载。《陈一谔回忆录》和《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则有不同说法。见本章第二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6页。

其中由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发起的新华门请愿，演变为长期静坐，一直持续到开枪前的6月2日。参见果卒《学法的为什么做了违法事——中国政法大学师生的反思》。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3日；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北大八名教授副教授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载《人民日报》5月31日，第1版；郑岩《新华门的见证》，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7日，第4版；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原文为“皇城根下”。因“皇城根”是北京旧城墙的地名（有东西皇城根两处），为避免混淆，笔者在引用时，改为“中南海红墙根下”。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7页。

沈彤《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6页。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26页。罗点点《流血的改革》。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28—129页。

同上，5月10日，第113页。

据《中国新闻》社记者耿军1989年与陈兆刚、陈小雅的谈话。2000年冬苏晓康给陈小雅的信中也谈到，当时在场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是他的同学，她事后对苏晓康说：这次怎么这么待见我们了？并对此感到诧异。

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讯。陈一谔《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同上。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93页。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香港联合报有限公司，1993年10月版，第375页。

吴庸《“四二六”社论的始作俑者——邓小平》。转引自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版，第389页。

详见本章第六节：倒邓狂澜。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89年9月30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李鹏《“六四”日记》，5月16日。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李政道（1926-）：Tsung-Dao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金日成（1912-199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同上，第52—53页。

同上，第53页。

同上，第53页。

同上，第53—54页。

参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五节：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同上，第54页。

指1993年前后。邓小平去世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鲍彤答张伟国百问》。《鲍彤文集》廿一世纪基金会，2012年7月版。

同上。

张敏《鲍彤谈“秦城交代”》。载《民主中國》<http://www.chinamz.org/ftpgb/mz0109b.gb>，2001年9月。

《鲍彤答张伟国百问》。《鲍彤文集》廿一世纪基金会，2012年7月版。

中国新闻社记者耿军当时在采访现场。事后对陈小雅、陈兆刚进行了描述。

据苏晓康2001年给陈小雅的电子邮件。

赵紫阳事后对杜导正等人说：“这可坏了！后来才知道，因为北京当时的政治局面，邓小平不愿意自己与中央保持那么近的关系，想保持一定距离。我不了解这个，只一厢情愿的维护邓的威信，就那么说了，结果是反认为我不愿承担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责任，好似将责任推给邓了。邓呢，觉得我那么信任你，紧要关头，你将责任推给我了！”见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2年10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29页。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1989年9月25日。

也可能是4月24日。

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九节，赵紫阳的双周维新。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

同上。

同上，第365-366页。

同上，第367页。

同上。

同上。

同上，第367-368页。

同上，第368页。

同上。

同上。

同上，第369页。

同上。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3日，第120页。

谷季柔《六四专访鲍彤》。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6月4日。

萧洪达（1918-2005）：广东潮阳人。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89年10月5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同上，1990年7月5日。

同上，2000年6月30日。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六节：价改闯关——赵紫阳的滑铁卢。

参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五节：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指担心胡耀邦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毛泽东。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七节，“倒胡”生活会。

指担心“保守派”拱邓力群当总书记。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四节，横扫“保守派”组合拳。

指吴学灿等在戒严以后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见本章 第七节：《人民日报》记者“逼宫”。

《陈一谔回忆录》说：5月22日有两个中央警卫团的高级军官曾找到他，表示愿意奉召。但赵回话，不愿看到流血。见该书第611、612页。

见本书第一卷 第二章 第二节：分道扬镳。

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七节：东风、西风、旋转风。

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三节：阎明复临危受命。

参见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下册，第四章 骑虎难下——毛林关系探秘。

此处原文为“十三届五中全会”，但与所述内容不符，根据赵紫阳关于十三大后邓小平地位的讲话，此处应为“十三届一中全会”。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2000年7月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胡耀邦被迫辞职。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四、筹备党的十三大。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同上。

同上，第200—201页。

《鲍彤答张伟国百问》。载鲍彤《中国的忧思》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5月版。

同上。

同上。

同上。

苏绍智《为正义和真理直抒己见——读鲍彤访谈录》。载《争鸣》98年7月号。

杜导正注：那时赵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是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兼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2000年8月6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此案为陶铸、赵紫阳主持广东工作时制造的冤案、错案。见本书上册，第一章 第六节，拨乱反正的“人心三策”。

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版。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中册，第455-45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鲍彤答张伟国百问》。载鲍彤《中国的忧思》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5月版。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96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据杜导正《赵紫阳还说了什么？——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谈这件事情的时间是1992年10月18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版。

原注：戈氏回忆录俄文版下卷，第435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2年10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联合报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7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页。

张敏《鲍彤谈“秦城交代”》。载《民主中國》<http://www.chinamz.org/ftpgb/mz0109b.gb>, 2001年9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 新世纪出版社, 2010年版, 5月19日, 第154页。参见本书下册 第四章 第二节: 江泽民微服进京。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 中册, 第461-466页。

节选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39章第四节。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出版。引自《争鸣》4月号《戈尔巴乔夫谈赵紫阳》。

同上。

同上。

译者按: 这里是根据语义翻译, 此饭店的中文名称不详。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 2001年版, 第428-429页。

同上, 第429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 新世纪出版社, 2010年版, 5月16日, 第129—130页。

详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7—38页。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 新世纪出版社, 2010年版, 5月16日, 第130—131页。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九, 1989年9月25日。

这个时间记忆与《中国“六四”真相》有出入。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见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1页。但王超华的这个判断与戴晴事前通过张郎郎向广场传信的情景无法衔接。详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七章 第一节 争取不流血的努力。

见李鹏《“六四”日记》，5月16日。

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版，第322页。

据《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报道《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

参见《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报道《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版，第322—324页。

参见《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报道《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16页。

据《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报道《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王丹的发言。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0页。封从德批注：“算数不及格。100多人怎么会出现99.9%？就算198/199也仅为99.5%。”

参见本册第二节：柴玲脱颖而出。下册第一章，第七节：赵紫阳泪洒广场。

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58页。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陈小平《1989年斡旋》载《北京之春》2001年8月号。

详见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36—138页。

《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 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 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绝不“秋后算帐” 希望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5—79页。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3页。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他曾因受到李鹏阻拦未能实现到广场的计划。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页。

见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4页。

以上游行队伍标语口号出自笔者手记、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醒动魄的56天》、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

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8页。

梁二《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1页。

同上，第182页。

详见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53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Ⅹ章 第二节：广播站、纠察队与“生命线”。

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10. 学部“五七干校”，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第56页。

同上，第57页。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11. 文革十年史，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

该文为“政治幻想小说”，后收入严家其《漫游历史和未来》一书，1980年由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杨大力编《走向民主政治，严家其中国政治论文集》，第127—140页。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出版。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同上。

当时的人们还不了解“四二六”社论实际上写在邓小平讲话之前。但社论根据邓的讲话做了修改后发表。见本书中册第三章 第四节，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见本书中册 第三章 第三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同上。

严家其《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

严家其《“五一七宣言”的背景》。载《前哨》月刊，1998年6月号。

同上。

同上。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35. 读南友《三驼图》，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222页。

《严家其谈包遵信》。见2015年2月16日严家其给陈小雅的信。

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即本节前述“五一七全市游行口号”，定稿时减少为18条。

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李建生《动乱“精英”严家其》。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日。

引文见鲍彤本人提供1989年9月25日《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三大结束后，面对保守派的攻击给赵紫阳造成的压力，严家其被迫离开政改办，回到社科院政治学所作研究。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五节：深化与波及。

详见本章 第五节：最后的挽救。原载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6页。

《人民日报》5月16日对话会录音。引自曹长青《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

《人民日报》5月16日对话会录音。引自曹长青《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

同上。

同上。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6页。

《人民日报》5月16日对话会录音。见曹长青《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从行文气势看，作者应是位资深报人。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4—85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9页。

指1938年前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国家干部，及同等资历者。

指1945年后国共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国家干部，及同等资历者。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79—80页。

同上，第80页。

同上，第80—81页。

同上，第81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五节：成长的烦恼。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原题《政府向人民妥协认错》。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82页。

同上，第82—83页。

《人民日报》5月18日对话会录音。见曹长青《抗争的声音：八九民运中的报纸——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五》。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

同上。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83—84页。

同上，第84页。

同上。

同上，第84—85页。

同上，第85页。

同上。

详见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86页；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中册，第504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95—396页。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中册，第506—507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 2006年版，第82页。

同上，第86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99页。

同上。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此处会议开始时间，依照李鹏《“六四”日记》。但该日记没有提到薄一波在场。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9页。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9页。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442页。

同上，第442页。

同上，第442-444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17日记载，邓小平此处说的是“这篇社论是正确的”。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9—14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

同上，第44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7页。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页。

参见本书中册 第三章 第四节：请战—碰头会—密诏。

同上。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82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4日。电子版，第100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5日。电子版，第102页。

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曾为贺龙元帅的外甥女婿，继为杨尚昆的妹夫。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446页。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9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3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页。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为：“对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只能组织服从，但是我保留意见。”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1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0页。

同上，第141页。据赵紫阳《改革历程》，李鹏在会上说：“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见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9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2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2页。

杜导正《赵紫阳：改革历程〈序：历史是人民写的〉》。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5页。

根据赵紫阳回忆，这里应该说的是“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杨尚昆在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讲话》记为“我的任务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见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4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2页。

同上，第142页。

同上，第143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9页。

同上。

张岳琦（1938-）：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赵紫阳秘书。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十一，1989年9月25日。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7日，第14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77页。

见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4页。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1989年9月25日。

1989年6月23日赵紫阳《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附录四。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14页。

指赵的秘书李树桥。李树桥（1944-）：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0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78页。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78页。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页。

指邓小平5月13日上午接见赵紫阳杨尚昆时，对赵紫阳汇报的方针的表态。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二节，抛邓？护邓？挟邓？

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446页。

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四节 赵紫阳醉酒。据杜导正《赵紫阳还说了什么？——杜导正日记》。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唐代诗人王昌龄五言绝句《答五陵太守》云：“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一，1989年9月25日。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2页。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4页。

4月19日。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69页。

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六章 第二节：江泽民微服进京。

谷季柔《六四专访鲍彤》。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6月4日。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9日，第112页。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2—74页。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同上。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5页。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同上。

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1989真相的一个推测》。载《动向》2015年4月号。

其实，即便有此事，这种猜测也是距事实较远的。参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二节，艰难的二次出发。事发当天柴玲与一位自称邓家子女朋友的交谈。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三节：出手时机的选择。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89页。

见本章第一节。

穆望（高瑜）《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镜报》月刊，1989年6月号，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4年4月14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23—1224页。

杨闇公，原名 杨尚述（1898. 3. 10—1927. 4. 6），生于潼南县双江镇，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中共党史上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毛泽东当政时代是一种嘲讽的称谓。指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从苏联归国、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路线”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包括：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其中徐以新以观点动摇不定被戏称为“半个”。

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伊铭《邓小平与杨尚昆的恩恩怨怨》1998年9月29日。

见吴稼祥《泡面传奇》。

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三节：重整河山。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同上，第344-345页。

同上，第345页。

同上，第345-346页。

同上，第346页。

同上。

同上，第346-347页。

指赵紫阳“亚行讲话”后，李鹏到赵紫阳家表现的“动摇”。见本书中册 第五章 第五节：为总书记“把脉”。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同上。

同上，第348页。

同上。

指导致胡耀邦下台的1986年底至1987年初学潮——原注。

应是背诵林肯《葛底斯堡演讲》。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同上。

杨白冰（1920—1913年）中国重庆潼南人，汉族。1938年1月入伍，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1985年-1987年任北京军区政委。1987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曾任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89年11月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参见本卷 第十三章 第三节：中南海：焦虑之夜。

李鹏《“六四”日记》的5月19日记载了在邓小平家召开的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会议。

参见本书中册 第七章 第七节：《人民日报》记者“逼宫”。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2页。

见本章第二节：“戒严”决定的出台。

事后，赵紫阳说，“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并认为李鹏有意瞒着他这么干。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2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1页。

同上，第4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

李鹏《“六四”日记》没有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同上。

应是18日。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2页。

同上。

5月15日上午，赵紫阳曾准备到广场看望学生，但绕广场一圈后离去。见本书中册 第七章 第二节：抛邓？护邓？挟邓？邹说《天安门悲剧》：“他（赵）准备于5月15日去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并和他们谈话，甚至已备好他的公车准备起行。但李鹏制止了他，警告他说，如果赵去天安门就是‘分裂党中央’。”载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纪念文集》。开放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6页。阎明复给出的说法是（16日）没能与学生联系上。见本卷第十三章 第七节：恐吓or警告——风马牛对话。

赵紫阳《改革历程》附录三：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07页。另据杜导正、萧洪达回忆，赵紫阳5月14日晨曾去广场。见本卷第十二章 第三节：待解之谜。

《赵紫阳同志会见索尔兹伯里的谈话》，1987年11月5日。载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附录1。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1页。

同上。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9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15页。

见柴玲《赵紫阳到广场与决定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9页；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39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二节：复食。

同上。

本节内容参照的文本有：1、李鹏《“六四”日记》；2、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3、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笔者的取舍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 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98-109页正文及其注释。

甄颂育，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86级学生。

据说，会前，阎明复和吾尔开希、王丹在旁边的另一个小房间进行过谈话，长达一小时。见封从德对《八九民运史》征求意见稿的批注。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称：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发生领导接见造反派时，往往不时打断或不让领导把话讲完的情况，会见一开始，他就同学生代表“约法三章”：“我还对今天谈话提出一点要求，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讲。我们不打断你们，也不插话。但是，我们讲话时，你们也不要打断我们。”学生代表对此表示同意。

参见本卷第十二章 第三节：待解之谜；第十三章 第六节：赵紫阳泪洒广场。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3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49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8日，第148页。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4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为“社会的正常秩序”。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为：“我都要利用”。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多了一句“，告诉全国人民”。

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为“在今天这个场合”。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5页。括弧内文字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没有。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5页。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5页。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5页。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没有这段话。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没有括弧内一段话。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8日，第150页。

戴厚英《回忆和思考——一个学运支持者的自白》。载《广场》杂志，第一期，第49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90—91页。

对话团正副召集人和三个组长都没有参加。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1日，第5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8日，第79页。

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这次会议在下午举行。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497页。

据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2015年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页。

据罗宇《告别总参谋部》。

八九 民运史

第七卷 顶 牛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十四章 民间竞争

第一节 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第二节 广播站、纠察队

第三节 “生命线”上的争夺

第四节 不信任的加深

第五节 深化与波及

第六节 首都工人自治会成立

第七节 党政军干部动员

第八节 “黑手”行迹

第十五章 保卫北京城

第一节 “三所一会”的反抗

第二节 复食

第三节 戒严令

第四节 全民“截”兵

第五节 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第六节 人大与党：短兵相接

第七节 军中反杨活动

注释

这是一场老年和少年的“顶牛”。在一方，是老年的执政者，代表着老年的中国，带着他太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政治的经验，还有他的实力；在另一方，是年轻的学生，代表着少年的中国，带着她对未来合理社会的向往和天真的逻辑，还有一腔热血。他们都一样的“认死理”，一样的不妥协。

第十四章 民间竞争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宋永毅、胡平、周义澄、张伟国、苏晓康、封从德）

当军事行动面临再次升级时，为提升自身的战斗力，学运的组织化程度也在加强。这一实践，在对政府的诉求外，衍生出了民间社会发育的另一理想。在全民投入的情况下，广场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第一节 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5月13日，绝食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北京市最低温度只有8度。当他们和衣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或三三两两地靠在一起，用各自的身体互相支撑、温暖着，用以抵御太阳远去后从地心升起的寒冷。柴玲有机会欣赏了这一独特的奇观。多年后，她曾抒情地写道：

“美丽的纪念碑沐浴在初夏夜光之下。它似乎能在星光之下折射蓝调的光辉。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座国家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用来纪念那些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烈士的。……在光滑的大理石表面之下，纪念碑里锁住的是成百上千英雄们光辉的魂魄，他们为我们现在生活着的更好的日子奋斗过，并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感到既渺小又受鼓舞。”

“一颗彗星划过了夜空，坠入了紫禁城里。这是一个厄运的前兆吗？有人说它预示着灾难的开始。还有人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不管命运最终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年轻的生命已经走到了过去和未来的十字路口。”

六年前，她从一个山区的偏远小镇，经过一整天的长途汽车颠簸和一整夜的火车无眠以后，来到这座城市。她乘坐的巴士曾载着她路过天安门广场。从移动的车窗里，她第一次看见了真实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另一侧的天安门城楼，以及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她想到了新闻纪录片里的镜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这座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84年10月1日，在同一个地方，她欢呼跳跃在打出“小平你好”横幅的队伍里。与她的同学们一道，向那位政治强人致敬！

作为一个从这次学运中自然产生的核心人物，在这一天白天，她自荐成为北大绝食队伍的召集人；在5月13日的寒冷之夜，当她第一次履职——查看绝食营地及同学们的状况，看见周围可爱的同学以各种难以置信的姿态睡去时，从她的内心升起了一种母性的“爱”。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照顾沉睡的孩子的母亲”。她或许也想到了她曾失去的三个未曾出生的孩子（有两个是在婚前）。那记录了她的屈辱和伤痛，她或许希望从眼前的场景中得到心灵的补偿？她虽然一无所有，但她“想到了圣女贞德”！

但她始料未及的是，贞德的道路是充满荆棘的。而且，她诗意的幻想很快就被残酷的政治现实打破。

绝食伊始，由于没有获得“北高联”的赞同，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5月13日下午，当绝食发起人王文举着一面上写有“绝食团”三个字的大旗从北师大出发时，马少方还坚决反对。他认为，“这场绝食活动必须由高联来领导。我们绝食同学只是绝食，绝食同学不要再搞出个组织。”进入广场后，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和程真等人，都是以“绝食倡议人”的身份，参与其中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的。

5月14日整个白天，天安门广场绝食者的团队各自为政，声援者接踵而来，参加斡旋的各方人士空前活跃，最忙碌的是“对话团”。5月15日，政府放弃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迎接戈尔巴乔夫仪式的打算，意味着“绝食”最初设计的

目标——迫使政府为了国际形象向学生让步——已经失效。“绝食还要坚持多久？还能坚持多久？”的问题，已经提到了众人面前。

经过凌晨的迁移折腾，5月15日一早才来到广场的李录，看到的广场营地是一片狼藉。他立即意识到，如果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绝食抗议活动有可能随时夭折。

据柴玲回忆，李录刚开始并不赞同绝食。5月13日下午，绝食队伍从北大出发时，曾经有过重要而令人惋惜的一幕：

“我们出发到中关村的时候，老远就看到李录推着自行车过来，我说：‘你快过来。怎么回事呀，你们上面是什么动静？’李录说：‘算了，算了，算了。’我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说，‘我们上面听那个所谓邓小平的五人智囊团说，基本上是这么回事，本来如果没有绝食的事，这事基本上交给赵紫阳来和平解决，给大家稀里糊涂过去了。’我说：‘唉，你怎么不早说？’他说‘昨天我们听你演讲时，我挤不进去。完了以后，又找不着你。不过，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生与死的界限的这么一场运动，看看怎么个结局吧。反正他要是真想和平解决的话，他也是绝对有机会的。’”

事后，柴玲说：“所以实际上，我们在绝食中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赵紫阳能够做点什么表示。”

但是，时间仅仅过去不到两天，事态已经出现难以挽回的征兆。现在的柴玲，耳鼓里听到的已是李录坚定的声音：

“我们需要领袖们能够挺身而出，愿意自焚，就像布拉格之春那个样子。”

他向柴玲讲述了用少数人“自焚”换取绝大多数同学的生命道理。并提议，由愿意率先牺牲的人们站出来，组成“绝食团”的领导机构。

与任何正常人一样，柴玲听到这个建议的反应是极端痛苦的：

“当他讲到‘自焚’的时候，想到老封、我父母，他们肯定特别受不了。我就一句也听不下去了。我开始止不住地抽泣了起来。”

作为一个外地学生，后来在天安门广场成为学生领袖，由于拿不出学生证，李录的身份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怀疑。1991年，在巴黎举行的“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诗人老木终于有机会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李录对此的回答是：

“我是南京大学85级物理系的学生，后来同时读物理系和经济系……我是4月26日由于在南京被公安局跟踪，我认为我在南京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同时我认为，我这个人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深信其它地方还有机会。全国望北京，我也只有往北京跑了。因为我也没有钱，在此之前我跑了很多地方，大概大半个中国，都是没钱旅行，我旅行从来不买票，作为副结果也从来不带学生证。因为这个原因，我那次也没买票，也没带学生证。我是4月27日到，到后我跟柴玲在29日见的，基本上到一、两天就认识她了。而且我到北京之后，有‘自治会’的学校我都去了，几十个学校，所有当时的著名学生领袖我都看了一遍。”

起初反对绝食的李录，是被柴玲的演讲打动的。此后，李录解释了自己转变的过程和提议采取激烈行动的动机：

“劝说绝水、自焚，用的主要理由就是，指挥部成立的目的，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为了避免其他人的牺牲，他们愿意首先牺牲，他们愿意站出来，为大家做这份贡献，做这个牺牲。如果你要自焚的话，你也先让我自焚啊；如果你要是真想自焚的话，不如你先到指挥部来工作吧。”

“因为当时的气氛并没有一个人想去争官，因为那是最危险的，所以哪个人能干哪个人可以干自然就形成了。”

“不要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在那个令人心惊的提议之后，李录的坚定声音继续敲击着渴望建功立业的柴玲：

“我知道他是对的。如果通过自己的死亡我们能够阻止别人的死亡的话，那么死就死了吧。我决定让李录来领导绝食抗议，因为他有我们当时正需要的力量、决心、清晰的头脑和效率。”

但当柴玲请李录担任总指挥时，李录却说：“不不，人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他们知道你。你的演讲激励了我们所有人。你应该作为指挥。”但是，他同意担任柴玲的副手。这一允诺无疑让柴玲感到踏实。于是，她向广场学生们作了讲话：

“‘我们的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条艰难的路，为了保护我们绝食抗议学生的生命，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如果我的死能够拯救广场上所有人的生命，那么我将是第一个走向死亡的那个人。’许多学生开始哭泣。许多学生鼓起了掌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人喊到，其它的人一起跟着喊起来。”

这时，有10多个人从40多所学校的学生中站了起来。他们走到绝食营地的前面，转身面对大家。而李录则和柴玲站在了一起。从此，他们成为新成立的“绝食团指挥部”的成员。

图7-1：柴玲（选自公安部通缉令）

事后，有许多人（包括封从德）质疑广场指挥部初始权力的建立，是“非程序”的。但据柴玲回忆，此刻，她想到的只是“服务”。她说：

“我的父母毕其一生致力于服务于别人，让我明白当人们呼唤你做一项事业的时候，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都要全力以赴，负责任到底。”

当时的柴玲，除了为同学服务和挑战“自我”的决心外，并没有“负责”的资质和资本，但无可否认，她应该是北京大学绝食队伍中“人望”较高的人，而北大学生是这次绝食的主干。而且，当日的绝食行动，除了自我牺牲和承担风险外，尚没有展示后来得到的巨大国际支持和荣誉的前景。但是，正如许多人事后总结的，绝食团的成立，在“北高联”、“对话团”之外形

成了学运“三分天下”的格局。而这个原本可以各有侧重、协同作战、共同推进的格局，因为没有更高一层的权力组织出现，三方很少协调成功，以至于除了“独舞”之外，“八九学运”从此再未出现象“四二二”、“四二七”一类的伟大行动。不仅如此，三方在摩擦中互相损耗，致使权力斗争缠身，并一步步上升为后期天安门广场的主要矛盾。最后，使“领袖们”濒临精神分裂的边缘。他们无意间重蹈了所有传统革命政党无不陷落的覆辙。

据李录回忆：

“采取激烈手段，是为了尽早结束，以避免真正的出现生命威胁。15日，我建议可能的话，是不是把队伍干脆拉到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上。原来是认为15日可能有回答，既然15日没有回答，那最多16日就有结果。要有结果的话，恐怕只能施加压力，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几千人了。但是这个提议在第一次联席会议上被当场否决掉了。从那时起，我也一直比较相信民主原则，这一点我跟小封一致。”“自焚呢，当然更是被限制了。”

5月15日召开的这次40余人的代表会议，就是后来几乎每天举行，并一直持续到6月3日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它成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最高权力机构，事后的许多事实证明，一切没有经过这个会议的决策、措施，基本上无法得到推行。事后，无论是赵紫阳、李鹏、阎明复，还是胡绩伟、万润南、首都各界联席会议，都没有想到通过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决策机制发挥作用，而是专注于与学运主体脱节的领袖个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天站出来的学生，都是有担当的青年。5月15日下午回到广场的王超华，正好目睹了程真焕发人性光彩的最美丽一幕：

“……有两个人架着程真从南边往北，就是绝食团前面那个空的地方一路走过来，程真挨个地跟大家说：‘大家千万要冷静啊。’我就问王丹是怎么回事，他在自己队伍中坐着。他说，有人说，要到长安街上去滚马路，去

挡路。‘我们不要做那种事啊。’程真从那头一直到这头。我印象当中，之所以那些绝食同学对程真有印象，而且觉得她是一个主要的领袖，就是因为这个。她很虚弱的，穿着黄长袍的裙子，两个人架着她走的，到处走，说是有人要滚长安街。”

5月16日，在阎明复的广场演讲结束后，绝食团正副总指挥召集了第二次“营地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文、马少方、程真等绝食发起人另立了一份指挥部名单，在下来的表决中，李录一度落选。但在柴玲的挽留下，李录又重回指挥部。”据李录回忆，这次会议确实开得相当激烈：

“……我们在广播站，广播站后面是一道草墙，草墙外边聚集有上千名群众，所有人都伸长脖子在喊，喊什么的都有，有喊我们走的，大部分的人是喊我们千万别上政府的当。那时北京市民刚发动起来，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跟各个学校先发动，后发动，跟北京，外地同学的区别差不多。而且那时开始已经有成万的大笔捐款，都是由国家单位做的，实际上这时候北京已彻底解放，彻底自由了。……”

“当时我派了一队纠察把他们挡开，派了两队纠察将近50多人勉强划出一个地盘，让大家坐下来有一个稍稍安静的环境。开始让大家先安静了一、二分钟，情绪开始平静下来，然后开始发言。印象较深的是周勇军，他坚决主张立刻离去，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他是一个少数派，是极端坚定的少数派，每次我开会他都是做这个。但是后来他的代表资格逐渐受到挑战，而且法大来了不止他一个，一共来了4个人，没有一个人承认他的代表性。当然他的发言资格没有被剥夺，因为当时我是主持，从开始到后来大部分营地联席会议都是我主持的。但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发言主张坚决不能够撤，说这完全不够级别，跟我们的要求不一样。我们写出了要求了，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做，纸上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要求，等等，而且很激烈。当时我的一个建议是我们先看一看，同时继续保持联系，看一看是否有更大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我说这还不是最后的结论，希望大家回去商量，然后再开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仍然是同样的决定。”

据会后各校代表回去统计，结果是90%的绝食同学坚决不撤。这是继5月14日晚统战部“对话”后，5月15日凌晨广场绝食学生就“撤”与“不撤”作出的第一次表决后的第二次表决。

事后看来，这一决定是事态朝恶化方向发展的开始。但是，它也证明了“广场营地联席会议”权威的有效性。这是一代人防止个人独裁，尝试民主的开始。因此，要撼动广场这块几近生根的“顽石”，只想着做少数领袖的工作是不够的，但这却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学生与知识界互动、朝野互动的不幸现实。

1991年在巴黎召开的“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不少学生领袖们反思了“绝食团”指挥部成立的必然性和局限性。封从德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对此作了系统批评：

“高联因为反对绝食等原因丧失了广场领导权，而广场又急需一个能代表绝食同学的权威组织，因此绝食团指挥部就产生了。而高联开始意识到丧失对运动领导权的危机，反过来支持绝食，试图重新取得运动的领导权，在广场上同指挥部的摩擦就不可避免。”

“（绝食团指挥部）这个自我任命的过程突如其来，门坎又几乎高不可攀（自焚），对其他学生领袖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政变’。如果说抗拒北高联的绝食团是八九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分裂，指挥部的形成则是第二次大裂变，既是绝食团抗拒北高联的延续，又是广场上后来越来越多的裂变的开端。譬如，与指挥部宣布成立几乎同时，人大绝食同学也脱离了对话团或北高联的领导，理由同样是‘既然绝食是一部分同学不满政府，自己报名、自发组织、自发进行的，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怎么做。’”

此后，围绕广场指挥部发生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如矿泉水塑料瓶中发现硫酸；针对李录、柴玲、封从德的一系列绑架案，大体都与“权力的非程序更迭”有关。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所作的“书面讲话”在电视上播出后，一直致力于与政府改革派合作的对话代表团撤离了在天安门广场设立的联络处。这意味着，绝食团的初衷——“通过绝食促进对话”的设想——已完全失败。据王德邦回忆：

“5月18日，对话代表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赶到中国音乐学院去开会。会议中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大家心悬着天安门的情况，于是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当看到一辆辆救护车长鸣着将一个个生命垂危的学生送往医院，看到红十字会一位副会长出来说，绝食几天后学生生命危险的情况时，整个会场哭声雷动，四十多条汉子肆意横流的泪水模糊了电视的画面，不可抑制的呜咽盖过了街上的救护车的汽笛……自我有记忆以来两次痛哭。其一，是我14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那种失去亲人的痛心，让我无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这89年的春夏之交，我不止一次地痛苦过，为学生那种慷慨赴死的豪情和与之相对的当局的冷漠残忍，为自己多年培养的信念的崩溃。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社会的党和政府还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第二节 广播站、纠察队

“镜头面前出领袖，广播里边出指挥。”事后，封从德总结道，尽管这不是他建立广播站的初衷，但5月15日“绝食团广播站”的恢复，的确是“绝食团指挥部”赖以诞生和巩固，以至于日后行使权力的主要工具。

那天早晨，从北大回到广场的封从德，先是经受了柴玲“自焚”的信息惊吓。之后，得知妻子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他又重新投入了广播站工作。但是一夜之间的变动，令14日刚刚具有雏形的广播站已经形同一个“杂货摊”。于是，他们的团队不得不着手重建：

“陈林已买来好几只高音喇叭，我就用广播求助，希望懂技术的同学帮忙。很快就有同学赶来，迅速将二只喇叭安在华灯柱上。”

“然后我开始建立一个广播班子，都是临时根据需要，利用广播征聘来的。我征请男、女播音员各一人，于是来了广播学院的王童和石冬青。还来了许多专业播音员，有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说：‘白天，我是政府的喉舌；晚上，我要做人民的喉舌！’”

依据以往各自的经验，他们边干边制订出一套广播站运作流程和一个稳固的工作班子。其各自分工如下：

总负责：封从德作最后审稿与综合调度，并作为广播站的代表，接洽处理各方面的事务；

站长：负责日常事务，先后由张伯笠、白梦、王童担任；

审稿：白梦、何贵方，将各方面传来的大量传单、文稿和通知，根据重要性和内容进行筛选；

播音：王童和北师大的女播音员（郑义的夫人北明也一度担任播音员）；

技术：管设备维护；

秘书：将广播内容全部录音，并管理磁带和文稿。每天都有能装一大纸箱的文稿；

纠察：保护广播站不受冲击。

经过几次调整，绝食团广播站逐渐从初期的由封从德一人掌握，改为“总编辑负责制”、“站长负责制”，白梦和王童逐渐取代了封从德的事务性作用，使他得以抽身，参与广场上更多事务的处理。

图7-2：绝食团指挥部广播站王童和北师大女播音员（选自64memo.com）

广播站建立之初，基本上沿用北大三角地“自由论坛”的模式：自由发言、自己负责，发言顺序由主持人协调。后来，虽然一度与“北高联”的“学运之声”广播站有所摩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绝食团广播站也倾向于不“参与任何派别之争”，成为独立的学运新闻机构，对各派学生组织一视同仁，谁有通告、宣言，他们都负责播出。封从德自我评价：这“颇有新闻独立的意味”。

“审稿并非新闻审查，”封从德解释道：

“但内容过于激烈的，如‘打倒共产党’之类，我们一般不播；寻人启事播过一段时间，后来不得不中止。好文章层出不穷、应接不暇。各界声援学生的文章，简短而感人。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市民的占大多数；农民、个体户、企业家、军人的也时有所见；警察、士兵甚至便衣的也有，或是亲自来广播站演讲，或是写几句话，表示不愿再跟政府走。这类消息，初期极鼓舞士气，随着成百上千的绝食者一个个倒下，我们便听从医生的劝告，逐渐减少这类新闻，以免绝食同学过于兴奋不宜健康。”

在稿件甄选上，学生领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身有北高联常委身份，又侧身绝食活动的王超华，在“514”斡旋失败的痛切教训之上，深感让学生们认识到自己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进而意识到保住胜利成果比盲目躁进更重要，因而认为广播站播出文章一味强调“未达目的，决不罢休”和“需要进一步牺牲”的煽惑于事无补。在另一方面，民间运动人士则觉得广播站的顾虑过多，局限太大，被认为有“狭隘的学生运动意识”，将辜负大有可为的历史局面。

张伯笠事后回忆说，所有这些不满事后都演变为对广播站的冲击和“夺权”。张伯笠曾经不愿卷入学运，但是，结果却爱上了广场广播站：

“这个广播站是封从德搞的。封从德说，‘你来了，正好。……你可以审稿子。’这样我就忙着审稿子，他任命我为广播站的站长。”

“广播站在那个时候是最感动人的。因为在第二天17日早晨，北师大的广播员播送了这样一段话，这是我给他写的，我记得非常清楚，‘今天是5月17号，同学们早晨起来宣誓，’就是那种《让世界充满爱》的那个音乐，后来这个女播音员用一个非常委婉、柔和的声音说：‘这里是绝食团广播站，今天开始17日的播音。现在我们已经有多少同学晕倒，被送进医院’。这个声音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然后她说：‘这是世界上，中国大地上第一个说真话的广播站。’底下就掌声雷动，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认为这个绝食团广播站在绝食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不仅仅唤起了大家的凝聚力，使大家凝聚到一起，而且它在鼓动方面，在它的宣传上，一步一步走的是非常稳健的。”

据北明回忆，她也曾在绝食团广播站义务播音三天。由于她受过专业声乐训练，又是作家，所以，她编写的播音词也颇受欢迎。

据广播站站长白梦介绍，绝食团广播站和绝食团指挥部是连为一体的，二者办公地点都在一处。后来大雨，有了一辆广播车，指挥部搬到了车上，广播站一度曾一分为二。当广播车开走，二者再度合一时，他决定将广播站改名为“民主之声”：

“当时因为我在绝食团的时候有许多人有意见，包括王超华提出的不给北高联广播，我个人当时认为广播的原则是我们这个广播站要控制广场的情绪，在绝食同学非常激动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去播一些非常刺激他们的言论。对情绪的把握是我当时强调的几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有好多人有意见，那么当两个广播站合并成一个的时候，为了使舆论的这样一种东西能尽可能

对外作得客观、公正，当时在我接管之后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说，我们是中立的，我们是独立于指挥部之外的。但事实上还是指挥部的广播站。为了和声明相符，所以我当时就把名字改成‘民主之声’。”

然而，绝食组织者最重要的义务，还不是通过同学们的自我牺牲，来达到一种理想的政治进程，而是保障绝食者的生命安全。而达成后一种义务，有赖于广场“生命线”的建立。而“生命线”的建立，又有赖于一支有效率和负责任的“纠察队”的存在。如果说，八九民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水平最高的一次民主运动的话，那么，其组织管理方面的创造应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据现有文献，八九民运中的学生纠察队，最早出现在“新华门事件”以后，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组织的冒雨游行中。出于保卫学生运动自身的纯洁性考虑，以后，它又被自觉地运用于“四二二”人民大会堂请愿活动。从这些实践中，他们总结出游行、集会、静坐等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纠察工作程序和管理方式，并经受了像“四二七”这样多达38所学校，人数高达3万、围观者上百万众，路途长达30公里，时间长达15个小时的“大游行”的考验。

5月13日“绝食”一开始，纠察队就作为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屹立于广场。起初主要由北京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承担。但随着绝食人数的骤增，学校派出的“声援队”开始不断地补充到队伍中来。以后，青年教师也参加了纠察的工作。

一位北京医科大学急救队女生曾目睹了5月15日上午纠察队员的工作情况：“一千多学生绝食，外围围着三层纠察队学生，最外层站着，手拉手。”16日，当常劲在广场上接任“北大声援绝食总指挥”的时候，该校在广场上的纠察已经达到2000多人，占据了广场上绝对大多数的位置。在北大的纠察队中，有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的职务划分：小队长是带队的，大队长是在广场上负责安排的，中队长是负责区域的。每个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都有代

号，大队长有三个，是001号，002号和003号，其他的按照顺序排。制度是换人不换号。即大队长可以换，但号还是001号。以此保证领导的完整性。

学运纠察队最初的骨干有北京大学的赵体国、张伯笠、孟召强等人；历任广场纠察队的骨干有北师大张迎新、北大的彭嵘、政法大的甄颂育、清华的张铭、北航的郑旭光、工人杨朝晖、广渠门中学的张健和北大的墨轩等人。地质大学教师张伦被“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任命为“纠察总长”后，也在广场进行过为期一天的整顿。

据曾有过纠察队员经历的学生回忆，纠察队最多时达到上万人。他们的来源，有的是“毛遂自荐”，有的来自各校的“拉壮丁”。也有特地从体育学院拳击队和武术队、散打队中挑选的，后期还有从穿制服的海洋学院等招募来的。据后期担任广场纠察队长的张健说，他自己就是被体育学院的学生以“春游”的名义忽悠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据他介绍，广场纠察队的分工有：负责广场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或“北高联”负责人保卫工作的，叫做“特别纠察队”（简称“特纠”，俗称“保镖”）；普通纠察队中有“敢死队”，由“敢于写决死书”，“或者在决死书签字的”的纠察队员组成。他们愿意在最危险的时候，在军队和市民之间，作出牺牲。他们的标志是头上或胳膊上缠有红布条。纠察队总指挥的职责，是领导广场安全大队、夜巡队、情报汇集队和特纠队，以后还有堵军车的敢死队。

纠察队的责任和履职范围是维持广场和游行队伍的秩序，保卫广场的指挥部、广播站、财务部、宣传部、情报部、联络部等处安全，保卫学生领袖的安全。同时也抬水、搭帐篷、分发食物、运送伤员、打扫卫生……

据张健介绍，纠察队员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醒着就工作，睡了就是休息”。广场纠察队员基本上都被送进过医院，或者有挺不住走的。他自己也几次被送进医院：

“广场的学生开始绝食以后,我一直在那里帮着抬水,搭帐篷或背晕倒的同学。后来我自己被北高联指挥部任命在生命线上做纠察队长维持秩序。运送绝食伤员,最多的时候,几乎每分钟都有学生抬走。绝食一天天的过去,但政府仍然没有稳妥积极的解决办法,对于我只有一个信念:救人,抢救并保护好广场上的每一个同学,而我自己也有好几次进医院……当时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地表温度太高,连续很多天抬人,没有休息。有一次,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有栅栏的床上,手上插着吊瓶针。原来是我躺在北京儿童医院的病床上。我变成了大儿童。我出生的时候也没有躺过这样一张好床。原来,需要抢救的绝食学生太多,当时的各医院已经出现了床位紧张,只能临时改造一些婴儿床急用。”

一位曾经自愿担当广场纠察队员的北大女生,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纠察队员的辛苦:

“我发现许多人,连着二、三天坚守岗位,帮助维持秩序。这几天,我充分感到北大人的责任感。刚开始的五天里,偌大广场的秩序,全部是由北大同学(后来许多教师也加入了)来维持的。为保证救援车能及时赶到现场,同学们手拉手排成两道人墙,组成有名的‘生命线’,而且一站就是十几小时。(后来其他院校也纷纷组织纠察队,情况有所好转。)大家都是默默地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图7-3: 绝食第四天,每分钟都有一个同学晕倒(选自64memo.com)

纠察队承担过的比较艰巨的任务是保障广场财务部安全,还有镇压数次针对学生领袖的袭击事件。

绝食早期,因纠察队都是各校派遣,广场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指挥机构,绝食团指挥部也管不了纠察队的事情。纠察队的需求,在绝食团的广播站也得不到反映。据王超华回忆:

“绝食发起是星期六、星期天，没有能够及时调来各校同学。在各校同学来了以后，在纠察队都拉起来以后，我们感觉对我们非常急迫的压力是我们没有宣传工具来鼓励这些做纠察的同学。据我们的了解，绝食的几天当中晕倒的纠察同学，不比绝食的同学少多少。因为常常就没有人替换，就这么拉着站多少个小时。而且一开始时，饭送不进去，纠察的同学也没有吃。送的面包，即使允许他们吃，大概是三个人能有一个面包。……可是绝食团的广播，不给我们广播稿子。……我们认为，广播的内容，应该是能够照顾到所有的面的。”

“五一七”大游行，对广场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对纠察队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郑义回忆，前一天，当他们接到这个大游行的所谓“指挥部”的通知后，看到游行路线经过西单、王府井大街等商业区，就感到情况不妙。当晚，他就来到广场“绝食团”指挥部的营地，在作家班的“小兄弟”张伯笠的指引下，他们好不容易找到刚刚从医院归队的柴玲，又发现她沙哑着嗓子几乎说不出话来，走路也摇摇晃晃，“谁也很难拽住他们，连续说上几句话”：

“好不容易逮个空儿，跟柴玲、郭海峰几个头头谈了明天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们亦不知道那个‘游行总指挥部’是些什么人。他们问我的意见，我谈了几个‘禁止’。柴玲半躺在别人身上（地方太小，有人倒下便睡去，打都打不醒），找了支笔，在一张破纸上划拉。见他们接手了，我如释重负。”

尽管放下了包袱，但对于学生能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郑义其实是一点把握没有的。所以，第二天的情况令他“出乎意料”：

“游行队伍未能进入商业街道。学生纠察队封锁了东单、西单、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繁华街道。——看来，昨晚柴玲的那张破条子真起作用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整个机器是如何运转的。在这等混乱局面下，重要意见能上达，领导机构（常常是谁也找不到谁）能及时研究，执行部门能坚决贯彻，真了

不起！北京人也真了不起！他们完全服从学生纠察队指挥，不进入商业街道。”

事后，北师大学生、“北高联”常委梁二回忆，当时“到王府井一带去守住路口，不要让游行队伍从那里走过”天津大学的学生，是他和邵江“派”的。

5月17日大游行后，“北高联”人马在邵江的带领下，在清华纠察队的辅助下，占领了纪念碑的顶层。据常劲回忆：

“（北高联）主要是用北师大的同学作为高联的组织机构，我看见他们设立了有联络站和财务站，王志新在那里负责，我还看到了郑旭光。他们都带着红领巾在那负责这个活动。我看到纠察中比较负责的，还有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他们和北师大的学生负责纪念碑南侧一线的队伍。”

图7-4：广场纠察线（陈小雅摄）

据梁二回忆，北师大的纠察队长叫张迎新：

“他曾经是师大学生会比较活跃的同学，他带来一帮教育系的哥们儿在广场上首先建立了一个纠察队。后来担任纠察队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总指挥，戴着一个帽子。我们刚建立财物部的时候买了几顶帽子，说只有戴着这个帽子的人才能进入广场的纪念碑第三层。他就在帽子上写了“〇一”，也就是说一号。……以后谁戴了这个帽子，谁就有权指挥整个纠察队。”“他在纠察队中起到了几个作用，处理了几件具体的事。一个是绝食同学的安全保障问题；第二是在外围组织市民。比如当时有些市民冲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东门，他就带领纠察队员做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可贵的。”

北高联占领纪念碑顶层后，从绝食团支款，建立了“学运之声”广播站。王超华所说纠察队员的疾苦得不到迅速反映的矛盾才得到缓解。但由此产生了绝食团指挥部和北高联两个广播的冲突，及两个广播站的冲突，以至“绝

食团指挥部”与“北高联”的冲突。后经过磕磕碰碰中的调适，“北高联”与“绝食团指挥部”一个负责外围、支援、救助工作，一个专责绝食团营地内的工作，分工逐渐变得清晰。

据张健回忆，他也曾参加过这些纠纷。有一次他被几个人带到清华纠察队的营帐，一个拄拐的人坐在那里，周围是几个看上去“能打的”。他们严厉质问了张健的来历，最后表示，今后与广场纠察队井水不犯河水，各管各的事。

第三节 “生命线”上的争奇

如果说在“四二二”请愿产生出来的纠察队标志着运动第一阶段的组织水平，那么，天安门广场绝食营地的“生命线”则标志着运动第二阶段的管理水平。

所谓“生命线”，是学生绝食以后，由北京20多家医疗单位在广场的医护人员、医学院的学生与北京市红十字会，为抢救濒危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营地上共同建立的一条链接各校学生营地和北京各大医院的救护通道。她的最初人员，是北京中医学院、北医大的师生。“他们先找到北大联系，然后北大纠察队帮助他们搞东西。”

据李录回忆，这条“生命线”是这样建立的：

“从15日开始大批人晕倒，生命线变得很重要了。开始的时候是请甄颂育来负责纠察的，王文去协助他。所以王文出去转了一圈以后才有了后来所谓的联络图。他把各个学校的地点写下来，成为他最大的财产，后来一直不愿意交。……后来我想想没有办法，只有直接去。直接去的时候我就把两部分，北面和东面分割了一下，在中间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空道。而这个空道

后来派人把它拉起来，这个道后来就叫成了生命线。……这条线后来延长到长安街上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没管，不大清楚是谁做的这方面的工作。”

“在初期时主要是北医和北中医的同学。但到了16日早晨，我们建立了‘首都医院防疫联合小组’。这事情是由协和的一个负责人来找我，商量这件事情……后来跟他们去开了两次会议，最后他们一共20几家医院联合形成。主要工作当然是他们做的，我们只是帮助建立与广场同学的联系，建立纠察制度，给他们‘特别通行证’等等。后来对穿白大褂的人完全有种尊敬。”

据5月15日开始进入广场的一位北京医科大学“急救队”女生回忆，那天下午4：00多，“生命线”已经拉起来了。但当时没有担架，病员全靠手抬。她的珍贵日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急救队员”每日工作的内容和绝食学生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

“（5月15日）早上9：00去校医室开仁丹，老师给我许多。又跑病房，外科门诊取药、生理盐水、葡萄糖水、包扎用品……”

“（夜间）由于天气太冷，医务人员出来巡诊，清醒着的同学叫醒周围的人：睡着会感冒的。我拿好各种药，整装出发，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过一个一个躺着的熟睡的人，轻轻地、不忍心地唤他们起来喝水及板蓝根液。诺大的广场已经几乎没有通道，躺着的全是人，行走困难极了。天黑，又怕踩着同学，纠察队的人已散了许多，绝食者完全暴露于广场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很累，回到自己的营地。刚刚坐下，旁边一个坐着的女生突然倒下来，叫也叫不醒，原来昏过去了。”

“（5月16日）已近中午，太阳当头，热极了。人越来越多，我们去送仁丹、十滴水给绝食同学。许多人中暑，许多人发烧，好可怜。”

“可怕的晚上又到了。冷是克服不了的问题。几床棉被铺在地上，供绝食者躺着……为了不让大家睡着，开始唱歌：国际歌、流行歌曲都唱，很提

神……我的辅导员陪我们整整一夜，我一直靠着她。老师不让我们动，不让我们干活，可是我们看着别人在抬水、送药，心里难过极了。……病人仍多是用手抬，抬走的已经有300多……”

5月16日，在绝食学生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上述“首都医院防疫联合小组”联络北京各自发参与救护院（校）的医务工作者，联名向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市红十字会发出了紧急呼吁：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惯例，我们北京市高等医学院校和北京各大医院医务工作者，从人道主义的愿望出发，希望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红十字会督促中国政府对绝食学生迅速采取积极措施，挽救广大绝食学生的生命。”

这一呼吁得到了政府的迅速响应，但协议达成的过程，却颇为曲折。据“六四”后《北京日报》刊登的一篇记者对北京市红十字会医护人员的采访说：

“5月16日，广场上已有600人次晕倒，在现场进行救护工作的22所医院和医学院校师生呼吁，要求市红十字会迅速采取措施，以保证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1200名绝食学生联合签名，对市红十字会及各医院帮助他们的医务人员表示最高的敬意。下午5：00，广场上的学生还打出横幅，要求与市红十字会负责人对话。晚7：00，‘高自联’常委熊炜 等人与市红十字会负责人会面了。”

从5月16日晚到17日凌晨0：40，北京市红十字会与“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的成员一直在谈判。据称，开始的阻碍来自北京市红十字会。矛盾纠结在是否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加入的问题。《北京日报》刊登的这篇采访说：

“熊炜等人……拿出一份写给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北京红十字会的呼吁书，声称按照国际惯例，绝食72小时以上，国际红十字会可以干

预。并明确表示要与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联系。这一要求被当场拒绝了。实际上，国际上根本没有这种惯例。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说：‘你们不是爱国吗？中国人能干的事为什么要请洋人来干呢？我们北京红十字会有62万会员，完全有能力担负起对绝食学生的监护和医疗工作。’经过市红十字会的反复做工作，‘高自联’才与市红十字会达成协议，从17日凌晨1：00起，由市红十字会全部接管对绝食学生的监护、抢救、治疗工作。”

“这时，熊炜等人又提出要与中国红十字总会负责人见面。在总会，熊炜等人又一再提出要国际组织干预的问题。这次他们改口说，国际科教文组织有这种规定，国际红十字会应对绝食3天以上者进行检查干预。总会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世界上只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它并没有规定可以干预哪个国家的绝食活动。总会的负责同志拒绝了‘高自联’的这项要求。”

“北高联”之所以会提出“国际红十字会加入”的问题，源于他们不相信，一个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在关键时刻不执行政府的意志。为这场运动已作出巨大牺牲的绝食者，尤其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不愿意在没有收到任何结果的条件下，忍看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不明不白地被消解于无形。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独立于各国政府的纯粹人道救援团体，请他们加入本不存在什么“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事后的一些迹象表明，学生的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

绝食团的封从德见证了这个过程：

“16日深夜，可能是北高联的熊炜，找我同去广场东面历史博物馆前，与北京市红十字会商议救护事宜。车里有市红十字会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会长是位妇女，五十左右，一副党委书记的样子；副会长也五十多，干瘦的老头，显得精明而谦卑，像个外科医生。他们将我们迎上一辆救护车，便令司机开到长安街上。”

他们自称受北京市政府的委托，来广场护理绝食学生。他们对封从德强调：“完全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履行职责。然后，他们说，发现广场上的救护工作没有统一协调指挥，完全是各个医院各自为政，出现许多混乱；现在是将各个医疗单位组织起来的时候了。接着，他们提出要求：由市红十字会来领导，指挥广场上的医务、救护工作。他们保证市红十字会能出十几辆救护车和几十名医务人员。

这时，封从德想起广场绝食学生向他反映的情况：

“从下午开始，许多同学气愤地跑来汇报，穿黄制服的市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十分粗暴，抬着担架在绝食同学中横冲直撞。昨夜认识的两位医生肖锋和柳田告诉我，市红十字会是北京市政府的下辖机构，听北京市委的调遣。而今天凌晨，市红十字跑到中国红十字会借制服，两位医生觉得是在搞什么阴谋。肖锋和柳田还希望与学生一起成立‘救护协调中心’，我很赞同，便拜托二人负责串联医务人员，我去组织学生一方。”

“因此，现在面对市红十字会的要求，我很为难，只能对他们说，希望他们与其它各大医务单位协商，组织‘救护协调中心’，而我也得回广场与同学们商量决定。干瘦的副会长一副焦急的神色，说恐怕这样太慢，广场上很快可能爆发瘟疫。但他们那种急切，使我更担心他们带有某种使命，因此坚持回去商量。相较之下，我更信任肖锋他们。我答应之后再联系。”

事后，“北高联”王超华也承认，正当封从德同市红十字会协商的时候，她曾向官方建议将封从德和柴玲“控制到医院软禁起来”。

但出于对学生生命负责的态度，学生还是对北京市红十字会作出了妥协。17日“凌晨1：00整，市红十字会的80名会员、16辆救护车和两辆大轿车准时到达了广场。”

自17日起，首都几十家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和许多机关单位都开来了救护车。当日暴晒，气温高达30℃，几家医院还在广场搭起了抢救棚。

据前述北医大女急救队员回忆：

“（5月17日）一分钟就有一个病人，我实在躺不下去，咬咬牙，爬起来，开始急救病人，给他们用冷毛巾擦脸，灌葡萄糖水，静脉注射葡萄糖，测心跳，量血压。老师见我们几个绝食者无力的样子，每人注射一百公撮葡萄糖，人精神了许多……救了十几位病人。最后统一让我们绝食者测血压，我是70/50，显然，极度营养不良。”

这位急救队员对当日绝食者状况的描述，与《癫狂的蛇年之夏》记载吻合：

“据目击者17日下午1：00，在历史博物馆西门前急救处的统计，就有57辆救护车疾速驶往市区各大医院。”

“有的学生明显脱水，有的已经发生脑出血、消化道出血、休克、肺炎、肠炎等严重并发症，每分钟都有急救车鸣着长笛，把病情越来越重的学生送到医院里……”

医护人员认为，“最初晕倒的学生，多是由于饥饿造成的低血糖、低血压，治疗比较容易。从第4天后，开始出现并发症——由于体内电解质紊乱而造成的抽搐、烦躁、萎靡等症状。由于大脑皮层在极度缺乏营养的状况下长时间持续兴奋，不少同学已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精神症状。由于肌体免疫力明显降低，各种疾病也开始发生，除了肺部、胃肠道、尿道感染，还发现了痢疾、黄疸性肝炎，有的还患有心肌炎、肾功能衰竭、脑出血等较为严重的疾病。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两个研究生，从13日起就参加了绝食。结果一个一度精神紊乱，另一个也几次被送进医院。原本一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不几天已经变得虚弱不堪。

大约也就是在这两天，两位五大三粗、熊腰虎背的青年，遭遇了他们人身中的仅有体验：一位是前述纠察队员张健——睡进了儿童医院带护栏的婴

儿床；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浦志强，被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送进了东华门附近的妇产医院。已经绝食5天的他罹患的是急性肠炎。

“看着这些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被摧残，真是心如刀割。我们只有竭尽全力地救治他们，内心才能感到安慰”。不止一位医护人员这样说。

图7-5：早期学生营地自搭的简易帐篷（选自64memo.com）

“（17日）晚上又到了，一分钟有两个病人被抬走。我们队伍的旁边不自觉地拉起了一条生命线。”

前述北医大女急救队员回忆道：

“深夜12点，风特别大，搭好的棚子几乎被吹走。……‘生命线’人手很缺，路口没人挡，我自愿去帮忙。看热闹的人走来就告诉他：‘谢谢，请您离开，里面躺的全是绝食的同学，他们需要安静，谢谢您，离开吧。’许多新闻记者抬着录影机走来，也被挡住了，因为上面有指示。更有许多绝食者的家长跑来，许多母亲哭了，哀求着见一见自己的儿子、女儿。许多家长是从外地赶来的，后来我也不忍心，只好放他们过去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5月18日）我做了一天的纠察队员，同伴见我，总劝我回棚躺下休息。一个绝食者已经成为重点保护对象。我心里很难过，因为自己心里明白，我和其他绝食者不同；在不断喝牛奶、青乐（乳酸菌），许多人是不喝奶制品的。我目的明确，首先做一个优秀的急救队员，其次做一个坚强的绝食者。”

据说，在绝食的7天里，参加者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晕倒被送医一、两次的经历。但也有一次都没晕倒的例证，此人曾现身说法道：

“我的办法主要是利用气功，减少身体消耗。当然，在绝食期间，我也喝了一些饮料。因为听说根据国际惯例，绝食可以喝饮料，当年印度的甘地

就是以这种办法绝食48天。……我有一天就喝了不少于50元的东西，有蜂王精、可乐、牛奶及各种高级饮料。”

尽管这只是个别现象，但这确实被当作有人嘲讽学生“绝食不绝牛奶”的来由。

但与这位不付出体力的气功爱好者不同的是，前述中国医科大学勇敢的姑娘，不仅绝食到最后一刻，而且以她的实际行动，不仅担当着“急救队员”的责任，还担当起纠察的工作！5月18日半夜，她看见“生命线”纠察缺人，又一次站到了那个最艰苦的岗位上：

“我从12：00多一直站到凌晨4：00，嗓子又喊哑了，人有些晕，不得不离开，回到棚子里，睡着了。据统计，平均每20秒有一个人晕过去……”

“早上5：00多，我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被送上救护车，忙喊着：‘我没有晕过去！’可那些急救队员哪里听我的？一下子被送进北京积水潭医院。”

“（5月19日）深夜1：00多，纠察队员极缺。我拿起一件棉大衣，跳下车，开始新的使命：叫担架、维持秩序。凌晨5：30，天亮了，我有些晕，跑上车，睡觉，睡得好香。6：40被别人叫醒，睁眼望见爸爸，一起走到绝食圈外，又见妈妈。他们开始给我讲形势很危险。……妈妈说我长大了许多，问还要绝食多少天？我说我也不知道。浑身已经很脏，很臭，同意和父母回家，洗个澡，再战斗。回家洗澡后，父母只是希望我不要去，但不强求。我自己只想着做一个急救队员，做一个坚持到底的绝食者。”

在1989年5月中旬的这一个星期里，类似这位女大学生急救队员的动人事迹还有很多。据北京市急救中心内科急救室的护士长说，她们全科护士都是19—21岁的年轻人，她们上完白班接夜班，让她们休息，赶都赶不走。她自己四、五天来只睡过6小时。

还有两位穆斯林到急救中要求献血。他们对医生说，我们的收入低，拿不出更多钱来支援学生，但我们一定要为这些可敬可爱的学生做些什么，心里才能平静。

药房主任为了保障用药，一连三天三夜不回家，八方联系，紧急调集药品。到19日止，光各种输液药品已用去400箱。而所有医药公司、药厂都全力以赴地支持。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医药经济技术经营公司、天桥医药公司送来的急救药品，农科院的医务人员送来6桶酒精浸泡的棉球……都是无偿提供。

另一些做着默默无闻奉献的人，是日夜奔波在“生命线”上的司机。据记载，一位司机连续开车38小时不休息，仅仅靠浓茶提神。急救中心的一位负责人不得已，只好把他反锁在地下室，才逼迫他睡上一觉！

5月19日夜，大概也就是在纠察队员奇缺的时刻，笔者有幸潜入广场，并一窥这条用青年医护工作者、各界志愿者和广大纠察队员用心血建立起来的“生命线”：

她如同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它的心脏，是在嘈杂拥挤的绝食营地辟出的一块空场，位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的旗杆前，向北穿过绝食团营地的中轴线，向东直达历史博物馆西路，呈“L”形。在东面这块宽阔的空场上，停放着数辆蓝灯闪烁、随时待发的救护车，周围是整装待发的，由白衣战士和担架队组成的救护队。通道向东到达历史博物馆前的广场东路后，向北、然后通过东西长安街，向四面八方呈辐射状散开，末稍连接着北京市急救中心和北京协和、同仁、天坛、朝阳、友谊、积水潭、复兴、铁路、妇产、儿童等32家医院。据称，这条生命线是北方交通大学师生的杰作。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场纠察队纪律的严明和群众的自觉维护。

据官方统计，自5月15日至24日18：00的10 天时间里，从这儿运出救治的学生达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 保证了绝食学生的及时抢救需要，无一人死亡。

虽然自愿参加绝食的学生们愿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的文明进程；虽然组织者和“幕后黑手”期待通过学生们的牺牲，收到某种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成果；虽然政府中的某些人也想利用绝食者的“健康状况”来揭露组织者的“不人道”面目，但是，最终，在进步了的时代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于在“人命”的问题上开玩笑。于是有了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是，人活着，诉求还在，希望还在。事情并没有结束。

第四节 不信任的加深

学运，与她的支持者一道，度过自己最艰难时刻的过程，就是学生成长的过程，同时，（很可惜）也是学生与政府互不信任继续加深的过程。

事情起于5月14日晚，《新闻联播》在报道广场上的绝食请愿时，所配的画面是一个学生坐着吃面包的特写，而且“这个镜头放了很久”。

这看上去很像一个有意向绝食学生“栽赃“的行为。为此，有的同学担心政府造谣，甚至拒绝任何饮料。两天下来，绝食同学的体质迅速下降，到5月15日，已经有上百人倒下。救护车笛声不断，有的同学进了医院也拒绝饮用流质养料。出于对自己的学生生命安全的担忧，15日晚6：00许，北大副校长陈佳洱带领教师声援队伍来到广场。他和一名校医来到广播站，讲了几句话后，便将话筒递给医生。这位主治医师告诉绝食的同学说：

“绝食不是绝水，不仅可以喝水，也可进流质。按国际惯例，绝食只是不进食硬性食品，但可用饮料、牛奶等流质。印度的甘地便是饮用牛奶坚持绝食了49天。”

事后，封从德感慨地说：

“北大主任医师的讲话，不知挽救了多少同学的健康。从此以后，绝食同学便可坦然地喝市民送来的各种饮料。冷饮、牛奶不断送到广场上，有的市民甚至将巧克力、蜂王浆加到水中。这时，绝食队伍中传来愤怒的抗议声，他们担心这么多营养物质损害了绝食者的声誉——‘我们是来绝食的，不是来疗养的！’他们派了代表到广播站这样呼吁。”

政府的“花招”，严重损害了学生们本已脆弱的信任感，同时也危害到绝食学生的身体。5月16日早晨，王超华从北大校医院的一个大夫那里听说，有自称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在把晕倒的学生拉走时，“把那些没晕的同学也拉走了”。人们感到，“这是阴谋，这是要破坏绝食。”

“八六学潮”带给封从德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影响到柴玲。据梁二回忆，为此，他曾跟柴玲打过“唯一一次受到温和对待”的交道：“当时我跟柴玲说有些同学和老师告诉我，红十字会想抬走学生，请你广播一下。柴玲就广播了，说警方、红十字会员要把学生抬走。”

据李鹏日记，红十字会的行动确实是北京市委的决定。5月16日当晚政治局常委会后，李鹏日记写道：

“已有学生因绝食而晕倒，近600多人，有的生命处于垂危状态。出席会议者对此感到焦急。李锡铭提议，由北京红十字会派负责人到广场争取与绝食学生达成协议，允许红十字会运送危急绝食病人去医院抢救。”

但是，在北京市红十字会进驻广场仅仅4个小时，中南海紫光阁里的会议还没结束，“北高联”就“单方面撕毁协议，宣布市红十字会不受欢迎，将前来救护的医务人员赶出了广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突然的变故？除了前述事实种下的“不信任”根源外，与北京市红十字会进入广场后的表现是分不开的。据该会工作人员回顾：

“按照协议，‘高自联’应负责打开救护人员进入绝食圈的通道，并将绝食学生分成四组，以利救护人员进行诊断和救护。可是‘高自联’根本没有进行一点准备，致使救护人员在广场外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得以进入广场绝食圈。只见绝食的学生绝大多数已经入睡，密密麻麻躺成一片，救护人员既无法下脚工作，也很难看出谁是睡熟、谁是昏迷、谁的身体虚弱。”

“救护人员在医学院校师生的协助下，一个个将学生推醒诊断，数百名绝食3天以上的体弱同学被及时地送往各医院。”

从上述工作人员的陈述，我们大体可知，他们对于广场学生管理能力的低下极不满意。他们认为，既然是等待救助，就应该将学生原先按学校聚集的建制打散，按医院候诊秩序将绝食者分成四组。但是，他们忘了，绝食营地不是候诊室！他们还极不满意绝食者没有一个个清醒地迎接他们的到来，而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时已是凌晨1：00多了！就是吃饱喝足的人，这时也到了肠胃排空，肌体休眠的时刻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满意、不理解 and 缺少同情，所以，说他们“态度粗暴，抬着担架在绝食同学中横冲直撞”，是可信、也可以理解的。

但理解不等于原谅，更不意味着容忍。因为，不论是被冲撞、被打搅的，同样是已经很虚弱的学生。

于是，驱逐市红十字会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不幸的消息传回紫光阁的小会议室。政治局常委们得到的汇报是，“学生头头已同意红十字会派车去。但是，只运走一部分人。据说是由于‘头头的强制干预，对于其余的绝食病

人，不允许撤离，即使有的人想走，也不准救护队将他们送走，反而把红十字会的大轿车轰走了，并且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 ” 李鹏当即认为：

“这已充分说明，这些学生头目已丧失起码的人道主义，不顾绝食学生死活，以绝食为手段向政府进行要挟。”

事后，“北高联”虽然又请回了红十字会，但他们的纠葛仍没有完。5月17日，天气预报有一个强大的暴雨云团正从西北方向飘来，将于第二天抵达北京。这个突然的变故，令学生绝食团指挥部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据李录回忆：

“保障同学生命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发生在17日晚上。当时传说要下雨，而且17日晚上情况突然变得非常危急，17日一天有将近1000人晕倒。”

“这前面还有一些细节，在16日开始出现要绝水、自焚等，主要是两个学校，一个是电影学院，一个是南开大学，两个学校将近有30几个人要绝水，加上外地学生提出自焚。南开的绝水被制止。电影学院的没有被制止。法大在新华门前开始从跪请到绝食，另辟另外一块战场。而且那一块到我们19日绝食结束之后都没有停止，之后好几天才停止。”

图7-6：坚持新华门请愿的政法大学队伍（选自64memo.com）

“当时我们的能力实在有限，而且支持实在过热，所以不仅内部的各种更激进的要求得不到制止，外面的人更无法制止。我记得很清楚的几件事，像西安、洛阳的学生一上火车就开始绝食。还有外地学生献血队，一边走一边献血，然后到北京来绝食，说到北京来就是要参加绝食。所以实在控制不住。”

“广场上人数剧增，我最后一次点名是3144人，这么多人，这么复杂。当时广场已被占领了4天，垃圾成堆，没有地方上厕所，很多地方随地大小便，加上生命力抵抗很有限，所以瘟疫就成为最主要的话题，至少在我们这些人

中间，我从15、16、17日听到协和的那个人不断地提。我们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在后面有一个指挥帐篷，我们去每次都提。到17日情况突然变得非常紧急，因为预报晚上有大雨。按照医生的说法，一场大雨使瘟疫传播的速度比没有暴雨时的速度增加10到20倍，水打到尘土上浮起来瘟疫就会迅速地传播开来。他说一场暴雨后100%一定是一场大瘟疫。如果这时广场一场瘟疫，全北京就会立刻流传开来，这样民主运动根本不用政府来镇压，一场瘟疫就会使民主运动永远背上这么一个黑锅，自然而然的民主运动就下去了。这是当时最大的一个考虑。”

图7-7：5月18日，纪念碑周围宛如吉普赛人的营地（陈小雅摄）

学生最早的计划，是寻求一批帐篷避雨。据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回忆：

“17日下午5：00，市红十字会接到市政府的通知，18日将有雷阵雨，要求市红十字会和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绝食学生的避雨问题。市红十字会马上与‘高自联’和学生绝食指挥部联系，提出用大轿车避雨的方案，但直到深夜12点多，‘高自联’的常委郭海峰才出面答复。”

“郭海峰坚持要求市红十字会给他们提供帐篷，在此之前，‘高自联’已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以便在广场长期呆下去。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说，从保证绝食学生健康出发，应该使用大轿车，这样有利清扫和消毒，而帐篷则容易进水和滋生病菌。郭海峰却问：‘你们用大轿车，是不是想把学生都拉走？’市红十字会负责人告诉他：‘我们一个也不会拉走。但是你们要考虑学生的生命安全。如果让学生淋大雨、或躺在帐篷里的湿地上生了大病，你们负得起责任吗？’郭海峰这才表示要回去商量商量。”

显然是出于不信任，学生原本不打算接受红十字会提供的轿车。他们打算自己对广场来一个大扫除。李录回忆道：

“整整一个晚上所有的人在忙碌，主要的事情是尽可能的整队。当时要整队是难上加难，我在15日时试图整了一次队，化了3个小时。到17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平均晕倒了一、两次，身体极端地虚弱，指挥部的这些人也绝食，很难保证真正头脑清楚，精力充沛。所以整队几乎作不到，完全靠意志，靠理念。有人不相信这些东西，我是极端相信的。后来这个队还真整成了。整成之后，我开始的计划是向南边移出10米，然后不断地一队一队的移10米，清扫10米，然后打上药，再挪动人。这样算起来要十几个小时，所以干了三、四个小时之后，这个计划被迫停止。”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开始和一些机关单位、医院、厂矿联系，为绝食同学提供各式各样必要的物质来源，包括帐篷、床、棉大衣、木板。这些工作主要是张伯笠、郭海峰和其他秘书处的人去作的。”

17日下午开始，绝食团指挥部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找车”活动。他们不相信北京市红十字会，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学校。封从德、柴玲、李录、郭海峰都参与了联系。其中郭海峰最终还是找到了红十字会。据红十字工作人员回忆：

“一直拖延到18日凌晨2：00多，‘高自联’才同意用大轿车让绝食学生避雨。他们提出，70辆大轿车要在18日早6：00开进广场。”

“5：50，市公交总公司克服了种种困难，70辆大轿车驶进广场。”

事实上，当时先后开进广场的大客车有80辆。这就涉及到一个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令学生度过这次危机的80辆大客车的来历的问题。

上述红十字人员的报数是70辆。在政府出版的资料中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于凌晨从市公交总公司抽调了78辆大客车到天安门广场，并从物资局调运400块厚木板，于午前运到广场，发给绝食圈里的学生。”

另有材料把“大客车”称为“大通道客车”，即公交公司通常用来做公共汽车的客车。从学生领袖闭口不谈获得这些车辆的途径来看，这些车辆极有可能是由北京市公交公司提供的。在公有制经济下，这些大宗物资的调运，应该是经北京市政府批准的。

但是，从下面的几份资料看，应该还有其他渠道（特别是各学校）提供的支援。据上述北医大女急救队员的日记：

“（18日）天阴沉沉，风呼呼地刮，马上有一场大雨来临。各校都在调动汽车，早上宣传80辆大客车会到广场，保证绝食者的生命。中午，我们学校的大客车已到，老师让许多同学上车，其中有许多人不是绝食者，目的是为了占好地方，不让其他学校绝食者上车。这时市高联广播着：‘各客车一定先让绝食者上车，不要有学校的界线，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可是我们的司机说：‘不是我们的人，我不让上车。’天沉得很，大雨点开始往下掉，我跑去找老师，先把药品搬上去。大家齐动手，药品、被子先上车，我拿着血压计，最后上了车。雨如倾盆下来，喇叭又响了，叫我们到广场东侧历史博物馆廊下领雨衣……抬头望窗外，声援队伍的卡车不断走过，他们没有雨具，各个头发淋得湿湿的，满脸是水，却仍那么整齐地喊着。泪水、雨水、汗水，谁能分清？人民付出了很多了，我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可见，各校调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据常劲回忆：

“到17日下午，组调车辆。当时绝食团总指挥部有大概几百个绝食的学生，他们在外面找不到能够住的车子。北外负责的同学就很着急。我们两个就一起去了历史博物馆的前面，那个地方停了很多大客车，都是各个学校派的，还有红十字会的救援中心。我去调车调不动。他们说，除非绝食学生撤回去，我们这个车可以动用。我就找了红十字会的领导，他们给我们派了几辆大客车，把这些学生都装进去了。”

政府统一派出的大客车开来后，剩下的问题是怎样有秩序地将绝食学生转移到车里。李录接着回忆道：

“当时广场上聚集着至少20万人，绝食的人冲到人群中怎么办？人群里有人加进来怎么办？这些人根本躺着就要晕倒，更不要说走了，中间出了危险怎么办？当时的情况现在很难想象。”

“那天早晨实际上是伯笠在指挥。（张伯笠插：代理总指挥）为什么代理总指挥呢，因为我忙了一夜，到18日早晨，我就看着那个雨点，已经开始打雷了。那个时候队伍刚整好，第一队刚弄过去，我再走回来的时候，扑通一下就跌倒了，跌倒之后就再也没起来，……我不知道在医院里输了四瓶，还是五瓶液，我醒来已经是下午了。当时我在晕倒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我说完了，这下我要成历史罪人了。……但没想到当时那场雨实际上是下午才下，早晨没下。就这么一个变化，没当成历史罪人，天公作美。”

张伯笠接着回忆道：

“那天李录晕倒了，柴玲身体很不支，说话声音已经嘶哑了，我是临危受命，因为我说话声音比较大，作为临时总指挥，所以那天是我指挥撤离的。那时广场上人山人海，怎么撤出去是个危险，冲击到绝食同学怎么办？绝食同学被冲倒了就可能出问题。所以一再要求同学们拉成警戒线，同学们非常自觉地拉成了警戒线，我就带着队伍一个客车一个客车的安排。我记得当时所有的同学进入客车的时候都流着泪。”

当时，在绝食团广播站当义务播音员的女作家北明，记述了张伯笠这个光辉的时刻：

“……现在请注意，现在请注意，我是张伯笠。绝食的同学一律听我指挥：从南向北，从南向北，依次，依次行动，沿纠察队为你隔开的通道，开始向大客车撤离，雷雨就要来了，请带好防雨用具，请你们互相搀扶一下”。

接下来封从德又提到了各校的车：

“5月18日避雨车的事情，……当时是柴玲在广播上……封了张伯笠。做这个调度临时总指挥。记得当时他画了这么大大一张纸牌挂在胸前就去赴任了。上午赴任，到了大概中午将近11：00的时候伯笠就倒下了。倒下的还有郭海峰，他也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当时好像都倒下了，这个牌子就接到了我这里，我也挂到胸前面。我跑到北面去就看见了这些车，郭海峰已经调了过来。当时正好有一个天津来的小汽车，我就用这个小汽车作为我的指挥车到处转，到处去调用很多其它学校，其它单位来的车。‘北航’的公共汽车也调进了广场。”

那天上午，还发生了一件更奇特的事，在所有调来的这些客车里，还有一辆装备了广播器材的“指挥车”——就像马群里突然走来了一匹大象！它径直开到了纪念碑东侧。

这个从天而降的礼物，令绝食团广播站的站长，此时又是临时调度总指挥的张伯笠喜出望外：

“当时突然来了一辆车，我就说，这个车是否能作指挥车。那个司机，也不知道是谁派他来的。他说可以，你要用我就给你开过去。开到纪念碑左侧的时候，封从德来了。我说，‘咱们坐指挥车。’可是我们俩刚要往上搬东西的时候，清华大学广播站周锋锁他们就把那些东西搬上去了。我说：‘这是绝食团的指挥车，他们怎么把那些东西搬上去？’他说：‘我们这个做广播站。’……” 图7-8：指挥车兼宣传车（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其时，周锋锁并不知道，这是封从德请人装备的一辆广播车。因此还一度与封从德发生口角。后来说明真相，双方言归于好。张伯笠认为：

“这个指挥车在这里边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5月18日大游行的时候，这个指挥车曾经开出了广场。”

“当时我们4个是抱着头在指挥车里边商量下一步的情况。4个人在上边站着，抱着。指挥车上的两个广播员一男一女，非常漂亮的两个广播员说‘这是绝食团的指挥车。’底下就非常激动。这个指挥车从东转到西，从西转到东。那天我就看到了5月18日大游行的场景，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但是，在兴奋过后，绝食团指挥部的领袖们并没有丧失警惕：这些派来的大客车，这会不会是北京市政府“清场”的一个步骤呢？

如前所述，红十字会的那位司机不慎透露，红十字会的大轿车，是用于运送停止绝食的学生回校的。而事后红十字工作人员也谈到，他们的工作，并不止于救护：

“18日清晨5：00，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等到医院去看望了绝食的学生，希望同学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这时，被送进医院的绝食学生已达3504人次，并有32人病情严重，天安门广场随时有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的可能。为此，市红十字会通过新闻媒介发出紧急呼吁，迫切呼吁学生们爱惜身体，停止绝食，红十字会愿意对绝食学生进行抢救、监护和治疗。”

“从18日凌晨起，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一次次地找“高自联”和广场绝食团的头头们要求谈判……”

而这时“谈判”的内容，显然已经不是关于对绝食学生进行救治，而是对他们进行“监护”，和要求他们“停止绝食”了。

无疑，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劝诫绝对是好意。任何一个在这场竞争中看不到希望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劝诫。但是，在不信任已经产生，并正在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北京市红十字会带政治任务的介入，不仅会有损于人道义务的执行，还将加剧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并使对立升级。

就在5月18日中午11：00，张伯笠在调度事业未竟先就晕倒之时，正是李鹏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学生代表，就“撤与不撤”的问题做最后的意见

交换的时间。而广场指挥部的领袖们，为与那场暴雨的搏斗，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晕倒，并被送进医院。本来是政治领袖们发挥作用，将学生一举撤出广场的又一个天降时机！

据李录事后回忆：

“……我从医院回来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已经有迹象表明政府不仅不跟我们对话，而且政府的压力在升高，已经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开始采取极端手段。最初的表现是在16日红十字会的问题。……到了18日的时候，又升温了，那天晚上，那个工人，我们都熟悉的那个大眼睛……已经来报红十字会已经进入各个绝食车。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接受了他们的主张，每一节车派一名医生。但是那些医生都是男的，而且都懂得开车，他们准备那天晚上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把车开走。后来才有了‘紧急会议’。‘紧急会议’作出的结论，就是所谓‘放闸’，‘扎车胎’，反正各个车所作的方法不一样。最后马少方对我进行激烈地攻击，让我要对国家的财产负责。那次他有些歇斯底里。”

据常劲回忆，“扎车胎”的事情，是刚刚从晕倒中苏醒过来的“张伯笠带头干的。”多年后，马少方对我解释了当时“歇斯底里”的缘由：

“那天应该是18日晚，我正好在电影学院同学的车上。当时天刚晚，突然有电影学院同学带了一位自称是汽车司机的人找到我，这位司机非常气愤地对我说：你们大学生就这素质？我们私自好心好意把大客车开到广场来让你们避雨，你们为什么要放车胎的气？你们不知道这车一放气，就趴窝了，就基本报废了。你们这么干，让我们事后怎么办？我听这个自称司机的人说得有理，又问那个被阻止给车放气同学，这个给车胎放气是怎么回事。同学说：这是指挥部的决定。说是为了防止晚上大家车上入睡后，他们拉着我们绝食同学开起就跑，就这样清场了。结果那个自称司机的师傅说：你们真是笨到家了。这车挨着车，能偷偷发动开跑吗？我们不是政府派来的，我们是自作主张来帮你们的。再说，你们实在害怕我们夜里开车，把你们拉跑，你

们可以把车上的发动线路给拉掉啊。为此，这师傅还给我们做了拉线的示范。我觉得师傅说得有理，就立即让电影学院同学一起去迅速阻止给车胎放气的行为。……当时柴玲、李录正好在指挥车上开会，我冲上车，按司机师傅的说法，指责他们这个荒唐的决定。最初他们并不认错，但听我转述师傅的话有理，也就同意停止放气，但拒绝向师傅道歉。……最后，我逼着李录给那个自称司机的师傅，当面道了歉。给车放气的事就停止了。”

按照那位司机的说法，这些车并不是公派的，而是工人师傅们私自开来支持学运的。但不论真相如何，这件事，成了政府指控“北高联”背信弃义的又一个证据。

图7-9：红十字

由于5月16日柴玲住院，李录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走到了前台。但是，他提议封从德临时代理“总指挥”职务，这使得封从德有机会认识李录的罕见的组织才能：

“这晚 的代表大会上，我真正认识了李录。他比我们都有才干。我虽代理总指挥，但对主持绝食团二、三百代表的大会还是感到很吃力。这时，作为副总指挥的李录，逐渐用他的才识取代了我的主席地位，使我松了一口气。我惊讶地发现并欣赏起他主持会议的秩序和效率。

李录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二、三百人的大会上，他能从广场上昏暗的灯光下辨认出谁不是某校昨日来开会的代表。他还能记住几天来所讨论过种种纷乱议题的细节，指出当前讲话同学的矛盾之处。大家发言后，李录所作的归纳性小结，既准确又精炼。

我看见一个高效而有秩序的会议：首先宣布讨论范围和议题，经大家增删后，将各议题按优先级排列为议程，然后严格按议程讨论。讨论规则：不许插话；举手发言；发言限时三、五分钟；只讲论点、不作阐述。最后这一

点尤为关键，因为通常发言的人总喜欢长篇大论，既多余，又易横生枝节引发无休止的争论。

议题讨论完，李录便将大家基本一致的观点归成一大类，将其他不同的方案明确描述出来，分出甲乙丙丁，又各细分ABCD，让代表们记下，回各自学校的绝食同学中去，将每个绝食同学对各项争议议案的投票数字统计上来，汇报指挥部，然后在广播站宣布各项投票结果。绝食团竭力推行民主程序，任何重大有争论的问题，都经过全体绝食成员的投票。

我相信，凡开过这些会的人，都会记得李录的才干。那晚，我对李录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头脑那么清晰，对民主程序那么在行——这正是运动当中一直缺乏的人才！他清晰的头脑让更多人头脑清晰，开会时他总说‘要相信别人的头脑’，使许多自大狂觉悟；他说‘只讲论点，不许阐述’，使大家发现阐述细节的不合适宜；在同我与柴玲商讨局势与战略时，他一句‘要用大思维’，使我们冲破了广场上瞬息万变的现实事务的局限。那时，我对李录的才能可谓五体投地。从此，我绝对信任了李录。”

这种信任，奠定了广场后期（张伯笠退出后）“三头政治”的雏形。

第五节 深化与波及

正如傅高义先生说，高层信息的不透明，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的公开化，“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

据李鹏日记，5月16日上午，中顾委委员李昌到赵紫阳同志处谈话。随后，李昌将自己起草的“要求中央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的信，征求中顾委委员签名。李锐、于光远、杜润生等人签了名。

从5月16日开始，游行队伍中关于拯救学生生命的呼声陡然高涨；许多前往声援的大学生，开始四处为绝食学生募捐；一些画家还在广场作画义卖。在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第72中、105中的中学师生队伍。

图7-10：参加5月16日游行的中学生队伍（陈小雅摄）

这一天最引人注目的是“十教授”与“十校长”的“紧急呼吁”和“公开信”；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的部分教师发表的“罢教”声明；

据统计，5月16日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人数已逾10万，波及南京、成都、重庆、新乡、郑州、保定、太原、上海、武汉、合肥、西安、汉中、长春、沈阳、杭州、兰州、天津、广州、海南、哈尔滨、呼和浩特、长沙等22个城市和近百所高校。这些游行抗议或演讲、静坐请愿活动，内容大多为声援北京学生绝食活动，督促政府对话。其中，上海、郑州等城市学生提出与当地政府“对话”；南京学生提出了“罢课”；上海的学生从5月13日开展的“绝食”一直持续到当天；天津、保定、长春、西安等市则有学生进京声援。

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的学生成立了“爱国运动学生组委会”。其纲领为“声援北京的绝食斗争，严格与北京学生运动保持步调一致，与呼市各大、中专院校保持一致。”

在南京大学、四川大学，都发生了学生冲击并短时间占领校广播站的活动。

在众多的游行中，注明经过市公安局批准的只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的游行。

在武汉，则发生了长江大桥被请愿静坐的大学生和围观者阻断公路交通的严重事件。直至午夜24：00，还有近2000名学生静坐不去。静坐学生表示，一直要静坐到省政府同意对话为止。

在山西，除游行规模越来越大，卷入的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多，社会自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的行动也越来越激烈。据官报署名秦越的文章介绍，从5月5日到5月19日，省城太原陆续出现了“山西高校自治联合会”、“学工会”、“省城工自筹”、“工人党”和“山西一把火”等60多个非法组织。还有“200余名社会渣滓和不法之徒组织了‘鸡毛掸子队’，他们扛着门旗、彩旗和鸡毛掸子，喊着口号招摇过市。”群众连续多次“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省城重要新闻单位，挤掉省委、省政府的牌子，挤伤公安干警，向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投掷馒头和标语牌，在省政府门前升白旗”。甚至有部分高校学生分别到太钢、太重等大型企业进行蛊惑煽动，叫嚷“要把华北地区的电网、煤炭、交通搞瘫痪，逼李鹏政府下台”。在5月17至19日的连续3天里，游行队伍和围观群众中，有人向值勤干警投掷汽水瓶、砖头、瓦片，甚至砸汽车、砸商店和附近居民的玻璃。3天中打伤公安干警92人，砸坏各种车辆63辆。5月17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家中主持常委会决定“戒严”的当天。清晨约6：20，清华大学宣传组广播了一个招聘30名记者的通知。希望能更迅速、全面地报导天安门广场每天的动态，并向全国传播。招聘不仅容纳各校学生，且希望“新闻单位记者积极报名”。

6：30，广场“学运之声”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当播送到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话中谈到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时，学生们发出了嘘声；在谈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时，有的学生说，“认识了就好！”在播放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对绝食学生的书面讲话，赵紫阳谈到“希望同学们停止绝食，中央就放心了”时，大多数学生都发出嘲笑。有人说，“就是想把我们哄回去。”

17日上午8：30至9：30，绝食团指挥部与北高联在历史博物馆前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绝食团指挥部的柴玲、李录和绝食发起人王丹、马少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据柴玲介绍：

“从昨天下午1：30召开新闻发布会到现在，我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仍未满足，因此，我们绝食的决心也没有变。同学们尽管身体都很虚弱，但还在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另外，有些情况在变化，那就是昨天下午首都有一千名教师、知识分子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市民也成立了声援委员会。现在请愿团中大批大批同学倒下了，我们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67个小时。希望记者能够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真实、准确地告诉广大群众。”

随后，柴玲介绍了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昨天（16日）下午3：00和晚上7：00左右，两次发生有人聚众，要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事情。是学生纠察队两次冲过去，用手挽手组成的“人墙”阻止了冲击的行动。柴玲说：

“我在此只想说，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请记者说句公平话，我们是在保护人民大会堂，是在维护这次和平的请愿活动。”

接着，柴玲说到昨天广播站误播“首钢工人罢工”的消息，兹后政府指责他们“造谣”，她对此提出了怀疑：这是否有人设置的圈套？

当英国电视台记者问道：“如果政府一直不理睬你们，你们怎么办”时，马少方回答说：

“我们要对3160名同学的生命负责，如果要死，我们先死。”

在《桥》杂志记者问到“今天早晨电台广播中有哪些与事实不符”时，学生代表回答说：首先是数字不符。绝食人数一直在3100人左右，而电台广播说有1000多人。其次，医疗队是学生自发组织的，不是官方派来的。急救车是急救中心院长自做主张派来的，也不是官方派来的。药品一部份是肿瘤医院送的，一部份是募捐得来的。而电台说这些都是官方派来的。再有，昨天来的教师都是声援我们的，而电台说是来劝说我们回去。

当美联社记者问道“募捐”的数目时，学生代表答道：“约三万多元”。

在回答《北京晚报》记者“学生组织是否有失控现象”时，学生代表承认“内部有分歧是无疑的，这是正常的，但没有失控现象”。

当中新社记者问道：请愿团中有人请求不要继续绝食，是否有这一说法？学生代表回答说：“我们自愿绝食，坚持到底”。

新闻发布会最后，李录介绍了两名工人代表。他们中的一人自称是山东宁阳人，年仅19岁。他带来了家乡人筹集的600多元钱，表示大家对学生的支持。他还夸奖学生是“80年代最可爱的人，是至高无上的人”。另一名工人是新成立的“市民声援委员会”代表，30多岁，名叫沈银汉。他声称全力支持学生，但没有透露工作单位。他还说，昨晚公安局抓走了他们中的两人，凌晨4：00才放出来。他们的指挥部设在纪念碑北侧。

新闻发布会期间和最后，柴玲和另一名代表晕倒，被救护者送走。

5月17日，北京医科大学校长曲绵域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顾方舟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院长高鹤亭副教授、首都医学院院长徐群渊教授对广场绝食学生发出《公开信》。信中指出，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将可能诱发传染病蔓延、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为此，他们联名发出紧急呼吁：

（1）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但要保重身体。不要绝食，更不要绝水。要接受治疗，注意个人卫生，防止并发其他疾病。

（2）事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学生状况不断恶化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

同日《光明日报》还刊出了著名作家谌容《致广场上的同学》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

你们在广场绝食已经第四天了，数以百计的学生已经晕倒。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担心，非常忧虑，非常难过。此时此刻，可以说全国人民的心都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自从胡耀邦同志逝世以来，你们的爱国行动，你们的民主精神，已经昭示于天下。我认为，不管政府给予怎样的评价，或者什么时候作出公正的评价，都不是主要的了。人民已经作出评价，历史还将进一步作出评价。

青年学生，作为人民的先锋分子，已经在1989年的春天里，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淘汰了“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等不实之词，证明了你们是社会的精英，是中国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和广大青年出色地完成了时代交给的任务。

在这个时候，我以一个普通作家的身份（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生的母亲）向你们提出一点请求，请你们结束绝食请愿，回到学校去。这是一个作家的心愿，一个母亲的心愿，也是全国亿万善良人的心愿。

民盟主席费孝通、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致函赵紫阳，认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冰心、艾青、夏衍、钱钟书、冯牧等30多位作家也向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中央负责人与学生直接对话，澄清事实，肯定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把对话实况进行现场直播。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全国妇联等机关、团体、学校也发出呼吁。有的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对话，也有的要求中央否定“动乱”的定性。

据统计，5月17日，全国有27个城市的170多所高校近30万学生游行示威。游行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城市有：上海、哈尔滨、西安、武汉、长沙、南京、石家庄、兰州等。

在武汉，24所高校近万名学生先后走出校门，继续到长江大桥静坐，公路交通再次中断。游行队伍中出现“工人声援团”、湖北社会科学院、华工教师、《长江日报》支持学生的横幅。15：47，20多名学生站在长江大桥京广铁路线上，致使两列火车停驶，至16：30列车才恢复正常运行。

在长沙，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20多所高校10000余人上街游行。湖南日报、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部分人员参加游行。部分学生冲进了省委办公楼。“《湖南日报》声援团”在省长办公楼前宣读了《呼吁书》，要求中央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校学生自治会，保障新闻、出版自由。

在西安，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29所高校约25000学生上街游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5所高校近千名教职工也参加了游行。政法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7校250余人先后宣布“绝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各系推出十多名学生代表，100多人乘火车赴京声援北京学生。西安新闻界、社科院、科技界等单位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声援活动。

在哈尔滨，21所高校2万多名学生沿不同线路在市内游行并聚集省政府门前。少数高校干部和教师参加游行活动。游行学生在省政府门宣布“哈市高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宣布各高校“举行无限期罢课”。游行队伍中出现“我们不要皇帝”、“邓小平下台”、“打倒独裁”等攻击性标语、横幅。

在西宁，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教育学院、青海医学院等校1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门前静坐。静坐学生成立了“青海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在兰州，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甘肃教育学院等12所高校上万名学生上街游行。中科院兰州分院、新闻界的一些职工参加游行。

在石家庄，一万余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850名学生乘火车赴京。

在郑州，河南大学、河南师大等十多所高校数千名学生到省政府门前请愿示威。游行学生冲击省政府大院，向警察投掷瓦片和砖头。

在天津，又有近2000名高校学生赴京。天津市累计赴京学生已达8000余人。

在杭州，11所高校的6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一些高校教师和职工参加游行。浙江大学十多名学生宣布“绝食”。

此外，广州、贵阳、合肥、保定、太原、重庆等地各有数千高校学生上街游行。

5月18日，北京虽然下了瓢泼大雨，但这一天游行的规模仍在一百万人以上。

除教育界、科技界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工人的比重迅速上升。参加游行工人因远道而来，大多乘坐着“大小车辆”；各单位自成一体，口号五花八门。而且到学生营地“捐钱送物数量数额较大”。

这一天游行队伍的口号有：“一人退休，全国欢送”；“风雨兼程为民主”；“铲除上层垃圾”；“钱可扣，职可掉，声援学生志不移”；“要国家，要太子？”“70年天安门之魂不死”等等。

这一天，游行队伍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军人、警察、农民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师生。北京空军的一位中士和身着便衣的军人，骑著自行车，举著一面上写“军人声援”的小旗。据这位军人说，支持学生的军人很多，有不少人穿着便衣加入到游行队伍里去了，主要原因是对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不及时出面与学生对话不满。他说：“如不解决问题，将继续声援”。

图7-11：北京警察学校：我们无愧人民（选自64memo.com）

一百多名北京人民警察学校和警察学院的学生，身着警服，打着“人民警察爱人民”的标语，分乘4辆大卡车加入游行行列时，游行队伍中报发出欢呼。

一份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印制的传单上，则刊登了这样一篇“快讯”：

“今天我们设在绝食现场的‘学运之声广播站’收到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证。这个证件是未用过的，打开证件，左面用红字印着：‘战士同学心连心，同学比战士更伟大。’右边这样写着：‘同学们，作为军人，我们从心灵深处声援你们，但作为军人，我们脱不下这军装，却也从心灵深处恨自己，如果我们脱了军装，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加入你们的行列，请相信我们真诚的迟到的声援。北京军区部队声援团。’”

18日下午，军旅诗人叶文福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声泪俱下地朗诵一首自己创作的长诗，然后当场宣布退出共产党。四季青、玉渊潭等地的农民也加入了这一天的游行队伍。简朴的标语是：“农民来了”，“爱国无罪”。

中共中央党校的300多名师生，高举“中共中央党校师生声援团”的横幅和一块写有向党中央、国务院的“紧急呼吁书”匾牌，分乘几辆卡车和大客车加入了游行队伍。

18日上午，有来自陕西、辽宁、吉林、山西、河南等省的近一万名学生在北京站下车。乘坐364次客车，在北京站下车西安大学生，一下车便在站台上列队出站，边走边呼口号。

有心人还采撷了天安门广场不少情感交流的镜头：

——在中央民族学院讲师团的绝食车上，两位老人前来看望绝食已6天的侄儿。叔侄见面抱头痛哭。叔叔连声说，“你们做得好，你们做得对。我们支持你们。你们是在为人民说话。”据了解，这位叔叔是中央某部干部。

——清华大学绝食学生当中，有一些家在北京。他们的家长探望子女时，一边痛心地大哭，一边又说“你们没有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两名绝食学生坐在地上不肯进车厢避雨，在短短的五分钟时间内，先后有四拨医护人员劝他们喝蜂王浆和水。两位年约50岁左右的女医生一开口就哭了。经询问，其中一人的孩子也是大学生，在学生纠察队值勤，另一人是某部卫生室大夫，自动带了医疗器具来服务的。她不肯说姓名，只是说，“谁没有儿女？看着这么多年轻人受苦，怎么就坐得住？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和学生直接对话？”

——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干部说，“学生绝食，全市大游行，反映了一种情绪。人民对政府不满的事太多，火儿憋了好久，一下子找个机会发出来了。大家看看游行的标语口号就知道了。”他指着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横幅标语，大声地说：“这就是民心！”

这一天，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号声明”：

强烈要求（1）党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立即召开非常会议，结束个人独裁，正式承认这场运动是伟大、广泛的人民民主爱国运动；（2）追究炮制社论的直接责任者和对人民的正义要求置之不理而导致事态不断扩大的政府领导人的政治及法律责任；（3）继续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平等地对话，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

《科技日报》刊登了学者代表曹思源 等12人、学生代表王丹等9人联合提出的《四点建议》：

1，鉴于中央集体讨论，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处理问题的工作程序，对于处理当前学生绝食这样的紧急情况已经不适合，不利于迅速灵活地解决问题，必然坐失良机，造成局势日益恶化，损失日益扩大，故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授权一名常委处理学生绝食问题。

2，建议被授权处理问题的政治局常委迅速接受绝食学生提出的两点要求，即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中央领导与学生公开对话，电视、广播作现场直播。

3，在前两条的基础上学生结束绝食行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4，对学生运动的直接参加者、组织者、支持者不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

这四点建议，体现了学生和社会各界对于运动形势的焦虑，及绕过邓小平的问题，给中央台阶下的苦心。

部分首都新闻工作者在昨天和今天的游行中散发了《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请战”真相》的传单。

据不完全统计，5月18日外地上街游行的学生达50多万，波及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300多所高校；北京以外14个城市出现高校学生绝食请愿，总人数约2500人。

在上海，这一天绝食学生已达350人，晕倒48人。上海大、中专学校50所，学生44000人；纺织、船舶、机械、轻工等系统20多家工厂、2000多名职工；新闻、出版、科研、文化及机关等上百个单位5万多人上街游行。1986年反“自由化”被开除党籍的王若望，胸前挂着“铁石心肠，可叹可悲”的牌子，背后写着“救国救民，先救孩子”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著名老作家巴金发表了一封《支持学运公开信》。全文如下：

7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批爱国学生为我们祖国争取科学与民主。7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认为今天学生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们所做的正是我们没有能完成的事情。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我已经是一个病残的老人了，但我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受到了很大教育。我相信，一切爱国的、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们，都会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巴 金

1989年5月18日于病中

在天津，工人、干部、科技人员、新闻工作者、中学生数万人上街游行。南开大学部分师生抬着绝食死亡学生骨灰盒、花圈游行。

在杭州，以工人、干部、中学生居多的数万人游行到武林广场。300余名高校学生在此开始绝食。浙江美术学院4名学生携带8000元捐款赴京。

在兰州，各高校开始罢课。工人、新闻工作者，以及大、中、小学校的师生参加游行者近10万人。游行队伍中有“反对垂帘听政”、“废除终身制”、“声援北京”等横幅、标语。300多名高校学生绝食，10余人晕倒。

在陕西，10个地市中9个地市出现游行、静坐队伍，有些地方发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西安地区游行请愿的单位和人数剧增。5万余人聚集新城广场游行，参加游行的包括大中专学校、中学、新闻出版、文艺团体、工厂企业、民主党派、政府部门及社会各方面人士。绝食学生已增加到1400人。游行人群情绪激烈，冲击省府和省委机关，并冲入省公安厅内。5000多人涌进西安火车站，要到北京请愿。许人扬言卧轨。3000余名学生强行冲上西安至北京的280次列车，列车被迫误点5个小时，无法开出。

在江苏，除个别市外，各市均有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南京地区28所高校4万多名学生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几十名高校学生开始绝食。游行队伍打出“结束老人政治”、“声援北京”等标语。

在哈尔滨，高校师生及科技界、新闻界、中专和中学学生等3万余人上街。哈尔滨工业大学1000多名教师，包括200多名教授、副教授、也上街声援。哈工大等校70余名学生上午在省政府门前组成“志愿绝食团”宣布绝食。绝食学生下午增至近200人。

在沈阳，社会各界3万余人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中出现“沈阳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横幅，已形成10所高校学生的联合行动，活动形式已从单纯的游行向游行、罢课、静坐等多种形式发展。此外，还有780名学生已赴京声援。

在拉萨，西藏大学400余名学生和少数青年教师在校内集会，要求上街游行。在仍处戒严的情况下，有学生冲出校门，在离校门口约300米的拉萨市政府门口发表演讲，声援北京。一名女生呼喊“打倒党中央”，但无人响应。学生返校后宣布罢课，直到北京学生绝食请愿活动结束。

此外，长春、成都、南宁、呼和浩特、福州、昆明等地均有数万人上街游行。

事后，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宋汉良告诉李鹏：18日，乌鲁木齐也发生学生冲击党委大楼，砸碎碎玻璃事件。

福建省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贺国强也告诉李鹏：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要求市委支持学生，闹得交通堵塞，社会混乱。

综上所述，16至18日北京学运已波及全国，而且有朝激烈化方向发展。尽管很多人的宗旨是劝北京学生停止绝食，只是从“做学生思想工作”的角度对之加以肯定和赞扬，同时向政府发出呼吁以示公平，但绝食学生对于肯定和赞扬的内容一律照单全收，对劝说的主旨统统置之度外，正如上述记者招待会学生代表所言，他们把所有一切都当成了“声援”！

随着事态的扩大，各种人物和他们的建议，以及社会各界捐献的物资，都汇聚到学生在广场的两个广播站。

“这时的物资，主要是饮料和药品，特别是生理盐水。医院平日绝不发放给普通百姓的营养品，这时都慷慨地运来了，成箱的‘人参蜂王浆’堆在一起。这样，我们又不得不兼管物资发放。虽然我们一再强调这里不是供应

站，但还是有无数市民、医生将这里当作运动的中枢，他们并不分谁是头，只管往发布消息和命令的学生广播站送东西。”

“各样的人物来到这里，提出形形色色的建议，更是将我们弄得头晕脑胀。他们那股热忱难以阻挡，却不关心是否找错了对象，也不在意如何实施。最后，我们不得不用广播征用了一队纠察，隔开这股潮流，开始了广场的‘新官僚’作风。”

“几天下来，广播站成了广场上的实际指挥所”，封从德说：即使这样纯洁的学生运动，其中的种种纷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动用纠察队的“武力”来应付各种“夺权者”。

大约在此前后，王超华用绝食团的财务部支出的大约5000元钱，在纪念碑的东南角建立了一个广播功率比绝食团广播站大三、四倍广播站，叫“学运之声”。这个广播站是应“北高联”进驻广场的步伐，由清华大学周锋锁等人操办的。自此，“学运之声”也开始接受对绝食者的捐献。据说，仅资金一项就达“上百万”。

这在当时，很快演变成了“绝食团”和“北高联”的矛盾。在诸多王超华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中，混合着“温和”与“激进”的“不同政见”冲突，参加者的“维权”意识，发起人和领袖之间的荣誉、地位之争。

当然，所有的获得都是有代价的。不久，王超华也开始为“盯摊”事业头痛不已：

“市民经常来找我们，最后我们就很烦。我说，‘你们市民自己应该提自己的要求，不要老来向学生提建议，或者只是声援学生。’另外我还找了我原来的单位，《光明日报》那儿，跟他们也提这个，‘新闻界应该提新闻界的要求，工人应该提工人的要求。你们应该提自己的要求。’学生的绝食要求只是一个：要求对话。可是对话究竟什么内容，几乎没有人能说得上来。……市民是在郑旭光的帮助下，成立的市民联合会。这当中我还去广场

转了一圈，发现那几个最经常来找我们的，其中有一个女的，果然在那围了一圈在开会。后来他们打出了旗号：市民联合会。这是15日。文艺界和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儿的，他们也来找我。那会儿我就说：‘学生不可能包办任何什么。你们成立了，你们自己就在那做。有什么事咱们就联合行动。我们不可能指挥你们任何事。’我的总的一个印象是，之所以到处都来找我们，是认为学生是有比较可靠的群众基础的。任何其它组织都有这个名、这个牌，但是不敢保证自己有实际的群众基础。”

“外地学生进京是在18日之后。我曾经在绝食车附近接受过中央广播电台的采访，当时主要说的就是希望外地进京的同学回到本地去，要求跟本地的各级领导对话，要求本地的自治权。不要都到北京来，都来声援北京。我当时一个感觉是，你们都不知道北京的对话到底要对话什么内容，你们来北京干什么？而且非常头疼，没有办法管理。” 王超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曾任北高联常委、副主席。但她并不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选出的代表。该校选出的代表名叫何贵方。王超华原来学建筑结构，在响应招聘考试到《光明日报》当上编辑之前，曾在一个设计院画了6年的建筑图纸。之所以转行，完全是因为她喜爱文科。1989年的她，已经有37岁，而且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妈。据说，她在北大作家班学习的丈夫，并不支持她卷入政治。王超华的父亲是北大著名的语言学教授王瑶。她之所以没有被本校选出，而又以该校“联络员”自荐，完全是因为她的家就在北大。因读研以前曾在《光明日报》工作，她与著名记者、作家戴晴熟悉，并经常从她那里得到消息，为她给学生传话。自担任北高联职务以来，她一直兢兢业业。在5月17日以前，广场的所谓“北高联”总部，实际上就是她“一人一桌一牌子”所占据的位置。她不仅因此获得“坐地泡”的雅号，还被个别学生怀疑是共军派遣的“特务”。

多年后，王超华面对误解，在谈到参加学运的动机时说：

“4月20日在我们学校学术讨论会上我还否认学运对历史可能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到4月22日我已经跑去当我们学校代表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4月21日晚上看到学生纠察队这么有秩序，我就想到这次学生运动可能会取得一些实际效果。……第一个念头已经想到了请徐四民办报这种事，因为这一年，《东方记事》的出版跟戴晴他们发表储安平的文章和林培瑞讲方励之赴布什宴的文章都是有关系的。我就想到像这样我们临时出一个杂志，赶紧发两篇文章就被共产党封了。我们有一个民族与文化的研讨班，上了一年就都在讨论这些事情。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就是思想自由，我们最感觉不好的就是思想不自由。我们希望哪怕学生运动给我们扩展一点点生存空间，我们在中国活得稍微好一点，能够有可能说出我们想说的话，实际上这些启蒙运动才有可能持续下去。我在运动自始至终一直讲我们有可能得到什么？我们有可能巩固什么？是不是能给我们的社会一点进步？这是从5月6日开始我接触新闻工作者就开始非常惊讶的，因为他们情绪非常乐观。这是我极力要加入到学生组织中，希望巩固学生组织的一个原因。只有介入才能帮助它，只有参与才能使它巩固。绝食开始之后我是非常绝望、悲观的态度，我和赵瑜曾经争论过，这也是和许多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差别。从那个时候我碰到重要人介绍情况总是忍不住流眼泪，我觉得没有办法了。”

大约与年龄形成的文化趣味“代沟”有关，坐镇广场的“北高联代表”王超华曾轻易拒绝了崔健的演唱会：

“我说，‘我没办法管这个。绝食团已经嫌很乱，很吵，嫌我们没有办法能把那些人都挡在外面。你那个大电子音乐……’。那个人说‘崔健你都不知道，能给学生多大鼓舞啊。’非常抱歉，我三十多岁，将近四十岁，还真对摇滚乐从来没有听过。”

政府的迟迟不表态造成的社会各界的卷入，给广场营地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不仅因为人员的拥挤、捐钱送物数额较大，车辆过多直接影响到救护车的通行。学生的广播站多次呼吁，要求大家帮助维持“生命线”的畅通。

多次紧急调动纠察队开赴现场疏通。但学生纠察队的负责人对记者说，“经过几天的辛劳，纠察队员的气力都快用尽了。”

如果说，5月18日广场出现的问题还带有某种喜剧色彩的话，那么，一周以后由于外地学生的大量涌入，它面临的境况，则带有悲剧色彩了。

第六节 首都工人自治会成立

据李鹏《“六四”日记》，5月16日，中苏高峰会晤举行期间，“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宣布在天安门成立。登记会员401人。这是笔者所见到的记载北京工人自治组织成立的最早时间。比市民联合会仅仅晚了一天。与李鹏这条记录不同的是，北京市委办公厅编印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和《中国“六四”真相》都没有为“工自联”的成立过程提供任何信息，直到《首都工人宣言》发表，才有关于它的报告。

“工自联”的成立，起源于学生“绝食”；起源于政府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的反应迟滞；起源于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对政府反应表现出的不满，以至于卷入运动规模的日益扩大；起源于学运转变为民运；起源于这场民运的危机时刻。

据梁二回忆，早在5月14日早晨，就“有人找到我们说想成立工自联，要求我们学生帮助。”王德邦也记得：

“16日晚……将近12：00……有两位工人强烈要求进入学生防卫圈内，广场指挥部无暇接待。我于是前去将两位工人领了进来，并陪着他们在纪念碑下转了两圈……两位工人中身材高大的一位自我介绍叫韩东方，从他的言谈中，我感到他应该参加过‘四五’天安门运动。他一则为学生的义举鼓舞，同时对广场的组织管理状况表示出一些忧虑，并谈了许多好的建议。我随后

将这些建议交给了广场指挥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还不止一次看到北京市民打着声援学生的横幅到天安门来，想加入学生队伍，却遭到学生的拒绝而被隔离在圈外。学生为了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跟外界联合。我看得出市民的难过，但他们仍然对学生给予理解。”

图7-12：“工自联”负责人韩东方（选自卡玛、高富贵《天安门》）

5月17、18两日，超过200万人的声援人群中，出现了大量工人的队伍。他们来自铁路、石油、煤炭、建筑、造纸、纺织、化工、机电、冶金、仪器仪表、电子、商贸、旅游等行业；打出的单位旗号有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青云仪器厂、曙光电器厂、北京低压电器厂、大华衬衫厂、首都钢铁厂、北京电子管厂、北京广播器材厂、北京国棉二厂、北京羊毛衫厂、首都汽车公司、北京石化公司、第一机具厂、中国重工业产品公司、四通集团、百货大楼、东单菜市场、西单超市、国际饭店、管乐器工厂，以及大批个体户和出租车司机。

图7-13：5月18日，工人游行大多乘车而来（选自64memo.com、陈小雅摄）

由于学生绝食得不到政府回应，北高联部分骨干开始把工作的对象转移到向广大市民和工人的宣传、动员方面。他们派出了一支支队伍，走向大街，走向工厂。虽然在很多地方受阻，但他们中已经有一批人“提出了组织工人运动的要求”。

据后来担任“工自联”法律顾问的李进进回忆，他就是这样走向工人运动的：

“5月18日晚，我和8个北大同学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同行包括朱苏人、龚晴和赴东。”李进进回忆道，他们打着“北大”演讲队的小旗，从复兴门开始，沿西长安街向东，一边演讲，一边朝天安门方向移动。

“每次演讲完以后，不少的人就提出许多发动罢工的问题，在私下，一些人还在我们面前抱怨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对外面群众态度冷漠或自居自傲。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到广场去说服学生们热情对待工人群众，认识工运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我们应当将这场运动扩大为全民性爱国民主运动，而不单单是学生的运动。”

“在演讲以后，我进入了广场内北大广播站的帐篷。当时有著名作家郑义先生和几个学生在那里，我将我的想法讲给在场的几个学生听，他们似乎不太认真听我的说教，但我看到了郑义的严峻的眼神，那眼神我至今还记得。是对我的演讲认可和支持。”

“我当时说服其它学生的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这场运动已经不再是学生运动，学生也不要自以为这场运动只是自己的运动。再有，学生本身没有任何利益，学生是靠别人养着的，有什么利益？从社会利益来讲，还是市民的、工人的。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积极参与了，我们就应当发动他们，组织他们，去引导、支持他们，至少在态度上要转变，要积极热情地对待他们。”

大约19日凌晨3：00，两位工人代表——岳武和白东平——找到了位于纪念碑东侧的北大学生广播站，并告知学生，他们要组织工人自治会，需要学生帮助。现在已有几百位工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面，要求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李进进看没有几个学生出来就说“我来吧！”

“我跟他们去。当时，我带着一顶遮阳帽，上面写着‘北大宪法博士研究生’。”

“我一去，就站在他们中间，发表了约十几分钟的演讲，并声称，我代表学生全力支援工人们组织起来。演讲后，一些工人提出了一些关于罢工权的问题，这在当时是组织工人运动的一个大的法律新主题。1982年之前的宪法，规定了工人的罢工权利，1982年宪法将这一罢工权利取消了。……他们问我，罢工是否合法，宪法取消了罢工权利是否意味着工人们不能罢工。我

简单地回答道，宪法没有规定罢工权利，并不等于宪法禁止罢工。工人的罢工权利可以从宪法规定的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权利中引申出来，工人们受到极大鼓舞。”

演讲完了以后，李进进回到广播站内，趴在扩音器上，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即《首都工人宣言》）。《宣言》称：

我们认识到：4月以来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与我们工人阶级利益休戚相关的全民性的爱国运动。

我们认识到：学生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已经竭尽全力，参加绝食学生正面临着危险；为了挽救数千学生的生命，为了我们工人阶级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此我们正式宣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24小时之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点要求。否则，我们将从5月20日上午12：00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

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

宣言起草好后，李进进再次来到大会堂东面的工人中。岳武宣读了这份成立《宣言》，并交大家通过。李进进建议，先搞个五人领导小组，作为筹备组，然后再去登记，搞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自己是学生身分只能作工人组织的法律顾问。于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担任了‘工自联’的法律顾问。”

19日的白天，“工自联”宣布正式成立。

当日上午，在绝食团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上，李进进认识了后来成为“工自联”领导人的韩东方，通过交谈，二人一拍即合。日后发表的一份《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就是二人共同起草的。

5月20日，一辆装有4个高音喇叭的大轿车在长安街和前三门大街缓缓移动。不停地广播：

“我们是首都工人自治会，号召全市市民走出家门，支持学生，把李鹏等一小撮政治阴谋家淹没在人民的大海之中。”

图7-14：5月19日，工自联成立游行（陈小雅摄） 5月21日，作为“工自联”存在的标志——一个功率更强大，主持人训练有素的广播站，在紧扼长安街咽喉的天安门观礼台西侧开播。曾任北高联第一任主席的周勇军，为这个广播站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后来担任“工自联”宣传部的他回忆说：

“我在绝食4天里，进了4天医院。到后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下去了。我们面对的是李鹏这些人。7天以后……我悄悄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到工人那里去。四通公司下面的一个公司给我提供了帮助，他们给了我一万多元钱，加上香港记者给我的逃命钱，我买了发电机，组装广播车，带到工人组织里面去，这是5月21日。我当时建议，把工人联合会改名为‘工人自治联合会’。我跟韩东方、赵品璐等人一起把‘工自联’的架子搭了起来。因为有了宣传工具，所以工自联才在很多组织中脱颖而出……”

北师大学生王德邦曾参加5月22日工自联的成立大会。据他回忆：

“5月22日，我作为北京高校代表出席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韩东方与另外几名工人活动分子当选为工自联常委（周勇军以王铁之名也当选了，记得当时还就此有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通过了）。会上通过了工自联章程，整个章程是由一个法学博士依照法律条文起草的，通篇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词，更没有

什么威胁或颠覆政权的目标。会议期间，不知什么人想冲进观礼台，一度引起过门口的混乱。”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5月22日的日记，曾记录下一段“工自联”的工作见闻：

“下午去广场。在天安门金水桥南挂上了‘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一位30多岁穿白色衣服的工人站在那里，对过往行人说：‘工人自治会已经组织起来了。’一会儿，过来一位40多岁的人说：‘请派两名纠察队员跟我去。’穿白衣服的手边没人，他对站在旁边围观的一位青年说：‘你可以去吗？’这位青年同意了。自治会就发给他一个红布条，说：‘你就算自治会会员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说：‘天安门下的门洞需要人堵。’（故宫和中山公园近来不开放，据说其中驻有军队）正在这时，从东边过来一支市民游行队伍，自治会的人就动员这批人到天安门去堵门洞。这支队伍果然留下了几百人听从安排。”

“工自联”的出现，的确为广场的学生提供了强大的心理安慰。也使为学运担忧的社会各界稍许放心。但当时，不论是李进进还是周勇军，都不认为这是发起真正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最佳时机。他们仅仅认为，这次“练兵”可以帮助“工人自治理念”的传播，并帮助瓦文萨式的人物脱颖而出。在政府主导的片面改革中，工人的确有许多自己的利益需要申诉，在可见的未来——企业自由竞争时代，这将成为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

图7-15： 工自联成立游行横幅：“学生必胜”（陈小雅摄）

第七节 党政军干部动员

就在“工自联”宣布成立的当天，根据17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中顾委、中纪委、

全国政协和北京市的副部长级以上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司局长参加了大会。会议于19日晚10：00开始，杨尚昆、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在主席台上就坐。据李鹏《“六四”日记》：会前他曾请胡启立请赵紫阳出席会议并讲话。赵以身体不适、头晕为由拒绝参加。李鹏又让胡启立再次去请赵紫阳主持会议，不作讲话，至少出席一下会议，以表示党中央的一致。他认为，赵紫阳曾表示保留个人意见，服从组织决定。赵若食言，便是对抗组织决定，“分裂党”。杨尚昆也通过中央办公厅作了同样的努力。但仍遭到赵紫阳的拒绝。因此，主席台上摆着的7把椅子有一张是空的。原本安排赵的讲话只好改由杨尚昆临场发挥。

《人民日报》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钱李仁、谭文瑞、范荣康、余焕春、保育钧、李仁臣和陆超祺，以及退居二线的胡绩伟、秦川等13人。据陆超祺回忆：

“大家的眼睛都盯著主席台：赵紫阳没有露面。虽然主持会议的乔石说赵因病请假，杨尚昆也说赵身体确有不妥，但在新中国生活了三四十年的人，谁都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

这次会议由乔石主持，李锡铭首先介绍了北京学潮发生的经过和发展的趋势。据《真相》记载：

“（李锡铭）用较大篇幅讲了一段‘幕后黑手’的问题，先后点了方励之、李淑娴夫妇，‘中国人权同盟’的任畹町，‘中国民主联盟’的胡平、陈军和王炳章、汤光中，89年4月在美国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的名，还列举了台湾国民党中常委、美国白宫发言人对这次学潮的评论，说明‘这次学潮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介入，更加说明了这场斗争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安定局面构成了重大威胁，并已对北京市各个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

接着，李鹏代表政治局作了报告。在描述了形势后，话锋一转：

“……本来，5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5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多，许多高等院校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全市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中的一些国事活动安排，也因此而被迫变更或取消，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把“五月”作为事态转变的时间节点，为处理赵紫阳问题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暴露了赵的缺席原因。继而，他谈到采取戒严措施的必要性：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人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绝食学生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了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多次同绝食学生的代表进行对话，并郑重表示今后将继续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天安门广场人群拥挤，煽动性口号不断和人群情绪极度激动的情况下，绝食学生代表也表示，他们已不能控制局势。（现在，如果我们再不迅速结束这种状况，听任其发展下去，很难预料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图7-16：赵紫阳缺席首都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主席台最左边的椅子是空的

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在不少地方，游行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多次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破坏活动。最近，甚至铁路干线上的火车也遭到拦截，使交通被迫中断。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我们的党和政府多次说过，广大青年学生的心灵是善良的，他们在主观愿望上是不想搞动乱的。

他们有爱国热情，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这同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已经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任意采取游行、示威、罢课乃至绝食请愿等方式，破坏了社会稳定，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事态的发展完全不以青年学生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正在越来越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处煽风点火，秘密串联，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我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我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我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我国。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区分开来，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及其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不要伤害好人，特别不要伤害青年学生。而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扩大事态，导致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动乱。

必须强调，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

过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党和政府同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之间的对话，包括同参加过游行、示威、罢课、绝食的学生之间的对话，还将通过多种层次、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广泛积极地进行，以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学生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他们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许多学校的负责同志、广大教师 and 同学们，为劝阻游行示威、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做了大量的极其艰苦的工作；广大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做出了很大贡献；机关、工厂、商店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坚持生产，坚持工作，为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对这一切，党和政府是感谢你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现在，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 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二、 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同志们，在今天的大会上，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作出贡献。

各级党组织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

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仅不参加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绩法纪，切实加强对所属地区 and 单位的领导和管理，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

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进一步努力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持正常的生产秩序；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的复课。

同志们！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样做，相信一定会得到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定会得到肩负着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干警维护首都正常秩序所做出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在维护安定团结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努力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通过对各种讲话版本的对照，这篇《李鹏5月19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是经邓小平、杨尚昆、乔石、彭真等人修改定稿的。但在讲话结束时，李鹏特意为解放军进城和即将宣布的戒严留下一个伏笔。他说，“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为维护首都安全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据次日凌晨看到这次会议的电视实况转播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回忆：

“回到社里已经1：00多了。只见所有的电视屏幕上都是李鹏的头像。他在发表关于实行戒严的讲话。他不时地挥动着拳头，声色俱厉。各处的电视机都开着，但很少人坐下来看电视。有人指着电视叫骂：‘法西斯！’”

杨尚昆在动员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说：

“首先，我完全拥护李鹏同志代表政治局常委所提出的报告和各项要求。最近北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所有的机关工作、学校上课，还有交通等等都发生了基本上混乱，这种混乱实际上是个无政府状态。刚才，李鹏同志讲了中苏会谈这样历史性的事情，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而临时改在飞机场，其中有几次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的，被迫改到钓鱼台，还取消了一些预定的节目，这样一种状态连原来规定了要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也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在我们对外关系上来讲是非常之坏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到这里来开会，也没有行车的自由，必须绕很多弯子到这个地方来，使大家提前一个钟头或者甚至一个多钟头动身才能赶到这个会场，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我们这个首都呵，不能称其为首都。北京市的工作没办法做，国务院的工作也没办法做，所以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恢复正常秩序，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为了稳定北京市的局面该恢复正常秩序，解放军不得已开一部分进驻北京附近。刚才各位来看到，路上摆的军车就是解放军从外面刚进入北京附近的，这是完全出于不得已的情况，因为北京市的警力已经无法维持北京市的秩序，而且北京市的武警、公安干警这一个月差不多都是连夜在奋战，许多同志是带着病、生了病，没有办法昼夜值班，两三天不睡觉，所以这样子，没有一部分解放军来维持北京市的这个治安呵，要恢复这个治安，我们认为是很困难的。解放军进驻北京附近，绝不是对付学生，不是为了来对付学生开来的，而是为了恢复北京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同时也保护一些重要的部门，还有一些重要的机关，所以解放军进来进驻是为了维护治安进来的，不是来对付学生的。这点今后几天

行动中间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就是说解放军是为了保卫北京的正常秩序、社会治安和一些重要的机关免受干扰或者冲击被迫进来的。这一点我想要跟在座的各位说清楚，绝不是来对付学生的，希望大家，各行各业，以及各方面，以及我们的民主党派支持解放军这种为了维护首都治安，这种行动希望你们加以谅解和支持，我想就是跟同志们说明这一点，旁的没有了，讲完了。”

他和李鹏的所谓“伏笔”，实际上已经把戒严的行动公诸于世。

当天晚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向邓小平、杨尚昆报告了军队的动态：

“接到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有关集团军迅速收拢部队，进行思想动员。在向北京开进中，各部队采取佯动迂回、隐蔽前进、多路进发、高速开进等多种办法向北京集结。到今晚10：00，先遣部队第27集团军、第38集团军、第39集团军、第63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已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准时开到北京城区，基本到达预定目的地，为进行戒严做好准备。其中一些部队遭遇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围堵，被围于街头、郊外。指挥部将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按由远而近、由外向里、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则，将被围部队逐步调整到有利位置。”

据时任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某雷达站站长李晓明的回忆，原驻辽宁省海城县的部队刚开始接到的是“去沈阳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的命令。“当队伍行进到沈阳附近时，上级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关附近，上面又说改去北京。”“部队对官兵教育还是到使馆区维持治安，不能向人民开枪，谁开第一枪就要向历史负责等等”。

5月20日，首都各大报刊都把李鹏在党政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放在头版头条位置，唯独《人民日报》，把它放在一版下方，通版标题无“动乱”二字。而在右上角“报眼”的位置，刊登了赵紫阳19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与绝食请愿的学生们见面讲话的消息和图片。“文稿是昨晚鲍彤派人送来的，没有送给别的新闻单位。”

与此同时，一夜之间，《人民日报》社内“原来贴满评报栏的大小字报都不见了”。《光明日报》也出现同样情况。据亲手处理这些大字报的朋友透露，大字报的作者中，有人在后来的清查中，对同事采取了翻脸不认人的态度。

第八节 “黑手”行迹

从李锡铭5月19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北京市，自4月18日学生的请愿“七条”提出以来，官方就把“黑手”的目标锁定在了“方励之夫妇”身上。这不仅因为方励之在1986年“自由化”浪潮中的“前科”，还因为他自此以后，似乎就和邓小平“犟”上了。从邓小平散布要起诉他的“诽谤罪”，到千方百计阻挠他出席美国总统的晚宴；从方励之年初给邓小平写信建议“大赦”，到他公开提倡“压力集团”，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场“顶牛”中，确有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中国官方编撰“动乱”纪事时，把方励之的年初上书放在“背景”首要位置的原因。这种选择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没有事实根据（如果不想抹杀方励之先生为争取民主所作的努力的话），但确切地说，相较其他更多、更重要“背景”而言，以及对这些更多、更重要背景的视而不见，这类编排方法具有明显迎合邓小平个人趣味的倾向。

说到“事实根据”，在八九民运中，确有学生曾拜访过方励之的家。大体因为方、李夫妇都是教师出身，李淑娴当时还是北大选区选出的当届海淀区人民代表，他们的家似乎是不设门坎的。

据张伯笠、封从德、沈彤等学运骨干回忆，1989年2月，方励之的文章《中国的失望与希望》被抄写成大字报贴在三角地，确实给他们很大鼓舞。

“3月8日，李淑娴又在北大写了一个她作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报告，讲她一年干了些什么。我发现她对她的选民非常负责，我看了很感动，这个时候我才感到在北大在中国还有这么一批人，希望中国有希望。”

因受出国留学问题的困扰，封从德还给李淑娴写信，并得到她充满正能量的回复：

“收到了李老师的回信，信中多是鼓励的话，说到海外，更可报国之类，最后还引用朋友去国前的一首七律，充满对故土的眷念。”

封从德说，这是学运前 他同所谓“黑手”唯一的一次接触。

据“奥林匹亚”的组织者沈彤回忆，上文所说的方励之文章，原是他给《纽约书评》写的稿件，1989年2月的某个周三，李淑娴曾把中文稿带给民主沙龙和“奥林匹亚”。这两个社团首先在北大，后来在各校散发。

“方励之本人是不能进北大的，大家都知道，李淑娴实际上是作为他的代言人。但李淑娴本人是北大学生选区选出的海淀区人民代表，那么她也有一定的权威，她在民主沙龙和我们社团的活动对小范围的学生积极分子都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张霖曾计划在安徽办一所私立大学，想在这个大学里开设西方哲学、西方民主一类的讨论课题，但是得不到教委的批准。不仅如此，他还被公安局到处追捕。据说，张霖同李淑娴也讨论过关于“非暴力”等问题。

但是，学运开始以后，为了不被官方“栽赃”黑手操纵，北大的学生，以及“民主沙龙跟奥林匹亚科学院都决定，在运动开始之后，不跟李淑娴和方励之发生关系。”

据方励之回忆：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我的生活方式，大体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种访问者，有朋友和学生，也有记者，晚上则写文章。从4月16日学运开始到5月20日戒严，一个多月里，我完成过一篇论文《含宇宙弦及热暗物质的宇宙中的偏袒成团》，会见过57次记者。

虽然在所有记者访谈中，我都表示支持学生。但我一直没有去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其原因是，早在学生请愿的第三天，4月20日，北京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造成和指挥的。并以此为由，伺机扑杀运动。”

在这些到访的客人中，也有刘刚。据老木回忆：“刘刚在胡耀邦逝世那天晚上，或是第二天晚上，去了方励之家。方励之提供了一些记者的名单，当然提供了我的名字，刘刚找过我。”

方先生所说4月20日的内部传达，与前述王丹的一个电话有关。

如前所述，方励之夫妇确系“民主沙龙”及其前身“草地沙龙”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许多八九民运的骨干，如：王丹、刘刚、杨涛、熊焱、郭海峰都出自这个沙龙。1988年5月4日，“民主沙龙”第一次活动时，方励之、李淑娴曾双双到场，表示祝贺。

图7-17：1988年6月6日，王丹等北大学生在方励之家聚会（选自《方励之自传》）

1989年4月5日，王丹等人在“民主沙龙”提出“要实现蔡元培的愿望，把北大建成推行政治民主化的特区”。李淑娴也表示要“登门拜访校领导”，使“民主沙龙”合法化。

4月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书“七条”的北大学生逐渐散去。但仍有200余学生留下。7：30，王丹见静坐的人越来越少，就给李淑娴打电

话求救。电话打了两次，第二次才拨通。李淑娴根据王丹的要求，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了题为《天安门前传来的电话》的小纸条，“希望学生去声援”。

据称，王丹向静坐学生传达了李淑娴“一要坚持，二要把请愿书递交人大常委”的嘱咐。

4月22日在胡耀邦追悼会后，请愿失败的北大学生讨论了未来学运的策略。作家郑义也明确向郭海峰、王丹、熊焱提出，尽可能不要与方励之夫妇接触，一是为了“保护”方先生夫妇，二是为了学生的自我保护。在众多的大学报中，有一张署名为“一清醒者”的“受骗学生”题为《原来是个阴谋》的大学报指控，学生提出的“七条”是征求过李淑娴意见的。它说：

“第一点：悼念胡耀邦，提出我们的政治要求。李淑娴老师说，要把为胡平反放在第一条，这样他们就只好说什么了。第二条也别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受批判的知识分子平反，那样太脱离群众，也容易引起误解，好像方励之老师参与了。要尽量避免给当局口实，再有群众最恨腐败，别直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用这一点攻他们！”

据《中国“六四”真相》，早在4月20日“新华门”事件后，在许多中共元老纷纷的建议和议论中，宋平就曾对姚依林说：“北京学生的闹事苗头已经很明显，方励之等人非常活耀，学生背后肯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操纵，中央要尽快采取措施，控制事态的发展。”姚依林则说，“这次学生是打着悼念耀邦的名义要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好多学生都蒙在鼓里，不明真相。实际上，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早就在等待时机，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正在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所以，要尽快揭露真相。这几天的趋势表明，学生闹事有演变成动乱的可能。”

对照上述两条信息，我们可知，元老们的意见与自称“受骗学生”至少拥有共同的消息来源。

4月24日，在一个大学教师与记者交叉的圈子里也出现谣传：方励之曾到过广场，但被他的两个朋友架走。

4月24日，李锡铭和陈希同拜会“老领导”万里时，李锡铭曾对万里说：

“这次闹事最凶的一些北大学生，就由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方励之虽不直接插手学潮，却是把学生与国外媒体直接挂起钩来的牵线人。还有一些人也不怀好意。”

当天，李鹏听取了李锡铭、陈希同的报告后，决定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据张良《真相》，4月25日向邓小平汇报时，李锡铭再次点了方励之的名，说“北大非法学生组织的幕后人物说是方励之的老婆。”

4月25日，邓小平讲话点到名字的“黑手”就是方励之夫妇。他说：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对有些人，要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不要卷进去，不要继续搞了。不要等事情发展起来了，怪我们没有打招呼。”

偏偏在这一天，《亚洲华尔街报》上刊登了方励之4月25日对该报记者的谈话，主张“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在4月28日上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宋平斥责其“厚颜无耻、赤裸裸的卖国。”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生改变策略，在第二天的游行中打出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王丹传达的李淑娴的意见，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政府”等口号，改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李鹏激动地认为，这次抓到了确实的把柄。

在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除陈希同再次咬定“北大的民主沙龙”和方励之、李淑娴外，李鹏提到“西单墙时期的一些非法组织头头”和“从美国

跑来搞签名的”人，以及国民党在26日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公开支持这次学潮的决定。杨尚昆介绍了从外交部获得的信息。反映最近一周以来，美国波士顿地区留学生到领馆前进行示威，成立《中国学生团结联盟北美分会》，陈军、胡平等人发表“致全中国大学生公开信”等情况。

他还提到，“香港市民也密切关注这次学潮，并将我们如何处理这次学潮与香港回归问题敏感地联系起来”

5月9日晚，北京大学“筹委会”广播站播放李淑娴的讲话录音，宣布要对北京市委对她的指控提出上诉。王丹则在稍后的演讲中，再次把本次学运与方励之联系起来。他说：

“方励之老师讲‘压力集团’，‘四二七’、‘五四’就是压力过程，结果怎样，谁输了？是人民还是政府？”

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报道中，海外媒体也有提到方励之的。据《真相》记载5月15日“呈送中南海的20篇海外报导，显著介绍了当天首都知识界大游行的情况”。其中共同社播发的题为《知识分子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的报导除提到“严家其外，还有反体制人士方励之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等。”法国《解放报》题为《莫斯科之风使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感到激动》的报导称，“方励之说，苏联头号人物的访问已经产生了间接影响。今年五月，马恩列斯四胡子的画像没有像40年来那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步。”“但是，许良英说，苏联无疑不能被看作一种榜样。那里的真正的民主并不比我们这里多。有人甚至说戈尔巴乔夫在搞个人迷信。”

5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面的福建厅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新华门前的绝食者打出的白布横幅上书：“中国科技大学青年教师”。这很容易令人想起方励之治校时，“让研究所所有的人都入党”的政策。并把这些活动与方励之联系起来。

与王丹相比，刘刚显然与方励之夫妇有着更长的合作关系。但在八九民运中，他去方励之处的次数并不多。如前所述，4月23日夜，他曾将起草的“团结学生会的章程草案咨询过方励之，方励之只作了一处改动：将“民主集中制”改成了“民主制”。在那次见面中，他向方励之介绍了陈明远的演讲，并希望方励之也能像陈明远那样登高一呼，公开地表达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但是，刘刚回忆道：

“方励之只是同我说‘陈明远有后台，后台还很硬。’并没有发表公开演讲的意思，而且告诫我们也不要像陈明远那样太出头。”

作为一个师长，出于对青年的爱护，方励之的态度与许良英一样，并非纵容的。而王丹之所以没有低调处事，很可能与他本人与方励之并无深谈有关。另外，他很可能总结了方励之的某种经验，即确信“知名度越高，就越安全”。他在学运中表现出来的偏爱“媒体路线”，加强了他在学运中“活跃”的领袖形象。而他的活跃，正好给北京市委提供了方励之（通过李淑娴）充当“黑手”的口实。而这，正好是强硬派鼓动邓小平的求之不得的证据！

方励之在八九民运期间的无所作为，应当感谢他的北京天文台同事。从4月20日，北京市委内部传达“北京学运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开始，他“处处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使当局无机可伺”。方励之回忆说：

“4月27日晨，是第一个紧张的时刻。那天学生组织大游行，科学院的一些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议前一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它指责学生运动是动乱，是‘一小撮坏人’制造的。显然，当局要以抓‘一小撮人’的方式，镇压运动。这是中共镇压各种不满情绪的惯用方法。……据参加游行回来的人说，果然在游行现场有传言，说方励之在游行队伍中‘跑前跑后地’指挥。这显然是一个恶信号。

恶信号制造者的计算，早被天体物理学家们计算到了。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有一个报告会，由法国人Bonnet-Bidaud讲‘毫秒脉冲星’。这个活

动，不仅没有因游行而取消，而且由我出面主持，不少参加报告会的同事都有良好预感，一到会场（即在传言出现之前）就说：今天我们可以证明，方励之没有去指挥游行。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劝我离家躲避，这是几位年轻的同行。他们从高层关系上确切得知，有关方面正在具体研究如何‘对付’方励之。我的行动当时已时时受到监视（一个证据是，后来在当局编制的指控我‘制造动乱’的影片中，就有我到天文台上班的电视记录镜头）。……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但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骑车要注意后面，尽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测。

5月12日，学生绝食，运动如火如荼。戈巴契夫访问北京，也下降成一条小消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感动了整个世界。一时似乎令人觉得中国的光明就在前头了。那几天，我也真想去看看天安门前回肠荡气的景像。一些学生和朋友，特别是海外的朋友都劝我赶快去天安门，一再说‘时候到了，你该去了’。我周围的同事，则仍一律坚决不赞成我出面参加任何活动。因为，前景绝非那样光明……

5月18日，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打来一个很恳切的电话，要我去天安门广场说服学生停止绝食。我也是主张停止绝食的，所以，几乎被他说动了，想去天安门试试。但最终还是克制了冲动……1986年12月23日的经验告诉我，说服科大学生结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的静坐，已经是我的能力的上限了。我绝不具有说服天安门广场学生结束绝食的力量。”

事后，方励之在柏林与留学生座谈时，也遭到同样的质询：“您和刘宾雁先生对学生最有影响，而刘宾雁当时在美国；您在北京，如您站出来讲几句话，凭您的洞察力一定可以看出运动之趋势，可您当时为什么保持沉默呢？”

方励之回答说：

“六四是相当自发的运动，当然有学自联的作用，从整体而言，学自联也不能控制整体运动，到后期失控状态更明显，王丹最后一次来我家是‘四二七’游行后。我说‘四二七’是针对‘四二六’社论的和平游行，是很成功的。当局同意对话，新闻界开始游行了，你们回到校园去更好，王丹也赞成，后来的发展，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从绝食第一天起，我们就认为不该绝食，学生领袖没有找过我们。……1986年12月23日，科大学生在合肥市中心广场坐了一夜，我认为很危险，和管惟炎一起去广场说服学生，把他们带回来了。那次成功了，这次为什么没去？我判断天安门广场上我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科大的学生听我的课，可以说服他们。我在家里试验过，有的学生能说服，有的不能说服。当时自己判断我的影响力不够，因此没有去。我有渠道可以影响学生，各种判断认为我不能去。”

当被问到：“群众运动到一定程度就失控，我们今后是否支持或发动这样的群众运动”时，方励之认为：如果89年停留在“四二七”或戈巴乔夫访华就撤掉，可能没有镇压。当然当局还会镇压的，但不致死这么多人，也有可能保留一些学生的组织：

“后期失控不等于说任何群众运动永远失控，主要是准备不够，包括我们知识分子，都有一定的责任，该收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学生停止在某一阶段上。……89年没有任何人想发动就发动，将来一定会出现民运，要比上一次采取更有效的方法，使群众运动有一个好结果。”

在谈到自己的角色定位时，方励之同意“是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民运的领袖”的说法。方励之说：

“我是做科学工作的，在中国任何人避免不了政治，我是越卷越深的。作为知识分子，我要对社会的好坏发表一定意见。我今天仍认为自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我对当局体制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中国民运发展落后于东欧的标志之一，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时间很短。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形成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

我公开承认，私下承认不算，是1987年6月被开除党籍时。有记者问我，你是否算持不同政见者，我说是。大量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对中国民运是必要的。中国的事情，主力当然是在中国大陆内部。大陆能有组织当然好，目前很困难。形成持不同政见者有一定可能性，组织出现要等一段时间。

……当然有人愿意到党内改革，我不排除这种可能。1985年最早是我的提倡之一，我提倡大家都去入党，入党去推动改革。现在看，这种观点有缺陷。当时我们科大天体物理研究室大家都去入党。这条路失败了，至少把我开出来了。(笑声)证明这条路要作修正，不是否定这一条。一定要有反对派的存在，才能证明你不是权宜之计。”

北京戒严以后，社会上开始流行各种版本的“黑名单”。据方励之所知，每个名单中都有他的大名，只是排名靠前还是靠后略有不同。5月24日，他和另一个同事前往太原开会，火车经过昌平时，“整个车站停满了军用列车，”方励之回忆道：“我们的列车在唯一的一条空闲轨道上穿行而过。那些军车就是后来从东面杀进北京的部队。”

当然，跟随方励之从北京到太原的便衣，即便是在恒山的悬空寺，也没有令他离开过自己的视线。

在无形围猎的名单中，另一位一直被关注、随着赵紫阳地位的确定势将挑明的人物，就是体改所的陈一谔。据戒严后李鹏向中顾委的介绍，这一关注始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与体改所联合成立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

索罗斯是美籍匈牙利犹太人、金融投机家。从1984年到1987年，先后在匈牙利、苏联、波兰、中国建立“基金会”，目的是“协助政府促进经济改革和批判性思维”。索罗斯说“要用自己的钱加速铁幕后面的社会改革”。他说，“共产主义正在崩溃，我的目标是帮助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从而加速这个崩溃的进程。”索罗斯还直接参与这些国家的政治活动。他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经费，给匈牙利的政治反对派优厚的援助。在匈牙利的索罗斯基

金还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次10万人参加的集会。在前苏联，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戈的夫人赖莎担任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的主席。李鹏认为，“索罗斯充当了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急先锋。

“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1986年10月11日，经鲍彤请示赵紫阳同意，由体改所所长陈一谔与索罗斯在北京签署协议。索罗斯每年提供不低于100万美元的赠款，资助中国“改革”活动。

显然，这一案件把赵紫阳、鲍彤全部牵扯进内。

中共高层不少人认为，这是那些希望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实现“和平演变”的美国政客的具体行动。他们不仅“培植”体制外的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政治反对派”；培植王炳章、胡平等人的“中国民联”，而且已经开始向体制内伸手：

“美国的一些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主要成员身上下功夫。他们认为这些人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特务在推荐原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一名工作人员访美时写道，这‘有助于打开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从1987年至1988年一年内，仅他一人就推荐了体改委系统的12人访美，成行11人。”

1988年10月26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了索罗斯，双方谈到苏联和中国的改革问题。索认为，苏联的改革在“公开性、民主化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赵紫阳对索罗斯说，“苏联先从政治改革开始是因为要找一个依靠力量，就是找到知识分子”。赵紫阳赞扬了索罗斯对中国改革的关心及其给予的帮助，并且认为“前一段合作得很不错”。

不久，基金会被举报，并在安全部立案。陈一谔也接到“邓办让写一个材料”的通知。为此，他搞了一个50多页的材料送了上去。据官方掌握的材料

料，1989年1月7日，美国某基金会向“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汇来25万美元。至1989年5月，美方共汇来250万美元。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上述机构的主要成员，都曾使用这个基金会的钱去美国。

胡耀邦逝世，学潮兴起以后，体改所一直与学运保持各种联系。但从未以单位名义介入学运。5月13，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统战部邀请各方协商对话问题。陶斯亮曾给陈一谔写过一张纸条，由陈一谔的秘书杨晓带给了陈一谔。纸条上写着：

“统战部知识分子局开会，听取各路精英的意见，怎么不见你这一路神仙？”

听杨晓说，陶斯亮很着急。但陈一谔认为，体改所出面只能给他们“添乱”。尽管阎明复是好人，但他“并没有改变历史的权力”。

5月15日，知识分子大游行的消息传出，体改所的年轻人群情激荡，许多人为参加游行都剃了光头。这时，陈一谔已经获悉，体改所与政改办、发展组三个单位，已经被列为运动的“三只黑手”之一。他架着双拐来到办公室说：“参加游行可以理解，也是每个人的权利，但体改所的旗帜绝对不能打！谁敢打出体改所的旗帜，我就开除谁。”他还质问年轻人：

“‘你们要干什么？都要当许褚、李逵，赤膊上阵吗？…我们需要的不是百夫长，而是万人敌！要每临大事有静气！？’杨晓拿来了留学英国的李磊发回的传真，号召所里的年轻人起来‘造反’，字里行间倒是充满了热血。”

这一天，陈一谔还接到天津开发区张炜的来电。他告知陈，已经与吴稼祥、石小敏一起，发起了一个声援学生的声明。

“我召开了一个临时所长办公会议。大多对学生的绝食反响强烈，对政府的冷血深表不满。我说：‘越是危急时刻，我们越是要冷静…’”

这一天，陈一谔发现外面来了5个丈量土地的人。他们携带仪器，一边丈量，一边记录。号称是“居民委员会丈量所里的土地和建筑”的。他们一间一间房子的丈量，已经干了两天。

“我又请一个军内的朋友去打听一下军队的动向。第二天，他告诉我说：‘老陈，不好了，各地都有部队以拉练、野营、换防的名义，在往北京四周调动。’”

这是5月16日的事情。

当天晚间，陈一谔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这个人哑着嗓子对他说：“你们已经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你也上了黑名单！”陈听出是在公安部当副部长的一个朋友。对方继续说：

“‘还有老鲍，家其，……’一阵杂音，电话断了。”

不知道是否受到上述信息的刺激，陈一谔不再“冷静”。当天，便向广场的求援者提供了资助。他回忆道：

“当天下午，杨晓带着政法大学的陈小平和北大的陈波来找我。他们哭诉了绝食学生的惨状，大骂政府的没有人性。我给了他们每人5000人民币，让他们给学生买饮料；又把老同学施旭东刚给我的600美元，分给一人300留作他们急用。齐永贵从美国考察回到海南，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我说：‘你赶快派人送10万元人民币来。他说，10万不行，5万可以。我说那就5万，要快！’他派许佳送来了钱，罗安义收到就给学生买饮料了。”

“杨冠三和白南风都说，学生已经失控了，没有谁的话他们能听进去，似乎陶醉在‘胜利’的盲目喜悦中；而且哪个学生领袖提了比较温和的看法，就会被认为是‘立场不坚定’被赶下台；况且没有哪个学生领袖能作出冷静的决定，谁的声音大、鼓动性强，就按谁的意见办。对劝学生撤出广场的忠

告，他们一概听不进去。倒是不少绝食的学生急需救助，最好是先给他们买一批饮料送去。我让马上从所长基金里拿出两万元，给学生去买饮料。”

当天，他还和政改办副主任周杰商议了“促成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组织一个各方代表参加的‘事件调查委员会’，来做一些缓和矛盾的工作”的问题。此事在戒严后演化成一轮对“人大”和万里的呼吁活动。

第十五章 保卫北京城

（鸣谢：本章资料主要提供者：胡绩伟、宋永毅、章立凡、石晓敏、何亦文、封从德）

为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国家政府部门可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戒严。1989年的中国，尚没有一部《戒严法》，类似行为，被1982年《宪法》称作“紧急状态”，分别纳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的权限范围内。其中，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国务院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处置权。二者的差别在于全部地区和“部分地区”。中央军事委员会没有被授予戒严的权力。它的职权仅仅是“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但是，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赋予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重大问题上建议和拍板的权力。而中共又是宪法序言规定的“领导党”。这一切就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上述规定形同一纸空文。

执政党依照“不成文习惯”行事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令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形成了漠视法律、法令的习惯。在不成文法主宰的国度内，“统治的有效性”以及被国际承认，就是它的“合法性”来源。依照这个逻辑，1989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戒严令”面临的并非条文是否“合法”的问题，而是它是否“有效”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戒严并不意味着“流血”。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举凡政府和国家举行重大国事活动，或领导人出行，或外宾光顾，小规模戒严与社会并不构成重大冲突。但大规模、无期限戒严，则意味着人民人生自由与生活、工作权利受到侵害。换言之，当它

把自身置于人民争取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汪洋大海”时，必然遭遇“无效性”的挑战。

此时此刻，事态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最终决定于政治家的领导能力。在政治家能力不及时，取决于各方博弈。

第一节 “三所一会”的反抗

5月19日晚，就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召开前45分钟，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宣布停止绝食。

李鹏日记写道：

“鲍彤领导的政改室另一位副局级干部高山，在19日上午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召集的会上，介绍了鲍彤17日晚向他透露的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的情况。鲍说，赵完了，我也要与你们告别。陈一谘、高山根据鲍的意思，先后炮制四份反动传单，并以‘体改所’、‘农研发展中心’、‘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四家名义，发表了一个《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天安门广为散发并进行广播。‘声明’呼吁公开中共高层决策内幕；立即召开人大特别会议，进行干预；召开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工作进行审议；授意学生要赶快结束绝食，说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这就是指戒严。以上事实说明，小平同志在5月17日开会时就对常委们讲‘你们办公室内有奸细’，这一判断是十分正确的。党的核心机密已被鲍彤泄露到动乱分子那里，扩散到社会上了。”

事后，“泄露党的核心机密”成了鲍彤的一条罪状。

在上一卷，我们已经谈到，鲍彤在当天并没有从赵紫阳处获得“戒严”的消息。据《陈一谘回忆录》记载，他的消息来源是这样的：

“5月18日上午，中央办公厅一个朋友告诉我，邓小平决定‘戒严’和赵紫阳可能下台的消息……中午，军内一个朋友又告诉我，北京四周已经都部署了部队，只让军人学‘四二六’社论和一些北京发生动乱的材料，说明部队进驻北京是早晚的事了。”

当晚，一直在他和邓朴方之间传话、协调的好友，他的北大同学何维凌告诉他：“朴方告诉我，老爷子决定要‘戒严’了，你怎么看？”二人交换了对时局、前途的不同看法后，就此进行了悲壮的告别。

19日上午，就在北京市委召集处以上干部会议统一思想之前，陈一谔召集了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负责人，以及体改所正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开始后，鲍彤的下属，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来到会场，向到会人士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和关于戒严的绝密消息。会议决定做两件事：一件是起草一份声明，就当前形势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第二件是组织20个部委的人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

《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全文如下：

1、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2、事态演变到今天这样的严重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

3、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脱离人民，违背良知，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直接对立。其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轨道运行，没有政治公开性，形成了只关心上层权力斗争，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为重的局面。

4、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至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这种黑暗的前景是经历过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

5、为此，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做出判断和选择；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最近一段时期的工作进行审议；

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吁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协助大学生做好维持秩序和后勤服务工作；

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6、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1989年5月19日下午4时

这份《声明》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来自中共体制内、以单位名义正式作出的第一个政治声明，也是“反戒严”行动的第一炮。它反映了与改命运攸关的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在是容忍中国人做暴政的奴隶，甘心出卖灵魂充当驯服工具、以沉默来忍受强权，还是做人、做共和国主人，为道义而战的大是大非面前，取义成仁、与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同进退的决心。较之于1986年胡耀邦下台时，胡派阵营的无声无嗅，分崩离析，不能不说是一种壮烈的举措。

“三所一会”之所以能一反历来党内斗争的传统，与他们“新生代”的特征和成长的历程有关。他们不属于中共建党四十多年通过历次斗争存留下来的任何旧的山头，大部分是中共建政以来出生或培养，又经历过“文革”觉醒的党内新鲜血液。由于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深知民间疾苦和制度弊病；由于思想敏锐而饱受旧的意识形态压制，他们充满变革的欲望与雄心。更由于邓时代，是建筑在以“前朝老臣”为政治基础上的“复辟”，而“文革”前17年计划经济的思路和“左”的干部路线，又无法提供“改革事业”决策参考的“新思维”和人才，加之十年“文革”造成的干部断层，使它在干部力量上，已无法承担起改革的新使命。于是，便发生了锐意改革的高层领导与这个“新生代”的跨代联合。

这份《声明》的联署单位，确如李鹏所说，都与赵紫阳有关系。首先是胡耀邦下台后，在他的关心下组建的社科院农村发展组接受赵紫阳“收编”，组建为后来的“体改所”，成为赵紫阳本人的咨询机构；鲍彤和陈一谔分别任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正、副会长；陈一谔又是鲍彤领导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成员；国务院农研中心则由赵紫阳的老朋友、被赵紫阳尊称为“杜老”的杜润生担任；而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李湘鲁，也曾担任过赵的秘书。

陈一谔请赵紫阳的秘书任会长的做法，曾引起中青年学术思想界的议论，认为它违反科学研究相对独立的原则，把应该以自由为前提的不受拘束的科

研工作纳入了“奏折学派”的轨道。但它从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改革派”的社会与政权基础，形成了党内“新生代”与赵紫阳的政治同盟。他们的素质虽然限制了中国80年代改革的想象力，但从纵向比较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共和国的历史。

从这个背景看，陈一谔当然是要插手民运的。在1989年4月京丰宾馆会议上，他们也发出过“改革派”即将受挫的警告，以及类似“团结起来，保卫改革”的号召。自4月中旬学潮之风起于青萍之末，陈一谔就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动作了。4月18日，以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校友名义打出的悼念胡耀邦的巨型条幅“中国魂”，就有他的身影。当时，崛起与胡耀邦政治生涯关系密切的陈一谔，就关注着学潮的发展，感到“民心不死，民气可用”。为此，他一直以“工作需要”为由，与在野的“职业革命家”保持密切联系。但是，这种愿望在对方记恨于他十年改革垄断了“进言渠道”的旧账面前，收获的只是表面应付。胡耀邦逝世以来，在他联系最密切的北大，还屡次出现“救赵”的言论，试图把学生的抗议引向保卫包括改革派在内的“改革成果”。但这些言论也立即受到谨慎的警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已不再希望学运充当“政客的拐杖”。

正因为如此，这份《声明》首先作用于受众大脑的讯息是，这可能是“合法的总书记”的声音。按此推论，与此相反的政策、命令则意味着“政变”和“矫诏”。其次，既然上层有如此强烈的斗争，那么，“戒严”不论“合法”与否，它的“可行性”就会存在问题？同时，特别是在改革派阵营中，它也释放了一个信号：既然改革是一个整体事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凡是与改革开放共命运的人，最后表明你们态度的时候到了。如果说，此前有许多人还在沉默的话。

下午4：00以后，天安门广场学生设立的广播站广播了这份《声明》。这个《声明》还发到北京各新闻单，各高校，并广泛张贴于街头，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将其电传给“美国之音”等新闻机构。

当日下午4：00，陈一谔携《声明》来到北大，“找到几个老朋友”，通报了情况。据陈一谔回忆，大家虽然深感广场学生的工作难做，但同意想办法说服学生。

当天下午，正在蓟门饭店召集会议 的陈子明先后接到北大张炳九和体改所杨冠三通报上述情况的电话。立即在会议上进行了通报。此后，由陈子明口授，其他人补充，周舵执笔，形成了一份《告人民书》。文告在无一名国家机关干部在座的情况下，由陈子明落款“部分国家机关干部”付印。当晚，社经所人员自称“体改委”的人，通过手提式小喇叭，在天安门广场广播并散发了这份文告。 其内容如下：

共和国公民们、同胞们、绝食同学、中共党员们、解放军指战员：

我们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极其愤慨地向你们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

赵紫阳总书记主持工作权力已被剥夺，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并决定今晚对绝食同学采取强制措施。

5月13日，赵总书记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张立即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被4比1多数否决。5月15日，赵决定去天安门广场向社会和公众宣布他个人的意见，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以违反党纪理由阻止；5月16日在邓小平出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赵提出五条意见：

- （1）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
- （2）由他本人承担发表社论的责任；
- （3）人大设立审查高干子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官倒行为的机构；
- （4）公布全国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社会背景；
- （5）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权。

以上意见又以4比1多数被否决。5月1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大多数同意赵下台。总书记职务由李鹏兼任。军管迫在眉睫。1976年四.五镇压后的局面马上要重演。

据悉，曾召集人大常委会议，几乎全体副委员长决定拒绝接受政治局的以上决定，李鹏威胁要以党纪处理他们。体改委等十部委决定开展静坐、绝食斗争。鉴于以上极为严重的事态发展，我们呼吁社会各界：

一、我们应尽量避免暴力对抗，绝对避免流血。

二、社会各界团结起来，捍卫宪法。

三、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

四、解放军是十亿人民的子弟，我们绝不能自相残杀。

五、我们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六、立即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

公民们、同胞们、亲爱的同学们，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以一切强有力的、合法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决死抗争。

部分国家机关干部

1989年5月19日

据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透露，起草完《告人民书》后，社经所随即“兵分三路”：第一路，陈小平将《告人民书》带往广场，向绝食学生通报（通报时自称“体改委工作人员”）；第二路，由王捷、严勇将《告人民书》带往北大油印传单（落款“北大传单”）；第三路，由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陈子华的丈夫于国禄等携带《告人民书》“赶赴社经所下属的科仪印刷厂安

排铅印，第二天由王军涛、刘刚等运送到广场上散发”（落款“部分国家机关干部”）。

5月20日凌晨，北高联、对话团和外高联共同发布的“改绝食为静坐”的文告，明确提出反对号召“工人罢工”。同时《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将陈子明社经所《告人民书》印成《〈人民日报〉号外》时，也删去了其中号召“实行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教、罢市”的内容。

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子明随机应变的能力，已经轻易地把《告人民书》转嫁给了“三所一会”。5月22日，杨尚昆在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的党组成员谈话时指出：

“最近，有4个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冒充《人民日报》印发‘号外’，把紫阳同志讲的一些话基本都透露出去了，里边有很多谣言。”

5月20日凌晨，有人在北大附近的居民小区宣读了“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把居民从睡梦中惊醒。清晨，在天安门广场及北京一些闹市区又出现“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

传单称，“由于少数高层领导坚持并扩大已有的决策失误，对这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镇压措施，中国目前已面临真正的社会大动乱和民族分裂的危险，处于历史的紧急关头。”“李鹏5月19日晚上的讲话恣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漠视各界人士的呼吁，排斥赵紫阳总书记5月4日以来的一系列正确讲话的精神，严重恶化了局势，致使社会面临动乱。”“值此非常时刻，我们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和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行使宪法和党章赋予的权力，对时局进行干预。”

5月20日上午9：00，陈一谘拜访了鲍彤。二人随即对政局展开了愤怒的宣泄。鲍彤“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刚毅的脸上充满了正气和义愤”。陈一谘回忆道：

“见我来了，他就说：‘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唯一合理的方针。把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成‘动乱’，把广大的学生当成敌人，还有没有一点人的良知？而且，又一次非法地推翻了合法的总书记！戒严？！和人民对抗，和人心对抗，会有什么好结果呢？这是困兽犹斗！’我插了一句：‘也许会狗急跳墙呢？！’”

“鲍彤激动地站起来说：‘我真想挂一个《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牌子，到天安门广场和学生们一起绝食、抗议！学生明明是爱国的，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李鹏非说是动乱，是非混淆到如此地步，还大言不惭地宣布戒严，真是没有天理了！’我说：‘老鲍，不要激动。李鹏这个人，无德无才无识无能，但在搞阴谋勾当上的确有一手。李鹏肆无忌惮地要搞掉赵紫阳，背后一定有一个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啊。’”

“鲍彤说：‘我们党就是让这样的人搞坏的。李鹏从小就不学无术，一心想爬上高位。’我说：‘我听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的朋友，讲了很多李鹏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鲍彤说：‘李鹏和朱琳那些丑事，要让老百姓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啊，太丢人了！’”

图7-18：陈一谔（左）、鲍彤（选自《陈一谔回忆录》）

鲍彤事后承认，他当时的确说了不少李鹏的“坏话”：

“我说，现在一提官倒，就是公司，一提公司，就提小平同志和紫阳同志的孩子在公司里工作，好像别的同志的孩子没有在公司里工作似的。我听说李鹏同志的孩子也在公司工作，而且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人，被扣到派出所里。我说，学生说紫阳打高尔夫球，李鹏同志也游泳呀！听说总后为他修了休息室，很豪华，据说花了一百万块钱。我还说，别的同志，外事活动都不带夫人，只有李鹏同志带夫人，听说有一次她在外国宾馆里丢了一件不值钱的首饰，还跟对方交涉，后来找到了，其实是赝品……陈一谔走后，我非常后悔，生怕陈把这些闲言碎语捅出去。我就要高山同志（他当时并不在场，

我找他只是因为他知道体改所的地址），立即专程来找陈，告诉陈，千万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仅给我招麻烦，还可能给紫阳同志添麻烦（这事其实与紫阳同志毫无关系），我要高山传这些话，不是从政治上的影响和后果出发，而是怕他给我惹事。”

看看进入务实阶段，陈一谔随即通报了昨日发布的“三所一会”《声明》。鲍彤说：“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当然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合法权利。”

但据一份罗干掌握的材料称，在这次陈鲍会见中，鲍彤还对陈一谔说，“体改委、体改所是改革的中坚力量，要保护这批力量。我认为，从现在起，大家不要再以体改所的名义闹腾了，绝不要再以四个单位发表什么宣言之类的东西了。这对大家都不好。以后，不要依靠上边获得消息了，主要通过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关系去获得。”

当陈一谔谈到“当务之急是怎样尽量避免流血”时，鲍彤说：

“流血恐怕难以避免了。如果民众进一步发动起来，李鹏就会陷入汪洋大海之中，也许能防止事态的恶化。”

鲍彤的估计并非畅想。就在前一天（19日）的下午，城东的呼家楼发生军车被堵事件。人们向军人讲述北京的事态，解释学生的要求和主张，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到广场去，不能镇压学生。

同时，在距离鲍彤家很近的城西公主坟解放军总后大院门口，也有50辆车牌“V”字打头的吉普车、卡车、雷达指挥车组成的车队受阻。卡车上装载着钢丝床、桌椅、煤炭、柴火、大米等。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曾目睹了现场状况：

“这时有人说，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我看了看手表，凌晨3：00。我立即下楼骑车沿西长安街西行，奔向

公主坟方向。只见沿途群众情绪激昂，有人演说，有人喊口号，对李鹏、杨尚昆、邓小平、王震等骂声不绝。一辆辆卡车满载学生自西向东呼啸而过，可能是到广场去壮大学生队伍。一辆辆卡车满载着市民自东向西飞驰，据说是去堵截军队。车上的人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

“几百辆摩托车集结成长长的队伍向西驰去，不久又从西边驰回，既威武又壮观，这是市民摩托队，是为学生壮威和通风报信的。”

“在公主坟，环岛周围 果然停有大量军车。这些军车被成千上万的人围住。在每辆车跟前，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有的为战士念《科技日报》上报道学生绝食的文章，有的和战士谈话，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有的向战士讲述党内腐败现象……用过去战争年代的话来说，这些人是在‘策反’。有一位战士还听得流下了眼泪。多数战士不说话。一位上尉走下车来和群众握手，说：‘我们心里明白。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干出对不起人民的事。’群众热烈鼓掌。”

在与公主坟一站之隔的六里桥，还出现附近的居民给又渴又饿的士兵送食品的情况。他们把食品交给维持秩序的学生，由学生送到战士手里，战士和学生你推我让，使围观的群众感动得直掉眼泪。

图7-19：戒严部队受阻（选自香港《明报》）

在19日当晚，北京军区大校副部长张元发奉命为即将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疏导群众，解救赴军事博物馆执行紧急任务的某集团军部队。不料，刚刚来到五棵松就被学生“戒”了“严”：

“晚9：00，飞驰的小车，开到五棵松，人山人海的学生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设了纠察线，拉上拦阻绳，把部队围堵在五棵松至公主坟一线。我们的小车（因挂白牌）也被阻拦，既不让右转弯，也不让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已经被剥夺了穿军衣的自由……”

“9：30，各路口交通指挥台上的交通警察，全被带红、白袖章的学生‘接管了’，长长的车龙互相堵塞，你要向南他硬叫你向西，你要向东他硬要你向北，你要进他硬要你后退。只要是顺路，不管什么车，他们都可以‘搭乘’，都可以‘借用’。行人要过马路，绕行他的纠察线。一锤定音，当时的交通一片混乱。”

“（晚）12：00左右，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已经结束。可是，北京军区政委、上将刘振华及许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和部长，还被围困在301医院附近的4辆面包车里，不能到会。我们与学生多次交涉，他们硬是蛮横地干预将军们参加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事后还造谣说：‘北京军区的首长拒绝参加大会。’”

很显然，在李鹏“戒严令”发布之前，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自发的“反戒严”运动已经在悄然展开。军头们虽然不是有意“旷会”，但半推半就的嫌疑还是有的。

图7-20：北京不需要在枪口下生活（选自64memo.com）

显然，戒严的消息一旦泄露，戒严成功实施的难度已大幅度提升。此时，消息的泄露，就成为了一个“万人敌”的武器。陈一谔当时认为，鲍彤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他思忖，李鹏的讲话毕竟代表中央，直接针对李鹏的抨击未必明智；不留回旋余地的公开对抗不一定有好结果。但回到所里，在所员们的群情激荡面前，他又决定从众：

“大家讨论决定，搞四份传单：一是《李鹏其人》，揭露李鹏一贯反对改革、制造阴谋、品德恶劣的真面目；二是《紧急告全国同胞书》，指出当前国家面临着改革还是倒退、光明还是黑暗两种前途；三是《敦请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案》，要求人大常委会立即组织调查当前事件的真相；四是《紧急呼吁人大常委会提出弹劾李鹏案》，要求人大常委会对欺上压下的李鹏进行弹劾。”

据罗干提供给李鹏的材料称，《李鹏其人》还指称李鹏“在这次学潮中的险恶用心，目的是当总书记”。会议还决定，通过高干子女做军队高级将领的工作，通过他们力争取消戒严令。

陈一谔回忆，这四份文告，“用不同的名义散发了出去”。智囊们的想法与动作，与赵紫阳的真意未必一致。他不愿当“胡耀邦第二”，就不想与学运扯上什么关系。

第二节 复食

据官方统计，自4月17日至5月19日，全国有近80个城市，500余所高校的153万人次上街游行。但5月19日比17、18日高潮的两天，估计人数减少一半以上。在北京，东西长安街部分时间能够通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参加游行的队伍中，外地院校来京的学生增多。国家机关、北京市机关以及文化界、科技界、新闻界、知识界的游行队伍明显减少。工人成分在增加。

工人队伍中有首钢模具厂、电车二厂、北京床单厂、北京剧装厂、北京服装五厂、丰台机务段、国营七〇〇厂、北京电影字幕厂、北京包装装备厂、北京革制品厂、南苑仪表厂等。但每支队伍人数都不多，最多的有千人以上，但大多数都是几十人或上百人。游行队伍中政治性口号也有减少。

据《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5月19日日记：

“首都各界声援绝食请愿学生的游行和声明、谈话有增无已，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万里同加总督会谈时也指出：学生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行动。朱学范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议。叶笃正、吴大琨、林兰英等12位人大常委紧急呼吁：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真诚吁请学生停止绝食，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党委会紧急会议，研讨当前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

图7-21： 万里称学运是爱国行动

今天《人民日报》2版除了几则戈尔巴乔夫活动的新闻外，绝大部份篇幅是各界继续呼吁的新闻，有全国工商联的，农工民主党的，致公党的，台盟的，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的，中国作协的，新闻界的，还有包括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纽约苹果电视台、华盛顿华府新闻报、洛杉矶论坛报在内的海内外19家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人联名致赵紫阳和李鹏的信。文艺界名人陈荒煤、冯牧、吴雪、周巍峙、丁峤、周海婴，杨宪益、张汀，黄苗子、唐达成等，社会科学界名人丁伟志、胡绳、任继愈、俞平伯、吕淑湘、李泽厚、冯至、刘再复、贺麟等，也分别联名呼吁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尽快与学生对话，接受学生的合理要求，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民主性质，同时也劝学生停止绝食，回校复课。

这一天的上午，曾有几辆满载警察、打着声援旗帜的卡车从长安街由东向西驶过天安门，引起了广场学生的阵阵欢呼。

上午9：30，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出现署名“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传单——《首都工人宣言》。其中写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24小时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条要求，否则，我们将从5月20日上午12：00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而在学生方面，天安门广场上出现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对话团和外地进京院校学生联合会四大组织并立的局面。绝食、静坐和声援学生缺乏统一的指挥，广场秩序混乱。特别是外地进京学生的大举涌入，令他们的食品、饮料、住宿工具比北京高校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有的学生因领不到食品，干脆宣布绝食。

据称，19日整整一个上午，绝食团指挥部都在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议。“撤”与“不撤”？继续“绝食”还是“静坐”？继续绝食将以何种方式结

束？这些问题不仅开始在学运领袖的脑海里反复翻腾，也在代表们的讨论中紧张展开。绝食团领导层在认识上也发生严重的分歧。

显然，在“绝食”的参加者和发动者那里，此时的问题已经不在于进一步动员支持与参加者，进一步对政府施压并争取运动成果，而是怎样才能够让这场运动尽量保持已有的成果，并使参加者全身而退？这自然也是“绝食”的最早提出者，“长胡子”的郑义此时最为纠结的问题。：

“每次学生头头去征求绝食同学意见，询问是否可以停止绝食，都被严辞拒绝。18日之前，有一晚看来停止绝食的意见在指挥部占了多数，但无法实施。绝食者怀疑有人要出卖来之不易的斗争成果，加之政府的不理睬，激起了他们以死相拼的绝望情绪……甚至有许多人宣布：指挥部如擅自宣布停止绝食，他们立即自杀！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以死相拼的情绪，每小时都在蔓延，加剧。共同绝食一百余小时的情谊又使三千人抱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死团：只要有一个人不复食，他们就全体坚持下去……每每是劝的人与被劝的人一起抱头痛哭……”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解决危机的主动权在中共党魁手里。”于是，郑义决定“打破运动中始终坚持的不与上层接触的理想主义原则，尽快与十年改革的推动者邓小平接触”“以期他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但是，找朋友请邓朴方传话，邓朴方已经找不到了。他又决定联络赵紫阳。但在此之前，他要取得学生方面的承诺：

“问身边几位知识界朋友：能否迅速与赵联络上？——能。好！我立即找到广场指挥部，叫出李录。据我接触，他是学生领袖中较成熟、较有政治头脑的。蹲在指挥部广播车下，我代表知识界谈了与赵达成妥协的意见：给赵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他对学运表个说得过去的态度，给我们一分，以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李录立即表示赞同。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无非想推进改革，如果最后的结局是天下大乱，人民遭殃，我们就成了

历史的罪人！……我严肃地问：你的意见能代表指挥部吗？他疲惫不堪有气无力挥一下手：能。……”

“傍晚，回信有了：未能联系上——赵紫阳、胡启立已下台！”

虽然郑义的这一努力付之东流，但其他方面的努力却取得了进展。根据现有资料，最终造成广场绝食学生先于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改绝食为静坐”的力量，根据时间先后，大致可以理出四条线索：

其一、统战部的通报与部分学生的率先复食；

其二、“三所一会”《关于时局六点声明》及其与赵紫阳凌晨讲话的综合考虑；

其三、匿名人士的消息；

其四、知识界后援会的劝说与帮助。

（一）统战部的通报与部分学生的率先复食；

据中央民族学院学生刘燕回忆，5月19日下午2：00，她与吾尔开希来到统战部。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见到了阎明复。阎明复令他们在“当天下午3：00以前”就知道了当晚要戒严的消息。当时，吾尔开希决定留在统战部，由刘燕回广场，通知所有能叫到的学生领袖都到统战部来。刘燕立即坐救护车回到广场，通过“绝食团的广播站”，找到了程真、马少方。据马少方回忆：

“当时程真和我还有北师大萨韬同学，正在国旗下默默绝水。理由就是：如果要死，我们先死。毕竟绝食进入第七天，每隔10来秒就响起的救护车的嘶鸣，真的令人非常绝望。在程真强烈要求兑现诺言的情况下，我就同意和她及萨韬不事声张默默开始绝食绝水了。刘燕找到我们，让我和程真立即停止绝水，和她立即去统战部见阎明复。我和程真就上了刘燕的车，去统战部了。”

在统战部，阎明复对他们进行了“非常诚恳”的劝导，刘燕回忆道：

“他主要说给改革派一个机会，今天晚上有这么一个行动，你们到底是想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还是你们想失掉这次主动权？这时程真和马少方他们已经宣布停止绝食，开始复食。当时开始喝水了。”

这时，吾尔开希披露了他们先前从残疾人联合会那里得来的消息，并追问阎明复：“是不是要坦克进城，机枪平射”。阎明复回答他说：“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大家的安危”。其后还有一句话，给马少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之后，陆续来到统战部的有梁二、沈彤、郑旭光、王志新、甄颂育、王正云、赵刚、项小吉、陈伟、徐兆良等人。

“到那儿之后大家一起跟阎明复谈。大家情绪特别高，好像就觉得我们既然作了这个决定之后，回去应该能够说服柴玲、李录，还有封从德，让大家一起复食。这时下午可能5：00多的时候，……在这里属于绝食团的人全部同意停止绝食，开始复食。阎明复就让他们食堂做了一大锅面条，我们所有的人在统战部吃了第一顿。那一顿面条特别香，大家记得特别清楚。”

据梁二回忆，马少方当时还即兴创作了一篇《复食书》，写得慷慨激昂。“读给阎首长听，阎首长好像感动得呜咽不语。”

据沈彤回忆，他到达统战部的时候，面条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开始宣布复食了，气氛开始比较活跃。那时，”沈彤说道：

“知道戒严的事情反而感到轻松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大家很高兴，互相签字，又有一种诀别的情绪，在每个人领襟上都签了字……照相啊什么，开希踢碎了三个暖壶。”

“就在这时开希突然宣布成立广场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全局。我问这总指挥部干什么？开希就说我当总指挥。我说具体怎么和绝食团协调呢？开希说我当总指挥。我说下一步成立总指挥部怎么组织撤离呢？开希说我当总指挥。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况下大家高高兴兴地去广场，边走边在路上说一定要停止绝食，最担心绝食团不同意。实际上我要说双方担心的是一个问題。当时共识同时就产生了。”

马少方的回忆与上述其他人交代的情节稍有不同。但他证明，其时，柴玲本人也到场，但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说：

“后来，在马晓力 的安排下，由王苏波 指导，我将那篇文《复食书》改成了《停止绝食的声明》。当时除了李录之外的相当一部分广场活跃学生都被开希接到统战部（其时，阎明复已经离开，留下陶斯亮在参与），召开了关于停止绝食撤出广场的会议。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参会的绝食同学，就在这个会议结束后在陶斯亮安排下，喝了杯牛奶。但在大家纷纷离开统战部回广场的时候，柴玲突然说了句：这个决议能不能生效，还需要广场全体绝食同学通过才行。陶斯亮听完这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开希就立马安排人去买大喇叭，但终究没有实现，而是柴玲掌控的绝食团宣传车，亦即绝食团指挥车，宣布了改绝食为静坐的决定。所以这里说的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出来。”

晚7：00统战部派了三辆面包车加一辆救护车，将所有学生送回广场。当吾尔开希要说服绝食团其他几位指挥的时候，他被告知，绝食团已经表决完毕，“改绝食为静坐”。

那么，在统战部部分学生复食的同时，在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改绝食为静坐”决议的产生呢？这里就要讲到第二条线索：

（二）“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及其与赵紫阳凌晨讲话的综合考虑；

据李录回忆，由于5月14日对话的失败，运动突然变得方向模糊不清，原计划15日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能够结束的绝食，到底还要进行多久也成了学生领袖必须考虑的问题。当时他想：“既然同学把生命交出来愿意参加绝食，我们就没有多少权力去要求他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做，这个决定应由他们自己作出。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则被大家通过认可的。但是我说我们在这里通过任何事情，除了保障生命不算，组织原则不算，其他关于政策的原则都希望得到每位同学的认可之后才能够认定。……同时当时讨论了一种方案，在我们无法确定如何停止绝食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绝食人数第一不要再增加，第二一旦身体不适立刻就送往医院，送往医院后不准再回来，这样绝食会有一个自然的结束。这个想法在15、16、17日3天之中一直是开始结束绝食的一个办法。”

“到了16日结束之后，通过和政府谈判这种方式来结束绝食，就已经不是主流了。……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后来又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就是通过自然结束绝食的方式，我们也不需要政府支持。因为受到15日游行的鼓舞，在15日下午我已经基本上有了这种想法，就是这个绝食的原始目的达到了，它充分动员了北京市的各个层面，我想他们本身也可能继续支持学生的诉求，那么只要我们体面地结束绝食，以师出有理的方式来结束，也就可以了。所以当时的方法，就是同学晕倒，直到最后一位晕倒为止，我们就胜利地宣告绝食的结束，而且非常地悲壮。这样的结果也不错。”

“这是第二种方案。这第二种方案，到16日之后，也基本上破产了。由于外地学生的加入，由于15日、16日的大游行，由于各界的人士，白梦讲了，叫‘名人博览会’，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又破产了。”

“16日再次表决时，突然发觉绝食人数已经到了3144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希望已经彻底破产了。到了17日、18日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通过哪种方式能够结束。因为当时非常担心，在这中间会出现生命的问

题。同时也在考虑，运动以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推向下一步。这个方法到了17日，基本上没有形成太多的进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天气预报的打扰”

“从16日开始已经有各个重要的人，当然是自称重要的，来自赵紫阳办公室，李鹏办公室。我想这有可能跟超华说到的对话失败有关系，在那儿得不到成果的话，就派人直接到广场来与我们商量。我所接待的人已不计其数了，辨不清真假，得到的总体印象是政府有可能采取激烈的立场，同时他们内部有重大的分歧。所以得到的结论是非常矛盾。有些人坚决主张要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有些人主张立刻退出。值得提一下的是19日 晚上一个什么代表，总之按陈一谔的说法是他们派出总代表送来了所谓的‘六点声明’。这‘六点声明’说得极其露骨，而且这些机构大家都有所闻，至少我是很清楚的。情况已经变得很危急了，而正在这个时候，很危急但又没形成很一致的办法。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希望得到他们具体的建议，那个人就回去了，说回去带更重要的人来，后来一直也没有来。”

“第二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觉得赵紫阳无能为力。和那天晚上刚刚收到的‘六点声明’联合在一起，使得我们对党内斗争开始有了比较深切的体验，至少是对我个人来说。我开始寻找第三种结束绝食方法时已经开始涉及到对党内斗争的考虑。”

“联系到赵紫阳的讲话，联系到‘六点声明’，我脑子里已经对结束绝食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学生运动决不能成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和工具，学生这个时候必须要立刻停止绝食，同时设法把学生撤出这场斗争中，这场斗争无疑已被作为一定的筹码了……”

柴玲的回忆，也证实了赵紫阳凌晨讲话对广场学生的警醒：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和李鹏来广场。……在指挥部的同学到达时他们已经走掉了。有个同学说有一个感觉：赵紫阳失势了。然后我们组织了一批稿子，播赵紫阳和李鹏对同学们的探望。李鹏、赵紫阳的稿子都是车上的同

学写。因为当时有两个广播站之间的问题，赵紫阳的稿子中途被另一个广播站截走了，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我们只好重新去调查，然后再重新写，同时也知道了一些其他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赵紫阳已经失势，第二个就是包括体改委一大批人都要受牵连，第三个就是部队就要进城，关于绝食的问题怎么办？”

据李录回忆：

“当时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决定至少把这件事广播出去，让同学们自己来决定，至少让所有的同学都知道这件事。记得第二天早上我们开着车绕场走了一圈到二圈，反正广播了十几次关于前一天晚上这一次见面的全部内容，详细的报道。”

19日中午以后，陈明远对绝食团指挥部的来访，使指挥们对形势的认识更加清醒，并促成了一次营地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反对复食的人实际上是围绕绝食圈的将近20人，而不是绝食者本身。

（三）匿名人士的消息；

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称，“据国家全部掌握的消息：傍晚5：00许，广场绝食指挥部内部有人传出，一位自称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刚拿着一张条子来广场通报，说北京市区即将实行戒严，不知此消息是否属实？此后，广场上平静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据张伯笠和李录回忆，在19日中午，确有几位知识分子陆续往绝食团指挥部送来消息。张伯笠跟随其中一人走后，“中间又来了一些人，是军区的军人，还有一个是昨天送声明的人。他们谈到军人已经开始在北京四周出现了，而且是穿军装的，……印象深的是大兵压境了。”

在这些来访的人士当中，大概有一位就是老木。在巴黎会议上，老木是这样说的：

“那天下午，大概是5月19日下午2：00多钟，来了一个朋友，带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最机密的一个消息。当时我们进去要找学生领袖，就去找了北高联，北高联派出两个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谁。最后密谈半天他们说作不了决定，我们说你们真正的领袖是谁？他们说真正的领袖不在，都在统战部对话。……到了绝食团的广播车里，我当时的印象就是柴玲坐在里面，张伯笠坐在里面。……我进去了就直接说这消息。我说今天晚上军队可能进城，而且是戒严。当时我记得柴玲是非常慌张，（柴玲：不对吧。）然后就喊，赶快叫人来开会……我当时的印象觉得你们完全没有准备，就这么一个状态，对军队要进城全无心理准备，非常慌张。”

老木的这个“非常慌张”的描述，与《真相》中国安全部得到的讯息倒是非常相似，只是时间上有些出入。

那么，复食的决议，究竟是怎样作出的呢？这就要谈到李录前述，张伯笠的去向。请继续往下看。

（四）首都知识界后援会的劝说与帮助。

据北京市委办公厅编印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5月19日上午，就在“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名字出现在广场以后不久，“10：00许，北大50余名党员教职工登上天安门东观礼台，声称绝食，并打出横幅，上书‘誓与学生共存亡’。”而早在此前的5月16日，一个由大学教师、知识界、新闻界人士组成的“知识界后援会”已经成立，并以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前的场地作为聚会地点，还附设了一张办公桌。而那个困扰政府、市民和绝食者本身的“绝食”行动结束的关键一步，就是在这里走出的。

图7-22：5月16日“知识界后援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设立办公地点。
图中从左至右：于浩成、李洪林、苏炜（陈小雅摄）

据张伯笠回忆：

“当时绝食已进行到了第七天。这天下午大概4：00，我不知道柴玲去哪儿了。封从德……那天住院。李录我们俩正在那坐着，商量事呢，就来了一个人。有两个知识分子找我，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必须去，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我就被他们搀到那儿，拽着，跑得非常快，我已经跑不动了。到那以后我发现几乎有五十多个知识分子。他们就说：‘张伯笠，你来了，非常好。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今天晚上12：00就要宣布戒严了。我们的意见，同学们绝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生命已经有危险。而且我们应该主动地复食，使政府没有进京的机会。’……当时我考虑以后，说：‘我同意，但是我要回去做工作。首先我要把指挥部这几个人的工作做通，然后我才能开会。你们马上起草复食宣言。你们要起草得有理有据。我们复食并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改换一种斗争方式。’大概已经下午6：00了。我回到指挥车的时候就跟李录首先把这个问题谈了，李录当时同意我的观点。然后我又跟柴玲把这问题谈了，柴玲也同意我的观点。我当时非常奇怪，他们是非常快地同意了我的观点。然后主持会议的这个责任就放在我的身上了。就是一个大客车，调纠察队把大客车包围起来。当时我告诉纠察队：别让吾尔开希进来……围上以后，我就讲了这情况，没有讲戒严，没有暴露这个戒严，就讲，我们同学已经绝食6天了，生命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再绝食下去，要死人。我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我希望复食。然后我又指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是事先串联好了的，有清华大学的代表，有北大的杨涛。说完大家投票。通知了二百多人，173票赞成，28票反对，7票弃权。”

“这个决定作出来以后，吾尔开希就闯进来了……说：‘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时候我们已经做出决定了。我说：‘好，吾尔开希来了。你不是绝食团的领导，你只能代表一票’，我说你可以投。他问是什么事？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出决定，就是准备复食。吾尔开希当时就举手说：‘我同意。’”

散会后，郑义就把已经起草好的复食宣言交给了张伯笠。张伯笠交给了柴玲，请她主持今天的复食。在复食之前，李录负责安排，把绝食队伍安顿在指挥车的四周，李录主持了会议，柴玲宣布了复食。据张伯笠回忆：

“宣布完复食，底下就炸了。当时那种情况非常可怕。说你们出卖了我们绝食的同学。（柴玲插：只有一部分人这么讲。）但是声音很大。我非常清楚。李录站到车上边去了，拿着麦克风说：‘大家静下来！’可是这个车已经被推得晃了，就要推翻了。……这个时候封从德闯了进来，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决定？你们是出卖学生运动，出卖绝食。’他非常激动，然后就抢麦克风，说：‘同学们，刚才那个决定是无效的。’（柴玲插：他没有抢成。）

“他说‘我现在建议重新开会。各个高校代表请到高校指挥车下边集合。’柴玲就跟他吵起来了，柴玲就哭了，我记得柴玲嚎啕大哭。然后李录在那也不吭气。”

封从德刚刚从医院归队。原来，前一天，他因痉挛被送进医院，从医院传回的消息说，他因为疲劳过度，极度脱水，大脑皮层萎缩。当时医生忠告前往探望的柴玲和其他人，“你们要注意你们的心脏，你们的心脏状况跟他的一样，可以猝死。”此时，柴玲看见丈夫从医院出来后性情大变，伤心地以为他真的已经“大脑皮层萎缩了”。这场混战的结局，据张伯笠回忆：

“我到车上以后，……就告诉北大那个管麦克风的人说：‘你掐断’。他就把它掐断了，声音就出不去了。然后我就说：‘封从德，你是副总指挥，是常委。我们刚才做的那个决定，你说我们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那么你符合民主程序呢？因为我们，柴玲，包括郭海峰，这是常委多数，我们开会研究过。那么你今天没有经过我们这些常委开会就自己在这儿决定，你首先违反了民主程序。……他走了。’

图7-23： 5月19日晚上的文化知识界后援团联络处，左一为徐刚（陈小雅摄）

那时，笔者刚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知识界后援会”得到“学生刚刚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刚好翻越隔离墩进入广场北部。听到这辆车里传出争吵的声音，我随即踏上了敞开着车门的指挥车。没想到，这成了我整个运动以来唯一一次侧身学运核心地带的机会，而且成了这一关键事件决策部分过程的见证人。当时，我清楚地看见了一男一女扭作一团在抢话筒。女方抱着话筒几乎趴到了指挥车的过道上，嘴里不停地说：“你真逗！你真逗！”我感觉女方说话有点儿戏，但不解男方为何怒气冲天！“权力斗争？”的传闻迅速飘过了我的大脑皮层。看见靠驾驶座的这边还坐着一个人，并不劝架，我判断没什么大事。此时，因外面有人推得车身晃动，我感觉站立不稳，于是退到车下。我下来后没走多远，（大约5米左右），只见男方气咻咻地从车上下来，摔手而去。从这个情节判断，张伯笠事后所说“那现在我就提议罢免你副总指挥的职务。”我说大家都在，可以投票。我记得柴玲、李录、郭海峰当时都举了手。封从德就把麦克风一摔说，我不用你们罢免，我辞职”的“罢免”过程，是没有时间进行的。

出走的封从德，后来进行了一场结果与指挥部完全不同的“表决”。封从德事后解释道，他担心指挥部这样的非程序行为，会失去它的民意基础。他与李录分歧主要有四：首先，要不要坚持民主程序。他更相信“重大决策须由全体直接投票”，而他认为李录相对较有集权的趋向。其次，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相对而言，他更坚持民主是目的，而李录则将民主视作手段。第三，是否介入政治运作。他认为学运不应该、也不能够追求短期的政治功效。但他认为李录的认识与行动，实际上已经显露，要以学生运动作为一股力量，参与到中国社会的政治运作中。第四，他认为，此前“五四”周勇军擅自宣布复课，对全国都是一个打击。而这样非正常形成的低潮并不会将学运降温带入校园民主的境界，反而强力反弹，导致非程序的绝食，从而形成学运的失控局面，个人大于组织，组织出现分裂，加上极度扩大的场面，再

要组织好就难了。他不愿意这样的恶梦再次发生，而他认为李录对这些曲折体会不深。事后，王超华在“学运之声”广播站也报道了还有很多同学在坚持绝食，劝大家“一定要坚守”，“要和这些同学在一起”。但不久之后，她就被几个医生模样的人强制“拉去医院，而且第二天早晨不让回来”。情报部长辛苦得到的消息也是，指挥部在没有与绝食参加者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宣布复食，令广场上的绝食同学对指挥部宣布复食非常不满。

但这些努力并未影响复食的进程。上风，依然在复食静坐者一边。

“当时的复食就针对戒严，让你没有借口戒严。当时有几个知识分子在身边就给我们充当秘书，反正你要起草什么，立刻就给你拿出来。……当时我们的复食宣言中有重要的一条是说：19日凌晨赵紫阳总书记到广场看望了同学。我们的复食表面上没有针对戒严，因为我们假装不知道戒严，但是我们复食是跟赵紫阳到广场上来有关系。”

在央视记者的迅速配合下，学生复食的新闻，抢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召开前45分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李录回忆道：

“无论如何，复食的决议终于作出……小封一走我立刻就跟柴玲，海峰到了北面接受十几个记者的采访，包括中央电视台。对着记者再次宣布绝食结束，还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当时我们的决议我记得很清楚：由绝食改静坐，静观当天晚上的发展。首先当天晚上这些人不必进监狱，这是当时最大的考虑。而且一旦发生混乱，如何保证这些人回到学校去，然后如何开始吃饭，怎么在发生冲击时不至于被踩死等等，考虑的都是这些问题。那是惊心动魄的一晚……。”

5月19日当晚，柴玲宣布了复食的决定。《复食宣言》是郑义、赵瑜和张伯笠三人起草的。9：15，张伯笠在“学运之声”又进行了复播。据他事后回忆：

“然后是邵江，那个挺黑的大个儿，他说很重要，赶快到历史博物馆前面去。那儿有一个热线电话，立刻传给中央。”

“他们3个人架着我到那去。我看见当时有新华社两个记者和人民日报一个记者。我把电话拿起来就接到了国务院值班办公室，就是值班，每天接我们的消息。我说：‘现在我们宣布复食。’‘为什么复食？’我就把整个复食书、复食宣言向他们读了一遍。我说你可以记录。他说，‘我不用记录，我有录音。’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职务？’我说‘我叫张伯笠，是绝食团副总指挥。’……”

为了对绝食团的决定形成配合，北高联、对话团和外高联联合发布了《北京高校学生组织的“四点建议”》。建议说：

（一）北京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已取得巨大成果，唤醒了全国人民。历史和人民已经对这次学运的爱国民主性质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对话的大门已经敞开。

（二）鉴于目前的形势，为了将这次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更深入更持久地进行下去，我们建议将绝食活动改为静坐。如果绝食的同学继续绝食，我们将继续声援他们。我们的斗争目标绝不放弃。

（三）这次学生运动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和这次学潮问题。

（四）我们呼吁全国各界人士配合北京高校学生维护秩序。为稳定社会秩序，中小學生不要上街游行，外地学生不要进京，工人不要罢工。

这个建议明确提出“工人不要罢工”，显见其起草时已经读到社经所的《告人民书》。

“学运之声”广播站还播出了，“决定成立义勇军特别纠察队。请参加者今晚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的通知。

据沈彤回忆，5月19日夜里，对话代表团也举行了一次会议。当时的对话团总部已经从距离广场较近的艺术学院撤回政法大学，由政法大学对话代表团秘书处和社科院的一位主谈代表主持这个会议，做了大量对广场的支持工作，包括杨尚昆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内容的披露，都是从这一系统出来，由北大印的。

项小吉在5月20日离开北京，对话代表团基本上解体。

第三节 戒严令

19日夜，当李鹏、杨尚昆还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上振振有词，按照秘书们根据过时信息编写的文稿，用杀气腾腾或冷不丁出现的怀柔语调，按部就班地进行节奏可疑的宣讲时，他们似乎根本没有得到广场学生已发生重大策略变更的消息。

晚12：00，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华灯柱上设置的高音喇叭全部开启，反复播送李鹏、杨尚昆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摘要，全场沸腾。他们万万没料到，这次放送迎来的不是预计中的紧张和庄严，而是绝食已经六天七夜的学生再一次情感激动的声浪比赛。当日凌晨，绝食团指挥部的广播车开上了生命线。在1：40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张伯笠痛哭流涕，情急之中口误，宣布“二十万人大绝食”，经李录提醒，改为“大静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反复播放了军队即将进城，北京将要戒严的消息。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的广播站播送道：

“据可靠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已经下台，李鹏已经主持政治局全面工作。今天晚上，中央决定出动军队进京戒严。同学们，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快到天安门广场去，到各个主要交通路口阻拦军车去。”

一些学生和居住在校区里的教师、职工以及附近的市民，都走上街头，议论纷纷，不少学生和群众向一些部队可能经过的路口涌去，并设置路障。据闻，有几位老头、老太太在街上发现了瓦斯车，他们一面跪在车前说，你们不能进广场伤害学生，一面回去叫人。于是，一批年轻人赶来，把车胎扎了。

鉴于广场传出20万人大绝食、大静坐的消息，李鹏感到形势有“恶化”的迹象，经他和杨尚昆、乔石商定，将原定于5月21日0：00执行的戒严，提前到5月20日上午10：00开始。

5月20日上午9：30，由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发布。命令称：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同时发布的还有，由北京市长陈希同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2、3号令。

其中，《第1号》称：

根据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为迅速制止社会动乱，维护首都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社会生活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发布此令：

（一）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

（二）在戒严期间，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他聚众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动；

（三）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联、讲演、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

（四）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严禁冲击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严禁破坏重要公共设施，严禁打、砸、抢、烧等一切破坏活动；

（五）严禁骚扰各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

（六）在戒严期间，发生上述应予严禁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值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以上各项，望全体市民遵照执行。

关于外国人的规定有：

在戒严期间，外国人不许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

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第2号》是对于外国人的规定：

为了执行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发布此令：（一）外国人必须遵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李鹏总理签署的戒严令所发布的各项命令；

（二）在戒严期间，外国人不准介入中国公民违法戒严令的活动；

（三）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第3号》是关于中外记者采访的规定：

（一）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挑唆、煽动性宣传报道；

（二）未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不得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像等活动；

（三）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指挥部也发布了《告北京市市民书》，全文如下：

1989年5月20日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令，派部队到北京部分地区协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执行戒严任务。为使戒严部队能够顺利履行职责，现就有关问题向首都人民通告如下：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根据宪法履行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是我军的神圣义务。部队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爱国学生的。

（二）戒严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受到一些阻挡。部队从大局出发，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广大人民群众也从各方面给予了配合。目前，首都的秩序仍然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交通中断，某些商品供应短缺，治安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人民群众深感不安和忧虑。戒严部队必须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我们有责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扭转这种局面。对于少数搞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我们将根据法律，按照首都人民包括爱国学生的意愿，采

取坚决措施予以处置。希望广大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充分理解，并予以大力支持和协助。

（三）广大人民群众关于惩治“官倒”，反对腐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要求。人民解放军给予坚决的支持。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正是为了创造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环境。我们相信党和政府会代表人民的意志，采取有力措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四）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将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并在部队中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教育，发扬我军勤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反对任何有损军民之间鱼水感情的言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相信，首都人民和青年学生，一定能够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顾全大局，进一步采取理智和克制的态度，支持部队完成戒严任务，尽快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

1989年5月20日

与此同时，在更早的时间内接到调兵命令的部队，正分头向北京开进。
《中国“六四”真相》记载：

驻扎在武汉空降15军的34旅、44旅，分别从开封、广水开进；

驻扎在河南开封的20军的58师、60师，分别从许昌、登封开进；

驻扎在河北承德的24军的70师、坦克1师，分别从河北滦平、天津蓟县开进；

驻扎在山东莱阳的26军的137师，从胶县开进；

驻扎在河北石家庄的27军的79师、80师、81师，分别从邢台、获鹿、邯郸开进；

驻扎在山西临汾的28军的82师、85师，分别从洪洞、集宁开进；

驻扎在河北保定的38军的112师、113师、坦克第6师、炮兵旅，分别从保定、新城、满城等开进；

驻扎在辽宁营口的39军的115师、116师，分别从盖县、新城开进；

驻扎在辽宁锦州的40军的118师、119师分别从义县、锦州开进；

驻扎在河南新乡的54军的127师，从安阳开进；

驻扎在山西太原的63军的188师，从山西忻州开进；

驻扎在河北张家口的65军的193师，从宣化开进；

驻扎在淄博的67军的199师，从邹平开进。

这些部队，分属于北京、沈阳、济南三大军区的12个集团军和中国空军，总计近20万人。

至此，邓小平1989年的“用兵”过程正式登上了第二个梯级。被赋予了“合法性”的军事行动已如开弓之箭。然而，它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却面临严重考验。不久的事态将证明，公众对“戒严令”的一系列条文都置若罔闻。

图7-24：全民截兵（选自64memo.com）

第四节 全民“截”兵

据后来担任捣毁天安门广场北高联指挥部任务的27军副政委回忆：

“在这20多天里，对我们来说，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斗。我们当时在老山，说老山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个地方比老山还要特殊。特殊就特殊在祖国的首都，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既有生死的考验，也有政治上的考验，而且斗争的性质，更主要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太复杂了。这些天经历了三个浪潮，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复杂。”

“第一个浪头是我们从驻地向北京开进。我们感到时间太紧迫了，部队来不及动员，准备工作非常仓促。18日晚，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到北京来执行紧急任务，守卫首都的重要目标，维护首都的秩序。我们感到是非常特殊的政治任务。从胡耀邦逝世起，我们就十分关注报纸和电台，对舆论上某些导向，我们指战员还是有所警惕的。特别是我们军的领导，感到有一场风云要来……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急！”

“接到‘紧急命令’后，我们马上开会，统一思想。因为好几年没有复员，去年有大批老兵都复员了，剩下的几乎都是新兵。为了应付，我们打乱了全军建制临时调集，有许多干部都不认识自己的兵。280名战士休假迅速招回，279名官兵把临时来的家属送走，365名干部战士推迟了婚期。已经买到车票准备探亲的干部战士，通知他们不休假。病房的干部战士听说有任务赶回营房。”

“仅用6个小时，全部准备就绪。

19日上午8：00多钟，执行任务的部队就开始启程，向北京慢慢地开进……我们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非常保密。家在石家庄的干部晚上都没敢回家……可是外面很快就知道了。到了保定就被拦住了。后来才知道，是赵紫

阳身边的人把这样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人家。北京学生打电话到河北保定，保定学生出动拦劫，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环节上起了作用，北京的高自联来电话指示：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走吧！那么就走吧！但走了一会儿又不让走了。

说是高自联又来了一个电话，说刚才那个电话是错误的……哗！一下又拦住了。”

“拦住了600多人……双方谈判，一直谈到20日的下午……后撤行不行呢？他们说后撤可以，一直把你们送回石家庄。好吧，你送就送吧！……这样，我们的部队又取道保定以西，到了徐水一带，又有4个青年在道上拦住……我一看，这4个人气色不大对，搞不好又要打电话，通报情况，又要堵车。我就说，下车，找个地方吃饭，确实也没吃饭。结果把那4个人甩了。以后我告诉先头部队，这个地方不能停留，赶快走。所以搞得大家措手不及。——这是第一个浪头。”

“19日夜里，机械化部队到了丰台、大兴一带。这时，部队来不及宿营，临时找不到住的地方。20日，部队第一次进城，就接到命令，要我们紧急向市区开进……来不及开会，只能电话联系，结果在开进途中，遭到部分青年的围困。”

“我们一个高炮旅旅长，带了300多人，一下子到了八宝山，在那里停了一下，刚开始很好的，才过了半个小时，哗——！成千上万的人上来了。我们被堵在了八宝山和八角村之间的一段青年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垃圾桶、自行车，真是层层障碍、种种阻拦，使部队无法前进，更谈不上执行什么戒严任务。”

“从20日上午8：00，一直到21日18：00，整整被围困了30多个小时……白天是烈日蒸烤，晚上是冷风袭人。没有饭吃，饭送不上来。在下面，我们有一千多斤的干粮：馒头、包子、饼子，送不上来。后来只能用救护车，

让一些战士假装虚脱了，用送病号的名义把干粮送进来。我们的士兵也下来找些吃的，到饭店里，一根冰棒从三角五角卖到二元三元；早晨早餐卖油条什么的啊，六元钱！有个青年推着汽水车来卖给我们。结果他哥哥紧赶过来，把他大骂一通：‘谁要你把这拉来卖的？还不如送给大学生呢！’一些厂子里的工人告诉我们战士，他们厂里有锅炉，水开了，可以去打。我们的士兵三三两两地可以去打水，人多了不让你出去，还得给他请个假，说‘打开水’……”

5月20日凌晨，向北京城开进的军队被普通市民拦截在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路口。人们将一切可以放倒的东西横在马路中间。被当做路障的有公共汽车、马路上的铁栅栏、木头。在一些干道上，隔栏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条马路被封死。有的人干脆就坐在军车前面。北京市委的宣传材料称，围堵的群众中，有的用砖石砸碎汽车玻璃，有的扎坏汽车轮胎，有的把汽车掀翻，有的甚至投掷石块、酒瓶，袭击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围堵军车的群众，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则2万余人……

图7-25：部队被阻于北京市郊区（选自64memo.com）

9：40，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播出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

上午10：00左右，五架军用直升飞机沿长安街飞进广场，在上空盘旋。大学生用高音喇叭对天空高喊：“直升飞机，请说明来意！直升飞机，请说明来意！”

在20日一天中，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共飞行了10余次，每次1—5架不等。它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合成集团军的新成员——“陆军航空兵”。据新闻媒体事后的报道，戒严令“下达当天，陆军航空兵即以戒严部队空中突击队的英姿，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散发宣传单，教育群众，震慑坏人。”在整个戒严期间，“出动直升机数十架，往来飞行数百架次，侦察联络，运送伤员，补给军需，确保戒严部队顺利执行任务。”

图7-26：5月20日，直升机飞抵广场（选自64memo.com）

5月20日下午，北京的几所重点高校，也被直升机驾临，并投放了印有戒严令的传单。为此，北大“环境中心”在三角地发布了“公告”：

“‘请同学们注意，最近有一稀有珍禽——大鹏鸟，在北大校园拉屎数枚，万望大家小心！’公告后附有漫画一张。”

鉴于戒严令三令五申：“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在天安门广场的许多学生都写了遗书。一群白衣战士高举小旗，上书：“今晚自此光荣！”一位记者的遗书上：“我儿宁宁……”赫然在目。

北京市民为广场的同学送水送粮，并送来了数以十万计的防催泪弹物品——口罩、湿毛巾、湿手绢等。

5月20日晚11：00，在劲松东口，五辆28路汽车横卧在马路上，大学生敢死队的同学站在汽车顶上进行宣传，数千名群众屏息静听，并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学生们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时，人们异口同声地高呼：“我们不走！”当学生们说：“请市民来几名代表”时，几位青年毫不犹豫地爬上车顶，并向群众介绍了自己。大家同声高唱《国际歌》。……当日，地面公共交通全部瘫痪，地铁于10：00左右停止运营。下午，有万余人聚集丰台解放军总后勤部西仓库北门，并用火点着了传达室。

李鹏5月20日日记也证实：

“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主力被困在八宝山，南面被围在南苑，东面困在通县，北面困在太平庄。”

“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2000余人。……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据工程师吕克相回忆，这列“唯一成功”到达北京站的军列，是经过各方精心策划和安排，在保密工作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得以瞒过沿途群众，开进北京的。

按照上级确定的方案，他们在京包线扣下一辆开往大同的货车，截下30个车斗，进行了“紧急整备和技术检查”，“避开电器化铁路的接触网”，把车辆开到装载地点。

事后，据该炮兵师官兵回忆，5月20日，当他们接到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时，“部队在农场插秧”。他们洗净脚上的田土后，又登上了这辆“刚刚卸完煤的敞篷火车里”。

“在装载和运行中，为了保证安全、迅速、保密地完成这次任务，我们会同铁路采取了非常运输措施。为了抢时间，列车不起货票，不挂守车，不派运转车长。为了安全，进行紧急安全教育，发放了电器化铁路安全乘车知识，为了保密，不编军用车次，控制知情范围。”

“3：25，代号‘平24’次列车满载雄赳赳、气昂昂的进京戒严部队官兵，从沙城出发。途中一路绿灯，风驰电掣般地从钢铁大道向北京奔驰，于6：13胜利到达北京站。”

但是，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火车司机突然拉响了汽笛，鸣笛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站台上的群众和学生以及周围的市民闻讯赶到“平24”停靠的站台，团团围住了各节车厢：

“大学生们泪流满面，向士兵介绍‘动乱’的真相及北京市民对学生的支持，一些解放军的眼圈发红了。学生们把全市人民赠送给自己的烟、食品送上列车，还为战士们送去了热气腾腾的大米粥。有许多同志提来清水，将湿毛巾递送给战士，请他们擦脸。据一位乘警介绍，战士们只知道是来执勤的。”

据《人民日报》记者目击，这辆运兵车至少到当日下午2：00仍没有得到疏散：

“有位记者告，他下午2：00在北京火车站6号月台，看到一列满载士兵的军车，共14节车厢，约1200人。……月台上挤满前来堵军车的大学生和市民。大学生向士兵介绍北京情况，给士兵送水。北京市民举的一个标语牌写着：‘49年解放军进京，我们夹道欢迎；89年解放军进京，让你寸步难行。’铁路员工很支持学生，他们密切配合，维持秩序，火车进出站正常。”

最后，这趟列车上的官兵终于没有能在北京站下车，而是被整体运到了丰台。据北京市委得到的情报，截止晚6：35，北京站内外仍有2万人围堵。同时，又有一辆9175次军列，刚过沙河火车站，即被三四千名学生包围。

此后的10多天里，炮兵师长陈明义“和战士们一起和衣睡在待修的火车厢里，吃一样的盒饭……”

在“反戒严”的宣传活动中，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发挥了骨干作用。据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负责人常劲回忆：

“20日戒严以后接到各个地方来的电话，各处的群众已经开始堵军车，而且要求北大增援。北大就由纠察部组织堵军车。在21日就开始确定各个军队的位置，我们得到了一张图，知道了军队的确切位置就安排堵截军车。北大还重新整理组织，把宣传部、秘书处、联络部、纠察部、财物后勤都重新整理了一遍。当时为了加强宣传，专门成立了宣传班子，有专门的一套人马每天写传单，同时派出宣传部在北京市的各个角落进行堵截军车、反对戒严的宣传。”

这条信息于21日当天被安全部报往中南海。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王德邦回忆，戒严以后，他们收到在前线阻挡军车的市民告急，曾前往各郊区支援：

“北师大成立了以十人左右为一组的‘和平敢死队’，分赴京郊各地了解军队进城情况，联合市民设法阻止军队进城。……为了掌握情况，我随一组去了南郊的新发地。在那里，市民利用军队进城路不熟而问路的机会，将军车全部带入了一条死胡同，并在后退的路上阻上小车杂物，一些老人就地坐在军车后。这样，使得军车进无可进，退无可退……”

当他们赶到时，已是中午。当地居民在自己家做饭送给学生吃，但他们却请居民送给军人。面对变化了的情况，部队采取了就坡下驴的策略：

“大学生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吃就吃吧。吃完了，喝完了咱们再说。”

但有良心的军人向群众承诺，他们绝不会向学生开枪。

5月20日，10：00戒严令宣布后，在北京街头，仍有6、7万人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游行。凡经过新华门的游行队伍几乎都叫喊“李鹏下台”的口号。在新华门前，有二百多名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静坐。他们的标语上写着：“政府已自绝于人民，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斗争到底。”一名学生站在平板车上拿着手提喇叭进行讲演，‘根据国际惯例，戒严令下达24小时未发生效力，政府就会倒台——现在，我们已经坚持了三十多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显示了人民的力量。’”长安街上有许多政法大学宣讲团的学生，他们边讲边向市民散发传单。一张传单上写着，“昨晚，当局居然调来了大批装甲车和军队。请问，这是想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毒手吗？我们怎么办？起来，亲爱的市民们！起来，共和国的公民们！用我们的良知、鲜血，甚至生命保卫共和国、保卫人民、保卫党、保卫自由、保卫人权！保卫法治。”

在人大大会堂东侧，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演说：“民可载舟，也可覆舟。我们老百姓把他们翻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做着“覆舟”的姿势。几百名听众鼓掌，欢呼。

有人在演说中称现政府是“伪政府”、“李鹏一小撮政治阴谋家”。广场上出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巨幅横标：“强烈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非常会议敦促李鹏辞职、邓小平、杨尚昆引退，解救危难学生、稳定政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打出的巨幅横标是：“政府已经走向历史反面！”“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20日午后，作家郑义将原“绝食团指挥部”有四个大喇叭的指挥车开上了长安街，展开了凌厉的宣传攻势：

“……李鹏、杨尚昆等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擅自宣布戒严令，调动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了从催泪瓦斯到坦克、武装直升机的现代化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他们撤销了赵紫阳总书记的职务，发动了一场反党反改革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他们的反革命行径，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数十万大军被人民成功地阻挡在北京城外，未能进入北京一步！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严峻时刻，我们号召一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市民团结起来，保卫爱国民主运动已取得的胜利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的首都北京！”

这份题为《告全市人民书》的文告，由郑义起草，仅二、三百字，辞句铿锵。这辆标有“绝食团指挥部”大字的指挥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出，上长安街后，沿西单路口—宣武门—前门—崇文门—东单—天安门的路线，缓缓而行。车后“紧随着上千自行车和步行者”，形成了一支特别的游行队伍。

据北明回忆，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的郑义，“不仅决定行车路线，而且以飞快的速度撰写广播稿，言辞简短，极富号召力”。他们把广播车开到前门东大街时，故意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口停下，播送了这篇《告全市人民书》。

下午，举着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汽车厂的送水队伍，各有几百人骑着自行车向天安门方向行进。他们边走边呼喊：“反对戒严！打倒李鹏！”的

口号。在电报大楼，一些妇女在议论。她们说，“本来群众中对学生绝食造成的混乱秩序有些烦了，可是李鹏讲话后，大家的情绪又转向了学生。”

5月21日，北师大教师刘晓波、高新再次登上绝食团广播车，并把它开到公主坟一带。沿途由曾当过专业播音员的高新播发稿件。北高联宣传部长马少方同行。

“5月21日下午，部队接到暂缓进城，在郊区集结休整的命令。但围堵的人又不让你回来。我们有一个工兵团，有一百来人，在大兴黄村一带，最后被赶到一个厂子里去，然后把大门关起来。几个学生守在门前，光席子，一个枕头，睡在马路上，也够难为他们的……我们找到了这支部队，说回来吧！我那天换了便衣，汽车也不得不挂上地方的牌子，老远就得停下来，过关口时还得把两个指头伸出来，但我们还是被看出来了……通过交涉，我们还是把部队接了回来。”

担任清场任务的27军奉命暂停前进。但被派遣占领“重要警卫目标”的部队却必需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据驻扎在京东通县39军的一位中校团长回忆：5月20日上午10：00，该部队接到师长命令，进驻人民日报社。摩托车队刚开出营房即被当地居民围住。

闯过此关后，又在朝阳区大北窑一带“被潮水般涌来的上万名市民学生团团围住，动弹不得。”他们想方设法摆脱困境退回营房。最后选择了以292医院为“前进基地”，避开大道走小道、穿农田，两步到位的方案。到了出发的时间，借用的“五副地方车牌照迟迟未到”，结果，不得不让“217名官兵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物资”，“身穿花衬衣、牛仔裤、新潮服”，乘坐没有车牌的大轿车闯北京。当车来到北关桥路口时，他们跟在蔬菜运输车的后面，“伸食指、中指作V字手势，探出脑袋摇旗呐喊，嚷成一片”，才算蒙混过关。

图7-27：所有人都打出V手势（选自64memo.com）

到达292医院后，这支部队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潜入市区。围堵群众在实践中也总结出识别便衣军人的经验，凡见到穿军裤军鞋、头发被军帽压倒的人，必要像“相女婿”一样围之，上下打量，审问鉴定，直到拉开长裤看里面是否穿着军短裤。到广播大厦执勤的战士董振军被发现后，被关入地铁站，在黑暗的遂道里摸索了三天两夜，才到达指定地点。某部专业军士程志仕在被发现后，假装上厕所，先是靠翻越厕所护窗得以突围；差点被追上后，又钻入垃圾桶藏身才最终逃脱。

随着军人渗入的加剧，“反戒严”战线也由北京的五环、四环，向三环、二环逼近，呈现出一幅向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地带坍塌的趋势。但是，这势必卷进更多的北京市民：

21日凌晨，1000多学生、群众冲进地铁太平湖总站，用砖头堵住铁道。2000多人堵住南苑机场，运油车队被拦截在外，汽油供应一度告急。宣武门、德胜门、崇文门、大北窑、吴家厂、八王坟、五棵松、广渠门、农展馆、天桥、六里桥、郎家园、东直门、东大桥、苹果园、红庙、十里堡、明光村、霞光街、亮果厂、紫竹院、三元桥、打磨厂、右安门、长安街、东单、天宁寺、莲花池等28个路口被堵。据《科技日报》记者报道：

5月21日9：50，六里桥空军招待所院外聚集着数百名群众，院内一、二十米远停放着许多大客车，车上约坐着一个营的武警战士。

有一个班的武警战士排着队要从小门出来上厕所，人群里有人喊：“不能出去！等上一班的回来了再去。”一位班长喊出了口令，战士们齐刷刷地向后转，往回走。大学生高举话筒喊道：“谢谢你们的理解。”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车下，一位40多岁的女教师和一名战士交谈，她说：“你们不要把枪口对准无辜的学生，大学生们是爱国的。”那位战士向周围看了看后低声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请放心，我把枪口向上，朝天上放。”

一辆军车的驾驶室玻璃前，出现了一个硬纸板做的标语牌——全民“截”兵。军人中一位连长走了过去，看过牌子就要撕。人群中传来了恳切的话语：“请不要撕。你这是在撕人民的心呀！”连长答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他沉思片刻，将牌子交给了站在自己不远的一位老者。

图7-28：军队受阻情况示意图（选自64memo.com）

在丰台、劲松、六里桥、车道沟等地，都发生了学生和群众向被围困的解放军战士进行宣讲的情况：

“在车道沟，一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人对解放军大声叫喊：‘戒严令宣布一昼夜了，北京城并没有戒严，戒严令自动失效了。你们看到了吧，你们听到了吧，现在到底是谁在给谁戒严。’……在被堵的军车面前，不时有群众和学生挥着‘掉转枪口’、‘全民截兵’、‘人民热爱子弟兵’、‘军民一家人’等标语。一些大学生领唱，接着由群众跟着为解放军战士歌唱《血染的风采》：‘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据《中国“六四”真相》：5月21日下午3：00许，在新华门至天安门广场一带，发现一张广为散发的传单，传单上写着：“昨晚三〇九医院附近，从石景山方向来的两车解放军和一车防暴警察被拦住，此为65军。立水桥军队与学生发生冲突，少数人受伤，两名女学生被送往五〇二医院。原在清河附近的600名军人受阻后回去。在香格里拉饭店附近阻拦军车的群众、学生与士兵举行联欢。昨晚，清华大学西门，学生与市民阻止了军队向市区推进。”在前门，一名学生用高音喇叭向过往行人发布说，“绝食的学生中已有一名女学生于19日死亡，还有一名男学生于20日死亡。”他还说，“现在已经有一批解放军便衣混入北京城和天安门广场，要广大市民千万提高警惕。”傍晚时分，天安门广场人数激增。好多学生和群众说，部队总是在黑暗中行动，所以，我们要来保卫天安门，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约7：15分，一支写着“北京市民敢死队”横幅的队伍进入广场。

下午近4：00，天坛西门传出部队准备在此空降的消息，天坛、先农坛、工人体育场大门立即被汽车堵住。

在反戒严的行列里，北京市民除了自发的堵截军外，还“滚雪球”似地“滚”出了一些颇具规模的声援专业队伍。例如，5月21日上午，仅二、三百人的“市民自治会”自行车游行队伍，到下午5：00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已有上千人。由北京市民中占改革的先机、“先富起来的”部分个体户青年的私人摩托车组成的“飞虎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被政府称为“社会渣滓”的人，队伍雄壮，啸聚成群，忽来忽去，传递着各处出现的最新情况，也仗着民运的声誉干一些抢劫汽油的勾当。其规模最大时达到三、四百辆摩托车。戒严部队对这批人尤其看不顺眼：

“有些‘飞虎队’轰隆隆地就来了，打着旗子，后面还带着个女的。他们来了，进行一些言语侮辱。看到一个胖一点的干部，就说：‘哗！这是邓小平的儿子’，‘那是杨尚昆的女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的战士始终保持克制状态。”

图7-29：由市民组成的“飞虎队”（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5月21日，一位北京大学女生骑自行车6小时转遍了北京西边的半个城市，本意是对这座美丽城市的宁静生活作最后的告别，没想到，却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感动：

“21日下午，曾骑车到市郊‘参观’夜间被堵在那里、静坐于阳光之下的士兵。北大的宣传工作真是做得神速。堵在那里的50多辆军车，几乎每辆上面都有几张传单和《人民日报》的影印件。（有一段时间，报纸的报道相当客观，可能也因此引起全国的反政府风潮），那些士兵几天没听新闻，对北京的事情几乎一概不知。而且，他们是被以演习和拍电影等名目骗到北京来的……每隔几辆车，就有大学生拿了小喇叭对他们做宣传工作，数百上千

的市民以掌声表现他们对学生的热烈拥护。对了，那天我还见到我们系的那位小有名气的年轻教师站在面包车上做宣传呢。”

“那天下午，几辆冲到前面的车辆回撤的情况是最令人兴奋、激动的。士兵们全部摘下军帽，微笑着向沿路的市民挥手致意。所有的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整条街都有一种胜利的气氛。”

“我还眼见了一次市民如何堵军警的。几辆装军警的车刚在一个十字路口露面，行人和骑车的迅速朝路口跑去，不到两分钟，路口就被几百人牢牢堵住。双方僵持十几分钟后，军警无奈掉头。多好的市民！”

“所有的路口都被公共汽车、建筑材料、垃圾桶堵上，几百、上千市民外加少数大学生彻夜守在那里。越接近天安门的路口，人越多。长安街上，一整夜都是人流不断。广场四周则是比肩接踵，快达到挥汗如雨的地步。……学生纠察队和工人敢死队的车四处奔忙，向人们报告各地的情况。好一座不夜城！”

“北京，那一夜最美。不仅因为华丽的街灯；几百万人对她的挚爱给这座城市罩上最美的光环。从来没有哪一个黎明像那样使我怦然心动，她的和平、宁静、和纯情是人民用了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不眠换来的。6小时的劳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西三环路上奔驰的我，心中只有愉快。”

5月22日，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曾在五棵松看见一批被堵截的军车：

“路经公主坟，这里的军车都退到301医院和一所中学里去了。在301医院门口有学生站岗。里面有60多辆车，车号是‘V04’打头，分别停放在东西两边。战士有的坐在地上打扑克，有的聊天。”

看见一名上尉，杨继绳明知故问：

“为什么不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回答是“等上级命令。”

“大概什么时候进城？”杨继绳又作出打探军事机密的的样子。那上尉也跟他玩起了幽默：

“你不如找学生打听，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一位是学生头儿。”

上尉指的是不远处一位穿粉红上衣的女生。而那位女生果然告诉记者，看来这几天部队不会进城。38军军长就住在医院里。不知这位女生从何处得来如此“机密”消息。这一天晚上，38军某师的“前指”的确在此召开了会议。

同日，“奉命保卫首都重要部门”，乔装潜入新华社的24名戒严部队官兵却被关进了大礼堂。他们被安排住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虽然大门紧闭，但不少人从礼堂侧门拥进去，质问当兵的，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穿便衣？大家齐声呼喊“反对军管”的口号。

5月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则通告，也反映了军队行进的艰辛。这份文告称：

“极少数不明身份的人……他们阻拦、抢劫车辆，扭打军人，非法设立哨卡、对行人搜身，检查身份证。更有一伙摩托车队，在街道上横冲直撞，严重地危及了市民的人身安全”。为此，通告严令：

“交通警察应严守岗位，尽职尽责。其他人员不得擅自设岗设卡，扰乱交通指挥。当前有些人阻拦车辆，强行检查，设置障碍，必须立即停止。”

另一份由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的《第一号紧急通告》称：

“极少数人制造谣言，恶意丑化、攻击戒严部队，用及其恶劣的手段，挑拨人民群众和戒严部队之间的关系，煽动一些人堵砸军车、抢夺武器，殴打干部战士，盘查、围攻军人，阻拦戒严部队的行动……”

该通告警告：

“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

显然，他们正是遭到了反戒严群众关于“行动时间、方式和着装”方面的质疑，同时这些“行动时间、方式和着装”也令戒严部队产生了困扰，指挥部才会作出如此详尽的自我辩护。

在另一方面，李鹏的“戒严令”明显地改变了北京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保守的生活方式。

“（20日）入夜，十里长街满是人民群众，各种车辆穿梭在市区主要街道上，维持秩序的市民和学生，认真负责。人们还用各种物件设置了八卦阵似的路障。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大学生准备了口罩和浸湿了的毛巾。据估计，广场总人数最多时达百万之众。”

当晚，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田学样也见证了这样的场面：

“晚饭后，长安街和广场的人比前两天要少一些，只有几十万人。晚10：00，……各方支持学生的队伍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排着整齐的队伍开进了广场。一队‘市民抗暴团’雄赳赳地开进来了，人们一阵欢呼。一位‘工人敢死队’队员拍着脑袋说：‘我已经写好了遗书，不准备活着回去。’传说戒严令必须在24小时内发生效力。所以人们认为，昨晚没进城的部队，今晚一定会强行进来，因此各种‘敢死队’、‘纠察队’准备进行拼死搏斗。”

而当黎明来临，“人们齐心协力，迅速清除路障，恢复了交通”，有工作的人仍然继续去上班。

据统计，5月21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整个白天约有10万人，晚7：00以后增至30多万人。

在“反戒严”运动中，新闻媒体也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此事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据李鹏5月19日日记，邓小平指示：

“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但新闻界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对此进行了抵制：

首先是新华社，在是否刊登李鹏5月19日讲话和戒严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总编辑要登，一批编辑、记者不让登。最后印刷厂的工人说：‘没有人手换版。’结果没有登出。”

据北京大学一位女生当时写给朋友的信：

“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部驻进军队。天津电台一天早晨曾如此播音：‘各位听众，请你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早晨没有新闻。’然后就停止播音。”

“20日，‘李总理’刚刚发布戒严令，新华社300名记者打着标语就出来游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电台工作人员说：‘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这叫什么事情。’……今天《人民日报》的记者打着标语，喊着：‘人民军队，不是家丁；共产党员，不是家奴。’又出来游行了，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24日首都知识界大游行，中央电视台那些为亿万人民熟知的播音员也走出来。”“几天前，先是中央电台忽然播了一条‘首都人民生活安定，交通事故比往年有所下降’的消息……”

“前天的新闻，发了一个‘士兵’语意双关的话：‘这饥饿、寒冷和渴，我们都受得了，这气我们可受不了。’”

据中央电视台传出的消息，广电部长艾知生有一次从中南海开会回来，对电视台的人讲话：“这几天，社会上有大动乱，我们电视台有小动乱。你们不要以为我要下台了。告诉你们，邓小平、李鹏下不了台，我艾知生就下不了台！”

5月20日下午，中央成立了“宣传小组”，成员有丁关根、王忍之、袁木、何东昌、曾建徽、王维澄，由李鹏直接领导。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对小组提出的要求是，“重点抓好《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四大新闻单位，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还说，“在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对动乱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在戒严期间，必要时，中央可派代表进驻《人民日报》，加强新闻监督。”

5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简讯：

“本台消息，国务院宣布昨天上午10点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来，天安门广场和主要街道上仍然聚集着学生、工人、市民。至今早6点发稿时止，解放军没有进入市区。”

据消息人士称，这条简讯播发的背后，是一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史以来内部的最大冲突。他们说：“昨天李鹏发布在京实行戒严令以后，进京部队由于市民和学生耐心说服劝阻到今天早晨未进入市区。本台记者编辑对这一历史事实给予极大关注，经过全面深入的采访和对目前形势的客观冷静的分析，决定编发一条简讯，安排在6：30新闻中播出。但是这一决定受到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的粗暴干涉，简讯稿被强行销毁，并且还硬性要求播出湖北、上海等领导人认真学习李鹏讲话的反面稿，对此，当时在场的记者、编辑表示了自己强烈的愤慨和抗议，但在上级领导的高压下，含泪发出了违反民意、违反新闻真实报道的节目胶带。但责任编辑没有放弃最后的机会，在节目的最后30秒，发出了这一60个字的简讯，尽管节目重播被撤除，但她毕竟传出了良心和正义的抗争。”

这一天《人民日报》开辟的《北京戒严第X日》，则是在“戒严令”的禁锢下开创的“戒严新闻”的新形式。它一直沿用到“六四”清场光荣牺牲为止。

《北京戒严第一天》全文如下：

本报北京5月20日4：30讯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发布第一天，首都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

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大学生仍在和平静坐。白天，大街上游行队伍不断；夜晚，广场附近，东西长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道口满是市民。

《科技日报》的记者集体采写的《人间自有真情在——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遭到报社领导否决后，被记者送给首都知识界自办的《新闻快讯》发表。

5月21日，北高联、工自联和前“绝食团”联合发表《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院总理李鹏，罢免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与人民为敌的现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全国人大“应组织特别法庭，依法公审”有关当事人。

《声明》“反对军管，呼吁北京市民抵制军队进城”。《声明》承诺：“如果军队进城，我们首都工人将同全市人民一道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绝食八天的几千名学生。同时也呼吁绝食同学迅速停止绝食”，“我们将以天安门广场为战场，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大学生及其他绝食者和静坐者；我们将以我们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墙”。

《声明》还呼吁军队“全体官兵调转枪口，对准这几个暴君。我们的原则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是保护人民的。”

《声明》不承认国务院总理签发的“戒严令”。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款并没有规定国务院可以授权北京市政府停止北京市公民行使言论、游行、示威等宪法给予的权利。”为此，《声明》“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这个戒严令”。

在天安门广场散发的传单中，还有一份署名“首都知识界300余人”的《紧急呼吁人大常委会提出弹劾李鹏案》：“鉴于目前的局势，只有李鹏下台，才足以平民愤，拯救国家、民族的灾难。为此，我们紧急呼吁人大常委

会委员，在国家民族危难之秋，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弹劾李鹏，以解国忧。”

图7-30：反戒严游行队伍经过北京饭店（选自香港《明报》月刊）

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党委紧急扩大会议，发出致北京市委并即呈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报告，吁请“以爱护党，爱护人民的赤诚之心”“立即撤回从外地调到北京的军队，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和事态不可设想的恶化”。

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一张署名为“北大英语系教师朱荔”的“退党声明”，声明称，“我郑重宣布退出由邓小平、李鹏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强奸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意愿，违背了我入党时的信仰和愿望，我决定退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受部队要进驻高校的流言影响，各高校也纷纷在学校周围的路口设置路障和检查站，查验过往车辆；各高校门口，都设立了由学生自己组织的门岗，查验进校门人员的证件。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学生自治组织的广播站，昼夜不停地发布有关戒严的消息，转播“美国之音”。据《中国“六四”真相》，在北京各个高校，广播或传播的流言主要有：

“万里、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支持学生运动”，徐向前说，“谁向老百姓开枪，我把谁枪毙！”“本来今天凌晨2：00戒严部队要行动，由于老帅和邓大姐都反对，行动未成”；“万里从加拿大来电，称李鹏讲话不符合宪法”；“上海市政府已声明脱离现政府，10个省市已响应”；“中办一位副主任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说，你们再坚持两天，等万里回来和赵紫阳一起，打倒邓小平和李鹏”；晋钢工人给中央下了一个通令，内容是如果24小时内不答覆学生的两条要求，22万工人就要罢工，上街声援学生”等等。

不论制造和散布这些流言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反映的是学生和广大民众的希望。但在客观上，它使人们的恐惧感得以稀释，也是戒严走出最坏结果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为了不使政府获得镇压口实，学生在西单、王府井这些繁华地段派出了纠察队，防止游行队伍进入，有人趁火打劫、给学运栽赃。

22日，作家郑义和赵瑜组织了戒严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

23日下午，北京爆发了戒严以来规模最大的“百万人大游行”：

“在西单附近的长安街上，三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并行（过去的队伍是一支，两旁是旁观者，今天满街都是游行队伍）。靠北边的一支是汽车队伍。今天游行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撤销戒严令，恢复首都正常生活；李鹏下台，以平民愤；李鹏丧钟已经敲响；罢免李鹏；打倒李鹏，全国安宁；公审李鹏，人民必胜；石油工人一声吼，流氓李鹏抖三抖——石油勘察院；李鹏是动乱之源；拥护赵紫阳……

游行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下午4：00左右，突然乌云压顶，雷声大作，大雨如注。人人被淋成落汤鸡，标语口号七零八落。队伍有些凌乱，但没有人离开队伍避雨。

在北京的得闲 队伍中，几位年轻教师扶着一位白发昂首挺胸的老教授，冒着大雨阔步前进，使人想起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的形象。

在雷雨中，所有的口号变成了一个口号：‘李鹏，下台！’一部分人喊‘李鹏’，一部分人喊‘下台’！成千上万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压倒了雷雨声。

雷雨稍停。在人大会堂北斗的长安街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一辆汽车上高举一幅李鹏投降的漫画，并且一边敲起大鼓一边齐声高喊：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他妈的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李鹏，而是李鹏怕人民。

在南开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按着步伐的节奏齐声喊：

周总理，在哪里？你的儿子不讲理，

邓妈妈，少讲话，快把儿子领回家：

再给三个大嘴巴，叭，叭，叭！

……‘邓妈妈，少讲话’是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今天发表的公开信，要求学生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学生对这封信不满意。喊最后的‘叭，叭，叭！’时，脚步声也同时‘叭，叭，叭！’地响，口号声和脚步声共鸣，有很强烈的效果。”

游行队伍中，还有人编了一个对话《给李鹏打分》：

领：去掉一个最高分——

众：251分

领：去掉一个最低分——

众：249分

领：李鹏得分——

众：250分

对于北京市民的这些反戒严活动，有关外电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今天（20日），100多万学生和工人公开反对政府，无视戒严令拥到大街上。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拦着配备冲锋枪的军队不让进城。”“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数十万群众，人们担心人民解放军会从地道冲进广场，工人们把垃圾车开到广场上，堵住地道出口。”（合众国际社）

“（21日）数以千计的市民在市区周围用公共汽车和卡车设起路障。在首都郊区的公路上，大批的军队被市民阻住无法前进。”“一位驱车从东城去西城穿过北京的西方公民说，他经过了30多个分别由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守卫着的路障。”为防止军队便衣混进城区，人们还在沿路设置了检查站。对进城车辆进行检查。（路透社）

“支持学生的工人和市民，一到晚上就涌向广场周围，据认为，抵抗军队的阵势在整个市区有200万人以上。”（共同社）

“（22日，）黎明前北京的大街上挤满市民，是为了保卫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免遭他们害怕发生的军事攻击。”（美联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一个军事家，一个统帅眼里，一个拥有现代武器和作战知识的现代军队面前，在几十万大军层层包围圈中，这些居民用肉体、自行车、汽车、垃圾桶构筑的层层障碍、密密工事，就犹如辛勤蚂蚁的搬山筑穴、渺小蜘蛛的拉丝布网。企图以此与数十万大军对峙，不能不说像是一场玩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去嘲笑这些蚂蚁，轻视这些蜘蛛。它们的辛勤、执着，表达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一种不可辱的尊严。尽管这是蝼蚁般的意志和尊严，但是它确实挡住了滚滚的铁甲，它让人民流泪，让士兵流泪，让将军流泪，让神明为之惊叹！

有一首题为《有没有脑袋都一样——北京戒严有感》的打油诗，反映了北京民众此时的心情：

菜篮子是您抓的

鸽子窝 是您关怀的

闷罐车是您提供的

就这脑袋是咱自己的 眼睛您又给蒙上了

耳朵您又给堵上了

嘴巴您又给缝上了

手脚您又给捆上了

咱百姓还剩下什么

动弹不了一无所有

可您还说咱动乱了

干脆

这脑袋也给您了吧

有没有脑袋都一样。

围堵军车的全民行动造成了交通的不便，戒严的气氛也带来了居民的恐慌。

这一天，行人中很多都拎着或用自行车带着一大袋一大袋的蔬菜、食品，有人成箱成筐地买。

在商店，据北京最大的两家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和西单菜市场经理反映，由于运输不畅，原订的元白菜、西红柿、黄瓜、茄子等都没有运进来，20日的营业额分别比19日少2万3千元、1万9千元，而猪肉、副食等销售又比昨天上升了25%、33%，两家柜台上的肉鸡都已断货，外面的货运不进来。在崇文门菜市场，上午进了十几种蔬菜，往常够卖两天的，可上午很快就被抢购光了。售货员说，排长队买菜就跟过春节时那样。此外，该菜市场一上午食

盐就卖掉1200多公斤，是原来10天的销售量。其他如猪肉、酱油、醋等生活必需品都有这种状况。不少顾客说，“多买点菜，主要是怕戒严后菜进不来。”

据《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发回的报道：

“今天（21日），来自美国东部，中西部各州及加州的30余所大学的留学生4千多人，聚集在华盛顿杜邦广场，中午时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留美学者学生联谊会联合会’横幅为先导，沿宾夕法尼亚大街向中国大使馆前进。在使馆门前，示威者高呼：‘中国要民主！’‘不准枪口对人民！’‘顺从民意，李鹏下台！’等口号，并散发《致万里委员长》、《致全国同胞书》。记者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留美学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台湾、香港留学生也参加了。

在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等20多所大学的留学生，也于21日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爱国运动。”

显然，一天来，“戒严令”使本来后劲不足的民运得到激励，其目标更集中、对立情绪越加尖锐：北京乃至全国各大城市出现目标更为明确的反对浪潮，把矛头更多地对准李鹏、杨尚昆和邓小平，老百姓对中央最高层的态度前所未有地鲜明，波及海外。据称，在当天各地报送中南海的材料中，除了“反对戒严”、“反对军管”、“撤出军队，取消戒严令”等标语口号外，大量的的是针对李鹏和邓小平的。

继4月28日李鹏举家从万寿路搬进中南海之后，5月21日，在李鹏“从工作大局出发”的劝告下，杨尚昆也从自己的柳荫街住地搬进中南海。从5月19日起，中南海和中央领导人住地的安全保卫得到了明显加强。在“元老们的住宅，警力都比原先加强一倍，都架设了轻机枪，备放了扎车胎的带刺钢板。中南海的新华门内侧沿南海和瀛台一带都部署了部队。”赵紫阳依然住在中南海里。他的一举一动也皆在保卫和监视之中。

兵贵神速。但5月21日，杨尚昆决定让受阻部队原地休整三天，理由是戒严部队进驻目标的计划失败，部队需要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这不排除他想运用这个压力向邓小平讨价还价。

依照分工，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

5月20日，在北京的卢沟桥乡大井村发生了“反戒严”运动中的第一次“流血事件”。从事后的观点看，这次事件实际上包含了后来发生的历史悲剧的所有要素，因而可称为“六四”的预演，但由于当时社会兴奋点在动员“反戒严”，而且志在必得，新闻报道不及时，以及政府的有意掩盖，此事的真相一直没有被揭示，它的教训没有被及时总结，以至于酿成了后来的滔天巨祸。

第五节 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5月19日清早，赵紫阳从广场回到办公室后感到头晕。请北京医院的大夫诊断，是心血管系统的老毛病。他当时就向中央请了三天假。从此中央就再也没有通知他开任何会，他要求开会，也没人给他回答。他实际上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事后，赵紫阳回忆道：

“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布我的问题做准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

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他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赵紫阳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找杨尚昆？以及杨尚昆的“澄清”是否具有“合法性”？抑或只是寻求“有效性”来源的证明？

如前所述，赵紫阳履新时，邓小平曾嘱咐杨尚昆和万里支持赵，而且赵亦有言，只要有这两人支持，其他人怎么样都无所谓。赵紫阳于1989年5月上旬启动的“新政”，无论是倚重于阎明复的“对话”，还是倚重于万里的廉政五条，基本上还是对于邓小平提供的这两条路径的依赖。5月17日后，尽管他已经感觉到邓小平“变心”，但依然对杨深信不疑。

从现有资料看，在胡耀邦逝世后爆发的学运中，到5月17日前，杨尚昆的态度仍是温和的、通情达理的。在很少提到杨尚昆的回忆中，赵紫阳曾提到：

“在我回国前，北京曾在常委碰头会上提出过实行戒严的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觉到在邓决定实行戒严以前，杨对学潮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也认为，杨尚昆原本是支持赵紫阳的，最后是迫于邓小平的压力才参与镇压学运决策。赵紫阳从朝鲜回京后，曾请许家屯给杨尚昆带话，请杨说服邓小平，改变对学潮的定性，代之以疏导方针。杨听了他的汇报后，明白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赵紫阳的意见，并说几位老师，向中央也提出同样的建议。

许家屯还说，杨尚昆十分欣赏5月4日赵紫阳的亚行讲话，反复说“讲得好！”还说“乔石也说，不错！”同时，他也对许家屯讲：“我去同老爷子（指邓小平）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去。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许家屯随即告诉他：“外面有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尚昆斩钉截铁地回答：“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在中共高层，大多数人认为，杨尚昆执行的是邓小平路线。很少有人反问，若没有他的支持，邓小平会出台戒严措施吗？他如果没有私利，会拿原则做交易吗？

据《中国“六四”真相》，5月18日凌晨，赵紫阳和政治局常委到医院看望学生后，直接回到办公室，当即给常委并邓小平写了一封辞职信。辞职信是以特急件直接送给杨尚昆的。这个情节虽与赵紫阳、鲍彤和李鹏等人的回忆不符，但它罕见提到了赵紫阳和杨尚昆的特殊关系。《真相》说：

“赵紫阳之所以不直接将信递交给政治局常委或邓小平本人，而征求杨尚昆的意见，是因为在中共元老中，杨尚昆是他的第一知交，他希望在作出这一事关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之前，由杨尚昆替他把关。”

杨尚昆在接到此信后，曾痛责赵紫阳不负责任的态度。并劝其收回此信。据说，在杨尚昆的劝慰下，赵紫阳的激动情绪得到了一定控制，稍后，他又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

尚昆同志：

谢谢你的批评。

我尊重你的意见，我这封信不发了。但是，我还保留我的意见。因此，我觉得我工作很困难，贯彻不了这个方针。

赵紫阳 五．十八

当日下午，赵紫阳借转荐李一氓等人的信件再次给邓小平写信。信发出后，依然电请杨尚昆替他陈明“想法”，但这个请求被杨尚昆明确拒绝。

赵紫阳的回忆录，没有交代他戒严后的这次约见杨尚昆是什么时间，也没有说，这次是否见到了杨尚昆，或者得到了回馈。但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了5月21日赵紫阳再次约见杨尚昆的结果：

“今天上午，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他要阎去见杨尚昆，杨拒绝了赵的建议。”

对比赵紫阳和李鹏所述情形，我们可以推出事情的顺序：首先，赵紫阳是通过秘书，想直接约见杨尚昆，时间可能是在5月20日晚，或5月21日上午，即赵紫阳三天病假的第二或第三天。希望明确自己是否“被停职”，以及解释“戈氏会谈”的动机，藉以最后挽回邓小平的信任。杨尚昆显然没有同意面见他，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于是，赵紫阳又找与杨尚昆关系密切的阎明复。通过阎明复再次沟通与杨尚昆的关系。阎是赵的下级，又支持改革，他可以把阎明复叫到家中谈话。但是，他不可能从阎那里得到他想从杨尚昆那里得到的信息。因为阎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中央人事更动的最高机密，也可能知道了也不敢向赵泄露，更重要的是，赵不便向一个下级去打听自己的地位问题。所以，赵只对阎明复谈到借重“人大”的问题，但依然是希望阎去说动杨尚昆。

赵紫阳万万不会想到，此时的杨尚昆，实际上已经准备与之切割。仅仅4天以后，在中央军委召开的“紧急扩大会议”上，杨尚昆的讲话系统地摘清了运动以来与赵紫阳的关系。他说：

“一段时间安定了，中央某人说话或者一篇文章出来，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一点。接着又起来了。到了最后，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搞得首都这样失去控制？全国都发生大的游行

示威？而且提出来的口号专门对着国务院，为什么会这样？……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图7-31：“召开人大，罢免李鹏”（陈小雅摄）

之后，他历数了赵紫阳在朝鲜同意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回来就变卦，要求改变定性，并在“亚行讲话”擅自发出不同的声音，“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在学生面前”。杨尚昆说：

“这期间，中央常委多次开会，说调子不能再变了。但是他坚持意见……后来我劝他，这个问题大得很，如果把性质变了，我们就都垮了。学校广大的教员、校长、积极的学生统统都要挨个耳光，毫无立足之地，一直在学生中做工作的广大学生党员、干部、校长等都要被打下去。”“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发消息时，劈头就讲这个问题……稍有头脑的同志都觉得这是一篇推卸责任的话，把小平同志摆在前面，说明一切错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最近他有一系列的东西，我相信你们都会有感觉的。”

“多少年来，几位80岁以上的老人坐在一起讨论中央事情，这是第一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人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陈云同志讲了非常重要的话，说这就是要把几十年战争所夺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就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在5月19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人，你们看他讲了些什么话？……北京多数干部看了他那个讲话，都说这个人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

“当时他同意：第一，有决断比没决断好。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退还是不退，总要有个决断。……第二，我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他就摔挑子了。”

“你们想一想，如果人大常委会作出这么一个决议，那不是等于把前面那个社论都推翻了，现在他们正在积极搞这个事情……”

“现在摆在面前的就这么一个问题，怎么解决？今天我想给军队各大单位的同志先打个招呼。中央考虑来考虑去，势必要换领导，因为他不能执行中央的指示，同时另外还有一套。他就要通过这样一个立法程序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在党内政治局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常委里只有他一票。”

在此，相信读者已经明确无误地感到了三个问题：1、杨尚昆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赵紫阳的事情了；2、在赵杨关系中，此时，是赵紫阳“剃头挑子一头热”；3、赵紫阳有话要说，而且只能对杨尚昆一个人说。

那么，先让我们来看看，A、杨尚昆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赵紫阳的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可以有三：

（1）邓小平在5月19日已向党政军领导人宣布“李鹏当总理，江泽民当总书记”，杨尚昆不想让生病的赵紫阳难过，不便在党还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前，将这个信息私自通报给赵；

（2）忙于戒严军务；

（3）他与赵紫阳的同盟关系消失。

其次，B、赵紫阳为什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还一心寄望于杨尚昆？他究竟有什么话，是只可以对杨尚昆一个人说的呢？答案也可以有三：

（1）认为邓小平并不真心要废黜他；

(2) 把反转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杨尚昆身上；

(3) 此前，与杨尚昆存在政治默契。

那么，现在我们对比这两组答案，就会发现：

第一组答案：A、邓小平已经宣布“江上赵下”，与B、邓小平并不真心废赵，已经不可并存。可以划掉。

第二组答案：A、杨尚昆忙于戒严军务，与B、反转局面的希望在杨，是南辕北辙的。划掉。

第三组答案：A、“赵杨同盟”关系消失，与B、赵杨曾经存在政治默契，是不矛盾的。那么，就让我们来谈谈“赵杨同盟”的问题。

自1992年撰写《八九民运史》以来，笔者一直怀疑，赵紫阳与杨尚昆存在某种“政治默契”。据姚监复称，他曾经把这个观点征求过所有他认识的中共高层人物，但只有两个人表示赞同，这两个人一位是鲍彤，一位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事后，姚监复向鲍彤引见了，对于我提出的这个问题，鲍彤作了如下回答：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赵为什么不要军权？”

鲍彤思考。

姚监复（以下简称‘姚’）：赵刚上任，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见，结果杨尚昆办公室来了个电话：‘尚昆同志可不可以去啊？’他就知道，已经插进来了。

图7-32：赵紫阳接见军队师以上干部（选自香港《争鸣》）

鲍彤（以下简称‘鲍’）：应该说，赵没有这个野心。他忙不过来。他一心想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陈：那么，赵和杨是不是有默契？

鲍：有。赵当总书记的时候，邓找过万里。万里原来是赵的上级，他当地委书记的时候，赵还是他下面的区委书记。邓对万讲，要他全力支持赵，他答应了。杨也是赵的上级，邓也找过他，要他全力支持赵，他也答应了。赵当时觉得，有这两个人的支持就行了，其他人怎么样都不重要。

陈：您对杨白冰这个人印象怎么样？

鲍：不错。他请我到总政去作过一次报告。

陈：有人说，在戒严问题上，邓和杨有交易……

鲍（吃惊地）：哦？

陈：杨对邓的要求之一，是让杨白冰接掌军队。

姚：所谓‘举贤不避亲’嘛！

陈：这事在军委三总部引起很大反弹，所以，三总部反戒严的声浪很高，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是杨的家兵家将！’军队是很讲究资历的，还有那么多山头。

鲍：这个不知道。”

从鲍彤的这段谈话看，他所认识到的“赵杨默契”主要的内容是：赵紫阳无意军权。虽然罗宇的《告别总参谋部》出版后，揭露出赵紫阳在第一副总参谋长的人选上显露出“铁爪”——把女婿所在部队的上司徐信从排名第二提到第一，但这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经济活动的便利，而不是对于军权的企图心。而如果“杨尚昆推荐杨白冰执掌军权”、“杨尚昆想做邓小平之后的太上皇”这二则谣传真有凭据的话，那么，杨尚昆的确可以和赵紫阳达成一种“政治和谐”局面。

但是“政治默契”和“政治同盟”是两个不同级别的概念。如果这种“和谐”格局是双方明确意识到并有意共守的，那么，二人之间即便有亲密政治关系的话，也仅仅是存在一种“政治默契”。但如果二者之间有过明确承诺，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负责任，就可以说，二人之间具备了某种“政治同盟”关系。

而逻辑的推断是，“政治默契”是没有制约效力的；“政治同盟”则是有约束力的。同理，在这个事件中，单纯的“默契”似不足以令赵紫阳对杨“穷追不舍”；但“政治同盟”的存在目前仍缺乏充足的证据。一个极大的可能是：赵紫阳在听到“江泽民将取而代之”的风声后，他将向杨尚昆挑明这层关系：

“江泽民能像我一样，和你党军分治吗？”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知道，赵紫阳是否确实向杨传达到了这样的信息，但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还将看到，杨尚昆反对江泽民当总书记，似乎是突然提出来的。而就在赵紫阳与阎明复谈话之后，他见的这个人，后来成了杨尚昆属意的人，传说最终也成了江的敌人。

据赵紫阳回忆：

“5月21日， 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

赵紫阳事后回忆道：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

“……在这之前，彭冲 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 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赵紫阳继续回忆道：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 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此时的赵紫阳仍在病假中，据事后组织审查，他的这些重大决定，既未与他委托（在其病休期间）主持中央工作和外事工作的李鹏商量，更未取得邓小平的同意。他的上述行为，似乎已经完全放弃在过去几年的执政生涯中，以“小平同志”为“定盘星”的原则（亦即“有效性”原则），而开始以“合法性”为武器了。

显然，在5月1日至5月17日晚“邓家常委会”这段时间里，在赵紫阳那里，依靠的是两个力量——邓小平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前者是他履新以来的成功经验；后者是毛泽东的制胜法宝。选择前者，意味着延续过去；选择后者，意味着拥有未来。但当“过去”与“未来”势不两立时，在两者中犹疑徘徊，只能埋葬于当下！这就如同一个来自清朝皇帝的电影故事：当康熙爷问及在寺庙扫地的儿子（未来的雍正）“扫地有何心得”时，儿子回答说：“当大风刮起时，要把地扫干净，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往一个方向扫。否则，不但地扫不干净，还会弄得一身的灰尘！”现在，赵紫阳似乎想清楚了——实际上他要有所作为已经别无选择——必须站在人民一边，并希望凭借“成文法”与“习惯法”对抗，并拉着万里——邓小平的牌友，一起干。其前景，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那么，赵紫阳依据什么认为，万里在此时会同意他的建议而漠视邓小平的意见呢？根据他的回忆录，可能依据有三：

1、万里是改革先锋，在思想观点和这种态度上都支持通过“民主与法治”轨道解决问题，且同情学运，直到5月17日，身在加拿大的万里还发表讲话，声称“学生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行动”。

2、万里一贯遭政治老人忌恨，如果保守派执政，他也没有好结果。

3、在人心所向的历史大事件面前，赵紫阳估计他会注意身后名节。否则，他会失去已有的民心，成为“旧势力”的陪葬。2015年7月，万里去世时，一拨人发动的“拒送万里”行动，充分证明了赵紫阳的这一预见。

遗憾的是，从前的赵紫阳的原则——有效性原则，是依靠别人的实力登上大位的政治家无可选择的选择；此时的赵紫阳的原则——合法性原则，也是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实力的政治家必然的选择。

这个选择，当然是充满风险，也充满阻力的。

第六节 人大与党：短兵相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在国家处于紧急时期，人民希望常委会打破定期的例会，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是正当、合法的。

鉴此，5月17日，厉以宁、江平等24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18日，叶笃正、冯之浚等12名常委也发出呼吁，“建议从速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同日，张友渔等9位法学家联名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5月21日杨振宁、李远哲等著名海外华人学

者致电邓小平，望立即召开全国人大。严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随即又在香港《明报》上，发表《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并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胡绩伟参加了5月17日24位常委的签名。据他事后回忆，当时，他正在河北承德出席中国新闻学会的会议。在与一位在京常委通电话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对方已经代他签名，并表示了同意。

20日宣布戒严后，北京形势骤然紧张。于前一日回京的胡绩伟感到，如果学生坚持不退，戒严部队入城以后，很可能发生不幸事件。在忧心如焚的当时，不断有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其他同志给他打电话，希望对召开“紧急会议”再做一些促进工作。胡绩伟当即委托秘书起草文稿并征集签名。

此后，胡绩伟又向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彭冲说，目前形势下，开会很困难。胡绩伟又提出，不开正式的紧急会议，是否先开一个在京常委的非正式会议，讨论研究一下常委会和常委应采取什么态度。彭冲答应召集副委员长会议研究。同时他也表示开会很难，因为当时交通受阻，他的车也很难通行。

而此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也在为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征集常委签名。这位公开“以建设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为重点研究课题和长远奋斗目标”的著名院外活动家，衷心希望全国人大这一“橡皮图章”逐渐变硬，于是向更多的常委收集是否同意召开紧急会议的信息。得知胡绩伟的动向后，曹思源立即与其秘书常大林取得了联系。5月21日，也就是赵紫阳向阎明复、乔石提出促请万里提前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的同时，胡绩伟接到秘书的电话：因为交通受阻，很难征集签名。同时告知，曹思源愿意承担征集签名的工作。胡绩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曹思源持自己起草的建议

信——《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来到胡家，请胡老敲定。建议信写道：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意志。为此，我们建议在5月24日至26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制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

因为同彭冲通电后估计召开“紧急会议”比较困难，胡绩伟在信末又加上了一行字：

“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定稿后，胡绩伟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曹思源在征得胡绩伟同意后，开始持这份签名信征集其他委员签名，并向外省的常委发了加急电报。

事后，胡绩伟解释道：“当时我对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印象是比较好的。该所所长曹思源曾经在起草《破产法》（草案）的工作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对人大有关工作有过一定的帮助。由四通研究所来代办这件事，当时我还认为是比较理想的。”

征集签名工作自5月21日晚始至5月24日上午，共有46位常委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代签（其中38位直接签名），或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或回电报赞成开会。加上前几次呼吁开会的常委，共计有57位常委赞成召开紧急会议，超过常委总数三分之一。5月24日，曹思源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常委意见的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绩伟随即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并附上收集材料，由曹思源的人于当天下午1：30送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

同时，四通社会研究所把这一签名信送给了北京的主要新闻单位和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但北京新闻单位都没有刊发，香港《文汇报》也没有刊登签名信的原文，而是综合以上信息，由记者编发了一条新闻，并在委员诉求中加入“罢免李鹏”的内容。

据李鹏5月22日掌握的情况，《人民日报》前社长秦川和16位委员在“征集函”上签了名。北大教授许良英对方励之说，“党内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是要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现在要看“人大常委敢不敢按宪法办事了”。

根据召开人大开常委会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程序，早在5月19日，人大常委会党组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递交了“关于请万里中止出访，提前回国并于5月提前召开本届第八次常委会的报告”。报告称：

“最近许多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来信来电，要求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或代表大会，采取稳妥措施缓和当前的严峻局势。11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都赞成将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为此，今天上午由彭冲同志主持召开了党组会议。

党组同志考虑到，法律规定临时召开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一致认为提前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学生游行示威、绝食请愿问题，已势在必行。”

此事被李鹏以“外事不变动为好”压了下来。姚依林同意，乔石在自己名字上圈阅。于是发生了上一节胡启立所说报告被“搁置”的情况。但随后，人大常委会召开委员长会议，讨论了常委和委员们提议的问题。据中央办公厅报送李鹏的材料称：

当日，人大召开了委员长会议。因为万里委员长已出国访问，会议由彭冲副委员长主持，不少副委员长在发言时情绪激昂。

有的说：对学生还是疏通教育的办法好，用强制办法越搞越对立。一个月来香港对我们都是赞赏的，现在改变态度。当然，政府没有镇压学生，但是，实际放弃了疏导。从共产党的章程来看，怎样才能撤换总书记，是不是五个常委中有四个人一反对他就没有权了。（有人插话：撤销总书记要中央全会才行）

有的说：这么大的事，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却没有声音，我很着急。一个戒严令，我非常痛心。只有民主党派讲话不行，现在只有请大学校长都出来讲话了。我建议，以委员长会议名义邀请各大学校长来座谈。第一、肯定学生爱国运动。第二、政府秋后不能算账。现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如果政府与人大对立，政府不能解散人大，人大有权罢免政府。（有人插话：不能以人大常委会名义邀请大学校长。）

有的说：关键的一条，学生是爱国行动，不是动乱。（有人插话：中央没有说过学生都在搞动乱，那是指少数人。）

有的说：我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由委员长会议做决定。我们呼吁学生停止示威游行，给政府一个时间，也给我们最高权力机关一个时间。

有的说：学生的要求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了，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承认是合法组织。

有的说：双方都撤退，学生回校，军队也撤退。国务院颁布的错误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销。

有的说：宪法规定，副委员长受委员长的委托，可以代行委员长的部分职权。（有人插话：万里出国没有委托谁代理，是万里的责任。）

有的说：不必拘泥这些了，国务院已发布了戒严令，人大应该立即开会。

有的说：是部分戒严，北京还有十个县，并没有戒严。

有的说：现在情况下，人大常委和国务院不一致可不得了。

有的说：今天会议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明天要公布出去，不是要讲透明度嘛！

有的说：大家一致决定的，才能公布。

有的说：不是讲透不透明的问题，而是要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有的说：按惯例，还是由党内副委员长先向中央通报一下吧！

对此，大家都同意。

与此相应，天安门广场学生坚持的目标也由“对话”，“现场直播”和“正确评价”转变为：

一、召开人大紧急会议；

二、罢免李鹏；

三、解除戒严令。

当日，北京爆发了戒严令发布以来首次正式游行。

23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成立，同时起草了内容为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当日，在戒严以来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中，人们读到了载有这些内容的传单。

图7-33：5月23日爆发最大规模反戒严游行（陈小雅摄）

同时，35位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就中国当前局势发出声明，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议。香港文艺界、宗教界人士也对戒严行动作出反应：著名艺人汪明荃说，如果中国政府的办事方针令人民失去信心，她将考虑辞退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全港17万基督教

徒和26万天主教徒在祈祷和做弥撒中，为中国人民的安危祈祷、查良镛（金庸）、邝广杰也为此辞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职务。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担任这一职务“违背良心”。

社会迅速地把矛头集中到李鹏，几乎是对李鹏宣布“戒严令”产生的条件反射。但在“幕后黑手”那里，不再提“垂帘听政”及“老人政治”，据说有给邓小平留下“回旋余地”的考虑。虽然胡绩伟的倡议中本无此考虑，但委员长会议中要求总理对“发布戒严令作出解释”的言论，颇能打中李鹏的神经。李鹏也感到，“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总理有权对省（市区）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从法律角度上讲不违宪；从组织上看，这是党中央常委的决定，也完全合乎党内决策的程序。”但是，“社会上已广泛流传‘通过人大来限制政府’的议案，‘弹劾总理，取消戒严’，”李鹏得出的结论是：

“显然背后有黑手在指挥。民主党派几乎都发表了不同程度地支持学生是‘爱国运动’的声明。有的人是出自不理解，有的认识观点相合。对部分人大常委的动向，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简单处理。在关键时刻，必须发挥党对人大的领导作用，对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向他们通报情况，引导他们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不能放任自流。我征得乔石、姚依林和杨尚昆的同意后，请中办通知人大办公厅，以党中央名义先同人大党组成员和党员副委员长交换意见。”

当晚8：00——11：00，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出席的有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等6人。他们反映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汇报。

李鹏除重申“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老一代革命家的看法，戒严令出台的背景和党内团结的需要外，特别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谁代表改革开放，是赵紫阳同志，还是邓小平同志？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1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当然，赵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如果我们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就应当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杨尚昆的讲话着重交代了运动以来的形势、赵紫阳态度的变化及其两次讲话给形势带来的两次反复；传达了邓小平幕后两次与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和他本人商量的情况，以及“两个司令部”的判断和着重解决党内问题，结束“无政府状态”的必要性。

乔石的讲话强调了学潮以来中央的“忍让”：

“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这中间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学生头头中提出了希望‘下一个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都尽可能地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流血。4月18日学生又在大会堂请愿，北京市派了三位人大代表把信接下来，他们认为胜利了，说要走了。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有些人冲进去了，喊的口号也是很反动。总之，一步一步，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来。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找出好的办法。如果能再退一步解决问题，早就退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不能再退了。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但军队完全不进城也不行，实际上已经有一些进城了。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根本没说要镇压群众。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紧张，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休息了。这种局面如旷日持久，他们会认为你没办法了。

目前，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用一部分警察，动员学校里的党政领导，加上部分家长协助。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

最好这样。拖下来的原因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但拖长了不好。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现在军队不撤，问题不大。如果后退，他们就认为胜利了。但军队总待在路上不行，要进营房。希望人大、政协都帮助尽量做点工作。”

据李鹏日记，几位副委员长听完解释，“都表示执行党中央决定，认为目前已不宜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宜要求万里委员长提前回国。这六位副委员长态度也不完全一致，陈慕华和王汉斌同志态度明朗。廖汉生同志不知情，有些牢骚，但态度正确。叶飞同志情绪比较激动，彭冲同志看来是同情学生的。”

当日，万里致电中央，他将按原定日程于22日访美，请示有何信息向美方领导人转达。

5月23日，乔石代表中央常委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副委员长认为他们提的要求，中央一条也没有采纳，情绪激动。与会者怀着对局势的严重担忧，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

根据鲍彤的回忆，他似乎并不了解赵紫阳“休假”后仍在运动人大“造反”的活动。也可能是为了避嫌，赵紫阳决定自己最后一搏。但是，当这一努力失败后，他不得不再次找到鲍彤，请他为自己做最后一件事——起草一个自我辩解的发言稿。

从20日鲍彤接到“今后不再在北京医院看病”的通知后，他即预感到，至少自己已经被撤职。后来，又传来所谓“赵紫阳、杜润生、安志文、鲍彤四人集团”和“鲍彤反革命集团”的风声，他就有了即将被逮捕或隔离审查的预感。此时，鲍彤想到：

“如果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告诉杜老一声（安志文同志不在北京）。……我25日或26日就想找高山，没有找到，碰上了另一位同志，我就对

他说，我现在有一种预感，好像我要出什么事，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你叫高山告诉杜老一声。”

鲍彤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还以如此不严谨的方式，请22日已经向机关党委报告了“三所一会”声明的高山传话，并且还是请第三者向高山传话，这等于是把他与杜润生的来往直接告诉了党中央，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对此，鲍彤的解释是，因为在研究室只有高山认识杜润生。而“四个人都冤枉，同案相怜，惺惺相惜”。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仅仅听到传闻的鲍彤，凭什么已经认为“赵鲍杜安”四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案子”，但鲍彤的下述解释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参考：

“尽管我跟杜老并不熟，一下子觉得在感情上亲近起来了，我如出了什么问题，得让杜老知道一下。我对杜老原来很敬重，但过去与他从无私交。个人之间的来往，一辈子只有两次：第一次是4月28日或29日晚上，学生27日上街，我十分焦急，紫阳同志又在朝鲜，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杜老，说想上他家聊聊天。……我向他讲了我听到的27日学生游行的情况，表示很着急，我发现他也很忧虑。我向他请教有什么具体办法能把事态平息下来，他说，难呀，大难题一个。……因这次是他来我家，我心中非常过意不去，所以5月2日我就专程上他家回访，这就是第二次。”

鲍彤所说两次与杜润生见面时间，正好与中共中央审查杜润生在学运期间的两件事的时间相衔接：第一件是杜润生4月25日在科学会堂召集会议，传达赵紫阳“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指示以后；第二件是在5月2日，赵紫阳会见杜润生之前。

鲍彤应该知道，此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已经因“三所一会”《声明》沾上了“黑手”干系，但杜润生是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的一手提携者，这无疑会为该中心提供一定保险系数。他认为，“国师”是保险的。

第七节 军中反杨活动

5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进京命令发布的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杨尚昆等军委领导人极其震惊的事情：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报告，38军军长徐勤先拒不执行进京戒严的命令。按照中央军委规定，野战部队一个班以上的人员带武器进京，需军委三个以上的领导签字。但是，徐勤先接到的进京命令不仅没有三方签字，而且只是“口头命令”。据新华社军事记者了解的情况，当时，“戒严司令部的张工向他传达口头命令，让他带兵进城。徐说：口头命令无效，要有书面文字。张工说不可能有书面的了。徐说没有书面的我不进城。”

据刘亚洲介绍，为此周衣冰亲赴保定，要徐带队进京

根据38军史料，自胡耀邦逝世以来，该军已经三次接到进京执勤命令，无论是保卫胡耀邦追悼大会和灵车护送，还是“四二六”社论后组成“制止动乱预备队”，徐勤先都没有抗命表现。稍有政治分析能力的人都不会怀疑，徐勤先的这次抗命，与他对党内斗争局势的了解有关。

听到周衣冰的报告，杨尚昆当即表示：“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这是军令！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他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马上亲自去一趟38军驻地。周衣冰星夜赶往保定。

5月20日下午，杨尚昆再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周衣冰首先报告了对徐勤先违抗军令事件的处理。他说：

“根据杨主席的命令……现在，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已经被解除，徐勤先住院养病去了。38军军党委成员一致表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拥护对徐勤先的处理决定，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军党委提出从今天起，军、师、旅各级党委要认

真清理各种思想认识，联系徐勤先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干部战士中狠抓坚定政治信念的教育。”

此时，38军的指挥所、112师、炮兵旅、高炮团和通信团等将近7千人已进入复兴路至公主坟一带。余下的113师和坦克6师等部队将于当天下午进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桥一带。周衣冰说：“虽然他们也像别的部队一样遇到了不明真相群众的围困阻截，但执行命令的情况是好的。”

杨尚昆再次强调：“徐勤先的事件一定要引以为鉴，保证不再发生。军人一定要以服从军令为天职，决不能违抗。”

会上，迟浩田详细通报了很多部队进京受阻，被困于街头或郊外情况。在研究怎么办时，杨尚昆说：

“我们的第一步任务已经完成，各部队克服诸多困难，采取多种办法，按照命令准时开进北京，为执行戒严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从5月21日起，部队要转入休整状态。被围于街头、郊外的部队，没有到达原定目的地，要本着由远而近、由外向里、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则，进行逐步调整。在休整过程中，各部队要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积极进行指挥方法研究和适应性训练。要从这场斗争的需要出发，配合军事行动，拿起政治宣传武器，部队休整时要广泛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活动，派出宣传队，走上街头巷尾，传播党的声音，说服和争取群众。同时，还要组织部队为群众做好事。真正让北京的广大市民理解，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

听取各方面汇报后，杨尚昆作出三点指示：

“第一，坚定政治信念，保证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北京目前的情况错综复杂，一定要排除各种干扰，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针对一些同志用善良愿望看待动乱、以担心情绪对待戒严的问题，要坚持用中央的精神和军委的号令统一部队的思想。

部队被围在街头和郊外的，各级领导要主动深入到点上车上传达宣讲中央精神和军委号令，引导部队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明确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现在北京城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听信谣言，不听信，不传播，对制造部队谣言的，各级领导要在各种场合公开予以辟谣。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军队进城绝对不是对付北京人民的，所以，我们光明正大，在目前很多北京市民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到‘三个公开’：即部队番号公开、车辆牌号公开、军官军衔公开。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风浪面前，要临乱不惑，治乱不软，团结一致，钢板一块。”

“第二，保持最大克制，严格控制使用武器。按照既完成任务又保护群众的原则，实施坚定灵活的指挥。这次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急关头，军队不能犹豫和迟疑，必须坚决行动，负起历史使命。但坏人利用了群众，群众掩护着坏人，良莠混杂，真伪难辨。我们要从战略的角度，既完成戒严任务，又有效地保护人民群众，努力寻求任务要求与政策要求最佳结合。所以，即使在遭遇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不法之徒以棍棒、砖头、燃烧瓶等手段对部队进行打、砸、抢、烧、杀时，也要保持最大的克制，坚持以非致命性手段进行自卫，严格控制使用武器。主要以棍棒作为自卫手段，决不能动用枪枝，向人群开枪，违者要以军法处置。团以上单位可以成立防暴队，配备木棍等防暴器材。”

“第三，重视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发广大指战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部队在执行戒严任务中，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现在我们的一些部队就被围困着。所以，各级领导要深入第一线，在开进的车厢里、被围困的街头上、宿营的帐篷中，向广大指战员宣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唱《国歌》、《军歌》，使人民解放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矗立在广大指战员心中。有了这种精神，就能遇险不惊、见难不避、受挫不馁、疲惫不怠。”当晚，杨尚昆向邓小平电话汇报了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邓小平则向杨交代：

“目前的情势大家都很焦急，我想明天老同志开个会，陈云、先念、彭真、邓大姐、一波、王胡子和你参加，讨论局势，两位老帅身体不好就算了；陈云同志建议，你、一波和李鹏、姚依林、乔石要立即安排分头找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进京谈话，统一认识；尽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政委统统叫来，通报情况，认清当前形势，维护全国稳定。”

《中国“六四”真相》作者敏锐地觉察到，“杨尚昆的这些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六四’悲剧的发生。当时几乎所有的海外舆论都对戒严部队被围困而不采取强硬措施感到惊讶，一些舆论将其归之于人民的力量，有一些则将其归之于军队高层的严重分歧，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都没有说出其根本。”

那么，“其根本”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一场不能公开的较量。但我们可以从公开的信息中确定的是，李鹏、李锡铭们——因走错了“四二六”这一步棋——确实更希望捕获运动中出现的偏激言论，或得到学生群众袭击军队的消息，这可以为他们的立场和失误提供借口。但杨尚昆则无从通过伤害学生获利，相反还可能罹罪，但他确实可以从民运持续保持的压力中，增强手握军权的分量，并发现和清除异己。最好双方都保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层面——唱戏的层面。

从此前杨获得军事行动的执行权看，从此后他对“第一把手”安排的不同意见看，我们不妨推测，杨的第一目的其实与邓、李或其它老人均不同。他并不急于清场，并不是因为他从未真正指挥过一场战役因而不懂军事，而是他懂政治，形势越乱人们对军队越是倚重。人们对他的倚重令他在人事安排上越有发言权。而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军政、军民工作，恰恰为身任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至于局势能否如人所愿？如何平息事态？他深知，邓小平是做那个最后决定的人。

对于“杨家兄弟”的诉求，谣传军队高层已啧有烦言。从八九民运中支持民运、寻求与群众运动结合的军人的表现，我们大体可知，军中的确存在一股“反杨”势力。这股势力在“反戒严”运动中，充当着技术指导和声援的生力军。

笔者曾部分亲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军人”通过北知联编发的《新闻快讯》发表一封“给学生市民的公开信”的过程。这封信以“一位老军人”的口气写道：

“这一段时间，我默默地关注着你们的斗争，我想提醒你们：你们已经取得了不可想象的胜利！我无法公开站出来支持你们，但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

一、战略：

天安门广场数十万人，少数军队是无法解决的，戒严令公布几十小时了，没有对天安门广场采取行动，因市内兵力、警力严重不足。军队与警察受的教育也不同，很难把枪口指向人民。一千万同仇敌忾的北京人民是无法对付的。

二、战术：

1、路口：群众自发地拦截军车，是前所未见的壮举。千万不要撤、即使听说其他方向已开进一两支部队，也不要撤。因为，一两支部队解决不了问题，无法实施广场行动和戒严、军管。坚守路口就是胜利。为此目的，各路口必须建立稳定的指挥系统，改善无组织状态。

2、分割：这是一贯战术。人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放行军队的2/3，卡住1/3。在下一个路口，再放行1/3，卡住1/3。把成建制的军、师分割成首尾无法相顾的几部分。能做到这一步，部队的军心、战斗力就基本上瓦解了。

3、开枪、催泪瓦斯：对聚集在一起的十几万人开枪， 施放催泪瓦斯必将造成混乱和大批伤亡。必须警告军队领导，谁下令，谁将来必上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就算北京用屠杀可以暂时控制，全国几十个大城市怎么控制？我们没有那么多军队。

4、要相信人民军队的基本素质，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不仅要号召他们不进城，而且要号召他们调转枪口，站在人民一边。

祝北京人民胜利！”

这封信，是北明和郑义夫妇带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会议室的。据北明说，是他们从广场撤出时，一个自称已经观察了他们很久的陌生人交给他们的。也许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公开，事后被戒严部队的“F75” 行动 所利用，事后，北明的回忆录没有提到这一次“奇遇”。

与这位匿名军人不同，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军委，反对以军事行动解决面临的问题。联名信写道：

首都戒严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入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据说，七上将联名信发表后，王震曾打电话质问张爱萍，你为什么发起签名反对戒严？张答道：“你老糊涂了。我们的信写的什么，你看懂了吗？问题是你们身边的人将我们的信捅到社会上去了。我们没办法。”王说不下

去，只好请彭真出面找张谈话。张有准备，写了一信带去找彭。彭客气婉转，说动机是好的。据说，李先念也曾找另一位署名上将谈话，问他：你为什么发起签名反对戒严？又说，赵紫阳给了你什么好处？该上将被激怒，用拳头猛击桌子（另一说法，猛击沙发）说：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谈话不欢而散。王震本来还想找萧克谈。想想不敢，不了了之。

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回忆：“当时《解放军报》一位记者采访萧克，萧克说：‘中国不能出现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流血事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倒退50年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上街的。’”

据一位当时在萧克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

“七上将上书后，仍有几位上将来电话，要签名。我们答：你们自己上书罢。萧克在旁补充说，王平也上书了，是单干。他说，事后李先念给张爱萍打电话（或谈话），说国家已到生死关头，不开枪不行。张爱萍答：‘我没感到什么生死关头。’以后王震打电话给张爱萍批张上书事。张答：‘我是接受历史教训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哄抢我军缴获的军用物资。我们急电中央，请中央指示能否开枪。毛主席答：你们这是要中央承担开枪的责任。办不到。要否开枪？你们自己决定。’这位秘书说：‘萧克同志上书后，心情非常沉重。6月3日夜听到大街上枪声大作，萧克同志难过地说：这下完了！以后两餐饭吃不下去。’”

据陆超祺回忆，《人民日报》也收到了“七上将”的呼吁。“写信的消息是张爱萍的女儿打电话告诉社科院一位研究员，这位研究员又打电话告诉本报一位老同志，这封信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

“我也很兴奋，觉得这封信如能发表，影响非同小可，特别是对军队，因为这八位上将，解放战争期间，都是兵团级干部，解放后，不是中央军委三大总部负责人就是大军区负责人，在部队很有威信。为了慎重起见，我请总编室夜班的同志和一些与部队有联系的老记者，帮助核对事实，征求这些

老将军同意不同意在报上发表。经分别和这些老将军的秘书联系，证实信是真的，至于公开发表，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这不好办。我和大保(晚上只有他在办公室)商量，给总参谋长迟浩田打电话，听听他的意见。迟浩田在粉碎“四人帮”后曾率工作组进驻报社，任副总编辑，是熟人。

迟浩田同志听了电话，表示不能发表，但并不肯定只是说‘恐怕不好吧’，让我慎重考虑。过了半个小时他来电话，估计是请示了什么人或者和什么人商量了，用很肯定的语气说，“千万不要发表，因为信是写给领导的，不是供公开发表的”。

虽然《人民日报》没能刊登“七上将”的信，但受此鼓舞，陆超祺决定将一篇原准备在“国际版”刊登的消息，移到头版，作为“影射新闻”。这则消息的标题是：

匈牙利总理内梅特说《不准用军队解决内政问题》

现在还不清楚，七上将的上书是出自谁的手笔？但有消息说，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作家罗峪平（即罗点点）曾居间发挥了“动员”和“串联”作用。其中万润南是刘少奇女儿刘涛的前夫，时任李昌的女婿，与罗点点是好友，在党政军系统拥有一定人脉关系。罗峪平是1978年去世的前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时任海军总医院门诊部主任。

罗瑞卿是开国大将，在毛泽东执政初始的前十年，是国家的公安部长兼中南海“大内总管”和“御林军”头目。他的霹雳手段，曾让共和国的初民们真正体验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为此，他曾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按其子罗宇的说法，他是毛泽东托付安全的人；是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开山鼻祖”，“在中央警卫系统、情报系统、公安系统和军队威信极高，人脉极广”。1959年庐山会议后，名义上林彪掌军，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是军委“管事”的人。林彪事件后，“死对头”邓小平复出，推举罗瑞卿任军队顾问。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掌军权，

罗瑞卿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据罗宇回忆，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邓小平就召集解放军“三总部”的头头讲话，第一句话便是“以后军队的事情就由罗瑞卿来管。”至此，“军队的一切调动，没有父亲点头，动不了”。而罗瑞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央警卫团（师）归了总参谋部的建制，改称总参警卫局”。至此，“御林军重归父亲掌管，一切人事任命、驻防、调动，武器装备配备，后勤补给到发工资，一切归于军队建制，汪东兴的独立王国连根拔掉”，华国锋成了光杆司令。可以说，罗瑞卿为邓小平帝国的建立，铺下了第一块垫脚石。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突然去世，按照罗家子女的看法，杨尚昆几乎没有重掌军权的机会。罗宇回忆道：

“耀邦当了总书记之后，我只陪妈妈去看过他一次。他一定要留我们母子吃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妈妈说：‘罗总走得太早了。要是罗总在，紫阳管政府，我管党，罗总管军队，那多好！’”

有鉴于罗家在党政军界的势力，陈子明社经所收购的《经济学周报》，在不久前刚刚通过何家栋的关系，将罗峪平聘为副主编。据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她与何家栋一道，利用与几位军界元老和遗孀的关系，促成了这次上书。书成后，利用社经所提供的运力，她一天之内拜访了十几位1955年授衔的解放军上将。在征集他们签名时，有的人避而不见，有的人婉拒，但张爱萍等七位上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据《陈一谔回忆录》：5月19日，在上层通报“戒严”的消息时，徐向前元帅说：“但愿绝对不是冲学生来的。”聂荣臻元帅说：“绝对??要发生流血事件。”在北京的800个将军中“有500多个签名反对动用军队”。由于咨询渠道的局限，笔者无法核实上述内容，但“七上将”给中央军委的联名信，显然只是海底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尖顶。而军队内部，自来就有“山头”之分。从张国焘事件、彭德怀事件，到林彪事件，虽然没有哪一支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作战经历的部队不是经过不断地整编、换将，以至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但为进行军队政治素质和军人荣誉感教育起见，这些“山头”特色总

能或多或少地得到保存。其中林彪、粟裕的旧部，对邓小平更怀有深刻的芥蒂。加之解放军“三总部”系统，确实对从来没有战功的“杨家将”的揽权、不避嫌疑的提拔资历浅薄的异母兄弟杨白冰，以及不惜虚与委蛇地作出邓小平家臣的姿态，以博得宠信、巩固自家在军队地位的行径，抱有强烈反感。这些人认定，杨家二兄是新时期军队的最大野心家。那些对邓小平怀有敌意的将领，也以“反杨”、“热爱人民”的面目出现反对戒严令，所以在戒严的决定刚一作出，他们就把消息透露给学生，故有军队一出营房门就被堵回去，以及识破其“化整为零”战术，且反应极其迅速的情况发生。以39军为例，据该军军史记载，这支军队曾与红15军团、新四军和林彪的“四野”和赴朝参战志愿军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近亲关系。其中116师更解放军“四大王牌师”中名列第二的部队。

5月20日，驻扎在辽宁海城的39军接到的中央军委命令，并不是赴京执勤命令，而是“紧急前往沈阳市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但当队伍由南向北行进到沈阳附近时，上级又突然命令他们掉头向西南下——改去北戴河。行到山海关附近，上级又命其改道西进——去北京。此举在后来官方的解释中称为“佯动”。

在一篇题为《一篇新闻稿》的文章中，一位部队的“业余报道员”真实地记载了自己千里迢迢进京送稿的故事。稿子写的是39军乘坐的军列如何受阻，官兵们如何在骄阳似火的旷野里忍受没吃没喝无救援的困境，又如何“像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家”一样受到了某县政府的款待，作者如何因此受到感动而产生写作冲动。然后文章又写了进京送稿过程经历的种种困境：因锦州大学生卧轨，原计划乘坐的290次列车停驶；文革“大串联”般的趴车、挤车和长途跋涉；北京大游行中激动人心的场景；人山人海似乎全北京只有他一个兵的感觉；最后终于找到《解放军报》社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是，他来到北京以后发生的事情：

“交上稿子，抓起电话，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熟悉的编辑。我担心电话也会像公共汽车一样不通了。一拨，好使。

“我把稿件内容讲了一遍。

“那边好一阵没吭气儿。

“把稿子拿来看看吧。

“X 编辑，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党中央、国务院……

“先拿来看看再说吧。

“《人民日报》、新华社能不能发这种稿子？我想……

“别，别，别去找骂了……”

最后这位作者感叹，千辛万苦赶到北京，就是这个结果！“中国，这是怎么了？”

相信这位“小笔杆子”的真实感叹，也是当时所有军队战士的感叹：心里不托底！但是当他把这一切真实地汇报给他的上级时，他的舆情侦查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

军人，尤其是部队高级军官，并不是不问政治的莽夫。

更热闹的是，经过两天一夜的急行军，39军116师于5月22日早晨刚刚抵达北京通县三间房军用机场后，就有“三总部”的负责人纷纷亲自前往视察慰问。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联络，但是，联系到6月3日38军装甲车撞翻39军115师军车，39军116师师长许峰以通讯故障为由拒不参加“清场”，以至于该师最后被“押解”进京——与38军会师天安门广场的故事，这些，应该都不是偶然的。

作为一支“人民军队”，解放军确有对人民崇高的信仰，但他们未必真的很同情学生；作为一支“阶级的军队”，解放军不会自己打自己，但他们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和疑惑。从“六四”后总政文化部编辑出版的《戒严一日》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类表达“惶惑”的回忆文章，这不仅是为了留下真实的记忆，恐怕也有曲折“谏言”的成分。

有一篇题为《在被围困的日子里》写道：

“……我走过去，对老人亲热地说：‘老大爷我们想……’

“‘用厕所，还想喝水？’老头可不亲热，生硬地回绝说，‘没水。’

“‘自来水也行。’我又朝他笑了笑，几乎是在乞求他。

“‘厕所是给大学生用的。’他又指了指院中盛着开水的大桶，‘那里的开水，也是留给大学生喝的。’”

最后，这位经历了重重困难，遭受了难忍奚落的38军中校，终于遇到了一位“好心人”，被允许坐上他的“垃圾车”，运达“前指”！

还有一篇北京军区中尉参谋写的文章，记载了陪同首长视察戒严部队执勤情况的细节：在京原路口的一个哨位，一个哨兵在骄阳似火的三伏天里，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小时，最终晕倒在哨位上。但是文章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巴”：

“我看见摔倒的战士坚强地站起来，他推开老大娘的汽水、小女孩的冰棍，身体摇晃着，固执地，坚定地，回到小方块里。”

“张副部长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无疑，我们的战士在3600秒的考验中是尽了力的。”

“‘看样子您是部队的首长？！’老大娘大概发现张副部长肩上扛的‘星’不少。

“‘我想给你们提个意见。’还没容我们回答，她紧接着说。

“‘您尽管提。’张副部长把老大娘扶到路旁树阴下，俨然是一幅小学生听老师训话的样子。

“‘你看看，’老大娘指了指值勤的战士，把‘您’改成了‘你’……”

这一个字称谓的变化，竟然能引发这样一篇“感慨”，说明军人的心灵，是何等的敏感！

最后，这位老大娘还甩下一句话：

“现在又没打仗，要真打仗了，我让我儿子去！”

“经老大娘这么一说，在成千上万人的大会上讲话，从来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副部长，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他握住大娘的手，一个劲地说：

‘谢谢您，谢谢您了，老大娘！’

在《戒严一日》的这个版本中，这类军人被困、被晒、被饿、被打、被迫钻阴沟、翻厕所，到处遇到“吐痰罚款”、“不准吸烟”的事例俯拾皆是；更有家属“拖后腿”，群众逗弄军人的种种办法，真是生动之极，令人啼笑皆非！

作为一件“宣传品”（在中共的词典中，什么新闻、学术、教育与文化作品，都被视为宣传品，因为其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统归“宣传部”领导），《戒严一日》的处境也是极为尴尬的：

——当你过分地渲染军队的困境，寻找“镇压”口实，反过来看，意味着你自己已被人民抛弃的境地；

——当你过分宣传人民与你的“鱼水情”时，又使你的开进显得缺少“理由”；

——当你强调军人的牺牲时，反衬的是决策者政治治理的无能，以至于只能用牺牲“人民子弟”的办法来治理“人民的事务”。

心理测验表明，比起荣誉、痛苦来说，令人尴尬的事情在记忆中最难被忘却。笔者统计了一下《戒严一日》“89版”，标题中冠有“难忘”二字的文章就有9篇，而这9篇不论记载的是什麼，也都无一例外地被后来的“精选本”cancel掉了！谁说1989年的50多天不是“令人难忘”的呢？学生有其难忘，市民有其难忘，学者有其难忘，士兵也有其难忘，爱恨情仇，都是一种“难忘”。但极权主义是一种“理性统治”的天然王国，在这里，情感要被进行“政治提纯”，言论要经过“滤毒”，行为要锻造得像服从“程序”的机器人，一句话，人要被修理得像“长城砖”一样，才能被“嵌进”一个宏大的事业，去完成某种“异化”的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戒严一日》的精选本，就如同当年的“样板戏”一样，并非它本身没有意义，但作为一种历史工程，它的设计是险恶的。

军人的干预，除向学生通报消息，像上面那位老军人进行战略战术指导外，还有尽力化解军民对立的劝诫。它告诉人民：解放军并不是真正的对立面。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目前他们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骗到这里来的。重要的是使他们了解真相，了解人民的意志，要理解与尊重他们。一份“致广大市民”的传单说：“某些盗用中央和政府名义的人，将解放军官兵骗到这里后，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使解放军的饮食得不到保障，有些官兵已连续几天没有吃多少东西。其目的无非是试图激化解放军与人民的矛盾。因此，我们对子弟兵要加以爱护，尽量帮助他们解决饮食方面的困难。”这份传单还说：“要理解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但也要向他们说明，军人也有拒不执行或反抗违背人民意志的命令的权力……在拦截过程中，要绝对避免与解放军官兵的冲突。同时要警惕便衣或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殴打解放军战士，制造事端。”他们在宣传中还揭露杨尚昆讲话中“军队不是针对

学生的”这条谎言，因为在官方通告中有“可以运用一切手段”的允诺，这必是包含了开枪和使用催泪瓦斯在内的。

反对杨家将统治的军人，既需要以群众的肉体作屏障，以粉碎杨氏兄弟进一步独揽军权的阴谋，也试图减轻人民的牺牲，他们向人们传授“催泪弹防护”基本知识。告诉人们催泪弹的中毒特征、使用特点、物性，及急救办法。此外，也同时作着戒严部队的工作。一位未署名的陆军少校在一封《致奉命进驻北京戒严的官兵的信》中说：

亲爱的战友：

我也是一个军人，出生在农民家庭，咱们是阶级兄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在北京工作，年龄比你大一点，想跟你谈谈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工农子弟兵，紧紧地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这说明，我们不是军阀的武装、私人的军队。

当外敌入侵祖国，我们驰骋疆场，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当人民受灾时，我们立即奔赴灾区，舍生忘死，为人民解忧排难。在人民心目中，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军民关系被喻为鱼水之情。

我十分痛心地告诉你：你这次来京，既不是抗敌，也不是救灾。你确实实是上当受骗了。这次部队进京是来镇压学生运动的。

这次大学生发起的广大知识分子、工人、人民群众参加的运动，波及到全国。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推动改革、反对腐败、打倒“官倒”、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北京市有百万人参加游行请愿，声势浩大，是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这场运动可以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媲美而永载史册。这场运动打中了特权阶层、腐化分子、丑恶官僚的要害，也打中了杨氏家族的要害。杨尚昆曾受到毛泽东的迫害，党中央挽救了他，给他平反，并委以重任。他

当上军委副主席后，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亲手提拔自己的弟弟杨白冰当总政治部主任，又提拔亲儿子当二炮负责人。军委会议快变成家庭会议了，真是厚颜无耻！

图7-34：军人声援标语（陈小雅摄）

这次党中央多次肯定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同意给百万人参加的爱国运动扣上“动乱”的帽子。你可知道，带上“动乱”的帽子就等于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这是谁都不会同意的。党中央非常支持大学生提出的“反官僚”、“反腐败”的要求。杨家兄弟预感运动越深入，对他们的封建特权越不利，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排挤全党正式选举的总书记赵紫阳同志，扶植刚刚犯了严重错误的野心家李鹏，篡党夺权，进而私自调动几十万军队向北京开进。其目的，一是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封住人民的嘴，掩盖他们的丑行；二是准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杨家王朝，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真是罪恶滔天，他们的阴谋已经败露，受到一大批我军高级将领和广大指战员的坚决反对和无声的抵制。有些人甚至喊出“打倒新军阀”的口号。

你想想看，这么多军队，包括强大的坦克装甲部队，为什么要开进和平的首都？难道那里发生了武装暴乱吗？没有！发生打砸抢事件吗？也没有。那里发生的是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平请愿活动，包括罢课、游行、静坐、绝食。如果是为了对付一小撮坏人，难道北京几十万武警还不够用吗？亲爱的兄弟，你也许已经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他们舍命阻拦军车，是在保护大学生、老师们的生命安全。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头，我们都不要做出受人民唾骂、令亲人痛心的蠢事，不要当杨家兄弟的走卒，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你的枪口、拳头绝对不能冲着大学生和慈爱的老师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宁可被开除军籍，也不当别人的工具，不能制造流血事件。切记啊，切记，大学生不会忘记你，你的父母会支持你，人民会感谢你！这就是我和我的许多战友的共同心愿。

致以崇高神圣的军礼！

一个陆军少校

5月20日一份署名“中央警卫第三师所有善良的官兵”，题为《军人的心声》的广播稿，在广场播出。来稿说：“从4月20日至今天，北京学生、工人、市民以及各界人士的爱国运动，已持续整整一个月了。是的，我们是军人，有铁的纪律，不可能整个部队声援你们。但，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同是炎黄的子孙，我们亦同样激动着一个拳拳爱国心。……我们不能不去执行上级的命令（包括进京守护），但我们这样说……我们的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亦都是受苦受难的百姓出身，我们都是良心未泯的中国人。”

“同胞们都在争民主、争自由。……极少数的战士冒着被开除军籍的危险，擅自离队来到北京，虽然他们只有几个、几十个、至多百十人，比百万的人民群众实在太微少了，但他们（包括我们）惦记着我们的人民与我们的学生。”“我们会以我们的方法重新树立我们的形象，我们是属于人民的。”

应该说，聪明绝顶的杨家兄弟对于自己在军内的地位，是有明智判断的，这一方面反映在他们紧紧地抓住邓小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成不变的保权策略；另一方面，表现在此次戒严行动中对军队的不信任。有评论认为，这次调兵之所以要打乱建制，动用如此多的军力，完全不是为了对付乳臭未干的学生、手无寸铁的市民，更不是一事无成的秀才知识分子，而是为了军队内部的制衡，为了便于杨家将的控制，同时，通过此事来考验军队对他们的忠诚。这一套方略，比起此次民运中的第一个玩火者——北京市委的小魔小术，堪称是有大开大合，吐雾吞云气魄的杰作。但是，不论其伎俩有多么高超，玩人头者毕竟有玩火者的下场。

蹊跷的是，直到“杨家将”光荣退出历史舞台，赵紫阳才对他发表评论，而对于此中奥秘，他似乎又洞若观火。据杜导正记载，赵紫阳说：

“……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至于处境如此悲惨。”

“尚昆自以为得到军内外老同志尊重，但老同志如张爱萍、萧克、杨勇全反对他！”

注释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77页。

同上，第77—78页。

同上，第22页。

柴玲《绝食队伍到广场》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04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77—78页。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二节：柴玲脱颖而出。

柴玲《绝食队伍到广场》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04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3页。

同上。

李录《复食》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75页。

同上，第165页。

李录《营地联席会议》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72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4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47-49页。

李录《复食》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4—165页。

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56页。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三节：阎明复临危受命。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注释第192条。

李录《阎明复到广场》。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42页。

李录和张伯笠也记得这次有五十多个代表参加的会议，投票结果还是不撤。参见《回顾与反思》第142-143页。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记载王丹发言，第145页；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6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12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注释第198条。参见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55页。

李录《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0页。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五节：最后的挽救。

沈彤《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6—87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8页。

封从德《两站一车》。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5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代表。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12—314页。

同上，第314页。

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张伯笠《广播站与指挥车》。同上，第155页。

张伯笠《广播站与指挥车》。同上，第155、187页。

同上，第188页。

同上。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38—39页。

白梦《广场广播站：后期的变故》。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86—287页。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一节：“新华门事件”及其后果。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游行3万，围观者数十万。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6—57页；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51页。但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4月27日记载，围观者有“上百万”。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三节：大游行。

常劲《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77页。

张伯笠《“四二〇”北大游行》。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5页。

张伦《纠察与“政变”》。同上，第278—279页。

陈小雅《张健访谈录》，2015年8月8日—9月5日（笔谈）。

同上。

同上。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北大女生的六封信》5月20日，第一封。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76页。

陈小雅《张健访谈录》，2015年8月8日——9月5日（笔谈）。

王超华《北高联与绝食团、广播站的关系》。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58—159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58页。

同上，第59页。

常劲《声援绝食》。同上，第177—178页。

梁二《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2-183页。

同上。

常劲《声援绝食》同上，第179页。

李录《绝食团指挥部的工作》同上，第139页。

同上。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5日。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67页。

同上，第66页。

同上，第67页。

同上，第68页。

清华大学学生。

北京日报记者《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救护见闻》。载1989年6月27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第3版。

同上。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30页。

同上。

协和医院大夫。

参见王超华的回忆，《回顾与反思》，第162页。

北京日报记者《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救护见闻》。载1989年6月27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第3版。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35页。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6日。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68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33页。

同上，第135页。

同上，第133—134页。

同上，第134页。

浦志强《向党交心——我在六四清查运动中提交的反思》。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24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34页。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6日。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68页。

指“绝食团指挥部”的规定。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7日。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69页。

同上，第69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34页。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7日。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69页。

同上。

同上，第70页。

同上，第136页。

同上，第137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统计：截止5月19日：“从5月13日起，全市医疗卫生系统累计收治绝食学生6003人次，其中留院观察4564人次。无一人死亡。”截止5月21日：“各医院自13日起收治的学生人数累计为门诊8258人次，留院观察6597人次。”截止5月24日“18：00，全市32所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一人死亡。”详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94、101、108页。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认为：“所言‘没有一人因绝食死亡’不实，至少骆一禾是因绝食死亡的。”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17页。

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57页。

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 第六节：“八六学潮”，天平迅速倾斜。

梁二《北高联在广场》。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53页。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四节：赵紫阳醉酒。参见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4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31页。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4页。

北京日报记者《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救护见闻》。载1989年6月27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第3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31页。

同上。

北京日报记者《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救护见闻》。载1989年6月27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第3版。

绝食团指挥部人员。

李录《绝食团指挥部的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39—141页。

北京日报记者《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救护见闻》。载1989年6月27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第3版。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7页。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8日。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69页。

常劲《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77—178页。

李录《绝食团指挥部的工作》同上，第141页。

柴玲5月17日上午晕倒入院，18日刚刚出院。

张伯笠《五月十八日》。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4页。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32页。

张伦听杨朝晖说过，“是他去汽车几场联系大客车的”。见张伦《五月十八日》。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5页。

封从德《五月十八日》。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4—195页。

张伯笠《广播站与指挥车》。同上，第188页。

北京日报记者《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救护见闻》。载1989年6月27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第3版。

同上。

详见第六卷 第十三章 第七节：恐吓or警告？——风马牛对话。

李录《复食》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7—168页。

李录《复食》常劲插话。同上，第167—168页。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北京日报记者《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救护见闻》。载1989年6月27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第3版。

5月16日。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29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29—330页。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31页。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3页。

详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六章 第二节：江泽民微服进京。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4—127页。

参见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5—126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36页。

参见秦越《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与山西省城的政治动乱》。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28日。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415页。

没有政府医药行政部门的批准，在这么大规模的救助中，医疗物资的费用报销是不可思议的。据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称，5月16日，北京市卫生局曾急招在京部分医院和城区卫生局领导人会议，“要求各医院要不惜代价，全力抢救急救中心和各方送到的学生”。市卫生局还成立了以副局长高寿征、李长明为指挥的“抢救指挥中心”，并“每天安排4个医院组织的医疗队到现场抢救。同时已组织12个医院120名医务人员日夜轮流值班。”见该书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2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同上，第416页。

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4—25页。

载于1989年5月17日《光明日报》。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30页。

同上，第127—13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页。

1989年5月18日“北大筹委会”传单。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来自军人的八封信》。载《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第7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502页。

同上，第500页。

同上，第502页。

同上，第503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8页。

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七节 《人民日报》记者“逼宫”。

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6页。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33—137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8日，第151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21页。

同上，第314页。

李录《北高联在广场》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0页。

详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

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56—157页。

王超华《动机与局限》同上，第341—342页。

王超华《北高联在广场》同上，第15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6日，第131页。

梁二《北京工自联》。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98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6-187页。

亚衣《中国工人运动与自由工会运动——采访李进进》。载《中国之春》1993年5月号。

李进进《我在1989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15页。

亚衣《中国工人运动与自由工会运动——采访李进进》。载《中国之春》1993年5月号。

参见亚衣《中国工人运动与自由工会运动——采访李进进》。载《中国之春》1993年5月号。李进进《我在1989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15—216页。

亚衣《中国工人运动与自由工会运动——采访李进进》。载《中国之春》1993年5月号。

韩东方，男，1963年生。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工人。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1—402页。

参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七章 第一节：争取不流血的努力。

亚衣《“六四”牌不能再打——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载《中国之春》1993年，第4期。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8-189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4—40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39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88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36-537页。

本节李鹏《“六四”日记》和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删节较多。括弧内的这段话，在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中，被置于上一节的末尾，李鹏《“六四”日记》中根本没有这段话。本书的版本取舍，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117-123页。

以上内容李鹏《“六四”日记》没有。但分别见于《真相》所载乔石、彭真、万里此前此后的讲话。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118页，及注解。

以上诸多文字不见于李鹏《“六四”日记》和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119-121页，及注解。

本节引用文字，经对照李鹏《“六四”日记》、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及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三份资料，采纳后者。见该书第四部分，第242—24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9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99页。

本节引用文字，经对照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及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两份资料，采纳后者。见该书第四部分，第252—253页。括弧内文字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没有。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40页。

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92—93页。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四、五、六、七节。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81—82页。

封从德给李淑娴写信的日期是4月8日。见封从德《动机与局限》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56页。

参见常劲《从胡耀邦逝世到北大筹委会》、沈彤《北大校园活动》。同上，第1、12页。

沈彤《北大校园活动》同上，第15页。

参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一节：共识的形成与策略的调整；沈彤《北大校园活动》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5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01页。

老木《北大校园活动》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16页。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页。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六章 第五节：“中国魂”、“七条”与大会堂请愿。参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张伯笠《4.17游行》；封从德《民主机制与组织建制》。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0、51页。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一节：共识的形成与策略调整。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同上，第176页。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四节：请战—碰头会—密诏。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5日，第69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第17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6日，第76页。

参见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2页。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7日，第7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03—10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21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三节：从“草地沙龙”到“民主沙龙”。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二节：北高联。

刘刚网文《我的同号陈明远》。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01—403页。

《方励之与柏林留学生座谈会记录》晓阳记录整理。载《中国之春》1991年3月号。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03—页。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7日，第209页。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七节：“治理整顿”的来踪与“倒赵风潮”的去迹。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90页。

三人同为北大经济系77级同学。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91—592页。

同上，第592页。

同上，第594页。

同上，第595页。

同上，第59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9—160页。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01页。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01—603页。

参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39页。

即“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参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八节：山雨欲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二节：异议运动的萌动。

见本书第四卷 第八章 第一节：共识的形成与策略调整。

详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六章 第五节：“北知联”与“联席会”。

据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79—480页。2013年1月7日，陈子明与陈小雅的“对质”时，陈小雅问陈子明为什么要将《告人民书》落款“部分国家机关干部”时，陈子明答道：“那你想让我署我的名字吗？”（有录音）。

参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41页。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81页。

参见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征求意见稿）；《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481页；中共研

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58—59页载“北大”传单。

括弧内为引者注。

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41页。据称，《人民日报》号外依据的是该份文告的“北大传单”版本。

杨尚昆《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见《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二五五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册，第614页）与李鹏5月22日日记，这个讲话是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报告后的讲话（第169页）。

戴晴《也谈春夏之交》。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06页。

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二，1989年9月25日。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册，第750-751页；李鹏《“六四”日记》也有相同记载。但陈一谔否认有这个内容。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06页。

那时公主坟还没建立交桥。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99—400页。

张元发《戒严前夜》。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51—552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07页。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9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87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69—70页。

同上，第71—72页。

当天许多人得到的消息都是19日晚开始戒严。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同上。

刘燕《在统战部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01—202页。

梁二《在统战部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02页。

沈彤《在统战部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03页。

马晓力，女，时任统战部副局长。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时任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女儿。

王苏波，海军司令部中校研究员。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刘燕《在统战部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02页。

即5月15日绝食团指挥不成立会议的共识。参见本书下册 第二章 第一节：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李录《营地联席会议》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6—167页。

李录《复食》同上，第167页。

详见本书下册 第二章 第三节：不信任的加深。

原文误记为18日。

李录《复食》见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8页。

同上，第169页。

柴玲《赵紫阳到广场与决定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9—200页。

李录《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8页。

柴玲《赵紫阳到广场与决定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0页。

李录《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9—17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李录《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8—169页。

老木《复食》同上，第198—199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91页。

张伯笠《复食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5页。

张伯笠《复食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同上，第196页。但张伯笠在后来的文章说是“17票反对，33票弃权”，而且是在他这个主持人讲完后立即表决的。张伯笠写道：“显然，全体代表都被我的讲话所感动。我没有给任何人再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提出绝食团指挥部决定将绝食斗争改为静坐斗争，请全体代表表决。”见《中国之春》1994年5月号47页。另据香港《文汇报》1989年5月20日头版报道，柴玲在晚上21时宣佈停止绝食，此前，“在刚刚结束的各校联席会议上，上述声明以52票赞成、14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

张伯笠《复食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6页。

张伯笠《复食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同上，第196页。

同上。

封从德批注：没有的事儿。

柴玲《赵紫阳到广场与决定复食》同上，第200页。

张伯笠《复食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同上，第197页。 陈小雅《89见闻录》。

张伯笠《复食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同上，第197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55—356页。

王超华《学运之声反对复食》、辛苦《大家非常不满》、王超华《高联正式讨论撤退》。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4-205、212页。

同上，第198页。

李录《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69—170页。

张伯笠《复食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5-206页。

同上，第197页。

同上。

《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四-三六）。

沈彤《绝食后的对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86—87页。

封从德批注：香港《明报》1989年5月20日第2版报道，是在凌晨二时在指挥车上宣佈的“广场上的30万大学生立即全部绝食。”香港《星岛日报》

及《天天日报》同日头版、《华侨日报》第2版均说是在凌晨一时四十分宣佈的，人数是20万。

见张伯笠《复食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97、198、200页；封从德《第二次表决：结果相反》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页。

柴玲《赵紫阳到广场与决定复食》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1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0日，第16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58-559页。

摘自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台湾风云时代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第510—514页。

参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0页；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99页。

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平暴中发挥空中突击队作用 陆军航空兵表扬先进》。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7日，第2版。

《北大女生的六封信》5月24日，第一封。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78页。

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99页。

吕克相《敞篷军列抢运兵》。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页。

吕克相《敞篷军列抢运兵》。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5月21日。

参见据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06页；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01页。

尹品端、李天印《将军与士兵——访北京军区炮兵某师师长陈明义少将》。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30日，第5版。

常劲《北大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90—291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81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0页。

摘自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台湾风云时代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第510—51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55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1—402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88—89页。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46—4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55页。

高新《狱中采访和审讯》。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打“V”形手势，以示胜利。这是八九民运中在互不相识的参加者和同情者之间互相沟通，以为勉励的一个最流行的手势。

摘自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台湾风云时代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第510—514页。

李旦生等《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开进》。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3页。

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同上。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82页。

同上，下册，第584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01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84页。

据《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称，5月17日的倒邓狂澜中便出现了一支有200多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到邓小平府上高喊“小平出来”，见该书85—86页；而《癫狂的蛇年之夏》称它于5月18日零时正式纠集而成。《京都血火》称其成份中“无业人员和个体户占76%”，因流氓、诈骗、盗窃等被判刑、劳教、拘留处理过的人员”占34、3%，见该书第133页。

摘自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台湾风云时代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第510—514页。

《北大女生的六封信》5月24日，第一封。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77页。

同上，第77页。

同上，第78页。

同上，第78页。

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5页。

辛健《在被围困的日子里》。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7页。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尽快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通告》。1989年5月22日。

《北京戒严40小时》载《科技日报》5月22日头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1—402页。

《北京戒严40小时》载《科技日报》5月22日头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83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2页。

《北大女生的六封信》5月24日，第一封。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78页。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0日，第160—161页。

《北大传单》5月21日。

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95页。

同上，第95—97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55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93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07—409页。

“二百五”是北方人的骂人话。形容一个人愚蠢。见万润南《我的 1989（7）袁木其人》。

“菜篮子工程”因政府为解决市民副食与蔬菜供应问题的措施而得名。后扩展为国家对用于消费的物质生产和供应的干预。“鸽子窝”指居民住房的狭小如同鸽子窝。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56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01—102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58页。

同上。

详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六章 第一节 八老问政——“接班人之争”的背后。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1日，第164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三章，第五节：大井事件。

BBC采访鲍彤。http://www.bbc.co.uk/mandarin/my_century/tiananmen/mc0306.ram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6页。参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二节：护邓？挟邓？抛邓？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见本书第二卷 第四章 第三节：重整河山。

阎明复与杨尚昆的密切关系，见《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32页。

林道静《杨尚昆晚年的无奈和悲情》2002年1月1日。<http://www.renminbao.com>

同上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三章 第三节：中南海：焦虑之夜。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77-478页。

杨尚昆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讲话》。见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第478页）记载赵紫阳信中此处为“因为”，本文采用杨尚昆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讲话》说法。见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4页。

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三章 第六节：赵紫阳泪洒广场。

杨尚昆5月25日《在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5页。

同上，第258页。

同上，第257页。

同上，第257页。

同上，第256页。

同上，第258页。

姚力文（1926年—），山东省金乡县城关镇人。1941年9月参加革命，194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后历任《冀鲁豫日报》编辑、记者、编辑组长；《人民日报》第一批驻省首席记者。1958年5月，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综合组研究员，1958年5月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

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55页。

见吴稼祥《螳螂、黄雀和蝉的故事》、《泡面传奇》。参考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邓南巡讲话及6月两次去首钢（首都钢铁公司）讲话，都说明邓对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体制很为不满。给人印象：要解决江、李体制。……此时，杨尚昆、万里误以为邓（小平）换江（泽

民）、李（鹏）的决心下了，便做出以杨（尚昆）为首组成中共中央顾问小组的决定，以代替邓过世后做‘最高权威’。”

赵紫阳回忆没有说明与乔石谈话是上午还是下午。在《改革历程》中，这次谈话顺序被排在与阎明复谈话之前。但如果赵紫阳与阎明复谈话（如李鹏《“六四”日记》所载）是在5月21日上午的话，笔者推测他与乔石的谈话是在下午。

彭冲（1915—2010年），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玉泉山位于北京颐和园西侧，得名于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为清代皇帝及皇室专用的饮用水。玉泉山自毛泽东时代起被隔离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别墅建筑群的所在地。

吴学谦（1921—2008年）：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3页。

《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第25条。

见《人民日报》5月19日头版。

参见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1997年8月3日：“张广友（原《农民日报》总编辑）来坐。说，7月初去了赵紫阳那儿。一、赵说：“万里在‘六四’后从美国回沪，李鹏代表中央给他拟一电报要他支持天安门镇压。万里说过‘镇压是必要的，哪个国家也不许可这样闹！’万里为什么这么说？有几种可能。但无论如何这定会影响他作为开明政治家的形象。我劝他给中

央或江泽民一函，简单说，适当时机应给‘六四’一个说法。这就为未来结论时，给自己留下一个说法。”

1989年7月3日《胡绩伟在人大常委会上的书面发言》关于签名问题的说明记载，18日呼吁常委为12人；《“四通研究所”的严正声明》载为18人。此处采用胡绩伟说法。

1989年5月31日《“四通研究所”的严正声明》载《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部分，第101页。

叶光《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6日。

1989年7月3日《胡绩伟在人大常委会上的书面发言》关于签名问题的说明。

同上。

同上。

参见1989年5月31日《“四通研究所”的严正声明》载《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部分，第101页；叶光《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6日。

1989年7月3日《胡绩伟在人大常委会上的书面发言》关于签名问题的说明。

参见1989年7月3日《胡绩伟在人大常委会上的书面发言》关于签名问题的说明；1989年5月31日《“四通研究所”的严正声明》载《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部分，第101页。

1989年7月3日《胡绩伟在人大常委会上的书面发言》为什么要委托四通研究所。

同上，关于香港《文汇报》刊登的情况；1989年5月31日《“四通研究所”的严正声明》载《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部分，第101页。

同上，关于香港《文汇报》刊登的情况。

同上。

许良英是中国科学院教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2日，第166页。

同上，第173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2日，第168页。

李鹏《“六四”日记》5月22日（第172页）记为：“要进天安门。”

乔石1989年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讲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66页

这与杨尚昆说，廖汉生提出戒严情况不符。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三章，第二节：“戒严”决定的出台。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2日，第173页。

笔者曾通过电子邮件询问过鲍彤，鲍彤对此没有回答。

据鲍彤本人提供《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十五，1989年9月25日。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226-227页。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六节：赵紫阳的闪避。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三节：“出手”时机的选择。

王岐山在1988年调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之前，一直在杜润生手下发展。

参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13页；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1998年6月4日，载《小参考》。

见刘亚洲《信念与道德》，载《刘亚洲文集》第8页。

这第二次调兵从4月27日一直持续到5月5日。载《38军军史》。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60页。

同上，下册，第560-561页。

同上，下册，第561-562页。

同上，下册，第563页。

1989年5月22日《新闻快讯》社代宣。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来自军人的八封信》。载陈小雅《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2003年，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第76页。

详见本册第五章 第五节：“F75”行动。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0年5月1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97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0年9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98—99页。

见5月22日《人民日报》。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98—99页。

详见本书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五节：中科院“百日维新”。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电子版）第401页。

参见万润南《我为“六四”做了两件事》；吴仁华《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94页。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08页。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

这“四大王牌师”是：陆军第54集团军第127师；陆军第39集团军第116师；陆军第38集团军第113师；陆军第38集团军的第112师。

高子荣《一篇新闻稿》。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6—9页。

辛健《在被围困的日子里》。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16页。

黄桂中《3600秒的考验》。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58页。

1989年5月23日《北大传单》。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来自军人的八封信》。载陈小雅《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2003年，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第79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来自军人的八封信》。载陈小雅《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2003年，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第76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93年1月6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八九 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门之变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
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十六章 主角的替换

第一节 八老问政——“接班人之争”的背后

第二节 江泽民微服进京

第三节 “真空期”

第四节 广场的支撑

第五节 “北知联”与“联席会”

第六节 “旅游革命家”占领时期

第七节 最后药方：空校？办学？

第八节 一样“流血”，两种“期待”

第十七章 形势急转

第一节 争取不流血的努力

第二节 “多余的话”

第三节 接力绝食

第四节 扫清外围

第五节 “F75”行动

第六节 催泪弹

第七节 清场决定

注释

第十六章 主角的替换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苏晓康、包遵信、仲维光、封从德、宋永毅、高伐林、李进进）

俯瞰1989年4至5月的形势，如同一场又一场的接力比赛。竞争各方，都朝着压到对方的目标，竞相追赶。当5月中旬结束时，这场A组（由学生—>新闻界—>知识界—>全社会推出）的大字报—游行—罢课—绝食—反戒严运动，与B组（由政府各派推出）的言论震慑—武力威胁—分化瓦解—戒严—“斩首行动”，构成的“武艺大比拼”，双方都已经花招用尽，并完成了最后一棒的传递。

等待中国人的，将会是一场世纪喜宴？还是惊天噩耗？

历史，在给定的环境下，依据人性的定理和政治的法则，并没有留给人们多少选择的余地。

第一节 八老问政——“接班人之争”的背后

据李鹏《“六四”日记》5月21日，他曾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邓小平：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事实上，这天的晚上，被称为决定中国政治事务的八位顶级元老，再次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了赵紫阳和相关人士的免职、总书记的“接班人”，

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等党国最重大问题。参与议论的人士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由于政见的不合，依然健在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照例没有参与这次决策。

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解决赵紫阳问题”的主题。在稍稍论述了一番“必要性”和“紧迫性”之后，他说：

赵紫阳在处理学运问题上“固执己见”，对目前形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令邓小平气不过的是，赵不参加首都党政军领导人大会。邓认为这是赵“严格想把我们与他划开一条线来，表明他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不谈赵紫阳的问题。”

李先念历数了赵紫阳从“四二六”社论到“亚行讲话”；从“戈氏会谈”到广场“告别演说”的问题，鲜明提出了“两个司令部”的问题：

“赵紫阳就属于另一个司令部，现在就要揭这个底、挖这个根子，否则党内思想统一不了。……北京戒严这么重要的会，他作为总书记可以请病假，又不是病得卧床不起了，他是有意制造党内分裂。他反对在北京戒严，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迫使我们这些老家伙交权、下台，搞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套。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他束手束脚，搞不了。赵紫阳已不适合担任总书记。”

王震则仍困于自己的“退休综合征”，一如既往地抓住“小字辈”是否尊重“老家伙”的问题，从《河殤》说开去，顺带提出了胡启立主持的“新闻维新”，认为他在戒严问题上态度不鲜明，“也应该撤掉。”

邓颖超则从作风和纪律的角度，揭示了总书记与总理矛盾的由来：

“赵紫阳同志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犹豫，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犯了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现在，社会上都把他当作一位改革家，是改革派。但他不谦虚。事实上这些改革方案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应该算在他的

头上。这些改革方案很多是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你们定的，他只是执行。李鹏对我说，他今年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讲政府工作失误时，想写一段过去的话，到赵紫阳同志那里却通不过，结果把失误统统算成是现在的。”

邓小平立即作愤愤不平状，赶紧安慰老太太说：“这些乱子，不是去年开始才有的，是三年以前就很明白的，五年以前就出现了的。算账也有他的一份。”

邓颖超也见好就收：“党的总书记应该虚怀若谷、承担责任。这次事件表明，赵紫阳同志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

彭真则言简意赅地表示：“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应该重新考虑总书记的人选。”

此时，杨尚昆第一次表示了与邓小平的不同意见。但话说得比较婉转：

“在这件事情上，赵紫阳的确犯有严重的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胡启立的思想也与中央的意见不统一。但我个人意见，还是从大局出发，团结为主。何况现在这个时候更换总书记不是时候，可以让赵紫阳作检讨。常委的班子还是要避免大的改动，国外总说我们这派那派，希望我们内部闹不团结。现在就已经开始大造舆论了。”

邓小平没有听出杨尚昆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立即对这种“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的态度表示嗤之以鼻。大概是害怕杨尚昆一语影响后面发言人的表态，他疾言厉色地说：

“赵紫阳……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分裂党，支持动乱。好在有我们在，还能压压阵。赵紫阳怂恿动乱，没有不换的道理，胡启立也不适合再当常委。不换，怎么向全党交代？他们不能成为全党的榜样。只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改变，只要坚持我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看换班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换，怎么向全党交代”一句，再次泄露了邓小平要找“替罪羊”的意思。与当年处理胡耀邦出于同一考虑。

接着，在肯定了常委班子团结的重要性的和榜样的作用之后，他急于转到下一个环节——提出新的人选。不过，他请陈云先说。

陈云的发言不多，也不激烈，但没有废话，而且几乎是“结论性”的：

“大家谈了很多关于赵紫阳同志的看法，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赵紫阳、胡启立不适合再当常委。新的总书记，新的常委班子成员在政治上首先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党性原则强；要能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不偏激，不主观，工作协调能力强；要学马列，懂理论，知识面广，工作实绩要好；要有良好的形象，各方面都能接受，能统领民心，稳定、可靠。先念同志跟我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同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我到上海几次，他都与我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为人谦虚，党性原则强，知识面也很广，在上海人缘不错。”

接着，李先念对自己推荐江泽民一事，作了必要的解释，但强调的是他对江泽民政治态度和工作能力的欣赏：

“我虽与江泽民同志没有太多的接触，但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不错。我记得，1987年初那次闹学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上海，江泽民自己到大学与学生辩论，有理有据，工作做得主动，做在中央前头，很有头脑。这次我观察了一下，‘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最早采取措施贯彻中央精神的还是上海，江泽民第二天就召开万人以上干部大会，把那个《世界经济导报》整顿了，不简单！当初做出这样的举动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但他顶得住，不退让，坚持原则！中央党政军大会部署戒严后，第一个向中央表态的又是上海，这种坚决态度，难得。所以，从政治上、党性上看，江泽民这方面有一贯性。当然，江泽民抓经济工作也有一套，这几年上海的经济工作基础打得不错，

我听过几次他谈上海的规划，谈得很透，有一套。还有，江泽民形象不错，年富力强。我同意他为总书记的人选。”

王震似乎没领会，上述“建议”实际上是邓陈李三巨头已经商定的事情，按照“党内民主”的信念，他提出的总书记继任人选是李鹏。遵循的是“论功行赏”的原则。他还说，“江泽民没有中央工作经验。总书记应该从常委当中产生。”

彭真似乎也不在意“三巨头”，依然按照毛泽东时代自己一贯奉行的原则——保自己的“山头”。不过，他提名的不是在这次运动中机关算尽的陈希同，而是邓小平也欣赏的改革派大将——万里。他说：

“万里同志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既在地方干过，又在中央干，熟悉全国情况，现在又抓法制建设，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有威望，拿得起来。”

兵来将挡，陈云立马封住了彭真：

“万里同志年纪较大，本来安排他去人大就有退居二线的意思。我建议，在常委人选上，能否考虑宋平同志参加进来。他接任组织部长后，干部路线上抓得还是很有成绩的。”

由此，从来“后发制人”的陈云，这次不仅提名了总书记，还把胡启立空出的位置也先占了。不清楚是陈云给了薄一波一个满意，还是薄一波给了陈云一个满意？薄一波赶紧补上一票：

“宋平同志搞计划出身，工作非常认真细致，在省部级干部的考察、培养与任用上，做了非常深入的工作，组织系统的同志对他评价很高。他对自己要求严，组织纪律性强。这次事件，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我同意陈云同志的建议。”

按照论资排辈的党内规则，杨尚昆不得不一直听着这几位“前辈”排兵布阵。事实上，早在5月11日，邓小平结束“闭关”，就同他谈到了江泽民的

问题。在5月18日邓家的老人通气会上，邓已经披露了“赵下江上”的决定。也许是杨尚昆忙于部署戒严，没有在意那次通气会放出的信息；也许是他仍一味相信，邓小平在17日常委会所说“赵还是总书记”，他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决定总书记“换马”，似乎全然没有思想准备。按照他与赵紫阳已经达成的默契，赵不会过问军事，这样才能保证他推荐的杨白冰上位。现在，突然提出赵紫阳下，那么接班人能否与他合作？就成了未知数。因此，等他回味过来时，他决定力挽狂澜：

“总书记可以考虑从现有常委中产生”。杨尚昆接过王震的话头，不过他并不同意王震提的人选。他说：

“现在各方面都把矛头对准李鹏同志，反对他的呼声很高，如果提议由李鹏同志担任总书记，党内会有很大的压力。乔石同志年富力强，他是目前常委中在中央各要职部门担任工作最多的一位，当过组织部长、党校校长、中办主任、政法委书记、中纪委书记，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总理，长期在书记处工作，熟悉中央机关情况。为人清廉，工作能力强，在中央机关有威信。我提议乔石为总书记人选。”他应该深知，这是他实现邓后“摄政王”计划的唯一时刻。但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这也是杨尚昆与江泽民结仇之始。

乔石，1924年生于浙江定海，原名蒋志彤。曾就读于华东联合大学文学系。早年参加、并组织上海学生运动。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南方中学、光华附中地下党支部书记，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干事；抗战胜利后，历任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上海地下党新市区委副书记，上海市北一区学委书记。组织指挥了同济大学“一二九”争民主、反迫害运动，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中共建政后，乔石曾任杭州市委青委书记，中共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1952年，与地下工作时期认识的郁文女士结婚。1954年至1962年任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工程技术处副处长、处长，酒泉钢铁公司设计院院长兼钢铁研

究院院长，酒泉钢铁公司陕西工程管理处党委书记。1963年4月，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研究员、副局长、局长。

乔石妻子郁文虽早年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参加革命工作，但因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外甥女，受身份牵连，乔石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残酷迫害。乔石因此被隔离审查和拘禁，还先后两次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文革结束后，1978年1月至1983年7月，乔石先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3年6月，乔石开始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此进入党的高层领导人重点培养序列。在熟悉了党中央的办事程序后，1984年4月，党中央又让他兼任中组部长，使之熟悉了解干部队伍。

1985年7月，乔石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年4月任国务院主管政法的副总理。

1987年11月，在中共党的“十三大”上，乔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9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从个人经历看，乔石受过党内极左路线迫害，对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路线应有免疫机会；在党资历和在中央工作的经历都胜于江泽民，但在地方独当一面的资历略显欠缺。从政治观点上看，乔石与胡、赵相去不远，自然也可以与杨尚昆共事。从人事关系背景看，乔石属于政法系，应能受到彭真支持；而他与江泽民一样，都没有军中背景，在这方面，不会与杨尚昆“军队梦”产生冲突。最重要的，也如同他所说，乔石有清誉，可以为全党上下左右所接受。如果是在“和平时期”，他应该是取代赵的不二人选。

据江泽民传记作者库恩掌握的信息，杨尚昆还认为江泽民“没有治军经验，甚至连枪也没开过”。江若当政，要结盟的军人会是谁？对于杨尚昆来说，远不如他对赵紫阳或乔石来得放心。

但邓小平主意已定，而且他立刻找到了乔石在处理动乱方面的缺点。邓小平说：

“总书记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表明态度，旗帜鲜明。天津的李瑞环有干劲、有魄力、有思想，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化解各种矛盾，很适合做宣传鼓动工作。我跟他谈过几次，别看他木匠出身，劳动模范的帽子一直戴在他的头上。其实这个人很有思想，他懂哲学，并能活学活用。这个人敢于坚持原则，经济工作也做得出色。这几年天津的市政建设、引水工程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李瑞环算得上是一个实干家，在天津有口皆碑，天津老百姓心目中威望高得很。常委中应该像有李瑞环这样干实事的人，这样群众才会服气，才会知道中央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经济建设方面是一贯的，才不会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他是常委的一个合适人选。”

大概是有感于邓小平对老太太的体谅，善解人意的邓颖超也投桃报李：

“我对李瑞环这个人印象不错。共产党的领导人应该要有亲民思想，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千万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定要有高远的思想境界。”

这样，邓小平终于在失掉常委中的两员大将后，又在常委中补进一个自己中意的人选。事后有人认为，邓小平属意李瑞环，并提名他当总书记，这恐怕是误解。他仅仅为了在反对乔石之后转移话题，以免杨尚昆的难堪，且只是提名李当常委而已。

李先念对于这一点似乎看得很清楚，于是提议见好就收：“总书记的人选、常委的人选，我建议是不是再酝酿、考虑一下，考虑得越周到、越全面，对党的事业、对国家的前途就越有利。”

邓小平也无心恋战，立即表示：“我同意先念同志意见。这几天我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进行反复比较。待考虑成熟后，再正式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我们的意见，并建议召开中央全会。”

陈云表示“同意”后，彭真提出了万里如何“回国”的问题：

“社会各界要求万里回国的呼声很强烈，还有人想期待万里回来解决问题。我看，万里继续在美国访问不妥，对中央对万里本人都会有压力。一下子回来也不是很策略。”

大佬们合计，万里还是先到上海。由江泽民先对他做做工作。

会议结束前，邓小平还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要立即召开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会议”，以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关于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书记处另两位成员的问题，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可以先停职，具体决定由中央全会作出。”

5月23日上午，杨尚昆、薄一波向李鹏传达了“打招呼会议”的决定。当日下午，邓小平同意向高级干部通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杨尚昆的目标没有达到，陈希同们上位的前景也落空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它的后果，还将在以后的历史中展开。眼前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军队突然决定：不急于进城。

第二节 江泽民微服进京

事实上，关于赵下江上的问题，早在“八老”会议以前的5月19日已经定了下来。根据李鹏日记，这次会议仍在邓小平家召开。到会的有陈云、李先念、杨尚昆，政治局常委中的李鹏、乔石、姚依林，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

赵南起、杨白冰，还有国防部长秦基伟、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于上午10：00开始。邓小平先讲了六点意见，根据李鹏记录，主要内容如下：

一、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二、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三、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保护学生，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快恢复正常秩序。无政府主义任它发展，很快就会波及全国，不可收拾。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动乱分子搞打砸抢，也有暗藏武器，他们要反抗，阻挠戒严。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我们这些人，都搞过学生运动，也算有经验。知道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逮捕人不可免，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台湾不是戒严20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開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

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安。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更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五、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熟悉党务，熟悉人的情况，可以帮三年。中央领导要逐步年青化，老同志一年不如一年，就不再进常委了，在一边帮忙更好些。常委还应该补充一两名在地方工作、搞改革、有成效的人。新的常委要树立新的形象，政治局应该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局。

六、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十三大从理论到实践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不能因为动乱而发生动摇。动乱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解决了，能保持10年，甚至20年的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那天的会议，李鹏是到得较早的一个。在会前，邓小平把他叫到书房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又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李鹏当即表示赞同说，在1987年学潮中，在这次动乱中，江泽民同志都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既有在中央部委工作经验，又有地方工作的经历，是总书记合适的人选。

江泽民，1926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祖父江石溪弃医从商，好琴棋书画，有发明。父亲江世俊是家中长子，承家风，擅诗文辞赋；曾投靠汪精卫政权，任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改名“江冠千”。江泽民是江世俊五个子女中的老三。1931年，江泽民5岁就读于家乡的琼花观小学。该校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其传统课程颇结合地方历史特点——围绕“四艺”，开设了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等课程。这些教育与长辈的喜好、家庭的氛围和社会风尚相结合，铸成了江泽民一生的爱好和习惯。

据库恩《江泽民传》介绍，江泽民自幼敬仰民族英雄史可法；年仅10岁的他，就以一篇支持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爱国文章，考取了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在中学，他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教育。1939年7月，江泽民的六叔——共产党员江世侯（江上青）在一次意外的“民团”伏击中牺牲，年已13岁的江泽民被“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作为子嗣，继承江世侯的香火。自1933年祖父去世后，江氏大家族已家道中落。但没有资料证明，此后的江泽民受到的“精英教育”得自中共党组织的接济。据此推理，“过继”后的江泽民仍然得到生父江世俊的接济，完成中学学业，并进入汪精卫伪政权开办的大学接受现代高等教育。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后，扬州中学分为三部，从江泽民的前后履历看，他就读的可能是迁往泰州乡下的“泰校”。

1943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同年进入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没有资料说明，他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或被保送至此，还是通过其他渠道进入了该校？库恩的交代只有一句话：“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

就读“伪央大”期间，江泽民曾参加该校学生反对抽鸦片的“禁烟”运动。事后知道，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从四川迁回南京，“伪央大”被分拆，部分专业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则被命令，需经过“政治甄别”和“重新考试”方可重新就学。江泽民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反对国民党教育部“甄别”和“重考”政策的学生运动。但汪伪政权的垮台，使江泽民失去了从生父那里得到的供养，他一度依靠国民政府对贫困大学生的救济度日。所幸他的学业优良，至1947年，21周岁的江泽民修完整4年的学业，从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

大学毕业后的江泽民一度失业，后来在交大师生的帮助下，在一家洋行的冰激凌厂（即后来的“益民食品一厂”）找到第一份工作。

从“反鸦片”到“反甄别”运动，江泽民与共产党员结下了友谊。1946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上海人民抗议苏联在东北暴行的运动中，他参加了“暗中保卫苏联大使馆运动”，掩护共产党员活动，以及国民党退台时的“护厂”活动。

1949年共产党接管上海后，江泽民有幸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贵人——汪道涵。他的敬业乐群，年轻有为，使之很快由专业技术人员升任管理者，直至党的基层领导。从此进入共产党的专家行列。

但是，历次党内整肃和政治审查运动，对于有着家世疑点的江泽民来说，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幸的是，他从这类斗争中获得的教训，转化为他日后较为开明的作风，以及做人的朴素和谨慎。当然，也决定了他日后选择的“大家庭”生活方式——承担起对于继母和堂妹们的责任。

1955年，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有革命背景和专业技能的江泽民得以进入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并由此掌握了俄语。1956年回国后，江先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

厂厂长。为国产第一部红旗牌轿车的下线和汽车制造动力的“煤改油”作出了贡献。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他依据专业常识，也发表过不满言论。1962年后，江泽民转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

在文革中，江泽民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相反，北京的“走资派”被打倒后形成的职位空缺，为他书写国家机关经历提供了机会。1970年，江泽民从一机部“干校”被直接调进北京，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由此，他结束了“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期”，获得了第一个“政府职务”。但是，他依然是干实事的角色。因为他很快被命令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对中国允诺的15座机械制造厂援建事宜进行了考察和规划。趁此机会，他恶补了罗马尼亚语。

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回朝，使北京的党政机关各个领导职位充塞爆满。江泽民很难获得快速晋升机会。1980年后，他转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精力、专业结构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确定了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政策。江泽民得益于其专业知识背景，更得力于曾经的领导人谷牧、汪道涵和周建南的推荐，被列入中组部中青年干部局的重点考察与培养序列。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经过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两次私下会见江泽民，1982年后，他由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升任部长、党组书记。1984年12月，赵紫阳率团考察上海，江泽民是唯一参团的正部级官员。受到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影响，赵紫阳认为“第三波”的工业发展一定以计算机为中心。上海要执中国“第三波”的牛耳。此时，上海市长汪道涵也到了届满离休的年龄。在汪和“一名元老”的力荐下，江泽民排除非议，升任上海市市长，兼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以后又升任上海市委书记。

图8-1：江泽民与北京对表

从1985年5月开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持的干部考察持续了数月。在新当选的64名中央委员中，有76%有大学文凭，平均年龄50出头。如何从这个平台上脱颖而出？政治背景成了最后角逐的资本。姚依林熟悉计划经济，是李先念的老部下、与陈云关系密切；胡启立此前是直辖市天津市委书记，并长期担任团中央领导，是邓小平看中的人，与胡耀邦关系也很好；田纪云熟悉财经工作，是赵紫阳从四川带来的人；乔石熟悉政法，是彭真的人；李鹏则是邓颖超的养子。正如傅高义先生所说：这场角逐的结局，“实际上以那些老干部的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随者取代了他们本人。”

在第一轮选拔中，江泽民只能进到候补“接班人”的第二个平台。但是出任中国第二大城市上海市的第一把手后，他已经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

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江泽民正式登上党和国家领导人选拔的平台。假以时日，不犯错误，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他迟早会进入这个行列。在他执政上海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艰难启动了老大有企业的改造的步伐，从市民生活到社会面貌，给这个昔日的东方明星城市注入了更多的现代性。他处理“八六学潮”的过程，被拍成录像在中南海播放时，他的处理现代社会矛盾的能力，得到许多领导人由衷的赞赏。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在内的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喜欢到上海去度过每年的春节。特别是李先念，退休后的大部分生活是在那里，而不是在自己中南海的家中度过的。到1989年4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发生时，作为省部级领导干部，这时的江泽民63岁——离退休年龄只剩下两年。

4月26日，上海市委在体育馆召开党政干部大会。江泽民宣布解除钦本立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第二天，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刘吉率领的“整顿小组”进驻《导报》。这个“制止动乱”的行动，抢在了跃跃欲试的北京市委之前。

4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赞扬了上海市委的决定。但此举引发了北京知识界的强烈反弹，在首都，学潮由此蔓延到知识界和新闻界。

“整顿小组”在《导报》社内的政令难行。上海新闻界记者的联合示威游行中，要求钦本立复职与要求江泽民辞职的标语并排高举。5月4日，上海游行人数逾万。许多著名知识界人士和作家、教师、新闻工作者参与其中。江泽民的好友钦本立走在队伍的前列。游行者提出了如下口号：结束官倒，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法治，以及新闻自由……

5月2日，阎明复告诉赵紫阳，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说，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

赵紫阳未必欣赏“导报”对胡耀邦问题的执着。而且，正是严家其所说的警惕“非程序更迭”引起了邓小平对赵的猜忌，因为“严家其是你的人”。但是赵紫阳或许认为，这是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他一直想为邓小平寻找下台的台阶。而“导报”事件与邓小平和“四二六”社论均无关系。这使我们得以理解，他从朝鲜回来首先掩饰了对于李鹏强硬路线的厌恶，但却以令人意外的直率，对远在上海的事件进行了指责。

5月10日，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赵紫阳的责备以后，5月11日，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江泽民求教于赵紫阳，请中央对上海市委处理“导报”问题予以支持。没想到赵紫阳回答他，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这件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据称，江泽民当时对赵紫阳这样对待“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他说，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

雪上加霜的是，赵紫阳的这些态度立即通过“导报”的北办传到上海，之后又被海外媒体披露。

5月13日开始，上海的学生也开始在外滩绝食；赵紫阳曾要求地方领导人跟学生对话，但在上海领导跟学生的对话中，江泽民并没有出现。5月16日中午12：00开始，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12所高校的4000多名学生冒雨上街游行。打出的横幅标语有：“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江泽民，你又错了！”“江泽民，你辞职吧，下台吧！”……游行队伍到市政府门口后，当场散发了《我们的请愿》。下午6：20分，静坐的学生代表正式向市府递交了请愿书。

图8-2：上海市政府大楼（陈小雅摄）

当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4000-5000人上街游行，绝食人数增加到70余名。晚10：00，市委、市政府经过紧急磋商后，以市委办公厅、市府办公厅名义发表广播讲话：

“市委、市府领导同志已经决定，明天和部分同学进行座谈、对话，并将在以后多层次、多渠道地进行。对于你们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党和政府会认真研究，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来解决，通过推进改革来解决，希望同学们保持冷静、理智、克制和秩序，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同学们，今天上海气温偏低，时有阴雨，大家游行静坐了好几个小时，已经十分疲劳，市委、市府领导同志十分关切，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休息，也希望各个学校老师们做好劝阻说服工作，动员同学们立即返校。”

但到17日凌晨，仍有200名左右学生在市府门前静坐，其中有40多名学生已经签名，准备绝食。当天，复旦大学已有200多名教授、教师，在贴出的一份教师“紧急呼吁书”上签名。

5月17日，复旦、同济、上海工大、华东师大、上海交大、中国纺织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20多所高校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解放日报社、世界经济导报社、文汇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等1

6家新闻、出版单位的少数职工，共3万余人上街游行。绝食学生增加到近200人。

此外，一向与共产党同舟共济的上海民主党派领导，也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江在民主和法律的框架下，尽快和学生对话，合情合理地处理学生的诉求。又建议他让新闻媒体客观公正和及时地发布消息。同一天，上海市委组织部的87名党员也致信江泽民，要求江跟学生对话，并宣布学生运动是爱国和民主的。上海市的三家报纸，两家电视台，以及其它主要媒体，都派出代表跟学生一起在市政府大楼前静坐。记者和编辑联署公开信，支持似乎已占得上风的学生。…… 这一系列事件，不能不构成对江泽民的连续打击。此时的江泽民，比那些绝食的学生更像是一个孤儿，而且根据传说，很有可能是一个被抛弃“替罪”的孤儿。

赵紫阳的绝决，把江泽民推向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所幸的是，他完美地接待了在上海度过最后一天的戈尔巴乔夫。他们不仅进行了融洽的会谈，戈氏夫妇还得以在游行学生中辟出通道，尊严地完成了向普希金纪念碑献花圈的仪式。戈尔巴乔夫刚走，5月18日凌晨（又抢在了赵紫阳前面），江泽民就手提扩音器走进了在外滩绝食的学生中。他对学生发表的演讲与赵紫阳第二天发表的演讲内容大致相同。江泽民说：

“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江泽民向学生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据当时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李劫回忆，5月19日下午，北京“三所一会”的传单传到上海，上海“高自联”学生领袖做出了静坐学生撤离人民广场的决定。但他们担心宣布这个决定会遭到学生的反对，甚至可能会引起学生否认他们权威，重新推举学生领袖。因此，华东师大的“高自联”领袖沈军找到李劫，询问该如何劝告学生撤离。为此，当时正在广场的李劫作了“不要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真理”的演讲，说服学生撤离。说服成功。傍晚时分，由华东师大学生率先，其他高校学生随后，相继撤离人民广场回校。之后，在上海市府前面绝食的学生，也于5月20日凌晨停止了绝食。李劫说：

“但北京宣布戒严，重又激怒了上海学生，20日中午，几乎所有上海高校的学生冲出校门，举行了上海规模最大的游行，抗议北京戒严。”

紧接着，北京形势的突变给江泽民带来了转机。在完成中央交托的一件大事之后，他突然再次被书记处紧急召到北京。接他的是一架专机，但当专机降落在乱糟糟的首都南苑机场时，等待他的是一辆桑塔纳。上车后，司机甚至要他换上一套类似画家工作服模样的服装，以便掩人耳目。直到此时，他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此行，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让人想起江泽民曾经历的“地下工作”年代。

第三节 “真空期”

天安门广场“绝食团指挥部”宣布改绝食为静坐以后，大部分原先绝食的学生不是被送进了医院，就是被送回各自的学校休息。指挥部成员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有“肩膀上如山的重负终于被卸了下来”。但因情况不明，并未马上撤离天安门广场。5月20日宣布戒严以后，原指挥部宣传

部还定出了“统一口径”的宣传口号：“打倒邓小平”、“独裁者”、“罢免李鹏”。同时，他们仍收到四方传来的戒严消息：

（1）戒严部队这一两天将要“屠城”；

（2）政府将派经过特殊训练的杀手到广场上暗杀学生领袖；

（3）地铁站已经关闭，天安门广场连续两天发生了真正的停水；

（4）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领导的集团军已经“在地铁、劳动人民文化宫准备了三个空降师”；

（5）北京市戒严指挥部印制了“一万张进城地图”，分发给分散进城的班或者排。

同时，还有“军人来提供了很多建议，包括怎么样穿插、切割，学生应该作什么样的策略”。

但他们“没有号召学生、市民去堵军车”，据张伯笠回忆：“指挥部绝对没有这个决定”。与此相反，出于对绝食团学生的责任意识，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讨论了形势和对策的问题。据李录回忆：

“因为在最初的几天一直在讨论军队肯定要进来，戒严以后没有想到阻挡军车还能有效。所以当时讨论的是要撤离，怎样撤离？在什么时间撤离？撤离的方式怎样？形成了一系列的决议，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讨论的重心。”

5月21日下午，在李录的坚持下，已经完成使命的“绝食团指挥部”召开了秘密会议。在确信的镇压将要到来时，为了“保护学运的火种”，他们决定原指挥部成员分散，并转入地下斗争。为此，郭海峰与封从德制定了各自的代号、联络的暗语、联系的方式；然后，由邵岩从财务部提款分给大家。每人分到1000元人民币，谓之“保命费”。

仿照革命历史故事《刑场上的婚礼》，5月21日晚9：00左右，柴玲为李录和前来探望他的未婚妻赵敏，举办了一个“广场上的婚礼”。由柴玲和封从德充当伴娘、伴郎，牵着光膀子穿背心的“新郎”和着妆朴素的“新娘”，在纪念碑周围转了一圈。张伯笠还在一张牛皮纸上用毛笔写成一张“结婚证”，盖上指挥部的大红印章，再当众高声地念了一遍：

“李录，男，23岁，与赵敏，女，25岁，自愿结为夫妻，白头偕老。绝食团指挥部批准结婚。特此证明。1989年5月21日。”

算是公证他们的婚姻。

结婚场面丰富多彩，完全出乎想象：一行人还没有走到大客车前，已经有人送来了鲜花花篮；郭海峰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只大西瓜；又有人送来两大瓶香槟……事后，封从德感叹道：“学运期间，似乎一切都成为了可能，一切都在众人的热情下低头让路。”

图8-3：李录婚礼（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同学们齐声祝贺：“恭喜！恭喜！”接着为两位新人唱起了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然后，众人齐声喊到：“新郎讲话！”于是李录说了一段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与当时心情的话：

“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我的口号是：既要战斗，又要结婚！”

众人一阵鼓掌，接着又喊：“新娘唱歌！”于是赵敏大方地唱了一段民歌，嗓音非常好听。李录开始与她合唱，后来大家都跟着齐唱。广场上紧张的空气一扫而空。

事后，李录回忆说：

“21日晚上是最危险的，通过中央电视台宣布军队介入。我也是那天决定的要结婚，觉得活也活不了了，觉得活着没娶个老婆当鬼都不满意，所以结了一次婚”。

这一天，也正好是柴玲和封从德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婚礼结束的当晚，各人趁着夜色，进行了化妆，然后融入人群。

自“绝食团指挥部”交出权力后，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无数以院校为单位的、分散的小组织，加上各种声援团体，广场上可谓旗幡林立。但是，这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期”，并不意味着学运的“空心化”。相反，在一个有民主程序基础的运动中，只要有基层组织存在，随时都可以产生出自己新的领导核心。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留下的一份“学运”档案，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在那个“真空期”里，基层运作的继续：在5月19日（复食以前）到5月20日“戒严令”发布前，以北航为中心的十余所高校学生代表，通过4次会议，已经形成了一个广场南部院校意见汇集与联盟的雏形。

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是5月19日下午2：00—3：15，地点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南面北航营地。参加人员有十所高校负责人。

会议内容：

1、分析当前形势。但因意见不一，没有形成成熟的看法；

2、讨论在与“绝食团”和“北高联”失联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一致同意“十校应该联合起来，给高联提出我们的建议（但不是决定和结果）”。

这份档案显示：

“有人认为，罢工是必然的。也有人认为，罢工取决于新闻或知识界和社会舆论。另外，罢工虽然对绝食有利，但对国家的利弊不明，一定要慎重从事。在这件事上可以不向工人表态。”

有人认为工人的事情应顺其自然。学生、工人是两个方面。学生可以不管工人的事。

会议还讨论了申请学联财务向不能解决伙食问题的高校拨款、停止募捐活动，及整顿广场秩序的问题。并预计当晚就可以解决广场南部几个学校的问题。会议明确决定：

“声援人员坚决服从绝食团，他们撤，我们就撤，只要他们在，我们就不走，哪怕军队来镇压。”

会议决定，如果发生与“北高联”和“绝食团”失联的情况，十校代表“每晚10：00在北航（营地）碰头，由北航挑头，作为一个和高校联络的联络点”。

当晚10：00至10：30，十校学生负责人按例举行碰头会。又作出两点决议：

- 1、一致支持北高联“将绝食改为静坐”的建议；

- 2、应对军队“清场”的策略：

“各校原地不动，缩小范围；小学校可以合并；新华门以东以西各一公里的纠察队员向新华门集结，其余向广场集结。”

“防止暴力事件发生。只有在绝食团全部撤离，北高联发出撤离的命令才能撤。如果军队一个一个来拉，不要反抗。”

5月20日凌晨，10所高校又召开“紧急碰头会”，并扩展为12所高校。会议继续细化了应付军队“清场”的对策：

“1、全部坐下；2、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外界群众或别的高校与军队发生冲突时）应全力减小冲突，避免暴力，把损失降到最小；3、坐下后各校是否沉默，或呼统一口号或唱歌？没有统一意见，各校自行决定。”

会议还讨论了“撤退后怎么办”的问题：

“1、回去罢课，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全体通过）；2、鼓动工人罢工（意见不统一）；3、全体绝食（只有一票赞成）。 ”

5月20日上午7：40至9：15，在“戒严令”发布前，“南部联盟”举行了第四次碰头会，参加者有11所高校学生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宣传问题：

“大家认为，学生是最纯洁的政治力量，不应被政治斗争中哪一派政客们所利用。所以大家不同意喊‘XXX下台’之类的口号，应就事不就人。对此，9票赞成，2票反对。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口号要合情合理，不要过激；不要涉及个人（不拥护或反对个人），不违宪，并尽力劝阻同学不要喊‘打倒XXX’或‘XXX下台’的口号。”

在“后勤工作”问题上，会议一致通过“在北航建立广场南侧各高校和北高联联络站。争取从北高联多得到一些援助物资和资金：

“我们这些学校可以互相协调，分配，大家相互支援。一定要保护各校及高联、绝食团的绝对团结。另外，大家回去应制止浪费现象。”

从会议记录可以看出，如果“北高联”和“绝食团指挥部”不再回到广场，依然留在广场的学生也势必重建广场的组织，并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决策。

5月20日王超华回到广场以后，“联盟”配合重建了“北高联”在广场的权力体系；并将自己汇集的讨论成果提交当晚王丹以“北高联”名义召集的会议，成为广场对付“清场”的对策；“六四”清场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最后一个撤出广场的成建制队伍，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据王超华回忆：

“5月20日我是上午大约10：00才离开医院。回去以后有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忽然我这儿成了中心了。……从六里桥到大北窑到处都有条子来，说那已经主动在堵军车了。我就不断地向人大等几个骨干院校派小分队到这几个主要的点。高联后来画了堵军车的一个图，从昌平一直到南郊，高联联络部

派给各校任务，哪个学校至少要派出几个小分队去哪个点、哪个点。本来我们负责后援绝食团，负责广场，这是一个共识，这时不管是广场，还是外围都是我们管了。

5月20日有过一个各校代表会，是王丹主持的，在纪念碑三层的东面，有外地同学，也有北京同学。各校代表也都愿意到我们这来了。当时讨论了万一军队进来怎么办。……我们开会定了一个方案，包括部队来了怎么聚拢，脸朝那儿怎么坐着，手挽手。如果冲散的话，讨论是回大学区还是怎么办。最后的一个结论，就近找老百姓家，过了危险时期之后再往西郊大学区集结。主要问题是要安置外地学生。当时最发愁的就是外地学生，一般认为北京学生还是有办法回去的。最后任命了一个青岛来的学生当总指挥。”

有感于绝食团指挥部的封闭性，以及对绝食团广播站的种种不满，当时仍留在广场的北高联领袖决心利用这个权力的“真空期”重新整顿广场。

当时在广场指挥部的兰州大学学生辛苦 记得，5月20日中午在纪念碑三层的广场“各校学生代表大会”，曾“选出王丹作广场总指挥”。香港《天天日报》报道，21日傍晚，王丹曾两次带领广场同学宣誓：

“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唤起共和国美好的明天！”

但王超华认为，王丹只是“名义总指挥”，“执行总指挥”是青岛来的连胜德。

5月22日晨，吾尔开希也来到广场，与王超华讨论了撤与不撤的问题。经过私下走访，王超华已经确定，有六成以上的学校同意撤离。但是，当晚，当与邓朴方联络不上的吾尔开希再次出现时，情况又发生了逆转。王超华回忆道：

“他说，‘不行，情况非常紧急。’我当时觉得既然情况非常紧急，而且见的是官方，那时都觉得官方找不到了，就把话筒给他了。他就说‘马上撤退。’底下有人就问：‘撤到哪？’他就说：‘撤到使馆区。’哇！哄成一片。开希一下晕过去了。”

据认为，北高联在广场刚刚建立起来的权威，经吾尔开希的一个命令，立即荡然无存。而他也立即被北高联在广场的常委罢免。

当时，在广场外围担任纠察的一位外地大学生事后回忆，此刻依然坚守岗位的他，怀有一种期待赴难的心情。但这种期待经不起时间的拖延，以至于等待中的他们曾发出怨言：

“狗日的，怎么还没来？”

事后，王超华也说，“我们觉得最危险的时候是21日凌晨4：00到5：00，而且在会上特别提出这个时间。居然没出事”

事实上几乎所有学生领袖，已经具有了在5月21日被“清场”的心理准备。从事后统计的资料看，在5月20—21日这两天，每天上万学生的进京“狂潮”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北大留在广场的学生仅“二三十人”。事后各人的回忆证明，那是一个大家都怀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并可以接受清场的“心理时间”。从政府方面看，这也应该是运用策略指导疏散，并以“不流血方式”完成清场的一个绝佳时机。但政府没能把握这次决战时机。以至所有重要当事人——与王超华的感觉一样——都很奇怪，居然什么事都没发生！

张伯笠回忆道：

“第二天没有镇压，没有打，天下太平。……后来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是：坚持下去。既然他这次没敢打，以后他很可能就是还打不下去。所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重又回到了广场。”

由此，政府也错过了清场的第一个最有利时机。

第四节 广场的支撑

重新回到广场的张伯笠，继续发挥着他在复食行动中表现出的魄力：

“22日回到广场之后，看到广场上的组织特别多，我是外高联，我是北师大，我是北大，我是绝食团指挥部，我是高联王超华，我是高联吾尔开希，……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了。我见到王超华，王超华当时拿了一个撤退统计数字名单，统计了大概是200多个学校同意撤退的名单。我看了这个名单以后，她就交给我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就研究怎么办。我说，咱们都定不了，还得开代表会，就是营地会议。”

因为主导思想是不能在“暴政”面前示弱，或“投降”，或者还有吾尔开希动议的余波影响，张伯笠在接下来召开的一个有500人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将“撤”与“不撤”的问题交付表决，而是提出了广场的整顿。这次整顿，在很大程度上使广场的秩序得以恢复，为接下来的广场坚持，提供了组织基础。

“我想，应该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如果大家同意，这个指挥部可以执政48小时，然后交给高自联”，张伯笠事后回忆时说：

“我希望高自联能拉回去整顿。整顿好了，形成一个领导机构，就是对广场、对全北京的领导机构……弄清了以后来。48小时以后我们把班子交给你，把领导权交给你们。说这些话以前，我和超华私下已经统一了意见，她同意。后来大家就全部举手通过了我的方案。”

“因为这个组织要运转，马上选的一些新人不可能运转得非常灵。我就说，能不能以绝食团指挥部代替这个临时指挥部，暂时运转48小时。当时大家投票就通过了。”。

依据这次“营地联席会议”的决议，张伯笠找回了原“绝食团指挥部”的人，确定“临时指挥部”的常委有：王丹、柴玲、张伯笠、李录、封从德、郭海峰、王超华等7人。由于“这7人在广场上，在整个北京学运中是有代表性的，大家一看，这些人可以信任、没问题，所以就很顺利地通过。”

图8-4：广场临时指挥部成员（从左至右）：柴玲、封从德、张伯笠、王超华、王丹、李录（选自张伯笠《逃亡者》）

由于这次接管的“临时性”，此后，围绕“学运之声”广播站的“拉锯”不断，并都以“政变”载入相关人士的回忆。但直到6月4日凌晨，这个广播站一直在广场指挥部手中。

由于人脉的关系，这个“临时指挥部”基本沿用了“绝食团指挥部”的执政理念和工作方法。他们重新拟定了四项斗争目标：一、取消戒严；二、保障绝食同学的正常医疗；三、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四，支持赵紫阳亚行上的讲话，平反动乱。

同时，他们重新统计了广场的人数，核定各校在广场上的位置，重建纠察队，组织后勤供给，接受捐款……事后，尽管发生了空降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任命“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与“临时指挥部”人选重叠，造成“临时指挥部”对“北高联”的“移交”承诺的食言，但从绝食团指挥部演变而来的广场组织机构的“有效性”，确是经过反复检验的。

在清理整顿过程中，“临时指挥部”发现，由于滞留广场学生成分的改变、广场组织的增多，广场的协调工作、物资供应，使广场秩序的维护面临巨大的考验。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广场的运动势将自动瓦解。

在戒严之前，广场的物质支撑主要来自各校的支持，北京市民和各官方机构的捐助。为保管和分发这些物资，北大学生自治会分别在纪念碑上联络站旁边设立一个供应站和一个供水站，在北大绝食团营地建了一个小的物资供应站，在历史博物馆前面建了一个物资站，并在那里安了一部联络电话。

这部电话与北大筹委会、广播站保持联系，同时与外界也有单独联系，为广场的对外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博物馆下面的物资站是为了纠察的吃饭问题。因为纠察在绝食同学面前吃饭不是太好，所以把他们都拉到那儿去吃。另外，广场上纪念碑上的联络站也负责一部分纠察同学的吃饭。”

5月19日，常劲接到学校通知，带着绝食团财务部剩余的两万元和北大在广场上集资的两万元回到北大，工作重心转向接待回校的同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由于承担着“北高联”的后勤、秘书和外联工作，最早与香港学联建立起信任关系，也承担了不少接待外地学生的责任。据梁二回忆，自吾尔开希到广场绝食之后，他便开始了与校方的交涉，“要求校方提供物质和精神的支持”：

“物质上的资助包括车和粮食的问题，粮食主要是解决当时有很多外地进京的同学的食宿问题。……精神上的支持是在方物康校长妥协之后有一些老师就自发组织了一些教师自治会的组织，发表一些声明，向学校提出一些建议啦……”

而“绝食团指挥部”不得已的“自我封闭”，也迫使“北高联”接受声援者的捐赠。以后还发生了绝食团财务部负责人在不清醒状态下欲用6万元购买武器被制止，但他被送往医院时，钱款仍留在身边的事情。这便加强了“北高联”对“绝食团”财务的不信任。梁二回忆道：

“这个时候纪念碑的第三层已经被逐渐的封锁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比较安全的地方。” “17日下午收到5千块钱之后我们就开始收钱，在广场上奠定了北高联的财政基础。有了钱之后相对来说就好办事了。当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财务部，超华和我最初一个是当会计，一个是当点票的。我记得是每一次不管是谁占领广场上的指挥部或广播台都要宣布一下财务部长梁二……我也不知道谁是我的领导。总而言之，财务部长梁二一直没有换……”

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在广场南侧建立了自己对广场的“食品供应站”。为照顾在广场北部的学生的需要，“一些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了食品供应站”。梁二回忆道：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北京工艺美术学院的女孩子向我提出申请，说她与北京一个食品加工厂有联系，希望从北高联拨出一些钱给他们建立一个食品供应站。我记得这个供应站从我手上批的钱超过10万块以上。因为当时人相当多，大约是百万人以上。”

图8-5：5月25日，后勤部长王刚赊账从某食品厂弄来两车面包（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当时，梁二的政策是，外地来的学生，就在广场上露天席地，每人配给5元，两天以后自谋生路。当时，不仅存在绝食团、高联两个财务部，而且还存在很多募捐箱，市民、外高联都有。“接收捐款的组织和个人是层出不穷”。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急救队女生的日记记载了她们5月16日募捐活动的状况：

“我和4个同学去募捐。上面规定‘募捐者必须拿校旗、学生证’，一人打旗，我抬募捐箱，一个同学讲演，两个同学跟着。‘叔叔，阿姨们，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北京医科大学急救队，现在有3000多学生绝食已经3天了，160多位同学倒下了，他们饿，可是他们能忍着，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想想呀，他们也是人，是我们的亲骨肉，3天，3天没有进一点食物了！有的人连葡萄糖水都不喝，为了维持他们的生命，我们只得骗他们葡萄糖水是生理盐水。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听呜呜的救护车声，一个个同学倒下，红十字在流泪，红十字在流泪……’讲演的同学哭着，喊着，脸红红的，泪像雨一样流下，她浑身都在颤动，两个男生过去扶着她。慢慢地围着人民纪念碑走着……1角、2角、5角……10元、50元、100元的票子如雨落到募捐箱内，20分钟募捐完毕，共募捐了947.60元。不小的一个数目。”“有很多纠察队员，他们一站就站

上几天几夜，吃饭很成问题。”于是，学生们又自发组织起“流动食品供应站”。“北高联”财务部除了支付食品费用外，下雨以后，还支付了一些雨伞、帽子的开支。据梁二回忆，在每天一百多万人待在广场的两三天里，“每天的开支经费都是在将近20万元左右”：

“准确地说最高时是20万，我记得是在21日吧，就是堵了军车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开支相当大。第二天向我申请的就比较少了。”

“5月19日宣布戒严，军车已经开进了。当时我跟程真、香港专上学联主席林耀强都觉得快完了，我们几个人就亲自跑到长安街上去。但是听说军队已经被堵住了，我就只好回去重新数钞票。这时有一些同学说，在20日堵车的时候没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一个是饮水，一个是食物，这两个问题很难解决。有的同学为了防暑还申请一些草帽。这时有一些政法大学的同学提出，堵军车一定要有组织，否则就会造成市民和军队的摩擦，继而扩大造成大规模的屠杀。总而言之，第一一定要避免这种混乱局面，第二就是这个组织的一定要保持它的持久性，第三就是基本的饮食条件一定要保证。”

外界的物质支援，有一部分来自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其下属的各部门、单位。在各种资料列出的项目中，有明确记载的有：5月16日，从商业部门调运了4000顶草帽；从17—19日，市委和市政府在广场设立的饮水站共送开水150桶、食盐、白糖各100斤；通过红十字会调配的100多辆救护车；52家医院腾出的2000张病床；18日大雨从公交总公司抽调的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的400多块厚木板；北京卫戍区应北京市要求19日送达的1000条棉被……此外，还有不可计数也无法确定是部门自为还是根据上级意图安排的，送达广场的食品、饮料、医药物资。

除北京市政府出于政治需要的支付和各界群众自发的捐款捐物外，有报道和记载的大宗款项主要来自几个单位：体改所陈一谔（8万元人民币、600美元）；全国总工会（10万元人民币，由红十字会掌握使用）；邓朴方领导的残疾人联合会（10万元人民币）；万润南领导的四通公司（5万元人民币）；

深圳师生（5.4万元人民币和港币）；东风电视机厂（2万元人民币）；北京纺织厂（1万元人民币），农工民主党（1万余元人民币）。此外还有“中国民联”及赴美留学生、学者的捐款数千元美金和万余元人民币。

民间和私人捐款的数额基本无法统计。据包遵信回忆，严家其就曾替加拿大华人和留学生组织接收过一笔捐款，后来交给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用于《新闻快讯》的印制和发行。据北明回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受画家范曾委托，也曾将2万元人民币交给广场学生，并还在绝食团广播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红十字总会的一份报告称：

“自5月17日至2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陆续收到社会各界为救护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的大学生捐款80余万元（包括15万港币折人民币）。根据捐款单位（个人）意愿，已为学生购买药品、线毯、草帽、毛巾、扫帚、一次性纸质水杯、各种饮料、面包、饼干、卫生纸、妇女卫生巾、速效消毒擦手巾等支出近20万元，另大部分捐款用于补偿给参加救护学生的各医疗、环卫和防疫等单位的开支。因救护工作特别是大量的防疫工作还在继续，少量捐款暂留中国红十字会统筹使用。总之，所有捐款将全部用于学生的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上。”

据说，中央电视台还收到很多各地以支票、汇款单形式寄来的钱；蛇口一位龙姓捐款人一百万的捐款，因接交手续原因没有提取。

有报道记载，在各单位赠送的物资中，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电视机、蜂王精、被褥、茶叶、馅饼等等。基本上是“生产吃的送吃的，生产用的送用的”；糕点厂送糕点，童装厂送毯子，全聚德烤鸭店“送鸭汤”……自工人声援开始后，他们要么捐款，要么送物，几乎没有空手到广场的。5月20日，郑义和夫人北明开着那辆广播车，绕西单路口—宣武门—前门—崇文门—东单—天安门路线宣传，曾遇到如下感人的一幕：

“广播车后紧随着上千自行车和步行者……写稿抄稿找不到笔了，只要向车窗外喊：‘笔，谁有圆珠笔？’马上就有几支笔递进来。好几次被拦住，人们硬要往车上成箱地送饮料、面包、口罩（防催泪弹）等东西。推辞不下，只好收下。其实车上堆满了这些东西、吃、喝、药、用，什么东西都可以翻到。……有这么多群众的保护，公安机关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我悟出一条：只要军队进不了城，北京就属于人民！”

5月23日下午，北京大雨，气温骤降，大批寒衣被送到广场，仅某中央机关就捐献衣服4000件。据杨继绳记载，仅纪念碑南面二层台阶上的物资站，两三个小时内就收到市民捐献的两、三万件衣服、毯子和棉被。市民除了把物资送到物资站，还直接送往广场营地的各个帐篷里。一对中年夫妇一次就给西安一所大学的帐篷送了5件衣服。北京医科大学一位研究生对杨继绳说，他们到一个居民楼求援，那里的居民们一下子送来的衣物就装了两汽车。小孩子还送来了煮熟的鸡蛋。有的市民还给广场送去了姜糖水、热稀饭，甚至酒！在挂着“体育馆居民大院”横标的送饭汽车周围，杨继绳亲眼看到“一群学生在高兴地喝着热稀饭”。

但是，戒严令发布以后，特别是李鹏5月19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出“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的呼吁发出后，国内公开的捐款活动已经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海外的援助成了广场物质支撑的重要来源。

据香港树仁学院学生、香港学联支援北京学运代表团秘书李兰菊回忆，早在学运发起的初期，香港学联的赴京代表已经与北京学运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个代表团4月20日下午到达北京，并参加了“四二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4月22日后，该代表团与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建立了联系，并认为“自治会是有代表性的，财务也有一定的监督，有相当的民主基础”。尤其对北师大的组织章程和选举资料印象较深。这个印象，与之在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

遇到的冷漠一起，构成他们日后决定将物资和资金投放给“北高联”而不是“绝食团”的基础。

据说，在这个代表团内，起初对于是否介入北京学运还存在不同看法：

“团长周永恒与学联秘书长陶君行的回应是……要考虑北京学生的安全：一旦外部力量加入的话，北京政府就有了借口镇压，说学运不是自发的，而是受利用的。——这是根据1986年学运的经验：当时，我们也派人到上海支持，最后总结经验时，认为是帮了倒忙。所以从一开始，学联的态度比较审慎。”

“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后，“北高联”举行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陶君行一行四人再次造访了“北高联”。会上李兰菊介绍说：

“我们香港学联是本届亚洲学联的主席，我们支持学运是很有经验的，台湾的学运我们也支持过，南朝鲜的学运我们也支持过，基本上这些支持都是成功的。”

陶君行也作了讲话：一、希望北高联尽快发展成有严谨架构和纪律的组织，作为以后民运的基础。二、问在场的代表：香港同学应作何配合，如物质与其它支援？三、我们正在考虑延迟离京，——一旦中国政府镇压（逮捕和驱散），我们马上会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后来，代表团接到香港学联发来的指示：“马上返港，发动声援”。

据李兰菊回忆，“‘四二七’的胜利，震动了整个香港”。证据是，香港学联4月27日通过电台发动的到香港新华社门前的静坐只有“两百多同学参加”，但“五四”发动另一次游行集会时，参加者已达5000多人。

“这是史无前例的。自从70年代保钓运动后，舆论都说香港的学运已死，而五四的集会令香港的学运‘复生’，这是北京学运对香港学运的影响。”

“这以后，香港学联的工作就主动很多，主要集中在募捐、街头宣传北京学运、向国内fax学运消息、在机场请旅客向国内带报纸。很多同学主动来学联参加工作。”

除了学联以外，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俞国涛和潘毅从4月28日起也与北师大建立了联系。据梁二回忆，“他们参加了五四游行，捐了一万港币给北高联财务部，这样北高联有了第一笔海外来款，第一笔正式资金。”

图8-6：香港学联代表李兰菊、陈清华（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5月14日，香港学联派出林耀强与陈清华组成第二个代表团到北京。15日凌晨00：06，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站发表讲话：

“我们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的。是特地来声援你们的。希望你们的爱国行动可以和平地进行。我们全力支持。（有人用粤语调喊：谢谢啦！）我们在香港发起了一个筹款行动。现在带到北京，希望给你们一点点的帮助。另外，还希望今天晚上与你们一起绝食，实际支持你们的行动。我们希望你们会坚持到底，为中国的民主化，为振兴中华，尽你们最大的努力。”

当天，他们在新华社门前发动了为期一天的“绝食”，以示声援北京学运。17日，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团指挥部广播站，发表了香港学联支持北京学运的声明。

据李兰菊回忆，此行他们带来了筹集的“40万港币”捐款，但“因为马上戒严，北京同学怕被捕后钱被充公，所以没收”。

5月19日台湾《联合报》报道，蒋纬国解囊台币10万元，通过民间团体给广场学生购买营养品。

5月20日凌晨，得知北京将实行“戒严”的消息，香港学联宣布停止绝食，并在电台呼吁同学去新华社门前集会抗议：

“呼吁播出不久，香港计程车工会宣布，郊区的计程车愿意免费送同学去新华社抗议。2000多同学就在三号风球之下，大雨之中，高呼‘学生爱国无罪’，‘反对镇压’，直到两点多，没有力气再喊为止。”

当晚，对北京后期物资起主要支撑作用的“港支联”成立，将香港“左中右三派，包括台湾和左派工会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在5月20日八号风球的情况下，组织了两万人的游行。据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香港受台风侵袭，挂八号风球，狂风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华分社门口，通宵达旦地彻夜静坐，请愿唱歌。我在12层楼上的卧室，看着下面风雨交加，歌声、口号不断，心中百感交集。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前，为了人民的利益，领导他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现在，反过来了，群众向共产党示威、提要求，共产党不仅不能满足他们，还要镇压他们。面对这个我无能为力的场景，我无法入眠，看着楼下群众在风雨交加下，不顾一切席地而坐，听着他们悲愤的歌声和呼号，我眼泪止不住地直流。”“新华社内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份，在香港新华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5月20日，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

5月21日，香港支联会发动了著名的“百万人游行”。当时，香港人口仅为600万。许家屯回忆道：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共产党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个角落，史所空前。”

5月22日，香港学联和广州的学生发动了约50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省港澳大游行”。期中越境参加游行的香港学生约200多人。

5月23日，柴玲向港支联代表邱延亮 提出了支援帐篷的问题，5月25日，香港学联派出的第三个代表团抵京就带来了帐篷。李兰菊回忆道：

“其任务有三：一、送捐款、帐篷和睡袋；二、协调北京学运的派别斗争和分裂（这是最困难的）；三、帮助整治广场混乱的情况。捐款20万给广场物资部，17万给北高联，作为北高联组织发展、以后领导民运，也包括地下工作的基金。后来程序是这样：交给物资部的香港学生黎洪保管，北高联方面由梁二按各院校的需要分配。后来因为镇压就没给。其实梁二签了字，但钱未拿。”

梁二回忆证实了上述情况。他说，“香港给我们的钱是最初的1万港币，后来17万交到了潘毅那里。当时他们有一个财政方面的要求，保持全面性散发。”其中包括两个大项：一是对群众的自发组织（如工自联等）的支援；二是对广场财务部的支援。为什么不把钱直接交给广场指挥部？李兰菊事后解释了他们“从一而终”的原因：

“香港学联有三个考虑：一、香港学联讨论认为，指挥部没有基本合规格的民主程序产生；二、香港学联不承认指挥部是一个有代表性、有严谨架构和有监督能力的一个组织，因为它的民众基础是流动的，就是说，今天在广场上的同学，未必就是昨天选出指挥部的选举人；三、一旦镇压，指挥部就会解散，广场工作人员就没有一个组织来约束与监督。要强调一点：我们虽然不承认它的合法领导地位，可是我们承认指挥部在广场上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后继续支持物资部的原因。”

李兰菊所说“物资部”，其实是一个由香港学联建立、在香港学生监督下的组织，全称“香港声援北京学运物资联络站”。地点就设在距离天安门东侧位于南池子大苏州胡同的张郎郎的家里。

据张郎郎介绍，他家这个院子，原是一个商人的住宅。原住户出国，两年后被他的弟弟买下，占地“两千多呎，9间房，一棵大树，一个天台，整个小四合院。”

因为居住地点合适，张郎郎经常会接受一些比较重大的指派。据他回忆，他第一次到广场执行的，是戴晴的任务：拍下中央美院送往纪念碑的胡耀邦的画像和“何处招魂”的挽联。他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老鬼要去献“血书”。他害怕临时去记者不知道，来不及为他拍照，所以要张郎郎先行占据有利地势，待事发时及时抢下满意的新闻镜头。

不久，已经卸任的美国大使夫人鲍柏漪又找到了他：

“她想知道天安门的情况，就只有给我打电话。一开始，鲍柏漪和戴晴轮流给我打电话，问天安门情况。后来光打电话不行了，得亲自来。戴晴来呢，带来一大帮各种各样的人、学者，还有学生。后来他们发现我这儿太好了！他们来了管吃管喝，天安门一转，然后来这儿歇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章立凡、郑也夫、苏晓康……他们就把我这儿当成了他们一个歇脚地儿。然后，鲍柏漪呢，她一激动了，他丈夫走了，但他那车还在，开着她那大车，

带着她的一帮，包括周七月这些小兄弟们到我这儿来。在我这喝茶，然后到天安门去看。……而且她们在这儿一待，就不带走的，一聊天聊到三四点钟。”

“接着就是《九十年代》的主编李怡他们，《明报》记者，我这儿就变成各式人马跟走马灯似的……当时，我们都是《九十年代》的专栏作家，包括龙应台、白杰明、邱延亮。……我和邱延亮聊天特别投机。我们两个的故事特别像：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干部子弟；但是都因为反对当权被关进监狱；他也差点儿死刑，我也差点儿死；他也差不多十年，我也十年；后来又都放出来。唯一不同的是，他关的是国民党监狱，我关的是共产党监狱。他是蒋纬国的小舅子。”

“邱延亮当时在中文大学教书。他带着一帮中大的学生，他们带着物资、带着钱，到这小院来找我。……他说，我们就在这儿成立个物资站。他们物资站的办公室在北京饭店，实际上真正运送物资呢，就利用我们这个小院。……当时，他们主要是药品。我当时跟他们开玩笑说，我是没有红十字的‘红十字会’。……后来，吾尔开希让他们财务的一帮人背了两麻袋的钱，当时，我们那西屋是空的，我说，干脆，给你们一把钥匙，那屋你们来利用，你们在里面点钱，你们锁上门自己弄。所以那，变成他们的银库。……一个辛苦、一个刘刚，他们就申请要对讲机。后来，邱延亮就让香港来的学生背那个挎包，一人背几个，一人背几个带进来……”

图8-7：香港支援物资（选自香港《九十年代》）

当时，“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已经成立，张郎郎因此跟邱延亮进入“联席会”。邱延亮离开北京前，委任张郎郎为物资站负责人。这就是陈希同后来的报告所说，“他们的黑据点就在天安门旁边”的由来。

在5月25日第三批“香港专上学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林耀强的话还没讲完，就受到记者质问：你们还把捐款交给学生？……学生还不撤退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你们支持他们在广场逗留下去，等于把这次民主运动推向绝路！记者会后，代表团向香港学联报告了这个情况。得到答复是：先把部分捐款交给北高联，因为我们一直承认北高联的领导地位；对广场的支持，要等讨论结果。第二天有答复：按一贯原则，不参加、不过问、不影响北京学生有关“撤”与“不撤”等策略性的决定。

“这是香港学联参加北京学运的一贯原则。只是站在人道立场，我们继续支持广场工作，于是将捐款交给物资部。”

李兰菊解释道。

戒严消息传出后，“北高联”财务部将剩余的捐款中百元大票数出来，全部装箱交人带回人大、清华和师大。5月24日“广场指挥部”与“北高联”财务交接时，封从德接手的两大箱钞票，连“毛票和钢蹦儿”共约9000元人民币。据封从德回忆，当时的广场还有十万人左右，后勤部每天要4万元买面包等。5月26日因为没有钱买面包赊帐1.5万；5月27日没还完，还欠账9000元人民币。封从德说：

“5月29日整顿财务部，我们每天都公布我们财政的大帐，每天也向记者公布，后来得到了记者很大的信任。到了后期，我们的钱就不太紧张了，问题大的是贪污嫌疑。所以我希望来的捐款不是现金，而是来物资，这也省得我们去买的周折。有一笔澳门东亚大学捐的37.5万还是47.5万的港币，我请他们全部送到香港的物资联络站潘毅那里。5月30日港支联的岑建勋也来和我们见了面，我们和他谈了，在北京饭店。还有2万港币的捐款我也带到了广场。5月31日香港教师联合会捐了50万港币给北京市红十字会，没给广场。”

图8-8：5月31日广场财务通报（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据后来香港学联在广场做的一个简单统计：受访的30位外地学生被问到，“如果没有香港物资站的支持，你是否会留在广场”时，7人表示“不会留在广场”；4人“要看情形”；1人“拒绝回答”；16人“将坚持留下”。考虑

到中国国内大学生所受教育与自尊心理，这个调查不能完全作为依据，但在后期广场物资支撑方面，香港的支援应该是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

5月28日，官方已掌握香港声援团带来捐款65万美元、港币200万元，50顶帐篷、还有5车皮包括药品、食品在内的物资的消息。5月31日，“港支联”还派遣香港成衣工会干事李卓人赶来北京，准备为学运提供进一步的援助。6月1日，北大筹委会的广播报道，台湾李登辉总统也表示，除声援外，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其它方面也支援”。

静坐示威，世界上很多国家几乎时有发生，但没有一个具有中国八九民运“占领广场”的规模和时长，这并不是中国学生的精神更坚强（或者更不可理喻）和遭遇更不能容忍，物质支撑作为一种抉择的参数，无疑是学生滞留广场的基本条件。但来精神的鼓励也十分重要。

“由于电视的普及，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被中国青年人这些发自内心的温和诉求所打动，这反过来又让示威者更加振奋。外国驻华记者的工作长期受到中国官员的骚扰，他们的活动被监视，敢于揭露问题的受访人被逮捕，因此外国记者热衷于倾听学生的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数学生还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憧憬传播出去，为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傅高义作如是观。对此，张郎郎也深有感触：

“当时，温斯德·洛德已经卸职回美国。但是，鲍柏漪则受聘于CBS，在电视台，在香格里拉，做中国的节目。正好赶上学生运动。那真实千载难逢。鲍柏漪以为她在这里可以大大地发挥。而在这以前，‘洋沙龙’的时候，她已经认识了王丹这一批人。包括方励之这些人。”

“鲍柏漪当时并没有插手民运，但她做了一件事情，把王丹、吾尔开希、柴玲这些人接到香格里拉，让他们看他们拍的那些录像，全世界在播。这

时候，他们更不可能撤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已经传遍世界了！他们不是在写历史了，他们就是历史直接的创造者和扮演者！他这个脚落不下来了！”与其相信和正视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自由追求，李鹏政府并不愿意更愿意相信那是敌对势力，特别是美国煽动的结果。偏偏美国人也不谦虚。5月24日：

“美国总统布什今天在讲话中称：‘全世界都在关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自由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着具有想象力的全世界男女’，‘美国将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

不过，学生一方情绪高涨，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各种限制均以失败告终。当他们重新获得通信的畅通，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或阻挡了军人的前进时，暂时取得“胜利”的“经验”令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的理想让步，民众赢得这场角力的曙光就在前头。他们很难想象政治领导人会动用武力，人民解放军会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

在这同时，各种蜂起的谣言，既顺应、也反映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位记者同事，曾向我描述了5月18日下午被暴雨冲刷过的天安门广场，又被一个巨大谣言洗劫的场面：

“那天下午下雨，我和司机躺在车里，因为连日抢救学生，太累，睡着了。突然间有人猛敲我们的车门，我们从梦中惊醒。再往外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车里的学生都从车窗、车门里往外咕碌，连滚带爬地出涌到外面。再看广场，欢声雷动。学生们有的在一起抱头痛哭，有的在摇旗呐喊，有的大吃东西，还有人把东西扔给别人吃——以为胜利了！北大的学生还准备马上回学校庆祝。手提扩音器里下面的话没听见，都被欢呼声压倒了！其实，下面还有话：此事未经证实，还在核实中。等广播第二遍时，听清了，说没戏了。”

这个关于“邓小平下台”的消息，据称是两个自称高干子弟的人在广场宣布的。

5月18日，是邓小平通报戒严决定的重要日子。谣言显然是耍弄了大家，尤其是在这个与“真相”南辕北辙的当口。但它造成的情感波澜足以表达民意，也反映了广场学生“需要神话，需要奇迹”的精神世界。

他们或许正是怀着对奇迹的渴望走到一起来的。

不过，上述“谣言”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据冯胜平通过彭真家人掌握的信息，事情发生在5月16日，邓小平在看了赵紫阳接见戈尔巴乔夫的电视新闻后。据称，邓小平为此十分恼火，他一边打牌，一边气呼呼地说“随他去，不管他了”。后来他接受彭真的劝告，要他关键时刻担起担子，以后才发生了决定戒严之事。如果上述谣言依据的就是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它的确迟到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5月的天安门广场，实际上是当时消息最灵通之地。各种在朝在野的政治与非政治的派别，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都把自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这里。其中不乏数条与最高决策者们有密切关系的消息渠道。

企望问题简单化，本是根植于人类天性中的惰性之一。广场战斗的徒劳无功，坚持日久的身心疲惫，均是这种潜伏在人性深处的惰性上浮的有利条件。而支持这种惰性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进入5月下旬以后漫天飞舞的谣言。下面，是这些谣言的一些标本：

以李鹏、薄一波、杨尚昆、王震为首成立中央伪政府。李鹏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将学运定性为叛乱；不惜用20天时间镇压掉广场20万大学生。

万里从加拿大来电，称李鹏讲话不符合宪法；

10个副委员长都支持赵紫阳同志；

北京各监狱除重犯其余犯人全部撤走，准备关押学生；

27军的驻扎在老山前线的将士们声明支持这次学生运动；

邓颖超要求退党；

聂荣臻说：“谁开枪打学生，我就先毙了谁！”

国家11个部委反对李鹏政府；

外交部通电国外，不承认中国政府；

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示不服从中央决定；

海南省委书记梁湘致电中央，反对中央决定；

世界上有30个国家不承认李鹏政府；

美国航空母舰进入渤海；

叶飞、聂帅、徐帅、邓颖超要求召开军委会议，罢免邓小平。

戒严部队兵变，38军军长被抓。杨尚昆停止老帅汽油供应。

解放军三总部2000余名官兵呼吁士兵调转车头班师回营。要求罢免邓小平的中央军委主席和李鹏的职务、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举行大选，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

6月4日以后，学运已被无情镇压，明摆着已无回天之力时，人们仍然没有从这种梦想中醒悟过来。“李鹏被刺”；“邓死李伤杨逃”等谣言如缕不绝。6月5日，北京城南传来的数声炮响，立即给人以“情况微妙”的感觉，接着，“27军与38军在南苑机场火拚”的谣言，迅速地被生产出来。凡此种种，反映了人们在潜意识中回避最不堪面对的现实的愿望；反映了，学生们需要神话，需要奇迹的精神世界。……

第五节 “北知联”与“联席会”

除学生自身的资源外，对后期学运提供信息、对策指导的几个主要团体，主要是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又称“北知联”）、四通公司和香港“支联会”（又称“港支联”）、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又称“联席会”）。其中“北知联”和“联席会”本是两批渊源不相同的人发起，但却在同一天、同一个屋顶下成立。但由于“联席会”有社经所资金和团队支撑，及高超的兼并技巧，“北知联”仅仅运作了几天就无疾而终。而“港支联”在京人员，则通过北高联、“联席会”这个平台，与学运发生关系。

关于“北知联”的来龙去脉，担任其召集人的包遵信曾有过一篇交代。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包遵信的背景。

包遵信，1937年10月生，安徽无为县人。在无为上小学，没读完便父母去世。1953年考入安徽芜湖第一中学，读至高中毕业。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于古典文献专业。

因出身贫苦，家事不幸，求学时代的包遵信，十分珍惜他的读书机会。对于培养他上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充满真挚的感情。正因为如此，在同学眼中，他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平凡的学生。大约是在毕业前，他已经与人合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谢应芳〈辨惑编〉的无神论思想》。1964年夏，他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在哲学编辑室当编辑，当年又发表了他独自完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孟子认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文革前，曾服从单位的派遣，到山西、河南参加过“四清”运动。

文革开始后，包遵信与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运动。在“评法批儒”斗争中，他得以结合自己的专业，挥笔上阵，写了不少“应景文章”。因为欣赏李贽的批判精神，

将这位儒家的叛逆标榜为“法家”。按他的知己学友的看法，此时的包遵信，尚未成为一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

1976年底，包遵信被调往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筹备出版《读书》杂志。其时，三联书店也准备复刊文革中停办的《读书》。于是，出版局和三联两家合办的这本杂志于1979年重新与读者见面。包遵信先任该刊的哲学编辑，以后又接替去世的史枚，担任了副总编。由于该刊把握了时代脉搏，在介绍西方最新社会科学和人文思潮方面的鲜明特色，使之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个人也因此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和文化人。但该刊因直接接受国家出版局及其上司胡乔木的控制，令包遵信常有戴枷跳舞的感叹！

在筹备《读书》期间，包遵信利用在出版界与学术界积累下来的广泛人脉关系和对于出版制度的熟悉，依托三联书店的平台，于1977年创办不定期学术丛刊《中国哲学》，并自任主编。该刊力图以相对独立的研究姿态，摆脱传统意识形态束缚，使哲学挣脱“政治的婢女”的身份。通过刊载章炳麟、顾颉刚、贺麟、汤用彤、冯友兰、侯外庐、朱谦之等老一辈哲学家、历史学家的旧稿、遗作，该刊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水准；又以刊载海外华裔学者的论文，打开了中外学术交流的民间窗口。在吸引业界人士的广泛参与的前提下，推出了如李泽厚、汤一介、庞朴等80年代“文化反思热”的骨干，其中有些人被誉为青年“思想领袖”。其时，包遵信正逢“四十不惑”的盛年，也因此享有“伯乐”的时名。

“我搞《中国哲学》，被称为‘哲学界的造反’”，多年后，包遵信对笔者回忆道：

“我们每年讨论一个问题，如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对历史唯心论的评价，还在黄山开了会，在《人民日报》和《哲学研究》发了文章。对于‘真理标准讨论’采取支持态度，但不参加。认为它主要是政治上有意义，理论上无意义。而且我自己也不是搞原理的。”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人，顺应他当时与官场渐行渐远的趋势，他毅然放弃官员身份，考上了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9年以后，当他具备升职条件时，因名额有限，他没有去和一位老人竞争。

1981年，在王光远、包遵信的支持下，《青年文库》创刊。王小强、林春、李银河等80年代思想理论界引领潮流的中青年理论骨干不仅得以从理论上崭露头角，而且开始亦步亦趋，在官方审查制度的夹缝中学办事业。

1982年，在包遵信的鼎力支持下，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合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出版。包遵信曾有言，他并不懂“控制论”，社会历史也未必可以用科学模式装载，但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事后多年，包遵信对笔者说，“我为什么支持金观涛，而没有支持何新？”

“因为中国需要‘新启蒙’——‘新启蒙’的最早提出者是我。我不同意王若水、李洪林的‘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提法。那是正统思想，原教旨主义。所以我向出版社以自己的名义担保，称杨向奎、白寿彝称赞了这本书。其实杨向奎看过、赞成，白寿彝根本没看过。”

所谓“新启蒙”，就是认为中国需要重新补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课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开拓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狭窄的理论甬道里、在有限的社会实践条件下，一条道走到黑；更不是从旧有文化传统里开发出替代性的新产品。从1984年9月至1986年5月，包遵信在《读书》上陆续发表“文化史比较研究浅谈”9篇系列文章，对中国明清时代存在“启蒙思想”进行质疑，“认为明清之际的社会批判思潮，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无法通过‘文艺复兴’的途径完成从中世纪形态到近代形态的更新”。为此，他在社科院历史所、在史学界，尤其在“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被责令作检讨。但在这关键时刻，侯外庐先生支持了他：“你做得完全对，不要作检讨。”正是本着这种“时代需要新思想、

新科学、新尝试，更需要一种对外界事物开放接纳的态度”的认识，根据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的经验，1983年，他又与金观涛、贾新民等联合筹办了《走向未来丛书》。

图8-9：金观涛、包遵信

一则遵循思想的脉络和行动的惯性，二则因为痛切感到“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大量来自新老传统的阻碍，在1986年掀起的“文化热”中，包遵信成了“反传统”思潮的急先锋。1987年，面对“新儒学”热，他又撰写了《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儒家伦理与“亚洲四龙”——“儒学复兴说”驳议》，1988年向“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的论文，不仅更进一步撰文批驳“新儒家”引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观点，还揭示了“新儒学”对中共党的政治伦理及思想方法的影响，把“儒家三期”的学说与“马列主义中国化”（暨“马克思+秦始皇”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比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专制制度是一个整体，也可以为“现代专制”服务。因而，依靠传统文化不足以推翻专制制度，不论是“明清启蒙思想”还是“新儒家”，都不可能开发出引领中国现代化的精神火炬。

其文章虽不能为大陆正规学术刊物接纳，但其思想却与《河殇》等作品一样，为80年代高歌猛进的“西化”浪潮所追捧。其时，包遵信有言：

“我知道‘全盘西化’在中国不可能，所以我要坚持。历史前进的方向是由各种力量的合力决定的，我只能用自己的努力使她更朝向理想的方向。”

在受到学界保守势力和来自体制的联合打压的同时，包遵信在事业上也连连败北。从退出《走向未来》核心圈后，他又创办了《文化哲学丛书》、《民俗文化丛书》、《农民文化丛书》、《太平洋论坛》，一个比一个影响更小、寿命更短。但每一个都灌注着包遵信的思想，并都试图坚持一定的学术水准。事后多年，包遵信回忆说：

“我点子多，狗熊掰棒子。《太平洋论坛》着眼于中华文化圈，迎合当局，避开了政治。是民族主义。把海内外学者团结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

“反正我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不后悔，回想起来有意义。个人恩怨在其次。”

这就是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中难辞召唤和追捧，以及他必然被社经所编织入计划的背景。

如前所述，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社经所已将该所成员推荐给包遵信任《太平洋论坛》秘书长。1988年以来，他还多次成为北大学生组织的校园研讨会和“民主沙龙”的特邀嘉宾。1989年1月，他参加了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在北京“都乐书屋”举办的“新启蒙丛书”首发仪式兼组稿座谈会。2月，他连续参加了北岛领衔的“33人签名信”和许良英组织的“公开信”联署。在4月北京改革理论界人士主办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包遵信也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

八九民运爆发以来，4月21日，包遵信领衔签署的由远志明、王润生等策划的知识界第一封公开信——《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公开信归纳了学潮要求，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建议，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可能出现的学潮低落提供了对策。4月28日，包遵信联署了严家其起草的《捍卫新闻自由——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4月30日，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举行的学运与民主化进程的讨论会；5月10日，应中国人民大学工会青年部邀请进行了讲演。对学生的“四二七”大游行，包遵信曾给予了高度评价。5月12日，包遵信再次应王丹的约请，赴北大“民主沙龙”讲演。5月13日，包遵信又联署了严家其、苏绍智等写的大字报《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呼吁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责任感”，并号召15日举行首都知识界大游行。他还参与了《五一六声明》的议论和定稿。5月14日包遵信接受戴晴邀请，参加了《光明日报》举办的知识界、理论界、文化界12位名人士的座谈会及“呼吁书”联署。并参加了统战部组织的到天安门广场的斡旋。

5月15日，包遵信参加了知识界大游行，并联署了《五一六声明》。次日，包遵信又联署了严家其起草的《五一七宣言》。

其时，“北知联”已经在酝酿中。

在《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知联”》中，包遵信写道：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又称“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正式成立的时间应是1989年5月24日，可是23日就对外发布了消息，自称“北知联”已成立。5月25日搞了一次游行，以后就再没有单独活动过。

据包遵信回忆，最早和他探讨知识分子是否应该“组织起来”的是一位女士：

“5月2日我在香山参加‘五四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一位朋友曾向我提起，知识分子应该组织起来，我讲了自己的意见。她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并说她去问过李泽厚，李也不赞成。”

但是，时隔三天，他便看见有人贴出了一份有李泽厚列名的“倡议书”：

“5月5日上午，我从社科院历史所出来，发现大门口排字房的南墙上贴着两份东西，一是署名研究生院部分研究生的小字报，介绍四月下旬以来学潮的情况，另一份署名李泽厚、严家其、戴晴、苏晓康的倡议书，说学潮已转为全民的民主运动，我们知识分子不能袖手旁观，如果要积极投入运动，更好发挥作用，就不能没有组织，因此建议成立知识分子自己的组织。……我怀疑有人假冒他的名义。”

为了澄清这个想法，他给名单上的几个人打电话，李泽厚的电话没拨通，严家其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

“我又给戴晴拨电话，戴没有说此事是有还是没有，而是问我对这事怎么看。我将自己的想法说了说，她说：啊，你是不赞成的。放下电话后我在想，这件事大概是哪位‘热心人’自作主张搞的，实际与他们无关。”

5月10日晚，包遵信应约到人大讲演。他回忆：

“同时被邀的还有许良英、戴晴、远志明、沈大德等人。中途我到休息室坐了一会儿，沈大德也跟了进来，他说，现在有不少人都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个组织，问我意见怎么样？他还建议会后我能到他家去商量一下。散会后到了大德家，远志明也来了……远志明、沈大德夫妇都说了一些人的意见，也说了李泽厚还是不同意。我接着这个话说，既然这样，咱们是否听听大家的意见……”

5月16日下午，《五一六宣言》几位发起者和联署人 在北大三角地举行新闻发布会。会前“一白胖年轻人”自称受包遵信一个熟人之托，递给他一张未署名字条，“内容是倡议建立知识分子的组织”。年轻人对包遵信说，“如果你同意，就请你领衔作为发起人，具体工作由他们北大几个青年人做。”并征求包遵信意见，是否可以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读这张字条？不满于自己的熟人跟自己玩这种“地下工作”的手腕，包遵信没有同意对方的建议。

5月20日戒严令发布。当天下午4：00，包遵信致电严家其。因二人在此之前已经多次合作联署“公开信”、呼吁书和“宣言”，包遵信直接向他提出了“是否可以召集一个知识界人士的会议，商量一下怎么办”的问题。严家其当时表示还要再看看。但第二天，社科院哲学所甘阳便通知包遵信，严家其决定“明天上午在政治学所召开一个会议”，让他一定参加。

5月22日上午，严家其主持的“情况交流会”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会议室召开。据说，参加者达一百来人。知名者有苏绍智、庞朴、黎鸣、张显

扬、李盛平、甘阳、沈昌文、柯云路、李陀、苏炜、杨百揆、王志刚、王若水夫妇、郑义夫妇。

会议开始前，陈子明社经所主办的《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通报了当时小道疯传的上层矛盾信息，但当高瑜准备利用会议征集一份她起草的《告全国同胞书》时，“遭到参加会议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和围攻”，所以她先行离开。

会议开始后，严家其宣布了会议宗旨：只是交换一下情况和看法，“不做任何决定，对大家没有约束作用，希望大家发言。

在发言者中，苏绍智认为，对未来的形势“应该看得严重一些”。柯云路、郑义都表示了坚决斗争的决心。郑义主张“和学生一道，坚守住天安门广场”。在对策上议论最多的是，“在万里委员长回京时，组织从机场到广场的夹道欢迎”。黎鸣则提出了“应该办份小报，以便打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包遵信的赞同和热心人士的参与下，这件事成为本次会议的唯一成果。第二天，以“首都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名义主办的《新闻快讯》诞生。

根据庞朴的意见，这个小报不设编委会和主编。严家其提议由包遵信负责。会后留下的新闻界人士经商讨，成立了由山西作家北明女士负责的编辑组、由《中华儿女》杂志段向群负责的出版发行组、由诗人老木负责的记者通联组。除加拿大华人托严家其转交的一笔捐款外，刊物没有固定的经费和工作地点，工作人员完全凭奉献工作，物质条件则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

图8-10：《新闻快讯》（陈小雅收藏）

5月23日，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返所日”。原定由政治理论研究室和《政治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如期举行。研讨会依旧在唯一的所会议室召开。主持人是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王润生、《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王焱，笔者担任记录。

参加者有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远志明、陈宣良、荣剑、杨百揆、王鲁湘、董郁玉、邓正来。记忆中还有一位自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宣传部长”的学生。

会议开始不久，话题转向天安门广场令人忧心的问题。在座的那位学生也表达了广场学生需要指导的意愿。于是，远志明率先“破题”，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组织起来”。据本已忘记这次会议，为《新闻快讯》而来，因而迟到的包遵信回忆：

“我还没有坐住，他就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问你谈的是什么事？远就将他们刚才谈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遍，大意是形势的发展，说明李鹏政府越发没有理智，现在已经没有退路。知识分子如果不组织起来，就不能有效地和李鹏政府的倒行逆施斗争。我们不能老是让学生呆在广场，应该真正和学生站在一起，没有组织就无法和学生一起斗争……”

现在还难以确定，那位学生究竟是被早有准备的远志明等人请来的，还是日前已经占领了这个会议室的《新闻快讯》的一员。反正，在“六四”后的“大清查”中，由于“北知联”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这位被描述为“穿白衬衣、绿军裤”的学生的“闯入”，及其“对坐而论道的一群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成为了有关人士对“北知联”起源的托词。但自始至终在场的笔者并未经历上述过程。远志明讲话的当口，会议室突然大门洞开，一拨人跟随北明长驱直入，北明则捧着一摞刚刚出炉的《新闻快讯》“创刊号”，并在参会者围坐的乒乓球台上辟出一块空地。室间原先的座上清谈，转瞬间混入了油墨作坊的芳香。

这个恰到好处的插曲，正好拉近了包遵信与现实的距离。远志明讲完话后，他忽然觉得大家期待的目光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正在他举棋不定之际，人民大学教师荣剑又加上了一个“砝码”：

“指着我说：老包，你还犹豫什么？说句老实话，你老包出面组织（知识分子），将来跑不掉，你不站出来组织，将来也跑不掉。反正你老包是铁板钉钉的黑名单的人物了。”

在激将法和道义驱使下，包遵信同意“先筹备起来”。并“指定由远志明、王润生、王鲁湘、陈宣良、荣剑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此即日后有文章所称“首都知识界联合会7名主要干部”。当日下午，包遵信与“小组”商量起草了一份《成立宣言》，并初步拟定了一个有40多人的“发起人名单”。

不久，由王润生起草，张明澍定稿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告竣。“宣言”全文如下：

“4月以来的学生运动，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全北京市人民、全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斗争。

李鹏等一小撮人倒行逆施，企图用武装力量压制党内、政府内的不同意见，镇压人民对他们的建设性批评，已经把这场运动逼到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时刻。

良知呼唤我们，习惯于温良恭俭让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能沉默。

惨痛的历史教训警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知识分子没有退路，中国人民没有退路。后退一步，就是流血，就是中国民主进程的夭折，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前功尽弃。

理智告诉我们，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知识分子应当组织起来，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我们庄严宣告，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于1989年5月23日成立。

我们的要求是：

- 1，取消戒严令，军队撤回原驻地；

2，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

3，在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基础上，切实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保障中国公民能够享受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

1989年5月23日”

5月24日下午2：00，“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备会”在政治学所会议室召开。到会60余人。包遵信和未到会的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集人。除包遵信介绍了该会的宗旨与筹备过程外，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远志明、王润生、张晓明、苏炜、王鲁湘、邓正来、陈宣良、荣剑、沈大德、牛小涵、张晓刚、蔡大成、甘阳等十余人。

包遵信申明，“北知联”是一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近期的三个目标是，解除戒严令；把李鹏赶下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

远志明依据“发起人”名单介绍了未来组织架构的设想：

“我们组织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位一两个，将来成立就算是理事会联络组的联络员。……我们知识界和这次爱国民主运动同命运……组织起来就是一个保护圈了”。

王鲁湘介绍说：

“学生奋战突击到今天，已经非常疲惫。因此，他们现在非常需要北京的知识界……不仅仅是道义上的声援及外围的游行，而是和他们汇成一股流。”

他还说：“成立一个非官方认可的组织是要冒风险的。我们不想有几个人不签名强加于人”，所以希望大家比较明确地表态。

一位与会者说，昨天他在天安门广场碰到作家梁晓声。梁说：“作为一个作家，我今晚一定要站在这里，如果我不站在这里的话，今后永远也不要写了。”

“我们在座的，曾经在过去的几年里，艰难地呼唤过民主和自由，而现在历史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应主动承担起来。……在这非常非常紧急的时刻，在这决定共和国命运的时刻，我们是利用好这个机会，使中国民主进程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还是永远失去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后代回忆起这一段时间永远痛心疾首，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至于风险，只要我们想到就够了。”

陈宣良发言认为，在这个时候，与其“在幕后单兵作战”，还不如一块出来反倒安全得多：

“老实说，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应有点豁出去的劲头，哪怕就是保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我看也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了，这是第一个。另外，我觉得不应该把知识分子现在的活动，仅仅看作要喊出一种什么声音的问题，或看作只是几天的事情。现在局势不清楚到什么程度呢？它可能两、三个月或是半年。比如说清了场，可一到出事点，如人大开会了，什么节日了，呼呼又来了，这种局面又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可能一夜之间突然就倒台了，这都是可能的。但现在的实况按着程序说，即使李鹏现在就下野的话，人民也不会满足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如果这时候不成立，时机错过了，你会后悔一辈子。这是一个多难碰到的机会，你说什么时候能在没有组织，没有核心，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市民竟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这种情况你到哪里去找啊！这是没地方可找的。如果忽然间李鹏下台了或市民突然间都回家了，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大好机会。现在刻不容缓，把这个机会抓住。”

苏炜觉得联合会的成立很及时，甚至稍晚了一点：

“前几天，知识、文化界成立了一个绝食救援团，在广场上设了个点，我们还募了两千多元……那两天我们也做了些工作，但自从戒严令下来以后，那个联络点就撤了，一撤连我本人也和大家失散了，这两天我天天去广场，但找不到自己的人，就好像失去了队伍。”

苏炜赞成搞一个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长期组织：

“一方面要公开，一方面要长期……只有这样作，才有真正的意义。”

他表示自己“从今天开始”将和学生在一块。北知联应“在广场设立一个常设机构——一个一天到晚24小时都有人在的常设机构，我愿意去那里工作。”

陈子明社经所的一位年轻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高自联’的同学一起工作。有一个郑州来的请愿工人满含热泪地对我说：‘中国几十年才碰到这么一个大好机会，这次机会我们再没有抓住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包括个人将太悲哀了。’当时我听了他的话，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在座的都是年长于我的人，有很多老前辈，我今年才二十多岁，是属小字辈，就看着你们都在这里……目前，这场运动已发展成为全民自觉的运动，在这重要关头，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人只能自觉救自己，别人是不会可怜我们的。”

另一位年轻人紧接着的发言也批评了“师长们”的幻想：

“我发现很多我们的师长，人们还抱有种种的幻想，这不是少数人，还是很多人，势力很大。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赵紫阳身上，还有很多人希望老邓发一下慈爱之心……”

张晓明介绍了当天上午在社科院哲学所召开的会议，基本思想是各所建立“联络机构”，遇有情况，“可以马上联络各所的人”，决定行动。“同时搞一些成立联合会的其它的工作机构”。

之后，与会者就组织的“公开”还是“半公开”问题发生了争论，并探讨了在各单位设立联络员的名单。最后，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联络点，由苏炜负责；创刊发行《新闻快讯》；取消了按23日拟定名单“以几个人作为发起人的设想”，改为当天参加会并“自动签名”者都算是发起人。25日下午，将以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当晚，“北知联”在广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据安全部当晚10：00给中南海的报告，该会号召入会的知识分子于当晚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静坐示威。“宣言”全文已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

事后，张伯笠的回忆证明，香港学联的支援物资很快就通过新成立的“北知联”交给了广场指挥部。

“这个时候我们跟知识分子取得了联系”，张伯笠说。5月23日，在“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后，戒严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设点的“知识界后援会”以“北知联”联络部的名义，在苏炜主持下，将办公地点挪到了广场，而且就在学生的“临时指挥部”的跟前，张伯笠兴奋地回忆道：

“就在纪念碑的东北角三角的这个地方，拉上了一个北京知识界的牌子。他们在那每天给我们提供信息，给我们买步话机，我们就开始变成大富翁了，有步话机就有了通讯设备。香港也介入了。大家就觉得应该坚持下去，整个形势看来是很好，我们能够粉碎戒严。我们说，我们已经粉碎了两天的戒严，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成果要继续扩大，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继续扩大。”

据包遵信回忆，在5月25日大游行后，“北知联”不复有单独活动。但作为“北知联”发起和组织的几个中青年骨干仍有一些私下聚会。据茅山道回忆：

“5月26日，北京，‘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秘书处骨干成员召开秘密会议，商讨避免流血、瓦解戒严令、阻止大军压境的策略，大家提出以下方案：

- 1、传播邓小平已经死亡的消息，形成心理攻势；
- 2、联络上层人士，终止戒严部队的军事政变；
- 3、组织全市大罢工，声援抗暴学生；
- 4、各地串联，造成全国罢工罢市；
- 5、寻求武器，展开城市游击战；
- 6、策动部队，响应人民起义；
- 7、占领广播电视台；
- 8、推翻李鹏政权。

以上八条，都是内部讨论，并未付诸实施，应该属于‘言论’范围。”

就在“北知联”成立的当日，由北京市社经所陈子明命名，王军涛主持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简称“联席会”、又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首都各界协商会议”、“维宪会”）也在社科院大楼内宣告成立。而且前期大部分会议都在严家其曾婉拒陈子明进入的政治学所召开。此时的政治学所长是吴大英。

如前所述，陈子明社经所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目标和成熟运作策略的民间政治团体，学运爆发以来，它一直以金钱和物资资助，通过幕后交流的方式介入运动。据陈子华回忆，直到5月13日学生“绝食”，郑也夫邀请王军涛、陈小平参加斡旋，陈子明仍“反对参与斡旋”。因此，王军涛和陈小平只能“以个人名义参与”。

5月14日，刘刚给陈子明打电话，“认为学运已经转化为全民运动，建议立即着手筹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以便对学生有所约束和指导。陈子明继续持前一天所务会议上的态度，表示现在由社经所出面作此事并不适宜。”

5月15日，社经所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 等到中国工运学院，参加与吕嘉民共同主办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工会”研讨会。针对当时形势，陈子明提出：“现在最好是酝酿，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戈尔巴乔夫来之后看中央有什么反应，再出这张牌。牌要一张一张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也就没什么威慑了。……这次运动只要能够取得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实际成果，开一个民主运动不以失败告终的先例，就应当鸣金收兵。”

5月1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立即被陈子明敏感到，赵紫阳“暗示了他本人已失去影响时局进程的能力”。当晚，便出现社经所一位兼职人员上门与包遵信探讨“倒邓”问题，之后又发生陈子明本人亲自走访包遵信未遇，留言而归的蹊跷事情。

5月17日，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又身兼社经所所务委员的陈兆刚，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孩子们要是死了一怎么办—2日内 中央政治局 国务院总辞职—2日后 推翻它！”的大幅标语。据他告诉笔者，日前，他刚刚与陈子明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交换了意见。他认为，到现在这种时候“该见血了！”当笔者对此表示差异时，他解释道：“再不见血，中国人就太……”。这是笔者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关于“流血”的建议。这是5月17日。

图8-11：5月17日，有两重身份的陈兆刚打出“推翻”的标语（陈小雅摄）

“5月17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商定，以王军涛个人名义邀请各界人士组成一个联席会议，再以联席会议的名义来影响广场上的学生。”

至此，陈子明社经所对于运动的“三线”计划 终于端上台面。

5月17日下午6：00左右，王军涛给包遵信打电话，说“目前运动出现许多问题，大家需要在一起交换一下意见。他准备请一些人开个会……” 5月18日，包遵信如期前往蓟门饭店。会议的参加者有社经所人员：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郑棣、毕谊民；该所兼职人员：杨百揆、刘刚、刘苏理、陈小平、刘卫华。此外，还有《世界经济导报》张伟国、《中国青年》杂志社杨浪、北大“教师后援团”负责人张炳九、工运学院教师吕嘉民、作家郑义、柯云路等。还有当时的学生代表项小吉、杨涛、严勇。

会上，陈子明以“三线”计划的构架为会议破题。他说：时局的发展要求知识分子把幕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前台，通过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全国民众。并表示社经所将为会议提供后勤服务。随后便离开了会议。接下来王军涛主持了会议。他说：

“现在运动进展很难预料，广场上的学生和政府的对峙局面，带来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如果不采取措施给予引导，可能会辜负大家的希望。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交换一下意见，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工作，能够影响学生。还说：我们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体工作可以由（陈）子明他们所来承担……”

由于要赶赴复兴门参加邓正来、周舵、陈兆钢发起的知识分子绝食活动，包遵信提前离会。但王军涛表示，一定要他赶回来，请他“担任这个会的召集人”。同时安排了车送车接。

因为在复兴门听到了军队可能要进城的消息，包遵信已无心回蓟门饭店参加下午的会议。但是，第二天一早，陈子明、王军涛就亲自驾临，用车将他从家中接到蓟门饭店。

19日的会，在前一天参加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王丹、刘力群、叶研、高超群，以及新成立的工人自治会与市民自治会的代表。酝酿知识分子“绝

食”活动失败后，在统战部再遇碰壁的邓正来、周舵、陈明远、陈兆钢也参加了会议。以上人士，构成了接下来成立的“联席会议”的班底。

据周舵事后回忆，18日晚，原定在统战部举行的知识界人士碰头会议出现了“无人接待”的局面。他当时说：

“事情很明显，赵紫阳已经不能视事，强硬派掌握了主导权，不久势将对学生下手。斡旋失败后，知识界必须重新定位。有两个选择——要么，退而旁观，这对知识分子最有利，秋后算账也算不到头上来；要么，干脆一屁股坐到学生一边去，与学生同命运。”

也许因为运动一开始他就通过北大青年教师给学生支招，以后虽扮演了在学生与政府之间调停的角色，但在朝野关系破裂之际，他认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危机时刻不能丢下学生不管；尽管并不赞成他们的幼稚做法。”在场的人都同意周舵的意见，委托他回去起草一份声明，并事先在一张白纸上签下名字。

之后，周舵随社经所的车回到蓟门饭店，从此开始了他作为社经所“客卿”，卷入该所一系列活动的历程。但他的目的，与社经所有备而来的计划显然无关。

由于在接包遵信时，王军涛的手指被车门挤伤，19日的蓟门饭店会议由陈小平主持。据包遵信回忆，会议一开始就提出“整顿广场”的问题。

“其他人提出一些问题，例如陈明远就曾拿来一份呼吁书，建议广场学生立即撤退，反倒被冷落了，至少上午没有作为讨论重点。……最后，张炳九自告奋勇，愿负责去广场整顿秩序。……这是上午会议的唯一成果。”

19日下午的会议，是通过了前述警告“军管迫在眉睫”的《告人民书》。

综合以上资料，读者可知：“联席会议”是在“倒邓狂澜”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赵紫阳的失势和“三所一会”的“集体自杀”，突然在原先显

得“拥挤”的道路上，闪出了一条通天大道——按照该所所务委员谢小庆的说法：

“88年底，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正由于这种考虑，在去年风波期间在对待李鹏的问题上，他们经常有投鼠忌器的苦恼。”

现在，一切都按照其预计成为了现实，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完全按照原计划迅速向“权斗得胜者”靠拢，他们将失去团体内多年网罗的民运资本，完全站在运动的对立方，与人民为敌。如果进一步卷入民运，积累民间实力，再择机与政府谈判，显然又会被政府视为敌人。如果按陈子明此前的策略，走一步看一步，一张张出牌，社经所只以“个人名义”介入学运，有可能避开陷阱；但如果政府迅速平定运动，恢复秩序，按照陈云的既定政策，分享政权的只能是他们的子弟，社经所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所以，危机，既是机会，也可能是陷阱！

依据目前有限的资料，我们还无法知道陈子明、王军涛这几天经历了怎样的思虑煎熬。但已经可以看出，陈子明“出位一搏”的迹象。首先，他一手推出了“联席会”，第二，他一改不参加“斡旋”的态度，开始在统战部露面。用该所一位骨干的话来说，“到5月17日，他感到再不跳出来，可能什么都捞不着了。”为此，他们把远在北郊蓟门饭店的“联络点”，搬到了前门附近的北纬饭店。据说，站在饭店的楼顶，他们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天安门广场的形势。

当然，把一场与其愿望南辕北辙的群众运动套上笼头，引入轨道，是需要极高的政治魄力和政治艺术的。特别是在“绝食”发起，学运出现多头、失控，使其前期投入资金和精力的力量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要成功地驾驭这场运动，可谓是难上加难。

据《陈一谘回忆录》记载，5月21日，陈子明通过杨冠三向陈一谘报告了“联席会”在北师大召开的筹组会议。并陈明其宗旨是便于“协调行动、影响学生，改变天安门广场出现的政出多门的局面”。同时转告，“希望体改所能够参加”。但陈一谘表示：“无论成立什么组织，都不要以体改所的名义参加；劝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撤出来是当务之急”。

包遵信没有记述20—21日两天“联席会”的情况。但是，他提到一份由社经所人员操作的著名文告：

《我们知识界的誓言》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以我们的人格，以我们的全部良知，以我们的全部身心，以我们作为人的全部尊严庄严宣誓：决不背叛爱国学生的生命和热血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决不以任何借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决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决不出卖自己的良知，决不向专制屈服，决不向80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宣誓人：包遵信、严家其、苏晓康、王军涛、沈大德、吴廷嘉、闵琦、陈小平、李德伟、谢小庆

5月20日”

据包遵信回忆，直至坐牢他都没有见过此文。他之所以在上签名，是因为5月19日社经所所务委员谢小庆给他打电话，而且指定要他第一个签名。说包遵信签名后，他再去找别人签名。鉴于严家其和包遵信有一个互相支持的协定，果然，在包遵信后面，严家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包遵信说，谢小庆在电话里念了文稿内容后，他听到最后那句“决不出卖自己的良知，决不向专制屈服”很入心，于是同意。他的印象，谢小庆念时，并无“决不向80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这句话。他揣测，这句话可能是严家其加上去的。

据包遵信回忆，在同一次通话中，谢小庆还念了另两份都是给万里的文告，让包遵信领衔签名：一份是呼吁万里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领导中国民主运动，因被包遵信斥为“胡闹”，所以作罢；另一份是呼吁万里早日结束访问，尽快回国……包遵信同意后，也被领衔签名。

现在还不清楚，社经所为何会将两份对万里要求完全不同的文稿同时征集签名？究竟是出于信息战、麻雀战的考虑？还是有意烘托万里“众望所归”的气氛？但同时让包遵信一人领衔签名，实难让人免除“心智已乱”的印象。

事实上，就在王军涛签署“决不向末代皇帝称臣”的誓言以后，由于“戒严令”出台，王军涛曾一度萌生了动摇情绪。据陈子华回忆：

“19日深夜20日凌晨，……陈子明‘乘车沿三环路窥察了堵截戒严部队的情况’。回到蓟门饭店后，他得到确切情报，公安机关已将饭店严密控制起来。于是他便和王军涛分头行动，在靠近天安门广场另找一个地方，以便和广场上的学生保持密切联系。陈则脱离运动第一线，回所布置各项善后事宜。”

“21日，陈子明考虑到家中和所里电话肯定已被窃听，便到北京师范大学姑姑家给有关下属单位负责人打电话及约谈，主要是布置建一个学生领袖秘密转运站，以及准备必要的资金与物资。……陈子明在北师大还和从广场上来的张伦和邵江见了面。张伦等向陈子明通报了广场上的情况，认为形势很危险，应当进一步加强力量，并作好各种准备。”

图8-12：王军涛

“这样，陈子明在21日深夜又回到了运动第一线。据张伦回忆：22号上午，刘刚来纪念碑上找我，说子明让我去一下。我随他上了停在广场南侧的所里派来的车，到了前门附近一个宾馆。一到房间，子明便请我介绍一下广场上的情况。我简单作了介绍同时谈到我的看法。我认为广场上太乱，这样下去随时可能出事，需要加强组织，帮助学生管理好广场上的秩序，引导运

动。接下来，讨论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子明发话说，他认为鉴于现在的局势，以社经所为核心形成的知识分子集体应该进一步上去，对运动负起更大的组织领导责任。此时，坐在靠门边的一张椅子上的王军涛说：‘我们这个团体这些年风风雨雨生存下来不容易。我倒是希望我们积攒下来的一点力量为中国的将来做些准备工作，我担心十年改革积聚起来的一代精英这次会被一网打尽。’一向以乐观著名的王军涛，此时说话神情之严肃和忧虑，是过去我同他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屋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刘刚坐在地上，周舵和另外几位坐在床上，沉默着。隔着茶几，我边上坐着的陈子明又说：‘军涛，你说得都对，但是，鉴于现在的情况，我反复思考过，我们还是得上。’这时，所里管所务的那位先生上来叫我们下去吃中饭，谈话中断。在饭厅里，我们开始吃饭，军涛和子明两位在靠近门边的一张空桌上继续商谈。我又起身过去插了一句说：‘你们这些当年的天安门事件的英雄，无论如何你们是不能这样丢下广场不管的，那你们怎样向历史交待。’正是这句话让我在流亡异乡后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最后，陈王一致同意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陈并允诺一俟联席会议运转起来自己就马上撤出。”也是在5月21日，陈子明电告张伟国，说政府已请他出面调停，让学生退走，条件是撤军。事后很多年，陈子明一直没有给出这个电话的说明。故此，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知道，《导报》租的是安全部的物业，电话是被安全部监听的。不过，这样的努力当然也是杯水车薪。因为，在官方的记录里，留下的完全另一种记录。请看《中国“六四”真相》中《关于“幕后黑手”的报告》记载：

“（5月21日）当晚22：00时，安全部向中南海的报告，提供了一个特别引起李鹏注意的消息。李鹏当即批示给代表他联络公安、安全、司法等部门的罗干：‘罗干同志，请嘱有关部门密切注意这个组织的动向。不要打草惊蛇。’现将这个报告全文照录如下。

据可靠消息：今天下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副所长王军涛等人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六个分指挥部人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会

议决定这个名为自发性松散组织的指挥中心，一天换一个地方，以免暴露目标，最安全的是能进入到部队高级干部住宅办公，为安全起见，一些指挥人员要少公开露面，并确定以密码等方法作为成员间联络的手段；组织专门舆论工作班子，编辑《李鹏其人》材料，创办民间报纸。据知情者透露，自4月下旬以来，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一直在幕后进行策划，并与高自联头头王丹等人有过多次接触。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成立、让学生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际到天安门进行绝食，都由陈、王等人的幕后策划有关，王军涛利用自己是北大毕业生的身份，更能获得北大自治会一些成员的信任。据悉，这个研究所不仅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组织成员提供经费，还经常召集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召开各种会议。有关部门将密切监视他们的动向。”

5月22日晚，李鹏与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的党组成员谈话时已了解到“三线”计划的存在：

“……我在5月19日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二线、三线的也有，相当高明。他们绝不是只搞一个月、二个月，而是作了长期打算的。”

以上信息中，《真相》反映的情况也见之于国家教委编撰的《惊心动魄的56天》，虽然参加人员的信息不确，但基本掌握了陈子明当天在北师大的活动轨迹和部署内容。李鹏的讲话则可以得到《真相》和台湾国民党“中共研究杂志社”提供资料的双重佐证。

李鹏5月24日日记载：“晚上常委碰头，对在幕后指挥的那一批人，经过讨论，还是不宜马上下手，目前重要的是掌握证据。”

李鹏5月27日向中顾委会议介绍“动乱”经过的讲话，不仅证实官方此时已经掌握“联席会”的来龙去脉，而且已经领悟了“三线”计划的精髓和工作方式：

“另外一条线索是‘精英’们从后台跳到前台直接指挥动乱。其中最明显的是5月19日由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王军涛、周舵等12人参加的蓟门饭店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明确提出‘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民众’。精英‘要将背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前台’。到5月23日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中国社科院召开会议，成立所谓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唯一遗憾的是，李鹏并不知道，该所潜在计划中“与留苏技术专家合作”的意向，并在运动中一直在对待他的问题上存在“投鼠忌器”的心理。

5月22日晚，王军涛、陈子明把包遵信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东北角开会。参加者有30多人。包遵信回忆说：

“究竟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王军涛事先没对我讲过，所以一直到开会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当主持人和王军涛让我讲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后来军涛说，你就讲讲白天会议的情况。我只好如此，将白天严家其召集一百来人开会的内容简单介绍了一下。”

包遵信介绍完这个与“联席会”风马牛不相干的会议后，陈子明接着为今晚的会进行了“点题”：

“陈首先对广场上学生们的勇气和行为表示钦佩，然后指出：‘现在的形势是学潮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我们感到广场上的事不再是学生单方面的事，有必要各界进行协商。’”

但由于柴玲、李录等广场学生领袖均不在场，当天不可能完成“联席会”正式成立的程序，他们决定第二天再开正式会议。

事后，包遵信回忆，“开完会后……我问军涛，才知道今晚的会，是筹备召开各界联席会议的”。而王军涛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包遵信的懵懂，为自己操控的“联席会”营造了一个社会各界已经开始广泛协商的形势。

5月23日，北高联撤出广场回校“整顿三天”，新成立的“广场临时指挥部”刚刚重新开张，下午，“联席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会议室成立。据包遵信回忆，会议原定中午11：00在政治学所会议室召开，但当日政治学所正好召开“民主与新权威主义”讨论会（暨“北知联”成立会）。于是，包遵信临时请杨百揆到楼上的马列所借用会议室。这一天，出席“联席会”成立会的大约有50来人，除前述“蓟门会议”的参加者外，又增加了社科院哲学所的甘阳、学生代表王丹、柴玲等。

王军涛主持了当天的会议。他提议王丹为会议召集人。

“陈子明发言时，建议会议分出三个小组，分别就运动的战略与策略，后勤保障联络，以及宣传工作，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这时有人要求与会者留下姓名地址，陈子明表示自己不是正式与会者，便离开了会场。”

柴玲向会议介绍了“广场临时指挥部”与“北高联”达成的“临时执政”协议，以及由100多所高校投票形成的决议和临时指挥部的权限和时限。王军涛听后可表示：

“我们这个会议只是一个联络后勤、帮大家出主意，给大家提供物资的一个机构。我们希望承认你们这个指挥部，把它进一步地制度化。”

如果说，具备政治学常识的王军涛语言中还带有几分含蓄的话，凭借想象和激情工作的郑义在事后的回顾中，则比较露骨地陈述了“联席会”任命“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的初衷：

“虽然绝食团指挥部权力有限，但它代表绝食团的意志。它成了运动的核心。失去了最坚定的中坚力量的市高联，遂变为一个名声很大但不能产生实际作用的泥足巨人。渐渐地，两个并存的指挥中心在天安门广场产生分歧，矛盾，并且愈演愈烈。……虽然双方一再努力协调关系，分工合作，但矛盾不断产生。……知识界一般支持绝食团指挥部，并非我们与绝食团头头个人接触较多，而在于他们是运动的实际领导核心。而且从感情上大家也倾向绝

食团指挥部，那些学生领袖自己既参加了绝食，又参与领导，个个又脏又累，几分钟不处理问题就昏睡过去。没时间洗脸洗脚，那一双手脏得骇人，伸出来简直是爪子。而我见过的某位高自联头头，衣冠楚楚，派头十足，活像大战期间后方参谋部的军官！”

“到成立‘联席会议’之时，一个经过运动考验的成熟的领导核心业已形成。这就是以柴玲、王丹等为核心的绝食团指挥部。为了防止政出多门，权力争夺，我们决定建议成立一个一元化的领导机构（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并以知识分子、工人组织的承认来肯定它的权威性。这便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及‘联席会议’产生的背景。”

通过重新命名“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任命“总指挥”，“联席会”得以广场各组织“协调人”身份嵌入广场政治。

为此，同一天成立的“北知联”主办的《新闻快讯》第三期，作了极为夸张的报道：

统一指挥 坚持斗争

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

本报讯：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保卫天安门指挥部”设总指挥1人，副总指挥4人，常委委员7人……总指挥部同时规定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纪律若干，以确保运动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顺利进行。

据当日罗干送给李鹏的材料称：“包遵信在会上宣读了《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并以此作为‘联席会议’的声明。”罗干生怕李鹏忽略，“亲

自将其送到家里”。李鹏事后说，这些材料是“一小撮人幕后策划、利用学潮，公然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并千方百计成立非法组织，进一步扩大事态，使运动不断升级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据包遵信回忆，这篇《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原是他为5月23日出版的第二期《新闻快讯》出题的一篇评论，它怎么成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声明？事后据王军涛说，是包遵信曾将此文“拿到联席会上念了一遍，大家都认为写得很好”，于是就“被”作为了“联席会”声明？但包遵信对此是不承认，也不知情的。文章写道：

“1989年4月，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由北京大学生引发，全国各界人民广泛参加的爱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自来都是为求温饱，为求最低的生存条件。这使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路德宗教改革，或资产阶级革命等革命运动。他们的革命是理想主义的，是为求发展而不仅是求生存的。

但是，现在，中国人民可以骄傲地宣告，旧中国彻底过去了。我们的这次斗争，是为了民主，为了人权，为了求发展。她不但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这也是五四和四五运动所不可比拟的，我们每一个有份参加了这次运动的人，将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我们手无寸铁。但是反人民的暴力反而在我们面前一筹莫展。时代已经改变了，以恶报恶的时代结束了，以善抗恶的时代开始了。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必将胜利。这是一次人民的革命，它不诉诸恐怖，也不会让实行恐怖者得逞。人民的觉悟就是斗争的目标，就是胜利的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这次运动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都将是最为辉煌的胜利。

目前，由于李鹏等一小撮人的倒行逆施，北京出现了动乱的局面……

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了。多少年来，在长久的高压下，我们不少人习惯于明哲保身，习惯于忍让，但现在，面对疯狂的反人民的一小撮人，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他们能把几千绝食学生的生命置于不顾，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发善心吗？

我们不要误把李鹏的色厉内荏当作有力量，李鹏等一小撮人以前的退让并不是他们醒悟，而是无能，他当教委主任，把中国教育推到危机中，他当总理，使生产下降，物价飞涨，他的无能是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负隅顽抗，只不过因为他自知欠人民的太多，我们不能指望他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个无能的政府是一定会倒台的。坚持就是胜利！

中国的民主运动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果人民胜利了，中国将开始走向民主化的健康发展道路，一切专制主义者，一切企图阻止历史进步的人就再也无力阻止人民的民主要求了。

我们警告自绝于人民的一小撮人，如果谁敢于用军队镇压人民，如果谁敢于用军队来解决党内、政府内和人民中不同意见的纷争，他们必将成为人民的公敌，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同胞们，祖国在危急中，共和国在危急中，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工人、农民、市民、军人、干部学生、知识分子、爱国侨胞，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团结起来，挽救危亡！”

5月24日，联席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誓师大会，柴玲进行了“就职宣誓”，誓词是：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保卫伟大的祖国不受一小撮阴谋家的颠覆，为了11亿同胞不在军管统治下流血牺牲，为了中华民族不沦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为了千千万万的儿童享受自由

民主的和平生活，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诚，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排除万难斗争到底。

王丹则代表“联席会议”宣读了《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关于时局的声明》。从第三期《新闻快讯》上，人们还可以读到这个联席会议《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信中在揭露北京市政府制造混乱的一系列阴谋后，提出了“全市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戒严令，坚决推翻李鹏政府”的口号。

据陈子华透露，联席会此番把矛头集中对准李鹏，实有给邓小平留下“回旋余地”的考虑。

综合各方材料，“联席会”到6月3日前共开会11次。与民运势头渐趋低落相应，自5月26日以后，全总的吕嘉民等4人不再到会；27日以前每次都有50—60人参加，28日以后，社科院的场所已不可能借用，会议地点转到西郊，莅会者只剩20来人。

图8-13：联席会在广场的联络点（陈小雅摄）

自称是“经受过较长时期的考验和选择，其权威性即对学生群体的影响力比这批一个月间仓卒形成的核心要大得多”的“文革中的学生领袖”郑义，也因不能发挥作用，于26日离京回家，从此退出运动。28日以后，柴玲也不再到会，后来作为“知识分子绝食”主角的周舵与刘晓波，是27日以后才正式参加的。这预示着，知识精英公开取代学生在广场中心地位的时期开始到来。

第六节 “旅游革命家”占领时期

任何制度的施行，都依赖一定的社会背景才能发生效力。政府的迟迟不表态造成的社会各界的卷入，特别是全国各地学生的大量进京，给被声援者

的广场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如果说，5月18日“百万计以上”人车混杂的大游行和捐款、捐物盛况，还带有某种喜剧色彩的话，那么，一周以后由于外地学生的大量涌入，它面临的境况，则带有悲剧色彩了。

5月23日下午2：00，天安门前发生湖南浏阳3名进京人员用颜料污损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事件。三人分别是湖南浏阳县达浒乡滩头小学的教师余志坚（即余鸣飞），《浏阳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和湖南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修理工鲁德成。5月18日当晚9：00，三人与另外两名同乡乘坐直达北京的2次特快，挤在车厢连接处的盥洗间里。5月19日下午到达北京站。五人刚出站就融入了北京街头的游行队伍，并急切地打出了自己“浏阳声援团”的旗号。在天安门广场，他们遇到了湘潭大学的旗帜，但话不投机。也就在此时，五人中的两人走散，只剩3人。好不容易在广场附近找了个露营地，作一休整。半夜里，却被骤然间便响彻云霄的高音喇叭吵醒：

“政府的喇叭在播放当晚党政干部大会上李鹏总理的讲话，而广场上‘高自联’的喇叭却在播放骇人的新闻：大军已经进城了，部队要来天安门广场镇压，20万学生的性命危在旦夕。学生领袖们号召组织工人、市民、学生敢死队去拦截军车。”“听完广播，三个人又是激动又是紧张，疲劳和睡意一扫而光。他们来到广场上，立即有人发给他们每人一块红布，要他们参加纠察队。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做好了捐躯的准备——每人都在红布条上写下了姓名和家庭地址。随后，三人就把红布条缠在手腕上，跟随纠察队的一位领导赶到前门维持秩序，防范军队从地铁口冲上来。”

一夜无事。5月20日清晨，他们观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去故宫、王府井逛了一圈，随后加入了一个路过的市民游行队伍。如此一连三天，他们白天参加游行，晚上露宿天安门广场。但他们并不满意北京人的运动“水平”。

5月22日上午，他们虽在广场上转悠，但已懒得再去喊那些无用的政治口号，也不再理会毫无目的的游行示威队伍。10：00左右，“高自联”广播站的喇叭开始播放一篇主张“胜利大撤退”的文章，他们异常反感，于是与周

围学生展开了辩论。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他们认为可能是“浓重的湖南口音”妨碍了这种交流，于是，由喻东岳执笔，写了两篇《何谓胜利？》和《民众的民主之路在何方？》的广播稿，呼吁（一）立即号召北京和全国市民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二）立即正式宣布李鹏政府为伪政府，戒严令无效。（三）立即由市民和学生接管人民大会堂和电视台。

“我们头扎着红布条，阿东还挂着照相机。为应付盘查，口称要事，手举记者证，朝着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高自联总部所在的纪念碑走去。快到顶层时，我们还是被拦下了，回答是高自联常委都很忙，也不在。无奈下，我们只得拜托学生卫兵转交我们的信件，还说一定要交给王丹或者吾尔开希。”“下来纪念碑，我们想与学生领袖探讨时局与对策的心也就凉了，泄气得很！”

当晚睡觉前，余志坚向两人谈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们此行只来到天安门转转、看看、喊喊口号便回去，是浅层次的。不干点大事，就等于白来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干就干一番惊天的伟业，那才是真英雄本色……”

“我把我想搞毛像的想法郑重其事地说了出来，喻、鲁都表赞成。阿东调侃道：‘你不是说来北京自焚的吗？怎么不自焚了！’我边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三人大笑起来。”

三人最后准备了两种方案。具体采取哪一种？待次日实地考察后再做定夺。5月23日上午9：00，三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作“实地考察”。余志坚放话：“把毛家大爷请下来，让他老人家复归鬼位。”

“城楼上有武警值班，毛像也很高，很牢，实在难得弄呢！我们只得放弃取消毛像或者架楼梯油漆毛像的办法，改为用鸡蛋填充颜料投掷毛像的方案。”

10：00到11：00点，一行人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免费购置了油画颜料，宣纸和墨水，毛笔，糨糊，又到了一家邮局。大家都给家里写了有点“遗言”味道的信。喻东岳则狂草了十多封给朋友们的信，每篇都是“我要学唐吉珂德去大战风车”，“我不是荆轲，毛泽东却甚过秦始皇”之类的话，前后也就半个小时。

中午12：00，他们在一个煎饼摊前用“天津煎饼”果腹后，又买了20个生鸡蛋。然后，三人来到天安门右侧的中山公园，把各种颜色的水粉颜料用水调开，再倒在蛋壳里。然后铺开宣纸，书写了两条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三人合影后，重回天门城楼下，将标语贴在天安门的城门洞里。并在毛泽东画像下铺开架势，等待着出手时机。

大约下午2：00，喻东岳扔出了第一枚蛋壳。随后，鲁德成和余志坚又接连扔了六、七个蛋壳。余志坚最后掷出的蛋壳，据说用力过猛，竟然飞过天安门城楼的护栏，落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图8-14：被污损的毛泽东画像（选自64memo.com）

据当事人回忆，仅仅过了十多分钟，余等三人就在一些纠察队员的推推搡搡下，被带走，其中二人——余志坚、鲁德成被“送到‘英雄纪念碑’的第二级台阶上一些学生领袖面前”。喻东岳则被送到“工自联”指挥部。据已经成了“工自联”宣传部长的周勇军回忆：

“赵品潞带回来一个外地人，衣着十分朴素，神态疲惫。当时岳武带人取下了他的手表，放到我的桌上，说给他没收了，我当场感到极为不当，亲自将表还给了他。我问他为什么向毛主席像泼墨水，他没有回答，带着一脸的沉思。我将工自联中所剩不多的面包和汽水给他吃，他只小声的说了一声‘谢谢！’我当时和赵品潞等工人领袖商量让他自己走，这事没必要管，可是不一会儿刘涣文，韩东方两人从广场中心回来，说‘高自联’要人，并说

‘高自联’已逮住另外两人，需要他们三人一起澄清事件。我当时虽然已离开广场学生的领导工作，但天生的纪律与服从观念没让我多想，就决定让刘焕文、韩东方等人将这个人送到‘高自联’去了。”

之后，在几个学生纠察队员的严密监视下，在历史博物馆门前向中外媒体澄清此次事件完全与广场上的学生无关，纯属他们三人自发的行动。采访结束后，三人又被带到金水桥前的一辆面包车，在车上一呆就是近4个小时，等待决定。鲁德成回忆道：

“纠察队对我们进行了看管，其中我记得最清楚有两人，当时有两个学生领袖，一个叫郭海峰（当时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秘书长），另一个叫杨朝晖。在车上还有一个《中国农民报》记者对我们3人进行了采访。我们3人还被隔离分开，说是分别了解情况。”

大约6：00左右，他们被送到东城派出所，在那里关押15天后，被送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K字楼）。

2002年“六四”十三周年之际，当时天安门广场外高联主席连胜德承担了这次行动的责任。作为当事人，杨朝晖至今沉默，张健则解释了当时没有释放三人的原因，而连胜德认为：

“这3个人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学生运动的整体性和严密性……”

时任“北高联”秘书长的王有才则表示，此事与“北高联”无关。但“三壮士的行为有损学生的理性克制，学生运动当然也不能因小失大，当时学生运动并不想推翻政府，否定现行法定制度，如果湖南3个的行为发展下去，可能导致法国大革命式的暴民政治。”

无可否认，随着“反戒严运动”进一步侵蚀学运主题，随着运动在全国的动员，伴随而来的是外地人士的大量涌入和逐渐取代天安门广场原有的学

生，运动“失控”的危机正日益加深。天安门毛像污损事件，仅仅是给民运敲响的第一声警钟。

自22日以后，广场上静坐学生大为减少。广场有99所高校的旗帜，其中外地64所，北京35所，计万余人。每面旗帜下实有人数平均逾百。据王丹称，流动人数已超过固定人数。是为天安门广场“旗多人少”时期的开始。到24日，北京的校旗也开始减少，由前两天的35面，减为28面，而外地的旗帜则由64面增为89面，是为“旅游革命家占领时期”的到来。

在八九民运中，全国学运对北京的声援，以及外地学生的进京运动，无疑是这个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北伐”运动的起源，最早开始于悼念胡耀邦阶段天津学生的进京活动。

4月20日下午5时，南开大学50余人组成的赴京请愿团正式踏进天安门广场。第二天，这支队伍就扩充到100多人。4月22日，他们参加了北京高校学生人民大会堂前的请愿。“四二七”大游行后，北京学运出现告一段落的情绪，外地的学潮则方兴未艾，成为首都学运坚持下去的外在动力。5月3日，两名山东大学学生《致北大同学的信》中说：“我们是为北京的同学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感召而来的……我们代表一些同学，对你们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并且说，“从4月15日到今天，学潮已进行了17天，进展到这种程度，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不但会遭到政府的耻笑，也会让人民失望。”

5月4日，北京学生纪念“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天津、武汉、沈阳、吉林、四川、唐山、上海、湖北、深圳、山西、大连、湘潭、温州、南京、烟台、香港等地23所高校的学生。5月13日，天安门广场第一批绝食者的行列里，也有来自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7名学生。

从“倒邓狂澜”开始后，全国20多个省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自5月17日至19日，游行人数上万的城市有兰州、郑州、昆明、哈尔滨、南京、合肥、上海、武汉、长沙、太原、济南、石家庄、成都、重庆、广州、长春、福州、南昌、贵阳、宁夏、杭州、海南、乌鲁木齐、桂林、沈阳；仍处在戒严状态的西藏拉萨，也有3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与此同时，有大批外地学生进京。5月17日，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吉林、辽宁、河南2万多学生进京；其中仅山西就有17所大学2400多人抵京。5月18日，有河北、河南、山西、天津、吉林等地4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2万余人分乘41趟列车（其中哈尔滨1500人强行乘车）进京；5月19日，有30多个院校的2万多人分乘23趟列车进京。

图8-15：云南义勇军（陈小雅摄）

这种进京的趋势，不仅没有因为《戒严令》的颁布而减弱，相反，在5月20—21日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后，进出京流转速度大大加快：5月22日起，各地又开始发生学生强行登车，造成多列火车停运事件。23日，有2.3万名外地学生分乘4趟列车进京，4560人离京；5月24日，1.4万人进京，8290人离京；5月25日，1.4万人进京，1.14万人离京。自5月19日至31日，13天内有20万（人次）学生进京。据北京站负责人说，自4月21日以来，由该站进入北京市的学生达37万人次。

外地学运的高涨和学生进京，使运动出现了持久化倾向。但也给运动的控制带来新的不可测因素。首先是红十字会发出了“天安门广场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的可能”的警告。其次是外地学生的生计问题。由于他们仓促来京，不带钱粮，没有住处，对广场靠捐献建立起来的给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后期广场领导系统的矛盾，学运与社会的矛盾，主要来自这个方面。

据梁二回忆：

“……师大安排了很多这样的力量，因此外地来支援的同学有很多也是以师大为核心进行联络的。”

“我记得第一个找我要钱的是一个天津大学的同学，那时我还没有一点钱。他告诉我，与其说没有吃的还不如开始绝食。我当时就觉得很难受，大家都因为没有吃喝而绝食，那么就沒有人来维持这个生命线，这个问题很严重。”

“南开和天大 在5月14日已经开始绝食了……我当时劝阻了……我当时在师大的权力已受到削弱，我听程真说她在师大已经安排了许多学生宿舍，包括我自己的床位已经被两个同学占领了。师大把到广场去的那些学生的宿舍让给外地学生住，而且师大直接跟校方联系供给免费的饭食……其他有一些学校也做了同类事。”

而进京“支援革命”者的状况也十分悲惨。他们中的人有两种情况，同时带来两类问题：

一类是在北京各高等学校有同学、熟人、同乡关系的，能够住进高校的学生宿舍。这时，一个同学往往会领来两三个、三四个同学或熟人的熟人，往原本很拥挤的宿舍里硬塞。许多大学的宿舍里一时间人满为患：不是走廊过道里躺满了人，就是供水不足，洗澡票价提高。有一个学校食堂，一顿供应的馒头、米粥被3000外地学生“一取而光”。使原来的在校学生要么从图书馆回到宿舍便没有了住处；要么到食堂吃饭已没有了饭菜。引起本校学生与进京“革命者”的尖锐冲突。

另一类人在北京举目无亲，又不可能住旅店。于是，天安门广场的地下过道便成了他们理想的栖息之地。遇上刮风下雨，里面能装上几千人。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曾目睹天安门的地下通道里，“数以千计的学生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躺满了整个通道。通道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

据陕西省驻京办事处人员回忆，5月18日，曾有3名山西学生代表来到前外招待所联系食宿。并要求“办事处主任代表省里表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除“解决食宿问题”外，还希望“供给他们饮料”。但遭到山西驻京办负责人的拒绝。

一位河南学生当时在《北京日报》撰文《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对此描述说：

“……因为听说捐款很多，吃穿都不用愁。但到这里后，就感到有些傻眼了。我们吃的都靠市民自愿送来，但平心而说，现在又有多少市民富裕到那种程度呢。于是，我们的眼睛几乎每时每刻不在为寻找吃的而忙碌。每当出现提着稀饭、馒头的市民，我们老远就眼巴巴地盯上。说实在话，那情形简直连花子也不如。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一个比较主动的办法还是募捐……不但包括捐款，也包括捐衣、捐物、咸菜、馒头、面包等一概来者不拒。”

据统计，天安门广场的外地大学生来自全国400多所大学，中专则无法统计。24日，纪念碑东侧的食品发放点围满了排队领食品饮料的外地大中专学生。一位负责的学生告诉记者，领吃的人太多，而食品太少。送食品的车还未到这儿就被截住，东西一下就分光了。26日，开着机动车来送饮食的单位已十分稀少。下午3：00，烈日当头，一辆平板车上放着两桶绿豆汤驶入广场南侧，还未停稳，一个桶就被围上的人挤翻。

与食品和物资不足同时存在的，是大量的浪费。在广场营地的垃圾堆里，经常可以看到没吃完就扔掉的面包、馒头；领来的棉衣一时不用就扔掉，要用再去领新的。但是也有学生宁可自己挺过困难，也不愿给北京市民增加负担。5月24日大雨过后，杨继绳就曾见到天津大学自动化系的小棚里，两个学生因长裤淋湿了，穿着短裤坐在水泥地上：

“我叫他们到纪念碑去领一件衣服，他们说：‘需要衣服的人很多，我们就这样凑合吧！’”

北京大学学生的油印刊物《新闻导报》第七期上，一篇由该刊记者采写的报道说，外地的大学生没有挡日避寒的帐篷，甚至连棉被、大衣也没有。仅有的几件棉袄和单衣铺在冰凉的石板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气渗人的夜晚。他采访的一位山东工业大学的女生说，由于昼夜温差大，她们出来时只穿了两件单衣，因为寒冷，夜晚只能睡两到三小时。这篇题为《广场——时代的难民营》的文章说：

“绝食结束后的第六天，广场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时代的难民营。”

“尽管静坐在广场上的绝大多数是被称为时代骄子的大学生，可从他们身上已无法领略到时代骄子的风采。疲倦抹去了姑娘脸上的红晕，灰尘遮住了小伙额上的刚毅。一面面红旗与一堆堆垃圾相应；招展的横幅下一桶桶泪水发出令人窒息的腥臭。”

图8-16：广场——时代的难民营（陈小雅摄）

尽管这些外地来的大中专学生中，许多人一下火车就认真地参加了游行和堵截军车的活动，但不少人是抱着亲身经历一下“千载难逢”的“历史大转变”的浪漫热情来的，在他们盼望的东西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便去满足瞻仰祖国名胜古迹的愿望：白天，校旗插在广场上算是一席领地，在广场游行一圈算是履行义务，然后免费游览北京的大小公园。晚上回到旗下，领取免费物资，回归歇息之地。

据包遵信回忆：

“‘外高联’的人，我一直没有接触，‘联席会议’也没有他们的代表。记得5月26日的会上，有两个深圳大学的学生闯了进来，大谈了一通坚守广场

的意义。指斥主张撤离是保守、退让，弄得与会者愤然侧目。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建议将他们撵了出去。”

当天，外高联的连胜德等人对广播站站长白梦实施绑架。他指责白梦在22日晚的会议上“让绝食团指挥部作广场临时指挥部”的提议，指责这是一种“预谋好的叛变行为”。他带领特纠队员把整个广播站团团围住，由三个“体院学生”将白梦反绑，并要求他在广播站宣布，“解除柴玲、李录、张伯笠的一切职务”，“广场总指挥是连胜德。”为团结白梦，他委任白梦为“副总指挥”。白梦希望他能“顾全大局”，拒绝了他的要求。此后，连胜德又三次与白梦谈话。白梦感觉到，“他的确掌握着很多的材料”。这也是他后来提醒广场指挥部重视连胜德的意见的原由。

5月28日凌晨，外高联担心“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宣布撤离，派代表连续冲击广播站企图再次夺权。白梦不堪其扰，宣布辞职。当天，联席会在文化书院开会，会上谈到头天晚上在广场宣读《十点声明》后，外地学生普遍反映不满，认为‘声明’的态度太软了。

由于北京学生接受“达7位数字以上的海内外捐款”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他们又不断地以“指挥系统”的名义号召外地学生经费自理；纠察成分的变化，加之外地学生的境遇每况愈下，最后，终于酿成6月1日凌晨，柴玲、封从德被原绝食团常委王文等“绑架”事件。

关于这次遭受绑架的经历，柴玲回忆道：

“那天晚上我们住进了一个属于我们的小帐篷。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了。我感到很疲惫，很快就睡着了。在早晨4：00的时候，一个掐住我喉咙的手把我从恐慌中惊醒。……王文带着几个男人把我的手扭到身后，逼着封和我离开我们自己的帐篷。当他们开始蒙我们的眼睛，堵我们的嘴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政府派来绑架我们的刺客。我让他们允许我穿上些衣服，他们

同意了。正当我穿衣服的时候，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用最大的嗓门喊道：‘来人哪！来人哪！总指挥被绑架了！’

我的喊叫声叫来了一些学生来帮助我们。

当帮助的人来了之后，王文提高他的嗓门声称他想要调查我们挪用公款。这件事真是来的出乎意料。我无法相信这个看上去有些孩子气的年轻男人，这个和我一起在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第一个晚上，整晚坐着照看学生的人，会因为被留在了领导层外而产生了这么深的暴力的仇恨，而他把所有的仇恨和愤怒都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当王和他的从犯从现场逃跑之后，我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揭露了试图绑架的事件，并呼吁大家要更加警惕和团结，到了那个时候团结真是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为了求证当年事件的真相，笔者近年又采访了当年柴玲的“保镖”陈凤山，以下是我们的一段笔谈：

陈凤山：绑架CL，我是亲历者之一。

陈小雅：您当时是学生吗？

陈凤山：大二。她有两个保镖……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北大学生。或许，我们自己定位为保镖吧。我们都是特纠。我们的帐篷，就在她和封的对面。那晚，是我和同伴救的她和封。我们反制了绑架者。后来听说，好像叫王文。但名字是不是确实这个，记不太清了。

陈凤山：……尽个学生的责任而已。我不认为绝食是值得做的事情，就做最辛苦的活。学生的本能的参与热情吧。……当时，我们特纠有个原则：不介入具体事务，不接受采访。只做实际工作。我那时很简单的，不是政治活动分子。

陈小雅：当时你们被灌醉了吗？

陈凤山：绑架那晚么？我们在对面帐篷休息。我的手因为受伤，难以入眠。子夜，听到对面帐篷很乱，就赶紧冲出去。我们那时都高度警觉。

陈小雅：绑架者有连胜德吗？

陈凤山：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6月1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后港台媒体的报道记载的涉案嫌疑人和操作人员有指挥部成员郭海峰、外高联前总指挥连胜德、原绝食团成员王文，以及陈伟、陈来和一名叫刘彬 的人。据柴玲和李录称“这次绑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其根据有四：

- 1、各学生领袖在广场上的住地非常秘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
- 2、负责广场保卫工作的纠察队长张健，凌晨被人灌醉。
- 3、指挥部唯一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以及广播站的两个喇叭的线路，事先被切断。
- 4、事发前，有人通知李录凌晨3：00有大批捐款，希望李录前往接收，企图将李录和其保镖支离广场。

另外，李录在事发前一天也曾遭遇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策划的绑架。联系到连胜德曾在绑架实施前曾“欲以个人身份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外地学生撤离广场”未遂，并被罢免职务，李录怀疑两次绑架均与指挥部坚持“不撤离”的立场有关，故称本次行动中“有同学已被中共收买”。

但6月3日香港《新报》批露的情况则是，参与此事的4人，一位是已经被“外高联”罢免的原副总指挥连胜德、一位是王文，以及一名叫陈伟的人和一名工人。他们不过是请柴玲交代一下5月21日“绝食团指挥部”解散时那笔“保命费”的使用情况而已。对质当场，郭海峰认为，“作为指挥员，柴又是总指挥，学生都没撤，提前撤对吗？”几位绝食团指挥部成员都交代了此

款用途，并作了辩护，且有录音为证。经香港“支联会”代表鉴定，“绑架者”提供的证据不能成立。

事情在当时虽然得到澄清，但人们却很少意识到，类似为“争权”、“争利”所引发的广场龃龉，愈演愈烈，实际上是学生民主运动目标的偏离和希望的渺茫必然衍生的矛盾。它虽然不应归咎于外地进京潮流，但是，外地进京潮流无疑充当了各种矛盾的催化剂。它把“社会是否能承担一次大的动荡？”“人民是否有义务支付看不到成果的民主运动？”“‘革命者’是否有权利要求人民作出无限期的牺牲？”等问题，尖锐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而当时的学运领袖则很少反省，所有的争权、团结的困难，是学运共识危机的增长、目标的游移和前景模糊必然衍生的矛盾。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官方公布的以下数字，变得有感染力了：

铁道部说：增开一列客车，要少开7列货车。货运量日均减少1000多车。收入减少9000万元。

张百发副市长说：北京市1100万人口，加130万流动人口，按最低供应标准，每天需要500万斤蔬菜，50万斤鸡蛋，65万斤盐，4000吨粮食，4万吨煤。现有172条公共汽车路线基本瘫痪，地铁停运，造成90万人次上下班困难。

——这些，虽然在民运的宣传品中可以解释为“四二六社论”的过错，并追究政府的责任，但是，任何一个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政治家或实习生，都要问一问：自己，能做些什么？

第七节 最后药方：空校？办学？

失控！意想不到的结果！的确是进入5月下旬以来，笼罩在民运参加者和领导人心头的阴云。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已经根本不是学运早期与政府“对话”的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可测量的因素构成的子系统集合而成的巨型系统。对于只会谈原则和书本道理的知识分子来说，它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大“怪物”！而且，这个“怪物”正像雪崩时向山下滚动的雪球，越来越大。如果它不能自生自灭的话，最终不免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毒瘤，既消耗着全社会，又毒害着民运新生的肌体。

怎么办？在学生的指导者那里，最初的希望仍然是期待来自上层的仲裁——万里回国，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不论是否达到罢免李鹏的目的，至少可以给民运一个公正的说法。为此，他们一方面组织欢迎万里的行动，一方面运动各方，以确保此事不致落空。据张郎郎回忆，曾怀疑他是中共“特务”的郑义，曾给他打来电话：

“通过你的渠道，转告万里，让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不要坐他的专机，自己买票回来。不要到别的地方降落，一定在北京降落，我们会组织百万人欢迎他。”

据事后郑义回忆，他当时在脑海里为万里准备的是一场“从机场到广场的百万人夹道欢迎”。

图8-17：工自联欢迎万里回国（陈小雅摄）

这一动议，与赵紫阳的想法，胡绩伟和人大常委的要求连成一气，一时间，人大、万里，几乎成了人民的救世主。没有了这个救主，一切通过合法斗争形式争取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希望均将化为泡影。

一篇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散发的题为《关于当前学运筹略的建议》，号召坚持中心广场的战斗，以支持高层斗争的胜利。要坚持一到两周。

反戒严形势下成立的各社会团体也纷纷发出“欢迎万里回国”的号召。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广播站甚至已发出通知：5月25 日上午开始紧急举行有社会各界参加的大游行，欢迎万里回国，由万里委员长主持召开人大非常会议并作出英明决策。游行口号是：“欢迎万里主持人大，罢免李鹏，伸张正义”。

然而，人大和民间的这一希望，因万里被中央截留在上海而破灭了。

据杨继绳记载：

“万里到美国后，看到赵紫阳没有出席5月19日晚间的党员干部会议，知道赵已经不行了。他访问期间一般要代表赵向对方领导人发表礼节性问候，现在觉得很难办，打电报给中央称身体不适要求提前回来。同时把这个意思通知美国政府，美国表示理解。他提前回来了。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是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稿（一个简短声明），调子和李鹏5月19日讲话的一样。5月25日凌晨3点，他没想到他的飞机没有按照他的愿望飞到北京，却飞到了上海。”

此前的5月23日，中央对各省一把手传达会议结束后，杨尚昆单独留下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着，他被秘密地带到了邓小平在西山的住处。在这次召见中，江泽民被告知，万里已缩短北美行程，将经上海返回北京。而他将作为“代表”，向万里传达中央的指示；在万里答应之前，他将被留在上海。

5月25下午3：00，当万里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在柏油碎石停机坪上等着他的正是江泽民。同时，还有经常和万里一起充当邓小平的桥牌牌友的丁关根、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以及万里的第四个儿子。据说，当时，上海的学生也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也拉了一个大的队伍到机场接万里。

江泽民和丁关根商量后，用了一个掉包计，万里在上海虹桥机场下飞机后，不按常规去西郊宾馆，而从机场侧门出去，住在市内宾馆。同时，却安排了另一车队将万里的随行工作人员和市里迎接人员接到西郊宾馆。当时，江泽民手持邓小平的信件，通知万里“已来不及阻止军事清场”。而丁关根则向万里传达了5月17日邓家常委会的情况，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

当日的新闻，播报了万里因“健康原因”滞留上海的消息。

万里滞留上海的消息，直接导致了自运动发生以来给予其最重要精神力量支持的郑义夫妇离开了运动。而万里的“公开信”则预示着，本来就不太在意上层脸色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支持的民间各团体，不得不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

面对大军压境，“北高联”新任主席杨涛依照“三国时代”诸葛亮“空城计”的思路，推出了“空校运动”的设想：以“播撒火种”为号召，动员天安门广场大部分同学撤走，只留下少数人象征性地看守各校大旗（这其实已是对现状的描述）；同时，让校园成为空地，使学生疏散到全国；实现全国高校彻底罢课，迫使政府对学生的诉求让步；政府一日不答应条件，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个计划的最大特点：一是无需费大力气组织，无需理性控制；二是它可以将政府“戒严”这张牌化解于无形；第三，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仅不会阻扰这个计划，而且在当前，必将助推这个计划的实施。其中要点，在于它的“釜底抽薪”、“以逸待劳”和“以退为进”。它虽与5月22日原“绝食指挥部”领袖们的“保留火种”设想一样，带有浪漫的性质，但是前者只考虑到少数人，后者却照顾了大多数。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当时无可替代的最佳方案。

据北大常劲回忆，“空校”的设想，早在5月21日已经提出：

“北大对形势分析之后有一个强烈的要求，一直贯穿北大的后来的策略之中，就是要求全体同学撤离广场。对此组织了当时绝食同学全部撤回北大，据汇报当时是全部撤回北大了，我们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留在广场的北大同学除了纠察队已经是非常有限了，只有二三十个绝食的同学留在那里。”

“我们希望其它学校都能像北大一样撤回本校，但是努力不成功。23日北大又提了另一个议案，针对外地高校不能撤回的情况，北大腾出一半的学生宿舍给外地高校，然后发给他们资金回各校。这个意见当时也没有得到实行。但是北大一直都是坚持撤离，而且提出了很多的具体方案。”

“21日开始，因为戒严，绝食同学撤回以后，北大提出一个空校运动，希望绝食同学回各地去休养，另外加强各地的宣传。但是这个空校运动考虑得不够成熟，所以造成了北京市一半的学生开始返回家乡，可我们没有很好地组织他们到底回去干些什么，造成这个计划把自己的力量削弱了。从此以后北大能够指挥动的校园里的力量就比较有限了，每天顶多能派出的纠察也就是一两千人而已。”梁二则证明，在北师大，早在“绝食刚发起的时候，有些人因为一看绝食长了有可能活不了，所以就想回家。我们当时就给了他们一些经费，让他们带很多传单到自己当地的一些学校进行宣传。”

5月23日，“北高联”回校整顿，准备三天后接管广场，但“联席会”已经重新任命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5月25日下午，杨涛向封从德介绍了“空校运动”。在当晚举行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上，封从德也对此作了介绍，并作为提案提出。但因成分已发生很大变化的与会代表质疑其可行性，提案未进入表决方案中。当天进入表决的四个提案是：

甲方案：坚持广场，主动出击，给政府更大压力。又分：A、包围中南海；B、控制某些重要机关，如电台；C、再次绝食；D、发动罢工。

乙方案：积极对话，坚守广场，取得一定进展如取消戒严之后，即行撤离广场。

丙方案：保持学运纯洁性，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坚守阵地，不与政府谈判，等到答复为止，传达民意，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态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丁方案：维持现状，自生自灭。不组织各校联合行动，各校自行决定行动方向。

会场辩论非常激烈。武汉大学的代表认为，学运已唤醒全国人民，我们应体面退出广场。政法大学的代表当即反驳说，我们到广场来时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条也没有兑现；相反，政府不仅宣判学生运动是“动乱”，而且颁发了戒严令，现在回去是死路一条，必然遭到进一步的镇压；因此目前应该和平死守，直到胜利。

四项方案充分辩论后，进行分组投票。300代表分成4个小组，按华东，华北，华南和西南分区，让代表回去到各校将4个方案征求本校同学意见后分区投票。

据封从德回忆：

“正要投票，大约凌晨2：30，柴玲突然发布了一个‘紧急动员令’。她说，有消息称凌晨3：00将有军事行动，广场全体同学必须马上处于紧急状态，所有同学必须服从指挥部的指挥。而在两个小时之内，实现一些战略部署，部分外地同学回各地发动，宣传当地群众，部分留下，在上午10：00前完成整编，使广场实现半军事化。她还说，军队随时可能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天安门冲到广场上来，因此我们必须作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向高校区转移。具体方案10：00以后再定。于是大会休会，各校代表回校组织同学，同时征集对四点方案的意见。”

由于“空校”计划未能进入表决，5月26日，杨涛亲往天安门广场，说服“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据柴玲回忆，她当时也觉得这个方案很“吸引人”。封从德甚至提出了补充内容：

“全国高校学生各自空校回家乡，但每周星期天中午自动到当地省会等大城市的市中心广场集会，当地学生自治会也因此每七天至少开会一次，这样周期性的压力反对北京的戒严；而戒严以外空校则扑个空，空校实际上给戒严部队唱一出空城记；而一个广场分散成几十几百个广场，军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这么多城市都戒严。”

但是，这个方案却当场遭到沈泽宜的反对：

“这个曾经为挑战毛的权威在监狱里受过多年迫害的人，激情地反对着‘空校运动’。他说这个计划可以正中共产党政府的下怀。‘如果我们都回到农村，’他说，‘政府就可以动员当地的警察和军队，以及当地的共产党机器，去把我们一个一个抓住。这样整个运动就被摧毁了。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战场。我们不能离开。离开就是放弃了它。’”

图8-18：对柴玲封从德影响很大的沈泽宜（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这个建议也没有获得李录的同意。他的理由与沈的相同——便于政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再则，26日凌晨5：00回收的“营地联席会议”的表决结果，上午9：00刚刚由柴玲在广播中宣布：

“广场上的最高决策机关‘各校代表营地联席会议’投票确定的学运方向是——‘坚守广场，主动出击’方案。

投票情况是：300多个高校出席会议之中代表，288校投了票：

甲方案即‘坚持广场，主动出击’方案获票162票，占56%，通过。”

其实，此时的李录已经有了另外的设想。他认为，办“民主大学”既可以使广场的斗争更富有意义，也可以在不耗费更多资源的情况下使占领持久化：

“这个想法来源于5月23日，我们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我、伯笠、小封、柴玲都在，我右边坐的就是香港的邱延亮。当时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我们干嘛那么正式？我们要搞联欢，要办学校，办营地，我们跟他来彻底的和平，对抗彻底的暴力。’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关于广场整个秩序的规划。到了5月26日就和潘毅画了广场整个的联络图，就是未来的设计图。这个设计图分了十大方阵，十大部门还有民主大学都在这个设计图之内。这个图划得非常巧妙，是潘毅和他的助手一起作出来的，他是方方正正划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后来就由他们几位组织了几百个外地学生成立了一个搭帐篷小分队。这个帐篷搭得很有成效，一天之内在南面就全起来了，第二天北面又上来上百个，把香港送来的全部的材料都用完了。那个时候大概解决了一半的人，在北边和南边都形成了很好的阵式。这个阵式到镇压的时候就完蛋了。就是民主大学没有人去落实，其它的只要是那个图上的都落实了。

图8-19：香港运来的帐篷刷新了广场营地（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这个时候张伯笠回来了， 他就去落实民主大学的事。伯笠也确实能干，在一两天之内办起了世界上第一所这种类型的大学……”

“按照原来的设想，按照在广场议会上得到的决议，如果运动坚持到6月20日，剩下来的组织形式就不叫指挥部，而叫民主大学了。因为我们也在考虑，运动结束之后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长期进行。我最初对北高联这种形式是有非常欣赏的感觉的。我这个感觉是和香港支联会还有李兰菊这些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但在具体的操作上我又同意小封的分析， 设想是很好，但确实很难在当时形成这么一个组织。我们知道广场指挥部这种东西毕竟是暂时的，

所以就希望有一个长期的。而当时决定在6月20日退出的时候附议了广场上的民主大学将继续存留下来，并一直保留下去。”

“坚持到6月20日”这个日期的来由，源自于5月11日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这个会议有一个决议：“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6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而会议的议程中，有两项是关于本次学运的内容：“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由于万里被截留上海，提前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或“特别会议”的希望落空。而学运仍不愿放弃“合法斗争”的原则。因此，这个日期似乎就变为学运去向的最后时限。

对于这种把希望寄托在现有“人大”组织的思想，民主墙人士任畹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批驳。据他本人介绍，自5月25日开始，他就在广场发表演讲，称“等候召开人大是纯粹幻想”。他认为，中国自文革“三支两军”开始，就“进入了军政时期”，并深刻地指出：“军政无法制（治）”。6月2、3日，他还在北师大的帐篷里将这些思想“油印发出”。但是，绝大多数运动的参与者并不是没有达到这种思想高度的人，而是他们更具备“死马当做活马医”的精神。

在5月27日“联席会”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甘阳5月26日起草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A版）。声明全文如下：

“伟大的‘四月学潮’迄今为止已持续了40余天，并已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运动’。由于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至非理性的行为，致使目前中国政治局势已出现极其严重而又复杂的状态。为重申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立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特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如下：

一、这次学运和民运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纯粹自发的群众性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它之超出‘四·五’运动以来历次学运和民运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场独立不倚，根本不依执政党内部斗争形势为转移的人民民主运动，执政党和政府的任何领导人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也没有力量来左右这场运动。恰恰相反，这场民主运动的目标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团都必须顺应这场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出发点是：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清除执政党和政府中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才能真正杜绝万民痛恨的‘官倒’现象。显而易见，这些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因为如此，这次运动才得到全国各地。港澳地区以至全世界人民群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也才能从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如此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

三、由此， 对这场伟大的学运和民运究竟抱什么态度，已经成为衡量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分水岭。肯定和顺应这场运动，就是肯定和顺应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否定和反对这场民主运动，就是否定和反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切政治党派和领导人都将在这场运动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并将由此得到人民群众的公正评判。

四、李鹏总理以及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人之所以在这场运动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无视人民群众的心愿，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否定。反对甚至镇压的完全错误的态度，从‘四二六社论’到顽固拒绝平等对话，使人民群众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领导人是不可能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可能领导中国走现代化之路的。而5月20日李鹏签发的极端非理性的戒严令，更是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法西斯恐吓手段，它使全体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鹏等人在台上，所有参加过声援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市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发布戒严令以后，各界人民群众才一致提出罢免李鹏、何东昌等人的完全正当而合法的要求。

五、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于执政党的政府的腐败以及官倒等现象，无疑负有重要责任，但在访朝归国后，他发表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讲话，表明了一个政治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应有的正确态度，同时也确实一度创造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这一讲话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众对赵紫阳采取了比较肯定的态度，并希望事态能在赵紫阳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六、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任何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果认为这场伟大学运和民运从一开始就以拥护谁，打倒谁为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这次学运的水平及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法制觉悟，同时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根本的问题，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对立面，谁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必将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顺应面，谁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一些政治领导人，恰恰仍然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根本缺乏开创‘新思维’的政治素质。他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看成仅仅是党内斗争的反映和工具，总是想当然地认定这场民运幕后一定有党内高层人士做后台，因此极端错误地认为，只要解决了党内斗争，也就解决了问题；只要找出了所谓‘后台’，这场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这种看法未免太落后于时代，也太低估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质。

我们在此严正指出：试图用解决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次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是幼稚可笑的，枉费心机的。党内斗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场伟大民运的结束。说到底，不是党内斗争决定这场运动，而是民主运动必将最终决定党内斗争的最后结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次学运和民运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坚决支持，因此，不管党内谁上台，只有首先站在这场运动的一边，才能得到广大党员的信任。如果站在这场运动的对立面，那必将在党内失去合法性基础。其最后以不光彩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八、不管党内斗争如何，这次学运和民运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目标，我们重申近期的具体目标如下：第一，解除戒严令，撤回部队；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李鹏五·二〇讲话，公开肯定这次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组织以及其它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间自治组织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全体人民一致发出的罢免李鹏的呼吁，从而创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上解决问题的良好环境。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为使政府方面对广大学生和人民坚定的决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特在此向全国和全世界郑重宣告：如果近期内不召开人大紧急会议，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将至少坚持到6月20日人大会议召开。

九、这次学运和民主运动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高度理性、冷静、克制、秩序的和平请愿运动。我们正告某些政治领导人，一味采取高压和恐吓的非民主的非法手段来解决问题是不会奏效的；企图以武装力量军事解决问题更只能玩火自焚，谁胆敢下令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和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谁就是在把执政党政府和军队推向绝路。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执政党政府和军队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十、伟大的‘四·二七’和平请愿大游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值此‘四二七’游行一周月之际，我们特发表以上声明，以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并向全国人民倡议：将4月27日定为‘中国自由民主节’！

伟大的四月学潮和五月民主万岁！

人民必胜！”

这篇文告，在“四二七”大游行胜利一周月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八九民运”的性质、理念、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立场，乃至历史意义进行了最早、最准确、最详尽的阐释，堪称一篇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杰作。但因其

中第八条的最后一句——坚持到6月20日人大会议召开——引出了一段多年未解的纠葛。

首先是封从德提出了反对：

“针对《十点声明》建议6月20日以后才撤，柴玲提议听一听指挥部的实际运作情况再定，大家表示同意。于是，柴玲介绍了广场上的混乱局面，然后提出推行‘空校运动’，也就是昨天我们与北高联主席杨涛商量好的那套撤离计划。王丹和开希一听就急了，都反对‘空校’，王丹马上说‘空不了’，开希则要带人南下去争取各地都来声援北京。只有反对，没见支持……”

“我利用这个机会发言说，广场没法坚持到6月20号，——因为根本钱不够。精英们似如梦初醒，惊异地问：不是有那么多捐款吗？我借机向大家汇报财政情况：捐款是不少，但绝大部分都被北高联在23日带回高校了，究竟多少，指挥部至今也没交接到高联的账目。高联24日只给指挥部留下9千元，每天虽有约2—3万元的市民捐款，但起初光为十几万广场同学买面包，每天就得花4万，加上广场外的和杂费，每天得5万。因此这几天的面包都是赊账买来的，至今还是财政赤字！大家便把目光投向梁二，他是北高联的财务主管，就坐在我左边。梁二申辩说：北高联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有钱，若按每天5万算，绝对坚持不到6月20号。”

“……鉴于广场财政无法维持，我希望尽快撤离，否则我只好辞职。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人建议‘坚持到5月30日’，我要求余下的这三天，北高联应当转15万到广场，梁二最终答应给10万。”

由于事前王军涛没有料到这个“声明”会在这个环节发生变故，所以，他早已通知“联席会”宣传部长老木付印了A版，并在市面上开始流行。但5月27日会议讨论的结果（B版），在当晚7：30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得以公布。其表述为：

“在5月30日，戒严令颁布第十天暂告一段落。”

参加27日晚新闻发布会的，有20余位学运骨干和100多位中外记者。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联席会”联络部长刘苏里主持了新闻发布会，召集人王丹宣读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并宣布：在5月30日举行一场“胜利大游行”之后，学生将撤出广场。

在这篇文告上落款的组织名称有九个，不论这些组织的大小、组织本身的代表性和代表对组织的代表性如何，也堪称八九民运之“最”。除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外，还有北京高校自治联会，外省赴京高联，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市民敢死队。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身份受到“联席会”部分人士的一再怀疑，李录没有参加当天的“联席会”。据称，他已经对该会“坐而论道”的风格反感透顶，并预言其将“一事无成”！他仅仅希望从那里得到对广场财政的支持而已。当柴玲从“联席会”回到广场指挥部，传达了“五三〇”撤退方案后，“李录爆发了”：

“‘你简直就是个愚蠢的白痴！’他大声吼叫道：‘你就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吗？真是个白痴！撤退？你难道不明白这是政府最希望的而又用几百万人民币都求之不来的？你难道不知道政府在用高官厚禄的许诺来购买人心来让这些人把学生们从广场上带出去吗？你们就这样白白的把什么都交出去了。那些在会议中作决定的都是些什么人？你知道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的动机，知道他们的关系吗？这些人到底是谁？’”

“在我们灯枯油尽，忙里忙外给天安门广场恢复秩序的日日夜夜这些人都在哪里？当广场就要被清空的时候他们都在哪里？你难道不知道去还是留

的决定是需要广场上的代表们作决定的吗？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钱。我就知道从那个会议什么好东西都出不来。”

尽管柴玲此前也从王丹那里了解到，“联席会”有自己的利益，但她仍不能确定这些人是否受政府左右。因为“五·三〇”撤退的提议是由她丈夫封从德引起的。不过，当李录像训斥一个未成年人一样对待她时，她的自尊心“感到很受羞辱”；当李录摔门而去的时候，柴玲知道，他们二人——因一次“非程序”动作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从此破裂了！

李录当日的愤怒，已经说明了自身的清白。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怒气是针对“联席会”的，但只能对柴玲发。就像此后的许多人，也只能对柴玲发一样！这也是作为“总指挥”的她，应该承受的。

当时的柴玲，还是屈从了李录的意见。在已经推后半个小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她告诉王丹，宣布了白天建议撤退的计划后，还应加上“最后的决定必须由广场上的学生来投票解决”。这句话并没有错，因为“十点声明”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个“建议”。

据柴玲回忆，在宣布完之后，学生们举行了又一次“营地联席会议”，“绝大多数的学生投票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同日，《人民日报》咨讯组获悉：清华大学5月26日在东城、西城、宣武、海淀、丰台等区所作的一个民意测验显示，在收回的235份问卷（其中工人71人、农民27人、机关干部23人、学生41人、市民27人、个体户3人、待业青年2人、军官3人、退休人员1人）中，反对戒严的占93.6%；认为军队不应进城的占93.6%；认为治安没变坏的占88.5%；认为不需军队维持秩序的占96%；认为学生不应撤（出广场）的占70.2%；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占98.7%；认为学生在广场静坐是对的并且对市民生活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的占94.9%；认为“动荡”责任在政府的占94.5%；赞成学生继续在广场的占96.6%；要求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的占91.1%；认为邓小平是伟大的

改革家的111人（不到50%），其他人答不知道或不回答；认为邓小平应退下来的94%；认为官方报导一般的23人，不满意的192人，共占91.5%；答共产党主流是好的41.3%，不好的24.7%，不知道的24.7%。

无独有偶，自“反自由化”受到打击“退居二线”后，政治上一向谨慎的于光远先生，也为“四二七”一周月特地撰文——《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文章称赞：

“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已创造了好几个新纪录：全球华人大游行；全世界中国留学生大游行；香港百万人游行示威；学潮前后持续一个半月，遍及全国各省市，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达半月之久；3千人宣布绝食请愿；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工青妇领导机关普遍支持和同情；北京全市人民齐心协力阻拦部队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宣布戒严后，群众游行示威不断，甚至在新华门静坐示威，高呼最得势的大人物下台的口号更响更集中；至于要求现代民主、法制的思想影响之深，群众思想觉悟之高，更是不可低估的。”

老先生将此文投稿《人民日报》未获发表，以后稿件又被辗转送到《科技日报》，最终在陈子明社经所5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这个事实表明，对于形势的误判，不仅存在于缺乏政治经验的学生领袖，同时也存在于政治经验丰富的学者型高级官员和“精英”之中。事后，李录回忆道，他反对的理由其实仍是两条：第一是“营地联席会议”是否能通过？第二是头一天“营地联席会议”刚刚作出“坚持”的表决，不可能朝令夕改。他说：

“当时柴玲说，本来知识分子也不是说30号撤。这时，王军涛拍拍李录的肩膀，很诚恳地说：要是同学们愿意坚持到6月20号，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指挥部说要什么吧，人力财力，我们都可以提供。说完，大概也是王军涛，当即将‘5月30日’划掉，改回为‘6月20日’。”

这就是“十点声明”的“C版”的来由。

据封从德事后考证，C版与A版内容相同，但“加了一个解释：联席会议最初草拟的声明就提出要坚持到6月20日，但听了指挥部柴玲等汇报后才改为5月30日撤出广场。”

“五三〇”案带来了广场两位最重要学运领导的分裂：期中的反反复复，也令具体办事人员怒火中烧。这个由“机构重叠”造成的矛盾，在多年后，结合柴玲在一段“私人录像”中的混乱“自白”，被演绎成一场对运动有益的“反思大战”，其中最主要承受压力者是柴玲。她被指“出尔反尔”、“极端自私”、为了“少数学生领袖的生命安全，不惜绑架广大学生和市民的生命”，因而具有道德瑕疵！

至于李录向柴玲传达的一些恐怖“秘闻”，究竟是他自己造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笔者在很长时间内都相信是前者。直到2001年笔者访问普林斯顿大学，苏晓康宴请时，苏绍智先生的一席话，才令我相信那是真的。他说，到美国以后，王军涛曾告诉他，当时，他们曾准备把李录用麻袋套头，拿去沉潭。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李录的“特务问题”也发酵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也许，正如5月27日王丹对柴玲所说：

“作为一个运动发起人看到这个运动要被带向一个所不能控制的方向，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并且要找出借口制止这种趋势的发生。所以在根本上可以解释为大家同仇敌忾地认为他是特务。”

不过，当日呈现给人们的场景，李录似乎并无惊弓之鸟的心态，而王军涛则依然是笑容可掬，拍胸脯赌咒发誓，一派祥和！

第八节 一样“流血”，两种“期待”

那么，一贯以理性著称的社经所团队，为何在这个关键时刻“屈从”了后来饱受病诟的“柴玲的个人意志”呢？实际上，“联席会”（甚至社经所）绝大多数成员都不了解王军涛和陈子明有一个“三线”计划。他们一直以为，社经所多年来资助历届民运和学运人士，是他们对民主运动的偏好，而不了解，那只“政治理论——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操作中的一环。换言之，他们只是借重民运或学运的力量，来实现其更宏伟的目标。从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社经所对运动的人力、物力投入，并不是要造成一个政府倒台的格局，而是取得与政府“谈判”的资本。

无论是“联席会”还是社经所的绝大多数成员（陈小平除外），也都不知道，戒严后，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曾与王军涛有过一次讨论。当时，白杰明问王军涛：下一步会怎样？王军涛答：“血流成河”。白又问：“那么，最后结局会怎样？”王说：“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和政府一起坐到‘圆桌’前。”据在场的陈小平回忆，二人争吵非常激烈！

连同前述陈兆刚关于“该见血了”的议论，这是在卡玛的电视片问世前，笔者知道的两宗关于“流血问题”的论述，两宗都来自社经所。

关于自己在“五三〇”案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王军涛也有比较坦诚的表述：

“自5月23日正式成立，维宪会在政治学所开了5天会议。广场指挥部建立后几天，京城形势比较稳定。但体制内背后各种力量趋于活跃，试图以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打破僵局，解决危机。5月26日，甘阳对我说，在政局复杂的情形下，运动需要一个明确的政治声明，表明自己的独立立场。……建议提出以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学潮时撤出广场……我支持甘阳在会上提出自己的设想。5月27日，我自荐主持会议以便讨论和通过这个文件。但5月27

日，来自广场指挥部的柴玲和封从德提出财政困难无法坚持，资源只能维持两天，他们希望北高联移交社会捐款给广场指挥部；否则，学生将撤出广场。北高联财务主管解释，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移交给广场。封从德表示，那就撤出广场。我们立即根据他们的动议修改原来的决议中的撤出日期，采纳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在30日全球大游行撤出广场的说法。……就我个人看法，谈判推进全面改革是最好的结局，但撤出广场避免流血也是比没有明确诉求和具体措施而坚守广场更明智的举措。但我不相信单凭学生领袖的声明就可以撤出；现有指挥系统撤出，不过留下权力真空……那不过使现有领袖出局，换上新的更淋漓尽致表达运动特有情绪的新的领袖。维宪会后，没有撤出，并不出我所料。”

按照通常的逻辑（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谈判就是为了避免流血，避免流血也是走向谈判的必由路。但王军涛罕见地将“谈判”和“避免流血”表述为一对矛盾；将大多数学生的“生命安全”会带来“权力真空”的纠结跃然纸上——如果不了解他和陈子明的“三线”计划，几乎是没人能看得懂的。因此，“三线”计划的存在，是“联席会”转而轻易同意李录意见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王军涛和李录——两位最有魄力的青年领袖，在1989年，并无多大区别。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对“流血”之后的“期待”不同。

据柴玲回忆，也就是在5月27日早晨，“联席会”召开之前，在“广场指挥部”的帐篷里，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

“这天，在李录和我之间有一些关系紧张，也许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同意了杨涛的想法。我们之间隔着两三个人坐着，谁也没有马上打破尴尬的沉默。这时候坐在我们对面的学生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该期待什么？我们又能实现什么呢？’

我自己也在思考那个问题。

李录平静又安祥地回答说：‘我们实际上是在等待一场镇压。’（在那个情况下，我相信他说的是公开镇压。）‘当政府没有招了的时候，就会狗急跳墙，用屠刀面对人民。只有到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人民才会觉醒，中国的百姓才会联合起来推翻这个政府。’

我看到那个学生的脸在这个令人震惊又别有力度的见解中得到了启发。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李录要反对‘空校运动’了。他和任畹町都强烈地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将学生从人们的注意力中挪走，同样的镇压将在暗地里进行，只要脱离了公众的视线，真相就会被掩饰起来了。那将是一个悲剧，因为学生们和市民们到如今付出的所有的牺牲都将白费了。”

李录的这类看法，其实是很多人在看不到希望时的潜意识存在。就像前述“绝食者”在统战部听到戒严消息，终于停止绝食那一刻的“如释重负”，6月3日晚，北京人听到部队终于进城时那种“另一只鞋子终于掉下来了”的心情，也是可以捕捉的。下面引用时任《人民日报》执行主编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

“凌晨2：30快下班时，听说戒严部队已分几路冲进天安门广场。记者从北京饭店来电话说，有一路部队已被群众堵在北京饭店。接著日本人从东京来电话，问部队已进驻天安门是否属实？多灵通的资讯！

自从实行戒严以来，我们每天，特别是夜晚，都提心吊胆，唯恐发生流血事件。每天都等到天亮，接到驻天安门广场采访的记者来电话报平安无事，大家才放心回家睡觉。这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不知还要苦熬多久？”

人们之所以说不出究竟何所“期待”，是因为他们不可想象“由谁来牺牲？”只有那些身在“一线”，准备献身的人才敢于描绘那“鲜血淋漓”的境界。如5月21日“北高联”、“工自联”和“绝食团”联合发表的《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其中就有“我们将以天安门广场为战场，用我

们的身体保护大学生及其他绝食者和静坐者”；“我们将以我们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墙。”事后，自称有“社经所研究员”头衔的任晓町也认为：

“甩开高自联绝食、甩开绝食团不撤、依靠‘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跟随各界联席会议坚守广场……促使学潮向纵深发展为全民运动，抵制戒严导致了抗暴民主革命，全民觉醒。这是89一系列‘组织结构’成功的重要经验。”“89学潮与民运的走向及‘组织结构’的演变不断地契合了民主政治革命的发展需要，89学潮及民运的各‘组织结构’客观上满足了‘自由民主派’的动员纲领，脱缰的野马实际为民主派（含学生）看不见的手驾驭，所以，才有说89的结局损害了赵紫阳改革派的利益。今天来看，民主派当时顾不了守旧改革派那么多了。”“当时来看，十几天的广场撤与不撤之争是社会民主派（含学生）与党内改革派之争！”

自八九民运爆发以来，任晓町以自己的言行证明，他就是他所称的“社会民主派”的公开的代表。

李录的思想是否受任晓町影响，还有待证明。但此时的李录，也是一个准备牺牲者。

事后的各种材料证明，李录和王军涛都是个人意志极强、行为目的性极强，并具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特点的人。这二人自介入同一个运动以来，一个要主宰，发明了“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一个想控制，推出了“各界联席会议”。“各界联席会”必然要通过“营地联席会”发挥作用，所以，不论如何掩盖，二人终究是要相见的。

那么，“联席会”与广场学生组织，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联席会”的发起人对此的设计和实际执行的偏差，又有多大呢？根据迄今为止披露的各种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排列出如下顺序：

一、5月23日凌晨3：00，北高联与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开会，达成5点协议：1、选举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成员，代理高联行使两天权力。北高联

总部撤回北大，运筹全市斗争，行使绝对权力；2、一致通过坚决不撤离广场的决定；3、临时指挥部在48小时内行使有效权力，除正常工作外，还要重新筹备长期的、稳固的广场学运指挥部。4、临时指挥部行使权力期间，广场上其他任何组织机构均告无效。5、公告发布后即生效。

经选举通过，新成立的“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的成员有：柴玲（总指挥）、张伯笠（副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连胜德（副总指挥）、郭海峰（秘书长）、李录（外联部长）、王刚（后勤部长）、杨朝晖（纠察队长）、王超华（常委）等组成。其中常委是：王丹、柴玲、张伯笠、李录、封从德、郭海峰、王超华等7人。

在这个名单中，连胜德、李录为外地高校联合会代表；杨朝晖为北师大职工子弟、北太平庄玻璃店职工，也是绝食的“六位发起人”之一，是为工人代表。二、5月23日下午，由王军涛主持的“联席会”决定，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更名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并决定了“指挥部总指挥”和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纠察总部的负责人。会后，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联合纠察指挥部”；配备了对讲机、望远镜，指挥、部署了“纠察队”堵截戒严部队。

指挥部总指挥是柴玲，参谋部负责人是刘刚，联络部负责人是刘苏里，宣传部负责人是郑棣和老木。

在“总指挥”人选上，“王军涛、陈小平、刘刚、郑棣等本来商议提王丹担任广场总指挥，但是在会上郑义提出了柴玲，王军涛担心一旦在这个问题上争议起来，可能达不成一致意见，广场上或许也会出现分裂，就同意了柴玲的人选。联席会议本身的核心层则有王军涛、王丹、包遵信、甘阳、周舵、刘晓波等人。”

关于“联席会”建立这个组织的意图，从前述郑义的回忆和《新闻快讯》第三期刊登的“重要新闻”可以看出，是“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其自我定位则是“民主运动指挥系统”。

图8-20：新闻快讯-联席会报道（陈小雅收藏）

机构、姓名、组织	原广场临时指挥部组织架构			“联席会”组织架构	说明
授权机构	广场营地联席会议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广场营地联席会议	
召集人	王丹	“联席会”设			
总指挥	柴玲	柴玲	共 有		
副总指挥	张伯笠、连胜德			张伯笠、封从德、李录	
	共 有				
秘书长	郭海峰	郭海峰	共 有		
政策推广部	连接营地联席会和各校30人				
参谋部	刘刚	“联席会”设			
联络部	李录	刘苏里	重 叠		
宣传部	张伯笠	郑棣、老木 重 叠			
纠察总部	张健、杨朝晖		张伦	重 叠	
后勤部	王刚	王刚	共 有		

对照上文上表，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出，“联席会”通过重新命名，和勉强接受郑义提出的总指挥人选外，把社经所人员及与社经所关系密切的人员安插进广场。另外，在貌似更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外衣下，却把代表“外高联”的连胜德和代表工人的杨朝晖排除在外。最重要的是，虽然它已经注意到“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法理权威，但在新的人事安排中，完全排除了“议长”李录在执行机构中的位置。

而且，它似乎已把与北高联的约定的，由“广场营地联席会议”通过的——临时指挥部“执政”期间，“广场上其他任何组织机构均告无效”的条款忘到了九霄云外！

此后的“政出多门”，带来的必然是学运领袖之间的分裂；重叠机构之间的行政冲撞，更造成了具体办事人员之间的矛盾。以后出现的“大政方针”的难产，纠察队整顿纪念碑秩序无效，找不到宣传部长，等等一系列冲突，均是这种一厢情愿的结构设计所带来的后果。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6月2日下午，以联席会议名义征召来的，用于保卫“绝食四君子”的40名中国政法大学的“特别纠察队员”吃不上饭事件。而据吴仁华了解，他的同事和政法大学生为骨干组织成立的“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每餐都能从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物资处领到二、三百份盒饭”。而联席会任命的“纠察总长”张伦，直到运动结束两年以后，还不知道总部的帐篷在哪里。

事实上，从一开始，被王军涛、陈子明推到联席会召集人位置上的包遵信，就曾对“联席会”的定位发生过疑问。但当他向甘阳寻求解释时，他得到的是一个更模糊的印象：“指挥部与联席会议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包遵信只好揣测：“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

而在学生领袖方面，时隔近两年之后，在巴黎召开的“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迟到而必要的专题研讨。时任“北高联”和“广场临时指挥部”常委的王超华说：

“首都联席会议，北高联始终是有一些人去参加的，但是我们在23日开始整顿以后每天开的例会中，首都联席会议的事情始终没有在高联中占主导地位，一直是高联工作的次要部分。原因是即使首联有农民、市民、工人自治联合会，但是就像知识分子和工人自治会碰到事情都来找学生，希望各校出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只属于幕僚、军师性质的，并不是有真正群众基础的，我们没有受他们领导的必要。包括我们派出的代表，事实上回来以后和在那开会的时候都不能改变我们独立作出的决定，加上印证广场指挥部对首联的态度，我不认为首联实际起了什么作用。除了几个特定的事情。”

几次参加“联席会”的梁二说：

“至于我在联席会议上的表现，最初我是跟张伦和邵江一起去的。我认为我在这个会上不起一个领导的作用，去只是感受到另一种信息、接受更多的信息。再就是我肚子饿着，要到那里面去吃午饭，第三那里大家宽容的气氛要比广场上那种急剧的斗争气氛和疲惫的、轰炸式的讲话方式要轻松得多。我在那个地方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以至于回去之后还更有精力开展工作。”

封从德则指出了“联席会”和“指挥部”双重架构的荒谬：

“这个设计有好多问题。首先是关系不清。这两个组织究竟是上下关系，还是平行关系？一会儿说是联席会议‘任命’了指挥部（这‘任命’的合法性哪来？）一会儿又联席会议只是指挥部的参谋机构（既是参谋机构，又为何下设五个执行部门？）……另外，指挥部上设两个联席会议，一是社经所团队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一是广场学生的营地联席会议，二者有了分歧怎么办？如果说指挥部相当于行政机构、联席会议相当于议会，那么现在出现了两个‘议会’，指挥部到底听谁的？5月27日关于撤离问题上的反复，便是这一矛盾的自然结果。”

“其次是双重任命，联席会议与指挥部的部门重复，出现两套人马。譬如指挥部有纠察总指挥张健，联席会议又任命了纠察总长张伦，结果广场上形形色色的纠察队很难整合，更不知道谁听谁的；而两边的宣传部长，张伯笠和老木，遇到具体问题就掐起来，谁也不服谁；联席会议后勤供给部的王刚，起初也被我任命为指挥部的后勤部长，但他很多时候不在广场，我就依托其他人来处理财务与后勤工作。参谋部我基本上没意识到其存在，部长刘刚我没印象在广场上见过；而联络部长起什么作用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刘苏里后来作了发言人。这些负责人本身可以说十分杰出，但这架构设计很不合理，部门重迭致使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掩盖实情，责任不清。黑手们设计权力结构时，显得羞羞答答。”“整个运动中，我都不清楚这些黑手的内情。甚至到了海外很久，我还以为联席会议是由‘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加上其它组织如工自联等演化而成。其实，联席会议是由社经所团队的王军涛在前台、陈子明在后台，拉上包遵信和王丹以及刘晓波、吾尔开希等人，运作操办的。……其实不仅是我，大多数学运骨干在运动中都不了解这些‘黑手’。”……

“最后，关键问题还是在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是自我任命的，而不是由下而上推选的结果。这些知识分子依然有一种倾向，要‘由上向下’地‘领导运动’，而不是由下而上地由民众推着前进。‘联席会议’其实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一些‘黑手’的用武之地。”

与王超华把“联席会”看作“咨询”组织（师爷、幕僚）稍有不同，李录认为，“联席会”应是一个“协调组织”。针对老木“联席会任命了指挥部”的实况描述，李录反驳道：

“当时据我得到的印象，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组织，给我们作后勤部，第二给我们作参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作我们的领导和派我们、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广场指挥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否定了与“联席会”有任何矛盾之后，李录重点讲述了从“绝食团营地联席会议”到“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历史演变和法理依据，并强调了它是“广场的权力来源”：

“任何建议如果不通过这个议会完全没有办法推行。”

在这里，李录使用了“议会”而不是“会议”这个概念。这意味着，发起人和组织者确有尝试“权力分立”的意图。他接着介绍道：

“政策推行部那30几个人主要负责和这上百位代表联系。这样一套自然的权力来源，才使得指挥部从头到尾领导阶层比较稳定，指挥部系统内部的领导阶层也比较稳定，最后的政策也能贯穿到6月3日。最后一次表决是在6月4日凌晨4：45左右，这个表决是由封从德主持的。当时是用的口头表决的方式，形成了撤离的决议。”

“营地联席会议的另一个职能是形成对广场各个部门的职权、新部门的设立，以及整顿广场等技术性的问题作出决议，因为它确实有议会的性质。我对几位主要的部长不去参加会议深感恼火，尤其是老木，老木一次都没去过。……所以后来大家一致推举还是由张伯笠回来再主抓。……对其它几个部门提出了严重批评。物资部从此就改成了三个部，包括食品部、供水部和物资部，由议会选出了外地的三个同学重新部署。这是在26、27日左右。”

“第三个讨论的范围就是指挥部领导阶层的权限和人员的产生，不断地得到合法性。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理想，真要搞民主。我们既然不是直接选出的，至少可以直接罢免，可以直接辞职。所以在这中间出过一些人事变动，任命过一些人，同意过一些人的辞职。比如说柴玲的辞职，就是在营地联席会议上被通过的，柴玲的复职也是在营地联席会议上被通过的。确确实实从头到尾每一项重大的任命都有它的合法性基础。包括24日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它的所有的名单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讲过，大家

一鼓掌就过去了。……当时是我们四个，后来一直没有变。除了柴玲的辞职和复职，还有28日通过的杨涛为整顿广场临时总指挥。”

“另外一个在人事方面通过的重大议题就是赵世民的事。当时这个事情引起了最激烈的愤怒，这是仅次于绝食之外的。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些议员听到这种事情。当时是汇报到我、伯笠、小封，当时是责成小封把这件事查清，但是对他的处罚一定要在会议上作出。我的印象是没有争论出怎么来处罚他。后来有人建议我们自己设一个法庭判一下，也有人说，这太影响形象。但是在撤销他的全部职务，对他进行审查，逼他交出所有钱这方面形成了非常一致的意见。另一个处罚是对王文和他所代表的一些现象，包括指挥部秘书处报告来的，拿出喝水的瓶子，居然发现是一瓶硫酸的事情，包括万朝晖和公安部的联系等等都有人来作证。我记得有二、三次作关于情报部当天收集情报的报告等等。我把它放在第一类，关于反对戒严。这个事情到了5月29、30日之后变得日益突出起来，所以这个题目又回到广场联席会议的主要议题。”

李录和封从德的叙述，为读者揭开了八九民运中一个很少为人关注的话题：学生们在向政府表达不同意见的同时，自身确实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民主理念，支撑学生领袖坚持到最后的，不是对权力的热衷，也不仅仅是一种“好斗”的理念，还有对“程序正义”的执着。这种对于“民主必须从草根生发出来”的信念，其实正是“四二二”、“四二七”取得成功的真谛。

第十七章 形势急转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章立凡、宋永毅、封从德、茅青、任畹町）

自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一个半月以来，学运已经被加载了越来越多的期望：从思想启蒙、意见表达，到争取落实公民权力；从要求“正名”、实践民主，到建构新的国家政体甚至“组阁”。还有许多通过或明或暗的操作或表白背后隐含的动机：大到权力易手、精英换位，山头宿怨、经费追加；小到个人荣誉、前途和安危……然而，当所有的“索取之手”都怀着赌博的心态在不断地往自己的目标加注时，有几人已经预测到，那个决定命运的转盘，将终止于“双输”的格局？押得越多，输的越惨。

第一节 争取不流血的努力

自八九民运爆发以来，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开明派”争取通过“不流血”方式解决问题的努力。5月22日，乔石对党内人大副委员长会议的讲话，系统展示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直至戒严，也并不意味着“流血”，并始终在谋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冲突，发生流血事件……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根本没说要镇压群众。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紧张，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休息了。”

“目前，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用一部分警察，动员学校里的党政领导，加上部分家长协助。如果这样能解决问

题，最好这样。拖下来的原因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但拖长了不好。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

如果不怀偏见地说，李鹏5月18日接见学生代表，应是已经扳倒赵紫阳后的他，希望能显示自己处理学运问题能力的一次努力。尽管碍于对学运的“定性”，他不得不以恶狠狠的语气以示立场，但从其谈话内容的文字看，事后的人们，的确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的警示。

1992年，美国纽约William Morrow出版公司出版的马克·佩里《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一书也提到，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李洁明，在6月4日凌晨2：00接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报告”称，派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美国情报小组获悉：中国安全部门官员在仍留在广场内安营扎寨的学生中间来回做工作，劝他们离开广场。美国情报小组推测，一个特别安全单位在军队进驻之前就派到了广场，它的明确目的是阻止流血。

5月19日，中央办公厅安排赵紫阳、李鹏等看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赵紫阳的一席话，除了传达“我已无能为力”的信息外，也寄托了“希望同学们平安”的心愿。

事实上，早在“绝食”运动刚刚开始，“撤与不撤”这个话题，不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就隐含着一切善良人对学生生命的关切。

据《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他曾向最高当局提出过令广场学生误解的建议：

“学生们开始绝食了……有的学生甚至宣布开始绝水。我专门打电话给赵紫阳、杨尚昆，建议处理学生绝食活动，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备几百辆大客车，腾出医院，动员医生、护士和一部份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晓时，几个人扶一个或抬一个，把绝食学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锁天安门广场，进行对话活动。我担心如果有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矛盾就会进一步激

化。”“他们两人在电话中都讲这是好主意。但后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动。大概他们那时也无能为力了。”

事实上，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学生中间，5月15日参加《光明日报》座谈会的严家其，就从北大听到了这个传闻。事后，阎明复为求学生撤离广场的努力付之东流，与学生认定了它的“破坏绝食”的性质有关。

另一些企图将学生撤离广场的努力，也来自上层。其中一个来自代表赵紫阳“改革派”的传话人戴晴，另一个则似乎来自邓朴方领导的残疾人联合会。

据邹谠先生介绍，张郎郎在《去天安门捎个口信》一文中曾回顾了他给戴晴传信的过程：

“5月17日晨，《光明日报》特约记者及著名知识分子活动家戴晴打电话给张，委托他代表自己给天安门广场广播站的学生领导带个口信。口信说‘现在应如下行动’：首先，赵早上的书面讲话，可当作政府部分人的初步态度，即明确肯定不会有‘秋后算账’；第二，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将来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进行对话，并将进行现场广播。然后，口信有点模糊的说‘下午两点钟，工人、农民和士兵将举行游行。’那之后，占领广场的学生将‘胜利返校’。张穿过几个由学生纠察队构成的警戒线后，终于见到了一个学生领导并传达了戴的口信。学生领导对张说，作为一位作家，学生们尊重戴，但如果戴要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那则会损坏她在学生中的形象。学生领导说，‘我们无法同意一个如此笼统的行动策略’，并说如果党和政府领导人想和学生对话，他们应直接来，而不是通过一个中间人。”

根据事后发生的事情，文中所说“高级政府官员”很可能就是阎明复。而这位学生领导就是张伯笠。由于不了解广场存在的“表决机制”，戴晴给学生提供的方案虽略显主观，但其用意，是在挽救学生生命的同时，更挽救赵紫阳所代表的党内“开明派”的话语权。

这次传话的失败，以及这个故事的传播，加剧了人们对广场学生的反感。邹谠先生也据此对学运领袖提出了批评。但戴晴并没有放弃这一努力，5月19日上午，她曾试图运动中顾委委员李锐、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到广场劝说学生结束绝食回校。之后，她又与何新一道，前往张郎郎家，亲自对学生领袖熊焱进行动员，虽然无果，心力已尽。

“残联”的干预，则是在“戒严令”颁布以后，学生觉得“最紧张”的一天。据中央民院的学运骨干、时任吾尔开希女友的刘燕回忆：

“21号晚上……当时有邓的人来，有胡启立的人来，还有其他的人来，他们来找开希和一些学生领袖，说有话要谈。程真带着邓朴方残联的人来说邓朴方要见，因为和邓家一直没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就说好去。当时去的人有开希、梁二、少方、程真和我……。”

“残联来的是一个姓韩的副主任，他刚开始说是邓朴方要见我们，我们就去了。在路上，他说你们以为北京城的地下是空的吗？你们知道北京城地下交通是四通八达的，你们只能拦住几个别人能看到的地铁口，还有更多看不到的口，根本就拦不住。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坦克平射，那么平射的对象是什么，那直接就是人那。当时路上的群众已经把铁桶、石墩儿挪到路中间当路障，他说，这种东西等坦克一来，不是一下就推没了嘛。听完这些话以后，我们几个人都很紧张，他描写出来的场景就是一场流血的场景。”

“我们四个人到了残联之后，他们又说邓朴方不在，那等于就是他们以邓朴方的名义把我们叫到残联。那个残联的办公室副主任和另外一个人就跟我说，请你们在今天五点钟之前一定要把同学带出广场。他说，后果不是你们能够负担的。这两个人自称是四五运动参加的人，他们说我们也是支持你们的，但是在形式上我们希望和你们能够达成一种共识，不要伤害同学，也不要有更激烈的情形产生。”

但是，他们从信访局获得的信息令人困惑。据当时参加了这次活动的梁二回忆：

“……后来又郑幼枚那儿去了，也就是到信访处去了。程真跟我提到，留在那儿的印象和与信访处主任郑幼枚的交谈结果她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中央有意要分化学生领导，就是让学生领导产生分歧。这点我觉得与阎明复的态度有关系，说不定阎明复也有这种感觉。程真她自己是当时就想到这点，中央一系列的与学生接触的活动不外乎两个目的，一个是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从中央分裂出来的，有意识地要与学生合作；第二个目的不外乎是中央并没有分裂，或者说分裂出的那一小部分并没有与学生接触，而相反那一部分继续留在权力位置上面的那些顽固派他们是利用这种接触，传达错误的信息，时间上错位的信息给你，从而给学生造成一种很混乱的印象，促成学生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得出不同的判断，而且在不同的判断之间再产生一种情绪上的相互抵触，造成学生内部的分化。这是程真自己的感觉。我记得当时开希也提到过这点。”

这件事的结果，是从“残联”返回广场的梁二对广场实施的紧急整顿，5月22日凌晨开希到广场宣布“撤退到使馆区”。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他的被罢免，及此后的“北高联”回校整顿。

据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常劲回忆，那段时间，也有自称与邓朴方有关的人，谋求与学运达成协议：

“大概是21日和22日，要么就是23日邓朴方有个秘书，残联的一个秘书跑到北大去找，说是你们如果有力量能够帮助他们的话，邓朴方愿意劝邓小平辞职，然后解除戒严，所有的学生从广场上拉下来。”

5月22日，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开部分高校学生代表会议，宣布干预学运。并提出了“凯旋在子夜”的设想。据万润南回忆：

虽然从胡耀邦逝世起，他就密切关注学运，但直到此前为止，他都对介入运动抱谨慎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四通的成功，以及他对自己明确的“企业家”定位。他认为，“企业应当是社会的稳定因素”；企业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他认为，民主制度的建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将有一个漫长的、代价高昂的过程。而在运动初起时，不明就里的学生，还把四通列入“官倒”行列。因而，他对这场运动被利用来“反改革”的可能性异常敏感。他说：

“只有稳定，改革才能按部就班进行下去。社会动乱，首先摧毁的是未来有希望的潜结构。四通就是这样的潜结构。……动荡——任何社会动荡，时间长了一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影响。据海淀区统计，今年的新产业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3%。除了四通，其他公司都有大幅度的下降。”

在中关村十大公司中，四通的总收入和总利润分别占59%和56%。“四二七”大游行当天，因游行队伍阻断交通，四通的营业大厅日销售额“一落千丈”。“我们捧的是泥饭碗，我们的承受能力有限”。万润南担心：“4月份已经亏损了，5月份，还看不到转机”。所以，学运初起，他向本公司员工宣布了三条纪律：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到5月18日李鹏接见学生代表后，他认为学潮早该结束了。尽管如此，四通的许多员工还是卷入了学运。他们有的不上班、不要工资，参加声援学生的游行，并且说“跟良心比，钱是次要的”。有人甚至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捐了出来。四通旗下的鹭岛公司的子公司——华成托运服务公司头头，也曾以“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为条件，直接给“工自联”常委和学运骨干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并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在总经理的默许下，从5月15日开始，公司就以“人道救助”的名义，“通过北大、清华的学生组织，给广场上的绝食学生送一些药品和水等物资，每天大约要花一万多块钱。”在整个学运期间，四通大约支援了“20多万元”。不仅如此，万润南一直派员密切观察学运和全国形势。他的得力助手崔铭山就曾对广场学生头头说过：

“从你们走上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开始，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监测着全国各阶层的反映，监测着全世界的反映。我们了解的情况比你们要全面一些，我们所作的判断，比你们要冷静一些。”

万润南承认，自学运初起，他就派出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公共关系部副部长周舵全天候跟踪学运和社会各界动向。包括参加统战部的“斡旋”和介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事务。曹思源策动召开人大“特别会议”也得到万润南的全力支持。

然而，戒严消息的传出，万润南终于抛却暧昧的姿态，决定亲自出马，约见了北大、清华的四位同学。万润南告诉他们：“是到了‘收’的时候了。现在是收的最好时机。”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学运组织得非常好，“就像写一篇文章，开篇、中篇都写得很好，现在要把尾收好”。“面对强大的戒严部队和专政机器，打持久战非常不利，也不可能。”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学们：

“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现在已经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安定，这又可能成为军队动武的口实。戒严部队进城了，还没有动武，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顾虑民心的向背。如果坚持对峙，出现了混乱，你们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

随后，他提出了“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的建议。

5月22日下午5：00，在刚刚开张尚未启用的国际饭店的彩虹厅，万润南召集了在广场上静坐的75所院校 的学生代表，说服他们在午夜12：00之前撤出广场，并建议把这次行动冠名为“凯旋在子夜”。

图8-21：北京国际饭店

高校学生代表如约而至。但是，动员会还没开始，从来宾们“个个面有菜色”的容颜中，万润南已经知道自己将无力回天。事后，官方的报告对这次会议记载说，万润南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重申了一部“杰作”的精彩“结尾”的重要性后，他话锋一转：

“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离回校，要坚持校园斗争。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这样，就更有利于下一步的斗争。”

大概是意识到这样单方面对学生提出要求不够公平，难以说服学生，他接着又说：

“当然，撤退，我们是有条件的，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

他把建议中的“大撤退”描述为“大进军”。“是为了新的目标才回学校的大进军”。

毫无疑问，万润南的目的是欲挽救学生于水火，而不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入火坑。但是，在具体步骤上，到底是学生先撤？还是军队先退出，邓李杨先下台？如果是学生先撤，那就无所谓“撤退的前提条件”；如果是邓李杨先下台，那又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建议学生，首先应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而不是向政府）讲清观点。

其时，恐怕连万润南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并不比自5月15日以来的所有“斡旋者”更聪明。他同样在还没有起步时，就已经陷入了一个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境地。当学生向他陈述自己的惶惑与无力感时，他批评道：

“当有人说‘学生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撤，有人要留，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我说：‘你们争取民主，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应该符合民主程序的规范。你们现在是小喇叭服从大喇叭，嗓门小的服从嗓门大的，调门低的服从调门高的，谁嗓门大，谁激进，谁就有领导权。这难道就是民主？’”

而他似乎忘了，“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正是他所欣赏的吾尔开希的名言。

当听到有人说不撤的主要原因是“怕走了会使市民伤心，这样就是出卖那些拼死为我们拦军车的北京市民”的时候，万润南愤怒了：

“如果你们不撤，流血的首先是北京市民。你们处在台风的风眼，反而相对安全些。市民拼命挡军车，是因为你们在广场坐着，他们是怕军车碾压了你们。如果你们撤了。他们还有必要挡军车吗？你们坚持不撤，难道是想逼着让北京市民为你们流血吗？”

直到最后，万润南才婉转地直奔主题：

“我希望学生一定‘要审时度势，考虑现在的处境和状况，听取各阶层的反响及国际反应，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变化。再坐下去，无异于给军队提供镇压的理由。如果发生流血的结果，对这次运动，乃至整个民族、国家，都将是灾难。”

动员大会从下午5：00开到晚上9：30，历时四个半小时，但没有收到应有的反响。万润南其时也不了解，广场的运作机制——与所有欲插手运动的

精英一样，他们都不知道广场的行动决定于广场“议会”。万润南只是凭感觉：学生的“民主”不可信任以后，他转而寻求学生中的名人：

“我问到会的一位学生，谁在同学中比较有威望？有人告诉我：王丹。”

“我说，派人去把王丹找来。当晚10：00左右，我从国际饭店彩虹厅赶到北京饭店的咖啡厅，单独会见了王丹。他处在一种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仿佛是被架到我跟前的。对我的讲话，他反应很慢。我告诉他迫在眉睫的流血镇压，他说：‘不会的。’我问他：‘你认为会是怎样的？’他说：‘最多是用棍棒把我们揍一顿，几个人合力把我们一个个抬出去。’”

王丹当时的想法，实际上是6月4日夜仍留在广场的绝大部分学生的想法。事后，万润南说，那大概是出自“1976年天安门运动”的“坑爹坑孩子”的经验。但当时，他大概与所有听到过这种想法都无言以对的人差不多，他的回忆录到此没了下文。

事实上，在整个运动中，能准确估计到最后结局的人并不多。笔者知道的只有许良英先生。他曾告诉笔者，70年代邓小平复出期间，曾主持镇压云南沙甸的所谓“回民叛乱”，下令用大炮轰平了两个拒不投降的回民村寨。据此，许先生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已经预见了“六四”的结局。这也是他坚决拒绝了刘刚、王丹的期望，在整个运动中绝不插手学运的唯一理由。但即便是笔者本人，当时也并不相信许先生的告诫。

5月23日，四通公司根据万润南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并征得了20多所高校的联署。《倡议书》发出后，北京大学赵宝煦、梁守德教授等60名教师，于当天下午发出《紧急呼吁》，赞成倡议。但是，这份倡议未能获准在国内报刊发表。

5月22日，著名女作家韦君宜以清华“老学长”兼“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的身份，给学生写信进行了现身说法。她赞扬了这次学生运动的成就，肯定了学生们“做了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想做，但没有做好的推进人民民主的事

业”，并赞扬了学生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接着，她又谈到自己当年搞“无限期罢课”，包围“教授会议”等种种盲动行为，最后怎样在中共地下党的启发下得到改正的经历，劝导学生：

“眼光再远一些，肚量再大一些。从来政治事态的发展都受多种因素影响，得权衡轻重，前思后想。……再对峙下去，老守在天安门广场，决不是办法。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会出现十分复杂，你们完全不能把握的事……各种情况使许多真想帮你们忙的人帮不上忙，这是不能不审慎，再三考虑的。”

上述种种信息集中到广场，必然引起学生的思想斗争。从戒严第二天起，在学生中就掀起了一场持续数日的“撤与不撤”的大辩论：

5月21日下午，北高联召集50多所高校自治会的负责人开会，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会上，对撤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对此问题投票表决时，32票赞成撤离，14票反对，2票弃权。于是，会上提出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口号，其内容是：“拥护党内改革派，打倒党内保守派”；决定撤离的方式是：“游行、宣传、回校后继续罢课。”

但是，这一集体决定并未付诸实施。据官方掌握的信息称，这与“幕后人物”的干预有密切关系。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干预”呢？北高联宣传部的负责人在事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知识界开会，一致决定坚决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坚决同李鹏伪政府斗争到底。

5月22日凌晨3：00，吾尔开希提议撤到使馆区后，仅仅过了十分钟，北高联王丹便宣布，吾尔开希的意见不代表北高联，也不代表广场指挥部。他个人的意见是，这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意味着对政府高压政策的屈服和学运的失败。并说，是否撤离，要待指挥部集体讨论过后才能作出决定。到凌晨4：00多，广播里传出指挥部已与部队达成协议：只要同学们维持广场秩序，部队将不开进天安门广场。一位自称指挥官的人也通过广播证实了这一消息。

为了体现传播媒介的价值中立，“学运之声”交替广播着两派的不同声音：

一份以“全体北京高校暨全国各地参加这次民主爱国运动的学生”名义散发，实际由四通公司起草的《紧急呼吁》说：

“通过30天坚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已取得初步胜利——自5月22 日上午10：00起，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大学生大规模地、有秩序地、迅速地撤离天安门广场，返回校园，重新整顿，重新准备，把这场科学、民主斗争继续再深入持久广泛地进行下去。”

为了表明“撤退”并不意味“投降”这份呼吁还详述了下一步运动的目标：

（1）政府必须尽快取消戒严令。（2）全国人大、政协应组成紧急调查小组，调查整个运动始末，作出正确评价。承认这场由学生发起的、全民响应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而绝不是动乱。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开除李鹏的党籍。（3）所有参加绝食、绝水的同学的健康和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均受到了严重损害，向最高法院起诉：立即立案调查，上述一切后果的法律责任均应由李鹏负责。（4）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国公布运动的事实真相。（5）希望在返校过程中，政府和人民都来协助这一行动，保证学生安全返校。（6）对于绝食、绝水学生要给予良好的护理和治疗。北京市政府必须继续保障人民生活用品的供给，等等。但与此同时，另一份落款是“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宣传部”的传单，则呼吁坚持。它说：

“如果我们在這個時候退让，天安门广场的人数减少，阻截军队的力量减少，他们就可能不惜流血，采用暴力镇压，北京乃至其它大城市的人民就会在军管的专制恐怖中生活，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会停滞不前。”

按照这篇文告的期待，民众的“反戒严”可能导致不流血的结局。与此同时，“高自联”的一名负责人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不是某个

人的军队，人民军队不会镇压人民，我们的学生对进京部队进行了宣传，已取得军队的同情和谅解，我们还准备列队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因为军队进城主要是帮助维持秩序。”

一份署名“中华民主同盟会”（亦称五月同盟）“广场智囊团”的传单说：

“目前，撤出广场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是一种最为糊涂的思潮和招术。但我们相信，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是出于糊涂，而非出于什么恶意，所以我们才在这里申明大义，力排糊涂言，极言不撤……广场若干阵营早已成为此次运动的标志，如不攻自破，不论设置何种理论、理由，都将是对中国民主运动和精神的一个沉重打击。参加者必将遭到历史的嘲笑。其实，撤出论者，尤其是领导者，主要是因为物质消耗问题被搞得头脑不清。坚守广场，每日要耗费5 万元用于饮食等。但这并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广场各校，应立即向支持广场的费用自负过渡。决不能吃大户，决不能让经济问题把广场圣地和伟大的民主运动拖垮，各校都有革命民主的不辞职责，应该主要自己筹款。”

而原“绝食团”的领袖们，则认为“以静制动”，“等着他们来拖”，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事后，李录曾对“撤与不撤”的争论有一个总结：

“撤与不撤的争论，这成为每一次广场议会的最重要的议题，有的时候是第一个议题，有的时候是最后一个议题，每一次占的讨论时间都最多。我总结一下当时两派讨论基本的理由。”

“主张撤的人理由是：第一，当时军队已经调入广场之后，这个运动基本上就失败了。失败后要保存实力，要想把运动长期地开展下去只能撤离广场，只有撤离广场之后才能保持学运火种，避免牺牲；第二，如果我们坚守

广场，可为的事情不多，对下一步学运缺乏明确的目标；第三，当时广场的秩序成为当时大家议论的中心，也是很多人同意撤离的原因。”

“不同意的原因如下：第一，当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全国学运一个旗帜，这个观点主要是由外地学生提出来的。如果在这边撤离，将使得各地的学运自生自灭，随后的秋后算帐必然会到来，这对学运在各地的火种是一个打击而不是保护。而各地的情况，无论是群众基础还是政府基础都远差于北京；第二，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已经齐聚到了广场，他们在电视机前事实上是对于全体学生最好的保护。当时认为在全世界舆论的关注下，中国政府还不至于做得太过分；第三，按照中共以往的经验，既然他已经动了真格的了，既然已经20万军队调集到广场，当时不断地有各种各样不断升级的传闻，有一天传说是导弹，而且有人照了照片来，后来发现那是毒瓦斯，认为镇压已经势在必行，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撤离广场，之间的区别是这个镇压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当时认为秘密的屠杀比镇压可能会更严重。当然这里还有没有说出来的原因，我想可以归纳成两个：一是对屠杀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缺乏估计，当时认为最严重的可能是用刺刀、枪托，死人当然是会死，学生领袖看来一个都活不成，但是对于大规模的用坦克、机枪的屠杀完全没有估计；第二是有可能外地学生强烈地感觉到，出来之后都已经回不去了，在当地本校都已经上了黑名单，回去就没有好果子吃。这是隐含的一个意义，没有讲出来的。”

就像早前戴晴竭力地劝学生撤离广场，给“改革派”留下回旋余地一样，此时，作为北大校友、邓朴方的朋友、此时应该是对邓小平声誉怀有关切的人物代表——何维凌于5月28日也再次回北大，并做了一场演讲。讲演的中心内容，就是主张学生尽快从广场撤离。可是，据包遵信回忆，它得到的回答却是一片嘘声。然而，何维凌“不到黄河心不死”，又转而试图做“黑手”们的工作，包遵信说：

“5月29日晚11：00我回到家里，就见桌上一张条子，说何维凌 来电，让我回来不论何时都要给他回个电话。何维凌也是我的朋友，可是，他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学运期间从未见过面……我忙完手边的事以后，已是次日凌晨1：00了。这时才拨通了何的电话。何拿起话筒，一听是我，就说：你不要睡，我马上到你那儿去！一刻钟后，他就到了我家……他一见我就说，你能不能跟王军涛他们说说，动员广场学生在月底撤离？”

显然，何维凌从自己的渠道清楚地知道，“联席会”已经驾临广场，包遵信成为了其象征性人物。

“你打算怎么个撤法？”包遵信问。何维凌说：

“可以确定一个时间学生撤离，撤离之后将广场打扫干净，表示我们欢迎解放军进城。然后在广场或者什么地方开个联欢会，军队领导和学生代表都讲几句话造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气氛。”

“我真佩服何维凌的想象力，竟然要让一片乱石瓦砾长出一丛又一丛的鲜花”。包遵信回忆道：

“不过，既然他把学生撤离的步骤考虑得这么具体，肯定不是随意说的……何维凌说：我到这儿来包括刚刚讲的撤退办法，都跟朴方说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的首肯。这件事杨家也知道，撤的办法就是得到他家的默许……”

包遵信与何维凌谈到30日凌晨4：00多。他一离开，感觉到身负重任的包遵信立即用BB机呼叫王军涛，让他上午派车来接自己……

包遵信不知道，何维凌当日回到办公室前，就被“陌生人”绑架。 后人也因此无法判断，何维凌所说的计划是否真的存在。直到张伯笠的回忆录问世，我们得知，当日下午，广场学生确实与军队做过一次正式接触，地点“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客房里”。参加者是广场指挥部的李录和张伯笠，对方

是“中共中央、戒严指挥部的代表”。但遗憾的是，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这次接触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学生代表被警告“尽快撤回学校，军队已决定尽快清场”。当张伯笠告知对方，广场有“十万人”，夜里大约“二万人”时，对方说：

“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可下两个空降师，在故宫里可下一个空降师，在地下铁路可以运两个师，加上人民大会堂的特种部队有6万人，我们可以三个人对付你们一个学生，强迫你们离开广场。”

但他承诺“决不会向人民开枪的”。

5月31日晚，温元凯在北京饭店见到了包遵信，也向他提出“劝撤“的问题。

5月31日，邓小平批准清场行动方案后，6月1日，国务院在第四会议室召开了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座谈会，讨论《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十条政策拟定：

一、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学潮，同极少数利用学潮之机制造动乱，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青年学生是出于爱国热情，动机和愿望是纯洁的、善良的。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他们的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二、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惩治“官倒”、清除腐败、反对官僚主义，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同党和政府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对党和政府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一定要充分肯定和坚决保护。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批评建议，一定要认真听取，积极采纳。

三、在学潮中，未经法定程序就上街游行示威，乃至采取罢课、静坐、绝食等等行动，即使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也是缺乏法制观念的表现。党和

政府也不赞成。这样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态扩大，激化矛盾，影响学校以至社会的正常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秩序，形成无政府状态，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政治动乱以可乘之机，使事态的发展走向广大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

四、对于在学潮中有过一些过激甚至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党和政府是能够谅解的，不予追究。

五、在学潮中通过各种方式声援过学生行动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绝大多数人的动机和愿望也是好的，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党和政府是谅解的，绝不会事后加以追究。

六、对于怀有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蓄意利用学潮，策划、组织、煽动动乱的极少数首要分子，对于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极少数人，对于向非法组织有意提供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的极少数人，必须彻底揭露，坚决依法制裁。

七、对于在动乱中趁机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活动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动乱中滋扰生事的流氓政治团伙，必须依法严加惩处，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八、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应当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在首都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对于继续聚众妨碍和干扰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戒严任务，屡经教育拒不改正的首要分子，应依照戒严令加以处置。

九、党和政府将继续同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积极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对话，广泛听取意见，交流看法，增进理解，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十、党和政府将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平息动乱，维护安定团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认真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搞好党的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继续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改进和加强教育工作，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及民主党派人士37人，及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生、何东昌、曾建徽、汪家镠、吴文昌等参加了座谈。北京农业大学裘维蕃、北京大学王楚、徐光宪、赵光武、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人民大学吴树青、张大力、清华大学张维、北京外语学院许国璋、北京工业大学王以铭、北京理工大学秦有方、北京师范学院储亚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文学所何新、中央歌舞剧院陈爱莲等，都就“十条”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李鹏在《六四日记》的6月1日这一天写道：

“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第二节 “多余的话”

据《中国“六四”真相》5月29日中南海获得的报告称：

“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批由香港捐赠的崭新的旅游帐篷，进一步表明了广场上静坐的请愿学生不会一下子撤走。由于没有游行声援的队伍，尽管广

场上插满了300多面旗帜，但静坐的学生还是显得孤单。白天，广场上的静坐学生显得很松散，睡觉的、打扑克的、看书的，说笑话的、甚至个别跳舞的，还有一些学生在探讨下一步的打算，关于‘非暴力不合作’的话题、‘关于空校’的话题，时有学生在相互争论。一种对学运厌烦了的情绪正悄悄地在静坐请愿的学生中弥漫。晚上的广场，人很多，气氛很热烈，像一个大型的节日晚会，很多学生和市民在这里转来转去。晚10：30左右，中央美术学院等8所北京艺术院校的几百名学生，将一座名为‘民主之神’的石膏塑像分块，用6辆三轮车运到天安门广场北端、国旗南边的场地上。晚12：00许，几十名学生开始搭建脚手架，准备吊装，要将这个像逐块地垒叠连结起来。在安装现场，学生们拉起了一道纠察线。有上千人围观。……这个像有50多人参与了设计和制作，用了约一星期的时间。”

图8-22：民主之神（选自64memo.com）

这份“安全部”报告还记载了28日晚“柴玲辞职”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据称约有300人参加：

“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由广场总指挥柴玲分析形势。她说，为大多数同学着想，坚持下去可能要流血、牺牲，还唤不起民众。目前的困难很多，主要是外地和北京的学生不团结，意见不统一，经费也很困难。她还认为自己能力有限，身体不适，要求辞去总指挥职务，民主选举新的领导人；二是代表一致同意由‘北京高自联’、‘外高联’、‘绝食团’三方面联合组成‘全国高联’。在广场上的学生将坚持到6月20日人大召开之后，用香港支援的帐篷以广场为根据地，办成黄埔军校式的大课堂，设立教室；三是有关下一步学运的建议：（1）建立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2）加强宣传，发动群众；（3）争取工人、市民的同情和理解；（4）继续采取上街募捐的方式筹集经费；（5）在广场留下少数代表，大多数人作为火种回到原单位。”

次日的香港《文汇报》头版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据柴玲自称，她打算辞职后去做军队的工作，对外则声称是想南下，发动“联省自治”运动。为此，她在28日白天已经向后来“出卖”她的那位外国记者——金培力先生，留下了一段逻辑混乱但无比真诚的“遗言”：

“我深信不疑真正的战斗并不是在天安门广场……最重要的是和军队接洽，劝说他们不要实施戒严令。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获取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和成功。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这意味着从镁光灯的保护下离开广场，走进未知的区域。和大家的假设相反，天安门广场成了当时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当黑暗的力量不断向我们侵蚀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人都可以很容易被抓住或者消失……。”

“谁应该去和军队联系呢？一个运动的真正的领袖，而不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名义领袖，她的责任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当我开始这新的一天时，我确信我应该向这个新的方向努力。但是当我试图联系军队领导人之前，我考虑过如果我被捕或失踪的话会怎么样。我最后的遗嘱和见证会是什么呢？我希望把我的经历和我对运动的想法留一个备案，这样如果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人们就可以从我结束的地方接着我的活干下去……”

“突然间，快速录像的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柴玲找到了她的保镖王力，通过他的关系，找到了“一个美国学生”：

“他把我带到了一个酒店里，把我介绍给了一个高个子的白人男性，他的名字叫金培力。”

“金培力的中文当时还不是很好，我不是很确定当时他对我们的意图有几分了解。我跟他解释说我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我的想法记录下来，然后我就要去做一项危险的任务。他说他认识一个可以说明我的人。他并没有告诉我他正在给一家外国媒体工作。当我等待着金培力开始的时候，一个来

自香港的女记者看到了我，坚持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王力很清楚地告诉她说这不是采访，她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她只是希望成为这个时刻的一分子。”

柴玲和金培力、香港女记者一道，乘坐出租车到了金的“一个朋友的寓所”。他们给柴玲在一张床上找了个座位，在摄像机准备好以后，柴玲开腔了：

“‘我的名字叫柴玲。我 23 岁。我的生日是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的日子，多巧合的事情？’我快速地讲述着，言语从我的心里流了出来，我讲述了我如何参与进学生抗议运动和各种情况如何最终让我成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当我重温六周以来的活动的时候，我突然情绪化了起来，我哭了。我有一个很强烈的预感，我们最终无法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劝说政府同意我们对于改革的和平诉求。这让我很难过。”

事后，通过金培力流出的录像，经卡玛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天安门》，让读者和观众得以了解，夹在“撤”与“不撤”截然对立的两派之间无所适从，感受到来自北高联、外高联、联席会各个方面的权力争夺，经过无数沮丧（主要是与李录关系的崩解）的打击，运动需要的光环和自我形象塑造压力严严包裹下的柴玲，终于打开了宣泄的闸门：

“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业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

“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4月20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

（哭）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

“同学们一直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的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撤回学校去的话，他们就会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的先进的领袖，还有一些党内的、军内的、能与他们相抵制的、能代表一些人民利益的呼声的一些人全部清洗干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一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是年轻的孩子们、、、、（哽咽）”

“记者：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记者：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

录像结束时，柴玲说，她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

事后，柴玲在她回忆录中解释，当时，她已经“有了和军队联系的主意”。“我想用些什么办法阻止他们实施戒严令”。但她一直没有能证明这个想法确实存在过。譬如，她究竟准备通过什么渠道，去做谁的工作？即便她能见到什么人，她将用什么道理说服这个人“撤军”或抵制“戒严”？亦或是她准备把自己交给政府当“人质”，以保全广大同学的生命，保全北京城的平安？除了4月底，她曾接触过一个自称邓小平家人的“朋友”、以及几个安全部的便衣（他们曾给她留下名片），她未曾交代过自己在上层和军队有任何内线。也许，由于她在运动中一直把与上层人士的交往视为“与政府做交易”，而对有关人士加以鄙视，以至于王超华曾给人打招呼，“以后跟上层有什么联系，请不要告诉柴玲。”在这种情况下，她当然不便让更多人知道她会去找安全部的便衣。而她丰富的幻想却足够让她意识到，在“老虎”已经张开大口的时候，这样孤身一人“深入虎穴”该有多危险！

事后，金培力和英国记者Andrew Higgins（贺安雷）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柴玲在5月底确有寻找外国朋友“帮她逃出中国”的愿望。但这究竟是她为“游说”失败所作的备选方案？还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掩护？一个可供参考的信息是，5月27日下午，联席会任命的广场指挥部宣传部长老木曾征询包遵信的意见，是否“准备逃往国外”，被包遵信“骂了一顿”。他和严家其在31日下午通话时仍准备好了坐牢。封从德回忆，5月28日郭海峰也曾对他提到政府拟定的“几十个人的黑名单”问题，并征求封从德意见“是否要办理一个护照留条退路”。

“他说，已经有外国使馆答应协助学生骨干随时潜逃，并说准备了40本护照。”

“我回绝了郭海峰。我很担心外界这样看学运：这帮家伙只是因为考不好托福不能出国留学才这么闹腾，以便争取外国人的同情。也很担心这会败坏风气，动摇军心。对外国人以这样的方式来援助学生，我十分的怀疑；如果是真的，则很不以为然。我更担心政府藉此大作宣传，支持学运的民众知道此事后一定难以接受。”

因此，金培力和贺安雷所说柴玲想寻求外国朋友帮助，究竟是她为在流传中的“黑名单”上的人寻找后路？还是为她个人寻找后路？亦或是她只是在外国朋友们征询其意见时（就像老木征询包遵信的意见、郭海峰征询封从德的意见时一样），表达了自己不同于以上二者的考虑而已？总之，此事的澄清，仍需相关人士提供更多的信息。

但是，因此，我们也可以做出判断：柴玲并不是坚持广场的死硬分子。我们即便可以相信她，真的是出现过“游说”念头，并且真的为这个念头留下了录影，但整个录影弥漫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主义”情绪，以及连她自己也未料到的“求生本能”的迸发，实际上已经打消了她自己将继续执行那个“计划”的可能。剩下的，能让人理解的难免就是，她准备在辞职卸下责任后，像所有悄悄离开广场的人一样，悄悄地离开广场。不再试图去“做贞德”，或卡莲娜，而是去做回那个叫“柴玲”自己的人！但是，真实生活中的柴玲，依然根据惯性在往前走，但她还算清醒的丈夫告诉她，不要胡思乱想。

尽管“游说”方案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但出于找不到继续坚持广场的理由和其他内心的压力，柴玲还是在28日的营地联席会上提出了辞职。据封从德回忆：

“柴玲听了我的话留在广场，在当晚‘营地联席会议’上提出辞职。这又是一个300代表的大会，大家围坐在纪念碑二层东北角，指挥部帐篷外的空地上。”

“劳累和沮丧之下，柴玲讲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在场代表们哄了起来。这时李录赶紧接了话筒替她解围。他说柴玲从绝食一开始便作了同学们的总指挥，如今累得快崩溃了，又说了几句安定情绪的话，会场气氛很快缓和下来。这时，柴玲找回了思路。”

“柴玲向几百个同学讲了她辞职的原因，身体支持不住，能力不够，没能将广场秩序整顿好，希望大家选出更有能力的同学来担当重任。她讲得很生动，好几次大家报以掌声，全无先时那样的反感。她又讲到自己的悲哀，指出广场上许多不良的现象，依然得到大家的赞同：‘外地来的同学，本来是说到北京声援，现在却要在广场上夺权！有的同学来北京白天游长城，晚上回广场睡觉。你们想一想，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这一番话对外地同学很有触动，没有人反驳她，有人劝慰她说：‘柴玲，你不能走！我们愿意听到你的声音，听你指挥。你还作总指挥，具体的事情由我们来分担。’面对代表们的热忱，她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坐到边上，再也不说什么了。”

5月29日的香港《文汇报》对此做了报道，标题是：《结束静坐主张遭反对 柴玲深夜提辞呈 广场指挥部凌晨尽力挽留》。同学们好意给她留出一天时间再做决定。丈夫则把她带回了阔别的家。于是，身心的疲惫一同向她袭来：

“整整一晚和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充分的休息恢复了我的精力和清晰的头脑，到了晚上我又恢复了精力，决定不辜负我们坚守广场到底的誓言。李录做了一些努力，试图恢复我们之间的隔阂，他的这些努力又重新建立了我的一些信心，但是我已经无法无条件地信任他了。但从5月29日开始直到最后关头，当学生们在6月4日凌晨决议离开的时候为止，我都一直没有离开过天安门广场一步。

我们这个时候从香港得到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香港在1989 年还是英属殖民地，我们在香港的支持者举办了一个马拉松演唱会，筹集了2600万港元来支持民主运动。 当他们把资金送来的时候，他们同时也送来了帐篷。 终于，在广场上重新获得了急需的秩序。 资金的注入提供了新的能量。 天安门广场一夜之间成为了有序的帐篷之城。”

从5月31日起，天安门广场原有的不规则旧帐篷一律换上了香港运来的新帐篷。300顶小蘑菇令原先杂乱无章的天安门前显得焕然一新。另外还有几十座大帐篷搭建在纪念碑的周围，显示了学运领导机构的庞大。而单独设立在广场西北角的一座属于工自联指挥部的帐篷，既与其设在西观礼台上的广播站遥遥相对，显得紧扼西长安街要道，又像是整个广场的守护卫兵

人们没有想到，三天以后，这些吉普赛式的营帐就将被付之一炬。

适应这个新的气象，5月30日清晨，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八大艺术院校推出，由中央美院雕塑系20多位同学集体创作的“民主之神”塑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揭幕仪式。为这个庆典，人们发表了《民主之神宣言》，将塑像“奉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奉献给广场上的战友们，奉献给全国百万大学生们，奉献给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支援这次民主斗争的人民的”。宣言还说：

“民主之神，你是1989年中国民主潮的灵魂。今天你庄严地站在广场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民主运动的大崛起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我们坚信真正的民主到来之日，我们一定会再来广场，树立起一座雄伟、高大、永久的民主之神”。

为防止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冲撞，塑像虽以法国大革命赠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为参照，以女性为模特，但正式命名却有意回避了“女神”的

称谓，正式定名“民主之神”。在选址上，特意选择在天安门广场中轴线，国旗旗杆与纪念碑之间的中间点，即原国庆节期间置放孙中山画像的地方。

该塑像基座高10米，人像高7米，用泡沫塑料和石膏等简易轻便材料制作而成。为此，经过三天四夜奋战的年轻艺术家们，也生发出种种担忧：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塑像虽然有防雨特性，却经不起大风的吹刮。他们不得不告诫前来观看、照相的游人，“最好不要离塑像太近”，最好保持10米的距离，以免大风刮倒塑像，砸伤游人。

这一塑像的成立，及其周围的彩旗与艺术气氛，使单调沉闷的广场一时间如同置身节日。但它的位置的选择和女性性别，立即招来了种种非议，并有指斥其为“强奸民意”的痛诋。

与此同时，作为这座雕像“模特儿”的柴玲，又增添了另一桩心事：

“一个北大的学生带给封从德一封厚厚的信封。那是来自波士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了封在波士顿大学遥感专业博士生项目的全额奖学金。封和我坐在总部的帐篷里，一页一页仔细地读着这些信。这些文件包括了给我们两个人需要赴美签证的资料。这是我们美国梦的第二步。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对方，意识到在过去的50 天里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有了多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的中国梦成了更重要的任务。”

然而，当晚，噩梦也随之进入了那个第一次可以供他们夫妻享用小帐篷，他们遭遇到“亲密战友”的绑架事件。

5月29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广播站播出评论员文章，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文章说：

“不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层次、多渠道的。既可以表现为罢工、罢市、罢课、罢教、示威、游行，也可以表现为怠工、躲避、敷衍等消极抵抗，也可以表现在拒买国库券。提取存款等具体手段上。一句话，只要每个人都千

方百计地和伪政府过不去，每个人都一点一滴地破坏，瓦解这个本来就很虚弱的纸老虎。那么，李鹏、杨尚昆垮台必指日可待。”

5月30日至6月1日，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农大、理工大、北师大、北方交大分别出现题为《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分析》的传单。传单说：

现在一部分掌握共产党、中国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不顺从民意，不听人民的呼声，而一意孤行，动用军队来压制人民的呐喊，这就极有可能导致这场民主爱国运动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巨变。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他的政府，人民将自愿组织起来，组成以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爱国力量为主导力量，将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并有可能包括有血性、有良知、有理性、向人民投诚的共产党军队）来与共产党的腐朽力量相斗争、相抗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去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台湾国民党李登辉已经宣布，台湾不但要从思想上，道义上支持大陆的民主爱国运动，而且还要从其它方面给予支持援助，据有关人士分析，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如果一再地不明事理，就有可能导致人民组成能够顺应民意、并获得美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尊重人权要求民意国家的支持，可能被称为民主党的反对党派、以共产党开明人士组成的改革派，以民联为机构，以要求民主的人民为主体，民主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以三个党为主体的多党制，进而过渡到议会制，从而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真正合好，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中国人民必须特别珍惜并且坚定地、彻底地把目前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6月1日，北大自治会的广播甚至报道了李登辉的上述言论，并说：“政府说学生运动中有台湾特务，如果这个人是搞人权、搞民主的，就是特务我们也欢迎。”

这类煽动，除了民众中尚存的“毛式”暴力革命思维在特定环境下的发酵以外，有一些是来历不明的。尽管它们的传播半径有限，并没有在仍然怀着浪漫幻想的学生和斗志日益怠懈的市民中引起反响，但由此，一个为军队开进北京市区，最后以扫平“反革命暴乱”为借口，结束40余天来的民主运动的舆论气候已经造成。

第三节 接力绝食

作为坚持广场斗争的最后一出重头戏，是“千人接力绝食”计划的出台。这次绝食的发起人是刘晓波。

刘晓波，1955年12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东北师范大学教师。1962年进入东北师大附小学习，毕业后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文革爆发后，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插队当农民。1976年11月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为工人。

文革结束后，1977年国家恢复统一高考，刘晓波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参与“赤子心”诗社。1982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1984年4月起，先后在期刊发表《论艺术直觉》、《论庄子》。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许嘉璐教授的高足。1985年先后发表《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无法回避的反思——从几部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谈起》，批判当时弥漫于“伤痕文学”中的忍辱负重精神，支持叛逆的“新潮文学”。

1986年9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刘晓波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即兴发言，以中国“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猛烈抨击占主导地位的“新时期文学”主流。批评“中国知

识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众更深更厚！”“中国作家仍然缺乏个性意识。这种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他认为“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

据刘晓波的“伯乐”之一，时任《深圳青年报》副主编的曹长青回忆，“该文在其他报刊发不出来”，后经大学同窗、“赤子心”诗友徐敬亚介绍，于同年10月在《深圳青年报》发表。刘晓波也因此一鸣惊人！一时间，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形成一股“刘晓波冲击波”、“刘晓波旋风”。他本人一跃成为“文坛黑马”。印有该文的字纸一时间洛阳纸贵！对文学批评界不满的怒火，不久就烧到了名流“权威”身上。仅仅一个月，刘晓波又向“四大青年领袖”之一的美学权威李泽厚挑战。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一文中，进一步深化了人的“感性”特征、文学的“表现”意义，而淡化了其“责任”意识。他鼓吹的“我升天，我入地狱全取决于我自己，他推崇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重估一切价值”的座右铭，他赞赏的西医“手术式”的文化革命，不仅适应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主题向文学领域的进军，而且恰恰打中了处于“反叛期”青年人的胃口。由此，刘晓波取代旧“偶像”，成为第五代青年崇拜的“英雄”。也因此被僵化的意识形态官僚视为“疯狗”。

据同行介绍，刘晓波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卢梭、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卡夫卡、马尔克斯和鲁迅。他最佩服鲁迅，也曾扬言要“超过鲁迅”。

虽然他掀起批判的浪潮，必然对旧有意识形态支撑的社会造成冲击，并对一代大学生和文学青年的个性解放有直接影响，但直到1987年，刘晓波仍未表现出对政治的兴趣。当1986年底学潮兴起和接踵而来的“反自由化”运动开始时，他已经把与大学生的厮混降到最低，并表现出对于廉价“追捧”的一定程度的厌倦。1987年，他发表了首部著作及成名作《选择的批判——

与李泽厚对话》。但除了李泽厚的几位博士生有些回应外，二人从未进行过交锋。

1988年，刘晓波的导师许嘉璐升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适逢新一波自由化浪潮风起云涌，在导师组织的一个由张紫晨、王元化、高尔泰、谢冕等九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保驾”，有数百名学生到场助威的答辩会上，刘晓波就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进行的答辩获得通过，由此取得文艺学博士学位，并被北师大中文系聘为讲师。

1988年8月至11月，刘晓波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作访问学者，讲授中国当代文学；1988年12月至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与研究；1989年3月至5月，应邀赴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

遵循着反体制、反禁锢、反传统、反权威、挑战现存秩序的路径，亲身沐浴了欧风美雨的刘晓波，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批判再度升级。期间，他在香港《解放月报》发表了《混世魔王毛泽东》，对毛泽东予以彻底否定。但他似乎没有把中国的问题归于个人的思想。因为，在接受该刊主编金钟采访时，他用极端言辞对中国的“民族性”、“人性”乃至“人种”进行了批评。在被问及，“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的回答是：“300年殖民地。”

另一方面，大概是反感于应付“造神”的叨扰，为保持“真我”的自由，他也不吝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解剖”。他坦承自己爱钱、爱谈“性”话题、爱表现，“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因此，被港台评论家认为有李敖之风。

受尼采影响，刘晓波有极为浓重的傲视天下，鄙视群氓的“精英意识”。他认为“自由只属于少数精英”。他也毫不讳言自己“最佩服希特勒”。他还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运用时，局限性很明显，尤其是它运用到中国后，成了中国专制政体的组成部分——即思想专制的工具，它不得

不被置于批判的地位，而且这种批判是“迫切地需要”的。但是，他不否认自己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的西方哲学史的最初熏陶；他承认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性，并不止一次地谈到，他的行动激情来自马克思。

在面对“卖国”、“叛国”的指责时，他引为辩护的也是马克思的语录：“工人没有祖国”。

曹长青认为，刘晓波“不仅在文学思考上独树一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对专制的认识也超过我当时了解到的其他同代人，对人生也在尝试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

为了寻求中文读者群及发声媒体，在美国继续待下去，刘晓波开始与“中国民联”及其主办刊物《北京之春》发生频繁接触。从对中国知识分子现状的批判，进而到自己身体力行。他积极卷入政治活动的历史从此开始。

图8-23：刘晓波

1989年4月天安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刘晓波就提出了知识份子要在精神上“跟党断奶”。4月20日，香港《明报》报道《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要求“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4月22日，刘晓波在纽约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文章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胡耀邦那种臣民对君王般的崇拜和依赖，那种感激“皇恩浩荡”的卑贱；他尤其抨击了知识界在热捧胡耀邦这种开明皇帝的同时，却冷淡仍在监狱中的魏京生；他更明

确提出，“我们到底是要魏京生，还是要胡耀邦？”以此呼应方励之的“大赦”呼吁和“33人签名”运动。

同日，刘晓波起草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继续坚持抗议活动，把中国的民主化切切实实地推前一步”；“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密切联系”；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并建立合作关系；保持与政府——从最高当局到学校领导——的对话；“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创办独立的刊物，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保障每一个参与者的人生安全和其它权利”等七条建议。在22日，这些建议大多已经成为现实，但也不乏深谋远虑。“中国民联”主席胡平等十位中国留学生、学者联署了这封《公开信》。

经民联安排，北京“四通公司”派人接机，1989年4月27日，刘晓波中止访问计划，提前回到北京，并向“北师大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中国民联”及赴美留学生、学者的捐款数千元美金和万余元人民币。

4月29日，刘晓波带着吾尔开希找到四通万润南的办公室。就已“挽起了袖子，摆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接受万润南的意见，刘晓波当时就向吾尔开希建议，“以后不要再搞这种大游行了。应该回到校园里，借这个机会把校园民主搞好。学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教师也可以成立教师联合会。或者教师和学生一起成立校园自治的民间组织，像北大的三角地那样，在师大的校园里也开辟一个类似的自由论坛园地。这个自治会主要是为了争取学生的权益，增加校务的公开性、透明性，学生和教师应该能参加校务管理。”

5月13日，学生的广场绝食开始，刘晓波一面参加统战部组织的斡旋，一面到广场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他不仅协助“绝食团”的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还亲自负责《北师大绝食团通讯》的筹款、组稿、编辑和发行。

期间，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传单。

其中5月23日由刘晓波起草，以“北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出的《我们的建议》的对象和针对范围包括：全国人大，国企工人，民企协会，新闻界，高校学生和教师，八个民主党派；内容包括：以“总动员”“瓦解军管”，运动中心由声援学生“转向社会各界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多元化操作，通过罢免李鹏逐步建立“民主的罢免程序”，“树立民间政治领袖的权威”，将本次学运由“爱国民主运动”改名为“全体公民的民主运动”，淡化“仇恨心理”和“敌人意识”，等等。

为实现“树立民间政治领袖权威”的设想，刘晓波在5月27日的“联席会”上提出推举吾尔开希为“人民发言人”的建议。但受到“绝食团指挥部”成员的强烈抵制。

除原“绝食团指挥部”人员的抵制外，“北高联”的梁二也认为刘对吾尔开希的影响促进了他的个人膨胀。

6月2日刘晓波发起的知识分子绝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关于知识界发动绝食，刘晓波并不是最早的提议者。最早的提议者是戴晴。据官方掌握的资料称，早在5月18日，戴晴给一个“朋友”的电话中，就提议用知识分子的绝食，换得学生们进食。那是为挽救学生生命所采取的动议。关于这种“只有参加进去，才能驾驭运动”的想法，当时在包括于光远在内的知识分子中都已存在。问题是，谁能“舍得一身剐”？

如前所述，中央民院的教师，曾先行一步，但造成的影响不大。

刘晓波发动的这次绝食，从已经批露的材料看，有一个舆论准备和组织实施的过程：

首先，5月26日晚，北大学生筹委会广播站播出了一份《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请愿书》。其内容为：

“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自愿组织绝食团，替代现在广场上正在绝食的学生。发起人：国家各部委领导和工作人员、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报名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二台阶。时间：5月27日、28日。人数：1至5000人。凭证件自愿报名。联系人：华夏子。 截止时间：根据事态发展而定。请愿内容：1、要求撤离所有部队；2、为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正名，是救国而不是动乱；3、将所有不义之财上交国库；4、释放所有政治犯；5、要求昏庸无能的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罢免职务，欢迎辞职；6、要求保护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7、要求代表真理的赵紫阳主持工作……口号：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不怕砍头坐牢；真理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精神永存；民主万岁。”

广播还宣布，29日绝食开始，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材料，“华夏子”的名称在后期的学运中还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号召“全球华人大游行”。而“华夏子”恰好又是“民联”《中国之春》一位女编辑的大号。

5月27日，就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公布了将“坚守广场，直到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为止”的消息以后，又公布了成立“全国各族人民、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合绝食请愿团”的消息。在第二天由留法中国学生联合会发起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出现了“绝食请愿团”的传单。该传单除前述《请愿书》中的内容外，还增加了决不允许以各种借口打击和镇压民运参加者；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大赦国内言论政治犯；交出“官倒”子弟，人人报账，欢迎有错即改，欢迎真诚的领导和领袖；要求迅速清理整顿中央政府的裙带关系要求立即改组中央政府，老的退休，淘汰昏官、庸官和恶官，选拔人民真正的公仆掌管国事；要尽快修改宪法；反对专权者和机会主义者趁机发动兵变和政变等要求。传单把《请愿书》中的

“口号”改为誓言：“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民主救国运动的彻底胜利，不怕开除党籍、公职，不怕开除干部队伍、丢掉领导职务，不怕砍头和坐牢。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惜为整个民族利益而献身！”

传单将原定的29日的绝食推迟到30日。

5月28日，刘晓波在“联席会”正式提出知识分子绝食的建议。但遭到多数与会者反对。

29日晚，刘晓波给好友、四通公司的周舵打电话，提出如果周舵不参加，他将进行一个人的绝食。“与朋友共担风险”的道义压力，“建立知识分子在广场的威信”，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将学生带出广场的功利动机，使周舵决定与刘晓波一同发起绝食。之后，他们又联络到侯德健和高新。这四位本次绝食的“发起人”事后被称为“四君子”。

5月30日，预定的绝食日期到了，但由于各种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后续的“接力”名单（尤其是名人）征集迟缓，“绝食”仍未付诸实施。

由于社科院大楼管理加强，5月30日上午的“联席会”转移到“中国文化书院”在人民大学租用的一间办公室召开。会上，包遵信在传达了何维凌的谈话内容，但“联席会”诸公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紧迫。在确定了由王丹等人负责与何维凌进行后续的联系之后，会议就转入讨论“接力绝食”问题。

在会上，刘晓波和周舵提出，希望以“联席会”的名义进行这次绝食，但王军涛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那天会议的意见是：此事联席会议不做决定，由刘晓波个人去组织发动，“联席会”采取支持态度。只是在听了周舵介绍的《绝食宣言》内容后，王军涛同意承担“绝食”的后勤保障工作，并同意主持“绝食”的新闻发布会。

根据事后披露的资料，王军涛之所以既对广场的“撤退与否”不抱成见，对何维凌的建议也意马心猿，更对“接力绝食”态度勉强，很可能与社经所正在组织另一幕后“计划”有关。

如前所述，戒严后，陈子明一方面指派社经所办公室人员印发了1000余份“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题为《献给绝食团勇士们》的传单，鼓励学生坚持下去；还通过任畹町的妻子给任畹町发了1000元印刷经费，并表示，可以派人担任任畹町的秘书；另一方面，他亲自准备了一套包括人员名单、经费发放、物资储备、联络密码和藏身地点在内的“转移—隐蔽—逃亡”计划。据王军涛回忆：

“5月27日……费远 在人人大酒楼安排了对天安门广场的紧急疏散措施；谢小庆承诺将人安排在昌平某地；毕谊民联系外地建立最后的藏身地；我还让刘丹红设计疏散后团队成员联络方式和密码。……5月31日，我决定撤出运动，同时还将刘刚和张伦从第一线撤下来休整。”

担任“联席会”纠察总长两天的张伦，证实了这一情况：

“我从广场上撤下来的日期是24日晚上，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次觉，是在北京医院，打了一夜点滴，打得胳膊都肿了，我的身体已经基本处于半垮掉的状态。29日我去广场开联席会，我的一个同学架着我走。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总部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纪念碑上面柴玲他们有一个大棚子。我说‘我想下去休息一下’，可就是找不着。后来军涛就说，‘你下去休息。’把我硬送到北京昌平区去休息，这是30日。”

据陈子华透露：

“毕谊民、于国禄、王之虹等具体组织了撤离方案的落实工作，在京郊宾馆布了一个点。王丹、刘刚、杨涛、邵江、张伦、包遵信、老木、刘苏里等按照这一方案的安排在‘六四’屠城时撤离了北京市区。”

社经所下属的北京人才考试与评价中心还为王丹等开具了化名工作证。

与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相适应，该所撤销了设在北纬饭店的联络点，将核心人物转移到西郊部队大院环绕的雅苑宾馆。在王军涛的回忆中，这里被称为该“团队”的“研究专案的协调管理中心”。实际上就是在整个运动中一直没有露面的“三线”人员工作的处所。

此时的陈子明，名义上是在组织一篇早已计划好的长篇经济论文，实际上急于用这篇认同李鹏“治理整顿”政策的长文寻求与当局的沟通。为此，写作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提出，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决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表态。他们虽对赵紫阳经济改革思路一贯持不同意见，但对在此时去认同李鹏政府思路抱有强烈反感！故而当场有人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6月3日，当包遵信被王军涛领到这里时，曾诧异“这里还有一个摊子”。但他有眼不识泰山，认为这大概是一帮“搞后勤的”。

据周舵回忆，直到5月30日晚，侯德健的飞机在北京落地，他并不理解为何要进行这样一场绝食：

“我们去机场接侯德健。他一路上都在问，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他实在搞不懂。他一个台湾人，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摸不着头脑。我们费了好大劲，最后又把刚刚起草好的《六·二绝食宣言》拿给他看，他才同意了。”

6月1日，此次绝食的发起人——“千人接力”第一轮（三天，72小时）出场者刘晓波，按“个人化”方式在北师大发表了绝食演讲。他说：

“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

为骄傲，为光荣！”“我明天下午要去绝食，是由我发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建”、“我们抗议以李鹏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专制的军事管制去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我想借这次绝食，告诉国内外舆论，所谓的一小撮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他们是公民，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这个讲演分别在北大、人大、清华等校的学生广播站广播。

“6月2号下午，我们四个人先在侯德健家里集合，我看见李双江也在，李还表示要参加绝食。我说你不想活啦？你是军人啊，要上军事法庭的！”

下午，4：00，刘晓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扎营，宣布“72—48小时有限绝食开始”。参加绝食的4个人中，除刘晓波外，另有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周舵，属改革十年形成的中青年理论界人物；因一曲《龙的传人》红遍大江南北的台湾著名歌词曲作家、歌星侯德建；兼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北师大校刊前主编高新。

图8-24：四君子。从左至右：高新、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选自64memo.com）

绝食开始，四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刘晓波首先说明了绝食的目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专制机器的强大，也由于几千年中国人的怯懦和盲目顺从，整个世界看待中国的前途、中国问题的思路，一直是从执政党着眼，从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着眼。但是，1989年4月到5月的全民民主运动，在向全世界宣布，这种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思路……人民已经觉醒了，人民再也不会跪倒在地，以衬托几个独裁者的高大形象。（热烈欢呼鼓掌）我们需要对话，我们需要平等。我们主张和平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反对任何暴力。但我们不畏强暴，任何暴力也吓不倒我们。我们将用这种和平的方式

粉碎李鹏政府的戒严和军管。消除李鹏政府的这种狭隘的封建式的农民的仇恨心理（热烈欢呼，长时间的鼓掌）。不要叫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进程。

另外，这一次绝食，我们的另一个宗旨，就是想公开地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极少数极少数’，所谓的‘黑手’，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们是中国的公民，他们所干的一切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大学生运动没有错，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一小撮’的人也没有错（鼓掌）。我可以代表我们四个人公开宣布：我们不但不恐怖，反而，我们为能够充当这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黑手’而骄傲，而自豪，而荣耀！”

（好！长时间欢呼鼓掌）。

图8-25：对“一小撮”的呼应（陈小雅摄）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来……基本上处于顺从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会动口而不会动手，只会空谈理论而很少行动。今天，我们四个站出来，就是要代表我们自己，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一个公开的，知识分子联名出现的，真正的行动！以行动，抗议李鹏政府的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我们几千年的沉默，软弱，盲目，顺从所犯下的种种过失……”

接着，周舵宣读了《六二绝食宣言》：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

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一）绝食目的：

1、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采取合法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政府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2、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互相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了中国人的遗传。1949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

但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我们抗议李鹏政府的新闻封锁，要求立即解除新闻戒严。

3、此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的民主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对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应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二）恶性循环因素

4、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渡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们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过失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5、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

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的政治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发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制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只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的克制，社会各界包括党、政、军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鉴于此，政府必须承认和反省这些错误，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吸取沉痛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全民的民主运动正在教会政府怎样地以民主和法制来治理社会。

（三）摆脱意识形态化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互相抵消，造成决策的零状态；财务上的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余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理论，不讲程序；只讲目标，不讲手段过程。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

6、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

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并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成功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

（四）我们的基本口号

1、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我们首先是公民！

4、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五）绝食地点时间规则

1、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下；

2、时间72小时，6月2日16：00至6月5日16：00.

（特殊说明：由于侯德健在6天后将赴香港制作唱片，所以他的绝食时间为48小时，从6月2日16：00至6月4日16：00.）

3、规则：只喝白开水、不得进食、不得饮用含营养物质（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的饮料。”

轮到侯德健讲话时，他说他参加本次绝食，除了代表他个人外，还代表5月27日在香港举行的连续12个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所有歌星和参加的所有香港观众。他介绍说，三十万香港同胞为这次义演慷慨损献了一千三百万港币，他还把T恤衫上有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成龙等100多位香港影视明星的签名指给大家看。侯德健说，“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支持我们。”

图8-26：侯德健的名人效应（陈小雅摄）

他还说，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结束后，三十万香港市民从跑马场退场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没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废纸垃圾。

作为一个词曲作家，他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就是为大家唱他创作的歌曲。他今天献给观众的，恰好是他为八九民运而创作的新歌——《漂亮的中国人》：

爱自由的人们\张开我们的翅膀\有良心的人们\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人们\团结我们的力量\丑陋的中国人\今天我们是多么的漂亮

把耳朵竖起来\谁也不许再撒谎\把眼睛睁开来\谁也不许歪曲真相

我们手挽着手\把脚步迈开\慢慢来\谁也不用慌慌张张。

绝食者的发言完毕后，学生代表吾尔开希进行了演讲。从其内容来看，很可能是刘晓波捉笔代劳。

据始终不赞同这次“绝食”的包遵信回忆，6月2日下午5：00左右，主持完新闻发布会的王军涛和甘阳又来他家：

“说刘晓波绝食引起很大震动……他们还对我说，打算组织第二批、第三批……这样接力式地把绝食进行下去，直到政府退让，取消戒严令。他们动员我参加第二批，甘阳还说他也参加第二批。”

第四节 扫清外围

正当“四君子”用折磨自己的肠胃来推广自己的思想，企图用“张开的翅膀敞开的胸膛”感动人民也感动政府时，政府那张撒开的网，正在慢慢地收拢。通过高层权力更迭、降服人大、广泛打招呼、制造舆论、逮捕重要人物等等步骤，最终为戒严清场铺平了道路。

据李鹏日记，他曾在5月21日给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打电话，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当晚，邓办传达了邓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5月22日下午3：00，李鹏请乔石、姚依林共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案。议定“一周后举行”。主旨是“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讨论如何坚决制止动乱，并解决赵紫阳的组织处理问题”。会议结束后向各省市传达，“统一思想，保持行动一致”。为召开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23日起，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宋平分别以个别谈话或会议形式，给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打招呼”。其间，杨尚昆于5月24日下午，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约70人参加。

5月24日、25日姚依林于给国务院35个部委、19个直属机构、5个办事机构和4个大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打招呼”。

5月25日，李鹏利用会见尼日利亚、墨西哥、缅甸三位新任驻华大使的机会，公开谈论了“赵紫阳下台”、“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宣告“中国政府是稳定的，有能力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读者对此的解读，大多为“政府的决心已定”。

5月25日下午，乔石向中直各部委、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负责人19人传达了中央精神。

当晚，李鹏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确定，在6月5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日左右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对赵紫阳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决定。

5月25日上午，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邀请中共党内副委员长习仲勋、彭冲、廖汉生、耿飚、陈慕华、王汉斌会议。李鹏《“六四”日记》写道：

“彭真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违宪的。这次游行示威就是动乱。全国人大是代表11亿人民的，不能服从搞游行示威的那一小部分人，与会同志都表示同意。彭真同志送来一个他与人大副委员长讲话的材料。从法制的角度讲，人大也不能违宪。人大无权撤销总理按照宪法规定行使的戒严权力。”

5月26日上午，陈云主持召开了中顾委第11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指示精神。中顾委主任陈云作了讲话。

5月27日，李鹏向中顾委全体委员详细地介绍了所谓“动乱”经过和赵紫阳“违反党的原则，反对小平”的经过。李鹏的讲话列出了关于运动“黑手”的五条线索：

第一条，是“以赵紫阳为总后台”的鲍彤领导的政改室，被称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受政改室领导的‘三所一会’则是宣传自由化、组织动乱的急先锋。”

第二条，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明确提出“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民众”。精英“要将背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前台”。

第三条，是所谓“直接受命于北大教授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的”王丹。

第四条，是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与陈一谘领导的经济体改研究所。

第五条，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据称，此时，单独居住在上海市内某宾馆的万里被告知，不得就国内问题发表个人或作为委员长与中共中央口径相悖的意见。5月26日凌晨1：00李鹏将“中央宣传小组”起草的“万里讲话稿”电传给在上海的江泽民。5月27日，万里在上海发表了“书面讲话”：

“由于健康原因，我提前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现在上海治疗。出访期间我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回国后，又从多方面进一步了解了国内的情况。”

“我一贯认为，广大青年学生真诚地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这种爱国热情难能可贵，党和政府给与了充分肯定。青年学生提出了社会生活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迫切要求尽快解决，这同人大常委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已经并将继续对人大常委会和政府改进工作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走向广大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种种情况表明，确实有极少数极少数人在搞政治阴谋，利用学潮，蓄意制造动乱，严重干扰了北京乃至全国许多地方正常的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和教学、科研秩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严重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对此，广大公民包括青年学生要高度警觉。我认为，对于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必须加以保护，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对于煽动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必须予以揭露。”

“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和杨尚昆同志5月19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赋予的权力，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这对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支持国务院采取的这一坚定措施。我相信政府能够妥善地解决问题。我们的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做好维护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我认为，青年学生提出的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设、消除腐败、惩治官倒、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只能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逐步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6月20日左右召开会议，讨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以督促政府改进工作。要开好这次会议，必须增强民主和法制的观念，必须有一个安定和有秩序的环境，不然的话，预期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目前，北京和一些地区的事态尚未完全平息。我殷切希望，全体有觉悟有爱国心的共和国公民团结起来，社会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迅速结束混乱状态，恢复正常秩序，作出应有的努力。我坚信，由邓小平同志开创和亲自指导的、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定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向加拿大、美国的议会和政府，对我访问期间的有好接待，表示感谢！对在那里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对我的关心和热情，也一并表示谢意。”

5月27日 下午，全国政协举行主席会议，一致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果断措施。政协主席李先念作了讲话。

5月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表态拥护制止动乱决策。下午，彭真再次出面，邀请党外副委员长，进行“统一思想”的座谈。

5月30日，高登榜、顾明、王厚德、宋汝棼等6名人大常委委员公开发表声明，对香港《文汇报》5月25日发表的57人签名呼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之事予以否认。

5月31日，万里回到北京。当日下午便见了李鹏。同日进京的江泽民被安排住进了中央警卫局大楼。次日谒见了邓小平后，虽然他还是形单影只地一个人到食堂打饭吃，但从此已开始了幕后见习“总书记”的经历。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洪声明，对香港《文汇报》5月25日登载的若干人大常委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表示“事前毫不知情，阅

后深为诧异”。声明自己“于5月9日至20日率团赴日本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不在国内。无论在国外，或出国前后，直到现在，我从没有在任何‘签名信’上签过名”。并“对这种冒名惑众的做法，极为愤慨”。

6月3日早6：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的谈话，指出在目前混乱情况下，6月20日左右如期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完成预期任务，是很困难的。

6月4日，人大常委会委员李贵也写信给新华社，声明自己是“被签名”。但此声明直到6月13日才发表。

与此同时，北京市和中央机关开始了新的统一思想和支持戒严的动员工作：

5月22日，北京市属单位和国务院各部委都接到通知：每一个局抽一名身强力壮、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纠察队，任务是拆除路障，欢迎解放军进城。

5月26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区、县、局、总公司及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会议。李锡铭传达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做好舆论宣传；组织群众，维护首都秩序；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广泛开展慰问解放军、公安干警、武警、交通民警活动。北京市委要求组织农民游行和农民对话，“每天三、四个县，搞几天，口号统一，要振臂高呼，群情激昂”。

5月31日上午，北京市委组织郊区顺义县1万多农民、工人、商业职工、教师举行“坚决反对动乱群众大会”。集会者以群众大会的名义给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出一封公开信。

当日下午，大兴、怀柔两县也分别举行群众集会游行。游行队伍的横幅、口号主要有：“坚决反对动乱！”“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的讲

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解放军万岁！”为了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精神，还有“打好三夏这一仗！”等标语。新华社报道，这些游行都是经过公安部门“批准”的。

6月1日，北京市门头沟区、通县、房山、延庆、昌平同时举行了市政府组织的号称“20多万农民和城镇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所作出的正确决策”的游行集会。据《人民日报》派往通县的记者说，通县的农民游行由县领导、各局领导带队：

“各乡村各村企业按照分配人数组织队伍，农民由县用汽车接到县城，游行后送回村，每人给记2—3个工。工人、干部未经准许而不参加游行的，扣发当月奖金；参加游行的有奖，有每人发5元的，有发10元的，有发20元30元的（因企业经济情况不同）。有些单位还统一发草帽，毛巾等。”

在北京著名的西瓜产地——大兴县的集会中，人们在“反对动乱，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中，烧毁了方励之的画像。

法新社6月2日报道，则活龙活现地描述了密云游行的场面：

“政府组织的集会今天猛烈地向反美方向转，官员们表演了一出闹剧……在北京东北50英里的密云县，农民、干部和学生约一万人聚集在运动场举行示威，有3名中国人打扮成山姆大叔的模样，身上裹着蓝色斗篷，头戴高帽子，上面画着星条。”

“有一个人拿着一条吊着一个黑纸心的绳子，黑纸心上写着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的名字。绳子上拴着一些白纸，白纸上潦草地写着中文‘美元’两个字。出席集会听取军队代表、农民和工人团体的官员发表赞成戒严令讲话的人群有气无力地呼喊‘打倒方励之’。”

5月30日，北京市委李锡铭还递交过一个“组织百万工人大游行”方案。次日下午，李鹏亲自找北京市经委、首钢、石化和内燃机厂负责人来谈话。

他们都认为，组织工人游行和纠察队都没有问题。李鹏在日记中曾表示出对其可行性的怀疑，因为在同时，学生和各界也提出过类似方案，李鹏大概拿不准，这种“结束方式”会不会为人所用？

为配合戒严清场“扫清外围”的工作，批准实施的是打掉民运侧翼——剿灭“飞虎队”；绑架“工自联”头头，切断“黑手”及联络通路。据信，从5月26日开始，北京市公安机关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活动，抓获了“飞虎队”的队长和一批骨干分子。遭逮捕者包括汽车司机易京瑶在内，共12人。就此摧毁了民运中自发产生的信息传递系统。

5月30日，工自联执行委员沈银汉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被“一辆装有警灯的吉普车上冲出的两名警察”绑架。同日遭到逮捕的还有工自联钱玉明、白东平和“飞虎队”的11名成员。5月31日上午9：00广场指挥部组织了“反捕人”游行。3000多名大学生从历史博物馆出发游行“先绕广场一周，高呼‘爱国无罪’、‘反对暴力’、‘还我同胞’等口号”，然后“走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释放被抓走的工人自治会三位负责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据工自联人士说，这三人5月31日下午5：00被释放。

图8-27：韩东方在北京市公安局前讲演（选自64memo.com）

6月1日，北京市总工会发表声明，要求取缔“工人自治联合会”。指斥工自联的所作所为是“企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公然破坏正在恢复的首都正常秩序”。

在此期间，政府对于广大学生，采取的仍是劝说撤离的方针。5月27日，有关各省均派出进京劝说工作组，做来京学生的离京动员工作。据山西省驻京办介绍，经工作组耐心细致说服，到6月2日止，在京的2400多山西学生只剩下80余人。到6月3日，除5名学生不愿返校外，其余学生都乘车返晋。

5月31日凌晨3：00，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司法部副部长鲁坚、冶金部副部长徐大铨，及航天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校领导和老师分别前往新华门劝静坐学生撤离。除法大与北京科技大30余名学生一直坚持到6月2日外，大部分师生已跟随劝说者回校。

据赵紫阳回忆：

“鲍彤是5月28日被组织部叫去谈话，一去就没有回来。并同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我当时就叫秘书给宋平打电话表示反对。”

同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他向戈讲话时好意，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反对小平同志。”

鲍彤的回忆更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只是说政治局常委要开会，要我参加。因此，我跑到中南海，一到中南海，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跟我聊了几句天儿，聊了几句非常一般的天儿。他问：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最近很忧虑，他问：什么事情啊？我说：不知道学潮现在处在这样一种僵持状态到底应该怎么解决？他问：那你现在安全不安全啊？我说：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他说：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安全一点，保护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学生要找你？我说：没有，没有学生找我，他说：你还是找一个地方安全一点儿；我说：我的家就住在复兴医院的边上，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楼，叫24号楼，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的宿舍。我当时就住在部长楼里……我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安全的。” “当时所有的部长都住在这里，我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在中南海的勤政殿，也就是中共中央常委办事机构的地方。5个常委有5个办公室，我作为常委的秘书，我也有个办公室，也在那个地方。”

“我说：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我晚上不回家，就在勤政殿住，没有必要嘛，他说：恐怕还是考虑考虑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些。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我出来时我发现我自己的车没了，换了一辆车，这辆车我看到的号码是：GA公安。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告诉我，就是这个车。我心里知道，那就是公安部专门运送囚犯的车。”

“我找谁呢？一个人都不认识，送我出来的人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他跟我热烈握手，走的时候跟我热烈握手，手握的非常紧，当时没有任何预兆。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说：走吧。我就进去了，我进去时是在后排坐着，他说，请你再进（去）一点，那么这边上来一个人，右边上来一个人，左边上来一个人，后边上来一个人，前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人拿着对讲电话，开出去了。”

“当时街上到处都是学生，市民。有的在游行，有的在发表演讲。车走动哪里不通，就拐个弯儿，再走，不通就拐个弯儿，再走。因此，我已经糊涂了，闹不清是什么方向了。最后，显然是到了郊区，看到了山，进了两道铁门，我下来，有三个人站在车边上，迎接我。”

“我下来后就问，这里是不是秦城？这三位迎接我的人说：是的……”

鲍彤当时显然还不知道，在没有赵紫阳参加的高层会议上，已经几次议及他的“安全”问题。最近的一次，早已被传到海外：

“5月20日高瑜在给张结凤 的电话中称：‘今天鲍彤他们被点名了，被控制了，想让鲍彤转移。’”

其时李鹏已知高瑜的“神通广大”，知道她“与严家其、王丹、刘锐绍、张结凤等保持经常的联系”，但并不掌握她的真实身份，以为她是“体改所杂志副总编”。

5月30日，也就是与包遵信深夜见面回去以后，何维凌在自己的办公楼大门内被“陌生人”绑架。

6月1日，曹思源、高瑜在同一天被捕。据曾向高瑜提供高层内幕的白南生回忆：

“我曾经将高山的事情透露给高瑜。高瑜当时全部写成文字。6月3日随身携带后一去不归。五中全会上王芳材料大部分是高瑜的交代。我当时说：你记这个干嘛呀？但没有阻止她。”

“后来我被抓了，怀疑她是安全部的，或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或者她6月3日准备投稿或者躲避。但是为什么6月3日带5月19日的材料？事隔十多天了……我的问题的了结，与杜润生的登记有关。但我的案子作为杜润生案子的一个罪证，因为我是他的下级。所以他们告诉我，最后了结，还得等高山一案的完结。”

加之胡绩伟此后受到的指控，高瑜的真实身份一直受到各种猜测。直至李鹏《“六四”日记》的出版，才算澄清了这个迷雾。

当时，各种“黑名单”的纷纷面世，的确给知识界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据包遵信回忆：

“5月30日，我乘302路汽车，到人大参加联席会。在人大校门口下车，离附中还有一段路，我一面走一面看贴在电线杆上的各种传单，看到有根电线杆那儿扎的人很多，我也赶忙凑过去往里面挤，一看原来是两张新贴的传单，一张是杨尚昆5月2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另一张是摘录香港《明报》5月27日的消息，列了一串的黑名单，本人荣幸，竟也侧立其中……”

“……传各种各样的黑名单正在紧急拟定中。有的已经出笼，包括政界、军界、知识界甚至工矿企业……知识界人士主要是赵紫阳的智囊人物和全力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家，包括苏绍智、王若水、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于浩成和方励之，全国人大、政协更有一批人列入，万里委员长亦在其中。”

“第二天下午，我从严家其家出来，到广场去看‘民主女神’像，发现广场北侧地下通道和前门地铁站也都贴着这份有黑名单的内容的传单。好像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我可以不去想它，却不能挣脱它，它预示着我的命运，大概逃不过这个大限了。”

与此同时，鲍彤被软禁，曹思源被绑架的消息已经不脛而走。北大学生自办的《新闻导报》还传出，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被捕，“揭开了大清洗的序幕”。

当然，抓人不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大多数”还得靠思想和舆论带动。为了把“清场”的难度降到最低点，自戒严以来，李鹏秉承邓小平的旨意，就致力于把舆论大权抓到手。此时，更加紧了向个新闻单位施压的力度。

5月22日，《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召集编委会，就《北京戒严第X天》传达：“上面有人提出，能否停下来不办？”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不必马上停下来。但钱李仁决定，从即日起“由他来定稿”。对于次日准备刊发的《北京戒严第三天》，他在审稿时“只在第一段最后一句改动两个字，即把‘也有一些部队向后撤退了’，改为‘也有一些部队向后移动了’。”这匹识途的老马，在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正义性的同时，因深知邓小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性格，也知晓高层幕后的种种运作，不忍再次误导群众！

23日晚，钱李仁向中央递交了辞职报告，《人民日报》全体编委也做好了“辞职”准备。

5月26日，《香港时报》抛出“赵紫阳反党集团”概念，报导把钱李仁也列入其中。

5月30日王维澄给《人民日报》钱李仁打电话，命令转载星期日《北京日报》“七位中年知识份子的来信”，并配一篇评论。这封信表达了对于学生

“爱国家、求民主”初衷的理解，以及对于在天安门绝食、静坐、请愿方式的不赞成，并以“一代经历文化大革命磨难的老大学生”的身份，告诫学生：

“眼下压到一切的大局是从党和国家及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稳定局面，控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冷静下来，回到法制和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这场已经出现的混乱，正在从北京向全国蔓延。它严重地干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一切善良人的不安和焦虑。中外历史沉痛地告诉我们：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必将导致一场全面的动乱。而动乱带来的灾难性恶果，就绝不仅限于党和政府承受，首当其冲的直接受害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

信中还提到“十年动乱”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普通百姓的人权丧失，暗示那次运动中“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煽动作用，以及优秀青年如何受蒙蔽而白白牺牲的惨痛教训。进而呼吁：

“在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风中失去亲人，耽误青春，受尽苦难的同胞们，拿出历史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告诫自己的子弟和亲人，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要使历史悲剧重演！”

“一切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同胞，都应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审时度势，进行坚韧的战斗；而不要用不负责任的冲动和过激的词藻去渲染一种不健康的民主乌托邦情绪，参与那些最后只能导致动乱的活动。必须审慎地看到：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一百年也许不多，而毁掉一个大有希望的中国一天就足够了！”

鉴于发声的日益艰难，当日，《人民日报》报决定，发出《北京戒严第十天》后停止这个栏目。

《北京戒严第十天》文如下：

【本报北京5月30日凌晨讯】昨天是北京部份地区宣布戒严的第十天。首都市民生活仍然比较平静，长安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但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上静坐请愿学生却未见撤走的迹象，还新搭了一批旅游帐篷，并正在安装一座石膏塑像。

在一些街道上，部份清洁工人清洗掉了贴在灯杆、墙角的传单，而另一些街道上，又有些新贴的传单，围观，议论者仍时有所见。

鉴于北京宣布戒严地区的社会秩序已日益正常，本报《北京戒严第X天》专栏，已无每天出现的必要。今后有关新闻，将随时用别的报导方式向读者介绍。

被誉为反映中央意图的《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一些“读者之声”的来信。这些来信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署真名，没有具体位址，没有具体工作单位。

5月31日，《新华社》发布了北京郊区三个县农民游行示威，拥护李鹏、杨尚昆讲话，反对学潮的新闻。新闻里农民说的话，也用了“极少数极少数”的概念；据顺义县读者反映，农民游行呼喊的口号中还有“查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代表人民”等内容。据《人民日报》派往昌平、延庆的记者反馈，在市委的口头通知中，确实有“揪出人民日报黑后台”、“反对人民日报一小撮”等口号。因两县与《人民日报》的关系不错，没有呼喊这两句口号。

图8-28：《人民日报》记者反戒严（选自64memo.com）

6月1日，宣传小组又指定《人民日报》发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不容亵渎》一文，重点批评“民主女神”塑像。作者笔名“靳仁”，给编辑们“砍人”的遐想！

《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顶着“出卖灵魂”、“出卖良心”的批评，“慷慨呼吁：同志们，现在是赶快转变立场，紧跟中央部署的时候了”。

在当天中央“宣传小组”召集的会议上，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还提出要对著名主播薛飞等有“抵触情绪的干部”，实行“坚决严肃处理，让他们停职检查”。

6月2日，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人民大学等校1000多学生，骑自行车游行到《北京日报》门前，烧毁了一些刊有上述文章的《北京日报》。游行队伍打出的横幅写着：“问题就出在党内——李鹏、杨尚昆”、“支持李鹏腐败政府”、“北京日报胡编乱造” 据法新社报道，与农民游行中有人扮演山姆大叔不同，他们佩戴着希特勒纳粹的标志和猪形面具，高呼的口号有：

“贪污光荣”、“腐败有理”！

“戒严期间 奉命游行 每人10元 拥护李鹏”

“跟著李鹏走，每人九元九”

“每人9块9，良心去喂狗”

“消灭民主 反对自由”

“恢复帝制 垂帘听政”。

至此，原先有意与学运划清界限的“新闻界斗争”以群众运动结束。

6月2日，新华社以通稿形式发表了北京市委宣传部撰写的《认清动乱的实质和戒严的必要性》。指责包括台湾和美国在内的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等策划和制造“动乱”，目的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制度，并有周密策划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插手等。宣传小组令各大报进行了刊载。

6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中国科学院51个研究所的负责人看望首都戒严部队。当天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日记中写道：

“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戒严的政治表态。宣传上也是舆论一律。市民们上街比过去少多了，天安门前的学生也逐渐减少。”李鹏的日记终于满意地写道：

“中央几大新闻单位已逐渐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总后勤部主任赵南起看望戒严部队，并转达邓小平、杨尚昆对部队的问候。

接下来的两天里，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和国防部长秦基伟在昨天和今天，分别代表军委主席邓小平、副主席杨尚昆，到戒严部队驻地看望戒严部队指战员，转达邓主席、杨副主席对戒严部队的关怀和慰问，勉励大家为制止动乱、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作出新的贡献。

6月1日，全国妇联代表团和文化部代表团，慰问戒严部队官兵。 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还刊登了著名歌唱家毛阿敏因“偷税漏税”被罚款3.4万元的消息。 据军内消息人士称，此前，毛阿敏一直被军中反对派指为杨白冰干女儿，因而追究之声浪颇高。 有观察家评论，值此军国大事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杨家将不得不牺牲毛阿敏以平息不同声音，把阻力降到最小程度。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连日来，在戒严部队营区，也一改往日萧条冷清的状况，出现了一个物资集结的高潮：

“一辆辆满载新鲜蔬菜、日用百货和各种副食品的汽车、马车、三轮车驶向营区……”

“丰台区商业、粮食系统的职工，为戒严部队供应10万公斤大米、白面，上万公斤食油、糕点、肉、蛋和蔬菜。海淀区人民政府除了给戒严部队送去

粮、油、菜、肉等食品外，还供应了大量棉垫让战士们防潮御寒。石景山区委还动员了6个街道、村庄和一个宾馆，腾出两千张床位，供部队休息。丰台区煤炭公司得知部队生火做饭急需柴禾，他们当天就把筹集的3000公斤劈柴供应部队。在某戒严部队的“露天小卖部”，整齐摆着果汁饮料、罐头、香烟、水果、啤酒、鸡蛋等，供部队指战员选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这些准备过程，以首都群众谅解戒严部队的面目出现，对“反戒严”活动进一步释放了麻痹情绪。据新华社记者报道：

“在这里服务的丰台区三营门副食品商场的8名职工告诉记者：前几天，我们见到解放军一律不卖给他们东西，现在我们明了解放军确实不是来镇压学生的，是来维持秩序的、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我们姐妹们自觉组织起‘支援解放军服务队’，天天早出晚归为戒严部队官兵服务。”

最先感觉到气氛变化的人群，是可以看到卫星传送的海外电视节目的外商和华侨。他们在得悉北京附近地面军队调动情况后，纷纷撤离北京。

第五节 “F75” 行动

5月31日，邓小平、杨尚昆批准了戒严指挥部关于部队进入北京市区执行戒严任务的实施方案。戒严指挥部将实施方案以命令形式下达北京、沈阳、济南军区和空军。

当天，多日来乔装渗入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的戒严部队，开始在首都机场、北京火车站、电报大楼等要害部门着装上岗。据戒严部队某部团长刘寅生上校告诉记者，部队进驻北京火车站后，“疏导、输送10余万外地学生离京返校，抢运积压邮件、报纸25000余件，协助公安干警对250多名冒充大学生的社会闲杂人员进行了查处”。

从6月1日起，北京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因进驻军队，已停止对外开放。

6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碰头会，原则上同意北京市和戒严部队提出的清理天安门广场方案。但是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因此，会议确定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批准了北京军区提出的戒严部队以隐蔽方式进入天安门周边的方案。截至2日凌晨3：00，已有25000人进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公安部大院、北侧天安门与午门之间，在南面，北京东站也有先期从沙河到达的3000兵力，已形成对天安门的四面包围之势。

有意思的是，这批潜入者的一部分，是利用被视为这次运动的“黑手”——方励之曾参与修筑的通道进入市中心的。方励之回忆说：

“1969年3月，科大全校被当局派去修铁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修铁路一直没有全停顿。我们修的是一条从北京到山西原平的铁路。这条路有极重要的功能。在北京的一端，这条铁路与北京城区的地下铁路相连。而地铁又直通中央要人的聚集地。它的目的是，如果北京有变，国家要人即可乘地铁迅速转移出北京。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前，许多士兵即已秘密到达天安门的地下，就利用了我们参加修筑的这条京原线。”

自此，从5月22日起被困在城边的27军，终于结束了那个真情假意的“猫鼠蜜月”。自6月2日凌晨1：10接到命令起，6月2日的整个白天，官兵们都被这个称为“F75”化妆潜入游戏而激动着。据称，这次行动的名称起源于纪念5月20日这支摩托化部队进城时，被“围困75小时”的经历。接到命令后，部队的领导研制了化妆进城的行军路线，设想了行进途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

拟定了各种化解的办法，还派人采购了服装。从上午10：50进行教育动员开始，到整个部队全部准备完成，整装待发，只花了一个半小时。

同时，集团军王良均参谋长率集团军“前指”先期到达人民大会堂三楼河南厅；第79、80师“前指”先后搭乘地方大交通车绕道到达人民大会堂。2日晚，第79、80师、高炮旅、通信团、工兵团等部先后由驻地出发，分别沿丰台、莲花池、广安门外大街、宣武门、和平门、虎坊桥、珠市口等路线向天安门方向前进。

27军某副政委回忆说：

“从6月2日晚7：00开始向大会堂开进。当时为了防止再次进城受阻，避免和学生、群众发生正面冲突，根据上面的精神，部队采取了化整为零，行微弃服，不带一枪一弹，全部便衣、徒手，不带挎包，只提一个塑料袋，步行进入市区。”

士兵们穿着五颜六色，大小不一定合身的衣服。有的手里拿一副球拍，有的装作待业青年，有的带上旅游图，有的叼着烟卷，有的吃着零食，也有袒胸露背衣服搭在肩上，装作搬运工人模样的……

下午1：40“调整收拢组”的人员乘坐的四辆吉普车，分别向香山、动物园、西四毛家湾、北海305医院等有地下通道口的地方驶去……

“只有几个领导同志有几台车。我是晚8：00到达大会堂的。这天晚上，因为一辆中央电视台借用的武警车发生交通事故，一下轧死7个人，他不是成心，使进军的意图被重新激怒起来的人群警觉了。原进城的战士3、5个人一组，有一个人负责。这个办法很管用，因为进度很快。但交通车出事后，有人造谣说，是部队开道的警车压死了人，就不太方便了。再加上战士经过训练，作派与社会青年不太一样，有的也来不及买便衣，就穿着部队的球衣、球裤或衬衫，还有的下面穿了一双解放鞋。有的人晚饭没吃，就给了点儿钱给他，让他到街上去买点儿面包吃。一些商店、饭馆的人也发现，‘今天晚

上，怎么小平头这么多呀！’结果在虎坊桥、宣武门一带，当时就给堵住了。大部分已经进入大会堂，外面还有几千人。有些是迷路了。因为出发前只是给每人画了一个草图：丰台--->大兴--->大会堂西南，很简单。有的战士拐几个弯就走迷了。有的直到6月3日还在钓鱼台一带。又不敢问人，怕被发觉。有的被困被打，仍高度忍让。后来大家座谈时，有的战士说，当时的情况是身上在流血，心中在流泪……有的找到了大会堂也不知道西南门是哪个口，转好几圈还进不去，往往要绕到广场去。一个战士到广场坐下，结果，一个高自联问：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民工。有人转了23个小时的市区……有的战士找得很辛苦，又受了不少委曲，千难万难，突然在路上看见了自己的团长，忍不住热泪盈眶，上前大叫一声‘团长’，结果周围的人一片震惊。怎么办？团长也害怕被围住，跑吧！”

通过这个化妆进城的计划，大部分官兵骗过了目标仍集中在车辆和辎重方面，已经有几分疲惫的北京人，在6月3日大部队开进以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会堂的27集团军官兵已有万余名。尚未到达的部队大约占1/3。其中，出发较晚的第80师近2000名官兵在宣武区的虎坊桥、珠市口、陶然亭等地被北京市民围堵，数十人受伤被送进医院，大部被冲散，两台指挥车被烧。不少官兵绕道二三十公里才进入大会堂。集团军高炮旅乘火车进入北京站，出站后刚上长安街即被围阻。经协调，最后被禁足于东单体校之内，直至6月4日凌晨。

军队化妆行动的后半截受阻，与6月2日晚木樨地附近发生的一起恶性交通事故有关。据次日中央电视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称：

“6月2日晚10：55，中央电视台建国四十年摄制组借用完毕的一辆三菱吉普车返回部队途中发生重大车祸，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

“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中央电视台计划摄制一部大型系列片。这个摄制组从去年7月起向武警北京总队五支队借用三菱吉普车一辆，车号31WJ—15

25，驾驶员陈福玉。此车与摄制组一起工作11个月，曾到10余个省市拍片。完成拍摄任务后，与部队商定返回。”

“6月2日下午，摄制组向他赠送纪念品，并将工作交接完毕。晚上10：30，摄制组四位同志以及两位招待所服务员一起送他上车，随车携带他个人生活物品返回东郊驻地。行前同志们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

“此车由西往东行到木樨地以东时，由于速度快，加之前面洒水车刚洒过水，车轮打滑，冲向右侧，司机急向左打轮，没有打过来，在失控情况下撞倒南侧隔离墩，通过慢车道，翻至南侧马路边上，把当时正常行驶的四名群众撞伤，其中三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司机陈福玉已被西城公安分局拘留。”

车祸发生后，现场立即聚集了5、6百人。不到10分钟，多辆警车迅速赶到。警察立即以绳索将人群和肇事车辆隔开，并将死伤者都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警车将肇事者带走后，不少市民议论纷纷，说这里面有文章。有人说，警察不待勘明肇事经过，就将肇事者带离现场也不合交通事故处理规则。人们判断，肯定是戒严部队要进城了。于是，一些市民不顾警察阻拦从肇事的车厢中翻出军装、地图、报话机，证明他们是军人伪装成平民……

图8-29：木樨地车祸现场（选自64memo.com）

戒严部队军官的回忆，对于这次车祸在形势急转中的关键作用，曾给予足够的分量。笔者事后反思，此事与陡然上升的暴力气氛应该不无联系。因为：

其一、三名死者中，有两名来自城建开发总公司。该公司长年拥有数千名长、短期合同工；

其二、该公司地址，就在后来对清场部队抵抗最顽强的地段附近——三里河东路；其三、事后爆发的市民“反开进”运动中，大量建筑材料的来源和人数不菲的“投掷者”究竟来源何处？

其四、最激烈的反抗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在周围都是高干楼和国家大机关宿舍的木樨地？

其五、牺牲的十名“共和国卫士”中，除六名军人死于一次翻车事故外，被打死的四人中，为何武警占了一半？

——种种这些，是否与“木樨地车祸”善后处理草率，死者工友的报复有关？仍是个尚待解答的问题。

6月3日凌晨，笔者被一个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的单调的声音唤醒：

“军队进城了！”

“市民们，起来吧！”

声音显然发自一名骑自行车的人。它越来越细微，但它仍然顽强地在喊着，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显得分外的凄清！当时的笔者，并不相信这个声音能把已经极度疲惫的北京人从安逸的被窝里拽出来。只能独自为这个男孩子流下敬佩加难过的泪水。但是，令笔者想不到的是，事后的资料证明，就在这个声音发布的同时：

1989年6月3日0：00，27军第80师近2000名官兵在虎坊桥、珠市口、陶然亭等地被围堵，数十人受伤被送进医院，大部被冲散，两台指挥车被烧。

2：00，27军15辆军车在西长安街被从梦中惊醒的群众包围。

2：30，39军3000官兵由东面向市中区开进，在距广场500米处受阻。据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称，差不多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曾目睹这样一个场景：

“这支军队没有穿军衣，几乎一色是绿军裤，白衬衫，剃了光头。他们六、七个一排，一个紧紧挨着一个，相互抱成团似的向前挤进。他们大约每

隔二、三十人，就有一个背报话机、头戴军用耳筒的通讯兵。他们来到正义路路口时，被市民死死的拦住了。”

“这批士兵看上去也是疲惫不堪的了，他们约莫十八、九岁的年纪，一个个汗垢满脸，衣服也被汗水、尘土染得变成黄迹斑斑，他们每人都携带两双鞋，一双是翻毛皮鞋，一双行军胶鞋。此外，除了斜背着卷起的雨衣之外，每人还在军帽藏着一个塑料包皮，内为胶圈包着的金属丝……他们悄悄地告诉市民，他们是从距离北京70公里的顺义县急速跑来的，来到这里已经跑了两个多小时了。记者见到至少十多个士兵因过度疲劳而不支倒地。一些中年妇女都骂了：‘这些都是孩子呀，李鹏这不是在糟践作孽吗？’这支队伍在这个地段大约被阻停留一个多小时，便向东撤退，市民报以掌声和欢呼声。”

有消息称，这支队伍最后被赶进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

图8-30： 6月2日趁夜潜入的部队（选自64memo.com）

混合着木樨地压死人的谣言，在黑暗中，一辆在西单路口东200米处被截的“切诺基”车窗被砸坏，车胎被放气，军人被揪出殴打……

拂晓前后，曹各庄12辆军车被拦、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破、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朝阳门约500名战士被包围、西单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被隔离墩围住、六部口的军车和士兵被市民全部围困。

堵截似乎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3日早晨6：00，北高联和工自联派出的人员出现在堵截现场。他们从砸破的玻璃爬进被围困于西单路口东的一辆车厢。据信，这辆从总后西仓库开出的切诺基，是已经进入大会堂的27军79师四辆弹药运输车的其中之一，是该师235团的装备，由该团8连的8名官兵押运。据称，车中有“装备一个营的武器弹药”：5挺轻机枪、100多支冲锋枪、7支手枪、上万发子弹和2部电台。据说还有还有匕首和绳索。

不久，又有一批佩戴校徽的学生手拉手把车与市民隔开。但他们取出武器，放在车顶展览。据当日上午路过此地的杨继绳日记：

“学生们把从车里拿出的机枪、冲锋枪、钢盔、菜刀、三角刀，当众展览。车上有一幅白布横标：‘请看李鹏政府怎样保护北京市民’。很多人在现场照相。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各个路口成堆的人议论纷纷。”

“为什么军人要带菜刀、三角刀？群众中有人说，那是为了给群众栽赃，在混乱中军人把菜刀、三角刀丢到群众队伍中，再说群众手拿武器阻拦军车……”

据北京市公安局干事回忆，3日凌晨3：00，这辆车被截获的消息已报告西单商场派出所。但他们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

6月3日上午，一辆扎有黑纱、挽带的吊唁木柩地车祸丧生人员的大轿车开进天安门广场。

“军车轧死学生！”

“军队要行动了！”

报警的呼喊立即飞遍全城。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相信军车是有意寻衅，但它急于离开摄制组显然预示着上峰的新命令已经下达；中央电视台人员拖泥带水的“客气”也耐人寻味。这些迹象与连日来“小平头”的增多等各种信息交汇在一起，令北京人感到，这一回，“狼”真的要“来了”。

6月3日的白天，大多数因疲惫已经回到家中的市民，开始再次回到大街上“值班”。西单路口被截的车辆，成了证实“谣言”的新的展览场所。

为了安定广场情绪，李录守着广播站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

上午9：00，西单派出所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西城公安分局秘书室下达的紧急通知：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家利益、保护人民利益、维护首都治安秩序的，不是镇压群众和学生的。堵截、抢劫军队枪支弹药是违法的，人群应立即离开。否则我们将采取强硬措施，一切后果自负。请大家散开，让开通道，维护好秩序，并警惕坏人的破坏活动，对打、砸、抢、烧分子将依法严惩，决不手软。”

大概在此同时，该车的驾驶员傅里加趁上厕所之际给单位打了告急电话，又趁便混出人群，跑进人民大会堂向师首长进行了汇报，随后他又见到了军首长、司令员。司令员在“询问了车辆、武器装备以及周围环境情况”后，召开了紧急会议。傅里加回忆道：

“我又回到师部，一位首长问我怎么营救最合适，我说穿便衣。很快就集合了30多名着便装的官兵，并作了动员……首长让我带了3名战士先走了。”

回到西单路口，人群对派出所广播的内容置若罔闻。不仅丝毫没有解散的迹象，反而更加密集、更加亢奋。下午1：00许，派出所5位着制服干警、几十名分局刑警队员连同20余名便衣民警好不容易分散渗入到车周围，但有的人“被挤得趴在车身上，半晌动不了窝”。面对派出所所长的协助请求，人们报之以谩骂和起哄声。在接到上级指示后，撤出人群的他们“个个大汗淋漓”，“就像是刚从水池里爬出来一样”。比起出发时那种英勇就义的面貌，颇有几分滑稽。

此后，再次返回大会堂汇报情况的傅里加正遇到一队“穿军装戴钢盔，徒手从大会堂出发”的营救队伍：

“谁知没等队伍开到南长街的红绿灯处，就被聚集的人流和雨点般的石头、瓶子击退了回来。”

2：30，因六部口解救另一辆被困军车释放了催泪弹，大量的人流涌向了西单。适逢某集团军师政委邵松高少将与上尉参谋等3人乘吉普车通过此地，被人从车中拖出；另有一名便衣警察因用报话机通话，被毒打。这就使解救西单路口军车的形势更加复杂了。

为保护军人生命和武器的安全，学生把暴露在群众中的军人都接应到车内，并发放了蘸水的纱布，准备迎接催泪弹。在车下，学生和便衣“胳膊挽胳膊”，组成了一道环绕军车的隔离带。还联手护送少将转移，并拦下一辆救护车，将受伤的便衣警察救走。

大概也是遵照上级的指示，下午2：00许，派出所选择一处餐厅，开始和北师大、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谈判。派出所为得到学生的配合，强留下学生代表，并同时向分局汇报。分局领导开始坐镇研究营救方案。当时，有军人提出“用防暴队驱散人群，把武器抢出来”的方案，但分局的王副局长说：

“白天试过，不行，伤了不少人，也搞不出来。”

他还告诉建议者：

“那辆车的情况和整个六部口的局势他们都清楚，陈希同市长和区领导都不时打电话询问情况。”

大约在6月3日晚6：00许，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收到一份电传。王局长看完后说：

“好了，今晚什么都解决了！”

不久，另两位学生代表——“北高联”的任建新和北京邮电学院87级陆玮——带来了学生将撤回广场的消息，并请公安人员到现场接管。分局王副局长和西单派出所赵主任“签写了字据”。陆玮也留了下来，负责协调移交事宜。

晚10：30，在戒严部队已经于木樨地开枪的情况下，营救方案出台：由西城区卫生局派出两辆救护车，70名干警换上便服（有的换上了白大褂），以救护学生为名开进现场，一辆救护在场军人，另一辆以“将武器送天安门广场展览”为名，运出武器。由便衣维护现场秩序。

11：40，装载武器弹药的救护车在北京邮电学院计算机系通讯专业87级学生陆玮、丰台区铁匠营职业中学烹饪班学生王永刚的护送下向西开出。由于复兴门已发生激战，车辆转道西二环路，最终未丢一枪一弹，被护送到阜成门外大街的海军总医院。

第六节 催泪弹

“F75”行动的露馅，给广场的学生带来了新的压力。据李录回忆：

“6月2日情况确实变得非常严重了，那天整个晚上我从大概八、九点钟开始就每几分钟收到新的进展。我有两个人专门坐在旁边绘制一张图，每过几分钟图上就有些变化，当时陪着我整个一晚上的是潘毅。

当时主要作出的反应就是把帐篷里的人集中起来，这时候帐篷已经开始建起来了，至少一半的人已经转入了新的聚居地，而新的聚居地已经考虑了对付军队进城的办法，所以这部分人是很容易集中起来。每个帐篷设置了一个棚长，这个棚长迅速待命，当时政策推行部已经建立，这些命令能迅速地传达到当时的每一个人，那几天晚上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没有睡好觉，都在等待发生意外。同时那天晚上和北高联开始有很好的合作，至少开希、杨涛等人从从师大和北大调进来将近一、两万人。

第二天上午大量处理的是被捕的军人。当时被捕的军人很多，还缴了很多械。但是这个情况已经引起了我们严重的关注，认为这是一场大行动的先兆。首先我们派出了政策推行部的几乎全部人马去到各个被软禁的军人，说

服同学把他们放走，同时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时有两位中校主动向我们说明背后的意图，还有一名将军。按照这次谈话的结果我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看法，这是一次预演，这是一次故意的疲惫战。气氛开始被弄得越来越激烈，好像有一触即发之感。这时就有了武器收缴，把所有的东西都收缴到指挥部。我印象里战利品还真不少，破枪破炮子弹一大堆，大部分是钢盔之类的，请专家看了看没有一样开得动，刀子也生锈，枪也没枪拴。总之，这个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这是一场故意的阴谋。

根据当时这些判断，立刻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公安局，从公安局里拿到了收条，召开了三次记者招待会，向各位记者不断地展示收条，同时请政策推行部的人到各个帐篷去请棚长和每个同学说明这一两天发生的紧急情况，请大家做好意外时刻的准备。当时的准备也并不很多，建立的基本原则是5月19日晚上到20日晚上建立的所谓的原则，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男同学保护女同学，互相并肩和平撤退，同时围成一个圆圈，这是接受了一个空军少校的建议，叫中心开花，中心突破，学习了很多军事术语，最后形成了这一套方案。这套方案在绝食最初的几天，每天都向大家传述，同时和医药站的人紧急商量弄了几千个口罩和毛巾，为防瓦斯。后来这都发下去了，在撤退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至少有一个毛巾或者有一个口罩。这是当时作出的一些反应。 到此为止，学生应对的策略，都没有给官方留下立即介入的借口。但这一天，人们终于见到了“血”！

如前所述，北京市公安局王副局长所说“白天”试过“伤了不少人”的事情，发生在距西单仅仅一个街区的六部口。这个事件之所以反复被人提起，并为史家所重视，不仅因为它让半个多世纪没有催泪弹记忆的北京人第一次尝到了它的滋味，也不仅因为它致伤人数比例很大，令北京人第一次看到了“血”！还因为围绕它发生的一些无法解释的怪现象，以及它在整个事件急转过程中的分量。

所谓“六部口事件”，发生在6月3日下午的西长安街六部口。如前所述，当日凌晨，沿西长安街向大会堂开进的4、5辆运载军人和军备的车辆，在西单到六部口一带被阻。车辆全部被扎胎放气，或有玻璃损毁。其中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大客车，正好停留在中南海正门西侧的路南。当日上午10：01，在六部口附近的一个大院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某部，已收到上级的电话：

“六部口一辆装有大批武器弹药的军用大轿车和车上十多名部队官兵，被一伙坏分子拦截围困，上级命令你部同兄弟部队、公安干警、防暴警察一起到六部口附近的……待命抢救。”

“……不到一分半钟，500多名官兵戴钢盔、穿皮鞋，不带枪支整齐地集合完毕。而后迅速到达待命地点。”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部队并没有出击。”

“这里离出事地点六部口只有一里多路。从院外混杂的声音里，官兵们已预感到前面出了大事……”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部队仍没出击。为什么？”

大约中午1：00，这辆车的周围聚集人群上千，此后减少到几百。几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登上车顶，并将车中搜出的一挺机枪、铁棍、套头钢圈和带刺刀的步枪挑着的钢盔向人们展示，同时进行了演讲。另有人将一部分武器带离车外，在新华门前、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台阶上进行展览。据称，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曾多次尝试解围，均不成功。

图8-31： 学生将军人遗弃的物品在新华门前展览（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1：30，上级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终于下达了出击的命令。1：35左右集合完毕。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扼要介绍了六部口事态之后，又做了简要动员……”

“2：05左右，这支队伍向六部口出发了。”

这支部队到达六部口只用了10分钟。于是，出现了公众所见到的一幕：

2：20左右，数百名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从中南海新华门冲出，向围聚在这辆车周围的人群施放了催泪弹，并以棍棒驱散人群，将该车弹药转移到早已预备好的其他车辆上，从府右街转移进中南海西大门。据李胜堂记载：期间还发生了群众几退几进，侦察兵与学生车顶搏斗，公安干警在戒严部队和防暴警察的掩护下冒砖石转运武器等惊险场面。整个过程只花了半个小时，到2：50结束。

关于这批解救弹药的军人，他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如上述，他们是从中南海的新华门出，从西大门入；另一种说法是从西大门出，从新华门入。两种说法，均是出于个人的目击。那么真相又是什么呢？

先看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描述：

“下午2：00，最早的镇压行动开始了。当时，西单、六部口和新华门都有很多市民在围观‘军用品’。突然，六部口响起了喇叭广播声，警告周围的市民迅速离开。广播不久，逾千名军人、武警及交警出现了，他们在西长安街筑起厚厚的人墙，军人排列最后，武警居中，前排是身穿白制服的交警。人墙刚刚列好，一个指挥官跳上一辆吉普车顶，大喊一声：‘立即执行任务！’人墙后排立刻向东面的人群发射了约20枚催泪瓦斯，与此同时，一大批手持电警棍、木棍的军人及武警冲入人群，挥棒便打。人群纷纷向长安街东面奔走，一时间，街上遗落大量的单车、鞋及背袋。”

“几乎是同一时间，新华门内也突然冲出约300名军人，同样是手持电警棍和杯口粗的木棍，冲出来后见人便打，将围聚新华门门口的学生、市民一直打退到长安街中心线外，随即立即收退返新华门前围成一个半月形的圈子。在这一路段约为45分钟的暴力镇压中，至少40多个学生、市民被棍、塑料子

弹等打伤。复兴医院一名医生透露，一位路过的孕妇被打至流产。军人在这次镇压中，抢回了学生展览的，包括枪械、弹药在内的所有军用物资。”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六部口解救弹药过程中，伤人的部队来自两个部分，一支是李胜堂和《文汇报》记者所说，在中南海西门集结待命已久，包含野战军、武警和交通警察的队伍，主要任务是解救军火，执行完任务后又进入了西门。北京市公安局陈友的文章证实，500人中有46人为“治安处防暴队”成员；另一支是吴稼祥所说，从中南海新华门出来，任务主要是驱散在逃避催泪弹过程中，向东涌向新华门的人群。事毕依然回到新华门里。

此次事件因投放了催泪弹，导致黄色的烟雾弥漫六部口、新华门一带，并随风吹拂到府右街，周围的人群四处躲避，咳嗽声不断。在躲避催泪弹的过程中，有民众（许多是午休出来散步的附近中央机关干部）随机避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统战部。一些学生、市民在警察转运的过程中，确曾使用石块予以还击。事后，大约上千名学生和市民在中南海新华门和紧闭的西大门外进行了抗议。

以上行为，事后均被作为“冲击中南海党政机关和要害部门”的事例，成为提前“清场”的根据。

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当天的日记，“六部口事件”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来到六部口，还能“闻到一股刺鼻迷眼的气味。”据他了解，“警察在这里释放了20多颗催泪弹”：

“这是建国以来共和国警察第一次向人民释放的催泪弹。现在50岁以下的人，只从历史课本上知道反动警察如何释放催泪弹，从来没见过催泪弹。”

另一位新华社记者，在六部口对17位被打伤者作了采访：

“有的被电警棍打成脑昏迷，有的因催泪弹爆炸使腿部有35度烧伤，有的被射钉枪射出的钉子打伤（有一个伤员钉子进入大腿5厘米）。 ”

“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急诊室有11名受伤的人，其中有学生、干部、工人。齐威，女学生，19岁，腿部被炸伤30多处。王长刚，干部，30多岁，右膝被射钉枪射入5厘米。宁火炬，干部，头部缝了5针。一名建筑工人被橡皮子弹打晕。一名妇女下身大出血。”

“北京急救中心外科有8名受伤者。外科主治医生聂星和其他医生对记者说，这次警察打人太狠。一般警棍打臀部、胳膊等处，这次多是打头部。”

几乎是在“六部口事件”发生的同时，《人民日报》总编室也收到前方记者打回的电话：

“总编室夜班的小廖从府右街给报社打电话，说府右街路口上，头戴钢盔的大批防暴警察从南往北驱赶人群。警察正在不断地施放催泪瓦斯。一些人逃到统战部大院，警察又往院里扔催泪瓦斯。警察和军队还动用电警棍，见人就打，还有往人群里扔汽水瓶的。”

“小廖说，在现场的老百姓不多，也就几百人，没有警察人多；也许警察、军人想确保中南海西门及附近道路的通畅，除此看不出使用防暴警察的必要。”

关于这辆运输车的来历和用途，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吴稼祥，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辆车是前一天夜里被人开进城，车上放著一些没有子弹的枪支，故意让学生们拦截，制造‘暴乱’假像的。学生们果然上当，现在他们正开著那辆车，车上架著一挺机枪，让市民看官方和军方的残忍。”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因为此前，就在中南海里，他还目睹了另一幕：

“这天中午，我拿著饭盆去食堂打饭。刚走出楼门，被聚集在楼外的一群穿白色制服的大汉们吓了一跳。他们正在狼吞虎咽，我的同事们殷勤地在

给他们送水打饭。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陕西精选来的警察，个个膀大腰圆，功夫精湛。看著他们，你理解什么叫虎狼之师。”

“他们来干什么？对付正在六部口驾著一辆面包车的大学生们。……戒严指挥部的目的达到了，这会儿要派陕西警察去把枪支抢回来。他们吃饱喝足之后，从中南海西门出去，带著催泪弹和棍棒，一路打出去，得手后，从中南海新华门进来。我听见的，就是发射催泪弹的声音。”

吴稼祥的说法，证实了前述李胜堂的记载：早在“中午”以前，官方就已经准备好执行在下午2：20才“发生”的“紧急救援”任务！那为什么会有长达4个小时的拖延呢？官方是在等待人更少？还是在等待人更多的时候才执行呢？如果联系到这段录像一直被中南海和北京市委全程监控，中午正好是领导们吃饭休息的时间，读者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吴稼祥是六四“阴谋论”最顽固、也最有力的坚持者了。

当天下午，六部口弹药解救结束后，吴稼祥朝天安门广场走去，看到了更加奇怪的一幕：

“……人民大会堂西侧几百个 赤手空拳的军人被许多市民围在中央。军人可能是又渴又累又困，个个精神不振，甚至有点垂头丧气；市民们在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不要与学生为敌，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侵犯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些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其实，他们是从人民大会堂的地下设施里被派遣来的，做动乱的诱饵和送给市民的人质。决策者希望这些军人被殴打，这就有了马上镇压的借口。但是，他们好好地坐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动他们一根毫毛。”

不久，无所作为的待命军人，由“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大约3：00过后，香港《文汇报》记者看到：

“……排列在大会堂西门对面围墙内的几千军人，更不时与市民互掷砖头石块。长安街的交通完全阻塞了，学生与市民的纠察队在几个冲突热点来回穿梭……”

这一景像也被散步回来的吴稼祥目睹。下午4：30，士兵与群众的冲突终于发生了。此前，收到快马讯报的张健，出于与吴稼祥同样的担忧，曾对一位带队的戒严部队中校军官说：“让士兵就在这里坐着不行，会出事的。”他话音未落，一块砖头从后面飞来，砸在他的手臂上。但是，不可理解的是，部队依然未动。

一份“国际特赦”的调查报告，也记述了这一奇怪的现象：

“一大群士兵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他们站立了几小时，没有试图移动。”

事后，王德邦回忆道，当天，他也得到了一个奇怪的报告：

“我听从天安门回来的同学说，有军队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奇怪的是，围阻军队的学生与市民中，有背着黄布包并且包内装了石头的人。他们混在学生与市民中，不时掏出石头向军队投击。这引起我极大的警觉，我似乎预感到灾难的降临。”

至今，没有资料揭示，这批士兵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一位在大会堂内的戒严部队中校助理员的回忆，多少也流露出一理解：“13：00冷藏车拉了一趟，第二趟就巧妙地把4轿子车方便面带了进来，约有16000斤。原打算把3万斤都拉回来，却发生了意外情况，戒严指挥部命令驻大会堂的部队徒手去六部口解救被困的军火车，组织了大约几千人，从西南门出发，没到长安街就被学生、市民围困了。双方对峙了6个多小时，不时有砖头、石块打伤的战士架回大会堂。这样一来，大会堂的车也就出不去了。”

大约在3：00左右，沈阳军区第40集团军有一辆侦查车来到大会堂西侧，也看到“西门附近”有一支部队。据他描绘，他们“大约有一二千人，头戴钢盔，排成整齐的队形，站立在街道上，四周全是不明真相的人。”

此时，六部口被截军车的武器早已安全转移到中南海，被送到纪念碑展览的武器也被广场指挥部派人统一送往派出所。这些军人为何还不离去？

事后我们得知，此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清场”的最后会议才刚刚开始。而这支任务不明的部队，在“六四”清晨，正好担当了人员撤离后清扫广场的任务。他们的回忆文章，记录了那里成堆的白糖和奶粉，还有“香港支援”的整箱的“避孕套”，对这片曾经的“民主圣地”充满着轻蔑。

一位捂着血流入注的头前往报信的伤员，在当晚7：00 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成为了这次事件的见证人。据当时刚刚担任特别纠察队员的吴仁华回忆：

“新闻发布会上，许多受伤者纷纷以亲身经历控诉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和公安武警的暴行，一位受伤不轻的民众坐着平板车赶来参加。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头破血流、浑身血迹斑斑的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郑鲁滨的控诉发言。”

“6月3日下午3：15，郑鲁滨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看见一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用武装带猛力抽打学生和市民，便冲上去抢救一位被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击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他也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毒打，头部被军用钢盔击破，血流如注，白衬衣几乎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郑鲁滨身为中共党员，他对在场的记者说：‘我特意抓住钢盔在军人方阵内转了一圈，请他们看看人民军队殴打人民的证据。我热爱党，按现在不许支持学生、不许上街的通令来看，我是违犯了党纪，没有跟党保持一致，但我坚信李鹏决不代表党。’”

图3-32：6月3日，浑身是血的郑鲁滨，从各个角度让人拍摄（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这次新闻发布会在纪念碑南侧召开。由于受“戒严令”限制，参会的主要是国内媒体记者。会议由李录主持，柴玲介绍了2日晚在木樨地发生的恶性交通事故、六部口武警释放催泪弹事件，以及大会堂西北军民冲突事件，重申了学生“反戒严”奉行的“非暴力”原则。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出示了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大红印章的军械收条。那是进城的军队被围堵时被“查获”或主动遗弃的军械，被群众送往广场指挥部，又被指挥部送往派出所时索取的回执。

“六四”事件后不久，笔者曾看到过郑鲁滨在大会堂西现场，满身鲜血，手拿钢盔的那张摄制得近乎完美的“新闻照片”。我相信，所有看了这张照片的人，都对戒严部队军人的“残暴”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对于军民对抗的进一步升级起到无声的作用。

我相信，照片展示的场面，也可以被北京市政府安装的摄像头及时、准确地捕获，为正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的“强硬派”所用。

虽然广场指挥部所宣示的“非暴力”原则依然为绝大多数大学生所奉行，但是，正如张健所说的，此时，学生的行事原则，已经与工人、市民敢死队的行事原则渐行渐远。

据《中国“六四”真相》记载：5：00许，天安门广场“工自联”指挥部向市民和学生分发了菜刀、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等“自卫武器”，并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的广播称，“现在事态非常紧急”，要“拿起武器，推翻李鹏反革命政府”。“工自联”负责人纠集了一千多人，推倒了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拾捡了砖块、钢筋等，准备还击。据目击者称，那天，前“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和许多工人朋友一起”忙着“制造汽油弹”……

下午5：30左右，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待命的3000名戒严部队官兵开始往后撤，市民和学生鼓掌表示欢迎。

其时，中南海勤政殿内，关于当晚“清场”的决定已经作出。

第七节 清场决定

据李鹏6月3日日记：

“下午4：00在勤政殿，由乔石召集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理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队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议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

与李鹏的日记不同，据《真相》记载，这次会议的召集人不是乔石一人，而是“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四人。

“会议由杨尚昆主持”。杨尚昆做完开场白请李鹏讲话。李鹏讲话的要点是点明：

“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在此之后，陈希同系统介绍了所谓“反革命暴乱”的事实：

其一、武警部队吉普车在木樨地发生重大车祸的消息，被“暴乱的组织者”所利用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进城开道车故意撞死市民，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到各路口，阻拦解放军进入市区执行戒严任务。

其二、从今天凌晨起，在建国门、木樨地、新街口、虎坊桥、南河沿、西单等几十个主要路口都设置了路障、拦截军车、围困并殴打解放军，一些军车的轮胎被扎破，还有暴徒抢夺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央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受到冲击。

接着，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作了进一步补充，但没有使用“反革命暴乱”和“暴徒”的提法：

“今天凌晨，部分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市区执勤点。开进途中，几乎所有的部队都遇到了市民、学生的阻拦，遇到了路障。一些人砸军车，朝战士们吐口水，我们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被围困的一些士兵，他们的上衣被扒得精光，当众受辱；朝阳门被堵住的四百多名解放军被市民用石块乱砸；虎坊桥着便装进来的一支部队，被人发现后四处追打，现在还有一些一士兵不能在大会堂西侧集中，队伍整个被冲散了；被堵在南礼士路的一些士兵被强行搜身。总之，现在戒严部队一些士兵忍气吞声，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气。有一些被羞辱的士兵恨得牙根都痒。各部队正在做政治思想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之后，李鹏的讲话利用了连陈希同、周衣冰都没有来得及引用的“暴乱”的最新的事例，并提出了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的底线。李鹏说：

“大家都知道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六部口，那些暴乱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车，并在车顶上架起机关枪炫耀。还公然冲击中南海西门、新华门。刚才中南海高度紧张，被迫向这些暴乱徒施放了催泪弹。所有这些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决不能让这些暴乱分子以为政府软弱可欺。所以，我们决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极少数暴乱分子决不能手软。凡妨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

警执行勤务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

杨尚昆最后告诉与会者，他刚才“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

“小平同志要我转达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清场任务之前，要利用电视、电台各种宣传媒体向北京的市民、学生讲清楚。奉劝市民、学生千万不要上街，留在广场的一定要自愿撤离。总之，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要千方百计尽量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

杨尚昆特别强调：

“戒严部队指挥部一定要向各部队交代清楚，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开枪。我在这里特别重申，决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发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不走，我们戒严部队架也要把他们架走。决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见，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致意见。”

会议决定：

一、3日晚9：00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

二、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4日凌晨1：00抵达天安门广场，6：00完成全部清场任务；

三、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

四、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在张良的记载中，没有提到李鹏日记中几次提到的“工人纠察队”的角色。

据李鹏《“六四”日记》会议结束后，他把清场决定向江泽民、姚依林、宋平、万里作了通报。他们都一致表示同意今晚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的决定。杨尚昆则直接向邓小平进行了汇报。

有消息说，原计划“清场”的日期，是下一个星期六——6月10日。现在还不清楚，将计划提前到6月3日晚至4日凌晨的决定者是谁。如果本节所述西单、六部口遗车和大会堂西北军人“待命”也是这个“预谋”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们最后的责任人，也应当是那个催促提前“清场”的人。

当晚，杨尚昆、李鹏、乔石、刘华清等在中南海游泳池杨尚昆驻地坐镇指挥；解放军三总部首长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在西山指挥部负责整个戒严部队的调度；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北京市委、市政府李锡铭、陈希同在人民大会堂戒严指挥部指挥“清场”。

见习总书记江泽民，则通过他的临时住地——中南海靠近南长街的警卫大楼四层的窗口，直接观看了天安门的“清场”。

注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89页。

同上。

同上，下册，第590页。

同上，下册，第590-591页。

同上，下册，第591页。

详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胡耀邦下台，及其与学运结缘。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91-592页。

同上，下册，第592页。

同上。

同上，下册，第592-593页。

同上，下册，第593页。

同上。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三章 第五节：从换将到用兵。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93页。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81页。据冯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文版被删节的内容。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93-594页。

同上，下册，第594页。

同上。

指芮杏文、阎明复。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5页。

同上。

佚名《江泽民身世揭秘》。

佚名《江泽民身世揭秘》。原中华民国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迁往重庆、成都等地办学。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8—39页。

汪道涵（1915. 3. 27—2005. 12. 24）。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原名汪导淮，安徽嘉山县（今明光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理学院数理系。1938年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县长、地委委员等职。国共内战时期，先后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政委，胶东区行署代主任，安徽省财办主任。1949年后，任杭州

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文革后，先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85年退居二线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名誉会长。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5年12月4日，李锐与陈小雅的谈话。参见本书第一卷 第二章 第六节 胡耀邦的1983危机。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05页。据冯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文版被删节的内容。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11页。原文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第99页被删去。据冯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文版被删节的内容。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19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同上。

参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 第六节：“八六学潮”天平迅速倾斜。

参见本书第三卷 第六章 第六节：《新观察》、“导报”座谈会；第四卷 第八章 第三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

参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四节：《导报》事件的反响。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8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74页。

见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二节：高层：两军探底。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0日，第115页。

《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之三。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74—7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0日，第115页。

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59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26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页。

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60页。

同上。

同上，第155页。

2016年9月20日李劫电子邮件。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记为，下半夜2：45学生全部停止绝食。见《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1页。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是5月20日凌晨。

2016年9月20日李劫电子邮件。

指在上海安顿万里，并向他传达邓小平的意见。

此说见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64页。但一位署名“中共党史评论员”的文章称：“江泽民于戒严的第十天奉召进京，从上海飞到北京南苑机场，贴上胡须、眉毛，扮作香港大商，骗过了市民和学生，溜进了中南海。”见《从六四死伤人数谈起》，1999年6月6日，于北京。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3页。

共产党历史中，国民党执政时期，党所从事的非法活动，及一切为掩护非法活动服务的合法活动的代（总）称。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8页。

参见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王超华《高联正式讨论撤退》、柴玲《广场总指挥》。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7、212、224页。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9页。

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7页。

指戒严以后第一第二次绝食团营地联席会议。

李录《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37页。

据说，李录当时向指挥部成员传达了一个今日凌晨清场的“绝对可靠的情报”。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67页。

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68—369、464页。

时间依据科技日报记者记载。见《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69页。

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李录《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37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265页。

同上。

同上。

5月20日凌晨《十二所高校负责人紧急碰头会记录》。载《北航档案》（原件）。

同上。

5月20日上午《十一所高校负责人碰头会记录》。载《北航档案》（原件）。

同上。

同上，第212页。

事后被任命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情报部长。

见香港《天天日报》1989年5月22日头版。

王超华《吾尔开希喊撤》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14页。

同上。

安魂曲《我的八九并不完整——为纪念六四运动13周年作》。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06页。

王超华《高联正式讨论撤退》同上，第212页。

常劲《北大后期工作》。同上，第291页。

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同上，第208页。

同上，第208页。

同上，第208—209页。

同上，第209页。

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同上，第209页。

详见下一节。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 下册, 第272—273页。

常劲《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76—177、180页。

详见常劲《声援绝食》。同上, 第177—180页。

梁二《声援绝食》。同上, 第180页。

梁二《广场财务部》。同上, 第242—243页。

梁二《财务与后勤工作》。同上, 第243页。

梁二《财务与后勤工作》。同上, 第243—244页。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6日。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 第67—68页。

梁二《财务与后勤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4页。

同上。

同上, 第245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 1989年7月版, 第81页。但《惊心动魄的56天》和《癫狂的蛇年之夏》记载为6000顶草帽。

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 1989年7月版, 第89页。

有记载为110辆。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9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90页。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90页。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41—142页。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38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第八节：“黑手”行迹。

梁二《五大财务问题》。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6页。

据5月18日新华社记者报道。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37页。

《红十字总会公布捐款使用情况 所有捐款将用于学生医疗和防疫》；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2版。梁二《五大财务问题》。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6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89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10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23页。

李兰菊没有说明是参加大会堂内的吊念活动，还是大会堂外的学生悼念活动。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23页。

王超华《北高联：从自发到自治》。同上，第43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3页。

梁二《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6页。

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五一四斡旋”前后的录音》。

白梦《广场广播站：初创阶段》。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52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4页。

同上。

同上。

邱延亮，蒋纬国的小舅子。1968年因民主台湾联盟案与陈映真等36人一起被捕，被判刑6年。现为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倡议人。

同上，第324—325页。

梁二《贪污嫌疑》。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61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5页。

张郎郎《我家小院是“黑据点”》。载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7月号。

据2008年1月张郎郎与高伐林、萧燕谈话录音。

同上。

详见下一节 “北知联”与“联席会”。

梁二《高联与广场指挥部的财务交接》。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51页。

封从德《广场后期的财务》。同上，第256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5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14页。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李卓人承认接触非法组织 经公安机关教育后已离京返港》。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8日，第1版。

据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广播。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六节：鲍柏漪们的“中国梦”。

据2008年1月张郎郎与高伐林、萧燕谈话录音。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4日，第177页。

北大 5月23日游行的诉求之一为“反扣信”。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 第289页。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四节：不信任的加深。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2016年4月版，下册 第290-291页。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合作者吴则虞。文载1964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发表于1964年第五期《江汉学报》。

又称“社教”。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包遵信——中国大陆的学术活动家与思想史家》。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包遵信——中国大陆的学术活动家与思想史家》。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同上。

同上。

《包遵信——中国大陆的学术活动家与思想史家》。

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

载1988年1月号《改革》、香港《明报》；台湾1988年4月号《中国论坛》（总301期）

“狗熊掰棒子（玉米），贪多装不下”。故事说：一只狗熊钻进一片玉米地，看到一个好的棒子，掰下来就夹在腋下，又看到一个更好的，又再掰下来夹在腋下，他不停地掰，不停地夹，原先夹在腋下的棒子也不停地丢失……最后，辛苦了一夜的狗熊回到家里，腋下只有一个棒子。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二节：异议运动的萌动。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三节：从“草地沙龙”到“民主沙龙”。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八节：山雨欲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七节：知识界签名风潮。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八节：山雨欲来。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二节：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四节：《导报》事件的反响。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三节：阎明复临危受命。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四节：知识分子的意见——《光明日报》座谈会。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第六节：倒邓狂澜。

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同上。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庞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黎鸣，时任民政部干部管理学院教师。

张显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研究员。

李盛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编辑。

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沈昌文，三联书店负责人。

柯云路，作家。

李陀，文学评论家。

苏炜，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杨百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志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

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见高瑜《新闻自由是吾辈的目标和旗帜——我和〈经济学周报〉》。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42页。

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由于社科院职工居住分散和研究工作的性质，社科院各研究所规定，研究人员每周两日返所，各所返所的时间不同。政治学所的返所日是每周二、五。

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茅山道《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张明澍为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主任，被陈子明社经所揽为所务委员。其执笔情况见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据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茅山道《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参见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录音整理者没有记下发言者的名字。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录音整理者没有记下发言者的名字。同上。

同上。

参见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严家其当日没有到会，但包遵信电话取得他的同意。见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远志明、邓正来负责。

王鲁湘负责。

苏炜负责。

见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茅山道《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
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55页。

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
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9—210页。

茅山道网文《悼念甜酸苦辣的邓正来》。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
密者邓正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一节：民间社会的扩展。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第七节：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
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74—475页。

同上，第475页。

原华中师大教师。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
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75页。

同上，第476页。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第六节：倒邓狂澜。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
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76页。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第七节：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社经所所务委员，兼《经济学周报》副主编。

北大历史系学生，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负责人。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77页。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四通社会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研、社经科所兼职人员。

包遵信记述为陈子明主持。此处依据王军涛和陈子华的记述。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载1990年6月16日《百姓》杂志（第218期）。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08页。

《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一—六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2—483页。

同上，第483页。

同上，第483—48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86-587页。

李鹏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见《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二四五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册，第614页）。根据李鹏5月22日日记，这个讲话是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报告后的讲话。见李鹏《“六四”日记》，第169页。

严家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且自辞去陈子明所办“函授大学“顾问职务后，从来不与陈子明发生交集。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一节：民间社会的扩展。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7日，第176页。

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载1990年6月16日《百姓》杂志（第218期）。

即前述5月22日上午，严家其在政治学所主持的“情况交流会”。与“联席会”毫不相干。

政治学所对“新权威主义”不感兴趣。据笔者的记录，这次会议主题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项小吉5月20日以后已离开北京。

详见本卷上一节：广场的支撑。

李录《联席会议与“五·二七”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74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95—96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57页。

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见《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四八九—四九〇页。

封从德批注：“据说王军涛起草的誓词是：‘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甘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6页。

韶闻《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壮士》。载《黄花岗》，2002年6月2日。

余志坚《五·二三事件真相》，2005年6月12日。载《“六四”档案》。

韶闻《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壮士》。载《黄花岗》，2002年6月2日。

同上。

吴弘达《此案未了——再论天安门三壮士》。载《观察》电子报，2006年2月28日。

同上。

陈少文《蛋击天安门毛像经过——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载《黄花岗》，2002年6月号。

吴弘达《此案未了——再论天安门三壮士》。载《观察》电子报，2006年2月28日。

余志坚《五.二三事件真相》，2005年6月12日。载《“六四”档案》。

同上。

周勇军《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2004年7月于洛杉矶。

吴弘达《此案未了——再论天安门三壮士》。载《观察》电子报，2006年2月28日。

据封从德到本书付梓时所知的情况，处理本案的“学生骨干包括周勇军、郭海峰、连胜德、张健，非学生包括韩东方、刘焕文”。

余志坚《五.二三事件真相》，2005年6月12日。载《“六四”档案》。

周勇军《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2004年7月于洛杉矶。

周勇军《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2004年7月于洛杉矶。

同上。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五节：深化与波及。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记动乱暴乱期间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原载《山西日报》，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第2版。

此处引用数据均出自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惊心动魄的56天》及新华社报道。

梁二《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0页。

梁二《广场财务部》同上，第242页。

天津大学。

梁二《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2—183页。

轩彦编《京都血火——学潮、动乱、暴乱、平暴全过程纪实》。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41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11页。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记动乱暴乱期间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原载《山西日报》，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第2版。

轩彦编《京都血火——学潮、动乱、暴乱、平暴全过程纪实》。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40页。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11页。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白梦《广场广播站：后期的变故》。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87页。

陈小雅《陈凤山访谈录》，2013年3月2日—3月4日（笔谈）。

《柴玲封从德险遭绑架，策动事件四人被点名》见香港《天天日报》1989年6月2日。

参见1989年6月2日香港《信报》、《港人日报》、台北《中央日报》。6月2日香港《华侨日报》记为“两个大型扬声器不翼而飞”。

《柴玲封从德险遭绑架》。载香港《天天日报》、《港人日报》1989年6月2日。

关于李录被绑架事件很少资料提及。事件据说是5月29日或30日。1991年巴黎《回顾与反思》会上，李录指认其事是时任北高联主席王有才组织的。参见李录《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21、281页。但苏绍智在海外却听王军涛说过。参见本卷 第十六章 第八节：一样“流血”，两种“期待”。

《柴玲封从德险遭绑架，策动事件四人被点名》。载香港《天天日报》1989年6月2日。

《柴玲封从德险遭绑架，疑有学生被当局收买》。载香港《港人日报》、《香港时报》；台北《中央日报》1989年6月2日。

见本卷 第十六章 第三节 真空期。

见《“高自联”头头被绑架原委》。载轩彦编《京都血火》，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9月版。原载香港《新报》1989年6月3日。

详见封从德、张伯笠、梁二《贪污嫌疑》。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58、259—260页。

据2008年1月张郎郎与高伐林、萧燕谈话录音。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96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五节：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六节：人大与党：短兵相接。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05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12页。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3页。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62页。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12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6日，第196页。

同上。

常劲《北大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91页。

同上。

梁二《师大与高联》。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2—33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16页。

封从德原注：可能是后来柴玲宣布时修改了词语，丁方案外界报导的是“得到承诺，主动撤离”。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17—418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同上，第421页。

封从德注：稍后报导(27日)的丁方案是“得到承诺，主动撤离”，可能是后来柴玲宣布时修改了词语。但最初的用词就是“维持现状，自生自灭”的放任方案，一些早期报导(如《快报》26日)和李录与我的记忆皆如此。无论如何，丁方案也并非无条件的撤离，而是有条件的(“得到承诺”)。总之，当时“坚守广场”的投票加起来超过97%。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2页。

张伯笠因写作离开广场两天。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2—223页。

即北高联一定要建立在校自治会民主选举的基础上。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3页。

据任晓町提供《等候召开人大是纯粹幻想》。

据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据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89页注287，以上内容已见于5月29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香港经济日报》29日第3版吾尔开希访谈、老木《回顾与反思》第236页、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179-180页、王军涛《黑手备忘录》第128页等文献均有记载。香港《争鸣》杂志1989年9月号第28页也有证明。

据《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部分，第492页。

但据与会者回忆，5月27日“联席会”讨论“声明”时，外高联和市民敢死队并没有代表参加讨论。

详见本书下册 第二章 第一节：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4—95页。

同上，第96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25—126页。

参见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5月29日；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90页。但陈子华所说《经济学周报》刊载时间为5月21日不准确。因《经济学周报》每周只出一次，五月下旬的出报日分别为5月21日和5月28日。于光远文中有“学潮前后持续一个半月”的内容，记得于光远在与本人谈话中说到这篇文章，也说过纪念“四·二七”这层含义。笔者推断，其写作日期大约在5月25日后至5月27日之前。 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

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92页注290；李录《Moving the Mountain》第179–181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92页注291；1989年5月29日香港《大公报》。

详见下一节。

苏绍智先生此处所说为真名实姓。苏晓康宴请时在场的还有苏绍智夫人胡鉴美、苏晓康和夫人傅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民主中国》编辑等人。

柴玲《广场总指挥》。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7页。

参见陈小雅《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廿一世纪基金会出版。

指卡玛、高富贵合拍的电视专题片《天安门》。

王军涛《独立、民主、自由与进步——“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的回顾、反思与展望》。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28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3页。

2015年12月3日，任畹町对本书的修订意见。

连胜德，天津民航学院学生。

参见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05页；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9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5页。

据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5页。据张伯笠的记忆，当日郑义交给他打印的名单中，宣传部长是张伯笠。因为他太忙，所以他亲自改为老木。见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10页。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同上。

张伦《纠察与“政变”》。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79页。

王超华、梁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组织》。第277页。

期间指挥部可能还任命过一个叫易水的同学为宣传部长，见《回顾与反思》第233、239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06页。

参见王有才的“六四口述实录”。载64memo。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07页。

李录《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组织》。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38页。

同上，第239页。

同上，第240页。

详见《回顾与反思》第257—258、259页。

李录《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0页。

关于建构新政体，主要见于任畹町对学运的期待。“组阁”传闻来自文化知识界部分人士在张郎郎家的议论。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六节：人大与党：短兵相接。

乔石1989年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讲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66页。

同上。

见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上午9时左右，胡启立同志来我办公室，提议我去会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我认为这是向搞动乱学生公开表示中央态度的时候了，所以欣然同意。”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三章 第七节：恐吓or警告？——风马牛对话

《黄雀行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央情报局活动》。载“大家论坛”
<http://bbs.chinesenewsnet.com/Dajia/Big5/11334.html>2001年11月14日。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参见本书中册 第六章 第四节：《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的意见；第七节：失败的斡旋；下册 第二章 第三节：不信任的加深。

张郎郎《去天安门捎个口信》，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6月，第233期，14—15。

戴晴还在5月14日组织十二个知识分子在一个对学生的紧急呼吁上签名。她于1990年5月9日获释。

张郎郎《去天安门捎个口信》，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6月，第233期，14—15。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五节：最后的挽救。

见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17页。

邹谠《天安门悲剧》载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纪念文集》，开放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戴晴《狱中交代材料底稿039》。

据说是一个“一个穿兰西装、戴眼镜的人”，见刘燕《残联的周旋》。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64页。

刘燕《残联的周旋》。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63页。

梁二《残联的周旋》。同上，第264—265页。

详见本卷 第十六章 第四节：广场的支撑。

常劲《残联的周旋》。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65页。

万润南《我的 1989（3）存亡之秋》。

万润南《我的 1989》（4）风云突变（10）处理家务》。

万润南《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参见万润南《我的 1989（19）亚视采访》；叶光《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6日。

万润南《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叶光《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6日。

万润南《我的 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17）橡皮图章企图硬起来了。

即清华大学化工系84级的李英华、材料系84级耿学洪，北京大学地理系87级范九利、物理系87级研究生王有才。见万润南《我的1989（14）毁家纾难》。

官方记载为80所高校。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21页。

万润南《我的1989（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22页。

同上。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0—141页。

万润南《我的1989（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同上。

《1975年的云南沙甸事件》称：云南沙甸事件起于文革派性斗争和革委会对于伊斯兰教的极左破坏政策。因遭到回民反抗被称为“沙甸叛乱”，解放军出兵围剿。仅沙甸一地，“这场战斗进行了七天八夜，炸毁民房4400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当时沙甸约有7700人。部队也有伤

亡。”但战斗不限于沙甸个地区。“以参加‘沙甸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其中开远市新寨的伤亡比例最高，超过了沙甸。简影杂物馆20140303。

万润南《我的1989（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万润南《我的 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96—198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02页。

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六、戒严：撤与不撤的争论。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封从德《撤与不撤》。同上，第304页。

李录《撤与不撤》。同上，第303—304页。

何维凌是邓朴方的北大同学，胡赵改革初期的幕僚人物，后作为“体改所”派驻美国联络员旅美。经常出入邓、赵幕府，八九民运中弃赵跟邓。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 第三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包遵信《最后的努力：与何维凌夜谈》。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王正德在《何维凌和〈手稿〉》一文中说，何维凌的被捕时间是5月29日。与包遵信的回忆在时间上有冲突。见《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序二。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见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50—151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383页。包遵信《与温元凯的一次夜谈》。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1日，第226—228页。

详见上书。

同上，6月1日，第235—236页。

《多余的话》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罹难前写的内心自白。其中谈到自己作为一个书生投身革命是“历史的误会”，尽管他此后还是被国民党处死，文革中的“革命群众”还是将其视为瞿秋白叛变革命的罪证。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九、部署清场：“民主之神”。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九、部署清场：“民主之神”。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封从德批注：“这是柴玲2011年的说法，此前未见其此说”。

包括对丈夫封从德也持这种说法。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第437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6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7页。

封从德批注，金培力这个朋友是“邝余莲花，旧金山华人，左派。网上资料：金山华裔社区人士邝余莲花，则在1989年六四前一周，曾让柴玲到公寓内接受电视访问。当时邝余莲花的先生孔军武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驻北京邮电部经理，他们住在丽都酒店。邝余莲花的朋友金培理（Philip J. Cunningham）为美国ABC电视台与英国BBC广播公司担任特约记者，约了柴玲访问，地点就在邝余莲花夫妇的住所。邝余莲花当时对柴玲的印象是：口才很好，勇敢天真，对欧美民主制度很向往，但并不了解欧美经济帝国主义的真相。”

同上。

柴玲此处是在复述一个同学对李录的询问，以及李录的回答。但她强加给自己的“领袖+教父”的义务，使她把李录的经历当成了自己的经历。直到这话惹来麻烦，她才意识到要还事实本来面目。详见本卷 第十六章 第八节：一样“流血”，两种“期待”。封从德注：本句问话与上一句问话不是同一记者，而是香港《天天日报》女记者梁淑英；《天安门》影片在本句与上一句话之间“减去八千字，录像中也相差四十分钟。”

卡玛、高富贵等《天安门》。明镜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5—177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8页。

柴玲一直没有说出此人的名字。在1991年巴黎《回顾与反思》座谈会上，她提到陶斯亮和“别人”。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 中册 第四章 第二节: 艰难的二次出发。

柴玲、王超华《纠察与“政变”》。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 第281—282页。

封从德《史实与史识的求索——增订手记》引文: “May 27、. . . she、. . . began sounding out foreign friends who might help her flee the country.” see Michael Fathers and Andrew Higgins,

Tiananmen – the Rape of Peking. London: The Independent, 1989. p. 88.

参见《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第262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 第435页。

香港《文汇报》5月29日急电。

柴玲《柴玲回忆: 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 香港田园书屋, 2011年版, 第98—100页。

见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32—133页。

引自《惊心动魄的56天》, 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 第182页。

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 1989年7月版, 第118—119页。

参见《维基百科·刘晓波》。

参见曹长青《撕裂的刘晓波》、《维基百科·刘晓波》、刘晓峰、冰岛《“狂人”刘晓波》。载《大学生》1989年第1期。

刘晓峰、冰岛《“狂人”刘晓波》。载《大学生》1989年第1期。

同上。

参见《维基百科. 刘晓波》，刘晓峰、冰岛《“狂人”刘晓波》。载《大学生》1989年第1期。

参见《维基百科. 刘晓波》。

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同上。

参见刘晓波《在地狱的入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载《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曹长青《撕裂的刘晓波》。

维基百科：刘晓波。

曹长青《撕裂的刘晓波》。详见刘晓波《悲剧英雄的悲剧——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一》、《完善制度还是塑造完美领袖——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二》、《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与程序——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三》。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万润南《我的 1989（6）刘晓波》。

指“四二七“大游行”。

万润南《我的 1989（6）刘晓波》。

参见柴玲《戒严之后》、封从德《人民发言人》。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26、294页。

梁二《师大、开希、刘晓波》。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94页。

邝岩《动乱“记者”戴晴》。原载《光明日报》。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14日，第2版。

王军涛《独立、民主、自由与进步——“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的回顾、反思与展望》。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22、128—129页。

包遵信《最后的努力：与何维凌夜谈》。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92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3页。

时任社经所所长。

王军涛《独立、民主、自由与进步——“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的回顾、反思与展望》。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22、128—129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侯德建因有片约在身，只绝食48小时。

现场录音，此处不清楚。

据陈小雅1989年6月2日现场录音整理。

《六.二绝食宣言》。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9—22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1日，第164页。

同上，5月22日，第165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1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7日，第208—210页。

罗点点《流血的改革》。

中央宣传小组成立于5月20日详见本书下册 第三章 第四节 全民“截兵”。

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91页。

在5月21日胡绩伟委托四通公司代征集签名这份议案上签名的常委委员不足召开紧急会议的法定人数。但将5月17日以厉以宁、江平等24位，同日卢嘉锡领衔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5月18日在全总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同日张友渔等有相同内容的呼吁书上先后签名、同意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加在一起共有57人。构成了超过1/3的法定人数。四通公司代理人在将消息发送《文汇报》时，未对“在议案上签名者”与“先后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者”进行区别说明。在后来的清算中，此事被称为“四通公司侵权案”。

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日，第2版。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人大常委会会议能否如期召开？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言人就此问题发表谈话》，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3日，第1版。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人大常委李贵写信说根本没参加过“签名”》。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日，第2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02页。

同上，第142页。

新华社5月31日电《经公安部门批准 京郊三县农民职工集会游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1版。

新华社5月31日电《经公安部门批准 京郊三县农民职工集会游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1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九、部署清场：瞄上方励之。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30日，第216页。

同上，5月31日，第218页。

据北知联《新闻快讯》5月31日消息。

参见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8—139页；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0页。

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日，第1版。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记动乱暴乱期间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原载《山西日报》，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第2版。

参见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北大八名教授副教授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载《人民日报》5月31日，第1版；郑岩《新华门的见证》，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7日，第4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31日，第218页。

美国之音记者张楠、何宗安《专访鲍彤——享受社会救济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2009年。

香港《百姓》杂志记者。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

王正德在《何维凌和〈手稿〉》一文中说，何维凌的被捕时间是5月29日。与包遵信的回忆在时间上有冲突。此处采用包遵信的回忆时间。见《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序二。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白南生（1950—2010），江苏人。“文革”中曾“插队”内蒙，后回北京当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后成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组”骨干成员。“发展组”分支后，进入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继续从事农村问题研究。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指六四后陈云建议中顾委准予杜润生进行党员重新登记。

载白南生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对陈小雅的道歉及案情通报。在众多于交代中供出我名字或对我进行无端指控的人中，白南生是唯一一个进行了道歉的人。据他认为，之所以我没有被牵扯进去，大概与办案人员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姑娘”有关。

这些谣言说，戒严指挥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北京市委各有自己的逮捕名单。其中戒严指挥部关照的是学生领袖；安全部的目标是与外国人有联系者；公安部的眼中钉是学运黑手；北京市的死敌则是“飞虎队”和工自联。

包遵信《我见到了黑名单》。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第121页。

同上，第129—130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99—200页。

同上。

同上，第201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2页。

同上，第143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7页。

同上，第14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九、部署清场：瞄上方励之。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2页。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4页。

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日第1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2—42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2日，第237页。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看望戒严部队 转达邓小平杨尚昆对部队的关怀和慰问》。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1版。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郭林祥 分别看望执行戒严任务官兵》。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3日，第1版。《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第1版。

《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第4版。

金乃凡网文《我和杨白冰（上）》。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首都群众关心戒严部队 热情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2版。

同上。

参见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 戒严部队已开始上哨》，载《人民日报》5月31日，第1版。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31日，第221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1日，第226、236页。

同上，第236、237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221页。

郭德华、何文亭、傅俊《“F75”在行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60页。

同上，第61页。

应是3人。

载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台湾风云时代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第514—515页。

崔维《圣殿轶事》、倪福田《守卫大会堂——一名军官的手记》。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6、65页。

《北京抓获反革命暴乱暴徒四百多人 “高自联”“工自联”有些头目也被缉拿归案》，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中央电视台发布新闻 借用完毕的一辆武警吉普车返回部队途中发生重大车祸三人死亡一人受伤》。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3日第1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十、“六四”惨案：山雨欲来。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见《大事记》6月3日—4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76页。另据官网介绍，该公司是北京市建委下属公司，成立于1980年9月；1992年11月，组建企业集团，更名为“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公司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同时涉及建材生产及配套供应、建筑设计等业务，是房地产开发国家一级资质大型企业。截止到2003年末，该公司拥有职工5900人（其中长期合同职工3636人，短期合同职工1154人，其他人员1118人）。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一）》89年6月8日。

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2—123页。据杨继绳记载，该车被阻位置是“西单十字路口往东50米路南”。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2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十、“六四”惨案：山雨欲来。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此处武器装备数量依据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0、142—143页。但陈友所记载的数量是“100支冲锋枪、一挺机枪和4支手枪、3万多发子弹”。见《大智大勇 舍死忘生——首都公安干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31日。陈小雅录音整理《27 军某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和“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3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插图说明）。1990年4月版。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06页。

韩景童《军火被截时刻》。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4页。

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9页。

韩景童《军火被截时刻》。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6—37页。

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30页。

详见本章下一节。

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31页。

同上，第134页。

同上，第135页。

陈友《大智大勇 舍死忘生——首都公安干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31日。

参见王小京《六月三日，在西单路口》；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第82—83、135、141—142页；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

李录《指挥部的情报与对策》。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5—306页。

李鹏6月3日《“六四”日记》说，这些车辆被阻时间约在7：00左右。实际上更早。参见李胜堂《六部口救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47页。

李胜堂《六部口救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47页。

同上，第148页。

部分资料记载为2：30左右。

关于整个事件所花时间有不同记载。此处采用李胜堂《六部口救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0—153页。但陈友《大智大勇 舍死忘生——首都公安干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记载“打了一个多小时的拉锯战”。该文对武警和公安干警遭受的袭击描述严重，与其他各种资料不相符。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31日。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二）》89年6月9日。

该文记载：“队伍从中南海西门行至距六部口百米处时，汽水瓶、石块，雨点般向他们投来。……46名防暴队员个个义愤填膺，迅速成扇面列阵，呐喊着迎面冲上去。刹那间，人群被驱赶到东、西、南三个路口以外”。陈友《大智大勇 舍死忘生——首都公安干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31日。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4日，第243页；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1页；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09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4页。

同上，第425—426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1页

关于本车弹药转移路线，吴稼祥与《中国“六四”真相》的说法不同。参见吴稼祥《真相在文件背后》，载《浴火凤凰》。

参见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34页。

各种资料对这批军人的数字记载不同。

吴稼祥《真相在文件背后》。载《浴火凤凰》。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二）》89年6月9日。

陈小雅《张健访谈录》，2015年8月8日——12月5日（笔谈）。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8页。

原作记为“6月2日”。但6月2日大会堂周围没有发生类似事件，笔者疑为应是6月3日。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1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39页。

黄小平《“虎穴”历险记》。同上，第42页。

张同锁等《清理“高自联”指挥部》。同上，第220—225页。

就在中央电视台发布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紧急通告》的同时。

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4日记为郑鲁兵。见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版。

详见本书第六章 第六节：待揭示的真相。

据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张华杰说，公安局开始时不愿接收枪支，后来在同学们义正词严的再三要求下，终于收了，并开了收据，列了清单，盖上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大红图章。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05页。

陈小雅《张健访谈录》，2015年8月8日——9月5日（笔谈）。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册，第909页。马少方《历史鞭打现实》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第102页；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第532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册，第909页。但香港《文汇报》记者记载军人撤出时间为“傍晚6：00多”，见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二）》89年6月9日。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12-913页。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30、31日、6月1日、6月3日，第216、218、226、236、239页。

参见刘凤君《突击抢制炊事车篷布》，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3页；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26页。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20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1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

【注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89页。

同上。

同上，下册，第590页。

同上，下册，第590-591页。

同上，下册，第591页。

详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胡耀邦下台，及其与学运结缘。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91-592页。

同上，下册，第592页。

同上。

同上，下册，第592-593页。

同上，下册，第593页。

同上。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三章 第五节：从换将到用兵。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5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93页。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81页。据冯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文版被删节的内容。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93-594页。

同上，下册，第594页。

同上。

指芮杏文、阎明复。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9日，第155页。

同上。

佚名《江泽民身世揭秘》。

佚名《江泽民身世揭秘》。原中华民国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迁往重庆、成都等地办学。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8—39页。

汪道涵（1915. 3. 27—2005. 12. 24）。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原名汪导淮，安徽嘉山县（今明光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理学院数理系。1938年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县长、地委委员等职。国共内战时期，先后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政委，胶东区行署代主任，安徽省财办主任。1949年后，任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文革后，先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85年退居二线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名誉会长。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5年12月4日，李锐与陈小雅的谈话。参见本书第一卷 第二章 第六节 胡耀邦的1983危机。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05页。据冯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文版被删节的内容。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11页。原文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第99页被删去。据冯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文版被删节的内容。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19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同上。

参见本书第一卷 第三章 第六节：“八六学潮”天平迅速倾斜。

参见本书第三卷 第六章 第六节：《新观察》、“导报”座谈会；第四卷 第八章 第三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

参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四节：《导报》事件的反响。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8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74页。

见陈小雅《鲍彤访谈录》。2007年2月3日。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二节：高层：两军探底。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0日，第115页。

《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之三。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74—75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10日，第115页。

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59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260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页。

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60页。

同上。

同上，第155页。

2016年9月20日李劼电子邮件。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记为，下半夜2：45学生全部停止绝食。见《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1页。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是5月20日凌晨。

2016年9月20日李劼电子邮件。

指在上海安顿万里，并向他传达邓小平的意见。

此说见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64页。但一位署名“中共党史评论员”的文章称：“江泽民于戒严的第十天奉召进京，从上海飞到北京南苑机场，贴上胡须、眉毛，扮作香港大商，骗过了市民和学生，溜进了中南海。”见《从六四死伤人数谈起》，1999年6月6日，于北京。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3页。

共产党历史中，国民党执政时期，党所从事的非法活动，及一切为掩护非法活动服务的合法活动的代（总）称。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8页。

参见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王超华《高联正式讨论撤退》、柴玲《广场总指挥》。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7、212、224页。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89页。

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7页。

指戒严以后第一第二次绝食团营地联席会议。

李录《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37页。

据说，李录当时向指挥部成员传达了一个今日凌晨清场的“绝对可靠的情报”。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67页。

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68—369、464页。

时间依据科技日报记者记载。见《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369页。

科技日报记者《人间自有真情在一1989年5月20—22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载《新闻快讯》1989年5月25日，第四期。

李录《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37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265页。

同上。

同上。

5月20日凌晨《十二所高校负责人紧急碰头会记录》。载《北航档案》（原件）。

同上。

5月20日上午《十一所高校负责人碰头会记录》。载《北航档案》（原件）。

同上。

同上，第212页。

事后被任命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情报部长。

见香港《天天日报》1989年5月22日头版。

王超华《吾尔开希喊撤》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14页。

同上。

安魂曲《我的八九并不完整——为纪念六四运动13周年作》。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06页。

王超华《高联正式讨论撤退》同上，第212页。

常劲《北大后期工作》。同上，第291页。

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同上，第208页。

同上，第208页。

同上，第208—209页。

同上，第209页。

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同上，第209页。

详见下一节。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272—273页。

常劲《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76—177、180页。

详见常劲《声援绝食》。同上，第177—180页。

梁二《声援绝食》。同上，第180页。

梁二《广场财务部》。同上，第242—243页。

梁二《财务与后勤工作》。同上，第243页。

梁二《财务与后勤工作》。同上，第243—244页。

逃兵《天安门广场绝食日记》5月16日。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67—68页。

梁二《财务与后勤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4页。

同上。

同上，第245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1页。但《惊心动魄的56天》和《癫狂的蛇年之夏》记载为6000顶草帽。

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9页。

有记载为110辆。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89页。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90页。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90页。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41—142页。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38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第八节：“黑手”行迹。

梁二《五大财务问题》。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6页。

据5月18日新华社记者报道。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37页。

《红十字总会公布捐款使用情况 所有捐款将用于学生医疗和防疫》；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2版。

梁二《五大财务问题》。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6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89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10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23页。

李兰菊没有说明是参加大会堂内的吊念活动，还是大会堂外的学生悼念活动。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23页。

王超华《北高联：从自发到自治》。同上，第43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3页。

梁二《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6页。

封从德整理《八九学运：“五一四斡旋”前后的录音》。

白梦《广场广播站：初创阶段》。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52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4页。

同上。

同上。

邱延亮，蒋纬国的小舅子。1968年因民主台湾联盟案与陈映真等36人一起被捕，被判刑6年。现为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倡议人。

同上，第324—325页。

梁二《贪污嫌疑》。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61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5页。

张郎郎《我家小院是“黑据点”》。载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7月号。

据2008年1月张郎郎与高伐林、萧燕谈话录音。

同上。

详见下一节“北知联”与“联席会”。

梁二《高联与广场指挥部的财务交接》。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51页。

封从德《广场后期的财务》。同上，第256页。

李兰菊《香港学联的支持与协调》同上，第325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14页。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李卓人承认接触非法组织 经公安机关教育后已离京返港》。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8日，第1版。

据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广播。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电子版，第20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六节：鲍柏漪们的“中国梦”。

据2008年1月张郎郎与高伐林、萧燕谈话录音。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4日，第177页。

北大 5月23日游行的诉求之一为“反扣信”。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 第289页。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四节：不信任的加深。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 第290-291页。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合作者吴则虞。文载1964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发表于1964年第五期《江汉学报》。

又称“社教”。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包遵信——中国大陆的学术活动家与思想史家》。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包遵信——中国大陆的学术活动家与思想史家》。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同上。

同上。

《包遵信——中国大陆的学术活动家与思想史家》。

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

载1988年1月号《改革》、香港《明报》；台湾1988年4月号《中国论坛》（总301期）

“狗熊掰棒子（玉米），贪多装不下”。故事说：一只狗熊钻进一片玉米地，看到一个好的棒子，掰下来就夹在腋下，又看到一个更好的，又再掰下来夹在腋下，他不停地掰，不停地夹，原先夹在腋下的棒子也不停地丢失……最后，辛苦了一夜的狗熊回到家里，腋下只有一个棒子。

陈小雅《包遵信访谈录》，1993年8月8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二节：异议运动的萌动。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三节：从“草地沙龙”到“民主沙龙”。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八节：山雨欲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七节：知识界签名风潮。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八节：山雨欲来。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二节：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四节：《导报》事件的反响。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三节：阎明复临危受命。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四节：知识分子的意见——《光明日报》座谈会。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第六节：倒邓狂澜。

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同上。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第八节：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庞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黎鸣，时任民政部干部管理学院教师。

张显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研究员。

李盛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编辑。

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沈昌文，三联书店负责人。

柯云路，作家。

李陀，文学评论家。

苏炜，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杨百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志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

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见高瑜《新闻自由是吾辈的目标和旗帜——我和〈经济学周报〉》。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42页。

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由于社科院职工居住分散和研究工作的性质，社科院各研究所规定，研究人员每周两日返所，各所返所的时间不同。政治学所的返所日是每周二、五。

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茅山道《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张明澍为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主任，被陈子明社经所揽为所务委员。其执笔情况见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据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茅山道《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参见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录音整理者没有记发言者的名字。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录音整理者没有记下发言者的名字。同上。

同上。

参见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严家其当日没有到会，但包遵信电话取得他的同意。见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远志明、邓正来负责。

王鲁湘负责。

苏炜负责。

见包遵信《没有飘扬的旗帜——谈“北高联”》。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

茅山道《邓正来塑造了季羨林最后二十年》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首发。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55页。

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9—210页。

茅山道网文《悼念甜酸苦辣的邓正来》。载王生《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一节：民间社会的扩展。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第七节：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74—475页。

同上，第475页。

原华中师大教师。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75页。

同上，第476页。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第六节：倒邓狂澜。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76页。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第七节：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社经所所务委员，兼《经济学周报》副主编。

北大历史系学生，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负责人。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77页。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四通社会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研、社经科所兼职人员。

包遵信记述为陈子明主持。此处依据王军涛和陈子华的记述。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载1990年6月16日《百姓》杂志（第218期）。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08页。

《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一一六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2—483页。同上，第483页。

同上，第483—48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86-587页。

李鹏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见《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二四五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册，第614页）。根据李鹏5月22日日记，这个讲话是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报告后的讲话。见李鹏《“六四”日记》，第169页。

严家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且自辞去陈子明所办“函授大学”顾问职务后，从来不与陈子明发生交集。详见本书第二卷 第五章 第一节：民间社会的扩展。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7日，第176页。

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载1990年6月16日《百姓》杂志（第218期）。

即前述5月22日上午，严家其在政治学所主持的“情况交流会”。与“联席会”毫不相干。

政治学所对“新权威主义”不感兴趣。据笔者的记录，这次会议主题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项小吉5月20日以后已离开北京。

详见本卷上一节：广场的支撑。

李录《联席会议与“五·二七”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74页。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95—96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57页。

包遵信《我的反省与〈快讯〉批判——谈〈新闻快讯〉》。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见《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四八九—四九〇页。

封从德批注：“据说王军涛起草的誓词是：‘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甘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6页。

韶闻《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壮士》。载《黄花岗》，2002年6月2日。

余志坚《五·二三事件真相》，2005年6月12日。载《“六四”档案》。

韶闻《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壮士》。载《黄花岗》，2002年6月2日。

同上。

吴弘达《此案未了——再论天安门三壮士》。载《观察》电子报，2006年2月28日。

同上。

陈少文《蛋击天安门毛像经过——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载《黄花岗》，2002年6月号。

吴弘达《此案未了——再论天安门三壮士》。载《观察》电子报，2006年2月28日。

余志坚《五·二三事件真相》，2005年6月12日。载《“六四”档案》。

同上。

周勇军《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2004年7月于洛杉矶。

吴弘达《此案未了——再论天安门三壮士》。载《观察》电子报，2006年2月28日。

据封从德到本书付梓时所知的情况，处理本案的“学生骨干包括周勇军、郭海峰、连胜德、张健，非学生包括韩东方、刘焕文”。

余志坚《五·二三事件真相》，2005年6月12日。载《“六四”档案》。

周勇军《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2004年7月于洛杉矶。

周勇军《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2004年7月于洛杉矶。

同上。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五节：深化与波及。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记动乱暴乱期间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原载《山西日报》，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第2版。

此处引用数据均出自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惊心动魄的56天》及新华社报道。

梁二《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0页。

梁二《广场财务部》同上，第242页。

天津大学。

梁二《声援绝食》。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2—183页。

轩彦编《京都血火——学潮、动乱、暴乱、平暴全过程纪实》。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41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11页。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记动乱暴乱期间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原载《山西日报》，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第2版。

轩彦编《京都血火——学潮、动乱、暴乱、平暴全过程纪实》。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40页。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11页。

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白梦《广场广播站：后期的变故》。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87页。

陈小雅《陈凤山访谈录》，2013年3月2日—3月4日（笔谈）。

《柴玲封从德险遭绑架，策动事件四人被点名》见香港《天天日报》1989年6月2日。

参见1989年6月2日香港《信报》、《港人日报》、台北《中央日报》。6月2日香港《华侨日报》记为“两个大型扬声器不翼而飞”。

《柴玲封从德险遭绑架》。载香港《天天日报》、《港人日报》1989年6月2日。

关于李录被绑架事件很少资料提及。事件据说是5月29日或30日。1991年巴黎《回顾与反思》会上，李录指认其事是时任北高联主席王有才组织的。参见李录《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

反思》，第221、281页。但苏绍智在海外却听王军涛说过。参见本卷 第十六章 第八节：一样“流血”，两种“期待”。

《柴玲封从德险遭绑架，策动事件四人被点名》。载香港《天天日报》1989年6月2日。

《柴玲封从德险遭绑架，疑有学生被当局收买》。载香港《港人日报》、《香港时报》；台北《中央日报》1989年6月2日。

见本卷 第十六章 第三节 真空期。

见《“高自联”头头被绑架原委》。载轩彦编《京都血火》，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9月版。原载香港《新报》1989年6月3日。

详见封从德、张伯笠、梁二《贪污嫌疑》。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58、259—260页。

据2008年1月张郎郎与高伐林、萧燕谈话录音。

郑义《历史的一部分》[台]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版，第96页。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五节：赵紫阳的最后努力。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六节：人大与党：短兵相接。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05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12页。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3页。冯良《江泽民传中被删节的内容》。

据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62页。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12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6日，第196页。

同上。

常劲《北大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91页。

同上。

梁二《师大与高联》。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32—33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16页。

封从德原注：可能是后来柴玲宣布时修改了词语，丁方案外界报导的是“得到承诺，主动撤离”。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17—418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同上，第421页。

封从德注：稍后报导(27日)的丁方案是“得到承诺，主动撤离”，可能是后来柴玲宣布时修改了词语。但最初的用词就是“维持现状，自生自灭”的放任方案，一些早期报导(如《快报》26日)和李录与我的记忆皆如此。无

论如何，丁方案也并非无条件的撤离，而是有条件的（“得到承诺”）。总之，当时“坚守广场”的投票加起来超过97%。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2页。

张伯笠因写作离开广场两天。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2—223页。

即北高联一定要建立在各校自治会民主选举的基础上。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3页。

据任峻町提供《等候召开人大是纯粹幻想》。

据包遵信《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据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89页注287，以上内容已见于5月29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香港经济日报》29日第3版吾尔开希访谈、老木《回顾与反思》第236页、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179-180页、王军涛《黑手备忘录》第128页等文献均有记载。香港《争鸣》杂志1989年9月号第28页也有证明。

据《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运纪实》。中共研究杂志社，第四部分，第492页。

但据与会者回忆，5月27日“联席会”讨论“声明”时，外高联和市民敢死队并没有代表参加讨论。

详见本书下册 第二章 第一节：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4—95页。

同上，第96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25—126页。

参见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5月29日；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90页。但陈子华所说《经济学周报》刊载时间为5月21日不准确。因《经济学周报》每周只出一次，五月下旬的出报日分别为5月21日和5月28日。于光远文中有“学潮前后持续一个半月”的内容，记得于光远在与本人谈话中说到这篇文章，也说过纪念“四·二七”这层含义。笔者推断，其写作日期大约在5月25日后至5月27日之前。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92页注290；李录《Moving the Mountain》第179—181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92页注291；1989年5月29日香港《大公报》。

详见下一节。

苏绍智先生此处所说为真名实姓。苏晓康宴请时在场的还有苏绍智夫人胡鉴美、苏晓康和夫人傅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民主中国》编辑等人。

柴玲《广场总指挥》。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7页。

参见陈小雅《佛之血——89\64研究文集》廿一世纪基金会出版。

指卡玛、高富贵合拍的电视专题片《天安门》。

王军涛《独立、民主、自由与进步——“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的回顾、反思与展望》。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28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3页。

2015年12月3日，任畹町对本书的修订意见。

连胜德，天津民航学院学生。

参见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05页；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09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5页。

据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5页。据张伯笠的记忆，当日郑义交给他打印的名单中，宣传部长是张伯笠。因为他太忙，所以他亲自改为老木。见张伯笠《从绝食团指挥部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10页。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同上。

张伦《纠察与“政变”》。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79页。

王超华、梁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组织》。第277页。

期间指挥部可能还任命过一个叫易水的同学为宣传部长，见《回顾与反思》第233、239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06页。

参见王有才的“六四口述实录”。载64memo。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407页。

李录《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组织》。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38页。

同上，第239页。

同上，第240页。

详见《回顾与反思》第257—258、259页。

李录《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40页。

关于建构新政体，主要见于任畹町对学运的期待。“组阁”传闻来自文化知识界部分人士在张郎郎家的议论。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六节：人大与党：短兵相接。

乔石1989年5月22日《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讲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66页。

同上。

见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上午9时左右，胡启立同志来我办公室，提议我去会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我认为这是向搞动乱学生公开表示中央态度的时候了，所以欣然同意。”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三章 第七节：恐吓or警告？——风马牛对话

《黄雀行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央情报局活动》。载“大家论坛”
<http://bbs.chinesenewsnet.com/Dajia/Big5/11334.html>2001年11月14日。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参见本书中册 第六章 第四节：《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的意见；第七节：失败的斡旋；下册 第二章 第三节：不信任的加深。

张郎郎《去天安门捎个口信》，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6月，第233期，14—15。

戴晴还在5月14日组织十二个知识分子在一个对学生的紧急呼吁上签名。她于1990年5月9日获释。

张郎郎《去天安门捎个口信》，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6月，第233期，14—15。

详见本书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五节：最后的挽救。

见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17页。

邹谠《天安门悲剧》载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纪念文集》，开放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戴晴《狱中交代材料底稿039》。

据说是一个“一个穿兰西装、戴眼镜的人”，见刘燕《残联的周旋》。
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64页。

刘燕《残联的周旋》。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63页。

梁二《残联的周旋》。同上，第264—265页。

详见本卷 第十六章 第四节：广场的支撑。

常劲《残联的周旋》。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65页。

万润南《我的 1989（3）存亡之秋》。

万润南《我的 1989》（4）风云突变（10）处理家务》。

万润南《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参见万润南《我的 1989（19）亚视采访》；叶光《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6日。

万润南《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叶光《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6日。

万润南《我的 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17）橡皮图章企图硬起来了。

即清华大学化工系84级的李英华、材料系84级耿学洪，北京大学地理系87级范九利、物理系87级研究生王有才。见万润南《我的1989（14）毁家纾难》。

官方记载为80所高校。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21页。

万润南《我的1989（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22页。

同上。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对话》。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40—141页。

万润南《我的1989（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同上。

《1975年的云南沙甸事件》称：云南沙甸事件起于文革派性斗争和革委会对于伊斯兰教的极左破坏政策。因遭到回民反抗被称为“沙甸叛乱”，解放军出兵围剿。仅沙甸一地，“这场战斗进行了七天八夜，炸毁民房4400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当时沙甸约有7700人。部队也有伤亡。”但战斗不限于沙甸个地区。“以参加‘沙甸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其中开远市新寨的伤亡比例最高，超过了沙甸。简影杂物馆20140303。

万润南《我的1989（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万润南《我的 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96—198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1989年7月版，第102页。

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六、戒严：撤与不撤的争论。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封从德《撤与不撤》。同上，第304页。

李录《撤与不撤》。同上，第303—304页。

何维凌是邓朴方的北大同学，胡赵改革初期的幕僚人物，后作为“体改所”派驻美国联络员旅美。经常出入邓、赵幕府，八九民运中弃赵跟邓。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 第三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包遵信《最后的努力：与何维凌夜谈》。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王正德在《何维凌和〈手稿〉》一文中说，何维凌的被捕时间是5月29日。与包遵信的回忆在时间上有冲突。见《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序二。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见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50—151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383页。包遵信《与温元凯的一次夜谈》。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1日，第226—228页。

详见上书。

同上，6月1日，第235—236页。

《多余的话》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罹难前写的内心自白。其中谈到自己作为一个书生投身革命是“历史的误会”，尽管他此后还是被国民党处死，文革中的“革命群众”还是将其视为瞿秋白叛变革命的罪证。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九、部署清场：“民主之神”。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九、部署清场：“民主之神”。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封从德批注：“这是柴玲2011年的说法，此前未见其此说”。

包括对丈夫封从德也持这种说法。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第437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6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7页。

封从德批注，金培力这个朋友是“邝余莲花，旧金山华人，左派。网上资料：金山华裔社区人士邝余莲花，则在1989年六四前一周，曾让柴玲到公寓内接受电视访问。当时邝余莲花的先生孔军武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驻北京邮电部经理，他们住在丽都酒店。邝余莲花的朋友金培理（Philip J. Cunningham）为美国ABC电视台与英国BBC广播公司担任特约记者，约了柴玲

访问，地点就在邝余莲花夫妇的住所。邝余莲花当时对柴玲的印象是：口才很好，勇敢天真，对欧美民主制度很向往，但并不了解欧美经济帝国主义的真相。”

同上。

柴玲此处是在复述一个同学对李录的询问，以及李录的回答。但她强加给自己的“领袖+教父”的义务，使她把李录的经历当成了自己的经历。直到这话惹来麻烦，她才意识到要还事实本来面目。详见本卷 第十六章 第八节：一样“流血”，两种“期待”。 封从德注：本句问话与上一句问话不是同一记者，而是香港《天天日报》女记者梁淑英；《天安门》影片在本句与上一句话之间“减去八千字，录像中也相差四十分钟。”

卡玛、高富贵等《天安门》。明镜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5—177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8页。

柴玲一直没有说出此人的名字。在1991年巴黎《回顾与反思》座谈会上，她提到陶斯亮和“别人”。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中册 第四章 第二节：艰难的二次出发。

柴玲、王超华《纠察与“政变”》。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81—282页。

封从德《史实与史识的求索——增订手记》引文：“May 27、. . . she . . . began sounding out foreign friends who might help her flee the country.” see Michael Fathers and Andrew Higgins,

Tiananmen – the Rape of Peking. London: The Independent, 1989. p. 88.

参见《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第262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第435页。

香港《文汇报》5月29日急电。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98—100页。

见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2—133页。

引自《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18—119页。

参见《维基百科. 刘晓波》。

参见曹长青《撕裂的刘晓波》、《维基百科. 刘晓波》、刘晓峰、冰岛《“狂人” 刘晓波》。载《大学生》1989年第1期。

刘晓峰、冰岛《“狂人” 刘晓波》。载《大学生》1989年第1期。

同上。

参见《维基百科. 刘晓波》，刘晓峰、冰岛《“狂人” 刘晓波》。载《大学生》1989年第1期。

参见《维基百科. 刘晓波》。

金钟《文坛“黑马” 刘晓波》。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同上。

参见刘晓波《在地狱的入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载《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曹长青《撕裂的刘晓波》。

维基百科：刘晓波。

曹长青《撕裂的刘晓波》。详见刘晓波《悲剧英雄的悲剧——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一》、《完善制度还是塑造完美领袖——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二》、《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与程序——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三》。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万润南《我的 1989（6）刘晓波》。

指“四二七“大游行”。

万润南《我的 1989（6）刘晓波》。

参见柴玲《戒严之后》、封从德《人民发言人》。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26、294页。

梁二《师大、开希、刘晓波》。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294页。

邝岩《动乱“记者”戴晴》。原载《光明日报》。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14日，第2版。

王军涛《独立、民主、自由与进步——“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的回顾、反思与展望》。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22、128—129页。

包遵信《最后的努力：与何维凌夜谈》。载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92页。

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83页。

时任社经所所长。

王军涛《独立、民主、自由与进步——“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的回顾、反思与展望》。载陈子华《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22、128—129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侯德建因有片约在身，只绝食48小时。

现场录音，此处不清楚。

据陈小雅1989年6月2日现场录音整理。

《六.二绝食宣言》。载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19—22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1日，第164页。

同上，5月22日，第165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1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7日，第208—210页。

罗点点《流血的改革》。

中央宣传小组成立于5月20日详见本书下册 第三章 第四节 全民“截兵”。

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第四部分，第2591页。

在5月21 日胡绩伟委托四通公司代征集签名这份议案上签名的常委委员不足召开紧急会议的法定人数。但将5月17日以厉以宁、江平等24位， 同日卢嘉锡领衔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5月18 日在全总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同日张友渔等有相同内容的呼吁书上先后签名、同意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加在一起共有57人。构成了超过1/3的法定人数。四通公司代理人在将消息发送《文汇报》时，未对“在议案上签名者”与“先后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者”进行区别说明。在后来的清算中，此事被称为“四通公司侵权案”。

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日，第2版。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人大常委会会议能否如期召开？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言人就此问题发表谈话》，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3日，第1版。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人大常委李贵写信说根本没参加过“签名”》。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日，第2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02页。

同上，第142页。

新华社5月31日电《经公安部门批准 京郊三县农民职工集会游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1版。

新华社5月31日电《经公安部门批准 京郊三县农民职工集会游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1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九、部署清场：瞄上方励之。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30日，第216页。

同上，5月31日，第218页。

据北知联《新闻快讯》5月31日消息。

参见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8—139页；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0页。

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日，第1版。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记动乱暴乱期间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原载《山西日报》，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第2版。

参见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北大八名教授副教授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载《人民日报》5月31日，第1版；郑岩《新华门的见证》，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7日，第4版。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6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31日，第218页。

美国之音记者张楠、何宗安《专访鲍彤—享受社会救济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2009年。

香港《百姓》杂志记者。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

王正德在《何维凌和〈手稿〉》一文中说，何维凌的被捕时间是5月29日。与包遵信的回忆在时间上有冲突。此处采用包遵信的回忆时间。见《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序二。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白南生（1950—2010），江苏人。“文革”中曾“插队”内蒙，后回北京当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后成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组”骨干成员。“发展组”分支后，进入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继续从事农村问题研究。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指六四后陈云建议中顾委准予杜润生进行党员重新登记。

载白南生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对陈小雅的道歉及案情通报。在众多于交代中供出我名字或对我进行无端指控的人中，白南生是唯一一个进行了道歉的人。据他认为，之所以我没有被牵扯进去，大概与办案人员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姑娘”有关。

这些谣言说，戒严指挥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北京市委各有自己的逮捕名单。其中戒严指挥部关照的是学生领袖；安全部的目标是与外国人有

联系者；公安部的眼中钉是学运黑手；北京市的死敌则是“飞虎队”和工自联。

包遵信《我见到了黑名单》。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第121页。

同上，第129—130页。

李云、岳风、晓利、南士、黎珊等编著《癫狂的蛇年之夏——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99—200页。

同上。

同上，第201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2页。

同上，第143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7页。

同上，第144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九、部署清场：瞄上方励之。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22页。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4页。

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日第1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22—42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2日，第237页。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看望戒严部队 转达邓小平杨尚昆对部队的关怀和慰问》。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1版。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郭林祥 分别看望执行戒严任务官兵》。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3日，第1版。《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第1版。

《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第4版。

金乃凡网文《我和杨白冰（上）》。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首都群众关心戒严部队 热情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31日，第2版。

同上。

参见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 戒严部队已开始上哨》，载《人民日报》5月31日，第1版。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31日，第221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1日，第226、236页。

同上，第236、237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221页。

郭德华、何文亭、傅俊《“F75”在行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60页。

同上，第61页。

应是3人。

载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台湾风云时代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第514—515页。

崔维《圣殿轶事》、倪福田《守卫大会堂——一名军官的手记》。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6、65页。

《北京抓获反革命暴乱暴徒四百多人 “高自联” “工自联”有些头目也被缉拿归案》，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中央电视台发布新闻 借用完毕的一辆武警吉普车返回部队途中发生重大车祸三人死亡一人受伤》。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3日第1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十、“六四”惨案：山雨欲来。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见《大事记》6月3日—4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76页。另据官网介绍，该公司是北京市建委下属公司，成立于1980年9月；1992年11月，组建企业集团，更名为“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公司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同时涉及建材生产及配套供应、建筑设计等业务，是房地产开发国家一级资质大型企业。截止到2003年末，该公司拥有职工5900人（其中长期合同职工3636人，短期合同职工1154人，其他人员1118人）。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一）》89年6月8日。

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2—123页。据杨继绳记载，该车被阻位置是

“西单十字路口往东50米路南）。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23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十、“六四”惨案：山雨欲来。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此处武器装备数量依据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0、142—143页。但陈友所记载的数量是“100支冲锋枪、一挺机枪和4支手枪、3万多发子弹”。见《大智大勇 舍死忘生——首都公安干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31日。陈小雅录音整理《27 军某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和“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23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插图说明）。1990年4月版。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06页。

韩景童《军火被截时刻》。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4页。

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9页。

韩景童《军火被截时刻》。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6—37页。

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30页。

详见本章下一节。

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31页。

同上，第134页。

同上，第135页。

陈友《大智大勇 舍死忘生——首都公安干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31日。

参见王小京《六月三日，在西单路口》；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第82—83、135、141—142页；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

李录《指挥部的情报与对策》。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5—306页。

李鹏6月3日《“六四”日记》说，这些车辆被阻时间约在7：00左右。实际上更早。参见李胜堂《六部口救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47页。

李胜堂《六部口救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47页。

同上，第148页。

部分资料记载为2：30左右。

关于整个事件所花时间有不同记载。此处采用李胜堂《六部口救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0—153页。但陈友《大智大勇 舍死忘生——首都公安干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记载“打了一个多小时的拉锯战”。该文对武警和公安干警遭受的袭击描述严重，与其他各种资料不相符。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31日。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二）》89年6月9日。

该文记载：“队伍从中南海西门行至距六部口百米处时，汽水瓶、石块，雨点般向他们投来。……46名防暴队员个个义愤填膺，迅速成扇面列阵，呐喊着迎面冲上去。刹那间，人群被驱赶到东、西、南三个路口以外”。陈友《大智大勇 舍死忘生——首都公安干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31日。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4日，第243页；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1页；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09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4页。

同上，第425—426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1页

关于本车弹药转移路线，吴稼祥与《中国“六四”真相》的说法不同。参见吴稼祥《真相在文件背后》，载《浴火凤凰》。

参见丹丁《西单路口：军火！军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34页。

各种资料对这批军人的数字记载不同。

吴稼祥《真相在文件背后》。载《浴火凤凰》。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二）》89年6月9日。

陈小雅《张健访谈录》，2015年8月8日——12月5日（笔谈）。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8页。

原作记为“6月2日”。但6月2日大会堂周围没有发生类似事件，笔者疑为应是6月3日。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1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39页。

黄小平《“虎穴”历险记》。同上，第42页。

张同锁等《清理“高自联”指挥部》。同上，第220—225页。

就在中央电视台发布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紧急通告》的同时。

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4日记为郑鲁兵。见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版。

详见本书第六章 第六节：待揭示的真相。

据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张华杰说，公安局开始时不愿接收枪支，后来在同学们义正词严的再三要求下，终于收了，并开了收据，列了清单，盖上了

“北京市公安局”的大红图章。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05页。

陈小雅《张健访谈录》，2015年8月8日——9月5日（笔谈）。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册，第909页。马少方《历史鞭打现实》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第102页；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第532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册，第909页。但香港《文汇报》记者记载军人撤出时间为“傍晚6：00多”，见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二）》89年6月9日。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12-913页。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30、31日、6月1日、6月3日，第216、218、226、236、239页。

参见刘凤君《突击抢制炊事车篷布》，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3页；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26页。

参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20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1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

（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第8卷156300字

八九 民运史

第九卷 六月腥风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十八章 收网

第一节 军队强行开进

第二节 集结——军事博物馆

第三节 木樨地

第四节 复兴门

第五节 民族文化宫

第六节 西单

第七节 保护与牺牲

第八节 建国门

第十九章 清场

第一节 民主大学

第二节 死亡信息冲击广场

第三节 巨兽的末路

第四节 不撤的理由？

第五节 38军进入广场

第六节 最后的纪念碑

第七节 被放弃的“逮捕行动”

第八节 南池子

第九节 六部口血案

注释

冯胜平分析道，导致邓小平动用军队的原因，是恐惧和误判。他写道：“任何人处于邓的地位，看到满街‘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失控的人大、异动的军人，加上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恐惧，过度反应恐怕也是唯一的正常反应。”作为个人，作为一个对周围事物感知日益失真和控制能力越来越弱的老人和病人，这几乎是正常的。但此时的邓小平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他仍是这个国家仅次于“独裁者”的首脑。国家事务和人民要求他明智和清醒。而在这个国家，能够克服这种个人局限的，只有“科学决策”的机制。不幸的是，此时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人治”国家。

第十八章 收网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章立凡、胡平、封从德、王鹏令、梁海琼）

第一节 军队强行开进

据戒严部队当事人回忆，至少在5月31日，各部队已经收到来自戒严指挥部的“清场预案”，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对之进行了“修改完善”。但是，对于6月3日的“紧急开进”命令，似乎都有些“突然”的感觉。

“提前清场”的决定作出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同时命令，各部队要与地方政府、公安民警、武警部队密切协同，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

据38军少将政委王福义回忆，由于军长徐勤先被拘禁，6月3日下午4：00，前往北京军区领受开进命令的是副军长张美远。5：00过后，接到命令的张美远为了争取时间，从军区给38集团军打回电话：

“（军区命令）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往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10：00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成4路纵队乘车东进。据此，张副军长提出将整个集团军密集收缩在1公里之内，人车集中，首尾相顾，形成铁拳。”

据38军史料，自胡耀邦逝世以来，该军已三次奉命进京“执勤”。第一次是4月22日，任务是保障胡耀邦追悼会和灵车安全，执勤人数近9000人，调动车辆409台；第二次是“四二六”社论以后，任务是警卫人民大会堂和组成“制止动乱预备队”，人数5100人，调动汽车234台，自4月27日到5月5日，渐次进入西长安街一带各部队大院；第三次是执行“戒严令”。

5月19日，该军奉“戒严令”出动的部队有112、113师，坦克六师、炮兵旅、高炮团、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计15099人、851台汽车、213辆装甲车、33辆坦克车，外加坦克抢救牵引车。实际上是在前两次进京部队中追加了113师和112师的336团，并增加了装甲、坦克车的比重。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少看到112师在执行“戒严令”开进过程中的故事，而这支以逸待劳的军队，在未来的清场开进过程中，被用在了“刀锋”上。

到6月3日接到“清场”令时，除在南苑东高地的112师装甲车队和因“大井事件”转移到丰台西仓库的113师外，38军的指挥所、112师、炮兵旅、高炮团和通信团等将近7000人，早已进入复兴路（从公主坟—翠微路—万寿路到五棵松）一带，集结于总参、总后、301医院等军队大院。在接到北京军区的开进命令后，38集团军首长制定了具体的开进方案：

“以A、B两个步兵师一家两路，齐头并进，坦克、炮兵旅和工兵团随后跟进。整个车队先头设600人左右的防暴队、排障队开路，两侧由各自的防暴队护车，人车相互掩护前进。整个战术以集团密集队形，对付人海战术；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木棍等的攻击，以强大的威势对付反革命气焰。”

据王福义透露，在政治思想工作依据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编队方法，出于一种激励的意图：

“我们这个部队有自己的传统作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荣誉感很强，内部比劲也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军主攻天津，就是以这两个师并肩突击，很快打进城去。这次又这么做，两个师势必争先恐后……”

图9-1：6月3日，香港专上学联学生拍摄的38军装甲车

也许是为了减轻“西路一梯队”——38军的开进压力，在东路的39军和40军、南路的15军、20军似乎在更早的时间已经接到开进命令。据当事人回忆，6月3日下午4：45，沈阳军区的40军118、119师在少将军长吴家民的率领下，已经从首都机场出发，由东北向西南，沿京顺路—机场路—太阳宫—三元桥，向东直门开进。就在38军准备方案、进行动员期间，5：30左右，40军已有50辆运兵卡车在东直门被拦截。

5：00整，驻扎在南苑机场的广州军区空15军两个旅，在大校副军长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的带领下，从南苑路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开进。

与此同时，驻扎在北京南郊大兴的济南军区20军58、60师，在军长梁光烈的带领下，向前门箭楼开进。

当晚6：00，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

“当前北京的事态发展已十分严峻。极少数暴徒大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公然诬蔑、围攻、殴打和绑架解放军战士、抢夺军火武器，围攻中南海，冲击人民大会堂，并企图纠集各种势力，随时可能制造严重的暴乱。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为此，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者，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据杨继绳日记，北京电视台反复广播了这个《紧急通告》。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没有听到，还是因为对通告所预言的事情不相信，或者仅仅是因为当天是周末，“晚饭后，上街的人比过去更多，满街都是人。”“西长安街

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很多人骂政府。”据他判断，这是“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的缘故，“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

晚7：00，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再次播发了《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 紧急通告》。

7：55，此前已经从北京东郊出发的沈阳军区39军由大校师长张作礼带领的115师的70辆军用卡车，被阻于建国门立交桥到建国门外大街一线。

与此同时，已进入人民大会堂的27军对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官兵们被告知，按照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后面部队将在晚9：00开始强行开进。

晚8：00，北京军区38军的指挥车队开始上路。据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的高新后来采集的信息，该军担任“主攻任务”的一个团，战前动员的场面十分“火爆”：

“可能是因为在军队自己的大院里，围观者反正也都是自己人或自己人的家属的缘故，这支部队在进行‘战前动员’时对‘人民子弟兵’的形象已经毫无顾忌。士兵们持枪列队，军官高声喝问：‘敢不敢打？’‘敢打！’……‘怎么打？’‘往死里打！’于是，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高呼着‘38，万岁！38，万岁！’的口号，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后大院。第一辆车开出大门，车上的一个士兵就已按捺不住‘阶级仇恨’的怒火，扣动冲锋枪扳机，横扫了一个‘扇面’。顿时，大门口左侧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弹，应声倒地。”

“镇压伊始，第一个倒在‘最可爱的人’枪口下的竟也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王福义没有记载这样的场面，他只写道：

“集团军指挥所的车队上路，驻地的官兵、群众目送我们，表情十分严肃。有什么想法却说不出，只是默默地挥手为我们送行。”

据高新说，在这批军车里，有的装了很多碎砖头。这个信息，与集团军“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的对策是相符的。

据王福义回忆：

“一上大街，我看到街两旁已经围着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我们的车到达公主坟转盘东口时，数以万计的人群涌上公路和林荫道，向我们围上来。有的举着铁棍、铁管，站在公路中间拦击；有的挥动拳头朝车队狂喊：‘当兵的，滚回去！’我们军指挥所十几辆车孤零零摆在中间，处境十分危险。”

由于指挥车队出发太早，该军的主力112、113两个步兵师尚未赶到。没有侧翼保护的车队遭到了四面雨点般飞来砖石的袭击……

据“国际特赦”的一个消息来源说，围堵群众与部队的冲突就开始在这里：

“冲突始于木樨地以西的公主坟。军队向东推进时对人们使用了电棒。当一位年轻妇女被打后，一位青年对士兵讲，不应殴打妇女。但他遭到一阵痛打。当时士兵还没对人开枪，仅对地面开枪，而且人们也以为使用的是空心弹。所以，当部队向东推进到木樨地时，人们的胆子很大。……”

就在38军出发之时，武警部队也接到北京军区命令：当晚8：00到军区“领受任务”。当50名“戴头盔、盾牌、电警棍，又装了1000发催泪弹”的防暴警察到达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室时，众多的二星、三星将军已经云集此地。

“宽大的军用地图上若干个三角形红色箭头，从东线、西线、南线、北线直插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盘踞的天安门广场。”

军区政委刘振华当着众将军的面，亲自对这支防暴队进行了动员：

“同志们，目前，首都从学潮引起的动乱已经发展成暴乱。他们烧军车，抢军火，伤害解放军战士，性质已经变了。”

“现在搞打、砸、抢、烧、杀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群众，而是反革命暴徒。我们要开进天安门，清理天安门广场，要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国家政权，保卫首都北京！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大部队把路打开。”

接着，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说：

“没人阻拦要进，有人阻拦也要进！军区首长直接指挥你们，今天一定要开进天安门广场。”

根据“平暴”后，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武警总队5支队8中队中队长姜超成的“事迹”，我们可知，这支防暴队在1989年6月3日晚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护送‘前指’到达军事博物馆”。其开进路线是：北京军区大院—玉泉路—永定路—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坟—军博，到达的时间是10：20。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载，晚8：40左右，有直升飞机在北京市上空“低空盘旋”。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记载，大约在晚9：00左右，一支大约有“700多人、全副武装的军人”，佩戴“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急速地从和平门向北方向跑去”。约近百名市民一见军队便上前拦截。“这些军人一见有人上前，举起枪托照头砸去，30多个市民瞬即被砸到头破血流，不少人不支倒地。其它人见到这批军人如此凶残，马上跑开躲避。这支队伍一直跑步进入中南海西门。”

晚9：10，由50名防暴警察开道的北京军区指挥车队，在军区首长的直接率领下，从西山出发。不料，车队刚出大院，当头的一辆车就熄了火，而且再也发不动了。军区首长立即命令把这辆车推到路边。50人的防暴队只剩下27人！

据当时在三公里外甘家口商场旁一座15层楼上观察的王晓明回忆：“晚9：00，我看到……公主坟环形交叉口处起火。隔了十几分钟，又起了一堆火。”据解放军某部侦察班长王山回忆，这两堆火燃烧的是“三辆军车”。准确位

置是翠微路口东100米处，紧靠公主坟环岛的地方。根据其起火时间，估计是38军各部队开进过程中沿路遗弃的报废车辆。

据武警部队中校副政委李林回忆，9：55，北京军区指挥车队在解放军总医院 所在的五棵松路口遇到了第一个障碍：

“几十辆车横在路上，被当作路障。……几十名解放军战士欲将车向北推开，而一伙暴徒在另一头将车死死顶住。双方哎呀哎呀叫喊着僵持不下，车的后面还有黑压压的万把来人，嗷嗷地起哄。见此情景，防暴队中队长带领着6个队员急速准备将暴徒驱散。谁知刚一下车，石头、砖头、啤酒瓶雨点般地向车飞来……把我们指挥车、大轿车上的玻璃顿时砸得粉碎。司机王永刚、防暴队员咸国坤被砸得满面流血……”

据他描述，这时，练就了一副“铁头、铁肩、铁腿”的27名防暴队员，突然张开“铁嗓子”一齐大喊：

“冲啊——！”

这一吼声，使毫无心理准备的围堵群众吓得落荒而逃。

笔者的朋友，时任《海南纪实》编辑的蒋子丹家居玉泉路一带的亲戚，当晚见到五棵松坦克装甲车开过的路段，一具被压扁、血肉和衣着均被履带带走，只剩下一个身影的人形。据丁子霖描述，遗体可辨认的部分，只有几颗牙齿。事后，另一位目击者汤学平向笔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6月3日晚上，我在五棵松路口……当时我站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当时的路没有那么宽，也没有立交桥。装甲车从南边过来，往东拐弯。因为当时车队是一段一段的过的，这一队过去了，后面的没上来，在这个间歇中，路边扔砖头的人，又到路中间去把碎砖头拣回来。这个小孩在路南。大概就在现在五棵松地铁站两个出口之间这个位置，距离马路崖子就一条腿这么远，

是往回跑的时候，没跑了……压得什么都没了，都成肉酱了。……这条路上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我家一直住在这儿附近，我知道。”

据汤学平描述，原本，他抱着还没满月的孩子站在路边看热闹，事发时他居然越过有一人多高的铁丝网，跳到了工地里面。天亮后，他又故地重游，怎么也不相信自己能抱着孩子越过这么高的障碍！

当晚，笔者的大学同学，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唐德阳，在翠微路附近回家途中被子弹射穿肺部。

第二节 集结——军事博物馆

在38军集结地，晚9：00刚过，一支由北京军区齐连运副司令、陈培民副政委、刘存康副主任组成的督战指挥组，已经先于军区“前指”赶到。此前，38军112步兵师和工兵团、坦克师、高炮团已陆续到达了预定位置。但直到9：20，远在丰台西仓库、在“大井事件”中牺牲惨重的113师和炮兵旅，方才在军事博物馆东面的道路上完成了集结。

9：30，这支1928年随彭德怀平江起义，历经保卫井冈山、两占遵义城、激战直罗镇、大战平型关、辽西会战，天津攻坚、抗美援朝等战役——此刻军长已经被逮捕——的军队，正式从记录了他们光荣历史的军事博物馆出发，向国家的核心——天安门——进军。比预定提前了半小时。

但是，戒严指挥部预案中拟定的——为戒严部队开道的——“工人纠察队”没有出现。事后，曾在建设工程兵服役的汤学平告诉笔者，李锡铭之所以那么有底气，担保工人纠察队没问题，原来他手里有两个大的集团，一个是建设工程兵成建制转业的“城建集团”，一个是铁道兵转过来的“中铁集团”，他们都还是军事化管理，连营房都和部队一样。6月3日那天他们都发了大棒或工地上的钢筋铁条，人手一个。让待命，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两支部队的转业，都是邓小平向美国承诺的“大裁军”的产物，1989年正处在整改之中。如果能为“清场”所用，除去文员，能投入的兵力大约在三万左右。足够对付广场数千学生，也不必与市民发生对抗。问题在于，80年代的大裁军善后不良，客观上为邓杨制造了一批离心力量。在高层，“江泽民接班”的安排，直接破灭了北京市委“接班”的前景。策划人的可能存在的消极、转业基层官兵的不满，使我们得以意会：八九民运中规模最弘大，令举世震惊的“反戒严”运动，为何会突然跑出来那么多“行家里手”？令现役军人牺牲惨重，而事后只抓到十几个劳改释放犯或流窜犯？其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关键时刻“工人纠察队”的不可信任，这就把部队推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手拿现代化热兵器的军人，必须直接面对群众！

38军只好由防暴队和排障队开道，成四路纵队前进。

此时，在军事博物馆东面的北蜂窝一带，群众组成了一道人墙，试图阻拦出发的部队前进：

“站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学、北京农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开枪之前，武警用砖头、带有金属扣的皮带以及足有一米长可能有钉子的棍棒殴打群众。伤员一个接一个的被自行车和三轮车运往复兴医院。所有伤员头部都有伤，大部分伤员的眼睛在流血。鲜血从他们的前臂流过，从肘部淌下……”

部队行进到北蜂窝丁字路口时停止前进，对峙双方相隔约30米。高新写道：

“部队方面暴露在最前面的全是徒步行进的士兵和军官，士兵手中全部是可以发射连发的自动武器。前面两排半蹲半跪，后面几排站立，枪口直对市民队伍。”

“这是血幕正式拉开前的最后一场没有激烈冲突的对峙……一些学生和医生找到一些打湿了的口罩和毛巾发给大家。”

“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批‘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朝人民开枪，所以，都在相互交流如何对付催泪瓦斯。”

北蜂窝的民众尚不知道，此时，一支决定命运的队伍正从西面开来。10：00整，仍在甘家口15层高楼上观察的王晓明看到：

“从公主坟环形交叉口处响起爆炸声。声音间断，比机枪声音响亮。紧接着，从公主坟环形交叉口到军事博物馆前腾起了一串烟雾（后来知道是军人在放催泪弹）。”

北京军区的指挥车队到了。

此前，38军副军长张美远就接到命令，到军事博物馆参加“前指”会议。而跟随38军指挥车队督战的军区首长害怕“督战不利”，表现出万分焦急。其中陈副政委命令王福义赶快想办法“排除路障，保障主力和车辆顺利通过。”王福义和各部领导交换意见后，迅速坚定了“行动决心”。

当部队向人群释放催泪弹时，在路障周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退到路障后面的人群，点燃了路障上覆盖的易燃物，形成第一道火墙。

此时，阵前指挥官王福义已来到最前线。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火海”：街边的隔离墩都横在了马路中间，“水泥杆、铁栅栏也乱七八糟地铺了一地”。“人群在火障后面，挥舞着钢筋、木棒”，从两侧的林荫道扔出的是砖石、瓶子和水泥块……

在先头部队“身后车队的上空”，传来了“坚决制止动乱”，“动乱不平，决不收兵”等震耳欲聋的口号，以及“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等集团军军歌。与这股造势的声浪同时，各师防暴队用石块奋力还击。

趁围堵群众被打退的间隙，38军排障队员抬开烧得滚烫的隔离墩……

群众的北蜂窝防线失守。据目击者李纪婉回忆，此时：

“军队已经到达木樨地桥西，街上已满布黑压压的装甲车、坦克、军车在马路中央，而军车两侧是横向站立、各自面向路南路北手持步枪的士兵。装甲车前，则是一个面朝东方的武装士兵的方阵，这个方阵不同于两侧士兵的是：除了乌黑的钢盔、瞄向前方的枪刺外，那个方阵的首排，人手一支大棒。与那一排大棒相距很近，在‘楚河汉界’之间，是一名手握一杆红旗、头缠一条红带的学子。红旗之后，便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两阵相逢，使学生和市民狂退几步的，便是那杀气腾腾的军人手中的大棒。不断有受伤的学生被市民们准备的平板车拉走。”

“我听到响彻夜空的怒吼声：‘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人民愤怒了，北京沸腾了！在进进退退的与大棒进行的拉锯点中，人们喊着、喝着，愤慨地甩出手中的饮料瓶，挖出木樨地马路两旁便道上的九格方砖，砸向坦克……”

据此时仍甘家口高层建筑上观察的王晓明记载：10：10以后，这一带“枪声越来越密，后来枪声像下雨一样。”

军队终于又前进了。但依然是一步步、一米米，十分缓慢地移动。从军事博物馆东到木樨地桥西，不到1公里的路程，这支机械化部队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

第三节 木樨地

但不久，情况就发生逆转。

据高新在当地目击者中采集到的信息，市民与军队的“对峙持续到11：00正”。打破这一对峙的力量，他估计，“大概是这支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枪声突然响了。上万名市民愣神过后马上意识到事情严重，潮水般退到木樨地大桥一带。”

几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目睹了这个变化过程：

“6月3日晚上10：00，我们15名北京航空学院的宣传队员来到木樨地。我们看到平民中有些学生在那里帮着维持秩序。100多米外站着部队，前10排的士兵持有半自动步枪和电棒。两边也有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军用卡车在中间。”

“在我们到达前，学生和士兵已在互扔石块。大约晚上10：20，士兵那边突然起火。几辆军用卡车着了起来。平民一片欢呼。这时，两侧的士兵开始向前移动。中间的‘士兵’不停地向我们扔石块。学生们则迎着士兵前进，试图阻挡士兵的前进。”

“突然，我的膝盖和身上其它三个部位被士兵扔过来的石块击中。北京大学的李平上前走到士兵和平民之间的空地上准备与士兵对话，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他。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倒下了。当我和其他两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往回抬时，又是一排子弹打来，打中了我们当中一人的前臂。我们把伤员抬到复兴医院。由于李平被击中头部，而且大量出血，很快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学生们愤怒极了。” 据一位当时刚刚到达木樨地的“外国新闻采访组”成员回忆：

“6月3日晚11：00，我和采访组其他成员一起乘小轿车离开了天安门广场，沿二环路向西行驶。一路上，人群对我们高喊‘他们开枪了’。当车开往木樨地时，我们听到了自动武器的持续枪声。在木樨地路口，出现了一些救护车，我们紧随着一辆救护车到达了复兴医院。平均每分钟都有自行车或三轮车送来一位伤员。……”

当时，复兴医院的主楼正在施工，进入急诊室必须经过一个二、三十米长的夹道，夹道只有一米多宽。仅仅十几分钟内“成百上千的伤员和救护者”涌过这条夹道，伤员的血与护送者的脚印，将这条通道弄得“泥泞不堪”。在急诊室里横七竖八的全是伤者和死者。

据家住木樨地北里的王庆元回忆：

“由于伤者太多，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更为严重的是血库的血浆很快告罄，很多伤员就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中年男子体壮如牛，工人模样，左臂有一枪伤，仅一筷子大的小洞，血流如注，但其面无惧色，任其流淌一地，经过者无不惊呼，促其尽快止血。他一脸豪气的说：‘没事儿，这仇迟早要报’。大约仅半个钟头，我再次经过这里时，看见过道边伏尸一具，仔细端详确已没气，左臂上如筷子大小的洞还在，此人正是刚才那位一脸豪气的男子。”

图9-2：复兴医院

据两位趴在复兴医院前草地上的医科毕业生观察，11：20，装甲车和坦克集群已经冲过木樨地桥。他们“能听出班用机枪、冲锋枪的散布射，79阻击步枪的点射”。

部队是否在11：00前“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真相仍需等待档案解密。但我们已知：这个时间，恰好是前往军事博物馆开会的38军副军长张美远回到部队的时间。

另外，沈阳军区40军少将军长吴家民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个估计。此时，他的军队正被阻隔于北京城东北角的三元桥和东直门一带：

“6月3日23：10，有个穿便衣的人说什么也要见我，说有重要指示传达。我见了，他掏出工作证，是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来传达上级首长指示，命令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果断处置。”

“他刚传达完，军区前指也来指示，通报了万寿路 戒严部队鸣枪示警驱散人群，迅速开进的情况。”

“这使我意识到事态已相当严重，显然不对空鸣枪部队很难突围开进。于是我们决定：第一，坚决执行上级首长命令，采取对空鸣枪驱散围阻人群的坚决措施，组织部队突围，保证在4日4：00前全部到位；第二使用已到达指定位置的部队，担负接应主要被围部队的任务；……第四，对空鸣枪前要首先使用宣传车进行宣传……同时我还专门指示先头团，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不能撤，撤就是犯政治错误……天亮前一定要到达东直门和东四十条立交桥；对空鸣枪时要注意一定不能误伤自己和群众。”

另有记载，关于鸣枪的问题，吴军长的话是这样说的：

“我活了50多年，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军事行动。军令如山，不过，弟兄们，我求求你们，进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把你们的枪口抬高一寸。”

这两段文字，都明白无误地证实，在那个时间段，上级确实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了“可以开枪”的暗示。由此，我们得以区分高新和王晓明记载开枪时间之差异的原因。那就是，在正式对人群开枪之前，军队曾有过一个“鸣枪示警”的阶段。王晓明在远处听到的更早的枪声，是“示警”的枪声，而高新采访的是在开枪现场者的描述——虽同样是枪声，但意义完全不同。

更多人并不知道，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发生的意外，许多部队中的相当一部分士兵，持有的枪械中并无子弹。供给他们的“枪支弹药钢盔器材”，有的尚在路上，有的已经在群众的围堵中被遗弃、被截持或被销毁。而有证据显示，此时，应是38军某部的枪弹汇合的时间。

这时部队的前进加速，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完成护送北京军区“前指”任务的武警防暴队，又“自告奋勇”承担起“为戒严部队进军天安门广场实施正面开道的任务”。

李林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武警防暴队介入木樨地战斗的时间。他写道：

“10：55，我们到达军事博物馆路口，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已经在这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拉锯的中心地带，是两大排公共汽车。前后交错，像茬砖缝一样堵在路当间。公共汽车的这一面是执行戒严任务的先头部队，另一面有上千名拿着木棒、石块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解放军战士绕过公共汽车，刚一露头，暴徒们劈头就是一闷棍，有的战士被打得满脸是血，有的战士当场昏死过去。”

另一位“共和国卫士”——武警总队司令部内卫处副处长、少校王志强的“事迹”，则为我们提供了这支武警防暴队在“正面开道”进程中的作用：

“在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平息反革命暴乱战斗中，他奉命组织武警防暴队为戒严部队主力开进天安门广场强行开路，带领防暴队勇猛冲击，用催泪弹、电警棍和石块与暴徒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一面指挥防暴队战斗，一面及时协调与解放军先头部队的配合，根据情况及时调整队形、战术及进攻节奏，使突击频频奏效。”

尽管事后38军的回忆文章没有一篇提到他们是否在此击毙“暴徒”；尽管他们反复渲染的是各级军队的忍耐和军人的荣誉感不能容忍的屈辱；尽管他们不断地把暴徒和市民的撤退归之于宣传车反复播送的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和排山倒海的“严惩暴徒”呼声的气势……但是，从此时开始，人们不断地看见有人中枪，和因中枪被抬下来的伤者和死者。

一些目击者事后回忆：

——“大约夜里11：20，部队开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扫射。我身旁的一位妇女中弹后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鲜血从弹孔里喷出，可能她已经死了。”

——“当我们（从复兴医院）回到木樨地时，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几米。士兵们对着学生和平民不停地射击。……我们得到在复兴医院死去的19个平民的姓名。”

——“大约在午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走到距离路障约100米处，士兵正在胡乱开枪。死尸和伤员横在街上……我在地上发现了两种武器的弹壳：AK_47型和58口径机枪。”

——“截止6月4日凌晨2：45，光是复兴医院就有26人死亡……一些身着白大褂带有红十字号的救护人员也被打伤，并送到复兴医院。”

《解放军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李靖记下了这样的情节：

“从军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队走了两个多钟头，受伤的战士不断增加，部队又这样迟迟不能按计划开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战士们被迫朝天鸣枪示警。然而，少数暴徒仍然十分猖獗，他们将几辆电车和军车推到木樨地桥头，放火点燃。面对这些肆虐的暴徒，破坏国家财产的现行罪犯，……战士们开枪击毙了少数暴徒。同时冲上前去冒着被打伤烧伤的危险，扑打被点燃的汽车……”

李靖的记载，是承认军人对人开枪的唯一文字。但他说“汽车火墙”形成于部队朝人开枪之前，却与前述武警副政委李林的记述及民间的记载不符。支持的记载只有这一条：

据王福义回忆：

“在木樨地路口，暴徒们用公共汽车、卡车、电车等交叉横排着三道车障。见部队过来，迅速浇上汽油，将车点着。霎时浓烟翻滚，火焰窜起来几丈高，车体被烧得毕剥作响，油箱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但是，一位从6月3日晚9：00开始，就陆续跟踪木樨地一带战事的轻工业学院学生，记载了“先开枪后烧车”的过程：

“部队的第一阵枪有可能是朝空中打的，因为似乎没有人倒下来。后来枪声大作，持续不停，人们纷纷逃命，我也顾不上再环视四周，只是夺路而逃……人群中有人喊，叫大家镇静，不要慌乱。快要退到木樨地大桥了，由于桥上横着车辆形成的路障，大批的人群几乎是挤在、停在那里了，后面的军队步步逼近，幸好桥西侧有一条沿着河往北的岔道，一部分人开始上这条路往北跑，我也在其中。当时我觉得军队的目的地是东方的天安门广场，不会朝北边追来，所以往北跑了没多远就停下来观看。木樨地大桥西侧的人群不多了，一部分人挤过了桥，很多人没过桥就往北跑了。又看到有人开始点燃桥上的车辆，不一会就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这一见证与李林的记载是吻合的。正因为部队对人开枪，发生在“汽车火墙”形成之前，听到枪声的围观者，在慌不择路地钻过汽车夹缝时，才可能发生踩踏事故。而武警指挥员李林目击和描述的“汽车墙”，恰是汽车尚未被点燃，但开枪的事情已经发生后的情景。

“很快，部队开到了桥西边，人停住了，枪声也听不见了。桥东边，居然有很多不顾危险的群众聚集在那里。火光里又见一些头戴钢盔，手持大棒，但是没有枪的士兵上了桥，群众见状，立刻将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石块雨点般的倾泻过去，军人被击退了。桥边及周围的人们自发地有节奏地喊着‘土匪，土匪’，‘法西斯，法西斯’。看来这些激怒了当兵的，不一会又枪声大作，群众撤退了，端枪的士兵冲上了大桥，冲过了大桥。又见坦克车，装甲车轰隆隆地上了桥，轻易地将桥上的车，路障推开，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跟在车后，潮水般地，势不可挡地跨过大桥向东推进。”

这位学生没有描述军队是如何克服“汽车火墙”的。王福义的回忆为我们保留了这个过程：

“……车体被烧得毕剥作响，油箱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防暴队员们奋不顾身冲过火障，反击暴徒，掩护排障队推车。……A师参谋长冯兆举，砸开前面一辆车上的窗玻璃，爬进车去，摘开车档，把着方向盘，大家喊着号子，

拼命把车推到路边。在推另一辆公共汽车时，一位小战士机智地冲上前去，伸手把油箱盖打开，防止了爆炸……”

那位轻工业学院的学生在远处看到的“头戴钢盔，手持大棒，但是没有枪的士兵”，则是李林所属的武警防暴部队。据李林回忆：

“……突然，从公共汽车上跳下了数十条黑影。”

“这些黑影落地后几乎听不到声音，20多个盾牌刷刷刷很快组成一个半圆形，看不到人的身体的任何部分……”

“骚动的人群炸了锅，喊叫着跳着退出十多米开外，而后又收住脚步，回头屏气观望。他们虽然从电影上看过坦克、装甲车，可从来没见过这半圆形发光体。”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进口武器，不过是我们防暴中队平时所自编自练的警棍盾牌术的一种队形。”

又一个讽刺！这支部队，是两年前为防止经济改革（特别是物价改革）出现困难，对付可能出现的群众性风潮，经公安部报请赵紫阳批准建立的武警防暴队。没想到第一次亮剑，却用在了赵紫阳坚决反对的军事镇压上。这是一种“把警棍和盾牌同训练有素的战士结合在一起，闪、站、腾、挪、扑、打、戳、撇，发挥群体的合力”的武艺。李林自豪地写道：“就在人群还在发愣的当口。这半圆形的队形，瞬间化为3个三角形，犹如三把尖刀插入暴徒中间。顿时阵阵催泪瓦斯的烟雾冲天而起，阻止军队开进的暴徒又惊恐地后退十几米。”

防暴队的突进，掩护了刚刚开到的排障车迅速推开了“汽车火墙”。此前，38军工兵团的排障队在排障过程中前进十分艰难。重型装载机排空一段路面，人们很快在它的后方又重新设置障碍，忙得笨重的大家伙团团转。很快，装载机驾驶员又被打破了头。直到大部队紧紧跟上，在防暴队的密切配

合下，才有轻工学院那位学生看到的，军队“潮水般不可阻挡地”通过木樨地桥的景像。

但是，紧接着，他看到了“收尸车”：

“木樨地丁字路口的东北地区是当时国家机械委，中科院总部等所在地。我在国家机械委大楼前看到一辆车身是橘黄与黑色条纹相间的吉普车，车的后厢板打开着，一个被枪打中的人头朝外躺在车厢里，里面还有几个人，都一动不动，不知死活，这个车要去复兴医院。一会儿，一辆平板三轮车从路口疾驶而来，车上躺着两个人，毫无动静，看样子也奔了复兴医院。这时，一个男青年过来跟我说，他的头被什么击中了，很疼，让我查看一下，我看不到血迹，他就说可能是橡胶子弹打的。”

图9-3：木樨地周边道路示意图（陈小雅标注）

学生锺罗白的回忆，佐证了轻工业学院学生的记述：

“当我们来到玉渊潭路与长安街 的交汇处木樨地时，就见到数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学生，也有市民，许多人眼里涌出悲愤的泪水。当我们停放自行车时，不知是谁高喊一声：‘冲啊’，数千人竟然旋风潮水般，突然涌向长安街。‘呼呼……’短促的枪声，使人们停下来，纷纷卧倒在地。”

“我们尾随着人群，也卧倒了，当我的手伏在地上时，觉得粘粘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滩血，我衬衫的下摆被染成红色。这时，枪声停了下来，我和叶傅连忙将这滩血拍照下来，周围的人见我们拍照，连忙指给我们其他血迹，我们又拍了几张，最后无法再拍了，因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滩血，有的血很厚。有幽暗的路灯下，可以看到黑色的柏油路上，布满了人们踏了血迹而留下的暗红色的脚印。”

“这时人群渐渐疏散开来，我和叶傅逐渐靠近在长安街上缓缓行进的军车，长长的一列，迤迤前行，有装甲车、坦克，也有军用吉普。人群尾随的

那辆，是军用大卡车，盖着绿色的帆布，十几个解放军端着半自动步枪，或站或蹲在车上，枪口对着距他们仅十多米的人们。”

“快到工会大楼时，尾随的人群渐渐达到三四百人，他们开始呼喊口号：‘不准伤害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口号声越来越大，人群不自觉地涌向军车，当前面的人距军车有七八米远时，一个解放军战士端起了枪，向人们的脚下射击，子弹打在马路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迸出一串串火星，后面的人开始卧倒，前面的人，则由于打在马路上的子弹反弹起来，打在他们的腿上或脚上，纷纷扑倒。人们纷纷将他们扶上自行车或平板车，送往医院。”

“惊魂不定的人们，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口号：‘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开始重新卧倒，又重新救护倒下的受伤者，后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每行进10米，需要5分钟，这5分钟内，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

此时，从天安门广场，经和平门急救中心—宣武门—复兴门一路目睹了各部队受阻情况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也来到了木樨地：

“到了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枪声密集，人声如潮。离路口100米，再也无法前进了。我在路北25号楼旁边站定。想看个究竟。我估计要开枪也是向东开，子弹不会打到北边的胡同里。突然，子弹的呼啸声从耳边响过。我身边一个人‘哎’地叫了一声，我一看，他的右胳膊的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他用左手捂着伤口，向大楼后面转移。我也赶紧躲向大楼后面。这时，一阵阵急促的喊声：‘快！快！快！闪开！闪开！’三个人、两个人抬着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淋的伤员从胡同里穿过。一辆辆三轮板车驮上了伤员。”

“枪声太密集，有点像大年卅晚的爆竹。我随着拉伤员的三轮车向北，绕到了儿童医院。医院的过道上鲜血。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弹，我问在现场的大夫：‘是橡皮子弹吗？’他瞪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第二

个大夫：‘是真子弹吗？’大夫吼着对我说：‘不是真子弹还能这样？’后来不少人说，不仅是真子弹，还是开花子弹。”

“一个宽大的会议室作为临时急诊室，里面躺满了伤员。我记下了伤员的名字……”

图9-4：六四死难者（选自64memo.com）

6月4日凌晨1：00，当38军开过之后，王晓明骑车来到木樨地，仔细观看了流血的情况：

“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8大滩血浆，每滩血浆直径在1米左右。这血浆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酱，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儿炸出来的。另外，从路口向西有一条约三十米长的血道。血道在路口处约有三米宽，向西逐渐变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经凝固变黑。路口中央有一辆军车被烧毁。”

将近12：00的时候，《人民日报》总编室已经收到记者从木樨地打回的电话：“军队向平民开枪，伤亡惨重！”

“接着是这个地段的22楼（一般叫部长楼）一位曾作中监委委员的关山复同志的家人打来的，说他家的女婿在厨房里被军队从街上开枪打死了！这一下，大家都震惊了！……”

“凌晨1：00以后，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第一个回来的是海外版的张宝林。他讲在木樨地看到军队如何开枪，市民倒地，他怎么样踩着血迹走回来的情景。最后，他撩起裤腿，脱下皮鞋，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

“接着回来的是年轻记者杨良化，也是海外版的。他一坐下来就抱头痛哭。大家安慰他很久，他才讲述自己目睹的情况。他原是派去天安门广场采访的，听到枪声以后，就朝着枪响的方向往西走，一直走到军事博物馆躲藏在一堵墙后面观察部队开枪，一名武警走过来，不问一声，就用警棍狠狠地打他。说罢，他脱下衣服，大家看见他背上还留有一道道血印。”

可能因为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关山复，曾是社科院党组书记的原因，“六四”后，笔者听到的第一例在木樨地中枪死亡的案例，就是木樨地22号楼8层关山复的女婿尹敬。据说，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6月3日晚只是去厨房取水，刚刚把灯打开，就被从背后打来的子弹击中，当场身亡，时年36岁。而居住在同一栋楼中第14层的中联部前副部长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姆，因探身于阳台，也腹部中弹，死于同一次扫射中。

在同一栋楼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墙上也被打穿一个“碗口粗”的大洞。这位老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王淦昌。

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楼上的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李立三之遗孀李莎家，子弹穿过窗户碰在墙壁上，落在她面前。

第四节 复兴门

上述那位轻工业学院的学生，在成为木樨地开枪的“目击证人”之前，也抽空到天安门广场去张望了一眼：

当时9：00刚过，木樨地已经“对空鸣枪”，但复兴门到人民大会堂地段，虽然人群已开始聚集，尚未出现“战事”。6月2日的“车祸”现场，不知什么原因仍未清理，此时已被人们作为演讲的凭据。

“复兴门立交桥西侧的广播电视部大楼前，看见群众围着一辆军用解放牌大卡车，驾驶室内还坐着军人，车厢内也有军人。群众中有人爬进车厢内看有何物，我也爬了上去，车内都是生活用品及炊事用具，没有军火装备。群众没有围攻、谩骂、殴打军人，双方和平相处，只是军人没有了行动自由。同在这一片地区内，群众还包围着另一辆军用面包车，里面有10个左右军人，有几扇车窗还敞开着，但车门是关着的，车外有钢盔等展览着，不知群众是

怎样从车内拿出来的。此时车都熄火停着，老百姓围着他们，军人们等着救兵的到来，群众也等着事态的发展，像是胶着状态。”

住在附近的邓拓夫人丁一岚事后也回忆说，大约从晚上8：30以后，就有部队被阻于这一带街道。部队多次广播，说我们履行任务，请大家让开。但群众不让。丁一岚还看见，先头部队用白色木棍挥舞伤人，群众后撤的情景。她认为，部队本可以趁此机会前进，但却没有，可能是要等候上级下达命令，因而用木棍开辟出的地方，复又被群众占领。

6月3日晚11：00，木樨地被突破，复兴门的对峙形势发生逆转。据丁一岚回忆，打破僵局的也是枪声：

“此时来了两队大学生，一队一、二十人，持大旗开进部队与群众之间。学生派代表与部队谈判，要求部队不要进城。部队拒绝要求。部队开枪将谈判的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击毙了。群众以石头还击。部队开枪，此一带死3人。”

就在杨继绳转道儿童医院察看时，那位轻工业学院的学生，正跟着木樨地主力部队再次东行：

“大批运兵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东行驶，路面上许多士兵端着枪步行或跑步前进，一边前进一边开枪，整个地区密密麻麻的枪声响个不停，硝烟弥漫。我和一些人冒险来到大街边上，当兵的一见有人观看，立刻将枪口朝我们转来，大家马上躲避，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枪响，不知是否有中弹的，反正我是安全地跑到了楼后面。这里有很多楼房，群众都躲在楼群之间，不时地出来高喊‘土匪’‘法西斯’，然后再躲起来。士兵只要听见喊声，不管看得到看不到人，就朝着声音的方向扫射，楼房墙壁被打的火星四射，周围的树被打的哗哗作响。”

“有一次因躲避射击进入楼群，刚好见到一群人围着两个中弹受伤的男青年，人们把他们两个并排躺在一块大木板上，一个好像昏迷不醒了，但还有呼吸。另一个人头上身上血迹斑斑，旁边一个人用手撑着他的嘴，帮他呼

吸，子弹打中了他的脖子和胸口交界的地方，还可以看到鲜血不时从伤口冒出。那个撑着他的嘴的人说，伤者曾经停止过呼吸，撑开嘴后又有呼吸了。”

“几分钟后，来了一辆130小卡车，大家把两个伤员连同木板一起抬到了车上，估计也是去了复兴医院。待枪声小了，我又去路边，躲在一座黄色大楼下的灌树丛中观看部队杀入城中的情景，不幸被一士兵发现，我就在他掉转枪口时迅速地趴在了地上，霎时一梭子子弹打到了我身后黄色大楼的墙上，激起一串火星……”

“……我选择了复兴门外大街北边一条与之平行的街道东行，大概行了一公里，转南，来到了燕京饭店东侧，这里是一个与复兴门外大街交叉的路口。路口南侧有许多人躲在暗处观看，但是没有人敢到复外大街边上站着，因为这里的枪声仍是响个不停。没有人用砖头石子袭击军人，也没有人喊口号，但军人只要发现有人看他们，立刻无情地开火，身边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楼被子弹打得火星迸射，军队是一路前进一路大开杀戒。家居木樨地的陈晖告诉笔者：6月3日晚，他躲在三里河路边树丛中录音时，亲眼见士兵持枪追杀一青年，对准青年藏身的花坛扫射。此后他又在在燕京饭店附近街口，见一士兵持枪追杀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女孩），直追至女孩钻进一铁桌底，打死为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李相事后的经历部分证实了陈晖的叙述：

“过了复兴门，还没到木樨地，在路边听到有人讲：有一个14岁的卖烟的小女孩，背对着烟摊，蹲在烟摊下面，但有半截脑壳没低下去。结果那半截脑壳被击中了。小女孩被打死了。……是蹲下，背对着，头没低下来。大家都在议论，这是什么‘暴徒’啊？！”

一位午夜赶到此地的英国《卫报》记者，记载了接下来的情况：

“……我们到达复兴门桥，听到连续的噼啪噼啪轻武器的枪声和间歇的重机枪的突突声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当时正是凌晨1：00。

在这炎热的6月夜晚，像往常一样，有成群的人穿着背心和夏裙呆在这横跨二环路的立交桥上。我们还没开始了解现场，先就看到一位较胖的中年妇女被抬着穿过人群。她的前臂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由于惊吓而全身颤抖。她被抬进了一辆出租车。当枪声接近时，后面的人群激动得无法抑制了。他们开始把六辆带拖节的公共汽车推到路中间横起来，从路一侧的树丛到另一侧的树丛。”

据38军前锋回忆，因为路障使用的是带拖节的公共汽车，中间疲软的部分令排障的难度增大。当军队在这边推动时，民众在另一边奋力抵住，双方角力，相持不下。最后，是防暴队员从车底爬过路障，或从车上越过“墙”体，这才打破路障后面的“人墙”。

眼看这道防线失守，人们再次点燃了这座路障。

此时的排障车和它的驾驶员，早已是伤痕累累。正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之际，从南苑东高地出发的38军坦克大队抵达二环路西南角。只见18辆装甲车以飞快的速度冲上复兴门立交桥，立即向西面的大部队迎上去。利用自身的钢铁外壳与内部机械力，他们从东面帮助推开了火障，将主力部队接进了复兴门，令举步维艰的行军大大加快了速度。

事后，一位在儿童医院参与抢救的护士长告诉杨继绳，部队到达复兴门立交桥不久，儿童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

“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脖子。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当时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但到了12：00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马上决定将名单撕掉，保护伤员。”

“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20多人。”

此后，杨继绳循着另一条与复外大街平行的街道一路东行，来到了阜城门内大街的人民医院：

“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我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他不说话。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20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跑了。……看到一个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東西，说这是人脑浆。”

“我准备离开人民医院，往口袋里一掏，发现自行车钥匙丢了。我找了块砖头把自行车砸开，几个学生围了上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以为我偷自行车，不让我离开。我掏出记者证，证明我的身份……这时，一个同学在门口喊：‘谁自愿献血？’他话音刚落，站在门口围观的十多个人同时举手：‘我去！’……”

事实证明，军人开枪并非都是针对“暴徒”。根据《戒严一日》官兵记载的当时情状，从黑暗中飞来的无非砖石、瓦块、牛奶瓶、啤酒瓶。最具杀伤力的，似乎是街边高楼上扔下的花盆，但木樨地和复外大街两边的高楼距离马路较远，士兵被砸到的几率不会很高。只是，受惊的战士已失去了自制力，对于周边的任何动静都恍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不是鸟，他们被赋予了一个不能被理解的使命，手中的杀伤性武器的宣泄，掩盖的是精神的空虚……

事后，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丁子霖记载，在同一时段、在上述军队开进地区（以木樨地为主）遭枪击致死的，有大学生、中学生，大学老师、工人，中科院研究人员、妇产科实习医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负责人，法院、总政干休所、铁路局职员，国家计委体改司机要秘书（转业军人）、解放军总医院301北门哨兵（武警士兵）、西单民族饭店的厨师。这些遇难者中最小的吕鹏，年龄只有9岁……

他（她）们中有的是因为救护别人而丧生，有的死于不准救治。

“军队在木樨地开枪了！”

“真枪实弹！”

“死人了！”

从那一刻起，不幸的消息立即飞遍全城。有人从当地朋友即时打来的电话中，都能听到“哗—！剥—！”炒爆豆似的声音。

更不幸的是，暴力并没能镇压暴力，牺牲并没有终止牺牲。暴力在竞争中生长，变得更加野蛮；牺牲在激励中发扬，变得更加壮烈……

被打消的，只是人性中的浪漫主义；进一步牺牲的，是那些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第五节 民族文化宫

已经通过复兴门的38军大部队也没想到，在仅有一站地之遥的民族文化宫前，这支“如虎添翼”的部队，再一次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先前到达的武警防暴队，已经在此与学生和市民“拉锯”近一个小时。

据当时一位从广场出来，骑行至此的北大女生小鹿回忆：

“我们取了自行车后往西骑行……接近民族饭店时，已见人群攒动，骑不过去了。问人哪儿在冲突，人们说，就在眼前了。正说着，忽见一阵烟雾在前边升腾而起，大家纷纷后退。接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涌来，熏的人直要流眼泪。原来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对小雪说：‘快把自行车放到马路边上去，看来是过不去了。’”

“待我放好车后，一转眼却不见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着她，我就戴上眼镜和口罩随着人们往前跑，想要看个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后跑。这样拉锯了几次之后，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们的催泪弹用光了！’于是群众呐喊着又往前冲。冲在头里的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一面红旗。可是冲出200米远后，军人又反应过来，双方开始用砖头互掷。”

“我站在自行车上，听到砖头砸得路边商店玻璃乒乓直响，心里直害怕。这时路中央的群众已退到我东边去了，只有马路边上还有许多人。我清楚地看见防暴警察头戴钢盔，手持齐腰长棍，肩挎冲锋枪，不断捡砖头向前面和左右投掷。一些年轻人为躲避砖头袭击，踩着我的自行车跳上了约俩人高的房顶。我吓得一叫，他们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顶的砖头扔在地上以作武器。”

“过了一会儿，不知为何军人又朝后撤，群众又朝前冲去，我也下了房顶，推起自行车朝西去。走到民族饭店东侧，向西冲的群众已冲得很远。……”

此时，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也在现场。据说，他目睹军民对峙的局面非常焦急，随即跑步到最前方，对一位军官展开说服工作。“没想到这位军官二话不说，举起手枪朝他当胸就是一枪。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当即伤重倒下。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及时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抢救，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忽然，前边的人又一次朝后涌来，只听得远处像炒豆子样响起呼呼乒乓的枪声。有人从前边跑来大喊：‘开枪了！开枪了！’人们纷纷问：‘是不是橡皮子弹？’退下来的人愤怒地大叫：‘前边已打死几十人，还说是橡皮子弹？’群众顿时感到十分恐慌。正在这时，前边拍下两个被枪打伤的人，大家纷纷上去帮忙抬往民族饭店门里。”

一位住在民族饭店的外国人，见证了小鹿描述的过程：

“午夜，透过我所住饭店的窗户，我看到约20名身着战斗服装的士兵向人群中投放催泪弹。一些年轻人被打倒在地上。这引起了反抗。示威者用石块回敬，并用木棍和铁棒把自己武装起来。在饭店前展开了约一小时的激烈搏斗，有人受伤或许还有人死亡。伤亡人员被抬走，救护车也开到了现场。有一小会儿，我下到饭店的门厅走到街上。但当搏斗又开始时，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间。”

另一位从天安门广场下来的外国摄影记者，则见证了民族宫前“拉锯”过程漫长的另一原因，及一名武警被殴打至死、多名军人受伤的过程：

“午夜之前或午夜左右，我从天安门广场沿着西长安街向西走。过府右街不远有一些路障，路障后面有一辆满载带有防爆盾牌士兵的大轿车。车已被群众围住。当大约六、七十名士兵沿着府右街开来时，群众突然散开转入长安街向西跑，并开始向新到来的士兵扔东西。这些士兵配有防暴盾牌，做出要向人群冲去的样子，扔催泪弹，并回扔石块。混战移到西单，接着向西一直打到民族饭店。当一些士兵的催泪弹耗光时，一些人就冲上去抓他们。人群中的学生和其他一些人试图阻止这些人殴打士兵，但没有成功。一个士兵遭到石块和棒子的殴打，他倒下后人们继续殴打他。其他几名士兵也遭到同样的攻击。一些受伤或死去的士兵被抬进民族饭店。我设法进入了饭店，里面全是治安人员。当我要给受伤的士兵照相时，遭到治安人员的攻击，其中一人试图用我的相机的带子勒我。两位美国人帮我解脱出来，并把我带到他们的房间。透过饭店的窗户，我可以听到枪声，看到坦克沿着大街开来，以及伤亡的平民被三轮车运走……”

这支从东面冲来，与38军进军大部队撞个正着的小分队来历不详。但事后有介绍“共和国卫士”的资料，谈到此时有两股人马在这条大街上从东面往西冲锋。

第一股是入住大会堂的63军某部通信团4连排长刘国庚及其战友，他们曾“自告奋勇”前往西单解救三辆被围困的军车。行至“电报大楼附近”，遭

遇“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被送往医院。刘国庚只身一人，面对疯狂的暴徒，毫无惧色，奋勇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6月30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

另一股由东向西的部队，是“奉命到西单路口设卡”的武警部队北京总队一、二支队的官兵。大概因为38军开进主力在复兴门获得了坦克大部队的支援，为了从后方为大部队开进早拓空间，他们放弃由西向东的开道计划，改从复兴门沿西二环路绕道“阜成门立交桥”，然后向东、向南，向集结地行进。其中二支队一大队部通信班战士李国瑞在阜成门立交桥“被暴徒用棍棒、铁锹等凶器疯狂殴打残害，并悬吊于立交桥栏杆上，壮烈牺牲”，其余人成功抵达西单路口。官方记录显示，他们从西单一路“挨打”，一直冲到民族饭店：“部队到达西单路口，遭到许多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堵袭击，砖头、石块、汽水瓶雨点般打在干部战士身上。为不误伤群众，刘艳坡和战友们表现了高度的忍耐和克制，一面坚持向群众宣传，一面与暴徒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佟麟阁路口，刘艳坡为掩护战友被飞来的石块、砖头砸伤多处，昏倒在地。在被抢送医院途中，又遭到暴徒拦截，残酷殴打，壮烈牺牲。”

与这个记录形成参照的，是此时在民族宫附近观察的《人民日报》记者给报社打回的电话：

“他从五棵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7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刘艳坡“共和国卫士”称号。上述外国摄影记者见证的，大概就是刘艳坡及其战友的不幸经历。

此时，仍在民族饭店前的小鹿看到：

“防暴警察过后，便是庞大的装甲车、运兵车和长长的用帆布蒙上的车辆，共分4列向前推进。装甲车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跟着装甲车向前，犹如在战场上一样。有的人低声咕哝：‘老山前线挪到长安街上来了！’有两辆装甲车上挂着红布横幅：‘热爱青年学生！’‘向首都人民致敬！’招来一阵低低的嘘声。这是宣传车，喇叭里喊着：‘你们赶快回家去！’群众中有人喊：‘你们赶快滚出北京吧！’立刻被周围人制止，实在太危险了。”

在民族饭店的一个窗口，先前的那位外国观察者继续写道：

“凌晨1：00，从西面开来大约二、三十辆装甲车。装甲车后面是一长串满载武装士兵的卡车。……街上的路障完全被轧平了。一个多小时后，当车队的最后一辆卡车从民族饭店前经过时，几百人（不光是学生）出现在街上，他们追赶卡车，呼喊抗议口号。有些人还投掷石块。士兵越开枪，人群越坚决越愤怒。忽然人们唱起《国际歌》，他们用石块武装自己并向士兵扔去。群众还向士兵扔了一些燃烧瓶，烧着了最后一辆卡车。射击持续着。开始士兵向人们头上方开枪，接着是朝各个方向开枪。在我住的饭店的前厅墙上也可见到弹孔。据我所能看到的，当时没有大规模屠杀，但有伤亡。在车队过去之后，这里又平静下来……”

枪声过后，救死扶伤的问题又凸显出来。此时，小鹿和身边的一对恋人转道民族饭店东侧的一个小巷子中：

“忽然听到后边一片叫喊：‘让开！让开！’一看，只见一辆平板车疾驶而来，旁边有人跟着跑，一片忙乱。车上躺着中弹群众，有人帮其捂着伤口，急急而去。惊魂甫定，又是一片‘让开！让开！’的喊声，又有受伤者通过。那位男朋友是医学院学生，他说：‘前边有个邮电医院，我们快去！也许能帮点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后，终于来到这所医院。许多人围在这里，自动组成的学生纠察队拦住众人不让进去，并拉出一条通道，供送受伤者的人进入。”

“……只见送受伤者的人流不断，急急忙忙一个，急急忙忙一个，令人心悬在嗓子眼。受伤者有的用救护车或其他汽车送来，有的用平板车或自行车送来，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则肩背人扶而来，平均每分钟一个。医院门前的水泥地上已经汪了一滩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着鲜血。”

“……单单是一楼已有9个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弯尽头。……有一个摄影记者、两位医生及另外两、三个人在旁，并悄悄议论着。记者说，他一定要让他的摄影机记录下这幕惨案，今后好让世人目睹真相。”

图9-5：六四死难者（选自64memo.com）

“我请人揭开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尸体身上放着的身份证或记录姓名等情况的纸片，一一抄录下来：

刘建国：男，35岁，西城区横二条50号。

富尔克：男，19岁，中央民族学院88级预科生。

吴国锋：男，中国人民大学工经86级，学生证号：6070115。

顾丽芬：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6级。

刘 忠：男，19岁，政法大学政治系，上海人。

段昌隆：男，清华化工系。

马凤友：男，工业企业部工人，1962年生，其子马骏飞同死。

许瑞和：男，复员军人。

另有一学生系北京农学院农经系学生。还有十男一女身份不明（因随身没带身份证）”

“一位刚送到的受伤者嘴唇中弹，上唇被撕成两瓣，上牙全无。”

“我在三楼看到，因受伤者太多，病房里和走廊上都躺满人。一位背部中弹的受伤者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两名医生就开始给他取弹片、做缝合手术。从他背上取出一颗弹头，是五四式冲锋枪子弹。他拿在手里观看。应我要求，让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说要永远保留着作为纪念。”

“回到一楼，见那位在医院门口痛不欲生的女学生已经获准进来，并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颗机枪子弹，很长，把他的背脊穿了两个洞，有拇指粗细，血流如注。医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针药打在药棉上，用手按住药棉在伤口上止血。男孩子疼得不断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女学生把脸贴在男孩子头上安慰着他，早已哭不出泪水。我询问了女学生，知道他俩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心里更加难过。”

“枪声响了一夜。护送受伤者进来的人互相讲述着各自的历险记。一位30多岁的男子说，与他站在很近的两个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妇女肠子流了一地，当场毙命。他护送了两名受伤者入院，浑身是沾上的鲜血。”

“这家医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术。许多受伤者需要转到积水潭医院。他们被安置在长椅上或担架上，两人抬起，旁边再有一人举着吊水瓶，就这样匆匆而去。医生说，他们都免不了截肢。有人开了个黑色幽默玩笑：‘这下，邓朴方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马了！’”

“已是6月4日凌晨，我们最后询问了一遍该医院死亡人数，已是22人！这时是5：15。”

此时也到达了邮电医院的杨继绳，也看到了“走廊里都是伤员”的情形：

“有人大声嚎叫：‘给我打一针麻药吧！’其中有两名受伤的防暴警察。几名身上带血的人不让大夫对他们两人治疗，说他们刚才打人太狠。这两位警察无可奈何地呻吟。……”

一篇次日刊登在英国《卫报》的文章，则记述了作者在民族饭店北面的人民医院看到的情景：

“我们来到人民医院，这是一家小医院。那里看起来像个屠宰场。长凳上、床上和放在地上已被血浸透的床垫上都躺着人。许多人胸部、腿部或头部有裂开的弹伤口。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已送来300名伤员。其中包括35名重伤员和70名其他程度的伤员。已有4人死亡，包括一名喉咙中了弹的9岁小女孩。’学生抢救了一些被严重殴打的士兵。我们看到一位浑身是血，显然是活不长了。”

以后，杨继绳又来到二龙路医院，也看到的类似的情况。他本想绕道西四南下回单位，没想到西单路口已有“密集的枪声”。

第六节 西单

西单，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道防线。

据家住西单附近的陈毅然回忆：6月3日黄昏下班的时间，她来到西单路口东时，大街上的人很多。有一辆22路公交车已经被横在了马路中间，被当作路障。正在那时，她看见一辆蓝色面包车从东面开来，在到达现在的西单图书大厦西边时，向北拐，停在了大厦西边的路口：

“出于好奇，我和一些人走了过去。我站在车门口，只见着便装的司机走出来，拉开车门，啊！是满满一车崭新、黑亮的长枪。……司机操着一口外地腔，手指着枪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拿走这些枪’。天哪！这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做？我一堆疑问，也更加紧张，下意识的档在了车门口。……心里快速的想着两个问题：第一，千万别有人拿枪，这会给社会带来很大麻烦。第二，如果有人拿了枪，我是不是要阻止他们？现场很静，围观的人真的没人拿枪。这时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你是军人么？’其实他虽然着便装，但那作派一看不会有人否定。司机没回答，但他从车里取出一个老式军用水壶。这是我很熟悉的东西，只是多年不见了。因为我站的地方离他最近，他就将水壶递给了我，并说：‘你拿去吧，还能用的。’我不解地，又是下意识的接过水壶，沉甸甸的。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位看似中年的男人挤上来，伸手拿过水壶并迅速打开盖子，一股浓烈的汽油味冒了出来，我们现场的人，都‘啊！’的叫了出来。接着，在大家还没搞明白的时候，拿水壶的人跑向横卧在路口市民做障碍用的22路公交车。”

当天的晚些时候，当她吃完晚饭，再次来到西单路口时，那辆22路公交车已经“在熊熊大火中燃烧着”。

那位曾到达木樨地，决定到东面看一看的轻工学院学生经过这里时，尚未看见这辆公交车着火。但他看见，在西单路口，白天被围困在那里的大轿车尚未转移：

“车里面军人的职位看起来比复兴门那边被围困的军人要高，车门关着，靠车门的车窗打开着，群众中有人和车里的军人交谈，还有人往车里送冰棍，军人们显得无可奈何且有些烦躁。西单这个地方比起复兴门立交桥那里气氛显得更紧张，民众已经用大型交通车辆将十字路口差不多封锁住了，只有小型车辆，自行车和人还能慢慢通过。”

“用作路障的公共电车，汽车顶上站了许多人，他们都往西张望，似乎等着军队的到来。此时还有有组织的学生列队通过这里往天安门广场进发，高唱着《国际歌》……西单路口东侧停着一辆军队大轿车，里面空无一人，显然也是被群众缴获的，车顶上展示着轻机枪，半自动步枪等，有学生模样的人站在车顶上讲，偷运这些军火进城就是要对学生和市民进行武装镇压的。”

从西单继续往东，他看到了杨继绳也看到的场面：人越来越多，而且明显多于前几日。

“途径六部口十字路口时，众多的人们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块空地，一个人在那里讲话，说的是当日白天军人或是武警在这里使用催泪弹的情景，那一块空地上还留有催泪弹燃烧后的痕迹。路口南侧马路上停着大轿车，不止一辆，聚集的人太多了，看不清有几辆。车辆损坏的比较严重，玻璃都打碎了，车身伤痕累累。……还有人说，看见有武警也跟着砸车，不知为何，是否要嫁祸于民。”

“……此时正赶上把守新华门的士兵换岗，只见从门内列队走出来一队士兵，有几十人，来替换上一班的士兵。士兵的装束发生了变化，上一班的还头戴大沿帽，来换岗的全头顶钢盔了。这样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明显紧张了许多。不过也引来了一阵哄笑，笑他们过分紧张了，大可不必。”

图9-6：新华门前换装的士兵（选自香港《争鸣》）

新华门，自“四二〇”事件后，清静了20多天。5月13日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开始，就有100多名大学生来此地静坐，试图开辟“第二战场”。但由于广场的动静更大，这里的活动基本没有收到多大反响。5月16日“中苏峰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门附近的福建厅会见戈尔巴乔夫，学生“对话团”和“中国科技大学青年教师”17人在此宣布“绝食、绝水”请愿，最多时聚集了3000人。5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绝食团”和“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绝食团”再次占领新华门前的空地；此后又有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加入。5月31日，经国务院各部和各校领导劝说，除法大与北京科技大30余名学生外，大部分师生已跟随劝说者回校。据吴仁华回忆，该校学生一直坚持到6月2日被强行驱散。但根据上述轻工学院学生的见闻，至少到6月3日晚11：00，新华门红墙以外，暂时还是“民众的天下”。但“民族宫防线”的溃散，令西长安街形势急转直下。

据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德邦回忆：

“我们当时考虑军队是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的，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市民越多，屠杀清场的可能性就越少。于是自治会广播呼吁学生到‘三一八’纪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门广场声援。”

“我决心去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共生死。陈章宝 在纪念碑前发表了简短演讲后，将师大一面指挥旗交到我手中，并叫我跟同学们说几句。记得我当时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每个学生都平安回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本来确有很多感慨，但当时是没法说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躯是阻挡不了枪炮坦克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重与痛苦，不知谁能体会。我默默地举起指挥旗，带领同学义无反顾地冲出了师大校门，一种可能永别的悲情袭过我出校门时的心。”

他们原打算赶到天安门广场，但行至西单附近就有学生来报，部队已经到民族文化宫了。大家心急如焚，“不约而同地奔跑起来”：

“随我跑到西单路口的师大学生因中途掉队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让大家手挽手背东面西横过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并叮嘱大家看我的指挥旗行动，如果我的指挥旗放下，大家马上往东冲进天安门广场里面，会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起行动。我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硬阻，那样不会有什么作用。”

交代完毕，王德邦独自爬上了一辆横在西单路口的公交车。

此时，已离开邮电医院，重新回到西单路口的小鹿，也看到了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规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在两面旗帜下，是手挽手、肩并肩的一百来名学生，迎着部队走去。

已经爬到路障汽车上的王德邦向民族宫方向望去：

“西边过来的军车那雪白刺眼的灯光在午夜的长安街已清晰可见，枪声也透过远处军车的轰鸣与近处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东涌来，并纷纷往两边胡同散去。紧跟在人群后的就是坦克。”

“我上车不到10分钟，头上就传来啪啪的爆裂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双眼就顿感涩辣难睁。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催泪瓦斯了。我赶忙放下指挥旗示意后边的同学们快撤，同时自己也摸索着往车下爬……”

据“北高联”的一份文告称，就在军队释放大量催泪弹过后，“几辆汽车同时起火”，这个过于“巧合”的情节，与前述陈毅然目睹的“一壶汽油”的故事结合，令人怀疑“是便衣有意所为，意在嫁祸于学生市民”。

不知为何，事后来自官方的材料避开了对这些着火汽车的描述，却描述了另一片“火海”？

“共和国卫士”姜超成“事迹”称，大约“当部队行到西单路口时，路面被暴徒铺上棉被，浇上汽油点燃，一片火障。他冒着雨点般的石块，站在最醒目的位置——交通安全岛上进行指挥，并亲自带领一个突击组冲向火海，一面扑火开道，一面向暴徒进行反击。”

一位退伍兵的现场观察，同时提到了两种火。凭着侦察兵十余年的经验，他能分辨出枪的类型和子弹的落点：

“……行至西单路口，听到枪声连成一片，不时夹杂着阻击枪的点射和坦克高射枪打平射很沉闷的散布射。”

“1：06枪响起的同时一辆辆汽车被点燃了，西单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钢盔的反光很抢眼，5个、10个、15个，越来越多，沿长安街左右两侧，成两列纵队半蹲半猫腰前行。我心头一沉：坏菜了，突击兵！”

“随即59冲锋枪作动筒火光四闪……他们运动我运动，他们停止我停下。我们学的是一个教程，停下就是瞄准射击。”

“我向后观察：还有几个人在掩护群众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后边压阵，十几人要掩护上万人的撤退，对上万人和十几个退伍兵来说，此时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离突击兵最近时就是40米，子弹打得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我听不到枪声，只看见火花四溅，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会受伤，因为火星就是前一弹着点，两颗子弹不会落在同一地方，这是常识。”

跑着的有幸免于难的，躲着的却有不幸中弹的。据莫默回忆，大约就在同时，在民族宫附近的一个胡同口，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的姑娘，被擦过树皮的子弹击中。“子弹从她的右太阳穴钻进，左太阳穴穿出”，“白花花的脑浆和着鲜血往外涌”。四年以后，他才从丁子霖那里看到这个姑娘的照片，得知她叫张瑾，遇难时年仅19岁，是国贸中心培训班学员。他就倒在男友的身旁。

图9-7：西单张瑾遇难地点

一位和部队差不多同时到达西单十字路口的目击者称：

“由于几次后撤以躲避子弹，我没能看清当时的情况。但我能清楚地看到长安街上车辆燃烧时映照出的市民的轮廓。他们在向前进的部队投掷东西。枪声不断，部队也在投放催泪弹。我起先以为士兵在放空枪，但我看到人们倒下，受伤或死去。后来我到六部口，进入府右街。那里有辆军用吉普，已被完全拆毁。我把自行车放在路边，又回到长安街的街口……部队黑压压地布满了长安街。……突然一个士兵在离我3米远处出现。我马上蹲伏下来。这个士兵正在扔石块并叫我扔掉手里所有的东西。我爬进府右街，摸到一大滩血。士兵们还向街对面的人开枪。……这时有人骑车经过，车后面载着一个中弹的人。”

这时，已经艰难地爬下公交车的王德邦，突然感到“长安街一片漆黑。”也许是催泪弹的作用，但他认为，这是“人为的熄灯，以便让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值得庆幸的是，他爬下这辆公交车前，它没有着火。

当他摸索着来到南面的墙根时，听觉告诉他，“军车的轰鸣声很近了，同时感到脚下水泥地上有爆裂声”。他努力睁开眼“看到脚下有火星在溅动”。他意识到，这“是子弹在跑……”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边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将所见情况念叨着：这么多坦克，还有炮呢，不好，那边有几个人被打倒了，还要去追那些跑的。又开枪了，完了，又有两个倒下了……这些土匪、军阀、法西斯，当年日本鬼子进北京也没有这样啊！太残酷了！他说着说着，声音在激动中变成呜咽。”

“停了一会，就听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细微响动声，我侧头看去，就见那人扬手抛出了一片瓦。马上批啪的子弹声就响了起来，并且一队士兵冲到了胡同口向里就是几枪……”

王德邦在跑，撤退的人流中，退伍兵也在跑：

“我跑着跑着，不时地回头看看后边的大兵有多远，80米、100米了，身边开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软软的塌了，有人硬硬捕地发出很响动静，有人像纸片一样飞出去，千姿百态。突然，我面前像爆开一朵红菊花，跑在我前头是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红色就在白衣上开放，我们跑一条轴线，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还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们，你中弹了，背后。’他伸手触及背后，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还未触地面，我的一条胳膊就夹住了他，另一个人胳膊也伸过来，同时把他捞起来。平常想练练这份功夫都不容易，这叫寸。”

“终于脱离了危险区，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楼工地的胡同口，自发救援的人，打接力把伤员转移走，效率很高。一个女孩大叫：‘妈哟！’捂着手冲进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断了，随手扯下一条男人围在脖子的毛巾，给她捆住动脉。”

“这当口，一个小伙子冲过人们的阻拦，手抓两块板砖：‘他们枪杀平民，我跟他们拼了！’我纵身一扑，将他强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气，我也喘着粗气，等他冷静了，我小声说：‘他们有枪！’”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气，人们全龟缩在胡同里。奇怪，又听见枪声了，紧张时听不到枪声，全是视觉感受。点射穿过街道是回声，还有脱音，散布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声，打在土地上啾啾声。老兵知道回声是子弹离的远，‘啪啪、啾啾’子弹是离的近，得当心了，这也是常识。”

1：45，在前锋已经抵达天安门广场后，38军的部队在西单仍未过完。有安全意识的退伍侦察兵选择了有铁皮大门的民航售票大楼工地作为藏身之地。并通过铁门缝隙继续观察：

“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黑影瞳瞳的墨绿色装甲车133、135、144，首尾相顾。”

“装甲兵过后是军用车卡，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这会儿枪声停了，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两女孩不听人劝告，一直尾随着大兵走到街口，她们还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声吼：‘不要命了，还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静地说：‘那你哪？’”

退伍侦察兵对人性与战争行为的关系似有深刻思考，他写道：

“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但此时，“大无畏”已经不仅仅是某类人。因为他接着又看到了一位老人：

“一个老人就坐在马路崖上，手拿烟斗吸烟，从他坐的姿势来看好久没动，续烟也续好几锅了。”

“当兵的也觉得怪了，围拢他转几圈，就见烟火一红一灭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不怕死就能永远不死，神了！在这大屠城时节，他是练的那份功啊，他想些什么？……当兵的放了他一马。”，

大军车队过后，被进军洪流排到路边胡同里的学生重新集结于长安街，依然手挽手，并唱起了《国际歌》，“紧紧地跟着军车”。据锺罗白回忆：

“军人继续向他们射击，人们不再理会。前面的一个少女，被反弹的子弹射中了一条腿，鲜血淋漓，也没有停下来，双手紧紧挽着旁边两个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继续向前行进。”

“天空弥漫着燃烧车辆的黑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焦糊味。枪声依然在响，人群却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军车，又一个一个地倒下。”

“枪声突然停下来，也许这些战士被惊骇住了，他们直楞楞地看着这些不啻于‘集体自杀’的人们，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竟不知所措。突然，一个军官喊了声：‘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枪声、哭声、人们的尖叫声、痛苦的嚎叫声，乱成一团。一个高高胖胖的小伙子，大喊着‘操你妈！’甩出了一块砖头，并直接冲向军车，没跑几步，就扑倒在地上。”

“我卧倒在地，在我和叶傅之间有一个老人，脚掌被打穿，正痛苦地呻吟，我们赶紧把他扶到路边一辆来救助的平板车上。”

锺罗白继续写道：

“待我们回来时，枪声已经停下来，这时，另一个小伙子也许见伤亡的人太多，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猛地撕裂自己的白衬衣，拍着胸膛，带着口腔吼道：‘你们打死我吧，你们打死我吧！’后面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掌声，那些军人沉默不语。”“也许被这个小伙子所鼓舞，生来怯懦、胆小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几步躍向前边，大声说道：‘告诉你们，这里不是老山前线，这里是首都北京；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是越南兵，他们是中国人……’”

“这时，我的腿被猛地一拉，重重在摔倒在地上，‘嘟嘟’，一梭子子弹打过来，‘呀！’在我后边一个女学生尖叫一声，倒在地上。叶傅不愧在军营中长大（他父亲曾是解放军高级军官），异常机警，他从后面将我拉倒，及时躲过了军人的射击，救了我一条命。可子弹却打在我身后的女学生身上，中弹三处，两双手臂和腹部，鲜血染红了她的衣服。人们将她飞快地送到跟着我们的一辆红十字会救护车上。

“‘杀人犯！杀人犯！’砖头雨点般砸向汽车，不知是什么原因，这辆汽车突然脱离行列，向前直驶而去。面对我们的另一卡车上，也有十几个战士，有一个麦克风，他们向人群喊话：‘保持距离，不要靠近。’那些战士并没有端起枪。”

陈毅然大概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据她回忆，当时有一种“求死”的心情。

“人们继续唱着《国际歌》，跟着军车，走向天安门广场。”沿途，锺罗白看到有几个市民从燃烧的军用车辆中“用长长的铁钩向外拉炮弹箱”，以防炮弹、子弹爆炸。

一位秉承“救死扶伤”医德的女军医星光，也目睹了38军开进西单路段的情景：

“……前面由防暴战士开路，他们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进。而街上民众的口号是坚决把他们堵住，绝不放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去。只见很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们爬上长安街南面的平房，将房上的瓦片揭下来摔碎，当作武器砸向戒严部队。但这种抵抗很快就被枪声和子弹压下去了，只见一排排子弹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大地。人们被子弹压得卧倒在地上，但枪声一停，又会有人大骂着，‘打倒法西斯’，奋勇地冲上去。”

随着大批受伤者的出现，星光和几个北京医学院的学生一起，利用位于西单路口的医疗用品商店成立了一个简易救护站。他们对送来的受伤者用绷带作简单的止血固定包扎，再由市民们用平板车或三轮车送往附近的邮电医院、复兴医院和北京市人民医院。有的受伤者抬进来时就已经没救了。有的受伤者伤势太重，也无从下手救治。

“有一个学生左胳膊上的动脉被子弹打穿了，抬进来时由几个人使劲压着左胳膊的伤口处，但血还是像喷泉似的向外冒，采用一般的止血方法根本就止不住。”

她们只好从桌子上找到一个墨水瓶，反过来盖住伤口，再使劲用纱布缠住，但那血还是很快就渗透了沙布。

图9-8：西单周边街道及医院情况（陈小雅标注）

大约半个小时后，军队过去了。王德邦与躲避在胡同中的人冲出了胡同。

“我一心记挂着天安门广场，就匆匆往东赶。很快到了六部口，在中央音乐厅的前边路口，我吃惊地看到几个青年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有一个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还汩汩地流着血的学生，向围观者痛苦地讲述着刚发生的事。他说军队过来时，他们往胡同里跑，几个女生因为跑得慢被士兵拦住了，他们几个想冲过去救，结果被一阵扫射打倒了。”

“……我背着他到了音乐厅后的胡同深处，那里已有不少三轮车装着一个个还有流血的受伤者。我就近将青年放在一辆车上，并叫推车者赶紧送去医院。许多人一边抬受伤者一边禁不住失声痛哭，整个胡同沉浸在悲泣声中。”

让星光感触最深的是，直到这时还有市民在问她：“大夫，这伤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吗？”

“大量被真枪实弹打死打伤的民众就鲜血淋漓地躺在眼前，他们却仍然对政府抱有希望，仍然不愿相信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大学生施绳，也是这时在六部口附近中枪受伤的：

“当时我首先中弹的部位是肩部，伤势比较轻。先是听到‘嗖’的一声，随之肩部感到一种麻麻凉凉的滋味。不过数秒，一记重击，我中了第二弹，是在背部。这次创口较大，位置非常危险，紧贴脊柱。事后推测为‘开花弹’所击中，由于子弹的威力不足，只是将表面的肉炸掉，而未伤及脊柱。”

“当时我没来得及有疼痛的感觉，只在短暂的死神到来之前的清醒中意识到自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要与家人永别了。这是我瞬间唯有的全部思维。紧接着便是神志昏迷。我想昏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我恢复了些许意识，微微睁开眼睛时，我还躺在离长安街边不远的地上。有几个人围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他的伤口很大，流血太猛，赶快包扎，堵住血流。’我的T恤被扯下，而后便有人用力把它从中间撕开（或用剪刀绞开？）并用其包住伤口。”

“还有人躺在我旁边。那人身上没有太多的血迹，不知伤在什么部位，途中一动不动，只是僵硬地躺着。有人将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概是试试呼吸情况吧。只听有人说：‘这边这位（指躺在我身边的人）比那位（指我）还要严重，怎么连气息都没有？！’”

“我被送到了—一个距现场较近的医院（邮电医院？）。有人扶我走进了医院大门。走廊两边站满了人。最后，我被扶进了一间屋子（诊断室？手术室？）。这里已人满为患，躺着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泪的，低声呻吟的，大声痛哭的，高声怒骂的，比比皆是。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嚎啕大哭，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说是她朋友刚才在长安街被打中颈动脉而气绝身亡。”

“稍后，我周围腾出了一点空间，一位首钢的工人帮我平卧在地上，托起我的头，让医生为我动手术。我看到地上满是血迹，这与周围血迹斑斑的伤者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战地医院’还有过之而不及的惨像。”

“我失血太多，需要输液。那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只能保证对垂危的病人输血。’那人又问：‘血库的血呢？’答曰：‘血库已接到命令停止向医院供给血液。’（这是我听到的他们的谈话，不一定真实）。此后我便感到异常的难受，剧痛快速向我袭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难忍，而后神志渐渐模糊。”

“右边的那位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绷带包着。我对他道声多多保重，他看不见我，回应地点了点头，并用手做了一个‘V’字手势。”

6月4日清晨，他与许多转院者被送到了积水潭医院。

“在我的病房里，足有40多个伤号。这里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伤号，但多数伤势不轻，据我观察，他们多数会留下或多呀少的后遗症。”

“一个外地赴京访亲的农民，整个小腿的肌肉几乎全被炸光，两根小腿骨暴露在外……每次医生给他涂抹药水，他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

“一个青年科技人员，伤势也着实不轻。通过交谈，知道他刚出本校门不久。六月四日凌晨，一颗猖狂的子弹沿着他的胸部紧贴表皮从左边穿到右边。感谢上帝，子弹没有伤及他的心肺。命是保住了。但是要知道，子弹有

毒，且受伤部位奇特，手术难度很大。他活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病床上。到我离开积水潭医院为止，他的伤势没有得到确诊和治疗。”

不断地有人倒下，但活着的人却抱定了要走到最后的决心。锺罗白继续回忆道：

“当军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人群继续向天安门广场走时，早已站在天安门广场周边的军人一阵扫射，人群被迫散开，向后奔去。可不知从哪里来的手持大棒的武装警察，截住了我们的退路。我们赶紧掉头向左拐，可我因带着相机，跑得慢了些，挨了两大棒，一棒打在相机上，将闪光灯打掉，另一棒打在腿上。”

“我们最后涌进左侧的石碑胡同，人多，胡同窄跑得很慢，走到前面，发现胡同因为临时施工给封死了。这时，胡同口处一阵枪声和惨叫，当枪声响过，屠杀者远去时，在胡同口那里，已倒下十几个人，其中至少5个人已经死亡。”

6月4日凌晨1：30，38军作为戒严部队清场的西路“第一梯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军队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38军这支机械化部队，自6月3日晚9：30从军事博物馆出发，8.1公里的路程，花了整整四个小时。

第七节 保护与牺牲

由于38军提前行动，整个戒严部队开进计划似乎也被动提前。原定在丰台六里桥集合，在西三环一线待命的西路“第二梯队”——第54集团军127师，突然收到了“迅速徒步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命令。晚9：50，127师在集团军副政委张堃、师长锺声琴率领下，沿六里桥、广安门、菜市口、虎坊桥、南新华街，向正阳门西侧开进。这是一条与38军开进路线平行，但比较僻静的入城路线。因为不在北京城的主干道上，动静也没有搞得那么大，虽然凭

两条腿，他们却比38军快了一步——当38军正受阻于北蜂窝第一道“火障”时，10：30，54军已来到了逼进二环路的广安门。但是，他们在这里遇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据该军的少将副政委张堃回忆：

“部队行至广安门铁路与公路交叉路口时一列火车停靠在路中间，拦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我和战士们一起，从火车下面爬了过去。部队一过火车道，暴徒们就在车厢上用砖头往下砸，用木棒和钢筋棍打，用火枪、气枪打，用路口上的横杆上下打，当即打倒几十名官兵。我的钢盔也被砸得噼啪作响，背上挨了几砖头。战士吴金虎刚钻过铁道，被一歹徒用火枪击中腿部，顿时鲜血直流。这时部队队形有些散乱，前进受阻，指挥员们纷纷问我：‘怎么办？’我一看，眼前是黑压压的人群，暴徒就混杂在群众中，如果还击，难免误伤，我命令部队：调整队列，收拢队伍，继续开进。官兵们搀扶着伤员，继续往前冲。”

“队伍行至广安门护城河。这里道路狭窄，聚集了上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护城河桥头的街道两侧正在拆建筑物，暴徒们在这里设立了第二道防线，部队行进至此，砖头、石块像冰雹似的砸来，顿时，不少官兵被砸得鲜血直流，翻倒在地。走在前面的前卫团被砸倒50多人，战士们憋不住了，跪在团长徐乃飞和政委跟前，要求发子弹。这位团长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曾生擒两名越军俘虏，被授予‘侦察英雄’称号。可他知道，执行这次任务与以往执行作战任务不同，群众与敌人混在一起，一时难以辨清。他和政委含着泪把战士一个个扶起来，坚定地说：‘执行命令，不准开枪！’这时，一个头扎黄带子、上面写着‘和平敢死队’的家伙混在群众中高叫：‘当兵的不敢开枪，打呀！’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歹徒越围越紧，大打出手……”

第54集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重装的3个王牌快速反应集团军之一，隶属于济南军区，战力上仅次于北京军区的38集团军。该军的127师379团——即6月3日夜担任54军127师开道任务的“前卫团”——原为孙中山的“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即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故有

“铁军”之誉。在“八一南昌起义”时，该团扮演了主力的部分角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标志。以后，该部随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带领的农民起义军会师。而54军127师的380团，也来自初创时期的红军，故有“红军团”之称。两团在成为“朱毛红军”的一部后，又演变为红四军、红一军团。在长征路上该军曾有“飞夺泸定桥”的传奇史话；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军中主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王牌师”中，54军的127师居首但是，这支军队并没有在人民面前显示它的军威。

“这支英雄的铁军，曾经为了刘老庄的群众免遭日寇铁蹄的蹂躏，一个连队就倒下87条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今天，他们宁愿自己流血挨打，也不误伤群众。他们搀扶起自己的战友，保持着最大的克制，从人群中硬是挤开了一条道路，顽强地向前推进……”

事后，张堃在回忆中说：

“我从军40年，也从未经历过这样悲壮的行军，从未碰到过这么复杂、这么严峻的事态。我随指挥所行进至此，鞋子已经被挤掉，双臂和背部已被砸伤，特别是看到与自己儿女一般大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我感到非常痛心，非常愤怒！我知道，只要我‘还击’的一声令下，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的！可是，不能啊！眼前这么多的群众，那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怀抱幼儿的妇女，被歹徒推到了前排，一旦开枪，难免造成误伤……”

“肉体上的痛苦，官兵们咽下了，最使他们感到难受的是被群众误解。部队通过广安门，进入广安门内大街，沿街路障重叠，逼得我们只好从路障两边的小口子通过。每经过一个胡同口，都是一阵石雨的袭击，都是一阵令人难以容忍的辱骂声。‘你们枪口对准谁？’‘你们不是人养的！’‘保皇狗！’……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实在忍不住了，从地上捡起暴徒砸来的砖头，冲出队列，要向辱骂他们的人群扔……我赶忙把他喝住：

‘你干什么？误伤了群众怎么办？回来！’小战士红着脸返回队列中，借着路灯，我看清了小战士稚气的眼中包着泪水，脸上、手上的伤口流着血。”

此时的张堃，既不知道38军在木樨地开枪，射杀无辜群众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城；也不知道戒严指挥部早已经把“动乱”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只是敏感到命令的突然，越靠近市中心，抵抗越激烈：

“部队行至南新华街时，遭到了更为猛烈的袭击。……一些打着‘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旗号的人煽动起上万名群众，用几十辆汽车、隔离栅栏设置了密集的路障……与我一道率队前进的钟声琴大校行进至此，在翻越隔离栅栏时，左腿关节被严重打伤，骨头外露。街道两旁的楼上，不时扔下花盆、破自行车、铁锅、石块等，走在我前面的一名战士被花盆击中头部，扑倒在地，被身旁的战友架起又继续前进。”

“这时，我已赤脚在冰雹似的石块、砖头袭击和人群的围堵下行进了10公里，全身多处负伤，体力消耗很大……快到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时，一块大石头飞来，砸在我的左小腿上（后来才知道左小腿腓骨粉碎性骨折），剧烈的疼痛使我放慢了速度，掉在了队伍的后面。在跨越隔离栅栏时，由于左腿已被砸坏，扑倒在地……”

少将倒下了，四五个歹徒朝他围了过来，又是踢，又是跺地摧残老人。

不远处，一个稚嫩的声音吸引了一位中年妇女——马嫂的注意力。她跑过去一看，数十名暴徒正在踢打一名小战士。小战士双手抱头，嘴里呼喊“大叔，大哥们，你们别打了，让我过去吧，我是解放军”。但暴徒们你一脚、他一脚地，把小战士踢得像皮球一样，满地滚。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嚷着：“打的就是解放军！”马嫂毅然冲上去，勉强抱起了小战士，一路朝附近的急救中心小跑。几个青年人从他手里接过了小战士，大家抬着，把他送到了急救中心。

打算回家的路上，马嫂发现了张堃：

“……这名解放军趴在地上，几个暴徒围着他，在他身上连踢带踩。他一动不动，任凭暴徒站在自己身上乱踩。‘莫非他死了？’”

马嫂忍不住再次冲上去，俯身将军军人翻过身来，只见张堃已紧闭双眼，面容仍是“极度痛苦又非常慈祥的样子。”

“他的脸上，特别是太阳穴两边满是鲜血，血还在缓缓地流着……”

马嫂见状蹲下身子，艰难地把这个身体已经微微发福的老人的手拿起，搭在自己背上，另一只手从后面紧紧将他的身体搂住，她艰难地站立起来，然后半背半拖地朝着450米开外的北京急救中心走去，一任从背后打来的砖头，打在二人的身上。

她不知道张堃的腿已经受伤。

迎面而来的4位20多岁的年轻人，再次施以援手，大家一齐把张堃抬进了急救中心。时间是6月3日晚11：30左右。据当时正在北京急救中心实习的军医贾志媛回忆：

“开始，谁也没想到那个可怜的老头儿是个将军。他浑身是伤，歪在二楼电梯旁冰凉的水泥地上，头像个血泡的葫芦。”

“他的诊断书上填满了X光透视诊断：6根肋骨骨折、肺部感染、左腿腓骨骨折、右腿软骨骨折……”

据这位大夫记载，从6月3日中午开始：

“伤员就一个劲儿地往里送，到了晚上，一楼、二楼、三楼都像堆劈柴似的堆满了。”

因别的医院也几乎达到了饱和，经过急救处理的伤员已经送不出去，只能推在大厅里、过道上。为了救治不受双方的情绪干扰，急救中心把二楼单

辟出来接收军人。而整个二楼的109名军人伤员，除6人外，全部都是54军张堃的部下！其中20人重伤，1人已经牺牲。

据事后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的资料称，54军某团后勤处参谋王锦伟，就是肩扛着弹药箱，在附近的南新华街中枪牺牲的。

6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召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和正副部长会议，在传达《告全党和全国人民书》时，额外提到“一位少将失踪”的消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美国之音》迅速获得了张堃失踪的消息。但是，直到通过可靠关系，接通一位在301医院的老战友的关系，他一直像一个隐身于高粱地的老农，隐身在急救中心的伤员中，隐身在他的战士之中。

正如某团政治处上尉股长胡海利所言，整个“解放战争打了3年，消灭了800万蒋军”，解放军“在战场上只有3名军以上干部牺牲”。他不可想象，为什么在这样一场奇异的战争中，竟会让自己的副政委“落到这份地步”！

与张堃少将大义凛然，从容赴义的形象相比，带领济南军区前线指挥部随54军126师行动的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固辉，则更显得高深莫测。据信，当日突然接到开进命令后，他们从大兴出发，沿木樨园—马家堡—太平街—虎坊桥，朝前门箭楼方向挺进。但是，他们刚走到太平街口，就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只见这位副司令：

“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站出来大声向群众说道：我是中将副司令，我既没有接到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也没有下达向群众开枪的命令。我的部队，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你们让开一条道，叫我出去！群众听完，高呼‘解放军万岁’，接着就闪开一条道，放他走了。”

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位暴露了身份的将军隐身到哪里去了。部队原地不动，搜救人员在人山人海、危机四伏的黑夜里，从虎坊桥到太平街——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地——来回捋了两遍，也没能见到这位福将的身影。最后，

通过各种途径，人们得知，这位副司令被群众救得后，完璧归赵送到了宣武区委。这才化解了一场虚惊！

至于这位副司令究竟撤下队伍想干什么？他是否只是去寻求方便一下？或曾经试图与上级联系？或有其他什么想法？倒也没人想问了。任何人都知道，把军队和人民推向自相残杀境地的不是他！

“六四”后，一篇新华社电讯稿报道了在“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中，首都民兵在人武部的领导下发挥的重要作用，表彰名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固司令得救地区的宣武区民兵，大专院校麋集的海淀区得以敬陪末座。

对“清场令”消极抵抗的另一典型，是原本被安排做清场“东路一梯队”的39集团军116师师长许峰。如前所述，39军在5月22日到达通县三间房之后，除了解放军三总部首长的密集慰问以外，还进行了自身严格的素质教育。据116师一营二连上尉李晓明回忆：

“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我们于5月22日早晨6：00到达北京市通县三间房军用机场驻扎。部队驻下后，基本与外界隔绝，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岗把守，不许官兵随意进出。我们当时获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解放军报》。部队对官兵教育还是到使馆区维持治安，不能向人民开枪，谁开第一枪就要向历史负责等等。”

直到6月3日黄昏5：50，39集团军已分四路向城区开进，军长傅秉耀“突然接到军区前指指示”，令116师改变集结地”。据傅秉耀回忆：

“这时，此部队已开出很远，我一面用电台通知，一面让车高速前进追上师参谋长和团政委，在两车并行中下达了命令。”

这个改变的命令就是：116师改使馆区警戒为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

据李晓明回忆：

“6月3日下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6月4日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上级没有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部队官兵也都感到气氛紧张，情态严重。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最后，我们军队后退，群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我们师长也许听到、看到更多。他回来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长头脑简单，说：师里怎么会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116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这时，大概是北京市民也知道有的部队开枪杀人的事，都躲了起来，没有人敢在街上拦阻军队和堵路，我们部队完全可以顺利进城，但车队就是不直接进城而是一直在城外绕行。中间每人都发了子弹，甚至看到一些坦克杀气腾腾地向城里开进。6月3日午夜，我正睡着，忽然听到马达响，睁眼看见一辆装甲车向天上放着枪，将挡路的公交车推开，全速向城里开去。这时，我们部队也完全可以随装甲车进城，但却仍然未进城，仍在效区绕圈子。”

许师长一头扎进通讯车再也没出来。战士们对“收不到讯息”的说辞不以为然，但军长却力图帮他圆谎：

“我打开指挥机，由于四周高楼林立，电波被阻隔，与各师的联络中断。”

“我于是身着便装，带着作训处长和炮兵参谋乘车去寻找。”

“我的车在北京的大小街道上穿梭着……”

最后，他搞清楚，115师受阻于建国门，116师还在遥远的八王坟。此后，他似乎将集团军指挥所迁到疑似大雅宝附近的“一幢高层建筑”，而站在这个建筑的“平台上，北京城一目了然”。他写道：

“这是火的城市，震动的城市。我的士兵们就在这血与火中！”

既然已经转移到这座高层建筑，通讯应当已经恢复。但傅军长仍然留有后手：除了军队出发的时间，军长大人此后的所有纪事，都没有时间！但是，细心的读者还是会发现，从《戒严一日》开始，军史中已经没有了许峰的名字。军长提及116师的行动，都不是在师长的名义下，而是在一个叫艾虎生的团长带领下执行的。艾团长的回忆则似乎说明，他一直是团为单位，在独立行动。

晚8：03，该团在八王坟受到“上万人”围堵和砖石袭击。9：20确定迂回战术改道高碑店后，直到11：20，500多人的部队才通过分散潜行的方式，完成在一座铁路桥上的集结。据艾虎生回忆：

“……记得那种感觉，到处都闪着红灯，有铁路沿线的红灯，也有火，这一簇簇一片片的红光在夜空跳跃，在我们的士兵们一夜之间似乎消瘦了许多的脸颊上跳跃……远处的叫喊声传来，与近处的溶在一起，那更远处的吼声又在城市的四周狂抖不止，把夜震了个东倒西歪。我们站在摇摆不定的夜里……我们的目光都热得烫人，狂热的目光撞到一起，简直撞出了火星，我能觉到每一根神经都在疯狂地撼动着，什么都别说了……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是怎么了，然而念头却有一个：挺进！再挺进！”

他们臂挽臂沿铁路西进，四次冲过堵截的人墙，终于在凌晨2：20进入北京站。在这里，艾虎生获得的消息是，已有两支队伍经过此地，一支“被围打、分割”，另一支硬冲了过去。

图9-9：39军艾虎生团进京路线（北京站）（陈小雅摄）

“我们怎么办？”此时，艾团长想到了小时候被高年级学生打翻在地的情景：

“狭路相逢，勇者胜！”

他们唱响了军歌，“以十路纵队臂挽臂，踏着正步冲过人群”。被誉为“钢铁七连”的连长尚福堂、指导员吴健飞也和战士一起手腕手，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战士刘杰，右腿被砸坏了，跪倒在地，被战友一把拉起，血流如注……班长邢德龙3次昏倒，手插在战友的臂弯里，细若游丝的意识却仍在指挥着双腿……”

“血也从我的身上、腿上流出来。我抹了一把脸，湿漉漉的，大概是血水汗水，兴许还有点激情的泪水。”

第八节 建国门

就在116师的艾虎生夜奔在诡异的铁路线上时，作为39集团军的另一支劲旅——115师正经历着另外的考验：

如前所述，6月3日晚7：00许，奉命开进的115师的1000多名官兵在建国门立交桥被堵截、被分割、被包围。他们的军车车胎被放气、篷布被撕破；士兵的背包、雨衣被抢；压缩饼干被人放进保温桶里泡了汤；有的军官被人吐了一脸唾沫，还有不少士兵被打得头破血流。遵照部队临时“紧急会议”的精神——“在还击暴徒有可能误伤群众的情况下，没有上级的命令，一律不准开枪”——在6个小时里，干部战士忍受着围堵群众扔来的砖头、汽水瓶，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让血水和泪水一齐往肚里咽，硬是用事实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人声鼎沸的立交桥逐渐平静下来。

4日凌晨，木樨地开枪的消息传到建国门立交桥后，气氛再次紧张。为防止武器落入暴徒之手，该师的干部、党员纷纷站出来，手挽手、肩并肩，在弹药车周围迅速组成一道道坚固的人墙。但是，不久，意外发生了……

据当时和部队官兵在一起的115师师长张作礼描述：

“夜里1：00左右，一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行进到建国门桥上，为了躲避人群阻拦，避免撞伤群众，不慎将暴徒推作路障的我某连一辆卡车刮翻。……一时间，队伍像脱了缰的马，有的战士甚至痛哭叫喊起来。……”

张师长的回忆，没有掩盖装甲车造成的翻车事故，但没有说明，遭受群众巨大误解、忍屈受辱6个小时都过来了的士兵，为何情绪会突然失控？因为他们第一次见证了死亡！而且，死者是自己的战友……

据香港《文汇报》记载，在这个时间段，同时有两辆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来回穿梭”清道：

“……不仅用最高的车速行驶，而且见人不避，逢物必撞，充满了挑衅性。……将许多单车碾成了铁片，骑车人跳车而逃，伤了多人。其中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竟然将一辆运兵卡车撞翻在地，当场将一个士兵头部碾爆致死，脑浆、鲜血溅了一地！车上的其它士兵倒在地上，跳起身来破口大骂，大叫‘老子不干了！’”

一位署名“中共党史评论员”的文章，也曾提到建国门翻车案。它写道：

“暴徒是谁？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还是架着机枪，满街草木皆兵驾车巡逻的人们解放军？在建国门桥上，是民众推翻了一卡车军人？还是解放军装甲兵杀人杀红了眼，或是因平时训练不够，在夜晚不能正确地识别敌我，而撞翻了那一车的弟兄们？”

一时间，39军部队“起义”的谣传甚嚣尘上。

显然，如果只是刮翻了一辆被军队废弃的卡车，没有伤人、死人，不会发生张师长所说的“队伍像脱了缰的马，有的战士甚至痛哭叫喊起来”的情况。幸得此事就发生在笔者上班的社科院大楼跟前的建国门立交桥上。据当

日在大楼值班的同事告诉我：他闻讯赶到现场时，只见建国门桥上的士兵围成了一圈坐在地上，个个低头不语。圈子的中央，是一具士兵的尸体。

这位牺牲的战士，究竟是如谣传所说“从车上甩下来摔死的”？还是被刮倒的卡车“砸死的”？还是直接被“碾死的”？在真相揭晓以前，我们可以根据情理作一个推演：

第一，如果这辆卡车——如张师长所说——已经被群众作为路障，官兵们应该不在车上。因此，士兵不可能是摔死的；第二，作为路障的车辆，在东西向的道路上，应该是被南北向横置的，那么，士兵只有在车身的东边，才会被西边过来的装甲车撞翻的车压死，否则，他会直接被装甲车碾死；第三，如果这辆车在军人在场的情况下被设置成路障，这个路障就是军人默许的。那么，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张师长的说法：

“我意识到，如不迅速控制局势，稳定情绪，部队就很难守住建国门桥，一旦这里失守，等于打开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大门……”

这就是说115师的任务就是驻守建国门立交桥，他们没有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并不是由于发生了翻车事故，而是他们的任务使然。那么，他们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接下来请看：

“4日凌晨4：30，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在路灯熄灭的瞬间，部队调整完毕。全面控制了建国门立交桥的交通要道，将万余人拦阻在立交桥外侧。”

张师长的描述告诉我们，他们的任务就是警戒建国门一线。再具体一点，就是阻断使馆区与天安门广场的通道。他这一说法，得到了集团军军长傅秉耀回忆的证实。因此，建国门桥上那辆被横过来的军车，既是群众设置路障的一部分，也是军队工事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在不知情的群众的帮助下，军队得以完成的任务。如果这样，大量军人处在车辆的东边，名义上“被阻”，

其实是在就地执行任务。至于是不是他们也接到了临时改变的开进命令迟迟没有动作；抑或是由116师的抗命迁怒于115师；才引发38军帮助开道的装甲车的暴行——从《戒严一日》中我们知道，每辆装甲车中都坐有级别很高的戒严指挥部军官？还是38军装甲车误把39军的工事当做了群众设置的路障给推翻了？这只有等待更多的史料揭晓才知道。

总之，虽然39军“起义”的谣传很不靠谱，但恼怒和不合作，是情理之中的；被迫开进又拒不开枪，对于军队的牺牲是巨大的。

据时任总参装备部大校、罗瑞卿之子罗宇回忆：当时部队行进受到群众阻拦，底下请示怎么办时，“上头”确有人说：“你们手上的家伙是烧火杆啊？”可面对军队的父母——人民的抗拒，人民的军队就是有人甘愿手里的武器什么都不是！这，是他们的光荣！

一位路过的送货司机，曾目睹39军“神枪手四连”在高碑店挨打的景像：

“……那辆车上有20几名战士，石块、砖头、汽水瓶从路两侧向他们飞去，雨点一样打在车上、战士身上，钢盔叮叮咚咚响……军人们怀里都抱着枪，可他们就那么任人打着，好像怀里抱着的不是枪而是烧火棍——不，连烧火棍也不如，烧火棍也能回击、自卫呀！”

时任四连班长的李虎祥回忆，该连1964年获得国防部授予的“神枪手四连”称号。1984年连队由步兵改为装甲步兵连后，他们“练得地上神，车上也神，神得枪响靶落，弹无虚发”。他本人就创造过“10发96环”的成绩。6月3日，该连接到命令，从三间房军用机场向北京市内开进时，该连被置于团的“龙头”位置。但是直至西路一梯队开枪，“血洗天安门”的谣言传来，他们一直被围困在距广场14公里之遥的北京第二外语学院附近。期间，他们碰到4辆“路过的装甲车”破障、引路。连指导员为制止焚烧坦克，被打得满脸是血：

“我们有枪不能开，只能睁着眼看着自己的指导员让暴徒们殴打，因为我们怕误伤群众。借着微弱的灯光，我们看到指导员的脸上流着血，无法躲闪的砖头石块打在他的腿上，腰上，胸上，打得他趑趄趑趄。我们的心都悬着，怕他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汽车已慢慢启动，车上的人不能再下去。我们只能用愤怒的眼睛，代替怒吼的枪口……”

直到4日凌晨4：00多，这支骄傲的部队仅仅向前挪动了近千米！

“我们车上有500多发子弹，如果开枪的话，保住自己冲出重围是没问题的。然而黑压压的人群，良莠混杂，黑白难辨，这枪怎么开呀，好人的不理解，却伤了我这颗军人的赤子之心。”

在整个被困被打的过程中，当事人目睹了团政委头部被打成重伤；参谋长手被刺破；团长被围困；自己的副连长被困被打，被人叫嚷着要“开膛”。他还目睹了车上弹药的爆炸……最后，直到自己被打昏又被工人救走，他们依然抱着自己的“烧火棍”！

事后，在军事博物馆展出的戒严部队实物中，有一幅军人写的对联：

抗日寇打蒋匪援朝击越老子何坚不摧

卫首都爱人民荷枪挨打儿子一拳不还

就在38军主力部队开枪突入木樨地的当口，11：55，38军炮兵旅侦察班押送的一辆满载弹药和防爆器材的篷布卡车，却在翠微路南翻车。

据信，这辆车是从100米处的总参通信部的大院开出的，向北刚刚行至翠微路口，车辆准备向右拐上复外大街时，意外发生了。

笔者读到的这次事故的最早报道称：

“暴徒们把解放军的克制当成软弱可欺，肆无忌惮地在翠微路推翻一辆军车，将车中的6名解放军烧成焦炭。”

但事后在车厢后部押车的侦察班长王山，却提供了不同的回忆：

“我觉得车身向左倾斜，并且斜得很急。是不是离心力太大？但车速又不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车已经向左翻倒了。”

“与车翻倒的同时，我看到像蓝球一样大的火球从我的对面八九米处飞了过来，直冲车厢的下侧。顿时，火球引燃了车厢尾部。”

“我们10名战士全被车上的防爆器材压在车里。车前头的5名战友都被死死地砸在车底下，挤在一起，“车厢后边的陈祥、郑志明、任放、王小兵和我也都被砸在器材底下。除王小兵以外，我们4个拼命挣扎，双手死死抓住车厢上搭篷布的栏杆，用尽平生气力，‘嘿’地一声，爬了出来。”

“我看到王小兵的一条腿露在器材外边，便死死抓住，拼命地往外拖，我向外拖，他向里爬，我怎么也拖不动。我想，他可能把我当作歹徒了。……”

“……王其富、李强、李栋国、杜怀庆、徐如军也都被压在车厢里，一直没有爬出来。”

“‘啊……！’‘啊……！’惨叫声从火海中传出来。这是车厢前边的5名战友的痛苦叫喊。我撕心裂胆，心如刀剐，和郑志明迅速向车头赶去，准备救他们，但两手空空，凶猛的烈火发出淫威燎着我们，一点也不能靠近。”

“这时，车厢里冲锋枪上的弹夹‘呼呼’爆炸，子弹的温度急剧升高，一颗颗呼啸着从火海里飞出，嗖！嗖！嗖！从我们的眼前飞过，如一群蚂蚱到处乱蹦。一颗子弹从我的左胳膊擦过，但我毫无感觉。”

“一群反革命暴徒瞪着吃人的目光试图抢夺我们的枪支。”

“任放紧紧握住冲锋枪，两眼红红的，牙齿已咬破了嘴唇，他把枪口对向了暴徒和群众混杂在一起的人群，右手食指扣进了扳机，只要手指一钩，沉积在胸中的仇恨怒火，便会呼啸而出。”

“我心里明白，开枪意味着什么。便跟他说：‘不要向人群开枪。’”

这时，大火已经从车尾烧到了车头。当翠微路的消防中队赶来时，王山回忆说，消防队员也遭到了暴徒的追打，消防水管也被截成了数截。6月4日凌晨1：05，距翻车时间1小时零10分过后，这辆在军队大院包围之中的武器弹药车在一声巨响中爆炸。六名战士成为了烈士。此时，大约也就是在38军主力部队突进至民族文化宫时。

1989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王其富等6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这份命令说：

“王其富等6名烈士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旅战士，在1989年6月4日参加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不惧艰险，惨遭暴徒焚烧，壮烈牺牲。”

这个《命令》隐瞒了这辆武器弹药车从丰台总后仓库开回，又从总参通信兵部开出的过程，完全不提在军队大院环抱中的这辆车从翻车到爆炸整整经历1小时零10分的漫长间隔没有获得有效救援等等难解情节，关于事故的原因，《命令》说：

“为不撞伤群众，他们冒着危险减慢了车速，一伙暴徒乘机向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由于车的左后轮被暴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在向右转弯时车身严重倾斜，向左翻倒。穷凶极恶的暴徒蜂拥而上，更加疯狂地向车上投掷燃烧物。整个汽车被烈火吞没，油箱爆炸，被挤压在车内的王其富等6名同志壮烈牺牲。”

图9-10：作者对六烈士事故地点和原因探访记录

据王山回忆，他和战友们都是隐瞒了自己的伤情，“抢”着来完成这次任务的。不可想象的是，那些在烈火中跳动的“金蚂蚱”如若被射向群众，会不会有更惨烈的局面？一辆行走中的车辆为什么左前胎没有被扎，左后胎被扎了？没有人交代司机和在驾驶座旁押车的是什么人，以及他们的去向。

据一位38军炊事班副班长回忆，第二天晚上，就在隔街的万寿路一家大酒店内，“聚集600多人饮酒盟誓，要不惜一切代价袭击通信兵部，企图切断通信网络，破坏戒严部队的平暴行动。”显然，这都不是一般平头百姓可以想象的事情。

就在39军116师艾团长率部在铁路线上向西奔进的同时，从南向北开往同一目的地的15军，在越过南三环以后，在凉水河遭遇了阻抗。他们不得不弃车徒步，并改变从中轴路直奔前门的路线，沿凉水河南转道马家堡东路。出于减少伤亡和开进压力的考虑，他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派出一个排继续沿中轴线“佯动，掩护大部队通过”。二是将“突围开进的时间”延宕至“凌晨1：00以后”。

图9-11：戒严部队开进路线（东西南）

奉命“佯动”的一个排，由空15军43师2营4连排长——少尉游德高带领。此时的游德高，母亲患癌症、爱人生病住院，但他毅然接受了赴京执行任务的命令。据新华社记者报道，“自己和三个班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部队行至木樨园铁道口时，左侧有一伙暴徒趁着黑暗，用路基上的石块向他们猛砸，战士们的头盔被砸得乒乓直响。游德高立即冲到队伍左侧，指挥战士拉开距离，快速通过这一地段。歹徒们发现他是指挥员，石块雨点般地朝他打来，他的腰部和左腿被砸得鲜血直流。他毫不退缩，坚持指挥，直到战士全部通过铁路道口，他才离开。”

4日凌晨0：00左右，游德高带领的部队沿木樨园、永定门一线向北开进。这时，战士们已经12个小时没有吃饭，不少人体力不支，开始掉队。“而一

伙暴徒却气焰嚣张地尾随在队伍后方10多米处，不时投来砖块、酒瓶子。他主动要求担负后卫任务。他一边大声地提醒新战士：‘快跟上！不要掉队！’一边轮换着帮战士扛机枪和压缩干粮筒。”

跑着跑着，他发现新战士陈连喜跑不动，要掉队了，于是“大步跨过去，用右臂挽住小陈的胳膊，拉着他跑。接着，他又发现三处负伤的新战士贾庆龙走路一拐一拐，落到了队伍的后边。游德高赶过去，把小贾的半自动步枪抓过来，背到自己肩上，用左手挽起小贾的胳膊，跟着队伍往前赶。”

部队经过7公里强行军到达珠市口。在冲过一道路障时，“年仅17岁的新战士江小平被暴徒投掷的石头击中左腿，倒了下去，游德高赶紧俯下身子拉起小江。这时，一个暴徒趁游德高不备，举起铁棒朝他头部猛砸，游的后脑勺被打出一条四五厘米长的血口子。接着又飞来一块砖头，游德高两颗门牙被砸掉，一头栽倒在地上。”

当他发现一名战士要冲回来救自己时，他大声命令战士：“不要管我，快赶部队！”后来，多亏两名便衣警察冒死相救，游德高才幸免于难。但由于伤势过重，游德高在医院昏迷了7天7夜。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全排官兵没有丢失一件武器装备和物资，按时到达集结地点——大会堂东门。游德高以自己的行动，率先垂范了自己常对战士们讲的一个道理：

“当兵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当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要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军人的天职。”

事后，游德高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即使派出佯动部队，并且将开进时间推到凌晨1：00，但今夜北京人似乎并没有睡意。据15军军长左印生回忆，在开进的军车上，连他也被砖瓦击伤。他们还遇到了燃烧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军指挥所对开进策略进行了调整：

“各级指挥员都要站在最主要的指挥位置，随时让部队看到自己的身影，听到自己的声音。对群众的过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让，采取‘打大雷不下雨点’的办法（即端枪上刺刀、对空鸣枪，产生威慑力量）。我让鸣枪示警的战士全部站在队列正中央，以免误伤群众，部队呼喊口号，奋勇向前开进，效果非常好，群众逐渐散开了。”

“午夜1：25，我们先头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先期抵达天安门广场的南侧。”

左军长的回忆，即便完全真实，显然也只是该军“先头部队”的开进状况。但在先头部队的后方，这支部队依然和群众发生了严重冲突。据当事人回忆，当有人发现部队只是对空鸣枪时，“一个胖胖的年轻人”一边投石一边发起了“冲啊”的呼喊。这时，一个军队干部“对准这个带头打砸部队的暴徒脚下打了一枪，后边的也再不敢追打部队了。”据戒严指挥部派往15军监军的中校干事赵晓强回忆，15军副军长左印生“一直跟部队徒步行走，指挥靠前，喊哑了嗓子，喊掉了假牙”：

“由于前门大街路面窄胡同多，两旁的居民楼高，很多石头、砖块、玻璃瓶子，还有菜刀、斧子、垃圾撮子、笊帚头、西瓜皮、烂西红柿，都不知是从楼上扔下来的，还是从胡同里甩出来的，特别是珠市口到前门这段路上，前有拦截后有追打，街道两旁楼上和胡同里一齐向部队袭击，只听官兵的钢盔嘣嘣响，形成了一个立体交叉的石雨区。暴徒们狂叫着：‘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战士们听了这话，气不打一处来……有的气得几次打开枪保险，请求多放几个连发，就是不往身上打，也要吓一吓暴徒……”

据39军军官回忆，当时的冲锋枪一个连发就是20颗子弹！记载虽然说领导劝止了战士，但“多放几个连发”的描述说明，他们已经放了不少次，并且是经过同意的。事后，丁子霖的死亡调查中也有在这一带中枪的无辜者。当然，在这支队列中行进，并非都是15军官兵，还有先期在凉水河桥南受阻的“兄弟部队”三个团。据15军的侦察排长报告，这三个团的前方部队已

经到达前方的木樨园、永定门，并被切隔阻挠在那些路口。于是，15军收编了这支被切割的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最后也一同到达前门。

从事后披露的前门一带警戒任务的分配位置看，这支被收编的队伍很可能是20军某师的一部分。只是未见该军敢于标明“出身”的相关回忆，笔者无法证实其真。但不敢留史铭志，本身也是一种证明。

时任《亚太经济时报》驻京记者的罗立为，目睹了北京军区28军的抗命行为：

“6月4日上午，28军坦克部队，行至复兴路中国工程院（？）附近，遇抬尸游行，见死者均是平民，部队领导集体下车，在路边开会。经过一番商量，两位领导行至第一辆坦克前，命驾驶员下车，然后二人上车，将坦克猛然开动，撞向立交桥。然后，二人下车，走向第二辆坦克，命驾驶员下车，二人再上坦克，将第二辆坦克猛然开动撞向第一辆坦克，造成两辆坦克相撞起火的场面。然后二人下车，将部队撤回原地。后该部领导集体被送上军事法庭。28军番号被取消。”

多年后，解放军空军政委、作家刘亚洲曾在一个内部报告中透露，28军军长和政委当时确曾玩笑似地讨论过，他俩将来谁上军事法庭？与20军官兵在木樨园桥头遭遇的“御敌于立交桥之外”相似，这两位首长感受的是“遍地青纱帐”和“十万青年十万军”，暨深陷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侵华日军的处境。

事后，负责善后的军队从木樨地桥下的水道中打捞出的武器，据称都是这些军人丢弃的。4日上午10：00民众焚烧了该军遗弃的74辆军车（其中包括31辆装甲车、2辆通讯车），据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亲眼所见，有军人为烧车行为充当了技术指导。

据担任北京军区总医院第一批医疗队队长的副主任军医田慧英记载，“6月4日凌晨1：30”她们接到赴人民大会堂抢救伤员的命令。经过一番准备，

她们于“4日凌晨7：00”出发，“7：30准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在待抢救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伤病员500多人”中，有“7名重伤员”。其中“第4名是眼球扎伤，玻璃渣子嵌入眼球，左眼已失明”。

第十九章 清场

（鸣谢：本章主要资料提供者：章立凡、封从德、王鹏令、张健、梁海琼）

第一节 民主大学

就在木樨地军民箭拔弩张，血战开场的当口，天安门广场的民运领地内，按原计划举行了“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

这个“大学”，是5月29日0：00，北高联、外高联、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营地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全国高联”时议定的。设想是用香港支援的帐篷设立教室，以广场为根据地，办成黄埔军校式的大课堂。

据李录回忆：

“民主大学的……想法来源于5月23日，我们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我、伯笠、小封、柴玲都在，我右边坐的就是香港的邱延亮。当时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我们干嘛那么正式？我们要搞联欢，要办学校，办营地，我们跟他来彻底的和平，对抗彻底的暴力。’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关于广场整个秩序的规划。”

“因为我们也在考虑，运动结束之后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长期进行。……我们知道广场指挥部这种东西毕竟是暂时的，所以就希望有一个长期的。而当时决定在6月20日退出的时候附议了广场上的民主大学将继续存留下来，并一直保留下去。”

“到了5月26日就和潘毅画了广场整个的联络图，……这个设计图分了十大方阵，十大部门还有民主大学都在这个设计图之内。这个图划得非常巧妙，是潘毅和他的助手一起作出来的……后来就由他们几位组织了几百个外地学生成立了一个搭帐篷小分队。这个帐篷搭得很有成效，一天之内在南面就全起来了，第二天北面又上来上百个，把香港送来的全部的材料都用完了。……民主大学没有人去落实，其它的只要是那个图上的都落实了。”

“这个时候张伯笠回来了，他就去落实民主大学的事……在一两天之内办起了世界上第一所这种类型的大学。”

张伯笠回忆似乎说明，民主大学的设想来自两个方面：

“成立民主大学的背景是这样，因为外地高校的不断涌入，我曾经跟外高联谈过多少次……回到本地去搞一个天安门广场，比在这儿好。现在这样就造成有点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样子。有很多人不懂民主。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运动向更理性发展，因为当时已经决定是不撤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已经成立。指挥部成立那天，我在联席会议的时候，跟郑义简单商量了一下，能不能把它搞的高一点，搞什么形式。我当时提出一个比民主沙龙要大，那么就是要办一个天安门大学。郑义表示支持，他说，‘这个想法非常好，但要具体设想怎么干？’这个框架就当时产生了，两天以后我见到了潘毅，李录就跟我讲，‘潘毅，这是张伯笠。张伯笠有一个设想，要办一个大学。他们也有这个想法，你们能不能合着办？’当时我想从资金方面，包括从教员方面香港会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后来因为香港这个大学不同意加入人员，说可以提供资金，但是不加入人员，可以帮助你们。”

马少方的回忆则指出，民主大学的设想与整顿广场秩序有关。他说：

“记得有一次会上，郭海峰说广场上太混乱了，得想个法子整顿广场，让大家运动不误学习才好。我就接着海峰的发言说，应该在广场上办个学校，让大家可以在具体的运动中学习民主。我不知道张伯笠是不是受了那次会议

的启发，开始了艰辛地办学筹备工作。张伯笠和郭海峰，还有梁兆二都是那种实实在在的干事的人……”

办“民主大学”的资金主要来自香港的捐款。张伯笠回忆说：

“在民主大学筹办的过程中，香港批给我们一笔钱，数目不小，要搞一个大讲台，……但是因为时间有限，那个纠察队长叫什么我不知道，年龄很大，当时跟李录、柴玲关系配合很密切，这个人一直没办成讲台，到要成立那天也没办起来，但钱是支了。后来潘毅告诉我，‘你还可以支一万块钱为了筹备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后来这笔钱我没去支，用了赵世民这笔钱，买了一个录音机，2800，还有其它设备，还有绳子、红布。他说总共花了7千多，但据我想是4千多。”

“当时设计有一个联络图，把这个民主大学放在民主女神下面，就是中心。李录也讲了，如果民主大学办成以后，整个的组织，包括指挥部就都设在民主大学那里，把运动往一个理性的方面发展，本身是个象征嘛。初期准备工作我就招收人员，广播里喊了多少次，大概有60多人报名，经过严格审查收了40名，因为有的没学生证。要求必须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才能作工作人员，而且固定，你不能再走，不能像广场指挥部那样，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了，这个不行，要作长期打算。在26日中共的电台就警告了，‘现在广场有一些人和香港某大学在搞一个什么民主大学。这个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是非法的，组织者要完全承担法律责任。’对这个警告我们同学有的就害怕了，40个人就退出了8个。我就开会跟他们讲，责任由我负……毛主席说了，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他经过哪个教委批准了？他们是培养军事人才，我们是培养民主人才。我们既不发毕业证，又不收学费，只要来天安门广场的就是学生，天安门广场就是我们的课堂，960万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的校园，要你什么批准？我这样一讲，大家的精神就又振奋了，振奋以后就办。基本什么都办成了，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联系教授……”

5月28日，张伯笠向柴玲提出辞职，提取了一批写作资料，并向封从德要了一笔经费，开始专职筹办民主大学。请陈鼓应讲第一课，请严家其当名誉校长。他还想请出方励之，但是方“怀抱琵琶半掩面，千唤万唤不出来”。

“严家其问我，‘你这个民主大学宗旨是什么？’其实我们当时还没讨论这个问题，但突然就冒出了八个字，可以用这八个字作办学方针和宗旨，就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严家其说，‘这八个字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改一个字，法制的制要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区别很大。’我说，‘这很好，我可能想的时候是那个制。’所以把宗旨也就定了。定了以后他说，‘好，我接受你的聘请，我作名誉校长。’我说‘好，我们现在就筹备开幕式。’我们定的是5月30日开幕式，就是开学典礼。”

“……继续筹备就让人去做舞台。可这个舞台让我等了两天，我已经失去希望了。第一天他说给我办了，第二天又说人家很为难，第三天说联系不到汽车，因为舞台相当大。当时我想没问题，因为民主女神都能拉来，大舞台当然能拉来。……

“到了6月3日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镇压，我说，今天一定要办起来了，不要他那个舞台了。拿着联络图按照位置是在这个民主女神像前面，因为那都是外地的学生，外地学生就很愤怒，‘我们的帐篷你们给我们挪了是不行的。’那时候是无政府主义，谁说也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挪到了民主女神像的东侧。我当时首先告诉他们搭帐篷，我们搭了八、九个红色的帐篷，整个形式都非常好，还搭了个大帐篷放广播台。那么这个舞台怎么解决呢？因为要讲台呀。于是我就找法大的同学联系，……弄了七个桌子，就搭上了一个简单的讲台。”

6月3日晚8：00以后，学生领袖们不断接获从各处传来的戒严部队已强行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消息（其间，曾有自称为解放军现役军人的人士或亲赴天安门广场，或打匿名电话，明白无误地告知：戒严部队今夜将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他们已接获中央军委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命令）。学生领袖们虽

然无法判断和查证消息的真伪，但还是及时通过广播站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要求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赶快返回校园召集同学，一起来保卫天安门广场。

可是，专心致至的张伯笠似乎并没有理会周边的变化：

“我就安排程序，起草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致词。这个致词大概是1200多字，改了多少稿，是很精炼了。当时设计的就是首先剪彩，然后是各方代表讲话，我致开学典礼致词，第一课陈鼓应。可是陈鼓应在医院，他心脏病复发，那天他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不能赴约了。……那么这第一课就忙了，我说必须严家其来讲，他来上第一课。派了三个人打电话找严家其，找了三次找不来，我一看已经9：00了，我说现在就开。可那边呢？就已经接到了开枪的消息。”

“后来推迟到10：00，才正式开始。这时严家其还没有到，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柴玲来了。我说，好啊，严家其没到，咱们哥儿剪彩吧。当时非常正式，买了几百米的红绸子，花了很多钱，这么大的花。用新剪子剪开以后，我们俩就举了起来，然后就掌声雷动，民主大学就正式揭开了开学典礼。当时有1万人左右吧……”

当张伯笠宣布开学时，广场上北京市政府的喇叭突然打开，再次警告当事人要负法律责任。张伯笠再次当众重申他的理由时，竟然引来听众的“哄堂大笑和热烈的掌声”。

接着，柴玲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致贺词。当她谈到“越是黎明即将到来，黑暗就越是浓重，但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时，在场者再次激起了“亢奋情绪”。

原定请吾尔开希作为学生代表致贺词。但因此时找不到他的身影，张伯笠请马少方代表大学生向民主大学致贺词。据马少方回忆，当时他已从台湾《联合报》记者王震邦那里听说，在丰台，部队已经向市民开枪。因此，他的发言不长，但情感激越：

“如今以李鹏为首的现届伪政府，把屠刀指向了善良的人民。我坚信：历史的绞架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终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之后，老木代表“联席会”向“民主大学”致贺词。

赵瑜代表作家的致词，也给具有文学情愫的吴仁华留下深刻印象，他说：

“偌大的中国除了良心、公正和勇敢，什么都不要！民主与自由是在万众一心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已然是一个光辉的象征——直面鲜血与枪弹，中华民族要再生！为此我祝贺！”

这时，严家其和高皋终于赶到了。张伯笠立即请名誉校长上第一课。严家其就“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含意和他对今后局势的看法讲了大约45分钟。在讲话中，他再次呼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并废除李鹏签署的戒严令，并呼吁罢免李鹏。其中一句“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给尚不知军队已经强行开进的听众留下了不祥的印象。

轮到校长老鬼讲话时，忽然寻不见他的踪影，更给事情带上一种诡谲的色彩。它与此时广场仍然沉浸其中的懒懒的气氛一道，形成一出荒诞剧的特定氛围。

严家其讲完以后，是民主论坛。

此时，军队已经开了杀戒的消息传到广场。不断地有人在广场学生的广播站失声痛哭，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的杀人。11：50，学生的高音喇叭里又传出急切的声音：“我是军博的一名文职，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在开枪！他们在开枪！我确认在我离开时，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说是橡皮子弹，有人说是实弹，我相信他们会包围广场。”

“广播未完，人们就全站起来了，依稀听见西边像过年时放鞭炮声，声音时紧时松，声音连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红，很可能还有火光……”

第二节 死亡信息冲击广场

据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邹明回忆，6月4日凌晨0：51，就有大批部队从前门东侧进入天安门广场。他们的聚集地在纪念碑东侧。这支部队的归属不详，有可能是39军艾虎生带领的部队，也可能是20军的一部分。大概是不成建制的原因，但这支部队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也不为军史所载。因15军文献记载到达广场的时间是6月4日凌晨1：25——这成了有记载的、戒严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最早时间。

38军先头部队到达天安门的时间，比15军只晚了5分钟——是6月4日凌晨1：30。

此前，在6月3日晚11：32，38军一辆奉命开道，代号为322的装甲车，经过刘家窑—天坛公园—磁器口—和平门—正阳门，堂堂皇皇地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这个“怪物”的突然出现，使得原先还烟火缭绕的广场东路小吃商摊转眼间隐入了黑暗。有女人惊得哭叫起来。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周边还没有路障。这辆装甲车以“不低于60 多迈”的时速 飞快地在广场上兜了两圈，又到崇文门—宣武门一线转了一圈，最后决定停在大会堂西路。

惊惧的人们开始咒骂：

“法西斯，滚回去！”

“刽子手，滚回去！”

此时，正好从南长街来到人民大会堂北路的笔者一行人看到，身着汗衫、脚穿拖鞋的市民用棍棒敲击着这座铁甲怪物。一时找不到武器的群众，撬起大会堂周围地面的水泥砖，砸碎了充作武器。路过的人们纷纷以分到一块碎砖，并向这个庞然怪物敬一石为快事。

稍后，322装甲车的一条履带被卸落。在两位戴校徽的大学生帮助下，受伤的副驾驶被送往市急救中心。

此时，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似乎还不相信当晚会清场。据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的教师孔祥智回忆：

“（我）大约在晚10：00左右，骑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和‘高自联’的喇叭都在广播。在‘高自联’的广播中，有人鼓吹‘以暴力对付暴力’，‘维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人大的帐篷，没有发现认识的学生，但几个人看到我戴着人大红校徽，便主动上来和我交谈。我对他们讲，今晚政府要采取措施，希望他们把大家劝回去。但他们认为可能性不大，有一个学生说：‘5月19日、20日夜里的情况比今晚严峻得多。’”

清华大学邹明事后的回忆，大概也代表了很多学生当时的想法：

“10：00左右听‘高自联’的广播说，6月4日0：00至1：00部队很可能进入天安门广场，我想看看部队是怎么对待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的，于是留了下来。”

当第一名学生在复兴门外大街军事博物馆附近遇难的噩耗传回广场时，位于纪念碑东北角的原绝食团广播站——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帐篷内顿时变得死一般的静寂。接着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哭声。

当广播站播出这个噩耗时，更多的人哭了。由于完全没心理准备，学生的两个广播站都没有预备哀乐磁带。有人只能放开歌喉，以一曲悲凉的《哀歌》抒发悲愤之情。

不久，广播里传来吾尔开希愤怒得失控的声音。他一会儿哭诉自己的女同学无辜被戒严部队军人枪杀的经过，一会儿高喊：

“他们已经拿起了屠刀，我们要团结起来！”

“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血、我们的汗、我们的泪，来坚决要求严惩杀人犯李鹏！李鹏不死，不足以平民愤！血绝不能白流，我们的同学不会白死的。严惩杀人犯李鹏！”

“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

据《华侨日报》4日头版报导，吾尔开希在广播站还说“学运经历过一段和平阶段，现时有需要作出正当防卫，并不违背非暴力原则。”

可能是出于过度的激动和悲伤，笔者从广播中听到的他的声音时断时续，最后，广播中传来呼叫救护车的声音……

吾尔开希走后，广播里出现了另一个女声，大概是还想极力振作精神的柴玲。她一会儿声嘶力竭地质问：

“市民敢死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市民敢死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一会儿又领头宣誓：

“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

据周舵回忆，大约此时，几个学生搀扶着一位满头血污，面无人色的军人挤过来，一边高喊着“别打，别打”。

“人们刚七手八脚把这人护送上救护车，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事后，戒严部队从一名英国记者手里缴获的一盘录音带，也反映了清场前广场人员和思绪的混乱。一个人气急败坏地对英国记者讲：

“快和中国断交吧！”

“快叫美国出兵吧！”

旁边有人插话：“美国太远了！”

“叫苏联出兵吧！”

“把邓小平、李鹏他们通通抓起来！”

——这，是广场学生听到军队开枪第一阶段的反应。

此时，封从德意识到，是将财务部清点转移的时候了。

“刘光这时也急迫地催促我：必须赶快转移财务部，再晚怕是救护车都全撤走了。我同他商量过转移的办法，就是利用广场上的救护车，将财务部的同学‘救’出广场。……”

我到纪念碑三层，将姚晓燕和郝建江单独叫到一个帐篷中，对他们宣布转移。我让他们带上几个得力人员，悄悄进了‘北大特纠’的棚子，孟昭强在这里负责，我请他派几个特纠守护。”

“在这个棚子里，我又对大家讲了眼前的危急局势，与大家商定转移方案，并为指挥部人员留下五千元，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我有些后悔没有多留些，记得这时财务部还有7万多人民币，港币则约30万，但由于之前王文的绑架案，我不愿再引起猜忌，心里却又实在觉得对不住指挥部的同学。”

“我宣布了行动方案，指定二人护送这笔钱。当我点这二人的名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期待着接受这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我同二人商定好联络方法，并对他们说，万不得已时可以毁掉钱，但必须保住账本，以对历史有所

交待。他们保证，将以生命来保护它。这时，刘光已在棚外等得不耐烦了。他在广播站呼叫救护车，我亲自背着其中一个同学，穿过马路到历史博物馆前，这时只剩下二辆救护车了，而且都正发动着，随时要走的样子。”

“我和刘光将两位同学送上救护车，这时一个年轻人惶惶跑来，医生无论如何不让他上车，开着车走了。这人追了几步，抓住车后什么地方吊在车上，但不到100米便摔了下来……”

第三节 巨兽的末路

0：20，38军的003号装甲指挥车在天安门东侧的金水桥边熄火。该车乘员一共9人，除指挥员大校副师长佟喜刚外，还有两名上尉军官，一名兄弟部队中尉参谋，两名战士和正副驾驶员，以及北京军区装甲兵部副部长——解某某。由于他的存在，该车官兵气焰高涨，引为自豪。据各方回忆，这是一辆“装甲指挥车”。它曾途经蒲黄榆—崇文门—东单—王府井—建国门，并在东长安街上来回破障。因曾“嘴衔”一块马路上月牙形的“安全岛”横冲直撞，给许多目击者留下深刻印象。美国人权组织“亚洲监督委员会”一直在广场采集资料的罗宾·芒罗曾雇了一辆三轮车，跟随其后，一直跟到建国门。因此，这辆装甲指挥车，很可能就是建国门撞翻39军运兵车的凶嫌。此后，003号继续发飙，在返回中国革命博物馆北门时，众目睽睽下撞死了一个正在翻越隔离栅栏的黑衣人。

还没有见过血和火的皇城墙下的居民，在骤然来临的暴行面前突然失聪——一阵耳朵什么也听不见的短暂间歇过后，紧接着便爆发出山洪一样的怒吼：

“压死人啦！”

“压死人啦！”

“打，丫亭的！”

此后，有十余人携带棍棒追逐着这辆装甲指挥车。他们将手中的木棒、钢筋插向003的履带，但飞快转动的齿轮将轧碎的木屑和投掷不中的钢钎反弹而出，反打在周围人的身上。但这些人并不停手，他们追赶着装甲车，反复运作。终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东观礼台前，有一根钢钎稳稳地插入履带的“负重轮和诱导轮”之间，接着，又有多根铁棍插入，最终把轮齿卡死。003前趋后倒、左腾右挪，都无法摆脱这些钢钎——这头恶贯满盈的巨兽终于停止了喘息！

更多的人围了上来，朝003泄愤。他们或用手中的棍棒把铁甲敲得“当当”作响，震得自己的虎口欲裂；或随手扔出手中的石块，石块反弹，又打在其他人身，一片混乱。这时，有人拿来了几床棉被，抛上装甲车盖。有人爬上车身在棉被上浇上汽油，最后将它点燃。

“有人开始攀上车顶，用巨型大石砸紧闭的小钢窗，鼓励之声如潮涌起，于是有更多人逞强。挤在人群背后的一个中年人用沙哑了的声音呼喊：‘不要给人制造借口！’可是，无人理解或者能克制了。”

“几张棉被铺在装甲车上，怒火燃起。10分钟后，两名头戴钢盔的军人耐不住高热，终于打开钢门逃生。两人甫出车门，立即被人围殴，有人更呼喝要把其中一个抛到紫禁城的护城河里，但3个学生迅速紧抱头破血流的军人，苦劝各人冷静，不要伤害子弟兵，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结果两个刽子手得以保住了性命。”

救出这几个军人的，是后来在附近被枪击重伤的广场纠察队长张健。据他回忆：

“……我制止住大家的攻击，并让3名军人坐最后一辆救护车离开。一位市民冲我喊道：‘为什么不打死他们，你知道这辆车撞死了多少人吗？’”

清华大学热能系学生戴东海从另一个角度目睹了这一幕：

“（我）看到靠近东观礼台一带有一辆装甲车着火了。一会儿又看到一些人搀扶着一个士兵朝历史博物馆附近的救护站跑，后面有人拿着木棒追。”

由于这些紧急事件的发生，很少人注意到，1：00整，天安门广场上政府的广播开始反复播送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的《紧急通告》。有人似乎是第一次知道，政府已经把反戒严的抵抗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发出了“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的号令！之后，三颗信号弹在北京的夜空升起，大会堂西南角的军队朝纪念碑上方发出一阵密集的射击。四面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出一道道闪光的弹迹……

网，已经越收越拢了！

第四节 不撤的理由？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此刻，他“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此时，部队已开到西单，离开二龙路医院的杨继绳已经不可能穿过西单返回新华社，只好绕道复兴门，经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的胡同返回。

“在各个小胡同里，都有年老的居民们站在家门口。他们神情木然，满脸惊恐、焦虑，低声议论。……”

在右安门南侧，沿护城河一线排列着望不到头的被阻军车。军人整齐的脚步声踏破了夜空的宁静。而隔岸的半步桥监狱却门窗紧闭，一片死寂。显然，部队开进的路线，有意避开了这片敏感之地。

政府《紧急通告》播出后，给广场带来了新的骚动……大约在此时，得知戒严部队开枪消息的梁二和马少方匆匆离开了北京饭店。半小时前，他们应台湾电视台举办一个“两岸学生联欢活动”的要求，通过饭店的长途电话，向中正纪念堂前的台湾学生致辞。回到广场后，二人首先到广场指挥部，马少方通过广播，报告了与台湾学生的通话情况。梁二则向李录提出了撤离广场的建议。

此时，在军队与市民的混战中，市民已经死伤惨重。人们往纪念碑下的“救护中心”送来了已经死去的同学。那里的地上，躺着身上血肉模糊的学生、市民，也有被学生纠察队救下来的士兵。

“北大筹委会的姬军也满身是血地跑到指挥部来，对柴玲激动地讲述他在长安街上如何与军队遭遇，一个9岁的小孩如何死在了他的怀里。血衣一件件地送来，血泪见证在广播中不断地控诉，形形色色的子弹也来作证：从食指粗的弹头到连壳长达八九厘米的重机枪子弹、开了花的弹头、手术室取出的开花弹头的碎片……一切都证明，他们真开枪了！”

据封从德回忆，此前一周，在柴玲和李录爆发冲突，柴玲提出辞职但仍坚持在广场时，李录、柴玲和封从德三人之间曾达成一个“分工协议”，并共同认为广场的领导机构有必要适应形势作进一步的调整：

“持久战成为既定方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实施。本来我们三人的默契是：柴玲务虚我们务实，李录主外我主内。但这样的格局在现实面前也开始不那么合理了。”

“广场长期的混乱状态，使李录越发相信强力的必要，对柴玲的柔弱也就不能满意了，柴玲的任命常常出问题：任命过XX作学运之声广播站站长，不到一天便发现此人徒有其表；任用几个秘书处骨干也能力平平且有贪污之嫌；纠察系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作彻底的整顿……。我也希望柴玲退下来休息，希望李录能出马统领广场，毫不担心他会像开希那样专权。我对民

主力量既有信心，也认同混乱之中需要集权的观点，而这个角色非李录莫属。他被几个同学私下称作‘土匪头子’，广场上的各路纠察队对他不是佩服就是敬畏。”

“但是，走这一步的最大危险，是领导层权力重新分配可能引发广场进一步的不稳定。要作这样的调整，须经广场营地联席会议表决，还得向首都各界联席会议通报，操作起来这么复杂，又有多少人明白这一步的必要呢？不过，李录还是逐步作了准备，比如更多地各种公开场合露面，作为舆论和心理上接纳他的准备。他盘算着进一步利用海外媒体来巩固指挥部的既有权威，约好了美国之音下周一（6月5日）的专访……”

显然，李录还没来得及走到这一步，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已经提到了他的面前。自学运转化为全民民主运动后，学运与民运全局已经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论学运参加者及其领袖如何能在“非暴力”问题上坚持原则，它已不可能洁身自好。尽管，自政府的《紧急通告》连续广播后，在广场留下的人，都是自主决定准备迎接命运的人，但在前方，在围堵数十万大军的数百万民众里，更多的人对流血和开枪镇压并无心理准备，也无法承担其后果。此时的广场——不论你坚持“和平”还是转向“暴力”——每多坚持一分钟，前方可能就多牺牲一个人。

但此时的李录，显然只有对广场同学负责的意识，而没有建立起对运动的“全局思维”。他对梁二的回答是：

“一时很难全部撤离天安门广场。”

“但我们希望能够将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都组织到纪念碑周围静坐，并且处理好学生送来的军人故意丢弃的军用物资，避免给军队提供滥杀的口实。”

事后，李录解释了他当时为什么没有撤退的想法：

“这时就作出了一个决议，所有的人员立刻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手挽手肩并肩，帐篷里不允许留任何人。同时我派出一些人，请所有的人都回来，不要再去堵军车，因为在这个时候关于屠杀的报道已经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时候伤员多得不得了，每个人都血糊啦喳的。想通知开会什么人也找不着，各种表决也不清楚，而且情报部长也找不着了，总之已经不再履行职责。谁也不知道军队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什么消息也没有了，只知道军队在三个方向向天安门广场进军……也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就到了广场。对于各种各样的判断已经没有办法作出，如果撤的话，撤到哪条街道上？哪条街道是生路？因为当时的感觉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进村以后，把村子包围了一样，哪条道路都出不去，出去就杀，反而呆在家里还有一线希望。所以我当时的基本想法是以静待动，我先把广场成为最和平、最安详的一块地方，让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要死大家就死在一起，要没有死的话还有可能保留一个生的机会。”

“在这个时候，封从德就说了，‘我们撤到纪念碑上去，我去那边安一个广播站，’这时候封从德就转移到了纪念碑三层。……从那个时候起，封从德就一直作了最后的主持，那个时候我和柴玲在下面的指挥部钳制大部分的人，因为他们来就是瞎捣乱，我们在那坐着，至少可以钳制这批人，给封从德一个机会，在那边重新建立一个指挥部。后来就是这个指挥部保留了最后五千人的生命，最后把他们带出广场。”

向纪念碑集结的决定作出后，梁二和马少方首先想到的是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总部，据梁二回忆：

“如果这样一撤下来，工自联就成为一个孤岛，我和马少方当时就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相互交谈之后，我记得当时有潘毅和李兰菊，我们一块到了工自联。我们与他们交涉的结果是，一个络腮胡子的人答应，必要的时刻撤退下来。后来我得到一个工自联来的朋友给我的信息说，他们确实是撤下来了。”

但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仍有一些工人自告奋勇前来，要求登记加入，参加最后的斗争。一位汽车司机掏出驾驶证，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但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办不了入会登记手续了，因为会员证和有关资料都已经转移了。”

此时“工自联”的广播传来一位刚从西长安街回来的工人的讲话：

“李鹏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他们现在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越输越赌，越赌越输！他们现在已经再也输不起了！……我刚从军事博物馆那边回来，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坦克已经到六部口了，很快就会把天安门广场包围起来。我亲爱的同胞们，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你们愿意在坦克的统治下生活吗？……”

听完这个讲话，愤怒的人群纷纷寻找能够自卫的“武器”，有的手提棍棒，有的怀抱石块，争先恐后地朝六部口冲去。

军队到达六部口的消息，促使一批围观者作出离开广场的决择。我们一行四人中，李肃是北京中青年理论界的熟人，阮江宁是《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主任、张萍女士是专程赶来北京的专业摄影记者。他们已买好明天离京的车票。特别是阮江宁已办好出国签证，他不打算就此牺牲。而我，那天晚上是从家中逃出来的，写了好遗书，连相机、笔记本和手表都没戴，因为我认为所有的一切，连同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了。在考虑带身份证还是带工作证时，我选择了工作证。因为我不打算让父母替我收尸。在1989年，我们的观点严重对立已经伤害了彼此的感情，我甚至希望他们最后知道，然后用我的死来教育他们。所以，我对另外三人说，你们走吧！但他们说，既然大家一起来的，还是要一起走。拗不过大家的义气，我只得跟他们走。

这时，李肃发挥了老北京“领头羊”的作用。他估计，军队包围广场，观礼台上应该是安全的，而且登高望远，那里对形势看得最清楚。于是，我们跟着一群人朝西观礼台走去。

据张健回忆，此时，南部开来的15军已经逼近广场：

“前门附近枪声大作，火光四起，杀声震天。我和学生敢死队赶到广场南方支援。很远就看到一大群军人过来，他们个个右臂缠着白毛巾……（我）双手捡起一丈多长用来搭帐篷的竹杆，冲上前去，跪在路中，试图以此阻挡军队的前进。这些军人冲到我面前，稍一停顿，便立即斜刺冲上历史博物馆的台阶，并架起机枪对准我们，当士兵们从我身边跑过的时候，我看见有些士兵竟然泪流满面，还有一个军人突然举拳高喊：‘我是北京人，我爱大学生！’这一幕真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到底是什么人，逼着这样一群同龄的年轻人重演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到底是什么力量？……”

当他返回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个纠察队员告诉他，西线的学生纠察队和市民组成的防线已经被戒严部队突破，而且死伤惨重。于是，他又亲自带着二、三百人向西面跑过去：

“此时，我们已经看到远方的火光，我看到许许多多，自以为是信号弹，实际上是枪弹飞向天空的情景。在我们向西冲的时候，许多远距离失效的子弹飞溅抽打到腿上，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子弹……我看到潮水般退下来的群众，远远的戒严部队闪亮的钢盔。”

当我们一行搭人梯爬上西观礼台的时候，广场西北方的长安街上，已经拉起许多卫隔离墩。张健和纠察队员把广场上带来的棉被和隔离墩上的可燃物全部点燃：

“当我们向前冲到500米左右，也就是新华门向西500多米的位置，我们已经看到不远处有戒严部队冲过来。前面的市民和我们的同学在向后撤退，在两边的人行道上，许多市民和学生抬着一个个浑身是血的人，有的因伤痛惨叫，有的则已没有气息。……”

第五节 38军进入广场

6月4日0：00时左右，戒严部队领导相继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踵而至的是政府有关领导。他们“一块决策清场计划。”据戒严部队某部中校傅水生回忆，“部队首长”，中有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等；“政府有关领导”有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而陈希同回忆，李锡铭和他本人、万里也都到场。“为减少冲突和避免流血，将军们、领导们彻夜未眠。1：00许，旅两名军官浑身是血、满脸是伤，跑到指挥部向首长报告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首长询问部队情况，他们说徒步上来，受伤严重，所带干粮被烧被抢。‘为什么不鸣枪？’‘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随后某集团军军长也来报告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首长留他在指挥部。他说我的指挥位置在部队，就匆忙走了。”

此时，经过一天来“弃服微行，轻装简从”渗入北京市区，并已成功集结到大会堂的27集团军，已接到“清场指挥部”发出的捣毁天安门广场“高自联指挥部”的命令。在大会堂二层会议厅，紧靠广场的一个套间里，刚刚到达的15军军长和监军赵晓强领受完清场任务后，撩开厚厚的窗帘，俯瞰着情绪波动起伏、秩序零乱的广场。在那里，张健带领的敢死队员，点燃了堆成了一个个的小山的棉衣、被服和杂物……

此时，我们一行四人在西观礼台站立未稳，就被身后的人推挤着，沿观礼台过道盲目地继续往西。在这条过道的尽头，等待我们的是“工自联”指挥部暨广播站。现在，这里除了逼人的尿骚气，已人去楼空。在这股气息逼迫下，来不及凭吊的人们又互相帮扶着爬下观礼台。此时，我们的身边还没有军人，但戒严部队的车灯已经越逼越近，越逼越近，强光照射下的长安街一片惨厉的白！

不一会儿，就可以看见38军大部队呈六路纵队的队形：中间两队是军车，军车的两旁，是持枪徒步的军人，军人的外围，是一手提白木大棒、一手持

盾牌的武警。路边仍有不少围观者，但比较沉默。我们四人中，阮江宁走在最前面探路，张萍因为要拍照一直走在最后。李肃则在首尾之间联络。在整个6月3日夜晚到4日凌晨，我们4人曾多次走散（因为我们各有自己的关注焦点），又多次聚合到一起，并能在最后一同撤出，当推李肃首功。

在这个四人的队列中，我虽走在张萍的前面，但实际上是英勇的她的追随者。因为她面对军队拍照时，有时需要我这个“掩体”。而在不需要“掩体”时，她又会毫不犹豫地甩下我，冲到别的地方去。每当这时，我都会在原地等她。记得有一次，是在大部队靠近我们之前，有人点燃了我们身后观礼台前的冬青树和月季花丛。但立即就有两名便衣军人（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后），挥舞着手中的物件上前扑火，紧跟其后的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军人操作的摄像机。这时，我才发现广场西北角燃起了一堆又一堆火……这些，都没有逃过张萍的镜头。她甚至看见了一个身穿黑衣的纵火者！

在张萍身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战地记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对我而言，情况就是命令！”她在突发事件面前的反应敏捷，在危险时刻的奋不顾身，面对题材的锲而不舍，以及对身边一切资源——也包括对我的身体——的利用，27年过去，回忆这一幕幕场景，每每令我热泪盈眶！

大约就在拍摄扑火镜头的同时，38军的大部队已经开过我们身边。我们，不意间——站在了天安门广场和西长安街那条界线上——成了这支部队踏进天安门广场那一刻的见证人。张萍用夜光片——通过从我叉腰姿态的咯吱窝下伸出的照相机镜头摄下的这一幕，一定还保存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

38军大部队，就这样在我们眼前滚滚开过，进入广场。《38军军史》记下的这个时间是1：30。

20多年后，我才知道，张先玲的独子王楠，就是在那一时间，在那一带，因拍照中弹身亡的。事后，他就被埋在我们身后28中学的花坛里。

大约此后不久，在我们所在位置的东边——天安门前毛泽东画像下的金水桥上，一个青年忽然中枪，倒在了英国《泰晤士报》东亚编辑梅兆赞的身旁。据梅兆赞回忆，半小时前，他也曾亲眼目睹003号装甲车在东长安街碾人实况。而身边这个青年，几分钟前还相信军人使用的是“空心弹”。

“我见到迎面而来的士兵的脸孔时，记起一位有经验的军人告诉我，在越战的战场上，当你能够见到敌人的眼睛时，他也可见到你双眼，这时便会开枪射你。是时候走了。”

感觉到形势的危迫，梅兆赞打算穿过天安门门洞离开广场。但是，他立即被早已集结在天安门和端门之间的武警部队堵了出来：

“我的自行车留在漆黑的紫禁城，于是打算通过城门，骑自行车回去发稿给伦敦的报馆，报道我见到的一些事情。十多名武警从紫禁城出来，不消数分钟便开始殴打在我附近金水桥上的示威者。武警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后，便用手枪射他们。”

“我开始快步绕过武警，但他们发现我，向我走来。我举起双手，以普通话说我是外国记者。他们喊：‘外国记者，你妈的’，然后就用长长的警棍打我。我以为他们会把我打在地上，然后开枪，但他们打掉我一只牙齿和打断我的左臂后便离去。”

“另一家报纸的朋友和意大利副领事曾喝止武警打我，他俩没有逃走，反而前来救我。他们带我离开广场时，意大利人把一些弹壳放在我的口袋。他说：‘不要丢失这些，明天他们会否认曾开枪。’”

这时，从西长街返回的张健，已经和学生、市民一道，溃退至天安门东观礼台。

“再向东一点的位置就是燃烧的坦克。此时戒严部队和市民学生处于僵持着的状态。大家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戒严部队进攻的队形是这样的，最

前面都是拿着冲锋枪的士兵，他们做直立射击状。在这排士兵后面是一架带支架的摄影机，由一个军人操纵着，士兵后面是一个军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中校。”

大约是6月4日凌晨2：00—2：30，一辆公共汽车（“平暴”录像显示为47路公交车）从南池子方向沿天安门前的机动车道，由东向西开来。行至东金水桥前，又急速向右转弯，横在军人的队列和从长安街撤下的学生、市民之间。但它立即被乱枪击毁，司机当场身亡，活着的五、六个人被军人从车上拖了下来。据戒严部队目击者描述：

“官兵们破窗一跃而上，将车上6名暴徒抓获，同时还从车上搜出两大桶汽油和10多个燃烧瓶。战士们在抓获的‘高自联’常委、秘书长郭海峰身上，搜到一个烫金红皮学生证，上印‘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生证’，编号18824306，还有天安门广场无限期使用通行证、指挥部人员出入证。”

在场的张健也认出，最后一个被拖下车的，正是郭海峰。于是他冲上前去，企图隔开军人和被捕的战友。

“后来一个中校军官对我举起五四手枪射击三枪。其中一枪射中我的右大腿，导致右大腿上三分之一处，肱骨粉碎性骨折。子弹没有贯穿，其中子弹的铅融化在骨头里面，另外部分停留在右腿外侧肌肉里面。直到2008年11月22日在法国取出，这颗中国制式的7.62MM子弹一直在我身上停留了19年。”

图9-12：张健的X光片。肱骨仍残留弹片（张健提供）

为了掩盖这次赤裸裸的枪杀，事后，戒严部队伪造了一个“火烧天安门城楼案”，栽赃“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门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

张健被周围的学生和市民救起后，送到了纪念碑上的广播站外：

“我让一名学生去告诉柴玲，我不行了……纠察队员把我和另外3个重伤员抬到121吉普车上，已经有3个人躺在车上，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北医大的学生，他们流着泪对我说：他们3个不行了。上百位市民和学生推着这辆被打坏的车子一直把我们送到同仁医院。”

事后，当晚在广场值班救护的北大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大夫山刚志证实，那天晚上他确曾处理过“肱骨干骨折”的伤员。

大约于郭海峰被捕、张健受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学生程仁兴，在国旗旗杆附近中枪遇难。而那时，离开了“工自联”帐篷的马少方，正好在国旗旗杆下，劝电影学院的同学到人民纪念碑下聚集：

“电影学院的同学认为，还是在国旗下比较稳妥。他们说，部队包围广场，主要是占领纪念碑，不会在外围花太多功夫。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旗一挥，游行返校了。……直到海峰的那辆车被机枪扫射，有颗子弹落在国旗下电影学院的队伍中时，……有同学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将子弹捡到手，立即被灼痛，立马扔掉，喊了句：‘真子弹’，电影学院同学才慌忙跑向纪念碑……”

与此同时，身在广场北侧偏东位置的北航学生李相看到：

“从（47路公交）车后跑出一个白衬衫男子，在隔离带附近跌倒。因为枪声非常杂乱，但凭感觉是被枪击。”

李相本能的冲过30米长安街，被隔离带持枪士兵用枪口逼停：

“81式自动步枪的枪口非常的小，持枪的是北方士兵，问是学生吗，掏出学生证后，缓和的说，你们都死多少人了，还那么执迷不悟吗？无语。被击倒的白衬衫附近一个当官的，对着我们这边高喊，过来一个人，意思是把伤者抬走。一下僵持的情绪放松了，心里非常感激那个军官，因为两个男人僵在那里，不知会如何收场。”

之后，李相越过隔离带，背起了这个伤员。据李相估计，此人身高约在1.70米左右，年龄约在25—30岁之间。在两、三个解放军的帮助下，他们一行缓慢地向广场移动。在长安街车行道中心，他们呼喊着什么。这时，过来一个“戴黄色肩章”的校级军官参与了帮扶。李相回忆道：

“背上白衬衫，感到他满嘴的散啤酒的味道，但他仍在我的耳边说，‘哥们’，‘哥们’——讲的是北京话。背人走到广场，自己竟然感到快虚脱般的疲惫，广场上的人马上接过伤者，我看见了他背后有一滩血……”

而李相自己右侧后背的T恤，也沾满了血迹。

当时在历史博物馆附近观察的香港专上学联代表陈清华也看到：

“凌晨2：30左右目睹一人向广场中央走动时背部中枪倒下。”

马少方也记得：

“在我们撤离纪念碑的途中，有群人抬着一个受伤者，从广场急急穿过，直奔停在不远处的一辆救护车。”

据张健回忆，他腿部中枪后被抬回广场，首先被放在纪念碑下。李相、马少方和陈清华所说的中枪者，是否同一人很难确定。从口中散发啤酒味和北方口音看，很像张健，但受伤部位、年龄和身高不符。那么，此人是否就是程仁兴呢？据丁子霖调查，程仁兴是湖北农村出身，25岁，身为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双学位在读生。这与李相所背的伤者年龄相近，但与满口“京腔”，口散“啤酒味”的特征不符。而且，李相所背的伤者，遇难地点在距离国旗杆东200米左右的北面长安街路边，而不是坊间所传程仁兴的遇难地——国旗旗杆附近。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这个伤员，很可能是这段时间广场遇难的第三人。

但是，李相提供的伤者情况，提醒笔者再次审视山刚志大夫的证词。他说：

“那天晚上不断有伤员送来。这些伤员一般是钝器伤，有的是扭了脚，或是手上割了口子。其中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我处理的伤员最重的是肱骨干骨折。一个解放军躺在地上，我弯腰为他治疗，一个汽水瓶从我脸边飞过，险些打着我的头。当时我们这个圈里气氛很融洽，我们给伤员喂水、喂饼干，一个伤员要喝水，解放军把自己的水壶给了他。” 山大夫的证词没有提到“胸部贯通伤”。但是，他非常严谨地说道，那只是他本人处理的“伤员”的情况。既不包括无处理希望的“已死”的人，也不包括别人处理的伤员情况。

据丁子霖调查，差不多同时，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遇难。

据香港《文汇报》记者记载：

“这段时间，除了广场北面完全为军队占领，不断有大批装甲车、坦克车由西至东开入广场之外，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东也出现了几批军队，但这几批军队当时并没有开枪。前门也出现了军队，几千军人占据前门箭楼的一块空地，一齐高喊要市民尽快离开。随后，逐渐演变到追逐市民开枪。”

第六节 最后的纪念碑

此时，指挥部广播站传来了柴玲的最后的语音：

“同学们，请镇静！同学们，请镇静！愿意撤离的同学现在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

“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最后的时刻！”

话分两头。大约从凌晨1：00开始，封从德组织人马陆续将“学运之声”广播站转移到纪念碑上：

“新的广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挥部）建在纪念碑三层西南角。我们启用了那台长期不用的发电机来供电，以防军方突然断电。有两桶汽油，足够烧一夜。我请了一位懂行的同学专门看管发电机，并让人将汽油隐藏到子弹打不着的地方，以防不测。”

与此同时，李录则通过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原广播站播发了紧急通告，号召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学生有序地向纪念碑底座集结，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

“同学们，不要害怕，属于我们的最后的、最光荣的时刻到来了。我们这次民主运动，直至今天，始终是一次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运动。今天晚上，我们仍将坚持这一宗旨。同学们，现在请大家起立，请大家手拉手，缓慢地向纪念碑靠近，在最后时刻，让我们在这堂堂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聚在一起，让我们紧紧聚在一起，共同接受历史的判决。对此，我们将永不言悔。”

此后，原先散布在天安门广场各处的学生在各自学校旗帜的引导下，缓慢而有序地向纪念碑集结，依次坐满纪念碑的三层平台和台阶，然后是纪念碑北侧空地。

此时，“亚洲观察”的罗宾·芒罗也回到纪念碑下。他看到：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从四周撤到了纪念碑的三级台阶上，看起来有3000至5000人坐在那里，互相靠得紧紧的。”

“纪念碑上的气氛是平静的，几乎令人感到压抑，但可以肯定，学生们没有惊恐感。”

据清华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成员、工程物理系学生赵明回忆，当该校已将队伍集结到纪念碑南侧二层平台上时，他环顾四周发现：

“这时，在纪念碑周围约有2000人，广场上的人已稀稀拉拉，气氛紧张。有的学生说：‘想尝尝催泪瓦斯和警棍的滋味。’有的准备‘决一死战。’……面临这种情况，清华大学‘筹委会’的几个人临时开了一个会，提出撤退的问题，但遭到个别人反对，理由是：‘我们不能当整个学生队伍的逃兵。’最后，我们提出让一个人同各校商议撤退的事情，但商议的结果分歧很大，未能形成决定。”

柴玲也再次在广播里重申，愿意撤离的同学，可以撤离。最后决定留下的人当时心中仍然存有某种信念，一不愿丧失气节，二相信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挨一顿棍棒，最终像电视新闻中南韩的抗议学生一样，被光荣地抬走。

凌晨2：00以后，柴玲、李录也撤到了纪念碑三层指挥部新址。自5月15日起建立的“绝食团广播站”，在持续工作20个昼夜之后，进入了倒计时。时任站长的王童，亲手砸烂了大家辛辛苦苦置办的器材，只带一只收录机，登上了纪念碑三层。

但随着这一迁徙，矛盾也跟着集中到纪念碑上来。据李录回忆：

“那个时候至少围了有几十个人，有拿刺刀的，有拿枪的。有人拿着枪对着柴玲说，‘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宣布我当总指挥。’柴玲还没有表示任何说法，那边已经把刀捅到了后腰上，不仅是杨朝晖，杨只是其中之一，说‘这么多人已经都死在那儿了，你要是还让人死在这儿，你就要做历史的罪人。我要为这些人的生命负责，如果你还不下令撤退，我先宰了你，然后我下令。’”

还有人用一把手枪对着柴玲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天亮，赵紫阳会带军队起义来支持学生……”。

封从德回忆道

“当时的紧张气氛难以描述。实际上，在纪念碑上同时有好几起不止于‘文斗’的两派争执，也不尽是市民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也不是所有学生都坚持‘非暴力’。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爆发阵阵骚动，新的广播两度险些被冲垮。那个拿枪的工人大约是‘工人敢死队’的，后来这班人马干脆离开纪念碑，红着眼去跟军队拼命去了。后来听说没有一个有下落。”

“我竭力维护指挥部的秩序，一面在广播中不断呼叫008和北大28支队来虚张声势，一面将带上的那二箱‘北京大学’T恤衫分发给守卫在广播站周围的同学，实际上无论是谁，套上这身‘号衣’便自然成了广播站的纠察。广播站周围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气势之下，再也没人捣乱了。”

“新开放的广播，采用‘自由论坛’的形式，让大家自由辩论，实际上还有发泄与稳定情绪的作用。经过一段激烈的辩论，‘非暴力’的原则得到了捍卫。这个原则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眼下，大军压境，一个人的暴力反抗等于是全体遭殃；长远来说，我们从一开始便坚持非暴力，不让血仇一环接一环地反复下去，便等于是拯救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和祖国的安宁。一个市民拿过话筒说：‘原来我不懂什么是非暴力，现在我明白了，这才是对付军队最明智的办法。’”

四名绝食的知识分子，也通过“自由论坛”阐述了“非暴力”原则。

此前，在邵江的请求下，周舵提出了“动员学生领袖带领学生队伍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以此避开戒严部队血腥镇压行动的锋芒”的建议。

周舵，湖南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父母为旅印教育工作者。本人出生于印度噶伦堡，是家中长子。中共建政前，幼年的周舵随父母回国，在广州中山大学上幼儿园。后迁居北京，在北大附小、清华附中完成了小学与中学教育。周舵从小受的是胸怀大志的教育。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的教导，令他终身铭记。但由于家庭的期望，他从小只

有一个志愿：当科学家。“我的目标就是进北大物理系”，多年后，他回忆道。

文革中，周舵的父母被关押，父亲精神失常。父母单位不发生活费，兄妹三人凭着母亲被捕时公安人员留下的400元钱，度过了多艰的一年。1968年底，周舵带着妹妹和年仅11岁的弟弟，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额吉淖尔插队落户，放羊度日。以后又转到河北白洋淀插队七年，其中三年当民办教师。此前，家庭和学校所给予的精英教育，使少年的他与“反智主义”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但落难经历令他感受到淳朴农牧民给予的人道关怀，又增近了他与普通百姓的感情。

周舵是一个孝子。1973年，他收到母亲终于出狱的消息：

“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学生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地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

然而，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当周舵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时，母亲立刻大声喝斥他，不许胡说！

“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这以后的三年（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完全演变成了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一部斗争史。

1973年底，周舵的父亲出狱，父母分居，周舵又承担起伺候精神病父亲饮食起居的家务。凭着身为人子的本能，过着白天黑夜在两个老人之间来回奔波的绝望的生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周舵母亲的精神垮了。虽然观点严重对立，他仍然每晚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的房间里，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赶来。”

“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在“返城大潮”下，一直“坚持农村干革命”的周舵不得不“病退”回京，在101中学和四中代课。1977年全国统一高考，周舵的成绩过线，但因“病退”造假的“肾病”和得罪片警而名落孙山。这次失败被一直“望子成龙”的母亲误解为受到自己的连累，也刺激了老人的反思和觉悟。但不幸的是，觉醒人以自杀结束了她短暂而扭曲的一生。

1979年，周舵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于光远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在北京外语师范学院、中央团校（后改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研究。1988年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主管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离副总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同时兼做《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外地报纸的特约记者。

学潮初起，周舵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学潮能冲击一下日益坐大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适得其反，反而再把赵紫阳搞下台。4月二十几号，他特地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

研究生，力劝他们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

“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矛头要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的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此后，他参加《亚太经济时报》“五四”讨论会，“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并参与促成了第二天的新闻界游行。学生绝食开始后，他受陶斯亮之邀，在学生与政府的斡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斡旋失败后他参加了陈子明、王军涛社经所的活动，并执笔了《告人民书》。之后，他偶尔参加一些“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活动，但似乎并不热心。他坚决反对绝食，但与刘晓波的“哥儿们义气”，终于把他拉进了最后的泥潭。他的事后表白让人相信，如果不能带走别人，至少，他会带走刘晓波。

“母亲去世后，我不断地做梦，主题永远是一个：我及时发现了她要做的事，把她救了下来。这梦不断地做了数年之久。由此，我知道了为什么说‘梦是愿望的达成’，知道了她的死给我内心留下的创痛是多么深。这是一道终生流血的伤口。

母亲远不是完人——远远不是，但我还是铭心刻骨地爱她——就像我深情挚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那样，尽管我深深厌恶中国人的肮脏、粗野、愚昧和丑陋，但我还是不能遏止这种无可理喻的爱。”

也许，正是这种“爱”，使周舵在这个时刻站了出来。当邵江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四位老师身上时，周舵并没有说服学生的自信。但他决定一试：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试了，不成功，我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上帝要灭这些人，那是天意。但是我不试，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再说四个人里我是老大啊！于是我就下了决心。”

他很容易就获得了高新的支持。因为对方早有此意。然后，他们一同去征求侯德健和刘晓波的意见。刘晓波表示反对。他认为局势发展至此，已经别无选择。在戒严部队的枪口下不能退缩，退缩就意味着背叛，对不起那些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而已经流血牺牲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然而，侯德健同意了周舵的建议。3：1，刘晓波服从多数。

接着，四人又商议具体方案。但正在这时，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上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架在了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要敲死谁。据周舵回忆：

“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劝说他们。这五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们一边哭着，一边讲述军队如何凶残……讲述他们如何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个平白无故地给打得满身窟窿。‘回去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刘晓波本来就结巴，此时连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劝说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

我走到一个年纪看上去不到20的小伙子面前，此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泪流满面。我劝那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那小伙子哽咽着告诉我，他19岁，是个体户。他说他家里有父母在，还有一个姐姐。我说死了的人没法再活过来，你去死也救不活他们。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亲还有姐姐会多难过？我们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千万千万别冲动，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

就这样，好歹劝这些市民敢死队把枪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邵江过来对我说他受过军训，问我是不是把枪栓卸掉。我告诉他快去！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已经把枪栓卸掉，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这人群里头还有好多抢在里边。一旦这里面枪声一响，那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非常危险……”

这个突发事件，使周舵觉得有必要在下来的行动方案中加上“收缴武器”一条。于是他提出了四条意见：第一，说服学生领袖，由柴玲和李录指挥学生撤退；第二，在广场广播站发表讲话，请广场上的全体人员放下手里的一切“武器”，准备和平撤离；第三，四人中派出两人去找部队谈判；第四，请部队配合，给学生留出撤退通道。

他们先来到绝食团广播站，对柴玲和李录进行动员。这时，刘晓波主动与柴玲和解。他告诉柴玲，“在最后这一时刻，我终于明白了广场领导情况的真相”，并承认5月27日提议设“人民发言人”一职，吾尔开希不是正确的人选。末了，他还给了柴玲“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一姿态，令一直对那件事耿耿于怀的柴玲感到宽慰。“我感到了真诚和理解”，柴玲回忆道：

“在我心里，学生始终没有能跟知识分子达成的联盟，在这最后的时刻终于建立起来了。”

就此，刘晓波也完成了由一个“愤青领袖”到“在野政治家”的华丽转身。但是，感到满意的柴玲没能给四人更多的回应。劝说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3：00许，四人又来到新广播站，开始直接动员学生。侯德健回忆道：

“好在纪念碑上还有另一个广播站，好在同学们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

碑接过其它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人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

之后，周舵也接过封从德手中的话筒，自我介绍之后，又介绍了四人和学生领导的“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他苦口婆心地说：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离。我们要求同学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周舵在广播里把上述内容讲了两遍，高新随后也讲了话。

此后，刘晓波和从北部返回的马少芳也通过“自由论坛”发表了最后的演讲。据广场指挥部情报部长辛苦回忆，此时，指挥部开始统一处理和销毁武器：

“那天晚上我已经很累，因为三天没有睡觉，最后大概睡了30分钟被我的保镖踢起来了，因为实在是叫不醒。我起来之后发觉，我的头下面硬硬的，我问是什么，他们说是机枪。我一听，开始还挺高兴，尽管我在晚上的时候收缴了三批武器交给公安局。这个机枪我一检查没有枪拴，我说这玩意儿留着我们都活不了命，又不敢抬出去，因为外面已经站满了军人。这个时候我就用我们那个小帐篷……里面的一个小被子把那个机枪裹起来，李禄的保镖，我的保镖和我自己抬着到纪念碑南面下去直到毛主席纪念堂前，喊‘一二

三’，扔到花木丛里面。因为旁边两边已经站了军警，我们害怕起误解活不了。具体时间是在3：40左右。”

处理完枪支的马少方再次向指挥部征询“坚持”还是“撤离”的问题。马少方回忆说：

“封从德好像说，至少坚持到早晨六点。 理由是不让屠杀被夜幕遮掩。我觉得他说得有理，就没再说什么，只是和梁二说：这里没我们什么事，我们应该回到学生队伍的第一排，我们应该在那里。”

梁二则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行为代表的是“北高联”，他回忆说：

“我们作为高联常委会代表，作为一度的学生组织者必须到广场的最前沿，我就跟马少方坐在最前沿。”

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自绝食以来一直和学生战斗在一起的杨朝晖。马少方回忆道：

“我和梁二又去叮嘱了香港学联的林耀强和李兰菊，大家拥抱，如同永别。然后和梁二、杨朝晖来到纪念碑正北，学生队伍第一排。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我的身后躲着香港著名记者蔡淑芳。她就在我身后，抢住机会就偷偷地轻按快门。……08年我有幸去香港，见到她那晚在我身后拍下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子弹打在纪念碑上发出火光的照片！”

话分两头。四位知识分子大约在“自由论坛”讲了半个小时。除了迅速处理武器外，在撤退问题上并没有获得期待的响应。据封从德回忆：

“停顿之间，纪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与枪声如除夕的炮仗，从远处传来。”

“自然也有同学操起话筒表示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北京市民冒死堵军车，我们在最后关头主动撤出阵地，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二，军队

不一定能够立即占领广场，只要坚持二个小时到天亮，百万市民就会涌到广场上来，我们就有希望坚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广场，一切便无可挽回了。”

“……四君子有点着急了，侯德健过来向我提议：由他们四人出面，与军方谈判，要求和平撤离广场，要求戒严部队在大家撤出时保证安全，他希望征得指挥部的同意。”

“我沉吟片刻，对侯德健说：‘你们愿意做什么，是你们的自由；你们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态去与戒严部队交涉，我个人表示钦佩；但是，你们绝不能说是代表学生指挥部去与军方谈判。与军方交涉的结果也必须经过同学们的表决才能生效。’”

之后，他们企图拉上柴玲，但柴玲回答说，自己是总指挥，不能离开指挥部。四人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出面找部队。刘晓波和高新留下，继续劝说同学，侯德健、周舵去谈判。

接下来的事情，当事人的回忆不尽一致，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据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宋松 回忆，与戒严部队沟通的建议，是他首先提出的：

“6月3日下午到晚上，我受医院指派，在广场值班。因为我当时没戴手表，很多时间只能估计。约凌晨1点多钟，听到政府广播让学生离开广场，我当时在纪念碑北侧下边治疗几个被玻璃划伤的学生，这时看到广场北侧有车辆被烧着，也听到了长安街方向的枪声。此时‘高自联’广播站有‘血战到底’之类的话，学生是一会儿传来一个消息，说某某被打死了，许多学生的情绪十分激动，很不冷静。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做些工作，让学生按政府要求撤出。但考虑我个人的作用不大，此刻到‘高自联’去提这样的建议，不一定起作用。我想到侯德健等人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可能会冷静一些。同时他们在学生中有一定名气，可能会起一些作用。我和侯等4人不认识，但由于6月3日晚约10：00受红十字会委派曾送水到纪念碑，知

道他们绝食的地方，就决定试一下。两、三点钟左右，我上到纪念碑最高层北侧，找到了他们。我以医生身份向侯德健等人提议，应该让学生撤出去，出现危险是不好的。侯德健等人谈到，他们也有这种想法，但他们不是‘高自联’的人，恐怕不好办。我又建议，是否可以和解放军直接谈一下。侯德健等人表示同意，并说希望我一块去，有个医生在场比较好些。我仔细考虑后，答应了。”正当他们向广场西边大会堂寻找军队时，同行的宋医生说跑去太危险，最好找一辆救护车：

“我从纪念碑下来拦车，当时广场上车很少，好不容易在广场西侧找到一辆小面包车，我向司机说帮忙拉侯德健去有解放军的地方，他说容易……”

这是一辆白绿相间的中巴。虽然上面坐着人，但一经说明情况，“乘客”均下了车。司机不仅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找军队，而且恰巧就给他找对了地方。这辆车飞快而又准确地绕广场半圈后，把他们送到了广场东北角。

“正在广场北侧集结待命的战士们大声喊道：‘面包车，快瞧！过来一辆面包车。’”

38军112师上校团政委季新国回忆道：这时团长赫飞也发现了驶来的面包车，忙对身边的几个战士说：“快！截住它，别让它跑了。”但不知为何，几个战士却喊道：

“别过来，赶快回去！”

“面包车‘吱’地一声，急刹住了，而后又慌张掉头，顺原道往回开。大概是车上的人发现并没有人开枪和追赶，车子很快停了下来。”

此时，大约是6月4日凌晨3：40左右。

“面包车在我团集结地点50多米的地方停下后，远远地看到从车上下来4个人。他们都高举着双手向我们这边走来，其中一个边走边喊：‘别开枪！你们别开枪！！我是侯德健！！！！’”

也许是恐惧的原因，周舵觉得，从下车到军队的警戒线大约有100多米。他事后描述，这段路程“简直就是走向地狱之路”：

“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一片。只知道对面就是坦克，就是机枪。走到那之后，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帮人，稀里哗啦，你也没法判断是什么声音，后来侯德健说是拉枪栓的声音。然后就听有声音高喊说‘站住！不许再往前！再往前就开枪了！’”

据宋医生回忆，从车上下来的四个人，除了他和侯德健、周舵外，还有“原来坐在车上的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几个军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侯德健说：‘我代表我们4个绝食的人，想和解放军交涉，帮助学生和平撤出。’”

季新国继续回忆道：

“我闻声走上前去，只见被称为侯德健的人，将右手按在胸前，慢条斯理地说：‘我是侯德健。’”

“听说来人是侯德健，不少战士纷纷围上来，都想看看这个以一曲《龙的传人》而轰动艺坛的歌星。”

季新国也没有放过这个近距离仔细观察流行明星的机会，不过言语中有一种玩赏到手猎物的意味：

“他瘦瘦的，穿着茄克衫、牛仔裤，戴着眼镜，留着长发，港味挺足，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塑料兜。但是，我怎么看，也没有在电视上看他唱《龙的传人》时那么顺眼。”

“和侯德健一起来的另外三个人，像是医护人员，他们穿着白大褂，胸前还印有红色‘协和医院’的字样。”

他的战士也没有放过羞辱这位孤独的外乡人的机会，不是拿电筒直接照射他的面孔，就是奚落地询问：

“怎么跑这儿来了？”

侯德健显然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修养。他只是扶扶眼镜，眨巴了几下眼睛，并不答话。此时，他也正利用那副憨厚的外表，从闪烁的镜片后面，用自己的眼睛仔细打量对面的军官。不过比季新国更善意一点：

“指挥官离我们不是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上前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见的那种40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不能称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们已经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

据新华社记者事后进行的采访，双方的握手似乎在稍后的时刻。因为大事当前，他们还没有互示友好的基础。据周舵回忆，他们说明来意和与学生协商的方案后，希望部队能给学生的撤离留出时间和通道。季新国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并答应马上报告指挥部。并要他们原地等候。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发生了两种不同的记忆，第一种记忆是季新国本人的回忆文章，他说“赫团长立即前往师指挥部，向师首长做了报告”。但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则说，“跑步到金水桥前，向现场最高指挥员报告”的不是赫团长，而是一位“顾副处长”。据介绍，顾副处长大号顾本喜，中校军衔，是“跟随部队开进的戒严指挥部工作人员”。

总之，不论是谁，这时，季新国和团政治处主任王剑中校并没有丢下四位来访者不管。季上校回忆道：

“王主任看了我一眼，将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故意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们再不撤，我们就不客气了！’”

“侯德健也不知道‘不客气’的分量轻重，说：‘撤，我们这就撤！’”

季上校继续回忆道，不一会儿，赫团长回来，还带来了刘师长和戒严指挥部的顾副处长。可能牵涉到与其他部队协调的问题，他们建议团里直接向军区领导和戒严指挥部请示汇报。刘师长并点名季新国去。事后，据李鹏回忆，这个讯息由在“天安门指挥部”坐镇指挥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上报了中南海的李鹏、乔石和杨尚昆三人。在大会堂的陈希同也听到了这个请示。他们都同意了这个“自动撤离”请求。

侯德健继续回忆道：

“就在他（季新国）走回部队没5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的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赶来，扳动枪械，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急待的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捡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4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劝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

大约去了十几分钟，季新国回到谈判地点，对谈判代表说：

“首长欢迎你们的态度。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乱。政府的通告你们应当早就听见了，已经播放了几个小时，反复动员你们离开广场。我们当然不愿意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几位这种时候来绝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们能说服学生撤离。时间已经不多了。上级命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天亮前完成清场任务。天一亮，市民出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一点你们应该能理解。”

周舵说：

“政府的广播根本没有说明从什么地方可以撤离，你叫我们怎么办，怎么撤离法儿？”

季新国说：

“广场南边一直留着通道。”

据季新国回忆：

“侯德健听完，原来紧张的神态，有些放松下来。但随即又问：‘你敢保证不向学生开枪？’”

“我立即回答：‘戒严部队来首都都是为了维持秩序，绝不会向学生开枪。’”

“侯德健从茄克衫里掏出纸和笔，将我告诉他的话记了下来。”

这时的侯德健，虽然依旧是一幅谦恭的外表，但却表现出对众人委托事项的责任心和敬畏法律的缜密风格——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打探起了“军事机密”：

“在我们的询问下，他告诉我们是部队的政委，姓纪（音），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纪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了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

他们相约保持联系，随时通报情况。

4：00熄灯，是戒严指挥部规定的“准备清场”信号。

“为什么要闭灯？外边现在有很多谣传，说闭灯后轻重机枪一起扫射，坦克压过去。其实，这是清场开始的一个统一信号。告诉所有部队，现在要开始清场了。另外一种考虑，就是给这帮人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

事后，27军某副政委这样解释说。

根据这个信号，早在广场东南、西南部完成了集结的15军、39军某团、54军由南向北，驱散人群，合围了南部广场，除东南角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外，宣布了“只许出，不许进”的规定；远在建国门的39军利用黑暗调整了队形，阻断了建国门外大街通往东长安街的交通。此前已受命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27军“特辑分队”，由大会堂东大门出发，直扑“高自联”指挥部。

与此同时，广场上播出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随后，又播出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要求：

“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知，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据《27军军史》记载，捣毁“高自联”总部的“特辑分队”由205名侦察兵组成。他们分别由27军的侦察一连、79师和80师的侦察连，以及80师第235团等四个连队选拔而出；由集团军司令部少校侦察参谋赵勇明带队指挥。

“4：25，我们连奉命出发……”

侦察一连上尉连长刘建军回忆道：

“我们占领出发位置后，两个连队向纪念碑南侧行动，一个连队正面推进，我连向纪念碑北侧出击。前进中，我连遇到的第一个障碍物是一些人点

燃杂物连起的火墙。这道火墙南北长60—70米，火头窜起2—3米高……为了尽快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我们交替掩护，拿出侦察兵的越障本领，选择火势较弱的地方，奋勇跃了过去。”

“穿过火墙后，我们改变成一线推进的散兵队形，快速前进……接近纪念碑外围帐篷后，我们按照预定方案，分组对各个帐篷进行搜索……”

特辑队提前接近目标时，据罗宾观察，广场上留下的人已很少，只有3000左右的学生挤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此时，侯德健与周舵已经返回，正通过广播做学生撤离的工作。在这个声音之外，有坚决不撤离的学生的口号声和歌声——他们按照约定的方式，维护着准备牺牲前最后的尊严。在肢体冲突之前，他们与特辑队士兵打起了嘴仗：学生让军人“滚回去”，官兵们则警告学生和看热闹的人“赶快走开！”“我们要清场了，请你们马上离开！”此外，官兵们还进行了“戒严合法！平暴合法！自卫合法！”的自我辩护。有的还斥责学生“不好好念书，把广场搞得乌七八糟”、“没有良心”！

为了说服学生撤离，四位知识分子继续苦口婆心地通过广播做工作。侯德健说：

“我是侯德建，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我们不能再流了。同学们，市民们，全体公民们，……我们已经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不是今天，我们早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们不怕死！但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们四人刚刚到指挥部谈过，我们已经答应尽量说服和必需说服同学离开广场，他们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大概也有批评“政府没有人性”之类的说辞。这些话或许能被知晓谈判内容的军官们理解，但“特辑队”听起来却觉得很刺耳。他们认为，这是“长胡子”的人还在“给一些人打气”：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连队几个干部一碰头，决定立即直捣设在纪念碑底座最上层东南角的‘高自联’指挥部。”

“指导员李相武带领二排突击班从北侧向上突击。当突击班上去时，一些人站起来进行谩骂、阻拦，干部战士大声喊道：‘蹲下，不准乱动！’……我们奋力扒开第一层人群，向第二层栏杆靠近。一个家伙窜上来夺枪，战士采取强制手段，将他驱开。突击班迅速冲到第二层栏杆下，因为栏杆较高翻不过去，于是他们就搭人梯上……”

几乎是与27军的特辑队同时，38军112师某部五连中尉连长张东旭接受了“推倒民主女神像”的任务。他率领8名士兵，趁熄灯之际，东凿西拉，扳倒了“女神像”。灯亮之时，“一辆装甲车轰叫着从上面轧过”，对这个诞生不到一星期的象征物，执行了“死刑”。

图9-13：6月4日凌晨，被摧毁的女神像

与此同时，据赵晓强回忆：

“从广场东南角方向开来4辆军用卡车……从车上下来二三百名防暴警察，头戴防护面具，左手持透明玻璃钢盾牌，右手拿电警棍，整队从纪念碑西侧向广场跑去，配合解放军清场。”

大概是因为这支防暴队伍开道，许多人记得在4：15左右（熄灯期间），有人在纪念碑的西南角释放了催泪弹。

赵晓强称，这批防暴队员与金水桥一线的38军汇合后，行进在装甲队列之前，引导车队前进。这一见证与任宗清、魏厚敏的记载相吻合：

“4：30，清场开始，按照武警在前，步兵居中，装甲车在后的顺序，由北向南缓缓推进。进至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时，部队和学生虽然相距比较近，但没有发生冲突，更没有开枪。部队清场中，对广场上的每个帐篷都做了检查，然后装甲车才通过。”

赵晓强的记述则更详细：

“武警和军队把散落在广场和留在帐篷里的学生和群众往南轰赶，不愿离开的，边说服边强拉硬拽，有的还不客气地用棍棒捅几下、用枪托子砸几下，采取一切强硬措施进行驱赶……”

这时，在纪念碑上，侯德健的劝说仍遭到一些人的顽强反对：

“软骨头！投降派！”

“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没人拦你！”

“有人冲到广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说是不许他再动摇军心”，封从德回忆说：

“周围的纠察队员死死地围住广播站，保护四君子与指挥部成员。”

这时，刘晓波抓住话筒喊道：

“同学们，我是，刘晓波！我是刘晓波！请大家相信我们，不要牺牲了！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样的。”

封从德回忆说，这时，稍稍缓过一口气的侯德健接着劝说道：

“同学们，我相信，现在留在纪念碑上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们都不怕死！”

在静听的人群中传来阵阵轻微的哭声。

“但是，我们死得要有意义！眼前的事实说明，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为之牺牲了！我再说一遍：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学们，请相信我们，赶快撤走！我会留到最后一个同学撤走为止！”

封从德认为，是侯德健这番英雄主义气概感动了大家，为最后决定撤走作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要大家撤走，这时还缺少一种形式。没有人愿意站起身来率先撤走。四个知识分子显然没有组织的经验。”

“这时，刘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须作个表决！赶快！赶快！’话筒在我手里。柴玲蜷在我旁边似乎睡着了，我不忍心去惊动她。李录显得很沉默。静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录好一会儿，要把话筒给他，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来主持这个重大的表决。但是，不知何故，李录似乎并没领会我的意思，照旧的沉默。”

“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感到内心异样的平静，宛如一汪清潭……我的头脑中异常清醒地产生了一个计划：口头表决。我这时感到最强烈的责任是作个表决，而并不十分在乎表决的结果如何。‘马上！必须快！’”

“表决，必须有个表决。我确信，表决本身，比表决结果还要重要。这既因经验形成的对于民主程序的信念，又与我当时的矛盾心情有关：这时我已不再坚持死守，原因不仅是因为侯德健的说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坚守广场’的优势意识已经被打破，军心已经不稳。”

他想起历次学运（特别是4月18日新华门事件）的经验，意识到“在两种对立的意见僵持不下时，任何群体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御攻击的”。在军队的攻击下，哪怕只有少数人撒腿开跑，整个场面必然大乱。混乱中万一发生踩踏事故，不仅会被政府当作笑柄，而且会玷污学生运动的形象。而这样的结果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于是，我站稳脚根，握住话筒，凭借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决。”

没人质疑这样的表决方法。于是，封从德开始执行。

按照规则，他喊“留守”时，赞同者重复“留守”；他喊“撤离”时，赞同者重复“撤离”，用赞同者的声音大小判别“撤退”与“留守”。事后，大概是人们所处方位的不同，对“声决”结果的感受也不尽一致。从封从德所在广播站“现场录音”中，他也感到“难分高下”。但封从德果断地宣布：

“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少数服从多数。我们现在逐步准备有组织的、（慢慢撤啊）大旗走在前面……”

没有欢呼，也没有咒骂，但隐约听到有人抽泣。封从德进一步宣布了撤退方案：

“外高联、外校的同学、市民纠察队和工人和北京的同学，从广场东南角，往中关村走，撤到海淀区去……”

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纪念碑下的旗幡涌动了。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队伍缓缓移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袖们也随即融入了人流……

“国际歌从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升起，人们的声音嘶哑、咽哽、悲壮，人们唱国际歌唱了很多次，从来没像这一次投入那么深厚的感情，这是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对国际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辩。”

在封从德宣布撤离后，播音员王童继续对戒严部队官兵播送：

“官兵们，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的枪口不能对准人民。（法西斯）现政府腐败，你们受了欺骗！、、、、、、（啪！）”

广播站的喇叭被打坏了！就像所有坚守岗位的媒体人一样，广播站播音历史中最后一盘磁带，留下了他的“绝响”。

据刘建军回忆：

“占领‘高自联’指挥中心后，他们的高音喇叭还在哇哇乱呼，我当即命令把喇叭打掉。一班长徐团辉、三班长孙涛、五班长朱跃表迅速以准确的点射，将东北侧、东南侧三个大喇叭打哑。四班长朱永军看到北侧灯柱上绑着4个小喇叭，就冲开人群，迅速爬上去把喇叭扯下。三班战士、司机陈志军一个箭步过去将三台发电机全部关闭。接着，战士陈志军、韩谊东、高洪波迅速冲进‘高自联’指挥部广播室，将广播器材全部缴获。这时冲上了纪念碑底座三层西侧的兄弟连队，也把纪念碑西北侧、西南侧的喇叭打掉了。”

在纪念碑的东面，清华大学研究生邹明目睹了这一过程。事后，他对新华社记者说：

“我这时站在纪念碑东侧栏杆上，看到过来十几个士兵，他们从东边穿过学生聚集地，来到纪念碑北面，站成一排，示意学生让路，然后上了台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持自动步枪朝纪念碑上‘高自联’设的喇叭点射。几个士兵来到三层东南角‘高自联’广播站前把帐篷扯下来。过不久，我随撤退的学生队伍朝广场东南角走去，正走着，回头一瞧，看到一个士兵正在用自动步枪点射“高自联”广播站另外的喇叭。这时有一些学生骂士兵，但士兵没有朝他们开枪。”

4：20左右，季新国、顾本喜和几个警卫战士也随队一同朝南走。顾本喜中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谈到有留在帐篷中的人，而且说得更加具体：

“在装甲车开过来之前，指战员们已经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要求，一个个帐篷察看是否有人。他亲自检查过一些帐篷，看见一位战友在一座帐篷里清出一个约莫30来岁的瘸子，还给了他一根棍子让赶快拄着离开。在另一座帐篷里，有一个女学生被吓昏了，战士们把她抬了出去。因为一个个帐篷都仔细检查过，装甲车开来时里面绝对没有人。”

张良在《中国“六四”真相》中记载的过程，与戒严部队官兵们的记录稍有不同。他写道：

“远处，一字排开的坦克和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缓缓向广场驶来。随着几下沉闷的撞击声，位于广场北端的‘民主之神’像轰然倒地。坦克和装甲车继续向前，一路撞倒、碾碎广场上的帐篷等物。装甲车和坦克在离学生队伍二三十米处分向东西两侧。广场正面，士兵们排成横队，从长安街向学生队伍一批批走来，队列中有一些戴护盔的防暴警察，所有的士兵都头戴钢盔，手握棍棒。”

两种记述最大的区别是：

第一，“民主之神”像是先被扳倒后被压过，还是直接被坦克车撞倒的。根据上图，塑像倒地的方向是头朝北，从北面一字排开的坦克装甲车，显然不会令塑像以这种朝向倒地，这说明，在这一件事情上，戒严部队的回忆更可靠些。

第二，在坦克碾过帐篷以前，是否有人对帐内进行过清理？据《真相》称，装甲车开道，的描述出自“安全部的有关材料”。而该书所载“38集团军给中央军委报告”则称，装甲车是在“步兵的引导下，驱散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一直推进到正阳门以南”的。

“国际特赦”获得的一份自称医务工作者的证词也曾描述，清场时，他（她）看见“二、三十辆装甲车慢慢地开过来，后面跟着士兵和武警。”他（她）还看见有“7个姑娘”呆在一个门朝南的自搭帐篷内，他（她）和另外三人劝其离开未果。不清楚他（她）的视线是否离开过这个帐篷。但他（她）说，最后，装甲车碾过了这座帐篷。

据梁二回忆，北师大中文系的确有一批“钉子户”帐篷，是5月15日凌晨整个“绝食团”营地东移时就拒不迁徙的扎根户和“独立王国”。6月4日凌晨，他们依然坚守阵地：

“师大在广场上设立了五个帐篷。第一个帐篷我记得是陈章宝和于军两人搭起来的，他们在广场设立了师大宣传部分部。后来这个宣传部就独立出来成了北师大宣传部了，不受校自治会和北高联的领导，也不受绝食团的领导。北师大中文系的同学一直找我们要钱，我们当然也给了。他们坚守阵地，超华去劝中文系转移的时候就碰了钉子。6月4日清晨我去劝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坚持在帐篷里不出来。后来我听说坦克压来的时候，他们在一秒之内一下就逃出来了，没有一个同学因为还在帐篷内而被坦克压翻在地。” 焦虑于大军压境的速度和“特辑队”咄咄逼人的态势，侯德健和周舵再次寻找季新国沟通。但绝食两日的侯德建已经体力不支，文弱的周舵不得不扶着他跑。根据周舵的回忆，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学生已经作出撤离表决，只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做学生工作，两人抱着只要不死，就要把话带到的决心做最后的冲刺。

很快，他们和季新国一行，在纪念碑北面的一排旗杆附近又碰面了。第二次与季新国见面，周舵感觉已没有原先那样可怕了，但他们没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季新国对他们说，如果劝不动学生，那你们自己赶快撤。此时，东方已经泛出鱼肚白。在天亮前解决问题是邓小平的死命令。

两人再次向纪念碑跑去。归途中，周舵和侯德健查看了沿路的帐篷，见里面确已无人。待回到纪念碑下时，见东面、南面的学生队伍已经开始缓缓撤离，纪念碑上已经是一片亮晃晃的钢盔……

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纪念碑基座北面台阶上仍端坐不动的人群，是一批坚持不撤离的人。但坐在北面最前沿的马少方否认了这种看法。他说：

“当封从德用喇叭对广场上的全体同学征求是撤还是不撤的决定时，最后他宣布说：他认为同意撤的声音，大于不撤的声音，所以决定撤出广场。当时大家都从坐着站起来，手持明晃晃刺刀的士兵，立即向我们紧逼过来，而里面的撤退队伍一下陷入混乱，有同学跌倒，于是从里往外开始喊：‘一二、坐下！’ ‘一二、坐下！’ 我们是前面的人，连忙重新手挽手，胸膛迎

向刺刀，用胸膛重新为同学们争取出足够的空间。于是，前面10排重新坐下，用《国际歌》声互相鼓励，一直等到我们身后的同学都走空了，我们才站起身。也就在这时，面前的士兵突然换了，换成了手持木棍的兵。他们手舞棍棒，我们这最后撤退的10排学生，终于被木棍打散。我和梁二、杨朝晖被从西面转过来的同学慌乱中推倒在身后的小松树上，然后就是双手抱头，无数的脚从我们头上踏过去。后来有同学大叫，有人在脚下，同学们立马停住脚，我们这十来人被拉起来。棍子又来了，赶紧跑，跑进东南角用装甲车夹出的撤退通道时，才发现杨朝晖几乎昏迷了。我和梁二把他架出通道，在历史博物馆前的大道上，正好有救护车过来，就把他交给了救护人员。等我回头再找梁二时，梁二已不见了。而我此时也才发现，两只脚是光着的，眼镜已经没有了镜片。我要补说一句：在我们跌倒被扶起的过程中，我还看见纪念碑上仍然有些人坐在那里，我的身后还有纪念碑西边撤过来的一些学生。所以我不是最后撤出的。”

这时，从北边回来的侯德健和周舵，刚好看到这些仍不愿离开的人：

“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就是死不肯走。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也不服从。把我急坏了。我和侯德健分头去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哄带骂，连拉带扯，我刚把前边那个学生说服了，拉起来要走，后边就有一个声音喊‘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他马上就坐下了。把我气得当时就开骂了。大意是说，你可以死，这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但你有什么权力强迫其他同学死？万一你没死，你将来怎么向这些同学的父母交代？讲了很多，最后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说了一句‘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还是要找个理由。这样才大家全起来跟着走了。

我正要跟着走呢，突然抬头一看，前面一大群军人，离得非常近了，挺着刺刀就过来了。我也没来得及多想，赶紧就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结果话音没落，一个东西就捅过来了……就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当时我就要窒息了，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

着我，赶紧把我扶住了，然后就跟他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就是两下。后来小宋拿自行车把我驮到我家门口，我们两个还互相擦起来看伤。都在这里，非常准，就在心脏旁边这个肋骨上。后来听说那就是从越南前线下来的特种兵。”

在行至离纪念碑百米左右时，“广场指挥部”重新聚到了一起。他们整队走到了撤离队伍的最前面，并告诉大家：“这里是指挥部，我们同大家在一起。”失散的秘书处人员和护卫人员纷纷归队，纠察队在墨轩的带领下，依然在行进的队伍两旁拉起了防线。

端掉了人去篷空的“高自联指挥部”，特辑队开始用枪托从三层平台上往下赶人。

“少数人在破口大骂的同时，石块、汽水瓶把他们头上的钢盔打得噼叭作响。四连战士陈瑞明的左腿被划破了一道血口。”

“战士们愤怒了！个别战士用枪托还击了对抗清场者中的极端顽固分子，有的战士用拳头回敬了扔砖块、瓶子的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向学生和群众开一枪。”

“当侦察分队的官兵冲上纪念碑的底座时，这时，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冲过来，企图夺班长史新的枪。史新见势侧身一让，跟着一脚飞出，将他踢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嚷嚷吵吵的人群顿时吓傻了，几个从下往上冲的人一见这情景，吓得退了回去。就在这当口，我侦察兵对空鸣枪示警，并厉声向人群喝道‘统统趴下！谁也不许乱说乱动！’……当一批批大学生和群众陆续撤去的时候，仍有两个执迷不悟的人不肯走开。‘打死我也不走，开枪吧，向这里打！’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胸膛。战士们愤怒地冲上前去，把他们强行拉下了纪念碑。”

图9-14：军人上纪念碑（高富贵摄）

一位向“国际特赦”提供证词的医护工作者这时看到：

“救护队还在历史博物馆那一边。有好多士兵已经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坐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们还坐在那里没动。15到20名由学生送来的伤员躺在救护站的地上。从纪念碑的西南边传来阵阵枪声。一阵枪声之后，3个受伤的学生被送到救护站。他们是背后中弹的。每阵枪声之后，历史博物馆台阶上的士兵就喊打得好。……”

“……大批的武警随着装甲车从北面开过来。他们捡起地上的碎砖头，向围着伤员的救护队扔过来。有些人被砖头砸伤了。有一名士兵从西面跑过来，站在历史博物馆旁边的铁栏上向武警喊，叫他们停止。他们住手了。接着，一群官兵来到救护队，命令我们撤离。”

据最后撤离广场的清华大学学生赵明回忆：

“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时徐徐朝东南方向撤去，北面戒严部队的坦克也慢慢向南开来。解放军与走在撤退队伍最后面的纠察队员之间总保持有二、三十米的距离。我与一些纠察队员负责检查纪念碑以南帐篷内有无同学，检查结果没有一人。撤到最后仍有少数群众和学生不愿离开广场，于是，手拉手的纠察队员苦口婆心地劝他们离开。这时广场东南角还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进行劝说的纠察队员，而在数十名不愿撤离的人中，群众多于学生。相持了一段时间，一些戒严部队从毛主席纪念堂方向过来，他们高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不愿撤离的人一瞧这阵势都慌了，四处散逃。我从前门朝西走，一路上看到不少被烧毁的军车和其他车辆。我离开前门时已是凌晨6：15了。”

高新的回忆，证实了赵明的描述：

“这时候，坦克也陆续从北往南开，走在最前面的坦克离我们只有20米左右。走到前门箭楼一带，我已是落在向外撤离的大学生队伍的最后一个”

当时与高新在一起的，还有程真和香港中文师范大学学生沙涛。

这个记载表明，“四君子”的确是最后撤离的。

送走杨朝晖的梁二和马少方，一度谋求与部分师大同学一道，从东北方向撤出广场。梁二回忆说：

“是我给他们探的路，带头的人是师大地理系的同学和师大的一位老师，从广场的东北口出去的，当时我在那个地方探路时军队杀死人的现象大约数目应该是3到6个之间。”

据马少方回忆，当时的情形是：

“这个线路被装甲堵塞，一排排军人荷枪实弹，严禁学生往北，有同学不服，非要试一试，结果枪响了，对天鸣枪，大声喝斥。大家只好调头往南，绕向前门楼子。我光着脚，不，不是我一人光着脚，很多人，大家都小跑着，在广场的东南角，有很多市民在这里发鞋，有人冲我扔过来一双，也不管大小，先穿上……我问问身边的同学都是哪些学校的，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是外地学生……”

被乱枪逼回的梁二从此与马少方失散，回归东南方向的正确路线。恰巧此时，他碰上了最后撤出的高新一行。同行的除程真外，还有林耀强和邵江。但他没有继续随大队人马西行，而是直到上午10：00，才离开前门地区。

而失去了梁二的马少方，也一度聚集起一个五、六十人的队伍，企图从大会堂的西南面北上回校，结果也被乱枪逼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此时的侯德健，已经离开了学生队伍：

“由于饿了两天两夜，又到处乱跑，感觉有点虚脱。学生们就把我扶到广场东面历史博物馆旁边的红十字会急救站。这时我听他们说学生已经离开

纪念碑，过了纪念堂，走到前门了。我和医生、伤员等100多人是最后离开广场的。”

北医第一医院副院长王海燕教授，是最后一批伤员和医务人员撤离的组织者。事后，她回忆说：

“我们是在5月18日奉红十字会的命令在纪念碑东北角靠近马路的地方设立救护站的，并再三接到红十字会不让我们撤出的指令。6月3日晚，我们有七八个业务骨干参加救护队，在广场值班。6月4日凌晨黑灯前后，各家医院的医疗点先后从广场撤到历史博物馆西侧。我白天忙了一天，实在累了，就打起盹来，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广播，我听明白大意是要撤出广场……我赶快起来，听到广场上在唱国际歌，看到旗帜向南移动。我问帮助做救护工作的医科大学学生愿不愿和大家一起撤，话音未落，两阵枪声，纪念碑上正在响的喇叭哑了。金水桥前的坦克向广场缓缓开来，就我目力所及，未发现轧着人。一些穿迷彩服、拿冲锋枪的军人，来到我们跟前，距离我们只有1米左右。我对军人说：‘我们是红十字会派来的医务人员。’一个扛录像机的军人命令战士向后撤，战士后撤到3米左右。我马上迎上去感谢他，和他握手。这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只戴钢盔、无领章帽徽的军人走过来，我告诉他我们这里都是医务人员，还有伤员，希望能派军队护送我们撤出去。不一会儿来了6纵排解放军战士护送我们。我们把两个负伤的军人送回去，把非军人伤员抬在床上，4人一排，向广场东南走。此时天已大亮，我们一路上没见到打死的或轧死的人。我们刚走到历史博物馆南面的第一个胡同口，就听到路边小黄楼上向下开枪的声音，保护我们的解放军靠着墙和树架起枪向上还击。我们正在射程以内，我命令大家全体蹲下，原地向后转，又回到了历史博物馆西侧。在枪声停了以后，我们这批最后撤出广场的非军人，就从广场东南角坦克让出的通路最后离开了广场。”王教授这里经历的，就是被很多纪事者提到的6月4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枪击案”。枪击发出地点，是一座四层办公楼上某广告公司朝北的窗口。枪击发生前，有200多不愿意撤离广场的人员，站在楼下对着戒严部队呼喊“法西斯、走狗！”“当兵

的，滚回去！”。在戒严部队上前劝说并驱赶时，人群背后的楼房里开枪了。从戒严部队摄影师余波拍摄的照片看，“楼中间一个窗口里喷着一团火，其他几个窗口上喷着白烟”，应该是有几个窗口同时发出了射击，但中弹的士兵只有一名，他叫郝连锁，是38军某部工兵团的战士。伤口在手背，所中为火枪铁砂。为示警，戒严部队此后在周围不断开枪，时间“大概持续了10分钟”。此时，那最后不愿撤离的200多人也撤离了广场。

图9-15：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枪击案”发生地（百度全景截图）

这时的广场东南角，据赵晓强记载：

“当人流越来越细时，队伍右侧出现一队穿白大褂的医疗卫生队伍，还抬着8副担架，担架上躺着8个人，有的用白布盖着全身，有的用大衣蒙着头，（据侯德健向记者透露，他当时就是被担架抬出去的……）这时4路装甲车队紧跟撤退的学生和群众队伍，轰轰烈烈地开到我们面前，我们鼓掌欢迎，装甲车里的官兵也打开上盖，向我们招手。两军会师，表明清场结束，我看一下表正好是5：27。”

另有人提到或见到，跟在学生队伍后的装甲车上的军人，对围在东南路口不愿散去的人群“鸣枪示警”，但有人中枪。

“一位目击者在广场东南边一个胡同里看到两、三辆自行车载着伤员。……一位香港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看到他身边的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满头是血，几乎整个头被炸开’，当时就死了。一位波兰国家电视台记者说，一名站在距他一米远的学生，在对向前推进的士兵辱骂之后被枪杀。这位记者补充说，他看到士兵在没受到挑衅的情况下，随意地向奔逃学生的背后开枪。另一个消息来源告诉国际特赦，他的一个朋友在清晨6：00左右于广场东南角被击中，子弹从脑后打入又从嘴里穿出。”

这位子弹从后颈打入，穿过喉咙，打掉一颗牙齿的伤者，是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兼国外巡回特派员徐宗懋。他曾在南美洲、柬埔寨、菲律宾等地作政变和战事的报道，但五、六年来未曾因采访而受伤。事后，他回忆说：想不到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地采访”，就发生在这片有感情的土地上。

第七节 被放弃的“逮捕行动”

据《戒严一日》和《27军军史》介绍，原定“特辑分队”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逮捕高自联领导成员”。但因为“学生走得很紧密”，一方面不好下手，另一方面害怕“节外生枝”，所以临时放弃了这一计划。

这个计划由于没有展开，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它试图怎样执行。但它应是当天整个计划的“3套行动方案和20余种处置紧急情况的措施”的一部分，且与集团军侦察连事先进行的“散打和捕俘技术训练”有关。

有迹象表明，6月3日晚8：00许，27军传达“清场令”后，北京市公安局也收到了收押天安门广场学运和民运参加者的命令。据北京市公安局人士回忆：

“市公安局的大门已经被围堵两天了，上级无法召开战前会议，局领导的指示只能靠专线电话来下达。”

“电话终于响了，那铃声清脆得令人振奋。处长放下电话后郑重宣布：‘局领导命令我们：一、派40名预审干部，20名和宣武分局的同志一起做审查工作，集结地点在前门地铁南侧的泰丰楼饭庄；20名和东城分局的同志一起做审查工作，集结地点在新华门附近的28中；二、做好机关内部的保卫工作，特别要确保看守所的绝对安全。’”

但是，出师不利。此时的大街上所有车辆都被堵塞，“一辆跑着的汽车也没有”。早在当日凌晨4：00许，北京市公安局一辆乳白色小轿车在南池子被围堵、放气，并砸坏玻璃，里面坐着的是下半夜出来察看路况的东城公安分局副局长。这位堂堂局长不仅挨了打，连报话机也被搜走。此时靠近天安门广场的西长安街路段已是人山人海，若要通过，只能微服：

“……到集结地点上级要求必须着警服，否则将无法开展审查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和目标，处长们研究决定，人穿便服，把警服装进手提兜里，分散开步前进。”

“‘这叫什么事？建国40年了，共和国的人民警察，在首都居然成了地下工作者？！’”

从出发地到两处集结地点，“大约十来里地，按正常速度用不了一个小时，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电话有动静。”“又过了半小时，（晚）9：30”抵达泰丰楼的有了回信，但去28中的却如石沉大海。又过了40分钟，依然没有动静。原来，有人已经走漏了消息，28中被围，什么人也进不去。

“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枪声。那枪声似乎离我们这里很远，但在黑暗与寂静中却使人听后为之激动，就像新年听到辞旧迎新的爆竹一样昂扬。”

“‘反击开始了！……’处长对我说。”

“……化妆到28中去执行任务的20名同志，原计划从人民大会堂西侧路穿过西长安街前进。谁知还未到路口，就见广场非法组织派出的‘敢死队’、‘纠察队’里三层外三层地封锁住去路。他们在检查行人，追打着他们认为是士兵和警察的人，不准警察和士兵进入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无奈，这20名同志只好分散开，绕道附近的胡同、街口，想迂回穿过长安街，到28中集结。没想到各个路口均有人把守。”

“……暴徒们已发现那里是警察的集结地点，用砖头和木棒发起了一次次冲击，先期到达那里的东城公安分局的同志不断有人被打伤。”

“就在这危急时刻，解放大军从西边浩浩荡荡地鸣枪开进。”

至于这些初来乍到的军人根据什么分辨谁是“高自联领导成员”，就要靠那些已经与广场的市民、工人和学生水乳交融地混在一起的“特工”了。

如前所述，6月3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出“清场”决定的同时，人民大会堂西北角有5000军人枯坐“待命”，无论当事人还是过路者，都感觉这种安排“莫名其妙”。但正是这个安排，使得山东大学外文系二年级赴京学生潘强，有机会为我们讲述他的遭遇：

“从6月3日下午起，天安门广场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先是人民大会堂西面涌出一大批军队，和劝说的北京市民发生冲突，被打伤的市民捂住血流如注的头，到纪念碑报信。在我和几位纠察队员赶到时，冲突已停止，但当我们走入坐在地上的士兵中进行戒严真相宣传时，仍感到军队士兵和军官中相当大的敌意。”

“这时我无意中犯了一个也许影响我一生的错误。那时在围观的人群边有一对年轻夫妇，像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为学生鼓掌助威。当时我像天安门广场上许多外地学生一样，将我的学生证用别针别在我的上衣口袋，以便有突发事件时，可以辨别身份。所以当那对‘夫妇’自称是我的校友，要看我的学生证时，我不假思索地递了过去。”

“后来我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在山东内部通辑的两名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很活跃的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的许泉），有幸上秦城监狱（狱友们戏称‘秦大’）暂时居住，相信部分归功于这对‘夫妇’的努力。”

6月4日凌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担任“特纠”的吴仁华，也曾有过一个令人回味的偶遇：

“……6月4日凌晨4：25左右，一群北京市民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向纪念碑底座走来，一边走一边齐声呼喊：‘中国人，站起来！中国人，站起来！’悲壮的呼喊声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像惊雷般炸响，如浪潮般卷过，撼动人心，那一幅慷慨赴难的景像，不能不令人动容。”

“站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望着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景像，我整个心灵都为之震动，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多么令人敬佩的北京市民啊，他们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选择了与和平请愿的学生生死相依，选择了面对死亡，而且选择得从容不迫。”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身边坐了一位姑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便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她回答说不是学生。我随即追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回答说是搞摄影的。我接着对她说，记者们不都已经离开这里了吗？你怎么还不走？这里太危险了，你一个姑娘家，赶快离开吧。她回答说，我不是记者，我是摄影个体户，我要将这百年难遇的历史事件用镜头记录下来。”

“她的回答让我既惊讶又敬佩，这真是一个奇女子。听口音她应当是江浙一带的人，我于是问她老家是什么地方。她回答说是温州。乍听之下，我更惊讶了，万万没想到会在此时此地遇到小同乡。都说温州人会做生意挣钱，还没有听说温州人肯为理念玩命的，何况还是一位姑娘。我当即兴奋地改用温州话告诉她，我也是温州人。这下子轮到她惊讶了。在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份和情况后，她提议为我在纪念碑前照一张相。我想也好，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留影了。平常我并不重视照相，有时还刻意躲避镜头，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所参与过的许多重要事件或场面，大都没有留下任何影像。”

“拍照前，我情不自禁地回首凝望纪念碑上书写的一行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心情颇为复杂。站在高高耸立的纪念碑前，耳边响着持续不断的枪声，四周一片黑暗，只有忽明忽暗的几堆篝火在闪烁着，在这种现场气氛下照相，不能不让人充满了英雄就义时的感觉。”

“拍完照，她向我索取了温州老家的地址，说会将照片寄到我温州的家中。说实话，我并不在意能否收到这张照片，因为当时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天安门广场都无法确定。可是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一直没有收到这张照片，这让我十分担忧，担忧的当然不是照片，而是她，不知她是否最终躲过了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的劫难。”

有着强烈英雄情结的吴仁华，对这位女子的身份似乎深信不疑。在没确实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便作任何肯定的判断。但是，依据上一节“清场”过程的时间表，这批人到达广场的时间，以及这位女子出现在当事人身边的时间，正好是“熄灯时间”，即清场各部队调整到位的时间。据15军监军赵晓强回忆，在该军1：25到达广场东南角时，已经将广场周边的围观者与广场的静坐者进行了驱隔。熄灯后——他记载的熄灯时间是4：00刚过——各戒严部队更是对整个天安门广场实行了铁壁合围，并规定了“只许出，不许进”的纪律。请问，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这支完整的、而且呼着口号的队伍，是从哪里来的？

其二，通过以上公安人士的回忆，我们可知，此时，拘捕广场学生领袖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取证的工作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这种公安工作的需要，与上述“个体女摄影师”的追求，是否纯粹是一种巧合？至于这位操有南方口音的女子，是否带着目的来到吴仁华身边？那倒不一定。因为此时吴仁华担任特纠还不到一天。不过，按照吴仁华自己的回忆，他当时“坚决不撤”的态度，他领唱《国际歌》时的悲壮情景，已足以让他成为当晚纪念碑下耀眼的“新星”！临时被盯上，被安排一个口音相近的谈话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对此，张健曾有过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体会：

“还有一次，我在纪念碑二层指挥部，一个纠察队员送来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署名是邓朴方。字体很隽永。意思是，你们是上了赵紫阳的当，你的外公是邓小平平反的，希望我认识局势等等。”

这张纸条至今保存在张健可靠的朋友那里，毋庸置疑它的虚假性。据张健说，他外公的事，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由此可见，在大多数人认为公安无所作为的日子里，他们实实在在是进行了一些艰苦细致的工作的。

“六四”后，从戒严部队发出的“通缉令”看，许多起过重要作用但知名度并不很高的学生尽在其之中。这说明他们在清场前已经做足了功课，只是执行被推迟了而已。

有多个消息来源称，学生撤离广场后仍有200人左右的一支队伍不愿撤离，他们的身份、去向，至今仍是个谜。这些人的留下，是否与上述任务的改期执行有关？目前还无资料证实。但有一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确有“盲目开枪”现象。此举除了造成围观群众的伤亡外，“还使一些夹在人群中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安全部门和部队的便衣人员被误伤至死，引起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这在陈希同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得到证实，他对因执行任务而被误伤至死的人员表示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图9-16：撤离广场的学生行至中关村（选自封从德《广场上的共和国》）

第八节 南池子

天安门广场被合围后，其中情况，对外界就变成了一个谜。时间越长，这个谜越显得沉重，也令人越发担心。

从那时开始，天安门广场东北侧的南池子，曾经发生过装甲车撞人场面的地方，就开始有市民聚集不散。人们试图冲击戒严部队拉出的警戒线，但多次被军人的阻嚇弹回。据一位在场者描述：

“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往东约百米的东长安街上，用隔离栏横街拉了一条阻击线，由约一个步兵连的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以或蹲或卧的姿势用步枪

瞄着东面，他们的钢盔泛着幽光。他们不时地放着冷枪，或向两侧便道的黑暗之处打几个连发。他们的指挥官从服饰装备和动作姿态来看，则极不像野战部队的军人。”

“与之对峙着的，是一条手无寸铁的人墙。在这条阻击线东100多米的南池子，沿着人行横道，从南池子口到公安部大门口，站着几百人自发组成的人群，一方面他们拦着向天安门方向走的不明真像的群众，告诉他们前面真的开枪了，已经有人伤亡，叫大家不要继续向前冒险；另一方面他们组织起来向戒严部喊话，如‘解放军不打老百姓！’，‘学生无罪！’，‘放了学生，不许清场！’等。当有人被狙击中弹时，口号就变成‘戒严部队是杀人凶手！’并唱起悲壮的‘国际歌’。这歌声与从天安门广场不时传出的阵阵歌声和口号声遥相呼应着。”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就在这南池子，我亲眼目睹的就有40几个人中弹倒下，他们中有50几岁妇人（腹部中弹），也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左臂中弹）。这几百人（多时上千人），因大学生都被催着回学校报信去了，留下的基本上是北京市民，其中有不少妇女儿童，有的还穿着拖鞋拿着扇子，显然是南池子附近的居民。”

据跟随38军第一批进入广场的两位军事记者描述，清理了聚集在天安门前的市民、学生以后，部队“立即派出官兵，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侧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面的长安大道上，组成数道人墙，挡住了一次次涌来的人群。其余部队在金水桥一线集结，等候后续部队。“国际特赦”获得的一份证词称，这条警戒线大约是凌晨2：00以后拉起的：

“他们一共有3行，第一行士兵有跪有蹲，第二行稍高于第一行，第三行站立在后。他们向广场东北部的人群射击几分钟后停止。这之后的一个小时内，士兵一段一段地向东长安街推进，至少还有两次阵射。……一些子弹从头顶飞过，一些碰到硬物又反弹，一些打中了人。……人群在开枪时跑开，但在阵射间隙又向广场方向返回。”

该报告称，截止3：00左右，在广场北部和这一路段，有人统计“有20到30人中弹受伤，并有‘少数人’中弹身亡”。另一消息来源称，在大约3：30的一次阵射中，他们“看到有36到38名伤员被抬走”，有胸、腹、背、腿部受伤者，还有“一个男子的头顶被掀掉”。伤亡者都被市民用三轮车或人力车运走。

20年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当日使馆人员搜集的一份档案称，2：30以后，“约百名解放军”在这一地段“瞄准群众”两次“开枪”，有“10至15人倒地”。

笔者便是在这第二轮开枪后来到南池子的。

当38军进入广场，后续部队开始封闭广场的西北路口时，在李肃的催促下，我们一行四人撤进了南长街口。在那里观望期间，我们经历过两次围观者向长安街的“返潮”。期间，有一辆公交大巴发疯似地从北长街方向开来，冲向长安街。但不久，这辆车又原路折回。从这辆车传达的某种信息，我猜测这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后在天安门前被击毁，事后被诬为“企图火烧天安门城楼”的那辆车。在它那毅然决然的气势下，我可以想象戒严部队的惊恐！在这种意外到来的惊恐下，他们为何会以“扫射”还击，何以会对张健开枪！

从天安门广场西北口撤出后，阮江宁和张萍回到了他们在北海附近的办公地。李肃和我决定重回天安门广场。大约4：00左右，我和李肃来到南池子。到达伊始，便自然地分头活动。

此时，在东长安街与广场的边界上，还可以看见一条松散的人墙，最前面，与采取卧姿的军人对峙的几十位市民坐在地上。他们的身后，东一堆、西一堆地站着议论纷纷的人群，我很快也成为了其中一员。他们似乎一直在场，态度较为舒缓，没有人告诉我此地曾发生过重大伤亡。但人们向我讲述了一个“英勇少年”的事迹：

一位男士告诉我：4日2：00以后，军队进入广场时，他看见“一个头缠布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与一群军官遭遇，学生朝军官举起手中的木棒，军官掏出手枪将其击毙。”我当时不太相信会发生这种场景，故未深究。根据后来当事人的叙述和述者所说的时间，现在，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他说的可能就是前述张健的受伤过程。

另一位女性，则向我讲述了一个“白衣少女”的故事。而当我问她是否可以给我留下姓名、地址时，她犹豫了，并迅速地离开了我。当时，我相信，只要是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找不到证人。果然，10年后，邢村发表了他的目击证词：

“大约（6月4日）凌晨3：00，最惨烈的一幕出现了。我坐在长安街靠北的马路上。忽然听到人们的呼喊。向南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大步向戒严部队的警戒线冲去，身后飘起她的长发。人们立即呼啸着跟着她一起向戒严部队冲去，我也起身跟着人群向戒严部队冲去。很快，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人们都趴在了地上并后退。在戒严部队与后退的群众之间的长安街上，留下了大约六、七个中弹者。但是，那个白衣姑娘却没有中弹，也没有停下，继续一个人向戒严部队冲去，当距戒严部队的警戒线仅仅几米的时候，响起了一串罪恶的枪声，她应声倒下了。”

“后来，她与其他的中弹者一起被医务人员救下。由于人很多，我没有能够到她的身边。据周围的人讲，子弹打中了她的大腿。”

16年后，另一位目击者公开了他当时用录音机录下的过程，使那位女青年和邢村提供的讯息得到证实：

“（6月4日）凌晨3：10，一阵枪打过来，我们迅速从坐姿改为卧姿。那动作做得又快又整齐。又是哭声一片。几个人被打倒了。我看见两边的人在七手八脚地抬受伤者。就在这时，我的右侧突然冲出一个姑娘，全速向部队

冲去。由于她身着白色连衣裙，黑暗中竟能看清她的背影。有五、六个男的也跟在她后面向前冲。全场的人都惊呆了。”

“姑娘向前跑去了，他们没有向姑娘开枪，姑娘向前冲过去了。哎呀，姑娘被打倒了。向前冲的姑娘被打倒了。那五、六个男的先被打倒了。他们离得很近，离得很近的时候开的枪。他们在离姑娘只有10米的距离开的枪。有一发子弹打在我身边……”

“六四后我无数遍重复听自己的这段录音，以致16年后的今天仍能一字不拉地背下来。”

事后，高新的一位朋友也曾告诉他，在此地的一次“拉锯”过程中，她“亲眼看到一位姑娘的左臂被子弹打穿”。

显然，牺牲并没有打散执着的群众。“白衣少女”倒下后，对峙的阵线又重新拉了起来。邢村回忆道：

“戒严部队……只有3排士兵，不时向聚集在东面长安街上的群众进行一具点射。每次点射之后，群众都会向东后退几十米，长安街上就会留下几位中弹者。这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侧停了好几辆救护车。马上就有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用担架把受伤者抬走，随即就会有一、二辆救护车向东呼啸而去。人们马上会自发地为救护车让开道路。”

“我也加入了对峙的行列，与群众一道呼喊口号，一遍遍反复高唱《国际歌》。这时，‘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歌词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当第一次打枪时，我听到周围的群众一下子向东后退一大截，至少是十米，也可能是几十米。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自己当时就回忆不出具体的过程，只知道是连滚带爬。腿也擦伤了。”

“枪声平息后，群众坐在地上继续喊口号，唱歌。本来我坐在最前面，但有人坐到了我的前面，又有人坐到更前面。我后来发现，我前面又坐了很

多人。这时几乎所有的人所关心的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碑附近的学生，都想冲进天安门广场将学生们解救出来。当戒严部队感到距离太近时，就会开枪将最前面的人打倒几个，人群就会往后退一退。就这样，开枪、后退、抢救受伤者、向前逼近、再开枪……循环往复。”

从西北部无法进入广场的王德邦，大约是与我們同时到达南池子的。他的证词与本人所见略同：

“南池子一如新华门边的情形，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封死了南池子进天安门的路。在离士兵二三十米处有一条警戒线，好像用什么拦了一下。市民们就自觉地聚集在警戒线外。大家急切地想了解天安门内的情况。随着天亮，人越来越多。大家议论着，交换着彼此的资讯……同时反复要求前面警戒的士兵让大家进去。在一再要求无果的情况下，大家对天安门里情况的担忧及许多方面枪杀情况的汇集，使大家心里升起了怒火。于是由请求变为质问，由质问变为斥骂，最后愤怒地喊起了‘打倒法西斯！’‘抗议屠杀学生市民！’‘请愿无罪！’——虽然大家在悲痛与愤怒中，但仍没有超越冲击警戒线。然而，一会就见一个军官带着一队士兵从警戒队伍后边忽然显出，举枪向天鸣了一枪。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些持枪的士兵向警戒线外的群众脚下扫射，一批手持警棒的士兵冲向人群抡棒就打。群众顿时惊慌四散。” 这次主动出击的动机，与笔者之后遇到的情况综合考虑，应是东面开进的部队要进广场了。据邢村写道：

“在南池子附近的长安街上，到处是斑斑的血迹。我还看到一处比较大的积血中，放着几张十元的人民币。不知是什么人放的，放钱时是出于什么心情。”

佛晓之前，最黑暗的时刻，笔者在公安部大门北侧的长安街上，也曾三次踩到粘稠物体（因为天黑、人多无法定位，不清楚是同一块血浆被我踩到三次还是三块血浆），每处直径大约70公分左右。事后，一位认识的报社记

者告诉笔者，那天凌晨，他曾躲在公安部附近街边的垃圾桶后，见一青年走向军人， 敞开衣襟朝军人说：“畜牲，朝这儿打！”被当场击毙。

大约6：00左右，我看见一位从历史博物馆西北侧墙根树丛中走出来的青年。他身材瘦高，头缠红布条，黝黑的脸上透着刚毅、坦然和明显的疲惫。待他走近，我问他是不是从广场出来的？他说：“是。”

“广场上的学生都走了吗？”我接着问。

“全走了！”“和平撤离！”他平静地回答道。

“全走了！”“和平撤离！”我立即高声地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周围人。

横在长安街上的人群逐渐散去。

也就在这时，从东长安街开进的大部队进入了我的视野，正朝我们站立的方向滚滚而来。据美国大使馆当时收集到的消息，这是从东面开进广场的第二支部队，大约由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隆隆的车声伴随着铁甲两侧射向路边的火龙，颇具威慑力。走在车队两边的是一队头顶钢盔、手持白木大棒的军人。他们额上青筋暴露，怒目圆睁，浑身的肮脏不亚于从广场出来的纠察队员，脸膛黝黑中透着紫红，只有眼球和嘴唇内侧一圈显露白色。当他们追逐人群，挥舞大棒恐吓路人时，引来小姑娘们的阵阵惊叫……

跟随躲避的人流，我避进了南池子大街西侧的第一条胡同，一阵枪响时，我本能地往胡同口看了一眼。我看见了李肃。他也看见了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图9-17：南池子今夕

这时，退伍侦察兵也来到了南池子附近，他目睹的情况与笔者的所见可以形成参照：

“6：12，我本能地寻着枪声就来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缩在里面喊口号，军队一字排开封住路口，后排的大兵坐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异样，撸胳膊卷袖，胳膊上扎条白毛巾，单手拎着冲锋枪，不符合军事条例规范，不时向南池子方向射击，里边喊几句口号打几枪。”

我继续向北回家。行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附近时，我看到一个小三轮上拉着一位身穿碎花衬衣、头部绷带渗出鲜血的少女，边哭边向尾随的旁观者用标准的北京口音说：

“这都是叫他们打的……”

在东华门路口，我看到东面又一队军用卡车快速由北向南通过王府井北口，一口气数了有60多辆。事后据日本《产经新闻》披露的美国政府档案记载，这是从东面开进天安门广场的第三支部队。时间是在6：20。

在我离开南池子后，是否还发生过更血腥的事？我不知道。但退伍侦察兵写道：

“几个当兵的神情显然恍惚，就那野劲，还是吃药啦，真疯了！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后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直到一个个平民中弹。一响一个平民倒地。”

“……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我离着30多米，清楚看到弹匣打空了还楼几下扳机，手枪弹仓打空，枪膛卡在后头处开机状态，他又连接几下枪机，这太有失常理。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撩倒，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撩了。”

当时，我尚不知道，自己的闺蜜——协和医大的在读博士生，正奔忙在同一地点的伤员救护中。事后碰面，她才告诉我，她曾协助将死尸抬送到协和医院的停尸房，但冰柜已经人满为患，柜门无法关闭。

作家罗点点在一则回忆中也谈到：

“00X 号装甲车上的驾驶员……由4个学生背到医院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与此同时，医院的急救室里躺满了被戒严部队打死打伤的人。地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凝固的人的血浆。一个护士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场面，脚踩上去咕唧咕唧，分不清是谁的血’……一个医生正给一个不省人事的妇女包扎伤口，那腹部的巨大伤口从脐上一直到横膈，切透了那女人的腹腔和胸腔，医生面无人色地说：‘不是匕首就是刺刀，手真狠’。”

根据长安街附近医院的分布状况看这里的死者，应主要来自天安门广场和南池子，可能有少量从新华门退下来无法就近送往急救中心的人。当时，笔者曾怀疑使用匕首的不是军人，但事后看到戒严部队收缴的“失散军用品”中，赫然列有“匕首”一项，因此不排除军人携带匕首的可能。

另一位记者记述，事后，北大医院的一位50多岁的医生对他说，部队开枪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抢救伤员的急救车和医务人员最多的是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的。一是从学生绝食时起他们就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医疗站，一直没撤；二是这两个医院离天安门广场较近。开始抢救时，急救车连伤员带尸体一起运走，后来因为伤员太多，协和医院内的遇难者遗体已“有一百多具”，便决定凡是已经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车。她还谈到，天安门金水桥前、天安门广场上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他们无法带走的尸体。这个记述从旁证实了我的闺蜜的描述。

据丁子霖女士的调查，在这些伤亡者中间已经查实姓名身份的有：

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工程师于地。他是凌晨2：00许南池子地段遭第一轮射杀的一个遇难者。子弹从他的“左下肋骨穿入右上肋穿出（奇怪的角度），伤及肝肾肺等8个脏器，擦伤脊柱，骨被折”。经协和医院先后4次大手术，摘去一肾，不治身亡，年仅32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法制局干部杨明湖，6月4日凌晨在公安部门前被“炸子”射中，腹部中弹，膀胱、骨盆粉碎，在同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终年42岁。

北京住宅壁板厂工人南化通，6月4日凌晨5：00许离家去长安街，家属在协和医院通过死者照片找到遗体：子弹从左后肩胛骨下射入，胸腔被炸烂。终年31岁。

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乐沂伟，6月4日凌晨在南池子附近腰部中弹，于协和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终年35岁。

此外还有河北唐山大学生L某，在南池子被子弹打中大腿根部。送积水潭医院医治，保住了大腿。

第九节 六部口血案

原先在木樨地见证并抗议38军强行开进的市民和学生，在民族文化宫、西单等路口相继失陷后，被排在了军队前进洪流的两边。除了伤亡被救护者送走的外，只要活下来的，都以天安门广场为目的地。但是，6月4日凌晨1：30，随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的实现，广场通往西长安街的道路也被封死，这批人也就被封在了外面。因为过度疲劳，有两位从木樨地一直跟进到南长街口的大学生，竟然在一辆平板三轮上睡着了。据其中一位回忆：

“凌晨5：00多钟，我们被一阵爆豆般的枪声吵醒。‘是天安门广场那里’，叶傅说。我们赶紧向入口处跑去。”

“这时，天渐渐发亮，浓重的烟雾中，浸射出几道刺眼的阳光。在天安门广场入口处，有数百名军人坐在那里，排成三、四排。”

据38军官兵回忆，因整夜的强行开进，当他们到达广场时，有的体力消耗太大的，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有的干脆就地躺下，等待军官把他们叫醒。此时，守在路口的这批人，究竟是没有承担清场任务的38军军人？还是（如有些资料所说）是大会堂内以逸待劳的27军？如果是后者，他们已然封死了38军的“回头路”！

图9-18：64早晨的西长安街

“在他们对面20多米处，对峙坐着四、五百名学生和市民，他们坐在地上，喊着：‘不许屠杀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同时唱着《国际歌》，打着‘V’（胜利）的手势。他们亦坐成三、四排。我和叶傅坐在后排。”

“这时，有人发现在我们对峙地段内，左侧一个平房上，有个人躺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一个人拿着望远镜望了一会，好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妇女，在那里还在轻轻地移动。”

“大家说，一定设法救她。可怎么救她呢？勇敢者出现了，一对年轻的恋人，那样子很风流潇洒，自告奋勇去救她。男的搂着那个女孩的肩头，一手做出投降姿式，并不时指指平房上的人，试探着向平房移动。走了一半，军人的麦克风响了：‘回去！’接着一阵扫射，打到他们脚下，他们只得退了回来。”

“人们喊道：‘法西斯，刽子手！’”

“这时，军人们竟然起了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人们继续高喊口号：‘人民要审判你们’，‘人民要绞死你们。’”

“这时，军人们的歌声嘎然而止。他们莫名其妙地鼓起了掌，然后突然起身，向西边散开。”

“这边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两排坦克，有20多辆，呼啸着向我们这边冲来。”

“这时的人们，显示出令人惊异的从容与镇定，他们继续唱着歌，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逃跑。”

“坦克在逼近，排山倒海般轰鸣着，好像不会停下来，前排的学生中竟有几个横躺在马路上，大声喊道：‘让我们的鲜血唤起中国的民主……’《国际歌》声更加雄壮。”

这些躺在马路上的学生，也是前一天晚上从学校吃完晚饭，准备到广场声援的某大学的学生。他们一行“十几个人骑著单车，打著大旗，沿著学院路向南骑”，但行至西二环路时，他们的计划被打乱了：

“当我们到达车公庄的时候，那里已有一串被群众自发拦住的军车，卡车上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有少数几个车上的军人头上戴了钢盔。群众一见到我们举著大旗到来，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请我们帮助指挥，拦住这些军车。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组分别指挥群众包围著一个军车，向他们讲道理作宣传。同时，我们也负责劝阻老百姓，不让人伤害军人和军车。整个车公庄大街的军人和群众都在有序地僵持著，军人站在车上，群众和学生下车下宣传。”

“约莫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大概在快12：00的时候，忽然有传说军队开枪了。不久，就见从二环路南面跑来了很多人，其中有的人身上沾满了血迹。这下，整个车公庄都乱了，群众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群起掀军车。车上的军人只好跳下汽车，汇集聚拢到了一堆。这时，有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打砸军人。当时我看到，有好几个可怜的军人的头被石头砸得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同学无助地看著发生的一切，看著这批可怜的军人簇拥一团，挤向了地铁站。”

群众饶过了这批军人，但无法饶恕剩下的军车。他们将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吉普点燃：“我们亲眼目睹著这十几辆军车，化成了熊熊大火。”

“约一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聚到了大旗下，商量著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市民，当他们听见我们要去广场的决定后，死活拦著我们，不让我们去白白送死。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广场上仍有很多同学在坚守著，我们一定要去支援他们，把他们救出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他们同意放我们去了，但坚决不让我们打著大旗去，因为听说军人一见大旗就开枪。这样，我们只好把大旗交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市民，开始骑车向复兴门奔去。（‘六四’后，我们几经打听，得知市民已把大旗完好地保存起来。他们告诉我，待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把它再打出来的。我非常感激这些不知名的父老乡亲，正是这些正义的人们留住了这面红旗，使我们几个能够化险为夷。否则，我们也许就像那些在长安街倒下的学生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

当他们一行人骑车取道复兴门，走上长安街时，正好是38军大部队已经开过的间隙：

“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著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著。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待军车过后，他们一行十几人此时只剩下两人。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又开始朝天安门方向步行跋涉。二人沿长安街的南墙根儿，慢慢地向东移动，一直走到新华门附近：

“当时的新华门附近就像死一样的寂静，甚至连个站岗的都看不见。当时我们想，那门里面一定埋伏了许多军人……。我和小王最后还是颤颤巍巍贴著南墙根儿，挪过了新华门对面。再往前走些，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市民和学生（约有几十人，看上去多数是学生）……”

“不一会儿，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了一大批军车和装甲车，卡车的四周围著帆布篷布”。雨源回忆道：“不过，这批军车倒是开枪不多，只是偶尔地，从驰过的卡车的两侧冒出几枪。由于长安街两旁连个石头也捡不到，我们只能躲在树后漫骂，也有几个人撬起了人行道的方砖，摔碎成小块后，向驶过的军车投去。”

这趟军车断断续续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人群又开始聚到一起。

“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著歌（我记得好像是国歌和国际歌等），……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著枪对著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著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一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起来，仿佛又壮大了队伍的平民开始组成人墙，再次手挽手，高唱著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雨源回忆道：

“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50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著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著，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们看到了前面所说那件“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著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队并排的坦克后，排著第二队，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队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著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

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著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坦克对著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著第一辆停了下来，接著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著，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著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著，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据带领这支坦克队伍的上校团长罗刚回忆：

“6月4日凌晨5：18，我带领部分坦克和所属的特种履带车辆，历时4个多小时的艰难开进，撞开了10余道路障，提前20多分钟由东长安街进入上级指定的位置——天安门广场。此时天安门广场已清场完毕，由戒严部队控制。”

“5：20，上级命令我带领部分坦克立即前去驱散正在冲击围攻新华门的歹徒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学生，以保证中南海的绝对安全。军令如山，责任重大，我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并作了简要的动员，迅速按团的部署，八辆坦克一字排开，共4排向西长安街并驾齐驱，以形成威慑力。”

图9-19：64早晨的东长安街口

“坦克刚行进约2华里，就遭到了一些暴徒的拼命抵抗。在他们的煽动下，10多米的路面上已横躺了几百名学生和群众，以阻止坦克前进。100米、50米、30米，坦克离‘人障’越来越近了，速度不得不降下来。怎么办？当时如果停车慢慢作疏导工作，就无法解救新华门，但继续开进，又会误伤大批群众和学生。这时我坐在指挥车里，头上直冒汗，电台不时传来‘新华门告急！’‘中南海告急！’的呼叫，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我命令：迅速采取1、2、3号方案。首先用广播器劝说，3分钟过去了一一无效；对天鸣枪示警，3分钟又过去了一一仍然无效，而且部分歹徒借机开始向我车投掷燃烧瓶，企图烧车。迫不得已我只得命令施放少量催泪弹……”

新华门没有危机！没有人听见罗团长所谓“3分钟劝说”！也没有什么在“拼命抵抗”。倒是有人第一次从播音中听到，民运已变成了“反革命暴乱”。在学生的记忆中，接下来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坦克驶到离学生不足五米远时，突然停下来，从坦克中钻出几个人来，向人群中扔了几个可口可乐罐状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炸弹……一会儿，罐中冒出黄烟，随风散去，越来越大，是毒瓦斯！那黄烟弥漫开来，坐在或躺在地上的人开始咳嗽。”

“一个毒瓦斯罐头正好扔在我面前，那毒气吸入肺中，似乎比死亡的滋味更难受，你可以不怕子弹，不怕坦克压，可你真难以忍受这种毒气弹。这时，不知谁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傻了，赶紧散开！’人们咳嗽着，慢慢散开，走上或爬向两侧便道。”

“坦克便急速向前驶去。不知为什么，沉稳的叶傅突然箭一般地冲上马路，拿起相机，向着急驶而来的坦克拍照。这太危险了，我大声喊道：‘叶傅，回来。’这时，又一颗毒瓦斯扔在我脚下，毒气顿时侵入肺腑，我感到一阵晕眩，胸口一阵刺疼，两眼模糊，终于跌倒在地，失去知觉。”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脸上一阵发凉，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个戴校徽的女学生，正用水湿的口罩，向我的脸上滴水。她一见我醒来，马上对我说：‘去那边’，我在她的拖曳下，爬到不远处一个脏水井边，那里有几个同学，正轮流把头伸入井中，呼吸新鲜空气，我试着呼吸几口，顿觉清醒。‘不好受吧！’那女同学说。‘还好’，我含混地答道。接着站起来，我想，一定得找到叶傅，他可能出事了。”

“我继续向前行，坦克飞快地向前开着，边开、边向两边的人们仍毒气弹。”

“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站岗的军人抱起不知什么时候武装起来的大木棒，向外驱赶试图入中南海躲避毒气弹的人群。”

此前，并没有发生“冲击中南海”的事情。罗团长的叙述如果是真的，那显然是上级发出的欺骗指示。这一指示，对于一个军官的压迫力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这条“上级指示”的发出，是不是有什么缘由？是否受到某种信息的刺激而发出的呢？笔者注意到封从德《六四日记》中，曾有过如下记载：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后，“李录很是沮丧，说‘我要是死在广场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诉我：‘他觉得我们几个总指挥至少死一个在广场上才好，’她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这大概出自内疚，觉得对不起不住保护我们广场的同学而拼死堵军车的市民。”因为5月15日成立指挥部时，李录和柴玲设定的加入指挥部的条件，就是在同学死去之前先作牺牲。

当时，李录提出了一个建议：带领从广场撤出的同学们走那条“血路”，一直走到首钢，去发动罢工。所谓“血路”是指西长安街——流血最多的地段。

“然而，当我们穿过狭窄的北新华街，上到六部口时，竟没能见到任何惨烈的景像。空旷的长安街上，没有尸体，没有士兵，除了几辆被烧的军车

还在冒着烟，地上撒满了瓦砾、碎砖。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两边伫立垂泪的零星市民。”

“这时，指挥部中形成一股冲动，李录要带领同学向东折回广场。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市民来，拦在同学们前面，哭着说：‘同学们，不要再牺牲了。前面的士兵架着机枪排在路上。’”

于是，队伍继续向西撤。他们有幸没有死成，不幸的是后来人。

雨源的此后经历，与锺罗白相似。但可能因为是躺着接受的毒气弹，他的行动只慢了半拍：

“毒气弹像易拉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捡起来扔向坦克，我看著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著穿过长安街，沿著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著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著手直直地立著，面无表情地看著我们跑过去。当时，我真怕他们把我们往公路中间撵，那样的话，我们可就要糟殃了。勉强跑过新华门后，我的胸部实在难受，只好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水（喷水龙头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著再往西跑。不一会儿，我便跑到了六部口。这时，坦克已经在我之前到达了，于是，我赶紧右转，向北又跑了几十米，当我看到已经停了许多学生，

也没有坦克追过来时，才停了下来。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呕吐干咳，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干脆横趴在人行道上，把头伸出路基干吐，样子看上去难受极了……过了一会儿，我觉著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著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著，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

哭声就来自锺罗白的站立之处。没想到稍早从瓦斯中毒中清醒过来的他，面临的却是一幅惊天惨像：

“当我们来到六部口时，见马路左侧围满了一群人，坦克开始停下，并缓缓后退，我穿过马路，来到那里，当即被那个场面惊呆了。”

“只见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7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压得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徽，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图9-20：六部口惨案现场（一）

“我从未目睹过这样残忍的场面（即便在电影中），这是对人性、对现代文明最无情的践踏；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页！”

“从我的脚下，发出呻吟声，啊！竟有人还活着，我连忙从血泊中扶住那个呻吟的人，一个男学生，旁边的人赶紧推来一辆平板车。当我抱着他血淋淋的身体，轻轻向外拉他时，他微弱地说：‘同学，我的腿……，我的

腿……’我仔细向下一看，还哪有腿了，整个大腿，从根部被齐刷刷地轧掉，正汩汩地向外冒血。当我把他抱上平板车时，叶傅来了，他用所有剩下的胶卷，从不同角度，拍下了这个场面。”

“我们推着平板车，扶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同学，向复兴医院走去。回头望望那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在一个死去同学的衣兜里，露出了一个塑胶袋，里面是一些干面包屑。也许，那是这个年轻的生命所享用的最后晚餐……”

“两个老太太跪在尸体边，双手拍着地，号啕大哭：‘我的学生们哪！’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恸欲绝的哭泣。”

“这时，街上高音喇叭在播送中共中央公告：‘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部分暴徒，破坏戒严令，残害解放军战士……’”

“惨白的太阳冉冉升起，照着充满血迹、弹迹、坦克履带印的，曾经十分美丽的长安街，烟雾慢慢散开。在这空荡的大街上，在这白色的黎明中，我扶着那已经死去的同学。”

“我们，已流不出眼泪。”

这时，雨源也壮著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

“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像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5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2米多远，头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1米多远。另外4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著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

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1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著，我们流著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哪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著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图9-21：六部口惨案现场（二）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著木板朝东蹲著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著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像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5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X X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著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5具尸体（一个连著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

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著我们沿著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温子建拍下了这辆坦克的番号。

“6月4日早上，温子建经过六部口，看见五六个被坦克碾死的尸体一顺排列着，坦克停在旁边，他绕到坦克前面朝黑洞洞的枪口走去，感到那十几步路简直好像是走过了一个世纪。他拍下了有那些尸体、坦克和黑洞洞枪口的照片……”

当六部口“血案”爆发时，广场指挥部已经行进到电报大楼附近。据封从德记载：

“我们快到电报大楼时，队伍后方突然一阵骚动，哗哗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涌。我们在队伍第一排，稳住阵势。但是几分钟后，我们得到后面来的汇报：几辆坦克从东面冲来，闯进队伍，当场压死11个同学！”

现在，是时候回答，这次坦克冲击，是否受到前述李录欲率大队重返广场这一信息刺激产生的反应了。为慎重起见，笔者于2015年12月20日上午对故地进行了重访。从电报大楼到六部口十字路口，我来回走了四趟。第一趟，在路南，由西往东，因天下雪子，路滑，我从10：11走到10：14，计有近400步，历时3—4分钟。然后，笔者又从地下通道穿到路北，由东向西，走了260步。因路程不全，我又由西向东走了一趟，因路遇扫雪车洒水，大约走了360步。最后一次，再次由东向西，从10：21走到10：23，因路面干燥，无障碍，仅用了339步。

满打满算仅仅三分钟的时间，足够戒严部队完成从信息回收，到派兵布阵，到开进的时间吗？参考前述从大会堂西北到六部口所有经历者的回顾，

我认为3分钟是不够的。这就是说，实际上，在学生的“指挥部”来到六部口十字路口前，坦克一师已经收到了“上级”的“欺骗指示”。

在六部口坦克碾人血案中，死者5名、重伤7名，绝大多数都是6月4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学生。其中遇难的5名大学生是：

1、北京科技大学89年应届毕业博士生，林仁富 30岁；

2、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田道民 22岁；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8级学生，董晓军 19岁；

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8级学生，王培文 21岁；

5、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学生，龚纪芳（女）19岁；

被坦克轧伤的7人是：

1、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宽宝 29岁；

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 22岁；

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赵国庆 20多岁；

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钱奕新；

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单连军；

6、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85级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学生，方政 23岁；

7、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刘华 20多岁。

根据丁子霖的调查，在这次坦克开进事件中，还有其他人在其他地段遭受枪击、撞击而受伤。其中龚纪芳左臂被“炸子”击中，但其致命的原因，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死亡证明书”载，“是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致死。

从事后各方的回顾，我们大致可以对这次“血案”做一个拼图：

下面是受害人方政对自己亲历事件的回顾：

“当时我走在队伍的后面。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经前门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乐厅附近一条南北走向连接前门西大街及西长安街的路），然后拐上西长安街继续向西行。此时已近黎明，约6时左右，学生队伍靠西长安街左侧（南侧）行走在人行道及自行车道上。”

“当我们刚拐上西长安街行至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顿时在学生队伍中炸开了，有一颗就在我身边爆炸，倾刻间，一团直径大约2-3米的浓烟笼罩了我们。走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在毒气熏呛下，加上惊吓，突然昏倒了，我便赶紧抱起这位站立不稳的女学生向路边转移。正在这时，我发现一辆坦克正快速由东向西朝学生队伍冲杀过来，于是我奋力将这位女学生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一眨眼，这时坦克已贴近人行道边逼近我的身边，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闪不及，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及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出来滚到了路边，但这时我已经昏迷了。以后的事我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学生送到积水坛医院去抢救的，在医院施行双腿截肢手术。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处截肢。”

躺在方政手术台边另一张病床上的施绳。见证了方政手术后的情况：

“一个体育学院的学生，双腿从大腿根部被锯掉（据说他的腿是被坦克碾断的）。他的病床，一个可以升降的手术台，紧挨着我的病床。由于麻醉剂的作用，他没有痛苦的呻吟，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看到他那残存的大腿一直在无助地摇动。难以想象，当他醒来，突然发觉他的双腿已不复存在，他会何等的悲哀！”

在接受高新采访时，一位幸存者告诉他：

“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碾，所以也没有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后，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医生都不敢看我。”

高新写道：

“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6月4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76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后头皮和一只耳朵被撕开，惨不忍睹。”

另一位幸存者王宽宝回忆，他当时与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的时候，他俩还不相信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于是就没有跟着一起奔逃。没想到一念之差，两个人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自己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次做手术。

另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受伤者，也曾著文留证：

“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队伍由三、四十名学生组成，处在整个学生撤离队伍比较靠后的部分。我的同学王培文赤着脚（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由于匆促，加上人多拥挤，很多同学的鞋子都挤丢了），举着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们学校队伍的最前面。”

“大约在清晨7：00左右，正当我们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三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冲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散开一片片呛人的淡黄色烟雾，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这是坦克在向学生队伍发射毒气弹……”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栅，这道铁栏栅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栅旁，无法退避到人行道上。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栅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开进铁栏栅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一刹那间，我被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种被轧死的感觉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失去了知觉。万万没有想到，在坦克过去之后，苏醒过来的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我环顾四周，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人，或死或伤，场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竖立的铁栏栅也已被坦克挤倒了。于是我在仓惶之中爬出死伤者的人堆，爬过倒塌在地的铁栏栅，随后被民众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作为目击者，梁晓燕的陈述给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细节：

“我们从北京音乐厅那儿走出。就在拐角处，看到后面有几辆坦克。结果呢？就听到后面一声喧哗惨叫，我们就赶紧回头去看，我们就看到后面人一片乱了，坦克就在中间打了一个转。后来就听到‘哇’的尖叫的声音，同学们就跑啊，一下就觉得坦克过来压人了。直感就知道了。我认识的一个学生，但不是我们学校的，他就是从坦克底下爬出来的，死的两个学生就是他们同学。”

梁晓燕的说法，可以与上述青年政治学院同学的说法互证。她提供的一个细节是，坦克在撞人后，在原地还来了个大转身，有些伤亡（如方政所说身体被拖拽）很可能是在这个大转身过程中造成的。

“六四”后多年来，人们都在寻找这辆坦克，以及它的肇事者。自温子建拍摄的照片流出海外后，可能是因为照片上的字迹印刷不清楚，网上的议论一直在106还是107两个编号中猜测。但我相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抑或是军队已经掌握真相，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日揭晓而已。时任《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的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给了我们这个信心：

“最令我吃惊也最令我难忘的是天安门广场清场以后，天都亮了，一位摄影记者给送来一张照片，是他刚刚放大洗印出来的——在六部口西长安街上，坦克从人群中冲过去，许多群众，大部是学生倒在血泊中，惨不忍睹！记者说，这些学生就是刚从天安门广场有组织地撤出来的。”

我相信，这些清晰的放大照片，在报社内一定不止三五人看到过。

我还相信，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征文的《戒严一日》筛选小组，通过这次征文，已经梳理出真相。因为笔者已经读出，他们在编排上刻意凸显的某些节点，对于揭示事件真相的重要意义。我理解，即便是在“文字狱”的高压下，作为文史工作者，总想千方百计留下一丝线索的那种不甘心。除上述大校团长罗刚的文字外，在这本书中，还有一篇上士李树存所写的《血染的风采》，就是包含着“六部口血案”部分真相重要参考文章。它记载：

“6月3日下午6：00，经过多次请战，连长、指导员才同意我进京执行任务。在紧急准备时，我的眉部不慎被驾驶窗的把手打破，缝了四针，视力从1.5下降到0.8。在开进中，由于装甲车内温度高达40度，汗水流进伤口，造成感染，眼睛肿得睁不开，我就用一只眼驾驶。”

他所在的连队，011、012、013号车被编为第一梯队的先头分队。可能与他在此事上的积极有关，他驾驶的013号走在最前头。换言之，整个坦克车队，由一只眼睛在开路！

6月4日凌晨的3：00许，这支部队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区的十里堡：

“我们三台车并排着开足马力向电车、汽车的结合部猛撞，强烈的震动，使我的头撞在驾驶窗的前壁上，旧伤缝合线一下崩断了，鼻子也被撞掉了一块肉，鲜血‘嘀嗒嘀嗒’直滴，一会染红了前襟……”

连里领导看到他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决定把他换下来。他绝不同意。因为他已经有了破障的“经验”。

以后，他们的车队又撞开八里庄、呼家楼、建国门、王府井一线9道障碍（用罗刚的话说是“破十道障”），他的车“成为全师第一台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

“我想看看011、012号车到了没有，刚站起来，突然眼睛一黑便摔倒在车上昏了过去。战友们见我如同血人，以为我不行了。把我抬到卫生车上包扎后，准备把我送上直升飞机，运出去治疗。这时，我听到守护在我身旁的杜团长说，一些亡命徒冲击新华门，我团受命去解救，保卫党中央。”

他一听这个消息“来了劲头，挣扎着站了起来，把医生吓了一跳：

“我不顾医生劝阻，一步三晃走到车前，爬上了驾驶舱，迅速发动，向新华门开进……我架着013号战车和其他战友的十多辆坦克、装甲输送车排成一个‘扇’形，吼叫着向前冲去。我们一边对空鸣枪示警，一边扔催泪弹，暴徒们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逃散，我们及时保证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的安全。”

从他叙述的情况看，他所属的部队，就是前述罗刚带领的那支部队，也是“六部口血案”肇事者所在部队。因为事迹突出，李树存后来被封为“共和国卫士”。相关资料显示，这支部队名叫“坦克一师”，隶属于北京军区的第65集团军。

据网上资料，该师前身是1945年12月在沈阳组建的东北坦克大队。先后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西北剿匪、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等战役、战斗645次；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入城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11次国庆阅兵。在辽沈战役中，该师装甲车一团一连“102”号坦克连续5次出色完成了任务，被东北野战军命名为“功臣号”。由此可以断定，无论是106还是107号坦克，与“功臣号”属于同一编队序列。

令人回味的是，抗拒执行戒严令的38军军长徐勤先曾经是“坦克一师”的师长。1998年7月，“坦克一师”被取消番号。原有部队被整编为“装甲第一师”，没有参加1999年建国50周年的大阅兵；2011年11月，“装甲第一师”又整编为“装甲第一旅”。有网友点破，自参加“六四平暴”后，该师一路走“背”。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人刻意要让那位青史留名的主帅，为自己部队遗憾万年！与此同时，“共和国卫士”已经在网上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这，应该就是历史方向的指示。也是国家、政府、人民的心声！

注释

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7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4—85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三章第五节：大井事件。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21页；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载1998年6月4日《小参考》。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4—85页。

同上，第85页。

张作礼《向共和国保证》。同上，第255页。

张振生《车头永远向北京》。同上，第233页。

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8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3日。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6页。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载1998年6月4日《小参考》。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6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5页。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2页。

同上，第93页。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3页。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三位“共和国卫士”事迹简介》。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7日。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4日。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6页。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装甲车在京华逞凶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89年6月10日。

王晓明《目击实录》。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王山《六烈士的最后四小时》。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8—59页。

即301医院。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4页。

陈小雅《李相、汤学平访谈录》，2016年1月24日。

陈小雅《李相、汤学平访谈录》，2016年1月24日。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458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5页。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载1998年6月4日《小参考》。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8页。

李纪婉《我死了，在1989年6月4日凌晨一点》。载《多维月刊》2004年5月号。

王晓明《目击实录》。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引自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6页。但笔者在大约五、六年前的一个聚会上，仍见到李平。不清楚这里是否说的同一个人，还是使用了“李平”这个化名。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6页。

王庆元《我所目睹的“六四”》 2013/6/2电子邮件。

同上。

退伍兵《亲历64》。

地点记忆可能有误，应该是木樨地。

吴家民《再度京华》。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2页。

参见题为《不堪回首忆“清场”，中央警卫团管收尸》的文章，作者佚名，刊载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香港《星岛日报》电子版。

吕志军《装载机在开进》。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64页。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三位“共和国卫士”事迹简介》。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7日。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5页。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三位“共和国卫士”事迹简介》。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7日。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9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5页。

同上，第16—17页。

同上，第16页。

同上，第16页。

李靖《镜头下的长安街》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79页。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5页。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8页。

《一位轻工学院学生的6.3见闻》。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22页。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9页。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同上，第95页。

同上，第96页。

吕志军《装载机在开进》。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65页。

《一位轻工学院学生的6.3见闻》。

长安街向西的延长线是复兴路。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4日。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8—429页。

王晓明《目击实录》。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7页。

同上，第157—158页。参见于夜《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希望》。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专辑. 三）1993年5月29日出版。原载《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6月3日。

由死者家属向“六四”难属苏冰娴提供。详见丁子霖《“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据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淦昌的学生许良英先生口述。

同上。

邓拓，曾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华北局书记。因著文批评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三家村”案遭受批判，文革前夕自杀。

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1989年9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1989年9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一位轻工学院学生的6.3见闻》。

李相《李相在6月3日的经历》（未刊稿）。

佚名《天安门广场死亡真相》。原载《博讯》2001年6月7日。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4日，第429—430页。

详见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8页。

刘国庚牺牲后，被暴徒焚烧尸体、剖腹，吊在车辆上示众。见《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要求全军向他们学习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日，第1版。

见新华社6月16日电《参与残害李国瑞的暴徒被捕》；新华社7月24日电《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李国瑞刘艳坡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6日，第2版；7月24日，第1版。

见《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李国瑞刘艳坡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4日，第1版。

子夜《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希望》。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专辑·三）1993年5月29日出版。原载《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6月3日。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8页。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丁子霖名单记为88级。

丁子霖名单记为马凤龙。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同上。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4日。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6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8—19页。封从德批注：卜正民（Timothy Brook）书中记录的也是4人死亡（人民医院）；丁子霖名单记录的9岁死者为男性：吕鹏。

陈毅然网文《从火光中想到的》。

《一位轻工学院学生的6.3见闻》。

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第320页；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81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84、85页。

参见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北大八名教授副教授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载《人民日报》5月31日，第1版；郑岩《新华门的见证》，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7日，第4版。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1页。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领袖。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2—193页。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3页。

北高联6月4日《告世界同胞书》。载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9页。

退伍兵《亲历64》。同上。

同上。

莫默《她，死于19岁》。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42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0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3页。

同上。

退伍兵《亲历64》。

同上。

同上。

同上。

锤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同上。

同上。

同上。

2016年7月26日，陈毅然向笔者指认自己的见证地点时，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全部紊乱。她记忆的时间是“晚饭后”，军车出现的地点是现在图书大厦的对面有一个胡同口，而不是从西单过来，她说看见西面的路上根本没什么人。她开始尾随的地点则是长安街“从音乐厅开始，到六部口止”这一段。而实际上音乐厅就在六部口。笔者事后考察和访问路南居民，居民反映：27年前，西单到六部口一线，除长安大戏院、首都电影院和音乐厅几个大一点的建筑外，路南全部是平房和店铺。在牛肉弯（即现图书大厦对面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胡同，只有一个很窄小的胡同通长安街，130小卡车勉强能通过，根本不可能快速通过几十辆军车。

星光《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载2005年《华夏文摘》增刊。

同上。

同上。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4页。

星光《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载2005年《华夏文摘》增刊。

施绳《我忘不了那年的那一天——两颗子弹击中了我》载《天下论坛》，2002年12月5日。

同上。

同上。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张堃《血染的征程》。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5—166页。

详见本书下册第三章 第八节：军中反杨活动。注Y

张堃《血染的征程》。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6页。

同上，第167页。

同上，第168页。

马卫东《马嫂》。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63、365页。

同上，第368页。

贾志媛《将军脱险记》。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83—284页。

参见贾志媛、胡海利《将军脱险记》。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85、288页。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要求全军向他们学习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日，第一版。王锦伟事迹见刘刚《南新华街前的哀思》。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30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66页。

屈承明《带路》。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02页。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制止动乱平息暴乱 民兵发挥重要作用》。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8日，第4版。

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傅秉耀《走进血与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7页。

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傅秉耀《走进血与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7—158页。

艾虎生《敬礼！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3—164页。

同上，第165页。

人民日报记者 赖仁琼《人民战士的情怀——戒严部队某部采访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7日，第4版。

同上。

张作礼《向共和国保证》。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8页。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装甲车在京华逞凶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89年6月10日。

中共党史评论员《从六四死伤人数谈起》1999年6月6日，于北京。

张作礼《向共和国保证》。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8页。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

吕敬东《送“神枪手四连”去广场》。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41—342页。

李虎祥《一个神枪手的自述》。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40页。

同上，第138—143页。

徐运平《血写的教科书——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展览侧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31日，第1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事故所涉人员分属于38军炮兵旅第五营营部无线班、二连四班、三连有线班。见第1025-1026页。

蓝默《如此新闻道德——西方和香港新闻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30日，第2版。

王山《六烈士的最后四小时》。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9—60页。

同上，第61页。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要求全军向他们学习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日，第一版。

王山《六烈士的最后四小时》。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8页。

郭建理《我们这些炊事兵》。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73页。

新华社记者孙茂庆、新华社通讯员李运斗《爱心献给人民——记“共和国卫士”、空军某部排长游德高》。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5日。

参见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上、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8、208页。

新华社7月27日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位同志两位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7日。第1版。

新华社记者孙茂庆、新华社通讯员李运斗《爱心献给人民——记“共和国卫士”、空军某部排长游德高》。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5日。

新华社7月27日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位同志两位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7日。第1版。

新华社记者孙茂庆、新华社通讯员李运斗《爱心献给人民——记“共和国卫士”、空军某部排长游德高》。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5日。

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8页。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0、215页。

见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王志英 男 35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车工、劳模。89.6.3.晚11点，与妻从宣武门岳母家回东珠市口家里，约12：00多至珠市口十字路口，遇戒严部队向北行进，一路扫射，王夫妇躲在路口一辆面包车后面，一颗子弹射中王颈动脉，送前门医院，又转送同仁医院，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王是同仁医院第一个遇难者。

张向红 女 20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国际共运专业87级学生。89.6.3.夜11点多，与兄嫂多人从珠市口亲戚家出来归家的途中，在前门遇戒严部队受阻，并被冲散。张与嫂一起躲在前门西侧树丛后，被子弹击中左胸主动脉，穿透后背，送市急救中心，6月4日凌晨去世。

王庆增 男 34北京天坛粮管所司机。6.3.晚11点，从家（珠市口附近）骑车去单（永定门方向）检查车辆安全，行至橡胶八厂对面马路时，被从南边开来的戒严部队射中左胃部，送天坛医院，不久死亡。

王文明 男 35北京前进鞋厂模具钳工。89.6.3.晚，王听到外面有枪声，与一邻居一起去珠市口方向观察动向，约12：00，戒严部队自南向北行进扫射，王左肋中弹，子弹从右肋穿出，送友谊医院抢救，因肠子打烂，于4日晚9：00多死亡。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08页。

2015年4月9日，罗立为与陈小雅、XX的谈话。

见刘亚洲《信念与道德》，载《刘亚洲文集》第9页。

参见刘建奇《血肉支点》。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98页。“御敌于立交桥之外”改编自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共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提出的“反围剿”方针：“御敌于国门之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利用北方大片高粱、玉米地作为游击战的掩护，有“遍地青纱帐”之称。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演讲中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抗日。

田慧英《医疗队开赴人民大会堂》。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71—76页。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3页。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同上，第222页。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同上，第222—223页。

潘毅曾对张伯笠说，这是邱延亮的想法。见张伯笠《民主大学》。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1页。

张伯笠《民主大学》。同上，第299页。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张伯笠《贪污嫌疑》。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59页。

张伯笠《民主大学》。同上，第299页。

同上，第299—300页。

同上，第300页。

同上，第300—302页。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张伯笠《民主大学》。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2页。

同上，第302页。

据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也有记载为“自由论坛”。此处采用张伯笠的说法。退伍兵《亲历64》。

邱永生 黄智敏 易俭如 张宝瑞 朱 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8页。

据《38军军史》；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0页；刘福祥 栗蕲春 魏厚敏 李全茂《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戒严部队某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1日。

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装甲车的时间并不一致，有“11点以前”说，持此说者有罗宾·芒罗《对天安门的最后一瞥》，见1989年9月23日《南华早报》；清华大学“筹委会”成员、工程物理系学生赵明，载张宝瑞、江钱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谎言——首都几位大学生和教师谈现场见闻》。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第2版。有12：10（或12时过后、12：15）说，持此说者有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邹明、热能系学生戴东海。

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持此说者还有退伍兵《亲历64》；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装甲车在京华逞凶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89年6月10日。这应该是另一辆装甲车第二次回到广场，被焚烧之前的时间。

此处装甲车编号依据李勃《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0页。但关于这辆车的编号有另外两种说法：1、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记为“993”，见《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载香港《文汇报》89年6月10日。2、退伍兵《亲历64》记为“337”或“339”。

李勃《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0—111页。

退伍兵《亲历64》。

李勃《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4—115页。

据周舵回忆，广播站曾有人讲授“用汽油瓶、棉被打（烧）坦克的方法”。见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据张伯笠回忆，当晚，负责广场广播站的张华洁因在六部口被军队打得“满脸流血”，曾在广播里“呼吁同学们准备抵抗”，成立“暗杀团”。张伯笠当场制止并批评了他并重申“和平非暴力原则”。见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54页。

张宝瑞、江钱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谎言——首都几位大学生和教师谈现场见闻》。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第2版。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据封从德回忆，此时大约是晚11：00，消息说，北师大的一位女生于10：20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被戒严部队打死了。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520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3日。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0—511页。

佟喜刚等《浴血金水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03—112页。

罗宾·芒罗《对天安门的最后一瞥》，载1989年9月23日《南华早报》。见于新华社香港9月27日电《美国一名目击者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8日，第4版。

陈小雅《郭黎见闻录》1989年6月3日。大约在同一时间，退伍兵《亲历64》记载：“两辆装甲车飞速而来，从南边插过来，分别从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通过天安门时速不低于60 多迈，车号是337-339，……时间是0：15。”“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自重12.8吨，乘员13人。”

赵斌等《浴血金水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1页。

陈小雅《89见闻录》。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装甲车在京华逞凶—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89年6月10日。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陈小雅《89见闻录》。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3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0页。

陈葆琛《黎明即将到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90、292页。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参见梁二《纪念碑上》，载《回顾与反思》。第318—319页；梁肇噉《挽歌——我在屠城之夜的经历》。

这类事例，哪怕就是在为戒严和开枪寻找合理性的《戒严一日》中，忠实于事实的指战员和编辑者也没有故意隐去不提。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09页。

同上，第478页。

梁肇墩《挽歌——我在屠城之夜的经历》。载《新闻自由导报》1991年6月14日（总第八十期）。

李录《六三这一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9—310页。

梁二《纪念碑上》，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19页。

梁肇墩《挽歌——我在屠城之夜的经历》。载《新闻自由导报》1991年6月14日（总第八十期）。

陈小雅《89见闻录》。

同上。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同上。

同上。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20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40页。

参见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台湾风云时代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第516页。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

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1页。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陈小雅《89见闻录》。

载《苹果日报》电子版，1999年6月7日。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梅兆赞的回忆。载《苹果日报》电子版，1999年6月7日。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4日，第243页。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山刚志，现任北京大学医院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曾留学日本。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李相《李相在6月3日的经历》（未刊稿）。

陈小雅《李相、汤学平访谈录》，2016年1月25日（笔谈）。

李相《李相在6月3日的经历》（未刊稿）。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六四档案。2009年6月。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血淋淋的六月四日凌晨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四）》89年6月11日。

当时纪念碑周围的人数有各种估计。笔者凌晨2：00离开前，估计有2000人左右。北京大学国政系教师陈育国目测估算，是“2000余人”。见王丹《与原北大青年教师陈育国的对谈》。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新华社香港9月27日电《美国一名目击者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8日，第4版。

张宝瑞、江钱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谎言——首都几位大学生和教师谈现场见闻》。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第2版。

李录《六三这一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9页。

李录《移山》，第197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2—513页。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八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参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三节：阎明复临危受命；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五节：最后的挽救；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106页。

侯德健《我的亲身经历》。载《天安门民主运动资料汇编》，第339页。

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18—319页。

封从德不否认此说。但他解释：这个时间概念形成的来源“好像是侯德健谈判回来说，军队得到死命令，七点天亮前必须清场。”

同上，第319—320页。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5页。据2015年11月网络资料显示，宋松生于1963年5月，现为 副研究员，供职单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专长是影像医学。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在周舵的记忆中，是同行的一个纠察队员告诉他们，“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于是司机才往北开。见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各种资料对此处时间记载不一：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李之云《答外国记者问》记载的时间是2：30，见《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3、417页。可能对方尚未调整到夏时制。新华社记者采访季新国、顾本喜时的说法是3：30。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的记载是3：45左右。因此说上与封从德回忆时间接榫，下与其他关键时间节点比较吻合，此处采用张良的说法。见下册，第917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此处与周舵所说不合。

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3页。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称是赫团长。见《戒严一日》上册，第265页。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报道称是顾本喜。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5页。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6日，第241—242页。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炼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54页。

《侯德健忆述六四清场交涉过程》。载台湾《时代周刊》第226期。

同上。

关于熄灯时间，有4：00、4：10和4：25几种说法。持4：00说法的有美国人罗宾·芒罗《对天安门的最后一瞥》，载9月23日《南华早报》；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引用安全部材料（下册，第918页）；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血淋淋的六月四日凌晨》；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持4：10说法的有cpcliusi《关于“六四”清场几个问题的考证》；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记载“4：00刚过”，见载《戒严一日》下册，第212页。持4：25说法的有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198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18页。

刘建军《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7页。关于搜查帐篷的时间，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记载是在摧毁高自联指挥部、缴获所有物资，并开始打扫纪念碑之后。并提到“我侦察分队官兵开始打着手电逐个检查帐篷内是否有人，强行驱赶一伙不肯离去的顽固分子。”见198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香港9月27日电《美国一名目击者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8日，第4版。

刘建军《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8页。

同上。

推倒“女神像”的时间有4：11、4：20、4：30灯亮以后和3：05等多种不同记载。此处采用亲自执行任务的张东旭《推倒“女神”像》和摄影师余波的说法。见《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0—262页；下册228页。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记为3：05，是熄灯和正式清场之前。见《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依据BBC电视新闻制作的“六四”凌晨录像片，坦克碾过“女神像”时，华灯已经开放。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2页。

侯德健与宋松证言。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2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6—517页。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七节：学生的绝望。

据封从德提供1989年6月4日广播站录音整理。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8页。

退伍兵《亲历64》。

据封从德提供1989年6月4日广播站录音整理；参见封从德《史实与史识的求索——增订手记》，2013年。

刘建军《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8页。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918-91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939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页。

梁二《师大》。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3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封从德认为“这应是出于宣传需要而加的情节”。

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3日。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页。

张宝瑞、江钱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谎言——首都几位大学生和教师谈现场见闻》。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第2版。

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梁二《纪念碑上》，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20页。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同上。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王海燕，生于1933年，1959年9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大内科主任、肾脏疾病研究所所长。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参见郝连锁《广场东南角的枪声》、余波《摄下这个瞬间》。载《戒严一日》下册，第229—231页。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2页。

香港《Standdrd》报，1989年6月5日。载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2—13页。封从德注：程真口述实录有类似记述。

路透社，华沙，1989年6月4日。

载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2—13页。

《子弹穿喉——台湾记者徐宗懋毕生的痛》。1999年。

陈葆琛《黎明即将到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87页。

孔宪金《智救公安局长》。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8、53页。

陈葆琛《黎明即将到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91页。

同上，第292页。

同上，第293页。

详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七章 第六节：催泪弹。

潘强《从山东大学到天安门广场》。载《大参考》总第2275期，2004年5月25日。潘强于1989年6月20日晚在山东大学校内被济南市公安局缉捕。见《“外高联”头头潘强落网》，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3日，第4版。

陈小雅《张健访谈录》，2015年8月8日——9月5日（笔谈）。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佚名《天安门广场死亡真相》。原载《博讯》2001年6月7日。

普通北京人《回忆南池子的“血墙”》载《小参考》1999年6月4日，总第444期。载自：64memo.com

同上

同上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1页。

同上。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六四档案。2009年6月。

邢村《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载《华夏文摘》（增刊）第180期，1999年5月18日版。

佚名《16年前那个腥风血雨的长夜——六四回忆》。载《华夏文摘》（增刊）第436期，2005年6月4日版。

高新《“六四”之后仍在开枪——〈“六四”谁在开枪〉一文补遗》。载《中国之春》1991年7月号。

邢村《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载《华夏文摘》（增刊）第180期，1999年5月18日版。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6页。

邢村《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载《华夏文摘》（增刊）第180期，1999年5月18日版。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六四档案。2009年6月。 退伍兵《亲历64》。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六四档案。2009年6月。

退伍兵《亲历64》。

见罗点点《流血的改革》。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北京收缴一批散失军用品》载：“据戒严区内8个公安分局的统计，截至6月17日，已收缴各类军用枪181支，其中冲锋枪135支，步枪2支，手枪25支，机枪19挺（包括高射机枪4挺）；子弹28287发。此外，还有电台、警棍、钢盔、催泪弹、匕首、盾牌等军警用品232件。”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第2版。

林彬《历历在目惊心动魄的“六四”》。载《枫华园》增刊，总第35期。
《天安门广场死亡真相》。原载《博讯》2001年6月7日。

丁子霖《“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4页。

同上，第32页。

同上，第66页。

同上，第72页。

同上，第82页。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载64memo.com/2004。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罗刚《红墙外的较量》。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9页。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锺同上。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21页。

同上，第536页，注353。参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一节 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载64memo.com/2004。

同上。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同上。

同上。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载64memo.com/2004。

同上。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20—522页。

详见丁子霖《“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方政的证词》1999年2月21日。

施绳《我忘不了那年的那一天——两颗子弹击中了我》载《天下论坛》，2002年12月5日。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1998年6月4日摘自《小参考》。

同上。

封从德批注：“用该是6：20——据法国记者拍摄照片所标定的时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坦克追碾学生事件亲历记》。转引自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梁晓燕《影片“天安门”解说词》。64memo - 2002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8页。

李树存《血染的风采》。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4页。

同上，第125页。

同上，第126页。

同上。

见刘亚洲《信念与道德》，载《刘亚洲文集》第8页。

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7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4—85页。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三章第五节：大井事件。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21页；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载1998年6月4日《小参考》。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4—85页。

同上，第85页。

张作礼《向共和国保证》。同上，第255页。

张振生《车头永远向北京》。同上，第233页。

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8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3日。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6页。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载1998年6月4日《小参考》。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6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5页。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2页。

同上，第93页。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3页。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三位“共和国卫士”事迹简介》。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7日。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4日。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6页。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装甲车在京华逞凶—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89年6月10日。

王晓明《目击实录》。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王山《六烈士的最后四小时》。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8—59页。

即301医院。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4页。

陈小雅《李相、汤学平访谈录》，2016年1月24日。

陈小雅《李相、汤学平访谈录》，2016年1月24日。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458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5页。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载1998年6月4日《小参考》。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8页。

李纪婉《我死了，在1989年6月4日凌晨一点》。载《多维月刊》2004年5月号。

王晓明《目击实录》。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引自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6页。但笔者在大约五、六年前的一个聚会上，仍见到李平。不清楚这里是否说的同一个人，还是使用了“李平”这个化名。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6页。

王庆元《我所目睹的“六四”》 2013/6/2電子郵件。

同上。

退伍兵《亲历64》。

地点记忆可能有误，应该是木樨地。

吴家民《再度京华》。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2页。

参见题为《不堪回首忆“清场”，中央警卫团管收尸》的文章，作者佚名，刊载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香港《星岛日报》电子版。

吕志军《装载机在开进》。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64页。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三位“共和国卫士”事迹简介》。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7日。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5页。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三位“共和国卫士”事迹简介》。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7日。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9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5页。

同上，第16—17页。

同上，第16页。

同上，第16页。

李靖《镜头下的长安街》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79页。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5页。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8页。

《一位轻工学院学生的6.3见闻》。

参见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22页。

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89页。

李林《开进中的防暴队》。同上，第95页。

同上，第96页。

吕志军《装载机在开进》。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65页。

《一位轻工学院学生的6.3见闻》。

长安街向西的延长线是复兴路。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4日。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8—429页。

王晓明《目击实录》。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7页。

同上，第157—158页。参见于夜《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希望》。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专辑. 三）1993年5月29日出版。原载《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6月3日。

由死者家属向“六四”难属苏冰娴提供。详见丁子霖《“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据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淦昌的学生许良英先生口述。

同上。

邓拓，曾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华北局书记。因著文批评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三家村”案遭受批判，文革前夕自杀。

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1989年9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1989年9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一位轻工学院学生的6.3见闻》。

李相《李相在6月3日的经历》（未刊稿）。

佚名《天安门广场死亡真相》。原载《博讯》2001年6月7日。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4日，第429—430页。

详见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8页。

刘国庚牺牲后，被暴徒焚烧尸体、剖腹，吊在车辆上示众。见《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要求全军向他们学习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日，第1版。

见新华社6月16日电《参与残害李国瑞的暴徒被捕》；新华社7月24日电《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李国瑞刘艳坡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6日，第2版；7月24日，第1版。见《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李国瑞刘艳坡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4日，第1版。

子夜《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希望》。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专辑.三）1993年5月29日出版。原载《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6月3日。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8页。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丁子霖名单记为88级。

丁子霖名单记为马凤龙。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同上。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6月4日。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26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8—19页。封从德批注：卜正民（Timothy Brook）书中记录的也是4人死亡（人民医院）；丁子霖名单记录的9岁死者为男性：吕鹏。

陈毅然网文《从火光中想到的》。

《一位轻工学院学生的6.3见闻》。

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第320页；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81页。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84、85页。

参见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北大八名教授副教授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载《人民日报》5月31日，第1版；郑岩《新华门的见证》，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7日，第4版。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1页。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领袖。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2—193页。

小鹿《六·三一一六·四惨案目击记》。载《华夏文摘》第688期，2004年6月4日版。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3页。

北高联6月4日《告世界同胞书》。载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9页。

退伍兵《亲历64》。

同上。

同上。

莫默《她，死于19岁》。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42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0页。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3页。

同上。

退伍兵《亲历64》。

同上。

同上。

同上。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同上。

同上。

同上。

2016年7月26日，陈毅然向笔者指认自己的见证地点时，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全部紊乱。她记忆的时间是“晚饭后”，军车出现的地点是现在图书大厦的对面有一个胡同口，而不是从西单过来，她说看见西面的路上根本没什么人。她开始尾随的地点则是长安街“从音乐厅开始，到六部口止”这一段。而实际上音乐厅就在六部口。笔者事后考察和访问路南居民，居民反映：27年前，西单到六部口一线，除长安大戏院、首都电影院和音乐厅几个大一点的建筑外，路南全部是平房和店铺。在牛肉弯（即现图书大厦对面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胡同，只有一个很窄小的胡同通长安街，130小卡车勉强能通过，根本不可能快速通过几十辆军车。

星光《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载2005年《华夏文摘》增刊。

同上。

同上。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4页。

星光《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载2005年《华夏文摘》增刊。

施绳《我忘不了那年的那一天——两颗子弹击中了我》载《天下论坛》，2002年12月5日。

同上。

同上。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张堃《血染的征程》。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5—166页。

详见本书下册第三章 第八节：军中反杨活动。注Y

张堃《血染的征程》。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6页。

同上，第167页。

同上，第168页。

马卫东《马嫂》。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63、365页。

同上，第368页。

贾志媛《将军脱险记》。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83—284页。

参见贾志媛、胡海利《将军脱险记》。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85、288页。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要求全军向他们学习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198

9年7月2日，第一版。王锦伟事迹见刘刚《南新华街前的哀思》。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30页。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66页。

屈承明《带路》。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02页。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制止动乱平息暴乱 民兵发挥重要作用》。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8日，第4版。

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傅秉耀《走进血与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7页。

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傅秉耀《走进血与火》。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7—158页。

艾虎生《敬礼！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3—164页。

同上，第165页。

人民日报记者 赖仁琼《人民战士的情怀——戒严部队某部采访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7日，第4版。

同上。

张作礼《向共和国保证》。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8页。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装甲车在京华逞凶—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89年6月10日。

中共党史评论员《从六四死伤人数谈起》1999年6月6日，于北京。

张作礼《向共和国保证》。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8页。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

吕敬东《送“神枪手四连”去广场》。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41—342页。

李虎祥《一个神枪手的自述》。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40页。

同上，第138—143页。

徐运平《血写的教科书——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展览侧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31日，第1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事故所涉人员分属于38军炮兵旅第五营营部无线班、二连四班、三连有线班。见第1025-1026页。

蓝默《如此新闻道德——西方和香港新闻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30日，第2版。

王山《六烈士的最后四小时》。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9—60页。

同上，第61页。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要求全军向他们学习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日，第一版。

王山《六烈士的最后四小时》。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8页。

郭建理《我们这些炊事兵》。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73页。

新华社记者孙茂庆、新华社通讯员李运斗《爱心献给人民——记“共和国卫士”、空军某部排长游德高》。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5日。

参见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上、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8、208页。

新华社7月27日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位同志两位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7日。第1版。

新华社记者孙茂庆、新华社通讯员李运斗《爱心献给人民——记“共和国卫士”、空军某部排长游德高》。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5日。

新华社7月27日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位同志两位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7日。第1版。

新华社记者孙茂庆、新华社通讯员李运斗《爱心献给人民——记“共和国卫士”、空军某部排长游德高》。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5日。

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8页。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0、215页。

见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王志英 男 35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车工、劳模。89.6.3.晚11点，与妻从宣武门岳母家回东珠市口家里，约12：00多至珠市口十字路口，遇戒严部队向北行进，一路扫射，王夫妇躲在路口一辆面包车后面，一颗子弹射中王颈动脉，送前门医院，又转送同仁医院，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王是同仁医院第一个遇难者。

张向红 女 20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国际共运专业87级学生。89.6.3.夜11点多，与兄嫂多人从珠市口亲戚家出来归家的途中，在前门遇戒严部队受阻，并被冲散。张与嫂一起躲在前门西侧树丛后，被子弹击中左胸主动脉，穿透后背，送市急救中心，6月4日凌晨去世。

王庆增 男 34北京天坛粮管所司机。6.3.晚11点，从家（珠市口附近）骑车去单（永定门方向）检查车辆安全，行至橡胶八厂对面马路时，被从南边开来的戒严部队射中左胃部，送天坛医院，不久死亡。王文明 男 35北京前进鞋厂模具钳工。89.6.3.晚，王听到外面有枪声，与一邻居一起去珠市口方向观察动向，约12：00，戒严部队自南向北行进扫射，王左肋中弹，子弹从右肋穿出，送友谊医院抢救，因肠子打烂，于4日晚9：00多死亡。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08页。

2015年4月9日，罗立为与陈小雅、XX的谈话。

见刘亚洲《信念与道德》，载《刘亚洲文集》第9页。

参见刘建奇《血肉支点》。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98页。“御敌于立交桥之外”改编自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共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提出的“反围剿”方针：“御敌于国门之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利用北方大片高粱、玉米地作为游击战的掩护，有“遍地青纱帐”之称。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演讲中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抗日。

田慧英《医疗队开赴人民大会堂》。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71—76页。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23页。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同上，第222页。

李录《广场后期工作》。同上，第222—223页。

潘毅曾对张伯笠说，这是邱延亮的想法。见张伯笠《民主大学》。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1页。

张伯笠《民主大学》。同上，第299页。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张伯笠《贪污嫌疑》。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259页。

张伯笠《民主大学》。同上，第299页。

同上，第299—300页。

同上，第300页。

同上，第300—302页。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张伯笠《民主大学》。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2页。

同上，第302页。

据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也有记载为“自由论坛”。此处采用张伯笠的说法。

退伍兵《亲历64》。

邱永生 黄智敏 易俭如 张宝瑞 朱 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左印生《戒严日记六则》。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88页。

据《38军军史》；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0页；刘福祥 栗蕲春 魏厚敏 李全茂《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戒严部队某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1日。

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装甲车的时间并不一致，有“11点以前”说，持此说者有罗宾·芒罗《对天安门的最后一瞥》，见1989年9月23日《南华早报》；清华大学“筹委会”成员、工程物理系学生赵明，载张宝瑞、江钱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谎言——首都几位大学生和教师谈现场见

闻》。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第2版。有12：10（或12时过后、12：15）说，持此说者有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邹明、热能系学生戴东海。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持此说者还有退伍兵《亲历64》；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装甲车在京华逞凶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89年6月10日。这应该是另一辆装甲车第二次回到广场，被焚烧之前的时间。

此处装甲车编号依据李勃《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0页。但关于这辆车的编号有另外两种说法：1、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记为“993”，见《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载香港《文汇报》89年6月10日。2、退伍兵《亲历64》记为“337”或“339”。

李勃《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0—111页。

退伍兵《亲历64》。

李勃《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4—115页。

据周舵回忆，广播站曾有人讲授“用汽油瓶、棉被打（烧）坦克的方法”。见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据张伯笠回忆，当晚，负责广场广播站的张华洁因在六部口被军队打得“满脸流血”，曾在广播里“呼吁同学们准备抵抗”，成立“暗杀团”。张伯笠当场制止并批评了他并重申“和平非暴力原则”。见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154页。

张宝瑞、江钱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谎言——首都几位大学生和教师谈现场见闻》。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第2版。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据封从德回忆，此时大约是晚11：00，消息说，北师大的一位女生于10：20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被戒严部队打死了。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详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Createspace, 2016年4月版，下册，第520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3日。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0—511页。

佟喜刚等《浴血金水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03—112页。

罗宾·芒罗《对天安门的最后一瞥》，载1989年9月23日《南华早报》。见于新华社香港9月27日电《美国一名目击者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8日，第4版。

陈小雅《郭黎见闻录》1989年6月3日。大约在同一时间，退伍兵《亲历64》记载：“两辆装甲车飞速而来，从南边插过来，分别从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通过天安门时速不低于60 多迈，车号是337-339，……时间是0：15。”“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自重12.8吨，乘员13人。”

赵斌等《浴血金水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11页。

陈小雅《89见闻录》。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装甲车在京华逞凶—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89年6月10日。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陈小雅《89见闻录》。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第43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0页。

陈葆琛《黎明即将到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90、292页。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参见梁二《纪念碑上》，载《回顾与反思》。第318—319页；梁肇墩《挽歌——我在屠城之夜的经历》。

这类事例，哪怕就是在为戒严和开枪寻找合理性的《戒严一日》中，忠实于事实的指战员和编辑者也没有故意隐去不提。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09页。

同上，第478页。

梁肇墩《挽歌——我在屠城之夜的经历》。载《新闻自由导报》1991年6月14日（总第八十期）。

李录《六三这一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9—310页。

梁二《纪念碑上》，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19页。

梁肇墩《挽歌——我在屠城之夜的经历》。载《新闻自由导报》1991年6月14日（总第八十期）。

陈小雅《89见闻录》。

同上。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同上。

同上。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3日，第239页。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20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40页。

参见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载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附录。台湾风云时代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第516页。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

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1页。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陈小雅《89见闻录》。

载《苹果日报》电子版，1999年6月7日。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梅兆赞的回忆。载《苹果日报》电子版，1999年6月7日。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4日，第243页。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山刚志，现任北京大学医院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曾留学日本。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李相《李相在6月3日的经历》（未刊稿）。 陈小雅《李相、汤学平访谈录》，2016年1月25日（笔谈）。

李相《李相在6月3日的经历》（未刊稿）。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六四档案。2009年6月。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血淋淋的六月四日凌晨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四）》89年6月11日。

当时纪念碑周围的人数有各种估计。笔者凌晨2：00离开前，估计有2000人左右。北京大学国政系教师陈育国目测估算，是“2000余人”。见王丹《与原北大青年教师陈育国的对谈》。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新华社香港9月27日电《美国一名目击者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8日，第4版。

张宝瑞、江钱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谎言——首都几位大学生和教师谈现场见闻》。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第2版。

李录《六三这一夜》。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09页。

李录《移山》，第197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2—513页。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详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章 第八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详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五章 第一节：“三所一会”的反抗。

参见本书第五卷 第十一章 第三节：阎明复临危受命；第六卷 第十二章 第五节：最后的挽救；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106页。

侯德健《我的亲身经历》。载《天安门民主运动资料汇编》，第339页。

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18—319页。

封从德不否认此说。但他解释：这个时间概念形成的来源“好像是侯德健谈判回来说，军队得到死命令，七点天亮前必须清场。”

同上，第319—320页。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5页。

据2015年11月网络资料显示，宋松生于1963年5月，现为 副研究员，供职单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专长是影像医学。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在周舵的记忆中，是同行的一个纠察队员告诉他们，“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于是司机才往北开。见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各种资料对此处时间记载不一：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李之云《答外国记者问》记载的时间是2：30，见《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3、417页。可能对方尚未调整到夏时制。新华社记者采访季新国、顾本喜时的说法是3：30。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的记载是3：45左右。因此说上与封从德回忆时间接榫，下与其他关键时间节点比较吻合，此处采用张良的说法。见下册，第917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此处与周舵所说不合。

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3页。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称是赫团长。见《戒严一日》上册，第265页。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报道称是顾本喜。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5页。

见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6日，第241—242页。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54页。

《侯德健忆述六四清场交涉过程》。载台湾《时代周刊》第226期。

同上。

关于熄灯时间，有4：00、4：10和4：25几种说法。持4：00说法的有美国人罗宾·芒罗《对天安门的最后一瞥》，载9月23日《南华早报》；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引用安全部材料（下册，第918页）；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血淋淋的六月四日凌晨》；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持4：10说法的有cpcliusi《关于“六四”清场几个问题的考证》；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记载“4：00刚过”，见载《戒严一日》下册，第212页。持4：25说法的有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198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18页。

刘建军《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7页。关于搜查帐篷的时间，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记载是在摧毁高自联指挥部、缴获所有物资，并开始打扫纪念碑之后。并提到“我侦察分队官兵开始打着手电逐个检查帐篷内是否有人，强行驱赶一伙不肯离去的顽固分子。”见198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香港9月27日电《美国一名目击者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8日，第4版。

刘建军《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8页。

同上。

推倒“女神像”的时间有4：11、4：20、4：30灯亮以后和3：05等多种不同记载。此处采用亲自执行任务的张东旭《推倒“女神”像》和摄影师余波的说法。见《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0—262页；下册228页。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记为3：05，是熄灯和正式清场之前。见《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依据BBC电视新闻制作的“六四”凌晨录像片，坦克碾过“女神像”时，华灯已经开放。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2页。

侯德健与宋松证言。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2页。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6—517页。

详见本书第三卷 第七章 第七节：学生的绝望。

据封从德提供1989年6月4日广播站录音整理。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18页。

退伍兵《亲历64》。

据封从德提供1989年6月4日广播站录音整理；参见封从德《史实与史识的求索——增订手记》，2013年。

刘建军《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8页。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同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918-919页。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939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页。

梁二《师大》。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183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

封从德认为“这应是出于宣传需要而加的情节”。

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3日。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页。

张宝瑞、江钱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谎言——首都几位大学生和教师谈现场见闻》。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4日，第2版。

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梁二《纪念碑上》，载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回顾与反思》。第320页。

陈小雅《马少方访谈录》（笔谈）2016年1月11—12日。

同上。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王海燕，生于1933年，1959年9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大内科主任、肾脏疾病研究所所长。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参见郝连锁《广场东南角的枪声》、余波《摄下这个瞬间》。载《戒严一日》下册，第229—231页。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12页。

香港《Standdrrd》报，1989年6月5日。载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2—13页。封从德注：程真口述实录有类似记述。

路透社，华沙，1989年6月4日。

载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2—13页。

《子弹穿喉——台湾记者徐宗懋毕生的痛》。1999年。

陈葆琛《黎明即将到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87页。

孔宪金《智救公安局长》。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8、53页。

陈葆琛《黎明即将到来》。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91页。

同上，第292页。

同上，第293页。

详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七章 第六节：催泪弹。

潘强《从山东大学到天安门广场》。载《大参考》总第2275期，2004年5月25日。潘强于1989年6月20日晚在山东大学校内被济南市公安局缉捕。见《“外高联”头头潘强落网》，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3日，第4版。

陈小雅《张健访谈录》，2015年8月8日——9月5日（笔谈）。

张健《最后一枪》（未刊稿）。

佚名《天安门广场死亡真相》。原载《博讯》2001年6月7日。

普通北京人《回忆南池子的“血墙”》载《小参考》1999年6月4日，总第444期。载自：64memo.com

同上

同上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0日。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11页。

同上。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六四档案。2009年6月。

邢村《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载《华夏文摘》（增刊）第180期，1999年5月18日版。

佚名《16年前那个腥风血雨的长夜——六四回忆》。载《华夏文摘》（增刊）第436期，2005年6月4日版。

高新《“六四”之后仍在开枪——〈“六四”谁在开枪〉一文补遗》。载《中国之春》1991年7月号。

邢村《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载《华夏文摘》（增刊）第180期，1999年5月18日版。

王德邦《不死的怀念——八九亲历记》。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96页。

邢村《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载《华夏文摘》（增刊）第180期，1999年5月18日版。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六四档案。2009年6月。

退伍兵《亲历64》。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六四档案。2009年6月。

退伍兵《亲历64》。

见罗点点《流血的改革》。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北京收缴一批散失军用品》载：“据戒严区内8个公安分局的统计，截至6月17日，已收缴各类军用枪181支，其中冲锋枪135支，步枪2支，手枪25支，机枪19挺（包括高射机枪4挺）；子弹28287发。此外，还有电台、警棍、钢盔、催泪弹、匕首、盾牌等军警用品232件。”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第2版。

林彬《历历在目惊心动魄的“六四”》。载《枫华园》增刊，总第35期。《天安门广场死亡真相》。原载《博讯》2001年6月7日。

丁子霖《“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4页。

同上，第32页。

同上，第66页。

同上，第72页。

同上，第82页。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载64memo.com/2004。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罗刚《红墙外的较量》。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9页。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锺同上。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21页。

同上，第536页，注353。参见本书第七卷 第十四章 第一节 天安门广场的“贞德”。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载64memo.com/2004。

同上。

锺罗白《白色黎明》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同上。

同上。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载64memo.com/2004。

同上。

引自《人民日报》记者XXX提供的资料。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20—522页。

详见丁子霖《“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方政的证词》1999年2月21日。

施绳《我忘不了那年的那一天——两颗子弹击中了我》载《天下论坛》，2002年12月5日。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1998年6月4日摘自《小参考》。

同上。

封从德批注：“用该是6：20——据法国记者拍摄照片所标定的时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坦克追碾学生事件亲历记》。转引自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版。

梁晓燕《影片“天安门”解说词》。64memo - 2002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8页。

李树存《血染的风采》。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24页。

同上，第125页。

同上，第126页。

同上。

见刘亚洲《信念与道德》，载《刘亚洲文集》第8页。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风 全文完

八九 民运史

第十卷 大结局

陈小雅 著

公民社 出版

献给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进步牺牲了生命，付出
了代价和正在努力着的人们。——作者

目 录

第二十章 死亡迷雾

第一节 哀乐升起的时节

第二节 民间谣传的死伤情况

第三节 政府的辩解及其变化

第四节 刘国庚遗体二次被难

第五节 “广场运尸”谣言与28中埋尸案

第六节 哈德门的“罗生门”

第二十一章 民心的测试

第一节 木樨地军民联欢？

第二节 “坦克人”

第三节 《戒严一日》披露真相

第四节 军以食为天

第五节 银荒

第二十二章 八九人物之去迹

第一节 方励之的避馆与去国

第二节 “四君子”下落

第三节 通缉榜

第四节 “精英人物”

第五节 社经所及相关人士的结局

第六节 “黄雀行动”及其他民间救援

注释

后记

天安门广场的清场，结束了50天的北京“学运—民运”，虽然事后没有引发成规模的全国性民众抗议活动，但相关人员仍继续品尝着动用军队处理国内政治事务的恶果。北京市民在悼亡之时，用它那根最后的“刺”——“非暴力不合作”——回敬了当政者。

第二十章 死亡迷雾

第一节 哀乐升起的时节

离开六部口后，从广场撤出的大队人马从西单一路向北，在西四分作两股，向西、向北各自回校。所经之地，有市民站在路边，给学生递送油条、馒头做早点。

有几个学生手中提着血衣、摊着子弹，边走边向市民展示。路旁的男女老少，见了学生，个个垂泪，有的女人禁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在宝塔寺十字路口，封从德看见，约有20来人站在路当间议论著什么：

“我猛然见到路口当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横躺着4具尸体！急忙跑到市民当中，拉着一个过路的三轮车工人的手，央求他将尸体收起来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闪中，我说愿出钱买他的三轮车。

这时，市民们围了过来，一个中年壮汉将我推到一边，愤愤地粗声对我喊道：

‘你们学生要敢作这样的事，我就跟你们没完了！’”

一位长者对大惑不解的他解释说，这几个人都是解放军，“昨晚这里百姓死了40多个，可比他们惨”。他指着东面不远人民医院说，“连穿白大褂的都不愿救这帮凶手啊！”他这才仔细打量了这些尸首，他们“浑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还是泥。有一个似乎还抽搐几下却没有呻吟。”他实在不忍

再看下去，不得不在几分内疚和十分无奈之中，弃之而去。心中却仍惦记着“最后有没有人将他们收殓起来”。

在甘家口《解放军报》社与二里沟西苑饭店，学生们烧掉了高楼上凌空而下的拥护戒严的标语。

离开了六部口的血腥场面，雨源搭在一位陌生人的自行车后座上，被送回中国政法大学。在东门，上千名师生早已候在那里。

“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

“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

一位教授模样的老年人，噙着泪水紧紧地抱住了他。雨源就像一个出门在外受尽了委屈的小孩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一样，趴在老年人的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当时整条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听到的都是哭泣声。

在法大教学楼的大厅里，人们为从六部口运回的5具死难学生遗体设置了灵堂。遗体四周放置着冰块，一日三餐定时贡祭。在以后的几天里，师生们轮流为之守灵。“数以万计”的法大师生、外校师生和北京市民前来吊唁。一位参与守灵的老教授愤怒地说：“这个政府疯了，也快把我们给逼疯了！”

在复兴医院，自行车棚被改作临时停尸房，到6月6日公共交通恢复时，这里一直停放着6月3日晚接收的遇难者和不治身亡者的遗体，共56具。据家住木樨地北里的王庆元回忆：

“这些尸体前都放着他们随身带的证件，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学生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学生证写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部，出生1966年……我和F感触的说：多好的年轻人啊！可惜生于动乱死于动乱。还有一个工作证写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像是一名记者，名叫张汝宁，三十四、五岁，新任命的俄语部主任，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久，那天晚上下夜

班，路过木樨地回家，就被打死了。他父母是我父母的同事，他姐姐张汝清和我妹妹是同学。”

“有些尸体始终没人认领，估计多是外地学员或民工。或许当时的大气候太白色恐怖，家属不敢认领。尸体已经腐臭，为了减缓腐臭速度，医院泼洒了浓重的福尔马林，腐臭和福尔马林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更令人作呕。医院的停尸房只有十个冰柜，正常情况下医院自用两个，没有死亡报告，火葬场也不敢收，所以尸体只好在院子暴尸。”

6月4日当天，在木樨地、学院路、东直门立交桥附近，都发生了抬尸游行。

当天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被誉为“金童玉女”的著名主播薛飞、杜宪以一袭黑衣亮相银屏。在播送戒严部队规定的消息时，语调凝重而哀伤。在播到广东大部分地区因受到“三号强台风”袭击，38县“暴雨成灾”，造成84人死亡，263人受伤时，杜宪和听众一齐掉下了眼泪！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节目中，新闻播音员陈原毅然播出了如下一段铭刻历史的记载：

“请记住1989年6月3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称，有些装甲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士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份文稿，是英语新闻节目的值班编辑吴晓镛执笔。消息人士称，6月4日凌晨，家住万寿路的他骑车上大早班，因途径公主坟、木樨地，亲眼看到屠杀后的惨状。上班后就亲自写了这篇著名文稿。但从文稿内容看，其消息来源不止于途中见闻。

图10-1：2014年六月号《开放》介绍吴晓镛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位置，以《北京这一夜》为题，第一个报告了军队“突进”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文章由张宝林、杨良化亲自采写，经代理总编辑陆超祺亲自删订：

“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第三版（国际新闻）的头条新闻，以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为题，报导了南韩光州事件；另一条关于波兰的消息，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一条关于中东的消息，则被冠以“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的标题。

在第四版（社会体育新闻）中，出现了如下标题：

“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

“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

“不能被征服的人”。

6月5日，又在第三版（国际新闻）刊出：

“金大中再次呼吁 法办镇压光州起义元凶”

当天，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在学校门口贴出了声讨檄文：

“当局动用军队和坦克在长安街上滥杀无辜，是一樁浸透了邪恶、野蛮和兽性的法西斯暴行；

当局为了一己之私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竟对手无寸铁的学子和市民举起屠刀，犯下了神人共愤、天理不容的滔天罪行；

一国首都、众目睽睽之下的对同宗同族同胞的凶狠残杀，虽希特勒、虽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虽袁世凯和蒋介石所不为！”

文告为江棋生起草。

李鹏6月9日日记哀叹道：

“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中国的声音”自此被压入地下。其经久不息的话题便是“死亡”！

第二节 民间谣传的死伤情况

我个人首先听到和经历的，除前面已经谈到的“广场东北学生被军官击毙”；“公安部门前踩到粘稠物体”；“南池子碎花衬衣少女头部受伤”；“木樨地22号楼关山复之子中弹身亡”；“李立三遗孀李莎家，子弹穿窗而入”；“三里河士兵扫射藏身花坛青年”；“燕京饭店附近士兵持枪追杀香烟小贩”；“建国门立交桥装甲车撞翻军车，摔死士兵”；“五棵松坦克装甲车开过的路段小孩身形”；“协和医院尸柜不闭”；“装甲车革博北撞死翻栏黑衣人”；“翠微路附近《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子弹穿肺”；“22号楼王淦昌家被达姆弹击穿留下碗口粗弹洞”；“东直门立交桥附近抬尸游行”外，还有：

1、6月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人员张亚来途经府右街回家，被枪弹击伤左腿，致残。

2、应戒严指挥部邀请，参加6月7日官方组织的“广场调查”的记者XX，遵循大会堂工作人员指点，特地注意了大会堂东路西北边第三棵灯柱附近的地面，发现有一大块被水洗过的地面，颜色明显浅于周围的路面。

3、六部口南，坦克路遇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调头过程中碾死学生6人。

4、6月4日凌晨，团结报社工作人员XXX在西长安街路遇一从广场出来的医务人员，白大褂上满身是血，他声称经手救过30多人。同一人路经六部口，见附近西长安街中一名军人躺在地上，有报纸盖脸。同一人稍迟，在月坛南儿童医院附近一饭馆前，见一身份不确者（可以肯定不是学生和军人）停尸路边，头盖骨被砸碎凹陷下去。

5、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干部XX，7日上午骑自行车到建国门一带查看街景，正遇士兵枪击外交公寓。经建国门内大街回家时，又遇戒严部队朝一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开枪。

6、6月4日夜，和平里一带枪响，某国家机关宿舍楼内的一退休老妇开灯观看，被窗外子弹击中身亡。玻璃上溅有血浆。

据杨继绳回忆6月4日一整天，新华社的同事们都在叙述自己看到和听到的死亡情况：

1、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小卜亲眼目睹六部口坦克过后受难的6具尸体：“第一具尸有血，头压扁。其余尸体当时没看到血，人都压扁了。” 2、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老周说：“一孕妇在院内乘凉，一颗子弹穿透腹部，胎儿和母亲都死亡，其夫一时精神失常。”

3、新华社《半月谈》小何6月4日凌晨在复兴门立交桥，“装甲车开过来，老百姓手挽手想挡住，装甲车开得很快，挡车的人只好让到桥两边。装甲车用机枪从上向下扫射，小何迅速卧倒，一骑自行车青年脑浆被打出。”

4、国内部政治组邹爱国与小何、小张同去六部口，见到坦克压死的11人，此外，还在音乐厅北口看见一人头部左侧中弹，“一块骨头掉了下来，是白色的，一学生赶快拾起头骨送上救护车。”另有一人被子弹穿过眉间，当场倒地。

前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记下的来访客人见闻和个人经历有：

1、1989年6月5日或6日上午，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司×××，北大的毕业生说：六部口坦克碾倒11人。

2、住在美使馆区的著名美裔华裔记者李敦白夫妇家，玻璃房子被打穿36个枪洞。

3、一位军级战友6月4日早晨7：00许，从府右街到西单，一路上数到“血迹处，共53处”。西单附近，两辆三轮车上血迹斑斑，鲜血还在从车上往地下流淌。

4、这位军级战友在复兴医院听到，该院“先后收了北京300多人，内死亡40余人”。他本人在停尸房见到了28具遗体。

5、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韩崇德的大女儿在复兴医院作护士长。她告父亲，“复兴医院死62人，伤110人。”

6、那位军级战友说，那几天，“医院医生们想打听死伤情况，彼此医院用如下巧妙语言打听：‘我们力量不敷了，护理不了，你们能收多少啊！’对方如数以告。这样数字大致出来了：

复兴医院：死48人，伤200余人；

邮电医院：死20人，伤100余人；

三〇一医院：死10余人，伤几十人。”

7、那位军级战友说，6月4日到6月8日，戒严部队继续开枪伤人。复兴门一带，共死人9个。

8、那位军级战友说，清华大学某系教授的一位助教，被一张照片敲定参与了打砸军车犯罪行为。释放出狱后第三天死去。医生解剖，内脏全被打坏。家人控告，对方想给两万元了结。家人不干……。

6月4日凌晨，体改所所长陈一谔先后给复兴医院、邮电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打电话询问，“这几个医院的尸首都在30具到45具之间”。

据国际特赦获得的消息，截止6月4日“清晨5：00，死在复兴医院的人数已达59人。该医院设有专线与其它医院联系。据该医院所获消息，儿童医院死了55人，铁路医院死了85人，至于受伤人数根本无法统计。”

综上所述，各处报出的死亡人数大体范围是

医院名称	死亡传说数字	消息来源
复兴医院	62-48	王庆元、杜导正、国际特赦
邮电医院	30-20	陈一谔
铁路医院	85	国际特赦
三〇一医院	10-	杜导正
协和医院	30-	陈一谔
北医三院	30-	陈一谔
儿童医院	55	国际特赦

在海外媒体上，还出现了更高的死亡人数报告。其中：

1、香港《文汇报》从一位自称“政治大学”的学生处得知，“广场上能数得出的学生尸体，有2600多具，除了被坦克、装甲车碾得不成人形的”，消息来源据称是一位当军医的亲戚。

2、香港《文汇报》称，据国际红十字会4日凌晨2：00的一个统计，被射杀死的市民、学生已经有2000多人；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大学生匆匆从六个综合医院拿到的死亡数字已超过了1000……

3、《六四档案》记载：中国红十字会人员6月4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700人伤3万人。

4、《六四档案》记载：北京某医院发言人6月4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600百人，其中1000人为大学生。

5、《六四档案》从《联合报》得到的消息称，戴晴6月4日从医院得到消息，最少有2000群众及学生在军队冲突中死亡。

6、《六四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6月7日发布的消息称，死4000多人、伤3万余人。

7、《六四档案》记载：《大公报》6月7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000人以上、伤3万人以上。

8、《六四档案》从《联合报》得到的消息称，法新社北约情报人员6月9日称，死难人数可能多达7000人。

9、《六四档案》记载：美国总统首席助理6月9日发布的消息称，死逾4000人。

10、香港《争鸣》月刊6月30日报道，市民和学生死亡10440人，受伤28790人。六四凌晨1：00到7：00，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和前门，死亡人数8720多人。军警数十人死，6千多伤。

11、近年一份自称从“白宫战情室”获得的资料称：“6月16日，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收到中方戒严部队线人引述一份声称是中共官方内部文件，提到6月3至4日，在天安门及长安街，有8726人被杀。6月3至9日，在天安门以外的北京城，有1728人被杀。换言之，合计共10454人被杀。至于受伤人数，则为28796人。

据称，海外对于“六四”镇压造成死亡人数，报数死亡最高的，是13362人。

第三节 政府的辩解及其变化

为了应付舆论，1989年6月6日下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中南海举行国内记者招待会。袁木和戒严指挥部发言人张工不得不首先谈到死伤问题：

袁木说：

“……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混乱，许多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2000多人；

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除此之外，军队到目前为止还有400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

……对这个数字，我已经再三说过不是很准确，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经过向各个大学了解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23名。我预计随着事件的发展、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各方面情况了解了，可能这些数字还会有变化。

诚如袁木所说，这个数字不准确，待局势进一步稳定，应有比较准确的统计公示于世。据杨继绳回忆，袁木曾建议由红十字会出面作一客观统计，但没有被采纳，他只好按照政府提供的数字说话。笔者认为，红十字会肯定也是有统计的，但发不发表，也必须听命于政府。据姚监复回忆，事后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的《历史大爆炸》说：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谭云鹤查过医院的尸体，‘六四’死了727人，其中军队14人，地方学生、群众713人”。

但是，袁木作为政府发言人，在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上显然故意使用了含糊手法。其一，把学生、市民与罪有应得的“暴徒”混为一谈；其二，把死亡的军人与非军人混为一谈。第一个“混同”，似乎是表明，在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他们已经鉴别了其人的身份。但这恰好给第二个“混同”带来逻辑上的难题：一个能把活人的身份分清的人，难道还分不清死者身份吗？但正是在这个最不应该含糊的地方，发言人有意含糊其词。这个欲盖弥彰的办法恰好证明，即使在“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军人的死亡与群众也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如果说袁木采取的是一种鱼目混珠的手段的话，那么张工在发言中则使用了以偏概全的伎俩。请看张工的说法：

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了，就是6月4日凌晨4：30至5：30，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现在谣言很多，我进门时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说我们的两个集团军为了“争夺”南苑机场，相互之间发生了激战，从昨晚一直打到现在，并且动用了大炮。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在南苑机场住，没有在那个地方，这种谣言纯粹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

接着，张工介绍了天安门广场的简要“清场过程”，对这次行动的时间、范围给出了明确的界定：

6月4日凌晨1：30，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反复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大体用了3个多小时），反复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这个紧急通告指出了在6月3日到我们清场期间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尽快离开。经过反复广播之后，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在广场的群众逐渐离去，只剩下一部分人仍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呆着。部队在正式清场以前，为了使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广场，再次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在反复广播宣传之下，学生代表向我们戒严部队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动撤退。戒严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复向学生说明，戒严部队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请他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广场。这样，就有不少的学生比较有组织地打着旗，从东南方向离开了广场。

清场开始时，广场上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部队由天安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推进，并且留下一个通道，让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能够自动地离去。直到学生和群众全部走完之后，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逐一地对他们临时搭起的帐篷进行了检查，看看里面有人没人。在确实弄清楚这些帐篷没有人之后，才用车辆把这些帐篷和各种障碍物，还有那个所谓的什么女神像统统推倒，在清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带着七个人，有的坐在一辆装着两桶汽油的车上，有的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瓶子，企图用这些东西来烧毁军车，并且要搞爆炸，还扬言要烧毁天安门城楼，当我们干部战士发现他们之后，他们的车没有开，提着瓶子向金水桥方向跑，跑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抓获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整个清场过程可以说是在强大的反复的宣传之下，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撤退。这个过程很清楚，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凡通读过笔者之前对清场过程叙述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张工——代表戒严部队，也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对外介绍的“清场”过程，有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把军队的开进过程与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区分开来；

第二，把1：30进入广场，对广场实行包围过程中驱赶、弹压、反冲击过程（共约3个小时）从“清场”时间中排除出去；

第三，把“清场”的范围限定在历史博物馆西路以西，人民大会堂东路以东，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以南，毛主席纪念堂以北的地域内。然后大谈在这个有限的区域内的1个小时（4：30—5：30）之中“绝对没有死伤一人”。而在谈到在此之外的北京城区的戒严行动时：

第一，只提军队的牺牲和物质财产的损失，闭口不谈市民和学生的牺牲；

第二，完全回避被他们称作“反革命暴乱”的——来自群众的反抗和暴行——是在军队开枪以后，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已经尸骨成堆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前所述，戒严部队为了掩盖他们在天安门前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暴行，还制造了一个所谓“火烧天安门城楼案：

6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说：

“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被及时扑灭。”

李鹏6月4日的“日记”，显然是采取了这种说法：

“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

6月6日张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则编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剧情，但看上去更加详细：

“在清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带着七个人，有的坐在一辆装着两桶汽油的车上，有的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瓶子，企图用这些东西来烧毁军车，并且要搞爆炸，还扬言要烧毁天安门城楼，当我们干

部战士发现他们之后，他们的车没有开，提着瓶子向金水桥方向跑，跑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抓获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6月30日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则把上述暴行由“完成时”变成了“未来式”，将“行动”变成了“企图”，称：

“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但新华社6月10日电其实已经改口称：北京市公安局介绍：

“‘高自联’常委、秘书长郭海峰，在与一伙暴徒准备烧毁装甲车时，被战士当场抓获。”

值得一提的是，袁木的这次记者招待会召开前，明令各报与会的记者，“不许录音，不许自己写稿，必须用《新华社》的稿子。”陆超祺当日日记写道：“连录音也不允许，心里没有鬼，何必这样紧张？既然如此，何不干脆叫做《袁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新华社也将计就计，借口“不安全，办公室灯一亮，就有人往里面打枪”，将这条报道推迟到第二天才发出。

大概是为了防止出现尴尬局面，袁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向境外媒体开放。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自称“真理”和“正义”在握的政府，发生这样震惊世界的事件，面对已经达到沸腾的国际舆论，永远回避是不可能的。不知道经过一番怎样的合计，中国政府决定由军队来面对这个困局。而军队则干脆推给了北京军区的38集团军。38集团军则连政委也不出面，而是将如此重大的任务委派给一个当时只有大校军衔的政治部主任——李之云。

6月11日，戒严部队“6家驻京外国媒体记者”的新闻发布会在38军驻地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出席的媒体有美联社、美国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加拿大电视网、日本富士电视公司。到会媒体人40多名。

会上，李之云除依据张工的口径，重复“天安门广场清场未死一人”的说辞外，面对外国记者的逼问，并没有回避军人向群众开枪的问题。事后，他回忆道：

“‘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一位戴眼镜的记者站起来，单刀直入，‘有的妇女脖子上被打伤，她们只是站在晾台上向长安街上观望，我亲眼看见士兵朝她们开枪，但是你刚才说是冲天开枪，但我看到这些无辜的人受到了枪击，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呢？’”

“‘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清楚了……部队在开进中遭到了暴徒的袭击，特别是高层建筑物上扔下了石块、玻璃瓶子，还打了冷枪。部队在对空鸣枪示警时，可能误伤了一些人，这也是事实，但决不是军队有意向这些人开枪。’”

“一位长连片胡，戴眼镜，穿长条格衬衣的记者扬了扬手，要求发言。我示意他讲。他接过话筒，跟着追问：‘刚才你在谈话中一直强调的是，在部队进入广场的过程中，士兵们向天开枪，但我确实看到，广场上的士兵朝着没有武器的群众开枪的。而且在星期天（6月4日）。我还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在北京饭店的前面，一些士兵向广场上的群众开枪，而不是朝天开枪，你能解释这个问题吗？’”

“……我看着他，心想，你说你亲眼所见，也可能是事实。但就冲你说广场上的士兵朝没有武器的群众开枪，我就敢说你是捏造，至少是张冠李戴。……”

“‘情况是这样的，’我说，‘当我们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后，我们设置了一些警戒线。在这些警戒线面前，有些暴徒不甘心失败，仍然袭击我们的部队。在这个时候，我们部队，特别是有些遭受伤亡比较大的部队，确实朝天鸣了一阵枪。有时候在发现歹徒十分疯狂，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让他吃点利害。’”

“我们在公安部东侧、人民大会堂的西侧、正阳门前，各设置了警戒线。当然我们其他部队在暴徒可能向我们袭击的地方也设置了一些警戒线。在暴徒顽固地向我们进行烧、杀、抢的时候，确实部队曾向这些歹徒进行了还击自卫。但在我们设置的警戒线之内，还没有发现群众伤亡的。”

“……我作为一位清场部队的指挥员，从来没听到过有谁下过开枪的命令。……我严正地回答：‘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戒严指挥部一开始就讲了，当我们的生命和装备受到严重威胁时，戒严部队有权采取措施进行处置。在我们的战士被屠杀，车辆被烧毁，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开始对天鸣枪示警。当我们鸣枪示警不能奏效的时候，也就是说不能中止暴徒的犯罪行为的时候，我们开枪自卫。’”

可以想象，李之云作出这样的答复，需要多大的勇气。事后，他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过曾经在脑际发生的思想斗争：

“谁知道人家会提出些什么问题？”

“说是光围绕清场，可嘴长在人家身上，谁能保证不冒出些清场之外的问题。”而关键的“软肋”，正是在清场之外。

他确实不惧怕事实，但他怕自己说不清，坏了事：

“那些天，我老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生怕自己哪个方面来不及考虑；有时又盼着那个时刻快点到来，真刀真枪地干完了倒痛快！”

李之云虽然承认了开枪，但是，他把军队武器运输受到阻止、军人受到袭击和侮辱这些事实，夸大为“生命和装备受到严重威胁”、“战士被屠杀”，进而替“为达到执行任务的目的而开枪”辩护，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是，他和袁木一样，完全颠倒了大规模烧车、残酷地杀害军人这些事实，发生在大量民众遭受军队枪击伤亡之后，这样一个基本顺序；同时，他把手

无寸铁的市民污蔑为暴徒，作为一个军官，这种明知故犯的错误，体现了一种与“文明之师”极不相称的蛮横的品质。

最重要的是，这两场记者会的发言人，都完全无视6月4日早晨发生在六部口的坦克车轧人惨剧，仍然在地域问题上玩花样，指天誓日地保证“绝对没有装甲车轧死人的事”，体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无耻！

由于中国政府和军队的说辞不能服众，国际舆论继续使用自己的“小道消息”。日本外务省亚洲局负责官员在日本国会上提到中国红十字会方面的消息，说在北京6月4日事件中，有2600名学生和市民丧生。美国合众国际社和《美国之音》报道了这条消息。对此，6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言人不得不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郑重声明，我会从未向任何人讲过北京6月4日事件中丧生的任何数字，而且这个数字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捏造。”

“六四”事件发生十余日后，中国红十字会尚不能发表权威的“伤亡讯息”，这显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在6月19日至21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李锡铭代表北京市委作了《关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该报告第一次正式披露了“六四”期间北京市民、学生和戒严部队士兵的伤亡情况：

“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各高校、北京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戒严部队23人中，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

“约7000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000余人，重伤的136名；市民约2000人。”

“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死亡的36名大学生，分属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七所高校各死亡2名，其余10所高校各死亡1名。”

引用这段材料的《中国“六四”真相》作者张良也证明：

“据戒严部队指挥部提供的材料，在6月3日晚的进军中，没有一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被市民打死。承担天安门清场主要任务的第38集团军官兵，在6月3日晚没有死一人，后来被任命为‘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十名解放军战士，其中有6名来自这支部队，是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丧生的。”

张良继续写道：

“据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了解‘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师、科技人员、机关干部、工人、个体户，还有退休职工、中学生甚至于小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9岁。”从死亡人员的职业和年龄分布的情况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辜的。”

半个月后，在北京市长陈希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军警死亡人数在继续下降，但伤者人数在上升。他说：

“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

“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等。”

这个面对至少是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常设委员会的报告，陈希同不得不把“死亡人数”中的军人与非军人进行了区分。但他依然不提民众伤亡的细节，回避绝大多数死亡者的无辜，以及民众暴行发生的时间，而不厌其详地展示军人伤亡的种种细节。

继陈希同报告之后，北京市高教局负责人于7月1日向媒体介绍了36名死亡大学生的情况及后事处理。该负责人称：

“36名大学生分属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院校各死亡2名，其余10所院校各死亡1名。”

他还说：

“北京现在共有83所大专院校，15.6万多名在校学生。”

“这些死亡的大学生中，许多人是在暴乱期间不听从戒严部队指挥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紧急通告，不顾学校各级领导、教师和父母再三阻止，赶赴木樨地、西单、南池子、珠市口等暴乱发生地点而出事的。他们中，有的参加了暴乱活动，从这些人的衣服口袋中发现有非法组织‘高自联’敢死队队员证、‘纠察队’队员证和‘高自联’头头亲笔签发的‘出入证’；有的是在围观阻拦军车时被打伤致死的；也有个别学生是路过现场时被误伤致死的。”“北京市有关部门、有关高校事件发生后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处理这些死亡学生的后事。经反复查对，并与死亡学生家长多次协商，进行了处理。处理过程中详细登记了每一名大学生的死亡情况、死亡地点、救护过程及处理结果。现在36名死亡大学生都已火化，学生家长都参加了后事处理。”

该消息称，“据北京市殡葬处提供的消息，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在京死亡的外地人共有15名。”

应该指出，北京市高教局发言人把学生在八九民运中参加的学生自治组织、愿意默默无闻为维护学运秩序并充当市民与军人之间的协调人的“纠察队”员、不惜自我牺牲解救他人的“敢死队”员，都作为“暴乱”参与者或“罪有应得”的人的论断，是极为不公正的。而且，对照丁子霖女士的调查结果，北京市委及市高教局的这个统计，仍是不完全的：

例一，清华大学遇难学生有名有姓的就有4名，而不是3名。他们是84级化工系的段昌隆、88级环保专业的研究生刘弘、86级精密仪器系的锺庆、无线电电子系研究生周德平。其中周德平因头部中弹，死于同仁医院，直到7月6日才由校方确认。不在这一批高校统计名单中，情有可原。但袁木和张工既然能把军队失踪人员也打入死者内，周德平在统计当时也应按“失踪人员”处理。由此可见，官方在统计时没有采取统一标准。

例二，在“六四”事件中，死者中还有不少中学生。

例三，在北京“六四”事件中，也有天津、沈阳、河北、湖北、武汉、四川、无锡等外地的大学生死亡。

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北京市高教局和北京市政府统计的数字内也可以理解，但这说明，仅以北京市大学生的死亡人数，是不足以囊括“大学生死亡人数”，更不能代表“学生死亡人数”。

“六四”20年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据说是其未完成的第二稿。虽未经中央同意出版，但其获得的数字与袁木当初公布的也有很大差别。他说：

“据北京市民政、公安和卫生部门反复核查，在这次暴乱中，死亡人数共计313人。其中大学生42人，部队官兵23人，还有少量工人，干部和居民；不明身份者多达114人之多，看来，这些人多是外地的无业游民，也有一部分是刑满释放人员。”

“六四”23年后，陈希同更把“没有死一个人”的地域缩小到“从旗杆到纪念碑之间”的“天安门广场”。

以上信息，均证实了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名单》、张健的亲历口述、李相、陈清华的证词的可靠性。

图10-2：丁子霖女士

随着“天安门广场”范围的日益缩小，6月3日李鹏政府为事件定性“反革命暴乱”的口径也发生了微妙转变。

事发当时，上海市长朱镕基在电台广播中清晰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矛头直指动用军队的做法。他说，因未能很好地保护上海市民免受暴乱影响，他感到抱歉。他说自己从未想过要出动军队。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爱国”，并非“反革命”。事后，《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评论道：“他让外界感到，他也为了北京的事而沮丧。”朱当时说：

“北京发生的事是历史。没有人能隐瞒历史真相，真相必会大白。”

开国上将吕正操在为《戒严一日》书写的书介中谈到：

“按一般笼统的看法，这次风波起源是‘不安分’的大学生闹事。其实大学生大多数愿望是好的，事情走向了反面，以致把局势闹僵，这也是广大学生没有意料到和不愿看到的。《戒严一日》中就有不少文章描写了这样一种情况：部队遭到围攻，正是那些大学生为广大官兵解了围。在《西单路口，军火！军火！》中，大学生为保护军车和武器弹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一文中，一辆最先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免于烧毁，就是当场的大学生起了保护作用。”

“对于去年夏天发生的这一重大复杂的风波，应当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读过《戒严一日》，分析和综合书中大量的见闻与实录，自然而然地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人民军队，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烈火见真金’、‘患难识英雄’，正是这场动乱，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认识了我们的军队、人民和大学生，是可以信赖、可以依靠、可以指望的。这是中国得以继续保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化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强有力的保证。”

1989年9月29日，有中资背景的《欧洲时报》刊文批驳流亡人士筹组“民主中国阵线”，为了消弱其影响力，也不得不承认赵紫阳5月对学运的定性：

“北京事件中，当时确有几十万北京学生和各阶层人士走上街头游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出于几年来对社会不正之风的不满，但是他们绝不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政府。”

1990年4月4日下午4：30，李鹏举行国内外记者招待会，在答复“六四”惨案话题时，也不得不承认：

“事后可以考虑，也许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但是……”

2004年“六四”15周年之前，中宣部甚至制作了一张“六四”光碟，在党政军机关局级以上干部中播放。光碟说杨白冰为“六四”镇压命令的签署者的指控虽然令人怀疑，但当权者意欲通过与“六四”划清界限来达到排除政敌的意图十分明显。

而在此之前的1998年，在“六四”镇压中表现活跃、态度坚决的陈希同，则以经济犯罪名义被下狱。其有期徒刑16年——跻身“六四”获刑者最长刑期之列。

从江泽民开始，“六四”的“反革命暴乱”性质被悄悄地改为“动乱”，之后不久，又以“风波”盖之。邓小平女儿访美时，则称之为“悲剧”。

这个提法，甚至为陈希同所接受。他在接受姚监复采访时说：

“六四是一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应当避免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党内问题不解决，上层争论、斗争激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不愿意发生的悲剧就必然发生了”。

“至于89风波中，对赵紫阳、李鹏的作用会有历史评价的。党内高层一致，就不会出问题。要出问题，就是党内高层领导出问题，什么事都不好干。”

2015年乔石去世时，相信是根据他本人的要求，中共中央为其书写的简历中，只字不提他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

这些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当事人的程度不同的忏悔，标明了历史的走向。

第四节 刘国庾遗体二次被难

为了澄清民间谣传的迷雾，戳穿官方说辞的谎言，20多年来，不少学者、记者作了大量分析调查。

1990年6月3日，高新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四”特辑上发表文章，提出“军、民伤亡的总人数有近万人”的观点。他不仅指出袁木在注意到“军队失踪人数”时忽略了更大量存在的“学生失踪人数”，指出“军队死亡人数”的报告事后一路递减，还指出了，“共和国卫士”“12个人的死亡时间没有一个是6月3日午夜11：00（大规模开枪杀人的开始时间）以前，而都是在6月4日凌晨。”

虽然，在高新计算“军队死亡人数”时，忽略了军人“在戒严期间的死亡人数”与“六四死亡人数”的差别——例如5月23日在石景山八角西街被推入撤退军车车轮之下死亡的戒严部队某部28岁上尉陈知平；忽略了“共和国卫士”中的死亡人数不等于“军队六四死亡人数”——例如在建国门被装甲车撞翻摔死或压死的39军那位士兵、38军从总后大院出发时扫射误伤的站岗士兵、6月3日夜被误伤的解放军301医院站岗的武警士兵……，但是，说军人在“六四事件”的死亡基本上是在“六三”开枪以后发生的，无疑是站得住脚的。

在另一方面，他也以见证人的身份指出，外界所谓在“血洗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死亡“2000多人”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为了查清“六四死亡人

数”，他从1990年7月上旬开始，“直接或辗转找了‘六四’时收治伤员的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邮电医院、二龙路医院、复兴医院、人民医院、天坛医院、宣武医院等地方医院。得到的非军人的死亡统计数字，相加起来不超过四百人。”

高新还提到：

“我能找到的所有杀人现场目击者都对我说，因为当时天黑加上紧张又没有救护常识，所以奋勇救护伤员的民众和大学生都是见了中弹倒地的，无论死活都赶紧送往医院，途中即使发现中弹者已经断了气也绝不会弃之不管的。”

凭借各种文献资料和笔者的见闻，这个观察和判断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如前所述，特别是在后期，确有医院因停尸间爆满不再运送被确定已经死亡的人员。

高新指出，事实证明，戒严部队出于某种宣传目的存在着“不收尸”的情况。其中著名一例，就是63军少尉排长刘国庚的尸体。

如前所述，6月4日凌晨，“自告奋勇”从大会堂出来到西单路口解救被困弹药和器材的63军少尉排长刘国庚，与东进的38军在西单撞个正着，在电报大楼前战死后，尸体被焚烧。焚烧后的遗体，脖子被吊在一辆毁弃的公共汽车上。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在6月4日的整个白天，在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军队也没人过问他；从广场撤退，路经此地的学生很少有人提到这一路段看见有死伤的情况。事后，只有从广场撤出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相注意到，那附近有一具军人尸体。那是“一个被打死的军人。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死人，面色红润，装束完好。是个上尉”。

根据戒严部队提供的信息，刘国庚是63军某部通信团4连排长。如果李相记忆准确的话，这个军人就不是刘国庚。换言之，戒严部队很快收殓了这位上尉，但令人不解地留下了刘国庚。

此后，北京市公安局又提供消息说，6月5日0：00许，前劳教释放人员张建忠流窜到此，用“一块碎玻璃片”在刘国庚尸体的肚子上割开一个长约5厘米的口子，然后用一根塑料绳将勾出来的一部分肠子系上”。据6月5日上午目睹了烈士尸体情景的杨继绳描述：

“（当时的刘国庚尸体）头上戴着军帽，全身赤裸，只有脚上穿一双浅黑色尼龙袜；头部烧焦了。全身皮肤惨白，腹部有一个三、四寸长的口子，从中可以看到肠子。在尸体旁边有人用粉笔写着：‘刽子手，他亲手杀死了四个人’是一笔很漂亮的隶书。由于这一行字的影响，有人向尸体上吐唾沫。有人说：‘死的活该！’”

注意，此处，杨继绳的描述可谓细致入微，但他看见的烈士的肠子，仍在自己的肚子里，伤口也没有所谓“供述”那么大。直到当日下午7：00，这具尸体仍在原地，而且还被当作了“道具”：

“下午7：00，西单浓烟滚滚。7：40，西单有枪声大作。从西单回来的记者说，7：00，军人用火焰喷射器烧毁了作为路障的公共汽车，用浓烟作背景，拍摄电报大楼前的那具军人尸体。”但是，上述新华社记者的叙述，似乎与为烈士整容的老资格军医张延芳的记述产生了矛盾。因为，当天下午7：00以前，这位中校军医已经为刘国庚完成了收殓和整容。

请看张医生的回忆：

“……今天是平暴后的第二天。……本来巡逻队没有受领运尸的任务，可是来到西单东侧地段后，这具尸体非常显眼，令人目不忍睹。这时有人说：‘这具尸体暴尸街头两天了也没人来认领。’……经过请示，几个人商量商量作出了决定。当时这一带仍有冷枪在响，下车去的几位官兵在兄弟单位一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接近了悬挂尸体的汽车，看看四周没什么动静，猛地窜上去，既迅速，又细心，轻轻地从车上取下尸体，没顾尸体散发的腐味，很快把尸体运到车上，拉回自己的驻地。”

之后，她与上级联系。上级指示，由他们负责料理好尸体，在尸体未确认之前，暂送305医院保存。张大夫回忆说：

“从医25年来我目睹过各式各样的尸体，也亲手整理过无数尸体，但今天这具尸体的惨状，我倒是第一次见。尸体满是烧痕，面目全非，颈部被绳索牵拉，有些过度延长，两上肢呈内收状，两手护住小腹，中下腹被划开一个大口子，小肠呈团状暴露在腹壁外。两下肢外展，肢关节呈曲状，全身大部分皮肤烧成青灰色，两腿上有几处皮肤裂口，皮下组织外翻。从尸体形状可以想象，他受难时肯定忍受了极大的痛苦。”

出于白衣战士的职业信仰，面对“体表已全部腐坏”的尸体，张大夫认真细致地从头到脚一部分一部分地整理。

“心想，再不能让他有损坏。由于下肢分离过宽，又是屈曲状，就先用三角巾将两腿分别包扎，然后慢慢合拢。当时心里总想着让死者以舒服的体位安息。整个尸体用被子、塑料布包好后，再用雪白的床单盖严，然后，叫来几位救护队员，慢慢地抬上了救护车。”

“7：00许，整理完的尸体被一辆乳白色的救护车载着向医院驶去。”

张大夫说：

“这具尸体后来才从电视中知道是在平暴中被暴徒活活烧死又破腹掏肠的某部排长刘国庚烈士。”

尸体是由305医院派车接走的。按照逻辑，此后烈士的遗体，应该安详地躺在305医院的冰库里。但是，当我将张大夫的回忆与上述新华社记者的回忆进行比对，惊讶地发现：在同一时间内——6月5日晚7：00，少尉的尸体竟同时出现在西单电报大楼前，戒严部队的电视拍摄现场？！

而且，第二天，6月6日上午杨继绳的日记写道，他再次看到了这具尸体，只是被挪了地点。杨继绳写道：

“6月6日……上午8：30，我去西单。昨晚被烧的十几辆汽车上显示出一个个大窟窿，这大概是火焰喷射器的痕迹。在电报大楼前军人的尸体移到了西单路口，腹部那个口子扩大到十多厘米，一大堆肠子鼓了出来。”

一具已经经过整容和完美包裹的遗体，怎么可能再次被暴尸街头？！

我宁愿相信，记者或大夫中有一方将时间记错了；要么是我本人，对“平暴后的第二天”、“暴尸街头两天”理解为6月5日不对！

同时，我也注意到，张大夫在回忆中描述的收尸地点，是“西单东侧地段”——而不是电报大楼前。但西单电报大楼就在西单东侧地段。只是这样的描述与杨继绳6月6日上午看到的烈士所在地点——西单路口——似乎稍微“接近”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张大夫描述的烈士的小肠“呈团状暴露在腹壁外”，与杨继绳6月5日看到的肠在腹内不同，而与杨继绳6月6日看到的“一大堆肠子鼓了出来”相近。如果张大夫的回忆没有被审查者“做手脚”，这应是烈士的遗体没有被“二次暴尸”的重要证据。但在拍摄宣传片时，他无疑遭到了“二次损毁”。

显然，高新所说，戒严部队收尸不如民众及时，已经是铁的事实。但高新似乎不相信，戒严部队也会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做出替民众“收尸灭证”的事情来。他坚信，排除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2000人”被杀的谣言，一些海外谣传的数字，实际上与他调查所得数字是很接近的。

第五节 “广场运尸”谣言与28中埋尸案

那么，怎样才能解开那个一直萦绕在一些人心头的“天安门屠杀”的心结呢？根据现有资料，持有这个观点的人主要基于两个事实：

1、6月4日白天，确实有人看见，戒严部队利用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运人”；

2、4：00—4：30的熄灯期间，广场确有枪声响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二个问题曾困扰人们心头。因为尽管当时广场上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在，但谁敢说熄灯时自己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没发生什么事情？就连27军政委，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把熄灯时间缩短为4：25—4：30。他试图用这种方法让人们相信，仅仅5分钟的黑暗，无论如何是不够杀2000人的！但是，参加清场的其他戒严部队和戒严指挥部、公安部，及大多数在场的学生、记者，都不支持这种时间描述。

显然，熄灯并不能证明杀人，但是枪声呢？已有的回忆证明，配合清场的武警防暴队从东南角开进广场，在途经纪念碑西南，绕道广场北部时，为驱散人群，的确释放了催泪弹。而且据笔者观察，所到之处，靠释放催泪弹开道，几乎成了这支部队开道的既定行为方式。前有6月3日下午六部口夺武器的事实，后有6月3日夜为北京军区指挥车队开道，及一路进军天安门广场的记载。据此，笔者几乎可以断定，在“六四事件”中，哪里有催泪弹的黄烟冒起，北京军区武警防暴队的队伍就开到了哪里。另据在广场东南角枪击案中受伤的战士郝连锁回忆，在弹压袭击者和驱散人群时，戒严部队确实在周围不断开枪，时间“大概持续了10分钟”。

那么，6月4日白天，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运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早1989年6—7月间，笔者就听闻这类传说，大部分人是由广场的黑烟想到了“烧人”，继而又出现直升飞机运送“骨灰遗骸”的说法。当时，这还只是崇文门“寡妇楼”中高干遗孀们的窃窃私语。因为她们很多人在那个不眠之夜和第二天白天，曾在楼顶观察天安门方向的动静。近年又听到当时趴在南长街四合院矮墙上遥望广场的某报记者的怀疑。后者曾言之凿凿的是：当时广场焚烧物体飘到他和女朋友白衬衣上的烟灰中，富含油脂的成分。

另外，中共港澳工委主管的香港《文汇报》，也曾登载过一则目击记说：

“北京某综合医院一位工作人员亲口告诉记者：那时候他随一辆急救车奉召开进广场。但是急救车开过了第一排军人人墙之后，在第二排军人人墙之前就被截停了，被命令立刻往回走，否则后果自负。急救车拐弯往回驶的时候，稍稍进入了二排防线，就在拐弯的时间，他赫然见到‘军人们将很多很多的尸体搬到一排排的架子上，更看见坦克车将排列成行的尸体碾碎……！’”

2013年“六四”23周年前夕，又有一篇署名“出尘公子”的文章，介绍了一位戒严部队军官的经历：

“六四当晚，他们连队接到命令，到达天安门清理广场，当时到达的还有数架直升机和数辆消防车，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广场上的死人搬上直升机，然后协助消防车清洗广场，前后不过一小时，广场上便如未发生过任何事一般。据他估计，广场上的死人他们没花多少时间搬完，估计不会超过二百人。”

据“出尘”介绍，这位军官姓李，山东济南人，时任解放军某部排长，退伍后在济南一电器厂任供销科长。

这位李姓排长的身份，令我想起《戒严一日》中上尉干事郑海军的一篇回忆文章《广场大清扫》。文章的内容有两点与上文是吻合的，那就是：第一，清扫广场的队伍是6月4日晚接到通知，6月5日到达广场的；第二，他们不是参加“六四”凌晨“清场”的部队，而是从外面调来的部队。但是，这里便发生一个疑问：按照常识，如果广场有“屠杀”和“毁尸灭证”行为，那一定就是为了缩小知情范围的需要。这意味着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们不是还听说有人参加运尸后被“灭口”了吗？）而从外面调军队——从李姓排长的籍贯看，他是济南人，大概应来自济南军区的某个军。如果他们真的参加

了运尸工作的话，那不是把北京军区捅的“漏子”一下扩大到半个中国以外去了吗？

而且，把死人搬上直升飞机并非易事，因为在广场使用军用直升机的舷梯是“软梯”。要把已经烧焦或“压碎”的遗骸搬上飞机，更需要进行处理。而待进行处理的尸体，还要费周折排成“一排排”放在“架子上”，不是绝对不可能，但似乎没有必要。所以，相关细节，仍需当事人进一步说明。

当然，上述两则信息，决非毫无可信之处。至少，它们让笔者想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田慧英大夫的文章《医疗队开赴人民大会堂》。其中提到，在人民大会堂内收治的500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伤病员”，由于救护车供不应求，有“200多名”，确实是被“8架飞机”运走的。这个数目，与上述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恰好吻合！

当然，田大夫所说的运送事宜，发生在6月4日，而不是第二天。郑海军的文章说6月5日才清理出直升机停机坪，与田大夫说的并不吻合。

图10-3：清场之后

总之，存在于以上各方证词中的诸多矛盾，特别是6月7日，地处天安门广场边缘的北京第28中学发现私埋“六四”死难者遗体事件曝光以后，使得政府——无论从火葬场还是学校和戒严部队任何一方——获得的证词，其公信力都发生了极大的动摇：有一就有二，人们自然会这么想。

所谓“28中埋尸案”，根据丁子霖的记述，其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被埋人之一王楠，出生于1970年4月3日，生前为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中2-2班学生。6月3日夜11：00，王楠携相机离家，6月4日凌晨3：30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中弹。由于子弹是“从左上额射入，从左耳后穿出”，形似倒地或伏地中枪。据途径当地的救护队说，戒严部队“禁止救护队抢救”，王楠

“两、三小时后身亡”。终年19岁。事后，戒严部队又“不让市民和医务工作者收尸”，将王楠和“一批”尸体，埋在了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第28中学门前的花坛里。6月7日，埋尸处因雨水冲刷，散发异味，尸体被发现并挖出。由于王楠当时身穿军训时发的军裤，头戴摩托车头盔，被疑为军人，他没有被戒严部队与其他尸体一同火化，而是被送到了护国寺医院。又由于王楠是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兼邓小平牌友）丁关根的外甥，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已将王楠失踪案向公安局报案，此事最终通知到张先玲。6月14日，母亲终于见到失踪10天儿子的遗体，由于天热，遗体已生蛆。6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为王楠出具“外出死亡”的证明，其遗体才得以在八宝山火化。

当然，根据丁子霖调查所得的上述材料，王楠的死因并非没有留下悬疑。因为其穿军训服和带头盔的装束，不仅可能令戒严部队产生辨识身份的疑问，也可能令民众产生疑问。事后，李鹏日记提到：“我们也从电视摄影纪录中发现，有些因围观而无辜伤亡者，竟是被持枪暴徒开枪乱射所造成的。”其所据录影在哪里？伤亡者为何人？尚需当政者进一步交代。现在想来，与王楠同一批“就地掩埋”的尸体，很可能就是前述医生所说，因医院停尸条件受限落下的尸体。因此数量不会很多。但此事告诉人们，即便死了，也不一定能在火葬场火化，如果没有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出具公安局证明其非“暴徒”身份的文书，没有医院出具的正常死亡证明，北京各郊县的火葬场将拒不接受尸体焚烧。这意味着，为了能让死者入土为安，有些人会被迫接受“正常疾病死亡”的证明书。因此，北京市政府依据从各殡仪馆获得的数据，说明“六四”事件死难人数，本身是不可靠的。

因此，要查清当时北京的死亡人数，还得另想办法。

1991年，《亚太经济时报》驻京记者罗立为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张家口、保定、廊坊、沧州、唐山、承德、集宁、赤峰等市，获得从1981到1990年10年火葬的数据。他从1985年至1990年的平均数中，再减去一个常数，得出1989年北京周边各城市共多烧8891人的数字。

笔者认为，不论这个数字是否能说明问题，其方法是可以参考的。

应当指出的是，笔者所作的这些研究，以及笔者赞同的一切为此做出的努力，目的仅仅是为了还历史一个真相，还死者一个公道。笔者并不认为，强调死亡群众所占比例，意味着对军人死伤的漠不关心。我认为，无论是军人还是群众，都是不该死的，他们，都是邓小平治国无方和国务院“戒严令”无辜的牺牲品！

真正有罪的，是那些把军队用于处理现代社会常规事务，把军人和民众逼上对峙火线的人！

第六节 哈德门的“罗生门”

6月4日傍晚，在天坛公园的古松下，在进行着另一种祭奠。

死者是一位年仅21岁的军人。他的身体被塑料编织袋紧裹着，上面放着几根苍翠的松枝。遗体是医院女战士用6种花草编织的4个花环，代表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期。

部队首长冉龙泉致了简短的悼词。近百名头戴钢盔，手握钢枪的解放军官兵为他送行。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他就是事后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39军某师榴炮二连的战士——崔国政。他死于6月4日凌晨崇文门过街天桥附近，死后被悬于天桥上。当日下午被兄弟部队收殓了尸体。

在笔者搜集的资料中，崔国政的牺牲过程有各种描述，其中最完整的是：（1）崔国政的同车战友的目击见证（简称“战友证词”），（2）“国际特赦”报告引述位于哈德门饭店两位老外的目击见证（简称“哈德门证词”）。

这两份证词在绝大多数情节上均可以互证，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产生了笔者书写本节的冲动。

为方便读者与我一道接近真相，现将两种叙述抄录于此：

“哈德门证词”说：

“从饭店他们看到了从大约（3日）午夜到（4日）清晨5：00在天桥处所发生的事件。据他们说，午夜左右有几千名居民聚集在路口处并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从午夜到凌晨3：00，发生了一些事。群众把公共汽车推到路上横起来，拦住了部分路面。从东开来几百名武装士兵，通过路口，向天安门广场方向行进；一辆坦克从南开来，随后又有两辆坦克。凌晨3：00过后，从南开来三辆盖有帆布篷的军用卡车。当卡车开到时，聚集在天桥处的群众离开那里，沿着崇文门外大街向卡车冲去，然后把卡车围了起来。”

“在这同时，几百名队列整齐的士兵从东面开来，通过路口后在路西面停了下来。士兵们面向东排成行，有的跪下，有的站立，向东连续开了几分钟的枪。从饭店的位置（天桥东南面），这些目击者无法看到天桥东面是否有人受伤。他们说有一颗子弹穿过饭店二楼的窗户。开枪之后，这批部队继续向西往天安门广场的方向前进。……”

从39军某团团长艾虎生的叙述，我们知道，“哈德门证词”所说的从东面开过的三支队伍，正是艾虎生所说从北京站开过的两支兄弟部队和艾虎生的500人团。这个吻合说明，无论从时间、方位和人数各方面看，“哈德门证词”都相当准确。

因为是坐在篷布车内，“战友证词”则不可能提供他们到达之前这一带发生的事情，他们只能说他们到达时被围的情景：

“人群的喊声，石块、酒瓶击在汽车上的撞击声震耳欲聋。我同榴炮二连指导员初慧民领着车厢内的9名战士，拼命地向车外喊：‘别打我们，我们

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一家人！’但无济于事。事实上，我们的喊声已被淹没……哗！哗！哗！玻璃被砸碎的声音。真真切切，那声音是来自驾驶室。那里面坐着对于我们来说是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榴炮二连连长王峰——这辆车的最高军事长官，司机李景民——所有人中唯一会开车的。……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透过驾驶室后面的小窗，清楚地看到王连长满脸是血侧靠在右车门上，一动不动。他已被打昏。仅能看到右侧半身的李景民，同样的满脸是血，但还在动着，像是在发动汽车。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老王，醒醒！”中尉干事张喜波用手枪柄敲着驾驶室的外壳。连长王峰终于有了动静。但此举似乎惊动了车外，包围者开始用铁棍从厢板的缝隙中试探里面是否有人。而且车篷布也被扯下。张喜波回忆说：

“这时，借助路灯我们才看清周围就剩下我们一辆车了。记得在一个叫十五里店的地方被堵截时，一起冲出来的还有这个连的另外两辆车呢！前面100米左右有7辆公共汽车横在路中央。再看我们的车，明显地是在向回掉头时被卡在马路礅子上，致使熄火的。”

失去篷布掩蔽的战士开始直接感受石块打击。但正当这时他们调整位置的机会出现了：

“是突然在前面路口处出现的一支部队暂时救了我们。他们对空鸣了几枪，人群才哗地一下离开了10多米。”

不知什么原因，在哈德门饭店的观察者并没有看到这辆车篷布被扯下的情节，但凭借有利位置，他们注意到了另两辆车的去向，以及坐在篷布车中的军人没有看到的情景：

“与此同时，在那条街上的卡车中的两辆已经掉转头开走。第三辆挂有拖车，试图掉头，但卡在了人行道边上。群众向车前部扔瓶子。卡车前部的士兵试图出来，有两名士兵终于出来。有三个男子向其中一个戴钢盔的士兵

靠近，这个士兵揪住其中一人的头发。这时周围的人一拥而上，猛打这名士兵。然后这名士兵不见了（目击者再没有见到他）。……”

在“哈德门证人”目力不及的地方，“战友证人”正好看到：

“……人群才哗地一下离开了10多米。这时车上的官兵都吃惊地发现，在车两边一边躺着一个人。还没等我和指导员发话，六班长孙朝恒、战士崔国政已经跳下车，迅速把车右边那个人救到了车上，仔细一看，是王峰。

‘赶紧救另一个！’晚了……有两个暴徒架起李景民退后10米左右，对着我们大声喊着：‘投降吧，缴枪不杀！’一名穿红衬衣的暴徒抽出一把匕首对着李景民的腹部就是一刀……战士们急红了眼，枪已同时打开了保险，但他们没有放，都把眼睛集中到我和指导员的脸上，等待着我们下命令。”

“战友证词”只字未提战友们“请求开枪”的下文。但“哈德门证词”却提到了：

“另一名士兵返回车前部，一会儿又从车后部出现，手里多了一枝来复枪。他开始向人群开火。目击者听到三声枪响，看到一位老太太和一个男子倒下。事后他们听说还有一个小孩被枪打中。群众被激怒了，涌向卡车。当这名士兵再从车的驾驶室出现时，衣服已被撕掉了一半。他向崇文门饭店（位于西面）跑去，跑上人行道，但被群众拖到左面。由于有过街天桥阻挡视线，目击者不能清楚地看到那名战士后来如何，但他们猜测他被杀死并焚烧了。他们接着看到的是火在燃烧。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他们看到那个士兵烧焦的死尸吊在过街天桥上。”

从这里，“战友证词”与“哈德门证词”截然分道，开始给我们讲述两个不同的故事：

“车已被从轮胎处点燃，不马上走，油箱即将爆炸。我们看到，暴徒们也看到了，他们吵嚷着后退着，借此机会，我们架着王峰迅速冲到了离汽车200米远的过街天桥上。凭一名军人的本能，我们知道居高临下，是最有利的

地势，也许能保全性命。在我们冲下车准备抢回李景民的同时，几名暴徒已架起他消失在夜幕中……”

“无意中，我看到了王峰手腕上已被打碎表蒙子的手表，指针停在4：06处。”

“桥上，12名官兵（一个负伤的），分守住两个桥头。……三名老太太在暴徒的胁迫下，手挽着手从东北侧引桥上来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伙暴徒就在她们的背后，像一群饿狼随时准备扑向我们，一步步的逼进，我们的人一步步地后退。桥宽不到两米，如果允许的话，就是没有子弹，我敢说，在我们训练有素的战士中随便挑出一人，站在桥头，用刺刀抵挡，百十来个也休想上来。”

“老太太已上到了桥上，她们喊着：‘孩子，别开枪啊！’同时跪倒在连长、崔国政等6人面前。‘大娘，您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怎能向自己的母亲开枪呢？’6名钢铁铮铮的军人、男子汉也同时跪在老太太的面前。连长被人架着跪在那里，满脸的血已看不出他的表情，只听到他用沙哑、微弱的声音乞求着：‘大娘，您赶快下去，他们（暴徒）已经上来了。’三名老太太正欲返回去，但晚了，跟在她们身后的几十名暴徒凶神一般扑向我们。棍棒、汽水瓶齐向我们袭来……”

“……我们12个人全都负了伤。忽然，几名老工人出来护住了我们。有的棍棒石块击在了他们的身上。一名男青年悄悄对我说：‘你们赶紧走，这些人疯了。前面不远处有个部队大院，那里保险。’……”

“于是，在老工人的掩护下，指导员断后，我架着王峰，从桥的西北引桥撤了下来。只不过20几米的路程，但在我们的记忆中，那段路那么长且又是那么艰难……”

“血已在每个人的脸上流淌，在脚下，在那段桥面上，印下了一个个红色的‘！’号。”

之后，“战友证词”记述了他们在“两名工人”的带领下，隐身小巷后的过程。根据事后《人民日报》一则报道，文中所说“两名工人”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工人”，而是国防科工委派出的援救人员。所幸，当时后面的人并没有追赶。直到有一名青年追上他们，把军人遗失的一支枪交给他们：

“后面的人又追上来了，青年匆匆说了句：‘你们的一个兵不行了，这是他的枪。’转身走了。”

“枪！是谁的？李景民的？”

“拿到亮处一看，这不是崔国政的枪嘛！他人呢？”

他们还不知道崔国政已经失落了！

从这段回忆看，这个队伍的指挥员并不清楚崔国政是何时失落的。虽然他清楚地记得和老太太互跪的6人中，有崔国政，但他也同样清楚地写道，在下桥时断后的是指导员初慧民。从情理上说，1968年出生的崔国政此时年仅21岁，入伍只有两年，正在争取入党，虽不是一名新兵，但这支充满阶级友爱的队伍，也断然不会忍看他处于断后的位置——如他的某些战友所说。在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提供的新闻稿中，中士孙朝恒提供了他个人的观察：

“暴徒们乘我们去搀扶救助老人之机，拳脚交加，棍棒横飞，将跟在队伍中的崔国政打昏后拖走了。”

但是，按照“哈德门证词”，他们似乎是在崔国政牺牲后才下车的，而且帆布蓬仍在车上：

“那个士兵被杀死之后，群众与这辆卡车保持一段距离。一些来复枪从盖有帆布蓬的卡车后部慢慢地探了出来，但约有半小时没有人从卡车出来。群众中的一些人开始向卡车扔燃烧瓶。后来卡车着火，士兵从车里钻出来。他们跑过天桥，把来复枪对着人群。仍有几千人的群众跑到路的东面。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边跑边退，后来在一条胡同消失了。据这两位目击者说，这

事发生在大约凌晨4：15。在6月4日下午，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开来把这个死去士兵的尸体运走。”

如果上述两种证词提供的时间都是准确的，从王峰的手表4：06停摆到一行人脱险，实际上只经历了短短9分钟的时间。9分钟时间，对于一队军人来说，从崇文门立交桥的桥西上去，跑到桥东，然后又从桥西退下，应该是足够了。但要失落一名战士，似乎过于匆忙了！

为什么没有初慧民关于崔国政的记忆？有没有可能，像“哈德门证词”所说，崔国政是在这“9分钟”之外的时间里失落的？如果他是在整队人马下车、上桥之前就失落了，那么，他是否就是那个“哈德门证词”所说“开枪”击倒“一位老太太和一个男子”的那个人？

事后有不少传闻，对于崔国政是不利的。

据另一位受国际特赦采访的人说，她在大约清晨5：30到达崇文门路口，看到“一些卡车”和那个士兵的尸体正在燃烧，那里的平民告诉她“这个士兵杀死了一位老太太和一个小孩”。

一份由“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提供的采访录，也记录了指导员初慧民的困惑：

“不知为什么，有些北京市民不信真话，却偏偏听信小道消息。就拿我们连战士崔国政被害一事来说吧，大街小巷就传得很厉害。有人说亲眼看见崔国政连续枪杀了3个老百姓之后，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了。还有人说他枪杀了一个跪在地上求他不要开枪的老大娘后，被老大娘的儿子打死后吊到过街天桥上，等等。作为一个现场的目击者、当事人，我真不知道这些造谣者居心何在，真恨不能给这些不负责任、随意乱嚼舌头的人两记耳光！”

初指导员听闻，显然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参与收殓崔国政遗体的部队指挥官的实地调查。这位上尉干事写道：

“（4日）下午一点多，他们在团副参谋长邹华强的带领下，组成40人的救援分队，前往北京市劳保公司附近营救二营被困的120多名官兵，收拢被打散的人员。行至崇文门时，远远就看到过街天桥上悬挂着一具烧焦的尸体。他是谁，哪个单位的，无人知道。从周围情况看，可以断定是被暴徒残害致死的战士。当时天下着小雨，桥下总有几千人驻足观望，有的在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的还在向尸体扔石块。”

辱尸！这已经不是对死人的摧残，不是对解放军战士的摧残，而是对人性的挑战！在中国历史上，若不是罪大恶极者，不会遭遇这样的下场。如前所述，崇文门地区的群众中仍潜伏着强大的正义力量，他们救士兵、送枪支，在混乱中尽可能地对情况不明且处于慌乱中的部队施以援手，他们怎么能容忍光天化日之下的这种暴行？！

有感于事情的蹊跷，在崔国政遗体入土后，主持仪式的常国君连夜对事情的经过进了调查。他写道：

“为了弄清烈士被残害的经过，我决定连夜到崇文门过街天桥附近了解情况。政治部的领导为了我的安全，特意派侦察兵小陈和我一起前往，以防意外。”

“……崇文门过街天桥北侧，一辆军用卡车和炊事车被烧被砸得不成样子。”

“尽管已是夜里10：00多，天桥附近仍然聚集着上千名男女老少。哈德门饭店小卖部前，一位学生模样的男青年在讲述战士的死，说那位战士是在连续杀了3个老百姓后，被群众打死的。还有一个人说，是他枪杀了一个跪在地上求他不要开枪的老大娘后，被老大娘的儿子打死后吊在过街天桥上的。”

这一调查说明了一个事实：直到事件过去后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人们还在大街上对着陌生人谈论着不利于崔国政的话题。6月7日，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说几千人传谣，说这个战士打死了3个人，还说有个老太太给这

个人跪下，这个人还把老太太打死了。”这大概有点夸张。但这个话题在千人瞩目的事发地点经久不散，以及言谈者的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他们中到底谁是亲眼所见？谁是在传播一个谣言？抑或就人们当时的感情来说，更愿意听信谣言？却是需要辨析的。

常国君决定继续寻找目击者：

“我和小陈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现场目击者。这位妇女似乎有顾虑，不愿暴露自己的姓名、职业和单位。她说：大约5：00左右，有三辆军车开到崇文门内大街与西大街交口处受阻，有很多人往车上扔石头和瓶子。这时有两辆车掉头回去了。还有一辆带挂斗的车掉头时熄火了。这时，雨点般的石头往车上砸。车上估计有十来个人，有武器但未开枪。这时，他们跳下车往胡同里跑。其中一个人被一伙人拽到天桥上，打昏后扔到桥下，然后浇上汽油烧了。这个战士被活活打死，有人还说他打死了3个人，这太冤枉了。她说她看见这个战士根本没打人。”

事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叙述此事的口径，基本上与这位女士的证词一样。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颁布授予十名在这次戒严行动中牺牲的战士“共和国卫士”称号的命令。崔国政是这十人中的一员。这份由邓小平签署的命令写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崔国政所在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区执行戒严任务。当部队车辆行至崇文门十字路口时，遭到一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他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坚持宣传群众，怒斥反革命暴徒。在暴徒裹胁群众疯狂袭击干部战士的生死关头，崔国政身背冲锋枪，完全有自卫能力，但为不误伤群众，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被穷凶极恶的暴徒残害，又被浇上汽油焚烧，悬吊于过街天桥，壮烈牺牲。崔国政同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党

和国家，弘扬了人民军队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戳穿了极少数人制造的谣言，唤醒了受蒙蔽的群众，使反革命暴徒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命令指出，崔国政是新时期雷锋式的好战士。他入伍后，刻苦学习政治理论，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严守纪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先后4次受到嘉奖。他关心同志胜过自己，经常为大家做好事，为战友排忧解难。他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经常为集体修旧利废，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他牢记我军宗旨，爱人民如父母，对首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表示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爱戴。崔国政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共和国的忠诚战士，是广大官兵的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为人民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严守纪律、恪尽职守的革命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

为此，崔国政被迫认为中国共产党员。

尽管如此，民间关于崔国政涉嫌枪杀老百姓的舆论一直存在。不知什么原因，官方既没有为此进行更多的解释，也没有公布相关案情调查过程。这不仅对牺牲的战士不负责任，同时也给予公众故意“与人民为敌”的印象。

显然，仅凭上述不愿吐露姓名、身份的女士“孤立证言”，是不足以消弭“哈德门”证词，以及该证词所涉民间传说的影响的。

首先，该女士的证词在事件发生的时间叙述上，与所有证词相去甚远。而其他证词虽然所述情节或重点不同，在这一点上却是隼接完美，丝丝入扣的；

其次，该女士说，一车官兵是从卡车上下来，直接避入胡同的，根本没有其他证词所说的在立交桥上的那一幕；

其三，她自称看到的烈士被杀害过程，但却与后来被逮捕的案犯供述过程不符。

据戒严部队某部少尉排长刘汉臣所述，6月13日被捕的赵跃堂供述的参与残害崔国政的过程是这样的：

“晚10：10，赵跃堂软坐在地上，供出了杀害崔国政烈士的全部经过——”

“6月3日晚，赵跃堂睡在北京站地铁东出口。”

“4日凌晨2：00多钟，赵听说解放军进城了，就拣了两个啤酒瓶子，两个汽水瓶随着人流来到崇文门。”

“到崇文门后，赵见许多公共汽车被放了气，作为路障堵在路中央。他就拿瓶子从车上汽油箱里灌上了汽油，由于不好灌，4个瓶子都灌了半瓶。”

“凌晨4：00多钟，赵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下，见到许多人围住了两辆军车，其中一辆带有挂车，里面装有大米、面粉等。赵见许多人正在向车上扔石头，就抓起两个汽油瓶往车上扔，车当时就着起了火。”

“之后，赵跃堂看到一伙人正围住一名解放军战士毒打，便掏出一把长约15公分的水果刀上前乱刺，这名解放军就是崔国政，他当即被打倒在地。崔国政在地上挣扎了好几次，想爬起来。赵身边一个穿皮夹克、身高1.80米左右、操北京口音、约20岁男青年，从腰间掏出一根约小拇指粗细的尼龙绳。赵与这个暴徒把崔国政从脚到胳膊一道道绑了起来，绑好后，赵抬着脚，那名暴徒抬上身，他俩一起把崔国政抬到天桥上，并吊在栏杆中央。赵与那名暴徒一起往崔国政身上倒汽油。那名暴徒问谁有火，赵说他有，说着，赵用火柴点着了崔国政的裤子。约10分钟后，因绳子烧断，崔国政掉在桥下，昏死过去。”

“赵与那名暴徒从天桥东侧绕下，等火熄灭后，赵与那名暴徒商量了一下，再次把崔国政抬上天桥，吊在了天桥中央。”

“事后，那名暴徒往天安门方向逃去。”

“赵向火车站窜去。”

刘汉臣的叙述，在案情过程方面，与6月15日新华社报道的赵跃堂被抓获消息稍有出入。新华社报道在叙述了赵跃堂烧尸过程后，在段落结尾提到：

“此外，赵犯还交待了用燃烧瓶烧了一辆军车、用刀子刺一名战士的罪行。”

这就是说，该犯并没有认定，他刺伤的人就是崔国政。很可能是其他人。为什么刘汉臣的记述要咬定“就是崔国政”？这是不是另有隐情？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现在，我们不妨先将刘汉臣记载的案犯供述与某女士的证词加以对比：显然，女士所说“其中一个人被一伙人拽到天桥上，打昏后扔到桥下，然后浇上汽油烧了”，与案犯所供的最大区别是，她说崔国政是被“拽”上天桥，而不是浑身捆绑后被“抬”上天桥的。

事后，崔国政的指导员初慧民曾回忆说：“后来，亲眼看见崔国政惨死的群众告诉我，他被打得不省人事之后，被几个暴徒抬起来从过街天桥上摔了下去。” 戒严部队新闻处采信了这种叙述，说明案犯的供词——至少这个环节——是可信的。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重大细节上的差别，说明了提供上述证词的女士，有很多事情并非亲眼所见，作为“目击证人”，她的资格是不完全的。但是，细读案犯的供词，我们也发现，作为一个车辆起火的目击者，他并没有看到军人弃车逃跑的过程，更没有看见军人在桥上与三位大妈互跪的那一段。在这一点上，它与那位女士的证词存在着相似的盲点。

那么，“战友证词”叙述的上桥、下桥过程，又有谁证实它的真实性呢？无疑是“哈德门证词”。

让我们重温这段证词：

“那个士兵被杀死之后，群众与这辆卡车保持一段距离。一些来复枪从盖有帆布篷的卡车后部慢慢地探了出来，但约有半小时没有人从卡车出来。群众中的一些人开始向卡车扔燃烧瓶。后来卡车着火，士兵从车里钻出来。他们跑过天桥，把来复枪对着人群。仍有几千人的群众跑到路的东面。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边跑边退，后来在一条胡同消失了。”

显然，军人上桥的过程是存在的。女士证词和案犯证词之所以没有记叙，很可能是他们没有注意，或并非全程在场。但是，这段“哈德门证词”又出现一个明显与其他三方证词相左的叙述：

军人们是在那个“士兵”——开枪打死人的那个人——倒下后才下车，才上桥，才撤退的！

事已至此，一个问题便凸显出来：哈德门证人所说的这个人，是崔国政吗？

不是。按照某女士和赵跃堂的说法，以及“战友证词”，崔国政显然不是那个在战士们下车以前已经倒下的人。

其实，细心的读者大概早已发现，严谨的“哈德门证词”从未把听说和推测当做亲见来叙述，它言之凿凿“由于有过街天桥阻挡视线，目击者不能清楚地看到那名战士后来如何，但他们猜测他被杀死并焚烧了。”而事实很可能是，他的猜测——包括大部分人的猜测——可能是错误的。

此时，只要我们证实了崔国政不是在战友们下车前就已经遇害，同时也就证明了，崔国政不是谣传中那个杀死3人的士兵。

因为，按照“战友证词”所说，在他们下车之前，两位在车前部遭受攻击的军人——连长王峰（右）和司机李景民（左）——已经倒地了。所以，“战友证词”不提战友中是否有人开枪，或打死打伤民众，并不是出于有意隐瞒真相，而是视线受篷布阻挡，无法看见。他们把枪声的来源归之于北边刚好路过部队的“对天鸣枪”，但却无法解释，“人群”为什么会“哗地一下离开了10多米”。离开谁10多米？当然应该是离开他们乘坐的卡车10多米。这样，他们才有机会从车上下来。但我们也因此可以判断，枪声来自车的周围，而不是至少100米外的崇文门西大街。

到此为止，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了：在王峰与李景民这二人中，谁有可能是开枪者？

让我们回过头，再仔细重温“哈德门证词”，聚焦在车的前部发生的事情：

“群众向车前部扔瓶子。卡车前部的士兵试图出来，有两名士兵终于出来。有三个男子向其中一个戴钢盔的士兵靠近，这个士兵揪住其中一人的头发。这时周围的人一拥而上，猛打这名士兵。然后这名士兵不见了（目击者再没有见到他）。……”

这个人应该是连长王峰。因为他后来他被孙朝恒和崔国政抬上车，在车被点燃后，大家担心油箱爆炸，又把他架上了天桥，所以，哈德门的观察者“再没见到他”是情有可原的。

“另一名士兵返回车前部，一会儿又从车后部出现，手里多了一枝来复枪。他开始向人群开火。目击者听到三声枪响，看到一位老太太和一个男子倒下。事后他们听说还有一个小孩被枪打中。群众被激怒了，涌向卡车。当这名士兵再从车的驾驶室出现时，衣服已被撕掉了一半。他向崇文门饭店（位于西面）跑去，跑上人行道，但被群众拖到左面。由于有过街天桥阻挡视线，目击者不能清楚地看到那名战士后来如何……。”

这大概就是“战友证词”所说，“有两个暴徒架起李景民退后10米左右，对着我们大声喊着：‘投降吧，缴枪不杀！’一名穿红衬衣的暴徒抽出一把匕首对着李景民的腹部就是一刀”的过程。

当时，不仅哈德门的观察者，连战友们也不知道李景民此后的去向。事后其他的材料证明，李景民当时所受创伤为“肝脏破裂”、“颅内血肿”，当晚就被市民救走了。6月6日被北京军区总医院收治，其情绪极为狂躁。

“战友证词”则说，他因脑伤，已经“失忆”。但医院大夫的回忆证明，李景民并未失忆。当他的脑血肿块被清除时，醒来的他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从而结束了他“无名氏”的历史。

话说到此，大概我们已经能够理解，由邓小平签发的崔国政事迹中，为什么会有“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形容……

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直到1990年春节过后，坊间关于崔国政的谣言并没有止息。但这时，谣言变换了身形。2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题为《勿使谣言惑众》的评论透露：

“社会上有那么一部分人，很容易被谣言蛊惑。比如在北京平暴中惨遭杀害的崔国政烈士，前些时竟有人造谣说真的崔国政并没死，死的那个是假的。春节前夕，北京市和吉林省党政军领导都去慰问烈士的父亲。请问，如果崔国政没有死，怎么会有春节期间的慰问活动？”

为了一探虚实，该年的正月十五，《人民日报》记者李安达特意前往吉林省南辉县看望了崔国政的父母。记者写道：

“室内怎么见不到烈士的遗像？同行的辉南县委副书记李扬悄悄告诉记者，国政牺牲后，老人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也一直不太好。烈士遗照没挂出来，是怕老人触景伤情。”

崔国政的父亲崔洪兴告诉记者：

“节前，吉林省副省长王云坤、通化市委副书记康立国、辉南县县长宫传仁分别代表省、市、县党委和政府来到我们家，了解我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沈阳军区还委托通化军分区的领导来家慰问。国政虽然牺牲了，但各级领导和许多群众常来看我们，送来温暖。”

崔国政的母亲温桂琴接过话茬说：

“国义、国萍参军还不到一年，部队首长破例让他俩节前回来探家，陪我们过节。部队领导还特地派国政生前所在连队的王峰连长把两个孩子送到家。”

这个叙述告诉我们，39军为了抚慰崔家，在崔国政牺牲后，让他的弟妹二人都入伍参军。特意派王峰护送的“隆重”情节，似乎也存在深厚的寓意。

末了，记者写道：

“当我们结束这次访问，温桂琴送我们下楼时，她几次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止不住激动和愤慨，把强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近来我听到了一些传言，说国政没有死，逃回家来了。这是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反动势力的可耻谣言！但谣言终究改变不了事实。他们想用这种手段来否定我们党中央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策和果断措施，否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功绩，实在是太卑鄙，太愚蠢了！’”

访问记的结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为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人民的幸福安宁，烈士献出了生命，烈士的亲属默默忍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我们感谢他们，敬重他们，更珍惜烈士以高昂代价换来的成果！谁要在他们身上使坏，向他们脸上抹黑，人民是决不会宽恕的。”

显然，幸福、安宁和烈士价值的彰显，并不存在于舆情防范和高压恐吓之中，而存在于真相揭晓之时。联系到前述案情资料的不明确之处，我们的确可以找到一些导出类似这个“谣言”的另一思路：

其一，当“哈德门证词”说“另一名士兵返回车前部，一会儿又从车后部出现，手里多了一枝来复枪”时，由于距离和时间的间隔，他并不知道前后出现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其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凶手赵跃堂承认曾用水果刀捅过一名战士的腹部，但他并不能确定此人就是崔国政或李景民，在这个问题上，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显得比刘汉臣的记述要谨慎一些。出于同行信任的原因，笔者认为，记者并不确定水果刀伤害者是崔国政。

这是不是说，死者可能是李景民，而被救走的是崔国政呢？显然，这种推测又与“战友证词”及“军医证词”相矛盾。笔者是相信军人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造出一个“李代桃僵”的案子的；同样，笔者也不相信，当日崇文门的目击者都是对政府和人民军队怀有仇恨的人。当他们的记述发生矛盾时，理顺事物演进的脉络，解释文献产生矛盾的原因，才是历史学者的本分。

图10-4：2015年11月，笔者探访了当年崇文门立交桥和哈德门饭店旧址的位置

第二十一章 民心的测试

从6月4日早晨，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撤回校园后，从此再没有走出校园。但北京市的民众抗暴仍在继续。据李鹏6月5日日记，两日来遭焚烧“军车41辆，烧砸其他各种车辆389辆”。除6月4日上午10：00木樨地那次来历不明的大规模军车焚烧外，在和平街北口公共汽车站也有“28辆公交车”被焚……

第一节 木樨地军民联欢？

戒严部队报告，直到6月8日，从公主坟到复兴门一带，“平暴”形势依然严峻。某部政治部主任对新华社记者说，几天来，这一地区仍“有三股暴徒活动。他们已抓获两股。另有一股劫持了6名战士不知去向，现正在追捕中。”

多年后，王庆元的一篇回忆文章，大致揭示的就是此中故事。他写道：

“6月6日下午2：00左右我去（木樨地）地铁站接F，接到她以后刚刚穿过22楼，一辆戒严部队的坦克竟呼啸着从东往西开过，光天化日之下，莫名其妙地向天上狂扫机关炮，由于长安街两侧高层建筑林立，特别拢声，机关炮益发显得震耳欲聋。”

街上行人立即作鸟兽散。两小时后，他出门送客，却不料，自己不仅成了一个“弥天大谎”的见证人，甚至成了剧中角色。他写道：

“快4：00了，F要走，我又送她坐地铁，快到长安街时我们发现人们都躲在22号楼南边利用建筑物作障碍物，每个人都探出半个脑袋窥视长安街上

的戒严部队，不敢通行，窥视的人一字排开有十米多长。这些戒严大兵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站在路边。老百姓不敢过去。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询问了一个人：‘让过去吗？’他说：‘不知道，部队说开枪就开枪，谁还敢过去？’我又问：‘刚才又开枪了，还是两小时前开的枪？’他说还是两小时前开的枪。我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不可能再开枪了……我决定冒险过去问一下，于是我向荷枪实弹的大兵跑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大喝：‘站住不许靠近！’我立即一个急刹车，停住了，距离大兵有10米开外。大兵警惕地握枪对着我，表情十分不友好。我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谦卑地说：‘我想坐地铁，给过吗？’大兵回答可以。我又没话找话地问：‘那你们这是……’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们是38军在执行任务。中央军委有命令，今晚消灭27军，因为27军是叛军，他们向老百姓开枪。’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激动地跑了回来，向躲在22号楼后面的群众说：‘报告你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部队今晚有大动作……’” “木樨地22号楼附近的居民对我的话将信将疑。我说：‘不信你们可以过去问。’于是，又有几个胆大的小伙子向大兵跑去。他们回来证实了我的话，这时已经有三五成群的市民向大兵跑去，要亲耳听到这激动人心的消息。”

“如同发生了核裂变一样，最多只有20分钟的时间，刚才还如同鬼子进村坚壁清野没有一人的木樨地，成千上万的人，就像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涌向了街头。木樨地转眼间就成了‘王府井’，人山人海，向所谓的38军致敬，成条的上好香烟，成筐的煮鸡蛋，都送到了‘亲人’解放军的手里。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帮助戒严部队清除路障。甚至很多热情奔放的北京姑娘和大兵亲切拥抱。场面十分激动人心。这时，突然出现了3台摄像机，（也可能更多），开始抢拍起现场镜头。这异常的现象，这来得如此及时的摄像机，立即引起了市民的警觉。有一位年长的问我：‘他们是38军吗？是来平息27军叛变的吗？’我连忙说：‘我也有些感到不对劲。’但这时想制止正在激动不已的群众已经不可能了。由于人太多，我不得不踮起脚，并尽可能地靠近摄像机的麦克风，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是38军吗？是要平息27军

叛乱的吗？我们会不会上当？’我希望我的喊声能够被录下来。但是，我很清楚，我离开麦克风还是太远了，是不可能被录下来的。即便录了下来，也只是报废了的带子。我就像落水的人，连烂草也想抓住一样，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

“6月7日清晨，当我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听到播音员播报：昨日首都市民热情欢迎戒严部队，在木樨地帮助部队清除路障，送烟送酒送鸡蛋……我怒不可遏，立刻跑下楼去，这时22号楼附近已经积聚几十人，大家见我就问你早上听新闻了吗？我说没听就不跑这里来了。大伙骂着：‘流氓军队’、‘流氓政府’、‘无耻透顶’。”

一星期后，王庆元从22号楼的一个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弟那里得知，这件事是“军委责成总参一手策划”的“骗局”。原因是国际社会质问中国政府：你们说群众是拥护戒严的，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拍到的镜头都是反对戒严的？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群众拥护戒严的录像？中国政府让广电部送上这方面的资料，结果广电部检索了全部录像带共6箱之多，没有一个合格。只好捡起中共弄虚作假的惯技，炮制了6月6日群众拥护戒严的骗局。

读了王庆元的这篇文章后，笔者去查《人民日报》，6月7日，第2版果然有这样的报道——《军博一带群众帮助清理路障 戒严部队英勇击退持枪歹徒》。报道说：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戒严指挥部消息：6月6日下午6：30左右，一伙歹徒躲在一栋未完工的大楼上向在北京复兴路军事博物馆一带清除路障和被烧毁的坦克、装甲车的某戒严部队指战员开枪，戒严部队立即还击。当地居民对戒严部队的正义行动非常支持，见部队喊话的话筒电池电力不足，争着送来新电池，并给部队送来面包和香烟等慰问品，居民们说：‘对向部队放黑枪的歹徒，就是应该还击！’在居民支持下，戒严部队很快将歹徒击退，歹徒仓惶逃跑。有一部分居民对部队的同志说，你们打枪，有的子弹飞到了居民楼上。部队官兵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枪是对着一小撮歹徒的，绝不是

对准你们的，不是对准首都人民的。我们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一些原来有
害怕心理的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帮助部队清理路障，使这一带的交通疏导
开了。群众高兴地呼喊：坚决支持解放军！许多群众兴奋地与解放军官兵拥
抱，呈现出军民一家的动人情景。”

事实证明，即便是对于军人，这类初级的舆论安抚，也是作用有限的。
对于他们来说，戒严，特别是“平暴”后的种种记忆更加刻骨铭心。据李鹏
记载：

“（6月5日）凌晨一时，我和王震同志到人民大会堂看望部队。发动在
京机关为部队送主食，战士食宿虽已有安排，但没有蔬菜吃。几万官兵都挤
在大会堂各大厅内地板上睡，特别是厕所不够，大小便困难，室内空气污浊，
如不迅速解决，部队难以为继。”

第二节 “坦克人”

如果不是2013年从电子邮箱收到朋友寄来的上述王庆元的文章，我永远
不会怀疑“坦克人”是否有其它更复杂的背景，也不会有这一节的研究。但
读罢此文以后，下述事实，立刻从记忆的深层升浮到眼前：

据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负责人刘成社回忆，6月4日凌晨1：00——
即戒严部队合围天安门广场之前，该处就收到“即刻派人去北京饭店收缴外
国记者违反戒严令非法摄制的录像带、胶卷，并对他们违反戒严令的行为提
出警告”的上级指示。

外国人管理处地处北池子大街，距北京饭店仅两个街区，该处的外事干
警很快于1：40在北京饭店大厅就位，“开始检查每一个进入饭店的外国人”。

凌晨3：10，第一个“猎物”——美国某新闻社的摄影记者——落网。3：21，另一名“大胡子”记者落网。4：45天安门广场“清场”以后，大批外国记者陆续落网，“清场”完毕后，更是“鱼贯而入”。

到6月4日上午7：30，北京饭店居住名单中的外国人全部回到饭店，这批外事警察才满载而归。

这个故事说明，即使是在最紧张的时刻，中国政府依然没有放松对于舆论的管制。这是5月20日颁发《戒严令》后，北京市政府1、2、3号通告早有特示的要义。6月1日，在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再次对有关条款作了说明。当日，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对敢于以身犯戒英国广播公司驻京记者麦杰思、日本《读卖新闻》社记者大岛则之进行了警告。

当日，这些乘兴而来，却即将注定要败兴而归的摄影记者绝对不会想到，第二天的中午，他们能享受到一顿不仅是“不枉此行”，而且是“不枉此生”的“视觉的盛宴”。这就是事后被称为“20世纪标志”的“坦克人”的出现。

6月5日上午，就在刘国庚暴尸露肠地方的相反方向，在天安门东面的长安街上，上演了这出剧目。据事后笔者从各种摄像记录下的镜头中看到的场景，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名青年男子（暂名“坦克人”），身着白衣、深蓝裤（衬衫掖在裤子里），脚穿疑似“懒汉鞋”，面朝一队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坦克（据说是18辆59式坦克）而立。他一手提着塑料袋，一手打着旗语，在将近10米的地方，拦住了最前面的第一辆坦克。那辆坦克（的驾驶员）似乎是楞了一下，将坦克停了下来，随后打右舵，打算躲开坦克人，跟随在它后面的第二辆坦克也随之改变路线。但坦克人左右移动着身体，继续阻挡坦克前进。那辆坦克在距离青年2、3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青年向坦克走去，他试图爬上坦克，但在一次滑落后，换了方向继续往上爬，这一次，他成功爬上炮塔。之后，他开始探查坦克前部的一些舱门或镜面，看上去是想打开它们。这时，坦克舱

盖打开，一位军人从那里露出了上半身，坦克人与他握手，彼此似乎还交谈了几句。

另一目击者称：

“之后……先是一名骑着脚踏车的男子也骑向坦克前方并且与男子交谈几句，之后2名身穿蓝色上衣并高举双手的男子也前往现场，接着便带着阻挡坦克的男子快步离开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队伍随后则继续向前行进。”

上述场景，大体上是现场的摄影者留给受众的印象。像所有的“短剧”一样，它传达的意涵也十分清楚：其一，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次日，一个弱小的青年，以孤独的身躯，成功对抗了象征专制暴政强权的坦克；其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面对民众的阻挠时，采取了极大的克制。

显然，两种解说，歧义巨大。正因为如此，它究竟是一场精心编制和部署的“短剧”，还是偶发事故，就成了后人解读的关键。27年后的今天，历史解读者基本上也是依据以上思路分为三派：

第一派认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坦克人要么是一个学生，要么是一个社会青年，但是“外地人”的可能性较大。持此观点的民运人士甚至判断，他可能刚下火车。并据此推测，“坦克人”已经被杀。

中国政府在公开的言论中，对其人身份也持同样看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90年和2000年两次对美国电视观众发表讲话，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在1990年面对美国广播公司知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询问“阻挡坦克男子的下落”时，江泽民先是对翻译表示：

“我不能确证你提到的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被拘捕。”

之后，沃尔特斯追问该名男子是否遭到秘密逮捕并且被处死时，江泽民则以英语回答说：

“不过我想他没有被杀。”

2000年，江泽民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时，他已经能够确切回答：

“这名学生并没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第二派观点认为，这个“短剧”，是应西方新闻媒体反对中国政府戒严的“舆论需要”，制造的一出“喜剧”。其当事人至今不敢露面，事发地点恰好在外国人聚集的北京饭店门前，似乎都可以佐证这一推测。在6月5日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该剧的片段镜头时，称其为“螳臂挡车的歹徒”。事后，中国政府对此实行网禁，都说明，它即使不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事端，也是为中国政府所不高兴的。

坦克人事件，的确是借由西方记者之手，在第一时间传遍世界的。资料显示，6月5日当日，有5名摄影师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影团队，不约而同，分别在北京饭店的不同楼层上，捕捉到了这一场面，并将其在第一时间加以发表。他们分别是：

1、美国最大通讯社美联社记者杰夫·怀登（Jeff Widener）在北京饭店6楼阳台拍摄的版本。他的位置，距离事发地点大约有800米。事后，他拍摄的底片，经由美国驻华大使馆交给了美联社。成为1989年6月6日欧洲各大报纸头版使用的照片。

2、国际摄影经纪公司马格兰摄影通讯社的摄影师斯图尔特·弗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在北京饭店5楼阳台拍下了一系列视野比杰夫·怀登还要广阔和深远的照片。据说，其底片是由一名法国学生藏在茶叶罐里面带出中国，其中有些相片收入2003美国《生活》杂志发行的《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

图10-6：“坦克人”近景

3、美国纽约《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查理·柯尔（Charlie Cole）当时与有350余家电视台加盟的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摄影团队在北京饭店同一阳台拍摄了这一场景。事后，他将底片藏在北京饭店的马桶水箱中。据说，此后不久，便有中国公安人员上门搜查。他们将“找到尚未使用的底片以及拍摄受伤示威群众的底片加以破坏，之后要求柯尔签署一份忏悔书”。但他藏在水箱中的这卷胶片幸免于难，并且交由《新闻周刊》发表。而他也因此获得了1989年年度世界新闻摄影奖。

4、当日，时任路透社摄影记者的香港记者曾显华，在北京饭店11楼房间的窗口也拍下了男子阻挡坦克的一系列相片，并交给了路透社。一开始路透社只选择使用男子爬上坦克炮塔的相片。但当工作人员注意到杰夫·怀登的相片版本大受欢迎后，他们重新检查曾显华的底片以寻找是否有和怀登类似时间点拍摄的影像。经过几个小时后，路透社才重新发布了曾显华所拍摄的男子阻挡坦克相片。

5、香港记者冼伟强也在北京饭店拍下王维林阻拦坦克队伍前方长安街场景，并且于之后在《星岛日报》发表。

6、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摄影团队也拍摄了现场状况，并且随即将影像发送到世界各地播放。

图10-7：“坦克人”远景

此外，还有一名摄影师，一直到2009年6月4日——暨“六四”事件20周年——才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他所拍摄的事件相片。照片的摄影者为美联社记者钟同仁（Terril Jones）。与其它版本的“坦克人”照片不同的是，他的照片角度显示，他是站在地面上拍摄的。而且，从中可以看出，“该名男子在坦克靠近自己之前便已经站在长安街中央抗议”。

钟同仁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原本拍摄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拍摄向前行进的坦克，因此他并不知道坦克人的存在；在美联社发布怀登的相片几个月后，他从洗出来的照片中意外发现，自己的镜头早已捕捉到坦克人。为了尊重这一标志性的图像，他从未将自己的作品向任何新闻媒体发表。对此他表示：“我错过了1989年发布这张相片的时机，今天是时候把它公布于众了。”

根据以上信息，笔者认为，指控“坦克门”事件为西方新闻媒体所制造，其理由并不充分。事发地点虽然恰好在外国人聚集的北京饭店门前，但北京饭店并不是外国租界，没有人证明坦克人事前与外国记者有所来往，事后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庇护。而事实证明，早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凌晨，中国的公安部门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包括北京饭店在内的所有涉外饭店。事情之所以发生在此地，如果不是出于偶然，应该另有原因。

这里，我们就要讨论第三派观点，也就是笔者持有的观点：“坦克门”事件，很可能与当天下午发生的“刘国庚移尸案”、次日发生的“木樨地军民联欢案”一样，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的需要，所编排出来的。

图10-8：“坦克人”形势图（自制）

首先，如图所示，坦克人所站立的位置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北京市政府大院和公安部大院的中间点，与这三地的最近边缘线大约都相距100多米。与天安门广场边缘直线距离仅700米。从镜头中，人们可以看到从金水桥延伸而来的昔日皇城红墙的末端，老北京人都知道，此地名叫“南河沿”，也是本人当年每次上下班都经过的地方。该地周围居民，主要是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以及散落在院落夹缝中的昔日皇城根居民。

其二，在这样一个地域，外国敌对势力要安排一个反对性事件，而做到全身而退，是不太容易的。而坦克人作为本地居民的可能性也极小。回想观看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段录像的当时，笔者对坦克人的身份也作过一番猜测。笔者第一个想到的，是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因为他动作有度，似乎懂旗语。但事发路段空无一人，北方交大在距市中心遥远的海淀，如果他是一名“学生”的话，在这个悲痛的日子里，怎么会孤雁离群，一个人跑到这个与学校所在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来？

其三，他的装束与连日来屐拉着拖鞋、穿着老头衫、短衣短裤阻拦军队的本地居民相比，显得过于正式（甚至堪称拘谨）。特别是他把衬衣掖在裤腰内、将长袖袖口挽得一丝不苟、手提塑料购物袋的形象，倒是与6月3日以来化妆进城的戒严部队战士有些相似。这些印象在脑海中聚集以后，“人武部”三个字便浮现于脑海。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自坊间开始流传坦克人名叫“王维林”以后，笔者开始转变怀疑态度。因为，这个信息的披露意味着，这个人的身份是可以查询到的：既然名字都知道了，那么，所在学校、家庭住址、同学邻居、父母亲友，都是可以证实的。但是，直到今天，27年过去，38军抗命遭受军法制裁的徐勤先获得自由；被通缉的柴玲、李录已经回到中国做生意；被判刑13年的陈子明出狱后周游世界已经离开了世界……，而“王维林”除了这个名字以外，一切都还是空白！这不合逻辑！

不论他是英雄，还是被中国政府视为“犯了错误”的人，他都没有必要隐藏这么久。他出来，不仅根本不会有安全问题，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空前巨大关注，并得到帮助。

但是，他确实依然没有出现。

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国，一些重要纪事者——不论是处在最敏锐新闻前线的陆超祺日记、杨继绳日记，还是处在最权威地位的李鹏日记，或是代表

政府的袁木讲话或陈希同报告，或是以包揽全局、明察秋毫著称的《中国“六四”真相》——都没有提及这个人的名字。

最近，从封从德为笔者搜集的王维林材料中，我注意到，有资料称，“王维林（Wang Weilin）”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英格兰”的一家“小型报纸《星期日快报》”上。该报不仅指出其身份是“学生”，甚至披露了该人的年龄——19岁。但是这一说法也遭到许多的质疑，其中曾经撰写《神州怨：我从毛泽东时代走到现在的长征》的加拿大作家黄明珍指出，“《星期日快报》并没有长期驻北京记者”。这就意味着，这张报纸，在北京没有稳定的消息来源和调查能力，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外事机构为其推荐或安排的“中国助手”。这意味着，这个名字的披露，存在着很大的解释空间。

其五，是真正经历过“六四”血腥场面的北京学生，对这次事件有“不真实”感。首先是6月4日晨撤离广场，在“六部口血案”中，被坦克轧掉双腿的原北京体育大学学生方政，“6、7月他在医院不断看见中共电视上播放这一镜头来证明戒严部队的‘克制’和坦克没有碾人（他对此自然敏感，因此记忆深刻）”。“六四”事件数年后，美国公共电视网在采访发起示威活动的北京大学学生时，“许多人对于阻挡坦克这张照片感到‘真正疑惑’，甚至有学生认为照片是一件‘艺术作品（Photo manipulation）’。”

其六，在整个事件中，钟同仁所见坦克人事先已站在出事地点等候坦克大队的出现，以及对结束整个事件起关键作用的那名“骑脚踏车男子”的来去匆匆，都说明，此事不仅经过时间、地点、场景、演员的精心准备，的确还有“导演”的存在。事后，伯克利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研究人的肢体语言的专家约瑟夫，分析了坦克人和将其带走的两人的手语，认为三人的肢体语言透露，他们是受过训练的人。

其七，“坦克门”事件的照片和录像，虽然是借助外国记者之手，传遍世界的，尽管西方媒体在第一时间——事发第二天发表了其新闻，但中国人

第一次接触这个录像，却是在6月5日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如果这个记忆不错的话，那就不得不问，中央电视台从何处，以最快速度得到了这批录像？他们显然不是从美国公共电视网买到了该片的版权，而是拥有自己的版权产品。而这些录像，正好适应了戒严部队改善形象的宣传。李鹏6月6日日记写道：

“由于电视台播放了暴乱的录像片，许多人观点发生了变化。”

但不满于中央电视台只将戒严部队制作的镜头放在新闻节目的最后，当日，在杨尚昆住处召开的“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派代表”到中央电视台“指导工作。”李鹏所指镜头是否包括“坦克门”镜头？尚待揭示。

其八，还有必要提到的是，钟同仁的照片，之所以等到“六四”20周年之后才发布，并非没有留下悬念。笔者认为，他很可能在事发前得到过某种消息，因此不惜冒违犯戒严令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军警密布的长安街上，“以身试法”。而钟同仁的网上资料显示，其时，他虽然身在北京，但身份却是美联社驻东京记者。在1989年他虽然已被“特派”北京四年，但应是受东京站领导，并与日本记者有密切来往的。而同行公认，在各国的记者中，日本记者历来是对北京的事无巨细感觉最敏锐、行动最快，知情也最多的。他当时没有发表那张不惜冒险拍下的照片，是否是对其“戏剧性”的内幕已有所了解？而从职业角度评价为“假新闻”，而放弃了这个得来不易的“出名”机会？而事后，当这张照片在世界引发轰动，并衍生为东欧剧变的历史性成果时，他或已感到，没有再澄清的必要了？

其九，本书修订版2016年4月在CREATESPACE出版后，笔者收到微信朋友转来的一篇网络文章。该文作者，自称当时受雇于“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6月5日下午，他受老板指派，前往北京饭店取回该公司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的“一些很重要的材料”。他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

在到达饭店门口时，他看到一排“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

“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与昨夜进入的外国记者一律遭到拦截和搜查的境遇不同，他被放了过去——这可能因为他是中国人，并顺利到达14楼该公司摄像组的房间。交接顺利。剩下的悬念就是，门口那帮人是否正“守株待兔”——就等着缴获他的藏匿物品了！

“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他顺利将录像带送回老板的住地——王府饭店之后，老板又让他立即将物品到机场“放信鸽”。尽管心理压力巨大，他仍圆满完成了任务。

图10-9：“坦克人”早早做好准备

事后，他认为，自己能在第一时间送出这份重要录像，不可能没有得到“帮助和支持”：

“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

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1995年10月，美国公共电视网纪录片《天安门》评论，“坦克人”的行为“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

1998年4月时，美国《时代》周刊以“无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作为名称，将“坦克人”的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因而将之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而这，是除了毛泽东以外，唯一获选的中国人。

2003年，美国《生活》周刊称“坦克人”照片“显示了十亿多中国人仍然是有希望的”，为此将其评为“改变世界的一百幅照片”。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裴洛西则将“坦克人”照片视为“20世纪最持久的形象，将再度永远烙印在世界的良知中”。

时下欧美评论界在论及“六四”时，也视“坦克人”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总之，这一切舆论，都足以让钟同仁及一切追求和执着于“真相”的人，放下自己的初衷和信念！

正如“八九学运”领袖封从德谈论此事时，所发出的感慨：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王维林挡坦克一事很可能成为一个神话，关于他的传说已有好多不同版本的演绎，在大众传媒中广为流传，而真相即便在以后翻案后，恐怕也难以寻得。而且作为神话，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象

征意义，而真相很可能被最后公众定格的心理定势（敢于反抗国家集权暴政的个人勇气）所取代，虽然这一象征意义也可能就离真相不远。”

不管坦克人是谁？“坦克门”事件是“自发”还是“制造”，从短期看，它的确被中国政府的宣传所利用。但长程的舆论胜利，却是属于世界的。自6月5日中央电视台使用“坦克人”的相关影像以来，它的确将传说中的“大屠杀”力道进行了消解。正如央视解说：“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据此，邓小平1989年6月9日讲话可以很硬气地声称：“坦克没有碾过去。我们的军队考试合格。”

与此同时，国内媒体，大都借此来表现戒严部队“人性化的一面”——他们尽管被要求持续前进但仍对于示威群众保持克制态度。不过，此后不久，有关影像便遭到严格禁止，而在国内的电视媒体上也没有再度播放相关内容。其中缘由，江泽民在2000年9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给出了答案：

“……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下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

可见，不论邓小平、江泽民是否对戒严部队宣传部的种种“猫儿腻”知情，但戒严部队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像已经替党完成了宣传任务的刘国庚遗体一样。

第三节 《戒严一日》披露真相

1990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开国上将吕正操的读书感想。文章介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主编，1989年10月出版的，戒严部队参加“平暴”活动的征文汇集，书名叫《戒严一日》。在这篇书介中，吕将军写道：

“（起初）我对这本书并不在意，以为是早已知道的一些通讯报道之类。谁知出我意料，一拿起来，竟再也不想放下，甚至希望国内外广大读者都来读这本书。”

“这是了解北京戒严情况最真实的一本书。……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写的自己亲历和目睹的事实，没有任何道听途说的东西。”

下面，笔者略引《戒严一日》中平暴前后的故事，用以佐证本章的主题：

6月3日，被围在京顺路上的一位从老山回来的40军军官曾感慨道：

“想起今年2月，我们部队侦察大队从老山凯旋归来，群众人山人海夹道欢迎，鞭炮爆豆儿似地放了老半天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该军的少将军长，则想到了1949年进入北京城：

“我这是40年后的再度京华。40年前，也就是1949年初，我17岁，从东北到北平郊区参加解放北平的战斗，走的也是我们这次开进的路线。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有一个步兵师参加，恰好就是我当时所在的师，也是这次执行戒严任务我带来的这个师。当时我是个士兵，从前门进城，从东直门出城，一路上都是花束彩带，欢声笑语，那时我只知道很光荣，很幸福。40年后，我作为一老军长，率戒严部队进东直门，没有欢声笑语，却有围追堵截，这说明，道路是曲折的，斗争是长期的。”

6月4日凌晨，一位被阻于朝阳区十里堡的39军少尉干事，冒着石雨，向围堵的群众解释：

“我们是奉命进京维护秩序、保卫北京人民的，请你们协助一下，把道闪开……”

“没等我把话说完，雨点般的石块就砸了过来。有的还喊着：‘砸死这些杀人狂、刽子手！’我怔了一下：‘北京人这是怎么了？我们是来保护他们，他们反而打我们……’我不顾一切地跳下车，问近前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保卫北京？’他把眼一瞪：‘看看你们这些坦克大炮吧，……如果真来维持秩序，为什么要带武器呢？’他身旁的一位老太太接着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见过坦克大炮进北京呢！’”

39军116师高炮团一营二连雷达站站长李晓明回忆说，6月8日，他和营部车辆管理员一同坐公共汽车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他们。到了邮局，当他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想发电报时，他们又遭遇的是同样冷峻的眼光，“说机器坏了，不能拍，拒绝了我们。”李晓明事后说：

“我是那样悔恨、羞愧。我那时就认识到，我们已经成了广大人民痛恨的杀人犯、刽子手……”

即便逃脱了市民的围困和“暴徒”的袭击，被救到医院的战士，仍然逃不过心灵的拷问和正义的追究。

据解放军268医院的一位中校干事王红云回忆，6月4日下午，该院送来三个“特殊伤员”。院长宣布立即休会，他抓起白大褂三步并两步赶到了外科病房。已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

“……两个头缠绷带的伤员半躺半卧在床上。他们的头大部分都被裹住了，仔细一看，草绿色军装上布满血迹、汗渍，黑一块白一块的。

我走到左边的床旁，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床上躺着的战士吃力地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过了好一阵子，这战士脸上的肌肉搐动了一下，答非所问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装甲车，被烧了。’

‘装甲车被烧了？在哪里？’我的心里一紧。

‘在…前面。’

‘前面哪里？’

‘在……’这战士没说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我问另一个战士，这个战士瞥了第一个战士一眼，嘴唇翕动了一阵子，什么也没说出来。

听说急救室里也住着位伤员，而且是个连长，我退出病室疾步走去。

这位连长看上去二十六、七岁，穿一条蓝色棉毛裤和一件发黄的背心，头上也缠着绷带，脸上、身上蜡黄。

‘你们的装甲车被烧了？’我问。

他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过了一会儿，才吃力地点了一下头，随后就闭上了眼睛。

从伤员们的神态中，我感到在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难以言状的忧虑和压抑。”

恶贯满盈的003号装甲指挥车 大校副师长佟喜刚虽然没有这种内心痛苦，但在协和医院，也经受了一番“磨难”。他回忆道：

“我非常想知道清场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的003号车和车上同志怎么样了。我盼着能有人来让我打听打听。然而，最终却令我失望了，脚步都绕开我朝远处走去。”

“过了一会儿，外面突然传来争吵声……闯进来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我以为医生来了，便礼貌地朝他们笑了笑，用最大的力气说：‘感谢你们救了我。’没想到，回答我的不是免谢，却是质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第一个开进天安门的那辆装甲车中被打的大校？’‘你们轧死多少群众？’‘是谁把你弄到这儿来的？’他们越说气越大，手指到了我的鼻子。我心想这哪像医生。但是为了能尽快使自己的伤得到治疗，只好忍气吞声地憋着心里的火，给他们作些解释。我求他们给包一包伤口，他们却说：‘没时间，告诉你吧，在这里不会有人管你，等死吧，死了活该！’说完急转身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俩根本不是医生……”

“……一位看上去比较老的医生走到我的身边，我眼含热泪，连说了几声‘谢谢！’老医生俯下身来，很认真地查看我的伤情，边看边摇头和叹气。……很快把我抬上了手术台。一个伤口没缝完，就听外边嚷嚷：‘不好了，当兵的开枪打人了，咱们赶快躲躲吧！’这一喊不要紧，弄的人心慌了，态度也变了。缝头上的几个伤口，连麻药都一点没打。疼得我咬破了嘴唇。最后告诉我说：‘你就等着部队接回去再缝吧。’”

此后，他又再次受到“闯入者”的骚扰，被“劝降”起义。“其实我有好多话要说，但说到这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心在跳，全身发抖”，直到“闯入者”被赶走了事。

“想着想着，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好像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猛地被惊醒，见一个年轻医生模样的人直冲我来，上前抓住我的胳膊，说：‘你是官，打死群众你要负责，几万群众死在你们手里，你要偿命。’接着又问：‘51048是哪个部队，V04、V05号车是不是你们部队的，就是他们血洗了天安门。’后来又大声宣布：‘从明天早上起一律戴上黑纱……’”

当时，正在协和医院实习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杨蓉娅大夫，证实了佟喜刚描述的一些情节：

“急救室的病人比往常多好几倍，大多数是外伤，我帮助包扎、止血、上药。约9：00左右，我跟随医院的救护车往中日、安外等医院转送伤员。中午12：00，我又回到体疗室，继续参加救治。

体疗室是医院为应付紧急情况而临时设置的，内有30多张床，床上躺着许多伤员。我发现楼道地铺上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左手动脉被打断，已做了初步处理，便小声问：‘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小战士用疑惑的目光扫了我一眼，一声不吭。”

与这位晚到的小战士不同，早些时候被送来的戒严部队伤员，被协和医院安排在住院部大楼0层的一间内分泌功能实验室内。当杨大夫走进这间“带有血迹、满是汗水的受伤官兵”的小屋时，官兵们“立即紧张地警觉起来”。

“多数人的伤口已经过缝合及处理，少数人因当时情况紧急，伤口来不及处理。人多，房间较小、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温度较高，不少人的伤口开始出现感染……”

在协和医院东门附近的一间消防器材库里，还隐藏着另4个战士。在取得医院领导同意及保卫处干部的帮助下，为这些战士诊疗和服务，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6月5日）夜11：30，在院领导和保卫处的安排下，我和任干事来到食堂准备给伤员打饭。管理员见我们推车进来，问：‘给谁打饭？’‘给急救室的病号打饭。’小任回答。

‘病号半夜吃什么饭？’管理员不解地问。

我慌忙补充：‘给病区的病号打饭。’

忠于职守的管理员更怀疑了，小任赶紧给院领导打电话……”

经杨大夫之手，戒严部队从协和医院转走34名伤员。20多名伤情较重，多数行动不便。

随着戒严部队伤病员的逐渐归口，北京军区总医院的任务也逐渐繁重起来。在接收后来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马国选遗体后，医院太平间的电冰柜突然坏了，不能制冷。经过检查，张技师发现，是压缩机的阀片坏了。但以前联系的三里屯制冷设备门市部告诉他：“不单卖阀片，若买，连压缩机一起买”。以后，他们又到朝阳门制冷门市部、东单制冷门市部，统统停业！

第四节 军以食为天

伤员得不到妥善护理、死人得不到及时安顿，活着的人，还有吃饭的问题。

据任立本回忆，当他和部队终于来到天安门广场，劳累加饥饿逼迫他们不得不分散搵食：

“当时哪怕是个发霉的窝窝头我也能一口吞下去。首长让我带着两名战士到附近居民点买点吃的东西，当我们走出戒严区时，投向我们的是一束束愤怒的目光，似乎要把我们吃掉似的。”

“我走到一位中年妇女面前，问：‘大嫂，哪里有卖吃的？’”

“她把脖子一扭：‘哼，卖吃的，不怕死啦！’”

满怀热情而来，受骂、挨打，完成任务后还要受饿，还要屈辱地搵食、争食，凄凉地分食，就是“平暴”后戒严部队面临的最迫切、最尴尬问题。

据担任戒严部队后勤补给工作的中校助理员傅水生回忆，还在6月3日中午开始，有的集团军已经“告急”：部队面临“断粮、断炊”的危险。

“按正常就餐，战士们带的干粮可以对付3号一天。由于缺少副食，一个战士一餐可吃5袋方便面，一餐吃掉两餐的。”

更多的部队，则因运输食品的车辆被截、被焚烧，战士被迫打时扔掉了除武器之外的随身携带物品（包括盥洗用品）等原因，呈现粮荒。

27军某团上尉军需股长介绍说：

“从2号我们化装进驻人民大会堂就一直在挨饿。开始8个人分一袋方便面，有的战士把掉在地上的面渣渣都捡起来吃了。一小袋方便面调料，大家也分着吃。到今天上午就剩几袋了。大家你推我让，有的说让伤员吃，有的说让清场的官兵吃。真没想到，当年上甘岭的场面，如今在繁华的都市再现了。”

6月4日下午18：00，天色已黑，又下起了小雨。两车方便面刚刚拉到广场，不及分发，战士们便“一哄而上”。

“我看着这些冒着火海石雨突进到广场，而又饿了一天的战士，没多说什么。……我区在广场的部队几万人，当天仅有万把斤食品，每人才二两多一点，又要执行任务，体力消耗大，能不饿吗？”

据38军某部大校参谋谷密山回忆：

“这时的广场周围已有几万名官兵，我们疲惫不堪地和衣在水泥地上宿营，绵绵细雨把我们的军装全浸透了，风一吹觉得丝丝凉意。进入第二天，我们由于没有粮食、蔬菜，部队起不了火，官兵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小块压缩饼干……”

6月5日凌晨4：00，在西观礼台下执勤的38军某部连指导员张建华被冻醒。“战士们蜷缩在一堆倚墙荷枪半卧”。他们“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相隔3米一个的哨兵，能够听到别人肚子里咕咕的叫声”。他很不安心。于是捡了些木头，用自己怀中已经揉碎的一袋方便面和哨兵练中田捐献的一袋方便面，为全连煮了一顿早餐。

6：00许，第一架直升飞机降临的隆隆声，引来在场官兵的一阵欢呼：

“‘嘿，是面包。’不知谁嚷了句，便迅速传开。”

“共20袋呢。”

两架直升机卸货以后，后勤管理人员开始分发。但这个连队去领食品的5个人，只领回“一根10公分长，直径3公分的肠和6个面包。”8个人分一个面包，最后还剩下半块。这半块面包在生病的连长和一位受伤的战士及三个巡逻兵之间传来一圈后，又原样退回，最后，指导员下令，把半块面包揉碎，煮了一锅水，全连分吃！

就在同一时刻，身在建国门立交桥执勤的39军某师一个连也迎来了“断粮”时刻。从6月3日下午19：10开始，到6月5日早晨“40多个小时”中，“全连干部战士每人只领到两小块压缩干粮”。时至中午，司务长决定出去搵食。几经周折，他找到了营里，没想到营里也断粮了……。

午后，终于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司务长回来了！”大伙儿闻声聚拢过去，没想到他只带回了两袋饼干。

“‘快，把饼干分给大伙！’指导员干涩的眼里闪出了光，话里带着喜音……”

中士王庆满回忆道。

但饼干在战士们手里转了一圈，一块没动，又原封不动地转回到指导员手中，大家你推我搡地都说自己不饿！支部会动员也不灵了。年龄小、体力弱的也不听话。直到傍晚，指导员查哨回来，两斤饼干还是两斤饼干！全连46个人，谁也没动！

就如同国民党把大陆甩给了共产党，同时把治国难题和腐败的机会也留了下来一样，此时，从绝食者手里得到广场的戒严部队面临的处境，一点也不比“无政府”领导的学生好。

自6月4日起，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分直升飞机开始运送食品，5日开始直升飞机全部用来运食品。至6日止，“三天空运67架次，运来主食8.3万斤，副食6.8万斤。尽管总后赵南起部长有指示：“近两天对进城戒严部队的后勤保障，不讲标准，不经中转，要直接发送到师旅”，但主食分配外地军区的部队日人均只能摊到0.79斤，北京军区部队更少，只能摊到0.48斤。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每天每两名官兵才能分吃一包方便面，许多坦克、装甲车、汽车也因为缺乏油料不能进行正常巡逻”。为加大运力，把从各郊县筹集到的食品和物资运到市中心来，6月6日16：04，北京军区副司令齐连运下达武装抢运的指示。

经过一番空中地形路线勘察后，一支配有“4辆坦克6辆装甲车、一辆故障车、47辆运输车”的车队组成了。当日夜深入静，这支庞大的队伍经过建国门立交桥，往东开去。第二天拂晓返回。当日上午10：00许，39军115师从东到西，在行至建国门外大街外交公寓路段时，遭遇来自道路两旁高层建筑——路北的外交公寓和路南的长富宫——同时发出的射击，官兵一死三伤，死者为39军上等兵臧立杰，时年20岁。39军随即向两边大楼开火，搜查了长富宫，并包围了外交公寓，至下午3：30撤离。酿成了国际上轰动一时的“枪击外交公寓事件”。

图10-5：长富宫、外交公寓

因此地是运粮队必经之地，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此后的几天里，押运指挥官决定采取“虚张声势”的策略：

“指挥坦克和火力掩护队，先于车队占领警戒阵地，造成半合围态势。这一招还真管用，我们很快通过了……”

“六四”后许多年来，北京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清场”后的日子里，还发生了那么多枪击事件，尤其是在“平暴”夜没有多少伤亡的北京东部，部队还有那么大的动作？因为，维系戒严部队生存的食品集中地在东边的通县！这些耀武扬威、随意开枪，不停地来往奔驰的武装车队，所执行的任务，是一个完全不亚于“平暴”的，更庄严的任务！20万紧紧包围了国家首都的野战军，没有吃的，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你想过吗？亲们！别说是朝外交公寓开枪，朝任何方向开枪都是有可能的。

据刘亚洲介绍，事后，杨尚昆就曾心有余悸地说过：

“（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

据解放军总后勤部少将芦光祖回忆：

“我们几乎是在空对空的情况下展开工作的。没有基地，没有依托；因为暂时的误会和不理解，又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遥望蓝天，我心中不免划起一个又一个的‘？’号。”

“以前，部队打仗也好，行军拉练搞演习也好，住的是老百姓的房，用的是老百姓的锅，点的是老百姓的灯……而现在……”

北京城区找不到吃的，部队就到北京郊县寻求支援。据大兴县商委主任刘士忠回忆，6月7日，他突然接到县政府办公室电话，说“有支戒严部队已

经3天3夜没吃饭了，现派人来我县要买4千斤包子”。不久，他接待了三个穿便衣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还带着介绍信。

“首长忧心忡忡地说：‘城里的饭店大都停止营业了，没关门的，由于误解，也不卖给戒严部队饭菜。战士们由于长时间光吃压缩饼干，身体很虚弱……’”

“这个任务必须完成”，这位刘同志党性很强。但他又必须考虑，交谁完成？怎样完成？他甚至想到应该为戒严部队送去，于是不假思索的问了一句：

“你们在哪里宿营？”

“谁知，解放军同志兴奋的目光荡然消失。憔悴的脸上瞬间布满为难而又警惕的神色。我顿感失言，暗暗自责，盯着满窗阳光，随手抓起电话……这时，只听部队的同志说：‘主任同志，请你不要对下边说这是为戒严部队做的！’”

“我猛回头，面前是三张难以名状的脸。从这脸上，我感到了一言难尽的悲哀！”

军人的这种敏感，并非自我消沉。包子出笼后，在一个承包点，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餐厅经理要求参加做包子的人“每个人吃一个”，而且他“带头先吃”。这不是为了犒劳大家，而是“为了确保解放军同志的生命安全”！

文中，这位刘主任透露，即便在大兴，“6月7日的菜市场，已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公平，有的摊位空着，有的摊位却是人挤人，人压人……菜头几乎不见，大葱一块五一斤，韭菜卖到两块。在前几天，这都是二三毛，三四毛钱一斤啊！”显然，刘主任所说的菜价，是“清场”以前的标价，而不是“动乱”以前的标价。

北京周边郊县承载着北京市二千万人口的补给，能提供戒严部队数十万人的经济支持能力毕竟有限。于是，部队供给部门把目光放到了天津。为旅途安全，还不得不启用空军。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即便有物资，没有钱买，在当今社会也是不行的——戒严部队出现了“银荒”！

第五节 银荒

“就像输给戒严部队的血浆。没有它，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将无法生存。”

据北京军区后勤部中校助理员洪希涛回忆，为了这次“银荒”，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周恩来、陈毅坐过的专机：

“‘六三’以后，一时间说不清形势是好转还是更加严峻。从我接触的情况看，北京市内的银行、票据交换中心、邮局都停止办公。6月6日，总后勤部正式通知，总后供给部队的款项一分也拨不出来。部队用的转账支票到郊区商店和银行也不好使了。”

“‘上哪去弄钱！’后勤部芦副部长也急了。”

“尽管我们在部队行动前四处筹款，使部队携带了15天的现金储备。可是，几天内不断接到部队的报告，由于装备损失严重，恢复和补给用款大量增加；还有的部队反映，这几天物价邪了，一个鸡蛋，卖给别人两毛，卖给部队一元，西红柿要花10块钱一斤。这样下去，坚持七天八天也很困难。”

“现在是商品经济，没钱，能玩得转吗？”

于是，总后决定到外地筹款。他们把电话打到沈阳军区。沈阳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几经周折，通过几家银行，才提出十多万元。以后，军区又下命令，

要锦州、辽阳、长春等地驻军筹措，限期“10日内送到沈阳”。此行，洪希涛带回100万元现金，200万元汇票，也给历史充当了见证人：

“据一些老同志讲，过去部队执行任务，走到哪里，吃、穿、用都是就地筹集。用飞机给部队运票子，在我们建军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7、8两日，……总共为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筹措和抢装了各种熟食品120000公斤，各种油料479桶，各种蔬菜15000斤，是4、5、6日三天用直升机关运物资总数量的十几倍。”

据戒严部队某部干事申敬旺回忆：“我曾到战计部门查阅戒严以来各仓库的收发报表，再和过去的收发量比较，统计表上显示出：某综合仓库：24天>420天；某军需仓库：一个月干了一年半的活；……”

6月6日晚，李鹏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单位会议，要求地处东西长安街的24个单位为接待戒严部队“腾房”。在讲话中，他几乎是以硬性摊派的口气，对在座的党政高级干部发话的：

“从6月3日开始在北京发生的这一场反革命暴乱，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是关系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存亡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同志们在接受戒严部队安排住宿任务的时候，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作为我们多年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要从国家和党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大前提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个国家交给他们？如果不愿意，只有一条路，就是支持解放军执行戒严任务。……沿东西长安街的国务院和中直的二十多个单位要接受解放军进驻你们大院的任务。解放军不会干涉你们的正常业务，你们只是给解放军提供一个驻地，便于他们执行戒严。你们应该以非常欢迎的态度来迎接解放军。有什么困难也必须克服。……解放军并不要求太好的房子，有住的地方，有水喝，有饭吃，有一份热菜热汤就行。……”

李鹏讲完后，罗干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接待任务。

据山西省驻京办事处回忆，6月9日，与天安门广场仅一站之遥的该部，在各省驻京办中第一个给广场戒严部队送去了食品，出发时仍做了“地下工作”准备：

“他们买了100箱罐头、200箱饮料、750公斤面粉、200条烟和一麻袋大蒜，代表省委、省政府去慰问戒严部队。下午3：00，他们找好了司机，拆掉车上的车牌，由所长押车，冒着生命危险，把三车慰问品安全地送到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

戒严指挥部领导激动且带心酸地说：

“你们是北京驻外单位第一家在我们处于最困难时期支援我们的。”

如果戒严是得人心的，这些语带威胁的哀求都是不必要的。人民当捧出最好的东西款待自己的子弟兵。

如果戒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就不应该在5月19日戒严令尚未发布就自发地出现“全民截兵”的运动。在6月3日开始的进兵中，部队不会遭到严重的围堵，军民之间不应该发生如此巨大的伤亡。

如果戒严是胜利的，人民军队不会发生有史以来不曾发生的困惑，从将军到士兵，都经历一场心灵的炼狱。

同样，如果动用野战军解决国内政治事务是正确的，党的宣传工具不会采用如此多的欺骗手段，并面临如此的尴尬。据最后履行《人民日报》代总编的陆超祺总结：

“近十多天来，上面指定发表的东西越来越多，有的是直接送原稿来，有的是指定转载某报某日某人的文章，有的是拐著弯子由《新华社》通知说是上面指定要发的。这些文章、新闻、来信，有个共同点，就是没有真实姓名、地点和单位：有的虽然有署名，但是假的，没法查核。仅从10日算起，就有下列文稿：

6月10日一版：十二名大学生的《反思起来我们无限内疚》；北京高校一青年教师的《美国之音，造谣可耻》；三版：《北京市一普通家庭三代人写信给伟大的解放军官兵》。

6月11日一版：《北京日报》的《一位目击者谈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文中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广场上没有枪声’。二版：《首都群众救了我——戒严部队战士陈海波谈被救经过》。

6月13日三版：《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署名“湖南长沙两共产党员”；二版：《方励之违背人民意愿》，一位中年知识份子的信（《新华社》据“有关部门”提供）。

6月14日，《一些城市连接发生严重事件说明了什么？》作者郭玉水，不知何方人士。

文稿不署名，不提供可查的单位和位址，据说是为了保护作者的人身安全，如《北京日报》在编者按中说的，也如王维澄在发表孙巨来信时一再关照的。保护作者的人身安全当然是必要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统治下，许多批评当局的文章往往暑假名，这是报刊对被批评者的保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些揭露某单位、某领导干部错误的文稿，也不署真名，为的是避免当事人对作者的打击报复。现在这些不署真名的文稿并不是批评有权有势者的错误，而是相反，都是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为党和政府说话的，还要保护作者的人身安全，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据杨继绳记载，6月7日，街头出现不少传单，而且是铅印的。其中一张写道：

你有机枪坦克可以屠杀人民，

你有电台报纸可以传播“新闻”，

你有权力可以自封领袖，

你缺什么？

你缺的是十亿人的心。

第二十二章 八九人物之去迹

第一节 方励之的避馆与去国

如前所述，被邓小平和北京市委视为八九民运“第一黑手”的方励之，在整个50天里，除了在家会见学生和海外媒体记者外，一直没有被官方抓到什么“涉案”的把柄。5月24日晚，他与同事乘火车离开北京，到太原参加一个天体物理学的会议，车过昌平，在布满运送军人列车的车站内，他们从唯一一条空闲的轨道上，与军列擦肩而过。在太原会议上，方励之作题为《超新星1987A的高能过程》的报告，“尽管危机四伏，会议仍一丝不苟地进行。”

在5月26日会议的间隙，与会者抽空去了一趟浑源的悬空寺。北京跟来的便衣，也一直跟到了悬空寺下。虽然一无所获，但并不能证明方励之已经是没有价值的“死老虎”。事实证明，方励之仍然保有极其灵通的消息渠道。6月3日，已回到北京的方励之，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木樨地开枪的消息：

“（晚上）9：30，我们就接到学生从第一个屠杀现场——木樨地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都可以听到枪声。”

“很多人来电话，都像那个学生一样，很简短，三个字，赶快跑。……”

6月4日上午11：00左右，一位“曾在最高层的机构里工作过”的老友，从公用电话里用老家方言再次催促他：“你们还等什么，还不快点儿找个干净的地方去！”接到这个电话，方励之夫妇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走”的问题。

在四种备选方案中，最后一个是去美国大使馆。方家的老朋友，林培瑞教授表示可以帮忙。林当时是美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事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刊登了根据林培瑞提供的资料写成的《方励之进美国大使馆记详》一文：

6月4日午前，林培瑞驱车去方家。林培瑞问他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李淑娴说如真的需要，她会打电话说“请孩子们过来玩”。到了下午5：00，李淑娴打电话来，说“请孩子们过来玩”，于是林培瑞又到了方家。他们找了车，开到香格里拉饭店。林用自己的名字租了个房间，给方家三个人住。第二天早上，林培瑞找了他自己雇的车和司机，开车去美使馆。使馆问方，为什么要住进来？方回答说，朋友告诉他，在黑名单中，他与李淑娴被列在第一、二位。他说能不能在使馆住几天，等气氛缓和一点再出去。美使馆官员说，政治避难是给一些到了美国本土的人的保护，在使馆内不能有这种保护，但有一种类别的保护，叫“临时难民”，是可以考虑提供的。方提出美国使馆能不能给他们绿卡，这样离开中国可能容易些。使馆人员说，使馆没有权发给绿卡，但可以发给签证。于是，方家三人就办了去美国的签证。到了晚上，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方励之去了美国大使馆的消息。在这之前，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这一消息。

林培瑞先生的这个叙述，简化了一些重要细节。真实的情况是，方励之曾两进美国大使馆，才被收留。他本人的回忆录写道，6月5日去时，他们提出的请求仅仅是“借住三五天”，以及希望“不走漏消息”。但使馆工作人员表示“后一条极难办到”。所以，在当日下午5：00，他们就离开了使馆。

图10-10：左：方励之第一次去美国大使馆日记；右：林培瑞

当晚，方励之夫妇就近住在了建国饭店。但是，快到午夜的时候，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方励之回忆道：

“匆匆进来的是美国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员。他们身着便服，神色多少显得紧张……他们压低声音很正式地说：‘我们请你们去使馆，你们是我们总统的客人，需要在使馆里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登上美国大使馆停在饭店后门的一辆专车，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时间正好是6月6日0：00。自这一天开始，他们在美馆度过了13个月的避难生活。期间担惊受怕，不备细数。

美国人果然没有替方励之“保守秘密”：6月6日当天，白宫发言人就证实了方励之夫妇避难的消息。6月9日下午5：00，中共中央召开常委碰头会，会议除“确定6月15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6月20日左右召开中央全会，并一致同意李鹏、乔石、姚依林三人联名向会议作报告”外，另一项议程就是决定由公安部对方励之发布通缉令。目的是“迫使方励之暂时滞留在美国驻华使馆，不采取强制逮捕的措施”。

从李鹏日记透露的情况看，中国政府其实非常希望方励之进美馆，因为这可以抹黑方励之本人，抹黑民运。而且，李鹏透露，他们并不希望逮捕方励之，因为在判罪的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逮捕不判，将无法自圆其说，更别提国际舆论会带来多少麻烦。而美馆一旦收留了方励之，中国政府以为，就握有了一张“讨价还价”的“大牌”。

图10-11：方励之、李淑娴

“六·四”过后不久，鉴于美国民众和国会的双重压力，老布什行政当局不得不对中国政府采取一定的制裁措施：6月20日，美国政府宣布1、冻结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财政机构对中国的贷款；2、冻结美中双方高层官员的会面；3、冻结双方的军事交流。但私底下，在同一天，老布什却向邓小平发了一封语重心长的绝密信件，向中国政府说明：

基于美国的制度，对中国的制裁是不得已。但美国政府极力需要继续维护美中的关系。希望中国方面的镇压“手下留情”，以赢回世界舆论。

希望合作解决方励之事件。会考虑任何中国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案。

希望中国能够接受美国派遣秘密特使，进行进一步具体交涉。

此密信发出后，不到24小时，中国方面就立刻表示接受美国派遣秘密特使的建议。

1989年7月3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中国科学院，声称，“方励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立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业经检察部门批准逮捕，现畏罪潜逃，公安机关正在通缉”。因此“决定撤销方励之的学科评议组天文学分组成员和博士生导师资格”。

11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决定，撤销方励之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决定”称，方励之原是1980年11月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选举产生的学部委员。“今年7月26日，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常务委员会研究认为：方励之的活动已危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我国的科学事业，丧失了继续享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资格，决定由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采用通讯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对是否撤销方励之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问题进行表决。根据表决结果，中国科学院决定撤销其学部委员称号。”

除了在羞辱这个“头号”敌人方面，邓小平找回了一点面子外，围绕方励之问题进行的一年零一个月的谈判，并没有给中国政府带来任何利益。相反，这个横在中美政府之间的问题，不仅妨碍着政府希望人们忘却“六四”的方针，更加妨碍着江泽民走向世界的进程。不久，它就变成一个烫手的山芋。

据方励之回忆，在他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不断地让步：从要求交出方励之（当然，这只是假象），到允许方励之认罪出国；又从“认罪”改为自行“请求宽恕”；最后以“人道”、“治病”为由，草草放走了方励之。为这

个虎头蛇尾的“外交战”画上句号的，是一场即使在方励之看来，也有几分荒诞的“隆重”送行仪式：

（1990年）6月25日，星期一，夏至刚过，天早就亮了。上午8：00整，成百警察和便衣开始在大使馆周围聚集，戒备森严。

10：30我们走出官邸大楼。大使陪同我们乘那辆一年前送我们进来的车，从正门驶出官邸，去机场。

我们所经的路上，一律戒严，一切车辆不准行驶。我们的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车号是GA11-0001，即第一号警车，车后也尾随两辆“保护”。一路戒严的警察一看到0001车开路，就知道后面一定有个“角色”。于是，他们不自觉地就敬起礼来。

11：05，到达南苑军用机场。美国军用专机已经到了。

11：30，一位中国公安官员，由另两位公安官员一左一右保护着，把两本中国护照交给我们。……

12：40，飞机一切就绪，登机，滑行，起飞。

就这样，中国政府让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送走了两个中国人，两名最大的被通缉“罪犯”。

图10-12：方励之夫妇登机离开中国

当然，作为对中国政府的让步，方励之没有直接飞往美国。中国政府允许他选择一个小岛作为落脚地，这个狡猾的家伙选择了英格兰。

之后，严家其邀请他出山领导海外民运，这个狡猾的家伙则向他推荐了管惟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老搭档。

第二节 “四君子”下落

美国政府宣布方励之夫妇在美国使馆避难的次日，齐家园外交公寓发生“枪击案”。事后，中国官方并未交代破案结果，倒是在翻来覆去的国际争议中，透露出“知情”的讯息：

“7月6日下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华秋约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面交了中国外交部对美国驻华大使馆7月3日照会的复照。外交部的照会断然拒绝了美国大使馆就6月7日在建国门外交公寓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对中国政府的无理指责和‘强烈抗议’。‘有人将使馆馆舍和使馆工作人员寓所充作与使馆职务不相符的用途，甚至对被中国公安机关通缉的人犯提供庇护，这才真正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践踏。’”

此事看上去是在指责美国大使馆收留方励之，但方励之其时并未被通缉。因此，复照指责美国政府“将使馆馆舍和使馆工作人员寓所充作与使馆职务不相符的用途”，似应另有所指。因为，此前，从广场撤出的侯德健和刘晓波恰好躲在“枪击案”事发地某“使馆工作人员寓所”。高新事后的回忆，可以为读者弥补部分盲点：

“四君子”撤出天安门广场后，各自都走散了。周舵、高新都回到了自己家中。而刘晓波和侯德健一时都不知去向。但是，6月4日晚，讲“哥儿们义气”的刘晓波从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给高新打来电话，并告诉他，侯德健也在那里。

刘晓波声称要出来接高新，但被高新拒绝。5日晚，高新来到外交公寓，三人见面时，“紧紧拥抱庆幸还能活着见面”。高新回忆道：

“就——就高新我跟你说吧，当时他妈最紧张的时候我真以为咱们几个这回就完——完他妈的蛋——蛋了我跟你说吧！”

刘晓波涨红着脸对我说。

从公寓的窗户向外，正好能看到建国门立交桥上的一排排坦克。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我们的大楼，巡夜的步兵则时断时续地也不知是向哪里打枪，气氛确实紧张极了。

我们三人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时，侯德健表示如果我们三人不走，他也要留下。但我和晓波考虑再三，还是觉得四个人里应该出去一个向外面说明事实真相。再者，我们也委实担心共产党会把我们抓走杀了对外则密而不宣。就为这也应出去一个人以防万一。那么，当然是侯德健出去的可能性最大。他至少还有个“统战对象”的特殊身份。

当时，我们这“四君子”手里都是有出国护照的。周舵手里持的是“因私”护照；侯德健持有一本“港澳通行证”和一本“公务”护照；我有一本原准备去日本“研修”而在四通公司办好的“公务”护照（此护照是88年9月份办的，并非为“动乱”失败后逃亡准备的）；刘晓波刚从美国回去当然也有护照，但我们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时，他的护照连同手提包忘在绝食的帐篷里，肯定是被“人民子弟兵”一把火烧了。事后刘晓波对护照没了倒是不以为然，只是心疼地大叫，“我他妈那提包里还有一条‘肯特’烟呢！”

说服了侯德健之后，高新6日早上骑自行车到他家里帮他取了护照，还买了机票。当天下午，侯德健就进了澳大利亚大使馆，准备第二天与几个外国朋友一同乘机出境。

6月6日晚，高新又将刘晓波接到他家。吃过晚饭后，刘晓波骑自行车去一位朋友家，商量好第二天再联系，计划乘火车到东北长白山活命。自此，四人再见面，已是分别从监狱出来后的事情了。

事后，高新了解到，刘晓波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侯德健因为在刘被捕的当天夜里就已得知确切消息，所以第二天没有冒险去机场，而是留在了澳大利亚使馆，直到8月才出来。高新则与打砸烧分子一起，被关押在

半步桥监狱的K字楼里。并且——如他所说——被“连续戴过35天”一种被称为“死揣”的刑具！

图10-13：半步桥监狱外景

从广场出来以后，周舵回到自己的家中，选择了个人行动：

“……我随便吃了点东西，一觉睡到下午，傍晚时到中学同学王和那里暂避一晚，第二天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看传单，当我说那个自称的‘清华大学学生’是在胡说时，旁边的人都怒视我，以为我是便衣特务！到四通公司一看，人去楼空，只有一个人值班；问万总在哪，说是已经离开北京。

不久接到刘晓波的电话，让我去和他们三人会合，他说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一听就知道是外交官公寓。我拒绝了；一来他要出来接应我，对我们双方都不安全；再者，我也不愿接受老外的庇护。……侯德健进澳大利亚使馆政治避难，使馆也同意接受刘晓波，但不接受高新；晓波还挺仗义，表示这样的话他也不去了。……王军涛托甘阳打来电话，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也谢绝了。人越多目标越大，越不安全。”

在起初的一周里，周舵并没有打算逃亡，只在北京的亲友家藏了起来。期间，他还抽空将“六四”广场清场的详情写了下来，用国际邮件寄给了他在美国的姨妈。6月13日，四通公司的两位同事帮他租了一辆小面包车，假装往烟台的分公司送货，一路闯过了七道公安检查站！

“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在盘查每一辆车，和每一个人。幸亏那时还没有发我的通缉令……在河北—山东交界的无棣县扣了我三个多小时，我还以为一定露馅了，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想要把日记嚼着吃了，没想到那么难吃，实在咽不下去，只好都吐在了茅坑里。”

6月25日，他买好烟台去上海的火车票，打算走一步看一步，但因买的是软卧票，没有职务介绍信，不能乘坐。于是回到近海别墅，直到6月30日晚落入法网。

“深夜，我被送进烟台公安局看守所。这地方是我到过的看守所里条件最好的，每间牢房都带洗漱间，顶上是铁丝网，可以晒太阳。关到7月4号，我被押往北京。”

“同一间车厢里还有另一个乘客，是个小伙子，想必是早就被警告过，不看我们一眼，从头到尾在闷头大睡。旁边过道人来人往，也都避免看我们。白天，警察用车上的枕巾盖住我的手铐（真是欲盖弥彰！）；晚上就把我的一只手铐住，手铐的另一只铐在茶几的立柱上。一日三餐，竟让我自己花钱买盒饭，他们自己只吃随身带的食品，连盒饭都舍不得买；比起现在猖狂蔓延的腐化，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真可以说是无比廉洁了！

第二天上午，为首的武警少尉正在看杂志，忽然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身边，开始没话找话，问东问西，问那位少尉穿的是什么制服，等等。那少尉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支吾了两句，又低头看书。那女士勃然大怒——显然是故意找他们的麻烦——说‘我是当老师的，我教了这么多学生，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没礼貌的，跟你说话，你不理不睬！’说着说着，忽然从身上掏出一个证件给我看，说‘同学你看（她大概把我当成被捕的学生了），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东北××学校的老师……’话音没落，那少尉一把把证件抢了过去，几个人把乘警叫来，把她带走了。”

到京后，周舵被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关押在昌平的一个高级招待所。大门前有一个大鱼缸，养着荷花。他们住的地方是一座二层楼房，外观似中国古建筑，有雕梁画栋。但内部却是标准的双人客房：配有两张席梦思床，带卫生间，有电扇。他由一名公安人员陪住，并料理生活事务。每天定

时有人打扫清洁卫生、供应热水浴，电视节目，还有闭路电视。每日享受十元的伙食标准。

据在这里住过的北明回忆：

“除了林妹妹日日要喝的燕窝粥，连烤鸭也吃过一回。按老百姓的说法，真是终日有大鱼大肉、好米好面。……有一次早饭是‘煮灌肠’……西餐，时候不多。沙拉毕竟不如国菜地道，但猪排或牛排三五列在碟子里，用筷子夹了吃，也算是中西合璧的一种新式样。我一生中，连续不断地、长期地吃上等佳肴的经验，便只此一回了。” 每日不间断的水果有：苹果、梨、西瓜、广柑、橘子……按北明的感受，他们享受的是“部长级待遇”。如此一年半载的，都不用自己掏钱。

周舵是“和平撤离”的核心人物，无论对于哪一方面，都是有功之臣。但由于他拒绝说别人的情况，一度被转到顺义看守所：

“那个鬼地方，是我所见过的看守所里最肮脏的；一间十几平米的牢房，关了将近二十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拉肚子，不停地轮番在屋角的小便池里拉稀。每个人都在糊火柴盒，这样中午可以加餐；我拒绝加餐，当然也拒绝干活。最可恶的是，我有严重的胃溃疡，他们把我随身带的药没收了，不给我吃。

关了三天，我估计一处很快就会来人——看看我服不服。……果然，第四天上午，一处两位审我的警察来了，笑哈哈地问我，老周啊，你怎么样啊，还好吧？我心说‘好个屁’，脸上也笑哈哈地说，你们这叫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啊！好吧，你们也别费事了，给我纸笔，我给你们写就是了……”

写，可以给他周密思考的时间，避免陷入被“挤牙膏”的境地。事后，他与审查者相处不错，不仅有人帮他给家人传递信息，女军医还留下了家庭住址，嘱咐他出去以后再联系。

根据客房门后的一张“火警逃生图”，周舵得知，这个地方叫做“潮白河管理处”。

“7月中旬，看到新闻里那些对刘晓波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我很担心他会被枪毙；另一方面，我认为共产党不会垮台，而且，共产党垮台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并非好事，那种敌我二分的仇恨和对立不应当长期持续下去——套用雷蒙·阿隆的名言：面对六·四屠杀这样的非正义不愤怒，可以说是没心肝；无止境地只有愤怒和仇恨，可以说是没头脑——于是提议由我们四个人出面作证，说明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真相，交换条件是免于我们四个人、特别是刘晓波的刑事处分。这个提议居然被接受了——看管我的警察认为那绝对不可能；晓波后来告诉我，他获释前，他的预审员给他交了底，凡是在广场清场过程中‘立了功’的，一律不判刑。我的做法，是耶非耶，留给后人评判吧。”

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四人接受了当局安排的为天安门广场“清场”作证的电视采访。高新在被采访三个月后改监禁为“监视居住”；周舵在被采访后八个月——1990年4月被释放。但同样接受采访的刘晓波，一直被关押到1991年1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只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有“重大立功表现”，“免于刑事处分”，获得释放。

经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协议，侯德健离开使馆后没有被捕，但依然经历了“专案”审查。事毕，中国政府按承诺放侯德健回台湾，但并没有按中国公民待遇“礼送出境”，而是把他放在一条走私船上，让他“咋来咋去”——以非法“偷渡”的方式回到台湾。到达当日，侯德健就到台湾当地公安机关自首。1992年移民新西兰。

第三节 通缉榜

1989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对本次学运的骨干人物发出通缉令，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转发了相关通知。被通缉的人物有：

（1）王丹（2）吾尔开希（3）刘刚（4）柴玲（女）（5）周锋锁（6）翟伟民（7）梁擎墩（8）王正云（9）郑旭光（10）马少方（11）杨涛（12）王治新（13）封从德（14）王超华（女）（15）王有才（16）张志清（17）张伯笠（18）李录（19）张铭（20）熊炜（21）熊焱

在这个通缉名单中，属于北京大学的学生（除熊焱、王有才两位代培生外），标明的都是年龄，而不是出生年月日。其中王丹的标明年龄还比实际年龄大四岁，封从德的年龄“被刻意减小一岁”。除中央民院的王正云、北航的郑旭光、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治新、北大的熊焱外，其他人没有标明详细的家庭住址。其中唯一的外地学生李录，则不仅没有学校的系别和籍贯，干脆连年龄也是估算的。由此可见这份“通缉令”出台的仓促，以及有关单位的刻意保护。

周锋锁

据《人民日报》西安记者站消息，“通缉令”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仅仅1个小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周锋锁第一个在西安被捕。当地公安局称：

“昨晚7：00多，西安市卫生局干部周引荣（女）从电视屏幕上发现，通缉的在逃成员中有其弟弟周锋锁，便立即与在空军工程学院任宣传干事的爱人杨毅波商量，并一同向院保卫处报了案。他们准确地提供了其弟周锋锁6月7日由北京乘火车回到西安、现住在西郊三桥镇大光明眼镜店哥哥周建恩家中

的重要查缉线索。晚上8：20许，周锋锁被抓获。前前后后，仅用了1个小时。”

事后，周锋锁澄清，当时的情况是，他从北京返回西安后，藏在北郊。他的姐姐从东郊来看他，向所在单位要车时，不小心泄漏了真实意图，结果被秘密蹲点的警察开车带上她在北郊找到了弟弟。弟弟被逮捕后，官方“大义灭亲”的说辞又令他姐姐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不知情的亲友、全西安、乃至全国各地都有人写信到她单位骂她，使她百口莫辩，痛心至极。据说，她收到的这类信件有一麻袋之多。周锋锁出狱后，立即为姐姐作了辩护，并与姐姐坐在一起，拆开那些信件，一边读，一边流泪！那时，不明真相的痛斥，实际上已经化为一贴贴安慰剂，抚慰着姐弟心灵的伤口——弟弟没有罪！

图10-4：周锋锁

周锋锁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一年，后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获释，但未能继续学业。后与共同经历六四兄弟一起开公司，但被官方捣毁。1995年，周锋锁与妻子自费留学赴美，在餐馆打过工；1998年获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后在纽约一间金融公司工作，从事量化投资。长期收集八九民运史实，帮助六四受害者。2008—2011年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

熊焱

第二个被捕的，是北京大学的熊焱。

6月14日凌晨3：00，内蒙古公安厅接到宁夏公安厅通报：公安部通缉的北京“高自联”头头熊焱已于13日乘银川至包头的170次客车潜逃。内蒙古公安厅立即部署堵截。4：04，170次列车到达内蒙古丰镇县车站时，丰镇县公安局和车站派出所派出7名干警上车将熊焱捕获。山西大同铁路公安分局随即派人将他押回大同，转送北京。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曾播放熊焱在山西大同被押下火车的镜头：在几百名荷枪实弹戴着钢盔的士兵监视下，他大义凛然、毫无畏惧地走下火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熊焱在秦城监狱关了一年零七个月，1991年1月26日未经审讯获释，被开除学籍。他拄着拐杖出狱后，在家中休养了一年多，1992年6月“自深圳透过秘密管道逃抵美国”。

在美国，熊焱成为在流亡学生领袖中最早皈依基督教的信徒。曾就读于波士顿神学院，后在圣路易丝攻读神学硕士和哲学硕士学位。1993年底，他曾入美国陆军服役，1995年8月以士官军阶退役。1998年，熊焱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攻读神学，后成为美国驻伊拉克军队的随军牧师。他的教授女儿妻子钱立筠1993年赴美与他团聚，并在他退役后的一个月相继从军，受训后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兵营，负责部队行政工作，获上等兵军衔。据说，小两口来美后，“革命生产两不误”，已经育有两个孩子。

熊炜

6月13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的消息播出后，从北京逃至沈阳亲戚家躲避的熊炜及其母亲极为震惊。13日晚当，熊炜母子二人搭乘沈阳开往北京的254次列车打算前往北京投案。在列车上，当他们再次听到广播通缉令时，为防其他变故，母亲主动向所在的7号车厢服务员讲出实情，并请服务员立即通报列车乘警。见到乘警后，熊炜坦承自己是“北高联”头头，曾负责组织拦截戒严部队军车。乘警将上述情况向北京的戒严部队和公安机关作了报告后，在北京站与北京市公安局作了交接。

马少方

6月14日下午3：30，马少方也到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派出所投案自首。据新华社驻广州记者报道，马少方6月5日离开北京，先后到过南京、九江、南昌，于6月12日晚逃到广州，住在蟠龙旅店。14日，他见到报上刊登的公安

部门的通缉令中有他的名字，便作出上述决定。据马少方回忆，作出这个决定，心理过程是很艰难的：

“我真的一下子就傻了。后来当我终于有幸看到通缉令的照片时，我真后悔这天性懦弱的性格。如果我当时在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再认真地想一想，再从容些，多买几张报纸，看到报纸上用的那张我入学时的照片，我大概是用不着那样感觉到到处都是盯着我的眼睛的。”

“通缉令”上对他的描述是：“身高1.67米左右，较瘦，长脸型，尖下巴，肤色较黑，戴近视镜”。身着对襟的唐装，梳着背头，不仅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大，而且形象颇为儒雅。逃亡中的马少方，历经50天运动的打熬，加上日晒雨淋，显然已经完全退去这层文化的外壳。当时，他正好向林耀强留给他的地址——香港学联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幢楼房走去。他觉得周围都是怀疑的、警惕的目光：

“我终于没有上楼，而是立即离开了中大。对于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过处理这样事情的经验。”

“我是一个生性懦弱的人。这一点不仅从当夜与王丹握手告别时体现出来，也在我投案这一事件上表现得非常充分。我之所以选择投案，虽说有认真的思考，有对形势的判断，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总的说来，还是天性使然。我知道我不是个勇敢的人，没有王丹、刘刚、李玉奇、郭海峰那样坚强的脊梁。”

“我是带着恐慌的心理登上白云山的，在山上，我整整思考了三个小时，设想了无数种结局，但我知道，在口袋里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的支撑下，我连回到我熟悉的地方都不可能了。再说，在举目无亲的广州，我将怎样藏身，而如果被发现，必将连累一大批人。于是，我开始清理自己在整个运动中的所作所为，甚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所有的言论，自觉自己进去后，大概

不会有生命危险，最多也就是坐十年左右的牢。所以，在处理了身上所有的文件之后，我决定走进不远处的派出所去抗议。”

不知道当局是否对他的“主动投案”有些意外，马少方回忆说，在诸多被捕的学生中，他也是“第一个面对法庭审理”的：

“1992年以后，我曾从有关渠道获悉，鉴于我在庭上的表现，他们也立即做了庭审计划的调整。原来他们也是第一次面对我们这样的‘犯人’，也是准备不足。庭审调整为先开模拟庭，把我们这些对手在法庭审理中可能使用的应对手法和说辞，进行尽可能周详的模拟，这也就是他们常用的打有准备之仗的理论的再一次应用吧。我虽然在庭审前夜，因焦虑、恐惧而失眠，但当我将庭审的经验与李玉奇、张铭分享时，他们就比我坦然多了。”

[上一页][目前是第15页][下一页] 杨涛

6月16日下午，北大学生自治会常委会主席杨涛在甘肃兰州永登县吐鲁沟旅游招待所登记住宿时，经群众举报，被永登县连城林场林业派出所抓获。1990年9月获释，被开除学籍，赴广东经营计算机生意。

1998年8月，杨涛和马少方致信最高检察院及法院，要求释放王有才。1999年1月，他因公安骚扰而失去工作。5月5日，他因筹备纪念“六四”活动在广州被捕，稍后获释。19日，他因计划参加纪念“六四”十周年的活动，被广州公安局以“煽动颠覆”罪名逮捕。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犯“颠覆罪”。2000年1月5日，广州天河区法院以“偷税漏税”的罪名将他判刑4年。2003年5月19日，杨于广州刑满出狱，但一直被严密监视。后居上海经商。

郑旭光

1989年5月20日，戒严令发布后，担任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首任总指挥的郑旭光，于1989年7月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1991年1月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但于同年7月获释。

郑旭光出狱后，曾在北京商界供职。但仍致力争取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因此两次被收容审查。1993年11月14日与马少华等人在西安一间小酒店内举行异见者讨论会，并发表声明。声明称：“我们希望全体公民以理性和非暴力手段，团结争取人权状况的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十分差劣”。“我们希望全体公民团结起来，保障人权”。同年11月下旬，他赴京探望“和平宪章”的签署人，于27日下午2时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酒店拟探望友人之际，被公安人员带走，解回西安。1994年2月26日获释。同年5月26日，他与王丹、马少方、翟伟民、邵江、李海和郭海峰联署一封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信，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给予重新评价，释放因这个事件至今仍被关押的人士，抚恤死难者的家属。1995年5月26日，他与方政、方蒙及吕江台因筹备发表公开信被捕，稍后获释。后在北京市开出版公司，活跃股坛。但长期受监视。

王正云

北高联常委王正云于1989年7月在云南省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91年7月刑满出狱，被遣送回原籍。此后，王正云在山东当推销员。1998年因参加山东“中国民主党”被指参与非法社团活动被捕，其后获释。2004年曾参与声援“中国民主党”人的绝食，2004年参与纪念“六四”15周年的绝食。2006年接受封从德“六四口述实录”采访时，他正在云南红河州金平县务农种植香蕉……

王有才

1989年8月，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被捕，到1991年4月，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91年1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次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1991年4月被转往浙江第四监狱。1991年11月因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访问中国，列入其要求释放的三人名单之一，而后获假释。

1998年6月25日，王有才与王东海、林辉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当天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前往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申请注册。29日下午，公安人员将王有才从杭州的家中带走，在拘禁8小时后予以释放，公安警告他停止一切有关“中国民主党”的行动。30日，他与王东海前往浙江省民政厅登记，但民政厅表示无此先例而不予受理。7月10日晚上，他在家中被公安“刑事拘留”。12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有才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次年1月送押于浙江衢州浙江省第一监狱。2004年3月4日，王有才获准赴美保外就医。

张铭

原天安门广场纠察总指挥张铭1989年9月在深圳被捕，与郭海峰等人同为秦城监狱“囚友”。1991年1月，张铭被控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同年4月与刘刚一起转往辽宁省凌源第二劳改支队九大队一中队囚禁，遭受过电刑、毒打和一丝不挂在雪地挨冻等肉体摧残。1991年6月获释，曾与马少方一起在北京工作及在上海市经商。2002年9月9日，国家安全局声称张铭“涉嫌计划爆炸大楼”，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他刑事拘留。上海公安局在10月16日改以“职务侵占罪”将张铭逮捕。2003年9月26日，上海市中级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对张铭判处有期徒刑7年。由于张铭抗议审判不公并绝食，他曾经被用绳子捆绑在床上113小时，期间不能自己洗脸、刷牙、大小便，人格尊严备受侮辱伤害。为了抗议对他的诬陷判刑、司法程序不公，张铭于2003年11月18日开始在上海狱中绝食至2004年4月中旬。2006年获保外就医。

翟伟民

逃过了“六四”追捕的翟伟民，由于在“六四”一周年前夕组织抗议活动，于1990年5月在新疆被捕。1992年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先囚于秦城监狱，后转往河北省第一监狱。1993年9月13日获释。1994年3月再被捕。

同年5月26日，他与王丹、马少方、邵江、李海、郑旭光和郭海峰联署一封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信，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给予重新评价，释放因这个事件至今仍被关押的人，抚恤死难者的家属。1998年10月23日，他和其他三名河南异见人士签署一份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的申请书，寄到北京的中国民政部及河南省民政厅。1999年1月26日早上8时，翟伟民被新安公安局人员从家中带走，此后被公安列入长期监视名单。

在“六四”15周年之际，翟伟民曾表示：

“这15年当中，我们感慨颇多，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这么长时间了，我自己总感觉到头上有一张无形的大网罩着自己，说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找谁去解决。有些东西，政治上并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人的观念、有些人的认识，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有时候，感到非常的压抑，自己也感觉无能为力……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确确实实考虑过出去。出去的话，起码思想是自由的，言论是自由的，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可是，我们的朋友都建议不要走，不愿意看到国内的人越来越少，一个一个出去。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大家都劝我不要走。我呢，确实也不愿意走”。

工自联人士

6月14日，公安部又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对“工自联”三名骨干的通缉令。他们是：（1）韩东方（2）贺力力（3）刘强。

其他

据新华社消息，自6月4日起，戒严部队和北京市公安局捕获犯罪嫌疑人批次如下：

6月6日，捕获28名企图焚烧朝阳区和平街北口公共汽车的犯罪嫌疑人；

6月6日晚，捕获6月3日晚在复兴路北京铁路局门前烧毁多辆装甲车、汽车；6月6日晚8：00，又混入军事博物馆，企图再次烧毁军车的河北省固安县农民路中枢。

6月10日，自6月3日至今，已捕获包括“高自联”和“工自联”骨干在内的400多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6月3日晚在陶然亭路口用武装带痛殴戒严部队战士的班会杰；6月4日晚在天安门前被捕的高自联常委兼秘书长郭海峰；6月6日晚，在西单路口焚烧了一辆被用做路障的无轨电车的王连喜。

6月10日，4月27日傍晚，乘大学生上街游行、交通秩序混乱之机，携尖刀闯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邮电学院储蓄所，抢走近6万元人民币的罪犯金文成、张晶（女）、李龙男被执行枪决。

6月1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逮捕：

——放火犯路中枢、张文奎、王连喜、栾吉奎、祖建军、林昭荣、陈坚、王汉武8人。其罪行为，6月3日至6月6日分别在西单、崇文门十字路口、右安门外大桥和公主坟一带，焚烧军车、公共电汽车、救护车，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抢劫犯罗红军、龚传昌、廉振国、孙彦财4人。其中仅罗红军一人，就抢得军棉大衣、军装、士兵证等80余件。

——残酷殴打解放军战士的班会杰。

6月14日下午，“工自联”头头贺力力的联络员、北京“工自联”B队成员贺群印和A队骨干尤建齐在西安被抓获归案。

据新华社北京消息，截至6月16日，北京已有109人陆续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中有“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及骨干成员；“市民敢死队”、“市民自治会”等其他非法组织成员；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等。报道称：

“他们有的交待了参加非法组织，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有的交待了参与殴打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的罪行；有的交待了参与烧砸军警车辆、抢劫、藏匿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的犯罪事实；有的交待了参与冲击党政机关以及造谣煽动、印发张贴反动标语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的还交出了在暴乱中抢劫和藏匿的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工自联’敢死队骨干成员李江，6月11日在电视录像中看到自己正扒在坦克上向解放军战士行凶的镜头后，立即到朝阳公安分局投案自首，交待了他5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工自联’敢死队的事实和6月4日在广场参与烧毁一辆坦克、3辆军车的罪行。……平谷个体运输户王福顺、李美福、杨洪武6月3日在马甸桥北驾车设路障截军车，致使31辆军车受阻，20辆军车被烧。6月10日王、李、杨3人一起到西城分局德外派出所投案自首，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判处一批“反戒严”活动中打砸抢烧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其中有放火犯林昭荣、陈坚、祖建军、王连禧、王汉武、张文奎，抢劫犯罗红军、流氓犯班会杰等八名罪犯，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消息称，他们的身份，或是本市农民、工人和无业人员，有的是外地流窜犯或农民，其中有多人因各种违法行为被处理过，或因犯罪潜逃来京。

图10-15：6月18日被判死刑的8人

6月17日，新华社报道：白信禹、杨毅军、杨恩森、吴让元（女）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其中61岁的白信禹，曾因流氓、杀人未遂等罪行先后多次被劳动教养、判刑。6月4日，他“窜到木樨地桥西侧，用军苫布、棉裤先后烧毁戒严部队的装甲车两辆，并抢得军用雨衣、皮带等军用物品带回家中，同时还在现场造谣惑众，散布反革命言论”。杨毅军是北京科技大学分校矿冶系87级学生，6月3日晚11：00，在石景山区老山路段向受阻的戒严部队军车投掷石块，后用汽油点燃棉丝将12辆军车烧毁。杨恩森是北京市第六建筑公

司工人，6月4日早8:00许，见几辆军车停在老山马路中间，大呼：“城里的军车都烧了，这些车还留着它干什么？”一连喊了四五遍。之后，几个暴徒便将这些军车烧毁。现年46岁的吴让元，是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实验师。被群众检举自6月3日以来，“先后在西单、六部口一带造谣、传谣，进行煽动，并于6月6日晚煽动一伙人冲砸交通中队，说里面驻有防暴警察。她还造谣说军车不是暴徒烧的，是军队自己烧的，并在西单路口对一些正在推车设置路障的人说，你们不能横放，要竖着放，这样军车才撞不翻。当一些暴徒烧车烧不着时，她又大喊，铁皮点不着，轱辘上才能烧着呢”。198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污损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 余志坚等三名罪犯被判刑》。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煽动罪”。其中余志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喻冬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鲁德成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第四节 “精英人物”

八九民运不光是学生的运动，也是新闻、文化知识界和政商精英参与或插手的运动。在“四二六”社论中，他们被称为“长胡子的人”。“六四”事件后，他们大多数遭到了清查、整肃，乃至被逮捕的命运，有的还踏上了逃亡之路。

严家其

与包遵信一同被社科院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严家其，在4月底就与包遵信有一个约定，即只要是他们之间任何一人起草的声明，都可以代自己签名。事后很多以二人领衔的文告，对方都不一定看过。但正因为如此，世人留下了严家其、包遵信联合行动的印象。事实上，在整个运动中，他们虽有交集却很少在一起活动。不过，在重要决定上，互相是通声气的。

据严家其回忆：

“1989年6月3日晚7：00，听到电视新闻广播，要求市民留在家中，但广播中没有公布‘要求市民留在家中的时间限制’，当时我就感到奇怪。从我家东总布胡同14层楼阳台往外看，看到建国门立交桥处聚集了千计人群，于是，我与高皋就到立交桥看。在立交桥，是市民阻挡军车前进，与车上的军人谈话、辩论，没有任何暴力因素，十分和平。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概9：30，我们回到家中，不久接到赵瑜电话要我去广场，参加‘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我与高皋骑自行车到广场。到广场的一个‘大帐篷’前，张伯笠宣布，我为‘民主大学’名誉校长，并让我讲话，我讲了大概40分钟。讲话后，发现怎么也无法离开，因为大帐篷前有数千非常拥挤的人群。”

“高皋说走不了就留在这里听别人演说”。她希望在广场待到天明。但严家其怕晚上休息不好，影响第二天的事，然后走进“大帐篷”说要回去。有人替他们拆开了缝合帐篷的线条。他们从那条缝隙中离开了拥挤的人群。有几个学生一直将他们送到历史博物馆前。

二人推车回到东总布家中，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

“6月4日凌晨，我们被持续、密集的枪声惊醒。我家住在14层楼，在阳台上可以看到长安街，在建国门立交桥上开动着坦克和军车，到处是机枪的闪光。往长安街天安门方向看，也是不停的闪光，机枪声愈来愈密集，后来又传来了坦克的隆隆声。我悲愤交加，心痛欲裂。天还蒙蒙亮，有几位整晚在长安街的朋友来到我家，讲述了他们亲见的屠城场面。他们满怀惊恐，含着热泪。最后商量说，希望我离开北京，以免被乱枪射杀。”

严家其离开前，曾每隔约一个小时给包遵信打一个电话。最后一个电话算作告别。据包遵信回忆：

“6月3日夜，严家其给我来过三次电话。第一次是11：00左右，说他们刚从广场回来，广场上气氛紧张，估计军队要强行进驻。12：00多又来电话，

告我建国门桥上枪声大作，市民与军队打起来了。最后一次已是4日凌晨1：00左右，我已经躺下了。他在电话中问我怎么样？有什么事没有？我说：我没事呀！他说，那好，请你多保重。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不是告别的口吻吗？”

这是严家其决定出走的时间。之后，在朋友的陪同下，严家其赶往北京站：

“这时，乘火车没有目的地，我熟悉江苏，就买了去江苏的火车票。我想，半个月或一个月后再回北京，大概会被开除党籍，受到批判，不至于被捕。”

在江苏，严家其在电视上看到了通缉21名学生的消息和画面。第二天，又看到通缉“工自联”头头韩东方等人的画面。自此以后，他“每天注意收看电视新闻”。

严家其回忆道：

“6月11日，公安机关发出通缉方励之、李淑娴的通告。6月12日傍晚，我在收听《美国之音》时，偶而听到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消息。消息说，杨尚昆提出要把方励之、严家祺、包遵信捉拿归案，并把这三人处死。当时，我并不太相信台北广播，但从这时起，意识到自己有危险。第二天早晨7：00，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十四号通告，宣布‘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合会’等为‘非法组织’。通告说：‘上述非法组织，参与了在首都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登记、投案自首。’‘对拒不登记、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

听到这个“十四号通告”后，严家其决定逃亡。当时，他并未想到去国，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也没有这方面的渠道。他只准备到“人烟稀少的山区暂住”。正好这时，妻子高皋准备到江苏看他。高皋离开东总布胡同的家时，

电话铃突然响了。当时，高皋还犹豫了一下，接不接这个电话？最终她向铃声走去……

正是这个电话，给了严家其逃出生天的机会。

当时的严家其，就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里。他并没有去找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舅父。与妻子汇合后，他们立即用高价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

从火车上下来的严家其，已经活活变成了一位“济公”：

“我知道当时已开始通缉我了，出广州站时，我让高皋一人先出站，我等到最后，一手端着一大茶杯水，另一手摇着一把破旧的芭蕉扇，一条裤管卷到膝盖上，一条裤管垂到膝盖下，摇摇晃晃走出检票口，居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顺利出了车站，在约定点地方，见到了来自香港的林道群。”

林道群和他的朋友李志华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接严家其夫妇的。他俩当时也被跟踪，险像环生。但他们一次一次机智地躲过了危险。

图10-16：通缉令下的广州站

他们原计划在6月17日偷渡去香港，但这一天，广州通往黄埔港码头的道路突然增设了十六条封锁线。他们不得不重作安排。严家其回忆道：

“我与妻子高皋、社科院一位年轻同事，一行三人，从广州出发，前往海边，准备偷渡香港。我们同行的是两辆车，前一辆是‘探路车’，我们坐后一辆。经过东莞、樟木头，在一家旅馆门前停下，我抬头一看，门上写着‘阅港旅馆’四个大字。我们下车后，进入了另一辆新开来的车，更换了司机。一个多小时后，在澳头海边停下。”

“探路车”与“换车”，大概都是为甩脱跟踪而进行的“技术设计”。此后：

“一位穿着黄色雨衣的人，手里拿着一条烟，带我们三个‘偷渡客’步行到海滩，上了一条快艇，当他把那条烟丢向岸上时，没有人说话，快艇就乘风破浪飞速前进，我们的衣服从外到里全部湿透，海水非常咸，蒙住了眼镜。一个小时左右，穿黄衣的人与我们三人登上了一个海岛。我这时才注意到，黄衣人并没有驾驶快艇，还有另一名船工是驾驶员。到荒岛上后，黄衣人告诉我荒岛上没有野兽，我就开始四处察看。在沙滩后面，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山丘，陡直而不能攀登。岛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有一处有一个山洞，附近有水坑，里面是淡水。往远处看去，可以见到几个小岛、灯塔。黄衣人告诉我，荒岛叫‘筲格仔岛’，远处的灯光就是大亚湾核电站工地。

下午7：30，黄衣人与船工开快艇回澳头，说是拿晚饭给我们。这样，在大亚湾荒岛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偷渡客’。”

6月19日0：00左右，黄衣人和船工给他们带来了盒饭。荒岛上十分安静，突然，一艘船向荒岛驶来，严家其下意识中感到是警察来了。但黄衣人却向前跑去，用命令口气大声叫对方立即上岸，结果，那艘船却掉头迅速离去：

“当一切沉寂下来后，涨潮声愈来愈响，我们就在月光下，坐在沙滩上，面对大海聊天。天色微明，我们三位‘偷渡客’登上了一艘大马力船。前面还有几艘船探路，我们不时听到几艘船之间的电话联系的呼叫声。”

显然，“专业”人士介入了行动。“黄衣人”扔在海滩上的那条烟，很可能就是部分定金。但是在大陆与香港水域的分界处，他们一行乘坐的大马力船与香港方面失去了联系：

“船停在水面上颠簸不已。当一艘船从远处驶过时，船工担心香港水兵会看到我们，要我们平卧在甲板下。甲板下面非常潮湿，而且还有一层薄水。我们遵命平卧着，透过甲板一条很长、很宽的‘缺口’，可以看到天空，随着船只的晃动，我觉得胃在翻动。

后来我从报导中知道，曾经有一艘偷渡船把甲板钉死，没有那条‘缺口’与外界相通，因为‘偷渡客’很多，非常拥挤地聚在一起，时间过长，大部分人就在甲板下闷死了。”

“1989年6月19日，就在我们偷渡进入香港的当天，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发布了《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规定》。规定海关工作人员执行缉拿任务时，非开枪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为时，可以开枪射击。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我们偷渡香港，船上没有武器，也没有走私货物，但在海面停留时，船工要求我们三人把随身带的全部行李沉到海中，衣服口袋里不留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纸张和电话号码。如果我们被捕，就说是随同朋友到海上玩的。我与高皋迫于无奈，把我们的全部行李沉下海底，另一人则不然，他说他带着到美国一大学读学位的文件，绝不能沉下海底，由于他坚持，他的行李没有沉下海底，平安地带到香港。”

大概不是巧合，也是从6月19日起，北京机场、深圳车站和许多地方都张贴了一份“七人通缉令”，严家其、包遵信、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等名列其中。

当天上午8：00，船在香港靠岸。社科院文学所的苏炜前来迎接，由法国驻香港副领事开车，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住下。他们被告知，因“偷渡客”的身份，不便在街上行走，否则会被警察查问，可能被押回大陆。

图10-17：《明报》1989年6月22日第一版报道：杨李力主处死严家其

6月22日，香港《明报》头版头条刊出了《乔石李鹏覬觞总书记，杨李力主处死严家祺》的报导。这一天上午10：00，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国驻香港领事馆官员把严家其一行三人带到港英政治处的一个机构。

“我们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为我们是‘非法入境’，必须到其他国家去，法国政府欢迎我们三人去法国。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在港英政治处，当时就照他们的安排，我们三人改了姓名，换上了一身他们要我们穿的衣服。我改名为‘朱丰’、高皋改名为‘白芳’，另一位社科院同事改名为‘史英’……港英政治处的警察将带着我们三个‘假警察’在机场‘执勤’，我们每人手里拿一个‘对讲机’，做四处巡视的样子。经过一个单向转动门、一个铁门，就到了机场……”“下午7：00左右，我们三人在机场等候时，听到广播中刘宾雁在香港说，严家祺现在在香港，在一安全处，这是比刘宾雁本人安全还要安全的地方。在听到刘宾雁广播讲话后一个多小时，我们三人乘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印度新德里停留后，飞往巴黎。我的登机证上的名字是Yip Paul，后来我知道，这是法国一位精通中文的外交官的名字，曾任法国驻北京公使。”

严家其一行到香港的第三天，万润南便到住地看望了他们。以后，在巴黎成立的“中国民主阵线”，二人先后担任第一、第二届主席，也成了政治竞争对手。

万润南

万润南是6月6日离开北京的，因为有IDG国际会议的邀请，所以有现成的赴港签证。他没有经历逃亡的惊险，但此前他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据他回忆：

6月3日晚，当木樨地已经发生激烈冲突时，他正在出席芬兰大使官邸举行的酒会。他离开时，已近午夜，长安街上除了军车和坦克，已经很少其它的车辆。他的座车，一辆白色的丰田皇冠，孤零零地行驶在大街上，但车后一直有一辆黑车尾随：

“上了西三环北路，快到家了，小籍为了甩掉尾巴，机警地把车开进一条岔道，并熄灭了车灯。黑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发现目标走丢了，居然掉过

车身，在大街上逆行而来，当两车几乎面对面时，小籍突然打开了车的大灯。对峙了大约有一分钟，对方有点不情愿地离开了。我感觉到有一张大网，正在收紧。”

他已经收到这一天曹思源失踪的消息。

6月4日是星期天，万润南和公司主要干部依然上班，与平日处理事务不同的是，工作内容是查询各部门员工的安全。收到的报告是，有一个部门的“王超同学今晨在长安街骑自行车时被子弹击中丧命。中枪的伤口在正面额头，戒严部队的结论：暴徒！据说他们当时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是背后中枪：被误伤的群众；如果是正面中枪：暴徒！”

“我不断接到匿名电话，接听时就是一句话：‘赶快走！你随时有危险！’从运动一开始去北大看大字报被拍照留念，到首都饭店彩虹厅的黑衣人高举录音机打招呼，到6月3日上午曹思源的失踪，到当天晚上和逆行的霸王车对峙，我很清楚自己已经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而且，他们马上就要下手了！

我一直困惑是谁给我打了这些报警电话。现在我有点想明白了，我认为正是监控、跟踪我的国保人员，只有他们最清楚我的处境，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下手’的指令，他们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希望我能配合……”

万润南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像这类抓了没法判的人，你逃跑实在是一件“公私两便”的事情。人都有“安全第一”的意识，在这方面，政府只要做一些成本极低的暗示，就会唤醒人的这种意识。

6月6日下午2：00，万润南使用胞弟的证件办理了登机手续，去机场前，还把段永基、李文俊、储忠三位公司骨干叫到车上。虽说只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先去南方看看”，但还是正式“签署了一份授权书”。

6月8日清晨，万润南从蛇口坐第一班船到了香港。此前一天，他不仅召见了四通公司在南方的几员大将，还会见了他的校友、时任深圳大学校长的罗征启。他承认，“特地避开罗湖海关，选择了相对冷清的蛇口海关，算是用了一点小小的心计。”6月9日，登有他名字的正式的通缉令就到了海关。当天，凡是四通公司的普通员工，都在机场被截留、禁止出境。

戴晴等

1989年4月27日，戴晴在“大游行”的队伍中曾遇到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那时，她就曾对那位记者说过：

“今天政府如果对学生镇压，我就退党。”

但政府对“四二七”大游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没有给戴晴实践诺言的机会。“六四”事件爆发后，在接受香港及东京等地媒体的长途电话采访时，她终于得以宣告，自己已“决意退出中国共产党”。6月5日，她向所在单位《光明日报》社的党支部递交了退党申请书。

据官方透露的资料，在此之前，她曾试图策划组织知识界人士“联名抗议政府对学生和平请愿的镇压”，但未能成功。2016年夏，笔者通过当事人接触到《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方得窥此事的全豹。下面是“手稿”的交代：

“1989年12月28日第一次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员手中看到王培公6月4日起草并在电话中读给我听的那份《我们抗议》。对这份文稿，当时虽然听了一遍，我后来所能记忆的仅是‘我们抗议’和接下来的排比着的‘国耻、军耻日’等。我还记得的是，即使在当时那样冲动的情况下，也觉得他的有些戏剧式用语有再推敲的必要。例如，在请他去与梁从诫商讨这份文稿的同时，我打电话给庞朴、郑万隆、郁风、蔡崇德（冯友兰女婿）、丁聪等人征集签名时，他们当中有不只一人问到‘具体文字’。我回答的都是‘没有定，正

在商量’。也就是说，我当时是不同王稿中的一些提法的。可惜我不能确记他们当中的谁这样问我了……”

在另一份交代中，戴晴进一步解释了此事的下文：

“……王培公打电话给我，说 he 已起草了一份抗议信。抗议政府以武装部队屠杀平民，定6月4日为国耻日。我表同情，请他与住他家附近的梁从诫再认真商量一下。我这就联系作家艺术家联合签名。接着，我给郑万隆、郁风、庞朴、冯友兰的女婿等人打电话。他们有的同意有的拒绝，有的先同意后又拒绝。最后郑万隆哭着劝我千万别再作这样的事了。到中午的时候，王培公又打电话来，说他与梁从诫也说好不必发了。此事到我作罢。”

言下之意，这件唯一有可能使戴晴罹罪的“义举”是一个“未遂”事件。扑灭此举的，显然不是她征求意见的那批知识分子，而是“六四”后进入政协的梁从诫。戴晴之所以要把王培公介绍给梁从诫，一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近；二是梁从诫的家里，打印机、复印机俱全，制作宣传品不必求助于单位才买得起的设备或世面上的商铺，又是一个便利。

但读罢这些材料，我对戴晴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未遂”事件，公安局预审员是如何得到王培公的手稿的呢？既然作为此事的“策划者”，您直至12月28日才“第一次看到”王的手稿，那么，王的手稿又是谁交给公安部门的呢？

27年后的戴晴，似乎已经不记得这个情节了。她问：

“难道王培公也被抄家了？”

为了寻找答案，我继续搜索这批档案中关于梁从诫的蛛丝马迹。以后，我又发现了这样的记载：

“……如需要，请专案组在向他取证时询问他这次通话的内容。梁从诫家中电话：352560。他是新增的政协委员，可向统战部和公安部了解他的情况。”

看来，这是戴晴所知道的两个了解梁从诫的单位。那么，梁从诫与统战部是什么关系呢？笔者手头正好有一套新出的阎明复的回忆录。在专门辟出的“大百科全书”这一章里，阎明复对梁从诫用字吝惜，仅仅引了一段别人的文字，介绍了自己当初“招降纳叛”这位“名门之后”的情况。戴晴的上述档案中，只有一段难得的文字，专门讲到她和梁从诫、阎明复的关系：

“第一次见到统战部长阎明复是在4月29日，统战部六局召开的冷餐会上。在此之前，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那是因为1987年初，我开始与不少台湾文化界著名人士往来，我觉得这情况应让组织和有关方面了解。但由于不愿让台湾方面的人知道我和统战部的联系，故这封信是请阎部长的私人朋友梁从诫去转交他的。”

“私人朋友”的提法，显然无法自圆上述“向统战部”了解情况的建议。但话说到此，笔者已不便追问。但是，即便如此对组织负责，戴晴还是被捕了。而且一捕，就关进了秦城监狱。时间是在1989年7月14日。

此前，众所周知的是，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也点了她的名；她也“通过不知拐了多少弯的关系”，看到了公安部门第三批逮捕名单中有她的名字；事发的前一天，北京市公安局的人还专程扣门求见，问东问西之后，还明确问她“明天在家么？”

但是，她决定：“我哪儿也不去。”

“上午过去了。下午，一名居委会老太太敲门，让我填写一张计划生育的表。她面颊通红，额头上满是汗珠，我想这肯定不仅仅是爬楼的结果。18年前，当时的军管会拟以‘现行反革命’捉我时，派来打前哨探虚实的，也是小脚侦缉队的骁勇，不过那次的名义是‘查卫生’。

我笑了，对她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必亲自跑，打个电话让我去趟居委会不就行了？她红着脸不答。虽然在机会合适的时候我常喜欢刻薄刻薄官员，打趣老人却从来不是我的习惯。但那次还是忍不住加了一句：‘您忘了我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了吧？’

太阳渐渐西沉，我等得有点枯燥，曼殊的‘踏过樱花第几桥’也读不下去了，于是跑到附近鱼塘，和我的一个朋友养的一群高大的良种狗玩了一个钟头——不知此刻警察朋友有没有尾随而至。我当时确实很注意地看了看前后四周，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天完全黑了，那晚上我们这一片住宅区拉闸断电。”

戴晴被带走后，她被告知，因“涉嫌动乱”被“收容审查”。在有关文书上按下手印以后，她的家被抄了。

在秦城监狱，通过她使用的饭盒上挂的小牌子上的一串数字，以及她牢房门和后来专属的放风小院门上相同的数字，她得知，自己的编号是8917。她意识到，自己是89事件被关进秦城的第十七位囚犯。

初次交道，有些令人尴尬：

“我被命令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而提问者则在正对面一张高高的讲台后边——‘这是为了给犯人一种精神上的威慑。’我想。我曾经是公安部门电视监测系统的技术员，不由自主地就开始找这间屋子有没有摄像机窥孔。我怀疑它们就装在那俗艳的、安装位置颇为蹩扭的壁灯中间。

问话之后，一名高大的女性管理人员进来，开始清点家里为我带来的衣物并搜身。除生活必需品外，裙子、香水、薄连裤袜，还有一小瓶片仔癀护肤蜜等‘奢侈品’都被挑了出来。我想我以后是和女性细腻雅致的生活绝缘了。后来知道，这其实不确，不允许带进去的，只是玻璃瓶装的、可以拉成

长条的、太过花梢和袒露的物品。前两样可用来自尽，后一样可服务于性挑逗。手表也不行，有助于越狱。

我最后瞥了一眼腕上的小表，10：30，然后摘下来，交了。

我的牢房很大，大约二十平方米左右，几乎是正方形的。记得当时第一个反应简直可以说是惊喜。因为牢房里只有一张用两条矮凳架起的木板床，屋角还有一间小小的盥洗室！天花板很高，大约有三点五米的样子；电灯直接装在天花板上，不但罩着磨砂灯罩，罩外还有铁丝网罩。两扇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窗子，开在距地面一点六米的高度，窗台是斜的（无法用手攀着爬），窗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磨砂玻璃窗。玻璃窗不是一般的左右对开，而斜着向上开。也就是说，你既使长到穆铁柱那样的个头，向外看也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牢房内非常清洁：墙壁是新粉刷的，靠墙的三屉桌上放着一个新的塑料面盆，盆里是新的搪瓷喝水缸、刷牙缸，大小各一只饭碗，和一把塑料羹匙；新的毛巾，新的牙刷，新的肥皂——当然是粗黑的洗衣皂；被子、床单和枕巾也是新的；褥子是那种薄薄的士兵用褥，旧的，但拆洗过，且铺了两条。”

后来，戴晴慢慢地知道，前人大委员长彭真，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前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还有前辈作家丁玲，住的都是这样的牢房。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又是‘踏着先辈的脚印走’了。”

“我仔细察看被子上打的印章和喷在桌子侧面的字，知道这里是‘中央公安部’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监狱，又使我安心不少。躺下来之后，因为通宵不能熄灯，我又把牢房仔细打量了一番——我就是在这时注意到那窥视孔的。还注意到铁皮门外，另有一道铁栅门，那栅直径足有二厘米。两扇门上都有送饭的小方孔。牢房内有暖气设备，但加了铁网外罩；坐式便池上没有垫与盖，墙壁和水池的直角都被打圆——也就是说，这种种措施所保证的，是关在里边的人，第一，别想跑掉；第二，别想自伤——包括上吊、触电、

撞头等等。至于像基度山伯爵那样打个洞去会他的老师，甚至装成死人逃出监外，只是小说家的幻想。

所有这一切设施再加上24小时六班不可间断的监视，几乎无懈可击。我以为，这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极必要的，比如用来对付那些心里怀着可怕的、重大的秘密的人。在政局每隔七、八年总要荡一荡的当代中国，这样的人恐怕不会太少。”

第四天，戴晴可以看《人民日报》了。她回忆道，她这一辈子也没有像那几天那么仔细地读过报纸，“连广告上的厂家地址都细细读过。”

对于听广播，她觉得“你不能选择听什么，但你可以选择不听”的规定“特别仁慈”。

“第七天，大兵砰的一声把牢门打开，喊了一声：‘放风！’

放风的小院和监房面积差不多，也是一间间排着，中间隔着大约四米高的墙。如果从上边俯视——押解大兵们就正在这样的位置来回巡逻，并以这样的视角看我们——非常像动物园关猛兽的隔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正像狮虎那样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小院里有草还有苔，在每天的两小时的放风中，与我为伴的小友，有蚂蚁、蟋蟀、蚰蜒、蜘蛛和蜗牛，偶然间还会飞来一只大蝴蝶。但灰喜鹊只喳喳叫着从空中掠过，抛下片片美丽的蓝灰色软羽及硬羽。我把它一一拾起，在院角堆起一个小小的羽冢……”

戴晴在八九民运中的行为都是公开的，因此，的确没什么可交代的。闲暇对于主人公或许是一种折磨，但若非如此，我们很难看到这位作风号称强悍的巾帼，还会留下这些非常女性化的、细腻的记录。

“大约在入狱后四个多月时，我的生肺癌的公爹病在弥留，监狱方许我到医院向他做最后告别”。戴晴回忆道：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经瘦成几乎透明的手，不再顾忌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爷爷……’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弱、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医生、护士、医院保卫部门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监狱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咱们……顶得住。’

那时是1989年底，“六·四”之后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说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可信赖，可以毫无戒备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数十年的渴望有了归结，我数十年的孤苦无依得到了补偿！

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有谁的父亲能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坚强仁慈，谁的父亲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无畏？”

戴晴有过四个父亲，其中一位养父，是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也是文革后曾经最有权势的人。但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庇佑自己的女儿了！还有什么能保护她呢？法律？那个过去连她自己也不相信在中国还算“回事”的东西，此刻，她已经不能无视它了：

“我要紧紧地抓住它，因为，在今天这局面下，如果说有什么可以保护我的话，只有它了。”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2条中“对被告人在侦查中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她是7月14日被捕的，但9月14日过去了，她的案情一点动静也没有。她开始将研究法律，希望从中找到“无望”的边界：

“仍依据该法第92条，如果因‘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者’，则需报检察机关延长一个月，也就是说可到10月14日。……

如果公安部门的调查到此时还下不了结论，怎么办呢？第92条又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依照前款规定延长仍不能终结，由高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延期审理。”

她开始向家中索要法律方面的书籍。丈夫王德嘉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的想法：

“他找到书送来，专案组也允许我收下。在短短的几句附言中，这不善辞令的人切切提醒我的是：‘法是法，社会是社会，保住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我哭了，为他的焦灼和无助，为他不得不退守到最底线的悲哀，也为我们多年共同生活的默契。我在自由的时候常常忽略我的这名最亲近的人，在狱中倒老是为他哭，只为他一人。”

戴晴开始真正细读《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她第一次感到：

“这三部《法》，竟字字句句都是保护我的。就算拿出鸡蛋里挑骨头的本事，也找不出对我不利的条款，包括那著名的第102条第二款——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我没有写标语，也没有发传单，但在102条中有‘其他方法’四个字。虽然我的作品都与煽动无涉，且都是由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经政府注册的正式部门出版发行的，但要给我定罪的人硬把它归到‘其它方法’中去，我也没有办法。不幸的是，《刑法》对于‘反革命罪’，还有一个‘两条缺一，

就不能构成’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拿住了我的作品这一‘客观行为’，还必须有推翻现政权这一‘主观目的’。这对我太有利了！”

“我这人是最不主张‘推翻’什么的。这信念在心头的明晰来自已故的黎澍先生。他在回答我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这事，若有可能，顶好还是不改。’我当时真是体验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快乐。1988年来，中国学界自发地开始了近代以来第三次大论争。这第三次是大民主与开明专制之争。……到后来，当局面变得非划出阵营不可，以昭彰一批小丑的过街老鼠之态的时候，我终于成了‘开明专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接着又被著名民主斗士许良英先生讥为‘筹安君子’。其实对当今中国的专制统治，我的评价并不比大民主派要好，批评起来也往往显得比他们更率直一些。但我觉得革命（也就是推翻）比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要可怕得多，对中国的损害也大得多。基于此，从4月28日我就劝学生复课，直劝到5月19号，从没有改过口——我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具推翻的‘目的’。

如果第102条挂不上，会不会扯到第98条呢？也就是说，我本人虽没罪，但我的朋友们“有罪”，于是硬把我归进一个‘集团’。我这样想并非没有根据，自7月份以来，报上一共点了我五次，而且老是把我与固定的几个名字点在一起。更况且，这种‘集团定案’法，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1986年，在为已故的胡风先生补行葬礼的时候，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十多名当了三十年共案犯的‘胡风集团犯罪分子’们，竟是头一回见面。

我期待着公安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为我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但若不可能，我期待检察院依该法第101条对我‘免于起诉’；但若仍不可能，我只有寄希望于审判了。我确信，如果形势到了这一步，那审判准是走走形式。也就是说，审判的结果早在侦察前就做出了。我能最后搏一搏的只有依照该法第111条和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先生最近的讲话，坚决要求公开审理。不错，我是被冤枉了，对此我无能为力；我能争取的，只是让世人知道我的冤情和我的反抗。”

“至于政府为我指定辩护人，我是绝对不要的。我可以想象他们怎样以‘认罪态度尚好’来维护我。而这种维护，对我说来，无异于羞辱。”

她等待着起诉，并决定由她的丈夫和她自己来担任辩护。

不久，她又开始胡思乱想：

“我估计，以我的‘罪行’，就算硬判，顶多也只能判个一、二年。……很难超过15年，但就这15年，我也不打算忍。因为，到了2005年，就算我还能活着出来，已垂垂一老妇矣……

首先，提出与我丈夫离婚。……但是，我想，只要我活着，他一定不会同意离婚。就算为了我们的恩爱而接受了我的诚意，他所要承受的道义上的压力也太重了一点——我也不愿他受到这样的压力。所以，使他幸福的唯一条件就是我已经不在了。……我怎样才能不在呢？……那么只有自裁了。……”

也许是当局有意玩的一个花招，几位与戴晴有共同经历的朋友都谈到过，一个暴雨之夜突然的集体转移，许多人都以为末日到了。而戴晴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隔座到监狱公干的人言之凿凿：一份“六人枪毙”的名单中，有戴晴一个！

“到底是谁？一定要我的性命呢？”

“窗外飘着雪花，一只一条腿的蟋蟀不知怎么蹩进了我的牢房。它已经跳不动了，只沿着墙慢慢爬。我给它一点饭粒，它并不吃，绕着爬开去了。它要到哪儿去？在找寻自己最后的栖息之所么？

我忽然想起徐志摩的一小段诗，很美很美的一段。如果我非走不可，那么在走的时候，就用它来向朋友们道别吧：

轻轻地我去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在那最艰难的日子，戴晴留下了她的遗言。27年后，当笔者读到这些隐晦的文字时，依然能感到主人公的洒脱，及一丝哀婉……

但暴雨之后，晴空也来得特别突然：

“正当我在一种澄明的心境下，期待着最好，同时又准备着最坏的时候，半年的期限已到。”

1990年1月21日，戴晴被带出牢房：

“我觉得我的心在跳，似乎每一步都在迈向预料中的不幸。我等着新的宣布：起诉、移送或者延期。我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哭，要镇定镇定再镇定。

到了。我走进去。我立即发现异样。专案组的人没有像往常那坐在高高的讲台后边等我。他们站着，而站在他们旁边的，还有监狱长与监区长（按规定，提审时监狱方的人不可在场）。他们向我做了一个我自认为把什么都想过了而竟然没有料到的宣布：‘改羁押为监视居住。’”

从枪毙的“六人之一”，突然变为“释放的200人中的第一人”——戴晴认为，她的身价的这一陡然变化，大概与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政府的一笔巨额贷款有关。这是“海派”执政带来的新的价值观！

监视居住开始是在秦城监狱职工宿舍区执行，以后改由《光明日报》社执行——工资照发，回家休息。令戴晴耿耿于怀的是，在她系狱期间，报社曾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宣布将入狱前已办好一切自动退党手续的她“开除出党”。

“这个世界没有遗弃你”！——在前路晦暗的时刻，是台湾《汉声民间文化》的主编向她伸出了支援之手。以后，她“穿林海、过草原、钻山村、闯渔家，在暖烘烘的炕头，在凉飕飕的场院，在老奶奶的关切下，在小弟弟的依恋里……在那些属于你属于我但已经快要被遗忘了的民居、年画、剪纸、面花中”，她找到了自己的喜爱，继续绽放着价值的光辉。

“这是伴着我们的先祖穿过朝代更迭的血雨腥风而延展的文明——在岁月的冲刷下，浮腻、轻俏早已淘尽，只留下最具生命力的朴厚亲切。”

以后，在应邀访美问题上，戴晴再次被抛上风口浪尖，经过诸多磨难，借助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中美进行“人权谈判”，最终以胜利结局。而在美国，与那个时代逃出生天的民运人士一样，她享受到“准英雄式的接待”。

但是，戴晴没有选择出国定居，她的感情、她的付出、她的期待和祝福，都在中国。她甚至通过熟人关系，企图帮助刘宾雁、苏晓康、老鬼等人回国。她认为，写作者，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受众。

但由于海外民运的突然膨胀，一时间似乎前景无限，当时他们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

198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广播学院和院纪委《开除苏晓康公职和党籍》的决定。决定称，“自1987年调入以来，他不顾组织上多次批评教育和劝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不断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及报告文学作品，参与电视片《河殇》的总撰稿；长期不承担教学任务，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苏晓康积极参与组织策划和煽动学潮、动乱及反革命暴乱活动。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他畏罪叛逃国外，继续参与反对祖国的罪恶活动。”

198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取消刘宾雁、苏晓康会籍》决定。

1993年，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到美国与苏晓康团聚的妻子傅莉被撞成重度残疾，苏晓康本人的伤也不轻。老鬼于1995年回到中国。刘宾雁则于2005年病逝于美国。

钦本立等

戴晴的另一位朋友——《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因早已查出身患癌症，“六四”后一直被隔离审查。1991年3月29日，上海市社科院党委书记在他的病床前，宣布了对他的党籍处分：留党察看两年。可钦本立没有坚持到党籍恢复，而是在17天以后——4月15日，恰好是胡耀邦去世两周年的那一天——怅然离世。临死前写下“导报精神不死”的题字。

与之相关的《导报》的四位记者——张伟国、阮江宁、陈乐波、许小微——却被捕。要闻部负责人陆一在党员重新登记时被“不予登记”（实际上是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处分。据说陈至立还下令，所有参与《导报》的人员，今后不得从事新闻出版行业的工作。

第五节 社经所及相关人士的结局

6月19日晚7：00，保定市公安局人民公园派出所治安积极分子在公园巡逻时，发现一人“形迹可疑”，当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审查。该人始而自称张顺，是一名装卸工。但干警看他皮肤较白，与职业不相称。通过进一步审查，发现该人就是“通缉令”上的刘刚。次日上午刘刚被保定市公安局押送北京。

刘刚

据刘刚本人回忆，6月4日，他先是被王军涛藏在昌平政法大学、北京农机大学等地。与他一起的还有王丹和张伦。6月5日，他和王丹被接到北京南郊社经所成员毕谊民的家里。张伦没有跟来，并因此逃离了逮捕。但王军涛

头一天已经把接来的包遵信安置在这里。此后包遵信的回忆清楚地记得，当他和王丹被安排呆在一间房内等待时，王军涛、刘刚和小毕“商量事”。事后，据刘刚回忆：

“我跟军涛私下里建议将王丹等学生跟我们这些长胡子的人分开，以免一旦被抓住时，防止中共造谣说是我们在背后控制王丹，利用学生运动，让学生感到是上当受骗。这样至少会减少王丹等人的罪名。同时，我也警告王军涛，王丹年龄小，不像我们经历过世面，一旦被抓捕，难免交待出重要机密。王军涛跟我说，没有关系，对王丹这样的学生，到时吓唬吓唬他，或者不老实的时候，就教训教训他，看他如何泄密。并说他会给他写封信来吓唬他。”

此后，刘刚、王丹、包遵信三人被转到房山窦店的苏村。刘刚回忆说：

“在那里我们住了几天。小毕后来曾亲手交给我两封王军涛的密信。给我的密信中说，一旦王丹不服从指挥，就立即就地正法。给王丹的信中记得开头几句是：‘王，一切行动服从刚指挥，如有不从，军法处置。’”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军涛的字。……我正怀疑这是否是王军涛的亲笔，王丹凑过来想看信。我立即将两封信撕碎，并扔进农村特有的厕所的粪池里……

王丹当然感觉很不高兴。他随后就跟我提出要回北京。我劝他再等等，如果明天不来人接我们，我就送他回北京。后来小毕又送来一个自称是体改所的人，好像是叫李小明。他剃光头，神五神六的。反复说服我们要尽快跟他一道回北京。被我拒绝。晚上，光头李小明失踪了。我立即带包遵信和王丹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去看电视。天一亮，小毕又来了，我向他询问李小明的身份底细。小毕跟我说……王军涛本人以前也不认识那个李小明。听小毕说到这里，我让小毕立即送我们转移，否则，我们将步行转移。此后，小毕就将我们都送走了，而且按我的要求，将我本人单独送到一个秘密据点。”

实际上，根据包遵信的回忆，6月6日晚，王军涛已经接走了王丹和包遵信，并连夜亲自将他们送往佳木斯。刘刚大约是在此后便离开了社经所的控制，独自到了保定。直至6月19日在保定人民公园被“土八路”发现。

刘刚回京后，先是被关在北京公安局预审处七处看守所的K字楼，一星期后又被押解到位于北京小汤山的秦城监狱，并在那里见到了他的许多“战友”：

“刚到秦城监狱时我被关在1号，与我同时关进1号的还有北京市民敢死队队长兼飞虎队队长刘兴洲，广场广播站站长温杰，随后两三天又关进了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的王义、北京计算机学院的刘新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王怀安。

7月1日，我组织该号全体难友齐声高唱‘国际歌’，以此给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祝寿。除了王怀安以外，我们其他五人都被扣上吵监闹狱的帽子，先是被警察用高压电警棍电疗了一番，直至电得我们都浑身起泡。随后悉数被戴上脚镣背铐并被分送到其它号单独关押。

8月底，我解除禁闭后被转到二楼的20号。当时20号里关押着皖南医学院的四年级大学生、曾任‘外高联’联络部长的黄利锋，及自称是哈工大学生的朱文利。左隔壁的21号关着刘晓波等三人，右隔壁的19号关着北大学生杨涛等三人。”

1991年1月30日，刘刚被带到位于正义路的北京中级法院，让同家人见面。会见期间，他被父亲告知：

“我弟弟刘勇及我在政法大学的女朋友帮我请了个律师。但王军涛的太太侯晓天，以及王军涛的铁杆朋友刘迪找到我家人，说是要给我请一个更好的律师。我父亲跟我要委托书，同意让刘迪、侯晓天帮我另请律师。刘迪号称是四五英雄，自称是那个‘小平头’的真身。我当然认为刘迪应该能帮我

找到更好的律师啦。于是就口头答应我父亲，同意让侯晓天和刘迪另帮我请律师。后来，他们给我请的律师叫王耀庭，确实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律师。

没过几天，这个王耀庭就带着助手来到秦城监狱同我会见。他说他们已经阅读了我的案卷，同时也阅读了王军涛、陈子明和王丹等相关人员的案卷。他指出我的案卷中都是不签名不画押的，所以都不能作数。但说我在1989年7月间的一次审讯中我却是签名画押的，那个笔录应该作数。

在那份审讯笔录中我曾主动交待说：‘北大民主沙龙是我发起的，同王丹无关。北京高自联是在我的住处成立的，同吾尔开希无关。北京四二七大游行是我倡议并组织的，跟其他高自联成员无关。北京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是我首先倡议成立的，同陈子明王军涛无关。’为了证明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是我首先倡议的，我还具体告诉警察我在人大酒家饭店同王军涛首次见面的时间，在1989年4月间去陈子明家的时间，以便他们去向陈子明和王军涛求证。

我确实是这样交待了。那是因为我在那一段时间里了解到王丹被抓捕，就想当然地认为王军涛陈子明和吾尔开希都可能被抓了，所以就主动为他们承担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审讯员最最关心的所谓‘犯罪事实’。我讲的这一切，连那些管教和预审员都知道我是在搅浑水，拖延时间，以便让他们一时查不出事实真相。但是，那个侯晓天帮我请的王耀庭律师，却抓住这一点不放，说这一切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是王军涛和陈子明的案卷里都反复核实的事实。王耀庭和他的助手反复劝我承认这些犯罪事实。我问他们是否是被侯晓天请来做王军涛的律师，是来设局舍车保帅舍卒保车的？王耀庭的助手立即对我大发雷霆，说我不敢好汉做事好汉当。并且说王军涛和陈子明一直在组织一个学术会议，只是后来有了我参加后，才被我拖入学潮，他们本人一直都无意介入民运。我跟他们讲，如果你能确保这些事件都最终由我一人承担，而不再以这些事件去审判其他人，我一定全部承担到底。王

耀庭跟我说他只能尽力争取。我立即跟他们说他们是两个混蛋。我当即拒绝他们继续给我当辩护律师。”

1991年2月10日，刘刚被带到法庭。据他回忆：

“审理过程中王耀庭律师居然用大部分时间指控是我发起成立了‘北京爱国维宪联系会议’，并向法庭出示陈子明和王军涛的供词。陈子明的供词是这样的：

审讯员问：‘是否有人向你提议过成立‘北京爱国维宪联系会议’？’

陈子明答：‘没有。’

审讯员问：‘刘刚在1989年4月向你提出建议了吗？’

陈子明答：‘如果有，那也就是刘刚了。’

我当即反驳，‘这是点名问供。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这个证据无效。’

审判长谭京生制止了我的发言。随后，检察官又出示了谢小庆，郑棣等人的供词。谢小庆和郑棣都是王军涛的铁杆哥们。1991年2月12日对我进行宣判，果真判我了六年，这是中共准备给我的最低刑期。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新闻说我有认罪悔罪表现。我拿到判决书后，立即写了一篇抗议书和起诉书，控告北京中级法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我造谣污蔑，说我有认罪悔罪表现，这就是对我的最大诽谤。我要求他们对我公开道歉，为我全面恢复名誉。我当时就将我的抗议书和控告书交给所长小孔，让他帮我转交法庭，这一次，竟是无人理会我的控告书。……………那二审居然就是在秦城监狱的一个监舍里举行。只有一名高法法官，一名女书记员。另有两个武警时时刻刻紧紧夹住我，这哪里是什么开庭审理啊。甚至提我出去之前，我都不知道是二审开庭，我都没来得及带上我的控告书。还没等那个法官开始给我念二审判决书，我就开始高声背诵我的起诉书，抗议中共对我进行非法审判，抗议新华社人民日报对我造谣诽谤。……

后来，那个审判长跟我闲聊，说他是曾经审判过四人帮，还没见到有我这样大骂他的，没见过像我这样藐视法庭的。中共几次对我进行审讯时，几乎总要想找一个美女来做助手。我刚被抓住时，第一次在北京看守所K字楼提审，也是一个美女当助理，那个美女还特意去给我从食堂买来了两菜一饭让我吃。我一口都不吃。她劝我赶紧吃，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吃到这样的饭菜了。”

1991年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刚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据他说，在狱中曾遭受毒打和折磨，他因此组织了绝食活动，并致信各国政要，以示抗议。1993年12月，中国官员下令中止他的家人探望权利1年。1995年他刑满释放，在家中受到监视。由于受不了当局反复再骚扰，尤其是涉及家人的迫害，1996年5月，刘刚逃亡到美国。

据刘刚事后披露，在他系狱期间，他的家人几乎全数被列入了一些人用以筹款的名单，而他们也无一例外地频繁遭受当局的骚扰：

“我突然明白，我的这些亲友为何会被中共政权反反复复逮捕关押了！原来他们都被王军涛列为敢死队成员！

1996年4月30日，我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顺利来到美国。我先是在王军涛家里住了十几天。我见到王军涛不久，王军涛就将他手写的那些有关国内武装反抗力量的有关文件全部交给我，并正式任命我为政委，让我全权负责这一行动。我一看那份报告，就是陈老板给我看的那份报告，所列人员全部是我的亲友。我一再跟王军涛说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人士，他们不过是一些愿意帮助我的亲友，有大部分人就是本分的农民，根本就不会也不愿意从事什么武装暴动。王军涛却跟我说，这些报告只是骗骗美国人、台湾人、和香港人的。只要将这种报告不断送给那些反共组织去看，就会得到经费。”

包遵信

与刘刚曾有过短暂交集的包遵信，此前此后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中呢？

据他在《未完成的涅槃》中回忆：6月4日下午2：00多，他主编的《新闻快讯》的一个下属——段向群来到他在东直门附近的家，替王军涛传话，说王在楼下等他。他什么也没准备，只随手拿了两本书，就跟来人下楼了。在小区外的马路上，王军涛正坐在社经所常用来接送人员的一辆夏利车中等他。随后，这辆车朝西郊开去，经人民大学又到了清河，期间与陈子明、刘刚乘坐的该所的一辆面包车，进行了人员互换，然后又返身向北京城内开去。据说，在路途，他们还多次遭遇北京市民的拦截和检查。王军涛曾幽默地说：

“‘我不怕被公安局抓走、审判，只要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清楚；怕的是就这么给人拉下去，二话不说，就地正法！’他夸张地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此时的老包，对去向和下一步毫无所知。每有问起，王军涛只有一句话回答他：“到了就知道了”。包遵信记得：

“调了车子以后，我们这辆面包车又回头往城里开。我们又到了人大，再到北大，北大南校门挂着黑布、白字，几米高的挽联，奏着哀乐，一片肃穆的气氛。我们都没有下车，只让车子停在十几米远的地方看了看，然后就从海淀上了三环西路，经过外语学院、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师院，这几个学校的门口都是黑布、白花，哀乐阵阵。

我们到公主坟，军涛让司机把车子开向木樨地，在北京铁路局对面停下。从公主坟到复兴门，一路全是烧毁了的坦克、汽车，向西向东，一路冒着浓烟；墙上弹洞或疏或密，最低的离地面不到一米。马路上到处是人，不少青年人还爬到烧毁的坦克上寻找什么。军涛也去看了看。面对这样的场面，我的心一直往下沉。……军涛从马路中回来说，想不到北京的市民竟会这样勇敢。”

当晚，包遵信被安置在毕谊民的家里过夜。6月5日中午，王军涛和毕谊民带回了刘刚和王丹。下午，他们就被送到了苏村。

苏村是毕谊民经营的一个工厂的所在地。一行人被当作工厂请来的技术人员介绍给了村支书。但他们的身份很快就被看破。包遵信写道：

“晚饭以后，小毕回城了，我们刚回到住处洗漱完毕，就有一位刚刚在一起吃饭的农民来，叫我们上他家看电视去。……路上，他说前两天大兵就住在他们村附近，老乡们不给他们水，他们连喝的水都没有。又说：城里发生的事，他们都知道；今儿早上，燕化 还出动了好多人和军队打了起来……到了他家以后，又给我们听短波电台。从电台中我们知道，38军和27军已经处于对峙状态……”

6月6日的整个白天，包遵信把带去的一本林语堂的《红玫瑰》读完。入夜，王军涛和小毕再次出现。小毕以“包先生年纪大了，出来了家里不放心”为借口，带走了一老一小。次日凌晨1：00，四人一道，登上了开往佳木斯的139次快车。

“我们就在一片漆黑的深夜离开了北京。”

包遵信回忆说：

“离京前，王丹嘀嘀咕咕，闹着要回学校去。”但被王军涛一番“当‘英雄’还是当‘战士’”的道理说服，不吭气了。

在列车上，一行人领教了“谣言”的可怕。一位坐在王丹旁边的女学生，以负责任的口气对乘客说：“王丹已经被打死了”。到了哈尔滨后，他们依然没有安身之处。于是一行人决定南下。包遵信提议，大家可以到他家乡附近的九华山，找个清静的去处呆下来，读书去。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所以，在等候飞机的时间里，一行人——除小毕回京外——竟跑到哈尔滨的书店里大买其书。包遵信回忆说，王军涛买得最多。

此后的行程，包遵信拿回了主动权。

“我们6月10日晚飞抵上海。由于朋友事先作了安排，一切倒也顺利。6月13日一早，我们又从上海乘火车到了芜湖。下了火车以后，到了我的母校芜湖一中。在一中校门口，王丹就与我们分手，找他大伯去了。他临走时与我们约定，等我们住下之后就去找他。”

但他很快得知，九华山已不归芜湖管理。九华山去不成了。而且，就在当晚老同学接风的宴席上，他们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了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

“这下我们紧张了。王军涛说，赶快切断与王丹的联系……当时军涛最担心王丹被捕，将什么情况都说了。

当时的形势，芜湖当然无法久留了。……我们临时确定，只好先暂时到我的老家无为县去。……第二天早晨4：00，我们动身，军涛买的书只留下两本，其余的全丢下，我们就这样上了芜湖开往安庆的轮船。中午12：00到了土桥，再到湖陇，因为我的一个堂伯父原来在那个小镇工作，现在离休住在那儿，他见我们去了，就说你们快走，这儿不安全。

走，往哪儿走？哪儿安全？从13日晚听完新闻以后，军涛就一句话也没说，而他对安徽人生地不熟，也无法同他商量，只好由我说了算。……我想了想就决定到我舅舅家去。可是40多里路啊，既无船又无车，我们已经很疲倦了，可是有什么法子呢？硬着头皮走吧！这时军涛累得已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把他捅醒了，他的一双脚又磨破了，就这样一瘸一拐地随着我上了路。走了大约5里地，遇到了一辆拖拉机，每人30元，我们可以搭乘到襄安。到了襄安，还有8里路。我们包了一条木船，划到我舅舅家所在的沈家埭，已近7：00了。我们到了我大表兄的儿子沈宗宝家，吃了饭，正准备休息，突然有人送来消息，说今晚要查户口……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船，只答应连夜把我们送到襄安。上了船以后，瓢泼大雨下了起来，军涛一头栽到船舱就睡着了，我开始还坚持住，不到一刻钟也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就从襄安步行15

里，到了刘家渡，在那里花了100元包了一条木船，下船又是步行，又坐车，直到下午3：00多才到我大表兄家。

当我们坐着木船，在长江里行驶着的时候，面对江中来往的船只，看到北岸一望无垠的芦苇，心潮汹涌，多少体味到当年项羽羞见江东父老的滋味，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慨。这时我对军涛说：想不到从小就在长江边长大，如今却这么狼狈回到它的身边，真想一头扎进它的怀里一死了之！”

此时，二人都不知道政府相继又发出了一份秘密的通缉名单，他俩都在名单中。他们原先想通过亲戚联系到江西暂避，把王军涛化妆混在民工里。王也同意了。但后来一想，王的一口京腔无法掩盖他的身份，王军涛遂提出分手，到曾经营有年的武汉去想办法。

“6月18日早晨，军涛就与我分手，到武汉去了。我们分别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军涛说了一句：老包，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定不要死！”

6月底，包遵信从“美国之音”中得知，严家其、苏炜、吾尔开希已经到了法国。7月7日下午，包遵信在沈家垸舅舅家被捕。当公安人员反扭他的双臂，将他按在地上时，问的第一句话便是：

“王军涛去哪里了？”

从这个信息判断，王丹已经落网。于是包遵信施展缓兵之计，告诉他们：

“听说去江西了。”

王军涛

分手后的王军涛，顺利乘船到达武汉。

1984年，王军涛辞去地处北京房山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南下开阔眼界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曾先后任华中师范大学应用教育中心副主任、江汉夜校校长、武汉汽车厂厂长助理和湖北省县市规划办公室秘书长

助理等职。但他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地方学、商、政界蜻蜓点水的体验，而是通过武汉地区大专院校青年知识分子举办的各种学术讨论和沙龙联谊活动，结交了一批讲义气、有胆识的青年才俊。据他自己说，在这些联谊活动中，他以一曲用以自况的《苏武牧羊》，迷倒多少纯情少女！

这次“走麦城”，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在这批青年中有“大哥大”之誉的萧远。萧远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他把王军涛安置在自己手下利用防空洞开办的地下养鸡场，化名“吴天”。为了安置王，他辞退了大部分职工，不得不自己承担起打扫鸡舍的劳动，而王军涛在这里，也从事一些给鸡喂水喂食的工作。大概是托人在上海兑换一笔外汇券的环节上走漏了消息，以后，已经闻到危险气味的萧远，又将王军涛转移到自己的妹夫——大江高技术应用研究所所长邬礼堂——手下的一个五氧化二钒矿里掩藏，化名“梁斌”。

为了心中有数，邬礼堂与王军涛作了一次郑重的谈话。王军涛的一席坦诚“交代”，即便没有打消他的忧虑，至少令他作出了承担的决定。据刘丹红记载，王军涛是这样说的：“我曾经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保护过邓小平，在这以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很欣赏他。中国的改革还是得由他领头向前推进。所以我一直都是想用自己的思想成果进入改革派圈内，进而影响老邓，影响中央，使中国的改革能更健康、更迅速地深化发展。我是反对用革命的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个真正的‘反革命派’。”

“……我确实在这次民运中，没介入任何暴力事件。对于运动，我起先是持保留和怀疑态度的，只是一为朋友相约，二因国家局势叵测，只能挺身而出，希望能使整个形势化险为夷，或者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尽力稳住些局势。不过，事情发展到后来，你可以想象，一树挡风，是无济于事的。当然，对这次学潮从内心来讲我还是非常同情的，特别是对胡耀邦是很有感情的。我还是北大一个学生时，胡耀邦曾接见过我和另外几个人，以一个长者而不是一个领袖的身份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的这一次谈话真可以说让我终身受益。

我敬重他，为他不平，对他的去世很悲痛。再加上学生绝食以后，全社会悲愤的情绪越来越强，自己也卷进去了。（但我绝对没有做任何反对宪法、反对国家的事，在这方面我问心无愧！）”

“自去年始，我在各种场合坚持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在专制，而在民主化浪潮过激而导致形势失控，演变成动乱和分裂，这在《国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杂志）曾公开登过。为此，国内学术界与国外舆论都曾将我列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加讨伐。此次事变之后，我颇有感慨：在中国做人真难。政府要抓我，民运也不理解我……总之，你应相信我，并不是因为政府要镇压，我才与六月事变划界限，我不是那种人。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除了预见性，就是气节与骨头，不谦虚地说，在这方面，我还有点美名。”

“本来我可以回北京向公安部门说清楚，但政府现在如临大敌，很不冷静；再说萧远被抓了，我一出来，怕他被动。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三个月收审期间如果没有证据，就该放人。过一段时间等萧远回来，那时政府也恢复了理智，到时我立即回北京自首……”

为了准备这个有朝一日与官方见面的机会，他在湖北与江西交界的崇阳山区躲藏地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据知情者说，信中确有称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定海神针”之类的比喻。

本来，自始至终，只要官方高层给陈子明、王军涛一个开诚布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都不至于导致后来两败俱伤的结果。但李鹏政府的愚顽与蛮横，王、陈二人的患得患失，不仅造成了彼此的悲剧，而且造就了一批义薄云天的侠肝义胆之士可歌可泣的救援故事。为了营救王军涛，先后有16位他的朋友被捕、关押和遭到司法机关审查，直接行政处分者二人，受牵连的亲友无数。其中又有诸多曲折和惊险，已有刘丹红女士的《情义无价》作了记述。

陈子明

1989年10月11日，王军涛的搭档陈子明在广东湛江被捕。在四个多月的逃亡期间，陈子明携妻游历了内蒙、宁夏、甘肃、河南、湖北、广西的诸多名胜，弥补了结婚“蜜月”的缺课，也经历了许多惊险。之后，在详细打听到其“三线计划”中的“三线”人物没有人被捕的情况，认为这个策略尚未暴露后，他决定回京，逐渐从“地下”走出地面。

但该所所长费远建议他外逃，并声称为他找好了香港接应的人物。而整个部署的最后操盘手，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王军涛最终也落入了这个圈套，10月20日晚，在以一枚“小辣椒”象征“星星之火”的长沙火车站，灯火通明的售票大厅，在前往“接应”的社经所所长确认了他的身份后，已经一副“山里农民”模样的王军涛被早就布满大厅的便衣公安一拥而上，拿下。

在他被戴上手铐时，费远在不远处也被戴上了手铐。

同日，前往救援的香港商人罗海星及其两名助手在广州被捕；

在秦城监狱等待审理的过程中，陈子明做了一件要事：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用“上书言事体”，写了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上书于1990年4月12日，“作为致江泽民、李瑞环信的附件的形式交给办案人员”。该文表达了他与胡、赵改革不同的思路；希望达到“与中共领导集团之间沟通思想的目的”。他在写给妻子王之虹的信中说：“平时人微言轻，此时倒是一个告诫执政者的机会”。虽然原件在1990年11月27日被退回，但他妻子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

“子明的《反思》早已经送达最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案头每人都有一份，政策研究机构也曾受命对他的文章做出研究分析。”

“子明还在服刑时，就有朋友告诉我，1989年以后中共的某些决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反思》的影响。……《反思》指出，‘在最高层党政分开领导体制下，责任政府制度是无法实现的’、‘最高层领导人实行党政合一’比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届人大时也未尝不可一试’。果然，经过这两次大会，江泽民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几个职务……”

图10-18：王之虹《风雨同行》披露丈夫秦城行迹

但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政府并没有感恩陈子明。相反于1990年11月23日，对他进行了正式逮捕。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对此，陈子明作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抗争。在一再失望的情况下，2月8日，他再次给江泽民写信，并附上了给秦城监狱中共党组织的入党申请书。这是他一生第四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图10-19：陈子明在秦城监狱的“入党申请书”

为了打乱政府利用“海湾战争”期间国际媒体无法聚焦于北京审判的步骤，他甚至不惜让自己“生病”——在“放风”时间，让自己裸露在寒冬腊月的天气里！

然而，审判没有被延迟，他的抗争却占用了他本来可以用来准备辩护材料的时间：

“在仅有的几个小时里，他起草了一份开庭时关于回避问题的发言稿，一份关于事实问题的答辩提纲，还为王军涛写了一份证言……”

“证言”写道：

“根据我对具体情况的了解和与王军涛本人的长期交往，我敢百分之百地负责任地担保，王军涛在1989年5、6月份参与在学生与政府之间斡旋，完全是本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与历史责任感，出于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与爱护，出于协助政府处理棘手问题的好意。

他深知由于自己的过去的经历，最容易被有关方面误解自己的动机与目的，但是他素来有一身侠气，看到一些青年学生由于幼稚与亢奋而陷于险恶的境地，他作为北大学生尊敬的‘老大哥’，不能不冒着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把他们拉出来。能够挽救一大批人，他当然责无旁贷，即使只能挽救一个人，他也具有‘救人已溺’的决心。”

就此，他不仅向王军涛释放了“溺己救人”的信号，而且顺便与“二线”的王军涛进行完美切割，将社经所在八九民运中的工作部署 完全归于王军涛优秀的个人品质与人际关系活动。

审判在1991年2月11日进行。陈子明意欲“‘配合法庭开创一个公正审判的范例’的良好愿望终于落空”。他被判处了八九民运中所有被捕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最重的刑期——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1994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6月再次入狱；1996年11月再次保外就医。2014年10月，因胰腺癌病逝，终年61岁。

鉴于陈子明的暗示，王军涛在法庭上对所有指控采取了大包大揽的姿态。但所判刑期，与陈子明也别无二致。

在狱中，王军涛几次绝食抗议。1994年，作为中美两国政府的“交易”，王军涛被送往美国治病。出狱时曾给狱吏们留下一句话：

“我赦免你们！”

赴美后，王军涛一度被麦克法夸尔 视为中国民运领袖中最有希望的人。但他很快因在“迎接”江泽民访美问题上的“原则性缺失，灵活性有余”而

丧失人心。但他并没有气馁。2003年6月，王军涛对赴美参加纪念活动的笔者说，他之所以决心要把博士学位拿下来，是因为不这样将来没法领导这批留学回国的博士。

与王军涛、包遵信分手后的王丹，也在当晚得到了自己被通缉的消息。已经厌恶了东躲西藏的他，觉得没什么不可以面对法庭的。于是，他自己作出了回到北京的选择。到京后，在与台湾女记者徐璐 的联系过程中不慎暴露，于7月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第六节 “黄雀行动”及其他民间救援

与包遵信同列一份“通缉名单”的陈一谔，虽然与万润南一样得以走脱，但走得没有他从容。据陈一谔回忆录描述，他的逃亡“历时一个月、途经12省市、三次险些被抓”，实在是吃尽了苦头。

陈一谔

与社经所对出逃早有计划、安排和分工，以“潜水艇”方式集体隐蔽江湖不同；与万润南胸有成竹，乾纲独断的工作作风，以个人切割保全整个公司也不同，陈一谔临走似乎没有对体改所的前途和人员作出周密细致安排。与其草莽风格一致的是，他描述的出走前情节，与他的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情况一样，总在一群爱国青年的包围中，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实现的：

“（6月3日）夜里11：00，西南木樨地方向传来了枪声，我心里一惊：枪响了，一场流血惨案要发生了！……

枪声时断时续，6月4日凌晨3：00多，猛地响了一阵子，似乎又沉寂了。快4：00时，张少杰满身血迹，上气不接下气地找到我说：‘老陈啊，我差一点就没命了。六部口已经血流成河了！’张少杰说：‘我正坐在电报大楼的

台阶上，看许多民众拦截军人。突然，大楼的门打开了，里面冲出来一队军人，拿着冲锋枪就向人群扫射，当时一大片人倒下了。我吓得从台阶上滚了下来，只见六部口的街上死了不知道多少人，下水道里血哗哗地在流个不停。……’所里的年轻人不断地从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天安门跑回来，痛哭失声地描述了军队杀人的情景。”

凌晨5：00，他悲愤地写了《我的辞职和退党声明》：

一、这次以学生为先锋、各阶层广泛参加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以李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发动的这场清算改革的军事政变，是逆历史潮流的、是不得人心的，这种倒行逆施已经写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不可违背的潮流。但经济改革不解决产权问题，政治改革不解决民权问题，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四、中国共产党公开与人民为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已堕落为法西斯式的政党；

五、我郑重宣布：自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并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随后，他将这个声明复制了若干，贴在了几个显要的地方。还不到6月4日凌晨6：00，国务院一位经常给他带话——似乎专送李鹏左右的消息——的朋友给他带话说：“李鹏认为你是‘赵紫阳黑线和学生运动之间的枢纽’，要‘不惜一切手段将陈一谔缉拿归案’，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还有人流着泪劝他说：“李鹏若让人把你绑架到新华门，一阵乱枪打死，说你是暴徒，就太不值得了！”

“6月5日凌晨，北京各处还不时响起零星的枪声”，陈一谔回忆道：

“中共元老万里派人给我送来一封急信，写了两行字，一行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决定，先暂时到南方避避风头再说。”

体改所副所长刘晓峰给了他一个化名“石坚”的假工作证和5000元人民币。另一名同事黄永山决定陪伴他逃亡。

6月5日下午2：00，刘晓峰开车先送二人到北京站。当他们看见“荷枪实弹”的军人一个个盘查往来行人时，没有敢硬闯。离开后途径长安街，《陈一谔回忆录》说：

“……燃烧过的汽车、战车还在冒烟，西长安街的弹痕随处可见……”他甚至有错觉感到“六部口的下水道边血仍在流” 晚6：00多，经过化妆的陈一谔一行，离开中央团校的朋友家，取道丰台火车站，他与黄永山一道，终于登上了一列开往南京的列车。

“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通往上海的沪宁线已不通车，……街上贴满了‘打倒邓小平、李鹏、杨尚昆！’‘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标语。时不时几百人、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激愤地抗议北京杀害学生和平民。

我们买了去南昌的火车票，想到云贵一带偏远地区避避风头再说。到了南昌，才知道通往各处的火车都中断了。怎么办？在火车站睡了一夜。7日下午，终于买到了两张通往广州的长途汽车票。汽车上人们都很沉闷，似乎一半以上都是南逃的学生。

车行了两夜一天，第二夜凌晨抵达广州郊区。突然，一队荷枪的军人包围了汽车，凶巴巴地要上车检查乘客证件。我看大家睡得东倒西歪，灵机一动，出溜到座位下装着呼呼大睡。检查证件的军人摇了我两次，看摇不醒我，就下车了。……”

在联系住宿时，他的假工作证上的红印泥章引起了旅馆服务员的怀疑，大概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嫌疑人，她给陈一谔开了房间，但不久，就有“一队荷枪的军人冲进了旅馆”，幸得二人机警，从服务员的表情中感觉到有危险，从侧门走脱。

以后，他们打车去了高档的花园饭店。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赵紫阳战友的儿子许晋豫。许开门见山，建议陈一谔去香港。不久，北京派人给他送来了护照。陈一谔回忆说：

“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立即给了我签证。我们连夜开车到了深圳，住进了园岭。约好6月16日12：00从罗湖出关，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鲍恩在罗湖接我。那天12：00多，老许回来无奈地说：‘公安部搜捕7名著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已经到了深圳海关，名单里有你……’”

以后，不知通过什么幕后运作，台湾商人方君接管了陈一谔的事务。黄永山就此别过。但他回到北京刚一下飞机就被捕，而方却把陈带到了海南。6月20日，赵紫阳的次子赵二军和儿媳汪建莉见到了陈。他们建议陈试试从海口飞香港。

“海口机场四处都是荷枪的军人，方君先去探路。不一会兴冲冲地来说：‘我给了售票小姐100美元，机票就换成老石的名字了。快走，这趟班机已登机了。’

我跟着他往登机大厅走去，刚到门口，两个军人用枪一架，要查证件。方君急中生智，拿出‘台胞证’说：‘我们得赶快走，飞机就要起飞了！’军人放行了。要入关时，方君突然说：‘老石，有你的名字！’原来，边检提到了入关之前，每过一个人人都对照一遍桌上的名单，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那份名单，第一页第三个名字就是我。”

不得已，他们又回到车上。但他们的面包车突然被包围了。司机下车与领头的军人交涉一番，塞了1000港币，那军人便以“违章停车”为由，责令他们迅速离开。

80年代末期，在南方，有钱能使鬼推磨，已经成为一个通行的信条！

从6月20日登机失败后，陈一谔在一名高姓医生家住了下来。通缉照片的张贴，使方君为他办理的新加坡护照也不能使用。陈一谔既不清楚前路何方，也不知道周围人在干些什么。直到7月5日，历史的时钟似乎突然加快了脚步：

“上午9：30，方君匆匆来找我，说：‘老石，快跟我走！’坐上他的小汽车东拐西转了约半个小时，停在了一家宾馆门口。门内走出两个人，只说了一句：‘跟我们走！’说时迟那时快，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门打开让我们进去，那二人也上了车。车立即开走了。

一个人跟我说：‘老石，你外甥接你去安全的地方。他正等你吃饭。记住，你是他舅舅，是来看他的。’并给我脸上、脖子上和胳膊上、手上涂了些古铜色的敷料……”

随着一声“舅”的热情称呼，陈一谔从此和这个素不相识的30多岁年轻壮汉结下了一段生死之缘。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太阳在地球的另一方。依稀可见的，只有天边飘忽明灭的几点灯光。

阵阵海风吹得小船不停地摇荡。我静静地躺在小船的底舱。不敢发出声响，汗水沁透了衣裳。不知道小船会把我载向何方。

7月的南方天气酷热，全身长满了痱子，船的底舱闷热得让人呼吸不畅。嘴唇干裂了，思维若断若续。怎么也睡不着。……”

在“外甥”的一艘运输船底，他被告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再热，也不能到上舱去。一张蒲席，就是他在甲板下的栖息地。如果有人来搜查，听见船板上的跺脚声，他必须立即钻进一个2×3米的水箱里。

“水是温热的，上面飘着一层油……”

“关上水箱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觉得全身泡在满是油污的热水盆中。……用手一摸，隔板靠下边有一个和水箱圆门大小差不多的圆洞，人蹲下来才能钻进去。竖耳细听，除了机器的轰鸣声，还传来船上人的走动声和听不清楚的说话声。我连忙钻过隔板，把头伸出水面，些许微光只能看到水面上漂着的油花在闪动。我闭目冥想深深地吸气，使自己镇定。说话声由远及近，水箱的小圆门打开了，一股光线透了进来，有人用棍子搅动着水，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水箱门关上了，人走了。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出来吧！没事了！……这是例行抽查。查过的船不能出港。明天8：00才能走……’”

剩下的漫长时间，又是与寂寞为伍。昏睡过后，接踵而来的是失眠。第二天开船后，他只有一个感觉：这船怎么开得这么慢！

第三天的早晨，船过澳门炮台，炮口看得清清楚楚。最高时速只有30海哩的小货船，知道不是时速60—80海哩的炮台快艇的对手，所以在附近停泊等候，硬是等到9：00换岗时，慢悠悠地开了过去……

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一谔到处躲藏，但“处处遇到善良的人们”。面临一道一道的关卡，又多少次化险为夷。1989年10月22日，他到洛杉矶西来寺拜访星云大师时，星云送了给他一幅题辞：

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

7月7日晚6：00，陈一谔登上港岛，结束了整24小时的海上漂泊。替他换装、为他接风的是香港著名艺人、港支联负责人、“黄雀行动”的总指挥岑建勋：

“岑建勋询问了我出逃的经过，而后指着身旁的两个人说：‘就是他们组织人救你的！’我拱手一揖道：‘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他们两人也拱手道：‘义之所至，理当效劳！’我问：‘你们冒这么大风险救人，要是出了事怎么办？’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我们养他全家！’我又问：‘要是出卖了呢？’他们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杀他全家！’”

岑建勋还对陈一谔说，许家屯收到了李鹏的手令，要“不惜一切手段将陈一谔缉拿归案”。他还和陈一谔商量：“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鲍恩明天中午要请你吃饭，他可能会请你去美国，你有什么考虑？”陈说自己还没有考虑。岑说：严家其和吾尔开希都想去美国，可是美国不接受，他们现在都去了法国。我建议你也去法国，这样大家彼此有个照应。陈表示接受岑建勋的建议。

7月8日上午9：00，岑建勋带陈一谔看望了“黄雀行动”的前线总指挥——陈达钲和弟弟陈达钊。因二人在兄弟中排行第六、第七，人称“六哥、七哥”。据介绍，在整个“黄雀行动”中，经兄弟二人组织营救成功的达100多人。

“中午12：00，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鲍恩请我吃饭。鲍恩说：‘陈教授，首先，祝贺你脱离了危险！其次，我代表美国政府欢迎你到美国。美国政府会在三年内，每年给你提供5万美元的生活费，并且给你提供工作和住宿用房，配一名秘书。’说实话，我那时对到国外以后怎么办，并没有什么打算。心想，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利用我吧？就按岑建勋的意见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的朋友都去了法国，我也准备去法国。’”

当天下午，岑建勋又带陈一谔拜访了著名作家金庸。临别时，金庸塞给陈一谔一个红包，让他“拿去放松放松”。离开后，岑建勋说红包里定是500

0港币，并说这个“香港的韦小宝”的意思是，“让你去富丽华夜总会玩一夜，喝酒、唱歌，加上一个女人陪夜，正好5000港币”。陈打开红包，果然是5000港币！

7月9日下午3：00，陈一谔按约定来到“港英政治处”。他被告知，法国总统密特朗已经邀请他参加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为了出关方便，他们打算把他化妆成一名英国警官。当晚9：00，皮肤被染成浅棕红色，内外身着英国名牌服装的陈一谔，在10余名英国警察的目送下，升空，永远离开了祖国！

二十多年来，许多当事人和读者，都想弄清谁是“黄雀行动”的组织策划者和具体帮助他们逃亡的人。直到香港《前哨》月刊总编辑刘达文在2012年出版《黄雀行动》，整个事件大概可见眉目。刘达文写道：

“严格来讲，六哥(陈达钲)与岑建勋、邓光荣和高世昌在尖沙咀香港酒店聚首，标志着‘黄雀行动’正式启动。在此之前，吾尔开希、严家祺、怀德已逃亡成功。”

图10-20：《前哨》总编辑刘达文

吾尔开希

据怀德回忆，营救吾尔开希的行动始于李依。李依是吾尔开希女友刘燕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同学。1989年6月7日至10日，“李依带领吾尔开希、肖锋等人从北京经开封、洛阳、徐州、广州、中山，将吾尔开希交给怀德。”在怀德的指挥下，胡若阳等人连续三次于6月14日——即通缉令发布的第二天——“在珠海唐家湾沿海将吾尔开希送出国境”。

据有关资料显示，吾尔开希逃离大陆后，随即流亡法国。他与严家其等人共同创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担任副主席。此后到美国柏克莱大学修读英语，后转往加州旧金山阳百瀚大学修读商业，在美国旧金山多米尼加大学

毕业。他后来在该校就读硕士课程，研究内容以亚太及中美关系为主。1994年8月30日，吾尔开希与台湾留美学生陈慧玲结婚。台湾考试院副院长毛高文担任证婚人，黑教林云大师担任主婚人。1997年，吾尔开希获台湾居留权。

“黄雀行动”的名字是事后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所起。“黄雀行动”的前线总指挥陈达钲说，这是根据曹植《野田黄雀行》这首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而起名。岑建勋、刘千石、朱耀明是“黄雀行动”的组织者，陈达钲(六哥)指挥成功地营救了133人，其中70多位是陈达钲与弟弟陈达钊亲自到内地安排营救的。据《美国之音》海涛报道，被救出的人员，包括学运骨干李录、项小吉、王超华、张伦、吕京花、陈一咨、苏晓康、徐刚、刘再复、远志明、吴仁华、蔡崇国、孔捷生、老鬼等。

严家其后来知道，救助他们的行动，发生于“黄雀行动”命名之前。陈达钲也参与了救助。但这项义举至今无人认领。以至于刘达文说：

“严家祺的逃亡就是一个谜。”

“我也想解开这个谜，也无能为力。”

是邓小平的意图？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大陆分布的网络在发挥作用？陈一谔的担忧，固然出于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造成的思维定式，但应该并非空穴来风。试想，陈一谔的救援者方君在海南的“无所不能”的通关能力；他刚到香港，就得到美国政府的邀请及赴美待遇的明确报告，如果不经上级部门或总统批准，民主国家花纳税人的钱，又事涉两国关系，是不可能私下由一两个官员决定的。而且在港英、美国和法国之间似乎已经就他的去向进行过讨论，最后只待他个人定夺。尤其是1992年，美国纽约William Morrow出版公司出版了马克·佩里的《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其中不仅提到了运动后期给学生领袖和著名知识分子发放200个签证之事，还提到吾尔开希、李录、万润南和严家其的出走。该书认为：

“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才有可能。”

而该书指出，这个网络主要归功于中央情报局东亚问题专家约翰·吉尔胡利，“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破天荒地在中国招募特务”。而有意思的是，如“黄雀行动”也是先有个人行动后有组织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救援有组织的投入，也是出自这些潜伏特务从各地发出的呼叫。马克·佩里说：

“在从1989年7月初到12月末的这一危急时期中，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后招募的特务，向中央情报局请求帮助。”

该书声称，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曾向他证实，潜逃中的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使用的武器。“大部分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它经由为此特别目的而在香港设立的前线机构来执行。

该书最传神的部分还在于，在营救和安置问题上美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的默契：

“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情报局默默地跟随在喜气洋洋的国务卿贝克的后面，贝克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都知道，主导营救行动的是法国。”

而“黄雀行动”的“铁幕”被撕开，似乎也起因于法国人的居功与否定美国人的在场。

在美国民间，也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支援逃亡者的捐款活动。最著名的一例，就是普林斯顿教授George Rowley的学生——约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1989年6月，他一次捐款一百万美元。由George Rowley的另一名学生著名汉学家余英时教授主持，林培瑞教授协理，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学社建立后，中国民运的骨干逐渐由巴黎转到这里。学社通过这笔钱，先后收留过26名著名学生和知识分子。为此，普林斯顿大学留下了一份150多页的档案，可供查阅。

张伯笠

“六四”后，张伯笠主办的《新闻导报》直到6月4日，还出版了自己最后一期“特刊”。

图10-21：6月4日刊出的《新闻导报》（陈小雅收藏）

为躲避通缉，张伯笠曾在家乡东躲西藏。1989年底，他曾成功地逃到苏联，并申请政治庇护。但正逢多事之秋的苏联政府不想就此与中国政府交恶，张伯笠被“克格勃”遣返中国。据张伯笠在《逃亡者》中描述，此后，他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深山野林里开荒种地、捕鱼、放牧，度过了两年野人般的生活。此后大概在北京待过一段。笔者有一次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见一位报告文学编辑，寻求出版《过渡文化的十年》。在稿件登记册上，我不仅看到了张伯笠的大名，而且他就站在我的眼前。这个人不仅长相和通缉照片上一模一样，而且还戴着那顶很有特点的白色荷叶形旅行帽。因我一直关注这段历史，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对这个形象记忆深刻，但我不解的是，接待我的编辑和那个叫“张伯笠”的人，面对我瞠目结舌的注视，竟若无其事一般。我当时就想，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同名同姓，长相一样，而且也在北京的文学界活动的人吗？

以后，张伯笠取道广东，再次逃亡成功。经香港到美国后，他的故事感动了美国前总统布什，称他为“最勇敢的人”。美国国会众议员南希·波洛西，称他为“当代的鲁宾逊”。

但是，苦尽甘来的张伯笠，此后又身患重病，首先说是“肾病”，以后变成“肝癌”，但后来“神”却让他的肝癌消失了。

王超华

王超华“飞”出中国后，也经历了从法国转道美国的过程。以后在美攻读文学博士。但作为天安门广场学生中的“温和派”，她一直为让“北高联”卷入绝食后的广场运动感到自责和不安。她曾在李录摄制的自传体电视片《移山》中痛哭失声，以一句“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引发了一次经久不衰的民运反思运动，至今影响巨深。

图10-22：李录、王超华、辛苦在法国

王超华曾坦承：

“支撑我坚持到逃亡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我的求生本能。因此，在海外每当面对欢呼或花环之类的场面，我就有小丑做戏的自惭。这一点加上我对符号式生存的恐惧，使我得以继续自己对普通人生活的追求。我当然无法忘记六四，但我也怀疑我真的能为国内的人们做什么？加上六四带给我的害怕承担责任的后遗症，我选择了和其他许多流亡学生领袖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活动靠拢组织，个人生活坚持独立。”

封从德、柴玲

从广场撤出后的封从德，带领指挥部人员在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广播站宣布广场指挥部解散后，把运动的善后事宜移交给了一直尽忠职守的北大筹委会的常劲。

“然后，和指挥部几个人在（28楼）238室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屋里有柴玲、李禄、我、辛苦、刘光、马斌及李禄的二个保安。

这时，有一个台湾女记者跑进来，拿着一张条子要请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着了，我接过条子看了看，说：‘对不起，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吗？’记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说什么。李录好像与她很熟

络，同她聊了一会，得知竟有一个台湾记者脖子上挨了一枪，另一个下巴挨一枪，他们真够勇的。

大家都困得不行，我和李录商量着下一步行动计划。现在必须逃亡或组织地下活动了。我坚持大家必须分散行动，‘总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商定好联络方案之后，我们分成了三组，辛苦、李录及其保安一组，他们只要了600元！他们竟是靠着这么点钱，最先逃离了大陆。

柴玲从困倦中醒来后，见我已经让马斌走了，而我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出逃计划，她很不满意。当时我还坚持认为在校园内比哪儿都安全。找了几处皆无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国际关系学院，想到办托福班的老师那里去躲躲，但到海淀出租车却没有车。柴玲很烦，在我们这样的不和之中，刘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俩单独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给他一点钱，但他愣是坚持分文不要！”

国关去不了，我们只好再去蔚秀园找我导师，希望她能收留我们躲藏。我的导师惊讶地问：‘真杀人了吗？’她家住有亲戚，不便收留，于是她打电话找丁石孙校长。丁校长还记得我，约我们去他那里。从我导师所在的蔚秀园到丁校长的中关园，要穿过校园，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倾盆大雨，却将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长那里，他也只能对我们说：‘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你们要留在学校，我可以保证你们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后，我也难料。’”

当时，封从德还不知道丁石孙校长“为了作出抗议，已经辞去党籍”。但他决心用自己在职的机会，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三天后，军队进驻学校，他的发言权就受限了。

最终，这对夫妇终于失望。他们在雨后的校园里，作了漫无目的地徘徊后，终于悟到：一切已成过去！一种深深的失落与无力感，向他们袭来。

“在电教东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一个筹办人。他说知识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经准备好了几十本护照，问我们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语，我却很生气，冷冷地说‘谢谢，不必了。’他没多加劝说，拎着一只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转过身来，对柴玲说：

‘你等着瞧，以后我的名气会比你更大。’

说完就走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竟是我们同伴的临别赠言！但当时，我简直没有什么知觉，心已麻木。柴玲也极其平静，好像没听见似的。”

离开北京大学校园前，封从德还记得一幅最温馨的画面：经过暴雨洗礼的校园，空气异常清新，青草丛中，一只小白兔蹦来蹦去。

“……小白兔是我们结婚前的宠物……她并不怨我没有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而将未来的安排暂时放下，还是完全信托于我？她因我而参加运动，现在却……这时我鼻子一酸，搂住她，含着泪说：

‘我对不住你。我完全没有准备后路。’ ”

图10-23：柴玲、封从德夫妇

注释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25—526页。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载64memo.com/2004。

吴仁华《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版。

封从德批注：卜正民(Timothy Brook)记录“六四”晨复兴医院死难者为59人。至6日应该有些尸体已被家人领走。

丁子霖名单#60、张汝宁，32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

王庆元《我所目睹的“六四”》 2013/6/2电子邮件。

见白志华《戳穿谣言》。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57页。1997年田大畏谈话；2015年2月21日罗立为谈话。

据64memo.com - 1989、《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629页。另有消息称，该播音员名为李丹。播音内容因翻译不同，还有如下版本：1、“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群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他新闻可向您报道。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大事记》6月3日—4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86页。2、“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装甲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装甲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轧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他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见吴仁华《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吴晓镛的父亲吴学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88.4~1993.3)、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当选)。曾任国务委员(1983.6~1988.3)兼外交部长(1982.11~1988.4)。上海市人。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学生工作，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副书记、代理学委书记。1949年6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派驻布拉格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

《北京这一夜》。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4日，第1版。

《人民日报》1989年6月4日，第3、4版。

江棋生《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段》。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9日，第258页。

以上三项为个人经历。

以上五项为在办公室听同事描述。

以上六项为朋友、同学、师长亲历或亲见。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2—433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89年9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封从德批注：卜正民(Timothy Brook)记录“六四”晨邮电医院死难者为28人。

杜同上。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28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最黑暗的夜，降临了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五）》89年6月12日。

同上。

六四档案《六四伤亡的16种说法》。64memo.com 2002年4月30日。

同上。

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5日，第2版。

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10日，第3版。

台湾《联合报》1989年7月1日，第4版。

《首曝白宫密档：六四屠杀死一万人》。载阿波罗新闻网2016年2月27日，来源：《壹周刊》。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7页。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45页。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

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清场。

在所有文献中，只有李鹏《“六四”日记》比较诚实地承认，清场历时“3小时”，但他坚持在“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则是相信了谎言。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有一位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一直在广场的东南角上，并拍摄了6月4日凌晨3个多小时天安门清场全过程的录像片。录像清楚地说明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死一个人，完全是和平撤退。”。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五节：38军进入广场。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9日。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

《北京抓获反革命暴乱暴徒四百多人 “高自联” “工自联”有些头目也被缉拿归案》。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67页。

李之云，1941年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李大庄村。1960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陆军第38军114师战士、排长、团政治处干事、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1981年1月任114师政治部主任、1981年9月政治学院基本系学习，1983年8月毕业后任114师副政委、师政治委员、1985年7月任陆军第3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90年1月任武警总部政治部主任，1993年7月任后勤指挥学院副院长（正军职）、1996年1月任政治委员。1988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90年1月晋升为武警少将警衔，1993年改授少将军衔。2001年6月退休。见《河南籍少将》：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714/22/11412242_484948196.shtml

李之云《答外国记者问》。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20—422页。

同上，第417—418页。

同上，第419页。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郑重声明》。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5日，第1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1025页。

同上，下册，第1025-1026页。

38军6名“共和国卫士”牺牲于翠微路口翻车事件。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七节 保护与牺牲。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89年6月30日。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第2版。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北京高教局负责人介绍 36名死亡大学生后事处理完毕》。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日，第1版。

参见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名单（186人）》。

同上。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10日，第263页。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20页。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71页。据冯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文版被删节的内容。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吕正操《〈戒严一日〉读后感》。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0日，第3版。

《〈欧洲时报〉撰文批驳严家其之流》。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4日。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2、14页。

见高新《“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兼答海外众多有疑问者的疑问》。载《中国之春》1991年7月号。

见雅峰《开进途中，戒严部队的困惑》。见叶宣编《平暴纪实》，载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49页。高新所获信息对此有不同的说法，见《“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兼答海外众多有疑问者的疑问》。载《中国之春》1991年7月号。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七节 保护与牺牲。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一节 军队强行开进。出自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1998年6月4日，载《小参考》。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四节 复兴门。出自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高新《“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兼答海外众多有疑问者的疑问》。载《中国之春》1991年7月号。

同上。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八节 南池子。出自林彬《历历在目惊心动魄的“六四”》。载《枫华园》增刊，总第35期。《天安门广场死亡真相》。原载《博讯》2001年6月7日。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三节：民族文化宫。

陈小雅《李相、汤学平访谈录》，2016年1月24日。

新华社6月13日电《在西长安街残酷凌辱被害解放军战士 群众要求严惩暴徒张建忠》。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第2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4—435页。

同上，第435页。

张延芳《一次难忘的遗体整理》。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40—342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8页。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最后的纪念碑注释。出自持4：25说法的有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198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

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六节：最后的纪念碑。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六节：最后的纪念碑。出自侯德健与宋松证言。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七章 第六节 催泪弹。

郝连锁《广场东南角的枪声》。载《戒严一日》下册，第231页。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最黑暗的夜，降临了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五）》89年6月12日。

出尘公子《残忍的民运斗士！——“广场死人二百人搬上直升机”！！》
64memo.com-2002年1月22日。

载《戒严一日》下册，第232页。

见田慧英《医疗队开赴人民大会堂》。载《戒严一日》上册，第75页。

同上，第75—76页。

据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第32、91—9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5日，第2
46页。

参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8页。

“哈德门”又作“哈达门”，均为崇文门的俗称，因元代哈达王府建在崇文门内而得名。《罗生门》是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借用自芥川龙之介同名小说之名，改编了芥川龙之介《筱竹丛中》的内容产生的一部电影作品。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武士被杀后的破案过程。因目击者和涉案嫌疑人的视角、立场和利益不同，各自对案情所作的叙述也不同。以后，人们常借用“罗生门”一语来比喻对同一件事，因立场不同而说出不同事实的歧异情形。

常国君《血肉谱写的壮歌》。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6页。

崇文门过街天桥。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2—23页。

同上，第23页。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七节：保护与牺牲。

张喜波《我们在奔进》。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7—168页。

同上，第167—169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3页。

张喜波《我们在奔进》。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9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3页。

据中士孙朝恒说，下跪的只有指导员初慧民、他和他架着的连长王峰。见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灭绝人性的一幕 战士崔国政在崇文门天桥被杀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

张喜波《我们在奔进》。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9—171页。

《把方便让给部队 把困难留给自己 国防科工委支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称：“6月3日，在戒严部队进城受阻、遭到暴徒围攻的紧急关头，科工委派出近200名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组成工作队，冒着生命危险去接应在危难中的受阻部队。6月4日，第一批进驻国防科工委营区的戒严部队……”。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1日，第2版。

张喜波《我们在奔进》。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9—171页。

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灭绝人性的一幕 战士崔国政在崇文门天桥被杀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3页。

同上。

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灭绝人性的一幕 战士崔国政在崇文门天桥被杀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

常国君《血肉谱写的壮歌》。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7—338页。

同上，第338页。

同上，第339页。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

常国君《血肉谱写的壮歌》。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9页。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要求全军向他们学习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日，第1版。

刘汉臣《他就是残害崔国政烈士的主要凶手》。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19页。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残害崔国政的部分暴徒被抓获》。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5日，第2版。

见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灭绝人性的一幕 战士崔国政在崇文门天桥被杀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谷密山《第一次武装押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0页。

见刘亚洲《信念与道德》，载《刘亚洲文集》第2页。

芦光祖《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8页。

刘士忠《九万六千个包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79页。

同上，第390页。

同上，第390页。

详见吴铁林《空中补给线》。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02页。

洪希涛《611特别空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05页。

同上，第406—407页。

同上，第407页。

汪先谋《紧急抢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7页。

申敬旺《这里通向天安门广场》。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7页。

指暴徒。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6日，第250—252页。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记动乱暴乱期间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原载《山西日报》，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第2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80—181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05、406页。

转引自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8日，第256—257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07—408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9日，第257、262页。

我的中国《老布什给邓小平的一封信绝密信件》1989年6月20日。载文学城 GateChina.com 2001-10-20。见64memo

见《人民日报》1989年8月4日。

见《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3日。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23—424页。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外交部就戒严部队遭枪击事件复照美驻华使馆 断然拒绝美方的无理指责和强烈抗议》。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

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同上。

同上。

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参见本卷第二十章 第二节清华大学自治会报告的死伤人数。

周舵《血腥的黎明·续篇：逃亡、被捕、获释、出国和归国》。

同上。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44—145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续篇：逃亡、被捕、获释、出国和归国》。

参见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56页。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维基百科，刘晓波。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日。

同上。

通缉令上的封从德照片取自他的档案，年龄不应该弄错，所以说是“被刻意”。

李录，男，20岁左右，南京大学学生。身高1.74米左右，体型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

《组织动乱和暴乱的头目被捕》。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

同上。

参见曾慧燕《六四学生领袖今夕》；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北京“高自联”头头熊炜投案自首》。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

《北京“高自联”头头马少方投案自首》。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6月4日晚。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同上。

《杨涛在兰州落网 贺尤二犯被抓获》。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据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通缉北京“工自联”头头和骨干》，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

《戒严部队粉碎一起焚烧汽车暴行 28名妄图纵火的歹徒交公安机关处理》，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6日。

《烧毁装甲车汽车的一暴徒被抓》。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9日。

《北京抓获反革命暴乱暴徒四百多人 “高自联”“工自联”有些头目也被缉拿归案》，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三罪犯趁乱抢劫银行在京伏法》，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北京逮捕13名反革命暴乱分子》，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1日。

《杨涛在兰州落网 贺尤二犯被抓获》。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严惩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罪犯 北京判处八名严重刑事犯死刑》。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北京又抓获一些暴徒和不法分子》。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8日。

卢云 李牧平《污损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 余志坚等三名罪犯被判刑》。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1日。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第124页。

包遵信《我与严家其》。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香港《明报》1989年6月11日刊出类似消息，说杨尚昆领导一个“六一小组”制定了一份“黑名单”，要把方励之、严家其、包遵信“用一切手段捉拿归案。”

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日，第一版。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第126页。

同上。

同上，第127页。

同上。

同上，第129页。

同上，第131—133页。

万润南《我的 1989（21）广场四君子》。

万润南《我的 1989（22）蛇口出境》。

同上。

同上。

邝岩《动乱“记者”戴晴》。原载《光明日报》。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14日，第2版。

戴晴《关于王培公起草的“我们抗议”》。见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底稿）之006。

戴晴《6月4日未遂“联名抗议”》。见1989年7月18日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底稿）之055-056。

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底稿）之095。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三节：大游行。

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底稿）之114。

苏曼殊，（1884—1918），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戴晴正准备写的一个电影剧本的主人公。

戴晴《在秦城坐牢》。

同上。

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戴晴《我的入狱》。

同上。

2016年9月2日戴晴与陈小雅的谈话。

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戴晴《我的汉声朋友》。

戴晴《不许进，不许出》。

刘刚在《我的同号陈明远》中称，自己是当晚被“押送京城”的。本文此处采用新华社石家庄6月20日讯《北京“高自联”又一头头落网》。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0日。

此处日期是参考刘刚和包遵信的回忆。

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刘刚《六四之日，良心审判系列：揭揭六四黑手的厚黑学》。http://jasmine-action-1.blogspot.com/2011/06/blog-post_3078.html

同上

同上

刘刚《我的同号陈明远》。

王耀庭，职业律师。中共党员。北京逢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从小学老师到中学老师，1979年，王耀庭成为全中国仅有的十几个律师之一，有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刑事辩护见长。曾为六四“暴徒”路中枢辩护，证其六四不在北京，及患精神分裂，死刑改无罪释放。曾代理了陈希同、禹作敏等一系列大案。曾为陈希同的私人法律顾问。

刘刚《六四之日，良心审判系列：揭揭六四黑手的厚黑学》。http://jasmine-action-1.blogspot.com/2011/06/blog-post_3078.html

同上

据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刘刚《王军涛向台湾军情局提供了哪些情报？》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19.html

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

包遵信《我与王军涛》。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

包遵信《我与王军涛》。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此处所说38军与27军对峙状态应发生在6月6日。参见本卷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木樨地军民联欢？中王庆元的回忆。包遵信此处所记有可能为次日的活动。

包遵信《我与王军涛》。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

同上。

其实是一厢情愿。据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2日（第169页）判断，当局当时已掌握其“三线计划”的证据。

见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8—20页。

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

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7—38页。

同上版，第38—39页。

同上，第68页。

陈子华《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1999年7月8日。 陈纯芝《开颅急救“无名氏”》。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08页。

陈纯芝《开颅急救“无名氏”》。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10页。

吴昊《勿使谣言惑众》。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14日，第1版。

李安达《人民感谢你们，敬重你们——崔国政烈士家庭访问记》。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3日，第1版。

同上。

同上。

有不少材料称，这些军车是军人或便衣军人所烧。也有人称是在28军军人弃车后指导民众所烧。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七节：保护与牺牲。

新华社6月8日电《军民一起清除长安街路障垃圾 天安门广场基本清扫干净很快可恢复通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8日，第1版。

王庆元《我所目睹的“六四”》 2013/6/2電子郵件。

同上。

同上。

同上。

戒严指挥部消息《军博一带群众帮助清理路障 戒严部队英勇击退持枪歹徒》。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2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5日，第246页。

刘成社《没有硝烟的战斗》。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95页。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就限制外国记者采访一事 北京市府发言人发表谈话》。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两外国记者违反北京市府令受到警告》。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

据封从德提供皮科·艾尔（英语：Pico Iyer）. The Unknown Rebel. 《时代》. 1998年4月13日 [2014年1月17日] （英文）

肖笙《六四挡坦克王维林下落？最完整录像曝光》。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5月28日。

詹姆斯·巴朗（英语：James Barron (journalist)）《CRACKDOWN IN BEIJING; One Man Can Make a Difference: This One Jousted》 Briefly With Goliath. 载《纽约时报》，1989年6月6日。

皮科·艾尔（英语：Pico Iyer）《The Unknown Rebel》。载《时代》，1998年4月13日。

吴仁华《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已遇害》。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6月4日。

安东尼·托马斯（英语：Antony Thomas）《Watch The Full Program Online》。载《前线（英语：Frontline (U.S. TV series)）》，2006年4月11日。

小乔《<邓小平时代>大陆出版内幕》。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6月5日。

Patrick Witty《Behind the Scenes: Tank Man of Tiananmen》。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3日。

Patrick Witty《Tank Man Revisited: More Details Emerge About the Iconic Image》。载《时代》，2012年6月5日。

Patrick Witty《Behind the Scenes: Tank Man of Tiananmen》。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3日。

同上。

《Tiananmen Square 1989》。载《生活》《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2003年。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Tank Man of Tiananmen》。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3日。

Monika Rebała: Kim był buntownik z Placu Tiananmen。载《新闻周刊》，2011年8月9日。

世界新闻摄影比赛. 1989, Charlie Cole, World Press Photo of the Year. 年度世界新闻摄影奖。

何凤仪《回到尘土人间 曾显华访谈》香港摄影记者协会，2013年3月20日。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Tank Man of Tiananmen》。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3日。

何凤仪《回到尘土人间 曾显华访谈》香港摄影记者协会，2013年3月20日。

《屠城后第一幕 坦克照首曝光》。载《苹果日报》，2012年6月3日。

Picture power: Tiananmen stand-off. BBC新闻。2005年10月7日；CNN Interactive: Video Almanac - 1989. 有线电视新闻网。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A New Angle on History》。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4日。

钟同仁 (Terril Jones) 《Tank Man》。波莫纳大学 (Pomona College)。2009年。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A New Angle on History》。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4日。

钟同仁 (Terril Jones) 《Tank Man》。波莫纳大学 (Pomona College)。2009年。

封从德注：德文。Eine Neue Sicht Auf Den Panzermann = A New View On The armored man (i. e. Tank man). 坦克人的新视角Panzer = a German armored vehicle, especially a tank used in World War II.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A New Angle on History》。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4日。

美联社《Man Who Defied Tanks May Be Dead》。载《洛杉矶时报》，1990年6月3日。

《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公共电视网。Interviews - Jan Wong. 《前线 (英语: Frontline (U.S. TV series)) 》。2006年4月11日 [2013年12月28日] (英文)。

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九节：六部口血案。

封从德2015年12月28日给陈小雅的信。

公共电视网。Interviews - Jan Wong. 《前线 (英语: Frontline (U.S. TV series)) 》。2006年4月11日 [2013年12月28日] (英文)。

封从德2015年12月28日给陈小雅的信。

参见小乔《<邓小平时代>大陆出版内幕》。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6月5日。2016年4月12日，记忆力超人的周孝正在陈小雅家聚会的谈话中，尚能清晰地回顾央视新闻这一录像镜头的细节。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5日、6月6日，第246、250页。

佚名《逃兵》。

同上。

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指把材料交给任何一位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交给指定的地址或人员。

佚名《逃兵》。

皮科·艾尔（Pico Iyer）《The Unknown Rebel》。载《时代》，1998年4月13日。

《Tiananmen Square 1989》。载《生活》《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2003年。

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Floor Speech on Tiananmen Square Resolution》。载《Democratic Leader》，2009年6月3日。

Su Mingyu《What Happened to the June 4, 1989 ‘Tank Man’?》。载《China Gaze》，2013年6月4日。

封从德2015年12月28日给陈小雅的信。

小乔《〈邓小平时代〉大陆出版内幕》。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6月5日。

美联社《Man Who Defied Tanks May Be Dead》。载《洛杉矶时报》，1990年6月3日。Andrew Higgins. Tycoon prods Taiwan closer to China. 《华盛顿邮报》，2012年1月21日。

小乔《〈邓小平时代〉大陆出版内幕》。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6月5日。

参见CBS公司《China's Leader Talks To 60 Minutes》。载《60分钟》，2000年8月31日。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49页。

吕正操《〈戒严一日〉读后感》。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0日，第3版。

胡卫平《京顺路一夜》。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03页。

吴家民《再度京华》。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4页。

任立本《北京人印象》。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76页。

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王红云《特殊救治》。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1—332页。

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六节 最后的纪念碑。

佟喜刚《入院后的磨难》。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12页。

同上，第313页。

同上，第313页。

杨容娅《在协和，有三十四名伤员》。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4页。

同上，1989年10月版，第339页。

陈纯芝《开颅急救“无名氏”》。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11页。

任立本《北京人印象》。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78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38页。

同上，第240页。

申敬旺《这里通向天安门广场》。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5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42页。

谷密山《第一次武装押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8页。

张建华《半块面包》。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37—441页。

王庆满《两斤饼干》。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47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吴仁祐《军需：六月四日纪事》、汪先谋《紧急抢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44、250、255页。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外交部就戒严部队遭枪击事件复照美驻华使馆 断然拒绝美方的无理指责和强烈抗议》。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英勇牺牲 臧立杰烈士追悼会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6日，第2版。

此处采用时间和军队开进方向采用新华社北京6月7日、7月4日电。见《一支戒严部队经过建国门 遭到来自外交公寓的枪击》，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美国之音”又在颠倒黑白》，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4日。但39军116师高炮团一营二连雷达站站长李晓明的陈述有所不同，他说部队是“从天安门广场前往朝阳区时在行至外交公寓路段时”遭到枪击，并称这次军队运动是“换防”。见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7日（第252页）称当事单位为“115师”，他获得报告的时间在下午2：30；部队撤离时间为3：30。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二十一世中国基金会，2003年版，第195页。

详见本书上册 第五章 第二节 异议运动的萌动。

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8页。

同上，第71页。

见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9页。

美国著名汉学家。

封从德注：《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26—627页。同上，第627页。

同上，第629页。

同上，第8页。

同上，第9页。

同上，第9—10页。

同上，第10页。

同上，第7页。

同上，第631页。

同上，第636页。

同上，第636页。

韦小宝是金庸小说《鹿鼎记》的主角，有七个老婆。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36页。

同上，第638页。

怀德《“地下通道”的生日叹息》。载《中国之春》1991年3月号。

据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刘达文《黄雀行动》，第37页，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海涛《“黄雀行动”内幕》。美国之音2007年6月5日。

参见本书下册第五章 第二节 “多余的话”包遵信和封从德的回忆。
《黄雀行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央情报局活动》。载“大家论坛” <http://bbs.chinesenewsnet.com/Dajia/Big5/11334.html> 2001年11月14日；或 <http://www.64memo.com/b5/1322.htm>

《黄雀行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央情报局活动》。载“大家论坛” <http://bbs.chinesenewsnet.com/Dajia/Big5/11334.html> 2001年11月14日。

同上。

同上。

同上。

沈诞琦《一九八九的一百万》。见《杂菇煲》，2013年11月2日。

曾慧燕《六四学生领袖今夕》。

语出《晋书·列传三十九》王导痛惜自己因误解好友周顗（伯仁）没有在皇帝替自己说话，导致伯仁被杀时的自责名言。

曾慧燕《六四学生领袖今夕》。

据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徐璐，台湾《自立晚报》记者。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六四凌晨学生撤离、军队进去时，徐宗懋在广场南边遭枪击，当时满身是血，子弹从颈部打进去，穿过喉咙，从嘴巴出来，随即被送往同仁医院。后来他的前排牙齿被换成假牙。

刘光后来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后来被捕入狱，关在武汉。

事后柴玲和封从德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封从德《六四日记——天安门广场上的共和国》，对他们此后的逃亡生活有详细记载。

注释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年5月版，第525—526页。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载64memo.com/2004。

吴仁华《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版。

封从德批注：卜正民(Timothy Brook)记录“六四”晨复兴医院死难者为59人。至6日应该有些尸体已被家人领走。

丁子霖名单#60、张汝宁，32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

王庆元《我所目睹的“六四”》 2013/6/2电子邮件。

见白志华《戳穿谣言》。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57页。1997年田大畏谈话；2015年2月21日罗立为谈话。

据64memo.com - 1989、《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629页。另有消息称，该播音员名为李丹。播音内容因翻译不同，还有如下版本：1、“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群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

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他新闻可向您报道。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大事记》6月3日—4日。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86页。2、“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装甲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装甲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轧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他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见吴仁华《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真相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吴晓镛的父亲吴学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88.4~1993.3)、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当选)。曾任国务委员(1983.6~1988.3)兼外交部长(1982.11~1988.4)。上海市人。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学生工作，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副书记、代理学委书记。1949年6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派驻布拉格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

《北京这一夜》。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4日，第1版。

《人民日报》1989年6月4日，第3、4版。

江棋生《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段》。载《“六四”参加者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9日，第258页。

以上三项为个人经历。

以上五项为在办公室听同事描述。

以上六项为朋友、同学、师长亲历或亲见。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2—433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电子版）1989年9月27日。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

封从德批注：卜正民(Timothy Brook)记录“六四”晨邮电医院死难者为28人。

杜同上。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28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最黑暗的夜晚，降临了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五）》89年6月12日。

同上。

六四档案《六四伤亡的16种说法》。64memo.com 2002年4月30日。

同上。

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5日，第2版。

台湾《联合报》1989年6月10日，第3版。

台湾《联合报》1989年7月1日，第4版。

《首曝白宫密档：六四屠杀死一万人》。载阿波罗新闻网2016年2月27日，来源：《壹周刊》。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437页。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45页。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

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清场。

在所有文献中，只有李鹏《“六四”日记》比较诚实地承认，清场历时“3小时”，但他坚持在“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则是相信了谎言。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有一位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一直在广场的东南角上，并拍摄了6月4日凌晨3个多小时天安门清场全过程的录像片。录像清楚地说明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死一个人，完全是和平撤退。”。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五节：38军进入广场。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9日。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

《北京抓获反革命暴乱暴徒四百多人 “高自联” “工自联”有些头目也被缉拿归案》。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67页。

李之云，1941年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李大庄村。1960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陆军第38军114师战士、排长、团政治处干事、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1981年1月任114师政治部主任、1981年9月政治学院基本系学习，1983年8月毕业后任114师副政委、师政治委员、1985年7月任陆军第3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90年1月任武警总部政治部主任，1993年7月任后勤指挥学院副院长（正军职）、1996年1月任政治委员。1988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90年1月晋升为武警少将警衔，1993年改授少将军衔。2001年6月退休。见《河南籍少将》：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714/22/11412242_484948196.shtml

李之云《答外国记者问》。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20—422页。

同上，第417—418页。

同上，第419页。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郑重声明》。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5日，第1版。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1025页。

同上，下册，第1025-1026页。

38军6名“共和国卫士”牺牲于翠微路口翻车事件。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七节 保护与牺牲。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89年6月30日。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第2版。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北京高教局负责人介绍 36名死亡大学生后事处理完毕》。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日，第1版。参见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名单（186人）》。

同上。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10日，第263页。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20页。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江泽民传》（英文版）第171页。据冯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文版被删节的内容。原载《亚洲时报在线》。

吕正操《〈戒严一日〉读后感》。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0日，第3版。

《〈欧洲时报〉撰文批驳严家其之流》。载《人民日报》1989年10月4日。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2、14页。

见高新《“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兼答海外众多有疑问者的疑问》。载《中国之春》1991年7月号。

见雅峰《开进途中，戒严部队的困惑》。见叶宣编《平暴纪实》，载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49页。高新所获信息对此有不同的说法，见《“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兼答海外众多有疑问者的疑问》。载《中国之春》1991年7月号。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七节 保护与牺牲。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一节 军队强行开进。出自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1998年6月4日，载《小参考》。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四节 复兴门。出自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名单》。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高新《“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兼答海外众多有疑问者的疑问》。载《中国之春》1991年7月号。

同上。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八节 南池子。出自林彬《历历在目惊心动魄的“六四”》。载《枫华园》增刊，总第35期。《天安门广场死亡真相》。原载《博讯》2001年6月7日。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三节：民族文化宫。

陈小雅《李相、汤学平访谈录》，2016年1月24日。

新华社6月13日电《在西长安街残酷凌辱被害解放军战士 群众要求严惩暴徒张建忠》。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第2版。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34—435页。

同上，第435页。

张延芳《一次难忘的遗体整理》。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40—342页。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38页。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最后的纪念碑注释。出自持4：25说法的有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198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陈小雅录音整理《27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平暴”经过的报告》。

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六节：最后的纪念碑。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六节：最后的纪念碑。出自侯德健与宋松证言。见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

见本书第八卷 第十七章 第六节 催泪弹。

郝连锁《广场东南角的枪声》。载《戒严一日》下册，第231页。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最黑暗的夜，降临了一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五）》89年6月12日。

出尘公子《残忍的民运斗士！——“广场死人二百人搬上直升机”！！》64memo.com-2002年1月22日。

载《戒严一日》下册，第232页。

见田慧英《医疗队开赴人民大会堂》。载《戒严一日》上册，第75页。

同上，第75—76页。

据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九十年代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2、91—93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5日，第246页。

参见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438页。

“哈德门”又作“哈达门”，均为崇文门的俗称，因元代哈达王府建在崇文门内而得名。《罗生门》是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借用自芥川龙之介同名小说之名，改编了芥川龙之介《筱竹丛中》的内容产生的一部电影作品。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武士被杀后的破案过程。因目击者和涉案嫌疑人的视角、立场和利益不同，各自对案情所作的叙述也不同。以后，人们常借用“罗生门”一语来比喻对同一件事，因立场不同而说出不同事实的歧异情形。

常国君《血肉谱写的壮歌》。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6页。

崇文门过街天桥。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2—23页。

同上，第23页。

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七节：保护与牺牲。

张喜波《我们在奔进》。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7—168页。

同上，第167—169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3页。

张喜波《我们在奔进》。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9页。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3页。

据中士孙朝恒说，下跪的只有指导员初慧民、他和他架着的连长王峰。见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灭绝人性的一幕 战士崔国政在崇文门天桥被杀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

张喜波《我们在奔进》。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9—171页。

《把方便让给部队 把困难留给自己 国防科工委支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称：“6月3日，在戒严部队进城受阻、遭到暴徒围攻的紧急关头，科工委派出近200名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组成工作队，冒着生命危险去接应在危难中的受阻部队。6月4日，第一批进驻国防科工委营区的戒严部队……”。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1日，第2版。

张喜波《我们在奔进》。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69—171页。

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灭绝人性的一幕 战士崔国政在崇文门天桥被杀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版，第23页。

同上。

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灭绝人性的一幕 战士崔国政在崇文门天桥被杀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

常国君《血肉谱写的壮歌》。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7—338页。

同上，第338页。

同上，第339页。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

常国君《血肉谱写的壮歌》。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9页。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要求全军向他们学习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日，第1版。

刘汉臣《他就是残害崔国政烈士的主要凶手》。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19页。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残害崔国政的部分暴徒被抓获》。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5日，第2版。

见戒严部队指挥部新闻处《灭绝人性的一幕 战士崔国政在崇文门天桥被杀真相》。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第2版。

陈纯芝《开颅急救“无名氏”》。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08页。

陈纯芝《开颅急救“无名氏”》。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10页。

吴昊《勿使谣言惑众》。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14日，第1版。

李安达《人民感谢你们，敬重你们——崔国政烈士家庭访问记》。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3日，第1版。

同上。

同上。

有不少材料称，这些军车是军人或便衣军人所烧。也有人称是在28军军人弃车后指导民众所烧。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八章 第七节：保护与牺牲。

新华社6月8日电《军民一起清除长安街路障垃圾 天安门广场基本清扫干净很快可恢复通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8日，第1版。

王庆元《我所目睹的“六四”》 2013/6/2电子邮件。

同上。

同上。

同上。

戒严指挥部消息《军博一带群众帮助清理路障 戒严部队英勇击退持枪歹徒》。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2版。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5日，第246页。

刘成社《没有硝烟的战斗》。载《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95页。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就限制外国记者采访一事 北京市府发言人发表谈话》。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两外国记者违反北京市府令受到警告》。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

据封从德提供皮科·艾尔（英语：Pico Iyer）. The Unknown Rebel. 《时代》. 1998年4月13日 [2014年1月17日] （英文）

肖笙《六四挡坦克王维林下落？最完整录像曝光》。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5月28日。

詹姆斯·巴朗（英语：James Barron (journalist)）《CRACKDOWN IN BEIJING; One Man Can Make a Difference: This One Jousted》 Briefly With Goliath. 载《纽约时报》，1989年6月6日。

皮科·艾尔（英语：Pico Iyer）《The Unknown Rebel》。载《时代》，1998年4月13日。

吴仁华《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已遇害》。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6月4日。

安东尼·托马斯（英语：Antony Thomas）《Watch The Full Program Online》。载《前线（英语：Frontline (U.S. TV series)）》，2006年4月11日。

小乔《<邓小平时代>大陆出版内幕》。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6月5日。

Patrick Witty《Behind the Scenes: Tank Man of Tiananmen》。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3日。

Patrick Witty 《Tank Man Revisited: More Details Emerge About the Iconic Image》。载《时代》。2012年6月5日。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Tank Man of Tiananmen》。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3日。同上。

《Tiananmen Square 1989》。载《生活》《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2003年。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Tank Man of Tiananmen》。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3日。

Monika Rebała: Kim był buntownik z Placu Tiananmen. 载《新闻周刊》，2011年8月9日。

世界新闻摄影比赛. 1989, Charlie Cole, World Press Photo of the Year. 年度世界新闻摄影奖。

何凤仪《回到尘土人间 曾显华访谈》香港摄影记者协会，2013年3月20日。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Tank Man of Tiananmen》。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3日。

何凤仪《回到尘土人间 曾显华访谈》香港摄影记者协会，2013年3月20日。

《屠城后第一幕 坦克照首曝光》。载《苹果日报》，2012年6月3日。

Picture power: Tiananmen stand-off. BBC新闻。2005年10月7日；CNN Interactive: Video Almanac - 1989. 有线电视新闻网。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A New Angle on History》。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4日。

钟同仁 (Terril Jones) 《Tank Man》。波莫纳大学 (Pomona College)。2009年。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A New Angle on History》。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4日。

钟同仁 (Terril Jones) 《Tank Man》。波莫纳大学 (Pomona College)。2009年。

封从德注：德文。Eine Neue Sicht Auf Den Panzermann = A New View On The armored man (i.e. Tank man). 坦克人的新视角Panzer = a German armored vehicle, especially a tank used in World War II.

Patrick Witty. 《Behind the Scenes: A New Angle on History》。载《纽约时报》。2009年6月4日。

美联社《Man Who Defied Tanks May Be Dead》。载《洛杉矶时报》，1990年6月3日。

《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公共电视网。Interviews - Jan Wong. 《前线（英语：Frontline (U.S. TV series)）》。2006年4月11日 [2013年12月28日]（英文）。

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九节：六部口血案。

封从德2015年12月28日给陈小雅的信。

公共电视网。Interviews - Jan Wong. 《前线（英语：Frontline (U.S. TV series)）》。2006年4月11日 [2013年12月28日]（英文）。

封从德2015年12月28日给陈小雅的信。

参见小乔《〈邓小平时代〉大陆出版内幕》。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6月5日。2016年4月12日，记忆力超人的周孝正在陈小雅家聚会的谈话中，尚能清晰地回顾央视新闻这一录像镜头的细节。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5日、6月6日，第246、250页。

佚名《逃兵》。

同上。

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指把材料交给任何一位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交给指定的地址或人员。

佚名《逃兵》。

皮科·艾尔（Pico Iyer）《The Unknown Rebel》。载《时代》，1998年4月13日。

《Tiananmen Square 1989》。载《生活》《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2003年。

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Floor Speech on Tiananmen Square Resolution》。载《Democratic Leader》，2009年6月3日。

Su Mingyu《What Happened to the June 4, 1989 ‘Tank Man’?》。载《China Gaze》，2013年6月4日。

封从德2015年12月28日给陈小雅的信。

小乔《〈邓小平时代〉大陆出版内幕》。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6月5日。

美联社《Man Who Defied Tanks May Be Dead》。载《洛杉矶时报》，1990年6月3日。Andrew Higgins. Tycoon prods Taiwan closer to China. 《华盛顿邮报》，2012年1月21日。

小乔《〈邓小平时代〉大陆出版内幕》。载《大纪元时报》，2013年6月5日。

参见CBS公司《China's Leader Talks To 60 Minutes》。载《60分钟》，2000年8月31日。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49页。

吕正操《〈戒严一日〉读后感》。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0日，第3版。

胡卫平《京顺路一夜》。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03页。

吴家民《再度京华》。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4页。

任立本《北京人印象》。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76页。

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王红云《特殊救治》。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1—332页。

详见本书第九卷 第十九章 第六节 最后的纪念碑。

佟喜刚《入院后的磨难》。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12页。

同上，第313页。

同上，第313页。

杨容娅《在协和，有三十四名伤员》。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4页。

同上，1989年10月版，第339页。

陈纯芝《开颅急救“无名氏”》。载《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11页。

任立本《北京人印象》。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78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38页。

同上，第240页。

申敬旺《这里通向天安门广场》。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5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42页。

谷密山《第一次武装押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8页。

张建华《半块面包》。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37—441页。

王庆满《两斤饼干》。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47页。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吴仁祐《军需：六月四日纪事》、汪先谋《紧急抢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44、250、255页。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外交部就戒严部队遭枪击事件复照美驻华使馆 断然拒绝美方的无理指责和强烈抗议》。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英勇牺牲 臧立杰烈士追悼会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6日，第2版。

此处采用时间和军队开进方向采用新华社北京6月7日、7月4日电。见《一支戒严部队经过建国门 遭到来自外交公寓的枪击》，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7日，第1版；《“美国之音”又在颠倒黑白》，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4日。但39军116师高炮团一营二连雷达站站长李晓明的陈述有所不同，他说部队是“从天安门广场前往朝阳区时在行至外交公寓路段时”遭到枪击，并称这次军队运动是“换防”。见吕易《八九年戒严部队军官访谈录》。载《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7日（第252页）称当事单位为“115师”，他获得报告的时间在下午2：30；部队撤离时间为3：30。

谷密山《第一次武装押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0页。

见刘亚洲《信念与道德》，载《刘亚洲文集》第2页。

芦光祖《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8页。

刘士忠《九万六千个包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79页。

同上，第390页。

同上，第390页。

详见吴铁林《空中补给线》。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02页。

洪希涛《611特别空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05页。

同上，第406—407页。

同上，第407页。

汪先谋《紧急抢运》。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57页。

申敬旺《这里通向天安门广场》。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下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7页。

指暴徒。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6日，第250—252页。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记动乱暴乱期间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原载《山西日报》，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第2版。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80—181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05、406页。

转引自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8日，第256—257页。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07—408页。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6月9日，第257、262页。

我的中国《老布什给邓小平的一封信》1989年6月20日。载文学城 GateChina.com 2001-10-20。见64memo

见《人民日报》1989年8月4日。

见《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3日。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423—424页。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外交部就戒严部队遭枪击事件复照美驻华使馆 断然拒绝美方的无理指责和强烈抗议》。见《人民日报》1989年7月6日。

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同上。

同上。

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参见本卷第二十章 第二节清华大学自治会报告的死伤人数。周舵《血腥的黎明·续篇：逃亡、被捕、获释、出国和归国》。

同上。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44—145页。

周舵《血腥的黎明·续篇：逃亡、被捕、获释、出国和归国》。

参见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纽约柯捷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56页。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载《中国之春》1991年6月号。

维基百科，刘晓波。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日。

同上。

通缉令上的封从德照片取自他的档案，年龄不应该弄错，所以说是“被刻意”。

李录，男，20岁左右，南京大学学生。身高1.74米左右，体型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

《组织动乱和暴乱的头目被捕》。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

同上。

参见曾慧燕《六四学生领袖今夕》；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北京“高自联”头头熊伟投案自首》。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

《北京“高自联”头头马少方投案自首》。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6月4日晚。

马少方《历史在鞭打现实——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而作》，2004年4月10日。明镜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2页。

同上。

《杨涛在兰州落网 贺尤二犯被抓获》。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据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通缉北京“工自联”头头和骨干》，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

《戒严部队粉碎一起焚烧汽车暴行 28名妄图纵火的歹徒交公安机关处理》，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6日。

《烧毁装甲车汽车的一暴徒被抓》。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9日。

《北京抓获反革命暴乱暴徒四百多人 “高自联” “工自联”有些头目也被缉拿归案》，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三罪犯趁乱抢劫银行在京伏法》，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北京逮捕13名反革命暴乱分子》，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1日。

《杨涛在兰州落网 贺尤二犯被抓获》。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严惩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罪犯 北京判处八名严重刑事犯死刑》。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7日。

《北京又抓获一些暴徒和不法分子》。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18日。

卢云 李牧平《污损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 余志坚等三名罪犯被判刑》。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1日。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第124页。

包遵信《我与严家其》。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香港《明报》1989年6月11日刊出类似消息，说杨尚昆领导一个“六一小组”制定了一份“黑名单”，要把方励之、严家其、包遵信“用一切手段捉拿归案。”

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日，第一版。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版（电子版），第126页。

同上。

同上，第127页。

同上。

同上，第129页。

同上，第131—133页。

万润南《我的 1989（21）广场四君子》。

万润南《我的 1989（22）蛇口出境》。

同上。

同上。

邝岩《动乱“记者”戴晴》。原载《光明日报》。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14日，第2版。

戴晴《关于王培公起草的“我们抗议”》。见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底稿）之006。

戴晴《6月4日未遂“联名抗议”》。见1989年7月18日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底稿）之055-056。

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底稿）之095。

详见本书第四卷 第九章 第三节：大游行。

戴晴狱中交代材料手稿（底稿）之114。

苏曼殊，（1884—1918），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戴晴正准备写的一个电影剧本的主人公。

戴晴《在秦城坐牢》。

同上。

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戴晴《我的入狱》。

同上。

2016年9月2日戴晴与陈小雅的谈话。

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戴晴《我的汉声朋友》。

戴晴《不许进，不许出》。

刘刚在《我的同号陈明远》中称，自己是当晚被“押送京城”的。本文此处采用新华社石家庄6月20日讯《北京“高自联”又一头头落网》。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0日。

此处日期是参考刘刚和包遵信的回忆。

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刘刚《六四之日，良心审判系列：揭揭六四黑手的厚黑学》。http://jasmine-action-1.blogspot.com/2011/06/blog-post_3078.html

同上

同上

刘刚《我的同号陈明远》。

王耀庭，职业律师。中共党员。北京逢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从小学老师到中学老师，1979年，王耀庭成为全中国仅有的十几个律师之一，有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刑事辩护见长。曾为六四“暴徒”路中枢辩护，证其六四不在北京，及患精神分裂，死刑改无罪释放。曾代理了陈希同、禹作敏等一系列大案。曾为陈希同的私人法律顾问。

刘刚《六四之日，良心审判系列：揭揭六四黑手的厚黑学》。http://jasmine-action-1.blogspot.com/2011/06/blog-post_3078.html

同上

据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刘刚《王军涛向台湾军情局提供了哪些情报？》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19.html

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

包遵信《我与王军涛》。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

包遵信《我与王军涛》。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此处所说38军与27军对峙状态应发生在6月6日。参见本卷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木樨地军民联欢？中王庆元的回忆。包遵信此处所记有可能为次日的活动。

包遵信《我与王军涛》。载《未完成的涅槃》（未刊稿）。

同上。

同上。

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

同上。

其实是一厢情愿。据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5月22日（第169页）判断，当局当时已掌握其“三线计划”的证据。

见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8—20页。

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

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7—38页。

同上版，第38—39页。

同上，第68页。

陈子华《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1999年7月8日。载陈小雅《佛之血——一九九\六四研究文集》。二十一世中国基金会，2003年版，第195页。

详见本书上册 第五章 第二节 异议运动的萌动。

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8页。

同上，第71页。

见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9页。

美国著名汉学家。

封从德注：《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26—627页。

同上，第627页。

同上，第629页。

同上，第8页。

同上，第9页。

同上，第9—10页。

同上，第10页。

同上，第7页。

同上，第631页。

同上，第636页。

同上，第636页。

韦小宝是金庸小说《鹿鼎记》的主角，有七个老婆。

《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636页。

同上，第638页。

怀德《“地下通道”的生日叹息》。载《中国之春》1991年3月号。

据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刘达文《黄雀行动》，第37页，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海涛《“黄雀行动”内幕》。美国之音2007年6月5日。

参见本书下册第五章 第二节 “多余的话”包遵信和封从德的回忆。
《黄雀行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央情报局活动》。载“大家论坛” <http://bbs.chinesenewsnet.com/Dajia/Big5/11334.html> 2001年11月14日；或<http://www.64memo.com/b5/1322.htm>

《黄雀行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央情报局活动》。载“大家论坛”
<http://bbs.chinesenewsnet.com/Dajia/Big5/11334.html> 2001年11月14日。

同上。

同上。

同上。

沈诞琦《一九八九的一百万》。见《杂菇煲》，2013年11月2日。

曾慧燕《六四学生领袖今夕》。

语出《晋书·列传三十九》王导痛惜自己因误解好友周顗（伯仁）没有在皇帝替自己说话，导致伯仁被杀时的自责名言。

曾慧燕《六四学生领袖今夕》。

据wumin《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人生际遇各不同》。载《文史摘要》，大蒙克顿地区中文论坛。发表于 2014-6-4 14:10。

徐璐，台湾《自立晚报》记者。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六四凌晨学生撤离、军队进去时，徐宗懋在广场南边遭枪击，当时满身是血，子弹从颈部打进去，穿过喉咙，从嘴巴出来，随即被送往同仁医院。后来他的前排牙齿被换成假牙。

刘光后来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后来被捕入狱，关在武汉。

事后柴玲和封从德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封从德《六四日记——天安门广场上的共和国》，对他们此后的逃亡生活有详细记载。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第十卷 大结局 全文完

后记

《八九民运史》（初版）脱稿于1994年3月，1996年6月，拜仲维光先生推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初版时书名为《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仅20余万字。由于当时的形势严峻、资源奇缺，使之不可能是一本史学意义上比较完备的研究著作，而过多地承载了“道义辩驳”的义务。可喜的是，由于铁幕两边的人们对于历史、舆论和公义的日益重视，我们不必像等待“延安整风”或“反右”档案的解禁一样，等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能与“八九-六四”的真相见面。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大量记述当年高层活动的书籍、文章和采访记录的发表，使我们——当代人和事件参与者——有可能在还有思考和鉴别能力的今天，比较全面地了解隐藏在那段纠结历史背后的部分真相。从而使本人，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次义务的修补。

来自当年学生领袖和运动成员的回忆，为本书的修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其中，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印制的《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记录》、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的问世，对于笔者了解学运内部的生长发展和竞争，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尤其是后者关于自身经历的点点滴滴的忆述，对于从青年心理的维度考察这场学运，显得尤为珍贵。对于本书修订有重要意义的另一部著作，是新闻界前辈、时任《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陆超祺先生的《“六四”内部日记》。它的完整性、专业代表性和可信度，不仅可以作为八九叙事一个侧面的主干，还可以补正诸多高层回忆和二手叙述。尤其在反省八九事件中的新闻界得失方面，对本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启迪作用。

此外，《怀念耀邦》系列的出版、赵紫阳《改革历程》、《杜导正日记》、李鹏《“六四”日记》、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张良《中国“六四”

真相》、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戒严一日》、陈子华主编的《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等著述，都是二十年来关于“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字。

阅读这些史料，我常常会对一个无辜的词汇感慨万千。这个词就是“没料到”——学生没料到政府会镇压；知识精英与在野政治家没料到自己一手促成的学运，自己最后驾驭不了；邓小平、李鹏没料到“四二六社论”和戒严令不起作用；赵紫阳没料到学生不听他的！——正是这些“没料到”，实际上在各个环节决定了这场运动的走向。而这些“没料到”说明，对立双方互相并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存在不切实际的希望。而由不切实际的希望主宰制定的政策，只能是“赌”——朝野双方的豪赌！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言而喻，肯定是南辕北辙！

本书依旧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追求叙事、求证与评论各不偏废的风格；重大事件、重点时段和完整案例辟专门章节的写作方法。

本书的修订从2013年开始，由于2007年脑伤，家中还有一个90多岁、中风24年的母亲需要照顾，这项工作拖拖拉拉持续了三年。期间曾几次想放弃这项看来自己已力不从心的工作。但终因初版的缺陷太明显，也因为朋友们不断地催促，特别是在笔者最困难的时候，王天定先生利用假期，为本书进行了大量文献核校工作，这些都使我不得不坚持走到今天。2016年4月，本书在征求意见和寻求出版的可能性过程中，身在美国的徐文立先生感到此书应“马上、全部出版”！加之亚马逊旗下的出版平台Createspace小徐女士的迅速反应和工作效率，本书在尚未完成修订的情况下曾以上、中、下三册面世。在《亚洲周刊》江迅先生的隆重推介下，在严家其、冯胜平、戴晴、李劫诸位大腕和新世纪、《开放》、……等网站和许多朋友的私人博客的支持下，这本尚不完善的著作，获得了空前热烈的反响。这就逼迫笔者在母亲去世，

我必须担当起全部善后家务的情况下，以残缺之身心，尽快推出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版本，以期不负广大读者的期望。

在最后修订阶段，考虑到三册版的体积过于庞大，携带不便，今后修订不便，而大众读者的关注兴趣也不一致，为避免浪费，本次出版，我将全书分拆为十卷。幸得封从德、江棋生两位博士主动援手，承担起最后校订和文字修饰工作，使本书能以今天的面目和读者见面。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上述朋友无私的相助！同时要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资料、记忆及见解的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特别是为读者提供了6月3日到4日个人经历与目击见证的文字，每当我读到这些文字，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

同时，我更要感谢直接为我提供了著作（特别是未刊著作）和各种资料、资讯的于光远、胡绩伟、许良英、郑仲兵、鲍彤、严家其、高皋、包遵信、张伟国、封从德、李盛平、仲维光、杨继绳、宋永毅、胡平、戴晴、吕朴、李大同、王鹏令、周义澄、章立凡、张勇进、王橙宇、吴洪奚、赵鼎新、高伐林、苏晓康、石晓敏、张明澍、白南生、柴玲、李进进、项小吉、江棋生、浦志强、郑旭光、马少方、罗立为、林达、何亦文、岳晓玉、茅青、任畹町、周舵、张健、李相、汤学平、顾昕、王家骏、锺兴永、梁海琼、陈毅然等先生和女士们！

此时此刻，我当然不能忘记，虽然政治观点与我迥然相砥，但在我失业的20年里，承诺养活我，为我提供了所有大陆公开发行的“89/64”出版物的父亲方克；同时感谢瘫痪24年，与我相濡以沫、给我关爱，直到最近时刻才撒手的母亲陈光，没有她对我哼哼唧唧的依赖、使我作为女人的母性得以寄托，把我拴在家里，我很可能被社会召唤，把精力散发于更为零散的事业，而精神不一定有今天的健全。

同时，在即将告别写作生涯的今天，我还要特别感谢这20多年来，曾经在各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协助的金钟、刘达文、魏承思、谭卫儿、黄方毅、何频、洪哲胜、苏绍智、胡立俊、岳明、周孝正、程翔、杨东平、周冀石、汪天山等先生，以及香港亚洲电视台、《亚洲周刊》、《明报》、《星岛日报》、《前哨》、《民主中国》、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全美学自联、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学者交流中心等曾经为我提供发表平台、学习机会和活动空间的单位。

因本人的能力、资讯和水平的限制，本书错谬肯定不少。在希望读者海涵之余，提出批评意见。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人共同的事业。完善这个研究，是我们亲历的一代人，对祖国、对青年、对历史的责任。

谢谢大家！

2016年12月平安夜